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第二卷

商务印书馆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第　二　卷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吴模信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6年·北京

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 époque de philippe II

Armand Colin Éditeur, Paris, 1990

据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 1990 年第 9 版翻译

北京市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95—263 号

2086/20

非利普二世时代的

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第　二　卷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吴模信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922-2/K·452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690 千

印数 1 200 册　　印张 32 1/4 插页 1

定价：48. 90 元

目　录

第二部分　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续)

四　各个帝国 …… 1

1. 各个帝国的起源 …… 7

土耳其的兴盛强大:从小亚细亚到巴尔干 …… 8

土耳其人在叙利亚和埃及 …… 14

从内部观察土耳其帝国 …… 17

西班牙的统一:西班牙天主教国王 …… 18

查理五世 …… 22

菲利普二世的帝国 …… 27

偶然事件和政治原因 …… 32

2. 各国的能力和弱点 …… 35

“公职人员” …… 35

职位继承人的指定权与官职的放弃和捐纳 …… 45

各种地方自治 …… 50

为国家服务的财政和信贷 …… 54

1600—1610 年:时机对中等国家有利吗? …… 64

五　各个社会 …… 76

1. 封建领主的反应 …… 77

封建领主和农民 …… 79

在卡斯蒂利亚:西班牙的最高贵族和有爵位的人同国王的对抗 …… 83

卡斯蒂利亚的西班牙末等贵族和地方行政官 …… 92
其他证据 …… 94
土耳其的连续相继的贵族 …… 97
“茨奇弗特利克” …… 105
2. 有产阶级的背叛 …… 107
地中海的各种有产阶级 …… 108
有产阶级的背叛 …… 112
贵族身份的出售 …… 115
对新贵族的敌视 …… 118
3. 苦难和盗匪活动 …… 120
未完成的革命 …… 121
是阶级斗争吗? …… 125
对漂泊者和流浪汉的敌视 …… 127
盗匪活动的普遍存在 …… 133
盗匪活动和国家 …… 135
盗匪活动和封建领主 …… 141
盗匪活动的高涨 …… 145
奴隶 …… 148
作什么结论? …… 149
六 各种文明 …… 166
1. 各种文明的多变和稳定 …… 167
社会新闻和轶事的意义 …… 167
文化财产怎样旅行 …… 171
传播和拒不借用 …… 175
希腊文明曾经残存下来吗? …… 182

永存的事物和文化边界…… 184
第二道文化边界的一个例子：伊弗里基亚 …… 187
交流和转移的缓慢速度…… 189
2. 文明的搭叠覆盖 …… 193
巴尔干东部平原的土耳其人…… 194
摩里斯科人的伊斯兰教…… 203
摩里斯科人问题…… 204
摩里斯科人的西班牙的地理…… 206
格拉纳达的悲剧…… 213
格拉纳达事件的后果…… 217
西方的霸权…… 224
3. 一种同所有其他文明对抗的文明：犹太人的命运 …… 230
一种确实存在的文明…… 232
各处犹太人社会的普遍存在…… 242
犹太教和资本主义…… 246
犹太人和总的经济形势…… 254
了解西班牙…… 258
4. 文明的传播扩散 …… 263
巴罗克风格的各个阶段…… 265
必须进行讨论吗？ …… 268
地中海文明的巨大传播中心：罗马 …… 269
另外一个传播中心：西班牙 …… 274
所谓的地中海衰落…… 277
七　战争的各种形式…… 303
1. 舰队战争和设防边界的战争 …… 304

战争与技术 …… 307
战争与国家 …… 309
战争与各种文明 …… 310
巴尔干半岛上的防御边界 …… 314
威尼斯的“罗马帝国长城” …… 315
多瑙河沿岸 …… 319
在地中海的中心：沿那不勒斯海岸和西西里海岸 …… 322
意大利海岸和西班牙海岸的防御 …… 327
在北非的海岸上 …… 329
驻防地——“一种不得已的解决办法” …… 335
赞同还是反对对部落的侵袭劫掠 …… 339
防御心理学 …… 341
2. 海上行劫——正规大战的一种补充形式 …… 343
海上行劫——古老和普遍化的行业 …… 344
与城市有关联的海上行劫 …… 349
海上行劫和赃物 …… 353
海上行劫的年表 …… 354
基督教徒的海上行劫 …… 355
基督教徒在黎凡特进行的破坏 …… 361
阿尔及尔的第一个兴隆昌盛时期 …… 366
阿尔及尔的第二个兴隆昌盛时期 …… 368
能够作出结论吗？ …… 373
赎回俘虏 …… 376
一种战争驱赶、取代另一种战争 …… 379
八 代结论：一种和几种形势 …… 399
一句告诫的话 …… 400

百年趋势 …… 401
长波 …… 405
西班牙王室的破产和经济形势的起伏波动 …… 407
内战和外战 …… 408
形势和总的历史 …… 410
短期危机 …… 411

第三部分　事件、政治和人 …… 415

一　1550—1559 年: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起和结束 …… 419
1. 战争的根源 …… 419
1545—1550 年:地中海和平 …… 419
阿弗里卡事件 …… 424
穆赫尔堡战役进行之后不久 …… 430
2. 地中海内外的战争 …… 441
的黎波里的陷落:1551 年 8 月 14 日 …… 442
1552 年的战火 …… 447
科西嘉投向法国人;英国投向西班牙人 …… 452
查理五世的弃权让位:1554—1556 年 …… 459
3. 战争重起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仍然来自北方 …… 467
沃塞尔停战协定遭到破坏 …… 467
圣康坦 …… 471
卡托—康布雷锡和约 …… 476
菲利普二世返回西班牙 …… 482
4. 世纪中叶的西班牙 …… 488
新教引起的惊恐不安 …… 489

政治上的不安与不满……………………………………………… 493
财政困难……………………………………………………………… 496
二 土耳其霸权的最后六年:1559—1565年 ………………… 525
1. 对土耳其的战争:这是西班牙的疯狂和愚蠢的行动吗? ………………………………………………………… 525
西班牙—土耳其谈判的破裂…………………………………… 526
土耳其人的海上霸权……………………………………………… 530
远征杰尔巴…………………………………………………………… 534
2. 西班牙的复兴 ……………………………………………… 552
1561—1564年 …………………………………………………… 552
同海上行劫者和严冬进行斗争:1561—1564年 ………………… 559
科西嘉暴动…………………………………………………………… 570
欧洲的平静…………………………………………………………… 575
几个关于西班牙的海上复兴的数字…………………………… 579
东·加西亚·德·托莱多………………………………………… 585
3. 马耳他:力量的考验(1564年5月18日—9月8日) … 588
发生过突然袭击吗? ……………………………………………… 589
骑士团的抵抗………………………………………………………… 592
援救马耳他…………………………………………………………… 593
西班牙和菲利普二世扮演的角色……………………………… 597
三 神圣同盟的起源:1566—1570年 ………………………… 623
1. 是荷兰还是地中海? ……………………………………… 623
庇护五世的当选……………………………………………………… 623
土耳其人在匈牙利和亚得里亚海……………………………… 627
匈牙利战争再起……………………………………………………… 634

1566年的荷兰 …… 638
1567—1568年:在荷兰的局势的影响下 …… 647
2. 格拉纳达战争的转折点 …… 657
战争浪潮的高涨 …… 658
格拉纳达战争的开始 …… 663
格拉纳达战役的后果:厄尔杰·阿里攻占突尼斯 …… 670
格拉纳达和塞浦路斯战争 …… 672
塞浦路斯战争的开始阶段 …… 678
援救塞浦路斯 …… 690
四　勒班陀战役 …… 724
1. 1571年10月7日之战 …… 725
为时已晚的缔结 …… 725
法国:一个外交因素 …… 730
唐·胡安和他的舰队会及时到达吗? …… 735
勒班陀战役之前的土耳其人 …… 738
10月7日之战 …… 741
一个无足轻重的胜利吗? …… 744
2. 1572年:惹人注目的一年 …… 748
一场一直延续到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惨案的法国危机 …… 748
1572年6月—7月给奥地利的唐·胡安的命令和逆命令 …… 758
对摩里亚的几次远征 …… 764
3. 威尼斯的"背叛"和突尼斯的两度被攻占:1573—1574年 …… 774
为威尼斯拟定的辩护词 …… 774

奥地利的唐·胡安攻占突尼斯——另一个无足轻重的胜利…… 777
突尼斯的陷落:1574年9月13日 …………………………………… 785
地中海终于有了和平 ………………………………………………… 794
五 西班牙—土耳其休战:1577—1584年 ……………………… 815
1. 马格利亚尼的使命:1578年—1581年 ……………………… 817
回顾过去:非利普二世最初的几次实现和平的尝试 …………… 817
唐·胡安时代……………………………………………………… 821
一个奇怪的胜利者:马丁·德·阿库尼亚 ……………………… 826
季奥瓦尼·马格利亚尼……………………………………………… 829
1581年的协定 ……………………………………………………… 842
2. 战争离开地中海的中心 ………………………………………… 848
土耳其面对波斯…………………………………………………… 849
对波斯的战争……………………………………………………… 853
土耳其人在印度洋………………………………………………… 861
葡萄牙战争:世纪的转折点 ……………………………………… 863
阿尔卡扎尔·克比尔……………………………………………… 867
1580年的军事政变 ……………………………………………… 874
西班牙离开地中海………………………………………………… 877
六 在重大历史事件范围之外的地中海 ………………………… 889
1. 土耳其的困难和动乱 …………………………………………… 892
1589年以后:北非和伊斯兰世界叛乱 ………………………… 893
土耳其的财政危机………………………………………………… 902
1593—1606年:匈牙利前线大规模战斗再起………………… 904
2. 从法国内战到对西班牙的公开战争:1589—1598年 …… 915
法国的地中海地区的宗教战争…………………………………… 916

西班牙—法国战争:1595—1598年 …… 932
韦尔万和约 …… 935
3. 战争将不会在海上发生 …… 940
1591年的虚惊 …… 941
让·安德烈·多里亚不愿同土耳其大舰队作战:1596年8—9月 …… 949
1597—1600年 …… 951
是1601年的一场虚惊还是一个错过的机会? …… 952
1598年9月13日菲利普二世去世 …… 955

结论 …… 975

附　录

一、本书脚注缩写汉译 …… 986
二、参考书目 …… 986

图表目录

55. 16世纪初巴尔干半岛的人口 …… 10—11
56. 国家财政预算随着经济形势变化 …… 37
57. 国家财政预算随着经济形势变化 …… 41—42
(1)威尼斯的情况 …… 41
(2)法国的情况 …… 42
58. 国家财政预算随着经济形势变化 …… 44
(3)西班牙的情况 …… 44
59. "合同"与卡斯蒂利亚的经济生活,1550—1650年 …… 55
60. 圣乔治信贷商行的"份额券",1509—1625年 …… 63
61. 1609年巴伦西亚的摩里斯科人和基督教徒 …… 198
62. 1565到1609年巴伦西亚的人口发展演变情况 …… 199
63. 阿尔贝公爵率军抵达佛兰德,1567年4—8月 …… 305
64. 托斯卡纳的海上行劫活动 …… 360
65. 被俘基徒被押解前往君士坦丁堡 …… 382
66. 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在安特卫普金融界的借款,1515—1556年 …… 476
67. 菲利普二世在工作,1569年1月20日 …… 942
68. 菲利普二世在工作,1576年10月23日 …… 943

第二部分

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续）

四　各个帝国

如果不广泛地回溯过去以重新抓住长期发展演变的方向，就无法绘制出一幅有价值的16世纪的政治全景图来。

14世纪末，这个内海即地中海属于城市和矗立于它沿岸的城市国家。当然，在这里或者那里，还有一些具有同一性质、幅员比较辽阔、濒临海洋的领土国家。那不勒斯王国这个出类拔萃的王国是这样的国家。拜占庭帝国是这样的国家。阿拉贡王国内部的联合起来的各个国家，也是这样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往往只不过是稍微扩展延伸了的强大城市而已。例如：广义的阿拉贡就是巴塞罗那的巨大活力的产物；东方帝国[①]就完完全全是君士坦丁堡和塞洛尼基两个城市的郊区。

---

① 指拜占庭帝国。——译者

在15世纪，城市已经衰落，不再能够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城市的危机首先在意大利显露出来。这场危机可能在本世纪就已经发端于意大利。一幅新的半岛地图在50年内重新绘制出来。地图的变化有利于某些城市，有损于其他城市。这场危机既然没有导致可能成为当时问题的意大利半岛的统一，因此是一种有限度的危机。我对这种统一是否构成当时的问题是持怀疑态度的。那不勒斯和米兰先后都未能完成统一意大利半岛的任务。在当时，完成这项任务还为时过早，因为居间横阻的地方主义太多，热望、渴求以自身特有的方式生活的城市太多。这就阻碍了统一大业的艰难的发端。因此，城市的危机只发展了一半，并没有充分地、彻底地发展。1454年缔结的洛迪和约，使一种平衡的和僵持的局面得以长期持续：意大利半岛简化了它的政治地图，但它仍然瓜剖豆分。

这时，一场类似的危机即将影响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确，各处的城市国家都太脆弱、太狭窄，显得不能担负起当时的政治任务和财政任务。这种城市国家代表一种不能持久的、注定要消亡的行政管理方式。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占，1472年巴塞罗那陷落，1492年格拉纳达覆灭，这些都是明显的例证[1]。

城市国家的竞争者——领土国家[2]——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只有这种国家才能提供现代战争需要消耗的大量物资和巨额费用。它供应雇佣军，购置火炮。不久以后，它还花费巨资进行大规模的海战。它的诞生和成长，是长期不可逆转的现象。15世纪末叶，这些新兴国家是：胡安二世统治下的阿拉贡、路易十一在比利牛斯山彼侧扩展的领土、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统治下的土耳其。不久以后，这些国家则是：正在意大利进行冒险的查理八

世统治下的法国和天主教国王统治下的西班牙。这些国家都已经在内地，在远离地中海的地区[3]，并且往往是在很少有城市障碍的贫瘠地区，发展了它们最初的力量。相反，这时意大利城市的富足和密布，却使意大利保持分裂和衰弱的状态。这个地区过去曾经是光辉灿烂的。这个过去现在仍然根深蒂固。因此，现代性只能十分艰难地从过去的束缚下显露出来。这样一来，光辉灿烂的过去就成了现在的突出的弱点。这一点可以从在1463年和1479年之间进行的第一次土耳其—威尼斯战争中看出。在进行这场战争的过程中，威尼斯共和国的市政议会不能受到它的过分狭长的领土的有效掩护，因此，它尽管拥有技术方面的优势，最后却不得不停止对敌斗争[4]。这一点还可以从1480年奥特朗托惨遭土耳其占领这件事中看出[5]。在查理八世1494年南侵意大利所掀起的那场风暴初期，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难道过去曾经有过比这次快速进军那不勒斯更加令人惊讶的军事行动吗？根据马基雅弗利的说法，入侵者只消让收集草料的骑兵用粉笔标出他所属部队要借宿的民房就行了。一旦惊恐情绪消散，人人都可以充当英雄好汉，随意高谈阔论，甚至还像一个名叫菲利波·特龙的贵族在1495年7月末所做的那样，对查理八世的大使科米恩嘲笑奚落。这个贵族还说，他过去并没有受关于法国国王的意图的传闻的欺骗。“当这个国王只不过想成为整个意大利的主人时，别人却说他亟欲前往圣地……”[6]

这些都是漂亮动听、渲染浮夸之词。但是，对这个半岛来说，这起事件却标志着一系列灾难的开始；对这个半岛的财富以及它在欧洲政治旋风中的中心地位来说，这起事件却标志着必然产生的不良后果，并且还毫无疑问标志着一种主要因素的，即它那极其复

杂的政治结构和即将形成“意大利平衡”的错综复杂的体系的脆弱性。从那时起,这个半岛的思想家——从这个世纪开始时的马基雅弗利和圭恰迪尼到这个世纪结束时的帕鲁塔、乔瓦尼·博泰罗和阿米拉托——都从灾难和每天发生的事件中获得教益,后来又对各国的政治和命运进行思考,这并非毫无缘由。

政治家们奇特的实验场所是意大利吗?是的,就是意大利。在那里整个民族都在谈论政治。每个人——从交易广场上的搬运工、理发店里的理发匠到酒菜馆里和小旅店里的手艺人——都根据自己的激情和偏见在那里谈论政治,[7] 因为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9]——这是意大利的重新发现——并不出自个人关起门来孤独地进行的思考[8],而是出自集体得来的经验教训。政治领域内屡见不鲜的暴行、背叛和一再点燃的个人复仇的火焰,都是各种旧的统治形式正被粉碎以及各种新的统治形式正随着人们无法驾驭控制的形势的发展变化而相继迅速产生的时代的标志。当时法院经常休庭,历届政府治理国政过于缺乏经验,以致无法避免临时采取措施和使用暴力。恐怖是统治和管理的手段。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这部著作就是教人生存的艺术,教人日复一日继续生存下去的艺术[10]。

但是,早在15世纪,并且肯定在16世纪,已经不再只有领土国家或者民族国家需要加以研究谈论了。那个时期出现了通过现存的单个的国家的聚合、继承、结盟或者联合而产生的更加巨大、更加庞杂的团体。尽管帝国这个合适的惯用词今天已经过时,但是,如果可以根据它目前的含义来使用它的话,那么这些团体就是帝国。否则怎样去称呼这些庞然大物呢?1494年对阿尔卑斯山彼

侧的事务进行干预的那个国家，已经不再仍然只是一个法兰西王国，而是一个法兰西帝国。在那不勒斯扎根定居，是这个帝国的首要目标。然后，它并不是在内海的中心停留不动，而是响应罗得岛骑士团一再发出的呼吁，迅速进军东方，保卫基督教在那里的事业，解救圣地。不管一个名叫菲利波·特龙的人对这件事怎样评说，查理八世的复杂的政策就是这样。这项政策就是十字军东征政策。它一举而横断、拦阻整个地中海。没有某种神秘主义，就不会有帝国，而在西欧，除了十字军东征这种神秘主义之外，在天地之间并没有什么别的神秘主义存在。查理五世的例子在不久以后就将证实这一点。

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统治下的西班牙，已往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统一于君主一人身上的诸多王国、国家和民族的联盟。素丹也统治着一个由被征服的和忠实的、与素丹同呼吸共命运的或者受素丹控制的各个民族组成的结合体。在这个时期，海上探险事业正在开始产生首批现代殖民帝国。这有利于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这些殖民帝国的重要性连当时目光最锐利的观察家开始时也没有看清楚。马基雅弗利本人在观察动荡不安、一片混乱的意大利的景象时，过分逼近景物，以致不能高瞻远瞩。这是通常头脑清晰的观察家的弱点，而这个弱点却是多么严重啊！[11]

16 世纪在地中海上演的戏，首先是一出政治发展演变方面的引人注目的戏。在这出戏的演出过程中，海中的巨兽占据了各自的位置。大家知道，法国由于外部环境，还毫无疑问由于它的仍然落后的经济，由于它对可靠的道德准则的爱好，由于它对宏伟壮丽的

事物的憎恶,而未能完成它刚刚开创的帝国事业。但是,没有发生的事,本来是可能发生的。梦想建立一个像曾经倚靠热那亚的西班牙帝国(不错,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那样的倚靠佛罗伦萨的法兰西帝国,并非纯属荒谬不经之举……大家也知道葡萄牙这个已经不完全是地中海国家的国家是怎样在地中海范围之外发展的(几个摩洛哥属地除外)。

因此,各个帝国在内海的崛起,就是奥斯曼人在东方的崛起和哈布斯堡家族在西方的崛起。正如利奥波德·冯·兰克很久以前就已经指出的那样,这对孪生强国的崛起,在历史上构成独一无二的篇章。在进一步阐述之前,我们还应该立即加上这一点:并不只是环境和偶然的机遇,对这个伟大的同一时期的历史的产生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不认为苏里曼大帝或者查理五世的所作所为是偶然的事物(正如亨利·皮雷纳自己曾经坚持过的那样)。他们这些人物本身无疑具有偶然的性质,但是,他们的帝国并不是偶然产生的。我也不认为,英格兰的"力量均衡"(balance of power)政策的创制者沃尔西具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1521 年,沃尔西违反他自己制定的原则,不去援助最弱小的弗朗索瓦,而去支持尼德兰和德意志的主人查理五世,即支持当时最强大的人物。他这样做就为查理五世在帕维亚突然取得的胜利打开了大门,铺平了道路,并且还应该对把意大利弃置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达两个世纪之久这件事负责……

因为,我并不否定个人和环境的作用,我认为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经济高涨的同时,存在着始终有利于幅员广大的国家,甚至幅员非常广大的国家,有利于这些"粗壮厚实的国家"的形势。关于这

些"粗壮厚实的国家"，今天有人又开始对我们说，未来属于这些国家，正如18世纪伊始，正当彼得大帝的俄罗斯日益发展壮大之时，正当一个至少是路易十四的法国和菲利普五世的西班牙之间的王朝的联盟开始缔结之时[12]，未来曾经在短时期内属于这些国家一样。西方发生的事，又在东方发生，情况大同小异。1516年，埃及的素丹包围自由城市亚丁，并顺理成章地占领了这座城市。但是，1517年，土耳其素丹同样顺理成章地占领了整个埃及[13]。人时时刻刻都有被比自己更加肥壮的人吃掉的危险。

事实上，历史对庞大的政治集团来说，时而有利，时而不利。它竭力促使这些政治集团成长壮大，发达兴旺，然后又竭力使之衰落削弱，分崩离析。这些集团在政治方面发展演变的方向并非一旦确定就一劳永逸，永不改变。并不存在任何注定灭亡、无可救药的国家。也并不存在任何命中注定，不管怎样都必然会成长壮大，似乎受命运之托来"吃领土并且吞掉它们的同类"的国家[14]。

两个帝国在16世纪显示出它们令人生畏的威力。但是，从1550年到1600年，它们同样严峻的衰落时刻已经初步开始，而到了17世纪就明确地开始了。

1. 各个帝国的起源

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候，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觉察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

没有什么事比编制这张年表更加困难了。这张年表并不是一份大事记,它只不过是一次惯常进行的可能有医疗错误的诊断或者听诊而已。

土耳其的兴盛强大[15]:从小亚细亚到巴尔干

三个世纪反复的和持续的努力以及长期的斗争和奇迹,是土耳其的兴盛强大的根源所在。16、17 和 18 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经常专心致志深入研究的,就是奥斯曼人的这个“奇迹般的”方面。奥斯曼人的历史的确是多么奇怪啊!他们随着在小亚细亚的变化不定的边界地区进行的战斗成长壮大起来,而这些边界地区正是冒险家和宗教狂热分子的渊薮(因为小亚细亚是一块举世无双的、充满神秘主义的狂热崇拜的土地)[16]!在这个场所,战争和宗教并驾齐驱,好战团体比比皆是,而且众所周知,土耳其近卫军士兵曾经同阿克哈依斯和伯克塔西斯等势盛力强的教派紧密结合。奥斯曼国家的行动、发展变化、基础和初期的狂热都源出于这些因素。奇迹是:这样一个蕞尔小邦竟能在经历了各次动荡和它的地理位置必然招致的种种意外事件之后继续存在下去。

它继续存在,并且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安纳托利亚各地的缓慢的变化。奥斯曼王朝的命运,从根本上说,是与那种往往无声无息地把土耳其斯坦的各个民族推向西方的强有力的入侵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小亚细亚的内部变化结出的果实[17]。这个在 13 世纪属于希腊并信奉东正教的小亚细亚,既由于外部不断有人渗入和发生了彻底的社会断裂,也由于伊斯兰教的各个教派的令人吃

惊的宗教宣传,变成了属于土耳其的并信奉伊斯兰教的土地。在上述伊斯兰教的各个教派中,有一些是革命的、“共产主义的”教派,例如巴巴伊斯派、阿克哈依斯派和阿布达尔派等就是这类教派;其他如科尼亚的麦夫勒维斯派等则是更加神秘的、信仰更加狂热的、更加热爱和平的团体。科普品萨德最近继 G. 胡阿尔特之后,阐明了这些教派的信徒的使命”[18]。它们的诗歌,亦即它们的宣传,是西土耳其文学的黎明的标志……

在海峡的彼岸,自然环境曾经大大有利于土耳其从事的征服。巴尔干半岛远非寸草不生、贫瘠不毛之地。说得更恰当些,在 14 世纪和 15 世纪,这个半岛甚至曾经是肥沃富饶之乡。但是,它四分五裂。拜占庭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那里互相争斗。在宗教方面,东正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在那里对抗、交锋。最后,在社会方面,巴尔干世界极端脆弱,真正是一座用纸牌搭成的房屋。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土耳其人在征服巴尔干时,利用了一场令人惊奇的社会革命。对农民冷酷无情的封建领主社会,突然受到冲击,崩溃瓦解,自行消亡。这次征服意味着大地主的末日来临。这些大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是绝对的主人。根据某些观点,这次征服是“穷鬼的解放”[19]。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小亚细亚终于被耐心地、缓慢地征服了。巴尔干半岛似乎没有对入侵者进行抵抗。保加利亚人在土耳其人到来之前,很久以来就饱受剧烈的和深重的农村动乱的折磨[20]。土耳其后来在保加利亚进展迅速。甚至在希腊也发生过社会革命。在塞尔维亚,民族封建领主正在消失。一部分塞尔维亚村庄被并为清真寺的财产(wakf)或者被分配给土耳其骑兵(sipahis)[21]。这些既是士兵又是终生领主的

土耳其骑兵，最初要求的是用现钱缴付杂税，而不是劳役。过了一些时候，农民的景况再度艰难起来。此外，在波斯尼亚和在萨拉热窝周围发生了大批改宗事件。众所周知，这些改宗事件部分是波哥米勒斯根深蒂固的异端引起的[22]。对阿尔巴尼亚来说，情况还更加复杂[23]。这里，地主能够在威尼斯人的驻防地避难。1501年以前一直属于威尼斯市政会议的都拉斯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些驻防地——堡垒和要塞——陷落时，阿尔巴尼亚的贵族就逃亡到意大利。在他们的子孙后代中，有的在某些情况下一直到现在还在意大利居留。1600年在那不勒斯绝嗣的穆萨基家族的情况则不是这样。我们有一部珍贵的关于这个家族的《穆萨基家族史》。这部著作1510年由乔瓦尼·穆萨基出版。它阐述了一个家族、一个国家和整整一个社会等级的命运。这个古老的家族的名称，在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叫做穆萨基的地区保存下来[24]。这个家族曾经在这个地区拥有大量田产[25]。该家族的流亡者及其移居史令人感到惊奇。巴尔干半岛所有的封建领主和地主的历史，并不全都是这样。但是，不管他们的命运如何，甚至当他们放弃或者不放弃宗教信仰暂时逃跑成功的时候，总的问题依然如故，即：在土耳其人面前，整整一个社会自行崩溃瓦解了。这就使人再次认为阿尔贝·格雷尼埃的这个感想体会是真实的、毫无例外的："只有急欲被人征服的民族，才会被人征服。"

这个社会现实说明入侵者为什么能够长驱直入，进行破坏，取得成功。他们的骑兵迅猛推进，势如破竹，深入敌境，切断道路，毁坏庄稼，扰乱经济生活，为后来的主力部队进行的征服铺平道路。只有山区在一个时期内受到保护，没有遭受所向披靡的土耳其人

的侵犯。土耳其人按照巴尔干的地理现实条件行事，首先控制了沿着各条流往多瑙河的江河的通衢大道。这些河流是：马里查河、瓦尔达尔河、德林河、摩拉瓦河……等。1371 年，土耳其人在马里查河畔的切尔诺门取得胜利；1389 年在瓦尔达尔河、德林河和摩拉瓦河的发源地科索沃一波尔日（“乌鸫田野”）取得胜利；1459 年，这一次是在铁门北部的斯梅德雷沃，土耳其人取得胜利。“该地是摩拉瓦河和多瑙河的会合处。它和贝尔格莱德同样控制着匈牙利平原的前山地带。”[26]

土耳其人很快就在东部各个平原的辽阔地带取得胜利。[27] 1365 年，他们在安德里诺普尔建都。1386 年，整个保加利亚，接着整个色萨利都被征服。[28]在西部山区，征服进行得比较缓慢，而且这种征服往往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征服而已，并非真正的征服。在希腊，雅典于 1456 年被占领；摩里亚于 1460 年被占领；波斯尼亚于 1462—1446 年被占领[29]。尽管某些“山区国王”进行抵抗，黑塞哥维那也于 1481 年被占领[30]。威尼斯自身无法长期阻止其他国家进入亚得里亚海。1479 年，斯库台被攻占；1501 年，都拉斯被攻占。还剩下另外一种征服，一种进行得更加缓慢的征服需要强调指出。这种征服的内容是：道路和据点的修建，骆驼商队的组建，所有负责军需供应和运输的驮畜队的投入活动（这些驮畜队往往交由保加利亚骡夫负责管理）；最后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土耳其人降服的，或者设防的、或者修建的城市所组织的那种征服。这些城市是传播和发扬土耳其文化的真正中心。这些中心至少抚慰了、驯化了、驯服了被征服的国家和地区。不应该设想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一个不断使用暴力的体制。

土耳其进行的征服,最初显然是靠向被征服的民族征收捐税来维持的。科索沃战役之后,成千上万个塞尔维亚人或者被当作奴隶出卖(出卖的范围包括基督教国家的市场)[31],或者被征募为雇佣兵。但是,对征服者来说,这并非毫无政治意义可言。从穆罕默德二世给予自1453年起就被召请到君士坦丁堡来的希腊人的特许权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意义来。土耳其人最后设置了一些机构和职位。巴尔干半岛上的人逐一在这些机构中任职,同征服者进行合作,并且在有的地方奇怪地复活了拜占庭帝国的豪华排场。这种征服建立了一种秩序:土耳其和平。我们应该相信这个在1528年写过下面一段话的匿名的法国人的话:"这个地方是安全的。没有流传过任何拐骗新闻,也没有任何人在通衢大道上拦路抢劫……皇帝不容忍有任何拦路抢劫者或者强盗。"[32]在同一个时期,关于加泰罗尼亚或者卡拉布里亚的情况,难道也可以这样说吗?既然在基督教徒眼里,土耳其帝国由于国内国泰民安、井然有序而长期显得令人赞赏、不可思议、令人困惑,既然它的军队以纪律严明、不事张扬,也以英勇善战、军火充足、士兵素质良好、艰苦朴素而使西方赞叹不已,因此,上述这幅令人鼓舞的图景中的一部分就应该是真实的。然而,悖于常理的是,这并不能阻止基督教徒憎恨这些"在他们从事的各项事业中比狗坏得多的非基督教徒"。这句话说于1526年[33]……

然而,评论终于逐渐公正起来。土耳其人可能是上帝降到世上来的刑鞭。关于土耳其人问题,瑞士法语地区的新教改革家皮埃尔·维雷于1560年写道:"如果上帝像他过去在犹太人抛弃对他的信仰时惩罚犹太人那样在今天假手土耳其人来惩罚基督教徒,

我们是不会感到惊讶的……因为土耳其人今天是基督教徒的亚述人和巴比伦人了，是上帝的笞杖、刑鞭和狂怒”。[34]从这个世纪的中叶起，另外一些像勒芒的伯龙那样的人，不久就承认了土耳其人的美德和效能。后来，人人都向往这个奇特的和怪异的国家。这是一个摆脱了西方社会及其束缚的地方。

用欧洲的错误和弱点来解释说明土耳其人的行动，这已经是个进步。[35]一个拉古萨人对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谈过这件事：[36]当欧洲国家正处于四分五裂之时，“在土耳其却是一人大权独揽，人人都唯素丹之命是听，由素丹一人进行统治。国家的全部收入都归他所有。一言以蔽之，他就是主人，其他人全是他的奴隶”。这大体上就是1533年阿罗依西乌斯·格里蒂对费迪南的各个大使所作的解释。阿罗依西乌斯·格里蒂这个奇怪的人物，是一个威尼斯人和一个女奴所生的儿子，长期深受奥斯曼帝国易卜拉欣帕夏的宠信。查理五世不该让他的军队冒覆灭之险去和苏里曼的军队对抗：不错，查理皇帝有权有势，然而，并不是人人都对他俯首听命。这一点我只想以德意志和路德教派各省作为例子[37]。

这个情况是真实的：土耳其的力量仿佛被一种真正的机械作用吸入欧洲的衰弱的复杂体中。欧洲发生的激烈的重大争吵，有利于土耳其一直推进到匈牙利，并且促使它这样做。布斯拜克写得很对[38]：“正是贝尔格莱德的攻占（1521年8月29日）产生了大量灾祸。这些灾祸来临的时间还很短，我们目前还在它们的重压下呻吟。这次攻占打开了那扇野蛮人通过它进入欧洲大陆蹂躏匈牙利的大门；这次攻占引起路易王死亡，导致布达陷落和特兰西瓦尼亚丧失。假如土耳其人最后并没有攻占贝尔格莱德，他们就永远不会

进入这个惨遭他们蹂躏，过去曾经以欧洲最繁荣昌盛的国家之一著称的匈牙利。”

事实上，1521 年，即贝尔格莱德战役爆发之年，是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之间的长期的大规模的激烈冲突开始的一年。随后，在 1526 年进行了莫哈奇战役。再后，1529 年维也纳被围。班德洛在这一重大围城事件发生后不久，撰写了《新闻》一书。[39]他在书中描绘一个预计局势将会恶化到顶点的基督教世界。他指出“这个世界由于基督教各国君主之间日益分裂不和，招致被土耳其人征服，而减缩为欧洲的一个地区……”情况可能是这样的。除非欧洲[40]并不是谋求粉碎奥斯曼帝国的迅猛的势头，而是正如一些历史学家很久以前就指出的那样，[41]的确被另外一些冒险活动，例如在大西洋上和在辽阔的世界上进行的冒险活动吸引，情况才不是这样。也许应该推翻这种十分陈旧的、错误的、尚未湮没消失的解释，即：土耳其所进行的征服，促成并引起各个重大的地理发现。事实截然相反，正是地理大发现在黎凡特地区形成一个人们对之兴趣较小的地区。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土耳其人因而得以在这个地区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就扩展开来并且定居扎根。因为当土耳其人 1517 年 1 月占领埃及时，20 年前瓦斯科·达·伽马就已经完成了绕非洲好望角的航行。

土耳其人在叙利亚和埃及

如果没有弄错的话，在奥斯曼帝国强大兴盛的时期，比攻占君士坦丁堡更加重大的事件，即被理查德·布斯奇·桑特内尔有些夸张地称为“这个

插曲”的事件[42]，难道不就是土耳其人先后于1516年和1517年一鼓作气，乘胜挺进，完成了对叙利亚和埃及的征服一事吗？这是奥斯曼国家未来的伟大历史的首次闪现。[43]读者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征服这个行动本身并没有丝毫特别伟大之处；这个行动毫无困难就完成了。叙利亚北部的边界纠纷，再加上马穆鲁克素丹为了置身于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之间充当调解人而进行的尝试，在时机一旦到来时，都被人当作借口。视火炮为不光明正大的武器的马穆鲁克骑兵1519年8月24日在阿勒颇附近无法抵抗谢里姆一世的火炮。叙利亚一下就落入9月26日进入大马士革的征服者手中。埃及新马穆鲁克素丹拒绝承认奥斯曼的封建君主地位，因此谢里姆让他的军队一直推进到埃及。1517年1月，马穆鲁克骑兵在开罗附近再次被土耳其的火炮打垮。[44]炮兵再次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权，情况正如1492年法国、莫斯科公国[45]和格拉纳达[45]等地的情况一样。

埃及在进攻者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就被征服。该地区的秩序几乎没有受到丝毫扰乱。马穆鲁克骑兵依靠他们巨大的财产，很快重新掌握了主要的权力。三个世纪以后，波拿巴发现他们仍然在那里。托特男爵写的这段话无疑是正确的：“人们通过对谢里姆素丹的法典的研究，应该推测出这位君主更主要是同马穆鲁克骑兵妥协，而不是征服埃及。人们的确发现这位君主在让统治那个王国的24个贝伊继续存在的同时，谋求的只是用一个被他立为总督和国务会议主席的帕夏的权威来抵销这些贝伊的权威而已……”[47]这个看法是要人不要夸大1517年的征服的意义。

然而，这次征服毕竟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谢里姆

得自埃及人的东西价值巨大、非常可观。他最先得到的是开始时虽然微薄[48]但却不断增多的贡品。奥斯曼帝国先参加来自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非洲黄金的买卖，然后又参加运往基督教世界的香料的贸易。这些活动通过埃及进行。我们已经指出这种黄金贸易和红海的航路在中东的总的贸易中再度具有的重要性。当土耳其人在瓦斯科·达·伽马绕好望角航行很久以后在埃及和叙利亚扎根定居时，这两个国家当然已经不再是通往远东的独一无二的门户了。但是，这两道门户仍然重要。横亘在地中海基督教世界和印度洋之间的这道土耳其长堤，[49]就这样全部筑成并且巩固起来。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这座大城市和一个广大的麦、米以及蚕豆的产区之间的联系也建立起来。在以后的某些时机，埃及在土耳其帝国的发展演变中，往往是决定性的因素和(甚至可以说)使人腐化堕落的因素。有人坚持认为，经常败坏政治秩序的官职捐纳制度[50]从埃及一直传到奥斯曼帝国的各个角落。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但是，谢里姆从他进行的征服中得到一笔和黄金同样宝贵的财富。他早在成为尼罗河的国家的主人之前，就已经教人为他祝福祈祷，已经扮演了大教长哈里发[51]的角色。现在埃及让他正式就任这个圣职，还可能为他举行了就任圣职的仪式。根据传说——这是传说，但这一点无关紧要——马穆鲁克骑兵在埃及收纳的阿拔斯王朝的最后一个避难的统治者，把统治所有的真正穆斯林的哈里发的职位让给了谢里姆。不管这是否传说，土耳其素丹从埃及返回本国时荣殊誉满，被人大事颂扬，享有很高的威信。1517 年 8 月，他从麦加的酋长的儿子那里甚至取得通往卡阿巴的要隘。[52]就从

这个日期起，穆罕默德的绿旗必须交给精锐的骑兵卫队保管。[53]毫无疑问，谢里姆1517年晋升到大教长的显职高位这件事在伊斯兰世界引起的反响和轰动，与两年后西班牙的查理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一著名事件在基督教世界引起的反响和轰动同样巨大。16世纪初期的这一年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的极其巨大的威势和宗教方面的不容忍异己的浪潮的来临（因为任何事物都要为自身付出代价）[54]。

谢里姆在取得胜利后不久，1520年死于前往安德里诺普尔的路上。他的儿子苏里曼在无人与之竞争的情况下继位。尽管有人对这位君主的健康状况作了悲观的预测，但确保并巩固奥斯曼帝国的坚固威势的这个荣誉，后来仍然属于他所有。这位君主胜任自身的职责。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一点：他是在有利的时刻功成名就的。1521年，他攻占通往匈牙利的大门贝尔格莱德。1522年7月，他包围罗得岛，并于同年12月攻下该岛。圣约翰骑士团的这个令人生畏的和坚固的堡垒攻克后，整个东地中海都似乎成了这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志在必得的目标。什么都再也阻挡不了这个已经占有地中海的大片海岸的人拥有一支舰队。他的臣民和希腊人，其中包括威尼斯所属的各个岛屿上的希腊人[55]，向他提供建立一支舰队所需的人员。这个光辉的胜利所开创的苏里曼的伟大的统治，如果没有先前对叙利亚的征服，难道会这样光辉灿烂吗？

从内部观察土耳其帝国

作为西方的历史学家，我们只从外部观察土耳其帝国的运转。这只观察到一半，而且是在

片面地加以解释说明。对伊斯坦布尔的和土耳其的其他地区的极其丰富的档案资料的使用,逐渐改变了人们这种肤浅狭隘的和陈旧过时的观察事物的方式。应该从帝国内部去观察这部巨大的机器,以便更好地了解它的功能、它的力量、它的弱点(因为这已经变得很明显了)[56]和它的发展变化。这样做等于对一种统治方式提出质疑,对这种方式进行研究。这种方式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混合的和复杂的遗产,也是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的一种宗教秩序和社会秩序。奥斯曼王朝的帝国伟业跨越几个世纪,因而包括一系列连续的、不同的、有时甚至互相矛盾的历程。在普瓦蒂埃战役之后的最初几年,在我们称为百年战争的战争的最初的几个阶段,从小亚细亚扩展到巴尔干半岛(1360 年)的,是一种"封建"制度。这是一种建立在欧洲的被征服的地区并造成一种土地贵族阶级的封建制度(以封地和采邑为基础)。历代素丹都对这个贵族阶级加以控制,其效果则不完全相同。后来,素丹坚持不懈地、成功地同这个阶级进行了斗争。但是,奥斯曼社会的这个统治阶级,即素丹的奴仆构成的这个统治阶级,后来不断改变它的成员。它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各次斗争,后来从内部标出这部重要的帝国历史的节奏。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回到这段历史上来。

西班牙的统一:西班牙天主教国王

一方面是奥斯曼王朝;另外一方面是哈布斯堡家族。在后者崛起勃兴之前,西班牙统一的缔造者们——天主教国王——在这部帝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如果说并不比布尔萨或者安德里诺普尔的

历代素丹在奥斯曼帝国的创建史上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的话，至少同等重要。被称为百年战争的这场战争之后的15世纪的那股迅猛势头，促进并推动了西班牙国王的事业。对史官关于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的业绩的撰述，的确不应该不加鉴别地全盘接受。对于天主教国王的事业，我并无意贬低。这项事业颇得天时与人和之助。这项事业是城市有产阶级所企望和要求的。这个阶级对内战十分厌倦，渴望国内和平，渴望和平贸易和安宁。第一个西班牙的城市同盟是一次大规模的城市的发展演变。它的报警的钟声在各个城市之间此鸣彼应，宣告新时代到来。城市拥有民主传统生活的惊人的储备力量，保证了西班牙国王的胜利。

我们不应该夸大这出命运剧的主要演员扮演的角色。当然，这个角色是重大的。几个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因1469年的婚姻而在事实上已经实现了的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联合，也可能在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之间实现[57]。伊莎贝拉可以在同葡萄牙人结婚和同阿拉贡人结婚这两起婚事之间，可以在大西洋和地中海这两个海洋之间进行选择。总而言之，顺应形势发展趋势的伊比利亚半岛的统一，正在议论、酝酿和流转之中。问题在于选择葡萄牙模式还是选择阿拉贡模式。后者不一定优于前者。进行选择轻而易举。两者都唾手可得。最终于1469年作出的决定，标志着卡斯蒂利亚转向地中海。鉴于王国的传统、政策和利益，这种转向是一项会带来重重困难的、引起畸变歪曲的、但仍然在一个世纪之内迅速完成了的事业。费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婚姻1469年缔结。1474年，伊莎贝尔在卡斯蒂利亚登基。1479年，费迪南在阿拉贡即位。1483年，葡萄牙的威胁终于消除。1492年，对格拉纳达的征服完成。1512年，

西班牙所属纳瓦拉的归并完成。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够把这个迅速完成的统一比作法兰西国家的缓慢而艰难的创建。法兰西国家的创建是以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之间的地区为基础的。我们不应该说：地域不同，事实各异；而应该说：时代不同，事实各异。

如果西班牙的这个迅速完成的统一没有产生一种必然会有的狂热的对帝国的盲信的话，那就会使人惊讶不置。希梅内斯家族的西班牙受到15世纪末叶宗教复兴的推动，并处于这次复兴的顶点，仍然生活在十字军东征时代的氛围中。因此，对格拉纳达的征服和几年以后在向北非扩张时最先采取的步骤都具有不容否认的重要性。对西班牙南部的占领，不仅完成了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土地的再征服，不仅把一个土地肥沃、拥有灵巧工艺和人口众多的城市地区置于西班牙国王的支配控制之下，而且还使卡斯蒂利亚的被长期牵制、固定在同西班牙伊斯兰教徒中不甘灭亡的残余分子进行的战争中的军队解脱出来，使之能够从事外部冒险。上述的残余分子形成一股年轻的力量。[58]

然而，西班牙的注意力几乎立即从对非洲的征服转向别处。1492年，克利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3年后，天主教徒费迪南被卷入意大利的纠纷中。卡尔洛·佩雷拉[59]这个怀有狂热偏见的历史学家责备费迪南，责备这个过于精明能干的阿拉贡人转向地中海。费迪南由于转变了方向，不去致力于缔造西班牙的真正的前途。这个前途存在于欧洲之外，存在于非洲的崎岖不平、寸草不生、荒凉贫瘠的土地上，也存在于美洲这个无人知晓、西班牙的主人听任人们在那里用最坏的方式进行冒险的世界上。不错，征服者们的惊人的冒险业绩应该归功于那种凭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去处置

海外世界①的行动。我过去曾指责马基雅弗利不重视、不承认海上的发现具有的潜在的重大意义。然而，读者想想，晚在17世纪，就连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这个黎塞留的并非一贯失败的敌手，这个几乎跻身伟人之林的人物，那时也还不了解西印度群岛的重要性呢。[60]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比阿拉贡的政策更加合乎情理了。这项政策包含很多它过去的传统。阿拉贡被它的过去和经验引向地中海。它的海岸、航运和属地（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西西里岛），使它同地中海结合起来。它像整个欧洲和整个地中海一样，必然受到意大利肥沃富饶的土地吸引。1503年，天主教徒费迪南由于贡萨洛·德·科尔多瓦的卓越指挥，占领了那不勒斯。因此，这时他获得一个重要战略据点和一个富裕王国。这次成功导致阿拉贡舰队取得胜利和西班牙步兵团经过这位大统帅的组建正式诞生。在世界的总的历史上，西班牙步兵团的诞生是与马其顿的方阵的诞生和与罗马军团的诞生意义同等重大的事物。[61]要了解这股把西班牙引向内海的吸引力，我们决不能够根据16世纪末期可能向我们提供的一个几乎无法生活、债台高筑的那不勒斯国家的形象来判断、想象16世纪初期的那不勒斯。在16世纪末期拥有那不勒斯就是背上一个包袱。但是，1503年，甚至还在1530年，[62]那不勒斯王国既提供有价值的战略位置，也提供巨大的财源。

最后，卷带和驱动西班牙的阿拉贡政策的目的，也在于遏制伊斯兰教的推进。这项政策使西班牙人先于土耳其人前往北非。西

① 原文为ultramar，指美洲。——译者

班牙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是站立在基督教世界的最前沿的堡垒上。路易十二可以一再夸口说："我就是西班牙国王武装起来反对的那个摩尔人。"[63]尽管如此，仅仅由于西班牙国王拥有的领土的位置，西班牙国王就日趋成为十字军运动的捍卫者，并因而肩负这个运动所包含的任务和拥有这个运动所包含的特权和好处。西班牙的十字军由费迪南率领，从半岛出发，不是毫不犹豫地深入它面临的贫困的非洲，也不是迷失于新世界中，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置身于当时基督教世界的中心，置身于这个世界的受到威胁的心脏——意大利。这是一项传统的、古老的但很光荣的政策。

查理五世

查理五世在西班牙继承费迪南的王位。他那时名叫查理·德·根特，1516年改称查理一世。他继位后，事事都复杂化和扩大化起来，情况和地中海的另一端在苏里曼大帝继位后的情况相同。西班牙当时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气势宏伟的、引人注目的统治下降居次要地位。查理·德·根特1519年改称查理五世。他成为西班牙的查理的时间不长。由于感情和健康的原因，他在很晚的时候，直到自己一生的末期，才成了西班牙的查理。这件事相当奇怪。西班牙尽管曾经有力地造成了查理五世的赫赫威势，但没有在查理五世的历史上扮演过重大角色。

当然，忽视西班牙对查理五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奉行的冒险政策和从事的霸业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公正的。此外，天主教国王们都为他们的这个外孙的命运和继承权作过精心的准备和安排。他们难道没有朝着所有有用的方向，在所有的地区：英格兰、葡

萄牙、奥地利和尼德兰，进行过活动吗？他们难道没有在王室的婚姻这个领域内一再进行赌博吗？包围法国并制服这个危险的邻国的想法，预先就决定了这个奇特的、似乎被挖空了的、中心有空洞的哈布斯堡帝国的形态和性质。对西班牙来说，选中查理·德·根特既是偶然的巧合，也是预先的谋算、准备和企求。毫无疑问，如果发生一起意外事件，历史的进程就会改变。以西班牙为例，如果它在查理的母亲、1555年才死于托德西利亚斯的疯女胡安娜生前不承认查理，或者它表态拥护查理的兄弟、在半岛上抚养长大的费迪南，那么，让我们讲下去，查理就可能在151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中落选。尽管如此，欧洲并不会因此而逃脱一次大规模的建立庞大帝国的试验，早在1494年就已经开始在这条冒险的道路上行进的法国，就可能再开始这样做并且获得成功。我们不应忘记，在查理五世的运道的背后，长时期存在着尼德兰的那股和大西洋的新生活相结合的强大的经济力量。尼德兰是欧洲的十字路口、工业和贸易中心。这个中心必须具有销路、市场和政治安全。德意志帝国当时虽然本身已经趋于瓦解，但仍然威胁着这种政治安全。

既然欧洲自动朝着建立一个庞大的国家的方向前进，建立帝国这出戏就迟早会上演。如果查理五世有另外一种命道，那么，会发生变化的就不是这出戏本身，而是这出戏上演的方式。1519年，法兰克福的各个选帝侯无法作出有利于推举本民族的人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侯选人的决定。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德意志经不起这种候选人身份带来的重压，因为它需要同时同两个候选人进行斗争，既反对弗朗索瓦一世，也反对查理。不管人们曾经怎样议论过，德意志选举查理是两害取其轻，而不单纯是选择了

那个拥有维也纳、守护它受到威胁的东部边境的人。我们不应忘记,1519年贝尔格莱德还是基督教世界的要塞。在这个城市和维也纳之间,延伸着一道很厚的匈牙利王国的屏障。匈牙利的边界1526年才被突破。那时,而且仅仅在那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哈布斯堡王朝的和奥斯曼王朝的历史命运虽然并没有被不适当地混同为一,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被混同得相当厉害。下面这些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民间歌谣可能没有在1519年流传过:

他为自己的祖国,
完成了所有业绩,
免得罗马的王冠
落入土耳其人手里。

事实上,德意志后来并没有充作查理五世的行动据点。1512年,马丁·路德成了查理五世命运的障碍。1520年9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埃克斯拉沙佩勒(亚眠)加冕之后不久,为了他的兄弟费迪南的利益,放弃了他和匈牙利公主安娜的婚姻。1522年2月7日,他在布鲁塞尔秘密地把世袭领地让给他的兄弟。[64]他这样做,就是放弃他个人在德意志的一切宏伟的功业。

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由于当时的局势,查理五世无法直接依靠西班牙。这个国家当时对欧洲来说,还是穷乡僻壤,还没有得到大量来自新世界的金银财宝。1535年以前,它都没有大量得到。查理五世在同法国的斗争中,他的两处阵地必然是意大利和尼德兰。自1521年起,这场斗争就成了他每天的生计。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把他的力量使用在欧洲的这个中枢上。大首相加蒂纳拉谏劝查理五世首先控制住意大利……这时,查理五世在尼德兰,至少在和

平时期，获得巨额收入并有可能获得借款，而且还同 1529 年一样，得到预算的剩余。惯常的说法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全部负担都落在尼德兰人肩上。1552 年以后，这种说法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流行。已经压在西西里、那不勒斯甚至米兰的头上的那种意外的灾难当时也在尼德兰发生。这种灾难就是：西西里等地虽然明显地是富有之邦，它们的预算余额却几乎枯竭。事态的发展可能转趋直下，因为查理和菲利普二世把他们的军事努力投向尼德兰，因为尼德兰的商业已经因此蒙受了损失。当然，从西班牙运来了大量钱款。菲利普二世后来特别重视这一行动。但是，1560 年争论仍在继续。尼德兰声称它遭受的损失比西班牙重，“后者当时并没有遭到什么损失，并且还继续在安全通行证的掩护下同法国进行贸易”。[65]因此，西班牙不应该为它在这场它声称只是为了使西班牙国王能“在意大利站稳脚跟”[66]才进行的战争中受到的痛苦过分怨天尤人。这是一场徒劳无益的争论。但是，这场争论后来却转而不利于佛兰德。菲利普二世在西班牙定居。1567 年，阿尔贝公爵的目标之一，就是使叛乱的尼德兰各省把赃物吐出来。因此，有一部翔实可靠的尼德兰的财政史，将会是十分有用的。[67]1559 年，威尼斯人把尼德兰描绘成一个殷实富足、人口众多，但生活费用高昂得可怕的地区。“在意大利价值为二、在德意志价值为三的，在佛兰德就价值为四和五。”[68]是美洲白银的到来和后来的战争引起的物价上涨最终破坏了尼德兰的财政机制吗？索里亚诺 1559 年在其所著《游记》一书中写道：“这些地区是西班牙的财宝，是它的宝库，是它的印度。这些地区在法国、意大利和德意志成年累月进行的战争中支撑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事业……”[69]索里亚诺唯一的错误在于他把这些

说成是他提笔著书时存在的情况……

意大利的尼德兰为查理五世当时的政策提供了双重的充满活力的实施样式。西班牙和德意志出的一份力量有时也添加进这项政策的实施中。因此,对研究菲利普二世的统治的历史学家来说,查理五世的帝国似乎是世界性的,对意大利人、佛兰德人和勃艮第人是十分开放的。当然,这些人有时会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左右和西班牙人摩肩接踵。在费迪南五世和伊莎贝尔统治西班牙的时期和菲利普二世统治西班牙的时期之间的查理五世时代,是一个颇具世界特征和世界意义的时代。十字军东征这个词的概念本身已经改变。[70]它已经失去了它的伊比利亚半岛的性质,并且远离“复地”的理想。在1519年的皇帝选举后,查理五世的政策脱离本土,耽于全球王朝的梦想之中……加蒂纳拉在这位君主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不久,写信给他说:“大人,既然上帝给予您极大的恩泽,使您升居基督教世界所有的国王和所有的君主之上,使您的威势如此之大,以致迄今只有您的前任查理大帝才有这样大的威势,因此,您现在正在通向全球王朝的道路上,即将把基督教世界集合在唯一的一个牧羊人之下。”[71]这个全球王朝的思想不断激发和推动查理五世的政策。此外,这个思想和当时人文主义的巨大潮流有密切关系。一个1520年在西班牙居留的德意志人格奥尔格·绍尔曼把他的《关于西班牙的陈情书》献给帝国秘书佩德罗·鲁伊斯·德·拉·莫塔。他在这份文书中竭力促使西班牙本身转而接受具有平定与和解作用并团结整个基督教世界同土耳其人对抗的全球王朝的思想。马塞尔·巴塔荣指出,这个基督教世界团结一致的思想,对伊拉斯谟,对他的门生弟子和朋友来说,曾经是何

等珍贵。[72]1527年，罗马惨遭洗劫。维沃斯致函伊拉斯谟说“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取得伟大胜利和教皇遭到监禁，耶稣基督给予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特别的实现这个理想的机会。”[73]

很少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具有启发开导性，更能示明那种像烟雾一样模糊不清的思想意识的真正色调，更能示明那种围绕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政策，以及这位皇帝常常在其中获得他的行动的动机的梦想……这决不是构成那个世纪的重大政治戏剧的事物的最索然寡味、最不引人入胜的一面。

菲利普二世的帝国

16世纪后半世纪，菲利普二世接替了查理五世，继承了他的事业。他也是一个帝国的主人。但是，这个帝国多么迥然不同啊！这个帝国在关键性的1558—1559年，出现于伟大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遗留下来的疆域内，它甚至比查理五世的帝国还更加庞大、更加团结、更加巩固，在欧洲受到的约束更少，更加以西班牙为中心，并因而更被引向大西洋。这个帝国的君主虽然缺少那个似乎能够把他的其他不胜枚举的称号归结统一起来并使之圆满的富有魅力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但这个帝国却已经具有一个帝国的实体、疆土以及五花八门、不相一致的现实事物和财富。经过一些上帝才知道是什么样的谋算和犹豫之后，查理五世的这个儿子被排斥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继承人的行列之外。早在1551年，在奥格斯堡，在原则上，但也仅仅是在原则上，已经决定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王位留给他来继承。[74]他在例如罗马宫廷，在这个万众瞩目的主要舞台上，和在同法国大使争

夺居先权的斗争中,因缺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个称号而感到痛苦难受。因此,1562 年,这位谨慎国王千方百计谋求这个帝国的王冠。1563 年 1 月,传闻他即将被宣布为西印度群岛皇帝。[75]1563 年 4 月,流传类似的消息[76]:菲利普将被宣布为“西印度群岛和新世界的国王”。下一年,即 1564 年,1 月份,谣言继续流传。这又是关于他将就任西印度皇帝的谣传。[77]20 来年之后,即 1583 年,消息传遍威尼斯。据说菲利普二世再度渴望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个显赫的称号。法国大使在给亨利三世的信中写道:“陛下,我从这些贵人那里获悉,格朗弗勒红衣主教今年 9 月已经来到罗马,设法让人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授予他的主人。”[78]

这是威尼斯的无稽之谈吗?即使这是无稽之谈,也饶有趣味。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菲利普三世后来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候选人。这并非单纯追求虚荣的政治活动。在一个人们竭尽全力追求声誉、威望、顾全颜面的世纪里,一场无情的为争夺居先权而进行的斗争使法国国王的大使和西班牙国王的大使发生冲突。1560 年,菲利普二世为了结束这场激怒人的、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斗争,建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他向特兰托会议任命同一位大使。菲利普二世由于不是这个帝国的皇帝,就在表面荣誉方面丧失了在基督教世界里属于他的第一把交椅。在查理五世的一生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同他或者同他的代表争夺这把交椅。

菲利普二世的帝国的最根本的特征,是它的西班牙特性。人们应该把这一点称为它的卡斯蒂利亚风格。这个事实没有逃过谨慎国王的同代人——朋友或者敌人——的眼睛。他们注意观察他,发现他是一只置身自己的网的中心、几乎一动不动的蜘蛛。但是,菲

利普之所以在1559年9月以后，在他从佛兰德返回后，不再离开半岛，从他那方面来说，这仅仅是出于强烈的爱好以及坚定不移的对西班牙的偏爱吗？难道这不也是，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不也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吗？我们已经指出，查理五世的帝国所属各个邦国默不作声，拒不表态，纷纷拒绝提供、付给实施他的谋略、政策所需的费用。西西里、那不勒斯、米兰以及后来尼德兰等地的亏空和赤字，使这些地区成了拖累这个帝国的包袱，成了菲利普二世这位君主无法再前去居留的地方。菲利普二世在尼德兰体验到这一点。从1555年到1559年，他在那里多亏西班牙的金钱援助，或者由于怀着这些援助会到来的希望，才得以生活下去。然而，对一个君主来说，取得这些援助而不在提供这些援助的当地定居的这种做法，变得日益困难起来。菲利普退向西班牙，就必然是退向来自美洲的金钱。如果说有什么过错的话，过错就在于没有朝着这些金钱尽可能走得远些，一直走到大西洋，走到塞维利亚，或者在更晚些时候一直走到里斯本。[79]难道是欧洲的诱惑力，是更好地、更快地了解在嗡嗡不停的大蜂窝里发生的事的这种需要，把国王阻留在半岛的正中心，阻留在这个他本能地感到适意的卡斯蒂利亚的特巴伊德①吗？

蛛网的中心固定在西班牙这件事，产生了很多后果。首先产生了一种西班牙民众对住在他们中间的国王的与日俱增的盲目的爱戴之情。菲利普二世在卡斯蒂利亚人中间受到的爱戴和他的父亲

① 特巴伊德为埃及一无人居住地区，许多基督教苦行者在此隐修。这里喻指僻静的隐修地。——译者

在低地国家的善良的人中间受到的爱戴同样深切。此外,还由此产生了半岛上的人、利益和激情偏见必然会具有的主导地位。这种地位就是那些卡斯蒂利亚产生的、被菲利普二世用于处理外部事务的冷酷的、高傲的、不妥协的大封建领主的主导地位。菲利普虽然使用大封建领主处理外部事务,但在使用人处理日常事务和官场的例行公事方面,对平民有突出的偏爱……在一个瓜剖豆分为各不相同的部分的帝国内,查理五世势必到处游移不定。他必须绕过怀有敌意的法国的障碍,把他的御驾亲临产生的温暖轮流带到他的各个王国。菲利普定居一地不动,助长了固定不变的行政机构的庞大臃肿。这个机构不再会由于旅行的需要而精简。公文这股水流的流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巨大。帝国的各个部分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降到二等国家的地位,而卡斯蒂利亚则上升到宗主国的地位。意大利各省的发展演变是清清楚楚的。在那里,对西班牙的仇恨处处显露出来。这种仇恨是时代的标志和暴风雨的先兆。

不错,菲利普二世没有敏锐地觉察到这些变化。他自以为是查理五世的政策的继承人,是他的弟子。这个弟子本身对已经接受的教训过分念念不忘,把他应该处理的事务的先例过分牢记在心。在这方面,他得到他的左右,诸如阿尔贝公爵和格朗弗勒红衣主教等人的协助。这位红衣主教是已经不复存在的帝国政策的内容的神妙的目录以及活的档案。毫无疑问,菲利普处于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经历过的环境类似的或者似乎类似的环境中。他像查理五世那样作为尼德兰的主人,为什么却不谨慎地对待其善良愿望对北欧十字路口的安全来说必不可少的英格兰呢?他像他父亲那样肩负领导各个邦国的重任,为什么却不以他父亲为榜样,谨慎小心,坐

待时机，致力于控制管理、组织这些遥远的、从未协调一致过的属地并使之和平安定呢？

然而，环境会引起根本的变化。只有过去的外部标志依然存在。查理五世的宏伟的、甚至过分宏伟的计划、方针和谋略，在菲利普二世的统治开始时，在1559年的和约缔结以前，就因1557年的财政灾难而无法付诸实施，并被无情地化为乌有。帝国机器必须检修、重造，并使之重新运转。查理五世在使他气喘吁吁、疲于奔命的东奔西跑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刹车。在菲利普二世统治的最初几年，和平的恢复势头迅猛。这是新的衰弱的标志。后来，较多由于环境的推动，较少由于这位君主的热情，宏伟的方针和谋略才得以再度提出。这个我们不妥当地称之为反改革运动的声势浩大的天主教改革运动，不断取得进展，逐渐确定起来。这个运动诞生于整整一系列努力，经过长期的、缓慢的酝酿准备。1560年，它已经声势浩大、强大得足以改变谨慎国王的政策的方向。在1580年以后，它面对信奉新教的北欧，突然猛烈爆炸。正是这个运动把西班牙推入菲利普统治时代末期的大规模斗争中，使这位君主成了天主教的倡导者和天主教教义的捍卫者。宗教的狂热激情在这里比在对抗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中更加高涨。十字军东征是一场人们几乎违心地在地中海地区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勒班陀战役似乎是个没有产生任何后果的插曲。

还有另外一个具有强制性的因素。这就是：在15世纪80年代以后，来自新世界的贵金属的数量达到了到那时为止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额。格朗弗勒返回西班牙宫廷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菲利普二世统治的末期出现的帝国主义，并不仅仅

是由于格朗弗勒的参与才产生的。始于15世纪80年代的那场大规模的战争,的确是为了争夺对已经变成世界中心的大西洋的控制而进行的。这场战争的结果将决定大西洋归属宗教改革派还是归属西班牙人,归属北欧人还是归属伊比利亚人,因为现在人人都对大西洋垂涎三尺。强大的西班牙帝国携带它的白银、武器、船舶、辎重和政治思想转向这个广阔的战场。在同一个时期,奥斯曼人坚决把背转向地中海,不予理睬,以便进行在亚洲的斗争……必要时,这些事实会使我们回忆起地中海的两个帝国至少在16世纪最后20年以同样的节奏生活,使我们回忆起地中海不再是它们的野心和贪欲的主要目标。这两个帝国后来撤退和衰落的时刻,在地中海不是比在别处到来得更早吗?

偶然事件和政治原因

历史学家今天在他们的说理、论述中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这一点看来是合理的。这样,在我们必须讨论的事物中,很多——当然并不是全部——都受到人口增加、贸易明显加快和后来经济衰退的左右。我们的论点是:在长期趋势的倒转和奥斯曼王朝以及哈布斯堡家族建立的庞大的政治集团将经历的一系列困难之间,可以确定存在着某种联系。为了使这种联系更加清楚地显现出来,我们有意撇开那些集中精力研究时代的杰出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历史学家所作的解释。如果仅仅通过这些解释来观察事物,这些解释就会歪曲一切。我们也对那些对我们来说更加有趣的、冗长的政治论证推理撇开不顾,因为政治和制度也会由政治本身,由制度本身加以解释。

在大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的最后一本书中的短短一段里，[80]又十分奇怪地进行了论战。他的部分观点与我们上述的观点截然相反。在他看来，只有一条粗大的线：资本主义的逐渐的发展演变(这条线我们称为“主导”线)。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其他事物，都只不过是偶然的、始料未及的、机遇的或者属于细枝末节的事物而已。“对南美洲的征服，产生了一股贵金属的洪流。”这是一种偶然的事物。没有这股洪流，哈布斯堡家族的胜利就会无法想象。“价格革命”使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具有爆炸性。这也是一种偶然的事物。在16世纪，正在扩展的各个国家(我还加上各个帝国)，在各自的面前找到自由的道路，这也是一种偶然的事物。偶然的事物怎样会产生呢？因为昔日庞大的政治强国事实上已经自行消亡。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于125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时消亡。罗马教廷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消亡，因为它的胜利只不过是一个以巨大代价换取来的胜利而已……1453年之前很久，拜占庭帝国就已经衰落了。

如果人们要做到公允无私、不轻易自以为是的话，一幅这样的图景(虽然熊彼特的书里的这一段非常简短)就值得逐点细加研究。但是，我们既然是在处理当务之急，就应该认为罗马教廷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在13世纪的自然倾覆，并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盲目的自我毁灭政策结出的果实。正如在16世纪一样，在13世纪，经济的飞跃发展使某些政治方面的发展演变成为可能，并为巨大的政治变化铺平了道路。紧接这次经济的飞跃发展而来的是一个衰退时期。这个时期的影响可以普遍感觉到。下个世纪发生的一系列崩溃，可以归因于长期的萧条，即这个“中世纪之秋”。这个

"中世纪之秋",标示出从拜占庭帝国到格拉纳达王国这些要砍伐的腐木朽株,其中包括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本身。所有这一切,从开始到终结,是一个缓慢的、自然发展演变的过程。

随着大体上在15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经济恢复,下一轮灾难、破坏、革新和重建即将发生。罗马教廷在马丁·路德进行叛乱和奥格斯堡会议(1530年)遭到失败以后,才遭到沉重打击。罗马本来可能奉行一项不同的政策、一项更加和解、更加抚慰的政策。我们应该加上这一点:罗马教廷甚至在政治上,在整个16世纪,直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1648年),都仍然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我们再回到其他论点上:价格革命的发生——这一点是熊彼特自己说的[81]——先于新世界的贵金属大量到来。同样,(路易十一的、兰开斯特的亨利七世的、阿拉贡的胡安的、穆罕默德二世的)领土国家的发展壮大先于美洲的发现。最后,新世界的矿藏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因为欧洲具有开发和利用这些矿藏的能力。开发矿藏并非毫不花费钱财。据说卡斯蒂利亚是在赌彩票中获得美洲的。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它后来不得不开发美洲,并且始终根据借贷平衡规律来进行开发。其次,即使新世界不提供易于获得的矿藏,西欧的发展需要所形成的这股驱动力量也会找到其他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机会,并把其他掠夺物带回西欧。路易·德尔米尼在他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提出,[82]西方世界在选择那里的一切几乎都由它来创造的新世界的时候,是否忽略了一项可能的选择,即选择大量东西在那里已经唾手可得的远东,或许还忽略了其他一些选择:非洲的黄金、中欧的白银。这些是在顷刻之间得到的并又在转瞬之

间放弃的财富……是西方这部发动机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约瑟夫·熊彼特的论据的确在重复一些古旧的课文和古旧的书本知识。在这些书本知识中，历史学家所说的偶然的巧合，是个方便的借口。这个论据排斥、低估各个国家的重要性，而各个国家却同资本主义一样，是一种复杂的发展演变结出的果实。实际上，历史形势这个事物，在它最广泛的意义上已经把所有的政治力量的基础都包括在内了。它促成或者废弃这些基础。当一场新的赌博开始时，赌赢的人永远不会全是过去的赢家：手气过了。

2. 各国的能力和弱点

人们觉察到的，主要是16世纪的种种形势和机遇所推动、促成的各个国家和各个“帝国”的兴起产生的效果，而不是导致这种兴起的原因。现代国家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建立起来。它应该增强它用以维护它的威势的手段、工具和代理人。这是新的现象中的最明显不过的现象。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

“公职人员”[83]

于是以密集的队形出现了我们不是由于对现代词汇的过度使用，而是出于方便将称之为“公职人员”的这种人。他们占据着政治历史的道路，这是事实。由于他们的缘故，发生了一场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政治革命。

公职人员受命执掌政权以后，立即把一部分公共权力据为已有。至少在16世纪，他们在各地都出身微贱。在土耳其，他们往往

出身为基督教徒,属于被征服的种族。他们也往往是犹太人。这是他们附加的缺陷。根据H.格尔策尔的统计,[84]在从1453年到1623年这段时期任土耳其首相的48人中,5人为土耳其族人(如果可以说是土耳其族人的话。这5人中有1个切尔卡西人),10人出身不详,33人是背教者(其中有6个希腊人、11个阿尔巴尼亚人或南斯拉夫人、1个意大利人、1个亚美尼亚人、1个格鲁吉亚人)。一直爬到土耳其官职等级的顶峰的基督教徒的人数显示出基督教徒已经以何等规模渗入奥斯曼帝国的公职人员的行列。最后,如果说奥斯曼帝国更像拜占庭帝国而不像某个蒙古帝国的话,[85]其原因就是这种大规模的公职人员招聘活动。

我们对西班牙的公职人员的情况比对其他地方的公职人员的情况更加了解。在这个国家,公职人员出身于城市的平民百姓,甚至出身于农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自称是西班牙末等贵族的后代。在西班牙,谁又不声称自己是这种贵族的后代呢?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的社会地位的上升却逃不过任何人的注意,特别是逃不过他们的公开的敌人之一、大军事贵族的辩护人迪戈·乌尔塔多·德·门多萨的注意。这位辩护人在其所著《格拉纳达之战》一书中指出[86]:“西班牙国王把司法事务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交到文士(letrados)的手里。这是介于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之间的、地位中等的、既不触犯前者也不触犯后者的以研究法律为业的人。”这些文士是意大利的文献资料提到的“法学博士”的同行,是16世纪的法国法律家的同行。这些法国法律家不管是否来自图卢兹大学,都由于他们具有罗马法思想而为瓦卢瓦家族的专制主义出过大力。乌尔塔多·德·门多萨怀着使他变得明智清醒的仇恨,提到这些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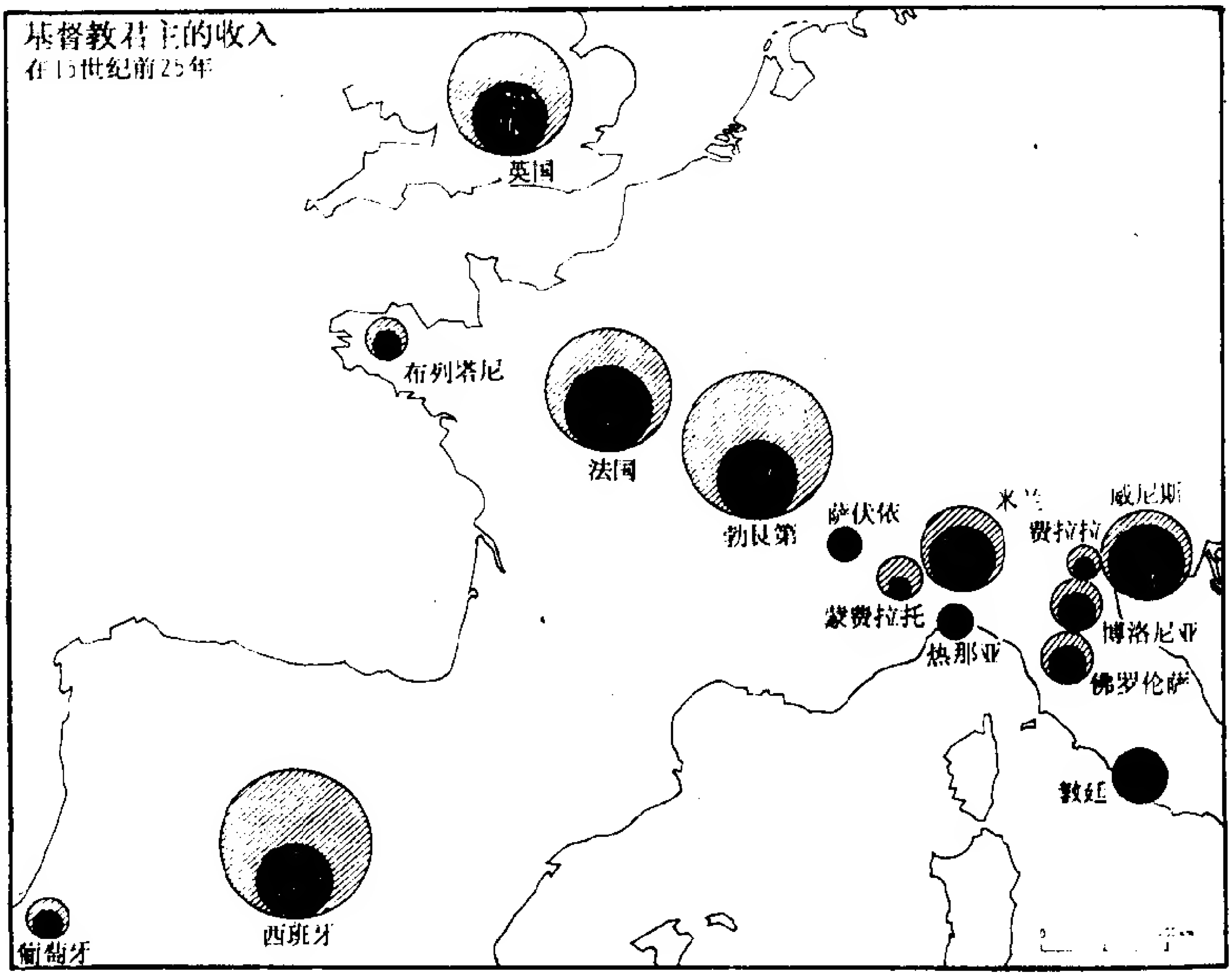


图 56　国家财政预算随着经济形势变化

威尼斯的这些奇怪的估算(见《总结算》,第 1 册,第 1 卷,威尼斯,1912 年,第 98—99 页)肯定不会绝对准确。但是,不管怎样,它却显示出在 1410 年和 1423 年之间这段时期欧洲国家的财政预算来源的总的减少(1410 年的数字用晕线形成的灰色圆圈表示;1423 年的数字用黑色圆圈表示)。英格兰的财政收入从 200 万杜卡托下降到 70 万杜卡托;法国的财政收入从 200 万杜卡托下降到 100 万杜卡托;西班牙的财政收入从 300 万杜卡托下降到 80 万杜卡托;威尼斯的财政收入从 110 万杜卡托下降到 80 万杜卡托。即使这些数字是准确的,仍然需要像计算实发工资那样计算实际财政预算。总的说来,国家似乎总是有些落后于经济形势的变化,无论在经济形势趋于上升时还是趋于下降时,情况都是这样。换句话说,国家的财政预算来源在萧条时期和收缩时期,比其他减少得慢——这是它的优点;在恢复时期,则比其他增加得慢。这个假说不能被已经提到的文献资料和以后将引用的文献资料证实。只有这个事实是肯定无疑的:国家的财政预算来源根据当时占主流的经济形势变化。

职人员的整个队伍:民事法官、刑事治安法官、法院院长、法院(类似法国的最高法院)的成员以及居于一切之上的卡斯蒂利亚会议的最高委员会……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权限达到所有领域,及于一切事务,比起对合法的事物和不合法的事物的审理权来,既不大也不小。他们妒嫉别人的职务,并时刻准备侵越军事当局(实际上是大贵族家族)的权限。这种进行统治和惩罚的工具并不局限于西班牙的范围内:"这种统治工具和方式遍及整个基督教世界,今天正处于它的力量和权威的顶峰[87]。乌尔塔多·德·门多萨在这个方面并没有错。让我们想象一下,在已经功成名遂、得到权位的文士之外的那一大群正准备步入仕途的,越来越充塞西班牙的各所大学(不久以后又充塞新世界的各所大学)的人。在下个世纪初,新西班牙的另一个大封建领主、克里奥尔人巴列侯爵罗德里戈·维沃罗[88]统计出有7万名大学生。他在计算时心绪十分恶劣。在这些大学生中,有鞋匠和农夫的儿子。如果说这不是国家和教会的过错,又是谁的过错呢?它们通过提供政府和教会的职位,以和求知欲相同的程度把人们吸引到大学里来,使之人满为患。有的文士往往在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或者在萨拉曼卡取得他们的学位。不管怎样,即使有人认为7万名大学生在罗德里戈·维沃罗眼里是个巨大数字,但与西班牙的人口相比,这个数字仍然微不足道。这股社会的推动力,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建设时期起,就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甚至那里已经出现了出身十分微贱的像西印度法律的编纂者帕拉西奥斯·鲁比奥斯[89]那样的"王室办事员"。他的父亲甚至连西班牙的末等贵族都不是。于是,后来在查理五世的统治下,出现了贡扎洛·佩雷斯这个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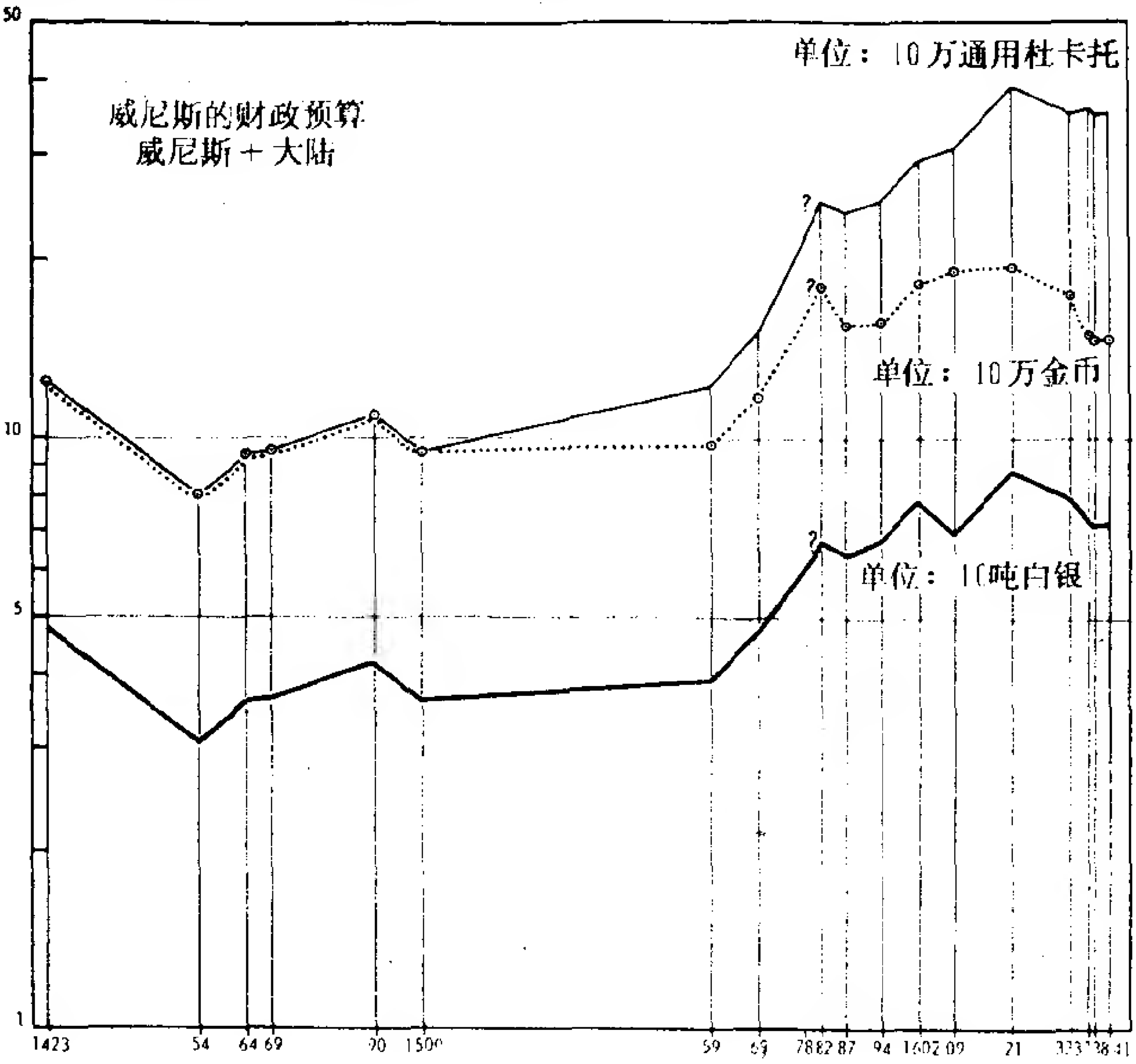
低下、后来被人怀疑其直系亲属是犹太人的秘书。[90]于是还在菲利普二世在位期间，出现了埃斯皮诺萨红衣主教。这位主教1572年死于中风，死时荣殊誉满，身兼多职，头衔颇多，留下一所档案汗牛充栋、文件堆积如山的房屋。这些档案和文件他生前还来不及一一过目，往往在那里睡大觉达数年之久……贡扎洛·佩雷斯同埃斯皮诺萨红衣主教和东·迪戈·德·科瓦鲁维亚斯·德·莱瓦一样，也是神职人员。他的亲戚塞巴斯蒂安·德·科鲁维亚斯·德·莱瓦1594年编写了一份相当长的对他的过去的介绍。[91]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了解东·迪戈的情况的时机。他生于托莱多。他的父母是贵族，出生于比斯开。东·迪戈在萨拉曼卡开始他的社会活动，曾经在奥维耶多中学任教，后来又在格拉纳达的法院任法官，接着任罗德里戈城主教，继而成为"西印度群岛中"圣多明各的大主教，最后任卡斯蒂利亚法院院长，并于当时被授予昆卡的主教辖区（事实上他在拥有这个辖区之前，于1577年9月27日死于马德里，时年67岁）。如果要说明什么的话，他的一生就说明：人可以同时在教会和国家两个方面任职；而在西班牙，教会又比别处向穷人把门开得更大。

在土耳其，苏里曼的统治时期既是战争胜利时期，也是进行多种建设和大规模立法活动的时期。苏里曼有立法者苏里曼的称号。这就使人能够想象到在他统治之下的各个邦国，特别在君士坦丁堡，法学研究重新兴起，而且还存在一个法学家阶级。他制订的法典把司法机构管理调节得如此之好，以致据说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派遣一个专家代表团去君士坦丁堡考察研究这个司法机构的运转情况[92]。事实上，他制订的土耳其法典在东方和《查士丁尼法典》

在西方,[93]或者和《法律汇编》在西班牙同样著名。苏里曼在匈牙利的全部立法工作由法学家阿布尔斯—苏乌德负责。这项工作取得的成果在所有权问题这个领域内是如此重要,以致它的很多细小部分还存留至今。一本私法手册[94]的作者、法学家易卜拉欣·哈勒比,同样应该列入16世纪西方最大的法学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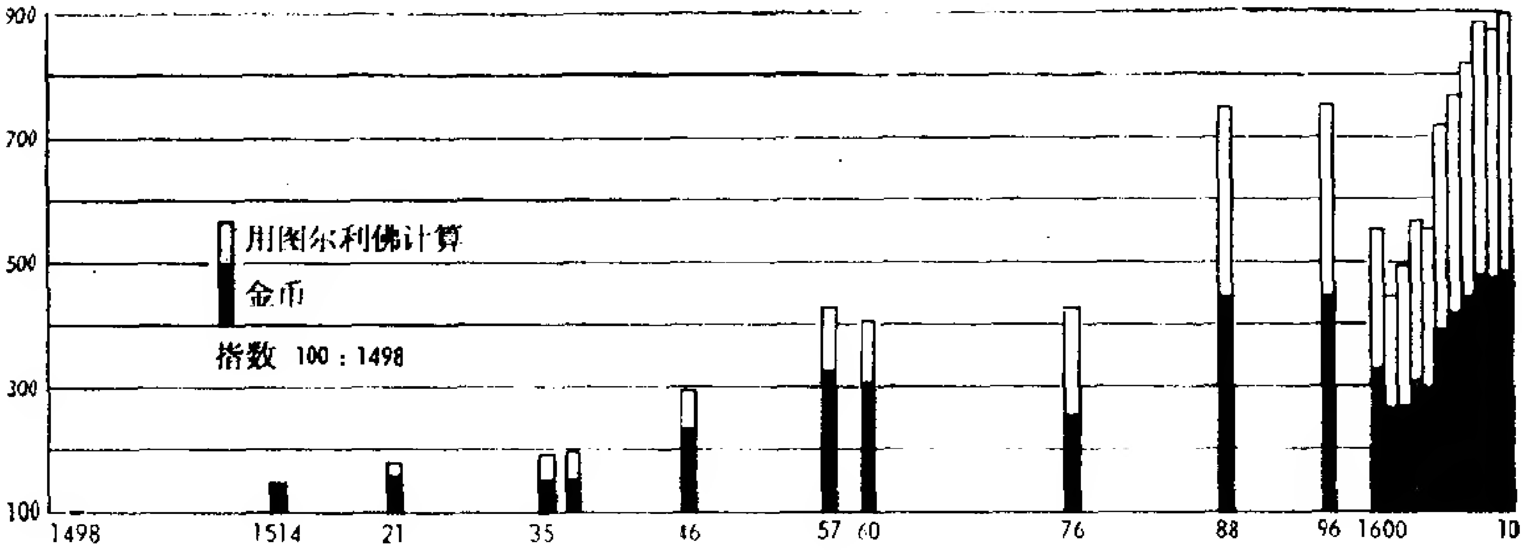
人们越思考,就越深信东西方之间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这些类似之处超越了词语、术语和政治的表面。不错,东西两个世界迥然不同,但并非始终背道而驰。罗马传统的法学家和学识渊博的可兰经经文的注释者——法学家,组成同一支庞大的队伍。这支队伍在东方和西方都同样致力于提高君主的特权。把君主政体的勃兴全都归功于这些法学家的热心,归功于他们的忠诚或者归功于他们的谋略算计,是鲁莽冒失的、不正确的。在过去,政权并非只有法律方面的根源。所有的君主政体仍然是神授的。而且,经济也起着作用。不管怎样,这支包括名闻遐迩的法学家和默默无闻的法学家在内的法学家队伍,以后曾经为各个大国效劳。这支队伍憎恨并粉碎了阻碍这些大国发展壮大的事物。甚至在伊比利亚的公职人员经常滥用职权的美洲,谁能否定这些忠于君主的小人物的效劳呢?土耳其部分地违反了它自己的心愿,变成了现代国家。它在亚洲东部被征服的各个省内大量增加分得一半税款的包税人。这些包税人以他们掌管的收入为生,但把收入的主要部分转交给伊斯坦布尔。国家也增加雇佣的公职人员的数量。这些人更愿意在易于监督的城市里从事某项既定任务以领取一份来自帝国国库的薪俸。这些人的队伍越来越由背弃自己原来宗教信仰并逐渐进入奥斯曼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基督教徒组成。他们来源于dewshirme。这是一种其

内容为"从巴尔干的基督徒家中夺走一些年龄在5岁以下的孩子的收集和贡奉行动"。[95]这个词同时表示政治和社会两个范畴。奥斯曼国家的这些新官员以后使巴尔干的timariote(古时土耳其给士兵的封地或采邑的拥有者)减少了并且几乎消亡了。他们以后还长期支持帝国的经过革新的力量。[96]



2. — Le cas de la France
（1）威尼斯的情况

16世纪的国家在并不总是明确愿意调动它的"公职人员"的职务的情况下，调动这些人的职务。[97]它随意使他们背井离乡。大国在这方面比其他国家做得更甚。格朗弗勒红衣主教就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这个弗朗什孔泰人声称自己没有祖国。有人会说这



(2) 法国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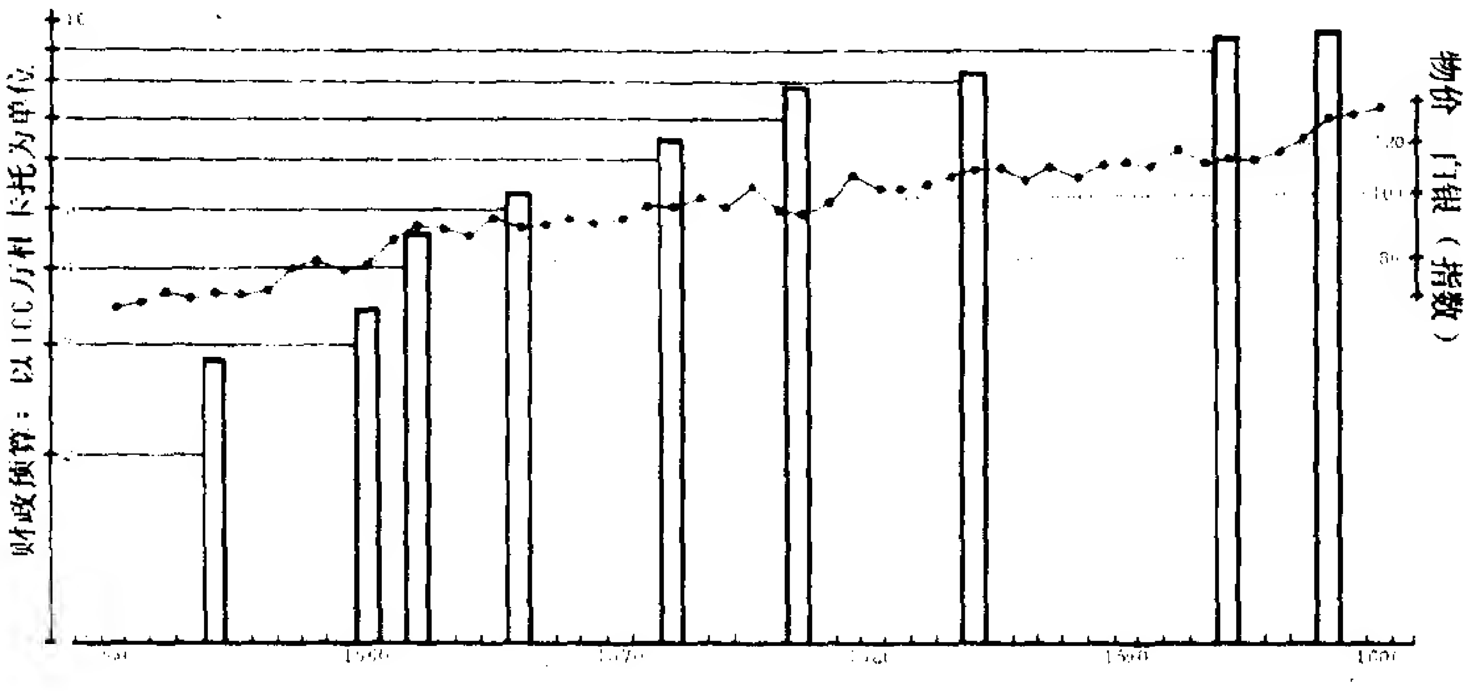
图 57 国家财政预算随着经济形势变化

威尼斯的国家财政预算由三部分组成:城市本身的财政预算、大陆的财政预算和帝国的财政预算。帝国财政预算的数字往往出自主观臆断,缺乏根据,因此被搁置一旁,不加考虑。杰玛·米娅妮小姐主要根据总结算绘制出这个图表。表上的三条曲线符合威尼斯和大陆的总收入情况:名义数字(以通用杜卡托为计算单位)、用金币表示的数字(以西昆为计算单位)、和用白银表示的数字(以吨白银为计算单位)。法国的数字(由弗兰克·斯普纳收集汇编)大大低于实际数量(以图尔利佛为计算单位的名义数字和以金币为计算单位的数字)。这些曲线尽管因有脱漏而不完全,仍然显示出国家财政预算的起伏波动与物价的起伏波动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特例。但是,在西班牙,这类调职事件的证据不胜枚举。先受雇于大加那利岛的法院,并且在巴利亚多利德的法院终其任职的被解雇的波洛马雷斯的情况就是这样。[98]在国王的军队中服役的军官,随同部队或者不随同部队,比平民百姓更加来去无定。西班牙的代表东·迭戈·门多·勒德斯马从南特向菲利普二世呈交一份长长的关于他的忠诚效劳的记录,[99]以便要求君主在他财政困难时给他一些"援助"。这个世纪末,他在南特是个精明强干的公职人员。他出身于一个肯定高贵的家庭,很年轻时就同他的兄弟一

起被收纳为和平王后伊莎贝尔(卡德琳·德·梅迪奇的女儿,菲利普二世的第三个妻子)的年轻侍从。在格拉纳达战役进行期间,他还是个孩子就在军中服役。然后,他又曾经在意大利跟随奥地利的唐·胡安。1580年征服葡萄牙时,他和两个兄弟曾经促使萨莫拉城为西班牙国王效劳,并把他自己的封臣的军队加进城市的警卫部队中。萨莫拉这座城市在接受增加营业税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并为其他城市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政府于是把东·迭戈派往该城,以使之晓事明理、回心转意……东·迭戈叙述说:"我一进入市政府,就扫清了所有的障碍,使一切都变得轻而易举,并使人们从困惑中解脱出来……"。没有比这更好的取得宠信的办法了。不久以后,他就在马拉加就任市长。正是通过这些市长——城市的主人和有权势的人物——国家控制着它的臣属。这些市长相当于法国的总督。东·迭戈在担任新职期间,负责港口码头的修建。他奉命立即前去救助受到德雷克威胁的丹吉尔和休达。他进行这项活动,没有花费西班牙国王一个里亚尔。不错,东·迭戈在这起使他倾家荡产的事件中破了产,因为他的确必须在担任新职期间,在救援驻防地时,出资供应60多名骑士和另外一些贵族……接着,他担任休达总督,并且以这个名义对他的前任的管理工作进行调查。他自夸在调查期间审理案件时明察公正,使教会中的任职者得以复职。他自感心满意足,于是不再任职,弃官回家,住在萨莫拉附近。在那里迎接他的,是他的贫困不堪的妻子的理由正常的呼叫。就在这时,他同意前往布列塔尼6个月。但是,这6个月却拖延达5年之久。在他离去期间,他的长兄和长嫂死去,他却不能继承他们的遗产。不在场的人总是错的。他甚至因此两次败诉。可能自从他临时调

往布列塔尼起，西班牙国王授予他一处有1500杜卡托年金收入的骑士团封地，并且还将付给他一笔按4年计算的过期未付款。但同他支付的巨额费用相比，同他家庭的贫困相比，这又何济于事，算得了什么呢？



(3) 西班牙的情况

图58 国家财政预算随着经济形势变化

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的物价指数借自厄尔·J.汉密尔顿的著作。国家财政预算以100万卡斯蒂利亚杜卡托为计算单位来进行估算。卡斯蒂利亚杜卡托是这个时期的计算货币，始终未变。国家财政预算的估算借自阿尔瓦罗·卡斯蒂洛·平塔多的一项未发表的研究。这次尽管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计算不完全，但物价的形势和财政收入方面的趋势的符合一致，比在上述的情况中清楚得多。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我使用了"国家财政预算"这个词，尽管严格说来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确切。我对国家财政支出的了解并不可靠。据我所知，只有锡曼卡斯的档案资料(可能还有英国的档案资料)能够使人了解到真正的国家财政预算。与我们已经绘制的这些图表相似的关于西西里的、那不勒斯王国的，甚至奥斯曼帝国的国家财政预算的情况的暂时使用的图表，易于估算和绘制出来。奥梅尔·卢夫蒂·巴尔康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

西班牙的档案保存着成千上万件诉状和类似的说明材料。历史学家并没有义务对这些档案材料陈述的种种怨言苦情字字信以为真。但是，毫无疑问，现代西班牙的"公职人员"薪给菲薄，并且经常在西班牙帝国的棋盘上移来移去，背井离乡，与故土割断联系

……毫无疑问，他们往往清贫度日。在马德里居住着一大群无业的寻找职位、养老金和过期未付款的人，一大群肢体残缺、顿足捶胸、等待接见的军人。这时，他们的妻女为了生活而出卖肉体，放荡堕落……这些国家失业者(chômeurs d'État)的历史是一部痛苦的历史。他们沿着富商巨贾居住的中心大街，在等待中消磨时光，根据季节变化去普拉多·圣耶罗尼莫寻找夏天的凉爽或者冬天的阳光，或者混杂在夜间散步者的拥挤的人流中[100]……

职位继承人的指定权与官职的放弃和捐纳

所有这些公仆都出于忠诚、荣誉感或者个人利益，固定在他们的职位上。这关系到他们的荣誉和利益。他们逐渐产生了在自己的职位上世代相传的愿望。随着岁月的推移，事物日益清楚起来。官职的捐纳是一种普遍的病症。在法国，情况也不例外，这种弊端迅速蔓延。确实是真正收入的逐渐减少在16、17世纪使各国听任这种弊端到处滋生繁殖吗？不管怎样，在西班牙，《法律汇编》[101]使人至少能够了解到这种损公肥私的个人对国家的逐渐剥夺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特权等级的兴起。要了解详情细节和真实情况，必须在锡曼卡斯对有关放弃[102]的一堆文件进行分析整理。放弃意即让别人继承自己的职位。这是1558年巴塞罗那宗教裁判所的警官(alguazil)[103]为了使他的儿子得到好处而提出的要求。这只是大量例子中的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政府同意地方行政官的要求。这些人从那时起就有权为了使他们中意的人得到好处而放弃(即使享有有限责任继承权者还不到18岁)，并且有权在生前，在

临终时刻或者在遗嘱中行使这种指定自己的职位继承人的权利。即使他们在法定的 20 天这个时限以前死去,这种放弃声明书也是有效的。[104]

这些细节使人联想起当时法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问题,尽管并没有解答这个问题。我毫不怀疑,对西班牙的情况进行的系统研究,总有一天将会揭示出关于这个半岛的、与法国历史学家已经成功地揭示出来的关于处于同一时期的他们的国家的事物并无什么差异的事物来。在我看来,伊比利亚半岛的这种发展演变的最奇特的方面,是这种发展演变的极端早熟的外表。在天主教国王费迪南和伊莎贝尔即位以前,在胡安二世和亨利四世[105]动乱不安的统治时期,可能从 15 世纪开始,[106]至少在市政官职方面,最初的征兆就已经十分明显了。那时很多这类职位就已经可以放弃了。确实,君主可以而且经常地收回他的各种权利。办法是使用武力或者简单地对这种放弃强加时限。这个时限既对已经弃权者(他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还活着,至少 20 天)[107]有效,也对新正式任职者有效。新任职者在关于放弃的证书出具后的 30 天内,必须自我介绍,必须让人承认他的权利。[108]1563 年,西班牙国会徒劳无益地要求菲利普二世把这个时限从 30 天延长到 60 天。[109]这个方面如果要证明什么的话,它就证明旧的程序手续仍然有效。这种程序手续是一种经常存在的威胁,是潜在的家族悲剧的根源,因为购买官职者常常为了支付官职购买费而使用宝贵的用来置备嫁妆的钱财[110]……大量官职后来逐渐变得可以放弃。对父传子之外[111]的这种或者那种禁止,对买卖司法官职或其他官职的这种或者那种禁止,[112]都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说明了这种弊端的蔓延为害。[113]国王自己增设官职

并出售官职。在这个范围内，他也助长了这种弊端的滋生蔓延。[114]安东尼奥·佩雷斯经常被指控[115]助长了这些官职的大批出售。但是，也应该让这个时代和这位秘书同样对此负责。甚至市长、治安法官以及司法部门、掌玺大臣公署和王室会议的书记员的职位都变得可以放弃了。[116]到处蔓延滋长的官职捐纳，正像在法国一样，在一种封建的气氛中发展起来。或者按照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奇的说法，[117]我们应该说，官僚主义和家长式的统治当时携手并进，并驾齐驱。显然，君主政体在卖官鬻爵和这种活动必然引起的贪污腐化所形成的赌博中输了。它为自己的权力设置了重重障碍。这种权力在菲利普统治时期远非路易十四式的专制权力。在卡斯蒂利亚，官职捐纳被限制在低下的职位方面，它只在市政职位的范围内淹没了一切。这一点是真实的。正是在市政职位这个等级上，在国会的支持下，长期存在一个关心本地利益的、市长无法轻而易举使之循规蹈矩的根深蒂固的城市贵族阶级……但是，城市难道无足轻重吗？任何有价值的对财政史的研究，都必然涉及城市的状况。[118]

一种官职捐纳制度——这种国家的畸变现象——同样在土耳其的政治机构内出现。我们已经引证过在土耳其全境实行的官职出租制度可能来源于埃及的这种看法。[119]每个公仆由于需要向自己的上司馈赠厚礼，对之阿谀奉承以取得恩宠，因此不得不定期损害自己的下属和自己管理的人，让他们付钱给自己。于是逐级照此类推，如法炮制。于是一场按等级从上到下进行的大规模的抢劫组织起来。奥斯曼帝国成了那些因受横暴粗鄙的习俗的逼迫而变得贪得无厌的官职拥有者的牺牲品。正如威尼斯人加尔佐尼曾经说

过并一再重复的那样，正如格尔拉赫在其所著关于穆罕默德·索科里的生平事迹的《日记》一书所断言的那样，这种全面的、普遍的掠夺的受益者是首相。穆罕默德·索科里早先是拉古萨附近的一个出身微贱的孩童，18岁时被素丹手下征兵的人征募入伍。很久以后，1565年6月，他晋升为首相。他在1579年被暗杀以前一直担任这一职务。他的巨额收入来自公职候补人对他的馈赠。威尼斯人加尔佐尼说："值得相信的人告诉我说，这笔收入平均每年高达100万金币。"[120]格尔拉赫也指出："穆罕默德的黄金和宝石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谁想得到一官半职，就得送他几百或几千金杜卡托或者向他送去马匠或孩童……"不能为贤者讳，不能为了保护穆罕默德·索科里死后的声誉，就反驳这些证言。毫无疑问，不管怎样，他毕竟还是个伟人。但是，在关于别人的钱的这一方面，在关于他的下属的钱，关于外国的钱这一方面，他却入境随俗，逐波随流，乐于屈从他那个时代的风尚习俗。

这个时期，土耳其首相的巨大财产往往由素丹支配处理。大臣不管是否自然死亡，他死后素丹就把这些财产据为已有。土耳其国家就这样参与惯常的对它的公职人员的财产的侵吞。显然，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完全用这些简单的办法来回收为国家所有。宗教基金会向大臣们的财产提供保护。(在建筑工程方面，关于这些基金会组织的证据还大量留存。)通过这种迂回曲折、转弯抹角的办法，少量违法私吞的金银可以确保安全无虞，可以留作来日的生活之需或者保证家族的安全之用。[121]我们应该承认，西方的制度一般说来不如东方的这些办法严格和处理问题彻底。但是，在东方和在西方一样，在官职捐纳这个领域内，出现了奇怪的国家政权遭到破坏和

解体的现象。我们剩下要做的，就是推定这种非常具有揭示性的解体现象产生的年代。就这种现象而论，16 世纪出现的种种迹象只不过是一些先兆而已。

不管怎样，土耳其帝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122]它的官员的数量在 16 世纪奇怪地上升。1534 年，在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省长居于各级官吏之首。省长之下有县长 30 名。在土耳其的亚洲部分，有省长 6 名和县长 63 名。1533 年，在编制之外设置了 1 名新省长，即西班牙的文献资料称之为海上将军的卡普丹帕夏。这位“海军大臣”的职责除了统率舰队之外，还包括管理加利波利、卡瓦拉、亚历山大等港口。因此，连同 1534 年设置于开罗的省长，共有高级省长 9 名。然而，1574 年，即 40 年后，就有 20 个“省府”了：欧洲 3 个（索非亚、泰梅什堡[蒂米什瓦拉]、布达），亚洲 13 个，在非洲先是 3 个，后来是 4 个（开罗、的黎波里、阿尔及尔，不久后还有突尼斯）。然后，再加上海上将军。正如政府官吏大量集中在亚洲这一现象所表明的那样，亚洲是土耳其关注和军事努力的中心。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发展。穆拉德三世在位期间，“省府”总数从 20 上升到 40，其中 28 个单独为亚洲设置。对波斯的战争在亚洲导致对广阔的边境地区的征服以及组建和管理。因此，这种增加是符合需要的。但是，也不能忽视在土耳其日益增长的那种奇怪的对衔级名位的需要和越来越明显的对公职的兴趣。镇长渴望晋升为县长。后者则渴望晋升为省长……在一般情况下，每个公职人员的生活水平都高于他的职级所能提供的水平。

一种类似干扰西班牙的发展演变的发展演变，甚至在遥远的伊比利亚半岛受到该地的发展演变搅扰之前，就已经在搅扰土耳

其了。的确,这个半岛直到菲利普二世的禁欲主义式的统治结束时,才展示出它的豪华奢侈,才听任对生活的爱好和对抛头露面的爱好自由发展。在东方,自从苏里曼于1566年去世后,时移事易,沧海桑田,一切都已经发生变化。用绫罗绸缎和金银制作的衣服,过去曾经遭到穿棉织品的老皇帝的禁止。在这个世纪结束之际,在君士坦丁堡接二连三举办盛大豪华的节日庆宴。这些庆宴活动闪耀的光辉,甚至投射到老哈默的相当平淡无奇的故事中。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的府第的豪华奢侈程度当时是闻所未闻的。这些府第的座椅全用金织布裹盖。人们养成夏天睡在最细的绸缎上的习惯。当时的人说,土耳其女人的一只鞋子比基督教公主整整一只项圈还更昂贵……这样说似乎并未夸大。冬天,人们身穿珍贵的皮毛衣。宴席的丰盛奢侈程度和意大利的宴席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23]应该相信1612年被派往君士坦丁堡的首任荷兰使节科尔内里乌斯·哈加所说的既相当有趣又坦真率直的话。他受到款待后说:“这好像是凯旋的日子。”[124]在一个毫无生气、奄奄一息、惨遭战争和饥馑折磨的国家,人们对穆拉德四世时代的盛大庆宴还有什么不能说呢?土耳其几乎和西班牙在同一时期,在这种铺张浪费、大讲排场、穷奢极欲之风同所有治国理政的良好规章制度,同国家的财政预算的严峻现状发生明显的矛盾的时刻,竟然听任自己耽于“黄金时代”的狂欢宴乐,这实在令人觉得稀奇古怪、不可思议。

各种地方自治

庞大的政治机器的图像,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我们把16世纪的政治机器同15世纪的政治机器加

以比较，就会看出前者过于庞大。但这仍然仅仅是个比例问题，是个程度问题而已。和目前相比，和目前为国家服务的公职人员的巨大数量相比，16 世纪“官员”的数目就微不足道了，就很可笑了。的确，那些具有“绝对”权力的幅员广阔的国家，由于缺乏足够的公职人员，它们进行的控制很不完全。在基层，在日常事务方面，国家的权力很不完整并且缺乏效能。它遭到成千上万个它无法制服的下层自治机构的反对。在庞大的西班牙帝国内部，城市常常各自为政，自行其是。这些城市通过承包，向国家缴付数额固定的钱款，控制着间接税。我们了解塞维利亚和布尔戈斯的政府机构。这两个城市享有广泛的特权。1557 年，一个威尼斯大使明确地指出这一点。[125]他写道：“西班牙的每个领地和每个社镇都根据自己特有的法律实行自治……”同样，虽然位于半岛之外但仍在西班牙帝国范围之内的墨西拿，直到 1675 年都始终是个共和国。它对那些像在 1577 年负责管理过这个岛屿的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那样的总督来说，都是肉中刺、眼中钉。科洛纳[126]写道：“陛下知道这一年 6 月墨西拿享有多大的特权。陛下也知道这个岛屿由于被放逐的人和杀人凶手从它这里前往卡拉布里亚十分方便，它的领土藏污纳垢，窝藏了多少这几种人。因此，管理这个岛屿的行政官员正直地、体面地履行他的职责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现在事态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上述行政官员的职位在两年之内带来的好处，比这个岛屿的总督的职位在 10 年之内带来的好处还多。有人对我谈过一些事。其中有这样一件：因应判处死刑的案件而锒铛入狱的人如果交付巨额保证金，莫不获释。保证一旦遭到破坏，管理这个岛屿的行政官员就把这些保证金纳入私囊。今天，这座城市被盗匪重重包

围,以致就在城墙之内也有绑架及勒索赎金等事发生……"

因此,在这个半岛内外,在整个整个地区,在整个整个城市,有时还在拥有它们自己的司法权和市政法或者享有特权的城市,西班牙国家都无法很好地进行统治管辖。所有遥远的和外围的地区的情况都是这样。格拉纳达王国的情况直到1570年也是如此。1580年后,直到1640年绝交以前,葡萄牙的情况也长期如此(这个国家因为拥有特权和征服者不敢触犯的自由是个真正的"自治领")。巴斯克各个小省和阿拉贡王国各地的情况也始终如此。即使在1591年的叛乱和动乱以后,菲利普二世也不敢向阿拉贡王国享有的特权伸出触犯之手。在这种情况下,最漫不经心的旅客,只要跨过阿拉贡的边界,走出卡斯蒂利亚,也会发现一个迥然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封建领主是半独立的,拥有很多有损他们的臣属的利益的权利,拥有他们自己安装的大炮和修建的城堡。这些城堡非常靠近毗邻的、顺从的和解除了武装的卡斯蒂利亚。阿拉贡集团拥有政治特权和财政特权,随心所欲地进行自治,只缴纳部分王室捐税。但是,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国与之毗邻接壤,近在咫尺;是因为稍为使用暴力,外国人就会利用这一事态,冲破这道关而不严的大门,即西班牙的大门。[127]

这个时期,在土耳其帝国,并非由于其他原因,素丹的权力在帝国的欧洲部分分散削弱。这种分散削弱的现象出现在这个帝国所属各个邦国的西部外围地区,出现在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克里米亚的鞑靼王国……我们已经指出存在于阿尔巴尼亚和摩里亚的巴尔干山区的多种多样的自治区。这些自治区是地理形势的产物。

此外,对国家的抵抗具有各不相同的形式。读者看看在那不勒斯王国里,在一贯桀骜不驯的卡拉布里亚的旁边,牧主公会和那不勒斯城市扮演的重大角色吧!农民通过加入牧羊人会社这种方式,逃脱了封建领主和国王的管辖。同样,当农民在那不勒斯定居时,这个城市的气氛使他们获得自由。在更加往南的地方,在西西里岛,可以通过效忠西西里的宗教裁判所来逃避世俗权力的管辖。这个裁判所的势力和影响就这样奇怪地扩大起来。在土耳其,首都的极度畸形膨胀,可能是对类似的原因作出反应。在外省,什么都不能保护个人不受地方上的省长、县长和镇长等的贪婪之害,或者不受比所有这些人更令人生畏的人,即他们的执行代理人——高级军政官员——之害。在君士坦丁堡,人们可以保证得到某种司法保护,得到相对的安宁。

毫无疑问,国家官员的腐败现象,16世纪在伊斯兰世界,在基督教世界,在南欧,在北欧都十分严重。1573年,阿尔贝公爵从佛兰德写道:“没有一起民事案件或者一起刑事案件不能像在肉店里卖肉那样出卖……大多数法官每天都卖身投靠想收买他们的人……”[128]这种触目皆是的腐败现象,是对统治者的意志的一种抑制和约束,当然决不是一种可以轻易解除的抑制和约束。腐败现象变成了一种盘根错节、阴险邪恶的力量,一种能够单独存在的力量,[129]它是个人在它的庇护之下能够逃避法律的那些力量中的一种。这是一种永远存在的力量和狡诈的结合体。老罗德里戈·维沃罗将近1632年写道:“西班牙的法律像一张捕捉小苍蝇和蚊虫的蛛网。”[130]有钱有势的人逃脱了这张网形成的罗网。只有不幸的人和穷人才被缠在里面。然而,这难道不是一个不仅仅是16、17世

纪的而且还是所有的时代的实际情况吗?

为国家服务的财政和信贷

幅员广大的国家不再完全同为数众多的纳税人直接接触,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们。因此,国家在税收方面处于罕见的劣势地位之后,又在财政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国家衰弱的另一个标志。除了以上已经引用的意大利的例子之外,地中海国家在16世纪结束时,已经不再拥有金库和国家银行了。1583年,在菲利普二世的亲信左右中[131],有人打算创建一个国家银行,但是,这个打算没有落实。在西班牙帝国中心,人们不得不求助于我们用一个过分现代的名词称之为银行家的放款人。这种人对国王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菲利普二世1559年9月重返西班牙。在此后的10年之内,他最关心的事就是整顿这个国家的财政。于是劝谏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传到他那里。这些劝谏归根结蒂都是劝他求助于人:时而向阿法伊塔蒂家族求助,时而向富格家族或者向热那亚人求助,甚至在埃拉索的民族主义危机发生时还向像布尔戈斯的马尔文达家族这样的西班牙银行家家族求助。

菲利普二世拥有的各个邦国四处分散。在他之前,查理五世下属的各个邦国也四处分散。这就必然引起税款的征收和支付也四处分散。这就必然促使人们使用国际商行。只有钱款的划拨转移需要求助于商人。但是,这些商人还起着另外一种作用:他们能够预付预算中将来使用的钱款并使之流通。这种作用往往导致他们以后直接征收国税作为对自己的偿还,因而也导致他们与纳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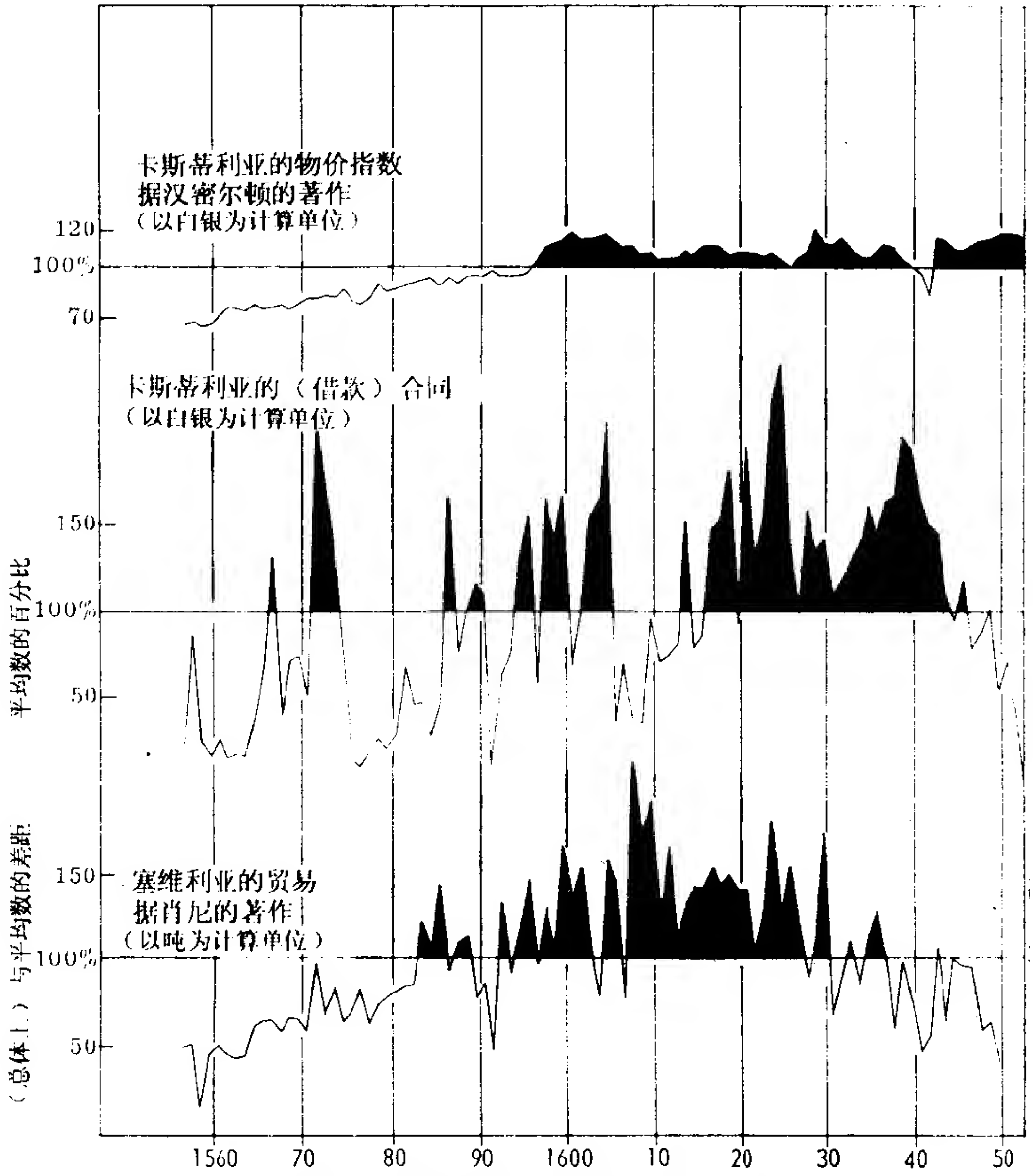


图 59 “合同”与卡斯蒂利亚的经济生活，1550—1650 年

一方面同根据厄尔·J.汉密尔顿的著作绘制的物价指数的变动（可以看出其幅度是适度的）比较，另一方面同塞维利亚贸易的突然的巨大发展比较，然后又同它的巨大衰退比较，“合同”（总而言之，即国家短期债务）的曲线与地震仪的波动相似。总的说来，它还是显示出某些与物价曲线类似的现象，在塞维利亚，情况更是如此。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是美洲白银的输入使“合同”载明的钱款的预付和偿还得以进行。总的说来，曲线的 100%的上升表示战争进行时期；曲线的下降相当准确地表示和平时期和后撤时期（征服葡萄牙除外）。注意在所谓的三十年战争中的大规模的借贷活动。“合同”的曲线是阿尔瓦罗·卡斯蒂洛·平塔多绘制的。

直接接触。放款人掌握西班牙的财政并使之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1564 年,菲利普二世把赌博用的纸牌的专卖让与热那亚人,接着又让与他们安达卢西亚的某些盐场的经营。另外一次,他恢复他父亲的决定,把阿尔马登的矿藏的开发经营或者军事修会的财产的管理交给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这等于把广阔的田地、牧场、入港税和农民的债务等都置于外国人的控制之下。富格家族让它的代理商和代理人移居西班牙。这些人是办事认真负责、有条不紊、热心积极的德意志人……此外,如果不是某家外国公司负责税收,就是中间权力机构、城市或者国会……等负责这项工作。如果说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财政方面的管制、监督仍旧很不完善的话,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法国,外币的转移并不是一种像对西班牙那样重要的需要。然而,放款人和银行家也具有他们的作用。在商人甚至能够在国家财政领域内自由活动的土耳其,情况也是这样。格尔拉赫在其所著《日记》一书中指出:[132]“君士坦丁堡有很多希腊人通过从事大宗买卖或者使用其他致富手段大发其财,虽然这些人为了使土耳其人不发现、不抢劫他们的钱财,总是穿着打扮成普通商人……”他们当中最富有的,是个名叫米歇尔·康塔库泽内的人。按照土耳其人的说法,这个假希腊人是魔鬼的儿子。根据荒诞不经的谣言,他的祖先是英格兰人。不管怎样,此人拥有一笔巨大财富,而这笔财富又与他为土耳其帝国的效劳奇怪地联系着。康塔库泽内难道不是帝国全部盐场的主人、无数海关关税的承包人、官职的出售者以及像大臣那样随意罢免天主教的主教或者希腊东正教的大主教的人吗?他难道不是一些整个整个的像摩尔达维亚那样的或者像瓦拉

几亚那样的省份的收入的主人，并且还是一些村庄的封建领主吗？他富有得能够独自一人就把 20 到 30 艘帆桨战船武装起来。他的安基奥里宫的豪华奢侈，可与奥斯曼帝国素丹的宫殿媲美。因此，不能把这个暴发户同加拉塔的和别处的地位卑下的、无足轻重的希腊人混同为一，等量齐观。他向他们炫耀财富，大摆阔气。他为人行事不像他们那样谨小慎微，以致 1576 年 7 月被捕。他被迫退赃后，被穆罕默德·索科里救出。这件事差一点没有成功。他获释出狱后，东山再起，甚至变本加厉。这次他就不仅从事盐业，还从事皮毛业，并且一如既往，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等地策划阴谋活动……最后，必然发生的事终于发生：1578 年 3 月 13 日，当局奉素丹之命，未经任何审讯，就判处他绞刑。他被吊死在他自己的安基奥里宫的门上，财产全部没收。[133]

另外一个人的命运虽然应该列入同一类型，但更加异乎寻常。这个命运的主人、葡萄牙犹太人约瑟夫·纳西，在不止一个方面是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人物。他以米克或者米卡斯这个名字为人所知，而且在晚年还用纳克索斯公爵这个虚夸的头衔装点自己。他长期到处流浪，对自己的道路方向心中无数，毫无把握。他去尼德兰、贝桑松[134]等地，在威尼斯逗留，然后将近 1550 年时到达君士坦丁堡。他挣得万贯家财之后，大摆阔气，娶妻成家，并且重新皈依犹太教。他早在谢里姆素丹即位以前就已经是这位素丹的朋友、亲信和美酒佳酿的供应人。他承包对各个岛上出产的酒征收的什一税。1570 年，他怂恿素丹进攻塞浦路斯。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或许是他 1579 年寿终正寝时仍然腰缠万贯。有人冒冒失失，试图为这个稀奇古怪的人物恢复名誉，平反昭雪。但是，我们听过为他作的辩护后，关于

这个东方富格的情况知道得并不更多。[135]西班牙的文献资料表明，他支持西班牙，并多多少少与西班牙国王串通合谋。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可以作为亲西班牙的分子或者反法分子一劳永逸地加以驱逐的人。如果认为他是这样的人，这就是忘记了君士坦丁堡的政治现实是何等变幻莫测。关于这个人物，正如在康塔库泽内的案件中一样，人们特别喜欢了解他在土耳其的财政事务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一点我们以后会了解到吗？我们关于土耳其财政本身的知识非常贫乏，看来在今后一段时间之内，仍然是这样。

土耳其的财政同基督教国家的财政截然相反，它肯定没有求助于长期的或者短期的公众信贷。这种公众信贷就是公债。这是一种彬彬有礼的、不会引起巨大痛苦的获取私人和大、小放款者的钱款的途径。在这种人人都参与的活动中，每个西方国家都会找到把有积蓄的人的钱款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的办法。在法国，市政公债是众所周知的。[136]我们已经了解到，在西班牙，在菲利普二世统治末期，发行了相当于8,000万杜卡托的巨额债券。[137]这些票据很快贬值，并且引起疯狂的投机。国家后来甚至以时价支付上升到70%的利息。我在塞万提斯的短篇小说《吉普赛女人》[138]里注意到这个非常说明问题的说法：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说，像拥有埃斯特雷马杜拉牧场的债券的人那样保存好和掌管好金钱。推测起来，这显然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因为既有有利可图的投资，也有无利可图的投资）。在意大利，向公众发出呼吁以筹集钱款，往往通过当铺进行。圭恰迪尼曾经说过：“不是佛罗伦萨打败当铺，就是当铺打败佛罗伦萨。”[139]这个事实在17世纪比在16世纪更加真实。A. 多朗在他的经济史中坚持认为，在国家债券上大量投放资金，是意大利

自 16 世纪初开始的后退的理由和标志之一。[140]投资者的金钱躲避进行冒险活动会带来的危险……

人们可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罗马那样，像在这个特别的、其空间既非常狭窄又极其广阔的国家，即教皇国那样，一再向信贷求助。15 世纪，罗马教廷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之后，饱受各国日益增长的地方主义之害，并且沦落到只能取得教皇国附近的财源的地步。它因而相当积极地进行扩展和恢复。15 世纪最后几年和 16 世纪最初几年的几届教皇，更主要是世俗君主而不是教皇。这个现象并非事出无因，因为财政状况使之如此。将近 16 世纪中叶，局势依然如故。将近 80%的教皇收入来自祖传产业。由此爆发了反对财政豁免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的重大胜利，是教皇国吞并了城市的财政收入，例如维泰博、佩鲁贾、奥尔维耶托或者翁布里亚的各个中等城市的财政收入。只有博洛尼亚得以保存它的主权。然而，这些胜利却让古老的，而且往往陈旧的征税制度原封不动。收入的来源可以说清除了阻塞。但是，正如一个历史学家[141]指出的那样，“教皇国和纳税人的直接接触，还只是罕有的例外情况。”

和这场财政战争同等重要的，是向公众信贷求助。克莱门斯·鲍埃尔说得对，教皇国的财政史那时变成了一部“信贷史”。[142]这种信贷包括具有向银行借款那样的普通形式的短期借贷和把分期偿还交给教会财务会负责的长期借贷。这种信贷的根源牵连到为在俗教徒设置的官职捐纳制度，因而更加值得注意。开始时存在着罗马主教府的官职拥有者和债权人混同为一的现象。这些官职拥有者—债权人组成团体。他们花钱购买官职，从中得到固定的薪俸收入，这种收入作为利息支付给他们。例如在设立于 1509 年、有售价

总额为9.1万杜卡托的141个官职的国家粮食配给处的债权人团里，一笔数额为1万杜卡托的利息—薪俸由罗马盐税的收入支付。以后，教廷通过建立官职会社，成功地把这些公债分给小公债债券持有者。官员的称号以后只作为纯粹的荣誉称号授予债权人。1520年，随着圣彼得骑士团的创建而开始出现的一系列骑士团的情况已经是这样。之后，又产生了圣保罗骑士团和圣乔治骑士团。最后，一个梅迪奇家族的成员、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可能仿效佛罗伦萨的做法，创设了公共借款。这样就最终创立了真正的政府公债制度。这种公债制度的原则和我们法国的市政公债的原则相同，即：让一笔固定的和有保障的收入作为对一笔支付的资金的报偿。这种公债的份额叫做借款份额券。这是一种可以流通和转让的证券。这种证券常常在罗马和罗马之外流通。流通价格往往高于票面价值。就这样，根据环境和需要，创设了以托尔法的明矾矿的收入作为保证的明矾矿借款以及其他一些借款，如好运借款、肉类税收借款、关税借款等。这些借款为人所知的共有30多种……

这些通常都是可偿还的借款。例如1555年创设的九年借款原则上应在9年之内偿还。但是，也有一些我们称为永久性借款的借款。这些借款的债券可以通过遗嘱转让。对教皇的财政来说，获得短期利益的一种方式，就是把终身债券改变为永久性债券，即把债券所有人死后归国家所有的借款改变为债券所有人死后通过继承转让的借款，因为这引起利率下降。所有这些细节和其他细节，显示出罗马的各种借款的现代性质。罗马的公共借款可以和佛罗伦萨或者威尼斯的公共借款，或者和圣乔治信贷商行的公共借款相比，更不必说和卡斯蒂利亚的债券相比了。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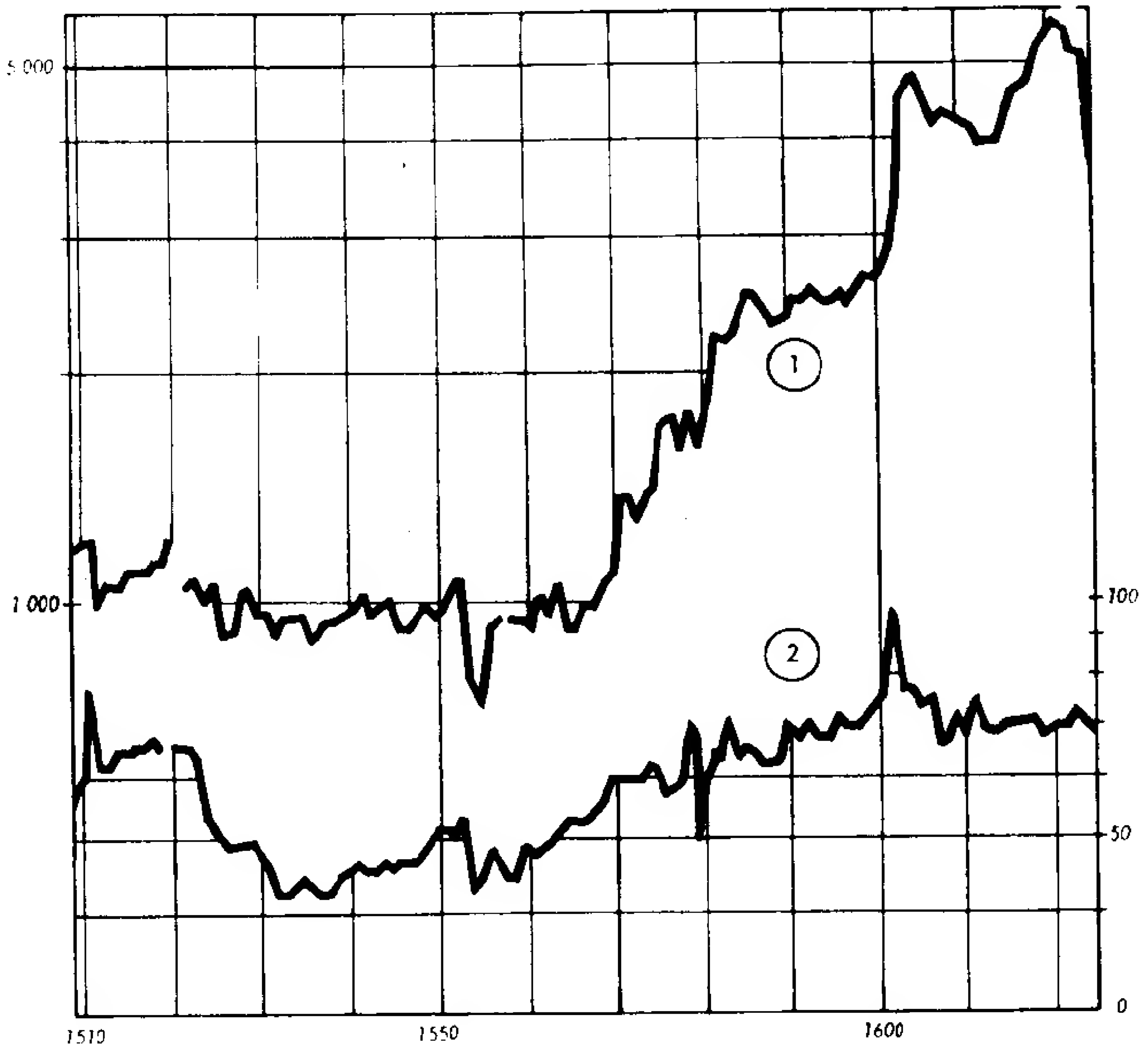
何计算都是困难的。从1526年到1601年，罗马教廷似乎为自身借了（有时还为罗马贵族的代表借了）1,300万埃居。这个数字可能不会对今天的读者产生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愿今天的读者了解这一点：西克斯特五世能够从这笔经过再三恳求从公民私人那里借来的钱款中抽扣出26吨白银和3吨多黄金妥藏在他的圣昂热城堡的金库里。西克斯特五世这样做，是执行一种乡下佬的把节省的钱藏而不用的政策。但是，他为了集存这些金、银，却使用了建立在现代金融和信贷手段上的政策。既然这些公共借款的份额是发向国际顾客的，"正当公债在罗马上升到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巨大数额的时刻"，[143]这种公债在热那亚放慢了增加的速度，这是十分自然的。我们会像利奥波德·冯·兰克那样认为罗马当时"可能是欧洲主要的金融市场"，[144]至少是放款人的主要金融市场吗？这是可能的，但并非肯定无疑。然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并不存在于政府在罗马借款的规模，而存在于信贷市场的巨大发展中。所有的国家，包括行事谨慎的和行事鲁莽的，都从这个市场得到借款。无数证券持有者都从这个市场得到满足。我们所理解的经济形势无法解释这种迷恋状态。这可能是一种集体心理，一种对某种安全的寻求吗？从1570年到1620年，在热那亚和在别处一样，持续出现了一个膨胀时期。卡洛·M.奇波拉写道："这次膨胀达到历史学家把它称之为价格革命的程度。在举目可见的情况下，一次利率的反常的逐渐下降在热那亚变得明显起来。"[145]这个利率从1522年起就在4%和6%之间摇摆徘徊，至少在从1575年到1588年这段最不景气的时期，它下降到2%甚至1.2%。这个现象与在这个时期难于投放的白银和黄金大量流入热那亚这个事实是吻合的。"这是在

欧洲历史上,自从神圣罗马帝国衰落以来,第一次以这样低的利率向人提供资金。这的确是一场奇怪的革命。”如果可能的话,剩下要做的,就是对其他市场的形势进行分析研究,就是查看一下利率是否正如可能发生的那样,正如今天证券交易所里的情况那样,决定了这里的推进和那里的后退。不管怎样,政府发行的公债迅速兴盛起来,国债证券突然受到欢迎,这些都对 16 世纪的政府有利,使它们的工作易于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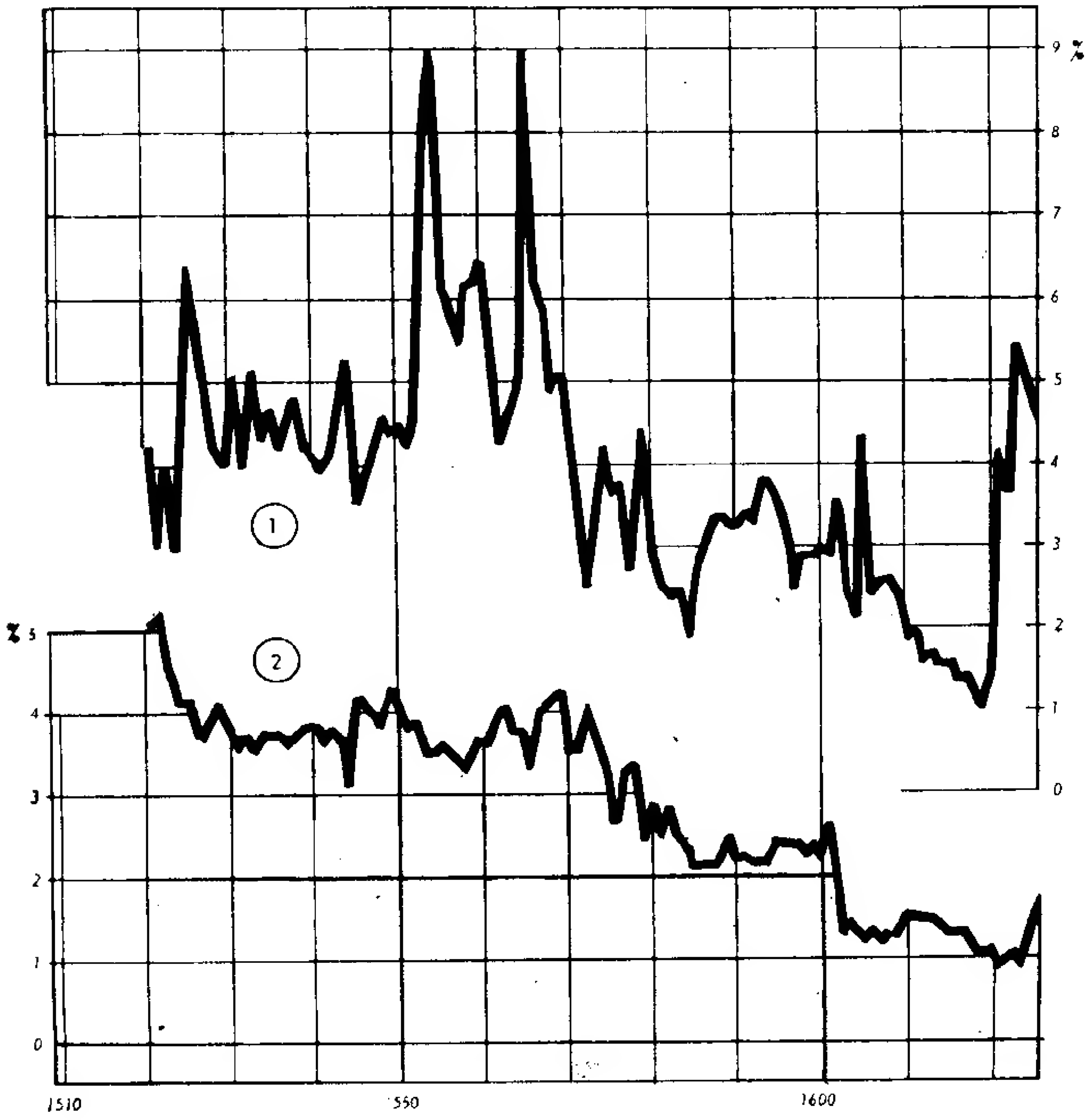
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人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土耳其国家在封地和终身官职的分配方面进行的粗暴勒索,也源出于这个事实:在土耳其不可能像在西方那样求助于小放款者或大放款者。信贷肯定也存在于奥斯曼国家。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商人在伊斯兰法官面前立下的借据,[146]提到在臣属于素丹的商人之间使用的

图 60 圣乔治信贷商行的“份额券”,1509—1625 年

这四条曲线概括了卡洛·M.奇波拉的重要文章(见以上注 3)。“份额券”是热那亚共和国发行的公债债券,其最初价值为 100 里拉(200 索尔迪)。这是一种永久性的公债债券。它的利率是变动的(相反,在威尼斯,利率是固定不变的),因为这种利率取决于圣乔治信贷商行的利润,而这家商行又以它代替热那亚市政会议征收的税款作为保证金。从 1509 年(193,185)到 1544 年(477,122),“份额券”的数量大增,因此市价下跌。这个数量以后稳定下来(1597 年为 437,708;1681 年为 476,706)。第一条曲线显示可在市场上流通和转让的“份额券”的市价(左边的比例尺从 1000 到 5000 索尔迪)。第二条曲线显示“份额券”的利息(右边的比例尺从 40 到 100 索尔迪)。16 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明显的上升,然后在下个世纪又出现了下降。当时“份额券”的利息从来没有到期立即支付。利息的一半在四年后支付;另一半再隔一年后支付。如果债券持有者想到期立即支付,就必须让他执有的息票贴现。这样,根据图 2 的第一条曲线,贴现在市场上是变化的。因此,考虑到这种时间耽搁和贴现,就可能计算出“份额券”的真正的利息来。这在最后一条曲线上显示出来。这条曲线在 1570 年后清楚地下降。这种下降在 1600 年后加深了。作者得出结论说:“因此,由于这一个或者另一个原因,17 世纪开始时,以 1.2%的利率向热那亚贷放资金。尚待了解的是:这种不正常的形势是不是金融市场的健康状况良好的标志。



5 000
1 000
100
50
0
1
2
1510
1550
1600



9 %
8
7
6
5
4
3
2
1
0
% 5
4
3
2
1
0
1
2
1510
1550
1600

汇票。如果在这方面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新出版的书刊[147]会证明犹太商人在他们相互之间使用汇票。甚至在这个世纪中叶流传着并且由让·波丹[148]偶然记录下来这个传闻:一些土耳其帕夏参加过里昂的"盛大聚会"公债的投机买卖。这全都是可能的。但是,在土耳其没有公共信贷。

1600—1610年:时机对中等国家有利吗?

在16世纪末叶和下一世纪的最初几年,大国患过某种疾病或者感到过某种疲乏吗?那个时代的人为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些人是义务医生。他们迫不及待地来到著名的病人的床前。每个医生都提出自己对病情的解释、诊断,当然还拿出他们的灵丹妙药。在西班牙,本国的或者外国的出谋划策者,[149]从来就不乏其人。他们本身就构成一个社会等级。17世纪的最初几年刚刚过去,他们的人数与日俱增,他们的声调日益提高。他们成群结队,匆匆忙忙赶到历史的仁慈宽大的法庭。在葡萄牙,他们同样活跃。那里有同样的争论和发展变化。

人们在了解到这些议论、证明之后,怎能不相信西班牙王朝的衰落呢?事件和证人、1612年托梅·卡诺描绘的那些黯淡图景[150]或者《海上悲剧史》[151]这部饶有兴味的文集——这是一份葡萄牙人在前往巴西和印度的航行途中遇到的意外事故的详尽记录——等都说明这种衰落。在《海上悲剧史》里谈到的,只是灾祸、衰落、筋疲力竭、敌人的胜利、"海上事故"、在莫桑比克沙滩上的搁浅和在好望角周围的航路上的失踪事件等。当在伊比利亚的道路上抢劫事

件倍增，瘟疫使人口锐减的时候，人们难道还会怀疑西班牙的躯体的衰竭和虚弱吗？当然，从外面看，西班牙还始终摆出一副大国的架势。它虽然受到威胁，但看上去在威胁别人。这个时期，至少在马德里，17 世纪欧洲最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生活展现出它的歌舞升平的节庆景象。

但是，在同一时期，伊斯坦布尔的素丹的宫殿的豪华奢侈也是闻所未闻的。

然而，也同样在伊斯坦布尔，阴影明显，倦态丛生。奥斯曼帝国像一艘用木板马马虎虎拼合而成的船，破损折裂、格格作响。一系列公开的或者隐蔽的叛乱，从阿尔及尔到波斯边境，从鞑靼国到埃及南部，使这个帝国深受困扰折磨。对敏于根据自己的愿望作出结论的欧洲观察家来说，奥斯曼的机器已经碎裂，无法修补。耶稣会会士和嘉布遣会修士以闻所未闻的热情，向这个失去方向的、不知所措的世界奔去，企图从精神上加以征服。这难道不正是把这些异教徒赶出欧洲并且瓜分他们的领土的大好时机吗？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伊尼戈·德·门多萨不断重复这个看法。不错，这个大人物内心激动、情绪狂热，准备弃离外交官生涯，加入耶稣会。此外，他还并不是那些在历史的没有尽头的道路上组成第一支精悍的拥护瓜分奥斯曼帝国的人的队伍中的唯一的幻想者。还有另一些人紧随其后。他们是：卡洛·卢乔神甫（1600 年）、法国人让·埃梅·夏维尼（1606 年）、另一个法国人雅克·埃斯潘夏尔（1609 年）、乔瓦尼·米奥蒂（1609 年 10 月）、一个匿名的意大利人（1609 年 12 月）、嘉布遣会修士弗朗切斯科·安东尼奥·贝尔图奇（1611 年）……至于苏利的雄图大略以及内韦尔公爵查理·贡扎格和约

瑟夫神甫(1613—1618年)的同样庞大的计划我们姑置一旁,不去管它。学识渊博的人如果有一点毅力,在这方面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这类名字的数目会是我们上面引证的数目的10倍。实际上,跟随者的人数应该是我们引证的人数乘以100。由于宗教激情狂热的推动,17世纪一开始,欧洲就指望得到"病人"的遗产。这些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之徒把事情弄错了。病人不会那样快就一命呜呼。他虽然永远不会恢复过去的元气,但还会苟延残喘很久。1590年,土耳其在对抗波斯的斗争中取得有名无实的胜利。1609年,经过一场使国力衰竭的战争,土耳其不得不满足于同德意志,即同西方,缔结一项对交战双方来说都毫无好处可言的和约。

事实上,车轮已经转动。这个世纪的初期对大国有利。根据经济学家的说法,这些大国代表最佳尺度的政治事业。这个世纪正在消逝,而且由于一些我们无法确知的原因,这些巨大的躯体逐渐被环境、形势背弃和毁损。这是暂时的表面危机还是结构性的危机?不管怎样,在17世纪初期,只有中等大小的国家似乎是生气勃勃的。亨利四世统治下的法国——这个突然出现的光彩夺目的物体——是这样。伊丽莎白的小的尚武好斗、光辉灿烂的英格兰是这样。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荷兰是这样。那个在从1555年起到三十年战争的先兆出现时止这段时期中经历过物质方面的安宁发展和繁荣昌盛的德意志也是这样(在这场战争中它跌下深渊,整个躯体都沉没了)。在地中海,再度盛产黄金的摩洛哥的情况是这样。阿尔及尔在摄政时期的情况是这样(这个城市正在变成领土国家)。因豪华、美丽、智慧而光彩夺目、光辉灿烂的威尼斯的情况也是这样。费迪南大公的托斯卡纳的情况也是这样。一切都发生得仿佛

新世纪在帮助能够在自己国内进行有效的管理的小国一样。为数颇多的正在成长中的柯尔培尔式的人物，[152]在这些小国里取得成功。他们擅长诊断经济的病情，提高关税，鼓励民办企业，同时对之严加管理。这一系列连续出现的时机和境遇，比各个帝国的重大的、复杂的、不很清楚的历史，更显示出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动。

换句话说，各个帝国将比各个中等国家更加蒙受从 1595 年到 1621 年的长期倒退之苦，而且这些庞大的政治群体在涨潮返回时没有像它们的敌手那样再迅速浮上水面。这次涨潮的确幅度小、历时短，因为一场持续长达百年之久的危机从 17 世纪中叶起就日趋严重。毫无疑问，在 18 世纪，从这场危机中崛起并将充分利用这个世纪的大规模的经济复兴的强国，并不是 16 世纪的各个帝国，既不是土耳其帝国，也不是西班牙帝国。这是地中海的衰落吗？当然是。但不仅仅是。因为西班牙完全有充裕的时间来强有力地转向大西洋。为什么它不这样做呢？

本部分原注

1. Voir *supra*, I, p. 311.
2. Je ne dis pas *à* dessein l'État national.
3. A. SIEGFRID, *op. cit.*, p. 184.
4. H. KRETSCHMAYR, *op. cit.*, II, p. 382.
5. Voir les études d'Enrico PERITO, d'E. CARUSI, de Pietro EGIDI (n^os^ 2625, 2630 et 2626 de la bibliographie de Sánchez ALONSO).
6. A. d. S., Modène, Venezia VIII, Aldobrandino Guidoni au Duc, Venise, 31 juillet 1495.
7. M. SEIDLMAYER, *op. cit.*, p. 342.
8. La paternité en est attribuée, on le sait, au cardinal Giovanni DELLA

CASA,*Orazione di Messer Giovanni della Casa*,*scritta a Carlo Quinto intorno alla restitutione della città di Piacenza*,publiée dans le *Galateo*,du même auteur,Florence,1561,p. 61. Sur cette vaste question,F. MEINECKE,*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in der neueren Geschichte*,I^{re} édit. ,Munich,1925.

9. Pierre Mesnard,*L'essor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au XVI^e siècle*,I^{re} édit. ,1936,p. 39 à 53,particulièrement p. 51—52。

10. A. Renaudet,*Machiavel*,p. 236

11. G.M. TREVELYAN,*op. cit.* ,p. 293.

12. BAUDRILLART(Mgr.)*Philippe V et la Cour de France*,1889-1901,4 vol. ,Introduction,p. 1.

13. Vior *infra*,p. 16 et *sq*.

14. Gaston ROUPNEL,*Histoire et destin*,p. 330.

15. Sur la grandeur turque,R. de Lusinge,*De la naissance*,*durée et chute des Étas*,1588,206 p. Ars. 8° H 17337,cité par J. Atkinson,*op. cit.* ,p. 184—185,et une relation inédite sur la Turquie(1576). Simancas. E° 1147.

16. Fernand Grenard,*Décadence de l'Asie*,p. 48

17. Voir *supra*,I,p. 163.

18. *Annuaire du monde musulman*,1923,p. 323

19. Le mot est de B. Truhelka,l'archiviste de Doubrovnik,dans nos discussions répétées sur ce magnifique sujet.

20. Cf. notammeat Christo Peyeff *Agrarverfassung und Agrarpolitik*, Berlin,1927,p. 69;I. Sakazov,*op. cit.* ,p. 19;R. Busch-Zantner,*op. cit.* ,p. 64 et *sq*. Cependant,si l'on suit l'article de D. Anguelov,*Revue Historique*(bulgare),IX,4,p. 374—398,la résistance bulgare aux Turcs aurait été plus vite que je ne le dis.

21. Jos. ZONTAR, "Hauptprobleme der jugoslavischen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in*: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934,p. 368.

22. J.W. ZINKEISEN,*op. cit.* ,II,p. 143;R. BUSCH ZANTNER,*op. cit.* ,. 50.

23. R.Busch Zantner,*op. cit.* ,p. 65.

24. *Ibid.* , p. 55

25. *Ibid.* ,p. 65 et réfrérences aux travaux de K. Jirecek et de Sufflay.

26. *Ibid.* ,p. 23.

27. W. Heyd,*op. cit.* ,II,p. 258.

28. *Ibid.* ,II,p. 270.

29. *Ann. du monde musculman*, 1923, p. 228.

30. H. Hochholzer, *art. cit.*, p. 57.

31. J. ZONTAR, *in: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34, p. 369.

32. Cité par G. ATKINSON, *op. cit.*, p. 179.

33. *Ibid.*, p. 211.

34. *Ibid.*, p. 397. Même idée, en 1544, chez Jérôme MAURAND, *Itinéraire de…d' 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1544), p. p. Léon DUREZ, 1901, p. 69, les victoires des Turcs en raison des péchés des Chrétiens.

35. F. BABINGER, *op. cit.*, p. 446—447. Pour la référence du livre, voir *infra*, p. 30, note 6.

36.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19.

37. Cité par J. W. Zinkelsen, *op. cit.*, III, p. 20, note 1, d'après Anton von Gevay, *Urkunden und Actenstücke zur Geschichte der Verhältnisse zwischen Österreich, Ungarn und der Pforte im XVI. und XVII. Jahrhundert*, 1840—1842, p. 31.

38. *Op. cit.*, p. 42.

39. *Op. cit.*, VIII, p. 305.

40. F. Grenard, *op. cit.*, p. 86.

41. Émile Bourgeois, *Manuel historique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 t. I, 1892, Introduction, p. 2 et *sq*.

42. "…eine Episone, kein Ereignis", p. 22.

43. V. Hassel, *op. cit.*, p. 22—23.

44. F. Grenard, *op. cit.*, p. 79.

45. Voir *supra*, I, p. 165.

46. J. Dieulafoy, *Isabelle la Catholique, Reine de Castille*, 1920; Fernand Braudel, "Les Espagnols…", in: *Revue Africaine*, 1928, p. 216, note 2.

47. *Mémoires*, IV, p. 47.

48. Brockelmann, *Gesch. der islamischen Völker*, 1939, p. 262.

49. J. Mazzei, *op. cit.*, p. 41.

50. *Annuaire du monde musulman*, p. 21.

51. Il ne prend ce titre officiellement qu'au XVIII[e] siècle, Stanford J. SHAW, "The Ottoman view of the Balkans", *in: The Balkans in transition*, éd. par C. et B. JELAVICH, 1963, p. 63.

52.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15.

53. BROCKELMANN, *op. cit.*, p. 242.

54. Stanford J. SHAW, *art. cit.*, p. 67, signale le rôle des *ulémas* fanatiques des provinces arabes nouvellement conquises et la réaction turque contre les missionnaires franciscains qu'expédient dans les Balkans Venise et les Habsbourgs.

55. Voir *supra*, I, p. 106 et note 1.

56. Stanford J. SHAW, "The Ottoman view of the Balkans", *in: The Balkan in transition*, *op. cit.*, p. 56—80.

57. Angel Ganivet, *Idearium español*, éd. Espasa, 1948, p. 62 et sq.

58. Pierre Vilar, *La Catalogne*…, I, p. 509 et *sq.*

59. *Imperio español, p.* 43.

60. *R.* KONETZKE, *op. cit.*, p. 245; Erich HASSINGER, "Die weltgeschichtliche Stellung des XVI. Jahrhunderts", *in: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1951, signale ce livre de Jacques SIGNOT, *La division du monde*…, 1re *éd.*, 1539. (d'autres suivront: la 5° en 1599), et qui ne parle pa, de l'Amérique.

61. Bien signé par Angel Ganivet dans son *Idearium español*, éd. Espasa, 1948, p. 44—45.

62. Naples déficitaire à partir au moins de 1532, E. Albèri, *op. cit.*, I, 1, p. 37. Dès le temps de Charles Quint la dépense ordinaire de ses États san celle des guerres excédait la recette de deux millions d'or. Guillaume du Vair, *Actions oratoires et traités*, 1606, p. 80—88.

63. Ch. Monchicourt, "La Tunisie et l'Europe. Quelques documents relatifs aux XVIe,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in: Revue Tunisienne*, 1905, tirage à part, p. 18.

64. Gustav Turba, *Geschichte des Thronfolgerechtes in allen habsburgischen Ländern*……, 1903, *p.* 153 *et sq.*

65. Granvelle à Philippe II, Bruxelles, 6 oct. 1560, *Papiers*…, *VI*, p. 179.

66. *Ibiad.*

67. Voir F. BRAUDEL, "Les emprunts de Charles Quint sur la place d'Anvers", *in: Charles Quint et son temps*, Paris, 1959; graphique p. 196.

68. E. Albèri, II *op. cit.*, III, p. 357(1559).

69. *Ibid.*

70. Pour de précieuses discussions, R. Menendez Pidal, *Idea Imperiol de Carlos V*, Madrid, 1940; pour une large revue des questions, Ricardo Delargo

Ygaray, *La idea de imperio en la politica y la literatura españolas*, Madrid, 1944.

71. Cité par E. Hering, *op. cit.*, p. 156.

72. *Op. cit.*, tout le chapitre VIII, p. 395 et *sq.*

73. D'après R. Konetzke, *op. cit.*, p. 152.

74. Voir *infra*, p. 233 et *sq.*

75. G. Micheli au doge, 30 janv. 1563, G. TURBA, *op. cit.*, I, 3, p. 217.

76. *Ibid.*, p. 217, note 3.

77. 13 janv. 1564, Saint-Sulpice, E. CABIÉ, *op. cit.*, p. 217, si toutefois Cabié ne s'est pas trompé de date.

78. H. de Maisse au Roi, Venise, 6 juin 1583, A. E. Venise 81, f° 28 v°. Philippe II songerait à demander le vicariat impérial en Italie, 12 février 1584, LONGLÉE, *Dépêches diplomatiques*…, p. 19.

79. J'évoque ici les idées de Jules Gounon Loubens, voir *supra*, I, p. 321, note 2.

80.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Londres, 1954, édit. italienne: *Storia dell'analisi economica*, 3 *vol.*, 1959, *I. p.* 175—181.

81. *Op. cit.*, I, p. 176, note 3.

82.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4 vol., 1964, t. I, p. 429 et *sq.*

83. Le mot est évidemment un anachronisme: je ne l'emploie qu'en raison de sa commodité. Faudrait-il dire "officiers"? mais le mot ne vaut que pour la France. Ou *letrados*? mais le mot ne vaut que pour l'Espagne. Ou "bureaucratie"?, comme le risque Julio CARO BAROJA, *op. cit.*, p. 148 et *sq.*, mais le mot est lui aussi un anachronisme.

84. *Geistliches und Weltliches aus dem griechisch-türkischen Orient*, p. 179, cité par BROCKELMANN, *op. cit.*, p. 284.

85. F. LOT, *op. cit.*, II, p. 126.

86. *De la guerra de Granada comentarios por don Diego Hurtado de Mendoza*, p. p. Manuel GÓMEZ MORENO, Madrid, 1948, p. 12.

87. *Ibid.*

88. B. M. Add. 18 287.

89. Eloy BULLON, *Un colaborador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el doctor Palacios Rubios y sus obras*, Madrid, 1927.

90. R. KONETZKE, *op. cit.*, p. 173, Grégorio MARAÑON, *Antonio Perez*, 2

vol. ,2ᵉ éd,Madrid,1948,I,p. 14 et *sq.* Angel GONZALEZ , PALENCIA,*Gonzalo Perez secretario de Felipe II*,2vol. ,Madrid,1946,n'aborde pas le problème.

91. Cuenca,13 mai 1594,Copie,B. Com. Palerme,Qq G 24,f° 250.

92. P. Achard,*op. cit.* ,p. 183 et *sq.*

93. Franz BABINGER, *Suleiman der Prächtige* (*Meister der Politik*), 1923,p. 461.

94. *F. Baginger,op. cit.* ,*ibid.*

95. R. Mantran,*op. cit.* ,p. 107,note 2.

96. Voir les admirables explications de Stanford J. Shaw,*art. cit.* ,p. 67 et sq. ,"Decline of the Timar System and Triumph of the Devshirme Class".

97. Beaucoup d'exemples peuvent être empruntés à la biographie de patriciens,d'ingénieurs ou de soldats au service de Venice ——ou aux agents turcs dont on connaît les déplacements analogue.

98. Sa fiche signalétique dans E° 137 à Simancas. Ce personnage curieux est l'auteur de ce long rapport à Philippe II (Valladolid,oct. 1559,E° 137), dont il est fait mention *infra*,p. 272.

99. Meno de Ledesma à Philippe II, Nantes, 21 déc. 1595, A. N. K 1597,B83.

100. Pedro de Medina,op. cit. ,p204 à 205 v°.

101. *Recopilación de las leyes destos reynos hecha por mandado del Rey*, Alcala de Hénarès,1581,3 vol. fol. ;B. N. ,Paris,Fr. 4153 à 4155.

102. Camara de Castilla,série VIII,Renuncias de oficios.

103. 9 juin 1558,A. H. N. Inquisition de Barcelone,Libro 1,f° 337.

104. Manuel DANVILA,*El poder civil en España*,Madrid,1885,V,p. 348—351.

105. *Recopilación*,I,f° 77.

106. *Ibid.* ,f° 73 et 73 v°.

107. *Ibid.* ,f° 79 v°(Loi de Tolède,1480).

108. *Ibid.* ,trente jours et à partir du jour de la renonciation (lois de Burgos, 1515;La Coruña, 1518; Valladolid, 1542). 60 jours (Pagmatique de Grenade,14 sept. 1501) pour présenter les titres "en regimientos",*ibid.* Mais les cas sont-ils les mêmes?

109. *Actas*,I,p. 339.

110. *Ibid.* ,p. 345—346.

111. *Recopilación*,I,f° 79 (Guadalajara,1436).

112. *Ibid.* ,73 v°, Valladolid,1523.

113. A quel moment l'office devient-il une marchandise négociable?La question préoccupait fort Georges Pagès. Il est difficile d'y répondre. Cependant dès la Pragmatique de Madrid,1494(I,f^{os}72 et 72 v°),il est question de ceux qui renoncent à leurs offices (municipaux) contre argent"…los que renuncian por dineros".

114. Il y a un curieux croisement des ventes pour l'État et pour les particuliers. Ainsi,dans le cas d'un office d'alcade à Málaga,D. Sancho de Cordova à Philippe II,18 janv. 1559,Sim. E° 137, f° 70. A Ségovie,en 1591 (COCK, *Jornada de Tarrazona*, p. 11),offices municipaux vendus ou donnés par le Roi"caundo no se resignan en tiempo para ello limitado".

115. R. B. MERRIMAN,*op. cit.* ,IV,p. 325.

116. *Actas*,I,p. 345—346 (1563).

117. *Op. cit.* ,I, p. 453—454. Gens des classes moyennes…

118. Jacob van Klaveren,*op. cit.* ,p. 47, 49 et *sq.*

119. Voir *supra*,p. 17,note 8.

120. J. W. Zinkeisen,*op. cit.* ,III,p. 100,note 1.

121. Jean Sauvaget,*Alep. Essai sur le développement d'une grande ville syrienne des origines au milieu du XIX*^{e} *siècle*,1941,p. 212—214.

122. A Venise,au lendemain d'Agnadel,décision du Grand conseil de vendre des offices (10 mars 1510). Admirable texte. *Bilanci Generali*, 2^{e} Série, vol. I, tome I, p. CCIV. Les guerres, par la suite, favoriseront les ventes d'offices.

123. Bistra A. CVETKOVA,《L'évolution du régime féodal123. L. von Ranke, *Die Osmanen und die spanische Monarchie* …, Leipzig, 1877, p. 74, d'après Businello, *Relations historiques touchant la monarchie Ottomane*, ch. XI.

124. "Es schien ein Tag des Triumphes zu sein",1er mai 1612,cité par H. Wätjen,*op. cit.* ,p. 61.

125. E. ALBÈRI,I,III,254。

126. Palerme,10 juin 1577,Simancas E° 1147. *Matadores*, des tueurs. Sur la ville même lire,bien que postérieur,le livre de Massimo PETROCCHI,*La rivoluzione cittadina messiness del* 1674, Florence,1954.

127. B. N. ,Paris,Dupuy,22,f° 122 et *sq.*

128. Cité par Jakob van KLAVEREN,*op. cit.* ,p. 49,note 5.

129. Cf. du même auteur une série d'articles *in*: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57, 1958, 1960, 1961.

130. B. M., Add. 18 287, f° 23.

131. J. E. Hamilt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Bank of Spain", 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45, p. 97.

132. p. 61, d'après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368.

133. D'après Gerlach, cité par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366—368.

134. Le passage à Besançon d'après une note de Lucien FEBVRE.

135. Le livre de réhabilitation d'ailleurs peu lisible de J. REZNIK, *Le duc Joseph de Naxos*, 1936; celui plus récent de Cecil ROTH, *The Duke of Naxos*, 1948, et surtout le remarquable article d'I. S. REVAH, "Un historien des 'Sefardim'", *in*: *Bul. Hisp.*, 1939, sur les travaux d'Abraham Galante.

136. Bernard SCHNAPPER, *Les rentes au XVI[e] siècle. Histoire d'un instrument de crédit*, 1957.

137. Voir *supra*, I, p. 484.

138. I. P. 29.

139. Gustav FREMEREY, *Guicciardinis finanzpolitische Anschauungen*, Stuttgart, 1931.

140. R. GALLUZZI, *op. cit.*, III, p. 506 et *sq.*

141. Clemens Bauer, *art. cit.*, p. 482

142. *Ibid*, p. 476.

143. Tous ces problèmes des *Monti* romains admirablement exposés par J. DELUMEAU, *op. cit.*, II, p. 783 et *sq.* J'ai résumé ses explications.

144. *Ibid.*, p. 821.

145. "Note sulla storia del saggio d'interesse, corso e sconto dei dividendi del banco di S. Giorgio nel secolo XVI", *in*: *Economia Internazionale*, 1952, p. 13—14.

146. D'après une information fournie par M. Halil Sahillioglu.

147. Aser HANANEL et Eli EŠKENAZI, *Fontes hebraici ad res œconomicas socialesque terrarum balkanicarum soœculo XVI pertinentes*, I, Sofia, 1958 (remarquable).

148. "…sous les nomes de leurs facteurs pour plus de cinq cent mille écus", *Traité de la République*, 1577, p. 623, cité par. J. ATKINSON, *op. cit.*, p. 342.

149. Je pense naturellement à Anthony Sherley, cf. Xavier A. FLORES,

"El peso politico de todo el mundo" d' Anthony Sherley ou un aventurier anglais au service de l'Espagne, Paris, 1963.

150. *Op. cit.*, référence *supra*, I, p. 95, note 3.

151. Voir référence *supra*, I, p. 52, n. 4.

152. Ammintore Fanfani, *Storia del Lavoro*…, p. 32.

五　各个社会

在地中海广阔的领域，各个社会的发展演变在16世纪初期显得相当简单。显然，只要我们坚持限于研究整体，略去细节、局部的例外、反常的现象、失去的时机（这种时机为数颇多）以及其戏剧性大于重要性的动乱等，情况就是这样：因为这些动乱出现之后，立即消失。

显然，这些动乱也有其重要性。但是，当时的社会以陆地为基地，发展缓慢，并且总是落后于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形势和所有其他各种形势一样，时而朝着一个方向，时而朝着另一个方向。社会发展的各种形势往往互相抵销。久而久之，真正的发展演变反倒始终不很明显。这种说法也许是正确的。例如在法国，强有力的更迭交替起了作用。整个16世纪初期都处于社会变化不定的氛围中。穷人从一个地方移居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国家移居另一个国家，没有在冒险的过程中倒下。[1]与此同时，一些富人沿着社会的等级阶梯垂直下落，一贫如洗，不再富有，被新富人取而代之。然后，一种放慢现象在1550—1560年前后出现。之后，发展演变运动恢复，接着，再度受阻，停滞不前。这种受阻现象可能从1587年起，产生于勃艮第；可能[2]将近1595年[3]在总的趋势大转变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加速、减缓、恢复和停滞等现象因而相继出现，而一切都导致，但却是暂时地导致贵族的明显的胜利，导致各个社会在这个世纪末的半冻结状态。但是，这个现实还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形

势发展产生的结果，属于那些会被下一个浪潮消除或者抵销的结果。

简而言之，16世纪尽管有过种种犹豫，却并没有非难、怀疑社会的真正基础，没有由于有这些犹豫而这样做。它大体上从先前的时代把社会的这些基础收纳过来。安东里奥·多明圭兹·奥尔蒂兹新近出版的优秀著作《17世纪的西班牙社会》[4]指出我们预先已经了解到的一些现实事物。这些现实事物是：同不断出现的财政困难进行斗争并从这些困难中脱险幸存的贵族，一个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且没有像一次社会革命那样完成自我的现代国家（它满足于妥协，对共处抱有希望），一个经常被它的成员背叛的有产阶级（但是，它是否意识到本身是个阶级，这一点令人怀疑），最后是不安的、不满的、骚动的但缺乏真正革命意识的民众。

1. 封建领主的反应

在基督教世界同在伊斯兰世界一样，贵族占据首要的地位，而且不想让出这个地位来。乍一看，这些贵族只在法国、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地方出现。他们到处为自己保留着这些社会的虚空的荣华富贵的象征：居先权、豪华考究的服饰、金银线织成的绸缎和天鹅绒、佛兰德的挂毯、纯种马、豪华的宅第和大批仆役等。该世纪末，他们还置备四轮华丽马车……的确，这全都构成他们自我毁灭的原因。据说在亨利二世时代，法国贵族每年进口价值400万利佛的来自意大利的衣服。[5]但是，外表也并非总是不可靠的。它可以显示出权威和财富的牢固基础。在广阔的地区内，这些贵族仍然从他们

强固的封建根系吸取营养。一种旧秩序使这些享有特权者位居社会的最高层,并且仍然支持他们留在这个层次。只在腐蚀古老的等级制度的大城市的周围和内部,只在商业贸易中心(虽然比人们预期的程度低些),只在像尼德兰,特别像意大利(但不是整个意大利)这种很早变富的地区才有例外。这一点我们已经预见到。

这些有例外的地区在地图上只不过是细小的点或者狭窄的地带而已。在地中海和欧洲的范围内,这些有例外的地区的历史显然是小部分人的历史。关于这整个辽阔的地区,我们应该承认吕西安·罗米埃在下面所作的关于卡特琳·德·梅迪奇的法国的解释说明:"一旦人们让这个国家恢复它的自然背景,即一个庞大的半封建王国的背景,"[6]它的一切都会变得清楚起来。进行建立国家这种既是社会革命的(虽然刚刚开始)也是政治革命的活动,必须同"采邑的拥有者、村庄、田地和道路的主人以及广大农村民众的管理人"[7]进行斗争。同这些人进行斗争,就是同他们和解妥协,就是分化瓦解他们并保存他们,因为不可能在没有一个统治阶级的共谋的情况下掌握控制一个社会。现代国家把统治阶级这个工具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砸碎这个工具,就意味着从零开始重建社会,而重建一种社会秩序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何况在16世纪,谁也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因此,贵族和封建势力有风尚习俗的影响作为它们的后盾,并且具有它们早就占有的社会地位产生的力量,更不用说国家相对衰弱和这个时代缺乏革命的想象力这两点了。

封建领主和农民

根据大量经常被人引证和评注的证据，16世纪可能使封建领主沦于贫困境地。证据往往是正确无误的。但是，并非所有的领主都遭到这种厄运。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既不是国王的受害者，也不是战争的受害者；既不是和平的受害者，也不是和平导致的军队复员[8]的受害者，也不是穷奢极欲、恣意享受的恶习的受害者。像某个历史学家那样，说“封建制度由于贵金属在美洲的发现所引起的货币贬值濒于消亡”，[9]这样说过于简单草率。而且这好像是断言有下述各种情况因而进行推论说理一样：资本主义[10]“用它的酸素”溶解社会的结构，或者至少是使社会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卡斯蒂利亚的封建制度就在天主教徒费迪南控制了强大的骑士团的同一天终结了；科西嘉的封建制度恰好在1511年，[11]当乔瓦尼·保罗·达·莱卡失败，当雷努奇奥·德拉·罗卡在他的亲戚设下的埋伏中丧命时受到致命的打击。[12]期望得到准确的解释或者准确的按年月顺序的排列，正如期望一个词自身有准确的含义一样，都会使人产生错觉。单单封建这个词本身就布满陷阱。事实上，只有时间的协同合作，才能促成这些既不能直线地，也不能单向地完成的转变。

不管怎样，在封建领主和农民之间的主要对抗中，后者可能偶尔取得胜利。例如在从1450年到1500年这段时期中朗格多克的情况就是这样[13]。在15世纪，加泰罗尼亚的情况也可能是这样（至少某些生活富裕的农民可能取得胜利）。但是，不符合规律的例外恰好证明了规律本身。[14]通常封建领主总是取得短期的或者长期的胜利。他们在阿拉贡和西西里等地甚至始终是胜利者。被人过多地

引用的价格革命，并不是民主的奇迹的创造者。这场革命减轻了可以用金钱支付的并在美洲发现之前就已经规定了的农民的佃租。事实上，对租给农民的采地征收的封建租税往往很轻，甚至几乎等于零。当然，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封建领主也特别征收与市价同时变化的实物税。莱默红衣主教公爵的收入一览表(1622年3月)提到他的家禽、谷物、酒类，谈到"谷物按规定价格出售，酒售价为4里亚尔。"[15]此外，在地中海和在欧洲一样，土地的瓜分从来没有一劳永逸地进行过。同农民的奸滑狡诈对抗的，是封建领主的奸滑狡诈，必要时还是封建领主的野蛮残忍。封建领主行使司法裁判权。他们对出租给农民的采地以及分开或者包围这些采地的土地享有最高的权利。在15世纪结束时和整个16世纪，呈现出始终根据封建领主的愿望修建的或者重建的村庄的景象。在普瓦图的加蒂讷，[16]在修建"谷仓"的汝拉，[17]在上普瓦图，[18]这都是真实情况。在上普瓦图，某个破落衰败、处于困境的封建领主家族分块出售先前一直空空荡荡、当时有农民定居的广阔的长满松林下植物的荒地，用这种办法来振兴经济，重光门楣。在西班牙，建立村庄时立有土地分配文契。[19]农民已经多年占有的土地，常常转入封建领主手中。在普罗旺斯，自由权与居住权证书和契约从1450年起就已经成倍增加。这往往是人们重新住入那些在旧址上修复的、以前遭到毁坏或者废弃的村庄，很少是住入新建的村庄(1501年瓦洛里，1504年穆昂—萨尔图，1519年瓦尔邦纳)。主动性和积极性每次都来自当地的封建领主那一方面，他们"渴望看见被弃置荒芜的土地有人重新移居，人口繁衍，有人耕种"，[20]于是他们"在附近或者往往在更远的地区，例如在利古里亚、热那亚河、皮埃蒙特等地征募渴望在他们

的土地上安家落户……的农民。”[21]封建领主给这些农民以优惠条件，自己也从中得到好处。[22]

这些“殖民活动”是经济飞跃发展和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产生的明显后果。例如在那不勒斯王国，封建领主有建立“新”城市并把移殖民召引到那里去的习惯。在这个王国，每个封建领主国家（État seigneurial）（其中某些十分辽阔，特别在阿布鲁齐、阿尔比和塔利亚科佐伯爵领地等地更是这样）包括一些乡村社镇和城市社镇。这些社镇都有自己的特权，因此永远不能随意开发利用。那不勒斯的西班牙当局徒劳无益地企图防止这种发展演变，于1559年通过第一号法令。一个世纪后，1653年，又通过第二号法令，规定未经政府准许建立的新城市将立即干脆并入王室领地。既然王国的村庄和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从查理五世在位时期的1,563个增加到1579年的1,619个，后来到1586年又增加到1,973个，逃脱这种严格的规定或者获得必要的准许就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事。属于教会和封建领主的城市以及村庄（占绝大多数，1597年1,556个，1586年1,904个），以和贫瘠的王室领地相同的速度增加。王室领地在同一时期从53个增加到69个（这个数字取自比安基尼的古老的著作）。简而言之，西班牙的仅有愿望而无行动的半心半意的政策，对防止封建领主的扩张推进无能为力。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情况同样如此。既然在王室领地内的或者回归王室领地的城市、村庄和土地都经常出售给新购买者，[23]这项政策还是一项并未始终贯彻执行的政策。

一个封建领主，不管深谙或者尚不熟悉当领主之道，都会是个密切注意并充分利用他的权利、他征收的封建杂税、他的磨坊、他

的猎区以及他和农民对抗的众多领域的业主,而农民也很关心谷物、羊毛和牲畜的商品化。菲利普派驻巴黎的大使贝尔纳迪诺·德·门多萨就仅仅因为这一点,对钱的问题非常操心。他从遥远的任职地点考虑他在西班牙的领地早先收获的小麦的出售问题,[24]因为他是谷物的生产者,甚至是谷物的储存者。还有另外一个迹象:在罗马城周围的坎帕尼亚及其他地方,[25]大土地所有者往往从事饲养大牲口。朱利乌斯·克莱因描述了某些封建领主和大封建领主在牧主公会的绵羊饲养中所起的作用。[26]17世纪,在安达卢西亚,贵族和教会获得大片土地,他们进行粗放耕作,使这个地势低洼的地区人烟稀少起来。[27]有大量关于这些领地和庄园的耕作经营的资料可供历史学家使用。此外,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已经显示出这些领地和庄园拥有多少财富。[28]仅仅那不勒斯的审计法院储存的丰富的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就揭示出生产和出售谷物、羊毛、油脂、木材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生产活动以及投机活动。[29]耕作土地和出售土地出产的谷物,并不意味着有失体面,丧失贵族资格。情况正截然相反。

在贵族阶级的这种生活中,具有封建性质的旧时的收入虽然已经减少,但仍具有一定的重要性。[30]贵族可以增加并且试图增加这些收入。这就引起争执、诉讼和骚乱。我们了解一些这类骚乱,可惜并不确切了解发生这些骚乱的原因。必须仔细查阅中止或者防止这些骚乱的新协定。1599年,皮埃蒙特的比利亚福基亚多镇当局就它的封建权益问题同这个镇上的封建领主缔结了一项协定。[31]必须看到,这项协定久而久之变得怎样,对谁有利。正如在很多其他情况下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这项协定肯定经过大量修改调整。

无数关于争执和诉讼的记载还留存至今。在西西里、那不勒斯、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等地，封臣通常申请把他们的土地并入王室领地。这可能是因为君主制国家对自身利益不如贵族那样警觉、关切，对借口经济变化——不管这种借口是否正确——修改旧的契约不如贵族那样迅速敏捷。

价格的上涨向我们预示封建领主和农民之间争执的总的趋向。1558年夏天，热那亚附近的菲纳尔侯爵领地的臣民起来造反，反对他们的领主阿尔方索·德·卡雷托的敲诈勒索。这是什么敲诈勒索？是否像德·卡雷托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重新对他的封臣的财产进行估价，是因为他企图提高他们的佃租？由于菲纳尔的问题很快越离这位侯爵的个人范围（热那亚和西班牙对这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地太有兴趣，以致不会不利用这个时机），[32]这一事件的实际开端通常反倒被人遗忘。

成功地同土地和土地收入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就这样度过了价格革命的风暴的贵族，最后数量很大。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们在这场风暴中安然无恙、毫无损失，[33]但是，他们毕竟度过了这场风暴。然而，这些保护措施和解决办法并非他们拥有的唯一措施和办法。

在卡斯蒂利亚：西班牙的最高贵族和有爵位的人同国王的对抗

人们说得对，现代国家曾经是贵族和封建势力的敌人。然而，必须这样理解：现代国家既是他们的敌人，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和合伙人。迫使他们服从、就范，是现代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且是它从未彻底完成的任务。它的第二个任

务是:把他们当作统治管理的工具来使用。正如在勃艮第有人说的那样,[34]现代国家位居这些工具之上,并且利用这些工具来控制“民众”。现代国家依靠这些工具来维护公共安宁和公共秩序,来保卫他们的领地、庄园和城堡所在的地区,来征集和统率在西班牙仍然重要的被动员令召集的附庸和他们的军队;现代国家依靠这些工具在1542年包围佩皮尼昂,在1569年进行格拉纳达战争,在1580年入侵葡萄牙。国王更往往满足于在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向他的封臣发出警报。1562年[35]或1567年[36]的情况就是这样。1580年,葡萄牙边境的封建领主自己出资征募了几支小的总共3万人的[37]、没有使用过的军队。每次都是为了守护边境进行征募。但这些征募肯定都深入进行,耗资巨大。

此外,国王经常让重要的封建领主了解他的意图、命令和重要信息。他征求他们的意见,并且要他们借给他巨款……但是,君主政体作为回报给他们的好处也不容忽视。当问题涉及西班牙国家时,首先就涉及西班牙的最高贵族和有爵位的人,[38]就涉及国王的这些主要的对话者。这些人是一个由享有特权者组成的少数。君主政体不时通过这些人间接地进行统治,避免广大地区的分裂派摆脱它的控制,因为这些大封建领主每个人背后都有大批拥护者,正如在法国的吉斯家族或者蒙莫朗西家族背后有大批拥护者一样。当一个王室法官(1664年的情况的确如此)准备逮捕赫雷斯的市长时,阿尔科斯公爵[39]就出面干预。他甚至连去见法官本人这点神都不劳。他对他的秘书说:“告诉他,这个市长是我家的人。这就够啦。”贵族阶级像是星星在君主政体的太阳面前那样失去光辉。当时的情况就是用这样的词句来表述的。但是,这些星星继续在天空

闪烁，不可等闲视之。

卡斯蒂利亚提供了关于享受特权的突出的例子。明显的斗争在那里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中，效果最差的，并不是王室司法官员对封建领主的司法机关的意图和索求以及对封建领主本身的长期敌视。没有什么比在发生遗产继承问题或者财产纠纷时让封建领主自己互相斗争更加轻而易举的事了。这是搞垮封建领主的大好时机。1572年，鲁伊·戈梅兹得到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刚刚打赢那场他同修道院长东·安东尼奥的侄子阿尔贝公爵之间的关于尼埃布拉伯爵领地的官司的消息时，兴高采烈，欣喜若狂。根据托斯卡纳大使的说法，[40]这块公爵领地有6万杜卡托的收益。官司打赢后——这是偶然的吗？——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娶了鲁伊·戈梅兹的女儿为妻。王室司法当局支持封臣反对封建领主的事极为罕见，但毕竟发生了。1568年7月，因凡塔多公爵来到法院。这位公爵长期是卡斯蒂利亚最富有的封建领主(1560年他仍然是最富有的)，[41]但他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了梅迪纳·西多尼亚。这可能是由于他地位优越、树大招风，特别易受到攻击和由于他故意隐没？不管怎样，他于1568年来到法院。这次是企图让直接从属王室领地的桑蒂亚纳侯爵领地的臣民对他起诉。富克沃补充说，在这个王国“还有另外一些被以同样的方式卷入诉讼的西班牙的最高贵族。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已经失去部分宝贵的领地或者庄园。其他的人也将同样失去。”关于这宗案件的详情我们就是借自这个富克沃的著作。[42]

至于这些封地领主进行的审判，它受到上峰密切监督，从来没有逃脱人们的注意。1558年，一个威尼斯人说，这些封地领主作出

的判决提交到司法部门。[43]1563年,保罗·蒂耶波洛重复了这一点。“卡斯蒂利亚的贵族拥有辽阔的领地、庄园以及相当肥美的土地,但是,他们的司法权和权力却很有限。归根结蒂,他们并不进行审判。他们不能向他们的百姓征税。他们既没有堡垒,也没有士兵,也没有大量武器……这种种情况与阿拉贡的封建领主的情况正好截然相反。阿拉贡的封建领主虽然等级地位更低,但篡夺了更大的权力。”[44]

君主政体取得的这些小胜利或者甚至像西班牙国王1559年在卡斯蒂利亚的海军上将死时收回坎塔布连沿岸的海关关税那样重大的成功,都不应该给人以任何假象。这些海关关税作为继承的让与物[45]属于卡斯蒂利亚的海军上将所有。封建领主权力的那股强大力量很少消减。1538年,查理五世使用了他所有的权威。[46]但是,面对贵族代表的反对,他未能使国会制订出一项总的消费税则。米歇尔·苏里亚诺后来写道[47]:“当查理五世企图取消他们的特权时,遭到所有西班牙最高贵族的反对,特别遭到卡斯蒂利亚的海军大统领的反对,虽然他对陛下忠心耿耿。1555年,菲利普二世不在西班牙时,西班牙最高贵族试图协调一致,东山再起,进行报复。从1558年到1559年,[48]胡安娜公主以菲利普二世的名义进行属于城市的村庄的所有权的转让。这些城市进行自卫,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而所有我们知道的购买者都是显要的贵族。他们是王室排挤或者试图排挤的很有权势的人物,因而显得突出,受人注意。例如王室希望卡斯蒂利亚的海军上将不要购置托德西利亚斯,希望拉斯·纳瓦斯侯爵不要把塞哥维亚的领地的一大片据为己有,[49]希望阿尔卡拉公爵不要拥有塞维利亚的1,500个封臣。[50]这些封臣是用15

万杜卡托买来的(即每个封臣及其家庭100杜卡托)。但是,挫败了1个贵族,就会有10个贵族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在没有城市的封臣的时候,一旦时机到来,就购买教会的封臣。这些封臣也被王室拍卖。西班牙的大贵族,正如他们的档案材料所证明的那样,狂热地购置土地、公债、采邑,甚至城市里的房屋。

然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君主政体的权力变得更加有效,毫无疑问,也更加严酷。这方面的迹象屡见不鲜。例如国王下令逮捕埃尔南·科尔特斯的儿子巴列侯爵。[51]这位侯爵被指控图谋在新西班牙独立。又例如国王于1572年在巴伦西亚通过宗教裁判所以异端罪或者鸡奸罪逮捕蒙特萨的总管[52](公共舆论并不能肯定这一点)。又例如他于1579年把阿尔贝公爵本人放逐到这位公爵自己的领地。又例如他经过长期犹豫之后,1580年打击,[53]而且沉重地打击鲁伊·戈梅兹的遗孀埃博利公主。又例如他于1582年4月在莫迪卡伯爵的父亲卡斯蒂利亚的海军上将的家里逮捕了这位伯爵。[54]不错,这位伯爵犯有杀害情敌罪。(一则威尼斯的通讯写道:"这次处决使所有的贵族,特别使在西班牙被称为最高贵族的人十分悲哀,因为兔死狐悲,他们看到自己并不比终有一死的平民百姓更受尊敬。")又例如谨慎国王1586年9月不经审判[55]就在马德里迫使身穿奇装异服的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变得规矩老实起来……在菲利普三世在位时期,接着又在菲利普四世统治期间,这些行使权力的行动一再重复,一一列举,会制成一张长表。马格达公爵和他的兄弟 D. 海梅因为动手殴打一个王室会议的公证人和治安法官而被判处死刑。事情后来平息下来。但是,当时的情况正像1621年4月奥苏纳公爵、莱默公爵和乌塞达公爵突然失势时那样,群情激愤,民

怨沸腾。[56]这件事甚至使法国大使也感到惊讶……

的确，贵族已经降服就范，而且往往心悦诚服。大贵族家族从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起，就开始在宫廷生活。他们在马德里定居。定居之初，他们小心谨慎，而且不无犹豫和反感。1597年，博尔盖塞红衣主教还写道，[57]大贵族家族在那里住在那些和意大利的房屋相比修造得很差的、不舒适的房屋里。豪华奢侈的地毯和金银器皿并不能防止这些贵族在那里生活毫不讲究卫生，以致人们走进这些房屋就像走进马厩一样。用不着为这些贵族辩护，使他们不受意大利的批评指责。他们的确像他们自己就是农民那样生活。他们往往性情暴烈，并没有变得温文尔雅、循规蹈矩，虽然他们当中也有某些人是很好的例外。而且，他们住的这些马德里的房屋只不过是临时住宿处而已。重要的节日庆典在他们的领地、庄园举行。[58]因凡塔多最富有的公爵们在瓜达拉哈拉拥有一座宏伟壮丽的宫殿。1525年，纳瓦杰罗宣称[59]这是西班牙最美的宫殿。后来菲利普二世和法国的伊丽莎白的婚礼就在这里举行。封建领主的宫殿大部分修建在乡下。在离奥罗帕萨不远的格雷多斯山区的拉加尔特拉村，[60]"农妇们还穿着她们古老的传统服装、护腿形的袜子和笨重的绣花衬裙"。[61]就在这个村子，弗利亚斯的公爵们拥有他们的城堡。这些城堡有开在厚墙壁上的文艺复兴风格的窗子、宽敞的庭院、宽大的楼梯、雕花的天花板、凸出的梁柱和巨大的壁炉。

封建领主逐渐抵挡不住城市的诱惑。因凡塔多公爵已经定居瓜达拉哈拉。在16世纪，塞维利亚的宫殿数目倍增。那种有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装饰物的窗子和廊柱以及那种用塑像支撑的、有纹章的房屋，今天在布尔戈斯还留存一些。[62]1545年，帕德罗·德·

梅迪纳对巴利亚多利德的贵族宅第的数量和富足都十分羡慕。[63]

当菲利普二世的统治结束时，封建领主大批蜂涌迁往马德里，然后又迁往在某个短时期内再度成为西班牙首都的巴利亚多利德，奔向宫廷炫示的生活，奔向宗教节庆活动，奔向中心广场上的斗牛。这个贵族阶级在君主周围把一道以后使君主和它统治的平民百姓隔离的屏障加厚。[64]由于懦弱无能的菲利普三世容忍听任，这个贵族阶级怀着它的狂热偏见让它自己的人、自己的小集团占据政府的主要位置。这是宠臣近幸的时代，是阿谀奉承之徒飞黄腾达的时代。从那时起，这个贵族阶级开始喜爱马德里的奢侈豪华的生活和松弛自由的环境气氛，开始喜爱街上的长散步场和这个城市的夜生活：剧院、讨好人的寡妇和妓女。这些妓女身穿绫罗绸缎，穿红戴绿，接待有身份的嫖客。这种情况激起品德高尚、作风正派的人的愤慨。这个贵族阶级被生活的这种改变陶醉，和大城市滋生的成份复杂的民众混杂一起，在与坏人为伍、腐化堕落的过程中感到一种反常的欢快。根据传统的说法，无敌舰队的不幸的英雄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在马德里开设了“七鬼”小酒店。[65]这件事被人信以为真。不管怎样，马德里不仅是国王的、戏子的或者流氓坏蛋的城市，而且是贵族的城市，是贵族追求虚荣、铺张浪费、大讲排场、争斗吵骂的场所。这些争吵由贵族自己解决或者由他们的亲信左右在街头巷尾解决。观察者说，这个城市每天发生暗杀案件一起以上。[66]

但是，贵族也蜂涌前往马德里监督王室政府，并且从中得到好处。这个阶级在被制服之后，也轮到它去制服别人，为它曾经被谨

慎国王在他漫长的统治时期疏远冷淡这件事报仇雪恨。平民继续占据机关里的要弄笔杆的职位,在通往荣华富贵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进。西班牙的最高贵族和有爵位的人,寻求恩典、丰厚的馈赠、有利可图的任命、资助以及各个骑士团的有钱款收入的显职高位和头衔的让与等。他们为自己和他们家族的成员央求。被任命为驻意大利或者驻美洲的总督,就是获得一笔可靠的财富。在名义上,西班牙大贵族的收入,由于遗产和财产相当有规律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不断增加。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收入随着商情和生活费用上升。根据威尼斯人的说法,[67]西班牙最高贵族和有爵位的封建领主,1525年总共拥有110万杜卡托的收入,其中梅迪纳·西多尼亚一人就拥有年收入5万杜卡托。1558年,[68]这位公爵的收入高达8万杜卡托。1581年,22个公爵、47个伯爵和36个侯爵总共拥有300万杜卡托,其中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一人就拥有15万杜卡托。[69]

表面现象如此,民众也这样传说。但是,身居这些显职高位的人无不债台高筑。他们的万贯家财已被抵押。甚至从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起,灾难性的负债就已司空见惯,成为通例。正如国王自身的收入一样,贵族的收入往往被分派来还债。例如,大家知道,佛罗伦萨的马尔泰里家族[70]1552年以弗朗切斯科·洛蒂和卡洛·马尔泰利的名称创办了商行。这家商行直到1590年为止专门向大封建领主(他们是迟付债款者)和一贯谨慎小心、付款准时的平民百姓放高利贷。迟付债款者的名单真是洋洋大观:“阿斯托尔加侯爵的儿子阿隆索·奥索里奥、D. 米盖尔·德·贝拉斯科、D. 胡安·德·萨亚维德拉、D. 加布里埃尔·德·萨帕塔、D. 迭戈. 乌尔塔多·门多萨、D.

路易斯.德·拉·塞尔达、D.弗朗西斯科·德·贝拉斯科、D.胡安·阿库尼亚、那不勒斯总督的儿子D.路易斯·德·托莱多、B.贝尔纳迪诺·德·门多萨、D.鲁伊·戈梅兹·达·西尔瓦、D.贝尔纳迪诺·曼尼克·德·拉拉、帕尔马伯爵的父亲拉韦加·D.加西拉索·德·拉·韦加、拉斯·纳瓦斯侯爵、尼埃布拉伯爵……"这是一块漂亮的运动场电动记分牌。这些债往往是为国王办事由他的使节欠下的。因此，可以理解，国王一有机会就进行干预，迫使债权人妥协[71]……我们对这些庄严堂皇但已空空如也的国库在下个世纪的情况了解得更加清楚。下个世纪，同样的困难仍然存在。一项国王的恩典、一笔及时得到的遗产、一笔丰厚的嫁妆、一笔国王批准用封建贵族长子世袭财产来偿付的借款，都会填补一下不稳定可靠的库存现金。[72]但是，事情很快又困难起来……最后，这反倒使君主更易于行事。贵族与活跃的经济生活隔离，他们做生意买卖注定亏损，并向放债人求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生活奢侈，大讲排场。

国王还拥有另外一种施加压力的手段。这就是在将近1520年，确定了一个很难跻身其中的精选的高等贵族的类别，即最高贵族和有爵位者这个类别。它包括最高贵族20人，有爵位者35人。1525年，这些贵族总共有60人；在菲利普二世统治结束时，总共有99人（公爵18人、侯爵38人、伯爵43人）。菲利普三世册封了侯爵67人和伯爵25人[73]……因此，出现了连锁晋升发迹现象。例如1533年和1539年，出现了新册封贵族纳瓦斯家族和奥利瓦雷斯家族的连锁晋升发迹现象。后来，高等贵族又区分为3个等级。国王就是通过这些办法来进行统治，控制他的世界的……

卡斯蒂利亚的西班牙末等贵族和地方行政官

在菲利普二世统治的末期，高等贵族有100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子最多有400或500人。对卡斯蒂利亚地区的各类贵族的总人数的估计不可靠，可能为13万人，[74]在西班牙总人口六七百万人中，有贵族50万。这个巨大的数量必然把贫穷和境遇，悲惨的贵族包括在内。在几千座有时破烂不堪、往往装有“刻在石头上的纹章”[75]的房屋中，住着一大群一心想要“高贵地”以为国王或者为教会效劳为生、不干有辱门楣的事的人。他们为实现这个理想牺牲一切，甚至常常牺牲生命。如果有什么贵族的疯狂的话，那么，这种疯狂就在卡斯蒂利亚不断加剧，尽管这种疯狂带来贫困，引起民众嘲笑。这类嘲笑中有大量谚语，[76]例如：“向西班牙末等贵族索还他欠你的东西，要放出你的猎兔狗。”“西班牙末等贵族的饭桌上，餐巾多，菜盘少。”“但愿上帝保佑你不受贫穷的西班牙末等贵族和富农的侵犯。”……

不用说，有这类嘲笑当然是意料中事。一方面想过高贵生活；另一方面又因为没有几乎可以使什么都变得正当合法的钱而无法过高贵生活。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某些城市竟至拒绝不在共同的财政负担中出一份力的西班牙末等贵族进入。据说，昆卡省加斯库尼亚村政府的房屋上用金字写着：“西班牙的末等贵族[77]、修道士和牛，我们的法律都不容有。”（“牛”在这句话里是否作为韵脚?）很多其他城市和村庄则拒绝区分西班牙末等贵族和平民。这两类“百姓”往往在他们之间平半瓜分市镇的官职和税款。[78]这有利于占少数的一方。在很多重要城市，例如在塞维利亚这个重要的

港口城市，[79]贵族已经占据全部领导岗位。我们已经指出官职捐纳制度的盛行。这种制度有利于拥有官职的家族。这些家族支配、控制着被国王出售后又被购得者转卖的城镇助理地方长官的职位。当然，这并不纯属虚荣问题，还往往是利欲熏心、锱铢必较的人的利害问题。地方贵族不能像最高贵族那样掠夺整个卡斯蒂利亚，于是就近掠夺伸手可及的城市和乡村的收入，并以此为生。在这些动乱不已的微观世界里，争吵、紧张局势和阶级斗争从来就屡见不鲜。这个世界里的事变有时可笑，有时悲惨，但始终具有某种意义。

没有肉的骨头往往全被大贵族扔在一边。同样，对西班牙末等贵族来说，宫廷里的低下职位和一般官职是可以弄到手的。甚至在紧接菲利普二世之死发生的社会的突然大变化以前，情况就是这样。菲利普二世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喜欢平民或者有产阶级。有产阶级的人数(如果除去教会人士)甚至在国家财政会议中也受到限制。这位国王还宁愿要中等贵族而不要大贵族。最近的调查研究证实了他的这种偏爱。这种偏爱改变了过去的总的一般性的解释。[80]封建领主的反应和对抗随着16世纪开始而开始，虽然，很自然，并非所有的贵族都马上被安置到舒服惬意的职位上。很多穷贵族很高兴置身于仆役的行列，置身于大贵族的仆役的行列。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而忘记时机一旦到来就佩带上圣地亚哥修会或者卡拉特拉瓦修会的红十字，[81]以显示他们的贵族身份。

面对这种全面的、普遍的、深刻的发展演变，很少发生过什么反应和对抗，甚至几乎没有发生过。人们知道并能确定其时间和地

点的反应和对抗因而显得更有意义。例如坎波城这座古老的商业城市,尽管1598年一项判决判它败诉,仍然拒绝把它半数的官职让与西班牙末等贵族,而且它还争取到缓期执行判决,然后通过支付2.5万杜卡托于1635年打赢了这场官司[82]。里奥·塞科城1632年也使用馈赠厚礼的办法在同样的情况下进行自卫,并且取得胜利。[83]从这些细节中可以看到商品和贵族在进行斗争。

其他证据

卡斯蒂利亚的景象,在别处同样存在,只不过在细节方面有了必要的改变。它存在于法国[84],甚至还存于加泰罗尼亚[85]和巴伦西亚。在西班牙的这两个与众不同的省份,国王的权威弱小,贵族对这一点加以利用,以致外国观察家往往很自然地认为,贵族的意图具有过多的颠覆破坏性。1575年8月,在谈起要把甘迪亚公爵(但他病了)或者阿伊托纳伯爵同埃斯科维多一齐派往佛兰德时,热那亚人绍利说,这两个人都可能追求"共和国人的称号,因为一个来自巴伦西亚,另一个来自巴塞罗那。"[86]"共和国人"是一块多么漂亮的招牌啊!另外一个更有意义的细节是:1616年4月在巴伦西亚,总督费理亚公爵由于一个贵族开要弄别人的玩笑而加以惩处,让他骑在骡背上周游全城。贵族们立即把各自的家门关上,穿上丧服。一些贵族还前往马德里国王处就此事提出抗议。[87]

在那不勒斯,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的凶猛入侵为贵族家族带来整整一连串灾难。大的王侯如萨莱诺亲王、塔朗托亲王和巴里公爵等,全都销声匿迹。他们的"邦国"四分五裂。但是,在这次赌赛

中，中等封建领主却扩大了他们的领地。一些幅员相当大的邦国幸存下来。例如阿尔比和塔利亚科佐、马泰拉、切拉诺等伯爵领地就是这样。1558年，[88]一则威尼斯报导作了统计，用表列出那不勒斯王国有公爵24人、侯爵25人、伯爵90人、男爵近800人。在这些贵族中，13个封建领主拥有1.6万到4.5万埃居的年金收入。这些数字后来增大。1580年有亲王11人、公爵25人、侯爵37人。[89]1597年共有"有爵位和头衔的人"213人，即：亲王25人、公爵41人、侯爵75人、伯爵72人、男爵600人或者更多。[90]人们不再劳神去统计这些无足轻重的人物。某些封建领主拥有年金5万到10万杜卡托。[91]国家既然通过审计法院出售职衔，怎么会进行一场反对它自己的顾客的斗争呢？

然而，国家进行了这场斗争，但从未全心全意彻底进行过。1538年，而且在这以后，查理五世宣布禁止那不勒斯的封地领主行使重罪审判权(mero)和轻罪审判权(misto impero)[92]，除非这些权利正式列入这些封地领主的特权中或者由一项合法的规定加以确立。封地领主如有违反，将被控篡夺司法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试图使社团的财产和封臣的自由摆脱开领主们的无常幻想。他试图把"效劳费"的数额限定在习俗确定的数额上。但此举徒劳无功。对贵族来说，什么都是好猎物：森林、公共牧场、他们的臣属的劳役(他们认为对自己的臣属享有一切权利，例如比安基尼甚至还谈到用人皮做面套的座位的事)[93]、君主的权利以及有时甚至应该缴付给国王的钱款。国王的确常常放弃他的权利和财政收入。这些权利和收入已经预先出售，然后又在时机到来时转售。因此，大多数封地领主在司法判决和封建杂税这两方面有同君主的权利几乎相等

的权利。他们有自己的忠实追随者。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制服他们。他们可能只缺少铸造货币的特权。他们大讲排场，铺张浪费。在那不勒斯，他们通常就住在总督的住所附近，并且在大城市的氛围中生活。他们崇慕虚荣，穷奢极欲。为了同土耳其人和“民众”进行斗争，他们需要依靠西班牙。只有这些事实才使他们没有兴风作浪，发动骚乱。也可能在他们当中有外国人——西班牙人或者热那亚人——这个事实，也使他们没有这样行事。这些外国人因为购买了封地、采邑而得以进入西班牙。

不管怎样，总的看来，贵族这个阶级不断成长。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灾难连绵不绝。毫无疑问，这使不止一个封建领主倾家荡产，特别在城内情况更是如此。债台高筑，债主紧逼，这迫使人出卖财产或者把财产暂时交给审计法院保管。在贵族的生活中，这类事情屡见不鲜，在那不勒斯或者别处，他们处境危险。他们终于得以幸免于难，留存下来。某个贵族个人可能遭到毁灭或者财产丧失殆尽，但整个贵族阶级并不因此而不再有力量和影响。我们如果一跃而进入17世纪中叶引人注目的年月，就会看到，在马萨尼埃洛时代(1647年)的那不勒斯革命期间，在优美如画的图景和人物的背后，完成了一场不可否认的社会革命。封建领主和他们的反动阶级是这场革命的胜利者。[94]

贵族阶级获得胜利，而且长年累月获得胜利，不仅仅在那不勒斯获得胜利，在米兰[95]、托斯卡纳、[96]热那亚[97]、威尼斯[98]和罗马[99]也同样获得胜利。可资我们用来印证的档案资料汗牛充栋。难道还需要重复吗?

土耳其的连续相继的贵族

最令人惊奇，而且这比其他材料令人惊奇的档案资料，是有关土耳其帝国的档案资料。我们对伊斯兰国家的情况缺乏直接的了解，但了解安纳托利亚的社会情况，甚至相当清楚地了解巴尔干的社会情况。这些真实的情况与人们经常重复的内容正好截然相反，[100]与西方的情况并非迥然不同。两者之间的相似或者类似之处都显而易见。既然一种社会秩序归根结蒂不会有结构方面的成千上万种可能性，既然这些社会都完全以土地的使用为基础，既然这些国家尽管令人注目，但都由于仍然处于摇篮时期，至少仍然处于不成熟的时期，而彼此雷同，那么就可以说：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

最近15年来进行的研究，虽然不能揭示和阐明一切，但使人得以辨清一些整体、一些有价值的“模式”。这里最必要条件是深入细致地区分不同的时代。太多的历史学家在谈到土耳其时，的确把在几个世纪内展现出的图景混淆起来了。社会虽然很少阔步前进，但久而久之却在相当广阔的地区内发生了变化。必须谈到的是三个、甚至四个土耳其的连续相继的贵族阶级。其中在16世纪末终于大胆夺权登位的最后一个，可以说是最不合法的一个。它虽然并没有单独使奥斯曼人的极权国家彻底灭亡，却完全占据并削弱了这个国家，因为虽然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这种现象随处可见，但是，总的形势也负有一部分责任，起一部分作用。经济形势时时在变化，处处在起作用。

寻找土耳其的第一个贵族阶级的根源，必须一直回溯到14世纪的蒙昧时期。这个阶级在奥斯曼人取得最初几次巨大胜利的前

夕或者在取得这些胜利之后不久，在安纳托利亚定居下来(从1326年攻占布尔萨起到将近1360年攻占安德里诺普尔止)。如果历史学家[101]的记述可信的话，这个上层社会是冷酷无情的、暴虐无道的、具有威胁性的，它形成一个联合体。这个联合体既是奴隶制度的，又是封建制度的，又是属于领主的。然而，它是自由的。事实上，它丝毫不受素丹统治，它过分自由。(素丹只不过在和他平起平坐的人中坐第一把交椅而已。)在这个联合体里，土地不受国家的任何管理和控制，不断买卖。最后，在这个联合体里存在着个人的田产。这种田产我们称为自由地的田产(mulks)，或者家庭的田产(wakoufs)，或者清真寺的田产，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善男信女捐助的作为基金的田产。但是，这些基金的创设者和他们的后代保存、管理并享用这些田产，因此这些田产在某些方面同西方的封建贵族的长子世袭的财产一样，成了稳固的财富堡垒。

第二个土耳其贵族阶级不仅出现于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属地，而且正是在欧洲，当它扎下了根然后迅速茁壮成长时，我们对它看得最清楚。

在土耳其人迅速征服巴尔干半岛各国之前很久，那里的整个社会已经在猛烈的农民革命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在土耳其人发动最后一次进攻之前，在从1521年攻占贝尔格莱德起到渗入匈牙利止(1526年莫哈奇战役)的这段时期，匈牙利农民叛乱，基督教贵族进行镇压，但为此付出了致命的代价。[102]总之，一系列旧的封建制度都几乎自行崩溃。这些都是源远流长的、由庞杂多样的成分(希腊的、斯拉夫的，甚至西方的)构成的制度。在灾祸降临、被人征服的前夕，巴尔干半岛各国由于它们的财富情况，甚至还由于像封建

领主移居与他们的领地、庄园（这是一种像意大利的人口的城市集中化那样的人口的城市集中化）邻接的城市这样的细节，都与西方类似。阿尔巴尼亚的封建领主穆萨基家族已经在都拉斯定居，住在像博洛尼亚的或者佛罗伦萨的设防高楼巨宅那样的设防高楼巨宅里。在内地，在不止一座城市的街道上，富有的封建领主的豪华宅第修建起来。蒂尔诺沃有它的封建领主街区；维丁也有它的封建领主街区[103]。所有这些豪华奢侈的事物与大庄园结合在一起，都与备受残酷剥削的农民结合在一起。正是这种制度，像舞台上的布景一样，在土耳其面前土崩瓦解。

紧接着征服而来的是破坏。当地居民退往寸草不生的崇山峻岭。但是，农民却得到某种程度的解放。这些农民聚集在他们自己的团体中，是自己土地的主人。当然，他们并不自由。他们服从不放过任何人的税务机关，并且被收纳进模仿旧领地组成的新领地里。这些领地是采邑，更确切地说是中世纪的封地，是在其中分配有人口和被征服的土地的提马尔。农民仍然用钱和用实物缴付佃租。缴付的实物大大少于缴付的钱。但是，农民这时从传统的苛重的劳役中解放了出来。土耳其人在到来后的最初几年是平易和解的。这尤其是因为：征服还在继续，尚待完成；对尚未征服的地区的农民骚乱带来的好处必须保存；素丹已经对因欧洲的采邑的分配而发财致富的老安纳托利亚贵族怀有戒心。这个贵族中的大家族[104]试图夺取国家事务的领导权。中央政府对封建主、大地主的这种不信任心理从未消失，因而采取了大量措施、政策和谨慎行动。在从一开始就给予巴尔干各国的基督教贵族的优待里，并没有深藏什么别的动机。这些贵族得到慷慨地授予他们的提马尔。[105]

这些提马尔尽管和西方的领地相似,但并非一般的采邑。它们同西方的领地一样,包括村庄、已耕的和未耕的土地、水流、通行税,有时还包括对附近的城市(例如科斯图尔这个保加利亚小城市)征收的市场税[106]……但是,这些领地用于供养士兵和骑兵(sipahis),因此蒂马尔也常常叫做“西帕希利克斯”(sipahiliks)。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附有条件的采邑、一种报酬。这种报酬的领取者为了报答,有义务在每次征调时率领一支骑兵前往服役。这支骑兵的数量与提马尔的大小成正比,并由行省的县长指挥。不响应征召,就要失去提马尔。这些可以收回的、授予个人终身使用的领地,更主要是加洛林式的封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采邑。但是,从很早起,提马尔就已开始由父亲传给儿子。这是一种向遗产的逐步转变,而不是向封地的转变。自1375年起,一项法律承认提马尔的拥有者的子孙后代有继承权。[107]

来自提马尔的正常收入通常十分微薄,少于2万阿斯普尔。这个最高部类的最高数额很少达到。维丁和贝尔科维扎等地区从1454年到1479年的记录表明:21个蒂马尔的收入为1416阿斯普尔到10,587阿斯普尔,即20到180杜卡托,其中大多数在2,500到8,000阿斯普尔之间。然而,这个微薄的收入标志着这个制度的黄金时代。提马尔拥有者在地方当局的严密监视下,无法侵吞农民的微薄收入。他们如果想发财致富,解决办法就是进行战争掠夺。战争中的掳获,是对奥斯曼王朝一直进行到将近16世纪中叶的富有成果的战争的奖赏。[108]

提马尔拥有者的收入相当微薄。这一点仅仅从他们的人数就可以推测出来。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时,他们可能是20万人,[109]即

在1,600万或2,000万总人口中有100万人(按每一提马尔持有者的家庭有5人计算)。这个贵族阶级的人数太多,以致无法富裕起来。但是,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享有特权者。一个大贵族阶级很早就已经形成。事实上,有三类提马尔[110]:普通提马尔,其收入达到2万阿斯普尔;中等提马尔,或称齐亚梅特(ziamet),其收入达到10万;哈斯(has),其收入还高于10万这个数字。1530年,首相易卜拉欣帕夏在鲁梅利拥有一个收入为116,732阿斯普尔的哈斯;阿雅斯帕夏拥有一个收入为407,309阿斯普尔的哈斯;卡塞姆帕夏拥有1个收入为432,990阿斯普尔的哈斯……这些是大领地。此外,还有清真寺的田产和自由地的田产(为了同农民的田产哈伊亚·茨奇弗特利克[raïa tschiftlik]对照比较,自由地的田产称为哈萨[hassa]或者哈萨·茨奇弗特利克[hassa tschiftlik])。我们能够把这些领地称为封建领主的禁地吗?15世纪后半叶,在希腊,这些禁地中的一些包括橄榄园、葡萄园、果园、磨坊[111]……私有财产很早就已经存在,规模或大或小,通常对大封地领主有利,并且可能破坏土地贵族的庞大的组织制度。土地贵族是在公共服务的传统里,并根据国家全部财富只属于素丹的土耳其国家这个基本学说培育起来并发展壮大的。

素丹发现过分富有的、而且现在已经过分自由的大贵族阶级具有威胁性,十分危险可怕。这件事说明为什么穆罕默德二世和苏里曼大帝作出了反应以维护一种在制度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央集权。这种中央集权正受到可能产生的分离主义和地方自治的威胁。这种反应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作出得过早;对苏里曼大帝来说,作出得过迟。伊斯坦布尔的征服者一法蒂赫的目标是:毁除

清真寺的财产和自由地的财产,使之再度被纳入西帕希利克斯的分区的控制下。[112]1530年苏里曼进行的大规模的管制和处理,[113]是一次总整顿。这种整顿是这位“立法者”时代的特征。从那时起,军事采邑只在首都伊斯坦布尔授予(省长只保留任命在较小的转让的采地上的职务的权利)。给予骑兵的儿子的补偿,现在固定下来。这种补偿根据父亲捐躯沙场或者死于病榻而有所不同,根据继承者是否已有采邑而定。但是,这种种措施,正如社会事务方面的所有专制强迫性措施一样,其结果是令人怀疑的。除非由于这一套办法集中于伊斯坦布尔,它以后主要依存于素丹的宫廷和依存于宫廷的谋略手段,而不是依存于宫廷自身的效能,情况才不是这样。不管怎样,已经确立的大地产所有制、大庄园制是不会倒退的。它受助于、得益于巴尔干内部的殖民化、人口的增长和未经加工的产品向西方输出的迅速发展。小麦贸易从1560年起到1570年止使大土地所有者发财致富。鲁斯特姆帕夏首相就是进行非法小麦贸易的商人。[114]

土耳其贵族阶级的第三个时代,大约是在1550—1570年这个时期以后,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的新时代。构成这个时代的特征的,是大所有制、大庄园制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先于16世纪中叶。尽管如此,产生的新事物是:土耳其进行的富有成果的征服停止(这种现象早在苏里曼大帝的非常光荣的统治终结[1556年]之前就已经出现);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封建领主不得不转向农民世界,不得不恬不知耻地、毫无节制地剥削他们,因为随着阿斯普尔一再贬值,用钱支付的租金已经不再有什么价值[115]。奥斯曼国家因而陷入困境。奥斯曼的编年史作者穆斯塔法·塞拉尼基于16世

纪末写道[116]："国库已经入不敷出。"税收措施和收入让与情事倍增。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物价上涨最终使旧秩序变糟。当时的人指责政府风习恶劣，指责它给宫廷贵族、给宫廷贵族的仆从、阿谀奉承之徒和食客以恩典优惠。奥斯曼帝国的宫廷变成了提马尔的分配者。它把提马尔保留给君主及其大臣周围的内宠近幸和仆从，例如书吏、财政包税监督员、高级官员的侍从、宫廷的年轻仆从等[117]，这还不包括帝国大臣和素丹的母后……这种形式的采邑分配，超过了以后西方在这方面经历过或者创造过的事物。法国的贵族证书同这些往往不是颁发一次而是颁发两次，并且毫无顾忌地赋予"局外人"[118]（这些"局外人"不属于奥斯曼统治阶级）特权的敕令相比，就根本算不了什么。一个奥斯曼帝国的编年史的作者[119]这样举出我们在西方称为新贵族的人："流浪汉、盗匪、茨冈人、犹太人、拉齐人、俄罗斯人、城里的居民"。"无耻的丑行"的时代[120]已经来临。这个时代还将不顾传统的准则延续下去。由于货币经济推动一切，广大的领地、庄园不断扩充。这是什么也无法再与之对抗的蔓生怒长的毒草。某个提马尔拥有者用假名获得二三十处领地……[121]较小的领地、庄园被大领地、大庄园兼并。一些身份下降或者受到身份下降的威胁的领主，将在本世纪末或者下个世纪的农民暴动中出现在显要的位置上。

这第三个时代同暴发起来的领主的全盛时代一样，开创了高利贷者、既剥削国家和贵族也剥削农民的金融家的世纪。事实上，奥斯曼国家自1550年起，就求助于古老的出售财政收入的办法，求助于塞尔柱突厥人和拜占庭已经实行的穆卡塔（mukata）和伊尔蒂扎（iltizan）（出租）制度。[122]这种制度的确十分普遍，既可以在那

不勒斯和威尼斯，也可以在巴黎或者西班牙找到。在那不勒斯，有人出售财政收入；在威尼斯，有人出售某项税收或者关税，为期两年或三年……土耳其国家也如法炮制，要求它的包税人立即提前缴付同要征收的税款数额相等的钱款。包税人尽管受到财政监督员监督，仍然能够随后马上就收回已经付出的钱款数，并且大获其利。例如在通行税征收处，绵羊每两头须付1阿斯普尔。后来对每头牲畜甚至征税达8阿斯普尔之多。此外，包税人在缔结交易之前还会提出条件，一再增加要求。大领主自己也经常出租他们的领地、庄园。犹太放款人或者希腊放款人编织的放债网到处扩展，不受阻碍。[123]他们很快就把整个土耳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货币经济和物价上涨使他们得以高踞指挥操纵的岗位。在这种环境中，古老的骑兵军事制度不再发挥作用。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反倒会使人感到惊奇。人们逃避兵役。中央政府下令进行的核查，全都被人嗤之以鼻，置之不理。

关于这个问题，阿赫梅德素丹的财政监督员艾尼·阿里的证明是确凿无误的。[124]他说："大部分封地领主摆脱了他们应尽的军事义务，以致在农村，需要有人服兵役时，10个提马尔中没有1个派人前来。"曾经使这种制度得以巩固的骑士精神不复存在。出生于阿尔巴尼亚南部科尔察的科西·贝格在他1630年出版的著作中证实了这一点。[125]甚至在这之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波斯尼亚人马拉赫·哈桑·埃尔克贾迪1596年就发出同样的警告[126]。在外国人的眼里，衰落是明显的[127]。在17世纪，骑兵离开他们乡下的住所前往城市定居。这是阿尔巴尼亚托普塔尼家族离开克鲁尤的城堡前往开放的、被果园围绕的地拉那城的时代[128]。这种向城市的迁移，是

牢牢扎根于乡土并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的贵族形成的迹象之一。

"茨奇弗特利克"

根据理查德·布斯奇·桑特纳尔进行的研究[129]，随着17世纪的到来，出现了另外一个同样巨大的变化。学识渊博之士[130]对他那本颇有见地的书执冷漠保留态度。但是，难道这些学识渊博之士这样做是正确的吗？理查德·布斯奇·桑特纳尔受到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地改革的文学和范例的启发诱导，受到弗朗日和伊乌西奇的关于南斯拉夫的著作吸引，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难道是什么缺点和错误吗？他也被人指责使用技术词汇不精确。这种不精确在我看来几乎不可避免。一个西方的历史学家在探究东方世界时，供他使用的词的含义是模棱两可的，过去的定义（例如Ch. 贝克尔斯确定土耳其采邑的意义和西方采邑的意义截然相反）或者一般的解释（例如J. 茨维杰奇的解释），都不能作为确切可靠、正确无误的根据。对土耳其的原始资料的日益频繁的使用，还使人移离本题，并使人不得不进行深入彻底的修改。

"茨奇弗特利克"（čiftlik）这个词可能指一种新事物，一种重要的实际现象。这个词本来意为用摆杆步犁一天耕作的土地的面积[131]（这就是拜占庭的 zeugarion、德意志的 morgen 或 joch、法国某些农村的 jour 或 journal 等词的含义）。可能它后来指私有田产——农民的私有田产或者大领主的私有田产——，最后指现代的大庄园——一种移殖民种植场或者地主家族种植场。我们不很了

解这种发展演变，但是，这个词从1609—1610年这个时期起就已经具有这个意义。[132]

这些苛严冷酷地组织管理的但收益巨大的现代庄园的存在，在必要时，将迫使我们在研究土耳其贵族的发展演变中，不仅仅考虑到社会原因或者政治原因。其历史并非都像编年史学家会抱怨和解释的那样，是破坏和变坏。上述庄园使人想起收益巨大的移殖民种植场，或者易北河以东的[133]，或者波兰的那些给人以美好印象的庄园。封建领主的房屋位于庄园的中心，像在科尔察的南阿尔巴尼亚平原上一样，是用石头修建的。这种房屋以它的像塔一样的外形成为多层堡垒房屋的典型。[134]它俯瞰农民的用粘土垒成的破破烂烂的房舍。“茨奇弗特利克”通常开发、利用平原上的洼地以及位于拉里萨和沃洛之间的杰泽罗湖[135]的泥泞的沿岸沼泽或者潮湿河谷。这是一种征服者的开发经营形式。“茨奇弗特利克”主要生产谷物。在土耳其和在多瑙河流域各省或者和在波兰一样，谷物一旦与大量出口联系起来，就创造了产生“第二农奴制”[136]的条件。这种农奴制在土耳其是明显的。这些规模巨大的庄园到处使农民的境况恶化，并从这种恶化中得到好处。同时，在经济方面，这些庄园首先对种植小麦，其次对种植大米，不久后对种植玉米，后来又对种植棉花是有效的。这些庄园从一开始起，就对巧妙复杂的灌溉技术的使用和对水牛[137]……等的套车的成倍推广使用是有效的。巴尔干半岛平原的发展变化与当时在西方出现的事物，例如在威尼斯地区出现的事物，十分相似。这些发展变化无可争议地就是大规模的、强有力的、影响深远的土壤改良计划的实施。同西方的情况一样，大土地拥有者利用最初几代领主和农民尚未充分勘探考察的

荒无人烟的土地。这里显然同别处一样，以社会压迫作为代价取得进步。只有穷人在这种进步中毫无所获，也无法有所获。

2. 有产阶级的背叛

有产阶级在16世纪受到商业贸易和对国王的效劳的约束，经常濒于灭亡。它不只是要冒破产之险。如果它变得过分富有或者对商业生活固有的风险感到厌倦，就会购买官职、公债、头衔或者采邑，并受到贵族生活以及这种生活的显赫豪华和安宁懒散的引诱。为国王效劳可以使人相当快地被册封为贵族。有产阶级也经由这条并不排斥他人的道路消亡，特别因为使穷人和富人判然有别的金钱在16世纪看来已经是贵族的标志[138]，因此有产阶级就更容易背叛自己的阶级。此外，在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的转折时期，商业停滞不前。这使审慎明智的人返回土地，寻求土地的可靠价值。从字义上讲，土地所有权几乎就是贵族的特性。

历史学家加鲁齐叙述说：[139]“在散布在欧洲各个市场的主要的佛罗伦萨商人中，很多(16世纪末)是把自己的资金抽回托斯卡纳投放到农业中的人。例如从伦敦返回的科西尼家族和杰里尼家族、离开纽伦堡的托里季亚家族和原来是葡萄牙商人但后来成为佛罗伦萨人的希梅内斯家族等的情况都是这样。在伟人洛朗之后还不到一个世纪，这种大商人返回土地的现象是一幅多么具有揭示性的图像啊！让我们翻开新的一页吧！在1637年改朝换代时，出现了一个新的、不同的托斯卡纳、一个新的、装得道貌岸然的、有贵族气派、阿谀奉承的托斯卡纳。斯汤达尔笔下的意大利[140]虽然长期以来

就可以预见到，但在这个曾经跳动着文艺复兴的自由心脏的城市令人感到惊奇。一种旧背景和旧秩序崩溃了。

如果展望以后的17世纪，把这说成是有产阶级的破产并不过分。有产阶级是同城市相联系的，而城市很早就已经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危机。例如1521年公社社员(comuneros)的叛乱和1530年佛罗伦萨的攻占等都属于这种危机。在发生危机的过程中，城市的自由受到很大的损害。接着，经济危机来临。这些危机最初是短暂的，然后，随着17世纪的到来而变得连绵不绝。危机使城市的繁荣兴旺的局面遭到严重破坏。

地中海的各种有产阶级

当时正在西班牙消亡的事物，过去几乎没有在那里存在过。古斯塔夫·施尼雷尔[141]认为，西班牙，至少卡斯蒂利亚，自从公社社员叛乱以来就已经不再有它的有产阶级了。这样说，的确是说得过分干脆、痛快，但毕竟并没有过分说错。西班牙半岛城市化的程度不够。那里只有从事商业工作的、与国家利益丝毫不相关的中间商。然而，正如在今天的或者更主要在昨天(1939年)的南美洲的这个或者那个国家一样，这些中间商在经济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中世纪，这个角色曾经由提供商人、高利贷者和征税员的犹太社会扮演。他们被驱赶(1492年)后，人们好好歹歹填补了这个真空。16世纪，新近成为基督教徒的摩里斯科人在城市和乡村从事零售商业。这些新基督徒被指控阴谋破坏公共治安、从事军火交易、囤积居奇和垄断一切。在商界上层人士中，在批发商中，特别在布尔戈斯这个地方的批发

商中，很多人是改变了宗教信仰的犹太人。[142]

这些怨言、成见和怀疑，在我们缺乏更确切的资料的情况下，说明在这里或者那里，在塞维利亚、布尔戈斯、巴塞罗那（这个世纪的末期使它从长期沉睡中醒来）居住着西班牙本土的有产阶级。当时有像布尔戈斯的马尔文达或者坎波城的西蒙·鲁伊斯那样的西班牙富商。

但是，为数众多的公职人员，这些为国王效劳的文士，[143]并非有产阶级。他们拥有他们惯于加在自己姓氏前面的“东”（don）字。他们是小贵族或者渴望成为贵族的人，而不是有产者。在西班牙这个奇特的国家，教士的私生子也获得末等贵族的称号。这真是咄咄怪事。但是，如果想到在西班牙进行体力劳动和商业贸易是同臭名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也想到最小的贵族和平民百姓之间的那道把守不严的边界线无数次被人逾越，遭到破坏，人们就会认为这类事毕竟并不怎么稀奇古怪了。一份1651年的控告书说[144]，在靠近葡萄牙边界的一座不大的城市的700个西班牙末等贵族中，可能只有300个是货真价实的末等贵族，且不去提檐槽下的末等贵族①，或者那12个享有财政豁免权但并不因此而是贵族并被平民百姓粗俗生硬地称为“穿开裆裤的末等贵族”的孩子的父亲[145]……在西班牙，有产阶级遭到这个扩散的贵族从各方面包围、啃啮。

在土耳其，城市有产阶级——主要从事商业——对伊斯兰世界来说是来自异国他乡的人：拉古萨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希腊

---

① 指只在所居住的村子里享有特权，如改变居住地，则丧失特权的末等贵族。——译者

人和西欧人。在加拉塔和各个岛屿上,具有"拉丁文化"的小块地区继续存在。可以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巨商富贾的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拉古萨人的急遽衰落是一种征兆。在素丹左右有2,000个大商人十分引人注目。一个名叫米歇尔·康塔库泽内,[146]是希腊人。另外一个名叫米卡斯,[147]是犹太人。15世纪末移居伊比利亚的犹太人(西班牙的或者葡萄牙的)逐渐占领开罗、亚历山大、阿勒颇、叙利亚的的黎波里、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等地的进行大宗贸易的商界的主要地位(特别是葡萄牙人)。他们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包税商中(甚至在官僚中)取得突出的重要位置。威尼斯人曾经多少次报怨犹太人——威尼斯货物的零售商——见利忘义、欺诈行骗啊!不久以后,这些犹太人不再满足于他们的货物重新分配者的职业,直接同拉古萨人和威尼斯人竞争。早在16世纪,他们就同墨西哥、拉古萨、安科纳、威尼斯进行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基督教徒在黎凡特海域进行海上行劫的有利可图的活动领域之一,变为追猎威尼斯、拉古萨或者马赛的船只载运的犹太人的商品,即西班牙人所说的犹太人的衣物。当人们任性地、专横地没收这些货物时,把这些货物视为类似禁运品的物品便成了最方便的借口。[148]此外,不久以后,就有亚美尼亚人同犹太人竞争。亚美尼亚人17世纪租船运货驶往西方。他们亲自前往西方,成了波斯国王阿拔斯贸易发展的经纪人、代理人。[149]这些人是曾经在某个时期是整个地中海的主人的富有的意大利商人的有产阶级在黎凡特的继承者。

意大利本身情况复杂,因为问题的核心再度存在在那里。有产阶级和主要城市曾经在那里繁荣兴旺过。伟人洛朗时代的佛罗伦萨的显赫荣耀同一个巨大的、富有的、有教养的有产阶级的显赫荣

耀，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正好吻合。这种智力的和艺术的爆炸，同影响并扩大了佛罗伦萨的强有力的社会发展演变，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正好吻合。这种吻合证实了赫尔曼·赫弗勒关于文艺复兴的论断。[150]文艺复兴在那里代表一种有产阶级的秩序——主要的技艺和秩序[151]——的完成。这种秩序长期控制着取得权力的通路，对商业、工业或者银行等方面的任何必要的工作都不鄙弃，并且尊重、迎合在奢侈的生活、知识和艺术等方面的讲究的追求。在佛罗伦萨留下的一系列人物肖像中，文艺复兴由于它的朋友画家的辛勤劳动，在我们眼前重新出现。仅仅这一系列肖像本身就是一个处于鼎盛时期的有产阶级的标志。[152]在乌非齐博物馆，一个参观者进入文艺复兴的肖像馆后，走几步就可以走到一幅布龙齐诺画的肖像前。这是身穿红色长袍、全身披上盔甲的科西默·德·梅迪奇的画像。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有自己的君主和宫廷贵族的时代。然而，一个定居佛罗伦萨的西班牙商人1572年写道："在这个城市，由于十分古老的习俗和传统，商人很受尊敬。"[153]不错，他所谈的是高级商人，即大批发商；不错，他们之中很多人事实上是贵族。他们要实现从商人到贵族的完全转变，只需不再从事商业转而尽可能靠他们的收入和土地为生就行了。

别的地区的景象也在变化。1528年，热那亚接受了一部贵族的宪法。这部宪法一直维持到1575—1576年这个动乱时期。在威尼斯，商人贵族在这个世纪末坚决从商业转移。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发展变化情况与此相似。在罗马，制服有产阶级的行动完成于1527年。在那不勒斯，只在法律工作方面还有有产阶级的位置……只有诉讼打官司之类的事养活这个阶级。[154]它的作用到处受到限制。在

西西里的伦蒂尼，城市的行政官员16世纪只从贵族中招收。[155]例如被招收的有自治城市向封建领主派去的居民代表像弗朗切斯科·格里马尔迪和安东尼奥·斯卡马卡。1537年，他们争取到这个城市重新归并入王室领地。又例如塞巴斯蒂安·法尔科内，他于1537年以陪审员和审查员的资格并以向查理五世缴付2万金埃居的代价争取到不把该城让与大封地领主，并由查理五世授予该城特权和肯定一项古老的惯例。这项惯例为城市的贵族保留伦蒂尼的统领职务。因此，我们不应该相信西西里的封建领主和国有城市之间有什么无情的斗争。即使当这些城市还在它们的有产阶级的手中的时候(这种情况极为罕见)，有产阶级也很倾向于同贵族和同受贵族保护的人和睦相处。行会的执事和理事，为了控制城市而同贵族进行斗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一些城市，事态发展演变得更甚。例如在那不勒斯王国北部的阿奎拉，对羊毛工艺的监督审查，从1550年起就变成几乎属于贵族的特权。[156]如果我们按照年月次序把这些事件一一加以排列，就可以看出，很明显，这个发展演变过程很早就开始了。

有产阶级的背叛

如果社会秩序似乎在发生变化，那么这种变化既是表面现象，也是实际情况。有产阶级并不总是被人清除，被人残酷无情地消灭。它自己背叛了自己。

这种背叛是不自觉的，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感到自己是这样一个阶级的有产阶级。这可能是因为它在数量上过分有限。即使在威尼斯，在这个世纪末，市民最多占城市人口的5%或者6%。[157]

最后，各类出身的富有的有产者到处都被朝着贵族的方向吸引。

贵族就是他们的太阳。从西蒙·鲁伊斯和巴尔塔萨尔·苏亚雷斯的信中看看他们对那些过着贵族生活，有机会就骗取这些行事谨慎、孜孜谋利的商人的钱财的人所怀有的奇怪的感情吧！[158]这些假有产者的野心是跻身于贵族之列，让自己融合到这个行列中，至少要让他们有大笔嫁妆的女儿置身于这个行列中。

在米兰，从16世纪初起，不门当户对的婚姻，就免不了会引起飞长流短，招致种种议论。但是，这种婚姻并不因此而终止。向我们提供情况的班德洛尽管思想宽容、豁达大度，也对此十分愤慨。一个贵族妇女嫁给一个没有显贵的祖宗的商人。她夫亡守寡，让儿子从丈夫经营的商业脱身出来，还千方百计再让儿子取得贵族身份。[159]这种种努力倒并不授人笑柄。这样做顺时随俗，完全合情合理。相反，一系列不门当户对的低就婚姻，这些涂抹在名门望族的徽记上的可耻的污点，往往受到恶毒的嘲笑。然而，这些名门望族因而一下就在经济上家业重振、门楣重光。阿佐·维斯孔特的一个亲戚娶一个屠户的女儿为妻，换来的是一笔1.2万杜卡托的嫁妆。叙述这件事的人不愿参加这样一个婚礼。他补充说："我看到这位岳丈就像我们的屠户所习惯的那样，身披白罩衫，正在放一头牛犊的血，双臂被鲜血染红，一直红到颈脖。我如果有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我想会老是嗅到一股屠户的冲鼻子的臭味。我似乎永远不敢再抬起头来。"[160]唉，这件事并不是孤立的、个别的。还有一个名叫马雷斯科托的人娶了一个园林工人的女儿为妻（至少他借口爱这个姑娘）。神圣罗马帝国大封地领主家族博罗梅家族的伯爵之一洛

多维科伯爵娶了一个面包师的女儿。萨吕塞侯爵娶了一个普通农家女。不错，是爱情，也是金钱使这类不门当户对的低就婚姻成倍增加。叙述者继续说："我多次听见安得烈亚·曼代洛·迪·卡奥尔西伯爵说：'一个女人有一笔4,000杜卡托以上的嫁妆的时候，即使她是个在米兰的教堂后面出卖肉体的女人，也会有人毫不犹豫娶她为妻。相信我的话吧！谁有钱，谁很有钱，谁就高贵；谁穷谁就低贱。'"[161]

即使在米兰这个本世纪初被人认为习俗轻浮、自由随便的城市，同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结婚，也会被人嗤之以鼻，当成笑柄。有一股严重的、能够突然引发悲剧的暗流。例如，1566年发生在安科纳的一起事件就是这样。有个医生[162]是普通裁缝的儿子。他为一个守寡的年轻贵妇人的女儿看病。(这个寡妇有7个孩子和5,000埃居家财。)寡妇愿意嫁给这个名叫马斯特罗·赫克莱的医生。于是就引发了一幕惨剧：医生被捕，差点无法脱身。他付了200埃居罚款，并且仅仅由于他的一个当保护人的亲人进行了决定性的干预，他才保住了性命。这个保护人带领几名骑士从拉文纳赶来营救他。在这个期间，寡妇的家庭更加坚持反对她同一个**地位低下、双亲卑微的人**结婚。由于这个家庭的成员们担心这个医生获释后会拐带他心爱的女人逃走，于是这女人的一个孩子便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医生……

在西班牙，悲惨事件很可能往往导源于人们把荣辱问题看得过分严重。然而，大家读读《西班牙贵族的耻辱》[163]这本书吧！这本书使得莫里斯·巴雷斯读它时，对托莱多的西班牙沉思、向往。这本小册子被人错误地认为出自门多萨红衣主教的笔下。一方面，固然

不应该轻信这本书或者别的轶事趣闻录之类的书的记述[164]；另一方面，也不应否认一切，拒不相信这些书籍揭露出来的惨剧，这些甚至在社会的最高层都有人犯的妨害血统纯净罪。[165]和有钱的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的女儿结婚——这是每天发生的不门当户对的低就婚姻的戏剧——在门第意识浓厚、喜欢挑三拣四、吹毛求疵的西班牙，颇具有悲剧的味道。但是，这种婚姻并不因此而数量减少。

贵族身份的出售

对那些热衷于成为贵族的人来说，有贵族速成法。这类方法在这个世纪随着时间推移而成倍增加。贵族称号和贵族采邑都可以取得。例如在斯瓦比亚，情况就是这样。然而，这些财产在那里为人带来的收益很少。那不勒斯的情况也是这样。称号和采邑这种财产在那里通常成为一种负担，并且在这些财产的获得者不知道怎样对之加以管理的情况下构成引起轰动的破产的原因。然而，虚荣心总是通过取得这种财产得到满足，而且立刻得到满足。位于托马斯·普拉特[166]于1598年8月3日经过的吕内尔的附近的博瓦斯隆，有一个城堡和一个村庄。这个城堡和这个村庄都属于“乌泽斯的普通公民，卡尔桑先生刚刚把这个城堡和这个村庄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因此而成为博瓦泽隆男爵，因为这块土地是有贵族称号的土地”。已经为人所知的类似的例子数以千计。从15世纪起，在普罗旺斯，对一个在“贸易、海运、司法以及不同的公职上”发财致富的有产阶级来说，购置一块土地是“一种既有利又可靠的投资，是一种家庭祖业的创建（这种家庭祖业是事业成

功的证明),最后还往往是很快被册封为贵族的机遇”。将近1560年,定居里昂的商人瓜达尼家族在“勃艮第、里昂内、福雷、多菲内和朗格多克等地拥有20来处领地”。[167]同年10月,律师弗朗索瓦·格里莫德在昂热的第三等级的大会上宣称[168]:“假贵族多得无法胜数。他们的父亲和祖先曾经在粮商、酒商和布商的铺子里,在贵族的磨坊和庄园里使用过刀枪,表现得像骑士般英勇。”另一个那个时代的人说:“很多人钻进贵族行列。这些人是模仿贵族并且渴望得到贵族过去的标志的商人。”[169]

这是谁的过错?在16世纪,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君主不出售贵族称号以换取现金。西西里从1600年起向任何人廉价出售侯爵称号、伯爵称号和亲王称号。而在这以前,只给予过几种罕有的贵族称号[170]。伪币时代也是伪称号的时代。在那不勒斯,将近1600年写成的一份西班牙文的长篇报告[171]指出,有爵位的人的人数极度增多。如同任何一种大量供应的商品一样,除了伯爵的称号,至少除了侯爵的称号以外,所有的贵族称号都价格下跌。人们甚至还“创造出几个以避开为好的公爵和亲王。就这样,贵族身份在各地集市上都可购得。在罗马、米兰、神圣罗马帝国、弗朗什—孔泰[172]、法国、波兰[173]、特兰西瓦尼亚等地莫不如此。在这些地方,“有贵族头衔的绅士”[174]比比皆是。葡萄牙[175]效法英格兰人,贵族称号的转让,在这个国家始于15世纪。第一批公爵出现于1415年。第一个侯爵出现于1451年。第一个男爵出现于1475年。在西班牙本身,很快使最高贵族数目成倍增加的王室,对等级较低的贵族不注意加以区分。王室对金钱的需求有增无已,于是向出得起钱的人出售骑士团礼服。这些人是靠西印度的贸易大发横财的西班牙人,或者在秘

鲁发财回到西班牙的人，或者更糟，是那些靠放高利贷成为暴发户的人。[176]怎么能够不听之任之呢？奥尔加斯伯爵在他于1586年4月16日从塞维利亚写给王室秘书马特奥·巴斯克斯的信中为他出谋划策说，如果有人想弄钱，就让他出售骑士团礼服吧，那怕这样做意味着违反过去所作的不再出售这种礼服的诺言。[177]当然，国会在卡斯蒂利亚对此极为不满，抱怨连天。[178]但是，王室会听它的怨言吗？贵族称号以后继续出售，并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从1573年起，菲利普二世的政府不得不颁布关于新封地的敕令。[179]

据说这种很快就转变为狂热怪癖的、风靡一时的对贵族头衔的崇尚源出于西班牙。它正如男人的紧身衣、胡髭、有香味的手套或者西班牙的喜剧的题材一样，是西班牙的输出品之一……但是，新的时尚并不完全是虚荣。有产阶级知道从它购置的东西中得到好处。它购置这些东西时有过一番盘算和考虑。其次，有产阶级像转向价值可靠的东西那样转向土地。这就加强了以领主特权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简而言之，人也像国家一样，有关于居先权的争端。这些争端往往掩盖着某些明确的、切实的企图。但是，人们乍一看只看到这些争端。1560年，法国国王派驻里斯本的大使尼科[180]在关于葡萄牙封建领主的问题上指出："这里的人使用仆从，大讲排场，铺张浪费，使用的仆从数量很大，以致普通小贵族或新贵族想过公爵的生活，而公爵又想过国王的生活。这就常常弄得他们倾家荡产。"利摩日主教1561年对西班牙作了同样的评论。[181]当时要册封500个有钱的、打过仗的人为贵族，条件是他们自己进行武装，每年在西班牙边境服役3个月。这个主教继续说，他对"存在于这个国家

的人中间的虚荣心”感到吃惊。“这些人只要被认为是贵族，能够穿上贵族的衣服，有了贵族的外表，就趾高气扬，神气活现起来。”

1615年，法国出现同样的景象。关于他的故土，蒙特克雷斯蒂安写道[182]：“现在根据外表来区别各种人是不可能的。开店的人的穿着打扮同贵族绅士一样。其次，谁难道还一点没有看出这种衣着服饰的雷同引起我们的古老风纪的败坏吗？……傲慢放肆的风气将在城市中增长；暴虐专横的行为将在乡野增多。男人因过分耽于逸乐而变得娇弱柔靡；妇女因过分关心梳妆打扮而把对自己家务的关心连同自己的贞操丢失殆尽。”这番话是符合讲道者的身份口吻的，但是，它证明至少在法国有过一个对现存社会秩序不满的时代。

对新贵族的敌视

几段引证的话都已经表明，谁也不对新贵族的命运完全赞许。谁不向他们寻衅吵架呢？谁不以侮辱他们为乐呢？1559年，在朗格多克各邦男爵们奉命只能派“血统高贵、有资格佩剑的贵族”[183]作自己的代表。敌视新贵族的人，每个人一有机会就复仇泄恨。例如法国在旧制度统治的整个时期的情况，甚至在这以后的情况，就是这样。17世纪各地的情况也都是这样。阶级障碍不断被人逾越，事物始终不断发展变化，社会的非难指责始终随时准备施加于人。在那不勒斯发生的一则社会新闻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84]：这个城市一个拥有万贯家财但出身微贱的金融巨子德·阿奎诺1640年想在总督本人的支持下娶孔维尔萨诺公爵的

妹妹安娜·阿加维瓦。未婚妻被贵族的武装骑士劫持。这些骑士决心用武力阻止一个年轻姑娘落入一个出身微贱、地位低下的人的手中。她被带到贝内文托的一个女修院中。这样，她在那里就受到双重保护，因为贝内文托属于罗马教廷。五花八门的这类事件已然弄得沸沸扬扬，可还在蔓延发展。除了唯一把自己深藏紧锁起来的、与世隔绝的威尼斯贵族外，所有的贵族都大门洞开，接纳新的血液。在罗马，在这个教廷(这肯定是西方各种社会团体中最宽容大度的)的所在地，由于每个本人并不一定出身名门望族的新教皇的亲戚定期被册封为贵族，甚至被册封为高等贵族[185]，因此罗马的贵族阶级比别处的贵族阶级发展变化更快。所有的贵族阶级都在发展变化，不断从自身清除朽木腐株，接纳新的富人。这些新的富人又对社会的大厦添砖加瓦。这对贵族阶级来说有这样一个很大的好处：它不需要同第三等级进行斗争；它发现第三等级急欲加入它的行列，并且为了这样做而同它分享自己的财富。第三等级这样做有利于贵族，自己却贫困起来。

显然，这个连续不断的发展演变可以加快。在罗马，教皇就加快了这种更新变革。在英国，在北方大贵族阶级的叛乱于1569年失败之后，这个阶级在一定的程度上被另一个后来统治英国至今的新近诞生的贵族阶级取而代之。这个新贵族阶级就是罗素、卡文迪什、塞西尔……等人所属的那个贵族阶级[186]。在法国发生了两系列战争：第一系列战争以缔结卡托—康布雷锡和约(1559年4月1日—3日)告终；第二系列战争以缔结韦尔万和约结束。这些战争以这种方式告终，加速了老贵族阶级的垮台，并为暴发户开辟了取得社会权力的道路。[187]以下是1598年菲利普二世的一个顾问对法国贵族

的状况的评述:“大多数封建领主丧失了他们的年金和收入(他们已经把这些年金和收入让与别人),他们没有维持他们的地位所需的钱财和手段,并且负债累累。几乎整个贵族阶级的状况都是这样。情况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一方面人们不能够雇佣这些贵族而不付给他们巨大的报酬和奖赏(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另一方面,人们又担心如果这些贵族遭受的战争灾难和破坏得不到某种程度的减轻,那么他们就会被迫图谋兴风作浪[188]”。

3. 苦难和盗匪活动

关于穷人的情况历史很少叙述。但是,穷人却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迫使那个时代有权有势的人物注意他们,并且间接迫使我们注意他们。动乱不息,骚乱四起,叛乱频仍,流浪汉和飘泊者的人数令人不安地剧增。盗匪不断打家劫舍。这种种喧嚣声虽然往往被人压低,但都表明即将结束的16世纪的苦难正在令人吃惊地加深。这种加深的势头随着下一世纪的到来而继续扩大。

这种集体的苦难可能就在1650年即将来临之际达到顶点。我们应该相信 G. 巴尔迪努奇[189]未发表的日记的记载。其中不止一处已经被引用。上述的苦难达到这样的程度:1650年4月,在佛罗伦萨,人们无法再在那里安宁平静地做弥撒,因为做弥撒时,人们被“衣不蔽体、满身疥癣的穷人”层层围住,水泄不通。在城市里,什么都贵得吓人,“织布工人无所事事”。更糟糕的是,一场风暴毁坏了橄榄树、桑树和其他果树……

未完成的革命

贫困化和有钱有势的人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同时产生，其结果是毫无疑问的。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即人口过多和经济衰退互相伴随，很快就清楚地显现出来。这种双重负担不断增加，左右一切。阿美利科·卡斯特罗[190]在一篇旧文里(1935年)原则上提出了西班牙没有经历过革命这个论点。在总的论断方面，这句话是轻率冒失的。但是，如果把它限制在16世纪的西班牙这个范围内，就并非不确切了。在西班牙，更主要的是有人曾经有过革命的意图，而不是进行过真正的革命。只有公社社员起义的短暂的爆发堪称例外。这件事人们正在争论，[191]也可以争论。[192]

16世纪的地中海的确有别于所谓的历次宗教战争在那里掩盖和包藏一系列社会革命的北欧。它虽然风雷激荡，但没有成功地进行它自己的社会革命。这并不是由于没有多次进行这种革命，而是由于地中海是某种魔法咒语的受害者。难道是因为西班牙的城市很早就被拆毁，强大的国家才不可抗拒地肩负起宪兵的保卫和平与安定的职责吗？不管怎样，结果是清楚的。可以构想出一部宏篇巨帙来。这部著作叙述地中海地区的连绵不绝的骚乱、暴动、暗杀、警察行动和叛乱，还叙述一种持续的、复杂的社会紧张局势。但是，最后并没有发生政治和社会的爆炸性的大变化。叙述地中海革命的书是一部宏篇巨帙，但是篇章散乱、互不连贯，而且这部书的基本思想是可疑的。[193]它的题目本身就使人产生误解。这部书配得上它的书名吗？

因为这些骚乱每年、每天都像肇事者、受害者、证人、编年史作

者以及国家本身不再予以注意的交通事故那样出现，人人都似乎逆来顺受，容忍这些经常肆虐的事故，既容忍加泰罗尼亚的盗匪活动这种事故，也容忍卡拉布里亚和阿布鲁齐的这种事故。在这些社会新闻中，有一件为我们所知，就会有十件、百件不为我们所知。其中的一些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即使最重要的也是如此细小，阐述得如此不详，如此难于解释。1516年西西里的泰拉诺瓦的叛乱确切说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应该赋予1561—1562年那不勒斯的所谓新教叛乱什么意义呢?这次叛乱导致西班牙当局对卡拉布里亚山的沃多瓦派教徒进行惩罚性的征伐。几百人像牲畜那样被割断喉咙。[195]应该赋予整个科西嘉战争(1564—1569年)和末期的格拉纳达战争什么意义呢?这两次战争都变了样，成了难以辨明的插曲的情节。这场战争是苦难的战争，同样也是对外战争或者宗教战争吗?关于1560年巴勒莫的动乱[196]或者1569年曼图亚的“新教徒的”阴谋叛乱，[197]我们又了解些什么呢?1571年，乌尔比诺公爵弗朗西斯科·马里亚的臣属起来造反，反对他们的这位主人的敲榨勒索。但是，这个情况不详的插曲仍然难对于解释：乌尔比诺公爵领地是块雇佣士兵的土地，那么是谁在幕后牵线操纵指挥呢?[198]1575—1576年这个时期热那亚的内部危机几乎同样情况不明。1579年，在普罗旺斯，造反的农民举行起义，维尔内夫城堡被他们占领，当地的领主克洛德·德·维尔内夫[199]进行屠杀。这一切都同很多其他动乱一样，也同1580年多菲内的那次新教的但也是民主的农民的起义一样，隐没消失在宗教战争的混杂不堪的情节中。这次起义受到瑞士邦州的榜样的启发，矛头指向贵族，它与几年前蒙吕克时期加斯科涅新教徒的具有革命性和破坏性的行动，或者与多年后遥远

的(1587年)科唐坦[200]的动乱类似。将近1590年发生在里瓦戈尔萨伯爵领地的阿拉贡农民的叛乱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次暴乱使阿拉贡农民最后归并入王室领地。上一年,皮翁比诺公爵的臣属也在托斯卡纳的海岸上造反。[201]1599年卡拉布里亚的造反并不是一起什么了不起的社会事件(坎帕内拉因此被捕)[202]。从1590年到1600年,土耳其帝国境内同样叛乱频仍,彼伏此起,北非和埃及的阿拉伯人和游牧民族的地方性叛乱还不计算在内。这些是"书吏"和他在小亚细亚的追随者、拥护者的声势相当浩大的暴动。基督教世界后来把一些狂热的、急切的和荒诞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暴动上。塞尔维亚农民1594年在巴纳特,1595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597年再次在黑塞哥维那发动骚乱。[203]如果一下子把大量的关于令人难以置信的抢劫的新闻添加到这张很不完全的单子上,我们有的就将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本厚厚的故事集了……

是的,乍一看,这似乎是一本厚厚的故事集。但是,这些事件、这些事故、这大量琐碎的社会杂闻本身,难道是一部有价值的社会史的经纬脉络、主要情节吗?(这部社会史如果缺乏另外一种表达手段,就会被迫用这种混乱的、笨拙的、有时可能使人产生误解的、把人引入歧途的语言来表述它的内容。)这难道是比较深刻的证据吗?这些正是历史学家问题的所在。像我想要做的那样对这个问题予以肯定的答复,就是承认在乍看之下存在着颠三倒四、缺乏条理、混乱不堪和明显荒谬的事物的地方存在着互相关联的事物、有规律的事物和整体的发展演变;就是承认例如"每天从晚上第一个钟头起就有人抢劫、相斗的"那不勒斯这样的地方是一场永无休止的社会战争的战场(在这场社会战争中发生的某些事,远远超过普

通罪恶的范围);就是承认1588年春季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社会方面已经狂热的巴黎的情况与此相同。威尼斯大使解释说:“吉斯公爵只带领十几个追随者入城。这位亲王逐渐被人发现不名一文、债台高筑,并且因无法使用大量兵力进行一场野战(他显然要付给部队军饷),而认为利用这个天翻地覆、群情激愤的城市的形势向他提供的大好时机更加可靠……。”[204]这是一场社会战争,因而也是一场残酷的、廉价的、依靠狂热的激情和深刻的矛盾进行的社会战争。

不错,我们谈到的所有这些社会新闻在一个方面和另一个方面都始终带有野蛮残忍的印记。随着这个世纪到来,开始在威尼斯周围的农村出现的罪行,同接踵而至的镇压一样,是残酷无情的。编年史学家或者在政府的、司法部门的记录上记载这些事实的人,都必然反对这些往往被抹黑丑化的动乱的制造者。在克雷马地区,1506年—1507年冬天,一伙人走进雷沃格拉拉的一个名叫卡德琳的女人的家里。元老院的司书叙述这件事时说:“他们砸烂了门,闯入屋内,强奸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拼死反抗。他们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来。”[205]所有的报告都载明,这些没有被完全验明身份的敌人在这次受审之前已经多次犯罪。这是一伙“越来越狠毒的、邪恶的”强盗、窃贼、流氓。这是一伙罪大恶极的家伙。这些人中间特别有那些在1507年冬季某天在贵族莱奥纳尔多·毛罗切诺的乡下住宅里没有找到这个他们要杀的贵族转而对果园里的树木发泄怒气、进行报复的农民[206]……岁月虽然不断消逝,文献资料的语调却没有什么改变。这些人是上帝咒骂的人。1562年春天,[207]他们在格鲁阿罗港的周围打家劫舍、抢劫财物、砍倒树木和葡萄。是对上帝的恐

惧还是伶恤之心消失净尽了吗?1585年9月末,一则由信件传送的新闻无动于衷地说:“这一年,在罗马,在圣昂热桥上(被割下的土匪的)脑袋比市场上的西瓜还多。”[208]瞧,这就为还处于创始阶段的某类报刊定下了调子。一个有威信的土匪头目、锡耶纳人阿方索·皮科洛米尼因被人出卖,1591年1月5日被托斯卡纳大公的士兵逮捕,[209]并于3月16日被绞死在波德斯塔宫的那根通常有的桩柱上[210]。人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含沙射影,暗示这个土匪像胆小鬼那样毫无抵抗让人逮捕[211],以此来使他悲惨的结局受人鄙夷唾弃。笔头的激情偏见以及犯罪和报复的残酷,这些标记证实了零零散散的社会新闻,并使这些新闻在那场先作为整个16世纪然后又作为整个17世纪的标志的永不休止的潜在革命中成为意味深长的插曲。

是阶级斗争吗?

我们会把这称为阶级斗争吗?我设想那个可敬的撰写17世纪法国民众动乱史的历史学家B.波尔切内夫[212]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个字眼。我们这些历史学家在使用我们已经造出的封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等字眼的时候,并不总是准确地考虑、了解它们因时代不同而包含的不同的实际内容。这是专门名词的问题……如果我们在使用阶级斗争这个字眼的时候,并不是指其他事物,而是指那些自相残杀的复仇、那些谎言、那些片面的裁判的话,那又为什么不使用这个字眼呢?(我就把这些称为阶级斗争。)这个字眼作为一种说法,和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紧张局势”这个说法同样好。但是如果说当阶级斗争可能对历史学

家来说已经清楚明显，阶级斗争这个字眼像我所想的那样必然包括某种程度的阶级觉悟的含义的话，那末历史学家必须记住这一点：这是在用20世纪的眼光观察、注视已经完结的过去。对在这一点上头脑肯定不清的16世纪的人来说，阶级斗争的概念并不这样清晰。

只从事自己唯一工作的历史学家，在他个人研究的过程中记录实例，积累卡片和资料，这样做仍然是一种不够充分彻底的探测。我只在16世纪前半世纪找到一些阶级觉悟的闪烁的微光。例如贝亚德(或者这位忠实的仆臣)1509年在被包围的帕多瓦[213]的前面讲的那番令人吃惊的话，那份谈到1525年10月在弗留利武装起来的对抗农民的[214]贵族的报告(弗留利当时受到德意志农民叛乱的污染)，1528年12月在阿布鲁齐和阿奎拉周围的那些饿得要死、在"穷人万岁！"声中试图奋起反对"叛徒"或者"暴君"、但根据编年史学家的可疑的说法却并不知道谁是要受惩罚的叛徒的农民[215]，1531—1532年发生于卢卡的那场被描述为反对贵族的斗争[216]的所谓衣衫褴褛的人的暴动……都是这种微光。至少就我所知，在这以后就不再有别的什么了。如果这个很不完全的调查是确切的，人们便会从中推论出这一点：在16世纪的前半世纪和后半世纪之间，人们头脑清醒的程度下降了，或者说革命觉悟(如果我们大胆使用这个词的话)下降了。没有这种革命觉悟，就不可能有有真正成功机会的、有意义的、声势浩大的、来势迅猛的革命。

事实上，16世纪的这个前半部分，这个被1540—1560年的严峻岁月打断了它的繁荣昌盛的景象的春天，似乎曾经特别动荡不安：1521年发生了公社社员事件；从1525年到1526年发生了瓦伦西亚

兄弟会事件；1528年发生了佛罗伦萨暴动和热那亚危机；1548年发生了圭耶内农民暴动……很久以后，在17世纪，发生了奥斯曼帝国内部的叛乱、波尔切内夫所研究的法国动乱、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的分裂、1647年那不勒斯的大规模叛乱、1674年墨西拿的起义[217]……在这两系列剧烈的动荡之间，在从1550年到1600年的漫长的半个世纪内(甚至到1620年或者到1630年)，因为这段时期的革命没有达到爆发点，而且人们还必须像巫师探测地下水那样探测这些革命，所以这段时期就显得不重要、不引人注目了。事实上情况就是这样。这种情况使分析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这些叛乱和革命不只是针对特权阶级，而且还针对国家。国家是最高贵族、大领主和冷酷无情的收税员的朋友和保护人。它本身既是社会的现实事物，也是社会的巨大建筑。它甚至在平民百姓的仇恨爆发时，首当其冲。这把我们带回汉斯·德尔布吕克[218]旧有的总的评注和政治历史学家的观点，即：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各个国家的巩固，为这种减弱了的声调和民众的慎重态度作出了解释。虽然人们看见治安的维护者经常挨打挨骂、被人嘲弄、没有效能，还常常合伙犯罪，他们毕竟坚持了下来。

对漂泊者和流浪汉的敌视

现在，在城市里开始出现马赛的行政官和市政长官称为“漂泊者和流浪汉”的人。这是贫困的无声的和持久的表现形式。这些行政官和市政长官在他们于1566年1月2日举行的会议中[219]，决定视察城内各区，以便把这些无用的、不受欢迎的人全部驱逐。从那个时代的精神的角度

看，这是一项没有任何不人道之处的决定。城市不得不维持治安，并且为了讲究卫生，要定期清除穷人：乞丐、疯子，真假跛子、瘸子，堵塞广场、酒店和发放大众汤的女修院的大门的游手好闲之徒。他们被赶走后又返回，或者有另外一些人到来。驱赶这些人这种狂怒的举动，是高雅、谨慎的城市面对这种从不间断的入侵所采取的一种软弱无力的措施。

在西班牙的各条通衢大道上，流浪者满坑满谷。他们在各个城市停留。这些人中有违反校规、对导师不辞而别、前来加入流氓帮伙的不断扩大的黑社会的大学生，有形形色色的冒险分子，有乞丐和拦路抢劫的强盗。他们有自己偏爱的城市。这些城市里有他们的要塞，例如：塞维利亚附近的圣卢卡尔·德·巴拉梅达、塞维利亚本身的屠宰场、马德里的太阳门……乞丐们组成一个兄弟会——一个有自己的假日、集市等的国家。他们有时以惊人的数量聚集起来。[220]在通向马德里的条条京畿大道上，穷人[221]、失业的公职人员、没有连队的连长、跟在一头卸光了所载货物的小驴后面寻找职业的小老百姓等的队伍络绎不绝。大家饿得要死，在首都期待有人来安排他们的命运。走向塞维利亚的，是准备前往美洲的移民的饥饿人群，想重光门楣的穷绅士，寻求冒险的士兵，不名一文、胸怀大志、想做好事的年轻人[222]，西班牙的全部社会渣滓，身上打了烙印的窃贼、土匪，想去那里找到有利可图的职业的流浪汉，急于从债主手中逃脱的负债者，想避开嘴尖舌利、凶狠强悍、嗜争好吵的老婆的丈夫[223]……对所有的人来说，印度乃是梦境，是“西班牙所有的绝望者的避难所和保护地，是叛乱者的教堂，是杀人犯的庇护所……”，塞万提斯在他最引人入胜的小说之一《爱吃醋的丈夫》的

开头这样写道。这部小说是那些从印度发财归来的人中的一位的故事。这个人投放资金、购置房产、安排有产阶级式的生活、娶妻成家。[224]

常在路上来去的人中，还有士兵——老兵或者新兵——骗子和无赖。这些人在路上行走，慢慢吞吞，碰碰运气，消失在妓院中，有时身后跟着一个妓女。有朝一日，他们会循着征兵的人的鼓声而去。在马拉加或者在另外一个港口，他们会随着一股由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孩、老兵、逃兵、杀人犯、神甫、妓女等混杂在一起汇集成的人流，遵照行政当局的命令，乘船前往意大利气候晴朗的地方，或者前往西班牙在北非的驻防地的服劳役的场所。在这些流放者中间，也有几个正正派派的人，例如迭戈·苏亚雷斯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人很年轻，换过几个主人，穿越过整个西班牙，从奥维亚多到卡塔赫纳。1575年，他在卡塔赫纳乘船前往奥兰，大概在那里居留了三分之一个世纪。如果需要对什么事进行证明的话，那么这就证明进入这些非洲关押人的地方比走出这些地方困难得多[225]……

在西班牙，流浪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危险。它威胁着城市和乡村。在这个半岛的北部，在比斯开，流浪汉不断来到各个城市和居民点。1579年，当局试图对此作出反应，采取措施[226]，以对付那些潜藏在香客群中的人，"如果他们不是老、弱、病或者合法的伤残人员，就让人把他们关进监狱……让医生和外科医生检查他们"。但是，这类决定往往丝毫不能奏效。随着岁月的推移，恶弊愈益严重。针对性的措施越来越严，但都徒劳无功。1586年3月21日，巴伦西亚总督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对付该地的无业游民[227]。该项措施对王国所有城市和村镇全都适用。给无业游民三天时限去寻找一个师

傅学艺，否则将被驱逐出境[228]，对不务正业者、游手好闲者、骗子、流氓更是如此。在干活的日子这些人在公共广场赌博玩乐，而且在找不到工作这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下拒绝接受任何工作。总督还通知没有固定住所的短工：如果他们进行赌博被抓获，将被拘押查处，[229]正如对所谓的乞丐和外国人，对所有企图不劳而生活的人进行拘押查处一样。说来令人难于置信，巴伦西亚的这种严厉措施竟然十分奏效。一封1586年7月24日来自威尼斯的信说，在萨拉戈萨的周围，"人们不得不在烈日酷暑之下，并且还冒着遭到大批杀人凶手的杀害的重重危险旅行。这都是因为在巴伦西亚发布了一道在若干天的期限后把所有的流浪汉驱赶出王国的命令并且以最严厉的惩罚相威吓。于是这些流浪汉部分来到阿拉贡，部分来到加泰罗尼亚。这是在大白天要带着身强力壮的保镖旅行的另一个原因"[230]。

这证明流浪汉和土匪是苦难弟兄，并且互相交换位置(虽然并不需要这种证明)。某个地区清除自身的穷人，其结果只不过是使其他地区为难而已。这个事实也得到证明。除非像塞维利亚在1581年10月那样行事，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的。这个城市的做法是：把在一次警方进行的大搜捕中抓获的流浪汉强行装上开往麦哲伦海峡的索托马约尔的船上。留给这些人的命运是当挖土方工人。在运送这些人的船中有4艘后来沉没；在这些人中有1,000人溺死。[231]

这些惨剧显然都提出了都市的社会底层的问题，即当时任何城市都必然会有的圣迹区的问题。从《林科内特和科尔塔迪略》[232]这本并不怎么具有儆戒性的"儆戒性"小说中，我们借助渊博精深

的评注，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塞维利亚社会的底层：妓女、风流寡妇、骗人的警官、不折不扣的流氓头子、值得文学描写的流浪汉、在秘鲁发财后回到西班牙的人、好笑的受骗者。这幅画上一应俱全。在别处，马德里和巴黎的情况都同这里一样。流氓、歹徒、流浪汉、乞丐以及所有文学作品热衷于描写的人物，充斥整个意大利。[233]他们到处遭到抓捕、驱赶，但总是在被赶走后又返回原地。只有负责当局才相信这种官方的、总是老一套的措施有效。

1590年2月，巴勒莫有关当局采取某些强有力的措施来对付“流浪汉、酒鬼和这个王国的间谍”[234]。两个年俸200埃居、不受腐蚀、廉洁奉公的监察官分管这个城市。他们负责驱赶这些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懒散成性的人。这些家伙把干活的日子用来赌博玩乐、为非作歹。这种罪恶“摧毁了他们的财产，更有甚者，摧毁了他们的灵魂”。他们赌博，但是，谁又不赌博呢？对赌徒来说，不仅仅用纸牌作赌具，什么都可以作赌博的题目。在巴勒莫，小麦的价格、即将出生的婴儿的性别，并且还像别处一样，罗马教皇将任命的红衣主教的数目等等均在赌题之列。在威尼斯的一批商业函件中，我找到一张被人偶然留在那里的彩票。为了和共同为害的赌博、酗酒、游手好闲等恶行进行斗争，巴勒莫规定警察对旅馆、客栈、集市、酒店和带家具出租的房屋进行检查，还对这些地方的有嫌疑的常客进行查讯……要尽力弄清他们来自何地、属何民族、金钱来源如何等等。

警察同窃贼之间以及市风端正的城市同流浪汉之间的这种赌赛，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这是一种永久性的景象、一种“结构”。经过一场大规模的逮捕之后，一切都恢复平静。然后，盗窃、袭

击行人、暗杀等情事又层出不穷,屡有发生。1585年4月[235],威尼斯十人市政委员会威胁要进行干预。1606年7月,那不勒斯出现大量坏人坏事。于是对客栈和旅馆等进行了夜间搜查。400人被捕,其中有很多"被付给高价的"[236]佛兰德的士兵。1590年,在8天之内驱逐了流浪汉、茨冈人、强盗、坏分子和亡命之徒[237]……

把这些驱逐命令列成一张表,看看它们是否像贸易集市的日期那样互相关联,会是件饶有趣味的事。被这些驱逐令这样再度投入社会的流浪汉到底来自何处?去往何方?在威尼斯他们来自很远的地方,甚至来自像皮埃蒙特那样遥远的地方。1545年3月,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人包围了城市。事后一些人返回他们的村子;另一些人登上船只;其余的人则被驱逐出境,因为他们是来自皮埃蒙特以及其他外国城市的无赖、流氓或者好吃懒做的家伙。[238]5年以前,即在1540年这个荒歉之年,情况相反,是一大群不幸的父亲携带妻儿乘船来到,住在桥下和运河码头上[239]……

不久以后,穷人的问题超出了令人厌恶的城市的狭窄范围,发展扩大到整个国家和整个欧洲。17世纪一开始,像蒙特克雷斯蒂安这样的人目睹穷人迅速大量繁衍,惊恐不安起来。如果他像其他一些在法国和他一样的人那样是"殖民主义者"的话,那么惊惶失措是为了清除无产者这支可怕的无声无息的大军。[240]在整个欧洲,在土耳其本身,受着每天对面包的需要折磨的大批民众,正日益贫困化。欧洲的人口和它的自然资源相比,数量过大。补偿性的经济勃兴不能再使欧洲振奋起来,阔步前进。人类将蜂涌投向三十年战争的凶残的冲突中。这场战争就是加罗特将要冷酷无情地描述的那场战争,就是格里默尔绍森将要过于准确地按年、月顺序编写它的

历史的那场战争[241]。

盗匪活动的普遍存在

警方有关城市生活中的盗匪作案的证据、记录等，比起血淋淋的地中海盗匪活动史来，比起陆上的盗匪活动史来，真是相形见绌、平淡无奇。陆上盗匪活动是与它几乎一模一样的海上行劫活动的同胞弟兄。陆上盗匪活动既像海上行劫活动，而且还以和海上行劫活动相同的程度形成地中海地区的习俗的古老特征。它的源流一直上溯到人类的蒙昧时代才消失。自从大海聚藏了一些紧密凝聚的社会以来，盗匪活动就在海上出现，以后不再消失。今天这种活动仍然十分活跃。[242]因此，我们不要像一些不寻求走出“他们的世纪”，即他们研究的那个世纪的历史学家那样，说什么盗匪活动在15世纪出现于科西嘉或者16世纪出现于那不勒斯。我们也不要过快相信我们看见的在16世纪以一种新的或者更新了的力量到处涌现出来的事物的新奇性。那不勒斯胡安娜王后，1343年8月1日对阿奎拉的首领作的严厉打击盗匪、歹徒的指示[243]，可能阿尔卡拉公爵或者格朗弗勒红衣主教也在16世纪发布过。时代不同，抢劫的名称和形式也发生变化。盗匪、拦路抢劫者、小偷、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土匪（拦路抢劫者原来是士兵；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和土匪原来是被放逐的人）——这些人都是强盗——在我们眼里是指社会叛逆者、不适应环境者。

地中海没有任何地区能够免除这种祸害。因此，加泰罗尼亚、卡拉布里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因这种祸害而著名的地区并不是独一

无二的有抢劫活动的地方。抢劫处处存在,以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恐怖主义……等多种面目出现。它既存在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大门,也存在于大马士革或者阿勒颇的大门,也存在于那不勒斯的原野(那里的观察塔是修筑起来对付盗匪的[244]),也存在于罗马城周围的坎帕尼阿(有时人们决定烧掉这块平原沼地上的矮树林以赶出隐藏过深的强盗),甚至还存在于一个像威尼斯这样的显然文明开化的国家。[245]1566年,土耳其素丹的军队经过斯坦布里奥尔,先向安德里诺普尔、尼切、贝尔格莱德,然后向匈牙利进发,进军途中,不断绞死一大批因大军过境而被赶出匪巢的强盗。[246]显然,强盗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在其安全备受赞扬的土耳其的通衢大道上出现,这件事很能说明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如何。

在地中海的另外一端,西班牙的景象与上述情况相同。我已经常常提起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道路上的祸患。1567年,一个佛罗伦萨人说,骑驿马从巴塞罗那到萨拉戈萨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过了萨拉戈萨骑驿马是可以的,但是,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是不行的。至于他自己,他加入了一支武装的封建领主的商队。[247]塞万提斯在他的一篇短篇小说中虚构了一小队在巴塞罗那附近遭到土匪突然袭击的英雄。这类事件司空见惯,层出不穷。在西班牙帝国宽阔的大路中,有一条通过巴塞罗那。西班牙经由这条道路同地中海和欧洲联系。官方信使遭到抢劫,甚至道路无法再通行,这类事件时有发生。1565年6月就发生过。[248]就在这一年,从马德里通向布尔戈斯的大路——另一条西班牙伸向欧洲和大西洋的大动脉——因为瘟疫猖獗为害而交通断绝。[249]这显露出疆域过分辽阔的西班牙帝国的大量弱点。但是,在朗格多克那方面有多少比利牛斯山的走私

者，在加泰罗尼亚这方面就有多少土匪。下罗讷河流域的农村建筑物[250]，全都是像我们已经谈到的加泰罗尼亚农民的堡垒那样的设防的房舍。在葡萄牙[251]，在巴伦西亚，在威尼斯本身，在整个意大利，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强盗组成的小国家灵活机动（灵活机动正是它们的力量所在），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比利牛斯山到格拉纳达，或者从格拉纳达到加泰罗尼亚，或者从维罗纳附近的阿尔卑斯山游牧、流浪到卡拉布里亚，从阿尔巴尼亚游牧、流浪到黑海。这些微生物嘲弄、蔑视各个正式建立的国家，并且还久而久之使这些国家毁损倾圮。它们和近代进行人民战争的游击队相似。平民百姓往往站在它们一边。

从1550年到1600年，地中海就这样在这种灵活的、残酷的、每天进行的战争中日益衰竭。这是历史学领域内的宏篇巨帙弃之不顾、毫不提及的战争。这是一种被传统的历史学家当成次要事件而置之不理，听凭评论家或者小说家去处理的战争。斯汤达尔在意大利这个范围内，就这个问题说过一些颇为中肯得当的话。

盗匪活动和国家

盗匪活动首先是对已经建立的国家——政治秩序，甚至社会秩序的保护者——进行的一种报复。“受巴利奥尼、马拉特斯蒂、本蒂沃利奥、梅迪奇……等家族折磨、欺压的民众，自然而然会喜爱并且尊敬这些这家族的敌人。继承第一批篡权夺位者的小暴君的残酷行为，例如教人杀害一直逃难到威尼斯和巴黎的共和主义者的（托斯卡纳的）第一个大公爵科西默[252]的这种残酷行为，向这些强盗送去了新兵。”[253]“这些强盗反对

继中世纪共和国之后成立的暴虐无道的政府。”[254]以上是斯汤达尔的叙述。情况既然如此，他就根据他眼前的景象来评断在他那个时代始终盛行于意大利的盗匪活动。他写道：“现在，大家肯定还害怕遇到强盗。但是，如果他们受到惩罚，大家却又都会怜恤他们。这是因为这个这样机灵敏锐、这样好挖苦别人、嘲笑一切在它的统治者检查下发表的作品的民族，喜欢阅读以饱满的热情描述妇孺皆知的强盗生活的小诗。这个民族在这些故事中找到的英雄事迹，会使那些始终存在于民众中的艺术气质迷醉……民众从内心赞许他们，乡村姑娘宁愿许身一个在他的生命中曾经有过一次被迫前往绿林落草为寇的年轻汉子，而不许身别人。”[255]在西西里，强盗的事迹被流浪盲人歌手歌唱。歌唱时“用一种小的、盖满灰尘的提琴”伴奏[256]。这些歌手在人行道旁边的树下被人团团围住。泰奥菲尔·戈蒂埃后来指出[257]，“西班牙，特别是安达卢西亚，在这一点上仍然是个阿拉伯国家。强盗在那里很容易被当成英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民歌，全都同样充满匈牙利古时民兵和逃犯的故事……盗匪活动是对统治集团、对执法不公的司法当局的一种报复形式。它几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是游侠骑士的行动。人们记忆犹新的那个在重罪法庭上摆出一副游侠骑士和穷人的恩人的姿态为自己辩护的卡拉布里亚强盗就是一个例子。他每天数念珠，做祷告，念玫瑰经。乡村的本堂神甫为他祝福祈祷。为了实现他的这种社会正义，他才30岁就已经杀了30来个人。[258]

盗匪与国家政权为敌，通常在各个国家的政府力量薄弱的地区内，在军队无法采取大规模行动，国家鞭长莫及、无力支配控制的山地活动。这些地区往往是边境地区，例如：沿着威尼斯和土耳

其之间的达尔马提亚的高原、匈牙利辽阔的边境地区（这是16世纪盗匪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259]、加泰罗尼亚、邻接法国的比利牛斯山地区、墨西拿（这个地方作为自由城市是个避难所，在这个意义上也是边境）、位于那不勒斯王国内教廷飞地中的贝内文托的周围地区（因为他们从一个司法辖区转入另外一个司法辖区，以此来愚弄挫败追捕者）、教皇国和托斯卡纳之间的地区、米兰和威尼斯之间的地区、威尼斯和奥地利大公的世袭领地之间的地区……所有这些交界地区为盗匪提供了良好的宿营地。后来，伏尔泰同样使用了费尔内这个地方……他这样做决不是为了杀人越货。可能各国之间终于达成协议，但这种协议一般不能持久。1561年，法国国王向菲利普二世建议[260]采取共同行动来对付比利牛斯山的走私者。这在一个时期内是明智之举，后来则毫无效果可言。那不勒斯和罗马之间关于贝内文托的协定，并不比上述建议更加有用。1570年威尼斯同那不勒斯正式达成协议，[261]并于1572年同米兰签署一项协定。1580年，[262]当强盗的劫掠在威尼斯国家制造出一种普遍不安全的气氛时，这项协定延长时限。两国政府都获得对方准许在追捕罪犯时可追至边界线另侧6里处[263]。1578年，当蒙德哈尔侯爵试图打击卡拉布里亚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时，它向所有邻国，其中包括马耳他和利帕里群岛[264]，报警。1585年，西克斯特·坎特在征伐教皇国的强盗的前夕，也同样行事。[265]

但是，这些谈判牵涉到国家主权，因此，进展缓慢、困难而且缺乏诚意。试问，哪一个意大利的君主从内心深处不对邻邦的困难幸灾乐祸呢？引渡的事极为罕有，除非用对等交换的方式进行。西西里总督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争取到从科西默那里解送来一个罪

大恶极、因受到某些男爵庇护而25年来走遍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消遥法外、不受惩治的江洋大盗里佐·迪·萨波纳拉，是以把一个被控阴谋反对大公爵的马尔泰里家族的骑士送交科斯姆作为交换条件的。这个土匪由两艘帆桨战船押送，到达巴勒莫时被毒死。

一般说来，每个国家自己负责维持治安。这并不是件小事。在盗匪活动的老家，这项工作永无止境。1578年，那不勒斯总督蒙德哈尔公爵决定采取新的对付卡拉布里亚的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的行动。他下车伊始就被告知这些人犯下的罪行：打家劫舍、切断道路、杀害旅客、亵渎教堂、纵火烧屋、抓人绑票，“其他大量情节严重、骇人听闻、野蛮残忍的坏事还不包括在内”。格朗弗勒红衣主教采取的措施丝毫没有奏效。总督写道：“甚至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还人数增加，罪行猛增。他们的势力和影响、肆无忌惮的气焰大大上升，以致在这个王国的很多地方，人们不能旅行而不冒极大危险。”那么，在哪些地区比在卡拉布里亚，比在这些内卡拉布里亚和外卡拉布里亚的省份能够更加有效地打击他们呢？（10年以前，阿布鲁齐可能是匪患最烈、民众最怨声载道的地方。）

如果我们的文献资料翔实可靠[266]，当时卡拉布里亚的情况就是：盗匪因得社会环境和自然地形之利而大量麇集。他们在那里犯下的罪行比在别处犯下的更罄竹难书，更野蛮残忍。他们恣意妄为、胆大包天竟达到这样的程度：“一天中午，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进入雷焦城，把大炮拖引到那里，袭击一所房屋，闯进屋内并杀死住在里面的人，而这个城市的总督却无法抵抗，因为市民拒绝服从命令，不前去救援。”但是，采取行动对付卡拉布里亚是件非同小可的事。蒙德哈尔从他自己付出的代价中体验到这一点。确切日期

不详的雷焦事件发生后，城市总督下令进行搜捕。这次他虽然得到审判特派员的大力支持，但搜捕行动除了增强了强盗的力量和活动以外，毫无效果可言。被任命为两个卡拉布里亚省的临时政府首脑的布里亚蒂科所作的努力，也同样归于失败。惩罚性措施只能激怒土匪。他们攻夺城堡，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入大城市，敢于"杀他们的敌人一直杀到教堂，抓一些人当俘虏并扣押索赎。他们的残酷暴行使恐怖气氛四处笼罩。他们破坏田地，杀死那些抵抗他们或者奉总督之命追捕他们的人的羊群，总督自己不敢追捕他们。总之，"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应该对司法当局怀有的尊敬、畏惧和服从"。总督布里亚蒂科伯爵在我们刚从其中引用了上述那些话的那份报告的结尾指出，在他那当时担任王国步兵司令的儿子东·帕德罗·德·门多萨的指挥下，组织过一次对土匪的讨伐。他尽量推迟这次行动，以避免各省遭到不管怎样纪律严明的部队都会造成的损害。但是，如果他再拖延等待下去，就会产生这样的风险：来年春季，他将不得不调集一支军队来对付土匪，而现在对付他们，一支小讨伐队就足够了。[267]

组成这支讨伐部队的有9个西班牙连(用于进驻有资匪嫌疑的村庄)和3个轻骑兵连。[268]3艘三桅战船将在海岸附近的水域巡弋。涉嫌资匪的省份就这样预先受到包围。当局一如既往，悬赏索求强盗首级：普通强盗的头每个30杜卡托；强盗头目的头每个200杜卡托。

1月8日，东·帕德罗离开那不勒斯。4月9日，总督宣称他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269]2月份，17个强盗的头颅被送往那不勒斯，钉在城门上。据说这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民众的心愿。[270]一些强盗被俘。这

些俘虏在东·帕德罗返回那不勒斯时解交了司法部门。

这是一次像总督以父母官的口气发表的谈话所宣称的那样的巨大胜利吗?事实上,人口过剩、贫困不幸、既盗匪蜂起又盛产丝绸的卡拉布里亚的生活方式依然原样不变,或者几乎原样不变。冬天3个月用小股兵力作战不可能奏效。1580年,一个威尼斯的官员说,[271]整个王国土匪横行,到处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的强盗在阿普利亚,特别在卡拉布里亚称王称霸,为所欲为。困难在于,如果想避而不走这些盗匪出没的危险的道路,就会冒落入海上行劫者手中的危险。当时,海上行劫者正大批出没于从亚得里亚海一直延伸到罗马海岸附近的水域。

二十来年以后,[272]情况更加恶化。强盗一直侵入那不勒斯的港口。当局竟至宁愿同强盗和解,或者使用诡计,而不愿与之斗争。就这样,一直使拉沃罗的大陆感到恐怖的安杰洛·费罗的大股匪帮,被派往佛兰德,在西班牙的旗帜下在该地作战。各个匪帮受到挑拨离间,互相火并。一伙匪帮在塞萨附近吃掉其邻近的匪帮。一些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被收编入军队,条件是协助政府打击其竞争对手。最后,还使用了派兵在强盗家里守候这个办法。由于强盗总是同他们的亲戚或者同供应中心所在的村子有联系,于是,当局首先建议被称为亲戚的人"找治病办法"。读者应该把这句话理解为他们交出"他们的"强盗。强盗的亲戚如果拒绝,那么一个西班牙连队就会开来驻扎在村子里。这个连队更喜欢选住该地的强盗的亲戚家中或者有钱人家中。这些强盗的亲戚或者有钱人就得和连队一道设法"找治病办法"。由于这些人有钱有势,因此,或者把罪犯交出就完事,或者设法让罪犯从王国出走。于是,当局又因逃亡者

干了坏事而向有关人员索要一笔赔款或者其他费用。连队撤走，然后一切恢复正常。至少根据一份把上述方法当作统治那不勒斯艺术的例证加以说明的乐观的报告的叙述，做法就是这样。

实际上，这些方法并无任何新奇之处，都是惯常使用的老一套。一份威尼斯的文献资料让人了解到这些方法曾经在干地亚使用过。1555年，在干地亚[273]，凡杀死比自己杀人更多的强盗的强盗都予以宽恕（据说当时该岛有强盗200名）。1585年，西克斯特·坎特试图对付罗马的强盗时，也曾经采用这种办法。这是一种从内部搞垮匪帮的方式。贡扎格家族在罗马的一个代理人指出宽恕、赦免和奖赏产生了效果。[274]当时热那亚在科西嘉宽恕了加入了它的军队的全部土匪（几个极端残忍的罪犯除外）。这个解决办法使这个惊恐不安的岛屿得以摆脱动乱的因素。获得宽恕的人保证在一个时期内不再与热那亚为敌，并为它效劳。[275]土耳其人在安纳托利亚的做法与此如出一辙。[276]

我们不要夸大这些既表示虚弱又表示灵活的手段的意义。以农民的顽强性来同这个敌人进行斗争的西克斯特·坎特的强烈的意志都没有制服这个受到强有力的支持的神出鬼没的敌人。

盗匪活动和封建领主

在海上行劫的背后，有城市和城市国家在进行活动。在这种陆上行劫——盗匪活动——的背后，有支持冒险行动的封建领主的不断援助。强盗往往或近或远地受到某个真正的封建领主的指挥、操纵。奥塔维奥·阿伏伽德罗伯爵就是这样行事。一则发自威尼斯的法国通讯指出，这位伯爵同他

那一帮人1583年6月[277]进行反对威尼斯人的活动。"陛下，譬如奥塔维奥伯爵这样的人，一直弄得这些在桑盖内的领主毫无宁日可言，苦恼不堪。自从我上书陛下以来，他曾经返回该地两次，并焚毁了维罗纳河岸边的几所房屋。"威尼斯人追捕他，设法使弗拉拉和曼图亚这两处他惯常藏避的地方不收留他。[278]尽管如此，他们没有将他抓获。两年后，他在蒂罗尔的费迪南的宫廷出现。[279]另外一个例子：在蹂躏教皇国——这是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盗匪和杀人犯的会集地——的匪帮中(大批当地的强盗不计算在内)，格里哥利十四时期的最凶狠顽强的强盗之一是蒙特马尔齐亚诺公爵阿方索·皮科洛米尼。这个人我们已经遇见过。[280]托斯卡纳大公在最后时刻救过他，因为长期以来系住蒙特马尔齐亚诺的线一直牵在这位大公手里。他受到大公救助之后，又险些儿被捕，于是逃脱后前往法国。那时法国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与游击战迥然不同的战争。这场战争这个拦路抢劫的强盗不大喜欢。他听信种种许诺和邀请，再次前往意大利。这一次他来到托斯卡纳，忘恩负义、冷酷无情、肆无忌惮，起来反对大公。他身居皮斯托亚山中，这离卫戍部队的堡垒，却能煽起民众叛乱，进行冒险。特别因为1590年是荒年暴月，小麦严重歉收，灾难更容易引导民众试图改变社会地位，变成盗匪。这是有远见卓识的惊人之语。[281]这个强盗头目来到托斯卡纳的心脏地区后，什么坏事都可能发生，特别因为他和西班牙的驻防地以及梅迪奇家族的所有敌人都有来往，情况就更是如此。他如果进入锡耶纳和它的马雷马，就会引起一片混乱。然而，他的那帮匪徒作战不懂策略，不能攻拔要塞，在托斯卡纳或者罗马的警卫部队面前，节节败退。最后，君主取得胜利。1591年3月16日，皮科洛米尼在佛

罗伦萨被处决。[282]一场奇怪的内战就这样结束。这场战争受到外部世界的密切注视，因为这些冒险行为和密谋活动的线有时牵到外国人手中，有时牵到埃斯科利亚尔，有时牵到多菲内的勒斯迪吉埃尔。[283]

这些是国际政治的著名例子。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子会更加适合我们的目的。但是，它们最不容易发现……然而，加泰罗尼亚的贵族和比利牛斯的强盗抢劫之间的联系、那不勒斯的或者西西里的贵族和意大利南部的盗匪活动之间的联系、[284]教皇国的绅士阔佬和罗马的强盗抢劫之间的联系，是无法否认的。贵族阶级或者在政治上，或者在社会上，处处都起作用，都扮演自己的角色。金钱能够搅动一切。贵族在经济上往往病弱。贫穷的贵族——他们之中有的破了产，其他的则是财产微薄的家庭中的年龄较小的非长子——往往是这种潜在的、不断死而复生的、“像七头蛇的头那样的”[285]社会战争的首领和骨干。他们被迫通过歪门邪道弄钱，以打家劫舍为生，被迫采取“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的手段(正如拉·努所说，法国的情况相同)过活”。[286]这种社会机制经常起作用，以后还会更起作用。18世纪，土耳其被某些领主弄得国无宁日。这些领主就是保加利亚的“克尔扎尔斯”。[287]他们人数太多，不能全都富裕。在巴西，19世纪初期，土匪是大地主的打手，是这些新时代或多或少对之不利的、不得不进行自卫的打手。[288]

但是，我们不要使事物简单化。强盗抢劫是个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现象。它既为某些贵族效劳，也被用来反对另外一些贵族。“著名的反对卡斯泰隆侯爵的土匪和叛乱分子”亚勒克索·贝尔托洛蒂在伦巴第地区的事迹就显示出这种情况。1597年8月17日，他

率领200多人攀越索尔费里诺城堡的墙壁,抓走侯爵的母亲和儿子——一个13岁的孩子。他把俘虏带到卡斯泰隆,试图让他的俘虏——老侯爵夫人——把门打开,以便抓捕侯爵本人。夫人加以拒绝,他枉费心机。于是他野蛮地打伤夫人,杀死小孩,接着又大肆抢劫。根据米兰总督的报告,他"的行为野蛮残忍"。[289]

盗匪活动不仅同某个贵族阶级的危机联系,而且具有农民性和民众性。一个18世纪的历史学家说,这种活动是一股社会浪潮、一种"泛滥"。[290]它掀起最复杂多样的、彼此各不相同的大片江、河、湖、海。它作为一种政治的以及社会的要求和反作用(不是宗教的要求和反作用[291]),既有贵族的成分,也有平民百姓的成分。(罗马城周围的坎帕尼阿或者那不勒斯平原周围的"山王",难道一般不是农民或者小百姓吗?)它是潜在的农民起义。这种起义是贫困和人口过多的产物。它是古老传统的复活,而且还往往是十足的抢劫,是人攻击人的凶狠残暴的冒险。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要仅仅把这种抢劫归结到最后这个方面,即那些为他们的财富、地位和生命担忧的有钱有势的人最强调的那个方面。然而,即使考虑到在叙述这些罄竹难书的罪行时有言过其词之处,这些罪行难道能够被人忘得干干净净吗?不错,16世纪人的生命贱如草芥。阿隆索·德·孔特雷拉斯自述的整个生涯,由于作者本人曾经亲自经历过,是一部已经为人所知的最出色的骗子小说。这部小说叙述足足十来起杀人行凶案件。本韦努托·切利尼的生涯今天可能使他坐牢,上断头台……根据这些典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些以杀人越货为业的人的踌躇犹豫和惶恐不安……对据在梅斯被包围期间为围城中的人治病的医生昂布鲁巴兹·帕雷说是出自查理五世之口的话和他

的想法，人们会作何感想呢？帕雷写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问奄奄一息的是些什么人，是否贵族、绅士和显要人物。给他的回答是：全是可怜的士兵。于是，他把这些人比成是吃植物的芽和吃其他从地里长出的植物结出的果实的毛虫、蚱蜢、金龟子等，说什么他们死了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如果他们有家产就不会为每个月挣6个利佛在军营里干事了……"[292]

盗匪活动的高涨

16世纪末期，不管当时情况如何，盗匪活动变本加厉，更为猖獗。在由各个国家拼凑而成的意大利，盗匪遍布全境、肆意抢劫。他们从这里被赶走，就去那里躲藏。如果他们因彼此之间恨大仇深发生火并而力量削弱，就与为数众多的绿林山寨建立联系，实力因此加强，再度出现于更远的地区。18世纪优秀的历史学家梅卡蒂告诉我们，这些匪帮在将近15世纪90年代时如何在意大利全境到处横行霸道，猖獗为害。他们常常利用格尔夫派分子和季伯林斯派分子的方便的伪装，打着这两派的旗号进行内部斗争。[293]所有这一切的背景则是一幕永恒的饥饿的惨剧。这些下山打家劫舍的盗匪进行的袭击，常常被人比作摩洛哥的劫掠牲畜、庄稼的武装匪帮的那种行动。（不久以前，摩洛哥的未被当局降服的山区的山民突然凶猛地扑向盛产小麦、牛羊成群的平原。）这就为这个世纪末期的意大利制造出一种奇怪的气氛。饥饿在那里折磨整个整个的地区。[294]强盗抢劫在那里四处蔓延。从西西里到阿尔卑斯山，从蒂勒尼安海到亚得里亚海，一连串盗窃、纵火、暗害事件和与海上行劫相同的野蛮残忍的暴行相继发生，连绵不

绝。人人都对这种局势哀叹。那不勒斯的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塞拉1613年承认在那不勒斯比在意大利任何其他地方,盗窃、抢劫、纵火、暗杀等犯罪行为更加层出不穷,猖獗为害。[295]西西里岛和教皇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王位空位时期,这些地方盗匪麇集,大量孳生。[296]那不勒斯和罗马涅的边界为他们提供了能够进行广泛活动的场所。[297]这一伙杂七杂八的乌合之众亡命冒险。他们之中有职业杀手、农民、贵族、违反放逐令的教士、不愿再遵守罗马教廷的清规戒律的修道士……等。这些人的出身来源,可以从由教皇国交给一个名叫让·安德烈·多里亚的人的船役囚犯组成的队伍中推断出来。这些人的名单有时还有人保存。撒丁岛和科西嘉的强盗的数量都十分巨大。托斯卡纳在弗朗切斯科的统治时期经历的重重困难,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298]。从1592年到1593年,意大利打算用大赦的办法来清除这些讨厌的人物。获得赦免的条件是:他们前去达尔马提亚在威尼斯的军队中服役。[299]

但是,并不只是意大利需要同这种祸害进行斗争。在拦路抢劫的强盗从未绝迹的北非,谨慎小心的旅客(例如君士坦丁的商人)总是结队而行。哈埃多说,他们中间最精明的人旅行时由伊斯兰教的隐士伴随[300]。在土耳其,窃贼和盗匪麇集。根据塔韦尼埃的记载,[301]在17世纪,"整个土耳其盗匪充斥。他们人数众多,成帮结伙,拦路抢劫过往客商"。早在16世纪,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流动商人就组织长列车队进行自卫,群集露宿。露宿地点点燃大火,[302]很远就可以看见。商人在陆上运送大包大包的货物和在海上用圆形船运载货物同样危险。

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和17世纪的最初几年,没有一个国家

能够比西班牙更清楚地提供一幅强盗抢劫的高潮的图景。老国王在埃斯科利亚尔死后，西班牙很快就在新兴城市马德里经历了以黄金时代之名为人所知的时代的奢侈豪华、节庆娱乐、艺术和知识等方面的令人惊奇的兴盛发展。这个贝拉斯克斯和洛普·德·韦加的马德里城，这个既属于很富的人也属于很穷的人的具有双重性的马德里城，迅速扩大。在穷人的马德里，乞丐睡在广场的角落上，身子裹在短斗篷里。封建领主们跨过这些斗篷回到他们的府邸。巡夜人为富人看守大门。这是一个皮条客、士兵、船长、饥饿的奴仆、玩油腻肮脏的纸牌的赌徒、甜言蜜语把嫖客剥得一干二净的妓女和弹吉他弹得流连忘返的大学生等令人不安的下层社会。这是一个受到整个西班牙养育，附近乡下的农民、工人早上大批涌入的五光十色、三教九流混杂的城市。这些农民、工人来这里卖面包……在谨慎国王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除了格拉纳达曾经情况十分紧张、令人不安，除了英格兰人曾经袭击各个海港之外，这个地区是和平宁静的。这种安宁常常受到外国人的羡慕。至于土匪，他们只在东比利牛斯山区活动，人数众多。他们在该地同加泰罗尼亚的小贵族和附近的法国保持着联系。然而在谨慎国王统治的最后几年，盗匪活动在整个半岛成了突出的现象。一些强盗在通往巴达霍斯的道路上活动。这件事与1580年对葡萄牙的战争有关。[303]在巴伦西亚，激烈的争端使大封建领主家族互相之间的对抗发展到杀人行凶的地步。1577年，危险是如此明显，以致为此颁布了一道新国事诏书。[304]

这里和别处一样，各种灵丹妙药又何济于事呢？用后无用，就必须再用。1599年、1603年、1605年[305]颁布了新国事诏书来对付在

现政权下(王国的)城市里的那些携带武器扰乱治安的匪徒。"坏人"问题[306]就在1609—1614年大规模驱赶摩里斯科人的前夕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次驱赶很快就为这些国事诏书的实施提供了很多良好的机会[307]。小公职人员的贪污腐化构成另一个因素。这些小公职人员在那里和土匪串通勾结,沆瀣一气。[308]

奴 隶

最后一个特点使地中海的这些社会变得独特起来。这个特点是:尽管这些社会具有现代性质,但仍然是奴隶社会。地中海西部的情况是这样,地中海东部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是一种奇怪的、对过去的事物的忠实和依恋的标志,也可能是一种奢侈豪华的标志和某种程度的富有的标志,因为奴隶身价昂贵,有自己的需求,并且与穷人和不幸的人竞争。甚至伊斯坦布尔的情况也是这样。劳动力的稀少以及矿产和甘蔗种植园的收益,使得新世界的古式奴隶制度这种大规模的和严重的倒退现象得以产生。不管怎样,奴隶制度虽然实际上已经从北欧和法国消失,但仍然以相当根深蒂固的家庭奴隶制度的形式残存于地中海西部、[309]意大利和西班牙。布尔戈斯的政务会1572年发布的法令不仅为运往新世界的,而且也为运往葡萄牙的以及运往这些王国的,即运往西班牙[310]的黑奴的安全保障规定了条件。古斯曼这个骗子英雄,在为一个丈夫远在印度的太太效劳时,恬不知耻,丢尽脸面,爱上了这位夫人的白种女奴。"我很久以来一直以为这个白种女奴是个自由人呢。"[311]将近1555年,在还是卡斯蒂利亚的首府的巴利亚多里德,一些奴隶在大家族里侍候主人吃饭,"他们自己吃厨房里的残汤剩菜,油水很足,吃得

胖乎乎的”，并且常常根据主人的遗嘱恢复自由。[312]1539年，一个在鲁西永被人发现没有主人并且是个窃贼的土耳其人被捕，又被当成奴隶卖给一个公证人。[313]在意大利，一系列文书契约表明：家庭奴隶制度的残余仍然存在；主要存在于南方；其他地方也有。在那不勒斯，一些经过公证的文件[314]表明还有奴隶贩卖（16世纪上半叶通常每“件”奴隶值15杜卡托）。在威尼斯，在公证文书原本存底簿中，[315]在贡扎格家族的通信中，都有同样的记载。毫无疑问，贡扎格家族为宫廷的娱乐购买黑人小孩。[316]里窝那港的船舶载货清单不时载明有几个黑奴到达船上。[317]

所有这种从未中断的奴隶贸易，只在发生特别事件时才充分展现出来。例如1510年的黎波里的攻占[318]把大批奴隶投入西西里岛市场，以致价格猛跌，以贱价出售，每个奴隶售价3至25杜卡托；以致西方的帆桨战船立刻把船上被罚划船的奴隶全部加以更新。1549年托斯卡纳大公派遣代理人去塞尼亚购买土耳其奴隶。[319]这样行事的并非只有他一人。奴隶制度是这个地中海社会的现实。尽管在这个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宗教怜恤和慈善运动规模巨大，但是，这个现实对穷人来说仍然是严酷的。不管怎样，它决不是大西洋和新世界所独有。

作什么结论？

一种缓慢的、强有力的、深刻的发展演变，从1550年到1600年似乎逐渐扭曲了、改变了地中海的各个社会，完成了长期的孕育。普遍的和日益增长的不安，并不表现为光天化日之下的叛乱，但它仍然在同样改变整个社会景象。这是一

出具有不可否认的社会性质的悲剧。在阅读了让·德吕莫对罗马和16世纪的罗马城周围的坎帕尼阿的确切叙述后,最后一个疑团(如果人们还有怀疑的话)消失了。这个叙述的优点在于它利用了、吸收了这个永恒的城市的“新闻记者”的上千条消息。这个证据广泛地证实了我们已经发现的事物。毫无疑问,在一个富有的、生气勃勃的、被重建为一些拥有巨大不动产的强大家族的贵族阶级和人数日多的、日益贫困的、像毛虫和金龟子那样的、卑贱低下的、繁衍过剩的穷人群众之间,一切都在向两极分化。一种裂化现象把古老的社会一分为二,并且在两者之间挖掘深渊。什么也无法填平这些深渊。我们必须重复这一点:甚至在这个世纪末期,连令人吃惊的天主教的慈善,也无法填平这些深渊。在英格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伊斯兰世界,一切都遭到那出17世纪把它的无法治愈的创伤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惨剧的破坏。国家同社会一样,社会同文明一样,一切都逐渐受到邪恶的侵袭损害。这个危机使人的生活染上它的色彩。富人之所以与坏人为伍,混迹于他们所不齿的人群中,那是因为生活有它两首相近的河岸:河的此岸是高贵的和奴仆过剩的家庭;河的彼岸是流氓团伙,是黑市、偷窃、花天酒地的生活和冒险的世界,特别是贫困的世界……这条河的两岸一衣带水相邻,正如最纯洁、最热烈的宗教激情和最骇人听闻的最卑鄙的以及最野蛮的行为相邻一样。某些人嚷道,这是“巴罗克”的令人惊讶的和奇妙的矛盾。情况不是这样。这些事物并不是巴罗克的矛盾,而是产生和支持巴罗克的,巴罗克遮盖得不完全的社会的矛盾。在这个社会的心脏里存在着痛苦的绝望。

产生这一切的原因,难道又是海没有担当起它作为财富、劳

役、财产甚至生活的欢乐的分配者的任务吗?难道又是所有古老的光荣和繁荣都已经消耗净尽了吗?难道又是海边的民族可能耗光了它们最后的储备吗?或者用我们在研究中提出的同样单调的问题:难道是因为这个包括地中海在内的整个世界或迟或早要猛然冲向17世纪的惊人的退潮吗?弗朗索瓦·西米昂[320]可能是正确的吗?

本部分原注

1. Cette mobilité à l'horizontale est, elle aussi, un signe révélateur de sociétés ouvertes. Gaston ROUPNEL, *La ville et la campagne au XVII^e^ siècle. Étude sur les populations du pays dijonnais*, 1955, 2^e^ éd., p. 99: "Au XVI^e^ siècle, on soigne ou on nourrit le mendiant avant de l'expulser [des villes].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on le rase. Plus tard on le fouette, et à la fin du siècle, le dernier mot de la répression en fait un forçat".

2. Henri DROUOT, *Mayenne et la Bourgogne*, 1937, I, notamment p. 48: "Ces robins qui avaient bouleversé depuis un siècle l'ordre social ancien formaient déjà, vers 1587, un corps conservateur. Ils voulaient maintenir le régime qui avait favorisé leur ascension et le pain qui pouvait garantir leur avenir. Ils tendaient aussi à s'isoler comme classe sur le sommet conquis."

3. Voir *infra*, p. 217 et *sq*.

4. Tome I, seul paru, Madrid, 1963.

5. Lucien Romier, *Le Royaume de Catherine de Médicis*, 1925, I, 3^e^ édit., p. 177.

6. *Ibid.*, p. 207—208.

7. *Ibid.*, p. 207.

8. *Ibid.*, p. 193—203; Henri Drouot, *op. cit.*, I, p. 40.

9. François de Ramel, *Les Vallées des Papes d'Avignon*, 1954, p. 142.

10. Josef A. Schumpeter, *op. cit.* (tr. ital.), I, p. 177.

11. Carl J. von Hefele, *Le cardinal Ximénès*, p. 364.

12. R. Russo, *art. cit.*, p. 421.

13. E. Le Roy Ladurie, *op. cit.* Je crains qu'il n'y ait pas dialogues, mais bien conversation, le paysan riche est le troisième interlocuteur adversaire et du seigneur et du petit paysan. Si l'on en croit E. Le Roy Ladurie, ce gros paysan gagnerait en Languedoc, de 1550 à 1600.

14. P. Vilar, *op. cit.*, I, p. 575 et *sq.*

15. Antonio Dominguez Ortiz, *op. cit.*, I, p. 664.

16. Dr L. MERLE, *La métairie et l'évolution agraire de la Gâtine Poitevine de la fin du Moyen Age à la Révolution*, 1959.

17. Lucien FEBVRE, *Philippe II et la Franche Comté*, 1912, p. 201 et *sq.*

18. Gabriel DEBIEN, *En Haut Poitou: défricheurs au travail* (*XV^e^ — XVII^e^ siècles*). "Cahiers des Annales", 1952.

19. Manuel TORRES-LÓPEZ, "El origen del Señorio Solariego de Benameji y su *cartapuebla* de 1549", *in*: *Boletin de la Universidad de Granada*, 1932, n° 21; compte rendu de Marc BLOCH, *in*: *Annales hist. écon. et sociale*, 1934 p. 615.

20. Robert LIVET, *op. cit*, p. 147 et 148.

21. *Ibid.*

22. R. AUBENAS, *Chartes de franchises et actes d'habitation*, Cannes, 1943

23. L. BIANCHINI. *op. cit.*, I, p. 260 et *sq.*

24. 8 octobre 1585, A. N., K 1563.

25. Voir *supra*, I, p. 72—73.

26. *Op. cit.*, p. 354.

27. G. Niemeyer, *op. cit.*, p. 51.

28. Aldo de MADDALENA, "I bilanci dal 1600 al 1647 di una azienda fondiaria lombarda", *in*: *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economiche et commerciali*, 1955.

29. Ainsi à titre d'exemples entre des centaines d'autres. A. d. S. Naples, Sommaria Partium 249, f° 181, 219 v°, 220, 247 (1544 et 1545).

30. A. de Maddalena, *art. cit.*, p. 29, leur chute "drastique" à partir de 1634.

31. Fr. Saverio Provana di Collegno, "Notizie e documenti d'alcune certose del Piemonte", in: *Miscellanea di storia italiana*, 1901, t. 37, série 3, vol. 2, p. 393—395.

32. Ses sujets se révoltent encore en 1566 (Simancas E° 1395, 7 février 1566), la révolte dure encore en 1568 (*Ibid.*, 11 janvier 1568.)

33. Carmelo Viñas Y Mey, *El problema de la tierra en los sigols XVI—XVII*,, Madrid, 1941, p. 30, pense que les revenues de la noblesse augmentent moins vite que le niveau géréral des prix.

34. Henri Drouot, *op. cit.*, II, p. 477.

35. *Correspondance de Saint-Sulpice*, p. p. E. Cabié, p. 37.

36. *Dépêches de Fourqueraux*, I, p. 365.

37. R. B. Merriman, *op. cit.*, IV, p. 365.

38. L. Pfandl, *Philippe* II. p. 315; S. Minguijón, Historia del derecho español, Barcelone, 1933, p. 370.

39. A. Dominguez Ortiz, *op. cit.*, p. 222.

40. Nobili et del Caccia au Prince, Madrid, 12 mars 1572,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903.

41. *C. S. P.*, *Venetian*, VII, p. 178.

42. *Lettres de Fourquevaux*, I, p. 295.

43. E. ALBÈRI *op. cit.*, I, III, p. 263.

44. *Ibid.*, I, V, p. 19—20.

45. Voir *supra*, I, p. 269, note 1.

46. Richard KONETZKE, *op. cit.*, p. 146.

47. E. ALBÈRI, *op. cit.*, I, III, p. 338—339.

48. D'après le rapport du licencié Polomares, cf. *supra*, II 32, note 5.

49. Simancas E° 137, f° 213, 9 juin 1559.

50. *Ibid.*, 13 juillet 1559.

51.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903, 29 septembre 1571.

52. *Ibid.*, 19 juin 1572.

53.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911, 15 février 1580.

54. A. d. S., Venise, Senato Dispacci Spagna, Matteo Zane au Doge, Madrid, 21 avril 1582.

55. A. d. S., Gênes, Spagna 15, Madrid, 27 décebre 1608.

56. Naples, Bibliothèque de la Storia Patria XXVIII, B11, f° 114 v°, 30 avril 1621.

57. A. MOREL FATIO, *L'Espagne au XVI^e et au XVII^e siècle*, *Heilbronn*, 1878, p. 177.

58.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903, 22 janvier 1571.

59. A. NAVAGERO, *op. cit.*, p. 6.

60. Balatasar PORREÑO, *Dichos y hechos del señor rey don Philipe segun-*

do, el prudente…, Cuenca, 1621, p. 6.

61. R. RECOULY, *Ombre et Soleil d'Espagne*, 1934, p. 97.

62. Théophile GAUTIER, *Voyage en Espagne*, 1899, p. 39.

63. *Op. cit.*, notamment la maison du comte de Benavente, près du Pisuerga, p. 229 v°。

64. L. PFANDL, *op. cit.*, p. 132.

65. Victor Hugo, *William Shakespeare*, 1882, p. 25, parle du cabaret *El* Puño en restro.

66. A. d. S., Naples, Farnesiane 48, Canobio au duc, Madrid, 7 septembre 1607: "de quatro mesi in qua passa cosa qua contrail solito et mai più è inter venuto che siano state a mazate in Madrid piu di trecenti huomini et non si sa come ne perche delli più".

67. E. ALBÈRI, *op. cit.*, I, I, 35—36, 16 novembre 1525.

68. *Ibid.*, I, III, p. 263.

69. *Ibid.*, I, V, p. 288.

70. Felipe RUIZ MARTÍN, *Introduction aux lettres de Florence*, à *paraître*.

71. B. BENNASSAR, *op. cit.*, dactylogramme.

72. Voir tout l'excellent chapitre III, *La posición economica de la nobleza*, d'A. DOMINGUEZ ORTIZ, *op. cit.*, p. 223 et *sq*.

73. Voir L. Pfandl, *op. cit.*, p. 313 et A. Dominguez Ortiz, *op. cit.*, p. 215 et *sq*.

74. A. Dominguez Ortiz, *op. cit.*, p. 168.

75. Théophile Gautier, *op. cit.*, p. 27.

76. J'emprunte ces exemples à A. Dominguez Ortiz, *op. cit.*, p. 224.

77. A. Dominguez Ortiz, *ibid.*, p. 255 et *sq*.

78. *Ibid.*

79. *Ibid.*

80. *Ibid.*, p. 270.

81. *Ibid.*, p. 277.

82. *Ibid.*, p. 263.

83. *Ibid.*, p. 262—3.

84. Lucien ROMIER, *Le Royaume de Catherine de Médicis*, 3e édit., 1925, I, p. 160—239.

85. Pierre VILAR, *La Catalogne dans l'Espagne moderne*, 1962, I, p. 573, notes brèves; A. DOMINGUEZ ORTIZ, *op. cit.*, p. 303 et *sq*. Petit nombre de la

noblesse catalane.

86. A. d. S. ,Gênes,Spagna 6,2415,Madrid,4 août 1575.

87. A. d. S. ,Venise,Senato Dispacci Spagna,P° Vico au Doge,Madrid, 27 avril 1616.

88. E. ALBÈRI,*op. cit.* ,I,V,p. 276.

89. *Ibid.* ,II. V. p. 464.

90. *Ibid.* ,p. 316.

91. *Arch. storico italiano*,IX. p. 247.

92. L. BIANCHINI,*op. cit.* ,II,p. 249,252—3,260,299.

93. *Op. cit.* ,p. 249.

94. Cf. les excellents articles de Rosario VILLARI,"Baronaggio e finanze a Napoli alla vigilia della rivoluzione del 1647 — 1648", *in*: *Studi Storici*, 1962; "Note sulla rifeudalizzazione del Regno di Napoli alla vigilia della rivoluzione di Masaniello",*in*:*Studi Storici*,1963.

95. *Storia di Milano*, *X*, *L'etá dei Borrmei*, 1957. problèmes sociaux abordés de biais. p. 353 et *sq*.

96. Voir *infra*,p. 70.

97. Vito VITALE,*Breviario della storia di Genova*,1955. I. p. 235 et *sq*.

98. James C. Davis,*The decline of the Venetian Nobility as a Ruling class*,Baltimore,1962.

99. J. DELUMEAU,*op. cit.* ,II,p. 433,et *sq*.

100. P. MILIOUKOV Charles SELGNOBOS et Louis Eisenmann,*Histoire de Russie*,1932,I,P. XIII;Henri Pirenne,*Les villes du Moyen Age*…,p. 52;Henri SÉE,*Esquisse d'une histoire du régime agraire aux XVIII*[e] *et XIX*[e] *siècles*, 1921,p. 180.

101. Ömer Lütfi Barkan,*Aperçu sur l'histoire agraire des pays balkanique*,tirage à part,p. 141 et *sq*.

102. Nicoara BELDICEANU,"La région de Timok-Morava dans les documents de Mehmed II et de Selim I[er]",*in*:*Revue des Études Roumaines*. 1957, p. 116 et 119.

103. R. Busch-Zantner,*op. cit.* ,p. 60—61 et ses réferences.

104. Stanford J. SHAW. *in*:*The Balkans in transition*,1963. p. 64.

105. *Ibid.* ,p. 64—65.

106. Ce détail et beaucoup des précisions qui suivent sont empruntés à l'article de Bistra A. CVETKOVA. "L'évolution du régime féodal turc de la fin

du XVI[e] siècle jusqu'an milieu du XVIII[e] siècle", *in*: *Études historiqu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Bulgarie*), à *l'occasion du X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Stockholm, août 1960, le détail relatif à Kostour, p. 176. Pour la bibliographie de cette historienne se reporter au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963, p. 320—321; faire un sort à son important article, "Nouveaux documeuts sur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des Sipahis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in*: *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l'U. R. S. S.*, *Institutum Populorum Asiœ*, *Fontes Orientales*, 1964, résumé en français, p. 220—221.

107.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146—147.

108. Bistra A. CVETKOVA, *rt. cit.*, p. 173.

109. *La Méditerranée*…, I[re] édit., p. 639. : "l'armée féodale des sipahis non soldés monte à 230000 chevaux".

110. Bistra A. CVETKOVA, *art. cit.*, p. 172.

111. *Ibid.*, p. 173-175.

112. Bistra A. CVETKOVA, "Sur certaines réformes du régime foncier au temps de Méhemed II", i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Orient*, 1963.

113.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154—158.

114. Voir *supra*. I, p. 535,

115. Voir I, p. 489 et *sq*.

116. Bistra A. Cvetkova: "L'évolution du régime féodal…", p. 177.

117. *Ibid.*, p. 184.

118. *Ibid.*

119. *Ibid.*, p. 184 et *sq*.

120. *Ibid.*

121. *Ibid.*

122. Bistra A. CVETKOVA, 《The System of Tax-forming (iltizam) in the Ottoman Empire during the 16th-18th Centuri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Bulgarian Lands》, en bulgare, résumé anglais *in*: *Izvestia na institouta za pravni naouki*, Sofia, XI-2.

123. Bistra A. CVETKOVA, 《L'évolution du régime féodal…》, p. 184. Toutes ces remarques et conclusions confirmées par les *lecons d'Ömer* LÜTFI BARKAN (dactylogramme,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VI[e] section, Paris).

124.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153-154. Cf. J. von HAMMER, *op.*

cit. ,I,p. 372.

125. Franz BABINGER,*in Encyclopèdie de l'Islam*,*II*,*p.* 1 116.

126. Ludwig von THALLOCZY,《Eine unbekannte Staatsschrift eines bosnischen Mohammedaners》,cité par R. BUSCH ZZNTNER,*op. cit.* ,p. 15.

127. Ainsi le Vénitien L. Bernardo,en 1592,B. A. CVETKOVA,*art. cit.* , p. 193,Cf. J. W. ZINKEISET,*op. cit.* ,III,p. 167,note 1.

128. R. BUSCH-ZANTNER,*op. cit.* ,p. 60.

129. *Aus dem Grundherr wurde der Gutsherr*,*op. cit.* ,p. 84.

130. Carl BRINCKMANN, *in*: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39, p. 173-174; Marc BLOCH,*in*:*Mélanges d'histoire sociale*,*I*,*p.* 120.

131. *Traian STOYANOVITCH*,《Land Tenure and Related Sectors of the Balkan Economy》,*in*:*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53,p. 338 et 401.

132. *Ibid.* ,p. 401.

133. R. BUSCH-ZZNTNER,*op. cit.* ,p. 86.

134. A. BOUÉ,*op. cit.* ,II,p. 273.

135. R. BUSCH-ZZNTNER,*op. cit.* ,p. 80-90.

136. G. I. BRATIANU,*op. cit.* ,p. 244.

137. T. Stoyanovitch, "Land tenure …"

138. Antonio Dominguez Ortiz, op. cit. ,p. 173 et 174.

139. Op. cit. ,III,p. 280-281.

140. Ibid. ,p. 497.

141. *op. cit.* ,p. 168.

142. Julio CARO BAROJA,*La sociedad criptojudia en la Corte de Felipe IV* (Discours de réception à l'Academia de la Historia),1963,p. 33 et *sq.*

143. Peu d'estime pour la *nobleza de letras*, A. DOMINGUEZ ORTIZ,*op. cit.* ,p. 194.

144. A. DOMINGUEZ ORTIZ,*ibid.* ,p. 266. note 38.

145. *Ibid.* ,p. 195.

146. Sur son cas, références, Traian STOYANOVITCH,《Conqquering Balkan Orthodoxe Merchant》,*in*:*Journal of Economic*,*History* 1960,p. 240-241.

147. Voir *infra*,p. 435-436.

148. Voir *infra*,p. 152.

149. Voir *supra*,I,p. 45.

150. Hermann HEFELE, *Geschichte und Gestalt. Sechs Essays*, 1940: le chapitre, 《Zum Begriff der Renaissance》 p. 294 et *sq.*, publié sous forme d'article *in*: *Hist. Jahrbuch*, t. 49, 1929.

151. Alfred von MARTIN, *sociologia del Renacimiento*, 1946, p. 23.

152. Marcel BRION, *Laurent le Magnifique*, 1937, p. 29 et *sq.*

153. Antonio de Montalvo à Simón Ruiz, Florence, 23 septembre 1572. Archives Ruiz, Valladolid, 17, f° 239, cité par F. RUIZ MARTIN, *Introduction* …, *op. cit.*

154. Benedetto CROCE, *Storia del Regno di Napoli*, 3e édit., Bari, 1944, p. 129-130.

155. Matte GAUDIOSO, 《Per la storia…di Lentini》, *art. cit.*, p. 54.

156. Cf. *supra*, I, p. 311, note 7.

157. D. Beltrami, *op. cit.*, p. 72: 5,1 p. 100 en 1586; 7,4 en 1624.

158. F. Ruiz Martin, *Introduction*…, *op. cit.*

159. Tome II, nouvelle n°XX, p. 47 et *sq.*

160. *Ibid*,. VIII, nouvelle n° LX, p. 278-279.

161. *Ibid*, p. 280.

162. Marciana, Ital. 6085, f° 42 et *sq.*, 1556.

163. Attribué à Francisco Mendoza y Bobadilla, édition de 1880: *El Tizon de la Nobleza española.*

164. C'est le nom donné aux manuscrits clandestins qui énumèrent les mésalliances des grandes familles, A. DOMINGUEZ ORTIZ, *op. cit.*, p. 163, note 11.

165. Albert A. SICROFF, *Les controverses des statuts de "pureté de sang" en Espagne du XVe au XVIIe Siècle*, 1960.

166. *Op. cit.*, p. 379.

167. Lucien ROMIER, *op. cit.*, I, p. 184.

168. *Ibid.*, p. 185-186.

169. *Ibid.*, p. 186, d'après Noël du FAIL.

170. L. BIANCHINI, *op. cit.*, I, p. 151.

171. B. N., Paris, Esp. 127.

172. Lucien FEBVRE, *Philippe II et la Franche-Comté*, 1911*p.*,. 275.

173. Dès le XVe siècle, A. TYMIENECKI, "Les nobles bourgeois en Grande Pologne au XVe siècle, 1400-1475", *in*: *Miesiecznik Heraldyczny*, 1937.

174. *Revue d'histoire comparée*, 1946, p. 245.

175. F. de ALMEIDA,*op. cit.* ,III,p. 168 et *sq*.

176. G. SCHNÜRER,*op. cit.* ,p. 148.

177. El conde de Orgaz à Matheo Vazquez,Séville, 16 avril 1586, B. M. Add. 28 368, f° 305.

178. *Actas*,III,p. 368-369,pétition XVI,1571.

179. Simancas E° 156.

180. *Correspondance de Jean Nicot*,p. 117.

181. L'évêque de Limoges à la Reine,Madrid,28 novembre 1561,B. N. , Paris,fr. 16103,f° 104,copie.

182.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1615,p. p. Th. Funck-Brentano,1889, p. 60,cité par François Simiand,*Les fluctuations économiques à longes période et la crise mondiale*,1932,p. 7.

183. Lucien Romier,*op. cit.* ,I,p. 187.

184. Rosario Vilari,*art. cit.* ,in:*Studi Storici*,1963,p. 644 et *sq*.

185. Jean Delumeau,*op. cit.* ,I. p. 458 et *sq*.

186. Lytton Strachey,*Eisabeth and Essex*,2e édit. ,1941,p. 9.

187. Pierre Goubert,*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de* 1600 *à* 1730,1960, *passim*, et p. 214 et sq.

188. Discours de M. Aldigala,en réalité de Guarnix,Public Record Office,30/25,n° 168,f° 133 et *sq*.

189. Marciana,G. BALDINUCCI,*Giornale di Ricrdi*,10 avril 1650.

190. "Intento de rebellión social durante el siglo XVI",*in*:*La Nacion*, août 1935.

191. Gregorio MARAÑON,*Antonio Perez*,Madrid,1957,2e édit.

192. José Antonio MARAVALL, "*Las communidades de Castilla, una primera revolución moderna*",*in*:*Revista de Occidente*,19 octobre 1963.

193. Voir les hésitations de Pierre Vilar au sujet du banditisme catalan, *op. cit.* ,I,p. 579 et *sq*.

194. Pino BRANCA,*op. cit.* ,p. 243.

195.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t. IX,p. 193-195.

196. Palmerini,B. Communale Palermo,Oq. D. 84.

197. Luciano SERRANO,*Correspondancia diplomatica entre España y la Santa Sede* Madrid,III,1914,p. 94,29 juin 1569.

198. J. de Zuñiga au duc d'Alcala,15 mars 1571,Simancas E° 1059,f° 73. La révolte se poursuivait encore en février 1573: Silva à Philippe II,

Venise, 7 février 573, Simancas E° 1332, six mille révoltés avec de l'artillerie, le duc se déclare maître de la situation, son état est *quieto*, 10 avril 1573.

199. Jean HÉRITIER, *Catherine de Médicis*, 1940, *p*. 565.

200. *A. N.*, *K*1566, 8 *janvier* 1587.

201. *Simancas E*° 109, le gouverneur de Piombino à Philippe II, 6 *octobre* 1598, R. GALLUZZI, *op. cit.*, III, p. 28 et *sq*.

202. Léon BLANCHET, *Campanella*, 1920, p. 33 et *sq*.

203. J. CVIJIĆ, *op. cit.*, p. 131.

204. B. N. Paris, ital., 1737, Giovanni Mocenigo au Doge de Venise, Paris, 11 mai 1588, copie.

205. A. d. S., Venise, Senato Terra 16, f° 92, 29 janvier 1506.

206. *Ibid.*, 15, f° 188, 16 décembre 1507.

207. *Ibid.*, 37, Portogruaro, 9 mars 1562.

208. J. Delumeau, *op. cit.*, II, p. 551.

209. *Diario fiorentino di Agostino Lapini dal* 252 *al* 1596, p. p. G. O. Corazzini, 1900, p. 310: arrive à Florence, l'11 janvier.

210. *Ibid.*, p. 314.

211. *Ibid.*, p. 315, note.

212.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de* 1623 à 1648, 1963.

213. *Le loyal Serviteur*, *op. cit.* (éd. de 1872), p. 179. Bayard n'est pas d'avis d'accepter, comme le demande l'Empereur Maximilien, de mettre la gendarmerie française à pied et de la faire charger aur côtés des lanquenets pour forcer la brèche: "l'Empereur pense—t—il que ce soit chose raisonnable de mettre tant de noblesse en péril et hasard avec des piétons dont l'un est cordonnier, l'autre maréchal, l'autre boulanger, et gens mécaniques qui n'ont leur honneur en si grosse recommandation que des gentishommes?…". Tout ce passage mis en vedette par Giuliano PROCACCI, "Lotta di classe in Francia sotto l'Ancien Régime (1484-1559)", *in*: *Società*, septembre 1951, p. 14-15.

214. M. SANUDO, *op. cit.*, XL, colonne 59, 9 octobre 525.

215. Bernardino CIRILLO, *Annali della città dell' Aquila*, Rome, 1570, p. 124 v°.

216. *Orazioni politiche*, choisies et p, p. Pietro DAZZI, 1866, discours de Giovani Guidiccioni à la République de Lucques, p. 73 et *sq*. Ce discours n'a, semble-t-il, pas été prononcé.

217. Massimo PETROCCHI, *La rivoluzione cittadina messinense del* 1674, 1954.

218. Weltgeschichte, III, p. 251.

219. A. Communales, Marseille BB 41, f° 45.

220. Federico Rahola, *Economistas españole, de los sigols XVI y XVII*, Barcelone, 1885, p 28-29, B. N, Paris, Oo 1017, in-16.

221. M. Aleman, *Guzmán de Alfarache*, *op. cit.*, I, II, p. 254; pauvres qui arrivent à Madrid "*tras un asnillo cargado de buena dicha*"; Madrid, la ville où l'on fait fortune, Pedro de Medino, *op. cit.*, p. 204 et *sq*.

222. Fernand Brandel, "Vers l'Amérique", *in*: *Annales E. S. C.*, 1959, p. 733.

223. Stefan Zweig, *Les heures étoilées de l'humanité*, Paris, 1939, p. 53.

224. *Novelas Ejemplares*, p. p. Fransico Rodriguez Marin, 1943, II, p. 87 et sq.

225. Voir *infra*, p. 181 et sq.

226. *Gobierno de Viscaya*, II, p. 64-65, 4 août 1579.

227. B. N., Paris, esp. 60, f° 55 (imprimé).

228. *Ibid.*, art. 60.

229. *Ibid.* art. 61.

230. A. d. S., Venise, Senato Dispacci Spagna, V° Gradenigo au Doge, Saragosse, 24 juillet 1586.

231. *Ibid.*, Zane au Doge, Madrid, 30 octobre 1581.

232. *Novelas Ejemplares*, p. p. Francisco RODRIGUEZ MARÍN, 1948, I, p. 133 et *sq*.

233. En Italie le succès du livre de Giacinto NOBILI (de son vrai nom Rafaele Frianoro), *Il vagabundo*, Venise, 1627.

234. Simancas E° 1157, Palerme, 24 février 1590.

235. Marciana, Memorie politiche dall'anno 1578 al 1586, 23 avril 1585.

236.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t. IX, p. 264.

237. A. d. S., Mantoue. A. Gonzaga, série E 1522, Aurelio Pomponazzi au Duc, Rome, 17 mars 1590.

238. A. d. S., Venise, Senato Terra 1, 26 mars 1545.

239. *Ibid.*, Brera, 51, f° 312 v°, 1540.

240.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p. p. FUNCK BRENTANO, 1889, p. 26.

241. A point nommé en Angleterre, la *poor law* fait disparaître les pau-

vres de la rue, G. M. TREVELYAN, *op. cit.*, p. 285.

242. *Mercure de France*, 15 juillet 1939, "La Sicile aux temps préfascistes connut des jacqueries dignes du Moyen Age".

243. G. BUZZI, "Documenti angioni relativi al comune di Aquila dal 1343 al 1344", *in*: *Bollettino della Regia Deputazione abruzzese di storia patria*, 1912, p. 40.

244. E. Albèri, *op. cit.*, II, V, p. 409.

245. L. von PASTOR, *op. cit.*, X, p. 59.

246. Voir *infra*, p. 339.

247.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8, Scipione Alfonso d'Appiano au Prince, Barcelone, 24 janvier 1567.

248. *Ibid.* Mediceo 4897, 1er juin 1565, f° 110 v° et 119. Autres ruptures, *La Méditerranée*…, 1er édit., p. 650, note 3.

249. *Ibid.*

250. P. George, *op. cit.*, p. 576

251. D. Peres, *Historia de Portugal*, V, p. 263.

252. Et non de Florence comme dit le texte. Lutte contre l'État, autodéfense d'une "civilisation" paysanne, sur ces thèmes voir l'admirable livre de Carlo LEVI, *Le Christ s'est arrêté à Eboli*, Paris, 1948.

253. STENDHAL, *Abbesse de Castro*, éd Garnier, 1931 p. 6.

254. *Ibid.*, p. 7.

255. *Ibid.*

256. LANZA DEL VASTO, *La baronne de Carins*, "Le Génie d'Oc", 1946, p. 196.

257. *Op. cit.*, p. 320.

258. Armando ZANETTI, *L'ennemi*, 1939, Genève, p. 84.

259. Baron de Busbec, *op. cit.*, I, p. 37.

260. Mémoire de l'évêque de Limoges, 21 juillet 1561, B. N., Paris, fr. 16 110, f° 12 v° et 13.

261. Simancas E° 1058, f° 107, Notas de los capitulos…(1570—1571).

262. Simancas E° 1338.

263. Salazar à Philippe II, Venise, 29 mai 1580, Simancas E° 1337.

264. Simancas E° 1077.

265. L. von Pastor, *op. cit.*, X, p. 59 et *sq*.

266. Voir notamment DOLLINGER, *op. cit.*, p. 75, Rome, 5 juin 1547.

267.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A. N., K, 3 janv. 1578, Simancas E°107.

268. *Sumario de las provisiones que el Visorey de Napoles ha mandado hacer*; s. d., *ibid*.

269.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9 avril 1578 (reçue le 29 mai), Simancas E° 1077.

270. Le même au même, 17 féve. 1578, *ibid*.

271. E. ALBÈRI, *op. cit.*, II, V. p. 469.

272. B. N. Paris, esp., 127 f° 65 v° à 67.

273. 28 mars 1555, V. Lamansky, *op. cit.*, p. 558.

274. 22 juin 1585, L. von Pastor, *op. cit.*, X, p. 59

275. A. Marcelli, "Intorno al cosidetto mal governo genovese", *art. cit.*, p. 147, sept. 1578 et oct. 1586.

276. Voir *supra*, I, p. 90.

277. H. de Maisse au Roi, Venise, 20, juin 1583, A. E., Venise, 31, f° 51 et 51 v°.

278. *Ibid.*, f° 56 v°, 11 juillet 1583.

279. G. SCHNÜRER, *op. cit.*, p. 102.

280. R. Galluzzi, *op. cit.*, II *Passim*, et t. III, p. 44 et *sq.* Voir *supra*, II, p. 78.

281. *Ibid.*, III, p. 44.

282. *Ibid.*, III, p. 53.

283. *Ibid.*, II, p. 443.

284. L. Bianchini, *op. cit.*, I, p. 60.

285. Marciana, 5837, Notizie del mondo, Naples, 5 mars 1587.

286. Cité par E. FAGNIEZ, *L'Économie sociale de la France sous Henri IV*, 1897, p. 7.

287. R. BUSCH-ZANTNER, *op. cit.*, p. 32.

288. Gilberto FREYRE, *Sobrados e mucambos*, p. 80 et *sq.*

289. Simancas E° 1283, Le connétable de Castille à Philippe II, Milan, 25 août 1597.

290. R. GALLUZZI, *op. cit.*, II, p. 441.

291. *Diario fiorentino di Agostino Lapini*…, 1591, p. 317: histoire de ce Pape que créent les bandits, autour de Forli, dans la personne d'un Giacomo Galli; ils lui obéissent comme s'il était souverain pontife. Il sera pendu avec

un chapeau doré… L'anecdocte est autant politique que religieuse. Pas d'autre détail à signaler à cet égard. Les partisans de l'ordre disent bien que les bandits violent les lois divines et humaines, mais c'est là façon de parler.

292. Ambroise PARÉ, *Œuvres complètes*, 1598, p. 1208.

293. G. MECATTI, *op. cit.*, II, p. 780. Lutte des partis dans l'État Pontifical au temps de Pie V, L. von PASTOR, *op. cit.*, p. XV.

294. *Ibid.*, p. 782.

295. *Op. cit.*, p. 145.

296. 28 mars 1592, Simancas E° 1093, f°12; G. MECATTI. *op. cit.*, II, p. 781(1590).

297. G. MECATTI, *op. cit.*, II, p. 784(1591); Amedeo PELLEGRINI, *Relazioni inedite di ambasciatori lucchesi alla corte di Roma, sec. XVI-XVII*, Rome, 1901: en 1591 poussée de banditisme au voisinage de la frontiète entre Rome et Naples, mesures inefficaces de répression.

298. H. WÄTJEN, *op. cit.*, p. 35.

299. G. MECATTI, *op. cit.*, II, p. 786-787.

300. *Op. cit.*, p. 32.

301. J. B. Tavernier, *op. cit.*, I. p. 2.

302. Angelescu, *op. cit.*, I, p. 331.

303. 11 oct. 1580, CODOIN XXXIII, p. 136.

304. B. N., Pairs, Esp. 60, f° 112 v° à 123 v°(s. d.), 1577.

305. *Ibid.*, f° 350 à 359.

306. Malhechores de Valencia, 1607-1609, Simancas E° 2025.

307. A. d. S., Venise, Senato Dispacci Spagna, P° Priuli au Doge, Madrid, 21 octobre 1610.

308. Jacob van Klaveren, *op. cit.*, p. 54, note 16.

309. Georg FRIEDERICI, *op. cit.*, I, p. 307. Que ferait Sancho Pança de vassaux noirs? mais il les vendrait. Sur la servitude domestique, R. LIVI, *La schiavitù domestica nei tempi di mezzo e nei moderni*, Padoue, 1928. S'arrêtant au XV^e siècle, le livre maître de Charles VERLINDEN, *L'esclavage dans l'Europe médiévale*, I, Péninsule ibérique, France, 1955. Esclavage domestique des noirs à Grenade Luis de CABRERA, *op. cit.*, I, p. 279; à Gilbratar, Saco…, p. 51, 77, 79. L'esclavage disparaît en France dès le XIII^e siècle, PARDESSUS, *op. cit.*, V, p. 260; Gaston ZELLER,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1948, *p.* 22; l'esclave vendu comme une marchandise en Sicile. PARDESSUS, *op. cit.*, V, p.

437.

310. E. GARCIA DE QUEVEDO, *Ordenanzas del Consulado de Bugos*, 1905, p. 206, note.

311. *Op. cit.*, II, III, VII, p. 450.

312. VILLALÓN, *Viaje de Turquia*, 1555, p. 78.

313.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Pyrénées Orientales, B. 376 "*por esser latru e sens amo*".

314. A. d. S. Naples, Notai, Sezione Giustizia, 51, f° 5 (36 ducats, un esclave noir, 1520); f° 244 (35 ducats, une esclave noire, 1521).

315. Alberto TENENTI, "Gli schiavi di Venezia alla fine del Cinquecento", *in*: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1955.

316. A. d. S., Mantoue, E. Venezia, 16 juin 1499.

317. A. d. S., Florence, Mediceo 2080.

318. SANUTO, *op. cit.*, XI, col. 468, Palerme 3 sept. 1510.

319. A. d. S., Florence, Mediceo 2077, f° 34, 9 avril 1549.

320. François Simiand, 1873-1935, philosophe, sociologue, économiste, historien, a été le maître à penser des historiesn français, l'un des grands orienteurs, à côté de Marcel Mauss, des sciences sociales en son pays. Ses principaux travaux: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3 vol., 1928-1930; *Le salarie, l'évolution, sociale et la monnaie*, 3 vol., 1932; *Recherches anciennes et nouvelles sur le mouvement gérèral des prix du XVI^{e} au XIX^{e} siècle*, 1932; *Les fluctuations économiques à longue période et la crise mondiale*, 1932.

六　各种文明

文明是地中海最复杂、最矛盾的角色。它们在刚刚被人承认具有某种性质的时候，又获得另外一种与这种性质截然相反的性质。各种文明之间亲如兄弟、宽容大度；它们接受别人来访，也进行回访；它们虽然爱好和平，但也同样好战；它们令人惊奇地固定不变，但同时也移动飘流；它们的表面受到成千上万个漩涡搅扰；它们的日常生活的细小的微粒受着毫无规律可言的“布朗运动”的支配。文明就像沙丘一样，牢牢地固定在土地的隐藏着的断层上。沙粒听任大风扬起，飘来飘去，被吹集成堆。但是，沙丘这个无数运动的固定不变的总量，仍然留在原处一动不动。

马塞尔·莫斯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概述的优点，[1] 毫无疑问就在于让人注意到这些文明固有的能动的、运动的性质和像强烈的光线那样可以变化的性质。可能他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突出它们的稳定不变性来。在各种文明的生命中变化着的、运动着的就是这个生命的精华和全部吗？毫无疑问不是。这里我们又会遇到结构和机遇、形势之间的，瞬间和长时段甚至和很长时段之间的对话。一种文明既不会由于那种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自身要完成的事物的粗暴力量，也不会由于那种完全听任历史的偶然性和好意摆布的惰性力量，也不会由于那种被最广泛地散布的、被最贪馋地吞下的宣传教导，而能够明显地侵越、影响另外一种文明的范围。从根本上说来，事物的某种形式、某种格局总是预先已经决定。北非

不是在1962年3月“背叛了”,[2] 而是早在8世纪中叶,甚至可能在耶稣基督诞生以前,在东方的女儿迦太基建立时,就“背叛”了西方。[3]

1. 各种文明的多变和稳定

发展变化和静止不变两者互相伴随,互相补充,互为因果。我们可以不冒迷误的风险通过一种或者另外一种途径来研究地中海的各种文明,通过表面上看来最荒诞不经的途径,通过它们的乍一看最无意义的方面来研究这些文明。这个方面是细小的琐事和每天偶然发生的事件的混合物。它像尘土积成的云一样从任何一种活的文明升起。

社会新闻和轶事的意义

这些细小的琐事[4] 比长篇论文能够更好地说明地中海人的生活,一种变化无常的、从各个方向被命运之风驱动的生活。1598年,在地中海某处的一艘大型帆船上,一个来自圣马格里塔的热那亚旅客向一个拉古萨老板吐露了他的隐情。这个旅客是一个拉古萨人合法的指定遗嘱执行人。这个拉古萨人在波托西死时非常富有。他委托这个热那亚旅客在梅佐寻找他的继承人。梅佐是个位于拉古萨附近海上的小岛。该岛是培养远洋航行船舶的船长和水手的场所。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经过调查,合法的继承人全部找到。[5] 关于下面另一个拉古萨人的情况我们知道得比较少。他名叫布拉斯·弗朗西斯科·科

尼奇,也定居秘鲁。威尼斯对他十分关注,因为1611年年底[6]他拥有一艘大型帆船“圣玛丽亚·德尔·罗莎里奥·埃·瓜德罗奇”号所装载的货物的一半。威尼斯市政会议进行报复,扣押了这艘船。另外一则社会新闻:拉古萨还发生一起证明某人死亡的事。死者是一艘大型帆船的船长,与1596年菲利普派出对付英格兰的那支舰队同时遭到灭顶之灾。法庭听取这个失踪者在出发远航前写给他妻子的信。这封信10月15日寄自里斯本,读起来真像一份真正的遗嘱:“今天我们驶往爱尔兰。上帝知道谁还能够从那里归来。”写信的人后来没有返回。[7] 还有另外一件事,但发生在热那亚。一个当时身份用拉丁文填写为 Pompeus Vassalus quondam Jacobi 船长的人,在庄严的赎回奴隶事务处长官面前就波多菲洛的马泰奥·福尔特的推定的死亡作证。他说:“我去年从5月到9月11日在埃及。我在所说的地点询问过好几个人亚历山大的‘贝勒’的帆桨战船上的奴隶马特奥·福尔特是否还活着……因为这个名叫马特奥的人在我的房屋附近有一所房屋,我想把这所房屋买过来。认识他的人全都说他已经在好几个月以前死了。那里有一些来自拉巴洛的认识他的奴隶。”[8]

一个来自博季亚斯科、在阿尔及尔被俘的名叫杰罗尼莫·坎波迪梅利奥的热那亚人的险遇,也是一则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社会新闻。这个人1598年50来岁。他的被俘日期和他过去在阿尔及尔的老板的名字,都没有查清。这个老板临终时赠给他一片店铺。正在这个时候,有人看见他出现在街上,穿着打扮得像土耳其人一样。一个人肯定说他娶了个女穆斯林。“我想他是放弃了宗教信仰,不想回来了。”[9]这是一个比料想的更经常发生的故事的结

论。事实上，甚至根据当时一个作家的说法，[10]基督教徒成千上万地改变信仰，投向土耳其人和伊斯兰世界。各种伟大的文明，或者各个强有力的政府，抵制这种现象，与之进行斗争，赎回它们误入歧途的孩子。单个的人通常则比较随和。后来逐渐制订了一项正式的法规来对付这些背教者。16 世纪，他们已经不受递夺公权的处分。一个居住在突尼斯的背教者甚至用有利于他在锡拉库萨的兄弟的方式处置他的遗产。[11]1568 年，一个名叫弗赖·路伊斯·德·桑多瓦尔[12]的人甚至向地中海的基督教君主、王侯们主动提出一项庞大的赎罪方案：将对这些迷路的人进行赦免。这样就会终止他们加给基督教世界的无穷祸患。在这期间，每个背教者都可不冒任何风险回到家里。威尼斯人加布里埃尔·祖卡托的情况就是例证。1572 年，他被塞浦路斯的征服者俘虏，并且沦为奴隶。35 年后，即 1607 年，他回到威尼斯，回到最神圣的信仰上来并要求得到一个经纪人的职位。鉴于他一文不名，懂希腊文、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甚至还能用土耳其文写作"，他的这项请求被五贤人接受，然而，改宗伊斯兰教就是背弃了原来的宗教信仰。[13]

不管怎样，地中海的这两种伟大的、敌对的和相邻的文明，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彼此不断的接触变得友好起来。在阿尔及利亚人于 1540 年对直布罗陀进行的那场失败的进攻中，80 名基督教徒落到阿尔及尔海上行劫者手里。警戒解除，惊恐消失后，按照惯例进行谈判。缔结了类似停战协定的条约后，进行正式会谈。阿尔及利亚的船只驶入港内，水手登陆，在城里游逛，和他们的老相识——过去的俘虏或者过去的老板——重逢，然后到下等咖啡馆或者小酒店去吃饭。这时，市民帮助运输淡水，向阿尔及尔舰队提供

给养。[14]大家友好亲善,互致良好的祝愿。这种友好亲善或许可以和在同一条战壕里作战的士兵之间的那种兄弟般的感情相比。可以想想,有谁愿意在两种敌对的宗教之间有一块密不透风的隔板呢?人们来来往往,对国家或者信条形成的边界漠然置之。他们知道存在着航海和贸易的需要、海上行劫和战争提供的偶然的机会、彼此串通的机会或者时机和环境促成的背叛。由此而产生了层出不穷的例如梅勒克·亚萨那样的险遇。这个改宗伊斯兰教的拉古萨人于16世纪初在印度又被人找到。那时他正负责防守第乌岛对抗葡萄牙人(他占有这个职位好几年)。[15]三个西班人的险遇也可作为例证。1581年,一艘来自阿斯特拉罕的英格兰小轮船在里海的杰尔宾特收容了这三个西班牙人。这艘英格兰船由莫斯科公司每两年或者每三年租用一次。这些西班牙人毫无疑问是背教者,是土耳其军队的逃兵,七年前在拉古莱特被俘。[16]他们的奇怪的故事真是无独有偶,1586年,英格兰船"大力神"号把德雷克在西印度释放的20名土耳其人带回土耳其。这是在叙述这艘驶往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帆船的航行故事的一个插曲中简短地提到的一个细节。[17]

17世纪初发生了同样的险遇。1608年,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朱里亚奥的人一直被囚禁在里斯本的S.朱里亚奥·达·巴拉的城堡中。他被俘时已经受过洗,[18]过去统率过在梅林德海岸附近的土耳其帆桨战船。1611年,波斯人俘虏了在首相穆拉德帕夏的土耳其军队里的3名法国人和1名德意志人。上帝才知道这些人是怎样去土耳其的。当然,不管怎样,他们总是经过了君士坦丁堡的驿站。此外,波斯人还俘虏了一个出生于塞浦路斯的希腊人。

他们全都受到胜利者的宽宥，然后由伊斯法罕的嘉布遣会修士收容。[19]

最后一个例子是一个名叫康斯坦丁·费尔贡的希腊冒险者在17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的命运。这个人生于凯法利尼亚岛，自称是某个威尼斯贵族的儿子，后来深受暹罗国王宠信，在暹罗“一切都由他经管……”[20]

文化财产怎样旅行

人旅行，文化财产也旅行。既有日常的旅行，也有最料想不到的旅行。文化财产随着旅客的不断流动，某年被某些旅客带到这里，下一年或者一个世纪之后又被其他旅客从这里带走。这些财产往往由无知的人的手来运输、抛弃、重新拾起。多瑙河流域各地的第一批用于翻印东正教的虔诚的教理的书籍的印刷机是门的内哥罗的商贩16世纪初从威尼斯或者从威尼斯属地[21]带到那些地区去的。1492年被驱赶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在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创办并经营全部该地恰好短缺的货品的商业。他们开办五金铺，[22]安装首批使用拉丁字母、希腊字母或者希伯来字母的印刷机（要等到19世纪[23]才出现首批使用阿拉伯字的印刷机）。他们建立了毛纺厂[24]和锦缎织造厂，并且据说还制造了首批活动炮架。[25]这种炮架使苏里曼大帝的军队能够用野战炮装备起来。这是这支军队能够克敌制胜的原因之一。查理八世在意大利1494年作战时使用的炮架可能是这些炮架的样品……[26]

但是，大部分文化财产的转移是在不知道谁是转运者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些转移的数量是如此之大，其中一些的速度是如此之

快,而另一些的速度又是如此之慢,它们的方向路线是如此曲折多变,以致在这个什么也不会留在原处、永远乱七八糟的巨大货站上,人们无法辨明方向。如果能够在这些行李中辨认出一件,就会有一千件无法辨认。在这些无法辨认的行李中,有的地址、标签短缺;有的有包装物而无包装的内容;有的却又只有包装内容而无包装物。当问题在于艺术品时,在于贝叶教堂[27]的墙角饰时,在于一幅在西奈[28]重新发现的加泰罗尼亚的画时,在于在埃及验明的巴塞罗那的铁饰或者在于一些16世纪在阿索斯山的修道院,在意大利或者德意志的影响下完成的奇怪的图画时,人们想对一切重新加以整理,这还行得通。当问题在于实质性的货品,例如日常用词或者地理用词时,这也还行得通,因为对这些进行检验,虽然是不可靠的,但至少是可能的。但是,当问题在于思想、感情、技术时,什么样的错误都可能产生。我们难道会认为16世纪的西班牙的神秘主义能够通过像雷蒙·吕尔的折衷主义的思想那样的假设的中介[29]追溯到伊斯兰教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吗?我们难道会认为西方的韵脚来自西班牙的信奉伊斯兰教的诗人吗?[30]我们难道会认为武功歌的内容(这是可能的)借自伊斯兰教吗?让我们既要提防那些把行李辨认得过分清楚的人(例如认为我们的行吟诗人使用的词来自阿拉伯的人),[31]也要提防那些出于对抗,当人、思想、生活的艺术、信仰、爱的方式等等正在地中海进行交换的时候,把一种文化和另外一种文化之间的互相仿效、借取的事物统统都加以否定的人。

吕西安·费弗尔[32]在一篇消遣自娱、引人入胜的文章里,想象了希罗多德如果今天旧地重游,对在我们看来构成地中海国家特

征的植物群会感到多么惊讶。这种植物群中有:阿拉伯人从远东输入的橘树、柠檬树、桔子树,来自美洲的仙人掌,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树(这种树征服了葡萄牙和叙利亚之间的整个地域。现在,飞行员说,能够根据桉树树林辨认出克里特岛),来自波斯的柏树,可能从秘鲁移植来的西红柿,来自圭亚那的辣椒,来自墨西哥的玉米,“阿拉伯人带来的恩惠”——大米,来自伊朗的原来是“中国山区居民后来变成伊朗山区居民”的桃树、菜豆和马铃薯,柏柏尔的无花果树、烟草……这张表既不完全,也没有完结。关于原系埃及土产,[33]后来又离开埃及漂洋过海的棉花的迁移情况,可以辟出整整一章来加以叙述。一项示明玉米这种原产于美洲的作物怎样于16世纪来到地中海的研究,也会受到人们欢迎。18世纪伊尼亚奇奥·德·阿索错误地假设玉米是有两个来源的植物。他认为,这种植物毫无疑问来自新世界,但在12世纪也经过阿拉伯人之手来自东印度群岛。[34]咖啡树1550年就已经存在于埃及。至于咖啡,它在将近15世纪中叶到达东方。非洲某些部落的人吃烤咖啡种子。咖啡作为饮料从这个时期起在埃及和叙利亚为人所知。1556年在阿拉伯的麦加禁止饮用这种伊斯兰教苦行僧的饮料。将近1550年,咖啡传到君士坦丁堡。1580年,威尼斯人把它输入意大利。在1640年和1660年之间,它传入英国。在法国,它1646年首先在马赛出现。以后,将近1670年,它在宫廷出现。[35]至于烟草,它从圣多明各传到西班牙。1559年,甚至可能早在1556年,这种“美味的烟草”随同特韦特 经过葡萄牙到达法国。[36]1561年,尼科从里斯本把烟草粉寄送给卡特琳·德·梅迪奇治疗偏头痛。[37]这种宝贵的植物很快就越过地中海的空间。将近1605年,它抵达印度。[38]在穆斯林国

家它经常遭到禁止。但是,1664 年,塔韦尼埃看见索非自己也在抽烟斗。[39]

这张小趣事表还可以延长。小亚细亚的悬铃木 16 世纪在意大利出现。[40]稻米的种植 16 世纪也引进尼斯地区和普罗旺斯沿海地区。[41]在我国叫做“罗马莴苣”的莴苣,是由一个名叫拉伯雷的旅客带到法国的。我们经常引用他的书信的那个布斯拜克从安德里诺普尔带回第一批丁香。这些丁香在维也纳借风力之助长遍该地的整个田野。进一步的验证并不会对已经清楚明白的事物增添什么东西。这一已经清楚明白的事物就是地中海各种文明的混合搅拌的巨大程度和广阔范围,这种混合搅拦现象因这个混合地区的文明的组群从一开始起就种类繁多而产生更多的重大后果。在一个地区,这些文明的组群由于以或长或短的时间间隔互相交换和互相借用,往往清楚明显。而在另一个地区,它们混在一起,特别嘈杂拥挤。这些嘈杂拥挤的景象,令人想起那些东方的港口。正如我们的浪漫主义作家向我们描绘的那样,这是一个各种民族、各种宗教、各种类型的人以及地中海世界所能包含的头饰、时装、烹饪、风俗等方面的各种事物的聚集场所。

泰奥菲尔·戈蒂埃在其所著《君士坦丁堡旅行记》一书中细致地描绘了每个中途停靠港的这种大规模的假面舞会的景象。最初读者还分享他的这种消遣自娱之乐。之后,读者无意之中突然发现自己阅读这本书时会跳过书中必然会有的描写,因为这种描写总是千篇一律、陈腔滥调。到处是同样的希腊人、同样的亚美尼亚人、同样的黎凡特人、同样的犹太人、同样的土耳其人、同样的意大利人……当人们仔细观看热那亚、阿尔及尔、巴塞罗那和亚历山大等

的港口区的虽然不那么生动但仍然活生生的景象时，便会有个文明显然不巩固的印象。但是，历史学家如果想弄清楚这个错综复杂的现象，就最容易弄错事实，产生迷误。历史学家认为萨拉班舞是古老传统的西班牙舞蹈。他们接着又发现这种舞蹈在塞万提斯[42]时代才刚刚出现。他们把捕金枪鱼想象为热那亚水手、那不勒斯人、马赛人或者科西嘉海角的渔民特有的劳作活动。事实上，阿拉伯人也捕这种鱼，并在将近10世纪时把这种劳作活动传给别的民族。[43]总之，历史学家几乎准备遵循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的观点，[44]认为真正的地中海种族是居住在混杂的、有世界性的港口内的种族（现在只举出其中的大港：威尼斯、阿尔及尔、里窝那、马赛、萨洛尼卡、亚历山大、巴塞罗那、君士坦丁堡），是一个把所有的种族合并为单一种族的种族。但是，这难道不是一种荒诞不经之谈吗？混合本身就必须以成分的多样性为前提。混杂现象就证明并不是一切都融合在一个单一的群体中，就证明存在着各不相同的成分，就证明当人们远离这些各不相同的成分随意混杂交错在其中的庞大中心时，人们就重新发现这些成分是孤立的、可以辨认出来的。

传播和拒不借用

除了能够把自己的货品输出到远方、能够发扬光大的文明之外，不存在任何别的文明。一种不输出人、不输出思想或者生活方式的文明，是不可想象的。曾经有过一种阿拉伯文明，它的重要性和衰退已经为人所知。曾经有过一种希腊文明，它至少保住了自己的本体。16世纪存在过一种拉丁文明（我不再称之为

基督教文明)。在与海进行斗争时,这种文明是所有文明中抵抗力最强的文明。它光芒四射,越过地中海的空间,向前移动,并且通过地中海向欧洲的深处,向大西洋和海外移动。这种历时达几个世纪之久的传播,也是造船能手意大利人即将传授给葡萄牙,并且一直传授给波罗的海地区的造船技艺的传播,也是意大利人最先获得然后示范传授的丝织技艺的传播,也是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佛罗伦萨人等经商年代久远的商人先于北欧人很久就创立出来的会计技术的传播。这种传播也是意大利和地中海的女儿——人们能够了解它在欧洲的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文艺复兴——的巨大反响的传播。

对于一种文明来说,活着就是既能给予又能收受和借用。借用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想借用的人不能都像师傅那样得心应手地使用采用的工具。地中海文明的重大借用之一,毫无疑问是由德意志师傅传入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直到果阿的印刷术。

一种文明有时拒绝借用。它反对某些联合。它在交换者向它提供的交换物中进行选择(如果没有警惕,或者更简单地说,如果没有脾性和倾向的不相容性以及口味爱好的不相容性,交换者往往会把这些交换物全部强加给它)。从这些现象中也可辨认出这是一种伟大的文明来。只有乌托邦主义者(16 世纪有一些例如纪尧姆·波斯特尔这样的可敬的乌托邦主义者)才会梦想把各种宗教合为一体。在构成每种文明——这是财富、力量和制度的合成物——中,宗教正好是最属于个人的和最具有抵抗性的东西。把各种宗教部分地混合在一起,把某种思想从一种宗教移植到另外一种宗教里,甚至在必要时把一种宗教的某一教义或者仪式移植到另

外一种宗教里，这是可能的。但这同把它们混合为一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拒绝借用吗？16世纪提供了这方面最光辉的范例之一。百年战争甫告结束，天主教就经受了宗教狂热的浪潮的冲击。在这些狂涛巨浪的猛烈冲击下，它像一株树皮爆裂的树那样折断碎裂了。在北欧，宗教改革运动席卷德意志、波兰、匈牙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英格兰和苏格兰。在南欧，在传统上被称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的这场运动和很多人称之为巴罗克文明的文明发展兴盛起来。

当然，始终存在着一个北欧地区和一个地中海地区。这是两个用绳索捆绑在一起，但因各自有自己的天空、自己的中心，以及从宗教上讲，各自有自己的灵魂，因而判然有别的世界。这是因为在地中海地区人们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宗教感情：这种方式正如它过去曾经使蒙田在意大利[45]或者圣古阿尔大使在西班牙[46]感到震惊不快一样，正如它过去被耶稣会会士或者穷人的耶稣会会士亦即嘉布遣会修士，把它传入西欧时曾经使整个西欧感到震惊不快一样，今天仍然使北欧人震惊不快。甚至在像弗朗什—孔泰这样的深皈天主教的地区，苦修修士的仪式行列、新的弥撒和祈祷活动、南欧的虔敬行为中的色情的、富于戏剧色彩的以及对法国人的口味来说超过限度的事物，都使很多冷静审慎、明哲理智的人大为愤懑。[47]

尽管如此，新教仍然把几个锐利的尖头推入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地区，[48]推入中央高原，推入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地区，推入贝亚恩的比利牛斯山地区。然而，它最后却在地中海地区的边境处处

遭到失败。拉丁文明在经过犹豫不决和使它的拒绝变为更加具有特征的猛进之后，对“山的彼侧”的宗教改革回答了一个“不”字。如果说路德教派的某些思想观点或者后来的加尔文教派的某些思想观点能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争取到一些信徒的话，这些思想观点也只不过能使个别人或者个别狭小的团体感到兴趣而已。这些人几乎总是已经长期生活在国外的人：教士、大学生、书商、小手工业者以及把禁书藏在货物包里带回国内的商人，或者是(马塞尔·巴塔荣在他的《伊拉斯谟与西班牙》一书中提到)把自己的信仰的根深深扎进自己的那块土地里的人。这块土地他们不借自任何人。这块土地就是伊拉斯谟信徒在西班牙、瓦尔德信徒在意大利耕耘的土地。

宗教改革在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失败，难道像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是政治问题，是统治问题，是精心组织策划的镇压产生的后果吗？谁也不会低估有计划的、长期的迫害的影响。因阿尔贝公爵和他的继承者使用冷酷无情的严厉手段而大部分再度天主教化的荷兰的例子，必要时将会使我们免犯这种低估的错误。但是，我们也不要高估西班牙的和意大利的“异端”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不能把它们比作北欧的各次声势浩大的运动。这里只提出这样一个区别来：新教在地中海并没有深深触及民众。新教是精英人物发动和进行的一场运动，而且，在西班牙，这次宗教改革往往在教会内部进行。西班牙的伊拉斯谟信徒也好，那不勒斯的瓦尔德信徒小派别也好，都不比法国的纳瓦尔的玛格丽特的小派别更企图同天主教会决裂。

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之所以像埃马纽埃尔·罗马卡纳基所说的

那样，“不是一场真正的宗教叛乱”，它之所以仍然“谦恭、沉思、对教皇毫无侵犯性”，它之所以反对暴力，[49]那是因为它大大超过一次“宗教改革”，是一次基督教的复兴。“改革”这个词是不适当的。危险或者勉勉强强称得上是危险的危险，只在皮埃蒙特由于沃多瓦派教徒[50]的缘故发生过（但是皮埃蒙特是意大利吗？），只在弗拉拉的勒内·德·弗朗斯的宫廷中发生过，只在那里的最富有的丝绸制造商从1525年起[51]就欢迎宗教改革的卢卡发生过；只在将近同一时期在那里召开过几次大会[52]的克雷莫纳发生过，只在殷勤接待北欧人、将近1529年方济各会修士或者奥古斯丁教派僧侣在那里建立了包含相当多手工业者的小组的威尼斯发生过。[53]在意大利的别的地方，宗教改革是个人的事。它的历史是一部收有“锡耶纳人”奥基诺的丑闻之类材料的历史。目睹这位先生1547年[54]抵达英格兰的德·塞尔韦指出，这位昔日意大利的大名鼎鼎、口若悬河的天主教的讲道者，今天在英格兰已经改而信奉、依从“德意志人的新观点”了。其次，进行改革的往往是巡游牧师。[55]这些人只不过路过某地，在途中撒播改革的种子而已。种子发芽后，庄稼长势很差。进行改革的还是一些离群索居的人、沉思冥想的人、命运颇不寻常的人。在从事改革的人中，有翁布里亚人巴尔托洛梅奥·巴尔托乔[56]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这个人在日内瓦开店经商，在一次去热那亚旅行时被捕，后被解送罗马宗教法庭并于1569年被处以火刑。从事改革的还有像于1600年[58]在坎波—德尔费奥里被处以火刑的季奥尔达诺·布鲁诺[57]那样卓越的被害者。

最后，让我们不要根据天主教的和教廷的焦急不安来判断新教在意大利形成的危险。这种焦急不安的情绪易于夸大这种危险。

这种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致1568年夏天人们担心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会南下意大利。据说，这些胡格诺派教徒将会发现意大利半岛的内部已经被折磨得到了危险的程度。[59]根据这种焦急不安的情绪来判断，就等于根据贡扎洛·德·伊列斯卡斯、帕拉莫、略伦特、卡斯特罗或者J.马克·克里等人[60]的著作来判断新教在西班牙形成的危险以及宗教裁判所的功劳或者罪行。

西班牙的宗教改革(如果确有宗教改革的话)局限于两个地点：塞维利亚和巴利亚多利德。1557—1558年镇压过后，宗教改革是一些孤立的个别事件。进行改革的往往是些普通疯子，例如埃尔南德斯·迪亚斯这样的人。摩勒纳山的牧人对他谈过塞维利亚的新教徒。他记住了这些牧人对他谈的那些足以使托莱多的宗教裁判所于1563年逮捕他的内容。[61]再者，他是个感到满足的疯子。他很高兴在狱中吃肉比在家里吃得还多。几个真正的西班牙新教徒走遍全欧，不断迁徙，从一个避难处到另一个避难处。著名的米歇尔·塞尔维和1578年在日内瓦"研究教派"并因可能准备来西班牙讲道传教或者可能准备向印度运送宣传书籍而被人向胡安·德·韦尔加斯·梅克西亚大使告发的大约12名流放者就是这样的人。[62]

西班牙当局的确厌恶并且密谋打击这些步入歧途的孩子。宗教裁判所同他们进行斗争，颇得民心。它对米歇尔·塞尔维进行缺席审判之后，紧接着又予以热情关怀。这件事事关国家民族的荣誉。[63]当1546年阿隆索·迪亚斯在多瑙河沿岸的诺伊堡命令他的一个仆役处决他自己的那个玷辱了他的家族和整个西班牙的兄弟胡安时，正是同样一种感情在驱使他。[64]因此，怎样来谈西班牙的

宗教改革呢?谈论这个问题,差不多就像人们就圣布莱士城的那个在1540年表示既不相信有地狱也不相信有天堂的异教徒弗朗西斯科·扎科的事,笼统地谈拉古萨的宗教一样,或者像谈根据拉古萨的历史学家拉齐的继承人的看法曾经在1570年出现过的“新教的倾向”一样。[65]因此,这样谈是不现实的。这已经不再是普通疗法,而是顺势疗法了。

一个名叫德利奥·康蒂莫里[66]的历史学家寻思:到目前为止,人们研究意大利宗教改革的历史都是通过研究人物传记的细节来进行的;这部历史当它根据法国和德国的模式被重新置于它萌芽的社会环境中时,是否会变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当然是这样。很久以前,爱德加·基内[67]曾经作过与此相同的思考。不过,如果问题被作为一个文化问题提出来探讨论述,它就会更加清楚明白了。意大利拒绝接受宗教改革,这同西班牙拒绝接受宗教改革相类似。这种拒绝在人种志的意义上难道不就是拒绝借用吗(这种借用正是文明的主要特征)?其所以拒绝借用,并不是因为意大利像好多肤浅的观察家所发现的那样,是“不信教的”,而是因为在意大利和在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地区,在天主教的老树上上升的液汁结出的是意大利的花和果,而不是德意志的花和果。被人称为反宗教改革的(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认为的话),正是它的宗教改革。人们注意到南欧国家被阅读《旧约全书》这种活动吸引的程度低于北欧国家。[68]南欧国家与北欧国家不同,没有被16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从德意志一直漫溢到阿尔卑斯山和西班牙北部的那股巫术的巨浪淹没。[69]或许由于一种隐藏着的古老的多神教的缘故,地中海的基督教徒甚至在他们的迷信活动中也喜爱对圣徒的崇拜。当外

界的攻击趋于激烈时，对圣徒和对圣母的虔信更热烈起来。这种现象难道是偶然的吗？把这件事看成罗马或耶稣会教士的花招阴谋，纯系虚妄不实之见。在西班牙是天主教加尔默罗会白衣修士传播对圣约瑟夫的崇拜。《玫瑰经》的民众团体到处支持、赞扬对圣母的热烈崇拜。季奥瓦尼·米克罗这个那不勒斯异端分子就是人证。1564 年，他宣布抛弃对大量宗教事物，其中包括对圣徒和圣物的信仰，但继续信仰圣母。[70]这件事甚至就发生在西班牙完成了为自己制造光辉的和好斗的圣徒：圣徒乔治、圣徒雅克[71]的时刻。另外一些圣徒随之而来：圣徒埃米利安、圣徒塞巴斯蒂安和那个名声一直远扬到加泰罗尼亚的农民圣徒伊西德罗。[72]

因此，当时的拒绝借用是蓄意的、断然的。关于宗教改革，有人说："这次改革闯进了中世纪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神学领域，正如野蛮的日耳曼人闯进了希腊罗马的文化一样。"[73]不管怎样，拉丁海海边的罗马帝国剩下的事物，在 16 世纪比在 5 世纪更有抵抗力。

希腊文明曾经残存下来吗？

希腊文明本身并没有在这个时代死亡。证据就是它也能够同样断然"拒绝借用"。虽然在 15 世纪它已气息奄奄、濒临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已受到死亡的威胁，但仍然拒绝与拉丁教派结合。16 世纪，问题再度提出。它仍然同样坚决拒绝借用。不幸得很，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东正教国家了解之差并不亚于对这个时期的土耳其的了解。一系列奇怪的文献资料（发现于威尼斯并由拉曼斯基发表于他那内容十分充实的文集中）在

好多年以后仍然等待某个历史学家去解析阐明它的含义。这一系列文章说明了 16 世纪的希腊人面对罗马的天主教时的奇怪的处境。[74]

1570 年，一个希腊人——一个干地亚的或者摩里亚的绅士，向威尼斯作了好几个长篇报告。他主动效劳，进行解释。他说，对希腊的几个邦国来说，进行叛乱，起来反对土耳其的时刻已经来到。这场叛乱只能依靠基督教世界，特别是依靠威尼斯。不过，基督教世界必须预先了解希腊人。然而，基督教世界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希腊主教们曾经不得不忍受多少愚蠢的欺侮和凌辱啊！天主教教士在威尼斯的所有属地上始终对希腊主教们采取轻蔑的态度。这些天主教教士往往只力求用武力把他们从"迷误"中解救出来，禁止或者强加某种宗教仪式，企图禁止在教堂里使用希腊语。然而，这些希腊人宁愿投向土耳其人而不向天主教屈服。他们的确这样行事。他们几乎始终同土其人结成联盟来反对威尼斯人，反对地中海西部的海上行劫者。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土耳其人通常宽宏大量，他们从不企图使别人改变宗教信仰，从不阻碍从事东正教的宗教活动。在一般情况下，希腊教士就这样置身于威尼斯的，以及总的说来，西方人的最顽固的敌人之列。每当反对君士坦丁堡的主人的叛乱在酝酿的时刻，希腊教会的成员总是居中调停，使人们恢复冷静，并且向大家解释，希腊民族的继续存在有赖于这种冷静。

我们的消息资料提供者继续写道，今天，之所以有人准备举起叛乱的旗帜，是因为自从将近 1570 年以来，一股不容忍异教的浪潮开始淹没土耳其的各个地区；一些教堂遭到劫掠；一些寺院遭到

焚毁;一些神甫受到凌辱……对威尼斯来说,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来到。但是,它只有一条通向成功之路:同东正教的大主教和平相处;向他们保证,天主教教士将奉命将来决不使希腊教士感到丝毫不安。一个与威尼斯有商务关系的人还自告奋勇,居中斡旋,但他坚持要了解威尼斯是否真的准备信守自己的诺言以及在什么情况之下胜利在他看来是有保证的。

只要读读拉曼斯基的文集所收集的与过分热心积极的威尼斯神甫或者僧侣在干地亚或者在塞浦路斯煽起的大量事件有关的文献资料,就会相信希腊教会所表达的抱怨不满的情况确有其事。人们可以明白干地亚人和希腊群岛的其他希腊人被西方指控同别人勾结并且"叛变"到底是怎么回事。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往往憎恨天主教徒,他们因此常被指控背叛天主教徒。但是,显然还有另外的原因,例如:一个从他受雇的土耳其船在希腊港口登岸的希腊水手在陆上探望他的家人时,会从家人那里了解到所有可能得到的关于刚刚驶过的威尼斯舰队的详情细节,或者关于前一天在中途停泊港停留的地中海西部海上行劫者的详情细节,他也会向人讲述这些详情细节。即使这艘土耳其船是海盗船,停泊港是威尼斯的属地,情况也是这样。(正如情况经常是这样一样。)但是,根本的理由还是把拉丁文明同东正教文明分开的那种敌意。

永存的事物和文化边界

事实上,在改变、掀翻或者搞乱各种文明的那些变化之外,还显现出一些令人惊奇的永存的事物。作为个人的人能够背叛文明,但是文明仍然钩挂在几个固

定的、几乎经久不变的点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下去。

J. 茨维杰奇在思考山形成的障碍时说，山对人种的渗入进行的对抗，“小于对产生于人类活动的运动和对文明的潮流进行的对抗。”[76]这种思想经过正确的解释和可能的修改后，似乎是正确的。对作为单个人的人来说，一切逾越、攀登、探索和一切转移都是准许的。当他是一个单个的人，用他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的时候，什么也阻挡不了他，阻挡不了他本人和他搬运的货品，不管这些物品是物质的或者精神的。如果是一个组，是一个社会群体，移动就变得困难起来。一种文明不能同它的全部家什财物一起迁移。个人在越过边界时就会感到身处异域、陌生而且不习惯。他于是“背叛”他的文明，把文明抛在身后。

这是因为这种文明实际上牢牢地固定在确定的地理区域内，而这个地理区域又是这种文明的实在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种文明在成为它的艺术的各种表现共有的(尼采把艺术看成是文明的主要真实，可能是因为尼采和他的同代人使真实成了质量的同义词)同一性之前，在根本上存在于一个由人和历史构成的地理区域里。因此，存在着文化边界，存在着异常持久的文化区域。世界上的任何异种杂交都不能够改变这些边界和区域。

因此，地中海被文化边界——主要的文化边界和次要的文化边界——切割开来。这些边界全都是无法愈合的但又起着作用的伤痕。J. 茨维杰奇在巴尔干这一大片地区辨识出三个文化地区。[77]在西班牙谁会对贯穿托莱多的纬线的两侧的鲜明对比不敏感呢？这个半岛的心脏——一个混合体——就在托莱多。在北面是半独立的小农和隐居在自己的外省小城市里的贵族的贫困的、艰苦的

西班牙;朝南是开发垦殖的移民地,这是平时人们愿意看到的唯一的西班牙。这是基督教徒在那里发现了精巧的深耕细作的农业、有组织的大庄园、大批勤劳的农民和大量代代相传的遗产的西班牙。基督教徒没有破坏这些遗产。

在地中海地区的边缘和心脏地带,呈现出更加宏伟壮观的景象。地中海世界最主要的边境,仍然是罗马帝国在欧洲的古老的边界线,即沿莱茵河和多瑙河的那条线。这条线将是16世纪天主教复兴的前进线。这条线是新的罗马帝国长城。沿着这条线将会出现耶稣会会士的团体和他们的那些门窗有大括号形装饰的教堂的圆顶。罗马和宗教改革运动之间的分裂正好沿着这道古老的伤痕产生。这就是比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更给予莱茵河边境以"庄严"[78]的性质的事物。16世纪的法国夹在罗马的这条前进线和新教的推进抵达得最远的比利牛斯山线之间。被两方撕裂为二的法国将再一次承受它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后果。

但是,地中海的各个国家最奇怪的伤痕是东西方之间,在我们已经提到的海上障碍之外的一道无法移除的障碍。这道永恒的障碍蜿蜒于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在位于德林河河口的勒什(阿勒西奥)以及达尔马提亚海岸和阿尔巴尼亚海岸的连接处[79]那里,从亚得里亚海岸中经内舒斯、雷米西亚纳和拉蒂亚拉等古城直抵多瑙河。[80]迪纳拉阿尔卑斯山的整个大片地区,从被罗马帝国西部控制的、宽阔的高地山谷通向那里的潘诺尼亚平原起[81]到海岸的边缘和朝向意大利的海岛止,都已经拉丁化了。韦利亚岛上讲拉丁方言的最后一个家族(还有一些岛屿呢!)已经在20世纪的头十年绝灭了。[82]在克罗地亚,一种仍然是意大利模式的生活艺术[83]今

天还和很多其他遗产混合在一起。这种艺术永远流传、延续。毫无疑问，这种意大利模式是一种很古老的意大利模式。

第二道文化边界的一个例子：伊弗里基亚

一个比较不突出的例子，即文化的再分的例子，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地中海的三大文明——拉丁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希腊世界文明——事实上是亚文化群，是被共同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各不相同的独立自主的文化家族的并列。在北非，没有一个文化家族的界限比古老的非洲的城市国家——阿拉伯的伊弗里基亚（今天的突尼斯）——的界限划定得更加清楚了。

大自然打下了它的基础。突尼斯平原北、东两面滨海。这块平原朝南向撒哈拉大大敞开门户。它把撒哈拉的蒿属植物和细茎针茅构成的景色加以延伸。它也收纳撒哈拉的城市尽其所能试图驯化的流浪的、游牧的和散乱的部落。它在西面的自然背景是独特的。这就是：在突尼斯干燥和炎热的平原上展现出一系列难于进入的、险恶的和起伏不平的地面[84]：丘陵、高原和小山脉。然后，群山一直通向昔日的努米迪，通向今天寒冷的君士坦丁堡地区。[85]这个地区使旅客回想起西西里中部、多山的安达卢西亚或者撒丁岛的内地。

突尼斯和中马格里布之间的群山起伏的连接地带大致上位于从塔库什角出发，中经克皮尔河、舍里夫河、艾因·贝达、塔夫朗特山及冈蒂亚的这条线的沿线地区。夏尔·蒙希古尔乐于描述这片宽大的连接地带的两侧的变化：这里，朝西是鹳鸟、栲木、榆树、呼

啸着高山风暴的天空下的褐色粗瓦屋顶;那里,朝东是台阶形的屋顶、古巴斯①的白色圆屋顶。这些景物显示出连接突尼斯城市和东方城市(例如开罗或者贝鲁特等城市的兄弟情谊。“凯鲁万只不过是个巨大的白色立方体……它和君士坦丁堡形成鲜明的对照。”君士坦丁堡在不止一个方面还是个房屋质朴而灰暗的山区居民的大村庄。[86]历史表明:伊弗里基亚在古代和当代都使这条线成了它的界限、它的西方边境。这个边境由障碍构成。这些障碍有时防止,有时勉强放进,但始终阻碍帝国主义对这块风光明媚和诱人的平原进行的冒险。[87]

这个宽广和质朴的地区朝西对突尼斯精巧的文化形成了一道屏障。16 世纪南下突尼斯的君士坦丁堡商人[88]在找到有台阶的白色房屋和阳光灿烂的城市的同时,找到一个富有的、与东方密切沟通的、定期与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通商的国家。这是一个治理有方、文明开化、阿拉伯语在城乡都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在同一时期,中部马格里布,一直到特莱姆森(这既是一座摩洛哥城市,也是一座撒哈拉城市),未开化的程度简直令人吃惊。阿尔及尔后来在一个没有任何文明酵母的、未经开发的、居住着牵骆驼的人、绵羊牧人和山羊牧人的地方成长起来。相反,近东地区却具有古老的传统。突尼斯国王穆莱·哈桑是最后几个哈弗西德家族的成员中的一个。他被儿子罢黜并弄瞎失明之后,于 1540 年来西西里和那不勒斯避居。他给会见过他的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是一个杰出的君主,喜爱美好的事物,是香料和哲学方面的行家。他

① 古巴斯是一种宗教建筑。——译者

的同代人班德洛对我们说，[89]这是一个“阿威罗伊派学者”，一个哲学家君主，一个即使在马格里布，甚至在暴发户和粗野的冒险家的城市阿尔及尔也永远找不到的君主。……突尼斯对先在1534年，然后在1569年暂时居留该城，最后从1574年起永久居留该城的土耳其人的厌恶，是一个古老的、虔诚的、管理良好和文明开化的城市对蛮族表现出来的憎恶愤慨。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一种文明的最根本的实在性，就是强使这种文明像植物那样生长，强加给它限制（有时甚至是严格的限制）的地理空间。除了这一点外，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吗？各种文明就是一些地理空间、一些地带，而且不仅仅是人种志学者在谈到一种双刃战斧的地带或者一种羽箭的地带时所理解的那种地理空间和地带。这是一种迫使人并且无止境地受人影响的地理空间。事实上，“突尼斯”的例子难道是一种平原合成体和与之性质迥然不同的山区合成体之间的对抗之外的什么别的事物吗？

交流和转移的缓慢速度

固定在土地上的文明的抵抗力，说明某些发展演变为什么特别缓慢。文明尽管具有明显的可变性，但要经过很长的时期，经过不明显的发展演变过程（尽管有表面上的破裂）之后才会发生变化。光线似乎是从遥远的星球经过中继，经过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暂时停顿，照射到文明上来，从中国到地中海，从地中海到中国，或者从印度，从波斯到内海的传播情况就是这样。

谁能够说出印度数字，即所谓的阿拉伯数字，从它的祖国经由

叙利亚和阿拉伯世界的中继站，即北非或者西班牙，到达地中海西部地区花了多少时间呢[92]？谁能够说出，这些印度数字战胜被认为更难弄错的罗马数字又花了多少时间呢？1299年阿尔特·迪·卡里马拉同业公会禁止在佛罗伦萨使用这些数字。1520年，“新数字”又在弗里堡遭到禁用。直到16世纪末它才在安特卫普使用。[91]谁能够说出那些源出于印度或者波斯，被希腊寓言和拉丁寓言(拉封丹后来从这两种寓言中吸取创作素材)收入的寓言的流传经过呢？这些寓言今天在大西洋的毛里塔尼亚还生机勃发，不断盛开鲜花。谁能够说出17世纪中国钟变成基督教的钟并被置放在教堂的高顶之上花了多少时间呢？[92] 根据某些人的说法，这要等到钟楼这种建筑从小亚细亚传到西方之后。纸的旅程也同样漫长而缓慢。公元105年，纸在中国发明。在中国，纸用植物制造。[93]造纸的秘诀据说是公元751年在撒马尔罕由中国战俘泄露出来的。在这之后，阿拉伯人可能用破布代替植物作为造纸的原料。布制纸大概从公元794年起在巴格达开始了它的历程。[94]它可能从那里慢慢传遍穆斯林世界的其余地区。在11世纪人们注意到它在阿拉伯[95]和西班牙出现。但是，萨蒂瓦的第一家造纸厂(今天在巴伦西亚的圣菲利普)大概不会创建于12世纪中叶以前。[96]布制纸11世纪使用于希腊[97]，将近1350年，它在西方取代了羊皮。[98]

我已经根据G.I.布拉蒂亚努[99]的著作指出，将近1340年，法国服装突然发生变化。十字军参加者的飘动长袍被男式短紧身上衣取代。穿这种上衣的人同时还穿紧身短裤和尖头鞋作为补充。所有这些时新的服饰同山羊胡子和特雷森托的西班牙式胡子一道从加泰罗尼亚传入。实际上它们都来自更远的地区，由加泰罗尼亚人

从他们经常去的地中海东部地区传入。而这些地区又是从保加利亚人甚至从西伯利亚人那里得到这些时新服饰的。至于这个时期妇女的服装，特别是尖角形头饰，它们来自近处塞浦路斯的吕西尼安宫廷。这个宫廷在很久以前又从遥远的唐代的中国传入这些头饰……

完成这样一些旅行，然后使新事物固定下来扎根、长茎，需要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相反，文明的古老的根株却仍然牢固得令人惊奇并且有抵抗力。E.-F.戈蒂埃一反专家们的看法，[100]坚持认为伊斯兰教徒在北非和西班牙重新发现了古老的布匿人文明的基础，而且这些基础为伊斯兰教在北非和西班牙的推进和入侵开辟了道路。在我看来，他这样说，是仍然停留在假说所允许的范围内。在地中海地区及其周围难道没有古代的残余，没有古代文化的涌泉吗？亚历山大和安蒂奥希等早期基督教世界的宗教中心的教义的影响，16世纪还残存在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徒中和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徒中。根据埃德里西的看法，12世纪，拉丁语在北非的加夫萨还有人讲。只是在1159年，即比伊斯兰教的征服晚4到5个世纪，由于阿布达尔穆明的迫害，当地最后一批基督教团体会社才从北非消失。[101]但是，伊本·赫尔东仍然指出，晚到14世纪，在同一个北非有“偶像崇拜者”[102]。让·塞尔维埃1962年在卡比利亚的苏马姆山谷和在别处进行的人种学方面的调查，也强调伊斯兰教是晚在1000年后传入非洲的。这个伊斯兰教“不是奥克巴的骑兵带来的，而是在两百年后的第9世纪定居在布日伊的什叶派法蒂米特家族带来的。这是一种被伊朗更加精神化了的伊斯兰教。它还因一股股入教的潮流而富有起来。它必然会接触到民众传统的

神秘的象征主义。”[103]此外，这种当今的、很多地方涉及20世纪的、具有强烈的具体现实性的神业，展现出一种民众传统的、一种世世代代留存下来而且今天仍然活着的基础宗教的宽阔的景象：没有神父；每个家长、“每个女主人”都有“主持宗教仪式的能力……这些仪式在尘世上加强了它们所负责照管护卫的人的团体”。[104]首先，构成这种宗教的特征的，是对死者和对保护圣徒的崇拜。“当圣徒奥古斯丁高呼：‘我们的非洲难道不是播满神圣殉难者的躯体吗？’时，他就已经承认这些白色的坟墓的存在。这些坟墓是山口和山的永恒不变的、坚定不移的守护者。它们后来变成马格里布的伊斯兰教的被人承认的圣徒。”[105]

我们就这样从文明的了望台眺望，并且应该极目远眺，眺望到历史的黑夜，甚至超过这个黑夜。作为一个研究16世纪的历史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新近创刊的关于史前时期的杂志《地下》[106]与我的研究工作有关。这个刊物从事古地中海的、阿尔卑斯山区的和北欧的底层的研究以及其他研究。它在诸如古时对死者的崇拜的复活等问题上，提供了不少资料。文明也是一种遥远的，而且很遥远的过去。这个过去坚持要继续生存下去，要把自己强加于人。对动植物的生境以及对人的农业实践来说，这种过去和地形、当地的土地、水的供给或者气候这些显然重要的事物同等重要。这一点是一个地理学家撰写的一本受人赞赏的关于普罗旺斯的书确切证实了的。罗贝尔·利韦对“地理遗传”很感兴趣。动植物的生境在这门学科中占首要地位。对罗贝尔·利韦来说，特征非常突出的普罗旺斯高山地区的生境（常规的解释，特别是防御地势理论，对这些生境的解释很不充分、十分可笑），毫无疑问是与一种他顺便命名为

岩石文明的文明相联系的。这种文明的基础和传统，上溯到在“罗马人移民定居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古老的地中海传统”。它在罗马时期沉睡，接着苏醒，在16世纪的黎明时期活跃起来。当时绵延不绝、彼伏此起的骚乱正使普罗旺斯的居民痛苦不堪，受尽煎熬。[107]这是一个把我们引离16世纪但并不引离它的真实事物的题目。

我们应该作出什么结论呢？毫无疑问，作出否定的结论。作结论时，我们不允许自己步其他很多人的后尘，人云亦云，动辄就重复“文明是终久会死亡的”这个老调。终究会死亡的事物，或许是文明的朝开暮谢的昙花，是一个时代的错综复杂的和短命的创造，简而言之，是文明的经济的胜利和社会的磨难。但是，文明的基础永存。这些基础并非坚不可摧，但它们多次比人们想象的牢固得多。它们顶住了无数次被人料想会来临的死亡。它们庞大的群体经过数世纪的单调转变，始终岿然不动。

2. 文明的搭叠覆盖

如果我们想从这样广阔的历史景观返回比较短暂的、迅速地但有意义地变化的、更在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和更显示出人的特点的历史上去，那么，我们所能进行的最好的工作，就是仔细观察互相邻接的两种文明之间的、胜利的文明（或许自以为胜利的文明）和被征服的文明（它梦想不再被征服）之间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在1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时有发生。伊斯兰教通过它的代理人——土耳其人——攻占了巴尔干的基督教据点。在西方，西班牙国王统治下的西班牙，把伊斯兰教在这个半岛上的最后一个前哨基

地连同格拉纳达一起占领。土耳其征服者和西班牙征服者要把这些征服的成果化为什么呢?

在东方,土耳其像后来英国人掌握、控制印度那样,往往用少量人力来掌握、控制巴尔干。在西方,西班牙人后来无情地压迫他们的穆斯林臣民。这两个强国这样行事,它们服从它们各自的文明的迫切需要的程度,超过人们的想象。基督教世界人口过多,而伊斯兰世界人力短缺。

巴尔干东部平原的土耳其人

土耳其伊斯兰教在巴尔干遍及、盖满被拜占庭文明直接或间接征服、统治的地区。在北方,它控制着多瑙河;在西方,它一方面在达尔马提亚、拉古萨或者在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的周围地区,触及拉丁文明区的边缘;另一方面,它扩展到用 J. 茨维杰奇的话来说属于族长文明区的辽阔的多山的边远地带。这种殖民试验在广大地区内进行,以后延续达 500 年之久。难道能够想象出一个比这个试验更加广泛、更富成果的殖民试验吗?

不幸的是,土耳其的过去仍然被人了解得不充分。巴尔干的历史学家或者地理学家在判断土耳其的过去时,没有始终让自己受超然独立、不偏不倚的纯粹的科学的考虑指引。即使像茨维杰奇那样治学严谨的人也未能这样做。如果说哈默和津克森撰写的通史已经过时的话,那么,N. 约尔加写的历史就杂乱无章了。事情还不仅仅止于此。土耳其统治的几个世纪的历史受到无缘无故的冷遇,正如过去穆斯林在西班牙统治的几个世纪的历史受到这种冷遇一

样。这种情况无法帮助我们把这个至少使我们感到迷惘困惑的世界里(因为这是一个世界)的事物查看得一清二楚。

然而,低估土耳其的试验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忽略这股力量传入整个巴尔干的事物,也是不可能的。整个巴尔干被这股力量用来自各地的货品和财富填得满满的。[108]亚洲的这种风度、气派和色彩,在巴尔干各地非常清晰。它们是土耳其伊斯兰教的传代物。土耳其伊斯兰教散布了它自身得自遥远的东方的货品和财富。它使城市和农村深刻地东方化。在拉古萨这个天主教岛屿上(人们知道这个岛屿是信奉怎样一种激烈的天主教教义的岛屿),女人在16世纪还用面纱遮脸,与社会隔绝;未婚夫在结婚前见不到未婚妻。[109]这些事物并非无关紧要。在狭窄的岬角上登岸的西方旅行者,马上就会感到这里开始呈现出另外一个世界来。但是,登上巴尔干半岛的土耳其人自己难道没有同样的感觉和印象吗?

事实上,在研究土耳其人的影响时,必须把巴尔干的两个区域区别开来。第一个区域包括一个被群山拦阻的斯拉夫地区的西部和一个同样多山的希腊地区的南部。土耳其人对这些地区的有效占领是罕见的。有人曾经坚持认为(看来事实并非不确),迪纳拉阿尔卑斯山的各个地区的穆斯林自身也并不是土耳其血统的土耳其人,而是伊斯兰化了的奴隶。[110]简而言之,巴尔干的整个这个西方集团,看来并没有被伊斯兰文明深刻改变。既然这是一整块多山的地区,对这个地区不大容易受到无论来自何方的"开化性"的入侵这个事实,人们是不会感到惊奇的。至于它的宗教的伊斯兰化,我们已经特别提到山区的"宗教信仰改变"[111]的可疑的性质。

相反,土耳其人却让很多他们自己的人在东方的色雷斯、鲁梅

利和保加利亚的辽阔的平原上定居，而且在这些地区厚厚地铺上一层他们自己的文明。这些地区从多瑙河到爱琴海，向南和北同样开放。入侵者从两个方向经过这些地区不断涌来。如果说土耳其人的努力能够作为成功或者失败来加以评价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些被这种努力尽可能征服的土地上对这种努力进行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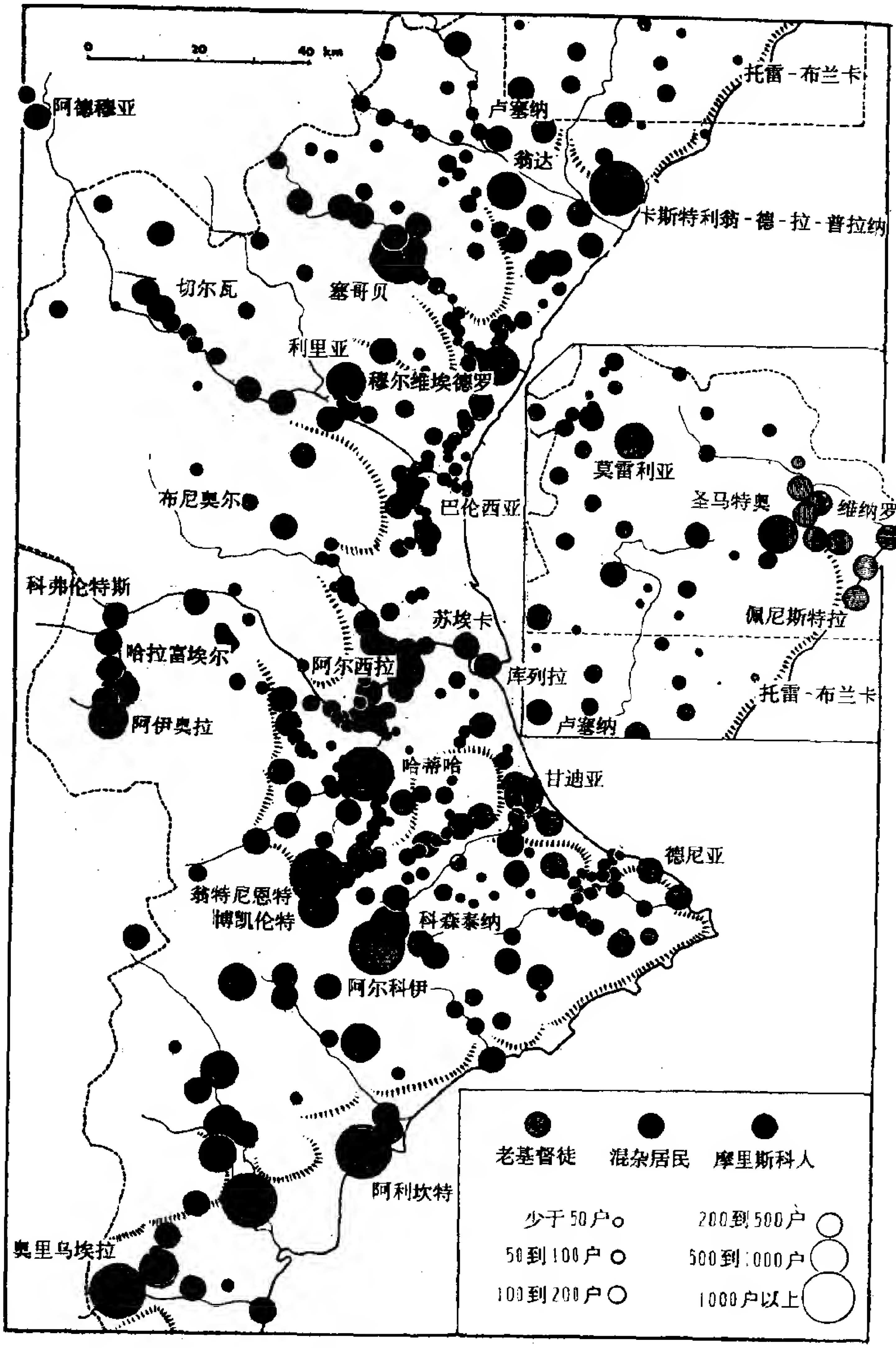
这种努力在被它征服的土地上，发现一个已经变得具有同一性质的群体，虽然这个群体是由根源不同的种族构成的。最后一批到来的入侵者——保加利亚人、佩切内克人和库曼人——来自北方。他们在这个群体中已经和更早在那里定居的色雷斯人、斯拉夫人、希腊人、阿罗穆内人、亚美尼亚人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成分已经相当好地融为一体了。对新到者来说，改信东正教往往是同化的决定性阶段。在拜占庭也产生巨大影响的这个地区，人们对此是不会感到惊奇的。这整个地区由受着大平原自身条件的约束的大平原组成。只有罗多皮高原和巴尔干山脉，特别是斯雷坦雅·戈拉，还保存着过着独立的山区生活的孤立的小群体。这种生活是巴尔干杰斯人的生活。巴尔干杰斯人今天仍然是迁徙和游牧民族，是保加利亚的最奇特的民族之一。[112]

在土耳其进行征服期间，某些保加利亚领主逃到库斯坦迪尔

图 61 1609 年巴伦西亚的摩里斯科人和基督教徒

根据 T. 阿尔帕朗·东吉:《巴伦西亚王国中的摩里斯科人》(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56 年 4 月—6 月)。

这幅图上的插图是对巴伦西亚向北的延续部分的描述。这幅特殊的地图的特别引人注目之处是它显示出两种人口的异乎寻常的混合。这一切正如下一幅关于在 1565 年和 1609 年之间这个时期的人口的发展演变情况所显示的那样，都是在人口在几乎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出现的。


0 20 40 km
阿德穆亚
托雷-布兰卡
卢塞纳
翁达
卡斯特利翁-德-拉-普拉纳
切尔瓦
塞哥贝
利里亚
穆尔维埃德罗
布尼奥尔
巴伦西亚
莫雷利亚
圣马特奥
维纳罗斯
佩尼斯特拉
托雷-布兰卡
卢塞纳
科弗伦特斯
哈拉富埃尔
阿伊奥拉
苏埃卡
阿尔西拉
库列拉
哈蒂哈
甘迪亚
德尼亚
翁特尼恩特
博凯伦特
科森泰纳
阿尔科伊
阿利坎特
奥里乌埃拉
老基督徒
混杂居民
摩里斯科人
少于50户
50到100户
100到200户
200到500户
500到1000户
1000户以上

和克拉托沃地区的山区避难地，以便逃脱他们的那些留在平原上的同类所受的那种奴役。他们的同类最后也以缴纳贡物为代价，成功地保存了他们过去的特权。[113]这些避难的领主形成了总的规律的一个小小的例外，因为土耳其进行的征服使平原地区沦于农奴制统治之下，摧毁了一切能够使保加利亚社会受到保护、得以保存下来的事物，杀死贵族、领主或者把他们流放到亚洲，焚毁教堂，并且还几乎把西帕伊尼克制度的沉重枷锁立刻套在这个从事农业耕作的民族的身上。西帕伊尼克即这个民族的服役军人贵族。这个贵族不久就变成了地主贵族。这个地主贵族骑在这个动物，即耐心、勤劳、对什么都逆来顺受的保加利亚农民的背上，过着舒适的生活。正如他们的同胞对我们描写的保加利亚农民巴雅·甘杰那样，保加利亚农民是平原地区的人的典型，是大领主的奴隶，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百依百顺，干活干得筋疲力竭，脑子里想的只是一餐饭。阿勒科·康斯坦丁诺夫把保加利亚农民描绘成粗野的，“野蛮到骨髓”的人。他说：“保加利亚人吃饭时狼吞虎咽，关心的只是吞下肚子的东西。如果有300条狗在他们周围相打，你咬我我咬你的话，他们也不会撂下饭碗、杯盆。他们额上的汗水简直要滴落到盘子里了。”[114]1917年，一个战争通讯员为他们画了一幅几乎并不更讨人喜欢的肖像：“他们是很好的士兵，遵守纪律，作战英勇但不鲁莽，他们顽强但不热情。这是一支唯一没有进行曲的军队。士兵们行军时，顽强、沉默、吃苦耐劳、冷漠、天性残酷但不暴烈，打仗得胜也不喜形于色。他们从不唱歌。人们从他们的体格和举止中很快得到一种迟钝、麻木和笨拙的印象。他们是还没有制作完全的人。他们似乎可以说不是单个地，而是成批成批地制造出来。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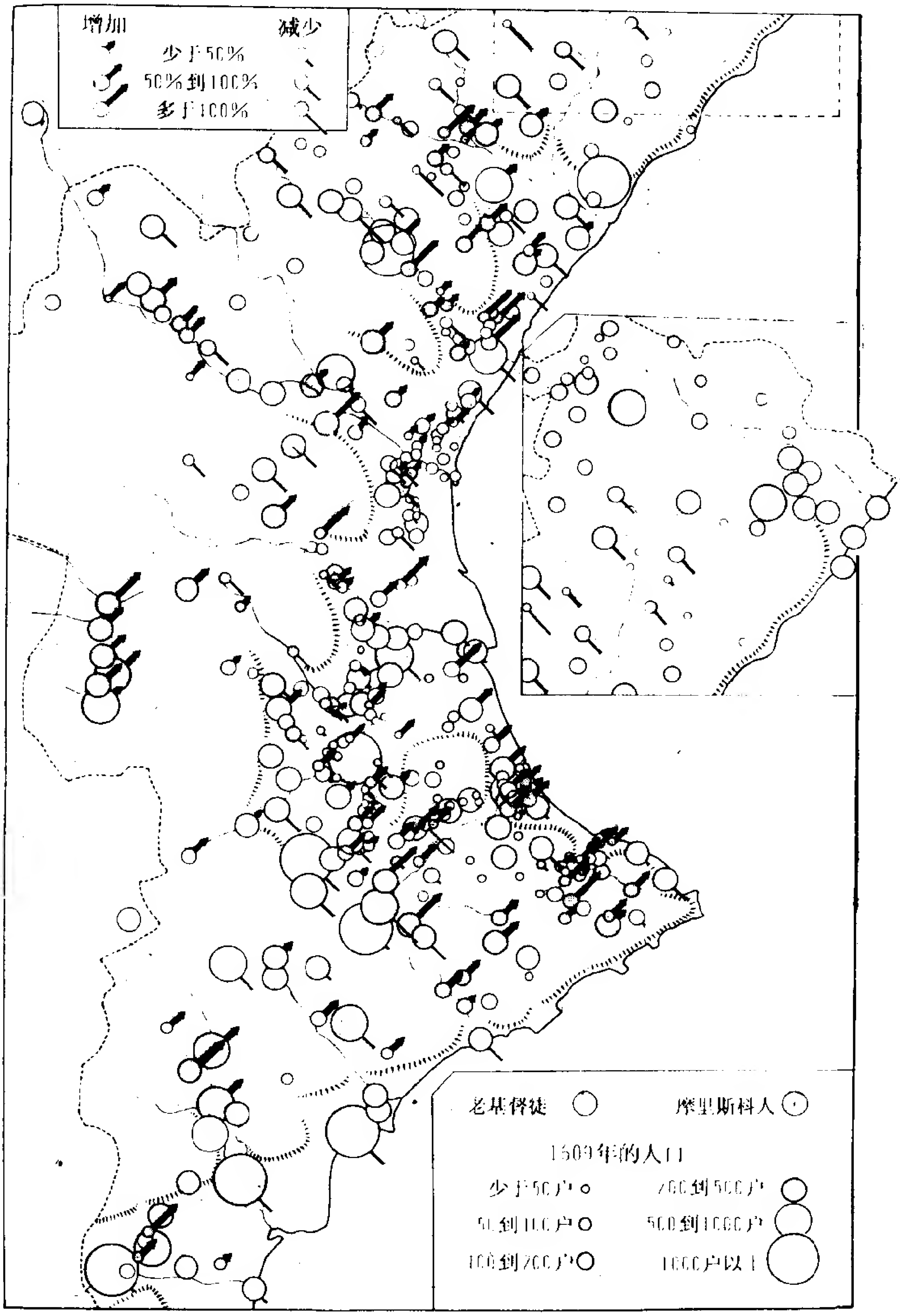


图 62　1565 到 1609 年巴伦西亚的人口发展演变情况

了解问题迟钝缓慢,但是勤劳、工作耐心、贪婪、节俭……"[115]

如果到西方山区的居民中间去搜寻关于平原农民的风趣的评论,这类具有倾向性的贬抑性的话就会成倍增加,这些不公正的描述也会得到补充。在西方,这些农民受人讥讽嘲笑。这是一种自由战士对这些粗笨的农民的藐视。这些农民穿着缝制粗糙的外衣,呆然木立,生来就惯于集体干活。他们是始终被禁止有个人主义、奇思怪想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爱好的人……在北方,罗马尼亚平原如果不是因远离土耳其这种地理位置而免于落入土耳其手中的话,如果不是因鞑靼游牧人的侵扰袭击而保持警惕的话,它也会遭受同样的奴役。从喀尔巴阡山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广阔山区迁移来的酵母特别使当地的生面发了酵……

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在保加利亚农村,土耳其进行征服时甚至并不需要使用武力来使农民低头屈服。这些农民已经低头受人奴役,准备服从并且继续他们的耕作劳动,因为他们一直在耕作劳动。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旅行者,把保加利亚的各个地方描绘成富有之邦。[116]1595 年,帕奥洛·季奥季乌断言这是土耳其的粮仓。[117]然而,在这里比在别处更加凶残的土匪的蹂躏、领主和国家的敲诈勒索、农民的贫困(当然不是他们的懒惰)以及农民使用的原始工具(他们用小木犁耕作)等因素,使耕地与耕地之间留下大片大片土地荒芜未耕……大犁只在大庄园中使用。在这些庄园的土地上,根据情况实行粗放耕作或者种植软粒小麦和硬粒小麦。稻米于 15 世纪随同土耳其人到来,在菲利波波利和鞑靼·帕扎尔哲克等地种植成功、长势良好,在卡里布罗德州长势较差。16 世纪保加利亚的稻米产量估计为 3,000 吨左右。引入马里查河平原的芝麻以及

引入安德里诺普尔、库斯坦迪尔和色雷斯周围的马其顿地区的棉花，都是16世纪土耳其带来的农作物。[118]在这类种植的作物之外，还加上少量质量低劣的酒、城郊栽种的蔬菜、[119]苎蔴、玫瑰花、于斯屈普附近的果园……最后还有另外两种新农作物——烟草和玉米——在不久以后出现。出现的日期无法确切推定。

这些农作物大多数在大种植园内种植。种植是按照土耳其方式组织起来的(即茨奇弗特利克方式。这是巴尔干耕作方式中对人来说最艰苦的一种)。这是土耳其大庄园形式改变的结果。农村居民接着经历了某些曲折变化，迁往平原低处。19世纪，这种大庄园放松了它的控制[120]，移居现象就停止了。这些变化特别导致土耳其人的专制统治。土耳其人依靠的是一种因靠近首都而变得更加苛严的行政机构。

在这个扎下了根的、受到强有力的严密控制的农村社会的旁边，几个团体——其中有瓦拉几亚人和“阿尔巴纳西人”——似乎享有某种程度的独立。这些团体在尚未开垦的土地上，在搭着暂时性棚房的、与斯拉夫人的固定的永久性村庄迥然不同的村庄里，[121]过着一种田园的和半游牧的农耕生活。但是，亚洲也在通过它的游牧民族同这些团体会合。这些游牧民族同它们掺混一起，或者同它们共处。尤鲁克人的情况最为清楚。他们越过海峡，定期来占领罗多皮的辽阔富饶的牧场。他们使奇怪的波马格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些波马格人是受亚洲游牧生活的巨大浪潮驱卷的贫困的穆斯林化了的保加利亚人。

亚洲似乎对保加利亚的任何角落都不放过，似乎让它的士兵和骆驼的沉重的脚踏遍保加利亚全境，淹没了(在少数合作者，特

别在放高利贷者,即臭名昭著的向敌人提供关于自己同胞的情况的乌鸦的协助下)一个由于血统,由于根源,由于土地本身的缘故所受的保护差于其他民族的民族。

散发出浓烈的香味的东方异国文明的渗浸，仍然十分明显。时至今日，情况仍然如此。保加利亚的城市仍然显示出这种文明的渗浸。在东方式的城市里，有两旁立着没有门窗的墙的狭长的小街小巷，有必然会出现的市场和狭窄的前部装有木头排门板的店铺。店铺伙计蹲伏在放下的排门上等候顾客。他的旁边放着“芒加尔”，即在这些被来自东方和北方的夹雪狂风吹打的地区不可缺少的火盆……16 世纪，整整一大批小手工业者在这些棚铺为商队、铁匠、小木匠、驮鞍匠和鞍具商劳动。集市的日子，马和骆驼混在五光十色的服装、商品和人群中，来到这些棚铺门前，在白杨树下的泉水的周围歇息。在这些人中，有土耳其人，他们是暂时回到自己的领地的茨奇弗特利克的领主；有希腊人，他们从法纳尔前往多瑙河各省路过这里；有香料商或者在阿罗穆内人的沙漠旅行队中赶驮兽的人以及谁对他们也不会相信的吉普赛马贩子……

对保加利亚人来说,生活就是屈服于这些入侵。然而,他们既然毫无改变,依然故我,就把他们最根本的东西保存了下来。在这种长期共处中,不管他们的借用是什么样的借用,他们丝毫不溶解在土耳其的群体中,他们保护了使自己不被溶解的东西:他们的宗教和语言。这些东西是他们来日复兴的保障。他们牢牢地攀附在自己的土地上,顽强地保住这片土地,留在他们的黑色土地的最好的地区。当土耳其农民从小亚细亚来到他们旁边安家落户时,不得

不满足于居住在种了树的山坡或者居住在“拉依亚”①留下的唯一未被占用的土地上的沼泽区。[122]这些地区位于盆地深处，旁边长着杨柳。土耳其人离去以后，保加利亚人发现自己仍然是保加利亚人，是在 5 个世纪以前和现在讲同样的语言、在同样的教堂祷告、在同样的天空下耕种同样的土地的同样的农民。

摩里斯科人的伊斯兰教

在地中海的另一端，西班牙人也在同一个无法同化的民族进行搏斗，而且这场冲突最终演变成一幕悲剧。没有任何问题像这个问题那样深刻地搅扰过这个半岛。

摩里斯科人问题正如它的名称所显示的那样是个宗教问题。换句话说，在强烈的和深刻的意义上是个文化冲突问题。这个问题难于解决，必将延续下去。摩里斯科人一词系指 1501 年在卡斯蒂利亚各地和 1526 年在阿拉贡王国各地改皈基督教的西班牙的穆斯林的后裔。他们曾经先后受过欺凌虐待，被灌输信仰，受到优待，但始终令人生畏，最后在从 1609 年到 1614 年的那场大规模的驱逐中被赶走。

研究这个问题，就是弄清 1492 年格拉纳达被攻占后伊比利亚伊斯兰教长期持续存在的情况，或者更主要是弄清伊斯兰教这艘航船的缓慢遇难下沉情况。很多东西从这艘难船的残骸飘浮到水面上来，甚至在 1609 年这个决定命运的日期以后也是这样。[123]

① “拉依亚”(raïla)指土耳其帝国内的非穆斯林臣民。——译者

摩里斯科人问题

不是有一个,而是有一些摩里斯科人问题。在西班牙有多少个正在衰落消亡的社会和文化,就有多少个这类问题。这些文化中没有两种处于同样一个衰退和腐朽的阶段。复地运动和宗教改皈的年表说明了这一点。

穆斯林的西班牙在它发展扩张的鼎盛时期,也只控制着西班牙半岛的一部分,即地中海海岸、安达卢西亚、塔古斯河河谷、埃布罗河河谷、葡萄牙南部和中部,它忽略了卡斯蒂利亚的穷困地区,也没有触及,至少是没有持久地触及比利牛斯山和它的向西延伸部分——坎塔布连山脉。长期以来,复地运动就在古老的卡斯蒂利亚的准沙漠地区发展。基督教徒为了在这些地区建立他们的警备和作战的城市,不得不带来需用的一切,不得不兴建一切。直到11世纪基督教徒才打了胜仗,开始蚕食伊比利亚的伊斯兰的活的躯体。托莱多的攻占(1085年)为他们打开了这条通往被人觊觎的世界的道路。对伊斯兰教来说,托莱多只不过是半岛的大陆心脏地区的前哨。

各个基督教王国缓慢地占领阿拉贡、巴伦西亚、穆尔西亚和安达卢西亚等人口稠密的山谷。萨拉戈萨于1118年,科尔多瓦于1236年,巴伦西亚于1238年,塞维利亚于1248年被攻占,格拉纳达于1492年才被攻占。在复地运动的几个连续的阶段之间隔着几个世纪。

因此,在1085年以前,这个运动使基督教居民在未被占领的真空地带定居下来,而在这几个日期以后,这个运动开始兼并一些农民和或多或少伊斯兰化了的城市居民居住的地方(这些人是穆

斯林或基督教徒)。于是完成了从移民殖民到开发殖民的过渡。在这之后,很快出现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以及超过这个范围的彼此对立的各种文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的形式千变万化;颇不相同。

既然冲突并不是在各个不同的被基督教徒重新征服的西班牙的穆斯林地区同时爆发,16世纪的各个摩里斯科人问题就彼此迥然不同了。在西班牙出现了一系列不同的情况。这些情况彼此不能截然分开,并且能够通过互相对照比较得到阐明。

它们之间的区别本身,就都是对这些区别的解释。譬如格拉纳达的摩尔人1499年奉政府之命改变宗教信仰。奇斯纳洛斯红衣主教不顾地方当局的劝告,破坏了西班牙国王作出的许诺,决定采取措施。1492年,当这个城市投降时,西班牙天主教国王曾经作出许诺,向它保证过它的宗教自由。红衣主教的这个行动的准备工作,是在几个改宗的摩尔人的共谋下进行的。采取这个行动之前和采取这个行动时,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等活动,其中包括焚毁大量古兰经和阿拉伯文手抄本……这样做的结果是引起了格拉纳达的土著城市阿尔巴辛的暴动。之后。又在韦尔默哈山发生了很久才平息的叛乱。1502年,这场叛乱不无困难地扑灭了。摩尔人被迫改宗或流亡异乡。尽管有不承认上述做法的文告和拒绝为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的官方声明,毫无疑问,自称对此感到惊讶的西班牙国王实际上同意托莱多大主教的做法。后者的责任就是他们的责任。[124]

强迫改宗的行动始于西班牙。在格拉纳达采取的措施应用到整个卡斯蒂利亚。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点:这项措施对新近征

服的格拉纳达的居民的影响，大大有别于它对卡斯蒂利亚的为数不多的摩尔人——穆德哈尔人——的影响。这些穆德哈尔人长期与基督教徒杂居，并且在那以前一直自由地进行他们自己的宗教祭祀活动。

在阿拉贡的各个地区(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巴伦西亚)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改变宗教信仰的活动在这些地方进行得更迟，一切都同样马马虎虎，而且并不是由国家下令进行，而是老基督教徒(摩尔人分散在这些基督教徒中)在1525—1526年发生兄弟会危机期间用武力让他们的穆斯林同胞成批施洗。这些强迫洗礼有效吗?远至罗马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妥协的解决办法的拥护者在罗马比在西班牙更多。[125]1526年，查理五世应别人要求发表意见。他声称赞成改变宗教信仰。这既是为了效法格拉纳达，也是为了他在帕维亚取得的胜利感谢上帝。[126]但是，他在这出戏中扮演的是个无足轻重的次要角色。格拉纳达和巴伦西亚这两个西班牙的大斜面(前者是阿拉贡的；后者是卡斯蒂利亚的)没有在同样的情况下变成“基督教的地区”(正如人们后来说的“摩里斯科人的地区”)，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这就至少把有摩里斯科人问题的两个地区区别开来了。

摩里斯科人的西班牙的地理

如果进行更细致深入的观察，便会发现这一点：根据摩里斯科人数的多少、受包围程度的大小、同征服者的文明接触的时间的长短，清晰地显现出另外一些区别和地区来。摩里斯科人在比斯开、纳瓦

拉、阿斯图里亚等地并非不为人所知。他们是手工业者或者行商，甚至是火枪火药的转卖商。[127]他们为数当然不多，虽然埃布罗的纳瓦拉山谷因有摩罗人的后裔而属于例外。在卡斯蒂利亚，他们的人数较多，似乎越往南越多。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摩里斯科人。[128]15世纪末，一个旅行者——希埃罗尼穆斯·穆恩策尔博士——注意到在马德里这个“并不比比贝拉赫大的城市”有两个摩雷里亚，即两个穆斯林的集中居住区。[129]在托莱多和托莱多以南的安达卢西亚，摩里斯科人的比例更大。他们在安达卢西亚触目皆是。他们是农民或者为城市服务的劳动者。在狭义的阿拉贡，摩里斯科人作为手工业者，住在城市居民点（在萨拉戈萨他们加工皮革、制造武器和火药[130]）。在埃布罗和比利牛斯山之间的高地，[131]他们为数更多，组成一些活跃的农业和畜牧社团[132]。几个大领主在他们的摩里斯科人地区拥有从事耕作劳动的人的大部分。例如埃克斯卡的弗恩特斯伯爵（埃克斯卡是摩里斯科人的阿拉贡最大的骚动地区之一）、阿尔莫内泽尔的阿兰达伯爵或者托尔拉斯的阿兰德公爵，[133]都是这类大领主……

相反，在加泰罗尼亚只有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摩里斯科人，甚至没有任何西班牙伊斯兰文化的痕迹。古老的加泰罗尼亚过去生活在伊斯兰世界的边缘。伊斯兰教只对它南面的位于塔拉戈纳和埃布罗附近的地区有所触动和影响。1516年，古老的加泰罗尼亚驱赶了居住在托尔托萨的摩里斯科人。[134]对巴塞罗那的宗教裁判所来说，被指定审讯一个摩里斯科人倒是一件罕有的令人惊奇的事。[135]

再往南，巴伦西亚的农村是典型的移殖民地区。这个地区13

世纪被阿拉贡的领主和加泰罗尼亚的商人接管。从那个时期起,它又受到千百次社会变化和连续不断的移民的影响。亨利·拉佩尔[136]把巴伦西亚的局势看成类似 1962 年 3 月以前阿尔及利亚的局势。摩里斯科人和基督教徒的比例在巴伦西亚和阿尔及利亚并不相同,但是,正如图里奥·哈尔帕林·东季[137]的权威性的地图所示明的那样,这两种居民交错杂居。地理分配的总的特点大致说来是相当清楚的:城市基本上属于基督教徒;少数摩里斯科人据有郊区。除哈蒂瓦和甘迪亚附近的地区外,灌溉区域也主要属于基督教徒。相反,除了某些高原以外,旱田和沙洲区属于摩里斯科人。这是高原的贫瘠不毛之地。"因此,无怪乎两次主要的叛乱都发生在山地:一次 1526 年发生于戴斯巴丹山;另一次 1609 年发生于位于胡卡尔河的右岸以及冈迪亚南部的拉古亚尔山谷的穆克拉·德·科尔特斯……"[138]

1609 年,摩里斯科人差不多占巴伦西亚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即摩里斯科人为 31,715 户,"老"基督教徒为 65,016 户。[139]但是,后者居于统治地位,完全控制、占有巴伦西亚及其肥沃的大菜田、大果田等。

这一切显然都是前几个世纪的长期发展演变结出的果实。被征服的社会阶层虽然仍旧存在,但沦落到其劳动所得只能勉强糊口的地步,恰如一块用破了的、往往撕裂的布。事实上,并没有什么高居于被征服了的无产阶级群众之上的贵族和穆斯林的精英。因此,遇到挑衅、进攻时,没有进行过很有组织的抵抗。摩里斯科人在城市,在农村,到处都受到胜利者的社会压迫。农民的保护者就是他们的领主本身。[140]这些领主保护摩里斯科人正如后来美国南部

的种植园主保护他们的奴隶一样。但是，在他们旁边，一个老基督教徒无产阶级成长起来。这是基督教好几个世纪胜利的统治的产物。这个无产阶级狂热、残酷，既是农村的，也是城市的。如果进行对比，它恰好令人想起美国南方的白人穷人。

16 世纪的格拉纳达可以使人想起 13 世纪的巴伦西亚应该是什么状况。基督教徒在格拉纳达取得胜利是最近的事。这个胜利是在使一个富国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个富国更主要是由于缺乏大炮，而不是由于它内部显然弱小而遭到失败。[141]穆斯林社会并非完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远不是征服没有带来任何直接的破坏和灾害）。但是，在这块被人占领、制服、一直耕种到最高的山地、有大量肥沃得惊人的低洼地（已经具有半非洲性质的土地中间的热带绿洲）的土地上，穆斯林社会仍然可以辨认出来。一些基督教徒领主在这块肥沃富饶的土地上定居。1568 年曾经保护过摩里斯科人的胡安·恩里克斯[142]就在格拉纳达的平原上拥有田产。到处都有公职人员和教士迁入定居。他们当中有的比较老实，有的则奸诈狡猾。他们往往玩忽职守、厚颜无耻，利用优越地位和特权谋取私利。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所能谈到的关于“殖民主义”的事物，在格拉纳达这个被再度占领的王国里都真实得令人惊讶。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官方的文件也说得明明白白。例如乌尔塔多学士[143] 1561 年春在阿尔普哈拉进行调查，发现摩里斯科人具有某些优点。这位调查者说，虽然 20 年来，这个省份没有任何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公平、正义，只有损害他们利益的贪赃枉法、作奸犯科和层出不穷的盗窃等胡作非为，他们却始终没有诉苦、抗议。调查者继续说，真正的、必须受到法律严厉制裁的罪犯之所以竟相喋喋不

休，说什么摩里斯科人是危险的，说什么他们积存粮食、面粉、小麦、武器，企图有朝一日起来叛乱，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他们自己不可饶恕的行为进行辩护。

乌尔塔多会受人欺骗吗？1568年圣诞节格拉纳达发生叛乱时，菲利普二世派驻法国的大使弗朗塞斯·德·阿拉瓦感到有必要进行类似的揭发来卸下自己良心上的负担。1569年10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秘书萨亚斯。[144]从这封信的头几行起，他就向这个秘书明确指出，他最近20年曾经去过格拉纳达七八次，认识该地军、政和宗教等方面的负责人士。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呢？他又有什么理由赶紧去援助当时同他遥隔千里的穷鬼呢？除了要使人了解事实真相之外，他究竟还有什么其他理由呢？

他说，摩里斯科人的确在叛乱，但是，这是老基督徒们对他们凶狠骄横，偷窃、抢劫他们的财物，霸占他们的妻女，逼得他们走投无路所致。神父的所作所为与此毫无二致。以下是一桩千真万确的铁事：整整一个居住摩里斯科人的村子的全部居民联名向总主教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反对该村神父。对村民控告这个神父的动机进行了调查。村民们喊道："把他从我们这里调走吧！不然就让他讨老婆吧！因为我们全部孩子生下来眼睛都同他的眼睛一样蓝。"这位大使并不满足于只叙述这个被他当作千真万确、十分严肃的事来向上级报告，他怒气冲天，内心非常痛苦，于是亲自去调查。他看到一些小公职人员，甚至原来也是摩里斯科人的公职人员，也贪赃枉法，对他们管理的平民百姓的剥削也不亚于其他人。他节日走进教堂，亲眼看到人们多么不尊重祭礼的庄严，又多么不使祭礼的庄严受人尊重。举行祝圣仪式的时候，他看到一个神父在

授圣体饼和授圣餐杯之间的片刻，转过身来窥视当地的全体教徒——男人和女人——是否按照规定跪下并且大声把教徒们骂了一顿。东·弗朗塞斯说，这是与祭拜上帝的宗教仪式背道而驰的事，以致“我浑身战栗起来”。

抢劫、偷窃、不公正、凶杀、到处私设公堂……等情事层出不穷。可以毫不困难地把对基督教的西班牙的种种指控列成一张表。但是，基督教的西班牙对那些往往暗中以它的名义，或者据推测以它的名义在富庶的南方干下的种种勾当难道了解吗？这一点是可疑的。人人都来这个地区寻找利益、好处、土地、职业。正如1572年[145]格拉纳达的宗教裁判所的一份文件指出的那样，佛兰德人和法国人在这个地区愿意作为小手工业者安家落户。有一种历史的物理学、一种无情的强权法则在起作用。一座位于穆斯林土著城市旁边，[146]从1498年起[147]就同这座穆斯林土著城市分开的官方的和基督教的城市发展起来。这座城市位于阿尔汉布拉附近。西班牙大统领就定驻阿尔汉布拉。在这座新建的西班牙城市的建筑物中，有创建于1537年的大学和创设于1505年并已于1540年权力十分强大、喜欢寻衅的掌玺大臣公署[148]……我们要了解——我不使用判断一词——情况，就不要忘记西班牙人发现他们自己正像昨天法国人在阿尔及尔，荷兰人在巴达维亚或者英国在加尔各答一样，深深陷入一种殖民主义事业中，陷入两种互相竞争的文明形成的大漩涡中。这两种文明波涛汹涌的水流拒绝混合为一。

面对这个并非总是灵巧敏捷的西班牙殖民主义，一个结构更加紧密的土著社会在那里矗立起来。这个社会有自己的领导阶级（巴伦西亚没有，或者不再有这个领导阶级）。这个阶级是阿尔贝森

的富人,是一群身穿绫罗绸缎、谨慎小心、秘密行事、统治着一群从事园艺耕作者的贵人。这群从事园艺耕作的人,是养蚕人,是长于挖掘肥水灌溉沟渠或者维修保养台坡作物的矮墙的农民。这个阶级也统治着一群赶骡子的人、小商人、转卖商和手工业者——织布工、染工、鞋匠、石匠、白铁匠。这些手工业者常常同来自北方的手工业者竞争,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办法和原则。所有这些穷人、所有这些卑贱者,都身穿棉衣。阿尔贝森的贵族没有经受一切考验的勇气,未来将非常清楚地证实这一点。他们担心自己的声誉受到损害,担心失去他们的"卡尔门内",即他们的乡间别墅。此外,一部分格拉纳达的贵族或者至少他们最杰出的代表,在格拉纳达陷落之后不久,就离开了西班牙。但是,这个领导阶级保存了它的某些成员、它的传统和它对门第、血统,对大王朝的盲目的、狂热的崇拜。在1568年的叛乱中产生了与加速格拉纳达的陷落的纠纷相类似的氏族纠纷。

这个残存的贵族看见自己旁边和上面一个新近迁入的基督教贵族成长起来,资财甚丰,深得宠信(虽然受宠程度不如在巴伦西亚),厚颜无耻,以榨取它的摩里斯科人农民的血汗为生。这些农民因为朴实而更容易受人剥削。据估计,一个摩里斯科人的消费比一个基督徒少一半。这句谚语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谁抓到摩尔人,谁就抓到黄金;抓到摩尔人越多,财富就越多[149]……

基督教领主是摩里斯科人农民的保护人。他们长期被承认有权在自己的领地上庇护逃自邻近领地的犯人。后来,国家想要恢复格拉纳达的秩序,废除了这项特权,并把在教堂内的避难权限制为几天。格拉纳达法院的文士企图削减大贵族及其首领——王国的

大统领——的权利，换句话说，门多萨大家族的权利。这个举动从1540年起特别明显，但在这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于是，逐渐建立了一个依靠基督教城市和在格拉纳达的移民来对抗门多萨大家族的军事的和领主的政府的平民政府。这次政治和社会危机虽然本身并没有单独拉开战争的悲剧的序幕，但是，它加深了紧张和混乱的局势。在同一个时期，菲利普二世的政府寻求财政来源，至少从1559年起就开始对财产证书的有效性表示异议。最后，格拉纳达的情况同巴伦西亚一样，人口剧增，在经济困难的助长下，出现了盗匪劫掠。强盗——古时安达卢西亚的摩尔人拦路抢劫强盗——无法再在领主家中或教堂中避难，于是逃往高山野林，与他们在城市里的同伙，摩尔人士兵、流氓、歹徒，或者与柏柏尔海上行劫者，或者与土耳其海上行劫者内外勾结，[150]突然下山袭击，打家劫舍。1569年，在叛乱开始几个月后，当蒙德哈尔侯爵刚刚开始对阿尔普哈拉进行征讨惩罚时，一切尚能再次通过贵族居中斡旋获得解决。胡利奥·卡罗·巴罗哈在他的关于摩里斯科人的优秀著作中特别谈到这一点，并且谈得十分中肯。[151]但是，问题是否因此得到了解决？是否带来了真正的和平？各种文明比各种社会更加苛严。它们发起怒来，残酷无情，而且久不平息。我们必须尽力设法看到的，是仇恨、残酷、互不理解等可怕的面目，而不要过久地停留在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谈到的战争的问题上。[152]

格拉纳达的悲剧

所有的“殖民”战争都意味着两种文明的冲突和激烈的、阴险的、盲目的狂热激情的侵入。由于西班

牙的政策自 1502 年以来在格拉纳达,自 1526 年以来在巴伦西亚,并且一直在阿拉贡,都在有利的情况下得到贯彻执行,因此一切合理的借口和算计都消失了。这项政策毫不费力就分化了敌人,阻止了叛乱从一个地区蔓延到另外一个地区。它在一个时期只需要对付一个摩里斯科人问题:在 1499—1502 年对付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问题;在 1525—1526 年对付巴伦西亚的摩里斯科人问题;以后在 1563 年[153]的一段很短的时间再对付巴伦西亚的摩里斯科人问题;1575 年[154]对付阿拉贡的摩里斯科人问题(但是情况并不十分令人惊恐);1580 年[155]对付卡斯蒂利亚的摩里斯科人问题;1584 年[156]对付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问题;1609 年[157]再次对付巴伦西亚的摩里斯科人问题;1610 年再次对付卡斯蒂利亚的摩里斯科人问题;1614 年再次对付阿拉贡的摩里斯科人问题。西班牙政府也密切监视外部边境,试图在比利牛斯山和地中海方面对逃跑的摩里斯科人关闭边境。这种警惕性虽然不能阻止他们逃跑,但至少使他们更加难于逃跑。例如 1550 年[158]以后巴伦西亚海岸的情况就是这样……根据西班牙的观点,这些是经验丰富的、政治上明智的、讲求实效的行政当局的明智之举。在军事会议和国务会议中听取摩里斯科人农民的领主的呼声和意见,在政治上也同样是明智之举。军事会议乐意接待这些领主。[159]西班牙在摩里斯科人的地区和在别处一样,被迫让高等贵族充当中间调解人。

然而这些治国理政的良好法则,却在紧急危险的时刻被人违反。有关当局先于 1568 年,后来又于 1569 年,不遵从蒙德哈尔侯爵的忠告,而是听信了红衣主教埃斯皮诺萨和格拉纳达法院狂热的院长东·佩德罗·德·德萨的偏见。这两个人都是文士的代表,

是那些人们如果听任他们为所欲为他们就会逐步把他们的法律强加给西班牙人并对西班牙人进行统治的不受教会约束的教士的代表。一个编年史学家[160]说，固执的红衣主教在并不是他干的那一行上很坚决。这一行当然就是用兵打仗。实际上，引发爆炸，首先在马德里引发爆炸，难道不是已经万事俱备了吗？但是，这一点却没有被人预先料到。自从 1526 年巴伦西亚地区兄弟会叛乱发生以来，摩里斯科人已经温和平静了 40 多年。即将点燃火药的国事诏书制订于 1566 年 11 月 17 日，公布于 1567 年 1 月。对这道诏书讨论了两年多，它给摩里斯科人和他们的保护人这样一个印象：妥协仍然可能，必要时可以支付一笔巨款来换取诏书的缓期执行。然而，菲利普二世的顾问们在这份文件上决定的，完完全全是对整整一种文明，对整整一种生活艺术的不容上诉的判决：摩里斯科男人和女人的服装遭到禁止（女人在街上不得戴面纱）；举行秘密的伊斯兰教宗教仪式的房屋遭到封闭；摩里斯科人的公共澡堂也被封闭；最后，阿拉伯语也被禁止使用。说得更确切些，他们的意图是清除一切被怀疑仍然存在于格拉纳达的伊斯兰教的痕迹。由于在谈判中讨价还价，拖延不决，激烈分子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在济贫院的秘密会议和募捐活动中以及在摩里斯科人在格拉纳达维持的复活节慈善会的秘密会议中和募捐活动中策划阴谋，准备行动[161]……

最后，1568 年圣诞节之夜，摩尔人拦路抢劫强盗渗入阿尔贝森，试图煽起暴乱。阿尔汉布拉正好面对阿尔贝森，它的保卫者不到 50 人。然而，这个地方并没有受到袭击。这个土著城市没有叛乱……在民众的狂热激情和暴行掺混进来后，在发生了基督徒和

他们在阿尔普哈拉的神父遭到杀害,平原遭到袭击以及双方又追捕对方的人员等事件后,战争才爆发了。这是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无组织的、蔓延到广大荒野和穷乡僻壤的屠杀。当国王最后准许老基督教徒有权任意抢劫,特许他们自由行动,为所欲为时,[162]就火上加油,给了这场战争新的动力,并把它推向极端。抢劫畜群、丝绸包、隐藏的财宝、珠宝,捕抢奴隶,这就是战争每天的真实情况。至于士兵和军需官偷窃农作物等事就更不必说了。在阿尔梅里亚附近的萨尔达斯,摩里斯科人把他们的基督教徒俘虏卖给柏柏尔人"一个人换一支喇叭口火枪。"[163]在格拉纳达,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拍卖的奴隶。基督教徒居民梦想一下子扑向摩里斯科人的城市,进行一次一劳永逸的抢劫[164]……激情、狂热、恐惧、混乱、怀疑等掺混一起。获得胜利但并不安宁的基督教的西班牙,生活在对土耳其的干涉所怀有的恐惧中,这次干涉的计划在伊斯坦布尔进行讨论。[165]早在 1568 年以前或者晚些时候,西班牙总是低估伊斯兰世界的威胁。

叛乱分子在试图重建格拉纳达王国的行动中,只使得一个幽灵得以复活。然而,他们的这种努力、叛乱分子的第一个国王的加冕典礼、阿尔普哈拉的一座清真寺的重建、对基督教教堂的亵渎等,从本章的观点看来,都是重要的……这的确是一种试图复活然后又再度跌倒在地上的文明。

由于奥地利的唐·胡安(1569 年 4 月 13 日接替蒙德哈尔侯爵统率部队[166]),为取得胜利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此极端的措施占了上风,盛行一时。1570 年 4 月,叛乱分子开始成批投降……战争实际上已告结束,叛乱已从内部瓦解。甚至上一年,即 1569 年 6

月，驱逐行动已经开始。格拉纳达的 3,500 个摩里斯科人(从 10 岁到 60 岁)已从首都运送到附近芒什省的首府。1570 年 10 月 28 日发布了驱逐全部摩里斯科人的命令。11 月 1 日，这些不幸的人遭到围捕，被捕后排成长队，带上苦役犯的镣铐，[167]流放到卡斯蒂利亚。这样一来，叛乱还剩下的活动由于没有得到当地居民的援助而彻底失败。这些居民过去表面上和平，实际上却同叛乱士兵串通一气，并保证这些士兵的给养。[168]高地的叛乱后来只有几百个拦路抢劫者参加。一则热那亚的通讯说他们像强盗那样进行一次小规模的战争。[169]一切似乎都已完结，并且永远完结。大批移民——加利西亚的、阿斯图里亚斯的或者卡斯蒂利亚的——约 12,000 个农户，成群结队来到格拉纳达的已经走得空无一人的村子。与此同时，从被征服者那里卤获来的战利品出售给领主、寺院和教会。据说国王从中获得巨额钱款。然而，事实上什么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农民殖民化很快就以失败告终。[170]并非所有的摩里斯科人都离开了不幸的王国。某些人去而复返。1584 年，[171]又得重新驱逐他们。1610 年驱逐再次开始。[172]

格拉纳达事件的后果

人们使格拉纳达摆脱了摩里斯科人问题，却使卡斯蒂利亚，特别是新卡斯蒂利亚，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合上了一个案卷，其结果是打开了另外一个案卷。格拉纳达的难民到处安插下去，像树木接枝一样，很快就蔓延扩散[173]、发财致富，又变得令人惊恐不安起来。他们难道不正是由于勤劳因而在一个被贵金属淹没并且居住着大批劳动对之说来就是降低身份

的西班牙末等贵族的地方注定要发财致富吗？大约在1580年—1590年，即不到20年后，格拉纳达的问题奇怪地变成了卡斯蒂利亚和安达卢西亚的问题，危险不断接近西班牙的心脏地区。那里又是草木皆兵、一片惊恐。再次有人寻求采取激烈的解决办法。现在，格拉纳达(当然该地区还留下一些摩里斯科人)的情况倒不如塞维利亚、托莱多或者阿维拉等地的情况那样严重。1580年夏天，在塞维利亚揭露出一个与摩洛哥有关的大阴谋。当时急欲依靠西班牙的谢里夫的大使对这个阴谋进行了彻底的揭露。[174]1588年春天，一些动乱开始露头。这次动乱发生于阿拉贡。[175]这些动乱使得有关当局7月份开会讨论。[176]会上提出了这个人数不断增加的内部敌人的存在对西班牙构成的危险。会议希望国王陛下不要重犯1568年在格拉纳达所犯的错误，还希望国王陛下立即发动进攻。这种惊恐不安的情绪最初是一次发生在几百个摩里斯科人和老基督教徒互相打骂之后的暴动引起的。[177]它很快就平息下来。那不勒斯总督对这次暴动很不相信，以致他5月份毫不犹豫地宣称这是英格兰进行宣传时散布的谎言。[178]

这些惊恐的情绪，除了是某些神经质的表现以外，也许还是个借口。因为，从同年11月起，西班牙教会再次进行干预。它的代言人托莱多红衣主教参加了国务会议，并把宗教裁判所派驻托莱多的委员胡安·德·卡里略的报告作为他的依据。[179]他的证词说，在这座那里的莫德哈尔摩里斯科人的老居留地已于1570年因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大批涌入而得到加强的城市里，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即流放者，在他们自己之间讲阿拉伯语；而与此同时，往往是文书信件代书人和精通西班牙文的莫德哈尔摩里斯科人则企

图钻进要职高位中。在这两类人中，经营商业、发财致富者为数颇多。所有像魔鬼一样的异教徒从来不做弥撒，从来不在大街上伴送圣体。他们只是因为怕遭到制裁和惩罚才忏悔。他们在自己内部结亲，把小孩隐藏起来，以避免小孩受洗。要让小孩受洗时，他们就在教堂的台阶上随便找一个遇到的人当孩子的教父。除了为无法接受临终涂油礼的垂死的人要求举行这种宗教仪式外，他们从来不提出这种要求。由于负责监督和教育这些异教徒的人很少，这些异教徒就随意到处流浪。尽快研究讨论这件事成了国务会议的当务之急。

1588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根据红衣主教的提议，国务会议研究讨论了这件事。这位主教陈述了自己的情况和理由。[180]当老基督教徒被征召入伍，加入“民兵”，数量日减并且装备很差，冒着有朝一日会遭受突然袭击之险的时候，对摩里斯科人的人数在卡斯蒂利亚，特别在他们的“城堡和要塞的”托莱多，令人不安地成倍增加这件事，人们难道会漠然置之吗？

关于这一点，国务会议一致认为，至少必须命令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在他们的管辖区内进行调查，并且进行一次对摩里斯科人的人口普查。

为人出坏主意，怂恿人为非作歹的恐惧情绪，就这样进入西班牙的心脏。第二年，即 1589 年，英格兰入侵，人们担心在塞维利亚为数甚多的摩里斯科人会援助入侵者。[181]1596 年，在巴伦西亚，同样的接触联系使人感到不安。[182]敌人在房屋内部的存在成了西班牙的政策最关注、忧虑的事，并因此以后使西班牙的政策改变了方向。用法文说就是：摩里斯科人插进了西班牙的心脏；用西班牙文

说就是:插进了西班牙的"肾脏里"。[183]1589年国务会议还是只限于讨论人口普查问题。但是,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第二年向国王提出几项狂热的建议:迫使摩里斯科人为了领取薪饷必须在帆桨战船上服役一段时期,这至少能防止他们人数增加;把摩里斯科人的小孩同他们的家庭分开,以便把这些孩子交给领主、神父或者负责教育孩子的手工业者;处决最危险的分子,把在卡斯蒂利亚安家落户的格拉纳达人驱赶回他们早先居住的地区,借此把他们从有名的国家的中心赶走,[184]把他们从城市赶到农村。自从5月5日后,人们谈到干脆驱逐他们。西班牙国王从前对犹太人这样做过,并因而获得神圣的名声。[185]不受欢迎的摩里斯科人在精神上遭到国务会议全体成员的判决,无一例外。但是,这些受到判决的人将得到一个相当长期的宽限。

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西班牙仍然卷入荷兰事务中,同法国斗争,同英格兰对抗,因此在清理这一笔内部的帐之外还有其他任务。并不是西班牙的善良宽容,而是作为它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奇怪后果的软弱无力救了摩里斯科人,这正如绳索支承着吊着的人一样。在他们周围,愤怒和仇恨不断增长。一份1596年2月呈交国王的报告[186]对政府的政策放任这些异教徒为所欲为表示反对,并且指出他们拥有大量财富,指出他们之中在安达卢西亚和托莱多王国拥有2万杜卡托以上的人为数超过2万。这难道可以容忍吗?这份报告揭发了一个在马德里定居的名叫弗朗西斯科·托莱达诺的托莱多的摩里斯科人。他是当地最富有的铁商。这个人由于从事批发交易而成为比斯开和维托利亚两个地方的掮客,并且利用经商之便做武器和短枪生意。国王陛下被恳请立即逮捕这个人并

公布他的顾客和同谋者的姓名。

1599 年，国务会议又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国王应该作出决定，应该立即作出决定，这就是所有建议的结论。在签名的人中再次出现托莱多的红衣主教，此外还有 D. J. 德·博尔哈、D. J. 德·伊迪亚克斯、钦琼伯爵、佩德罗·德·格瓦拉等人[187]。在保存在锡曼卡斯的关于这些讨论的大量文献资料中，为摩里斯科人辩护的一份也找不到。[188]

讨论的结尾是 1609—1614 年进行的驱逐。各种形势和时机结合在一起，终于使这次驱逐行动成为可能。这些形势和时机是：和平的恢复（1598—1604 年，1609 年）以及暗中对整个西班牙舰队——大帆船和帆桨战船——进行的动员。[189]这支舰队能够保证登陆和行动的安全。J. C. 巴罗哈认为，马拉喀什的素丹 1609 年春季对非斯“国王”取得的胜利，可能促使西班牙作出这些根本性的决定。这可能是事实。[190]

同化伊比利亚伊斯兰教徒的长期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这是一个当时被人清楚地感觉到的失败。非常坚决拥护这一驱赶行动的巴伦西亚大主教在进行驱赶的时刻却问道：“以后什么人为我们做鞋子呢？”摩里斯科地区的封建领主寻思，以后什么人种我们的地呢？人们事先就已经知道，驱赶这个行动会造成严重的创伤。此外，阿拉贡的王国代表反对这次驱赶。1613—1614 年，胡安·波蒂斯塔·洛巴纳为了绘制地图走遍这个王国。他多次在笔记中记下荒无人烟的村庄的凄惨景象：在隆加尔斯，1,000 个居民只剩下 16 人；在米埃达斯，700 个居民只剩下 80 人；在阿尔法门，120 个居民只剩下 3 人；在克兰达，300 个居民只剩下 100 人[191]……一些

历史学家曾经说过并且一再重复，所有这些创伤久而久之都会愈合。这是事实。[192]亨利·拉佩尔最近指出，在可能为800万的总人口中，最多驱赶了30万人。[193]虽然这大大低于过去夸大了的数字。但是，对当时的西班牙说来，这个数字仍然是巨大的。同时，亨利·拉佩尔[194]认为，当时直接造成的创伤是严重的。17世纪出生率的下降推迟了创伤的愈合。

然而，最难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西班牙是否为这次驱赶以及为为此而采取的暴力政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或者它这样做是否有理。问题也不在于用我们今天的观点再来打这场官司。所有的历史学家当然都同情摩里斯科人……西班牙自己抛弃这个勤劳、繁衍迅速的摩里斯科民族是得策还是失策，这无关紧要。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首先是因为摩里斯科人仍然无法同化。西班牙采取行动，不是出于种族仇恨(在这次斗争中似乎不存在这种仇恨)，而是出于文明仇恨和宗教仇恨。它的这种仇恨的爆炸——驱赶——是它对自己的软弱无力的供认，其证明就是摩里斯科人根据具体情况，在一两个世纪或者三个世纪以后依然故我。服装、宗教、语言、有回廊的房屋、摩尔人的浴室等，他们统统保存下来。他们拒绝西方文化，这是冲突的核心。在宗教领域里的几个引人注目的例外以及城市里的摩里斯科人愈来愈采用征服者的服装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195]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西班牙人很清楚，[196]摩里斯科人同一个幅员广大、一直延伸到遥远的波斯、有类似的房屋、习俗和相同的信仰的世界是心连心的

所有对摩里斯科人的一切抨击、谩骂都可以概括在托莱多红

衣主教的声明里："这是像阿尔及尔伊斯兰教徒一样的真正的伊斯兰教徒。"[197]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指责红衣主教不容忍异教的态度，但不能指责他的话与事实不符。国务会议成员建议采取的解决办法证实了这一点。问题不在于消灭一个被人憎恨的种族。但是，在西班牙国内保持一个顽固不化的伊斯兰核心似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该怎样办呢？或者通过消灭一切文明的支柱——人的材料——一下子把这个核心拔掉。这是最后采取的解决办法。或者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强迫洗礼这个措施没有圆满地实现的同化。于是有人建议只保存具有可塑性的材料——孩子，并且赞助成人离开西班牙前往柏柏尔，条件是他们离开时谨慎行事，不事声张。另外又有人，例如德尼亚侯爵这样认为：必须采用基督教的方式来抚养教育孩子；从 15 岁到 60 岁的男人送去服终生划帆桨战船苦役；女人和老人送去柏柏尔。这个侯爵认为，只需按 1 户摩里斯科人对 50 户老基督教徒这个比例把摩里斯科人分配到各个村子就行了，同时还禁止他们迁居和从事农业以外的职业，例如工业、运输业及商业等，因为这些职业的缺点就在于利于迁移和与外界交往。[198]

西班牙选择了所有办法中最彻底的办法：流放，把植物从地里连根彻底拔除。

然而，是否所有的摩里斯科人都从西班牙的土地上消失了呢？当然不是这样。首先，在某些情况下，分清摩里斯科人和非摩里斯科人并非易事。混合婚姻数量之多使得驱逐敕令需要对这种情况加以考虑。[199]其次，一些有关的当事人进行了干预。他们无疑解救了大批本来会遭受打击的摩里斯科人。城市里的摩里斯科人几乎全部被驱赶。住在王家领地上的摩里斯科人被驱赶的比例稍小。至

于领主的土地上的摩里斯科人、山民、独居一地的农民……等的例外情况就更多了。[200]

最后，摩里斯科人就往往这样混杂、消失在群众中。但是，他们仍然留下自己不可磨灭的印记。[201]西班牙的基督教居民，甚至他们的贵族，难道不是已经有了这种摩尔人的血统的印记吗?美洲的历史学家也通过多种方式肯定摩里斯科人参加了对美洲的殖民。[202]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即：穆斯林文明受到摩里斯科人的残余和西班牙若干世纪以来从伊斯兰教吸收来的事物的支撑、维持，不断促进西班牙半岛的复合文明，甚至在1609—1614年驱赶摩里斯科人行动之后，情况也是这样。

仇恨的巨浪不能卷走已经永远在伊比利亚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的一切事物。这些是：安达卢西亚人的黑眼睛、数以千计的阿拉伯文地名、几千个已经进入从前的被征服的种族的词汇中的词。这些从前被征服的种族今天已经成了西班牙的统治者。有人会说，这是死的遗产。烹调技术、[203]某些行业、等级制度结构和领导管理的职能，仍然在西班牙或者它的邻国葡萄牙的日常生活中传播伊斯兰教的声音，这些都无关紧要。然而，当18世纪法国国势鼎盛并在欧洲具有优势的时期，在半岛上仍然保存着一种活的艺术，一种真正的莫德哈尔的艺术。这种艺术有它的灰墁、陶瓷制造术和它的蓝色彩釉瓷砖的柔美的色彩。[204]

西方的霸权

但是，摩里斯科人问题只不过是一场范围更广的冲突的插曲而已。在地中海，规模巨大的争斗在东西

方之间进行，在永远存在的“东方问题”上进行。从根本上讲，这个问题是一场文明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按照拥有优势的一方的意愿停后复起。这场赌赛使冲突双方交替地拥有优势。好牌从一方手里传到另一方手里。主要的文化潮流根据一方或者另外一方占上风的情况确定下来，从比较富的文明导向比较穷的文明，从西向东或者从东向西。[205]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下的西方打赢了第一个回合：古希腊文化代表中东和埃及的第一次“欧洲化”。这次“欧洲化”后来一直延续到拜占庭时代。[206]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和第五世纪的大规模的入侵，西方和它古老的遗产崩溃了。现在是拜占庭和伊斯兰教的东方保存或者收集财富并且在几个世纪内把这些财富投掷、传送到野蛮的西方。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和在十字军东征之后，我们的整个中世纪都被东方的光辉穿透、照亮。“东西方两种文明通过它们的军队混合起来。大量叙述这些遥远的世界的历史和故事广泛流传。《圣徒传》充满这些故事。圣厄斯塔什传、圣克里斯托夫传、塔伊斯传、埃费斯的七个睡眠者传、巴尔拉姆传、约萨法特传都是东方的寓言。圣格拉尔传插进阿里马蒂的约瑟夫的回忆中。波尔多的于翁的传奇故事闪耀着仙境之王的魔力的幻景。仙境之王是晨曦和震旦的精灵。圣布朗丹的历险记只不过是水手森巴德[207]的险遇的爱尔兰版而已。”这些借用只代表内容丰富的文化交流的总内容的一部分。勒南[208]写道：“这样的在摩洛哥或者在开罗创作的作品，在比今天一本重要的德国书渡过莱茵河所需的时间还少的时间内，就在巴黎或者科隆为读者所知了。只有作了关于13、14世纪的学者所熟读的阿拉伯著作的统计以后编写

出来的中世纪的历史,才会是一部完整的历史。"神的喜剧在穆斯林文学中的根源被人发现。阿拉伯人在但丁看来是应该摹仿的伟大楷模。[209]圣让·德·拉·克罗瓦有一些奇特的穆斯林先驱。这些先驱之一龙达的诗人伊本·阿巴德早在他之前很久就发展了"黑暗之夜"[210]的主题。对以上种种人们会感到惊讶吗?

从十字军东征的时代起,一个反方向的运动正在完成。基督教徒占领了海洋。对道路和贸易的控制带来的优势和财富,从此属于基督教徒。这些交替现象阿尔弗雷德·赫特纳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他断言16、17、18世纪[211]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接触减少了,这显然是错误的。相反,"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关于欧洲人的旅行的叙述,在欧洲的各种语言中成倍增加"。这是因为东方"向常驻大使、领事、商人侨民、经济调查使团、科学使团、天主教使团……向为土耳其人效劳的冒险者敞开了旅居的大门"。[212]于是发生了西方对东方的入侵。这是一种包含着统治概念和因素的入侵。

但是,让我们回到16世纪的西方来吧!在这个时期,西方远远胜过东方,把东方抛在后面。尽管费尔南·格雷纳尔提出了他自己的论据,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确认这一点,决不是对两种相互对峙的文明作这种或者那种价值评断,而是确认:在16世纪,交替运动进行得对西方有利;西方的文明更加强劲有力,使伊斯兰文明从属于自己。

仅仅人的迁居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人们从基督教世界蜂涌前往伊斯兰世界。后者以它提供的奇遇和巨利的远景吸引这些人。它使他们得到好处。素丹需要手工业者、织布工、造船专家、经验丰富的水手、大炮铸造工匠、构成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力量的"五金制

品工匠"(指各种金属)。蒙特克雷斯蒂安写道[213]:"这一点土耳其人和其他民族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能够抓住这些人的时候,就把这些人留下来。"一个君士坦丁堡的犹太商人和的黎波里的莫拉特·阿加之间的一次奇怪的通信表明:这个犹太商人寻找能够织造丝绒和花缎的基督教徒奴隶,[214]俘虏在提供劳动力这个方面也扮演着他们的角色。

这是因为基督教世界人口太多,还没有充分进行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化活动,因此不减少向东方的移民吗?基督教徒在与伊斯兰国家接触时,往往受到转变为伊斯兰教徒的强烈欲望的支配。在非洲海岸驻防地,西班牙卫戍部队中的开小差之风这种瘟疫,使这些部队大量减员。1560 年,在杰尔巴岛,在堡垒投降土耳其人之前,很多西班牙人"扔掉他们的信念和同伴"[215]加入敌军。不久以后,在拉古莱特,一个准备把要塞交给非基督教徒的阴谋被人发现。[216]一些船只经常从西西里岛出发运走大批准备参加背教者的行列的人。[217]在果阿,在葡萄人中存在着同样的现象。[218]召唤是如此强有力,以致它连教士也不放过。那个陪同法国国王的大使返回法国,西班牙当局被劝说在他经过时加以逮捕的"土耳其人",是个过去的匈牙利神父。[219]这种情况不会罕见。1630 年,人们要求约瑟夫神甫召回散居黎凡特的嘉布遣会修士,"担心他们变成土耳其人"。[220]一些背教者从科西嘉、撒丁岛、西西里、卡拉布里亚、热那亚、威尼斯、西班牙,从地中海世界各地奔向伊斯兰世界。没有任何类似的反方向的流动。

土耳其人可能不自觉地打开了大门,而基督教徒却不自觉地把门关上。基督教的不宽容是它的信徒的巨大数量产生的后果。它

不欢迎异乡生客;它拒人千里之外。所有被它从它的地区驱赶出来的人——1492 年是犹太人,16 世纪和 1609—1614 年是摩里斯科人——加入了志愿离乡背井者的队伍。他们全都前往伊斯兰世界。那里可以找到工作和金钱。这件事最好的标记,是犹太人的移民潮流。特别在 16 世纪下半叶,从意大利或者荷兰到黎凡特,存在这股潮流。这是一股强大迅猛得没有逃过在威尼斯的西班牙代理人的眼睛,使他们警觉起来的潮流。因为这些奇怪的移民活动,是通过这座小城市进行的。[221]

16 世纪的土耳其通过所有这些人完成了自己受的西方教育。菲利普·德·卡纳伊 1573 年写道:"土耳其人通过这些背教者获得了基督教的所有优势。"[222]"所有"一词是夸大之词,因为土耳其刚刚获得这些优势中的一个,又发现了另外一个。这另外一个它还没有。

这是一种使用各式各样的、或大或小的、或者高尚的、或者卑下的手段进行的奇异的竞赛或者奇异的战争。某天,敌人需要一个医生;另一次需要西方高水平的炮兵学校培养出来的一名炮手;再一次需要一个地图绘制员或者画家。[223]敌人可能寻求贵重的货品:火药、制作弓弩的柴杉木。不错,这种树生长在黑海沿岸(既然威尼斯人在那里找到了一些转卖给英格兰[224]),但不够 16 世纪土耳其军队的消耗。于是它从德意志南部进口这种木材。[225]1570 年,拉古萨被威尼斯指控——真是天大的讽刺——把火药、船桨,特别是把一个犹太外科医生[226]交给土耳其人,而拉古萨自己也往往找意大利医生。[227]这个世纪末,欧洲在东方最重要的贸易之一是铅、锡和铜的贸易。

在纽伦堡铸造的大炮可能运交土耳其人。不论武器、人员，或者像瓦拉几亚的一个王侯给喀琅施塔得的人的信所指出的那样，医生、药品等，君士坦丁堡也通过拉古萨或者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逊城市，从它的边境地区得到供应。[228]柏柏尔国家尽管贫穷，的确"野蛮"，也同样对首都效劳。这些国家奇怪地(很明显，它们是在穆斯林世界里)最接近西方的技术的最新发展。因为通过它们的志愿的或者非志愿的移民，通过它们在地中海西半部的位置，还通过不久以后它们同荷兰人的联系，它们最先得到关于技术方面的新事物的信息。这些国家有自己的工人。这些工人是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者每年夏天捕获的大批俘虏和安达卢西亚人。安达卢西亚人是能工巧匠。他们之中有的能制造喇叭口火枪，全部都会使用这种武器。[229]1571年后，土耳其大舰队的改造以及它按照西方的方式进行的装备(火枪取代了弓弩，大炮在帆桨战船上大大加强)，是一个由阿尔及尔海上行劫者训练出来的背教者、一个名叫厄尔杰·阿里的那不勒斯人的功绩。这件事难道纯粹是巧合吗?

但是，文化借用并不经常发生。1548年，土耳其人在他们对抗波斯的战役中，曾经试图改换土耳其骑兵的武器装备，并用手枪把他们装备起来。(布斯拜克明确指出，这是骑兵使用的最小的手枪。[230])这个企图陷入一片嘲笑声中。土耳其骑兵在勒班陀战役和以后的战争中仍然用弓箭装备。[231]这个普通的例子表明，对土耳其人来说，模仿敌人是何等困难。如果没有敌人内部的分裂、争端和背叛，土耳其人尽管纪律严明、狂热盲信、骑兵精锐、装备精良，也是无法顶抗西方的。

所有外界的赠予，[232]都不足以使土耳其世界免遭灭顶之灾。这

个世界从16世纪行将结束之时起，就有沉没的危险。到那时为止，战争已经大力帮助它取得必要的财富、人员、技术或者技术带来的成果，帮助它在陆上、海上或者沿着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一线的地区占有肥沃富饶的基督教世界的几块土地。加索特在君士坦丁堡的兵工厂里看见大炮堆积如山。这些大炮更主要是通过胜利的战争获得的，而不是使用巧妙的手段购买的或者就地制造的。[233]战争是各种文明的平衡器。这是一篇要进行答辩的论文。上面谈到的战争从1574年起在地中海导致交战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并于1606年在匈牙利战场导致从那时起就不可能超越的对峙平衡状态。那时出现了一种以后变得更加清楚的劣势。

很多基督教徒的确在关于奥斯曼在17世纪的最初的几年的前途这个问题上弄错了。在这些年月，十字军东征的计划再度大量出台。[234]但是，难道不是欧洲的分裂和三十年战争的开始使人对奥斯曼的力量产生了假象并且拯救了它庞大的帝国吗？

3. 一种同所有其他文明对抗的文明：犹太人的命运[235]

到目前为止所谈到的每次冲突，都局限于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但是，面向犹太人的时候，所有的文明都成了诉讼的一方，而且每次都处于占压倒优势的地位。这些文明是一股力量、一个群体。犹太人则始终是它们的极其势单力孤的对手。

但是，这些对手却有奇怪的良好机会：当一个君主迫害他们时，另外一个君主却保护他们；当一种经济使他们倾家荡产时，另

外一种经济使他们发财致富；当一种伟大的文明抛弃他们，另外一种伟大的文明却欢迎他们。1492 年西班牙驱逐他们，土耳其却接纳他们，乐于利用他们来对抗希腊人……正如葡萄牙的犹太人的情况充分显示的那样，他们也可能施加压力，代位行使诉权。[236]他们拥有钱财收买共谋。他们在罗马有一个通常忠于他们的事业的大使。因此，没有什么事比让里斯本政府采取的反对他们的措施束之高阁更加轻而易举了。正如 1535 年 12 月路易斯·萨尔米恩托[237]向查理五世解释的那样，这些措施通常都被收回、撤销或者被弄得毫无效果可言。改宗的犹太人已经获得教皇宽恕他们过去的错误的谕旨。这将妨碍政府的行动，特别因为这些改宗者已经贷款给葡萄牙国王，情况就更是这样。这个国王债台高筑，负债达 50 万杜卡托之多，剩下的他在佛兰德“和在外汇交易方面欠下的债款”还不计算在内。这时民众不断抱怨这些干鱼商人——改宗的犹太商人。干鱼是穷人吃的一种臭鱼。1604 年 10 月，即葡萄牙宗教裁判所于 1536 年建立之后半个世纪，一封迟到的威尼斯来信“凶狠”地说，民众对他们极为不满，抱怨连天。

最弱小的人也有武器：忍从、从犹太教法典学来的巧妙敏锐的特性、狡黠、顽强、勇敢，甚至英雄行为。[238]犹太人不论在那里总是显得很能适应周围的环境。这就使他们的情况对历史学家来说似乎变得更加复杂。他们证明自己对接触到的文明，不管是持久的或者是短暂的，都能很快适应。犹太艺术家和作家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难道不是真正的卡斯蒂利亚的、阿拉贡的或者其他地方的艺术家和作家吗？他们对强加给他们或者向他们提供的最卑下和最显赫的社会地位也适应得同样快。他们好像危险地濒临文化的毁灭

和本体的弃失。关于后者我们知道不少事例。但是,他们通常成功地保护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称为他们的“基础人格”的东西。他们把自己严密地锁闭在自己的信仰里,锁闭在一个任何事物都无法把他们从那里赶出来的世界的中心。这种顽固性,这些对外来事物的拚死抗拒行动,正是他们的命运的特点。基督教徒抱怨有钱的马拉内(这是对中世纪在西班牙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的贬称)[239]暗中坚持信仰犹太教,是有道理的。的确存在着一种犹太文明。这种文明是如此独特,以致它并不总是被人承认具有真正的文明的性质。然而,这种文明在发光,在传播,在抵抗,在接纳,在拒绝。它具有我们指出的文明的所有特征。不错,它没有扎根,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它的根扎得不深。它拒绝服从任何稳定的、永久不变的地理的迫切需要。这是它最突出的特征,但不是唯一的特征。

一种确实存在的文明

这种文明的躯体是分散的。它像很多细小的油滴洒落、散布在其他文明的深水的水面上,永远不同这些水真正混合,但又始终依附它们,以致它的运动也是别的文明的运动,因此是一种异常敏感的“显示器”。埃米尔—费利克斯·戈蒂埃试图找到一种与犹太人聚居区等同的物体。他举出一个本身十分微不足道的北非的莫桑比克人的例子。莫桑比克人散居在本身也很小的殖民地里。[240]人们可能由此也想到亚美尼亚人。他们是山地农民,在文艺复兴时期变成从菲律宾到阿姆斯特丹这一线的国际商人。人们甚至还会由此想到印度的祆教徒或者亚洲的

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最根本的是，要承认存在着犹太人(聚居区型的各种文明。这些文明把它们无数的岛屿散布在外国的水域里。这些文明比人们乍看之下所想象的数量多得多。例如从8世纪穆斯林征服北非起到13世纪迫害阿尔摩哈德家族止的这段时期的北非的各个基督教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次迫害几乎使这些社会灭亡。在某种意义上，欧洲在第三世界各国的殖民地在这些国家获得解放以前和以后的情况也是这样。甚至穆斯林文明的继承者，被西班牙用冷酷无情的仇恨行动粗暴地赶走的(正如我们已经阐述过的那样)摩里斯科人的情况也是这样。

如果这些小岛互相接触，整个局势就会完全改观。例如在中古世纪的西班牙，直到14、15世纪发生的残酷迫害以前，犹太社会倾向于构成一块几乎连接不断的、像一块布料那样的整体，一个教派的、一种信仰的国家，[241]一种土耳其人所说的“米勒特”，一种北非语言称为“梅拉赫”的东西。葡萄牙的独特之处是：1492年它的犹太居民因逃自西班牙的难民大量涌入而人数激增。黎凡特的独特之处具有同样的性质，而且出于同样的理由。在现代初期疆域突然扩大的波兰的情况也是这样。从15世纪起，由于犹太人在波兰数量增加，于是产生了犹太人的影响，并且几乎出现了一个民族中的民族，一个国家中的国家。这个国中之国后来被经济困难和17世纪的无情镇压，即1648年那几年的“大洪水”消灭。[242]在新生的、地广人稀的巴西，情况也是这样。直到16世纪，犹太人在那里比在别处较少受到威胁。[243]犹太居民的相对密度每次都起了作用，是个重要的因素。

但是，即使当人的数量不利于或者不能加强犹太人的存在时，

这些基本单位,这些小型社会,这些初级细胞,也被教育、信仰、商人的不间断的定期旅行、犹太教教士和乞丐等(他们数量巨大)连接在一起,也被不间断的商业的、友好的或者家庭的书信来往连接在一起,最后还被书籍连接在一起[244]。印刷术助长了犹太人内部的争吵,但更促进了犹太人的团结。这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的书籍,很容易就成倍增加起来。谁又能够烧毁或者没收这些书籍呢?某些流浪汉的具有典范性的生活故事,表明这些具有团结统一作用的联系活动的生命力。雅可布·萨斯波尔塔斯将近17世纪初生于西班牙占有的奥兰。他先在特莱姆森,然后在马拉喀什和非斯当犹太教教士。他被投入牢狱后越狱并逃往阿姆斯特丹,在该地的平托学院任教。后来他回到非洲,于1655年陪同梅纳斯·本·伊斯拉埃尔出使伦敦,其后重新担任犹太教传教士,特别自1666年到1673年在汉堡担任这个职务。之后,他返回阿姆斯特丹,被召往里窝那,接着又回到阿姆斯特丹,并死于该地[245]……这些繁复的联系说明并且加强了犹太人命运的高度一致性。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在他的《论人类历史哲学思想(1785—1792年)》一书中写道:"犹太人在欧洲仍然是亚洲民族。对世界的我们的这一部分说来,这个民族是外来的。这个民族无法摆脱在某个遥远的人世间加在它身上的古老的规律的束缚。"[246]

然而,犹太人并不是一个种族,[247]所有的科学研究都作了相反的证明。从生物学观点看,他们的群体依存于它们与之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国家和民族。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德意志犹太人(或者阿斯克赫纳泽人),西班牙犹太人(或者塞法尔迪特人),是半德意志人、半西班牙人,因为血统混合的现象屡见不鲜。犹太区往往产

生于某个地方的就地改宗犹太教这一改宗行动。犹太人从来不让自己与周围的世界隔绝，从来不闭门不出。相反，他们经常向周围的世界把门大大敞开。再者，如果有时积累起来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竟然还没有导致不同居民的这种混合的话，这无论如何也是令人感到惊讶的。1492 年离开西西里，从此一去不复返的犹太人毕竟曾经在这里生活过 1500 多年。[248]

此外，犹太人并不总是单独另外居住一处，穿特别服装或者带有例如黄色贝蕾帽或者轮形帽之类的特别标记。1496 年一篇威尼斯的文章说："他们不在胸部正中佩戴用黄布制作的标记。"[249]他们并不总是居住在一个特别区域——"格托"(ghetto，这是在威尼斯指定给他们居住的地区的名称。有人猜测这个名称源出于这个地区过去是铸造工厂。在这个工厂里铁被"扔掷〔jeter，ghetta〕"入铸模内浇铸成大炮。)。[250]1540 年 8 月，那不勒斯的被人刻骨仇恨的犹太人仍然抗议下达的迫使他们"居住在一起并佩带特殊标志"的命令。这项命令是违反他们的特权的。[251]一年以后，这种刻骨仇恨得逞。其次，哪里还实施隔离法规，这项法规就会在哪里经常遭到违反破坏。在威尼斯，1556 年 3 月元老院的一项决议宣称，路过的犹太人和其他犹太人"最近不断散布到城内各处，在基督教徒家中住定下来，白天、晚上去他们愿去的地方。最根本的是让这种丑事不再发生，迫使犹太人住在格托里"。[252]"他们不得在除这里之外的任何地方开店。"将近同一个时期，来自土耳其的犹太人戴着白色头巾到达意大利。戴白色头巾是土耳其人享有的特权。当时犹太人的头巾应该是黄色的。勒芒斯的伯龙断言这是犹太人的欺诈行为。[253]他们盗用土耳其人的信义。在西方，土耳其人的信义比犹太

人的信义确立得更好。1566 年，米兰的犹太人被迫戴黄色帽子，但这还并不是一声警报。[254]

隔离往往推迟贯彻执行，并且即使执行，执行情况也很差。在维罗纳，1599 年(虽然人们至迟从 1593 年起就已经谈到这一点)，那些“分散在各处生活”的犹太人必须把居住地点固定在“城市的大广场附近”。[255]犹太人在那里“沿着一直通往圣萨巴斯蒂诺教堂的大街出售葡萄酒”，这条街因而被通俗地称为“希伯来人街”。[256]仅仅在 1602 年，在帕多瓦制定了一项类似的措施。直到那时为止。“大部分以色列人在这个城市四处散居。”[257]1602 年 8 月，曼图亚发生了几起事件，因为犹太人像别的任何人一样，戴着黑色贝蕾帽在那里散步。[258]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共处成了几个世纪的规律。在葡萄牙，民众最经常提出的要求之一与教皇对犹太人规定的义务有关。这项义务规定犹太人必须在他们的衣服上佩戴特殊标记，(1481 年的国会甚至说)以防止犹太人所习惯的对基督教徒妇女进行引诱的企图。犹太人并不遵从这项义务。犹太人裁缝和鞋匠在他们前去干活的农夫家里常常勾引农夫的妻女[259]……其实，犹太人在葡萄牙更主要是同贵族，而不是同平民百姓通婚。在土耳其，犹太人有男的和女的基督教徒奴隶，并且“在同女基督教徒奴隶性交时并不比同犹太女人性交时更感到疑惧不安”。[260]不管颁布什么样的禁令，并不是种族血统这种空谬乌有的力量，而是别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和犹太人对别人的憎厌维护着犹太社会。这一切都是宗教问题，是遗传的习俗、信仰甚至烹饪方式等组成的合成物产生的后果。西班牙国王的史官贝纳尔德斯[261]在谈到改变宗教信仰的犹太人时解

释说："他们永远不会丢掉犹太人的吃饭方式。他们用葱、蒜做荤菜，把肉放在油里煎，用油代替猪膘。"对现代读者来说，这就是对西班牙今天的烹饪的描述。但是，用猪膘烹饪，过去却是老基督教徒的习惯，而且正如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所说，油对猪膘获得的胜利，是犹太人的一项遗产，一种文化的转移[262]……当西班牙的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星期六故意忘记在家里生火时，同样露出破绽来。某天，一个宗教法庭法官对塞维利亚的省长说："大人，你如果要了解改变宗教信仰者怎样庆祝安息日，就同我一起到塔上去吧！"当他们到了塔上时，这个法官又对省长说："抬起眼睛，瞧瞧这些改变宗教信仰者住的房屋吧！不管天气多冷，星期六这天你永远看不见烟从他们的房子的烟筒冒出来。"[263]伊本·韦尔加（大约在 1500 年）讲述的这个故事有一种真实的味道。塞维利亚冬天的寒潮真是名符其实的寒潮……还有其他一些细小的、能显示某人是犹太人的标记：在黎凡特，犹太人"决不吃土耳其人、希腊人或者西欧人烧的肉，也不愿意吃基督教徒或者土耳其人烧的肥肉，也不喝土耳其人或者基督教徒卖的酒"。[264]

但是，所有的犹太社会当然都不得不同别的社会进行接触交流。有时这种接触交流是在当它们周围的占主导地位的文明的整个性质发生变化的时候，在引人注目的环境下进行的。在西班牙，穆斯林取代了基督教徒，然后，后者在复地运动中取得为时已晚的胜利，返回西班牙。过去讲阿拉伯语的犹太人开始讲西班牙语。他们在匈牙利的境遇同样不幸。在那里，由于神圣罗马帝国在从 1593 年到 1606 年这个时期内的推进，布德的犹太人有两种恐惧：

对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恐惧和对土耳其人的恐惧[265]……所有这些环境使他们成了周围文明的无意的继承人。接着,他们朝着这个方向或者那个方向传播这些文明的货物。他们作为哲学家、数学家、医生、宇宙志专家,直到13世纪,并且在这个世纪以后,都是阿拉伯思想和科学传入西方的中间人。15世纪,他们很快就对印刷术发生了兴趣。在葡萄牙,印刷的第一本书是《摩西五书》(圣经的头五卷)。这本书1487年由萨米埃尔·加孔在法罗印刷。10年后才在葡萄牙出现了德意志的印刷厂厂主。[266]如果人们想到由德意志人传入西班牙的印刷术1475年以前还没有到达这个国家这个事实,就可以测知犹太人印刷这些宗教圣文是何等急速。1492年犹太人被驱逐出西班牙,把印刷术带到土耳其。将近1550年,他们"把各类书籍统统译成希伯来文"。[267]建立一个印刷所是行善积德之举。例如纳克索斯公爵的遗孀让·米卡斯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科雷吉斯米的乡下就这样行善。[268]

1573年,威尼斯根据它1571年12月14日的决议[269],准备驱逐该地的犹太人。但是,自从勒班陀战役以来,时过境迁。索朗佐这时从他在那里担任总督职务的君士坦丁堡到达。听听一个犹太编年史作者[270]认为是他在十人参政会上的这番发言吧!"你们驱逐犹太人,这是个多么有害的行动啊!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会使你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是谁使土耳其人变得这样强大?除了在已经被西班牙国王驱逐的犹太人中间,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找到这样的能工巧匠来制造使土耳其人能够和其他民族较量的大炮、弓箭、炮弹、刀剑、盾牌和小盾牌呢?"将近1550年,法国一则对君士坦丁堡的描写[271]已经谈到:"那些人(西班牙的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

的犹太人）是让土耳其人知道对那些我们机械呆板地使用的东西怎样进行交易和处理的人……"

犹太人还有另外一个优势：他们在东方是各种会谈的天生的翻译。没有他们，什么事都办不成，或者不容易办成。勒芒斯的伯龙[272]解释说："那些离开西班牙、德意志、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犹太人把（这些地区的）语言教给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学习了他们要去那里居住并且和人交谈的国家的语言。这些语言可能是：希腊文、斯拉夫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亚美尼亚文和意大利文。住在土耳其的犹太人一般会讲四五种语言。有好些会讲 10 种或者 12 种语言。"索朗佐在埃及的罗塞塔发表了类似的意见。在埃及，犹太人"在土耳其统治的各个地方人数激增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个村庄没有他们居住，而且人数有增无已。因此，他们能讲各种语言，不仅通过充当我们的翻译，而且还通过让我们了解这个国家的情况为我们效了大劳"。[273]

在语言学方面，奇怪的是：在 14、15 甚至 16 世纪被从德意志驱赶出来的、后来使波兰的犹太人地区发迹富有的犹太人，传入了他们自己的语言——意第绪语。[274]这是一种特殊的德语。西班牙的犹太人的情况也是这样。1492 年西班牙犹太人在伊斯坦布尔，特别在萨洛尼卡，建立了大片移民地，把他们自己的语言列托一罗马语，即文艺复兴的西班牙语，带到这些移民地，并且对西班牙仍然怀着一种真正的感情。这种感情有很多表现[275]（这证明一个人故乡的土地的泥土总是粘在他的鞋子上的，即他总是眷念故国本土）。在这些重大的现实事物之外还有一些奇怪的细节：一个研究西班牙问题的专家今天在摩洛哥的犹太人那里[276]找到西班牙中世纪罗

曼斯的曲调和歌词；一个历史学家也告诉我们，汉堡的塞法尔迪特人怎样缓慢地、违心地、笨拙地，而且很糟地使自己适应德语。[277]他们对自己的本源的忠诚，也继续存在于萨洛尼卡的各个犹太社会的名称中。这些名称是：墨西拿(Messina)、西西里亚(Sicilia)、普里亚(Puglia)、卡拉布里亚(Calabria)[278]。

这种种忠诚的表现和行为并非毫无弊端、缺陷。它们制造出等级和类别来。某些犹太民族显得有别于其他犹太民族。它们之间有时发生争吵。例如从1516年到1633年在威尼斯建立了三个彼此邻接的犹太人区：老区、新区和最新区。这是三个像岛那样互相连接的、高层房屋鳞次栉比的住房群，因为那里缺乏空间，是全城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老区是来自黎凡特的犹太人居住的地区，1541年以来就在威尼斯的5名商务行政官员的管制之下；新区则在负责处理商事诉讼的法官的管制下，庇护着德意志犹太人(Todeschi)。这些犹太人因为不能全都住在那里，便部分迁往老犹太人居住区。他们在康布雷联盟时代已经获准住进该城。他们是贫穷的、从事旧衣服和旧家具买卖以及放抵押贷款的犹太人，后来在威尼斯开当铺——穷人的银行。在这个时期，专门经营大宗贸易的犹太人——葡萄牙犹太人或者黎凡特的犹太人——时而遭到威尼斯市政议会憎恨，时而又被这个机构恳求。毫无疑问，他们从1581年起就获得一种特殊地位。[279]但是，1633年，所有的犹太人，其中包括地中海西岸地区的犹太人，被集中起来居住在同样的犹太人区里。因此，在这个人为的、近似集中营的小世界里，发生了社会纠纷和宗教纠纷。

这些特点和差异并不妨碍一种犹太文明存在。这种文明生气

勃勃，变化无穷。这种文明当然不是惰性的，或者像阿诺德·汤因比硬说的那样，是“僵化”的。[280]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这种犹太文明具有警惕性和侵略性。它有时为一些突然爆发出来的奇怪的救世主降临说所苦，特别是在现代的早期，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个时期，它分成两派：一派早在斯宾诺莎之前就把某些人引向怀疑主义和无神论的理性主义；另外一派赞成群众的非理性的迷信和狂热激奋的倾向。每次迫害都由于事物的反作用引发了宣传救世主降临说的运动。例如在查理五世时代，从 1525 年到 1531 年，所谓的救世主戴维·鲁伯尼和迪戈·皮勒斯等人煽起葡萄牙犹太人叛乱。[281]又例如，17 世纪萨巴塔伊·泽维的关于救世主降临说的宣传[282]在东方，在波兰，甚至在更远的地方掀起高潮。

但是，如果把这些尖锐的危机撇在一边姑不置论，假定犹太人的态度通常是爱好和平的或者容忍异说的，那就错了。他们的态度活跃积极、敏于劝人入教、敏于进行斗争。犹太人区不仅仅是囚禁犹太人的监狱的象征，而且还是犹太人自动退守其内以保卫他们的信仰和犹太教法典的继承性的堡垒的象征。一个和伟大的卢乔·德·阿泽夫多同样同情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坚称，刚刚进入 16 世纪时，犹太人不容异说的程度“超过基督教徒”。[283]这种说法言过其实。但是，总的说来，犹太人不容异说这个事实是明显的。甚至还有这样的传闻：查理五世路过曼图亚时，犹太人曾经企图使他改信摩西教义。[284]这个传闻本身就荒诞不经，却在将近 1532 年时广泛流传。

各种犹太人社会的普遍存在

犹太人不管是否愿意，都被迫扮演文化交流的代理人的角色，几乎不可能有另外的情况。他们当时或者在这以前曾经遍布各地。他们虽然遭到驱逐，但并不一定离开禁止他们居留的地方。他们被驱赶后又返回原住地。从1290年到1655年，他们被正式禁止在英格兰居留。1655年是克伦威尔执政时期他们所谓被重新准许进入英国的时期。事实上，伦敦从17世纪开始时，甚至更早，就已经有犹太人商人。1394年，法国也同样一劳永逸地驱逐了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不错，是西班牙的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是表面上的基督教徒)很快又在鲁昂、南特、波尔多、巴约讷等地出现。这些地方是葡萄牙的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在前往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的途中惯常停歇的驿站。亨利二世"这位法国国王准许曼图亚的犹太商人前往他的王国的城市，准许他们在这个国家经商。他还免除他们缴纳捐税。这一年，他们前去向他表示敬谢之意时，他对他们亲切而热情"。[285]毫无疑问，这件事发生于1547年。更奇怪的是(如果说这不是更重要的话)，1597年春天在巴黎或者在南特，西班牙的情报部门搜集到这个传闻：法国国王考虑"让已被法国国王圣路易驱逐的犹太人返回"。[286]4年以后，1601年，这个传闻再度流传。菲利普·卡纳伊大使对亨利四世解释说："一个(葡萄牙的)犹太人中的首要人物对我说，如果陛下愿意准许他那个民族在法国定居，陛下将从中得到好处，并有5万多个聪明勤劳的家庭住在陛下的王国里。"[287]将近1610年，在进入法国的摩里斯科人中(他们通常只在法国过境)，一些犹太人，特别是一些葡萄牙的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与流

放者混杂一起，并且“可能在基督教徒的伪装下在法国，特别在奥弗涅，安家落户”。[288]

犹太人过去在法国南方人数不多。将近1568—1570年这个时期，他们被赶出普罗旺斯各个城市，逃往萨瓦避难，在那里受到友好接待。[289]17世纪初，他们在城市政策多变的马赛寥寥无几。[290]1492年，一些被驱赶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在朗格多克落户定居，并且“使（法国人）习惯于在柏柏尔进行不正当的交易”。[291]在新基督教徒的伪装下，他们在蒙彼利埃从事药剂师和医生的职业。费利克斯·普拉泰住在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的家里。这个世纪末，他们在阿维尼翁受到教皇庇护，人数为500，但没有在城内、城外购买房屋、花园、田地和草地的权利，被迫从事买卖旧货和裁缝……等职业。[292]

当然，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情况过于多种多样，因此他们不可能同时被人从各个地方赶走。然而，上帝知道，他们也经常被人撵来撵去。一个城市向他们关上大门；另外一个城市则向他们把门打开。当米兰于1597年经过多次犹豫驱逐了它的为数不多的“希伯来人”之后，就我们所知，这些“希伯来人”到达韦塞伊、曼图亚、摩德纳、维罗纳、帕多瓦以及“附近村镇”。[293]他们挨城逐市的集体迁徙，即使在并不顺利的时候，也往往有滑稽可笑的味道。例如热那亚的情况就是这样：1516年犹太人被正式赶出该城，1517年返回。[294]威尼斯和拉古萨等地也发生同类事件，因为他们总是最终获准返回。1515年5月拉古萨这个小城的居民在一个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的煽动下，赶走该地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立即在阿普利亚和摩里亚两地对圣布莱士共和国实行谷物封锁（这证明他们控制

着谷物的供应)。该城不得不重新接纳他们。1545年,拉古萨有人刚打算驱逐他们,素丹就提醒拉古萨人注意社会秩序[295]……1550年威尼斯企图驱逐犹太人,却发现他们控制着它的商业:呢绒、丝绸、糖、香料等,还发现威尼斯人自己往往只限于转卖犹太人的商品,只从中获取惯常的佣金。[296]事实上,由于犹太人被连续不断地从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驱赶出境,因此,犹太人充斥意大利境内,特别在罗马教廷的国家情况更是如此。犹太人更喜欢去那里避难。在安科纳开始出现一种对犹太人来说令人惊奇的运道:在保罗四世于1555年和1556年开始对犹太人进行残酷凶狠的迫害之前,有犹太户主1,770个。他们任意购置不动产、房屋、葡萄园等。"这些东西不带有任何能使他们区别于基督教徒的标志。"[297]1492年,犹太人被从西西里赶走。据说被驱逐的人达4万之多[298],其中大多数是手工业者。他们的离开所产生的后果,非这个岛屿所能承受。在10年之后才沦于西班牙国王的控制之下的那不勒斯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犹太人获准留住该地。直到1541年他们的确为数不多,但是,他们之中有像阿布拉瓦内尔家族那样富有的、活跃的家族……[299]

把被驱赶的犹太人比作灵活机敏的歹徒、恶棍、帮伙,是不恰当的。但是,总而言之,希伯来人和不法之徒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利用复杂的政治地图所提供的方便。其次,在德意志有逃往附近的波兰避难的方便条件。必要时,逃亡者携带衣物,堆放在车上,驶往波兰。在意大利则有逃往海洋和黎凡特的方便条件。1571年,威尼斯人打算驱逐犹太人。当驱逐令收回时,一些犹太人已经登上即将启航的船只。[300]这些取道海洋的逃离,当然并非毫无风险。对船主来

说，夺走行李、卖掉乘客，乃是一种巨大的诱惑。1540 年，一个拉古萨船主抢劫了乘他的船的旅客——这些旅客是逃离那不勒斯的犹太人——并且把他们弃留在马赛。弗朗索瓦一世怜悯他们，用他自己的船把他们送往黎凡特[301]。1558 年，逃离佩扎罗的犹太人[302]到达拉古萨，然后乘船前往黎凡特。可能是拉古萨的船员抢走了他们，并且在阿普利亚把他们当作奴隶卖掉。1583 年，一些水手——这一次是希腊人——杀害了他们的 53 名犹太乘客中的 52 名。[303]

犹太人始终在寻求"他们的脚可以歇息"的城市。[304]但是，最后不可避免地星散各地。1514 年，在塞浦路斯住着一些犹太人。该地教会的神长接到威尼斯市政议会发出的不准任何犹太人不戴黄色贝蕾帽而戴黑色贝蕾帽的命令。[305]在伊斯坦布尔有 12 个处境很糟的干地亚的犹太人。我们由此还了解到岛上"有 500 多个犹太人"。[306]1588 年，在另一个威尼斯的岛——科孚岛——上，有 400 个犹太人，他们散居城内各处。他们的房屋和基督教徒的房屋混杂在一起。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说，为了满足双方的愿望，[307]把他们分开乃是明智之举。事实上，科孚岛上的犹太人有和威尼斯当局打交道的明显好处。[308]

我们如果愿意在最大的地中海的和世界的范围内标示出犹太人的散布情况，就能够毫无困难地重新发现他们在果阿、亚丁、波斯，在"整个地中海东岸地区，在颓垣残壁之下过着悲惨生活"。但是，这是 1660 年的评注。[309]时间的车轮已经转动，并且还将继续转动。1693 年，一份法国的文献资料向我们描述"40 年来"定居黎凡特并且还钻到法国在"士麦那"的领事保护之下的葡萄牙和意大利犹太人。在这之前他们也钻到马赛或者"令人难以察觉地拥有黎凡

特的大部分商业。这就迫使已故的M.德·塞涅莱用国王的一道敕令,教人把他们赶出马赛"。[310]但是,他们很快就在黎凡特掌握了商业贸易线的另一端。在马德拉有犹太人,而且在圣多美岛犹太人为数如此之多,以致(他们显然是新基督教徒)他们在这些地方"公开"信奉犹太教。[311]他们是首批到达美洲的人,是首批(1515年在古巴)受到西班牙宗教法庭迫害的殉教者。[312]这个法庭以后的所作所为还远不止于此。1543年,西班牙所属各个王国当时的摄政者菲利普,把他们从卡斯蒂利亚的印度①赶走——这纯粹是理论上的姿态[313]……从北非一直到撒哈拉,犹太人都为数颇多。

犹太教和资本主义

犹太人从前和亚美尼亚人一样是农民。若干世纪以前,他们脱离了土地劳动,转而成为各地的金融家、军火商、商人、高利贷者、当铺老板、医生、手工业者、裁缝、织工甚至铁匠……等。他们过去往往很穷,有时开个普普通通的当铺。犹太女人肯定很穷。她们卖化妆品,在土耳其市场上卖手帕、毛巾和华盖等。[314]这些犹太人都翻山越岭。犹太教教士的裁定纪录,使我们了解到犹太人在巴尔干的争执和他们在那里从事的往往十分卑微低下的职业。[315]在这些贫困、饥馑的移民社会里,当铺老板,即使他们当中最卑微的,也几乎是有产阶级。在意大利,这些小放债者为数颇多。他们的服务在推动促进这种服务的农村和小城市中是有效的。1573年9月,卡波迪斯特里亚的波德斯塔[316]要

① 即西属美洲。——译者

求把一个犹太银行家召来城市，否则深受物价不断上涨之害的居民将不得不像他们曾经做过的那样前往那些以 30%到 40%的利率贷款的的里雅斯特的高利贷者的家中借贷。这类事不会发生在一个当地的犹太小放债人身上。下一年，即 1574 年，卡斯特尔弗朗科的穷人团体要求威尼斯的市政议会特许放款人约瑟夫在小城市里开设一家银行，向人放款，但同时禁止他放款时收动产之外的其他抵押物。[317]这个机构同意了这项要求。1575 年发生了类似事件。波德诺内的穷人团体也为“众多穷人的利益”恳求准许一个放款人开设银行，向人放款。[318]这些事例并不意味着以后在犹太放债人和基督教徒借债人之间一切都十分圆满。例如 1573 年，契维达尔·德尔·弗里乌尔的穷人团体[319]要求“从不停地啃啮并且吸尽这个城市的脂膏的希伯来人的贪婪中解放出来”。1607 年 7 月，一家希伯来人开的当铺在科内利亚诺遭到拦路抢劫强盗抢劫。市政议会的轻骑兵（我们以后称为宪兵）追捕这伙匪徒，夺回被抢走的物品（价值 5,000 杜卡托的金银首饰和其他抵押品），杀死 4 名劫匪，并且割下他们的脑袋带到特雷维索，同时还把两名被活捉的匪徒也押解到那里。[320]

除了这些短期高利放债人和高利贷者之外，还有经常被驱逐，接着又被召回，始终被人恳求的犹太富商巨贾。他们被人发现在里斯本假装成新基督教徒，或者（如果他们富有的话）假装成完美无缺的基督教徒。例如希梅内斯家族、卡尔德拉家族、埃沃拉家族……就是这种人。他们也可能是革新者。例如米歇尔·罗德里格斯或者罗德里加就是这种人。后者是黎凡特的犹太人，是威尼斯的斯普利特中途停靠港的设计者。[321]他们也会像萨米埃尔·阿布拉

瓦内尔和他的家族那样强大。这个萨米埃尔·阿布拉瓦内尔和他富有的家族在好多年之内牢牢地把那不勒斯的犹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贷款给国王,在马德拉的糖的贸易中,在兰恰诺的集市贸易和粮食交易中占重要地位,很有影响。[322]在葡萄牙的门德斯家族的独一无二的经历中,特别在这个家族的侄子胡安·明格斯(人称让·米格斯)的经历中,可以瞥见巨大的成功。他是来自黎凡特的西班牙的信传消息中提到的约瑟夫·米卡斯。[323]他早先被迫皈依天主教,到伊斯坦布尔后重新皈依犹太教。他在该城变成了类似富格那样的人物,一直到死(1579 年)都很有权势,并梦想有朝一日成为犹太人的国王,在圣地建立国家(他修复了太巴列的遗迹),梦想成为"塞浦路斯国王"。他最后不得已求其次,满足于被素丹册封为纳克索斯公爵。他以这个名字为那些通常乐于歌颂美化传记主人公并且关注他的历史学家所知。

但是,即使是这种辉煌的成就也取决于总的经济形势。以 16 世纪的土耳其为题进行著述的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或许太迟)犹太商人当时在土耳其取得的成就。[324]正是这些犹太商人不久以后就同希腊人一起承包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甚至富有的地主的收入。他们的商业网撒布、延伸到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将近 1550 年,勒芒斯的伯龙对这些犹太人进行了观察。他就他们的问题写道:"他们牢牢地掌握着土耳其的商品贸易,以致土耳其的财富和收入都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用高价收集来自各省的贡品,承包盐税、船运酒税和土耳其的其他税收。他下结论说:"由于我多次不得不使用犹太人并与他们交往,我很容易了解到:这是一个最精明能干并且满肚子诡计的民族。"[325]没有犹太人的这些集体命运和这些总的成

就，像纳克索斯那样的生涯和经历是不可能有的。同样，我也认为，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如果没有奥格斯堡和约(1555年)缔结之后的和平安定年代和为德意志犹太人以后进行报复铺平道路的财富积累，德意志犹太金融家，亦即这些"宫廷犹太人"[326]的财富是不可想象的。在同样的情况下，在16世纪末，控制着糖和香料贸易，拥有巨额资金的葡萄牙犹太人的网，促成了阿姆斯特丹的繁荣兴旺。也在类似的情况下，整个美洲都被纳入犹太人的贸易网中……

这并不是说犹太人全都富有或者无忧无虑。这也并不是说犹太教由于它的进行冒险投机的神召或者由于它的伦理原则应该对我们称为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称为16世纪的前资本主义的事物负责。这也并不是说，"以色列像太阳一样在欧洲上空转行；它在哪里发光，新的生活就在哪里萌生；而在被它抛弃的地方，所有已经开花的事物都凋谢枯萎。"[327]更主要的是，犹太人懂得像适应商业世界中不断变化的局势那样适应地理形势。我们大家不必担心。如果他们是"太阳"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被人从地球进行遥控的太阳。犹太商人蜂拥前往蓬勃发展的地区。他们在多大的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繁荣兴旺，就在多大的程度上从这些地区得到好处。提供服务是相互的，有来有往的。资本主义意味着千百种事物同时并存，也意味着一种计算制度、一种对技术的了解和应用，即对与金钱和信用有关的技术的了解和应用。在十字军于1099年攻克耶路撒冷之前，犹太人就已经熟悉当时广泛使用于穆斯林世界的汇票(suftaya)和支票(sakh)[328]。尽管犹太社会被迫迁徙，这种经验仍然得以保存下来。

此外，每个资本主义都意味着一张网，一系列信任、一系列在

世界棋盘上的合作。单单南特敕令的撤销本身，并没有自动导致新教徒经营的、始于16世纪的银行业的成功。但是，此举却为这个行业开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新教徒在法国、日内瓦、荷兰和英格兰之间，布设了一张情报和合作网。在若干世纪之内，对犹太商人来说，情况都是这样。他们建立了世界的最主要的商业网，因为他们遍布全球，在落后地区或者不发达地区充当手工业者、店主或者当铺老板。在主要城市里，他们参与促进这些城市的经济的勃兴和商业的繁荣。他们有时人数很少。1586年，他们在威尼斯只有1,424人。[329]17世纪初，他们在汉堡[330]勉勉强强有100来人；1570年，在阿姆斯特丹，他们最多有2,000人。在安特卫普他们一共400人[331]。16世纪末，乔瓦尼·博特罗[332]提到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有16万犹太人。[333]萨洛尼卡这个城市是流放者的主要避难所。但是，根据乔瓦尼·博特罗的统计，在发罗拉，犹太家庭只不过160个。圣莫罗的犹太家庭数目与萨洛尼卡犹太家庭数目相同。罗得岛有500个犹太家庭。开罗、亚历山大、叙利亚的的黎波里、阿勒颇和安哥拉等地共有犹太家庭2,500个。这些细节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靠的。可以肯定：哪里人口稠密，哪里的生活就十分困难，哪里的流放者就必须从事任何行业，即使是收入微薄的行业。他们在萨洛尼卡、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一些地方当织工、染匠。他们是在当地农民的集市贸易上购买羊皮、皮革的行商负贩……另一方面，与此相反，比较小的犹太人移民地往往是犹太人中的富商巨贾的居住地。这些商人受好些利市百倍的生意买卖的定位集中之惠，被这些买卖吸引，因而是新来的人。

在13世纪，香巴尼的定期集市是西方商业经济的中心。所有

商品都在这里集散。犹太人也聚集在香巴尼的城市和农村。[334]他们之中有的人在该地的农村从事耕作;其他人则是手工业者。他们拥有田地、草场、葡萄园、庄园和房屋等。他们购进或者出售这些产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已经是并且首先是商人或高利贷者。在他们从事的行业中,"放债似乎大大压倒商业"。他们贷款给领主,特别是贷款给香巴尼的各个伯爵和寺院。犹太人虽然受到香巴尼的定期集市和这些集市带来的繁荣景象的吸引,但他们(少数的例外证实了这条规律)并不直接参与这些集市,特别是不去操纵这些集市。尽管如此,他们却掌握、控制着某些通向这些集市的道路。

随着16世纪的经济衰退,西方在经济方面唯一的安全地区是意大利。犹太商人在那里到处人数倍增。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335]他们占领了高利贷的低层次,把他们的竞争者从这个商业生活中的基层排挤了出去。

15、16世纪,地中海的主要商业贸易潮流导向北非和黎凡特。1509年,当西班牙的干涉在特莱姆森激起群众屠杀基督教徒商人的时候,犹太人与基督教商人共命运。[336]在西班牙人于1510年[337]接管并定居的布日伊和的黎波里,也有犹太人。1541年,在同一个特莱姆森城,当西班牙军队进入时,"在这个城市,很多犹太人被俘并被征服者当作奴隶出卖……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在奥兰和非斯被赎回,另一些人被当作俘虏带回西班牙。他们在西班牙被迫发誓弃绝神——以色列的上帝"。[338]几年以前,即1535年,当查理五世攻占突尼斯时,也出现过同样的景象。约瑟夫·哈·科恩医生叙述说[339]:"犹太人男男女女在各个不同的地区被人出售,但那不勒斯和热那亚的意大利团体把他们大批赎回。但愿上帝为此记住这

些团体。”

根据非洲人莱昂的说法，犹太人社会在北非是兴旺发达的；16世纪开始时犹太人社会还十分好战并能进行抵抗。就这样，这些社会在奥兰的西班牙驻防地的对外客冷漠仇视的中心地区一直存留到1668年[340]，并且参与一切活动。一项1626年[341]在奥兰的西班牙驻防地进行的调查提到来自撒哈拉的商队的到来。这些商队中的一支来自塔菲拉勒和菲吉格，由“好战的”犹太人伴随。这些犹太人其实是普通商人，因为在西班牙和在伊斯兰国家一样，生活在堡垒附近的臣民——和平的摩尔人——和不顺从者——好战的摩尔人——被区别开来。同样也有和平的犹太人和好战的犹太人。但是，犹太商人在这个古老的贸易轴心的出现值得注意。

在黎凡特，当时的报导都着重记述了犹太商人大规模地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他们作为放债人控制着阿勒颇(特别是葡萄牙犹太人)和开罗的市场。基督教徒经常向他们借贷。整个商队贸易显然都集中在他们手里。

还有什么别的需要说呢？在威尼斯尽管局势紧张并发生争执(继争执之后而来的是协议和和解)，犹太人仍然留在那里。毫无疑问，发生了驱逐事件。这是一起1497年驱逐被迫改信天主教的有钱犹太人的事件[342]。这起事件发生在这些犹太人在供给威尼斯人食用的西西里小麦的买卖上进行投机倒把之后。投机倒把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是新近来的到威尼斯的犹太人。(既然1550年再次谈到要驱逐这些人[343]，既然我们发现一直到中世纪末，甚至在本世纪后，他们的名字都在威尼斯被人提及，这一切都使人认为他们已经返回威尼斯。)我也指出过，一直到1597年犹太人还在米兰和米兰

内出现。在罗马，他们继续过着圈子相当狭窄的生活。在安科纳的繁荣兴盛时期，即一直到 17 世纪的最初几年，他们的社会是兴旺发达的。在里窝那，他们从梅迪奇家族复兴的真正开始时期起，即从 1593 年起[344]，就是这个复兴的缔造者。

人们最想了解的，是犹太人在世界金融首都热那亚的情况如何。可是在这方面我们正好缺乏翔实可靠的材料。我们只对下面这件事是有把握的：当地人对他们怀着敌意。在热那亚，小手工业者和医生对他们的犹太人竞争者的妒恨导致 1550 年 4 月 2 日驱逐犹太人团体。一个目击者说，这项驱逐犹太人的法令“在刺叭声中宣布，情况就像我的父亲拉比·耶荷舒亚·哈—科恩那个时代”的 1516 年一样。这同一个目击者——约瑟夫·哈·科恩医生——去不远的地方定居，仍然住在热那亚的领土内的沃尔塔季奥。他在那里继续干他那个行当。[345]1559 年，再次爆发了来自热那亚方面的或者至少来自一个热那亚的重要人物——“这个像刺进犹太人的肋部的刺棒的坏人”[346]内格龙·德·内格里——方面的敌意。他后来企图把犹太人驱逐出皮埃蒙特，但枉费心机。1567 年 6 月，热那亚人把犹太人驱逐出他们的领土和属地。在那次把犹太人从热那亚城清除出去的驱逐行动之后，热那亚人曾经容忍犹太人在领土和属地居住。约瑟夫·哈·科恩医生于是离开沃尔塔季奥并前往“蒙费拉特辖区内的卡斯泰勒托定居，那里人人都高高兴兴欢迎我。”[347]如果有更加确切的文献资料，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进行得顺利些。犹太大商人是否像我所想的那样进入了皮亚琴察的集市？

最后一个要牢记在心的特征是：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遍

布地中海的各个地区，这就为荷兰人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并且标志着世界史上的阿姆斯特丹时代的开始。1627 年，奥利瓦雷斯公爵把葡萄牙的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推上粮布供应合同的决定性的舞台。于是出现了另外一个财政金融时代。其实，这个时代早在这个时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348]这个时代可以从很多迹象辨认出来。早在 1605 年，就已经谈到发给 1 万个犹太人在西班牙安家落户的许可证，以帮助把西班牙国王的财政整顿、管理得比在基督教徒棉布供应承包商的统治下更好。[349]加长这份抄录单，并且指出 17 世纪犹太人在马赛、里窝那和士麦拿等三个繁荣昌盛的地中海城市的存在，在塞维利亚、马德里、里斯本等更重要的地方的存在，最后在阿姆斯特丹的存在以及早已在伦敦的存在，是十分容易的。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卡尔巴哈尔这个富商，这个“伟大的犹太人”在 1630 年和 1635 年之间这段时期在伦敦定居。[350]但是，我们的论证本身已经足够。

犹太人和总的经济形势

如果我们把构成犹太人历史的殉教者列传中的迫害、屠杀、驱逐、强迫改皈宗教等事件用年表的形式进行排列，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变和上述种种残暴措施之间的一种关联就标示出来了。后者总是依存于经济生活的恶劣气候，并且伴随这种气候。使英格兰(1290 年)、德意志(1348—1375 年)、西班牙(塞维利亚的排犹运动和 1391 年的强迫改皈宗教)和法国(1394 年把犹太人全部驱逐出巴黎)的犹太人的幸福与繁荣兴旺消失的，并不只是君王或者“坏人”的敌意。主要的罪行是

西方世界的总衰退犯下的。在我看来，这一点没有争论的余地。同样，仅以犹太人被从西班牙驱逐为例（1492 年），根据韦纳尔·松巴尔特的说法，[351]这个世界性事件迟迟发生于一个漫长的衰退时期内。它随着西班牙国王的统治开始，至少一直延续到 1509 年，还可能延续到 1520 年。

正如 1350—1450 年的百年衰退把犹太商人抛向意大利和意大利的受到保护的经济一样，[352]1600—1650 年的危机使他们置身于北海地区的也受到保护的经济领域中。于是信奉新教的世界拯救了他们，给了他们优惠。反过来，他们也拯救了信奉新教的世界，给了这个世界优惠。总之，正如韦纳尔·松巴尔特所指出的，就通向美洲、印度和中国的海路而言，热那亚的地理位置和汉堡或者阿姆斯特丹同样优越。[353]

经济形势和犹太民族的盛衰起落之间的对应配合，不仅在重大的事件上和在长时期内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几乎逐年逐月逐日发生的小的危机中也是明显的。以以下这个细小的例子为例：由于拉古萨这个共和国当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它 1545 年考虑把犹太人驱逐出这个城市，就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了。在 1559—1575 年的长期衰退中，在威尼斯，很自然地在城内和在大陆上立即采取的反犹措施的背后，也有类似的动机。在 1570—1573 年对土战争的年代里，[354]一切都迅速发展，急转直下。黎凡特的犹太人被捕。犹太人的货品交给第三者保管。对犹太人留住威尼斯强加了苛严的条件（1571 年 12 月 18 日），制订了驱赶犹太人出布雷西亚，甚至出威尼斯的计划。年轻的犹太人在亚得里亚海被捕，并被处以在帆桨战船上划桨的刑罚，“直到战争终结”……这对“雅可

布"①[355]来说,真是一个痛苦的时代。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都取决于经济形势。1581年对弗拉拉的犹太人的残酷迫害情况与上述的相同。这次迫害是另外一起要补入已经明显的1580—1584年的周期性危机的内容丰富的档案材料中的事件[356]……

长期的趋势在1575年和1595年之间再度出现,天气晴朗起来,这有利于地中海的整个经济生活,特别有利于犹太人居留地的经济生活,不管这些居留地在哪里。(在罗马,这些地区受到西克斯·坎特〔1855—1590年〕的保护。)[357]如果我们没有看错的话,犹太资本主义在海上贸易中所起的作用从此与日俱增。犹太资本主义不但在安科纳,[358]而且在弗拉拉[359](威尼斯除外)也是主导力量。所有这些"葡萄牙的"或者"黎凡特"的成功、同摩洛哥苏斯省以及同这个省的糖厂的贸易联系[360]、斯普利特港的修建[361]、拥有权势的人物达尼埃尔·罗德里加1587年3月提出的在伊斯坦布尔设立一笔数额为两万杜卡托的保证金的建议[362](这笔保证金由贝勒支配管理用以换取威尼斯海关一笔同等数额的预付贷款)以及将近1589年接纳弗拉拉的犹太人入城的建议等[363]所体现出来的在计划和行动方面的自由,都表明气候发生了变化。1598年为地中海西岸地区的犹太人制订的制度,的确是一种真正宽容的制度。当局发给犹太人有效期为10年的安全通行证。此证到期如不废除将自动继续有效。这和10年以前,即1589年同意的条件相同。还同意了一项附加的小优惠:"他们可以在旅行中戴黑色贝蕾帽及携带常用武器,但在威尼斯不能。"[364]事实上,威尼斯当时已经变成在意大

① 此处指犹太人。——译者

利的因受迫害而改皈天主教的犹太人的集合中心，变成他们同来自德意志的和来自黎凡特的犹太人接触联系的地方。这不利于弗拉拉。这是一个清清楚楚的迹象：威尼斯扮演着知识文化首都的角色。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因受迫害而改皈天主教的犹太人的文学作品，一直由威尼斯的印刷所出版。在这些印刷所被阿姆斯特丹和汉堡的印刷厂厂主的工厂接替之前，情况都是这样。[365]

这样，在从阿姆斯特丹到里斯本、威尼斯和伊斯坦布尔这个地区，犹太移民就进入一个胜利的时期或者至少是环境更加舒适的时期，惯常的对地中海船只装载的犹太货物的追猎，并不是一种徒劳无益的活动，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征象。相反，这是一种大批形形色色的敌人竭力反对的繁荣兴旺的标志。再者，这种追猎很早就已经开始。早在 1552 年，[366]后来又在 1565 年，[367]犹太人就提出抗议，指控马耳他的“非常凶恶的僧侣”的船只、这种用来掠夺犹太人的财富的陷阱和网”。[368]这个世纪末，托斯卡纳人、西西里人、那不勒斯人和岛上的希腊人沆瀣一气，勾结串通，驾驶海上行劫者的帆桨战船进行抢劫，[369]这或许是因为掠夺来的财物已经增加了。犹太人经营的商业的振兴还有其他一些迹象，例如有利于他们同那不勒斯的重新通商等。1541 年他们被驱赶后，似乎只准许他们参加兰恰诺和卢切拉的集市贸易活动。但是，从 1590 年起，举行了关于恢复贸易关系的谈判。[370]1613 年 9 月贸易关系恢复[371]。

历史学家已经提出过富格家族“时代”和热那亚人“时代”。正如这种提法是常有的一样，在我们的研究工作目前所处的阶段中，提出伟大的犹太商人的“时代”，并非完全不合时宜。这个“时代”始于 1590—1600 年，延续到 1621 年，甚至延续到 1650 年。这个时代

具有鲜明的智力色彩。

了解西班牙

对犹太人的命运不能在世界历史范围之外,特别不能在资本主义历史之外进行考察研究。(认为犹太人不是资本主义的发明者,这样做过于急躁,虽然这可能是千真万确的。试问:又有哪一个单个的团体能够自称是资本主义的发明者呢?犹太人用整个身心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始建。)如果我们最后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缩减为仅仅对西班牙的引人注目的情况的讨论,那么这场讨论就会更加清楚明白。犹太人的命运的图象映照在西班牙的历史的多面镜里,而西班牙的历史也映照在面对着它的犹太人的命运这面镜子里。

主要的困难在于防止把今天的敏感性、词汇和争论塞进这场争论中。不要相信道德家们的简单化的语言。这些人把他们的严格的分界线划在好与坏之间,划在善与恶之间。我不认为西班牙有谋杀以色列的罪过。难道过去什么时候有过一种为了另外一种文明的存在而牺牲自己的存在的文明吗?以色列也好,伊斯兰国家也好,在这一点上肯定都不比别的国家或地区更是这样。我这样说并没有什么激情偏见,因为我是我这个时代的人,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同情那些在自由、肉体、财富和信念等方面的受害者。因此,这里在西班牙的范围内,我同情犹太人、改变宗教信仰的人、新教徒、光明派教徒、摩里斯科人……但是,这些我无法摆脱的感情与真正的问题毫无关联之处。谈到16世纪的西班牙时,把它称为"极权国家,"甚至称为"种族主义国家"是毫无道理的。当然,这些

景象是悲惨的，但是，在同一个时期，法国、德意志、英国或者威尼斯的景象（通过阅读有关的司法档案）也是这样。

让我们再一次强调这一点：形势在西班牙正如在土耳其和在正进入世界历史的新世界一样，都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它应该受到它应该受到的那一份指责。在取得格拉纳达的胜利之后不久（胜利总是使人萌生坏主意），费迪南和伊莎贝尔并不是独自行事。他们的行动受到阴沉的经济气候和这些愈合得很差的创伤的推促和影响……最后，各种文明和经济一样，也有它们自己长期的历史。它们受到群众运动的折磨。它们仿佛被历史的重力不知不觉地推到隐蔽的山坡上。山坡的倾斜度正好足以使物体下滚，但任何人都不会察觉，也不会为此负责。自我“分割”[372]、剪除自己过度增长的部分、在前进中抛弃自己的部分遗产和携带的东西，这就是文明的命运。每种文明都永不休止地继承自身，并且在父辈遗留给子孙的财富中进行选择。携带的某些东西被遗弃在路旁。没有一种文明像伊比利亚文明处于它最光荣的时代那样，即在从费迪南和伊莎贝尔在位时期到菲利普四世统治时期这段时期那样，被迫强加给自己如此之多的变化，被迫“分割”自己、撕裂自己。我特别谈到伊比利亚文明。这是因为它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特别品种，是西方文明的突出部分或者海角。这个海角以前几乎被外国的海洋覆盖淹没。在“漫长持久的”16 世纪，西班牙半岛为了再度变成欧洲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了战斗的基督教国家。它用它两种加得多余的宗教——伊斯兰教和希伯来人的宗教——来分割自己。它拒绝按照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和现代的非殖民化的过程相象的过程变成非洲或者东方。可以为伊比利亚设想其他的命运，例如它本来可以根据它的地

理位置和它在几个世纪中的历史使命继续成为欧非之间的桥梁。但是,桥梁意味着双向的交通。欧洲经由比利牛斯山、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航路到达西班牙半岛。由于复地运动的胜利,欧洲在这个边境地区压倒伊斯兰教。这个胜利也是欧洲自己的胜利。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博诺斯和阿美利科·卡斯特罗等西班牙半岛的历史学家了解这一点:"山那一边的人"得胜。欧洲对西班牙的再征服,被加进严格意义上的西班牙对穆斯林的土地的再征服之中。地理大发现则在后来把剩下的工作完成了。这些发现把西班牙半岛置于现代世界的中心,亦即欧洲对世界的征服行动的中心。

认为西班牙本来不会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这是提出一种论点。这种论点曾经有人坚持。[373]但是,难道西班牙不能变成欧洲的一部分吗?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考虑,而且还有民众的意愿和狂热,导致驱逐持异端的人,导致1478年设立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导致1536年设立葡萄牙宗教裁判所。在我们的眼里,宗教裁判所令人憎恶,之所以令人憎恶,主要是由于它采取的手段,而不是由于它的受害者的相对地说来有限的人数。[374]但是,难道宗教裁判所、西班牙国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各个统治者,是真正应该对民众的深切愿望推动的斗争负责的主要力量吗?

在19世纪缔造的各种民族主义产生以前,各个民族只感到自己被结合在一种宗教归属产生的感情里,换句话说结合在一种文明归属产生的感情里。15世纪的西班牙的广泛的团结一致,是一个长期面对另外一种文明,处于劣势的、最弱小的、最不引人注目的、最不精明的、最不富有的和一下子就解放了的民族的团结一致。这个民族再度变得最强大后,还没有获得内心的自信或者最强

大的民族的习惯行为方式。它继续战斗。可怕的宗教法庭迫害的人最后之所以寥寥无几，乃是因它进行的斗争多少有些无的放矢。西班牙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仍然过分胆怯，过分警惕，过分好战，以致异端无法轻易潜入这个国家。在西班牙既没有伊拉斯谟主义的地位，也没有内心可疑的改变宗教信仰者或者新教徒的地位……

在关于这场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的论述方面，莱昂·波利亚科夫所作的激昂的和诱人的辩论并不能使我感到满意。他只看到悲剧的两面镜子中的一面，即以色列的诉苦抱怨，而没有看见不同时期西班牙的并非虚假的、并非骗人的或者并非疯狂的抱怨诉苦。一个基督教的西班牙正在为诞生而进行斗争。它的力量推动的冰川，把它在浮动中遇到的树木和房屋统统压得粉碎。让我们不要认为西班牙由于它的劣迹恶行，由于它在1492年进行的驱逐，由于它对大批改变宗教信仰者进行的迫害，由于它从1609年到1614年对摩里斯科人的泄怒而受到严惩，以免使讨论成为说教，步入歧途。西班牙的这些劣迹恶行、这些激情狂热，使它的威势付出了代价。这种威势正好产生于1492年并一直延续到罗克瓦战役(1643年)之前，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直延续到17世纪中叶以前。根据历史学家选定的日期，对犹太人的惩罚如果不是晚一个世纪到来，至少也是晚40年到来。我们不接受以下这种说法：驱逐犹太人使西班牙失掉一个生机勃勃的资产阶级。事实上，正如菲利普·鲁伊斯·马丁最近论证的那样，由于有害的国际资本主义，即热那亚银行家和他们的同类人的资本主义的植入，商业资产阶级并没有在西班牙形成。另外一种经常听说的论据是：血的纯净和清澈的悲剧是对西班牙的折磨和惩罚。谁也不会否

认这种折磨,不会否认它的后果,不会否认它可怕的死灰复燃。然而,西方所有的社会都在17世纪设置障碍、闭关自守,使社会上的特权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但并不因此而有人们归咎于西班牙的那些理由。

倒不如让我们接受这种说法:各种文明不管是否愿意,都朝着自己的命运前进。如果我乘坐的停靠在车站上的火车开动了,与这列火车并排的火车上的乘客会有他们乘坐的那列火车向相反的方向开驶的感觉。各种文明的前途命运相互交叉。它们互相了解吗?这一点我不能肯定。西班牙正在政治统一的路途中。这种政治统一在16世纪只能理解为宗教统一。与此同时,以色列正在注意它的犹太人聚居区的前途命运。这种命运也是一种单一的命运。但是,它的活动空间是整个世界。它跨越海洋,跨越新生的民族和各种古老的文明。它否定、蔑视古老的文明。这是一种点火过分提前于它所处的时代的现代命运。即使一个像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那样头脑清晰的人,也把这种命运看成具有恶魔的特征。恶魔总不是自己,而是别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其他的文明。《莫诺潘斯特斯岛》(1639年)是一本矛头指向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和他左右的被迫改皈天主教的犹太人银行家的小册子。这本书可能不是出自克维多自己的笔下。莫诺潘斯特斯岛的犹太人说,“在鲁昂,我们是法国用来反对西班牙的钱袋,同时也是西班牙用来反对法国的钱袋。在西班牙,在遮掩我们的割礼的外衣之下,我们用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和在与君主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国家里……所拥有的财富来援救君主(指菲利普四世)。我们在德意志、意大利、君士坦丁堡也干得同样多。我们布设了整个这个不易识破的阴谋

圈套，制造了这场战争的根源，办法是从每个人最大的敌人的口袋里掏出给予这个人的援助。我们像向赌输的人放高利贷以使他们输得更多的银行家那样帮助别人……”[375]总之，这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

每个人都乐于就各种文明说自己的真话。当邻居说这种真话时，这种真话听起来永远也不会顺耳。唯一肯定无疑的是：以色列的命运、它的力量、它的永恒存在、它的不幸等都来源于它永远是一个坚硬的、顽强地拒绝稀释冲淡的核，即一种忠于自身的文明。每种文明都既是人类的天堂，也是人类的地狱。[376]

4. 文明的传播扩散

进行传播、扩散、赠与，就是进行统治。赠与的理论，对个人和社会都有价值，对文明也有同样的价值。这种赠与最终可能引起贫困化。但是，在它持续的期间，它表示一种优越性。这种观察完成了本书第二部分的总的论断，即：在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之后，地中海在一个世纪之内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是一个光辉和强大的宇宙。何以见得？它教育其他地区并且把生活的艺术教给它们。我要强调指出这一点：是整个地中海世界，其中包括穆斯林地区和基督教地区，那时把它的光芒照射到比它的海岸更远的地方。甚至通常被人当作穷弟兄看待的北非的伊斯兰教，也向南方，向撒哈拉的边缘传播、扩散，越过整个沙漠直到苏丹的内地。至于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它照亮了整整一个其中一半属于它的文化区域。属于土耳其的这部分地区位于巴尔干半岛，延伸到阿拉伯非洲和阿拉伯

亚洲,延伸到亚洲的腹地,直到印度洋。伊斯坦布尔的苏勒马尼耶清真寺是土耳其帝国的艺术的杰作。这种艺术光芒四射,显出它至高无上的、无可匹敌的力量。建筑术只不过是大规模的文化扩张的一个成分而已。

西地中海文明的深刻影响在我们看来甚至更加与众不同,具有特色。总之,它逆世界历史的潮流传播、扩散,它照亮了世界力量的中心即将在那里建立的北欧。作为地中海世界的事物,拉丁文化之于新教欧洲,正如希腊之于罗马。这种文化在16世纪和在17世纪一样,一下子就横越大西洋。而且由于这种横越大洋的地理扩展,地中海的势力范围最后变得完整了,它包括当时美洲最光辉灿烂的部分——西班牙所属的和葡萄牙所属的美洲。为了更加易于识别,雅各布·布克哈特抛出巴罗克风格这个词来。这个词指基督教地中海的文明,那里看得见巴罗克风格,内海就在那里拥有我们能够为它要求拥有的权利,我们就能在那里辨认出地中海文化的标记。把对价值的评价姑且撇在一边不谈就纯粹的重量和数量而论,文艺复兴不能和巴罗克风格的巨大爆炸相比。前者是意大利的城市的儿女;后者则既从神圣罗马帝国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中,也从西班牙帝国的世俗力量中汲取力量。显然,这是一道崭新的光线。从1527年和1530年起,从文艺复兴的繁荣兴旺的大城市如佛罗伦萨和罗马等的悲惨的末期起,这道光线就改变了色调,情况正如在照射灯的光线突然由白变绿,或者由红变蓝的舞台上一样。新的更加血红的色彩沐浴着西欧的景色。

我谈完这一点,希望读者能够了解我的这番话。我在撰写一本关于地中海的书时,无法对有关地中海的巨大的形态变化的一切

统统加以叙述。否则，我就得写一本关于整个世界的书。在我看来，一个单一的论证就既足以描述地中海的光荣，也能满足本书的平衡。我将遗憾地把伊斯兰教搁在一边，也遗憾地把西班牙—葡萄牙的美洲以及位于巴西的矿区中心的乌罗·普雷托的诞生得很晚的但十分罕有的光辉灿烂的事物搁在一边。蔓生怒长、充斥各地的巴罗克风格，仅仅在本身已经十分辽阔的西欧这个地区内，就已经足够使我们忙得不可开交了。

巴罗克风格的各个阶段

继雅各布·布克哈特之后，德国历史学家 H. 韦尔弗林、A. 里格尔、A.-E. 布林克曼和 W. 魏斯巴赫等人使巴罗克风格这个词[377]得到人们的赞同和喜爱。他们让一艘有另外很多人搭乘旅行的船下了水。他们试图进行的，原则上是一种有用的、在可以和地层相比拟的艺术层的分类和辨认等方面所作的尝试。有人向我建议在罗曼风格、哥特风格和文艺复兴风格序列之后再加上第四个词，[378]即巴罗克风格这个词。这个词正好放在受法国启发、影响的古典主义的复活的前面。既然巴罗克风格被描写成一种即使不是四层也是三层的重叠建筑，这个词就是个不适用于一个完全清晰的或者简单的概念的词。

在米开朗琪罗于 1497 年和 1499 年之间为圣彼得教堂雕刻的《哀悼基督》中，在拉斐尔的《房间》中，在《波尔戈的火灾》和《被从神殿赶出的埃利奥多尔》的激烈的动势中，在博洛涅尼亚的《圣塞西尔》壁画中，都可以看出巴罗克风格的根源来。根据埃克尔·马尔的说法，这幅《圣塞西尔》壁画自身已经含有新时代的特征的某

些东西,[379]而且据说还含有“巴罗克风格的手势语言”[380]的某些东西。在《安格希亚里战役》的大底画中或者在(这次是在意大利之外)丢勒的版画中也可以找到这些根源来……这一切实际上形成一种令人惊奇的混合物。人们明确指出:巴罗克风格的不可否认的创始人之一是收存于帕尔马[387]的《圣母升天图》的作者柯雷乔。他只差对尘世的欢乐和对裸体的美表示出更多的鄙视厌弃和冷漠疏远就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完全被人接受的巴罗克风格艺术家。而米开朗琪罗在他那方面特别喜欢通过这种裸体美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感情。但是,另一方面,米开朗琪罗对伟大事物的爱好,他的怜悯、同情、悲怆,他的恐怖,同拉斐尔的优雅,同柯雷乔的画中的动势和光线的闪动,是乐善好施的仙女放在巴罗克风格这个婴儿的摇篮上的第一批礼物。婴儿得到这样的赠礼,于是很快长大。当柯雷乔1534年去世时,婴儿差不多已经成年。当米开朗琪罗1541年经过七年殚精竭虑的劳动,完成“中世纪的恐怖”[382]在其中复活的《最后的审判》这幅画时,这个婴儿肯定已经成年。

1527年罗马惨遭洗劫和1530年佛罗伦萨被攻占后,文艺复兴的光辉灿烂的事物忽然宣告完结。“罗马的可怕的洗劫”[383]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似乎是一次上帝的判决。它突然提醒城市要尽自己所担负的基督教的使命。当克莱门特七世在圣昂热古堡中进行抵抗时,罗马城遭到士兵和打家劫舍的农民蹂躏破坏达数月之久。什么也不能幸免于难。拉斐尔的门生弟子已经分散在远方各地:帕尼到了那不勒斯;皮耶里诺·德·瓦加到了热那亚;朱勒斯·罗曼到了曼图亚。后者再也不愿从那里归来了。斯汤达尔仓促地作出结论说[384]:“因此,拉斐尔的门生不再有门生了。”艺术的整个生命

的和才智的整个生命的脆弱性就这样显露出来。"上帝的第二次判决"——佛罗伦萨的包围和攻占——在1530年使1527年的灾难重演。G.帕伦蒂指出了这次包围和攻占对经济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由于这次灾难重演,"某些事物死亡了,而且死亡得很快"。[385]新的一代正在登台,新的方式正在胜利。[386]朱利安·德·梅迪奇预言这新的一代将主要是斯巴达式的,而不是雅典式的。死去的是文艺复兴,或许是意大利自己。胜利的是矫揉做作、模仿、夸张、浮夸。这些胜利的事物使仍在进行创作的拉斐尔的所有的门生的作品肿胀起来。它们的学院主义有自己的追随者,以后成了学派。[387]

绘画第一个标明这种风向的突变。风格主义开始了。1557年,卢多维科·多尔切在一次为矫揉做作所作的辩解中为风格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提出一个纲领。从1530—1540年[388]这段时期起,除了威尼斯外,整个意大利都浸透这种风格主义。威尼斯有少数风格主义者。但是,在长时期内,那里也有无法降服的提香。

20世纪把这种风格主义的名称改为前巴罗克风格。这种风格持续的时期是一个漫长的、以丁托列托为典型并且和丁托列托同时于1590年终止[389]的阶段。风格主义的最后的杰作是从1589年到1590年画于威尼斯的大市政会的会议厅的巨幅画卷《天堂》。在这之后,几乎立即开始了巴罗克风格的第一阶段。根据G.施尼霨尔的看法,这个阶段的巴罗克风格的引进人是乌尔比诺的费德里科·巴罗齐奥。他的著名的《人民的圣母》现存于乌菲齐博物馆。[390]直到将近1630年,第一阶段的巴罗克风格都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是第一阶段巴罗克风格的终结吗?不是。因为从这个意大利的巴罗克风格立刻派生出一种生气勃勃的艺术。这种艺术在

瑞士、上德意志、奥地利、波西米亚等地茁壮成长，欣欣向荣，直到18世纪和19世纪为止。它在这些地区得到一种丰沃的、人民大众的灵感和想象的滋养。这种灵感和想象给予它它在其伟大的意大利时期从来没有过的活力。此外，的确就在这里，巴罗克风格这个词(不管它的根源如何)从18世纪开始运用于当时事实上已经衰落的艺术。德国学者宣称，由此得出这样一个公式：巴罗克风格＝德意志。如果考虑到巴罗克风格的根源，这是一个错误的公式。

必须进行讨论吗？

人们可以无休止地就这个按年月次序作出的排列和这个排列所显示出的意图进行争论。这个排列肯定会使巴罗克风格的意义更有价值、更加扩大。人们也可以无休止地争论巴罗克风格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古斯塔夫·施尼雷尔甚至已经把这个巴罗克风格视为一种文明，一种存在于自身的文明。这是一种向欧洲推荐的并且强加于欧洲的最后的普世文明。这是最终的文明吗？人们还可以在这方面吹毛求疵，无端指责。在本书的第一版中，作者沉湎于这种无端指责的乐趣中。但是，这些问题判然有别于我们目前关注的问题，即：不管这些文明的确切的性质和特色是什么，它是从地中海辐射传播出来的。地中海是给与者、传送者，因而也是一股较大的、优越的力量。地中海的教训、生活方式和趣味爱好，成了远离它的海岸的地区遵行的准则。这种文明的活力的证据、它的根源和产生的原因是我们关切的。

地中海文明的巨大传播中心：罗马[391]

罗马是地中海文明的巨大传播中心之一。它不是这种文明的唯一的传播中心，但却是最重要的传播中心。16 世纪开始时，它还是一个普通的贫穷城市。拉伯雷 1532 年第一次旅行时看到的罗马，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的罗马。马尔里亚尼的《地志》和很多其他旅游指南描绘的罗马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的罗马。这是一座狭小的城市，周围是乡村。古老的纪念性建筑物遍布城内和城的四周。这些建筑物往往半遭破坏，外形严重毁损，更往往连同底座都埋没在泥土和废墟瓦砾之下。城里有人居住的部分，有砖砌的房屋、肮脏的小街和大片大片的空地。

16 世纪这座城市发生了变化，它生机勃勃，宫殿、教堂拔地而起。它的人口增加。即使在 17 世纪这个总的说来不利于地中海城市的发展的时代，它仍然保持在它原有的水平上。罗马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任何工艺匠师都能够在那里找到工作。首先是一支石匠—建筑师大军：锡耶纳的巴尔塔萨尔·佩鲁齐（死于 1536 年）、维罗纳的萨米凯利（死于 1549 年）、佛罗伦萨的桑索维诺（死于 1570 年）、意大利北部（几乎所有意大利的建筑师都是从那里来的）的维尼约莱（死于 1573 年）、那不勒斯的利戈里奥（死于 1580 年）、维琴察的安德烈·帕拉迪奥（死于 1599 年）、博洛尼亚的佩利格里尼（死于 1592 年）。奥利维里是个例外，他是罗马人（死于 1599 年）。紧跟这些手工业者、建筑师和石匠之后，匆匆赶来一支画家队伍。这支队伍对于装饰画达到顶峰的艺术时代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拱顶和天花板为画家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与此同时又

把一些有时严格确定的题材强加给他们。“巴罗克风格”的圣画首先是这种风格的建筑极其自然地生下来的女儿。

这个时期圣彼得教堂的修建工程正在完成。杰苏教堂在1568年和1575年之间这个时期正由季阿科莫·维尼奥拉修建。他1573年去世时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的这件艺术品。第一个耶稣会教堂这时已经诞生。这个教堂后来虽然并非始终但也经常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充作楷模。每个修会现在都希望在罗马或者在罗马城外拥有自己的教堂,有自己的特别装饰物。这种装饰物是它们自己的特别礼拜仪式的形象。这样,就先在不朽之城,接着又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诞生了首批有大括号形装饰物和圆形屋顶并有朴素的几何图形的教堂。这些教堂中的恩典谷教堂在法国虽然迟建,但仍然是个优秀的典型。

罗马的这个奇迹般的发展需要巨额开支。斯汤达尔在指出是那些不需要为它们自己的权威担忧的国家在让人制作现代绘画、雕刻和建筑工程的最伟大的杰作的时候,正确地找到了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392]这把我们带回教皇的财政史上。克勒门斯·鲍埃尔在一篇出色的文章里更新了这部历史的基础。[393]的确,历届教皇从他们的国家抽取巨额收入。他们成功地求助于公共信贷。他们的宗教政策,或者简而言之,他们在基督教世界里的政策被人遵奉执行,执行时花费他们自己的费用少于花费各国国家教会的费用。法国教会和西班牙教会已经分别由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掌管支配,被用来满足他们的贪婪和财政需要。在令我们操心关注的50年内,教皇国家很少(只在1557年和神圣同盟存在的3年里)有过巨额战争支出。因此,罗马教廷能为美术事业的发展制订一项庞大

的预算。美洲白银侵入地中海，使这些奢侈的、耗费巨大的政策易于推行。在1560—1570年这段时期以后，利奥十世和于勒二世梦想的事物全都实现。另一方面，因天主教的虔敬行为的浪潮而数量倍增的各种修会和教廷同心协力。罗马也是国中的这些小国的首都，是它们向人炫耀卖弄的首都和它们的橱窗。耶稣会、多明我会、加尔默罗会和方济各会等修会都尽了自己应尽的那份财政努力和在艺术竞争方面的努力，并且在罗马之外模仿、复制首都的成就。如果巴罗克风格在艺术和宗教方面有所发展的话，这就是由于这些修会，特别是由于圣伊尼亚斯这个修会发挥了作用。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的”这个形容词比“巴罗格风格的”这个形容词更适于标示这个发展，尽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保留他们的看法。

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对普遍的、声势浩大的、复杂的向寺院制度和修道院生活的推进进行研究。没有必要说明这种推进怎样在特兰托宗教会议获得成功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开始产生。特兰托宗教会议的成功是新的几代的第一次胜利。早在1517年，就在罗马引入了神爱奥拉托利会。这个修会是在上世纪由贝尔纳尔丹·德·费尔特尔在热那亚创建的。在同一个1517年，利奥十世同意把方济各会的严格遵守教规的修道士同这个修会的圣芳济会修士分开。1528年，从改革的方济各会修士的行列里分离出一些修士，其中有嘉布遣会修士。但是，只在将近1540年，即创立耶稣会的那一年，上述推进运动才声势浩大起来，才能够被看作是最终完全发动起来了。

三年以前，即1537年，保罗三世召集的红衣主教委员会态度悲观。这个委员会甚至考虑让腐败的修会灭绝无继，以便以后由新

修道士来充任这些修会的成员。接着在15世纪40年代,一切都明朗起来。进行了并且打赢了第一个回合,继续创立修会和改革修会。修道士的革新运动蓬勃发展,声势浩大起来。它在特兰托宗教会议后加速发展:圣菲利普·德·内里的奥拉托利会于1564年建立;圣查理·博罗梅的献身会于1578年建立;热那亚人耶安·阿多尔诺和圣弗朗索瓦·卡拉奇奥罗的小兄弟会1588年建立(它的第一个设在那不勒斯的机构建立于1589年。);3年以后,即1592年,在阿维尼翁成立了基督学说父亲会。

这些为了斗争的需要而经常被免除了古老的合唱圣歌的生活的束缚和修道士的教规戒律的束缚的修会,这些"真正的正规的教士",谁能说他们给了罗马教廷什么支援呢?教会因他们而得救。教会能够从罗马发动一次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自上而下进行的、最令人惊奇的革命,它打的这一仗,是深思熟虑、足智多谋地进行的。它传播的文明——这种文明的名称无关紧要——是战斗的文明;它的艺术只是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的另外一种手段。

因此,巴罗克这种艺术风格往往属于宣传的范围,带有宣传的味道。在某些方面,这是一种被引导的艺术,有它的优点和缺点。精明的修道士和神学家要求鲁本斯、卡拉奇奥罗、多米尼基诺、里贝拉、苏巴朗或者牟利罗等人把他们想象、构思的图画具体画出来。如果画出的画显得有不够完善之处,就拒绝接受。天主教会反对新教,仇视装饰豪华的庙宇和图像,想修建上帝在尘世上的最美丽的房屋。这些房屋是天堂的形象,是天国的几个部分。艺术是用来进行战斗和教育的有力的手段,是一种通过形象的力量来确认圣母玛利亚的无瑕的圣洁、圣徒的有效的价值和介入、圣体圣事的真实

性和强大力量以及圣彼得的卓越高尚的品性的手段，是以圣徒的幻想和狂喜为论据的手段。一些完全相同的肖像学方面的题材，被人耐心地汇编、传授，一再横越整个欧洲。巴罗克风格之所以夸张，之所以对死亡、对痛苦和对以毫不留情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的殉教者有兴趣，之所以似乎耽于悲观主义，耽于17世纪的西班牙的醒悟，这是因为它是一种一心一意想进行证明和说服的艺术，而且应该进行证明和说服的艺术，这是因为它绝望地寻求使人感到惊奇的和引人注目的戏剧性的细节。这种艺术供基督教信徒使用。人们想说服、引导这些教徒。人们想通过积极的行动和示范表演把某种真实主义，把大量受人怀疑的概念（例如炼狱的概念和圣洁怀胎的概念）的真实性教给这些教徒。这是一种戏剧艺术，一种有意识地具有戏剧性质的艺术。戏剧难道没有充作过耶稣会会士的武器，特别在这种艺术在它到处享有权利，有巡回演出队，又很快有固定的舞台的时期充作耶稣会会士用来征服德意志的武器吗？

因此，巴罗克风格既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也是一种信仰的方式。它从地中海海岸传向北欧，传向多瑙河和莱茵河，传向法国的心脏巴黎。17世纪初期在巴黎修建了教堂和修道院。巴罗克风格是一种特别具有地中海地区性的生活和信仰的艺术。请读者看看雅各布·布克哈特对庇护二世怎样“在《最后的晚餐》、《圣米迦勒战魔鬼》、《基督升天》、《天使带圣母玛利亚凯旋上天堂》[394]等栩栩如生的图画的围绕下”携带圣体穿过维特尔博的描述。这个描述就是上述论点的证据。人们会马上想到有耶稣受难记中的人物在其中出现的人群的西班牙宗教仪式行列。这并不比在意大利更加排除上演纪念圣体、圣事的奥义的宗教剧。[395]总之，这是一种使北欧

感到惊讶的基督教的戏剧形式。西班牙人在佛兰德的虔诚和自答令人惊讶不置并且引起轰动。[396]巴罗克风格的艺术被用这种南方的宗教感情哺育起来，并把这种宗教感情的某些东西传往北欧。关于传入欧洲各地的弥撒和祈祷仪式，关于地中海人在强烈的要求得到北欧的被争夺的地区(这些地区后来回到罗马教会怀抱)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写整整一本书。当人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能再谈什么地中海的衰落了，除非衰落这个词和它所指的解体被人认为具有一种强大的传播一种垂死的文明的力量。

另外一个传播中心：西班牙

从维也纳西行到里昂，然后到图卢兹，再到例如巴约讷这个地方，就可以看见出现另外一种文明的传播：西班牙文明的传播。罗马和意大利(意大利的各个地区)的影响，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居于统治地位。在法国，罗马和意大利通过它们的旅游者、它们的习俗风尚、它们的思想教导发挥作用。但是，人们却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西班牙的影响。

比利牛斯山的问题之一是：它的大门从来没有同时朝着南、北两个方向打开，以利于南、北互相往来。或者法国是教育者，一切从北向南流转，这是从 11、12 世纪到 15 世纪的情况；或者火炬传到西班牙手中，西班牙跃居突出地位，一切从南向北传播，这是 16 和 17 世纪的情况。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传统久远的对话，因此突然改变了方向。它还将在 18 世纪再次改变方向。在塞万提斯时代，法国力图从它那个既遭人嘲笑、又被人惧怕、也受人敬佩的邻国得到服饰的流行式样、言语、行为的风尚和思想观念。与此相反，西班

牙却断绝与法国的一切接触，监视两国之间的边界地区，禁止它的荷兰臣民去法国学习，从蒙彼利埃撤回它的医学生。[397]

这是一种奇怪的、和往常同样毫无友情可言的对话。除了在荷兰以外，西班牙人还在哪里比在法国更被人嘲笑呢？一部在米德尔堡出版的西蒙·莫拉尔撰写的讥刺性幻想作品的法文译本1608年问世。该书题为：《关于西班牙老爷的行为、美德和风尚的标志》[398]。可怜的老爷！他在书中被比作各种野兽、屋子里的鬼怪、在桌子上进餐的狼、卧室里的公猪、街上的孔雀、同女人在一起的狐狸等。其余的我就略而不提了。这本小册子结束时说："因此，你到处都得提防老爷。"但是，这个受人嘲笑的老爷却被人妒忌和模仿。西班牙的势力的传播，是一个强大的民族、"没有黄昏的"庞大帝国的势力的传播，一种比我国的文明更加精美的文明的传播。在法国，所有正直的、有文化教养的人都应该通晓，事实上也都通晓西班牙文。这就使得几个像出生于西班牙的穆尔西亚人安布罗西奥·德·萨拉扎尔那样的西班牙半岛人，在玛丽·德·梅迪奇统治法国时期在法国有十分美好的教师和语法学者的职业。卡斯蒂利亚的词汇使法国的语言殖民化。布朗托姆是法国亲西班牙的人中的巨擘。[399]这些人习惯于用一些假西班牙词，如用 blasonner、bourler、busquer、fortune、habler 等词代替 parler（说），用 tirer 代替 lancer（投掷），用 treper 代替 monter（登上）。还说摆 care 或 gerbe（架子）以及 marcher à la soldade bizarrement（像士兵那样古里古怪地行走）。[400]用在当时和意大利词同样多的西班牙词来点缀会话，是一处时髦的派头。[401]养成这种风尚需要进行学习，需要很多教师，需要进口书籍。蒙田的父亲读过《亲密无间的书信》、《马

尔克·奥雷尔的留言簿》、《君主王侯们的时钟》和《宠臣近幸的闹钟》这些出自蒙多内多的著名主教安托尼奥·德·格瓦拉之手的著作。[402]翻译书籍大量出版,充斥各地。"巴黎有一家真正的卡斯蒂利亚文的翻译社"。[403]塞万提斯的著作风靡一时。1617年,他的伟大作品《帕尔西勒斯和西吉斯蒙德历险记》在巴黎用卡斯蒂利亚文重印,然后译成法文。[404]此外,骗子无赖小说也有热心的废寝忘食的读者。之后,又有为在法国上演而改编的西班牙喜剧。英格兰的情况与法国相同,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书已被该国翻译并且被吸纳入这个国家的智力、知识的实体中。

在文学的影响之外,1000种其他小的借用也有待评价。既可说是西班牙式的、也可说是法国式的路易十三的宫廷作出了表率。所有西班牙的事物都风靡一时、非常热门。妇女用"西班牙白粉"和"西班牙硃砂"。其实,这些脂粉并不全都来自这个国家。妇女在自己身上洒香水。男人也如法炮制。这些香水有些来自尼斯和普罗旺斯。其中大部分,特别是价值最昂的,禁止"乡巴佬"使用的,则从西班牙和意大利进口[405]。如果布朗托姆的话可信,那么"这两个国家的女人用起香水来,比我们法国的贵妇人更加留心,更加精细。"[406]大家争夺生产稀有的香精和美容制剂的方法。这些方法至少和莫里哀笔下的附庸风雅和卖弄学问的女人的秘方诀窍同样复杂。一个媚女人的男子答应为他的情人买"西班牙皮"手套。的确,虽然法国在那个时代已经制造出精美的产品,法国服饰的流行式样和漂亮雅致的东西已经声誉鹊起,西班牙的柔软而精致的皮手套、有名的科尔多瓦的花露水和雕皮这种被当作挂毯使用的镀金皮革,那时就已享有和今天的"巴黎货"同样的声誉。这些东西同巴

黎商品一样，非常昂贵。当西蒙·鲁伊斯的妻子心血来潮，突然想到要“做些生意买卖”并从西班牙向佛罗伦萨运去一些“香手套”以换取意大利商品的时候，与他丈夫有商务关系的人巴尔塔萨尔·苏亚雷斯说，在这个严肃的有产者居住的城市里没有人愿意购买这种昂贵的奢侈品（每双 3 埃居）。但是，这已经是 1584 年的事了。[407]人们很想知道几个 5 年之后，佛罗伦萨人在想些什么。

在我们了解得最清楚的文学进口物品方面，西班牙的影响在路易十三的统治终结之前[408]没有减少，在终结时才告衰落。这一点把我们再次引到将近 1630—1640 年这段时期。这段时期是财政和经济历史的转折点，是世界财富历史上的伟大时期。西班牙的影响的传播的黄金时代，大致说来是 17 世纪的前半世纪。16 世纪已经进行了上千次接触交往。法国发觉不能忍受西班牙帝国的地理包围而不受损害。但是，随着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前几十年和平恢复，已经播下的种子才发芽、成长、开花。正是和平的恢复导致了巴罗克风格在整个欧洲的胜利。

所谓的地中海衰落

假使人们没有长时期认为地中海在文艺复兴之后不久就已经衰竭的话，历史学家本来会花费更大力气去研究它在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的影响。我不想夸大这种影响的价值、持续时间和效能。然而，巴罗克风格向欧洲喷投去的文化瀑布可能甚至比文艺复兴向欧洲喷投去的文化瀑布更浓密、更厚实、更持续不断。巴罗克风格是两种巨大的帝国文明——罗马帝国文明和西班牙帝国文明——的产物。但是，在缺乏必要的地图的情

况下,我们怎样用图表来说明这两种文明的发展演变和它们在国外的起伏曲折的冒险呢?我们有博物馆的目录,但没有艺术图集;我们有艺术或者文学的历史,但没有文明的历史。

这一点至少是清楚的:正是在地中海的边缘地区,而不是在地中海的骚乱的中心,地中海的命运能够较好地显示出来或者辨认出来。地中海的这些向各个方面漫溢的影响充分标示出它在构成世界的伟大生命的交流和竞赛中的存在和力量。这些影响在17世纪开始时,突出了作为古老的文明的摇篮的地中海在缔造现代世界的过程中的卓越地位。地中海在现代世界的身上打上一个十分巨大的印记。

本部分原注

1. "Civilisation, éléments et formes", *in*: *Première Semaine Internationale de Synthèse*, Paris, pp. 81—108.

2. Lemot de "trahison" est emprunté à un cours de Lucien Febvre à l'université de Buenos Aires, en octobre 1937.

3. Charles—André Julien,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1931, p. 20.

4. On les trouve dans toutes les séries documentaires et spécialement à Raguse, *Diversa di Cancellaria* et *Diversa de Foris*; à Gênes, *Magistrato del Riscatto dei Schiavi*; à Venise, *Quarantia Criminale*...

5. A. de Raguse, *Diversa de Foris*, VII, f°62 à 66, oct. 1598.

6. A. d. S. Venise, Dispacci Senato Spagna, P. Priuli au doge, Madrid, 3 décembre 1611.

7. Archives de Raguse, *Diversa de Foris*, V, f^{os}152 v° et 153, Lisbonne, 15 oct. 1596.

8. 8 juin 1601, A. d. S. Gênes, Atti 659.

9. *Ibid.*, Atti 659.

10. H. Porsius, *Brève histoire*, Arsenal 8° H 17458, cité par J. Atkin-

son, *op. cit.* ,p. 244.

11. 25 sept. 1595, P. Grandchamp, *op. cit.* , p. 73. Voir l'histoire fictive du père de Guzman de Alfarache, M. Aleman, *op. cit.* , I,I,I, p. 8—9.

12. A. d. S. Florence, Mediceo 5037, f°124, Fray Luis de Sandoval au grand—duc de Toscane, Séville 1er août 1568.

13. A. d. S. Venise *Cinque Savii*, Riposte, 142 fos 9 v° et 10, 25 mai 1607.

14. *Saco*, *op. cit.* , p. 101.

15. V. L. Mazuranic ,*art. cit.* , résumé par Zontar, *art. cit.* , p. 369. Voir aussi cette histoire compliquée de Renié, 10 nov. 1571, L. Serrano, *op. cit.* , IV, p. 514—515.

16. R. Hakluyt, *op. cit.* , II,p. 282

17. *Ibid.* , II,p. 282—285.

18. *Boletim de Filmor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 n° 16, p. 692, Madrid, 8 mai 1608.

19. B. M. Royal, 14 A XXIII, f°14 v° et *sq.*

20. Abbé PRÉVOST,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voyages*, IX, p. 135—6, d'après le voyage de Tachard (1685).

21. N. IORGA, *Ospiti Romeni*... ,p. 21.

22. BELON DU MANS, *op. cit.* , p. 182.

23. *Annuaire statistique du monde musulman*, 1923, p. 21, Prêtres musulmans qui gagnent leur vie à copier des manuscrits, BELON DU MANS, *op. cit.* , p. 194.

24. Voir *supra*, I,p. 398.

25. J. W. ZINKEISEN, *op. cit.* , III, p. 266.

26. *Ibid.* , note 2.

27. Communication de Marcel AUBERT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1913.

28. CONYAT BARTHOUX, *Une peinture catalane du XVe Siècle trouvée au monastère du Sinaï*.

29. Ou par d'autres cheminements. Voyez les comparaisons entre Ibn Abbad et Saint Jean de la Croix. Asin PALACIOS . "Un précurseur hispano-musulman de San Juan de la Cruz", *in*: *Al Andalous*, 1933; J. BARUZI, *Problèmes d'histoire des religions*, p. 111 et *sq.* Mais l'héstitation demeure: filiation, parallélisme, simple coïncidence?… J. BERQUE, "Un mystique

…",*art. cit.* ,p. 759,note 1.

30. Abbé MASSIEU, *Histoire de la poésie françcoise avec une défense de la poësie*, 1739,c. r. dans le *Journal de Trévoux*,fév. et mars 1740,pp. 277—314,442—476. VIARDOT, *op. cit.*, II,p. 191—193. A. GONZALEZ PALENCIA, "Precedentes islamicos de la leyenda de Garin", *in* : *Al Andalous*, I, 1933. Maxime RODINSON, "Dante et l'Islam d'après des travaux récents", *in* :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oct. — décembre, 1951.

31. J. SAUVAGET, *Introduction*, *p.* 186; on sens contraire, R. KONETZKE, *op. cit.* ,p. 64.

32. "Patate et pomme de terre",*in* : *Ann. d'hist. soc.* , janv. 1940,II, p. 29 et *sq*; article reproduit dans:*Pour une Histoire à part entière*, Paris, 1962,pp. 643—645.

33. A. Philippson, *op. cit.* , p. 110.

34. *Ibid.* , p. 110.

35. J. KULISCHER, *op. cit.*, II,p. 26—27. Sur le café, l'abondance de la litérature défie tout recensement. La chronologie reste incertaine à souhait A. FRANKLIN, *Le café* ,*le thé* , *le chocolat*, 1893; William H. UKERS, *All about Coffee*, New York, 1922; Jean LECLANT,"Le café et les cafés de Paris (1644—1693)",*in* : *Annales E. S. C.* , 1951; Günther SCHIEDLAUSKY, *Tee*, *Kaffee*, *Schokolade*,*ihr Eintritt in die europäische Gesellschaft*, 1961.

36. Olivier DE SERRES, *Le Théatre d'Agriculture*, Lyon, 1675, p. 557, 783, 839; Otto MAULL *Geographie der Kulturlandschaft*, Berlin, Leipzig, 1932 p. 23.

37. D'après les études d'un érudit charentais, Robert GAUDIN.

38. Otto MAULL, voir ci-dessus,note 2.

39. *Op. cit.* , I,p. 451.

40. Rabelais à Jean du Bellay, Lyon, 31 août 1534,*unicam platanum vidimus ad speculum Dianae Aricinae*.

41. QUIQUERAN DE BEAUJEU, *op. cit.*, p. 329.

42. *El celoso extremeño*, *Novelas ejemplares*, II,p. 25.

43. R. Lacoste, *La colonisation maritime en Algérie*,Paris, 1931, p. 113.

44. *Jeunesse de la Méditerranée*, 1935, p. 10, 15,20…; *Le sel de la*

mer; *op. cit.*, p. 118.

45. *Voyage en Italie*, *op. cit.*, p. 127—128.

46. *Sources inédites... du Maroc*, *France*, I, p. 322, Saint-Gouard à Charles IX, Madrid, 14 avril 1572.

47. Note de Lucien FEBVRE.

48. G. TURBA, *op. cit.*, 1,3,12 janv. 1562.

49. *La Réforme en Italie*, p. 3.

50. En 1561, Emmanuel Philibert avait signé une trêve avec ses Vaudois. "...e como dire uno interim", écrivait Borromée, J. SUSTA, *op. cit.*, I, p. 97. Depuis 1552, les Vaudois sont liés à l'église réformée de Bâle, avec les réformés français du Dauphiné et de la Provence. F. HAYWARD, *Histoire de la Maison de Savoie*, 1941, II, p. 34—35. Nouvelles concessions du duc aux Vaudois en 1565, Nobili au duc, Avignon, 7 nov. 1565, Mediceo 4897, f° 152. Vers 1600, nouveaux troubles, des hérétiques étrangers, surtout français, mettent à mal catholiques, couvents... Les Chartreux demandent à descendre vers 1600, de Montebenedetto à Banda... Fra SAVERIO PROVANA DI COLLEGNO, "Notizie e documenti d'alcune certose del Piemonte", *in* : *Miscellanea di Storia Italiana*, 1901, t. 37, série 3, vol. 2, *art. cit.*, p. 233.

51. Arturo PASCAL, "Da Lucca a Ginevra", très remarquable étude, *in* : *Riv. st. ital.*, 1932—1935, 1932, p. 150—152.

52. Federico CHABOD, *Per la storia religiosa dello stato di Milano*, Bologna, 1938, nombreuses références à l'index, p. 292.

53. A. RENAUDET, *Machiavel*, p. 194.

54. 23 nov. 1547, p. 258.

55.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IX, p. 27—29, vers 1535; Alonso de la Cueva à Philippe III, Venise, 17 oct. 1609, A. N., K. 1679.

56. M. ROSI, *La riforma religiosa in Liguria e l'eretico umbro Bartolomeo Bartoccio*, *Atti della Soc. Ligure di storia patria*, 1892, compte rendu *in* : *Bol. della Soc. umbra di storia patria*, I, fasc. II, 1895, p. 436—437.

57. Sur G. Bruno voir : Virgilio SALVESTRINI, *Bibliografia di Giordano Bruno*, 1581—1950, 2ᵉ ed. posthume, p. p. Luigi FIRPO, Florence, 1958; d'après les sondages auxquels nous avons procédé, cette bibliographie semble exhaustive quant à la période indiquée. Voici pour mise à jour,

quelques titres postérieurs à 1950 : Paul—Henri MICHEL,*Giordano Bruno, philosophe et poète*, 1952(extrait du *Collège philosophique : Ordre désordre, lumière*);A. CORSANO, *Il Pensiero di Giordano Bruno nel suo svolgimento storico*, Florence, 1955; Nicola BADALONI, *La Filosofia di Giordano Bruno*, Florence, 1955;Ádám RAFFY, *Wenn Giordano Bruno ein Tagebuch geführt hätte*, Budapest, 1956; John NELSON, *Renaissance Theory of Love, the Context of Giordano Bruno's"Eroici furori"*, New York,1958;Augusto GUZZO, *Scritti di storia della filosofia, II, Giordano Bruno*, Turin, 1960; Paul Henri MICHEL, *La Cosmologie de Giordano Bruno*, Paris, 1962.

58. Souvent de simples actions judiciaires, ainsi pour cet hérétique, Alonso Biandrato, réfugié à Salucas sous la protection française et que le Pape veut qu'on lui livre. Cardinal de Rambouille à Catherine de Médicis, Rome, déc. 1568,B. N. , Fr 17 989, fos 29 v° à 30 v°, copie.

59. Philippe II auprince de Florence, Aranjuez, 2 juin 1568, Sim. E° 1447; Grand Commandeur de Castille à Philippe II, Carthagène, 10 juin 1568, Sim. E°150,f°s18 et 19; D. Juan d'Autriche à Philippe II,Carthagène, 10,juin 1568, *ibid.* , f°17.

60. E. SCHÄFER, *op. cit.* , 1,p. 134—136.

61. *Ibid.* , I,p. 34—36.

62. Relacion de cartas de J. de Vargas Mexia para S. M. , 29 déc,. 1578,21 janv. 1579, A. N. K. 1552,B 48 ,n°15.

63. Marcel Bataillon. "Honneur et Inquisition, Michel Servet poursuivi par l'Inquisition espagnole",in :*Bulletin Hispanique*, 1925,p. 5—17.

64. R. Konetzke, *op. cit.* , p. 146; Marcel Bataillon, *Érasme et l'Espagne*, P. 551.

65. *Op. cit.* , p. 258.

66. "Recenti studi intorno alla Riforma in Italia ed i Riformatori italiani all'estero, 1924—1934",in :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1936,p. 83—110.

67. Edgar Quinet, *Les Révolutions d'Italie*, Bruxelles, 1853,p. 235 et *sq.*

68. Herbert SCHOFFLER, *Abendland und Altes Testament*, 2e édit. , Francfort-sur-le-Main, 1943.

69. Énorme littérature à ce sujet, et notamment, G. SCHNÜRER, *op. cit.* , p. 266.

70. E. RODOCANACHI, *op. cit.*, I, p. 24.

71. Gilberto FREYRE, *Casa Grande*, *op. cit.*, p. 298.

72. Voir *supra*, I, p. 149

73. Julius SCHMIDHAUSER, *Der Kampf um das geistige Reich*, 1933, cité par Jean-Édouard SPENLÉ, *La pensée allemande de Luther* à *Nietzsche*, 1934, p. 13, note 1.

74. Spécialement le long rapport de Gregoria Malaxa, V. Lamansky, *op. cit.*, p. 083 et *sq.*

75. *Ibid.*, p. 087.

76. *La Péninsule balkanique*, p. 27.

77. *Ibid.*, les zones méditerranéenne ou italienne, grecque ou byzantine, patriarcale.

78. Le mot est de M^me^ de Staël.

79. A. Philippson, "Das byzantinische Reich", *art. cit.*, p. 115.

80. Konstantin JIRECEK, *Die Romanen in den Städten Dalmatiens*, 1902, p. 9

81. A. PHILIPPSON, voir page précédente, note 4.

82. J. CVIJIĆ, *op. cit.*, p. 89.

83. H. HOCHHOLZER, "Bosnien u. Herzegovira", *art. cit.*, p. 57.

84. A. E. MITARD, "Considérations sur la subdivision morphologique de l'Algérie orientale", *in* : 3^e^ *Congrès de la Fédération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de l'Afrique du Nord*, p. 561—570.

85. Sur le Constantinois, R. BRUNSCHVIG, *op. cit.*, I, p. 290 et *sq.*

86. Toits rustiques et terrasses des maisons, le contraste existe aussi dans le Sud de l'Espagne en arrière d'Almeria et de l'Alpujarra. Mais comment l'expliquer ? Julio Caro BAROJA, *Los Moriscos del Reino de Granada*, Madrid, 1957.

87. *Revue africaine*, 1938, p. 56—57.

88. LÉON L'AFRICAIN, édit. 1830, II, p. 11.

89. M. Bandello, *op. cit.*, IX, p. 48.

90. Lucien Febvre, *La religion de Rabelais*, 1912, 2^e^ éd. 1947, p. 123.

91. J. KULISCHER, *op. cit.*, II, p. 297.

92. Gal BRÉMOND, *op. cit.*, p. 339.

93. Friedrich C. A. J. HIRTH, *Chinesische Studien*, Munich, t. I, 1890, p. 266.

94. Dates différentes, G. MARÇAIS, *Histoire Générale de Glotz, Moyen Age*, t. III, 1944, p. 365.

95. *Chimie et industrie*, août 1940.

96. Berthold BRETHOLZ, *Latein. Palaeographie*, Munich, 1912, 3e éd. , 1926, p. 16.

97. Voir ci-dessus note 5.

98. *Ibid*.

99. *Études byzantines*, 1938,p. 269 et *sq*.

100. Ch. André Julien, *Histoire de l' Afrique du Nord*, 1re édit. , p. 320—7.

101. Robert BRUNSCHWIG,*op. cit.* ,I, p. 105.

102. Gal BRÉMOND, *op. cit.* , p. 372,note 1.

103. Jean SERVIER, *op. cit.* , p. 17.

104. *Op. cit.* ,p. 21.

105. *Op. cit.* ,p. 20.

106. Premier numéro, juillet 1963,Éditorial Herder, Barcelone.

107. *Op. cit.* , p. 221.

108. R. BUSCH ZANTNER, *op. cit.* , *passim* et notamment p. 22; Otto MAULL, *Südeuropa*. p. 391.

109. Darity, *op. cit.* , 1617, p. 637.

110. J. Cvijič,*op. cit.* , p. 105; H. Hochholzer, *art. cit*.

111. Voir *supra*, I, p. 31,et *sq*.

112. J. Cvijič,*op. cit.* , p. 121.

113. I. Sakazov,*op. cit.* , p. 192.

114. *Baba Ganje*, p. 42,cité par J. CVIJIC,*op. cit.* , p. 481.

115. Cité par J. CVIJIC,*op. cit.* , p. 487.

116. I. SAKAZOV *op. cit.* , p. 197.

117. Antoine JUCHEREAU de SAINT-DENIS, *Histoire de l'Empire ottoman,depuis* 1792 *jusqu'en* 1844,4 vol,1844, I, p. 36.

118. F, de BEAUJOUR, *Tableau du commerrce de la Grèce* ,1800,I, p. 54,et *sq*.

119. D'après Besolt,voyageur du XVIe Siècce,que cite I. Sakazov, *op. cit.* , p. 202.

120. J. Cvijič,*op. cit.* ,p. 172.

121. R. Busch Zantner, *op. cit.* ,.p 59,J. Burckhardt, "Die thrakische

Niederung und ihre anthropogeographische Stellung zwischen Orient und Okzident", *in* : *Geogr. Anz.*, 1930, p. 241.

122. Herbert WILHELMY, *Hochbulgarien*, Kiel, 1935; R. BUSCH ZANTNER, *op. cit.*, p. 28; Wolfgang STUBENRAUCH, *Zur Kulturgeogr. des Deli Orman*, Berlin, 1933.

123. Depuis la première édition de *La Méditerranée* ont paru des études décisives sur le problème morisque: Tulio HALRÉRIN DONGHI, *Un conflicto nacional : Moriscos y Christianos viejos en Valencia*, Buenos-Aires, 1955; "Recouvrements de civilisations : les Morisques du Royaume de Valence au XVI[e] siècle", *in* : *Annales E. S. C.*, 1956; Henri LAPEYRE, *Géographie de L'Espagne Morisque*, 1959; résout le difficile problème statistique de l'expulsion des Morisques; l'ouvrage déjà cité de Julio CARO BAROJA, *Los Moriscos del Reino de Granada*, est un chef d'œuvre, l'un des plus beaux livres d'histoire et d'anthropologie culturelles que je connaisse.

124. Contrairement à ce que disent H. Hefele ou F. de Retana... Témoignage rétrospectif, mais catégorique dans notre sens, celui de Diego Hurtado de Mendoza, *De la guerra de Granada*, éd. de Manuel Gòmez-Moreno, Madrid, 1948, p. 8 et *sq.* J. Caro Baroja dont on admirera le ton, *op. cit.*, p. 5 et *sq.*

125. En 1609 encore, Clément VIII est opposé à l'expulsion des Morisques et au zèle du saint archevèque de Valence, Juan de Ribera, G. Schnürer, *op. cit.*, p. 196.

126. R. Konetzke, *op. cit.*, p. 57.

127. *Gobierno de Vizcaya*, II, p. 357. En 1582, on évoque contre lui des lois raciales (*ibid.*, II, p. 223) et, en 1585, au nom des exclusives prévues par le *fuero*, *ibid.*, p. 309; exclusives mises en pratique aussi, en 1572, dans la proche Navarre, Antonio CHAVIER, *Fueros de Navarra*, 1686, p. 142.

128. Simancas Patronato Real, 15 août 1513, pour Arevalo et Medina del Campo.

129. Cité par L. PFANDL, *Philippe II*, Madrid, p. 310—311, "*habet duas morerias cum Saracenis plenas*".

130. I. de Asso, *op. cit.*, p. 219—220.

131. CABRERA, cité par R. MENENDEZ PIDAL, *op. cit.*, I, p. 122.

132. Au total 20 p. 100 de la population aragonaise, H. LAPEYRE, *op. cit.*, p. 96.

133. Apuntamientos del Virrey de Aragon sobre prevenciones de aquel reyno contra los Moriscos, Simancas E°335, s.d. (vers mars 1575).

134. *Geografia General de Catalunya*, *op. cit.*, p. 343.

135. Voir cependant, A.H.N. Inquistion de Barcelone, Libro I, f°21, 20 décembre 1543.

136. H. LAPEYRE, *op. cit.*, p. 27.

137. Voir p. 114 et 115.

138. H. LAPEYRE, *op. cit.*, p. 26.

139. *Ibid.*, p. 30.

140. A ce sujet, innombrables preuves, ainsi Castagna à Alessandrino, Madrid, 15 mars 1569. L. SERRANO, *op. cit.*, III, p. 5, les Morisques "sono favoriti da tutti li signori di quel paese perché da loro cavano quasi tutta l'entrata che hanno...", à propos de Valence et du Maestre de Montesa.

141. J. C. BAROJA, *op. cit.*, p. 2 et *sq.*, *passim.*

142. *Ibid.*, p. 154.

143. Simancas E°328, le licencié Hurtado à S.M. las Aipujarras, 29 juin 1561

144. F. de Alava a Çayas, Tours, 29 oct., 1569, A.N., K1512, B 24, n°138 b, orig. dup. n°138 a.

145. A.H.N. Inquisition de Grenade, 2602, 20 mars, 28 mai, 17 juillet 1572 ; 7 sep. 1573.

146. Sur l'aspect "colonial" de Grenade, Pedro de Medina, *op. cit.*, p. 159 v°.

147. J. C. Baroja, *op. cit.*, p. 13.

148. *Ibid.*, p. 142.

149. *Ibid.*, p. 23.

150. *Ibid.*, p. 166.

151. *Ibid.*, p. 193 et *sq.*

152. *Infra.*, p. 354 et *sq.*

153. Manuel DANVILA Y COLLADO, "Desarme de los Moriscos en 1563", *in* : *Boletin d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X, 1887, p. 275—306.

154. Simancas E°335.

155. 6 juillet 1580, A. E. Espagne, f°333, défense aux Morisques de Castille d'entrer en Portugal.

156. H. LAPEYRE, *op. cit.*, p. 127.

157. *Ibid.*, p. 162, et *sq.*

158. *Ibid.*, p. 29.

159. J. C. BAROJA, *op. cit.*, p. 154.

160. *Ibid.*, P. 151, le mot est de L. Cabrera de Cordoba.

161. *Ibid.*, p. 169.

162. *Ibid.*, p. 196.

163. *Ibid.*, p. 188.

164. *Ibid.*, p. 199.

165. *Infra.*, p. 363.

166. *Ibid.*, p. 199.

167. H. LAPEYRE, *op. cit.*, p. 122.

168.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903, Nobili au Prince, Madrid, 22 janvier 1571.

169. A. d. S. Gênes, Spagna..., Sauli à la République de Gênes, Madrid, 11 janvier 1571; il y a plus de 2 500 "bandolieri".

170. H. LAPEYRE, *op. cit.*, p. 122 et note 4.

171. *Ibid.*, p. 127.

172. *Ibid.*, p. 162 en *sq.*

173. Dans les terres tolédanes, ils sont 1 500 et 1570 mais 13 000 en 1608, aux dires du cardinal de Tolède, J. C. VAROJA, *op. cit.*, p. 214.

174.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911, Bernardo Canigiani, ambassadeur du Grand-Duc. Medrid, 27 juin 1580, a cru tout d'abord à une fable, puis la confirmation vient par des lettres de marchands de Séville.

175. Longlée au Roi Madrid, 5 mars 1588, *Correspondance*, p. 352.

176. Simancas E°165, f°347. Consulta del C° de Est°, 5 juill. 1588.

177. Longlée au Roi, 5 juin 1588, p. 380.

178. Simancas E°1089, f°268. Miranda au Roi, Naples, 6 mai 1588.

179. Sobre los moriscos, conseil d'État, 14 nov. 1488, Simancas E°165, f°34.

180. Los muchos nuevos christianos que ay por toda Castilla, Madrid, 30 nov. 1588, Simancas E°165, f°348.

181.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185, f°ʳ171 à 175, rapport anonyme.

182. Marqués de Denia à Philippe II, Valence, 3 août 1596, Simancas E°34, f°42.

183. Madrid, 22 mai 1590, Simancas E°165.

184. 22 mai 1590, voir note précédente.

185. 5 mai 1590, Simancas E°165.

186. Arch. de l'ex-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Algérie, Registre 1686, f°101.

187. Consulta del C° de E°, 2 févr. 1599, Simancas E°165, F°356. Voir également C° de E° au Roi, 10 août 1600, A. N., K1603.

188. H. Lapeyre, *op. cit.*, p. 210, nuance ce jugement: "Cela est vrai pour le Morisque endurci qui se refusait à la civilisation chréstienne, mais on y trouve d'assez nombreuses défenses du Morisque que nous pourrions appeler 'bien pensant'."

189. J. de Salazar *op. cit.*, p. 16—17; Gal Brémond, *op. cit.*, p. 304.

190. J. C. Baroja, *op. cit.*, p. 231.

191. I. de Asso, *op. cit.*, p. 338.

192. E. J. 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 p. 304—305.

193. H. Lapeyre, *op. cit.*, p. 204.

194. *Ibid.*, p. 71 et 212.

195. J. C. Baroja, *op. cit.*, p. 127.

196. *Ibid.*, p. 107.

197. Simancas E°165, 11 août 1590.

198. 2 févr. 1599, référence note 6, p. 128.

199. Gal BRÉMOND, *op. cit.*, p. 170.

200. "Il serait temps d'en finir à ce sujet avec les doléances sentimentales d'une certaine école historique, sur ce qu'elle appelle l'*odieuse et barbare expulsion des Mores d'Espagne*. Ce qui doit étonner, c'est qu'on se soit résigné à supporter pendant plus de cent ans, malgré l'avis du grand Ximénès, la présence d'un million de Morisques en état de conspiration permanente à l'intéreur et à l'extérieur..."Henri DELMAS DE GRAMMONT, *Relations entre la France et la Régence d'Alger au XVII[e] siècle*, Alger, 1879, 1[re] Partie, en note p. 2 et 3.

201. Voyez comme s'y trompent peu des voyageurs, bons observateurs. LE PLAY, 1833, "il y a du sang arabe chez tous ces gens-là", p. 123;

Théophile GAUTIER, *Voyage en Espagne*, p. 219—220; Edgar QUINET, *Vacances en Espagne*, p. 196 et tant d'autres.

202. Ainsi C. PEREYRA pour l'Amérique espagnole. Pour le Brésil, N. J. DABANE, *L'influence arabe dans la formation historique et la civilisation du peuple brésilien*, Le Caire, 1911.

203. Pour le Portugal, cet *Arte de Cazinha* de Domingos RODRIGUEZ, 1652, que cite Gilberto FREYERE, *Casa Grande e Senzala*, I, p. 394, livre auquel nous empruntons aussi nos rapides remarques à propos du XVIII[e] siècle. Persistance d'une architecture et d'une décoration "morisques" à Tolède, jusqu'au XVI[e] siècle et peut-être au delà, ROYALL TYLER, *Spain, a Study of her Life and Arts*, Londres, 1909, p. 505.

204. Sur la question morisque énorme documentation encore inédite, à Simancas, ainsi E°2025 (Moriscos que pasaban a Francia, 1607—1609). Un transport de réfugiés morisques "avec leurs hardes" par une barque marseillaise, A. des B. du Rhône, Amirauté B IX, 14, 24 mai 1610. Un texte admirable, enfoui dans Eugenio LARRUGA, *Memorias politicas y economicas*, t. XVII, Madrid, 1792, p. 115—117. Des Morisques *desterrados* sont revenus en Espagne (1613), sans femmes, sans enfants… Rien que des hommes seuls. Va-t-on les employer dans les mines de mercure d'Almadem? Non, qu'on cherche, parmi les galériens, des spécialistes du travail des mines et qu'à bord des galères on les remplace par ces gens sans aveu, plus coupables que les galériens, "pues han sido de apostasia y crimen loesae Majestatis".

Sur les survivances de la civilisation musulmane, il faut voir le plaidoyer chaleureux, souvent neuf de Julio CARO BAROJA, *op. cit.*, p. 758 et *sq.* Sur les expulsions mêmes des Morisques et l'énorme transport qu'elles signifient, voer Henri LAPEYRE, *op. cit.*, *passim*. Ce beau livre ne fixe qu'un aspect (statistique) du problème, lequel problème est à replacer dans toute l'histoire politique, sociale, économique et internationale de l'Espagne. Ici la tâche est loin d'être accomplie: "…l'expulsion des Morisques ne semble pas le fait d'un État en décadence" *ibid.*, p. 213, c'est possible, non pas démontré. De même ont joué la pression démographique, *ibid.*, p. 29 et *sq.* la haine contre une classe artisanale, marchande et prolifique. Je reste, jusqu'à plus ample informé, fidèle à l'explication ancienne (*supra*, p. 129): la religion a désigné les partants …

Paru en 1977,le livre de Louis CARDAILLAC, *Morisques et Chrétiens, un affrontement polémique* (1492—1640), a la valeur, pour les études hispaniques, de l'ouvrage monumental de Marcel Bataillon *Erasme et l'Espagne*. Il apporte sur le conflit, en terre espagnole, entre Islam et Chrétienté, des lumiéres neuves d'une rare richesse. Retenir seulement, dans le sens des explications qui précèdent, cet acharnement, cette surexcitation progressive entre les deux religions,c'est marquer la coexistence tendu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la façon dont elles s'adaptent l'une à l'autre, en grognant et souffrant. Adaptation qui n'est certes pas sous le signe de la tolérance. Tout finit par l'explosion.

205. Alfred HETTNER, *art. cit.*, p. 202,ou les éblouissantes remarques d'André MALRAUX, *La lutte avec l'Ange*, 1945.

206. Sur ce grand problème le livre lumineux d'E. F. GAUTIER, *Moeurs et coutumes des Musulmans*, (réédition 1955).

207. Louis Gillet, *Le Dante*, p. 80.

208. Cité par Louis Gillet, *ibid.*,p. 94.

209. Fernand Grenard ,*Grandeur et décadence de l'Asie*, p. 34.

210. Louis Gillet ,in :*Revue des Deux Mondes*, 1942,p. 241.

211. *Ibid.*, p. 202.

212. J. Sauvaget, *Introduction*, p. 44—45.

213. *Op. cit.*, p. 51.

214. A. d. S. Flòrence, Mediceo, 4279.

215. Paolo Tiepolo, 19 janv. 1563, E. Albèri, *op. cit.*,I, V. p. 18.

216. *Ibid.*

217. Ainsi en 1596, rapport sur Africa, Palerme, 15 sept. 1596, Simancas E°1158.

218. J. Atkinson, *op. cit.*,p. 244.

219. 4 sept 1569, Simancas E°1057,f°75.

220. E. de Vaumas, *op. cit.*, p. 121.

221. Francis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Venise, 23 nov. 1590, A. N.,K 1674.

222. *Op. cit.*, p. 120

223. Dès le XV^{e} siècle ,Pisanello.

224. B. N., Paris, Fr 5599.

225. Richard B. HIEF, "Die Ebenholz—Monopole des 16. Jahrhun-

derts",*in*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VIII, 1925,p. 1925,p. 183 et *sq*.

226. L. VOINOVITCH ,*Histoire de Dalmatie*, 1934,p. 30.

227. Les Recteurs à Marino di Bona, consul ragusain à Naples, 8 mars 1593,A. de Raguse, L. P. VII, f°17. Un "lombard"médecin à Galata,N. IORGA,*Ospiti romeni*, p. 39.

228. N. IORGA, *Ospiti romeni*,p. 37,39, 43.

229. Le fait souvent signalé et même par M. BANDELLO, *op. cit.* ,IX, p. 50.

230. *Epist.* III,p. 199.

231.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p. 173—174.

232. Et les pénétrations européennes catholiques ou protestantes; G. TONGAS, *op. cit.* ,p. 69; H. WÄTJEN, *op. cit.* ,p. 69; le rôle de Venise entre Capucins et Jésuites, E. DE VAUMAS, *op. cit.* ,p. 135;l'affaire des Lieux Saints en 1625, *ibid.* , p. 199; l'histoire mouvementée du patriarche Cyrille Lascaris, K. BIHLMEYER, *op. cit.* , III,p. 181,G. TONGAS, *op. cit.* , p. 130 .Même l'Afrique du N. touchée par cette croisade sans guerre, R. CAPOT-REY "La Politique française et le Maghreb méditerranéen 1648—1685",*in* : *Revue Africaine*, 1934,pp. 47—61。

233. Jacques GASSOT,*Le discours du voyage de Venise* à *Constantinople* ,1550, 2ᵉ éd. ,1606,p. 11. Dans la fonderie de Péra ,40 ou 50 Allemands "…font des pièces d'artillerie", 1544,*Itinéraire de J. 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p. p. Léon DURIEZ, 1901,p. 204

234. Voir *infra*, p. 4.

235. Pour une bibliographie plus ample que celle que fournissent nos références, se reporter aux livres essentiels d'Attilio MILANO, *Storia degli ebrei in Italia*, Turin, 1963,et de Julio CARO BAROJA, *Los Judios en la España moderna y contemporanea*, Madrid,3 vol. , 1961. Le problème essentiel reste en ce domaine le point de vue qu'adopte l'hisrorien. peutil resrer exlérieur, comme Iurio Caro Baroja au drame quil relate,être purement spectateur? Michelet n'eût pas adopté ce parti-là.

236. Léon POLIAKOV, *Histoire de l'Antisémitisme, II, De Mahomet aux Marranes*, Paris, 1961,p. 235 et *sq*.

237. Simancas, Guerra Antigua 7, f° 12, Luis Sarmiento à Charles Quint, Evora, 5 décembre 1535.

238. A. d. S. Venise, Senato Dispacci, Spagna, Contarini au Doge, Valladolid, 4 octobre 1604. Simancas, E° Portugal 436 (1608—1614). Preuve qu' il y a des façons de s'accomoder, encore à cette époque, avec les autorités portugaises, La conscessisn de sortie pour les nouveaux chrétiens est de 1601, le retrait de la concession de 1610, J. Lucio de Azevedo, *Historia des christãos novos portugueses*, 1922, p. 498.

239. Sur le mot, voir I. S. Revah, "les Marranes", in :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 3e série, t, I, 1959—1960, pp. 29—77; sur l'obstination à judaïser, tout l'ouvrage de J. Caro Baroja porte témoignage, ou telles page, à propos du cas mineur de Majorque du vieux livre de Francisque Michel, *Histoire des races mauditas de la France et de l'Espagne*, Paris, 1847, t II, pp. 33 et *sq.*

240. Mœurs et coutumes des Musulmans, *op. cit.*, p. 212.

241. Léon POLIAKOV, *Histoire de l'antisémitisme*. II, *De Mahomet aux Marranes*, p. 127 et *sq.* : La nation juive en Espagne. Nous avons beaucoup emprunté à ce livre honnête et intelligent.

242. *Ibid.*, I, *Du Christ aux Juifs de Cour*, 1955, p. 266, et *sq.*, particulièrement p. 277 et *sq.*

243. Plinio BARRETO, "Note sur les Juifs au Brésil", *in* : *O Estado de São Paulo*, 31 octobre 1936; riche et solide literatune à lenr sujet à partir des livres classiques de Gilberto Freyre, de Lucio Azevedo; le recueil documentaire essential reste les trois volumes de la *Primeira Visitação do Santo Officio as Partes do Brasil* pclo Licenciado Heitor FURTADO de MENDOÇA…, deputado do Sto Officio : *I. Confissôdes da Bahia* 1591—92, Introducção de Capistrano de Abreu, São Paulo, 1922; *Denunciacôes de Bahiã*, 1591—93 São Paulo, 1925; *Denunciacôes de Pernambuco*, 1593—95; Introducção de Rodolpho Garcia São Paulo, 1929. Sur le Portugal, Léon POLIAKOV, *op. cit.*, *De Mahomet aux Marranes*, p. 235, et *sq.*

244. Léon POLIAKOV, *Du Christ aux Juifs de Cour*, p. VI—XII; *De Mahomet aux Marranes*, p. 139; Joseph HA COHEN, *Emek Habakha ou la Vallée des Pleurs*; *Chronique des souffrances d'Isriël depuis sa dispersion*, 1575, et à la suite *Continuation de la Vallée des Pleurs*, 1602, p. p. Julicn SÉE, Paris, 1881, p. 167. …

245. Hermann KELLENBENZ, *Sephardim an der unteren Elbe. Ihre wirtschäftliche und politische Bedeutung vom Ende des* 16. *bis zum Beginn des* 18. *Jahrh.*, 1958, p. 45.

246. Cité par J. LUCIO DE AZEVEDO, *op. cit.*, p. 52.

247. Léon POLIAKOV, *op. cit.*, I. p. 307 et *sq.*

248. A. MILANO, *op. cit.*, p. 221.

249. A. d. S. Venise, Senato Terra 12, f^{os} 135 et 135 v°, 26 mars 1496. Cf. M. SANUDO, *op. cit.*, I, col. 81, 26 mars 1496.

250. Giuseppe TASSINI, *Curiosità veneziane*, Venise, 1887, p. 319.

251. Simancas, E° Napoles 1031, f° 155, Naples, 25 août 1540. Nombreuses références relatives aux Juifs dans ce *legajo*.

252. A. d. S. Venise, Senato Terra 31, 29 mars 1556.

253. *Op. cit.*, p. 181.

254. Septembre 1566, Joseph HA COHEN, *op. cit.*, p. 158.

255. *Ibid.*, p. 207.

256. Lodovico MOSCARDO, *op. cit.*, p. 441.

257. Joseph HA COHEN, *op. cit.*, pp. 215—216.

258. Musco Correr, Cicogna 1993, f° 261, 16 août 1602.

259. J. LUCIO DE AZEVEDO, *op. cit.*, p. 10.

260. BELON DU MANS, *op. cit.*, p. 180, 193 v°.

261. Cité par Léon POLIAKOV, *op. cit.*, II, p. 180.

262. *Ibid.*, d'après S. de MADARIAGA, *Spain and the jews*, 1946.

263. *Ibid.*, p. 191. IBN VERGA, *Le fouet de Juda*, cité par L. POLIAKOV, *op. cit.*, t. II, p. 64, d'après la traduction allemande due à Wiener, Hanovre, 1856.

264. BELON DU MANS, *op. cit.*, p. 181.

265. *Ibid.*, p. 209—210.

266. J. LUCIO DE AZEVEDO, *op. cit.*, p. 36.

267. BELON DU MANS, *op. cit.*, p. 180 v°.

268. J. HA COHEN, *op. cit.*, p. 251, d'après E. CARMOLY, *Archives israëlites de France*, 1857.

269. A. MILANO, *op. cit.*, p. 180 et *sq.*

270. Le continuateur de J. HA COHEN, *op. cit.*, p. 181.

271. B. N., Paris, Fr. 6121 (s. d.). Voir églement L. POLIAKOV, *op. cit.*, II, p. 247, références au voyage de G. d'Aramon et de Nicolas de Nicolay.

272. *Op. cit.*, p. 180 v°, p. 118.

273. *Ibid.*, p. 100 v°.

274. L. Poliakov, *op. cit.*, I, p. 270—271.

275. *Ibid.*, p. 249 et 250; *La Méditerranée*, 1[re] édition, p. 707—708.

276. Paul Benichou, *Romances judeo—españoles de Marruecos*, Buenos Aires, 1946.

277. H. Kellenbenz, *op. cit.*, p. 35 et *sq.*

278. A. Milano, *op. cit.*, p. 235.

279. Cecil ROTH, *in*: *Mélanges Luzzatto*, pp. 237 et *sq.*; et *à* titre d'échantillon, A. d. S. Venise, Cinque Savii 7, f[os]33—34, 15 décembre 1609. Sur les trois ghettos et l'origine évidemment discutable du mot, arguments et détails dans G. TASSINI, *op. cit.*, pp. 319—320; tout n'est pas clair au sujet de la répartition des trois communautés juives dans les trois ghettos, même après la lecture d'A. MILANO, *op. cit.*, p. 281.

280. Arnold Y. TOYNBEE, *L'Histoire, un essai d'interprétation*, Paris, 1951, pp. 30—153, 398, 428.

281. J. LUCIO DE AZEVEDO, *op. cit.*, p. 68—73.

282. L. POLIAKOV, *op. cit.*, II, p. 262 et *sq.*

283. *Op. cit.*, p. 39.

284. F. AMADEI, *Cronaca universale della città di Mantoa*, II, p. 548.

285. Joseph HA COHEN, *op. cit.*, p. 127.

286. A. N., K 1600, 4 avril 1597, Relacion de algunas nuebas generales que se entienden de Nantes de Paris y otras partes desde 4 de abril 97: "*...quiere hazer benir los judios que hecho el cristianissimo Rey St Luis...*"

287. Cité par L. POLIAKOV, *op. cit.*, II, p. 368, Lettrs et ambassades de Messire Philippe Champagne, 1635, p. 62.

288. Cité par L. POLIAKOV, *op. cit.*, II, p. 367—8, d'après Francisque MICHEL, *Histoire des races maudites de la France et de l'Espagne*, 1847, p. 71 et 94.

289. J. HA COHEN, *op. cit.*, p. 160.

290. H. KELLENBENZ, *op. cit.*, p. 135.

291. Jean BODIN, *Response...*, *op. cit.*, éd. H. Hauser, p. 14.

292. Thomas et Felix PLATTER, *op. cit.*, p. 252, p. 391.

293. J. HA COHEN, *op. cit.*, p. 200.

294. *Ibid.*, p. 112—113.

295. S. Razzi, *op. cit.*, p. 118—119(1516); p. 159(1545). Voir aussi

l'intervention de Soliman le Magnifique contre les persécutions des Julifs et des marranes d'Ancône, A. Milano, *op. cit.*, p. 253; C. Roth, *The Houses of Nasi, Doña Gracia*, Philadelphie, 1947, p. 135—174.

296. W. SOMBART, *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 1922, p. 20. D'après le document p. p. David KAUFFMANN, "Die Vertreibung der Marranen aus Venedig im Jahre 1550", *in* :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1901. Sur cet ordre d'expulsion des Marranes, Marciana, 2991 C. VII. 4, f° 110 v° et 111;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46, f°155, 8 juil. 1550.

297. Marciana, 6085, f° 32 v° et *sq.* : récit des persécutions de 1555 et 1556. Cf. également A. MILANO, *op. cit.*, p. 247—253.

298. L. BIANCHINI, *op. cit.*, I, p. 41. Mais non pas 160 000, A. MILANO, *op. cit.*, p. 222.

299. A. MILANO, *op. cit.*, p. 233.

300. J. HA COHEN, *op. cit.*, p. 180.

301. *Ibid.*, p. 121.

302. *Ibid.*, p. 143.

303. A. HANANEL et E. ESKENAZI, *Fontes hebraici ad res oeconomicas socialesque terrarum balcanicarum saeculo XVI pertinentes*, Sofia, 1958, I. p. 71.

304. L' expression prise à Joseph HA COHEN est banale.

305.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46, f°55, 5 juin 1514.

306.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1, f°1, Constantinople, 5 mars 1561. Voir égalemant sur le ghetto, la "zudeca" de Candie, A. d. S. Venise, Capi del Cons° dei X, Lettere, B^a285, f°74, Candie, 7 mai 1554.

307.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1, 1588.

308. M. Millano, *op. cit.*, pp. 236, 281, 283...

309. *État de la Perse en* 1660, *par le P. Rapbaël du Mans*, p. p. Ch. Schefer, Paris, 1890, p. 46.

310. A. N., A. E., BIII 235, 1693.

311. A Madère, encore en 1682, Abbé Prévosl, *op. cit.*, III, p. 172; Lisbonne, 14 février 1632: "… l'île (de São Tome) est tellement infestée de nouveaux chrétiens qu'ils font les pratiques juives presque ouvertement", J. Cuvelier et *L. Jadin*, *L'ancien Congo d'après les archises romaines*, 1518, 1640, 1954, p. 498.

312. Prologue de Fernando Ortiz, à Lewis Hanke, Las Casas…, P.

XXXVI.

313. Jacob van Klaveren, *op. cit.*, p. 143.

314. Belon du Mans, *op. cit.*, p. 182, et 182 v°.

315. A. Hananel et E. Eskenazi, *op. cit.*, I, 1958 (XVI[e] siècle); II, 1960 (XVII[e] siècle).

316. A. d. S. Venise, Senato Terra, 62, 20 septembre 1573.

317. *Ibid.*, 63, 6 avril 1574.

318. *Ibid.*, 66, 1575.

319. *Ibid.*, 60, 1573.

320. A. d. S Florence, Mediceo 3087, f°348, 14 juillet 1607.

321. Voir *supra*, I, 262—263.

322. La *casa* des *Abravaneles* est d'origine espagnole, ses prêts au Roi, Simancas, E° Napoles 1015, f°101, 6 octobre 1533; *ibid.*, f°33; 1018, f°21, 15 janvier 1534, si l'usure n'est pas faite par les Juifs, elle sera faite par les Chrétiens *à* un taux triple, "porque el fin de Ytalia como V. M. tiene mejor experimentado y conocido, es ynterese"; *ibid.*, f° 58, 3 octobre 1534, "*à* Naples, de 300 *à* 400 familles juives; 1017, f°39, 28 mars 1534, arrestation de Nouveaux Chrétiens à Manfredonis, "que debaxo de ser xpianos han bidido y biben como puros judios"; 1018, f°58, 3 octobre 1534; la ville de Naples demande *à* conserver les Juifs, sans eux l'année passée les pauvres seraient tous morts de faim; 1031, f°155, 25 août 1540, mesures anti-juives; 1033; f° 70, 19 juin 1541, leur expulsion décidée... A. d. S. Naples, Sommaria Partium, 242, f°13 v°, 16 avril 1543, Samuel Abravanel fait extraire par son facteur Gabriele Isaac, 120 *carri* de grain de Termoli; *ibid.*, 120, f°44, 8 juin 1526, un Simone Abravanel, "Juif habitant Naples", importe du sucre de Madère.

323. L. POLIAKOV, *op. cit.*, II, p. 254 et *sq.*, excellent résumé de cette vie hors série. Le livre de base est celui de Cécil ROTH, *The house of Nasi*, 2 vol., 1947, et *The Duke of Naxos*, 1948.

324. Voir *supra*, II, p. 69 et *sq.*

325. *Op. cit.*, p. 180 v° et 181.

326. Werner Sombart, *op. cit.*, p. 53 et *sq.*; L. Poliakov, *op. cit.*, I, p. 249 et *sq.*

327. W. Sombart, *op. cit.*, p. 15.

328. Je pense évidemment aux *Geniza* du Caire et *à* leur prochaine pub-

lication parn A. Gothein.

329. Daniele BELTRAMI, *Storia della popolazione di Venezia..., op. cit.*, p. 79.

330. H. KELLENBENZ, *Sephardim an der unteren Elbe*, 1958, p. 29.

331. *Ibid.*, p. 139.

332. Giovanni BOTERO, *op. cit.*, III, p. 111.

333. Simancas, E° Napoles 1017, f° 42, vice-roi de Naples à S. M., Naples, 26 avril 1534, Salonique "donde ay la mayor juderia de Turquia".

334. Paul BENICHOU, "Les Juifs en Champagne médiévale", *in*: *Évidences*, novembre 1951.

335. L. POLIAKOV, *Les banchieri juifs et ls Saint-Siège du XIII^e au XVII^e siècle*, 1965.

336. H. HEFELE, *op. cit.*, p. 321. La puissance de la présence juive en Afrique du Nord explique la longue survie de la juiverie d'Oran sous la domination espagnole; Diego Suarez décrit leur quartier au beau milieu de la ville avec synagogue et école; en 1667, le ghetto compte plus de 100 maisons et 500 personnes; les Juifs furent expulsés d'Oran sur ordre de Charles II, le 31 mars 1669, d'après J. CAZENAVE, *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Alger*, 1929, p. 188.

337. J. HA COHEN, *op. cit.*, p. 110—111.

338. *Ibid.*, p. 124.

339. *Ibid.*, p. 120.

340. J. CARO BAROJA, *op. cit.*, I, p. 217.

341. "Cargos y descargos del Marques de Velada", answers to the charge of maladministration brought against Don Antonio Sancho Davila y Toledo, marques de Velada during his government of Oran, 1626—1628, f° 57 (P. DE GAYANGOS, *Cat. Mss, in the Spanish language*, B. M., IV, 1893, p. 133).

342. M. SANUDO, *op. cit.*, I, colonne 819, 13 novembre 1497.

343. Marciana 7991 C VII. 4, f^os 110 v° et 111, et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soe 46, f° 155, 8 juillet 1550.

344. F. Braudel et R. Romano, *op. cit.*, pp. 26—27.

345. J. Ha Cohen, *op. cit.*, p. 130—131.

346. *Ibid.*, p. 152.

347. *Ibid.*, p. 158.

348. Voir *supra*, I, p. 577—578.

349. Espejo y Paz. *Las antiguas ferias de Medine del Campo*, 1912, p. 137.

350. W. Sombart, *Krieg und Kapitalismus*, 1913, p. 147.

351. *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 p. 15.

352. L. POLIAKOV, *Les banchieri juifs...*

353. *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 p. 14.

354. Arrestation à Venise des marchands turcs et des Juifs levantins, 5 mars 1570, Chronique de Savina, Marciana, f° 326 v°; plaintes des marchands juifs à Constantinople, 16 décembre 1570, A. d. S. Venise, Annali di Venezia, serie antica; les 24 points du règlement que les Juifs doivent respecter, A. d. S. Venise, Senato Terra 58, 18 décembre 1571; sur le même thème, Museo Correr, Cicogna 1231, f°16; les Juifs chassés de Brescia, 4 septembre 1572, A. d. S. Venise, Senato Terra 60; délai accordé jusqu'en septembre 1573, *ibid.*, 61, 8 mars 1573; règlement des activités permises et défendues aux Juifs, *ibid.*, 11 juillet 1573; concordat accordé à la banque de "Cervo hebreo", dont la faillite doit remonter à 1565, *ibid.*, 20 juin 1573. Alors le climat cesse d'être aussi tendu. Sur les Juifs chassés d'Urbino et mis à la rame : J. HA COHEN, *op. cit.*, p. 161.

355. *Ibid.*, p. 174.

356. Cecil ROTH, *art. cit.*, p. 239.

357. A. MILANO, *op. cit.*, p. 257, J. DELUMEAU, *op. cit.*, II, p. 854, 887—890.

358. Ce qui va de soi, mais à noter les nouvelles exemptions accordées aux Juifs levantins à Ancône, menaces graves sur Venise. Admirable document, A. d. S. Venise, Cinque Savii, Busta 3, 10 août 1597.

359. J. HA COHEN, *op. cit.*, p. 205, 1598.

360. A. d. S. Venise, Cinque Savii, 22, f°52, 20 novembre 1598; f°73, 16 août 1602, privilège et renouvellement du privilège de Rodrigo di Marchiana; *ibid.*, 138, f° 191, 22 février 1593, des Juifs portugais proposent d'établir un trafic commercial avec le Cap de Gué, ces Juifs sont déjà Rodrigo di Marchiana et ses frères.

361. Voir *supra*, I, p. 262 et *sq.*

362. A. d. S. Venise, Cinque Savii 138, 18 mars 1587.

363. Ceeil Roth, *art. cit.*, p. 239

364. A. d. S Venise, Cinque Savii, 7, f°30, 5 octobre 1598.

365. Hermann Kellenbenz, *op. cit.*, p. 43; voir également C. Roth, Gli ebrei *in Venezia*, 1932, *et "Les marranes à Venize", in :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 1931.

366. J. Ha Cohen, *op. cit.*, p. 131.

367. *Ibid.*, p. 172.

368. *Ibid.*

369. Ainsi *infra*, p. 203.

370. A. d. S. Naples, Sommaria Comsultationum, 10, f^os^ 91—93, 30 mars 1590.

371. *Ibid.*, 25, f^os^ 152 v° à 159, 8 septembve 1613.

372. Le mot est de Michel Foucault, *L'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1961, p. IV.

373. *La Méditerranée...*, 1^re^ éd., p. 136, n. 1.

374. Léon POLIAKOV, *op. cit.*, II, p. 204 à 217.

375. Passage cité par Léon Poliakov, *op. cit.*, II, p. 290.

376. Voir dans une ligne analogue, mais d'explication sociale, le livre novateur (à paraître) d'Antonio José Saraiva, *L'Inquisition et la légende des Marranes*.

377. Sur le mot, voir Pierre CHARPENTRAT, "De quelques acceptions du mot *Baroque*", *in* : *Critique*, juillet 1964.

378. L'origine du mot, obscure : de la logique formelle (de *baroco* une des désignations de la séquence *barbaro*, *celarent*, *baroco*), selon L. PFANDL, *Geschichte der spanischen Literatur*, p. 214, note 1—ou du mot espagnol *baruco* qui désigne en parler de joaillerie, une perle irrégulière, selon G. SCHNURER, *op. cit.*, p. 68 — ou du nom de Federigo Barroccio (Le Baroche de nos manuels français) (1526 ou 1528 — 1610), selon P. LAVEDAN, *Histoire de l'Art*, Clio, p. 302. Resterait à savoir quand ce mot réapparaît dans la littérature historique où J. BURCKHARDT a assuré sa vogue.

379. *L'art religieux après le Concile de Trente...*, p. 188.

380. le mot de Marcel BRION, dans son *Michel Ange*, 1939, p. 149.

381. G. SCHNÜRER, *op. cit.*, p. 80.

382. Pierre LAVEDAN, *op. cit.*, p. 293.

383. STENDHAL, *Promenades dans Rome*, éd. Michel Lévy, 1858,

II, p. 121.

384. *Ibid.*, p. 121.

385. Gonzague TRUC, *Léon X*, p. 303.

386. *Ibid.*

387. *Ibid.*

388. G. Bihlmeyer, *op. cit.*, III, p. 131.

389. Erich von der Bercken, *Die Gemälde des Jacopo Tintovetto*, Munich, 1942, 360 illustrations.

390. G. Schnürer, *op. cit.*, p. 86—87.

391. Voir l'admirable ouvrage de Jean Delumeau, *Vi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Rom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1957, p. 246 et *sq.*

392. STENDHAL, *op. cit.*, II, p. 191.

393. "Die Epochen der Papstfinang", *in* : *Hist. Zeitschrift*, 1928.

394. Cité par G. TRUC, *Léon X*, p. 123.

395. M. LA TORRO Y BADILLO, *Representaciòn de los autos sacramentales en el periodo du su mayor florecimiento*, 1620 à 1681, Madrid 1912; Ludwig PFANDL, *Geschichte der spanischen Literatur*, p. 124; Henri MERIMÉE, *L'art dramatique à Valence depuis lesorigines jusqu'au commencement du XVII[e] siécle*, 1913.

396. Georg FRIEDERICI, *op, cit.*, I, p. 469.

397. Sur ce dernier point, Francés de Alava à Philippe II, Montpellier, 18 déc. 1564, A.N., K 1502, B 18, n°67, 0.

398. A. MOREL FATIO, *Ambrosio de Salazar*, 1900, p. 52 et *sq.*

399. A. MOREL FATIO, L'*Espagne en France*, *in* : *Études sur l'Espagne*, I, Paris, 1895, 2[e] éd., p. 30.

400. *Ibid.*, p. 32.

401. *Ibid.*, p. 40.

402. *Ibid.*, p. 27; *Essais*, II, 1.

403. *Ibid.*, p. 41.

404. *Ibid.*

405. Alfred FRANKLIN, *La vie privée d'autrefois. Les magasins de nouveautés*, 1894—1898 II, p. 39. Voir également I, p. 183; II, p. 23—25, 75.

406. IX, p. 253, cité par Alfred FRANKLIN, II, p. 39.

407. F. RUIZ MARTIN, *Lettres de Florence*… CXXI.

408. A. MOREL FATIO, *op. cit.*, I, p. 27. Signalons l'opinion de BRÊMOND, *op, cit.*, p. 310, que l'on ne saurait garantir, selon laquelle les habits ajustés des hommes, qui firent scandale, viendraient en France de l'Espagne de Philippe IV. Sur l'influence espagnole en Angleterre et particulièrement sur Shakespeare, Ludwig PFANDL, *Geschichte der spanischen Literatur*, p. 98, et J. de PERROT, *in* : *Romanic Review*, V, 1914, p. 364.

七　战争的各种形式

战争并不简单地是文明的对立面。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总是指控战争，而对它的一种或者多种真正的性质却并不真正了解或者不想了解。物理学家对物质的奥妙的构成，并不比我们对战争更加无知。我们指控战争，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它不断干扰人的生活。编年史作者叙述史实的时候，把战争置于首位。当代的观察家们最关切、醉心的莫过于议论战争，并从中得出下面这些问题的答案：谁对战争负责？战争的后果如何？

虽然我们决定不丝毫夸大历史—战役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不想忽视战争——人的生活的可怕的、永恒的潜流漩涡——的影响深远的历史。在与我们的论题有关的半个世纪中，战争标示着季节的节奏，打开并关闭时间的大门。它甚至在表面上平息的时候，也继续暗中施加它的压力。它似乎消亡却仍然存在。

但是，在谈到这些惨剧的时候，我并不想从中得出关于战争的"性质"的哲学性结论。战争学虽然是一门科学，但目前还只是处于它的孩提时代。它必须超出历史事件之外，抓住历史事件的长节奏、规律性和相互关系。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1. 舰队战争和设防边界的战争

一谈到地中海大战，人们就会立刻想到帆桨战船的细长的、威武雄壮的侧影，想到这种战船夏天沿着海岸疾驶，冬天在海港内休眠。关于这种战船的航行移动、维修和豪华的设备，历史文献资料载有丰富的详情细节。专家们发表了大量论文，试图说明它们在维修、粮食供应、人员和钱财等方面的耗费情况。经验很快证明：集结这些战船、进行集体行动，是困难的。特别在大编队中，它们必须由运输大量军需供应品的圆船伴航。它们进行了长时期的周密的准备工作后，突然启航。总的说来，这些船只航行迅速，能够抵达任何一处海岸。但是，我们不应当夸大帆桨战船的袭击能力。它们运送登陆部队，必要时不远离海岸。1535 年，查理五世攻占突尼斯后不向更远的地方继续推进。1541 年，他试图攻占阿尔及尔，但未成功。这一仗仅仅使他得以从马提福海角进抵俯瞰阿尔及尔全城的制高点。土耳其人的情况并不比这更好。1565 年，土耳其舰队也同样包围马耳他，在该地按兵不动。1572 年，年事已高的加西亚·德·托莱多在勒班陀战役结束后不久劝奥地利的唐·胡安说，如果征服者要征讨黎凡特，就宁肯进攻岛屿而不进攻大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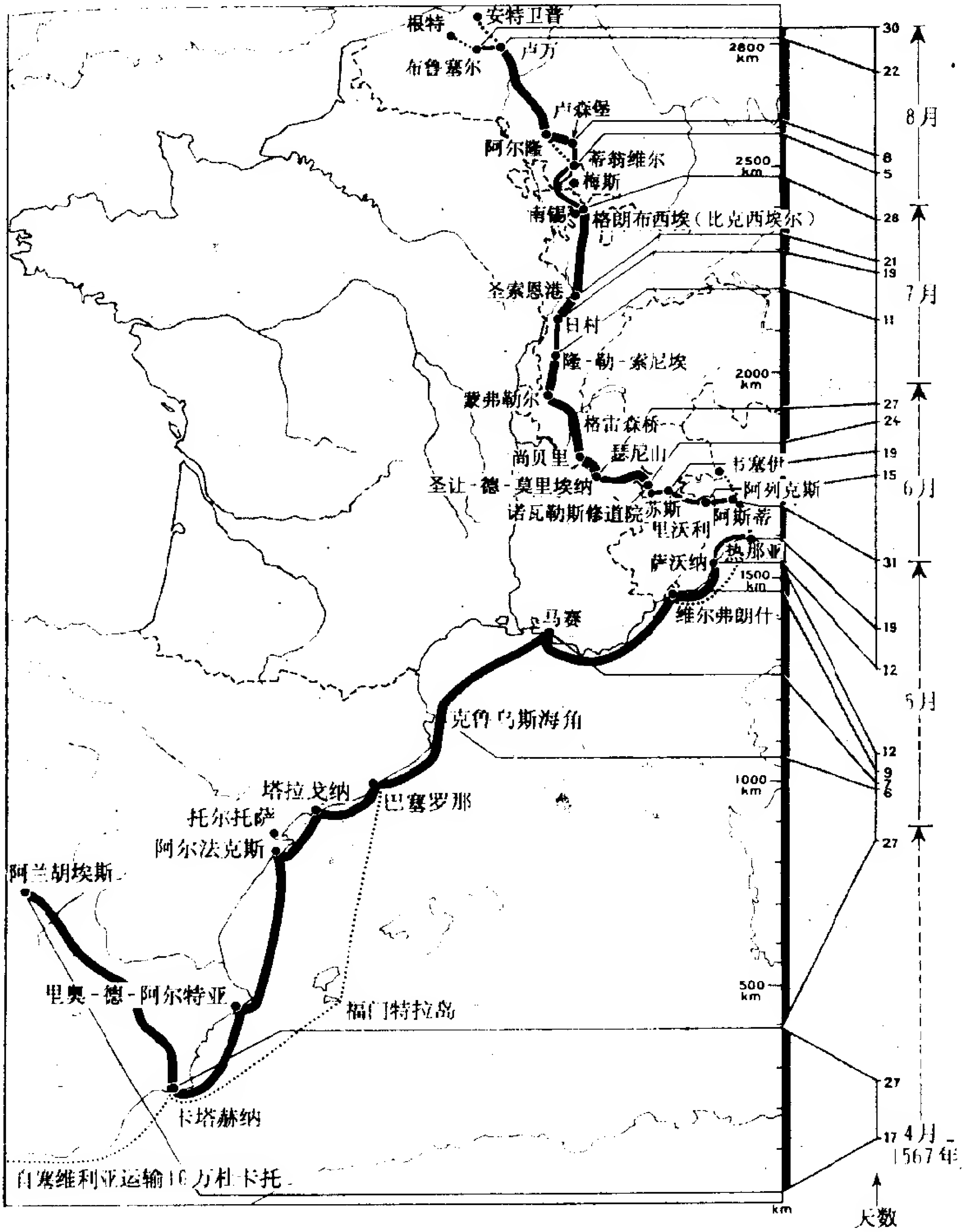
一谈到战争，人们就很快想到在 16 世纪以其激增的数额引人注目的军队。把这些军队从甲地转移到乙地和事先集结等都是问题。法国国王花了几个月时间在里昂集结雇佣军队和大炮，以便有朝一日“翻山越岭进行突然出击。”[1] 1567 年，阿尔贝公爵实现了率领他的军队从热那亚前往布鲁塞尔这一壮举。但是，这仅仅是和平

时期的演习和调动而已,并非一系列遭遇战。同样,把素丹的军队从伊斯坦布尔投向多瑙河地区,或者从伊斯坦布尔投向亚美尼亚并在远离出发基地的地方作战,需要耗费土耳其帝国的大量人力和物力。这是耗资巨大的和非凡的壮举。一旦必须对敌作战,任何长途行军和部队的长距离运动通常都是不可能的。

最后应该回忆起的形象,是要塞和堡垒的形象。这些要塞在16世纪起着决定性作用,在17世纪则几乎决定一切。面对土耳其人和海上行劫者,基督教世界在边境遍筑防御工事,把自己隐藏在工程师的技术和挖土工人的劳作成果的后面。这些庞大的工事说明一个世界的心理状态。罗马帝国的长城或者中国的长城,始终是某种思想情况和心理状态的标志。基督教世界(不是伊斯兰世界)用一长列要塞和堡垒把自己包围起来,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事实。这是我们以后还将回过头来讨论的主要试验之一。

但是,这些惯常的主要的形象,并不能够把地中海战争的情况全都向我们示明,并不能提出地中海战争的整个问题。它们所展现的景象,是大规模的、正规形式的战争的景象。不过,这些正规的战争一旦停止,次要形式的战争——海上行劫和陆上抢劫——就立刻取而代之。这种形式的战争当然早已存在。它当时正在到处扩散,填占已经变得空荡荡的地区。这正像高高的乔木林一旦遭到砍伐,就把空间让给低矮的林下灌木丛或者丛林一样。因此,有不同

阿尔贝公爵和他率领的部队的确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行军。但是,行程达3,000公里这件事本身也是一大业绩。注意在海上的快速行程和翻越阿尔卑斯山所用的时间……这支军队必需绕过抱敌对态度的法国的领土。以上是J.J.赫马尔丁格尔所作的计算和研究核实。



阿尔贝公爵行进路线：▭快速行程

▭慢速行程

……军队、与阿尔贝公爵会合的部队或者在阿尔贝公爵前面行军的部队的其他行进路线

图 63　阿尔贝公爵率军抵达佛兰德，1567 年 4—8 月

“层次”的战争。只有通过研究这些层次不同的战争之间的悬殊差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才能够在解释这些战争时取得进展。这种辩证法是必要的。

战争与技术

战争问题始终是武器和技术两方面的问题。经过革新、改进后的技术，能够彻底改变这种赌博的进行。以火炮为例，它在地中海地区和在别处一样，突然改变了战争的条件。它的出现、它的传播、它的变化——因为火炮在不断变化之中——是一系列技术革命。还待于推定：这一系列技术革命什么时候发生？火炮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安装在帆桨战船的狭窄的甲板上？火炮在什么时候首先成为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或者巨型帆桨战船的火力然后又成为大帆船和高舷圆船的特别的、可怕的火力？火炮在什么时候安装在堡垒的防御土墙和平台上？最后，火炮怎样跟随军队转移？不错，在苏里曼大帝取得胜利之前，查理八世1494年9月远征意大利时就使野炮顷刻之间大行其道，驰誉全球。火炮的制造分好几个互相连接的时代——铜炮、铁炮、加强炮。此外，还有根据军火工业的地方化的情况而定的各个“地理”优势时代。天主教徒费迪南的政策取决于马拉加的铸造厂和坎波城的铸造厂的生产情况。后者创建于1495年；前者创建于1499年；两者都很快衰落。它们生产的武器后来在意大利用旧，接着又安置在非洲或者面对法国的边境上，长期固定不动[2]。米兰铸造厂和弗拉拉铸造厂的统治地位历时更久。[3] 然后，这方面的首位转而归属德意志和法国的铸造厂。在对西班牙和对葡萄牙的供应这个方面，则首推佛兰德。从16

世纪前几十年起，出现了火炮的（可能还有北欧和火药的[4]）独霸局面。这些都是重大问题。1566 年，10 来门火炮从佛兰德运到马拉加。[5] 这个事件立刻被载入外交通讯中。同样，44 门火炮从马拉加运到墨西拿的消息在某一位托斯卡纳大使看来是远征阿尔及尔或者柏柏尔的的黎波里的先兆。[6]1567 年，富克沃宣称，用 1.5 万发炮弹就足以攻占阿尔及尔。[7] 如果人们置身于问题引起的激烈争论之外，接受马耳他 1565 年因佛罗伦萨公爵让人在前一年对它运去 200 桶火药而得救的这一事实的话，富克沃这样说似乎并不过分。这至少是一个西班牙的情报员传出来的看法。[8] 我刚才谈到的情况使我们能够注意到托斯卡纳对弹药、炮弹和火枪药线的生产所具有的重要性。

准确地推定这些变化什么时候发生、产生影响和后果，仍然是困难的。几个概略的轮廓和几个景象，这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同样，我们虽然能够有把握地把装备有火炮的大帆桨战船或者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就技术而言这些舰船无疑有助于取得勒班陀战役的胜利）在威尼斯舰队里出现的时间推定为 1550 年[9]，关于武装的大型帆船在地中海的发展情况，我们就几乎毫无所知了（这种帆船我们突然发现将近这个世纪末时土耳其人在从君士坦丁堡前往亚历山大[10]的途中使用）。因为基督教世界虽然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但技术却会从海的此岸传到海的彼岸，物质器材却会趋于变得相同，因而趋于限制这些革新的政治意义和影响。火炮既为基督教徒进攻格拉纳达和北非效劳，也同样为土耳其人在巴尔干，例如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莫哈奇战役[11]中，在波斯[12]或者第二次在北非取得胜利效劳。

战争与国家

战争是一种耗费,一种浪费。拉伯雷说过:"战争的筋腱是银两。"当然,这句话并不是他的发明创造。

在自己选择的时刻进行战争或者缔结和平而又既不蒙受前者也不蒙受后者带来的不利,这在理论上是强者的特权。但是,令人惊奇的事始终可能发生。在每个君主周围的幕僚谋士中,总会是众说纷纭,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君主在思想感情上也会左右摇摆、犹豫不决。这种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冲突,常常体现在永恒的敌对者——主战派同主和派——中间。直到1580年,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的宫廷都一直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下面这个重大问题提出达几年之久:谁会在谨慎国王那里占上风?是主和的鲁伊·戈梅兹的同党好友(他们在鲁伊·戈梅兹死后仍然聚集一起)还是好战的阿尔贝公爵的拥护者?这个公爵一有机会就宣扬强硬手段的效果。但是,有哪个君主;哪个政治领袖没有经常面临过这两种以彼此对立的派别为代表的倾向呢?惹人注目的、戏剧性的1692年末,黎塞留自己难道没有遭到爱好和平的掌玺大臣马里亚克的反对吗?[13]某些事件往往使人不得不在两派之间进行选择。于是某个"合乎时宜的人物"就应运而生,被推到冲突的前台。

战争的耗费削弱国力。毫无效益可言的战争不胜枚举。不光彩的、耗资巨大的爱尔兰战争,在伊丽莎白的光辉的统治的末期,毁坏了她的国库,并且比其他任何原因更为1604年的议和休战预先铺平了道路。地中海战争的费用如此高昂,以致在西班牙和在土耳其,破产都接踵而至。菲利普二世的花费极其巨大。1571年有人

在马德里估计，维持1支拥有帆桨战船200艘、圆船100艘和士兵5,000名的（威尼斯、教皇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每年耗资达400万杜卡托之多。[14]这些舰队——真正浮动的旅行城市——大口吞噬金钱和供应的物资。将近1560年时，每年供养、维持1艘帆桨战船耗资和制造1艘帆桨战船同样多，均为6,000杜卡托。[15]这个数字以后继续增大。从1534年到1573年，海军的武器装备至少增加了两倍。在勒班陀战役进行期间，地中海有500艘到600艘帆桨战船，其中包括基督教国家的和穆斯林国家的（参阅注中的计算），[16]即有兵员15万到20万。这些兵员中有划桨者、水手和士兵。这些人在航行中全都听凭大海摆布或者像加西多·德·托莱多所说的那样，都听自然力量——水、火、土、空气——摆布，因为所有的自然力量都威胁着海上的人的朝不保夕、岌岌可危的生命。一份供应1支在西西里停泊的舰队的食品（饼干、酒、咸肉、大米、油、食盐、大麦）的帐单的金额竟高达将近50万杜卡托。[17]

因此，正规的舰队战争，是巨大的财力和人力的动员。参战的人中有在西班牙招募时衣衫褴褛、在行军途中领到制服（如果发给他们制服的话）的士兵；有取道波尔萨诺步行到意大利，然后在斯培西亚拥挤成堆，等候登上帆桨战船的法国雇佣的德意志步兵；有被招募收罗来填补开小差和瘟疫为部队造成的减员空缺的意大利冒险家；特别有排成长队跋涉前往港口充当帆桨战船的划桨手的囚犯。对划帆桨战船的红色船桨这个差使来说，这种犯人的数量永远不会足够。因此，经常需要强迫穷人，[18]抓捕奴隶，招募志愿者。威尼斯收罗这种人，一直收罗到波希米亚这样的地方。在土耳其和埃及，大批捕人这种行动，使人力资源枯竭。不管是否出于志愿，大

批人成群结队走向海边。

如果加上陆军本身也耗费巨大这一点(根据这个世纪末的统计,[19]一个约有兵员5,000的西班牙步兵团进行一次战役——军饷、后勤和运输包括在内——费用为120万杜卡托),人们就会了解到战争的巨大消耗和君主们的收入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了。战争通过这些收入,最后与人的全部活动联系起来。然而,战争的现代化和它的迅速发展演变,使它扯断缆绳,砸碎最坚固的弹簧,而且有朝一日,它自身也陷于停顿。和平的产生是缘于这种长期贫弱、军饷一次次迟发、军备匮乏,以及这种停顿不前;政府为之担心,但又骑虎难下,因为坏天气或暴风雨乃是天意,必须接受。

战争与各种文明

每个民族都经历过激烈的冲突。但是,有各种不同的战争。如果我们从各种文明——地中海冲突的主要参加者——出发来考虑问题,就必须把任何一种文明自身的"内战"和"外战"区别开来,把两个互相敌对的世界区别开来,换句话说,把十字军东征或者圣战放在一起,把基督教的或者伊斯兰教的内部冲突放在另外一边,因为这些伟大的文明在永无休止的内战中,例如在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兄弟阋墙、互相残杀中自我焚毁。

这些区别十分重要。它们首先向我们提供了有规律的地理定位,因为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是具有陆地边界或者海洋边界的特定空间。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奇怪的是:它们也向我们提供一个按年月顺序进行的排列。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内战"时期继

一个“外战”时期之后而来，先后顺序相当清楚。这既不是一支配合完美的管弦乐队，也不是一场在细节上安排处理得很好的芭蕾舞。然而，接续交替的现象清晰可见。这种现象为研究一部混乱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观点。这部历史突然明朗起来，却并没有产生任何假象或者幻象。人们摆脱不了这样的信念：具有相反的特征的意识形态的各种模式、格局首先建立起来，然后互相取代。在文献资料最为丰富的基督教世界的这一方面，十字军东征，即外部战争，直到将近1570—1575年这个时期都居于主导地位。在要求进行这场战争的人中，有的热情较高，有的热情较低。对于这场战争，已经有人转弯抹角地逃避，巧妙地推脱，半心半意，不冷不热或者干脆拒绝：一方面是纳税人的拒绝；另一方面是头脑冷静清醒、抱怀疑态度的人的拒绝。但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整个时期，难道没有它的狂热的辩护士和责难者吗？不合谐的音调丝毫不能掩盖富于战斗性的宗教的总的感情正在贯穿浸透16世纪的基督教世界这个事实。这在西班牙是不言而喻的。法国的情况与此相同。尽管法国王室的政策巧妙灵活、妥协和解。很容易在例如龙沙的作品里找到这种染上希腊主义的十字军东征精神的痕迹。拯救希腊——“适于居住的世界的眼睛”——并且为基督尽力……这种精神甚至在已经转变为信奉新教或者即将转变为信奉新教的北欧仍然存在。在整个德意志都唱着来自东南方的遥远的战场的土耳其民歌。乌尔里希·冯·许滕在要求德意志从罗马的剥削和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同时，要求人们把这样做收回的钱用于加强帝国、扩展帝国、打击土耳其人。同样，路德也一直在进行活动，赞助反对君士坦丁堡的主人的战争。在安特卫普，经常有人谈到打算向非基督教徒发动进攻。在英

格兰，人们一直对天主教徒在地中海的胜利惶恐不安，但与此同时，又对土耳其的失败兴高采烈，因此这次勒班陀战役使英格兰人既惶恐不安，又兴高采烈。[20]

但是，勒班陀战役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十字军东征运动的衰落，很久以来就已经露出了先兆。1571 年的胜利的光辉，给人以假象，奥地利的唐·胡安这个十字军东征的迟来的参加者像他的侄儿、阿尔卡扎尔·克比尔战役的英难东·塞巴斯蒂安后来那样极端孤立于他的同代人。他们的梦想落后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其部分原因至少是天主教对宗教改革运动进行的反抗的高涨。这次高涨至少从 1550 年起是意识形态战线上的一个变化。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世界放弃一场战争以便进行另外一场战争。它的宗教狂热已经改变了方向。

在罗马，态度的彻底转变随着教皇格里哥利十三世(1572—1585 年)开始他的任期表露出来。这届教皇任期的确是以对信奉新教的德意志采取突然敌对行动作为它的开始。这个行动是教皇目前的重大任务和关切所在。他所继承的、并因威尼斯人的背叛而于 1573 年被粉碎的濒临死亡的神圣同盟，这时已经不再是他的重大关切了……罗马教廷的整个政策现在向北摇摆，它及时地促成了西班牙和土耳其之间的谈判成功。当时在菲利普二世左右的人，不止一次对这些在 1578 年和 1581 年之间同素丹缔结的每年的停战协定会产生的后果感到忧心忡忡。但是，教廷仍然保持沉默。它的目标在于：从此以后对信奉新教的北欧展开斗争；并为此目的推动西班牙国王对爱尔兰的事务进行干预，以此来反对英格兰。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看到西班牙国王是以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军队的

追随者而不是以这支军队的旗手的角色出现……

由于在16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风云突变，反伊斯兰教的十字军东征运动的思想丧失了力量。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1581年，西班牙教会不对放弃土耳其战争表示抗议，却对缴纳变得漫无目的的捐税表示抗议。

然而，1600年以后，由于新教战争势头减缓以及基督教欧洲的和平恢复缓慢，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和在1593—1606年的土耳其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战争进行期间的法国，十字军东征的思想重新获得力量和活力。一个历史学家指出[21]："1610年以后，煽动公共舆论的对土耳其人的敌对思想，蜕化变质为一种真正的怪癖。"用计划和希望混合制成的焰火于是迸射出来，直到新教战争——"内部战争"——1618年再次使它终了为止。

我们无法有这样一张详尽细致的年表；它能够使人看见民众的激情狂热是否紧随或者先于——或者像我想的那样，既先于也紧随——这些突然的态度的改变，是否引发这些改变，为这些改变火上加油而且最后焚毁于由此引起的爆炸中。即使情况如此，以上这些一揽子的解释，也几乎是无可辩驳的。但是，一种仅仅考虑到交战者之一的解释很可能不充分。我们总是倾向于透过西方的幼稚天真的眼睛来观察世界。我们西方的说理方式仍然相当好笑。事实上，地中海的另外一半有它自己要过的生活，有它自己要创造的历史。一项最近进行的研究（因其简短而更堪为楷模[22]）提出，土耳其方面也有一些类似的阶段，即有一些同时产生的形势和机遇。基督教徒放弃战斗，突然对地中海感到厌倦不满。与此同时，土耳其人也是这样。不错，他们仍然关注匈牙利边境和内海的海战。但是，

他们关注红海、印度、伏尔加……等地的程度也不稍减……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耳其军事努力的重心和方向按照一场"世界"战争的各个阶段转变。这个思想弗里德利克·C.莱恩在他同我们的谈话中常常提到。在这部充满从直布罗陀海峡、荷兰运河到叙利亚、土耳其斯坦的这片地区的战争的历史上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这个历史只有一个"电压",只有一个节奏。它的变化程度在"电气学上"是相同的。在某个时期,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圣战中和十字军东征中对抗,然后,又都转过身来发现了各自内部的冲突。但是,这种会合在一起的狂热激情的平衡,正如我将在本书第二部分的结论中试图阐明的那样,[23]是经济形势的缓慢节奏产生的后果。这种经济形势在16世纪作为一个统一的单位开始了自己的存在的世界里,到处都是相同的。

巴尔干半岛上的防御边界

面对土耳其人,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堡垒林立。这是这个地区的战争经常具有的形式之一。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在作战的同时,经常扩展它的遏阻线和保护线,把自己的身躯掩蔽起来,罩上铁甲。这是一项本能的和单方面的政策。在土耳其人方面,防御工事构筑得少而差;在阿尔及利亚人或者谢里夫那方面,情况也是这样。问题在于技术水平或者态度方面的差别吗?在这一边,这是一种对土耳其近卫军士兵,对土耳其骑兵或者对帆桨战船的有生力量的信任吗?相反,在另外一边,这是一种安全的需要,甚至是一种对在大规模的战争中节省力量和支出的关切吗?同样,基督教国家之所以在黎凡特维持规模巨

大的间谍机构，不仅仅出于恐惧，而且还为了准确地估量威胁着人的危险的严重程度，还为了使防御的努力与这种危险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土耳其人今年不会来临。于是，能够复员的部队都很快复员。新兵征募工作全部取消。班德洛说，[24]为了了解土耳其人或者索非将采取什么行动、将不采取什么行动而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真是一种荒唐可笑的游戏。他说得有道理，因为他所指的那些才智不凡的嗜争好讼者虽然就强大的敌人的计划和秘密夸夸其谈，谈得上气不接下气，但实际上对这些计划茫然无知。对君主们来说，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游戏往往决定以什么样的规模把防御措施付诸实行。

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就这样拥有一系列对付伊斯兰国家的"帷幕"和加强的"前线"。这个世界在这些漫长的防线的后面意识到自己的技术优势，感到自己受到较好的保护。这些防线从匈牙利一直延伸到地中海边界，中间经过一系列把两种文明分开的没防地区。

威尼斯的"罗马帝国长城"

威尼斯位于西方的海的边缘，自古以来就保持警惕。面对土耳其人，威尼斯市政议会沿着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阿尔巴尼亚的漫长的海岸线布设它的驻防地和海岸观察哨，这些防御设施一直延长到爱奥尼亚群岛，并且越过这群岛屿与干地亚和塞浦路斯连接起来。威尼斯市政议会1479年获得塞浦路斯这个最后据点，并且一直到1571年都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威尼斯这个狭长的海洋帝国，这株生长在海岸上的

寄生植物，受到土耳其连续不断的推进的伤害。1540年10月12日缔结的和约[25]从它身上切除了它布设在达尔马提亚海岸上的一些很有价值的哨所：纳迪诺和洛拉纳，切去了它在爱琴海上拥有的那些小岛：希俄斯岛、帕特莫斯岛、卡西诺岛，切去了一些“封建的”岛屿：皮萨尼家族的采邑尼奥、基里尼家族的采邑斯坦帕利亚、韦尼埃家族的领地帕罗斯岛。就这样，它就无法再向北后退了。它也不得不放弃在希腊的马尔瓦西和纳波利·迪·罗马尼亚等两地的重要哨所。33年以后，根据用1575年的苛刻的协定[26]加以补充的1573年4月的单独和约，它又在达尔马提亚让出一些哨所，支付一笔战争赔款，放弃事实上从1571年起就已经失掉的塞浦路斯。威尼斯常常被比拟作大英帝国。16世纪末的威尼斯像失去了苏伊士以东的属地、疆域不再远达印度的大英帝国。但是，但愿比拟不会使人迷误，因为威尼斯的这些边境地区由极小的村落和往往很古老的要塞构成。那里有几千个居民的城市和岛屿为数很少。1576年扎拉的人口稍多于7,000人；[27]斯普利特的人口稍少于4,000人；[28]科托尔由于1572年发生过一场瘟疫，人口只有1,000来人；凯法利尼亚岛的人口不到2万人；[29]赞特有15,000人；[30]科孚有17,517人。[31]只有干地亚因有居民20万人而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这是新链条的主要链环。但是，人们知道，这个希腊岛屿并不可靠。这种情况1571年已经出现过。1669年还会再度出现。总的说来，这个小岛屿帝国就人口而论，与威尼斯和它的大陆部分相比的确无足轻重。估计威尼斯及其大陆部分差不多在同一个时代总人口为150万。[32]

因此，这一道位于土耳其海岸外的海面上的屏障遏阻了土耳

其的入侵，实在是个奇迹。让我们顺便提醒读者注意这件事：1539年，西班牙人无法在巴尔干海岸上的卡斯特尔努奥沃的桥头堡里坚守。[33]威尼斯防务的异常坚固，是适应能力的胜利，是再三考虑算计的结果，是精心养护维修堡垒的结果，是海军造船厂这个强大的工厂紧张备战、不停生产的结果，是大帆船和帆桨战船不断巡逻的结果。除此之外，让我们再加上边境居民所受的训练和忠诚、以市政会议的名义在边境地区担任指挥的人的良好素质和在该地服刑的流放犯人的勇敢等。至于炮兵训练效果良好以及在这些动乱不安的边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达尔马提亚人或者希腊人中容易征兵等因素就不用提了。

然而，威尼斯在这根防御的链条的两端却遇到困难。在东端，塞浦路斯筋疲力竭，难于防御，岛上的居民很不可靠。像罗得岛这样的岛屿有过分靠近小亚细亚的缺点，因此，任凭土耳其摆布。以后，1571年的失败迫使威尼斯把触角退缩到干地亚。1572年，干地亚在九死一生中侥幸得救。从那时起，威尼斯市政议会就一直感到这个岛屿经常处于贪婪的征服者的野心的威胁之下。在链条的另外一端，在北方，在伊斯特拉和弗留利的边界上，威尼斯与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接壤并且几乎与土耳其的领土毗连。因此，形成了双重危险。这种危险因它威胁着威尼斯的命根子——大陆——而更加严重。早在1463年和1479年之间这段时期，土耳其的袭击和进攻已经远达皮亚韦河。[34]在面对哈布斯堡家族的这一侧，边界线从1518年起，[35]事实上已经稳定下来。但是，在法律上还并不如此，即在法律上还并非无可争议。威尼斯为了对付这些危险，在这个世纪末修筑了耗资巨大和坚固的帕尔马要塞。

威尼斯帝国的领土只不过是一条线、一系列前沿阵地而已。这个帝国虽然无法把庞大的土耳其帝国紧紧勒住，但却使这个帝国的行动受到阻碍和约束。威尼斯并非不知道这些阵地的极端脆弱性。威尼斯市政议会派出的大使和派驻在东地中海殖民地的总督没完没了地在君士坦丁堡调解、说情，试图通过达成谅解、协定和行贿来保护这些阵地，使之不受可能发起的进攻。或者由于政治或贸易方面的原因，或者由于发生了边境事件，或者由于一艘船未经许可装载谷物，或者由于一艘海上行劫船过于胆大妄为，或者由于一艘执行巡逻任务的威尼斯帆桨战船行事过于认真，过于生硬，事件没完没了地突然发生、恶化。1582年，锡南帕夏蓄意向威尼斯市政议会寻衅。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谴责威尼斯人并向他们索取那些是“素丹的国家的身上的脚”的岛屿的大好时机。[36]

但是，可能威尼斯这条线正是由于它的纤细脆弱才得以经久不断。土耳其人已经在这条线上打开了宽大的缺口，他们通过这些成为门窗的缺口能够到达西方。莫东虽然设防很差，但在1572年引人注目的包围中却坚持住了。早在1550年，该地就已经被勒芒斯的伯龙视为“土耳其的钥匙”。更向北的是纳瓦林。该地于1573年后设防。[37]最后是位于阿尔巴尼亚的发罗拉。这个地方虽然不幸处于一个动乱不止的国家的包围之中，但仍然是一个远征西方的海洋和基督教世界的良好基地。可以认为威尼斯的帝国长城的这个裂口在削弱这座长城的阻碍作用的同时会使这座长城存留得更加长久吗？

多瑙河沿岸

在巴尔干半岛以北[38]，土耳其帝国扩张到并且超过多瑙河这条重要的但脆弱的边界线。它占有多瑙河流域各省的一半，尽管它从来就不是森林茂密、丘陵起伏的特兰西瓦尼亚的主人，至少从来就不是这个地区的无可争议的主人。在西边，它通过克罗地亚的纵向山谷向前推进，超越萨格勒布，直达库尔帕河、上萨韦和德拉瓦河的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峡谷，面对贫瘠、多山和不易进入的地区。迪纳拉山脉通过这些地区同高入云天的阿尔卑斯山相连。因此，土耳其在巴尔干以北的边界的西端和东端一样，相当快就固定下来。它在这两端都受到地理障碍的限制。当然也有人为的障碍。鞑靼人的游牧部落不时入侵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东部地区，进行烧、杀、掳、掠，大肆蹂躏，无法抵御。在西边，一条德意志的边界线至少在中萨韦和中德拉瓦之间的温迪奇南德已经设防，由莱巴赫的大统领率军守卫。关于这道防线设防的敕令1538年在林茨颁布。在查理五世和费迪南时代，温迪奇南德和克罗地亚的边防军事机构和设施先后主动地自行建立。1542年的一项章程规定了整个区域的组织。正如不久以前尼古拉·兹里尼于1555年所写的那样，它是施蒂里亚的堡垒和前部屏障，因此，也是整个奥地利世袭领地的堡垒和前部屏障。再者，难道不正是这个共同的、必要的，由当地筹款建成的防御体系逐渐把奥地利世袭领地这个早先由若干个小国和民族组成的混杂的集合体逐渐牢固地结成一个真正的、可以公认的统一体吗?[39]1578年，卡尔施塔特的坚固的堡垒在库尔帕河河岸拔地而起。同一时期，汉斯·伦科维奇在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的边境上负责指挥防务。这个边境的行政管理由布鲁克敕

令再次加以明确规定(1578年)。这个边境地区的最奇怪的特征，是无数逃避土耳其人的统治和逃离土耳其领土的塞尔维亚农民沿着边界扎根定居。这些农民得到土地和自由。他们聚集成大家庭。这种家庭是真正的族长制的和民主的团体。在这种团体里，由年长者分派军事和经济方面的任务。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军事边区的组织得到巩固和加强。人们或许可以根据布斯拜克的笔记认为，[40]这样一种边界之所以能够稳定下来，是因为它在长时期内，至少直到将近1566年，是宁静的。但是，和平和宁静都只是部分的。因为，如果说在这条边界线的两个侧翼可能进行防守、抵抗的话，那么在它的中央地带，在匈牙利的辽阔的、毫无遮掩的平原上进行抵抗就有危险了。关于这个不幸的地区的灾难、1526年以后它仍然经历的可怕的混乱、它内部的争吵、它内部的自相残杀、它的分裂、它于1541年几乎完全沦于土耳其统治之下等，我们已经谈得太多，因此不必再谈。匈牙利并入土耳其帝国后，还留在基督教徒手里一个狭窄的边境地区。匈牙利的平原和水流，特别是多瑙河，利于外国入侵。土耳其1529年向维也纳进军之后，为了保卫过去已经成为德意志世界的主要堡垒的东西，必需大大增加沿陆路和沿河流的人工障碍，必需建立和维持一支多瑙河舰队。根据维也纳海军造船厂的格罗尼莫·德·扎拉大将1532年的估计，这支舰队有舰船约100艘。格蒙登盐务局接到在它平时拥有的运盐船之外再制造这些船舶的命令。这些船叫Nassarnschiffe或者Nassadistenschiffe。在我们16世纪的法语里就是nassade这个词。但是，模仿土耳其语的Caïque这个词造成的Tscheiken这个名词最后占了上风。这样，一直到19世纪，

在多瑙河上都有 Tscheiken 驶行。在这些船上有 Tscheikisten 搭乘。1930 年,在一次在克洛斯特新堡举办的历史文物展览中,还展出了欧仁亲王统治时期的 Tscheiken。

将近 16 世纪末,匈牙利漫长的边界线固定了下来。这条边界线从来没有完全安定平静过。尽管边境袭击、追猎奴隶、抢劫贡物等事件屡有发生,边界线还是以不同的程度固定了下来了。一个地区内的遍布各处的监视塔、堡垒、古堡和要塞逐渐形成一张防御工事网。它的网眼有的窄密,有的宽稀,小股侦察队通过毫不费力。但是,密集的部队却被这张网拦阻,缠在网里,无法前进。这张网就是为了对付这种部队布设的。这里也同别处一样,同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一样,和平为建设提供了良好时机。特别在 1568 年以后和安德里诺普尔停战协定签署以后,情况更是这样。安德里诺普尔停战协定曾于 1574—1576 年和 1584 年展期。这个相对的和平直到 1593 年才遭到破坏。但是,25 年的和平足以使这条漫长的、曾经多年未定的边界线固定下来。1567 年,它显然还是脆弱的。维也纳的昌托奈写道[41]:"当然,基督教世界在这个方向设防掩护得很差。"富克沃特地添加说,这是因为在匈牙利的德意志士兵特别庸碌无能。土耳其人"把他们看成是女流之辈。每次同他们交手,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42]以上是 1567 年的情况。1593 年对土耳其的战争再起时,情况更是这样。1585 年春季,访问了从拉包到诺伊特拉这段边境地区的法国人雅克·邦加尔[43]在他的《日记》中记下基督教世界在防御方面采取的大量预防措施。仅仅在拉包这个县,就修筑了堡垒 12 座,并且在和平时期驻有步兵 5,000 人和驻防骑兵 300 人。在科莫恩还建有工厂 1 个作为补充预防措施。这个工厂就

在要塞内部制造子弹和火药。沿整条罗马帝国长城,袭击和小规模战斗每天都有发生。[44]

在地中海的中心:沿那不勒斯海岸和西西里海岸

把那不勒斯的海岸和西西里的海岸加在一起,然后再加上把这两个地区同马格里布连接起来的马耳他岛,这样,一个迥然不同的军事区域就呈现在我们眼前。这个区域位于海的中心线的连结点上。这个地理位置使它具有战略价值。"它是意大利对付来自土耳其的威胁的海防前线"[45],换句话说,它面对着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和在希腊拥有的了望塔。它的使命是:既向西班牙舰队提供基地,又抵御土耳其小舰队,又保卫它自己的领土使之不受海盗的袭击。

布林迪西、塔朗托、奥古斯塔、墨西拿、巴勒莫、那不勒斯都能够充当基督教世界的帆桨战船集结的中心点。布林迪西和塔朗托可能太靠东。巴勒莫和奥古斯塔朝向非洲甚于朝向近东。那不勒斯太靠北。墨西拿的地位压倒一切,在危险时刻,它是西方国家的主要海军要塞。它俯瞰狭窄的海峡。它易于得到西西里和外国的小麦供应。它靠近那不勒斯。这一切都有助于它获得好运,成为地理位置最适宜的港口。人员、帆布、饼干、酒、醋、"灵敏"的火药、船桨、灯芯和火枪的"杆茎"、铁弹……从那不勒斯运到那里。至于城市的位置,让我们不要过分根据我们现在的思想去加以判断。在土耳其拥有优势的时期,对穆斯林的小舰队来说,强行打开海峡的通路始终是可能的。这是脱离舰队单独航行的帆桨战船或者海上行

劫者的舰队在情况需要时冒险干的事。这是因为对当时大炮的射程来说，狭窄的水道是宽大的并且难于监视。

从16世纪开始起，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海岸就和内地一样，都遍布堡垒和防御工事。这些堡垒和防御工事往往陈旧过时、堡墙倒塌。它们很少考虑要安装大炮，很少考虑为大炮设置炮手射台和配置骑兵的必要性，很少考虑为抵抗敌人的炮火袭击而加固堡墙和炮台的垒道，并把高出地面的重要设施降到地下。拆毁和修复这些过时的堡垒以及修筑新的堡垒，是好几代人的工作。从1541年起，[46]卡塔尼亚开始为中世纪修筑的堡垒添筑能使火力交叉的棱堡。这项工程经过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努力和花销，1617年始告完成。

将近1538年，这项规模巨大的防御工程在梅佐季奥尔诺全境开始。在那不勒斯，这项工程在彼得罗·迪·托莱多的推动下进行；在西西里，这项工程在费朗特·贡扎加的推动下展开，因为这一年是普雷维扎年，是在海上所向披靡的土耳其舰队开始对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海岸进行猛烈袭击的一年。这种袭击是无法防备的。未署名的著作《彼得罗·迪·托莱多的一生》[47]一书指出，总督下令开始修筑雷焦、卡斯特罗、奥特朗托、莱乌卡、加利波利、布林迪西、莫诺波利、特拉尼、巴列塔、曼弗雷多尼亚、维埃斯特等地的防御工事。同时他还致力于加强那不勒斯的防御设施。似乎从这个时期起，在那不勒斯海岸修筑了观察哨所。1567年，又在王国修建这种哨所313个。[48]彼得罗·迪·托莱多在那不勒斯所进行的工作，费朗特·贡扎加从1535年到1543年也在西西里完成。[49]费朗特·贡扎加命人在西西里东海岸和南海岸修筑炮楼137座。[50]

后者还多多少少有些天然屏障;前者则充分暴露在土耳其人的打击下,不久就缩减为只是一条"面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边界线。"[51]从1532年起,在位于这条敏感的边界线上的锡拉库萨,开始构筑防御工事。[52]正如费朗特·贡扎加本人在他给国王的报告中所说,[53]这是这个岛屿的唯一的一段暴露的海岸。北海岸群山起伏。南海岸的海滩"在这些海的海滩中最难登上、最难行走、最受海浪拍击、隐伏的危险最多",[54]不再向敌 人的舰队提供隐蔽港。东部因海岸低矮、肥沃,易于登上,情况就不一样。因此,有必要除了加强锡拉库萨外,还加强卡塔尼亚和墨西拿两地的防务。1535年,费朗特·贡扎加到达时发现卡塔尼亚和墨西拿已经"被人抛弃,无意防守,没有任何防御设施了"。[55]但是,当他后来离开这两个地方时,这两个地方面貌依旧,仍然没有设防。

因此,并不是朝夕之间,甚至不是在一个总督的短暂任期内一切都会改观。在费朗特的继承人的统治下西西里的设防工程继续进行,正如在彼得罗·迪·托莱多的继承人的统治下那不勒斯的设防工程继续进行一样。这是一项永远不会完结的工程。[56]由于朝令夕改,时而停工,时而复工。在那不勒斯,据说每个要处理王国的20座堡垒的修建事务的总督(到1594年正好共有19个),无不拆毁自己的前任已经完成的工程。[57]鉴于这些总督遇到重重困难,这种说法言过其实,有失公允。施工负责人因资金缺乏而受到阻碍,不得不在一个地方把工程停下,去另一个地方开始另一项工程,或者对正要倒塌的设施进行维修(西西里的观察哨所1553年建成,须在从1583年到1594年这段时期重建),逐一彻底检查并使之现代化。最后,必须把防御工事更向西扩展。这证明人们想遏阻的来

自西方的危险正在增加。柏柏尔人在进行海上行劫时，土耳其人在1558年以前进行大规模的出征时，都从背后进攻，攻占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阵地。事态发展得十分严重，以致以后必需在第勒尼安海这一边的巴勒莫[58]、马尔萨拉[59]、特拉帕尼[60]、索伦托[61]、那不勒斯[62]、加埃塔……设防。主要的来自东方的危险，并不因此而稍有所减。防务系统特别朝着这个方向发挥功能。以1560年的那不勒斯为例，这一年在佩斯卡拉[63]、布林迪西岛和塔朗托的大驻防城市等地[64]进行的设防工程正在进展。经过几次辩论，决定永远撤销那道先由阿尔贝公爵（他1557年任那不勒斯总督）下达，后来又由他收回的命令。这道命令的内容为：如果奥特朗托海角和巴里附近的诺尔塞塔、索维纳佐、维杰拉、加利纳诺和诺拉等一系列小城市自行设防、自行防御的话，就拆除原先已经修建在这些地方的一系列小型要塞。这个细节充分表明工程进展困难，防御线不够完善。上述命令撤销后，在夏季即将来临之际，这些各种各样的要塞得到加强。那不勒斯民兵提供了8,000到1万人，必要时可提供2万人。由于这1万人穿过这个王国并且在行军途中宿营时被分配住在居民家里，居民发现他们是那不勒斯士兵，不是外国士兵，因此感到高兴。[65]1560年5月，500名步兵被派往曼弗雷多尼亚；700名步兵被派往巴列塔；600名步兵被派往特拉尼；400名步兵被派往比斯切列；300名步兵被派往莫诺波利；1,000名步兵被派往布林迪西（此外，又加派3连西班牙士兵进驻堡垒内部）；500名自卫队士兵被派往塔朗托；800名自卫队士兵被派往科特罗内。此外，全副武装的骑兵1,000名和轻骑兵200名在阿普利亚驻扎。还征募了6,000个意大利人来组建一支进攻时可以提供兵员的预备队。[66]人

们在占有海岸线并加强海防要塞的同时，注意从海岸上没有设防的城市和村庄撤退。1573 年，西西里岛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既然防御的帏幕不能展延遮护整个岛屿，[67]于是作出了只保卫墨西拿、奥古斯塔、锡拉库萨、特拉帕尼和米拉措并暂时放弃以下这些太易于受到攻击的地方的决定：塔奥尔米纳、卡塔尼亚、泰拉诺瓦、利卡塔、季尔詹蒂、夏卡、马扎拉、马尔萨拉、卡斯特拉马尔、特尔米尼、切法卢、帕蒂……

这些就是直到将近 1580 年这段时期，甚至在 1580 年以后，那不勒斯总督和西西里总督在夏季全力以赴的紧迫事务。冬季来临时，整个防御体系都已经拆除。由于这个时期土耳其的威胁减轻，人们更加感到这些军事负担沉重，在西西里情况更是这样。在这个岛上，骑兵(这是守卫这个丘陵起伏的岛屿的主要部队)的确大口吞食王国的收入。总之，人们如果很好地考虑到投入这个高级的、复杂的防御体系的力量，考虑到这个系统使用的大量部队，考虑到这个系统所包括的负责处理公文急报、交通联络以及信号等方面的事务的机构，就不会对土耳其人遇到这个柔韧灵活的障碍时遭到猛烈的突然袭击感到惊讶不置了。如果大致说来，1538 年标志着这个弯弯曲曲的、适应性强的防御系统开始运转的话，那么只是在 1558 年以后它才充分发挥它的功能。[68]威尼斯人提到过这种功能并且加以承认。1583 年，舰队的总监督官尼科洛·苏里亚诺的一项报告说："不久以前，整个阿普利亚海岸，从圣玛丽亚角到特龙托，了望塔很少，因此，土耳其人的低舷长形船不断沿着这条海岸线来往逡巡，进行骚扰，对航运和领土带来严重损失。这些船只满足于在这里取得胜利，不深入海湾的心脏地区。现在，由于有了这

些了望塔，海岸上的人看来得到保护……白天小船航行可以确保安全无虞。如果敌船出现，它们可以驶往塔下躲避，在那里受到架设在塔上的多门大炮的很好的保护，能够平安无事。由于这些情况，现在土耳其低舷长形船绕过安科纳山。这样它们就有把握大量掳获而不冒很大的危险。”既然在这段海岸之外的海面上被掳获的是威尼斯船只而不是驶往那不勒斯的西班牙船只，因此这个报告的作者的关切以及他作出的教皇、弗拉拉公爵和乌尔比诺公爵应该修筑像那不勒斯王国的了望塔那样的了望塔的结论就不难理解了。[69]西班牙总督的工作难道会这样受人轻视吗？

意大利海岸和西班牙海岸的防御

那不勒斯—西西里这条线经过基督教徒在马耳他岛上的强大的基地居中连接，一直延伸到柏柏尔海岸。土耳其舰队通常不越过这条线。在柏柏尔海岸上的拉古莱特的驻防地，一直到1574年都是西班牙的属地。土耳其舰队之所以不越过这条线，并不是因为这条线能够阻挡这支舰队前进，而是因为土耳其人一旦掠夺物收集到手，就很少关心继续推进。他们想继续推进时，什么也阻挡不了他们，正如什么也阻挡不了船只在土耳其和柏柏尔之间驶行一样。当时，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者也一直很活跃。因此，各个基督教国家必须认真采取措施来保卫全部海岸，为这些海岸配置了望塔和堡垒，在纵深进行设防。

像西西里的防御工事一样，这堵防御墙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够升出地面来的。这堵墙修建后，要迁移，还要使之现代化。这些工

程何时进行？如何进行？这很难确定。1563 年，[70]人们觉察到必须用能够安装大炮的工事来代替巴伦西亚的古旧的了望塔。在巴塞罗那立刻提出了这个问题：该由谁来支付这笔费用？国王？城市？市场？[71]1536 年 8 月，[72]哨兵在马略卡从了望塔的顶上发现敌人的帆船。因此，这个时期，岛上肯定已经有了了望塔。这些了望台是什么时候修建的？1543 年，防御工事开始在阿尔库迪亚特出现。但是，这是什么样的防御工事？同样，什么时候在科西嘉修建了必须使之有别于村庄防御工事的方形塔的圆形观察塔？[73]是从 1519—1520 年这段时期起按照圣埃芒达德[74]的模式组建了一支装备有“怪物”和警报系统的海岸卫队吗？既然 1559 年菲利普二世在布鲁塞尔对在阿利坎特的堡垒里只有 6 个人一事[75]感到惊讶，因此，这种卫队不会数量太大。1576 年，卡塔赫纳的防务计划仍然在制订中。[76]相反，1579 年，在格拉纳达有一支海岸卫队由海防大统领桑乔·达维拉指挥。[77]这是因为有更多特别的理由在这个地区采取预防措施。同时，撒丁岛不得不考虑它的防务（我们现在还保存有这个岛屿将近 1574 年时的详细设防计划[78]），并在将近 1587 年时，在总督东·米盖尔·德·蒙卡达的治理下，修建了一些塔楼。[79]沿着这个岛屿的珊瑚礁捕鱼的渔民在这些塔楼的后面躲避并且使用大炮自卫。[80]

当然，这些防御工事永远不会完工。经常需要添加一些东西以确保能够保护航海的贫民[81]和海岸上的居民。总的看来，这是一些规模大大小于我们在上面谈的工事的工事。西班牙的海岸经常遭到海上行劫者袭击，特别是遭到柏柏尔海上行劫者袭击，但不大惧怕君士坦丁堡的舰队。这毕竟大不相同。

在北非的海岸上

北非的防御设施问题对历史学家来说比别处清楚明了。[62]这并不是因为它比较简单，而是因为人们对它了解得比较清楚。排列得像一根链条那样的各个驻防地尽管十分狭窄，却同它们所包括的地区的历史有关联。它们是两种文明的汇集地。由此而产生多种阐述。这些阐述确切地说明了这个汇集地点的细节和整体，说明了西班牙在北非的阵地的总的历史和个别的历史。边界线确定于天主教徒费迪南统治时期，尤其确定于1509年和1511年之间，当时沿着一个古老的、不连续的、无法自卫的地带的边缘延伸。也许这个阿拉贡人过分受意大利的财富的引诱，因而全神贯注于这些财富。这就是使西班牙不能占领马格里布地区的内地。但是，时机一旦丧失就不再来。1516年，巴巴罗萨家族去阿尔及尔定居。1518年，这个家族被置于素丹的保护下。1529年，他们的城市从西班牙人自1510年起就已经在佩农拥有的阻碍、束缚人的小堡垒下解放出来。甚至在这个时期以前，阿尔及尔就已经是中马格里布的贫瘠荒芜的地区的中心城市，它向这个地区派出它的快速纵队，配置它的卫戍部队，把这个广阔的中间地区的全部商业贸易都吸引到它这里来。从那时起，一个由当地内部的权威势力控制的国家，就同在北非的西班牙人对抗，并且威胁他们。查理五世1535年对突尼斯和1558年对穆斯塔加奈姆进行的大规模的远征，丝毫没有改变这个格局，此外，查理五世进攻穆斯塔加奈姆遭到的失败，导致放弃与摩洛哥结成联盟的庞大计划。在这次失败以后，另外一个时代，即驻防地的第三个时代，已经开

始。

这个时代由菲利普二世开创,其标志是小心谨慎和深谋远虑,而不再是鲁莽冒险。当然,远征非洲的计划并没有一齐烟消云散。但是,雷声大雨点小,讨论颇多而行动甚少。行动起来,就或者在已知的地点,或者在被认为特别脆弱的地点行动。远征的黎波里的情况就是如此。这次远征以1560年在杰尔巴遭到的灾难告终。这次远征是西西里总督梅迪纳·切利公爵和马耳他骑士团团长,而不是国王主动发起的。1564年,由100多艘帆桨战船进行的对佩农·德·贝莱斯的大规模的征伐,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最后不了了之。1573年,奥地利的唐·胡安再度攻占突尼斯而且不顾他的兄弟和顾问的反对(他们只想撤出要塞和平毁要塞),顽固地保住他的这个战利品。这是狂妄自大症的突然发作,是查理五世在位时期的精神的短暂复活。谨慎国王统治期间,出现过几次这种复活……

1560年和1570年,人们耐心地执行一系列不事声张但久而久之显得卓有成效的政策。这的确加强并且发展了大量设防地。臼、砂浆、石灰、砖、梁柱、厚木板、石料、土方工程需用的盛土篮筐、铲子、鹤嘴镐等,成了在寄自设防地的信函中所谈到的器物。与要塞首领的权威并行的另外一种人物——粮食车马员这种"会计"、这种发放钱款司库——的作用和权威也在增长。工程师一建筑师这种平民的权威也在增长。这种情况并非从来没有引起任何矛盾或者冲突。例如乔瓦尼·巴蒂斯塔·安托内利被委以负责进行米尔斯克比尔的工程的重任。[83]另外一个意大利人伊尔·弗拉蒂诺(菲利普二世也在纳瓦拉使用过他)把梅利利亚过去的驻防地连砖

头都整个搬迁到这个驻防地的泻湖附近。他绘制的两幅图现在保存在锡曼卡斯。这两幅图显示出位于新址的小驻防城市的景象。这是一小群位于教堂附近，面对陡峭的、广阔的海岸的房舍。伊尔·弗拉蒂诺也在拉古莱特工作。[84]这使他和总督阿隆索·皮门特尔之间常有狂风暴雨，关系十分紧张。这是与世隔绝的人之间的典型争吵。这种争吵尖锐到互相告密检举；激烈到杀人行凶的程度[85]……但是，驻防地并不因此而不继续扩大发展。1573年和1574年的木版画展示出这样一幅图景：在"老拉古莱特"的原来的筑有棱堡的长方形工事的周围，有一列1573年夏季竣工的新建防御工事。[86]还有磨坊、弹药库、蓄水池、"搬运车辆"等。在车上架设有火力强大的铜炮，因为大炮是非洲堡垒的力量。

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驻防地一直在扩建。新的防御工事遍筑各地，耗费大量经常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建筑材料（一艘船在米尔斯克比尔卸下石灰），并且不断需要新"拓荒者"，即苦役犯。在奥兰和附属它的米尔斯克比尔，呈现出一幅宛如蚂蚁在辛勤劳作的生机勃勃的图景。1580年以后，米尔斯克比尔是这类地区的样板。本世纪末，这不再只是一个堡垒，而是一个用巨额费用和耗尽体力的劳动创建起来的设防地区。士兵像普通苦役犯一样，在那里用铲子和鹤嘴镐干活。迭戈·苏亚雷斯这个在青年时代曾经在埃斯科利亚尔劳动过的奥兰的士兵编年史作者，简直找不出言词来赞扬这项完美的工程。他总结说，这项工程同埃斯科利亚尔同样壮丽。但是，这件独特的杰作在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年才告竣工，而且1574年并未免于遭到彻底破坏的威胁……西班牙政府的统治当时正处于第二次破产，即1575年的那次破产的边缘。在突尼

斯,刚刚占领突尼斯城的奥地利的唐·胡安违抗国王的命令留住该地。[87]他的顽固导致1574年8、9月的那场使土耳其人得以同时占领拉古莱特和突尼斯两地的灾难。这个双重的失败表明,这两个分享从宗主国西班牙运来的供应物资的堡垒最后互相伤害。由此,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仅仅用一条1里长的、大炮无法通行的坑坑洼洼的道路来连接奥兰和米尔斯克比尔的双重驻防地,也可能是个错误。那里只有一条通道。韦斯帕西亚诺·贡扎加1574年12月完成的现场调查报告[88]的结论是:必须放弃奥兰,拆除、平毁该地的堡垒以便把驻防地的全部兵力集中于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并有良港的米尔斯克比尔。这位调查者写道:"我们攻占突尼斯城的那一天,拉古莱特丢失了。"至于在奥兰修筑工事以巩固城防这件事,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工程师都能做成的,除非在那里兴建一座大城市。然而,警报解除后,西班牙人耐心地挖掉岩石,从事修建的正是这座"大"城。[89]他们挖掘时,准备了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后来,小京都宫廷即这个在18世纪被不无夸张地称为奥兰的小马德里,在这个环境里繁荣兴旺起来……

1574年,突尼斯各个基地的陷落,并没有产生人们担心的后果。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灾祸。不错,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使用了留给它们的武器——帆桨战船舰队。[90]1576年,圣克鲁斯侯爵率领那不勒斯和马耳他的帆桨战船对突尼斯的萨赫勒的海岸进行了一次惩罚性的征讨,并在那里抢劫克肯纳群岛,抓走一些土著和大群牲畜,纵火焚烧房屋,造成2万杜卡托以上的损失。萨赫勒所有海岸上的居民逃离一空。1艘加强的荷兰圆头帆船把惶恐不安的情绪一直传到君士坦丁堡。[91]机动舰队有它的某些

好处。这一点西班牙人当时似乎已经明白。他们还觉察到，保卫受到威胁的海岸的最好办法是派遣帆桨战船主动出击，而不是1570年以前过多采用的那种办法，即让这些船只小心翼翼地集中在墨西拿等待土耳其人前来袭击。突尼斯失陷后，人们提出了多项再征服这个地区的计划。其中一项制订于1581年，把海军力量是先决条件这一点作为原则提出[92]……至少有人有这种见解。终于从应该开始的地方行事了。

这种新防御方式，即通过发动侵略来进行防御的方式，由于马格里布的经济复兴，甚至很可能比以前更加有利。1581年的一则西班牙的报导[93]指出，波内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生产相当精美的珐琅瓷，输出黄油、羊毛、蜂蜜和蜡。布日伊或者舍尔舍勒是内地农产品输出的门户。这些农产品并不单独由阿尔及尔巨大的贸易市场吸收。证据是：甚至在更靠近元首的城市，在乌埃德·埃尔·哈拉奇河的小港湾，在马提福的顶端，也有船只驶来把羊毛、谷物、家禽运往法国、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等地。这些详情细节酷似哈埃多叙述的将近同一时期的，即1580年的阿尔及尔的港口的活动情况……因此，今非昔比，在马格里布的险恶的而且无法停靠的海岸之外的水域航行、活动，大有猎物可获。此外，这种防御方法难道不比建立驻防地的办法更加经济省钱吗？一项大约在1564年和1568年之间拟定的财政报告[94]对从佩农·德·贝莱斯（1564年在西方收复）到拉古莱特（的黎波里于1551年丢失，布日伊1555年被阿尔及利亚人攻占，因此，这两个地方未包括在内）等一系列驻防地的总费用作了统计。各地卫戍部队的军饷分别为：佩农1.2万杜卡托，梅利利亚1.9万杜卡托，奥兰和米尔斯克比尔9万杜卡

托,拉古莱特 8.8 万杜卡托,共 20.9 万杜卡托。[95]可以看出拉古莱特开支较大。它的那支 1,000 人的正规卫戍部队的耗费加上 1 支 1,000 人的特别部队的耗费,约为奥兰驻防地耗费的两倍。奥兰驻防地当时由 2,700 名士兵和 90 名轻骑兵驻守。拉古莱特的开支之所以为奥兰驻防地的两倍,是因为后者的步兵的军饷较低(每月 1,000 马拉维迪),因为该地的生活费用低。[96]在西方,只有佩农的卫戍部队领取意大利的高额军饷[97]……

20 万杜卡托这个数字只涉及花在人员方面的费用。还有多项其他费用,例如还有防御工事的修建费和维修费。1566 年,菲利普二世为建设新拉古莱特拨出 5 万杜卡托,两年后再拨出 5 万杜卡托。这两次拨款还并非绝无仅有的两次。此外,还有耗资极为巨大的军火供应,例如 1565 年仅仅供给拉古莱特一地的物资[98]就包括铅 200 公担、火枪绳 150 公担、灵敏火药 100 公担(每公担值 20 杜卡托)、运土篮筐 1,000 只、带柄铲子 1,000 把。这些物资器材共值 4,665 杜卡托,运输费用尚不包括在内。1560 年,运输同等数量的物资需要帆桨战船 8 艘。每个驻防地为了进行建设都有自己的资金。当局需款时可以借用,然后偿还。这些收支值得仔细研究。这些收支使我们能够计算出维持这些经常需要维修、加固、扩大、供应粮食、供应其他物资的小堡垒所耗费的巨额费用。这还要撇开征服行动本身最先需要的费用。例如 1564 年,为攻占佩农花费了 50 万杜卡托,舰队的费用不包括在内。

为了进行比较,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在同一时期,巴利阿里群岛(虽然受到严重威胁)的防务仅花费 3.6 万杜卡托。卡塔赫纳和加的斯之间的海岸的防卫费用与此相同。至于 1 艘帆桨战船

每年的维修费用，当时则为7,000杜卡托。在1564年和1568年之间，各个驻防地的防卫工作差不多占用了正规卫戍部队约2,500人(2,850人)、特别增援部队2,700人(即春季运往该地，至少原则上初冬撤走，因为在到达时，特别在换防时，迟到情事屡有发生)。5,000人这个数字比西班牙国王在整个那不勒斯王国维持的兵员的数字还大。[99]如果不去研讨与一个热那亚代理人所谈到的那些投机活动适合的、相称的计算和考虑，能够认为保持30艘帆桨战船可能比保持在非洲的驻防地更值得吗？不管怎样，这些数字的好处在于：它们毫无疑问显示出西班牙面对柏柏尔的海岸作出了多大的努力。

驻防地——“一种不得已的解决办法”

罗贝尔·里加尔[100]曾经寻思过这个万不得已才采用的解决办法的使用是否已经超过有用的限度，是否已经不合时宜。科尔特斯在墨西哥登陆时焚毁了自己的船只：他必须破釜沉舟，因为不是获得胜利就是遭到灭亡。在北非，人们始终有运载水、鱼、布料或鹰嘴豆的船只可以依靠。行政部门还会对你加以照料……基督教徒的技术优势，在使他们能够建立并且维持“人们在那里用大炮进行自卫的”驻防地的同时，还使他们免除了更直接的、更有效益的努力吗？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是，这个地方也利用它广大的幅员和干燥的气候来进行自卫。这里不可能像美洲的征服者那样用驱赶牛群、猪群的办法来生活。至于移民定居进行垦殖的办法，已经有人想过。从天主教徒费迪南在位时期起，就有人提议：让卡斯蒂

利亚的摩里斯科人移居城市;将近 1543 年时使奔角成为殖民地[101]。但是,怎样使移居者能够生活下去呢?在这个被新世界的诱惑力和意大利的佳肴美味弄得眼花缭乱的西班牙,能够在哪里找到这些人呢?也有人想到过让这些设防城市在经济上发达兴旺起来,想到过好好歹歹建立起同广阔的内地的联系,这些城市将能依靠广阔的内地生活。先在天主教徒费迪南时代,然后在查理五世时代有过一项发展北非的港口的奇特的经济政策:[102]这项政策打算使这些港口成为加泰罗尼亚的海运中心,并且迫使威尼斯的帆桨大战船在那里停泊。但是,这一切都枉费心机。……1516 年,[103]西班牙的各个地中海港口的关税倍增,这并未能迫使威尼斯船只把它们在非洲进行的贸易集中于奥兰。马格里布的商业贸易潮流自动转移,避开西班牙的驻防地,并且宁可把塔朱拉、米苏拉塔、阿尔及尔和波内等地当作输出地点。这些都逃脱了基督教徒控制的港口或者海滩。这些自由港口的巨额贸易,标志着西班牙人在国外的驻防定居失败。正如摩洛哥的情况一样,16 世纪末拉腊歇的各个摩洛哥港口;萨勒、盖拉海角等的好运突出了葡萄牙据点的崩溃。这些据点过去曾经长期是繁荣兴旺的商埠。西班牙和北非之间的贸易[104]——如果文献资料可信的话,这种贸易更主要是转而集中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而不是转而集中在柏柏尔海岸——在 1580 年以后能够再度繁荣起来,能够把布料(呢绒、绸缎、天鹅绒、塔夫绸、农民呢绒)、胭脂红、食盐、香水、漆、珊瑚、藏红花以及成千上万顶装有衬里的和没有衬里的帽子从科尔多瓦或者托莱多一直运到非洲海岸,并再从这些柏柏尔国家运回糖、蜡、羊脂、牛皮、羊皮甚至黄金。这些交易(除了有时通过休达和丹吉尔进行外)全都

在驻防地外进行。驻防地几乎在商业流通范围之外。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驻防地只能同市集商贩和随军小贩做些买卖，既不繁荣兴旺，也不扩大发展。这些驻防地像嫁接的枝芽，勉强成活，能够办到的仅仅是不死亡而已。

驻防地的生活只能是悲惨的：粮食离水太近易于腐烂；人员死于热病；[105]士兵终年饥肠辘辘；供应品长期由海外运来。后来，由附近地区供应肉类和谷物。据称巴勒莫的医院住满来自拉古莱特的病人。这种供应在本世纪末成了定期补给。[106]但这仅仅是在奥兰进行。卫戍部队的生活在很多方面类似船上生活。这种生活不能免于偶然的风险。

马拉加的供应调度站有它的物资供应员，[107]有时还得到卡塔赫纳的服务机构的帮助。这个供应调度站保证西部地区如奥兰、米尔斯克比尔和梅利利亚等地的供应。上述机构提供服务时，当然会发生错失和渎职等情事。这些都有真凭实据可查。相反，没有这类事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我们不应该夸大这些轻微的错误。马拉加的贸易额是可观的。所有运往非洲的供应品诸如军火、粮食、建筑器材、士兵、苦役囚犯、挖土工、妓女等[108]都经由这里运走。供应和运输发生了严重的问题。例如小麦首先要收购，然后用费用奇昂的小驴运输队[109]从内地运来。从政府行政部门的仓库运往港口、再从港口运到驻防地，这意味着有新任务和有新耽搁。海上海盗麇集。因此，当冬季海上行劫活动暂时停止时，人们就冒险把 1 艘科尔夏班(corchapin)、两三艘小船、1 艘单桅三角帆船、甚至 1 艘马赛的或者威尼斯的大帆船[110]派往奥兰。这种大帆船被禁止出入港口，而且被征用来运输供应物资或者军火。这些船只多次被来自得

土安或阿尔及尔的大帆船抓捕。西班牙人如果能够在海上行劫者根据习惯在福尔肯海角沿海停泊时把船从海上行劫者那里赎回，就是天大的幸事了。因此，海盗也像工作粗枝大叶的政府行政部门一样，要对西方的驻防地一再发生的饥馑负责。尽管拉古莱特表面上十分幸运，离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很近，容易从这两个地方得到取之不尽的面包、酒类、乳酪和鹰嘴豆的供应，但它的命运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些从西西里短途渡海成功的人，并不能总在他们认为最方便的时候渡海。1569年，当皮门特尔负责指挥驻守拉古莱特的军队时，这支卫戍部队既没有面包，也没有酒，只能靠储备的乳酪活命。当然，意大利的后勤部门在这件事上也应该部分受到指责。这支卫戍部队难道不是从意大利的后勤部门或者从西班牙的后勤部门收到2,000双用西班牙优质皮革制作的、却是小女孩穿的尺寸的鞋子吗？[111]

此外，驻防地的内部组织不利于驻防地的良好运转。这一点可以从米尔斯克比尔1564年的行政管理规章制度看出。[112]士兵的粮食由仓库管理员按商品运送清单上规定的价格供应，[113]并且往往用赊款方式供应。这就是危险的薪饷预支制度。对经常向过路的商人赊购货物的士兵来说，这就是他们债台高筑的原因。有时，在发生困难或者在有地方当局参与策划的情况下，物价飞涨，漫无节制。有的士兵为了逃避他们无法偿还的债款，就开小差溜之大吉，投奔伊斯兰世界。导致一切恶化的原因是非洲的薪饷低于意大利的薪饷。这就是在让开往驻防地的部队上船时不预先告诉它们此行的目的地，而当它们一旦到达目的地后，又不派人替换它们的另一个原因。例如迭戈·苏亚雷斯在奥兰度过27年，尽管在这漫长

的27年中他曾经多次企图像帆桨战船的偷乘者那样逃跑。只有病人可以从令人憎恶的海岸返回西西里和西班牙的医院就医(这种情况当时并不常有)。因此,驻防地是流放的场所。一些贵族和富人在那里服刑。哥伦布的孙子因犯三重婚罪在巴利亚多利德被捕,被判处10年流放刑,1563年到达奥兰,1573年死于该地。[114]

赞同还是反对对部落的侵袭劫掠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些卫戍部队驻地的气氛吧!每个要塞都是要塞大统领的采邑:梅利利亚长期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家族的采邑;奥兰长期是阿尔考德特家族的采邑。1513年,的黎波里让与雨果·德·蒙卡达,由他终生拥有。[115]总督和他的家族以及在他周围生活的封建领主共同进行统治。这些统治者爱好的娱乐消遣,就是对部落进行侵袭劫掠。这是一种预先周密策划组织的出击活动。这既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职业。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活动、一种严格的需要。卫戍部队有责任管辖、控制堡垒周围的地区,驱逐入侵者,保护居民,收取抵押品,收集情报,征集粮食。以下种种活动仍然很有诱惑力:玩玩当兵打仗的游戏,在突尼斯城附近的花园设下埋伏并在那里绑架前来采摘他们的水果或者收割大麦的和平的、手无寸铁的、毫不提防的农民,在奥兰的时而发出蓝光、时而被水覆盖淹没的平原之外去突然袭击某个乡镇。雇佣的暗探早已提供了这个乡镇的情况。这是一种比猎捕野兽更加引人入胜、更加危险、更加有利可图的狩猎。掠夺物人人有份。大统领有时从猎获物中提取"五分之一"(或称"王室的五分之一",这是王室的特

权)。[116]不管对谷物、对牲畜或者对人都这样提取。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士兵对军队日常正规生活感到厌烦,于是自行外出冒险。这是因为他们希望获得钱财和新鲜食物,或者因为他们感到百无聊赖。虽然这些侵袭劫掠活动可能像人们指望的那样,把西班牙的名字引起的恐怖传播远方,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妨碍内地和堡垒之间的必要的和平往来。在这个问题上,当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迭戈·苏亚雷斯认为,必须进行这种袭扰劫掠,与此同时,还必须态度随和,还必须增加在堡垒周围躲避而自己也保卫堡垒的和平的摩尔人,即顺从的土著居民的人数。这位军人——年代史编者根据自己的意思重复这句平常的谚语:"摩尔人越多,就挣得越多。"这就是说,摩尔人越多,谷物就越多,"吃的东西"就越多,牲畜就越多[117]……但是,克制自己,不对可贵的供应者进行袭击、恐吓,因而不抛弃、疏远他们,与此同时却又不破坏构成驻防地的生活和防御的传统制度的事物,不破坏通过说服或者使用武力来完成势力范围和保护范围的发展,这难道是可能的吗?这种势力范围和保护范围对西班牙的驻防地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它对在摩洛哥的葡萄牙的驻防地必不可少一样。没有这个势力范围和保护范围,要塞就会停止呼吸。

这样一种制度并非没有产生过不幸事件和严重错误。1564年,从西班牙传来上级的命令:8、9两月暂停侵袭劫掠。土著居民被正式告知此事后,赶紧把谷物和粮食运往奥兰。就在这时,奥兰防区的司令安德雷斯·邦斯组织了一次侵袭劫掠,抓回11名俘虏。按当时市价计算,这次行动获利约1,000杜卡托。这个数目当然可观。但是,当时在米尔斯克比尔担任指挥职务的弗朗西斯科·

德·巴伦西亚拒绝参加这次行动。有人猜测这个弗朗西斯科不大喜欢他在奥兰的同僚。他不但拒绝参加这次行动，而且还写书面报告说，这次对上级抗命不从，使奥兰丧失了小麦和大麦供应。事实的确如此，土著从此不再来驻防地了。这是好事吗？他还更加笼统地写道："我谨禀报陛下，在我看来，迄今进行的侵袭劫掠活动把土耳其人引入了特莱姆森王国。"[118]

这种指控言过其实。如果把侵袭劫掠活动列为驻防地的艰难困苦的和离群索居的生活的原因，那么这种活动丝毫不能说明为什么西班牙在非洲的土地上最后归于失败。这种活动不比衣衫褴褛的士兵的饥饿或者负责他们的思想教育的稀奇古怪的神父等更能说明这种失败。在这些神甫中有一个法国人。此人在梅利利亚临时充任神父，他很可能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神品。他还通过一个什么神迹始终过着终日好酒贪杯、半醒半醉、飘飘欲仙的生活。[119]上述的侵袭劫掠活动也不比土著居民的背信弃义更能解释这种失败。一个西班牙船长说：这些土著居民是"世界上最大的说谎者"。一个意大利人高呼他们是"世界上最不忠诚老实的人"……这些对当时的人来说显而易见、不言自明的理由在历史的面前份量减缩了。西班牙不充分使用非洲驻防地，只不过是哈布斯堡家族，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只不过是天主教世界的政策的一个方面而已。

防御心理学

基督教世界面对伊斯兰世界，处处设防自卫，这个宽广的景象是个重大标志，也是个重要证据。伊斯兰世界却宁肯使用大量骑兵打进攻战，而不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正

如纪尧姆·迪·韦尔[120]在谈到土耳其人时所说的那样,伊斯兰世界"总是把身子悬在空中",以便向敌人猛扑下去。总之,这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对这个现象能够作出解释吗?埃米尔·布尔热瓦[121]很久以前就已经指出,基督教世界随随便便、满不在乎,放弃大片土地,特别听任巴尔干和君士坦丁堡落入伊斯兰世界手中。尽管基督教世界在大西洋彼岸专心致志于扩张,但是,还有什么事物能比它对伊斯兰世界所采取的态度更加顺理成章的呢?这种态度就是:采取一种花最少的费用,使用大炮和复杂的防御工事来进行防御的政策。这是一种把背转向东方,对之不予理睬的政策。

另一方面,伊斯兰世界之所以寻求接触,甚至在必要时寻求殴斗这样的绝望的接触,这是因为,正相反,它想继续进行对话或者把对话强加于人,而这样做的原因又是它需要分享它的敌人的高级技术。没有这种技术,就不会拥有威势;没有这种技术就不可能在亚洲玩弄基督教世界对它玩弄的那种手法。土耳其人在卡尔尼奥尔的边界上经受、体验过西方的炮火后,试图训练土耳其骑兵使用手枪对付波斯,[122]但未获成功。在这方面,土耳其人的航海词汇和基督教徒的航海词汇的接近和它们之间的明显的联系,更加具有结论的性质,例如 kadrigha 与 galère(帆桨战船),kaliotta 与 galiote(荷兰圆头帆船),kalioum 与 galion(大帆船)[123]就有这种联系。东方的学生除了借用西方的词汇外,还借用西方的器物。

这个世纪末,东方人根据西方的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的式样制造在黑海上航行的大型帆船。更有甚者,他们还仿造基督教世界的大帆船。[124]土耳其人拥有这种船只 20 艘。这种船只是吨位为1,500波特的大型运载工具。在这个世纪的最后 25 年,这种运载工

具保证了埃及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联系，运送香客、糖和大米。[125] 我们还应该加上黄金。当然，黄金也从陆地运来。

相反，土耳其人面对波斯却修筑一道帝国长城。任何人对比自己更穷的人来说，始终是富人。

2. 海上行劫——正规大战的一种补充形式

1574 年以后，小舰队战、远征军战和大规模的围城战实际上都已经结束。1593 年以后，这些战争在一定的程度上死灰复燃，但仅仅在地中海之外的匈牙利边界上进行。官方的大规模的战争被排除，就意味着和平到来了吗？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出现了其他形式的斗争。这些斗争纷然杂呈，充分发展。毫无疑问，规律是行之四海而皆准的。

在法国，军队在卡托—康布雷锡和约缔结之后的大规模复员，大大促成了宗教战争的爆发。这一系列战争最后发展演变为远比国外战争更加严重的动乱。相反，从 1555 年到 1618 年，德意志之所以安定平静，是因为它把它的寻求冒险的军队的多余力量向外派往匈牙利和意大利，尤其是派往荷兰和法国。17 世纪开始时，对外战争的终结对德意志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乔瓦尼·博泰罗把他那个时代的法国的战争同西班牙的和平对比，提出法国为自己在国外的迟钝懒散、无所作为付出了代价，而西班牙则因同时卷入世界上的所有的战争而得到好处。[126] 只要使别人家中兄弟阋墙、争吵不和，就可以使自己家中安宁平静和睦融洽。

1574 年以后,地中海的大规模战争暂时中止。这肯定是发生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动乱以及劫掠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大国之间的战争的停止,把海上行劫这种次等战争置于地中海的历史的首列。[127]从 1550 年到 1574 年,这种战争已经占有不可等闲视之的地位。它发展、蔓延、填补了正规战争的减缓所留下的空隙。在从 1574 年到 1580 年这段时期以后,海上行劫活动加剧,范围扩大,并且从那个时期起形成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引人注目的地中海的历史的主流。战争的新首都不再是君士坦丁堡,而是阿尔及尔;不再是马德里或者墨西拿,而是马耳他、里窝那或者比萨。今天的暴发户取代了昨天的有权有势的人物。国际冲突蜕变为群众斗殴。一部混乱不堪的历史代替了一部伟大壮观的历史。[128]

海上行劫——古老和普遍化的行业

地中海的海上劫掠的渊源和历史同样古老。在博卡瑟的著作中,[129]在后来塞万提斯的著作中,[130]同在先前的荷马的著作中一样,都有关于海上劫掠的描述。这种古老的性质甚至使海上劫掠在地中海比在别处具有更加自然的性质(我们能说这种活动更有人情味吗?)。16 世纪,在同样动乱不安的大西洋上,有毫无疑问比内海的海盗更加凶狠残暴的海盗猖獗为害。此外,在地中海,海上劫掠(piraterie)和海盗(pirate)这两个词不大使用,至少在 17 世纪初期以前是这样。通常使用的是海上行劫(course)和海上行劫者(corsaire)这两个词。法律上的十分明确的区别在并不彻底改变问题的实质的情况下有它的重要意义。海上行劫是合法的战争。正

式的宣战声明或者武装私人船舶许可证[131]、护照、委托、训令……等使这种活动成为合法行为。当我们回溯历史时，这些说法在我们看来不管多么离奇怪诞，海上行劫确有"它的法律、规章，它的生动的惯例和传统。"[132]德雷克没有受到任何委托出发前往新世界，这在他的很多同胞看来，似乎是不合法的行为。[133]的确，如果认为16世纪没有国际公法、它的惯例和某些强制性的力量，那就错了。伊斯兰国家和基督教国家交换大使，签订条约，并且经常遵守签订了的条约中的条款。整个地中海都是两种邻接而又敌对的文明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的地区。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是恒久的现实，它原谅海上劫掠这种活动并为之辩护，而为这种活动进行辩护，就是把它列入与之邻接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体面的海上行劫的类别中。西班牙人16世纪使用两个名词。他们谈到柏柏尔人在地中海上的海上行劫也谈到法国人、英国人或者荷兰人在大西洋上的海上劫掠。[134]海上劫掠这个词之所以在17世纪展延到地中海的活动中，这是因为西班牙想为内海的这种抢劫活动标上耻辱的印记，并且了解到，过去的海上行劫已经变质，这种活动以后只不过是所有的基督教强国为了破坏它的贸易、它的疆土、它的威势和它的财富而进行的伪装的、不合法的战争而已。根据一个历史学家的说法，[135]海上劫掠这个词，只在西班牙攻占马摩拉（1614年）之后，才应用于阿尔及尔海上行劫者。这个城市被攻占时，该地的海上行劫者被从他们的基地赶走，逃到阿尔及尔避难。这个词便随同大西洋的船只通过了直布罗陀海峡。但是，这个细节纯系猜测臆断之词，并不可靠。

然而，读者会这样想：海上行劫和海上劫掠往往是同一个事物。类似的残忍行为和类似的压力，决定行动的方式以及对奴隶和

掳获的货物的支配处理。尽管如此，在这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区别：海上行劫是地中海本地的海上劫掠的一种古老的形式，有它自己熟悉的习俗、惯例、协议和谈判。抢劫者和被抢劫者没有像一出完美的艺术喜剧中的大众喜爱的人物那样在事前达成协议，但时刻准备谈判，然后谈妥。因此有很多中间调解人的网(没有里窝那的居中调解活动和它开的门，抢来的货物就会在柏柏尔的港口腐烂)。因此，对易受欺骗的历史学家来说，就产生了大量虚假的问题和危险的简单化的现象。海上行劫在16世纪不是任何海岸、任何集团、任何负责人物、任何罪魁祸首独占的活动领域。它是地区性的，经常猖獗为患。所有的人和物——坏人[136]和有权有势的人、富人和穷人、城市、领主和国家——都被网在这面撒到整个海洋上的网里。西方的历史学家过去教导我们只对穆斯林海盗进行观察研究，特别只对柏柏尔的海上行劫者进行观察研究。阿尔及尔发达兴旺的好运遮没了其他一切景物。但是，阿尔及尔的这个好运并非绝无仅有。马耳他和里窝那是基督教世界的阿尔及尔。它们也有自己的苦役犯、监狱、人口买卖市场、肮脏的交易……此外，这种阿尔及尔好运要求人们持最严肃谨慎的保留态度。是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事物特别在17世纪，在这种好运的日益增多的活动的后面起作用呢？哥德弗雷·费希尔在其优秀著作《柏柏尔传说》一书中使我们认清了事情的真相，这非常正确。因为不只是在阿尔及尔，而是在整个地中海范围内，人们互相猎捕，互相关押，互相出售，互相严刑拷打，人们经历了、熟悉了各个“集中营世界”的种种苦难、恐怖、贪婪和圣洁行为。

此外，海上行劫活动往往与国家、信仰等并无多大关联，它只

不过是一种谋生之道而已。如果海上行劫者在进行海上行劫后空手而返，阿尔及尔就会发生饥馑。[137]在这种情况下，海上行劫就根本不会去考虑被抢劫者是什么人、什么国籍、什么信仰，而成了纯粹的抢劫。塞尼亚和阜姆的乌斯科克人既抢劫土耳其人，也同样抢劫基督教徒。地中海西部的海上行劫者（西方的海上行劫者在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外海上被这样称呼）的帆桨战船和西班牙运输掠得的金银的大帆船的所作所为也如出一辙。[138]他们抓捕他们能抓捕到的一切，其中包括威尼斯和马赛的船只，借口是没收船上的犹太人或者土耳其人的货物。威尼斯市政议会对此提出抗议，但白费气力。教皇是安科纳的保护者。他希望他的一面旗子就能保证船货一劳永逸地获得豁免。但是，船舶检查权不管是否滥用，仍然掌握在基督教徒海上行劫者手中。土耳其的帆桨战船也同样使用这种权利来没收船舶运载的西西里的或者那不勒斯的货物……检查云云，这在双方都只不过是借口而已。尽管威尼斯的帆桨战船不时给予各个民族的形形色色的海上行劫者以沉重的打击，海上行劫仍然继续发生。

1536 年 8 月驶来抢劫伊比扎的船只是法国的还是土耳其的？[139]怎样知道呢？既然这些船只抢走几大块咸猪肉，它们无疑是法国的。甚至在基督教徒或者穆斯林内部，也发生火并和抢劫情事。1588 年夏季，驻扎在阿格德的蒙莫朗西的士兵（没有军饷，至少他们声称没有军饷）开始驾驶一艘双桅横帆船进行海上劫掠，并且捕获来自海湾的一切。[140]1590 年，卡西斯 海上行劫者抢劫了两艘普罗旺斯的小船。[141]1593 年，一艘法国船“浸礼会信徒让”号（它大概来自布列塔尼港）虽然有梅克尔公爵和西班牙驻南特的代理

人唐·胡安·阿吉拉发给的必需证件和通行证，它的货物仍然被多里亚亲王没收、出售。[142]船员被带上脚镣手铐。1596年，一些法国的，特别是普罗旺斯的单桅三角帆船，抢劫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海岸。[143]20来年以前，1572年夏季，[144]一艘船主为安托万·邦迪夫的马赛船“圣玛丽亚和圣约翰”号自亚历山大港满载而归。狂风暴雨使这艘船同它所属的马赛船队的其他船只失去联系。它在大海航行时，遇到一艘来自干地亚的拉古萨商船。这艘商船驶往西西里岛装载谷物运往巴伦西亚。商船俘获了马赛船，把船上的货物抢劫一空之后，让它沉入海底，并把马赛船的船主、军官和中级船员全部溺毙。这就是海上生活的意外风险。1566年，一艘法国船的船长在阿利坎特处于困境。根据这艘船的法国水手的一大堆诉苦，西班牙人什么时候想制造巨大困难，就能够在什么时候制造。但是，上述的那个船长胆子很大。他把强行登上他的船的人统统抓了起来，而且还攀登城堡的围墙。[145]他倘若成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1575年，一艘法国大帆船在柏柏尔的的黎波里装载前往亚历山大港的摩尔人旅客和犹太人旅客。旅客中“男、女、老、少都有”。这艘大帆船的老板肆无忌惮地把旅客和行李运往那不勒斯，并在该地把乘客和货物全部卖光[146]……下述事件无疑属于社会杂闻，但屡见不鲜：1592年，马尔蒂格的一个名叫库蒂尔的船长的船在罗得岛装载土耳其人驶往埃及。但是，这个船长却不把这些土耳其人运往原定目的地，而是运往墨西拿。[147]还有纯粹的抢劫行为。1597年夏天，盗匪武装了几艘小船，并在热那亚海岸大肆抢劫，见到什么就抢什么。[148]这些各国水手习以为常的行为却被弄得在我们看来如此令人惊讶不置，人们过去是在怎样向我们讲述历史啊？

与城市有关联的海上行劫

正如儒尔丹先生①整整一生都在无意之中把事情做成一样，肯定会有不少水手虽然按照海盗的习俗风尚进行航海活动，但在听见他们自己被描绘为海上行劫者时大吃一惊，在听见他们自己被描绘为海盗时就会更加惊讶不置了。例如，1563年，桑乔·德·莱瓦难道没有提议率领几艘西西里的帆桨战船前往柏柏尔海岸去带回一些充作划桨手的俘虏吗？[149]舰队经常派遣几艘帆桨战船去抓舌头，并且在猎物出现时进行海上劫掠。进行海上劫掠就是打仗，就是打一场必需同城市、村庄和牲畜等打的仗，就是靠吃别人的食物来养活自己，使自己身强力壮。1576年，圣克鲁斯侯爵前往突尼斯海岸进行一次治安巡视。另外一些人说得更简单干脆，这位侯爵是去抢劫贫瘠的克肯纳群岛[150]……人人都可以自由参加海上偷盗抢劫活动。在这方面英国商人在1580年后特别臭名远扬。他们有冷酷无情和肆无忌惮的名声（是地中海水手为他们制造了这个名声）。但是，根据海上的习俗，近似海上劫掠的海上行劫，却是合乎风尚的，是海上传统的一部分。[151]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官方海运船队收纳、聚藏海上行劫者并进行海上行劫。这些船队有时就源出于海上行劫者。土耳其人的力量就是通过进行海上行劫从14世纪起在小亚细亚的海岸上开始展现的。[152]土耳其舰队在西征的航途中除了进行大规模的"海上劫掠"之外，还干过些什么呢？

① 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剧作《贵人迷》中的人物。——译者

海上行劫——或许应该称为"真正的"海上行劫——通常是在某个按照自身权力行事的或者只是勉强地附属于某个大国的城市的怂恿下进行的。这在16世纪和在路易十四时代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当太阳王在对英国及其盟国的战争中无法继续进行正规舰队战时,就进行或者听任别人进行海上行劫战。圣马洛和敦刻尔克取代法国变成交战的一方。

早在16世纪,迪埃普,特别是拉罗舍尔,就已经成了海上行劫中心。后者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共和国。列举地中海的海上行劫中心等于列举几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战略城市。在基督教世界方面有:瓦莱塔、里窝那、比萨、那不勒斯、墨西拿、巴勒莫、特拉帕尼、马耳他、马略卡岛上的帕尔马、阿尔梅里亚、巴伦西亚、塞尼亚和阜姆;在穆斯林世界方面有:发罗拉、都拉斯、柏柏尔的的黎波里、突尼斯、拉古莱特、比塞大、阿尔及尔、得土安、拉腊歇萨勒[153]……在这张表上,3个新兴城市显得特别突出。它们是:马耳他骑士团自1566年起开始修建的瓦莱塔、科西默·德·梅迪奇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重建的里窝那,最后,特别是居于首位的,是把上述城市全部概括、包含在自己的令人惊讶的命运中的阿尔及尔。

当然,这不再是本世纪初的那个柏柏尔人的阿尔及尔,而是一个突然兴建起来的"美洲式的"新城市。这座城市各种设施齐全,有防波堤、灯塔、古老但非常强固的堡垒以及远于这些堡垒的使这座城市的保卫工作得以完善的防御工事。海上行劫者在那里得到保护、供应,得到大批技术工人如捻船缝工、大炮铸造工和木工等。另外还有船帆、船桨、一个活跃的销售猎获物的市场、等待雇佣进行海上冒险的人和划桨的奴隶,最后还有港口的各种娱乐消遣活动。

没有这些娱乐消遣，海上行劫者的大苦大乐的生活就毫无好处可言了。阿隆索·德·孔特雷拉斯从海上行劫归来马上就在瓦莱塔城内的妓院里同妓女把金币花个精光。瓦莱塔除了决斗和祈祷仪式之外，还以其他一些事物闻名。在阿尔及尔，海上行劫者的首领们出海征伐归来，就在他们在城里的住宅或者在萨赫勒的别墅里大宴宾客。萨赫勒的花园之美，堪称世界上首屈一指。

海上行劫必然需要一条贸易的路线和一个市场来销售赃物。阿尔及尔只有变成活跃的商业中心，才会成为海上行劫据点。将近1580年，当哈埃多用敏锐的目光注意观察这个城市时，这个转变已经完成。为了取得装备，得到粮食供应，出售掳获物，必须向商队、外国大帆船、赎回俘虏的人的船开放，必须向马赛、加泰罗尼亚、巴伦西亚、科西嘉、意大利各地、英国、荷兰……等属于基督教世界的船只开放，让它们一直驶到城市。也必须使各国的领袖人物——伊斯兰国家的或者半伊斯兰国家的，有时还有北欧的——在客栈扑鼻的香味的吸引下乘坐他们的帆桨战船或者精巧轻捷的帆船蜂拥而来。

阿尔及尔当时是个强大的、行动自由的城市，是海上行劫者最好的集中地和首都。在16世纪，各国之间尽管存在着争端，但都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并被认为遵守国际法，而当时的海上行劫者的城市有时却根本不把国际法放在眼里。这些城市形成一个社会边缘上的世界。在1580年和1620年间，阿尔及尔处于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它根据对自己是否有利、是否方便来决定服从或者不服从素丹的命令。从伊斯坦布尔到阿尔及尔海天阻隔、路途遥远，素丹鞭长莫及。马耳他也是基督教世界的十字街头。它希望实行自治。

1577年和1578年之间这段时期,[154]圣艾蒂安骑士团的团长托斯卡纳大公在同土耳其人的谈判中,为了使他自己个人的事业和利益有别于这个骑士团的事业和利益作出了努力。没有任何事物比这些努力更加具有揭示性和启发性了。这是一个的的确确在行使真正的权力但同时又声称自己毫无权力的王侯。

以城市为基地进行活动的海上行劫者并非唯一的海上行劫者。在以城市为根据地的海上行劫这种大规模的海上行劫之下,还有一种低级的、往往微不足道的、与偷窃田间蔬果类似的海上劫掠。在食肉的大兽之外,还有一些很小的猛兽经常出没海上,在希腊群岛之间,在希腊的西海岸上,寻找它们力所能及的猎获物。它们只要一看见阿普利亚的海岸上的了望塔,就逃之夭夭,被迫从这些危险的海域回到东方的海岸和岛屿。它们地位低下,野心不大,只不过是抓走一个渔民,抢劫一座粮仓,绑架几个收割庄稼的人,从纳兰塔的河口的土耳其和拉古萨的盐田抢走盐……如此而已。勒芒斯的伯龙看见在希腊群岛活动的就是这种海盗,[155]"三四个人……对海洋十分习惯,大胆冒险,异常贫穷,只有1艘小船或者1艘三桅战船或者1艘装备很差的双桅横帆船,但是有他们的叫做bussolo的航海罗盘。他们也有作战工具。这是一种在短距离内射击的轻武器。他们携带一袋面粉、一些饼干、一皮囊油、一些蜂蜜、几串大蒜、洋葱和食用一个月的盐作为食物。这些东西准备好后,他们就开始冒险。如果被风暴阻留港内,他们就把船拖上陆地,盖上树枝,用斧头削砍树木,用火石撞铁点火,用面粉做圆形大面包。他们做面包的方式与罗马士兵过去作战时做面包的方式相同"。17世纪安的列斯海的冒险家或者海盗开始时的情况也是这样。[156]

不过，这些食肉动物对人的伤害并不总是最轻。它们最后积累起来的财富，也并不总是最少。海上行劫这个领域正像美洲一样，是个碰运气的世界，风云莫测、祸福难卜。昔日的羊倌或许会变成阿尔及尔的国王。卖彩票发财的幸运者的传记，充满这些奇妙的发迹史。1569 年，西班牙人想争取和收买厄尔杰·阿里时，向他出的价是侯爵爵位。这种出价对一个出身微贱的平民来说应该是诱人的了。厄尔杰·阿里原来是卡拉布里亚的普通渔民，后来成了柏柏尔城市的"国王"。不久以后，他因振兴了素丹的海军而使全世界感到惊讶。

海上行劫和赃物

没有无赃物的海上行劫。赃物有时微不足道。如果没有把盐从科孚运往阿尔巴尼亚以便从阿尔巴尼亚运回五倍子的这种贸易，这个岛屿就会免遭阿尔巴尼亚的不间断的海上劫掠之苦。这就是 1536 年有人在威尼斯元老院作出的解释。[157]劫掠者和被劫掠者之间能够建立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特别因为被劫掠者进行自卫而发生变化。火炮很早就已经登上帆桨战船。它尽管碍手碍脚令人感到不便，但始终留在船上。接着商用大帆船也采用它。将近这个世纪中叶，[158]船只配备火炮已经十分普遍。1577 年，即使最小的在塞维利亚停泊的船只也有自己的铁炮或者铜炮。炮的数量大致与船的吨位成正比。[159]海岸也进行自卫，而且愈益有效。海上行劫者根据每年的情况，某一年抢劫海上船只，另外一年又抢劫海岸。这只不过是粮食供应问题和时机问题而已。

从 1560 年到 1565 年，柏柏尔人的海上行劫使整个西方海域

惨遭蹂躏。这几年内地中海西部关闭起来、无法通航的这种说法，几乎确有其事，并非虚构。基督教世界各国异口同声，抱怨不满，这就清清楚楚(或者过分清楚)说明了这一点。柏柏尔海盗这时甚至袭击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的海岸这件事，也说明了这一点。[160]这是因为当时海上行劫的成功本身使赃物数量减少；这是因为海上行劫者没有赃物就不能吃饭，不吃饭就活不下去，甚至在朋友之间情况也是这样。对法国国王的臣民来说，这就活该倒霉了。17 世纪，阿尔及尔仍然在发展中，但是为什么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者仍然在东方冒险(可能比传说的少[161])？他们向亚得里亚海猛扑，猎捕马赛船只，然后越过直布罗陀。他们在来自北方加入他们一伙的新成员的援助下，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大西洋，于 1631 年抵达英国海岸，奔袭葡萄牙的笨重的大吨位帆船，在冰岛、纽芬兰和波罗的海等地出现……这或许意味着他们能够定期在地中海获得的赃物日益减少了吗？总之，海上行劫处于自身的发展变化中，以它自身特有的直接的和快速的方式表明地中海生活的巨大发展变化。猎人跟踪猎物。我们在使用海上行劫这种“显示器”时，不幸的是，我们实际上无法求助于严肃的统计数据。我们收集到的种种描述、断言、抱怨、传闻和谣言都不可能使人能够进行任何严肃认真的计算、估量和分析。

海上行劫的年表

以下几个关键日期为海上行劫的历史定下标志并且左右了这部历史：1508 年、1522 年、1538 年、1571 年、1580 年和 1600 年。将近 1500 年时，除了在威尼斯外，俘

虏和苦役犯被用来替换到那时为止唯一地或者几乎是唯一地配备在帆桨战船上的志愿划桨手。[162]1522年罗得岛的陷落扫清了最后还在东面剩下的阻挡穆斯林的大规模的海上行劫的障碍。[163]1538年，普雷维扎战役使伊斯兰国家取得了制海权。1571年，基督教徒因在勒班陀战役中获胜又夺回这个控制。在这两个年代之间(1538—1571年)，特别在从1560年起(在杰尔巴之后)到1570年止这10年间，柏柏尔人的海上行劫活动第一次迅速发展。在这10年里，除了马耳他包围战之外，比较而言，大型舰队进行的大规模战斗相当少。1580年以后，由于大型舰队按兵不动、袖手旁观，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海上行劫以同样的势头增加。最后，在1600年以后，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者更新了全部技术装备，涌入大西洋。

基督教徒的海上行劫

甚至在最阴暗的时刻，基督教徒的海上行劫活动也从来没有在地中海中断过。这种活动之所以没有被历史学家详细记载，部分是由于某些心理上的原因，部分是因为它是诸如双桅横帆船、三桅战船、小三桅战船、小船等往往很小的轻便船只的惯常活动。西西里或者西班牙和非洲海岸之间距离很短，因而可能使用小型舟船进行活动；海上行劫的赃物不丰，因而必需使用这样的舟船进行活动。马格里布的海岸丘陵起伏、荒无人烟，土耳其人戒备森严。不错，过去在这些海岸附近的海域里行劫是有利的。过去的情况如此，15世纪的情况还可能如此。

一份1559年发自威尼斯的报告说[164]：“人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习惯于在柏柏尔的海岸附近的海域进行海上行劫了。”1560年

前后，沿这些海岸抓获到些什么呢？几个土著、1艘小船、1艘载运baracan这种粗呢或者哈喇的黄油的双桅横帆船。这样微不足道的掳获，同一次收获不丰的海上行劫是相称的。我们的文献资料除了偶尔提起外，对这类事未作任何记载。哈埃多对巴伦西亚人胡安·卡内特[165]的记述，像投射到胡安·卡内特的事迹和功业上的一道光线。巴伦西亚人胡安·卡内特是一艘有14个座席的双桅横帆船的船主。他以马略卡为基地，是柏柏尔海岸的一名勤劳的猎手。他夜间驾舟直接驶往阿尔及尔的门户，在那里抓捕在城的护墙下熟睡的土著……1550年春季，[166]某天黑夜降临时，他冒险一直驶入阿尔及尔港内，打算纵火焚烧低舷长型船和看管不严的荷兰圆头帆船。这个企图归于失败。九年后，他在苦役犯监狱里被狱卒处决。1567年，另外一个名叫胡安·加斯孔的巴伦西亚人再次执行胡安·卡内特的计划。这个人连同他的双桅横帆船都受雇于奥兰的供应船队。他有时也为自己干海上行劫的勾当。[167]他比他的那个前辈幸运，能够深入港内，纵火烧毁了几艘船。但是，他接着就在大海上被阿拉伯人首领截获……

关于西班牙南部地区的水手的情况，这类社会新闻只打开了狭窄的天窗，向我们提供的情况很少。然而，我们有这样的印象：1580年，这些地区从沉睡中醒来了，因为在这个时代，它们比过去活跃得多，更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文献资料中。也可能它们从来就没有睡着过。当我们开始较好地觉察到它们的时候，这些地区的水手还在使用同样的高帆轻舟，他们始终那样胆大。一个名叫胡安·菲利普·罗马诺的人的第三次旅行的故事可以作为例证。此人是个为来自阿尔及尔的逃亡者效劳的“助人偷越国境者”。[168]1595年5

月23日，他离开巴伦西亚的克拉多，可能搭乘的是一艘上一年掳获的柏柏尔人的三桅战船。[169]6月7日，他驾船来到阿尔及尔附近一个小海湾里的花园的旁边停泊。这个花园是预定的约会地点。但是，第一天夜里并没有人来会见他。情况既然这样，他就留在岸上，叫与他同来的伙伴回到船上去，命令他把船开到大海并且等待信号发出再回岸边。第二天，花园的主人和他的妻子果真来了。罗马诺很久以前就同他们订过协定。逃亡者是个马德里的名叫胡安·阿马多的人。这个人1558年在穆斯塔加奈姆被俘(因此早40来年)。在被俘后的时期内，他改皈伊斯兰教，但是仍然很想同他的妻子和1个7个月的孩子一道返回西班牙……在这艘那天夜里他登上的船上，还上来1个"公主"—女兵(穆斯塔法的女儿)、10个基督教徒俘虏和"公主"的两个黑奴，再加上1个22岁的摩里斯科人和马米海伊斯的妻子。后者是一个梅诺卡岛的副长官的女儿，也由黑奴伴随。这些奴隶之中有4个男基督教徒和1个女基督教徒。登上船的还有1个葡萄牙人。他是阿尔及尔的锁匠。这个葡萄牙人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一齐上了船。最后，还有几个基督教徒也上了船。他们当时正在这艘船停泊的地方，于是利用这个意外的良机登上了船。罗马诺总共把32个人顺利地带到巴伦西亚。

这的确是个优美动人的故事。但是，这样的偶然行动极为罕见。个体手工业式的海上劫掠规模很小，例如特拉帕尼的渔民驾驶他们的liutelli船[170]进行的海上劫掠和1614年，甚至可能还更早一些，由撒丁的西班牙的政府[171]为了某些人的利益组织的海上劫掠就是这样。地中海西部唯一的重要猎物是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船只本身。但是，只有舰队的大型帆桨战船才能进攻这些特别可怕

的猎物。另一方面,将近1580年时,阿尔及尔地区的渔船因为害怕基督教徒的三桅战船,[172]不敢驶离海岸半英里以上。

但是,对基督徒海上行劫者来说,地中海东岸地区是狩猎成果最丰的狩猎地。他们让加强的帆桨战船、双桅横帆船、大帆船、三桅战船[173]、适合在冬末或者春季波涛汹涌的海上艰难地航行的海上行劫帆船等川息不流地驶向东方。理由始终是同样一个:对海上行劫者来说,东部地中海是猎物丰盛的大海。这些猎物可以在希腊群岛的海域中找到,甚至可以在罗得岛和亚历山大之间的航线上找到更多。这条航线是进香朝圣者、香料货船、丝绸、木材、大米、小麦、糖……的航线,猎物当然丰富,但也守护很严。每年春初,土耳其人派出他们的警卫帆桨战船巡弋。这些战船用于保卫他们的船只甚于用于保卫他们的海岸。

将近这个世纪中叶,在东方积极活动的,只有马耳他的帆桨战船、几艘托斯卡纳的帆桨战船和一些像热那亚人哲加拉的大帆船那样的海上行劫帆船。这艘大帆船1561年丧失作战能力。[174]此外还有1艘像总督自己1559年武装起来的大帆船,或者像前一年约瑟夫·桑托船长[175]装备的那艘荷兰圆头帆船那样的西西里船在到处航行。这个船长在阿列西奥掳获1艘价值1.5万杜卡托的土耳其船后,迫于恶劣气候逃到威尼斯人那里。威尼斯人立刻没收了这艘船。是这些事件使我们了解到有这艘船。1559年,1艘托斯卡纳帆桨战船“路帕”号和安德烈·多里亚的1艘荷兰圆头帆船都轻率、冒失地出航。后者被罗得岛的守备部队捕获;前者经过很多迂回曲折,历尽艰险之后,终于筋疲力尽,落入塞浦路斯的威尼斯人的网中。[176]西方对威尼斯市政议会的这种准土耳其式的行径如何

激怒、义愤填膺是不难想象的。佛罗伦萨公爵据理力争说，如果所谈的那艘基督教徒的船不进入威尼斯人的港口，威尼斯人难道有权阻止这艘船前去同非基督教徒进行斗争吗？大海难道不是属于众人的吗？[177]可怜的威尼斯人！与此同时，土耳其人难道没有责备他们未能控制住地中海西部的人吗？[178]土耳其人进行报复往往言之在先，并且往往言必信，行必果，威胁着所有在东方的和平的基督徒旅客和商人。[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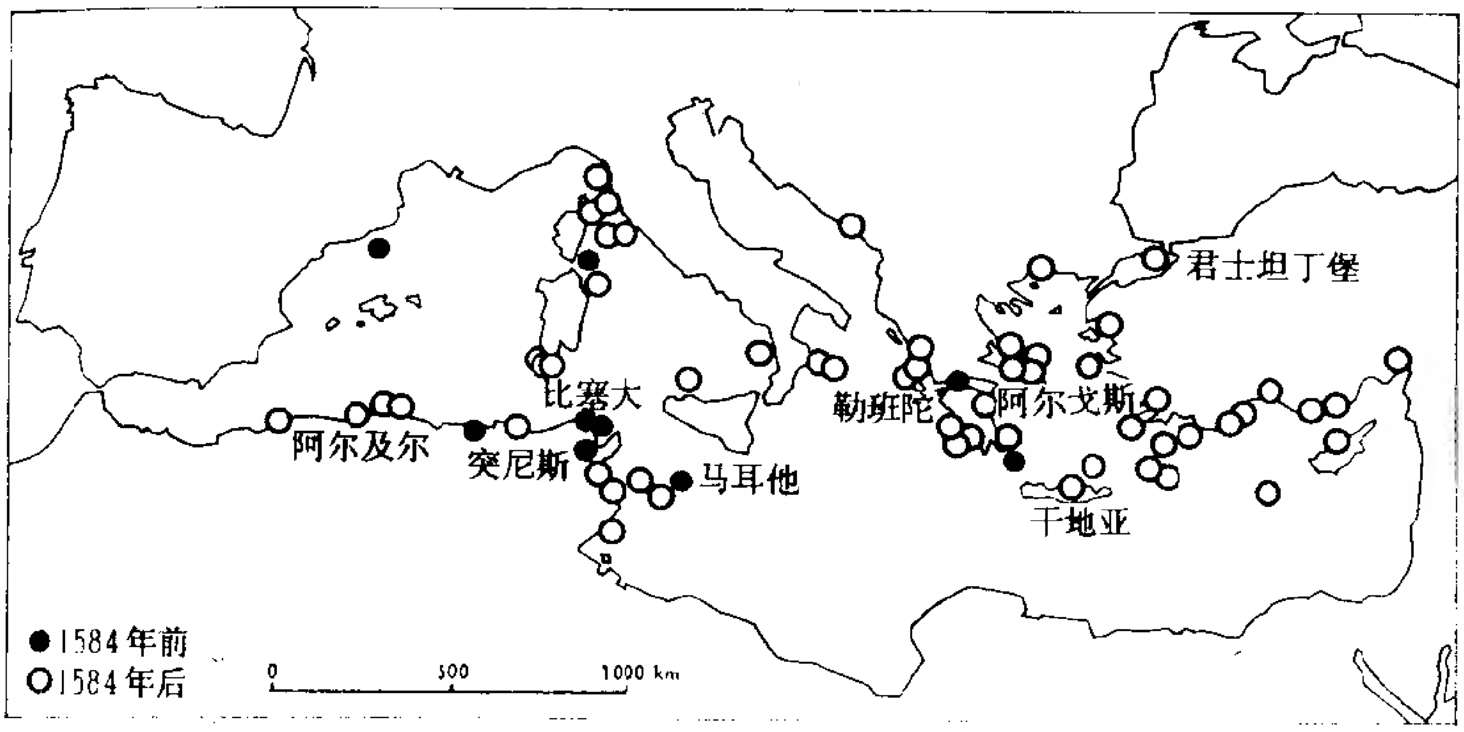


图 64　托斯卡纳的海上行劫活动

本图根据 G. G. 瓜尔尼埃里的著作（见其被引用著作第 336—337 页）绘制。本图显示在 1563 年和 1688 年之间这段时期圣艾蒂安骑士团的托斯卡纳帆桨战船的重大行动和战绩。人们不过分深入研究这张统计表也会看出这一点：在 1584 年以前，托斯卡纳的海上侵袭活动地区主要是地中海西部而不是地中海东部；在 1584 年以后，这种活动遍及整个地中海。

这个世纪中叶，西方最胆大的海上行劫者是马耳他骑士团。在将近 1554 年和 1555 年之间这个时期，这个团体由瓦莱塔率领；[180]将近 1560 年时由罗梅加斯率领。1561 年，罗梅加斯在尼罗河口掳获奴隶 300 名和满满几船货物。[181]1563 年，他率领两艘帆桨战船

出发、[182]随后返回帕萨罗时,[183]带回黑人奴隶和白人奴隶500名以及堆积在被他抢劫的8艘船上的货物。这些货物由被抢劫的船中的两艘运回(其余的被凿沉)。一些信函补充说:"这些掳获物既然来自亚历山大港,肯定是很丰盛的了。"1564年,罗梅加斯捕获3艘满载船桨、下脚麻、开往柏柏尔的的黎波里的"科夏尔班"船和1艘载重量为1,300萨尔马的从的黎波里开往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大帆船。这艘大帆船载有113个黑人……这艘船被带往锡拉库萨;那艘科夏尔班则被带到那不勒斯[184]……

这些年代,第二把交椅已经归于不久以后同圣约翰骑士团争夺第一把交椅的托斯卡纳人。1562年,巴西奥·马尔泰里[185]一直推进到罗得岛,在叙利亚和柏柏尔之间的海洋巡回游弋,抢走了土耳其人和埃塞俄比亚摩尔人的1艘船。后者载有给素丹的赠礼:宝石、金十字架、缴获自基督教徒的军旗和一串按照宗教仪式割下的基督教徒的鼻子。1564年,[186]圣艾蒂安骑士用4艘帆桨战船以修会会士的身份出航,进行第一次海上行劫。这几艘船驶往地中海东岸地区,在该地捕获两艘满载货物的土耳其船。毫无疑问,这张掳获物的统计表并不完全。在这个时代,地中海东岸地区还没有遭到残酷无情的劫掠。1564年初春,一份来自威尼斯的报告提到在希腊群岛海域有12艘地中海西部的帆桨战船。[187]这当然是个对之不可掉以轻心的数字。但是,在同一个时期,穆斯林的海上行劫是用二三十艘低舷长形船和荷兰圆头帆船这样大的力量来大口大口咬食西方的财富的。当时,在各方面进行的破坏的规模还不平衡。

基督教徒在黎凡特进行的破坏

相反，大约从1574年起，黎凡特被来自地中海西部的海盗侵入。马耳他骑士团实际上已经放弃了附近的柏柏尔海岸，来到东方的海面上进行远程巡弋征伐。托斯卡纳的帆桨战船的活动也明显增加。它们经常以四五艘快速和强大的战船结成队伍，高速航行，进行活动。1574年，它们进行一次从意大利到罗得岛和到塞浦路斯的往返只需要29天(8月7日从墨西拿出发，9月9日抵达卡塔尼亚)。这并不妨碍它们有时也突然侵袭西方海域，进行劫掠。托斯卡纳大公的一艘大帆船也不时出航试试运气。[188]瓜尔尼埃里那本生动的颂扬这些野蛮行径的书[189]没有叙述圣艾蒂安骑士团的从不停息的航行的全部故事。从这些航行中可以了解到很多关于土耳其海上贸易的情况。在这个海上，遍布小船、三桅帆船、双桅横帆船和西方的大帆船。这些船只穿梭往来，川流不息。保存在佛罗伦萨档案馆里的关于海上行劫的报告，是十分翔实准确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充满生动的详情细节。我们可以在这些文献资料中再次读到威尼斯人怎样驾驶他们的帆桨战船在塞里戈和塞里戈托之间横冲直撞；这时有红十字标记的帆桨战船立刻改变航向，驶往意大利，在黑夜的掩护下消失得无影无踪。[190]在别处，平安无事的直接远航可以用下面这样一行话来概述：船顺风驶出，目的地不久出现，海岬、无数在夜间闪烁的灯火或者疾驶的帆船，这些都往往是陆地就在附近的迹象。其他航行则沿海岸慢速进行，从一个淡水补给点到另一个淡水补给点。船驶入小海湾或在沙滩附近抛锚。下面对掳获物的描述简短、语气冷漠无情：发现小船1艘，旗舰为摧毁这艘

船的横桁或折断它的桅杆进行炮击，我方死亡人数、敌方死亡人数。接下去是船装载的人和物：希腊人、土耳其人、干鱼、大米数袋、香料、地毯。然后谈的是下一艘的情况。下面一句简短的话把传统的诡计说明得清清楚楚：如果敢于进入希腊群岛，“化装成土耳其人，在大陆靠岸”[191]，有时就可能不战而抓获到码头来上船的旅客。这时这些旅客还误以为基督教海盗的船是土耳其人的帆桨战船呢。海盗这个行业的惯常做法，人们也很了解：把遭到抢劫的船的主要东西搬走后，就把这些不再有用的船凿沉；残酷地拷打这艘威尼斯船的热那亚船长，在他脚上系上重物，直到他供认船上有犹太人或者土耳其人的“财产”为止；然后商定一笔赎金，[192]例如1,000埃居可用大包的丝绸（每大包重 250 磅）支付，按每磅值 1 埃居计算；或者如果可能的话，就把刚刚抢来的满载大米或者小麦的船武装起来；在这艘船配备了希腊船员后，就让它驶往西西里，祈求上帝和他的圣徒让这艘船平安到达……在某艘被搬空了的土耳其船上配备前一艘大概已被凿沉的船的希腊船员。如果船上有某个希腊东正教神父对此过分抱怨不满，他就会被毫不客气地带到马耳他岛上[193]……

历史学家要了解这些残酷无情的远征的真象，就必须重新找到关于战争和掳获物的记述，就必须计算这些独特的贸易活动的收益和亏损，就必须研究海上行劫所创造的同样奇特的市场，特别是人口买卖的市场。人口买卖是马耳他、墨西拿和里窝那等地的专营行业。一张决定支付赎金的俘虏的名单（名单上列有出生地点。这些地点包括在非斯和波斯以及和黑海之间的各个地区）[194]或者一张载明年龄和原籍的帆桨战船的苦役犯名单，都足以使人能够

估算出圣艾蒂安的海盗—骑士和他们经验丰富、思虑周密的头目大概获利多少。这些利益也可以从托斯卡纳大公在的黎波里和在阿尔及尔的对手写给他的大量信件中了解到。[195]他愿意释放某个人来换回他想要的人吗？他同意倾听阿尔诺·马米的妻子用尊敬的态度对大公夫人本人提出的请求吗？……他不管怎样会屈尊接受作为礼物送给他的马吗？

在这方面，时间的车轮已经转动。1599 年 5 艘悬挂红十字旗的帆桨战船攻下希俄斯岛要塞并在短时期内据有这个要塞。[196]圣艾蒂安骑士团的舰队更进一步于 1618 年在罗得岛附近掳获了全部运载前往麦加的香客的土耳其船只。[197]君士坦丁堡方面进行的报复是半心半意、并不认真的。1609 年，土耳其帝国政府内部有人提出要禁止去耶路撒冷朝圣进香，希望借此激起基督教世界对托斯卡纳的海上抢劫行为的愤慨。[198]当然，今非昔比，时代已经变了。托斯卡纳的圣艾蒂安骑士团和马耳他的圣约翰骑士团等被一份 1591 年的文献资料称为希腊群岛的入侵者的人，[199]并不是唯一明白这一点的人。另外一些海上行劫者强行闯入黎凡特。他们是西西里的、那不勒斯的甚至柏柏尔的海上行劫者。[200]至于那些黎凡特的人自己组成的可怕的零散小团伙，这里就不必提了。这些团伙同卫戍部队的人员勾结串通、沆瀣一气，搜刮还可能在可怜的希腊群岛上搜刮到的一点东西……如果来自威尼斯的情报正确无误的话，那不勒斯海上行劫者(在 1575 年和 1578 年之间这个短暂的间歇期内发生的穿插性事件除外)在这个世纪末之前没有大批出现。[201]仅仅在那个时期，总督才准许船只武装起来或者为公或者为私进行海上行劫。在海上行劫者中能够找到阿隆索·德·孔特雷

拉斯和两个普罗旺斯船长，对这样的事人们会感到惊奇吗?孔特雷拉斯对劫掠海岛的描述特别冷酷无情、令人难受。至于两位船长则在巴黎被认为居心叵测。[202]

另外一方面，从1574年以前起，就有一大股海上行劫者开始从西西里扑向黎凡特。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大名鼎鼎：菲利波·科罗纳、季奥瓦尼·迪·奥尔塔、雅科布·卡尔沃、朱利奥·巴蒂斯塔·科尔瓦塔和彼得罗·科尔瓦塔。他们同其他一些海上行劫者，特别同侦察黎凡特的专家、超群出众的人物切萨雷·里佐，经常出现于勒班陀。切萨雷·里佐驾乘他那艘轻便的、张挂着过多风帆的三桅战船参加过一次大规模的战斗。他从这场战斗中带回一只土耳其人在上一年的战斗中从塞浦路斯抢走的钟[203]，并把这只钟作为战利品带到墨西拿的圣尼科罗·卡尔萨教区的美惠圣玛丽小教堂。还有其他一些著名人物，例如佩德罗·兰扎。他是科孚的希腊人，是三桅战船、荷兰圆头帆船、威尼斯船和威尼斯的臣民的猎捕者。巴里和奥特朗托的总督里贝拉曾经从1576年到1577年雇佣他。[204]还有著名海上行劫者菲利普·卡尼亚达斯。1588年，他登上佩德罗·德·莱瓦的进行海上行劫的荷兰圆头帆船。佩德罗·德·莱瓦是西西里帆桨战船的将领，[205]同时也是威尼斯船只的抢劫者。

因为16世纪末整个海上行劫者的世界亟欲向圣马克共和国大兴问罪之师，找它算帐，不断抢劫威尼斯人运输的货物，威尼斯共和国的帆桨战船提高警惕，加强巡逻，但徒劳无功。有很多办法可以使威尼斯市政议会松手罢休，例如可以对威尼斯在塔朗托的商人征税等。它在佛罗伦萨或者在马德里提出的外交抗议都不大

被人理睬。它争取菲利普二世禁止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进行海上行劫，获得成功。那不勒斯人或多或少服从这项禁令。[206]西西里的百姓和总督本人却都继续从事他们有利可图的买卖。此外，菲利普二世的禁令从1578年起更主要着眼于他正在与之进行谈判的土耳其人，而不是着眼于威尼斯人。威尼斯人一再白费口舌争辩说，劫夺他们的大帆船运载的犹太人和土耳其人的货品、财物，就是破坏他们的贸易，而且影响所及，最终间接地破坏他们与之有贸易往来的西班牙的贸易。他们还说，海盗采取这些行动骚扰"没有国家的"、被从西班牙赶出后仍然自认为是西班牙国王的子民的可怜的犹太人以及谦虚的、热爱和平的土耳其商人[207]……马德里幸灾乐祸，看见威尼斯市政议会遇到困难，感到十分高兴。马德里知道这个威尼斯市政议会对西班牙居心叵测，并且认为这个机构通过它精心维护的和平或者任何其他手段大发不议之财。在黎凡特，甚至土耳其人自己也抢劫威尼斯的船只，以致海上行劫这种活动的全面高涨应该同威尼斯和同拉古萨联系起来加以仔细考虑。(拉古萨的大帆船也无法逃避对商船的检查。)有必要考虑一下，西方进行的海上行劫的成功难道不是拉古萨和威尼斯撤退到亚得里亚海的比较安全可靠的航路上的部分原因吗？这些航路远离骄横的"基督教船只""骚扰的"和"使之挨饿"的海域和岛屿。[208]威尼斯的保险率在任何情况下都很能说明问题：对通往叙利亚的航路，1611年这个保险率上升到20%；1612年上升到25%。[209]

阿尔及尔的第一个兴隆昌盛时期

在地中海的另一边,穆斯林的海上行劫活动同样兴旺。它长期以来就是兴旺的。这种活动有好几个中心。但是,它的命运全部集中体现在阿尔及尔的神奇的发展中。

从 1560 年到 1570 年,大批柏柏尔海盗,特别是阿尔及尔海盗在西地中海猖獗为害。他们之中有些向亚得里亚海或者干地亚的海岸推进……这些年代的进攻方法的特征,可能是大股海盗定期袭击,甚至是真正的舰队定期袭击。1559 年 7 月,14 艘海上行劫船驶抵安达卢西亚的尼埃尔布拉附近。[210]两年以后,它们还是 14 艘(帆桨战船和荷兰圆头船)在塞维利亚的外海,[211]在桑提·皮埃特里附近活动。8 月初,让·尼科报告说,葡萄牙的阿尔加维[212]有"土耳其式的帆桨战船 17 艘"。同一时期,德拉库特率领舰船在那不勒斯的近海活动,并且在这个海域进行的一次袭击中一举掳获西西里帆桨战船 8 艘。[213]盛夏时节,他以 35 艘帆船封锁那不勒斯。[214]两年以后,即 1563 年 9 月(因此是在收割庄稼后),他率领舰船在西西里周围海域往返游弋,不怀好意,并且两次率领 28 艘船出现在墨西拿附近海上的圣让海沟。[215]1563 年 5 月,9 艘阿尔及尔船,其中有帆桨战船 4 艘,在加埃塔附近被人发现。[216]8 月,9 艘阿尔及尔船在热那亚和萨沃纳之间出现。[217]9 月,阿尔及尔舰船在科西嘉海岸附近海域出现。[218]这次有 13 艘。9 月初,有 32 艘船在卡拉布里亚的海岸附近的海域出现。[219]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些据传大约为 30 艘、一个晚上到达那不勒斯附近并在蓬察岛附近避难的舰船。[220]也是在 9 月份,有 8 艘船在普佐尔附近海域驶过,炮击加埃

塔。[221]与此同时，25 艘帆船在伊斯基亚岛的圣天使城前面出现。[222] 1564 年 5 月，一支由 42 艘帆船组成的舰队在厄尔巴岛附近海域出现。[223]根据一封法国人的信的说法，这次甚至有 45 艘。[224]1569 年 4 月，富克沃报告说，又有 40 艘帆船沿朗格多克的海岸埋伏，窥伺意大利的帆桨战船。[225]1 个月以后，25 艘海上行劫船在西西里海岸前的海域鱼贯航行。由于它们全力以赴，猛追小船或大船，因此没有怎么袭扰和损害这个海岸。[226]。

以下的数字说明海上行劫者的袭击何等凶猛：某次海上行劫者一下子就劫夺了 8 艘帆桨战船；另外一次在马拉加附近海上劫夺了 28 艘比斯开船。[227](1566 年 6 月)仅仅一个季度，他们就在直布罗陀海峡以及安达卢西亚和阿尔加维两地的海岸抢劫了 50 艘船。[228]他们在一次对格拉纳达岛的内地的袭击中，抓获俘虏 4,000 名[229]……在这些年代，基督教徒说，海上行劫者胆大包天，不知餍足。[230]他们过去只在夜间活动，现在则明火执仗，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家劫舍。他们袭扰抢劫的范围远达马拉加的流氓歹徒聚集盘踞的地区。[231]1560 年卡斯蒂利亚的国会谈到这个半岛的海岸[232]满目荒凉、人烟皆无的景象。1563 年，当菲利普二世在巴伦西亚停留时，圣絮尔皮斯写道[233]："谈的只是马上比武、骑马长枪比武、舞会和上流社会的其他娱乐消遣；而这时摩尔人却分秒必争，不失时机，无所畏惧，一直挺进到只离这个城市 10 里的地方去抢夺船只，把能抢走的全都抢走。"巴伦西亚受到威胁，那不勒斯遭到封锁(1561 年 7 月，500 人因海上行劫者肆虐无法从那不勒斯前往萨莱诺[234])，西西里或巴利阿里群岛被包围。所有这一切都可用地理环境和位置来解释：这些欧洲南部地区都就在非洲门前，近在咫尺。

但是,海上行劫者也抵达到那时为止比较安宁的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利古里亚等地的海岸。1560 年 6 月,在维尔弗朗什附近,[235]萨瓦公爵本人险些儿没能从海上行劫者手中逃脱。在同一个 1560 年的 6 月,热那亚谷物、酒类短缺,物价腾飞,原因是:往常从普罗旺斯和科西嘉运回谷物、酒类的小船,不能冒险在海上航行,因为惧怕那 23 艘居心叵测、在海上逡巡、虎视眈眈、伺机抢劫的海上行劫船。[236]这些都并非个别事件,因为每年夏天,热那亚的领土都遭到洗劫。1563 年 8 月,轮到里维埃拉的策莱和阿尔比索拉遭殃。热那亚共和国当局致函它驻西班牙的大使绍利说:"这一切都缘于这些海上没有帆桨战船,没有一艘基督教徒的快艇在那里巡航。"[237]其结果是:无人再敢航行。次年一则菲利普二世自己批注的[238]来自马赛的报告说,阿尔及尔船 50 艘、的黎波里船 30 艘、波内船 16 艘、贝莱斯船 4 艘出海行劫(关闭这个港口的佩农岛 1564 年 9 月才被西班牙人攻占)。如果这则情报真实可靠的话,那么当时就有 100 艘船在海上进行骚扰活动。这些船中有帆桨战船、荷兰圆头船或者低舷长形船。同样一些情报员添加说:"大批可怜的基督教徒纷纷来到这个阿尔及尔……"

阿尔及尔的第二个兴隆昌盛时期

从 1580 年到 1620 年这段时期,阿尔及尔的第二个兴隆昌盛时期来临。这个兴隆昌盛时期和第一个同样引人注目并且肯定影响范围更广。阿尔及尔这个海上行劫活动的首都兼受海上行劫活动的集中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技术革新之惠。

海上行劫像它在将近本世纪中叶曾经取代过大型舰队战争一样，现在再次取代这种战争。南方岛屿被包围达数周甚至数月之久。西西里总督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 1578 年 6 月写道："海上行劫者对这个岛屿的缺少了望塔的沿海地区造成重大损失。"[239]1579 年，在卡普里附近海域，几艘柏柏尔的低舷长形船劫走西西里舰队 2 艘帆桨战船。有关方面向那不勒斯的帆桨战船发出警报；但徒劳无功。这些那不勒斯的帆桨战船同平时一样停在港里，撤除了武器装备，没有士兵，船上的划桨罪犯正忙于从商船上卸货或者忙于从事另外一种同样和平的劳作。[240]1582 年，西西里总督极其悲观地写道："海上海盗麇集"[241]，随着岁月推移，局势日益恶化。单是海上行劫活动在海的北岸附近的海域已经经久不息、司空见惯这个事实，就很能揭示出问题来。甚至遥远的加泰罗尼亚（这个地方的确特别受到骚扰）、普罗旺斯或者马赛也不能免遭劫掠。1584 年 2 月 11 日马赛市政会议[242]讨论赎回在阿尔及尔的马赛俘虏的问题。1585 年 3 月 12 日马赛市政会议决定[243]"考虑使用最迅速的办法来终止柏柏尔海上行劫者在普罗旺斯海岸进行的破坏活动"。一年过去之后，局势没有丝毫改观。1590 年冬季，马赛当局决定派遣代表前往阿尔及尔国王处商谈赎回俘虏事宜。[244]在因地理位置与非洲遥隔而在原则上本可安全无虞的威尼斯，负责外交事务的主要行政长官 1588 年 6 月 3 日选派一名驻阿尔及尔领事，其职务是专门照顾在被俘后沦为奴隶的威尼斯人。[245]

在这些恐怖的岁月里，海上行劫者比比皆是。必须在直布罗陀海峡同他们进行斗争。他们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加泰罗尼亚沿海[246]和罗马的海岸上。他们同时抢劫安达卢西亚的和撒丁的捕金枪鱼

的建网。[247]早在1579年,哈埃多就惊奇地提到"62个教士俘虏被同时关押在阿尔及尔。这样的事过去在柏柏尔一向闻所未闻"。[248]但后来却变得司空见惯了。

对阿尔及尔的第二次繁荣颇不乏解释:它首先源出于地中海的总的繁荣。我们必须重复一下这个观点:没有商船就没有海上行劫者。以下是哥德弗雷·菲希尔的著作经常表达的观点之一:地中海的繁荣和经济生活的活力,不管客观环境如何,至少一直维持到1648年以后。[249]由此得出这个结论:既然尽管敌对行动增长,繁荣局面仍然保持,因此海上行劫并没有大量报导或者大量言过其实的诉苦所断言的或者使人联想到的那种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海上行劫和经济活动是互相联系的,后者活跃上升,前者就受益迅速发展……简而言之,海上行劫是整个地中海空间的强迫交换的一种形式。另外一种解释是[250]:海上行劫是大国明显的,日益加深的衰竭无力的表现。土耳其人像西班牙人松开手放掉地中海西部的海洋一样,也松开手放掉地中海东部的海洋。让·安德烈·多里亚1601年对阿尔及尔的远征[251],只不过是一个姿态而已。最后,特别要指出这一点:阿尔及尔的活力被证明是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城市的活力。阿尔及尔和里窝那、士麦那和马赛等城市都是地中海的青春力量。当然,那里的一切都取决于海上行劫的规模和成功。甚至城市里最穷的赶驴人的口粮[252]或者由一支奴隶大军担负的街道清扫工作,尤其是建筑工地、耗资巨大的清真寺、富人的别墅以及似乎由安达卢西亚的难民的劳动完成的引水工程等,都取决于这种活动。然而,那里总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下。土耳其近卫军士兵虽然经常参加经营商业,但并非全都能发财致富。海上行劫这种主要产

业是城市的内聚力。它在港口防御方面，以及在海洋、内地和大批奴隶等的开发利用等方面都使整个城市协同一致起来。在阿尔及尔城内秩序井然。这种秩序是严格的司法秩序，并且俨然是一支驻扎在城市军营中的军队建立和保证的秩序。我想象到哈埃多在他整个一生中耳朵里都响着土耳其近卫军士兵在阿尔及尔街上行走时他们穿的钉了钉子的鞋子的声音……毫无疑问，海上行劫刺激、带动并安排其他部门，使粮食和其他商品汇集于阿尔及尔。远离这座白色的城市，一直到城市周围的群山和遥远的高原，都是一片宁静。对城市来说，随后就有了迅速的、异乎寻常的发展时期以及它的外表的和社会实际情况的变化。

从 1516 年到 1538 年，阿尔及尔是柏柏尔人和安达卢西亚人的城市，是背教的希腊人的城市，是土耳其人的城市。一切事物好好歹歹、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这是巴巴罗萨兴起创业时期的阿尔及尔。从 1560 年到 1587 年，厄尔杰·阿里统治下的阿尔及尔日益意大利化。在从 1580 年到 1587 年这段时期以后，接着又在将近 1600 年时，北欧人——英国人和荷兰人——来到这里。他们当中有个名叫西蒙·丹塞尔(Danser)[253]的人(意大利和法国文献资料中的 Dansa)，即有个 Tantzer(跳舞者)。此人真正的名字是西蒙·西蒙森。他是多德雷赫特人。英国驻阿尔及尔领事看见他 1609 年乘一艘大吨位船到来。这艘船造于吕贝克，配备有由土耳其人、英国人和荷兰人混合组成的船组。船上还有该船这一年已经拥有的 30 来个俘虏。[254]关于丹塞尔这个人的曲折多变的一生：他如何返回基督教世界、如何返回马赛(他在该地有妻室儿女)、如何进入这个商业城市的行政部门、如何被俘、如何在被俘后几年、很可能于

1616年根据台伊的命令被处决等我们对之毫无把握的详情细节,[255]都需要解释说明、讨论、研究。这是必要的吗?碧眼金发的入侵者并非空手而来。他们带来成船成船的风帆、厚木板、树脂、沥青、火药以及火炮等货物。他们也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帆船,即那些在大西洋上航行并且长期以来比伊比利亚的巨大笨拙、难于驾驶的大吨位帆船和运载金银的大帆船速度快得多的帆船。里窝那也欢迎新到者。而阿尔及尔却懂得更好地使用他们。帆船在那里取代了细长的帆桨战船和传统的荷兰圆头帆船。荷兰圆头帆船船体轻而纤细,不是因大炮、行李和自重而超载,而是因被罚划船的奴隶而超载。这些被罚划船的奴隶在必要时要忍受极大的痛苦,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划桨以保持对基督教徒的重型帆桨战船的速度优势。无从比较的被罚划船的犯人,曾经是阿尔及尔国王的主要力量。但是,现在阿尔及尔人却采用轻帆船。这种船能高速行驶和进行突然袭击。

1580年,阿尔及尔舰队可能共有帆桨战船35艘、三桅战船25艘,此外还加上双桅横帆船和小船若干艘。将近1618年,阿尔及尔舰队可能共有帆船100来艘,其中最小的可能装备火炮18门到20门。1623年英国驻金角湾的商务代表托马斯·罗爵士提供的比较可靠的数字表明,这支舰队包括帆船75艘和其他快船数百艘。从那时起,柏柏尔的海上行劫者几乎全部集中在阿尔及尔。曾经一度令人胆寒的的黎波里(将近1580年时,在意大利对出海的人的临别赠言是:“愿上帝保佑你不受的黎波里的帆桨战船伤害!”)1612年只有帆船两艘;突尼斯1625年只有帆船7艘。[256]西方的情况难道是同样的吗?在西方,西班牙人先于1610年,后又于1614

年，兵不血刃，占领了拉腊歇和马摩拉。[257]总之，阿尔及尔因为财富装得太满而爆裂了。一个葡萄牙俘虏[258]告诉我们，在1621年和1627年之间，阿尔及尔差不多有2万俘虏，其中一半属于“纯基督教徒世系”：葡萄牙人、佛兰德人、苏格兰人、英国人、丹麦人、爱尔兰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西班牙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另一半是异教徒或者偶像崇拜者：叙利亚人、埃及人，甚至日本人、中国人、新西班牙的居民、埃塞俄比亚人。每个民族当然都为这批人提供了自己的那一部分背教者……我们应该考虑到证据有欠准确之处，但不能因此而否认阿尔及尔的百衲衣使它的颜色倍增。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者遍布海上。他们的城市从此以后就具有支配整个地中海的能力了。1624年，阿尔及尔人抢劫亚历山大勒达，在该地掳获船两艘，其中一艘是法国船，另一艘是荷兰船。[259]此外，更有意义的是，他们驾船驶出直布罗陀海峡，1617年抢劫了马德拉，1627年抢劫了冰岛，1631年到达英国（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260]从那时起，他们就在大西洋上（特别从1630年到1640年）进行劫掠。[261]穆斯林的海上行劫活动和在大西洋上的海上行劫活动结合起来……据说是别号西蒙·海伊斯的西蒙·丹塞尔本人可能从1601年起教会阿尔及尔人怎样迅速通过难于通行的直布罗陀海峡。[262]

能够作出结论吗？

这份关于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活动的材料概括得不好，不能使人作出任何不容置辩的结论。在我这方面，我倾向于把阿尔及尔的这种活动同仍然远非健康的地中海的总的经济形势联系起来。哥德弗雷·菲希尔富有创新精神的著

作并不反对这一点,而是正好相反。但是,他不无理由地使问题复杂化了。在他看来,总的说来,穆斯林的海上行劫,特别是柏柏尔人的海上行劫,所起的破坏性的、在西方人心目中是邪恶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基督教世界的反对者同这个世界的保卫者和仆从一样,都常常心怀好意、行动真诚。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公正的"裁判"会评定基督教世界的反对者不对。但是,历史却习惯于拒绝公正的裁判。指出以下这一点是必要的:我和我的英国同行一致认为: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海域里进行的海上行劫活动被过分高估了。我们过分注意倾听基督教世界海岸居民的抱怨、诉苦和论点。历史学家作结论有时过分仓促。

海上行劫并不是上帝给予大海的繁荣的天罚。G.菲希尔为了更好地证实他的结论,想修改我们的数字。对他来说,100 艘阿尔及尔帆船似乎太多。事实上,我们也并不知道准确的数字,尤其不知道这个数字随着岁月的推移发生的变化。但是,这些帆船吨位很小,并且为了速度而牺牲了火力,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263]这些帆船的所作所为往往只不过是攫取食品,从别的船上抢劫一两桶纽芬兰或者别处的鱼而已。1613 年它们在英吉利海峡出现时,是它们的新奇性能,而不是它们的实际危险对人产生了强烈的印象。[264]它们在那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对人造成的创伤只不过一些针刺的小孔而已。

我们能够让自己被这种解释说服吗?也能够也不能够。能够,因为我们已经太快地而且片面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能够,因为阿尔及尔的情况不仅仅是伊斯兰世界或者北非的奇异现象,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和国际性的奇异现象。不能够,因为在 G.菲希尔使用

的证据之外的一些别的证据让人听到另外一种说法。一些像阿尔贝托·泰嫩蒂所作的研究那样的深入细致的研究，[265]为我们及时修复了一幅进行残暴劫掠的海上行劫者麇集的海洋的图画。他对在1592年和1609年之间这段时期离开或者进入威尼斯的船只所作的调查，显然并不能用之整个地中海而皆准。但是，既然威尼斯在海上行劫这种活动中拥有成为众矢之的的特权，这项调查也就不仅仅具有严格的地方意义了。在这个短短的时期之内遭到抢劫而且我们也可以在地图上确定其被劫地点的250艘到300艘船的被劫案件中，我们确知90起的罪犯。穆斯林海上行劫者抢走船只44艘；北欧海上行劫者（英国的和荷兰的）抢走24艘；西班牙海上行劫者抢走22艘。基督教徒进行的海上行劫的次数和穆斯林进行的海上行劫的次数大体平衡。除了250到300艘船被掳获外，还有沉船事件360起。因此，人的为害程度和海上风暴的为害程度几乎相等。[266]……如果不过分相信但又承认威尼斯的贸易约为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十分之一的话，那么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在从1592年到1609年的18年内，就有2,500艘到3,000艘船被海上行劫者掳获，即平均每年有138艘到166艘船被海上行劫者掳获（在海岸上被抢劫的人、商品和其他财富不计算在内）。这倒也并不是个什么惊人的数字。但是，我们既不要过分相信这些没有把握的数字之小，也不要过分相信海上行劫者的舰队的装备之差。[267]海上行劫者的舰队的装备足以战胜在小船过多但治安很差的海上所作的任何抵抗。此外，海上行劫就是强行登船，就是白刃格斗，使用刀、剑、火枪多于使用大炮。如果纯粹用船的吨位大小和武器装备作为标准对乌斯科克人的小船进行评价和鉴定，那么就会永远也

想象不到这些小船曾经对任何人都是一种危险和威胁，而它们也的的确确是一种危险和威胁。

显然，最主要之点仍然是海上行劫和地中海的经济生活之间的积极的相互关系。我们要强调指出：这种相互关系是积极的。它们同时兴起上升，同时衰落下降。有时海上行劫之所以很少冲击和平的贸易，这可能是因为供抢劫的物品很少。这个现象可能与贸易的总的衰退相吻合。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具有数字，而我们正好还缺乏数字。对进行海上行劫的船只的总数、被抢劫的货物的数量、俘虏的总数，我们都缺乏确切的概念。这些数字似乎在增大。

赎回俘虏

在基督教世界里到处都在创设赎回俘虏的机构。众所周知，富人安排他们自己的赎救事宜。1581 年，罗马教廷作出了榜样。格里哥利十三世创设了赎救奴隶圣慈善会，并使之附属于古老的、积极活动的罗马的大旗手协会。有关赎救第一批俘虏的事宜的谈判于 1583 年举行。第一个使团 1585 年 2 月到达阿尔及尔。[268]1596 年在西西里建立了赎救俘虏协会。这个机构的总部设在巴勒莫的新圣玛丽亚教堂。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旧有的、曾经在 15 世纪起过作用的机构的恢复而已。[269]1597 年 10 月 29 日，[270]在热那亚建立了积极进行活动的赎救奴隶行政管理处。这个机构也是一个可以追溯到 1403 年的机构——慈善事业管理处——的后续。还必须为这些暂时没有公民权的俘虏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和法庭。这些俘虏在某种程度上暂时被褫夺了公权。当他们返回家园时就遇到一些棘手得难以置信的需要解决的处境问题。他们失踪

时间太长，并且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因此，悬而未决的事留下得太多，以致他们的家庭不得不进行活动，让有关方面为他们的失踪立下正式文书。与此同时，"俘虏部"在它那方面，也插手干预，以保护失踪者的权益和财富。对那些想使有关这些关押监禁的史实清楚明白起来，而不是对生动的叙述感兴趣的人来说，保存在热那亚的长长的一系列文件是个多么丰富的文献资料的来源啊！

拯救俘虏是件好事。但是，首要的是必须拯救他们的灵魂。每个修会都积极热情地从事这项重大的工作。还必须在赎回俘虏这个合情合理的借口下进入柏柏尔，必须和慈善组织进行合作，达成协议，取得通行权，从罗马、西班牙、热那亚或者从其他一些地方取得适当的、相应的施舍、钱款。阅读嘉布遣会修士弗拉·安布罗西奥·达·松西诺1600年12月7日从马赛致在热那亚的赎救行政管理处的一封信，会对这些困难的谈判有个大概的了解……嘉布遣会修士和加尔默罗会修士分担精神方面的工作。前者在阿尔及尔进行；后者在得土安进行。但是，为取得通行权的谈判是没完没了的，"对拯救灵魂来说，时间是需要的，因为人们追求的只是这个，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271]

由于有这些赎救活动以及这些人同商品的交换，一门新的市场和贸易地理学出现了。赎救者的频繁来去旅行次数成倍增加。他们的船只装载硬币或者商品。一切都正式经过保险。[272]在阿尔及尔，自1574年以来，一切都在法国领事馆进行登记。从1574年起，突尼斯的情况与此相同。将近1600年，泰拜尔盖岛[273]是另一个对突尼斯和比塞大方面进行工作的赎救活动中心。被赎救的人返回时，人们举行盛大仪式并且有游行和赦免等活动。早在1559年[274]，

一队获释的俘虏在里斯本城里散步，把黑面包系在他们的手杖的顶端，这是他们在苦役犯监狱中唯一的粮食……捕获俘虏、谈判释放俘虏事宜和释放俘虏等活动，不可避免地使一张联系网建立起来。海上行劫这种活动的相互性，最后产生一种极为错综复杂的局势。一份发自法国驻突尼斯领事馆的文件[275]提到一个撒丁岛的教士。他是海伊斯马米·阿尔诺的妻子的奴隶，而马米·阿尔诺本身又是西班牙国王的奴隶。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使交换即使不能迅速进行，至少可能进行。

另外一方面，由于苦役监狱人满为患，越狱事件增多。我们已经注意到菲利普·罗马诺的帆桨战船的事迹。菲利普·罗马诺是巴伦西亚人，他为阿尔及尔的苦役犯偷渡布设了一条几乎是官方的逃跑路线。苦役犯自己组织集体逃跑和越狱的事已经屡见不鲜。[276]某次他们偷来一艘低舷长形船。另外一次，他们偷到一艘帆桨战船，驾船出海后就只好听天由命了。这是这些不幸生活中比较使人感到快慰的枝节之一。逃跑之所以容易，主要是由于进行走私活动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通婚生下的混血儿的人数增加。这种混血儿住在两个世界的交界处。这个交界地区处在友好的联合之中。如果国家没有在那里维持某种程度的礼仪的话，这种友好的联合还会更加明显。与敌对集团友好，可能是宗教信仰改变的结果，也可能(虽然这不是最高贵的事业，但却是最广泛的事业)是进行贸易交流的结果(不管在赎回方面或者商品方面)。在君士坦丁堡，赎救活动是意大利背教者的特别活动领域；在阿尔及尔，这是科西嘉角水手的特别的活动领域。这些水手对海伊斯和苦役犯监狱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十分熟悉。他们有时是珊瑚采集者，是蜡、羊毛和毛

皮的运输者。在突尼斯赎救活动几乎是法国领事垄断的事业。法国领事受到指控要想让谁获释就能使谁获释，并且在受贿之后保证使某个俘虏不会获释，永不返回。[277]在赎救活动中充当中间人的犹太人到处都可以遇到。

从事这些活动都有利可图。一个受审问的热那亚商人说，在阿尔及尔进行不正当的交易可以稳获30%的利润。因此，在西班牙，不得不多次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把被取缔的商品带到阿尔及尔和购买盗窃来的商品[278]或者海上行劫者出售的商品均在禁止之列。但是，这类商品很容易在意大利和里窝那找到买主。这些联系在17世纪仍然存在。有人叙述说，[279]1621年，一艘葡萄牙人的大帆船被海盗掳获。这起劫船事件使一批可使"整个意大利发财致富"的钻石落入阿尔及尔海伊斯手中。土耳其人对珠宝很不内行，贱价出售了这批钻石……这里，我们只不过对这些每天进行的、不引人注目的交易稍有觉察而已。突尼斯和阿尔及尔一样，是走私交易的会合处。也许那里的走私交易还更加活跃。一个西西里的历史学家说，[280]突尼斯是发展中的上海。他这样说肯定是正确的。

一种战争驱赶、取代另一种战争

因此，当人们说1574年战争在地中海终止这句话时，必须确切说明这指的是什么样的战争。大规模的、正规的、被大国用来进行扩张的、用巨额费用维持的战争，的确已经终止。但是，进行这种战争的有生力量，即已经变得不足的报偿和薪饷无法使之再依恋舰队生活的人(1558年，这个事实没有逃脱目光敏锐的威尼斯人、海湾的

船长菲利波·帕斯加利戈的眼睛),却因为这种战争的消除而闯荡江湖,从事冒险活动。帆桨战船的水手、有时甚至本身逃离舰队的帆桨战船、士兵或者在正常情况下会当兵的人、野心或大或小的冒险家等,全都被再度卷入正在陆上或者海上进行的小规模的战争。一种战争驱赶另一种战争并取而代之。官方进行的大规模的、高级的、复杂的、现代的、耗资巨大的战争席卷欧洲和大西洋。因此,在地中海只进行次等的和小规模的战争。地中海的社会、经济和文明不得不尽量适应这些战争,即陆上的游击战和海上的劫掠战。老实说,这些战争在此点燃了种种力量、悔恨、恶意、报复和复仇……土匪战争也似乎预先耗尽了一场未爆发的社会战争。海盗战争燃起了在别的时候会煽动人们进行一次十字军东征(或者一次圣战)的狂热激情:圣战也好,十字军东征也好,除了疯子和圣徒以外,无人对之感兴趣。

随着和平的普遍恢复(1598 年、1604 年、1609 年),大规模的正规战争离开了北欧和大西洋,转而把它的威胁、图谋和梦想投向地中海……这种战争会再度爆发吗?不。奥苏纳公爵和西班牙发动的对威尼斯(1618—1619 年)的那场流产的战争,提供了一次方便的验证。这场战争没有发展演变为广泛的冲突,这或许证明地中海不再能够支撑这个负担,即付不起这笔巨大的代价。但是,地中海并没有因此而从战争中解脱出来。

论述进行到这个地步,我们的结论定会是悲观的。如果 16 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人类侵略史既不是虚构的谎言也不是幻觉的话,那么,战争就通过它自身的变化、更替、伪装、复活和退化,再度肯定和表明它的永恒的性质。"战争是万事之父。"这句古老的格言

16 世纪的人很熟悉。战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子，是万源之河，无岸之海。战争是万物之父，但不是人们朝思暮想的、极少得到的和平之父。每个时代都产生它自己的战争，甚至它自己的各种类型的战争。对地中海来说，在勒班陀战役之后，官方进行的大规模的战争完结了。这种战争从此向北、向西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并且在即将到来的几个世纪内停留在这些地区。世界的心脏在这些地区跳动。这次转移本身比任何一篇长篇演说、一次长时间的辩论都更好地表明和强调了地中海已经退出舞台的中心。1618 年，当三十年战争的战火最初点燃时，大规模的战争重新开始，但这已远离地中海了。内海不再是世界上风雷激荡、动乱不已的心脏地区了。

图 65 被俘基督徒被押解前往君士坦丁堡

据 1639 年 S. 施魏格的绘画。

本部分原注

1. A. d. S. Modène, *Venezia* 15, 77. VI. 104, J. Tebaldi au Duk, Venise, 16 août 1522.

2. Jose ARANTEGUI Y SANZ, *Apuntos históricos sobre la artilleria española en los siglos XIV y XV*, 1887; Jorge VIGON, *Historia de la artilleria española*, tomeI, 1947. Décadence des fonderies de Málaga? Cependant voir Simancas E° 499, Cobre entregado al mayordomo de la artilleria de Málaga, 1541-1543. Sur Málaga et son arsenal vers le milieu du siècle, Pedro de MEDINA, *op. cit.*, p. 156.

3. Les historiens italiens ne marquent-ils pas trop volontiers la décadence des fonderies de Milan? L'expédition des pièces se faisait tantôt par Gênes (surtout arquebuses et armes blanches, 30 août 1561, Simancas E° 1126) ou par le Pô et Venise (artillerie chargée à bord d'une nave portugaise pour Messine. Venise, 25 avril 1573, Simancas E° 1332).

4. Cf. un curieux texte de 1587 que je compte publier sur la tentative anglaise contre Bahia, A. N., K. Pour la place, des pièces nordiques en Espagne, 1558, E. ALBÈRI, *op. cit.*, VIII, p. 259.

5. Nobili au Prince, mardi 6 juin 1566,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7 *bis*. Bien entendu des Flandres arrivent aussi les autres armes et notamment les arquebuses, témoin ce navire venu des Flandres, chargé d'armes pour les présides et qui est enlevé en deça du détroit de Gibraltar par les corsaire d'Alger, l'évêque de Limoges à la Reine, 24 août 1561, B. N., Paris, Fr. 16 103 "…depuis dieu qermis qu'un bon et fort navire venu de Flandres pour munir tous les fortz de Barbarie d'armes a esté combattu et gaigné après avoir passé le destroict ou il s'est perdu cinq ou six mille harquebuzes, corselets, pistoletz et autres sortes d'armes offensives…."

6. Voir note précédente. Mediceo 4897 *bis*.

7. *Op. cit.*, I, p. 167, 4 janv. 1567.

8. D. Francisco Sarmiento au Grand Commandeur de Castille, Rome, 28 sept. 1565, *CODOIN*, CI, p. 112-114. L'opinion rapportée est celle du Grand Maître de Malte.

9. F. C. LANE, *op. cit.*, p. 31-32.

10. E. Albèri, *op. cit.*, III, V(Matteo Zane), p. 104(1594).

11. Le succès des Tures y est dû à une concentration d'artillerie sur la ligne de combat.

12. Les Perses craignent l'artillerie et les arquebuses turques, J. Gassot, *op. cit.*, p. 23; "…car n'usent guère de bastons à feu…"

13. Georges Pagès, in: *Rev. d'hist. mod.*, 1932, p. 114.

14. Relatione fatta alla Maestá Cattolica in Madrid alli XV di luglio 1571… B. N., Paris, Oct 1533, f[os]109 à 124.

15. Voir pour le début du règne de Philippe II *l'asiento* à demi-solde pour les galères toscanes (Simancas E° 1446, f° 107), une galère reçoit par mois 250 ducats, à onze réanx d'argent le duecat. Pour le prix de construction, Relacion de lo que han de costar las XV galeras que V. M. manda que sé hagen en el reyno de Sicilia este año, 1564, Sim. E°1128; pour 15 galères on arrive à un total arrondi de 95 000 eseudos, sans compter les armes à distribuer aux mariniers. Ce prix est représenté comme très avantageux par le rapport que nous mettons en cause. Relevons que le corps brut de la galère, représente moins de la moitié du prix de revient, l'autre moitié étant représentée par les voiles, les rames, les antennes, les arbres, les cordages, les chaînes, les fers, les récipients, les bêches et autres outils de bord, les barils, le fil pour coudre les voiles, le suif pour espalmer…Sur un total, répétons-le, de 95 000 écus, les corps des 15 galères représentent 37 500, les cordages 9 000, les voiles presque 20 000, les arbres et antennes, 3000, les rames 2 900, l'artillerie 22 500. On laisse ainsi dans ces calculs de côté le prix d'achat des forçats ou des esclaves. C'est là, avec les indispensables ravitaillements en biscuits, la grosse dépense d'entretien. Sur les 22 galères de Sicile, il y a en mai 1576, 1102 forçats, 1517 esclaves, 1205 rameurs volontaires; en mai 1577, les chiffres en décrue sont respectivement de 1 027, 1440 et 661 (Simancas E° 1147), ce qui fait à la rame, par galère, dans le premier cas 173 hommes, dans le second 143. Or il est des galères renforcées. La galère d'un petit-fils de Barberousse (7 oct. 1572, SERRANO, *op. cit.*, II, p. 137) compte 220 esclaves. Aux chiourmes s'ajoutent les officiers, équipages et infanterie. En août 1570, pour 20 galères napolitaines, on compte un effectif total de 2 940 hommes, soit en gros un effectif de 150 hommes par galère. Donc chaque galère représente au moins 300 hommes entre forçats, mariniers et soldats. En 1571-1573 avec quelque 500 ou 600 galères, d'Islam ou de Chrétienté, c'est

de 150 à 200 000 hommes que la guerre des escadres fait voguer, sans compter ceux qu'elle immobilise à terre, dans les ports et les arsenaux. Pour une étude des prix de revient, signalons les admirables ressources de l'Archivio di Stato de Florence et notamment: Nota di quel bisogna per armar una galera atta a navicare, Mediceo 2077 f° 128. Voir aussi Mediceo 2077, f° 60.

16. Voir note précédente.

17. Simancas E°, 1141.

18. Voir ainsi le traitement des gitans espagnols emmenés sur les galères non pour leurs délits, mais *por la necessidad que havia de gente por el remo*..., Don Juan d'Autriche à Philippe II, Carthagène, 17 avril 1575, Simancas E° 157, f° 11.

19. MOREL FATIO, *L'Espagn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op cit.*, p. 218 et *sq.*; Nicolas SANCHEZ-ALBORNOZ, "Gastos y alimentación de un ejército en el siglo XVI segun un presupuesto de la época", *in*: *Cuadernos de Historia de España*, Buenos Aires, 1950.

20. Voyez encore les curieuses interprétations possibles de la politique d' Élisabeth vis-à-vis du Sultan, elle ne veut pas avoir trop l'air de pactiser avec les ennemis de la Chrétienté, W. A. R. WOOD, *op. cit.*, p. 27.

21. L. DRAPEYRON, *art. cit.*, p. 134. Sur toutes ces questions, G. de VAUMAS, *op. cit.*, p. 92 et sq.

22. W. E. D. ALLEN, *Problems of Turkish Power in the XVIth Century*, Londres, 1963.

23. Voir *infra* p. 218-219.

24. *Op. cit.*, IX, p. 138.

25. Giuseppe Cappelletti, *Storia della Republica di Venezia*, VIII, p. 302 et *sq.*

26. H. Kretschmayr, *op. cit.*, III, p. 74.

27. Relation d'Andrea Giustinan°, 1576, B. W., Paris, Ital. 1220, f° 81.

28. *Ibid*, f° 69.

29. *Ibid*, f° 34 v° et 35.

30. *Ibid*, f° 25 v°.

31. *Ibid*, f° 39. et *sq.*

32. B. W., Paris, Ital. 427, f° 274, 1569.

33. A. Morel Fatio, *in*: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t. XXXIX, 1911, p. 12 et *sq.* du tirage à part. Tentative aussi vaine, cinq ans plus tôt, à Coron, en Morée.

34. Fernand GRENARD, *Grandeur et décadence de l'Asie*, p. 77.

35. Carlo SCHALK, *Rapporti commerciali tra Venezia e Vienna*, Venise, 1912, p. 5.

36. X. de Salazar à S. M., V. 24 mars 1582, Simancas E° 1339.

37. P. de CANAYE, *op. cit.*, p. 181.

38. Pour tout ce paragraphe se présente à nous l'énorme et pas toujours saisissable littérature relative à la Hongrie. A. LEFAIVRE, *Les Maggyars pendant la domination ottomane en Hongrie* 1526-1722, Paris, 1902, 2 vol. Des livres allemands récents en partie orientés par des préoccupations actuelles, Rupert von SCHUMACHER, *Des Reiches Hofzaun, Gesch. der deutschen Militärgrenze im Südosten*, Darmstadt, 1941; Roderich Gooss, *Die Siebenbürger Sachsen in der Planung deutscher Südostpolitik*, 1941 (politique et détaillé); Friedrich von COCHENHAUSEN, *Die Verteidigung Mitteleuropas*, Iéna, 1940, partial et sommaire; G. MÜLLER, *Die Türkenherrschaft in Siebenbürgen*, 1923; Joh. LOSERTH, "Steiermark und das Reich im letzten Viertel des 16. Jahrhunderts", *in*: Zs. d. hist. Ver. f. *Steiermark*, 1927, au sujet de la mission de Friedrich von Herberstein allant, en 1594, demander secours au Reich, contre les Turcs. Sur la vie religieuse et la pénétration du protestantisme, une abondante bibliographie que l'on trouvera résumée au t. III du *Manuel* de K. BIHLMEYER, p. 69; *Mémoires de Guillaume du Bellay*, *op. cit.*, II, p. 178. Les soldats hongrois formant de la cavalerie légère "auxquels on donne parfois le nom d'Hussirer sont considérés par les Allemands comme des demi-barbares...", G. ZELLER, *Le siège de Metz*, Nancy, 1943, p. 15. Sur le ravitaillement de la guerre de Hongrie, Johannes MÜLLER, *Zacharias Geizkofler 1560-1617*, Vienne, 1938.

39. F. von COCHENHAUSEN, *op. cit.*, p. 86-87.

40. *Op. cit.*, II, p. 82 et *sq.*

41. *CODOIN*, CI., 7 juin 1567, p. 229.

42. FOURQUEVAUX, *op. cit.*, I, p. 239, 17 juillet 1567.

43. L. ANQUEZ, *Henri IV et l'Allemagne*, p. XXI-XXIII.

44. *Ibid.*, p. XXII.

45. A. RENAUDET, *L'Italie...*, p. 12.

46. Rosario PENNISI, "Le Mura di Catania e le loro fortificazioni nel

1621",*in*:*Arch. st. per la Sicilia Orientale*,1929,p. 110.

47. *Arch. st. it.* ,t. IX. p. 34.

48. Simancas E° 1056 ,f°30.

49. G. CAPASSO,"Il governo di D. Ferrante Gonzaga in Sicilia dal 1535 al 1543",*in*:*Arch. st. sic.* ,XXX et XXXI.

50. G. LA MANTIA,"La Sicilia e il suo dominio nell'Africa settentrionale dal secolo XI al XVI",*in*:*Arch. st. sic.* ,XLIV,p. 205,note.

51. Hans HOCHHOLZER,*art. cit.* ,p. 287.

52. L. BIANCHINI,*op. cit.* ,I,p. 259-260.

53. Milan,31 juil. 1546,B. N. ,Paris,Ital. 772. f° 164 *et sq.*

54. *Ibid.* ,f° 164 v°.

55. *Ibid.*

56. Simancas E° 1050,f° 136,3 déc. 1560,et E° 1052,f° 10.

57. *Arch. st. it.* ,t. IX,p. 248;Simancas E° 1051. f° 68.

58. 2 mai 1568,Simancas E° 1132;1576,Simancas E°1146,la question est toujours à l'ordre du jour.

59. G. La Mantia,*art. cit.* ,p. 224,note 2.

60. L. Bianchini,*op. cit.* ,I,p. 55.

61. Après quélle eut été saccagée par les Turcs,31 janv. 1560,Simancas E° 1050,f° 14.

62. 26 févr 1559,Simancas E° 1049,f° 91.

63. Fourquevaux au courant,29 déc. 1565,Fourquevaux,*op. cit.* ,I,p. 36.

64. G. C. Speziale, *Storia militare de Taranto*,Bari,1930.

65. 10 janv. 1560,Simancas E° 1050,f° 9;*Ordenanzas de la milicia de Napoles*(1563),imp. ,Simancas E° 1050,f° 54.

66. Simancas E° 1050,f° 43 (18 mai 1560);dispositions analogues en 1561,Simancas E° 1051,f° 52(5 avril 1561).

67. E. ALBÈRI,*op. cit.* ,II,V,p. 483.

68. Voir ainsi un relevé des garnisons côtières à Naples en mai 1567, Simancas E° 1056, f° 67; en Sicile, en 1583 ou 1585, Simancas E° 1154.

69. V. LAMANSKY, *op. cit.* ,p. 600-601.

70. 31 mars 1563, référence d'archive égarée.

71. A. de CAPMANY, *op. cit.* ,IV, appendice p. 84,20 juil. 1556.

72. 29 août 1536,A. N. ,K 1690.

73. P. B. ,"Tours de guet et tours de défense. Constructeurs de tours ", *in*:*Petit Bastiais*,19 juin- 14 juil. 1937.

74. K. HÄBLER,*Gesch. Spaniens*, t. I,p. 26-27.

75. 31 mars 1559,Simancas E° 137.

76. *CODOIN*,II,p. 183.

77. *CODOIN*,XXXI,p. 162,165,169. J. O. ASIN,articles *in*:*Boletin de la R. Academia Española*, 1928, XV, p. 347-95 et 496-542 et *Bulletin Hispanique*,XXXV,1933,p. 450-453 et XXXIX,1937,p. 244-245. Cf. également Mariano ALCOCER MARTINEZ, *Castillos y fortalezas del antiguo reino de Granada*,Tanger,1941;A. GAMIR SANDOVAL,*Organización de la defensa de la costa del Reino de Granada desde su reconaista hasta finales del siglo XVI*,Grenade 1947.

78. Relacion de todas las costas del Reyno de Cerdaña(s. d.),Simancas E° 327,document d'une extrême importance,postéricur à 1574.

79. Francesco CORRIDORE,*op. cit.* ,p. 18.

80. F. PODESTÀ,*op. cit.* ,p. 18.

81. 20 mars 1579,A. d. S. Gênes L. M. Spagna 8 2417.

82. Fernand BRAUDEL,"Les Espagnols et l'Afrique du Nord",*in*:*Revue Africaine*,1928;"Les Espagnols en Algérie",*in*:*Histoire et Historiens de l'Algérie*, 1930. Depuis cet article, une seule contribution d'ensemble, Robert Ricard,"Le Problème de l'occupation restreinte dans l'Afrique du Nord (XV^{e}-XVIII^{e} siècle)",in:*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1937, p. 426-437.

83. Juan Baptisth Antoneli à Eraso,Mers el Kebir,29 mars 1565,Simancas E° 486. En conflict avec F. de Valencia,F. de Valencia au Roi,Mers el Kebir,8 févr. 1566,Simancas E° 486.

84. Sur les fortifications de la Goulette,Alonso Pimentel au Roi,29 mai 1566,Simancas E° 486;9 juin 1565,*ibid*,;Luis Scriva au Roi,7 août 1565, *ibid.* ,la fortification "va de tel arte que a bien menester remedio"Philippe à Figueroa,5 nov. 1565,Simancas E° 1394, il a décidé de fortifier la Goulette, emprunte 56 000 écus à Adam Centurione;Fourquevaux au courant,21 déc, 1565,annonce le départ du Fratino et de charpentiers *op. cit.* ,I. p. 10 et 19;*lo que se ha hecho en la fortificacion de la Goleta*;*Instruction sopra il disegno della nova fabrica della Goleta*,1566,Simancas E° 1130;Philippe II à D. Garcia de Toledo, Madrid, 16 février 1567, ordre de remettre 50 000 écus à

Figueroa pour les envoyer aussitôt à la Goulette, Simancas E° 1056, f° 88; Fourquevaux, 30 sept 1567, *op. cit.*, I, p. 273.

85. El Fratin au Roi, La Goulette, 5 août 1566, Simancas E° 486.

86. 20 mai 1573, Simancas E° 1139.

87. Voir *infra*, III[e] partie, chapitre IV.

88. Vespasiano Gonzaga à Philippe II, Oran, 23 déc. 1574, , Simancas E° 78, voir sur son retour, B. N., Paris, Esp. 34, f° 145 v°; Mediceo 4906, f° 98; consulte du Conseil d'État, 23 févr. 1575, E° 78 (ou le repli sur Mers el Kebir ou la fortification d'Arzeu).

89. Sur les travaux d'Oran et de Mers el Kébir, Diego SUAREZ, *op. cit.*, p. 27-28 (en 30 ans les fortifications d'Oran ont coûté 3 millions), p. 148-149, 209, 262.

90. Le fait bien vu par E. PELLISSIER de RAYNAUD, "Expéditions et établissements des Espagnols en Barbarie", *in*: *Exploration scient. de l'Algérie*, t. VI, 1844, in-8°, p. 3-120. Cf. aussi B. N., Paris Ital. 127, f°72.

91. Relacion de lo que se hizo en la isla de los Querquenes, Simancas E° 1146.

92. Relation de todos los puertos de Berberia que deben de ganarse y fortificarse, Simancas E° 1339.

93. *Ibid.*

94. Relacion de lo que monta el sueldo de la gente de guerra que se entretiene en las fronteras de Africa, Simancas E° 486.

95. B. N. Paris, Dupuy 22.

96. Philippe II à Peralte Arnalte Escorial, 7 nov. 1564, Simancas E° 144, f° 247.

97. En 1525, la dépense totale des présides estimée à 77 000 ducats, E. Albèri, *op. cit.*, I, II, p. 43, En 1559, l'entretien estimé très lourd sans plus, E. Albèri, *op. cit.*, I, II, p. 345.

98. Simancas E° 1051, f° 170.

99. Où le chiffre est variable: 2826, avril 1571 Simancas E° 1060, f° 128; 3297, 11 mai 1578, Simancas E° 1077.

100. *Art. cit.*, *supra*, II, p. 181, note 1, et *Bulletin Hispanique*, 1932, p. 347-349.

101. Memorial de Rodrigo Cerbantes, Contador de la Goleta (vers 1540), *Rev. Africaine* 1928, p. 424.

102. Les privilèges nord-africains accordés aux voiliers catalans; pragmatique du 18 déc. 1511, donnée à Burgos, pragmatique nouvelle accordée par la Reine Germaine en 1512; *Real executoria* donnée à Logroño cette même année 1512 contre les officiers d'Afrique; nomination d'un consul catalan à Tripoli; protestations encore en 1537 aux Cortès de Monzon contre les gouverneurs d'Afrique..., A. de CAPMANY. *op. cit.*, I, 2, p. 85-86, II, P. 320-322. Mais les courants nord-africains se détournent des postes chrétiens ou tripolitains, M. SANUDO, *Diarii*, XXVII, col. 25 (déviation vers Misurata ou Tadjoura); vérité oranaise, *CODOIN*, XXV, p. 425, Karl J. von HEFELE, *op. cit.*, p. 321 (massacre des marchands chrétiens à Tlemcen en 1509), caravanes allant vers Bône, en 1518, La PRIMAUDAIE, *art. cit.*, p. 25. Je crois que pour la politique espagnole à l'égard du négoce vénitien entre l'Afrique du Nord et l'Espagne la note juste est donnée, jusqu'à plus ample imformé, par H. KRETSCHMAYR, *op. cit.*, II, p. 178, l'Espagne essayant de faire passer en 1516 par Oran ce commerce entre Afrique et Ibérie. D'où le doublement des droits de douane dans les ports espagnols qui ruinerait le commerce vénitien. En 1518, Venise (C. MANFRONI, *op. cit.*, I, p. 38) essaierait en vain de forcer la porte oranaise, le fait se rattache mal à ce que nous apercevons de la question. Plus tard, Charles Quint s'emparant de Tunis (1535) pratiquera la politique de la porte ouverte, J. DUMONT, *op. cit.*, IV, 2e partie, p. 128, Jacques MAZZEI, *Politica doganale differenziale*, 1930, p. 249, note, 1. Sur ces questions économiques, en arrière de la "croisade" hispanique, toute une immense recherche reste à faire. Cf. la précieuse étude de Robert RICARD,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u commerce génois au maroc durant la période portugaise (1415-1550)", in: *Ann. de l'Inst. d'Ét. Orientales*, t. III, 1937.

103. G. Cappelletti,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VIII, p. 26-27.

104. Outre HAEDO, *op. cit.*, p. 19, B. N., Paris, Esp. 60, f^os 112-113; 18 juin 1570, Simancas E° 334; *CODOIN*, XC, p. 504, RIBAY GARCIA, *op. cit.*, p. 293. Enquête sur le commerce en Berbérie, 1565, Simancas, E° 146, 1598, Simancas E° 178; 4 nov. 1597, E° 179; 26 et 31 janv. 1597, *ibid*, 18 juil. 1592, A. N., K 1708. En 1565, de Cadix, 30 navires partent vers le Maroc. En 1598, S'exportent environ 7 000 douzaines de *bonetes*.

105. Pescaire au Roi, Palerme, 24 déc. 1570, Simancas E° 1133, les hôpitaux de Palerme remplis de malade de La Goulette.

106. Le duc de Cardona au Roi, Oran, 18 juin 1593, G. A. A. Série C 12,

f°81.

107. D'assez nombreuses lettres de ces proveedares conservées à Simancas dans les legajos E° 138,144,145:7,21,28 janv.,14 févr.,6 mars 1559;E° 138,f^os^264,265,266,276,7 janv.,14 sept. 25 sept.,29 nov.,17 nov.,31 déc. 1564;E° 144,f^os^22,91,96,278;E° 145,f^os^323 et 324.

108. Défense est faite de les emmener bien sûr,ainsi que les soldats contagieux,ou les prêtres déguisés en soldats. La orden ql Señor Francisco de Cordoba... Valladolid,23 juin. 1559,Simancas E° 1210,f° 37. Une courtisane espagnole à la Goulette et à Tunis,Isabella de Luna, M. Bandello,*op. cit.*, VI,p. 336.

109. simancas E° 145,f^os^323 et 324,25 sept 1564.

110. R. de Portillo au Roi,Mers el Kebir,27 oct. 1565. Simancas E° 486.

111. Vers 1543 ,rapport de Rodrigo Cerbantes,G. G. A. Série C. liasse 3,n° 41.

112. Relacion de lo que han de guardar los officiales de la fortaleza de Melilla,9 avril 1564,Simancas E° 486.

113. Diego Suárez,28 juil. 1571,B. N. ,Madrid,ch. 34.

114. Alfredo GIANNINI. "Il fondo italiano della Biblioteca Colombina di Seviglia",*in*:*R. Instituto Orientale*,*Annali*,févr. 1930,VIII,II. *Autres desterrados*:Felipe de Borja,frère naturel du Maestre de Montesa,Suàrez,*op. cit.*, p. 147;le duc de Veraguas Almirante de las Indias,*ibid.*,p. 161;Don Gabriel de la Cueva,*ibid.*,p. 107 (1555).

115. G. La MANTIA,*art. cit.*,p. 218.

116. Diego SUÁREZ, *Historia del Maestre ultimo de Montesa*, Madrid, 1889,p. 127.

117. Diego Suárez,paragr. 471,G. G. A.;en faveur d'une entente,paragr. 469 et 470,*ibid.*,481 et 482,mais ailleurs B. N. ,Madrid,ch. 34,les razzias sont utiles,c'est par la terreur qu'ils inspirent que les Espagnols dominent le plat pays,imposent *seguros* et suzeraineté. Une razzia,13—16 nov. 1571, rapporte 350 prisonniers et un immense butin de chameaux,chèvres,vaches … Par contre,d'innombrables *correrias* tournent mal et coûtent beaucoup d'hommes. Les razzias se font l'hiver pour profiter de la longueur des nuits, Diego SUAREZ,*op. cit.*,p. 87,double avantage de cette politique frapper les uns,protéger les autres,p. 69;ce que les Maures apportent à Oran,p. 50;ce que lui livre parfois le royaume de Tlemcen,p. 50,(blé parfois exporté vers

l'Espagne, Oran a besoin de 40 000 fanègues de blé et 12 000 d'orge par an); soldats retraités à Oran, p. 263; la technique des razzias, p. 64 et *sq.*; le partage du butin, p. 125 et *sq.*, exemples, p. 228-229, p. 260, p. 293. Le régime du partage a changé, au delà de 1565, p. 90 et de façon curieusement favorable au soldat.

118. Francisco de Valencia à Philippe II, Mers el Kébir, 8 févr. 1565. Simancas E° 486.

119. 12 févr. 1559, Simancas E° 485; 2 mars 1559, *ibid.*

120. *Actions et traités*, 1606, p. 74, cité par G. ATKINSON, *op. cit.*, p. 369.

121. *Manuel historique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 t. I, Paris, 1892, p. 12.

122.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173-174.

123. J. von HAMMER, *op. cit.*, VI, p. 184, note 1.

124. E. ALBÈRI, *op. cit.*, III, V, p. 404 (1594).

125. *Ibid.*, p. 402.

126. *Op. cit.*, p. 127.

127. Sur la piraterie, immense sujet sans frontières, voir les pages brillantes de Louis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1964, I, p. 92 et *sq.* Ces pages mettent en cause au XVII^e siècle la "grande ceinture" de la piraterie des Antilles à l'Extrême-Orient. Cette montée et cette ubiquité sont mises en rapport avec la désorganisation des grands Empires: le turc, l'espagnol, l'Empire du Grand Mongol, la Chine finissante des Mings.

128. Les pages qui suivent s'appuient sur les résultats de trois livres essentiels: Otto ECK, *Seeräuberei im Mittelmeer*, Munich et Berlin (I^{re} éd. 1940. 2^e 1943) que je n'ai pu me procurer que très tardivement (manque toujours à notr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Godfrey FISHER, *Barbary Legend,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North Afica*, Oxford, 1957, plaidoyer en faveur des Barbaresques, oblige à reprendre les dossiers que l'on croyait classés une fois pour toutes. Enfin le livre riche de documents inédits de Salvatore BONO, *I corsari barbareschi*, Turin, 1964. Les bibliographies copieuses de ces trois volumes, surtout du dernier, me dispensent de multiplier les références.

129. 5^e journée, 2^e nouvelle.

130. Et elle s'y trouve au complet dans le *Quichotte*, dans *l'Ilustre Fregona*, II, p. 55; *El amante liberal*, I, p. 100-101; *La española inglesa*, I, p. 249, 255.

131. Peu de lettres de marque en Méditerranée. Un exemple, lettres de représailles de Philippe IV sur les Français, Madrid, 2 août 1625, B. N., Paris, Esp. 338, f° 313. Sur l'Océan, la piraterie s'exerçant entre Chrétiens a de ce fait besoin de lettres de marque.

132. S. BONO, *op. cit.*, *p assim* et pp. 12-13, 92 et sq.

133. G. FISHER, *op. cit.*, p. 140.

134. *Ibid.*, *passim* et pp. 84 et 139.

135. C. DURO, d'après G. FISHER, *op. cit.*, p. 138.

136. S. BONO, *op. cit.*, p. 7, d'après A. Riggio: "la course barbaresque avait pris en calabre la forme authentique d'une lute de classe".

137. D. de Haedo, *op. cit.*, p. 116.

138. Marin de Cavalli au Doge, Péra, 8 sept. 1559, A. d. S. Venise, Senato Secreta, Constantinopoli, 2/B, f° 186.

139. Bernard Pançalba, gouverneur de l'île à l'Impératrice, Ibiza, 26 août 1536, A. N., K 1690 (orig. catalan, tr. en castillan).

140. Barcelone, 24 juill. 1588, Simancas E° 336, f° 164.

141. A. Com. Cassis, E E 7, 21 déc. 1580.

142. Henri IV à Philippe III, Paris, févr. 1600, Lettres de Henri IV à Rochepot, p. 3-4.

143. 25 déc. 1596, Simancas E° 343.

144. Les consuls de Marseille à Messeigneurs les ducs et gouverneurs de la ville et République de Gênes, Marseille, 20 avr. 1574, A. d. S. Gênes, Francia, Lettere Consoli, 1 2618.

145. Madrid, 28 mars 1566, A. N., K 1505, B 20, n° 91.

146. Henri III à Philippe II, Paris, 30 sept. 1575, A. N., K 1537, B 38, n° 113, copie esp.

147. P. GRANDCHAMP, *op. cit.*, I, p. 42.

148. A. d. S. Florence, Mediceo 2845, Giulio Gotti à son frère, Gênes, 22 août 1597.

149. 20 nov. 1563, Simancas E° 1052, f° 44.

150. Simancas E° 1146 ou même relation, Simancas E° 1071, f° 78.

151. S. Bono, *op. cit.*, p. 3.

152. F. Grenard, *op. cit.*, p. 54; W. Heyd, *op. cit.*, II, p. 258.

153. R. Coindreau, *Les corsaires de Salé*, Paris, 1948.

154.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274, 4279; Simancas E° 489, 1450, 1451;

A. N. , K 1672, n° 22; G. VIVOLI, *op. cit.* , III, p. 155.

155. *Op. cit.* , p. 86 v° et *sq.*

156. Alexandre O. OEXMELIN. *Histoire des aventuriers flibustiers...*, Trévoux, 1775, t. I, p. 124-131.

157. V. LAMANSKY, *op. cit.* , p. 592, note 1.

158. BELON DU MANS, *op. cit.* , p. 88 v°.

159. Voir ci-dessus I, chap. V, p. 276 et *sq.*

160. A. Com. Marseille BB 40 f° 197 et *sq*; 19 août 1561, Sim. E° 13; E. CHARRIÈRE, *op. cit.* , II, p. 659-661 (27 juin 1561), p. 799-803 (27 sept. 1561); Bayonne, 28 juin 1565, A. N. , K 1504 B 19, n° 34; Venise, 18 août 1565, Simancas E° 1325; Charles IX à Fourquevaux, Orçamp, 20 août 1566, FOURQUEVAUX, *op. cit.* , p. 48-49.

161. G. FISHER, *op. cit.* , p. 144.

162. D'après M. Sanudo, cité par C. MANFRONI, *op. cit.* , I, p. 37. De même en France, lettres royales de 1496, Alfred SPONT, "Les galères dans la Méditerranée de 1496 à 1518", *in*: *Revue des Quest. hist.* , 1895; Alberto TENENTI, *Cristoforo da Canal. La marine vénitienne avant Lépante*, 1962, p. 78 et *sq.* Venise n'aura de galères de condennati qu'à partir de 1542, *ibid.* , p. 82.

163. Relacion de lo de Tremeti (1574). Les îles Tremiti sont des position-clés sur le rivage adriatique du royaume de Naples. , Simancas E° 1333. "Despnes de la perdida de Rodas multiplicandose les cossarios en el mar Adriatico...".

164. *Relazione di Soriano*, p. 54.

165. *Op. cit.* , p. 158.

166. Non pas en 1558 comme le dit C. Duro, *op. cit.* , II, p. 16. Courses analogues, en 1562, d'un certain Francisco de Soto, basé à Majorque, D. de Haedo, *op. cit.* , p. 163 v°.

167. Madrid, 13 juin 1567, Simancas E° 333.

168. Relacion del tercero viaje q. ha hecho Juan Phelipe Romano a Argel (1595), Simancas E° 342.

169. Vice-roi de Valence à Philippe II, Valence, 30 juill. 1594, Simancas E° 341.

170. Salomone MARINO, *in*: *A. st. sic.* , XXXVII, p. 18-19; un brigantin de Trapani en course, 17 nov. 1595, Simancas E° 1158.

171. AMAT DI S. FILIPPO, *Misc. di storia italiana*, 1895, p. 49.

172. D. de HAEDO, *op. cit.*, p. 44.

173. Avis de C., octobre 1568.

174. D. de HAEDO, *op. cit.*, p. 160 v°; Péra, 9 avr. 1561, A. d. S. Venise, Senato Secreta Costant., 3/C, Venise, 22 mars 1561, Simancas E° 1324, f° 83.

175. Venise, 27 sept. 1559, Simancas E° 1323.

176. A. de Herrera, *Historia general del mundo*...; Madrid, 1601, I, p. 15.

177. *Ibid.*

178. Péra, 13 juill. 1560, A. d. S. Venise, Sena Secreta Cost., 2/B f° 253.

179. Baron de BUSBEC, *op. cit.*, II, p. 279, vers 1556.

180. J. B. E. JURIEN DE LA GRAVIÈRE, *Les chevaliers de Malte*..., 1887, I, p. 16-18.

181. *Ibid.*, p. 63-64 et Simancas E° 1050, f° 27, 28 mai 1562.

182. *Ibid.*, p. 64.

183. Avis de Messine, 1er juin 1563, Simancas E° 1052, f° 189.

184. Per lre(=lettere) di Messina, 7 mai 1564, Simancas E° 1383.

185. G. MECATTI, *op. cit.*, II, p. 723.

186. G. VIVOLI, *op. cit.*, III, p. 53.

187. Daniel Barbaro au Doge, Péra, 28 mars 1564, A. d. S. Venise, Senato Secreta 4/D.

188. Silva à Philippe II, V, 10 sept. 1574, Simancas E° 1333.

189. *Cavalieri di San Stefano*..., Pise, 1928.

190. Pour la police vénitienne, rôle considérable de la guette de Cerigo, à partir de 1592 (E. ALBÈRI, *op. cit.*, III, V, p. 430), la garde vénitienne de Cerigo aurait réussi à protéger la navigation turque. Cerigo, dit Cigala "… fanale e lanterna dell' Arcipelago e la lingua e la spia di tutti gli andamenti turcheschi …".

191. Nota de vascelli presi (1575), A. d. S., Florence, Mediceo 2077, f° 536.

192. Autre exemple, 10 déc. 1558, *Corpo dipl. port.*, VIII, p. 78.

193. Tous les détails de ce paragraphe pris à une relation de 1574, A. d. S., Florence, Mediceo 2077, f°s 517 à 520 v°, et à une relation de 1597, *ibid.*, f° 659 et *sq.*

194. *Nota delli schiavi*... (1579-1580), *ibid.*, f° 606 et *sq.* Liste de forçats,

blessés ou morts, *ibid.* ,f° 349.

195. *Ibid.* ,4279,nombreuses missives d'Alger,de Mustafa Aga,15 avril 1585;de la femme d'Arnaut Mami,20 oct. 1586;de Mahamat Pacha,"roi"de Tripoli,juin et juill. 1587;d'arnaut Mami,9 oct. 1589;de Morat Bey,*capitan general de mar y tierra deste reyno de Argel*,16 févr. 1596,etc.

196. Les galères de Saint-Étienne portent la croix rouge dans la Levant, G. VIVOLI,*op. cit.* ,IV,p. 11. Prise de la forteresse de Chio,G. MECATTI,*op. cit.* ,II,p. 816.

197. G. VIVOLI,*op. cit.* ,IV,p. 29-30.

198. Alonso de la Cueva à philippe III,Venise,7 févr. 1609,A. N. ,K 1679.

199. C. 19 avril 1591,A. N. , K 1675,"…para guardar el Arcipielogo de la imbasion de Malta…".

200. Des fustes barbaresque pillent Candie,H° Ferro au Doge,Péra12 nov. 1560,A. d. S. Venise,Sen° Secreta Cost,2/B f° 291 v°;Simancas E° 1326,12 août 1567;A. W. K1677,7 juill. 1600. Pour le XVII^{e} siècle,Paul Masson,*op. cit.* ,p. 24,33,380.

201. F^{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I,Venise,10 juill. 1601,A. N. , K 1677.

202. J. B. de Tassis à l'ambassadeur espagnol à Gênes,Paris,20 juill. 1602,A. N. ,K 1630.

203. Salomone MARINO,*in*:*Arch. Stor. Sic.* ,XXXVII,p. 27.

204. Relacion sobre lo del bergantin de Pedro Lanza…, Simancas E° 1336,1577. Silva à Philippe II,Venise,20 nov. 1577,*ibid.*

205. Relacion que ha dado el embaxador de Venezia…,Simancas E° 1342. Le document signale deux autres galiotes expédiees en caurse par P. de Leyva pour son propre compte,contrairement aux ordres du Roi.

206. Marcantonio Colonna à Philippe II,Messine,10 juill. 1578,Simancas E° 1148.

207. F^{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I,Venise,5 févr. 1601,A. N. ,K 1677. Important et long plaidoyer.

208. V. LAMANSKY,*op. cit.* ,p. 578(1588),également p. 592,599,601-602. Complicité des populations grecques.

209. G. BERCHET,*op. cit.* ,p. 130 et 139.

210. Simancas E° 138,7 juill. 1559.

211. El Prior y los Consules de Sevilla à Philippe II,7 mai 1561,Siman-

cas E° 140.

212. *Op. cit.* ,p. 69.

213. A. d. S. Naples Farnesiane,fasc. II,2,f° 271,28 juin 1561;Simancas E° 1126,29 juin 1561;J. NICOT,*op. cit.* ,p. 70,17 août 1561.

214. L'évêque de Limoges au Roi,Madrid,12 août 1561,B. N. ,Paris, Fr. 16103,f° 33 et *sq*.

215. Relacion de lo que ha hecho Dragut,15-30 sept. 1563,Simancas E° 1127.

216. Simancas E° 1052,f° 182.

217. Simancas E° 1392,18 sept. 1563.

218. *Ibid.*

219. Simancas E° 1052,f° 212.

220. *Ibid.* ,vice roi de Naples à J. André Doria,20 sept. ,1563.

221. *Ibid.* ,f° 214,9 sept. 563.

222. *Ibid.* ,f° 217,10 sept. 1563.

223. Simancas E° 1393,24 mai 1564.

224. Oysel à Charles IX,Rome 14 mai 1564. E. Charrière,*op. cit.* ,II,p. 755,en note.

225. *Op. cit.* ,II,p. 69,7 avril.

226. Simancas E° 1132,Pescaire à Philippe II,18 juin 1569.

227. FOURQUEVAUX,*op. cit.* ,I,p. 90.

228. *Ibid.* ,p. 122.

229. *Ibid.* ,p. 135.

230. Simancas E° 1052,f° 184.

231. Pedro DE SALAZAR,*Hispania victrix*,1570,p. 1 v°.

232. Cité par C. DURO,*op. cit.* ,II,p. 45-46.

233. Cité par H. FORNERON,*op. cit.* ,I,p. 351-352.

234. 3 juillet 1561,Simancas,E° 1051,f° 108.

235. H. FORNERON,*op. cit.* ,I,p. 365;CAMPANA,*op. cit.* ,II,XII,p. 87 et v°;Pietro EGIDI,*Emmanuele Filiberto*,II,p. 27 donne la date du 1er juin,Campana celle du 31 mai. Le raid conduit par Euldj Ali. La nouvelle arrive en Espagne,Maçuelo à Philippe II,Tolède,12 juil. 1560,Simancas E° 139.

236. Figueroa à Philippe II,Gênes,19 juin 1560,Simancas E° 139.

237. A. d. S. Gênes,L. M. Spagna 3. 2412.

238. Avisos de Marsella,2 mai 1564,Simancas E° 1393.

239. Marcantonio Colonna à Philippe II, Messine, 26 juin 1578, Simancas E° 1148.

240. E. ALBÈRI, *op. cit.*, II, V, p. 469.

241. A Philippe II, Palerme, 6 juin 1582, Simancas E° 1150, "...el mar lleno de corsarios...".

242. A. Communales Marseille BB 46, f° 91 et *sq*.

243. *Ibid.*, f° 228 et *sq*.

244. *Ibid.*, BB 52, f^os 10 et 10 v° et f° 29.

245. A. d. S. Venise, Cinque Savii, 26.

246. A. de Capmany, III, *op. cit.*, p. 226-227; IV, Appendice p. 85;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903, Madrid, 3 juin 1572.

247. F. Corridore, *op. cit.*, p. 21. En Corse, à la fin du siècle, 61 villages détruitsou brûlés, Casanova, *Histoire de l'èglise corse*, 1931, I, p. 102.

248. *Op. cit.*, p. 153.

249. *Op. cit.*, p. 158.

250. Voir *supra*, II, p. 48.

251. Voir *infra*, p. 511-512.

252. O. Eck, *op. cit.*, p. 139 et *sq.* Pour tout ce paragraphe, G. Fisher, *op. cit.*, *passim* et p. 96 et *sq*.

253. E. MERCIER. *Histoire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Paris, 1891, III, p. 189.

254. G. FISHER, *op. cit.*, p. 174.

255. S. BONO, *op. cit.*, p. 361 et note 21.

256. *Ibid.*, p. 89.

257. 20 nov., A. BALLESTEROS, y BERETTA, *op. cit.*, IV, 1, p. 485.

258. *Historia tragico-maritima*, *Nossa Senhora da Conceycão*, p. 38.

259. H. WÄTJEN, *op. cit.*, p. 138, note 2; Paul MASSON, *op. cit.*, p. 380.

260. S. Bono, *op. cit.*, p. 178.

261. J. Denucè, *op. cit.*, p. 20 et même plus tôt, ainsi Barbaresques (Turcs) en face de....

262. Voir *supra*, I, pp. 109-110.

263. G. Fisher, *op. cit.*, p. 186.

264. *Ibid.*, p. 138.

265. *Naufrages, corsaires et assurances maritimes à Venise, 1592-1609*, 1959.

266. *Ibid.* ,p. 27 et *sq.*

267. La difficulté est surtout de mesurer les importances *relatives.* J'aborde ce problème dans un autre ouvrage en cours d'impression:*Capitalisme et civilisation materielle*, XV^{e}-$XVIII^{e}$ siécles,vol. 1,chapitre 1. Suivre de une série de chiffres du XVI^{e} siècle,c'est retrouver une autre échelle. Tout dépendra de celle-ci.

268. Salvatore BONO, "Genovesi schiavi in Algeri barbaresca", *in*: *Bollemino Ligustico*,1953;"La pirateria nel Mediterranéeo,Romagnnoli schiavi dei Barbareschi",*in*:*La Piê*,*Rassegna d'illustrazione romagnuola*,1953.

269. G. LA MANTIA,*in*:*Archivio storico siciliano* ,XLIV,p. 203.

270. R. RUSSO,*in*: *Archivio storico dei Corsica*,1931,p. 575-578. Sur les rachats,énorme documentation inédite.

271. A. d. S. Gênes,M° del R° degli Schiavi,Atti,659.

272. *Ibid.* ,14 et 15 mai 1601,assurance sur 2 532 lire,à 4 p. 100(deux assureurs).

273. *Ibid.* ,très nombreux documents et ainsi,à titre d'exemple,Giacomo Sorli à Philippe Lomellini,Tunis,7 novembre 1600.

274. J. NICOT,*op. cit.* ,p. 25,21 sept. 1559.

275. P. GRANDCHAMP,*op. cit.* ,I,p. 43,26 août 1592.

276. Relacion del tercer viaje que ha hecho J. Phelipe Romano a Argel (1594),Simancas E° 342.

277. G. ATKINSON,*op. cit.* ,p. 133.

278. Ainsi défense faite aux Valenciens,4 janvier 1589,B. N. ,Esp. 60,f^{os} 441 et v°. Énumération non moins fréquente des *mercaderias no prohibidas*, 17 juillet 1582,Simancas E° 329,I.

279. *H. tragico-maritima*,*N. Senhora da Conceycão*,p. 19.

280. Carmelo TRASSELLI,Noti preliminari sui *Ragusei in Sicilia*,article inédit,p. 32 du dactylogramme.

八　代结论：一种和几种形势

在论述地中海的经济、政治、文明和战争等方面的生活的章节之后谈“形势”，其目的并不在于像理所当然那样通过进行总结来作出结论，而是为研究工作开辟一条新路，指出新的方向，作出新的解释。

的确，在前几章中，读者经常被提醒注意历史上的发展演变和半静止状态之间的相互更替轮换关系。假如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范围缩少，只集中到发展演变的因素上，那么图景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这和在数学上用消去一个维的方法从立体几何过渡到平面几何一样，而且后者必然比前者简单，其原因自不待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一种对历史所作的叙述。这种叙述的富于情节的内容——周期、危机、阶段和转折点——会诱使历史学家使解释戏剧化起来或者转移到方便的但有时是虚妄谬误的解释上去。因为经济形势这种我们必须对付的事物之中的最明显、最熟悉的事物，很快就高居于其他一切事物之上，把它自己的一套词汇和范畴强加给其他一切事物。新的唯物主义是一条诱人的道路。它作为一种方法，其正确性和有效性如何呢？

一句告诫的话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要设想一下物质生活的各种节奏同人类生活的其他各种不同的起伏波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确定这种关系的范围。由于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形势,我们必须设想一系列同时发展和相互搭叠的历史。如果能够把这种复杂的实际情况归结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模式的节奏的话,事情就太简单、太美好了。那种模式本身又会是多清楚呢?即使把经济形势当作一种一劳永逸地设想出来的单一的、有它的必然的规律和有它的后果的发展演变运动,也不可能为它下一个定义。弗朗索瓦·西米昂在谈到把波浪本身的运动包含在自己的运动中的潮汐的时候,至少辨别出两种形势来。但是,现实并不像这种相对简单清晰的形象那样简单。从构成经济世界的振动中,专家们可以毫不困难地分离出十来种发展演变运动来。这些运动因它们的时间长度能被人辨识出来。它们是:百年发展演变运动(趋势)(即各种长期发展演变运动中历时最长的运动)、各种长期形势(康德拉季耶夫的各种五十年循环、双循环或者多循环、内部循环[1])、各种短期形势(即十年内的循环和季节性发展演变运动)。这样,在经济生活的尚未显现出差别来的发展演变运动中,通过某种人为的分析方法可以分辨出好几种彼此对立的矛盾的调式来。

如果我们想使用经济来找出延伸到过去的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来龙去脉,就会面对10种、20种可能有的调式和同样多的不同的因果关系的脉络。历史马上会再次变得头绪纷繁、混杂不清,并且(谁知道呢?)可能当我们寻求抓住过去所有不同的振动和已经过去的时间的各种波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个组织结构从我们手指

缝隙中溜掉。这些波应该最后像秒、分、时甚至日那样加进表的运转机制中去。

但是，具体的谈吐比理论上的探究更有价值。假设在我们眼前的是漫长的16世纪的整个的、像我们已经试图恢复的那样的地中海，让我们把保留和审慎的态度置诸脑后，暂时根据百年趋势的标准，然后根据长期形势的标准来试着进行几次测量吧！我们将把短期的和季节性的波动变化撇在一边。

百年趋势

经济生活的百年高涨可能始于将近1470年。毫无疑问，由于1590年和1600年之间这段时期的创纪录的物价高涨，经济生活的高涨中断了，至少是速度减慢了。但是，不管怎样，这个趋势仍然勉勉强强地持续到1650年。1470年（或者1450年）、1590年、1595年或1600年、1650年，这些日期只不过具有相互之间的距离很短的里程碑的价值而已。这个长期的高涨，从谷物价格的变化中基本上得到了证实。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材料。如果以薪津的曲线图表作为基础，如果能够以生产的曲线图表作为基础来进行计算，毫无疑问，就会得出另外一些稍有不同的按年月次序的排列。但是，最后必须根据谷物的具有权威性的曲线来核查这些排列……

不管怎样，在这个漫长的16世纪，一种缓慢的但强劲有力、影响深远的高涨，有助于物质生活和所有从物质生活吸取养料的事物的高涨。这种高涨是经济根本的健康的秘密所在。厄尔·J.汉密尔顿有一天对我说："在16世纪，创伤全都愈合了。"补偿现象始终

在出现。例如,在工业领域内,像箭一样迅速的高涨现象相互替换出现。又例如在商业领域内,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缓慢起来,另外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就起来接替。

这种潜藏的复原活力并没有随着16世纪的终结而消亡于朝夕之间。事实上,衰退迟迟不显露出来,没有在1619年和1623年之间这段短时期的但却是结构性的危机爆发之前显露出来(换句话说,没有被人们深深地感觉到)。这是鲁杰罗·罗马诺的看法,[2]也几乎是卡洛·M. 奇波拉……等人的看法。[3]正如埃马纽埃尔·勒卢瓦·拉杜里、[4]勒内·巴厄雷尔[5]、阿尔多·德·马达勒纳[6]和菲利普·鲁伊斯·马丁[7]等人提出的那样,也正如我在自己观察的范围内愈来愈认为的那样,上述衰退的出现可能不在1650年之前。在倒退的道路上,的确有暂停、刹车,有明显的复原,甚至在人们所想象的首先遭受打击的农业领域里还有明显的复原。菲利普·鲁伊斯·马丁写信给我说[8]:"西班牙的农业在1582年的危机之后的衰退,不像人们习惯于说的那样令人头晕目眩。在它总的下降的过程中,有从1610年到1615年的周期性的(即短的)复原和1630年的另外一次复原。灾祸的发生不先于1650年。"

一场本身已经相当复杂而且又提出在欧洲各部分的经济趋势之间可能有的时间滞差问题的争论,是无法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简单地加以解决的。虽然也在这个时间滞差问题上,我认为仅仅把北欧的形势同地中海的形势加以区别、进行对照比较的这种做法过分简单,后者比前者更受17世纪总衰退的影响……争论仍然胜负未决。对我们这些研究地中海史的历史学家来说,问题的确在于再一次摆脱那种困扰我们的和错误的关于过早衰退的概念。在本

书的第一版里，我把衰退的年代定在1600年以后，甚至定在1610年和1620年之间这段时期以后。[9]现在，我愿意把这个年代再往后推30来年。

谈了上述情况后，下面这一点倒令人感到奇怪：经济学家很早以前进行的总估算预先把17世纪正中的年代定为这个长期飞跃发展的终结时期，这样就把这个世纪的前50年加进这个发展期内，虽然增长的某种减速现象当时已经明显。相反，经济学家决不同意确定一个出发点。在我转而赞同的马利·克尔胡埃尔的估算[10]（1470年或者更准确些1450年）和詹尼·格里齐奥蒂·克雷斯齐曼（1510年）的估算[11]之间，我们能够进行选择。这两种估算都能够自圆其说。较早的终结年代——1470年——是从名义的价格曲线图推算出来的，最迟的终结年代则是根据银价推算出来的。至于我自己，我同勒内·巴厄雷尔一样，宁愿把名义价格指数作为计算的基础。但我并不想参加这场争论。

毫无疑问，在这场争论中，人们可以求助于历史学家将逐渐阐明的另外一种材料。我对突尼斯的事物进行过相当深入细致的研究。从1450年起，在该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装饰美化。运河上的木桥改建为石桥。[12]1445年8月，在圣玛丽亚·德·布罗里奥教堂附近挖掘了一口大井。[13]1459年5月修建的里沃亚尔蒂区的新住宅等都对我产生了强烈印象。[14]为了扩建总督宫，拆毁了里沃亚尔区的织布工场。1494年的一份文献资料写道[15]："这座城市每天都在装饰、美化。但愿这些装饰物至少受人尊重。"1504年3月[16]，有关当局下令从圣马克广场（这个广场自1495年以来以其宏伟的塔楼夸耀于世[17]）拆除石匠在那里修建的窝棚。这些石匠还在窝棚旁

边种植了树和葡萄。“最恶劣的是，他们在那里修建了公共厕所。人人都去那里干下流淫荡的勾当……”这些论据当然既不能在突尼斯(那里的建设是在经济形势有利或者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吗?)，也不能在整个地中海的范围内证明任何事物，却鼓励、促使我把在1450年和1650年之间的这些热火朝天的年代结合为我常常称之为“漫长的16世纪”的这样一个时间单位，并因此鼓励、促使我像让·富拉斯蒂埃和他的学生提出的那样[18]认为这个漫长的世纪的繁荣的第一个波浪并不依存于来自美洲的金条和银块。在这种情况下，把一个单一的城市——突尼斯——当作“指示器”，毫无疑问是有充分根据的和有效的。这种做法显示出一个或许比物价曲线图所标明的形势更加真实的形势。当吉尔斯·卡斯特写“活力回到在1460年和1470年之间的这段时期的图卢兹”，或者当他声称同样这个图卢兹城发了整整一个世纪(1460—1560年)的财(对我来说，是在漫长的16世纪的第一段)的时候，[19]上述观点就是他的想法。但是，必须用其他的史料来反复证实这一点。这样做是有用的。

1450年和1650年之间的200年，构成一个连贯紧凑的时间单位。这一点显然需要进行广泛的解释阐述。人口普遍的、稳定的增长，不管是原因还是后果，始终贯穿这两个世纪。增加速度的快慢，则因区域和年代而异。但是，就我们观察所及，增长现象从未中断。然而，这一点必须注意：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上升的趋势并不表示生活水准的上升。至少直到18世纪，经济的发展在一个时期或者另外一个时期，总是在“社会的屠杀”[20]为害数量日益增多的民众的情况下完成的。

毫无疑问，百年增长这种恒久不变的推动力，似乎已经先促进

了领土国家的建立和发展，然后又促进了帝国的建立和发展。[21]它的倒退将为这些国家制造出明显的困难。经济的发展尽管会有暂时的停顿，但对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是有利的。我们已经看到，贵族阶级因为“有产阶级的”入侵而得到加强并东山再起，恢复旧观。而这个入侵又是一系列繁荣兴盛的局面推动的……这样的繁荣兴盛的局面必须以经济生活的猛烈的冲势为前提。接着，由于百年倒退，社会可能把它的大门闭锁起来。但是，这里我们缺乏研究，无法确定一个可以接受的年表。

长　波

经济史学家[22]在关于以下一系列低点：1460年、1509年、1539年、1575年、1621年和以下一系列高峰：1483年、1529年、1595年、1650年之间的长波方面，几乎意见一致。这些年代的准确性的误差约为1至2年。这样就有4个连续的“波”。每个“波”都有涨有落。第一个“波”历时49年；第二个“波”历时30年；第三个“波”历时36年。最后一个“波”历时46年。这个图解的明显的规律性，掩盖了这个事实：第三个波（1539—1575年）的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没有其他阶段具有的那种惯有的清晰性。真正的16世纪（1500—1600年）的中叶的标志，是一种扭转、一个停顿。这种扭转和停顿所产生的反响虽然在西班牙（如果我们把塞维利亚作为标准的话[23]，是从1550年到1559年或者到1562年）是短暂的，但在法国、英国、荷兰以及肯定还在别处却持续得比较久。于是有第一个16世纪（盛产金的世纪）和第二个16世纪（盛产银的世纪[24]）这两个情况不同的世纪。它们之间隔着一个困难的过渡时期。

难道是因为(其他理由中的)这个理由,在广义的16世纪有过资本主义的几个连续的类型(相似的和不同的)和从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模式到丰厚优渥的模式的几种工资模式吗?皮埃尔·肖努发现资本主义在安特卫普的发展的两个阶段。他写道:“是在从1470年到1490年这段时期的大饥饿——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使商人阶级得以奠定安特卫普的繁荣的基础。安特卫普作为贸易中心的极盛时期,与从1520年到1550年这个无产阶级的苦难时代恰好吻合。在1566年和1585年之间,安特卫普的衰落不仅可以归咎于社会的动乱,还可以归咎于在必要时我将称之为安特卫普的城市无产阶级的第二次数量过多这个事物。[25]他的这些看法同厄尔·J.汉密尔顿的经典论述如出一辙。在地中海或许有与这些论述符合的事物。我发现这个地区大体上有三个资本主义的阶段相继出现,虽然我无法把这三个阶段同利润的差别变化联系起来。这三个阶段是:大约在1530年占主导地位的商业资本主义,将近本世纪中叶的工业资本主义(由商业引导),和本世纪将结束时的金融资本主义。[26]在本世纪末,在威尼斯出现了“薪水阶级”人数过多的现象。[27]

这个不完全的图解,是对一些材料的归纳总结,可以讨论商榷。特别是世纪中叶停滞时间的长度,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时间长度估计得最长的是从1529年到1575年,可能是从1539年到1575年。不管怎样,这个停滞时期同北欧的船舶从地中海消失的时期,恰好吻合一致。对我来说,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28]

西班牙王室的破产和经济形势的起伏波动

在我们的图表上，长期被人谈到的西班牙王室宣布破产[29]、停止偿付债款的时代的位置定得很好，以致对这些事件的解释可以无需寻求而自动作出。第一次破产（1557年和1560年）的时间定在第三个波浪的高峰的附近。第三次破产（1596年）的时间定在第四个波浪的高峰的附近。一次中间周期性的高涨的停止，再次打开了破产的道路。总的说来，这些属于正常破产，是外部压力强加的破产，也可以说是必然会发生的破产。至于1575年、1607年和1627年的破产，根据上述说法，这些破产是不正常的。它们不仅是经济的恶劣气候（当然不乏这种气候），也是内部压力造成的。这些破产是蓄意制造出来的或者至少是被人欣然接受的。我们在谈到菲利普二世和他的顾问决定制造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1575年的危机时，已经指出这一点。这位西班牙国王和他的顾问认为在时机变得有利时清除热那亚的银行家是可能的。这一点直到50年以后，由于1627年的破产，才得以实现。1607年的破产起因于西班牙的财政部门先在菲利普三世统治下的然后在菲利普四世统治下的黄金时代的开始时过度浪费。[30]

这样就必须把部分是故意制造的破产同部分是环境强加的破产区别开来。因此，历史学家必须注意不要把这两种破产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尽管它们相似的表象是千篇一律的。

内战和外战

战争更顺从一种分类尝试。我们已经根据内(在基督教世界内部和在伊斯兰世界内部一样)、外(处于这两个敌对世界的结合点上)这个标准来区别战争。[31]可以说,圣战和十字军东征都始终由恶劣的经济气候促成。相反,不管是基督教徒内部或者是穆斯林内部的自相残杀的战争,都有经济上升的“波浪”作为先导。每次经济下降都有规律地阻止这类战争。因此,基督教世界的重大外交协定:1529年(夫人和约①)、1559年(卡托—康布雷锡条约)、1598年(韦尔万和约),或者位于我们的图表的上升曲线的各个高峰,或者位于这些高峰附近。相反,大规模的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之间的战役:1538年的普雷维扎战役和1571年的勒班陀战役,都处于低潮时期,位于它们必然据有的位置上。我并不坚持认为这种相互关系适合所有情况并能概括所有情况(我特别不坚持认为这种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土耳其人1521年攻占贝尔格莱德;莫哈奇战役发生于1526年夏季。根据我们的模式,这两次战役都不应该发生。另外一件发生得与时间不合的事,是查理八世1494年越过阿尔卑斯山。根据上述分析,当时意大利战争应该在1509年,即阿尼亚德尔战役年才开始。(让我们谈时一笑。)但是,假如说这张日程表对查理八世或者路易十二的法国不完全适合的话,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对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和伊莎贝尔的西班牙倒是适合的。在从1483年到1509年这段时期内,同时发生了对格拉纳达的征服和对北非的进攻。后者在1509年和1511年之间这

① 即康布雷和约。——译者

段时期加速进行，并于1511年因所谓的意大利战争死灰复燃而告结束。[32]

我不想过分以烦扰人的证据作为理由来进行辩护，也不想抛开这些证据。我必须指出：意大利战争虽然爆发于1494年，但发动缓慢，不合时机，这一点确系事实；同样，1521年和1526年两年为土耳其的入侵打开了匈牙利的大门，这一点也是事实。但是，一些历史学家硬说，匈牙利只在后来才真正被占领，缓慢的征服将近1541年才在匈牙利宣告完成……

相反，请注意这一点：反土耳其的打算是在16世纪末，在1595年以后，因此，正是在我们预期的时候传播开来；一场十字军东征在酝酿策划中，虽然这次征讨后来并没有进行。然而一场相互间的海上行劫战却遍及整个地中海并且反常地激烈、残忍。这不仅仅有技术、经济或者个人冒险方面的原因。狂热的激情也推波助澜，起了作用。在从1609年到1614年这段时期内，西班牙有30万个摩里斯科人被驱赶。这次驱赶从属于这个时期最野蛮的战争之一。晚在将近1621年这个局势危急的年代，一场关键性的、最初于1618年在波西米亚燃起的战火，因为有人添薪加油而继续燃烧，焚毁了中欧的心脏地带。这就是三十年战争的悲剧。这出悲剧也及时上演了。

这些同时发生的事物使人获得教益，有它们的价值。天气晴朗时，家庭争吵占上风；天气恶劣时，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之间发生争执。放之伊斯兰世界，这条规律也是准确无误的。从勒班陀战役结束一直到1593年，反德意志战争重起，土耳其关切亚洲事务，投身于狂热的对波斯的战争中……我们可以从这些观察中瞥见重大战争的心理根源。

我们应该在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内加上这一点：所有的排犹运动都服从对外战争的形势。不管犹太人住在基督教世界的什么地方，他们都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受到迫害。

形势和总体历史

我不能确保前面的分析说明具有规律性，确实可靠，正如不能确保任何使用解释性的图表来对已知的历史资料进行分类的尝试具有规律性、确实可靠一样。这些图表是从我们关于很多可能有过的形势的概念中派生出来的。[33]对局势和机遇进行的分析说明，即使在好几种不同的水平、层次上重复进行，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或者最终的、无可争议的。然而，它是历史性的解释的必要的手段之一，是有用地提出问题。

我们一方面要对经济形势进行分类；另一方面要对各种非经济形势进行分类。后者要根据它们历时的长短来量度和定位。配得上同百年趋势连接的有：长期的人口发展演变运动、国家和帝国的变化不定的面积(总的说来它们的地理形势)、具有社会活动变化性的或者没有社会活动变化性的社会、工业的发展增长的力量等。配得上位居长期局势的行列的有：工业化的速度、国家财政的波动和战争……形势的脚手架帮助我们更好地修建历史的房屋。但是，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还需要十分审慎。分类是困难的、不可靠的。各种文明的长期发展演变运动、各种文明在词的传统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等，使我们惊讶万分，不知所措。例如在1480年和1509年之间，文艺复兴处于明显的周期性的衰退时期。伟人洛朗的时代在经济上是个天气阴沉的时代。[34]西班牙的黄金时代和17世

纪欧洲各地的甚至伊斯坦布尔的光辉灿烂的事物，都出现于第一个百年趋势的大颠倒之后。我提出一种解释，但是，谁能说出这种解释有多大的价值呢？我提出：任何经济衰退都会让大量金钱闲置在富人手中。这些无处投放的资本的相对的浪费，以后会先创造出黄金年代，然后创造出黄金世纪……

这个尝试性的答复阐述了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正如我们大家所听到的和熟知的关于文艺复兴和巴罗克风格这两个未被预料到的秋末冬初的晚迟的季节的花开景象的看法以及关于产生文艺复兴和巴罗克风格的动乱的社会的看法不能解决问题一样。文艺复兴和巴罗克风格可以说是这些动乱的社会的几乎病态的产物。文艺复兴意味着城市国家结束。随着巴罗克风格的出现，各个庞大的帝国开始不再一帆风顺。某种文明的过度繁茂可能包含着它的经济失败……这些问题全都超过局势的长期或者短期的范围。但是，局势使我们能够再次以有用的方式对这些范围进行探讨。

短期危机

在这次讨论中，我略去了那些内部十年的短期危机这个问题。这些危机的历史在我们眼中日益明确起来。它们显然是无法抗拒的、有传染性的。R. 罗马诺在他写的那篇关于从1619年到1623年这段时期的国际危机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一点。这篇文章我经常引用。这次危机会像我所假定的那样在土耳其的疆域内和新世界引起反响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事物肯定地证实了这一点。继菲利普·鲁伊斯·马丁最近进行的研究之后，另外一项可能付诸实施的研究计划，是对从1580年到1584年这段时期的短期

危机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这一短期危机，不仅像我在进行第一次研究时所想的那样，归因于把西班牙和它的信贷机构引向葡萄牙的摇板运动，而且还归因于当时正席卷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粮食危机。这次危机迫使这个半岛把大量现金付给北欧国家，付给这些因此再次和这个半岛结合起来的、必不可少的、“具有补足性的敌人”。这次巨大的震荡显示在西班牙、威尼斯、佛罗伦萨甚至法国的价格运动上。蒂耶波罗·皮萨尼银行在威尼斯宣告破产。对这些短期危机，对这些经济生活中的惊涛骇浪，对它们的发展演变，特别是对它们的可变性质等进行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为地中海经济的发展设置了新的路标。深入研究经济生活中的事件，对历史学家来说，会有重大的价值。但是，这项工作尚待进行。开始时的主要困难问题，在于我们对土耳其统治下的地区的情况毫无所知。根据已经了解的情况，至少在16世纪，那里的经济情况似乎同西方一样。[35]

本部分原注

1. Gaston IMBERT, *Des mouvements de longue durée Kondratieff*, 1959, et notamment p. 24 et *sq*.

2. Ruggiero ROMANO, *art. cit.*, *in*: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1962.

3. Avant tout, l'article écrit en collaboration avec Giuseppe ALEATI, "Il trend economico nello stato di Milano durante i secoli XVI e XVII: il caso di Pavia", *in*: *B. S. P. S. P.*, 1950.

4. *Les paysans du Languedoc*..., en cours d'impression.

5. *Une croissance: la Basse Provence rurale (fin du XVI^e siècle-1789)*, 1961. René Baehrel pense à la coupure de 1690; n'est-elle pas déjà nette aux alentours de 1660? Cf.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Voies nouvelles pour

l'histoire rurale (XVI[e]-XVIII[e] siècles)",*in*:*Études rurales*,1964,p. 92-93.

6. *Art. cit.*, *in*:*Rivista int. di scienze econ.*,1955.

7. Lettre qu'il m'adresse, 11 août 1964.

8. Voir note précédente.

9. *La Méditerranée*...,1[re] édit., p. 613,1095,1096-97. "Je ne sais pas si, de 1550 à 1580,se dessinerait une phase B,puis de 1580 à 1610, une phase A,celle des dernières splendeurs de la Méditerranée".

10. *Les mouvements de longue durée des prix*,1935,Thèse soutenue devant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Rennes. Cf. le résumé de Gaston IMBERT,*op. cit.*, p. 20.

11. *Il problema del trend secolare nelle fluttuazioni dei prezzi*,1935:la hausse longue commencerait en 1510 et se retournerait en 1635(France) ou 1650 (Angleterre).

12. Ainsi, A. d. S. Venise,Notatoio di collegio 12,f° 32 v°, 18 novembre 1475; 13, f° 17, 14 novembre 1482; 14, f° 9,10 février 1490.

13. *Ibid.*, 9 f°26 v°,12 août 1445.

14. A. d. S. Venise,Senato Terra,4,f° 107 v°,25 mai 1459.

15. *Ibid.*,12 f° 42 v°,18 février 1494.

16. *Ibid.*,15,f° 2,4 mars 1504.

17. *Ibid.*,12,f° 115,3 nov. 1495,l'horloge est *quasi fornito*,ne reste plus qu'à fabricar *il loco*.

18. Voir *supra*,I,p. 368. et note 2.

19. Gilles Caster, *Le commerce du pastel et de l'épicerie à Toulouse* (1450-1561),1962,p. 381 et 383.

20. Le mot est d'Ernest Labrousse.

21. Voir *supra*,II,p. 7 et *sq.*, chapitre sur "Les Empires".

22. Gaston Imbert,*op. cit.*, p. 181 et *sq.*

23. Pierre Chaunu,*op. cit.*,Conjoncture,I,p. 255 et *sq.* Récession qui serait purement américaine,*ibid.*, p. 129 et *sq.*

24. Frank Spooner, *op. cit.*, p. 8 et *sq.*

25. Pierre CHAUNU,"Sur le front de l'histoire des prix au XVI[e] siècle: de la mercuriale".

26. Voir *supra*, I,p. 292, et *sq*,p. 312 et *sq*.

27. Domenico SELLA, *art. cit.*, *in*:*Annales E. S. C.*,1957,p. 29-45.

28. Voir *supra*, I, pp. 557-560.

29. Voir *supra*, I, pp. 459-468; II, p. 273 et *sq*.

30. Voir *supra*, I, pp. 467—468.

31. Voir *supra*, II, p. 170-172.

32. Fernand Braudel, *art. cit.*, in: *Revue Africaine*, 1928.

33. Je pense aux beaux articles trop riches et discutables de Pierre CHAUNU, "Séville et la 'Belgique', 1555-1648", *in*: *Revue du Nord*, 1960; "Le renversement de la tendance majeure des prix et des activités aux XVII^{e} siècle. Problèmes di fait et de méthode", *in*: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1962; "Minorités et conjoncture. L'expulsion des Morisques en 1609", *in*: *Revue Historique*, 1961; et l'*art. cité* plus haut, p. 217, note 4. La chasse aux événements politiques, c'est un peu la chasse aux papillons.

34. Roberto LOPEZ et Harry A. MISKIMIN, "The economic depress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V, n° 3, avril 1962, p. 115-126.

35. Voir *supra*, I, p. 470. Les indications d'Ömer LUTFI, et Traian STOIANOVICH, "Factors in the decline of Ottoman society in the Balkans", *in*: *Slavic Review*, 1962.

第 三 部 分

事件、政治和人

我经过长期犹豫不决之后，才决定发表本书的这个第三部分。这个部分描述在我们所研究的五十年里地中海发生的事件。它同纯粹传统性的历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莱奥波德·冯·兰克如果今天健在，会在这一部分里辨认出他的原则、他的写作方式和思想方式来。然而，一部总体历史，的确不能把它自身减缩到只对稳定的结构或者缓慢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这些永久性的现实框架，这些保守的社会，这些受到种种不可能性的限制约束的经济制度，这些能够经受时代考验的文明，所有这些我们在前几章中检查过的深入研究历史的合法方式等，在我看来，毫无疑问都提供了人的过去的本质的事物或者至少在 1966 年的今天我们乐于认为是本质事物的事物，但是，这种本质的事物并不是全部。

这种重建过去的方式，可能会使菲利普二世的同代人感到失望。他们作为 16 世纪的观众和演员，在地中海和别处都正确地或者错误地感觉自己参加演出了一出威武雄壮的、他们首先看成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戏。这可能是，甚至非常可能是幻觉。但是，这种幻觉，这种作为一次世界性演出的目击者的感觉，促成了赋予他们的生命以某种意义。

历史事件是瞬间即散的尘埃。它们像短暂的闪光那样穿过历史。它们刚刚产生，旋即返回黑暗中，并且往往被人遗忘。不错，每个历史事件不管历时多么短暂，都带来证据，照亮历史的某个角落，有时甚至还照亮历史的某个广阔的深景。这些广阔的深景不仅仅是政治历史方面的，因为每个历史的所有领域的景观——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甚至地理的——都印满事件的标记，都被事件的断断续续的闪光照亮。本书的前几章有整整几页使用了这些具体的证据。没有这些证据，就往往不可能看清事物。我决不是反对叙述事件。

但是，在开始研讨本书的第三部分时，问题就迥然不同了。问题并不在于为了进行可能超出历史范围的研究而利用叙述事件的历史的光线，而在于像一个优秀的传统的历史学家必须做的那样，问我们自己：是否这些光线合在一起，这些信息彼此结合，会构成一部有价值的历史，一部人的某种历史。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但条件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这个历史是在所有的事件之中作出的选择，而且至少是为两种理由和在两个水平上进行的选择。

首先，这样构想出来的历史只收纳、研究“重要的”事件，并且把它的假设只建立在牢固的或者被描绘为牢固的基础上。这种重要性显然是个看法问题，值得商榷。有助于解释说明问题的事件，即泰纳所说的那种有意义的、细小的但却往往会把我们引导出研讨的题目之外的、把我们引导得远离事件本身的事件，是重要的。正如亨利·皮雷纳喜欢说的那样，有深远的影响和后果的事件是重要的。根据这种看法，用一个德国历史学家的话来说[1]，1453 年攻占君士坦丁堡，甚至就并不是一个什么事件。勒班陀战役（1571

年)这个基督教徒取得了巨大胜利的战役,正如伏尔泰喜欢指出的那样,并没有产生任何后果。这里,我要赶紧说一句,这两种意见都很值得商榷。一个事件如果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是重要的,是他们用来作为衡量事物的参考,用来作为具有本质性意义的分界壕沟,即使它们的确切的影响被夸大了,也可以定为重要事件。对法国人来说,圣巴托罗缪惨案(1572 年 8 月 24 日)把他们的国家切割为二,是法国历史上具有创伤性的转折点。米什莱后来也跟着感情激动地这样说。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有过什么切割的话,也是几年以后,将近 1575 年甚至 1580 年,才发生了真正的切割。最后,一切与先前的事件有联系的、产生后果的、构成一条链条的一个环节的事件都是重要的。但是,这种"成系列的"历史本身是历史学家自己作出的选择结出的果实,或者是主要的文献资料来源为历史学家作出的选择结出的果实。

大体说来,有两条结构相当紧密的链条供我们选择:一条是由最近二三十年的广泛的研究工作重新制作的链条,是经济事件和这些事件的短期形势的链条;另一条是长期制作的链条,是广义的政治事件、战争、外交条约、决定和内部骚乱、内部动荡等的链条。在当时的观察家看来,第二条链条的地位在其他各个系列的事件之上。在这个编年史学家辈出、"新闻记者"开始出现(例如在罗马或者在威尼斯的信传消息的编写人等)的 16 世纪,根据所有密切注意、热心观察政治局势的发展的观众的看法,政治才是真正的比赛。

对我们来说,始终存在两条而不是一条链条。因此,甚至在这些传统历史的领域内,今天跟在莱奥波德·冯·兰克之后,亦步亦

趋，是困难的。然而，危险在于相信这两种排除其他任何链条的链条，在于跃过这种幼稚的用另外一个系列来解释某个系列的做法的陷阱。当人们这样行事时，其他事物的一些链条却被推测了出来。这些链条是社会的、文化的甚至从属于集体心理的链条。

不管怎样，我们承认经济的和政治的现实事物在短时期内或者在很短的时期内比其他各种社会现象易于分类，就意指某一超越这些现象的总的类别存在，就意指需要对事件的表象之后的结构和范畴进行研究。安德烈·皮加尼奥尔在本书第一版出版后写信给我说，我本来可以把这个选择了的顺序颠倒过来：从事件开始，然后超过富丽堂皇的、而且往往把人引入迷途的虚假方面，然后进入结构性特征，最后进入基本的原则和事实。沙漏肯定可以翻转，正、反两面都可以使用。这个形象使我不需要在这篇简短的序言里作长篇大论。

一　1550—1559年：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起和结束

从1550年到1559年，阴森可怖的岁月迅速推移。战争在中断了五六年之后，重新出现。它虽然不以地中海为主要战场，但却多次迅猛地穿越它的空间。这是一场进行得既违反潮流又违反心愿的战争。德意志、意大利和荷兰对欧洲来说，是吸引力更强大的场地。对土耳其来说，波斯是当时最使它对之全神贯注的地区。因此，在这些岁月里，地中海没有一部独立的历史。它的命运是和邻近的以及遥远的地区的命运相连的。在我看来，这些联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这种联系在从1558年到1559年的这些危急的年代中断绝时，地中海被弃置一旁，独自制造它自己的战争。它在这些战争中耗尽大量活力。

1．战争的根源

1545—1550年：地中海的和平

1550年，地中海已经多年平静无事。它的各次战争已经平息。1544年9月18日[1]，在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之间签定了克雷斯皮—昂—拉

奥诺瓦条约。这是一项临时草草缔结的、作为权宜之计的、缔约双方都对之毫无诚意可言的协定。这项协定所安排的几个王朝的联合，不久以后就迅速土崩瓦解。然而，它以后却建立了持久和平。一年后，1545 年 1 月 10 日，经过比较容易的谈判，费迪南和土耳其人缔结了一项休战协定。[2] 素丹坚持协定中的那些具有羞辱性的条款，其中包括向土耳其政府俯首称臣纳贡。但是，这项协定比任何其他措施更能使战争从地中海的东部和西部消除。1545 年，法国能够从地中海撤出 25 艘帆桨战船。这些战船在保兰·德·拉·加尔德的率领下，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前往参加一次在北欧的怀特岛[3] 的登陆。这些微弱的战争愿望接着也消失了，1546 年，法国和英国达成协议。[4]

财政困难迫使人们恢复和平宁静。几个影响很大的偶发事件也促成了这个局面。这些事件就是这个世纪的前半个世纪的伟大武士相继从这个世界消失。马丁·路德于 1546 年 2 月 18 日去世。同年 7 月，巴巴罗萨的传奇式的一生宣告结束。这位阿尔及尔的前"国王"从 1533 年起直到他死为止，成了卡皮坦帕夏，是他的各支船队的主人。[5]1547 年 2 月 27 日和 28 日之间的那个夜晚，[6] 轮到英国的亨利八世去世。3 月 31 日，轮到弗朗索瓦一世去世。[7] 新人和他们的顾问登位掌权，意味着政策和思想都发生变化。由此出现了一个有利于和平的停战时期。

在地中海，这种暂时的平静紧接一系列灾祸之后而来。（这些灾祸为害程度之深为地中海几个世代以来所仅见。）的确，在一个长时期内，尽管有海上行劫者惯常的抢劫和陆上战争，秩序，至少是某种秩序，已经在地中海建立了起来。至少自 12 世纪以来，地中

海是一个基督教湖。此后,基督教世界在北非通过它的商人和士兵,在黎凡特通过岛屿据点,在各地通过它强大的舰队,在面临一个被限制、闭锁在其大陆领土之内的、眼睛向内看的伊斯兰国家的情况下,为了它的贸易和它的文明的最大利益成功地维护它的统治。然而,这种统治的秩序最近崩溃了。障碍突破后(地中海东岸地区的罗得岛于 1522 年陷落;北非的阿尔及尔于 1529 年全部解放),大海的门户就向土耳其舰队洞开了。到那时为止,土耳其舰队除了进行过像在 1480 年对奥特朗托的洗劫那样的冒险之外,还没有在那里冒过什么险。但是,从 1534 年到 1540 年,并且还一直到 1545 年,一场激烈的斗争使局势逆转。土耳其人和柏柏尔海上行劫者结成同盟,在柏柏尔海上行劫者中的最有名的人物巴巴罗萨的指挥下,成功地取得在整个地中海上的霸权。

这是一起重大事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或者和德意志之间的引人注目的斗争,却把这起事件抛到查理五世一生的历史中的次要地位。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由于土耳其开始在海上大规模地推进,由于弗朗索瓦一世和苏里曼接近(1535 年),最后还由于在第一个联盟的几年内(1538—1540 年)威尼斯和查理五世勉强结盟,整个海上的命运危若累卵。对基督教世界来说,这一盘棋几乎完全输掉了。这应该归咎于基督教世界本身的四分五裂,归咎于安德烈·多里亚亲王这个生来就与圣马克共和国为敌的惯施诡计之徒,归咎于既不能也不愿忠实履行与威尼斯缔结的联盟的查理五世本人。哈布斯堡家族在外交上再次信赖卑劣低下的手段,试图收买巴巴罗萨,诱使他叛变。后者则止于无休止地讨价还价,对这件事并不认真考虑。他会为这个不大不小的报偿背叛土耳其人

吗？他如果背叛，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偿呢？是他所要求得到的整个非洲或者仅仅是基督教世界提出要给他的布日伊、的黎波里和波内吗？[8] 最后，这些幕后活动并未能阻止任何事件发生。1538 年 9 月 27 日，[9] 多里亚的舰队不战而退，把普雷维扎的战场丢弃给巴巴罗萨的帆桨战船和低舷长形船。

有人说过，基督教世界 1538 年的失败没有任何可以同土耳其 1571 年的灾难相比拟之处。这次失败只不过是一次退却、一次丧失威信而已。真实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但是，这次失败的后果和影响历时超过三分之一个世纪。1540 年，威尼斯背弃了同盟，同意为法国外交界为它周密安排的单独和谈付出昂贵的代价。然而，对西方同盟来说，没有威尼斯的舰队，就不可能对付土耳其的小型舰队。土耳其的这支小型舰队不久以后由于配备了法国帆桨战船而得到加强。这些法国战船迅速沿着加泰罗尼亚的海岸或者在巴利阿里的水域内抢劫。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国家的集体防御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土耳其向前推进，不再进行打击，而是超越马耳他和西西里的大门。基督教国家在海上被迫采取效能很差、耗资巨大的防守战略。冬季来临，它们只能进行海上行劫式的袭击或者仓促作战，对敌方舰队的后卫进行袭扰。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最后一次巨大的努力，即查理五世对阿尔及尔进行的远征，1541 年在阿尔及尔城下和它的“神圣的”保护者的面前遭到失败。当土耳其舰队攻下尼斯，于 1543 年和 1544 年之间在土伦港作冬季停航时[10]，局势明朗而令人震惊。这使和法国国王同属一个教派的人群情激愤，深感失望，起而反对这位國王。

就这样，穆斯林在好几个世纪后重新占领了地中海全部富饶

肥沃的海岸，远达甚至超过海格里斯石柱峡直至塞维利亚附近的海域。在这个海域，有从美洲满载而归的货船航行。所有基督教国家的船只在地中海航行时，都忐忑不安、提心吊胆，注意提防，除非像土耳其人的同盟者马赛人那样，像土耳其的臣属拉古萨人那样，像在任何情况下都甘心情愿遵守中立的威尼斯商人那样，同土耳其人妥协，受到土耳其人的好意照顾。海上的冒险家、想卖身投靠最强的主子的背教者，都投奔穆斯林。穆斯林拥有速度最快的舰船，数量最多、训练最好的划船奴隶，最后还拥有当时地中海新兴城市之中最强大的城市、柏柏尔人的冒险中心——阿尔及尔。

这意味着君士坦丁堡充分认识到并且衡量了这个胜利的重要性，必欲取得这个胜利吗？[11]土耳其1543年的政策似乎更使人认为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它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休战必要时可以用克雷斯比的和约来解释说明原因，因为没有法国的箝制，就不可能战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军队。因此，苏里曼必须暂时不再打算攻占尚未攻占的匈牙利的这一小块土地。但是，土耳其在海上也没有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和利用它的优势，这更加令人感到惊奇。1560年以前一直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战斗。这是因为巴巴罗萨不再在这个地区出现，或者更是因为土耳其军队在对波斯的战争中不得不在远离君士坦丁堡几千里的丘陵起伏、荒无人烟、冬天休战、军队需要大量马队供应的地方进行艰苦的战争吗？1545年的波斯战争因苏里曼和他那造反的儿子穆斯塔法之间的那场争夺王位的斗争而复杂化。[12]再加上一场同葡萄牙人在红海和印度洋进行的真正战争（对第乌岛进行的第二次包围是1546年[13]）。这一切都迫使土耳其强大的战争机器从地中海转移开。

一些人的灾难就是另一些人的幸福。地中海的城市得到喘息机会。这些城市中，谨慎的，就利用这个休息机会来加强自身防务（在西西里就是这样[14]）。它们的舰船再次在海里巡航游弋。甚至在那些在1535年左右几乎已经从地中海销声匿迹的北欧舰船中，也有一些不久以后再次南下旅行。[15]它们混在从英国返回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大帆船中。一旦时机到来，这些大帆船就毫不犹豫地、大胆地甚至一直驶到摩洛哥的海港。地中海南、北两岸之间的以及两种宗教之间和两种文明之间的再度联系往来意味着和平已经到来了吗？

阿弗里卡事件

是的，和平已经到来。但是，和平在地中海必然导致海上行劫死灰复燃。当然，不可能用统计数字来量度和平。但是，如果全部已知情况都已经编目分类，整理得井井有条，那么参考材料的数字就会清清楚楚地表明这种小规模的战争扩展到地中海的中部地区，没有受到任何制裁。在当时的人佩德罗·德·萨拉扎尔所著的于1570年出版的书中，[16]人们可以读到这些劫掠者驾乘的船只中的几艘在夏天的一连串惊险离奇的经历。这是两艘土耳其低舷长形船和1艘双桅横帆船。它们隶属于配属给德拉库特的舰队，因而以突尼斯的萨赫勒和杰尔巴的南岸为基地。1550年6月——6月这个月份对海上行劫者来说是个大好时期——这3艘船在伊斯基亚岛附近，在那不勒斯的入口处驻守，监视刚刚驶向西西里的东·加西亚·德·托莱多率领的西班牙舰队的后卫。它们首先没有冒什么风险就掳获1艘军需供应船

(帆桨战船总是由难于护卫的圆形军需供应船跟随)。接着，1艘基督教徒的三桅战船也被掳获。之后，仍然在那不勒斯沿海海域的文托莱内岛和蓬察岛之间，1艘满载香料开往罗马的船遭到袭击。上述3艘海上行劫船中的那艘双桅横帆船离开它的两个伙伴后，单独返回杰尔巴岛。两艘低舷长形船继续北驶，出现于台伯河口，然后向杰尔巴岛进发。但是，其中1艘情况不佳，于是返回波内，并从该地驶往阿尔及尔，在这个港口出售它的掳获物。另外1艘则继续航行。在一段时间内，它在皮翁比诺的海上和德拉库特的4艘荷兰圆头帆船并排驶行，但不久以后就让这些帆船开往西班牙。它自身则驶抵科西嘉海岸。它在该处掳获甚微，于是决定返航，沿撒丁岛的海岸航行，先到比塞大然后抵达波尼。这艘船于8月驶返阿尔及尔……如果我们用10或者20这个数字来乘这种航行事迹，并且想到也同样忙于劫掠的基督教徒海上行劫者的话，[17]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关于海上行劫在1550年的那些年代里在地中海的生活中所具有的份量和所占的地位的概念。

当然，海上行劫没有任何事物类似大型舰队的威胁。海上行劫者仅仅限于小规模的活动，对城市、堡垒和舰队则敬而远之。可以说他们从不在某些海岸附近冒险。但是，其他一些海岸，例如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海岸，则是他们喜爱的常去之地和猎捕奴隶的猎场。一种真正的猎捕人的活动在这些地方进行。对非洲的海上行劫者来说，和猎捕奴隶这种活动同等紧迫、同样重要的是猎捕驶离西西里南部海岸的载货船运载的小麦。载货船本身有时受到袭击。

在这些捕食西西里的小麦的海上行劫者中，德拉库特是最危险的人物。他原籍希腊，年龄在50岁左右。他有过一段长期冒险

生涯，其中 4 年是在热那亚的帆桨战船上当俘虏。1544 年初，巴巴罗萨亲自交涉把他赎回时，[18]他还在船上划桨。1550 年，他定居杰尔巴。[19]他每次进行海上行劫之后，就回到那里，并在那里过冬。过冬期间，他得到他的海伊斯们的照顾。他征募船员。由于杰尔巴的居民对他容忍，他便利用当地居民内部的争吵，于 1550 年不失时机地占领了位于突尼斯的萨赫勒的阿弗里卡这个小城市。阿弗里卡位于斯法克斯以北，差不多和凯鲁万在同一纬度上，是个狭长的寸草不生的岬角，既没有树木也没有葡萄园。这个城市过去在法蒂米特家族统治时代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时期。它现在衰落了，与其说它是个城市，倒不如说是个村庄。然而，对德拉库特来说，这个小城市由于有它的水域和颓垣断壁的掩护，却是在通往西西里的航途中的一个有用的停泊场所，是他在等候更加美好运气期间的家。

这个地方更换了主人这件事，立刻使西西里的大门另侧的负责当局警觉起来。那不勒斯总督接到热那亚的专差信使的通知，立刻下令攻占这个小港。据说，在战略上，这可能是个比阿尔及尔更重要的地方。[20]我们不应该过快抱怨这是在夸大其词。受到德拉库特的推进威胁的不仅仅有对西部地中海的供应来说必不可少的安全，而且还有“突尼斯”——哈弗西德家族的衰落的、被突尼斯城的统治者控制掌握得很差的王国。西班牙之所以容忍突尼斯的这些统治者，是因为它能够（由于有在拉古莱特的驻防地）保护他们并在必要时使之就范。现在西班牙认为这个仍然富有而且被西西里人觊觎垂涎的突尼斯、这个伊弗里基亚，或许会被土耳其人改组成一个更加强大、团结的国家。1535 年，查理五世御驾亲征，以便把突尼斯从上一年定居该地的巴巴罗萨的手中夺走。[21]基督教世界

会袖手旁观，听任土耳其有朝一日会支持的德拉库特占据邻近的地盘吗？人们对阿尔及尔的迅速崛起记忆犹新。阿弗里卡可能是个开端。

4月12日，查理五世（他很快被人告知）在一封他从布鲁塞尔写给素丹的信中对德拉库特的所作所为大事抱怨、提出抗议。海伊斯们难道没有破坏过休战协定吗？当时代表费迪南正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马尔维齐大使也同时收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训令。[22]

然而，从4月起，德拉库特就准备开始他的狩猎季节。他布署了一支由500名土耳其人组成的警备部队留守阿弗里卡后，于20日抵达法里纳港。一份西西里的公文急报报告说，他率领的3,000艘帆船在西西里附近海域出现；还报告说，一旦把这些船的船底涂上动物油脂，一旦天气有利，他就出海抢劫。[23]那不勒斯顷刻之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那里的人正急切等待多里亚亲王率领帆桨战船到来。但是，亲王的舰船很晚以后才于5月7日到达。[24]10来天前，即4月29日，一份公文急报报告德拉库特在墨西拿附近埋伏，伺机抢劫运粮船只。[25]之后，他的舰船像前面我们曾经跟踪的那3艘战船一样，时而集结，时而分散，继续在基督教世界沿海海域巡弋。海岸哨兵未能每次都及时发出发现它们的警报。5月7日，[26]在那不勒斯获悉的关于海上行劫者的情况，只不过是他们的船只已经西驶并可能向西班牙方面进发而已。至于其他情况则毫无所知。

因此，自然要进行一次反击。查理五世的“卡皮坦帕夏”、年迈的多里亚亲王，5月7日率领他的那些装备很差、配员不足（至少缺划桨者1,000名）但很能完成警察行动的帆桨战船抵达那不勒斯。这些舰船载有步兵2,000名。[27]多里亚11日[28]离开那不勒斯

时，他的意图是趁德拉库特不在阿弗里卡的这个时机占领该地。但是，他开始在阿弗里卡北面进攻小港摩纳斯提尔时，在那里遇到的困难大大超过他的预想。如果这个海港防守得再熟练巧妙一些，西班牙步兵会在这次战斗中全军覆没。[29]困难既然如此之多，因此他很注意发出的警告。他深知在阿弗里卡这个地方有大炮和火枪在等待他。在向该地发起进攻之前，他派遣 24 艘帆桨战船前往那不勒斯，其任务是在那里运载 1,000 名西班牙增援士兵和进行包围战所需要的大口径炮。他还要求任命一名指挥远征部队的将军。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西西里的总督胡安·德·拉·韦加 7 月 3 日接到这项任命。[30]

这种种措施足以使那不勒斯在整个 6 月份都处于积极备战和激昂振奋的状态中。一些方济各会的教士加入运输队伍，他们佩带着有耶稣像的大十字架，意志坚决，发誓要让这些狗胆战心惊。每个人都“怀着不是战斗就是死亡的最大决心”，[31]离开家园、奔赴前线。总之，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样：斗志昂扬。

6 月 28 日，包围战开始。[32]这次围城之役历时近 3 个月。直到 9 月 10 日，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马耳他骑士才攻下阿弗里卡。[33]多里亚和他的水手们作为旁观者目睹了这一战役的前后经过。这项围城任务并不简单。在战斗间隙期间，不得不要求增援骑兵 500 名。佛罗伦萨公爵的军需物资供应官送往比萨的作战消耗物资总表表明，远征部队作战时毫不吝惜炮弹和火药。[34]

攻下阿弗里卡毕竟只不过是一次小胜而已。德拉库特构成的危险已经排除。西西里人保留这个遥远的前哨阵地仅仅短短几年时间。他们偶尔和南部游牧民进行几次接触，共谋采取行动。这是

一项容易但并无多大效益的举动[35]。由于马耳他骑士团不愿负责防守这个前哨阵地，在警备部队发动的一次相当离奇的兵变后，小堡垒拆除，堡垒的围墙被用地雷炸毁。[36]1554 年 6 月 4 日，该地占领军撤到西西里[37]，并从那里投入锡耶纳战役，因为事物是互相关联的，任何部队都不能长期按兵不动，袖手旁观。[38]

1550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奥格斯堡正为其他事务焦头烂额、烦恼万分。在他看来，上述事件只不过是一次微不足道的交战而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有其他要操心关注的事，例如皇帝家族的事务和德意志的政治和宗教局势。10 月 31 日，他写了一封长信给素丹。[39]在这封信中，他再次对德拉库特的所作所为大事抱怨，声称德拉库特的行动违反了停战协定的条款。他还在这封信里解释他为什么不得不进行干预。总之，这差不多是一封道歉信，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来没有比 1550 年这一次更急于不惜任何代价坚持对土耳其执行和平政策。不如此，他就不可能腾出手来在欧洲和德意志为所欲为。按照当时的惯例，惩罚一个海上行劫者、一个歹徒，并不一定意味着冒犯素丹。停战期间每天都不得不处理调解这类事，而且也的确处理、调解了这类事。因此，查理五世并不认为阿弗里卡事件特别重要。这在他那方面是一次失算，因为第二年土耳其人在那里发起强大的反击……其他一些比阿弗里卡事件更加重大的理由也在这次反击中起了作用。阿弗里卡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穆赫尔堡战役进行之后不久

要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就必须先回溯过去，先回溯1544年、1545年和1546年这些表面上和平的年代，然后回到1547年4月20日进行的穆赫尔堡大战上来。这个战役一下子就把德意志和欧洲的命运固定下来（如果这样变化无常的命运能够固定下来的话），因此也把地中海的命运固定下来。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来说，这是一个甚至比帕维亚战役的胜利更重大的胜利。德意志终于属于他所有，而过去查理五世所缺乏的几乎总是德意志世界的始终不渝的支持。这不仅仅是个胜利，而且还是个奇迹，因为正好像是为了使他易于实施一项长期构想的计划一样，他周围的一切困难全都已经克服。1544年9月18日，对法战争结束。1545年12月[40]，主教会议在特兰托再次开会，教会取得重大胜利。11月，对土停战协定签订。最后，罗马教廷于1545年6月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缔结联盟。[41]这是对一个事实上已经存在的联盟的可贵的确认。这个联盟已经存在多年，其矛头指向德意志的新教徒。但是，尽管如此，它并不能阻止罗马经常提防查理五世对强大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执行的拖延政策，也不能阻止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面对时而与他敌对、时而同情他的罗马的奇特的强大力量经常谨慎行事。这次，在法尔内兹红衣主教于1545年3月[42]在沃尔姆斯的会议上进行谈判以后，前景比过去光明得多。罗马的支持意味着获得军队和金钱——一笔30多万杜卡托的巨款——，还姑且不谈西班牙教会收入的一半。在罗马，这笔收入被人称为半个果子。因此，这也是个财政胜利[43]……

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很晚才决定进行第一次打击。其原因也许是它的掌玺大臣公署难于从大量公文中脱身出来处理国务,也许是军需供应缓慢。1545 年 9 月,神圣罗马帝国驻罗马大使胡安·德·拉·韦加在罗马[44]眼见良机即将坐失,于是焦急烦躁起来。

由于法国保持中立,甚至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半串通一气,由于土耳其即使不是保持中立至少也是不积极行动,因此进行干预的机会真是千载难逢、非常之好。9 月,胡安·德·拉·韦加对他的秘书推心置腹,吐露衷情说,他紧急呈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篇要让人读给这位君主听的长文。这篇文章所包含的梦想和空想真是何其多。查理五世如果获得胜利,就必须把神圣罗马帝国改为王位世袭的国家,废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仪式,使这个帝国变成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国家。之后,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国国王结成联盟以便征服英格兰,并从土耳其人手中收复匈牙利。法国将重新获得博洛尼亚以补偿它失去的米兰。由于费迪南的女儿的婚姻,被再度征服的匈牙利将归属她的丈夫奥尔良公爵。这篇长文虽然只不过是一个计划、梦想和泡影的混合物,却使人能够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观察到当时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宫廷的奇特的环境气氛的一些景象。16 世纪的世界四分五裂,为害自身。在这个世界里,某些集团令人难以置信地朝思暮想,亟欲恢复世界的统一,无时无刻不在重温十字军东征的旧梦。查理五世本人如果竟置身于这种思潮之外,倒会是个不可理解的人物。

但是,我并不打算在研究一个世界——地中海世界——时,把注意力集中到另一个世界——德意志世界——上,不管这后一个

世界在这个世纪的中叶具有多大的决定性作用。这里，我的目标是让人看到，战争在经过德意志和德意志以外的环境的长期孕育培养之后，而首先又是在经过地中海的安定本身的孕育培养之后，最终如何在德意志爆发，战争怎样保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取得胜利，这个胜利又怎样同时导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各个对手互相接近。他们的共同努力再次破坏了欧洲的均衡，使之不利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战争先限定在德意志的范围内，然后才逐渐蔓延到与德意志邻接的欧洲的其他地区和地中海。这是 1547 年 4 月进行的、日期久远的穆赫尔堡战役和在 3 年之后发生的地中海战争的再起之间的从来没有被人揭示出来的联系，虽然这个联系是明显的。

1547 年 4 月 24 日在云雾笼罩的厄尔巴岛上获得的这次胜利，究竟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什么呢？这首先是一个威信方面的无可争辩的胜利，因为这个胜利大大出人意料，而且得来之快使战胜者本人也大为惊讶。取得这个胜利并不是由于指挥有方。在战胜者方面，保密不严，部队集中缓慢，大炮运输无人护送，本会遭到截拦。[45]但是，新教徒本身四分五裂，最后时刻因莫里斯·德·萨克斯的背叛而丧魂失魄，于是他们的首领和数千名士兵落入敌人手中。他们的撤退变为崩溃。[46]查理五世一举而摆脱了“15 年来最折磨他”的事物，即施马尔卡尔登同盟这个所有信奉新教的德意志的诸侯的组织，这个向罗马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造反的组织。[47]

这个德意志既然已被征服，查理五世就打算在政治和宗教两方面把它组织起来。这就产生了引起激烈争论的奥格斯堡的职位空缺期（1548 年）问题和引起同样激烈争论的神圣罗马帝国帝位

的继承问题。后一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更引起我们关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确试图保证他的儿子——西班牙的菲利普——将来能够统治德意志，并因而试图把神圣罗马帝国帝位的继承问题同勃艮第和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联系起来。这是与德意志舆论的明显意愿背道而驰的。从1546年起，新教的宣传就宣称，没有外国人能够统治我们，因此，西班牙犹太人也不能统治我们。[48]非新教徒的德意志人的意见与此毫无二致。1550年9月，特里夫斯的选帝侯公开扬言他不愿意西班牙人支配德意志。[49]同年11月，奥格斯堡的红衣主教对西班牙人的骄横无礼大发雷霆，声称德意志只能容忍一个德意志君主在它自己的头上。[50]1551年2月，威尼斯人说："有很多选帝侯不愿选菲利普，声称他们宁可与土耳其和好。"[51]

置这些感情于不顾就是疯狂。但是，紧接穆赫尔堡战役之后，胜利者又有什么事不能下手干呢？只有少数几个自由城市还在继续抵抗。然而，它们又还能坚持多久呢？不能指望从国外得到任何支援，因为土耳其人把他们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之间的停战协定延续了5年(1547年6月19日[52])。法国的确已经明确表示了一些微弱的行动愿望，但是，弗朗索瓦一世已经在穆赫尔堡战役之前死去。法国的新国王已经卷入北欧的争端，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企图卷入这个争端。法英之间争夺布洛涅的战争1548年开始。[53]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来说，在罗马出现了困难的、严重的、特别具有揭示性的关于教皇的地位的问题。但是，这些困难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其次，保罗三世于1549年11月10日死去。[54]哈布斯堡家族在德意志放手大干，为所欲为。事实上，他们主要是在那里争吵……

哈布斯堡家族长期忠心耿耿，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周围形成一个线束。的确，如果没有这个线束，查理五世的帝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正如在一个最普通的家庭里一样，一旦继承问题来临，这个线束就松开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帝位继承问题早在1546年，可能还更早，在穆赫尔堡战役进行之前就已经提出。1547年，当议会在当时军人还满坑满谷的城市奥格斯堡召开时，这个问题再度被人提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本人需要思考他本身辞世的问题，于是自己把帝位继承这件事提出来讨论。他的这种对辞世的思考推促他留下大量遗言。

查理五世47岁难道不已经是个老人了吗？在那些峥嵘岁月任何一个经历过军旅征战的艰苦生活的军人50岁时就已经精力耗尽、衰竭不堪。后来蒙莫朗西的安娜的长寿使与他同时代的人感到极为惊讶。与查理五世同一时代的人亨利八世和弗朗索瓦一世都在穆赫尔堡战役进行的那一年刚刚死去。亨利八世终年56岁，弗朗索瓦一世终年53岁。各国大使不时报告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还饱受痛风病的折磨，已不久于人世。他们还指望这个老人尽快死亡。他们又说："这个老人整天整天脾气很坏，情绪恶劣，一只手已经瘫痪，一条腿弯缩在身体下面，他拒绝接见任何人，把时间消磨在拆卸和装配钟表上。"[55]

然而，这个人仍然怀着一个热烈的愿望：把他的全部遗产传给他的儿子菲利普。这是一种既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也出于父爱的愿望。因为他喜爱这个很有条理、行事审慎、思考缜密、对人尊敬的儿子，这个他乐于或从远方或就近亲自培养教育的弟子。他现在是德意志和欧洲的主人。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这个儿子召唤到自

己身旁。自从 1542 年起就统治着西班牙的菲利普，1548 年 10 月 2 日离开巴利亚多利德，把他的堂兄弟、费迪南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留在他的职位上。这一年他 21 岁，第一次环游欧洲。一个即使并非笔触生动至少也是审慎细致的编年史作者，[56]向我们详细地叙述了此行的礼仪方面的所有细节。西班牙贵族的精英——从父亲到儿子[57]——随同菲利普作这次旅行。老多里亚的整个舰队执行勤务，把这些人从加泰罗尼亚的小港罗萨运往到热那亚。帆桨战船的桨漆得五彩缤纷。饰金的船头灿烂夺目。船上奏着音乐。在陆上，在前往布鲁塞尔途中，凯旋门相继出现，欢庆、演说和盛宴接二连三举行。1549 年 4 月 1 日，这个世界的继承人在布鲁塞尔再次同他的父亲会合。查理五世立即让人承认他的儿子是他在荷兰的继承人。这是个颇不寻常的步骤，因为当时荷兰在名义上仍然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举行了“册封”这位太子为佛兰德伯爵和布拉邦特公爵的“册封盛典”。这位太子在南、北各个城市露面。这些城市自 1549 年春天到秋天轮流正式举行官方庆典，迎接这位太子。这次德意志巡行不久就激起一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尖锐、激烈的关于继承帝位的争端。

在议会召开的地点奥格斯堡，哈布斯堡家族于 1550 年 8 月举行了一次真正的家族会议。这次会议的讨论在微笑和正式祝贺中连续进行，几乎一直没有中断。这次会议历时 6 个多月。查理五世遭到他野心勃勃的兄弟，或者说得更确切些，遭到他的兄弟的家族——“费迪南分子”——的反对。费迪南家族中最顽强狂热的分子，是这个家族的长子、当时的波希米亚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侄儿和女婿马克西米利安。事实上，正是查理五世自己造成了费迪南

家族的强大威势。1516年，在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时刻，费迪南在他哥哥面前退避三舍，销声匿迹，尽管他可能曾经为这件事争吵计较过。不久以后，他就得到报偿。他通过1522年的条约得到完完整整的奥地利世袭领地。9年以后，1531年1月，他升任罗马人的国王，并以这个名义在他兄弟长期离位期间统治德意志。这个“被授予亲王采地”的家族，已经懂得如何自力更生，扩大威势，于1526年兼并了中欧的堡垒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或者说得确切些，匈牙利的领土中土耳其人留下的未加占领的那一部分。1550年的局势对它有利。由于德意志既不愿屈服于外国统治，也不愿接受天主教，因而也不愿接受体现这两者的西班牙的管辖，所以转向维也纳的王侯。它希望继承费迪南的是马克西米利安，而不是菲利普。

查理五世有个同盟者——他的姊妹匈牙利的玛丽。这个玛丽对自己的家族感情热烈、忠诚虔敬。她自1531年以来就统治着荷兰。这项帝位继承的计划可能出自这位姊妹之手。[58]总而言之，是她对费迪南进行了说服。难道费迪南不是像受恩于查理五世那样也受恩于她吗？1526年，她的丈夫、匈牙利的路易在莫哈奇战役中阵亡。这个战役后，她帮助费迪南取得死者的继承权。9月，她前往奥格斯堡，在教务会议上耐心而坚决地严词谴责顽固不化的费迪南。当她回到荷兰时，在奥格斯堡留下一个缓和和平静的局面。不错，人们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暂时保持沉默，那是为了等待马克西米利安。他一到来，讨论就重新激烈起来，并且立即恶化。这些讨论是奇怪的秘密会谈，用法文进行，以纪念这个家族的埋葬在第戎的查尔特勒修会会址的勃艮第祖先。在讨论中哈布斯堡家族的人像狂热的普通继承人在公证人面前那样争吵。他们同时就德意志

和欧洲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争论。

马克西米利安来到时，会议的调子发生了变化。他的泄露秘密的言行，使到那时为止关起门来秘密进行的讨论公诸于世。大使们的日记充满了耸人听闻的详情细节。查理五世大发雷霆，几乎绝望。1550 年 12 月，他致函他的姊妹说："我向你发誓，我不能再容忍了，不然我会死的。"[59]从来没有任何事物，即使是"死去的法国国王"对他的所作所为以及法国王军统领蒙莫朗西现在对他的"顶撞"，都不像他的兄弟国王的态度那样使他痛苦不安。玛丽接到这封信就于 1 月返回。这次所有进行调解的企图都成泡影。于是查理五世决定通过 1551 年 3 月 9 日的单方面的苛刻的解决条件，采取强制手段来贯彻他的旨意。这项单方面的苛刻的解决条件[60]的正文后来相当神秘地就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房间里由阿拉斯的主教执笔拟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保留给菲利普，但是，他在未来某个时期才能正式拥有这个称号，因为这顶金质王冠首先由他的叔父继承，而与此同时，罗马人的国王这个称号则由菲利普继承。费迪南以后一旦去世，菲利普就将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则将成为罗马人的国王。在这之后不久，菲利普还另外得到被授予"封建的"权力的允诺。这项权力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意大利以意大利领土上的帝国代理人的名义拥有的。[61]

但是，这项协议后来成了一纸具文。[62]费迪南家族的人虽然受到谴责、威胁、恐吓，但知道他们能够指望有朝一日时来运转。马克西米利安不同法国国王眉来眼去卖弄风情时，就会是路德派教徒的朋友，就会是莫里斯·德·萨克斯的朋友。路德维希·普范德尔并不能很令人信服地论证说，[63]这甚至就是查理五世顽固不化的

原因，因为他不愿意把帝国交给这样一个不可靠的人，交给一个半异教徒。然而，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找到的这个解决办法并不可行。奥斯斯堡议会甫告结束，一些诽谤性的小册子和侮辱性的煽动性招贴就警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人们经常因这项计划的失败而指责年轻的菲利普。这个认真、冷漠、勤奋、对一个曾经被那个时代的人说成喜爱杯中物甚于喜爱路德教义[64]的国家的语言和习俗风尚都毫无所知的孩子可能输掉了他要参加的那盘个人的赌博。但是，难道他可能赢吗？奥格斯堡的裁决难道没有预先就遭到德意志和欧洲的谴责吗？

首先是遭到德意志的谴责。怎么能够期望使用南欧的、肆无忌惮的、由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组成的外国军队来控制德意志呢？德意志民众对这些外国团队的仇恨情绪立刻激烈起来并且与日俱增。此外，长期维持这些军队是不可能的。因为维持一支军队耗资巨大。1551 年 8 月这些军队撤离德意志[65]已经意味着穆赫尔堡战役胜利之影响的极大衰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德意志的同盟者寥寥无几。即使南德意志的天主教城市也并非毫无保留地站在他那一边。它们珍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更珍视和平。至于那些德意志诸侯，则根本不应该指望依靠他们，特别因为这个瓜剖豆析、四分五裂、非常难于统治的德意志世界对它周围的欧洲国家来说，时时刻刻都能够提供进行干预的时机和借口，而欧洲本身也并不比德意志更希望神圣罗马帝国取得胜利。

就这样，战争的威胁在德意志和它附近的地区缓缓增大。之所以缓缓增大是因为缔结协定、征募军队和安排必需的供应等需要时间。外交官员在这些不祥的备战活动迟缓而困难地进行之前很

久，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出警报。

神圣罗马帝国派驻法国国王处的大使西蒙·勒纳尔这次是最细心的汇报这一活动的人，因为法国在正准备发动的攻势中扮演首要角色。这个国家自从通过 1550 年 3 月 24 日缔结的条约[66]摆脱了对英战争以后，就腾出手来为所欲为。在这个日期以前，西蒙·勒纳尔早就对法国的外交阴谋深感不安，这是有理由的。停战协定在到期以前会遭到破坏吗？法国国王难道没有试图说服土耳其人在到期以前取消停战协议吗？（1550 年 1 月 17 日的信[67]）。与此同时，他还在不来梅采取行动，在他的宫廷中养着一批西班牙逃亡者。甚至据说他企图朝着丰塔拉比这个方向发动进攻（见菲利普 1 月 27 日致勒纳尔的信[68]）。菲利普写道，法国人要弄阴谋诡计。[69]而法国的外交函件也证明这些传闻确有其事。这些传来传去的新闻环绕着王军统领蒙莫朗西的无法预卜的政策和他本人。这位王军统领为人谨慎小心，但有时也会言词粗鲁、行动暴烈。当然，这已不再是 1540 年的“合作”[70]了。

自对英战争所形成的障碍被清除之日起，法国的对抗作用就更加强大、更加有效。西蒙·勒纳尔注意到法国的行动所产生的反响。4 月 2 日，法国代表奉派前往土耳其和阿尔及尔。布洛涅要塞不再需要的守备部队向皮埃蒙特方面转移。[71]25 日[72]威尼斯人毫不掩饰他们对宣布缔结法英和约一事感到高兴。在他们看来，这项和约似乎保证法国将不归还皮埃蒙特，并将继续在北欧、在整个意大利同西班牙的统治抗衡。在同一个 4 月 25 日，一个法国代表被派往谢里夫处。谢里夫由于入侵奥兰地区和据说他计划对半岛本身采取某些行动，使西班牙深感不安。[73]据说，法国代表提出用目前

在对英斗争中已不需用的法国舰队来帮助他。瞄准的目标是格拉纳达王国。

显然，法国到底意欲何为，这是永远也无法得知的。西蒙·勒纳尔在 4 月 25 日这同一天写道："陛下，在这个王国，事态和议论是如此变幻莫测，以致要发现、报告法国人的行动的真实情况，十分困难。"总之，多嘴多舌、滔滔不绝、喜好谈论——这是法国人的一个缺点——难道同西班牙人的沉默寡言、守口如瓶，不同样是掩饰自己要玩弄的花招吗？然而，几个月以后，西蒙·勒纳尔作出结论说："法国国王不相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为了粉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图谋，同德意志人、瑞士人、摩尔人以及不信仰基督教的人谈判。"[74]9 月 1 日，西蒙·勒纳尔添加说，法国国王还同那不勒斯的流放者、逃亡者，同阿尔布雷公爵，同摩洛哥的谢里夫[75]进行谈判。12 月 6 日，丰塔拉比再次作为法国国王将要进攻的据点被提及，"法国国王知道丰塔拉比是西班牙的锁钥"。[76]威尼斯人最求之不得的莫过于看见这场法西之间的战争爆发。法国人似乎已经下定决心打这一仗了。"促使他们进行这场战争的，是他们在德意志的情报活动和秘密勾结。"一旦发生敌对活动，德意志就会起来造反。莫里斯·德·萨克斯难道没有在议会里直率地提出过吗？土耳其皇帝也进行怂恿。他答应"率领一支足以把陛下从柏柏尔、西西里和那不勒斯赶走的舰队前往，之后把将被他攻占的地区交给法国人"。这些计划西蒙·勒纳尔通过各种来源和渠道有所风闻，并且由一个充当翻译（阿拉伯文—土耳其文翻译）、住在巴黎的名叫德麦蒂科的希腊人加以证实。阿尔及尔"国王"派驻法国国王那里的大使可能在亨利二世进入布卢瓦的同一天到达。他受到法

国国王和王军统领的接见。他们谈到"陛下这一年在阿弗里卡取得的胜利"。根据最新消息,土耳其人将以在匈牙利修建堡垒违反缔结的协定为借口破坏停战协定。

第二年,西蒙·勒纳尔的信件[77]还详尽地叙述了关于丰塔拉比、某些德意志城市、意大利和柏柏尔等地的与上述情况十分类似的事。一个马耳他骑士报告说,桨、帆从马赛运到柏柏尔。在这之后,令人警觉的迹象倍增。法国大使 4 月 12 日返回君士坦丁堡。这是即将发生重大事件的征兆。5 月 27 日,蒙特吕克乘船前往意大利。法国国王下令在马赛装备 4 艘帆桨战船准备出航。事实上,最后就在帕尔马问题上爆发了战争。教皇于勒三世在那里向法尔内兹家族发动进攻。法尔内兹家族的背后是法国国王。教皇的背后是神圣罗马帝国军队。这头几枪是中间人打的。这几枪的枪声低沉、微弱。但这是大战的开始。先是隆隆炮声在整个欧洲不断增大。最后,大战终于爆发。7 月 15 日,人们在奥格斯堡获悉土耳其舰队最近驶抵那不勒斯沿海海域。[78]

2. 地中海内外的战争

第一枪的确是土耳其人打的。他们怎么能够让基督教徒在从马耳他骑士团占据的的黎波里[79]到阿弗里卡和拉古莱特的这段非洲海岸上定居下来,沿着这条最重要的可以完全切断或者至少可以严重阻碍他们的通往西方的道路的线上稳稳当当地定居下来呢?德拉库特没有力量单枪匹马对抗安德烈·多里亚的几支舰队。1551 年 4 月,他在杰尔巴岛的南部挖掘一条横贯退潮时露出的沙

滩的运河[80],用这种绝望时采用的计谋才使自己得以在这个岛屿上逃脱这几支舰队的袭击。德拉库特有被从非洲海岸连根拔除的危险。另一方面,据说马耳他骑士打算放弃他们的丘陵起伏、贫瘠荒凉的岛屿,一直迁往阿弗里卡和的黎波里,他们在那里可以控制附近海域。土耳其人会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就在柏柏尔的入口修建一座罗得岛的新的固若金汤、不可攻克的堡垒吗?[81]

的黎波里的陷落:1551年8月14日

然而,一切进展得如此之慢,以致土耳其人能够根据最站得住脚的外交准则,大胆断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违反停战协议的条款,沿匈牙利边境地区构筑防御工事。他在特兰西瓦尼亚策划阴谋活动。[82]他进攻素丹的同盟者德拉库特。1551 年 2 月,一个土耳其使者——这是一个拉古萨人(他取道君士坦丁堡和奥格斯堡之间的陆路)——前来觐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宣称:皇帝必须拆毁佐埃诺克的堡垒并且归还阿弗里卡,否则将会爆发战争。[83]这里有个很小的奇怪的细节:锡南帕夏抵达墨西拿的灯塔前面,他的整个舰队在福萨·迪·圣焦瓦尼集结。这时,他致函总督[84],重申这项归还要求。这项要求当然遭到拒绝。人人都焦急地寻思素丹的舰队会采取什么行动。它将开往马耳他、阿弗里卡、的黎波里还是继续向西驶行以便同法国的帆桨战船会师?法国会采取什么行动?这就是查理五世在奥格斯堡为之焦虑不安的事。[85]

土耳其舰队在进行佯攻之后,于 7 月 18 日抵达马耳他,[86]力图在该地登陆,然后一直推进到戈佐岛。该岛惨遭洗劫蹂躏。土耳其

人从该岛抓走5,000到6,000名俘虏。[87]7月30日，土耳其舰队扬帆启碇，驶往非洲海岸。马耳他和的黎波里的情况一样，8月初还存在这样的希望：这只不过是一次声东击西的佯攻而已。法国驻土耳其大使阿拉蒙在前往君士坦丁堡途中，于8月1日到达那不勒斯。当时风传他是来这里寻找舰队以便随同这支舰队前往西方的。舰队将在西方停泊过冬。远征部队很快就开始在的黎波里西部的祖瓦赖和东部的塔朱拉登陆。

1510年7月，的黎波里曾被西班牙人攻占，并于1530年被西班牙人转让给马耳他骑士。这是个很小的土著城市，是个设防情况极差的驻防城市。城内住着为基督教徒服务的阿拉伯人。城区有一道残破的城墙围绕。城墙有的地方筑有城楼，但城墙基本上用泥土砌成。面对港口的是一座老式城堡。城堡有四座角楼和墙。墙小部分用石头砌成，大部分则用泥土砌成。最后，一座小城堡用炮火控制着海港的进口通道(海港宽大水深，足够停泊1,200萨尔马的大帆船)。这座小城堡修筑在伸入海中的狭长陆地上。这片陆地通向在西边掩护海港出口处的岛屿。这种小城堡或者阿拉伯人所叫的Bordj el Mandrik，是一种质量十分低劣的堡垒，之所以质量十分低劣，是因为这个贫瘠的地区缺乏木材、石料等。据说也由于骑士团团长胡安·德·奥尔梅德斯吝啬，不愿花钱修建得好些。在堡垒内有由说奥弗涅方言的元帅弗拉·加斯帕尔·德·瓦利埃统率的30名骑士和630名在最后紧急关头才征募来的、素质很差的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的雇佣兵。这位元帅在经受考验的时刻，显得庸庸碌碌。[88]

因此，尽管土耳其人在冬季到来之前可用来攻城的时间很少，

但攻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这次攻城，进攻者可以登陆、轻易取得供应、挖掘前进壕沟，布署3支各配备火炮12门的炮队来轰击城堡。被围困的士兵哗变，强迫司令投降。谈判十分简短。土耳其人要求把城防工事完整无损地交给他们。交换条件是：在已经同土耳其人会合的法国大使的干预下，守城的马耳他骑士保全了性命并且获得自由。他们搭乘大使的帆桨战船灰溜溜地回到马耳他，士兵们却留在敌人手中。这些士兵抗命不从，这是他们罪有应得[89]……

以上至少是博西奥这个马耳他的“有产者”的记述。他在内心毫无疑惧、十分安宁的情况下，把随后在马耳他审判负责的司令官时所用的论据作为他的材料来源提供出来。全部过错都加在不再在那里进行自我申辩的被俘士兵的头上。但是，这起案件当时产生了大量传闻。法国骑士加斯帕尔·德·瓦利埃像历史学家萨洛莫内·马里诺硬说的那样叛变了吗？至于对阿拉蒙大使的严重指控、污蔑就更不必说了。或许必须指控西班牙人德·奥尔梅德斯本人带来这场灾难吗？这个人至少表现得鼠目寸光、缺乏远见。

是谁的过错，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由于的黎波里陷落，土耳其人拥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战斗的和同柏柏尔联系的工具。这个城市是非洲内陆传统的出口，这次将恢复它过去的重要地位。基督教徒过去占领这个城市后，撒哈拉的贸易转向黎波里附近的塔朱拉。塔朱拉是莫拉特·阿加这个粗暴的人的采邑。1551年的胜利使莫拉特·阿加得以高踞的黎波里的帕夏管辖区的首要地位。于是，黄金和奴隶再次踏上这条通往这个“富有黄金的”城市的道路。

土耳其的这次突然袭击，也发出了正在欧洲酝酿准备的全面战争的信号。法国的挑衅和冒险行动变本加厉、大大增加。与此同

时,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也采取预防措施,从8月份起夺取了法国在荷兰的全部船只。[90]遭到亨利三世和王军统领侮辱的教廷大使一遇到愿意听他讲话的人就宣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91]有人已在加斯科涅征募兵员。[92]吉斯公爵的3万名官兵和7,000匹马越过巴罗瓦和勃艮第的边界。但是,这些人马不会立即抵达意大利。西蒙·勒纳尔说,对法国人来说,在意大利的帕尔马和米兰多拉,事态发展得相当糟糕。[93]马赛的帆桨战船大概接到命令去同土耳其舰队会师。[94]

这种种危险沉重地压在施展谋略手腕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上。财政困难对他的压力也并不稍轻。在这个他必须应付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问题的困难时刻,财政困难是个严重问题。他担心西西里岛的命运,于8月份下令把西班牙军队和意大利军队从符腾堡调往该岛。很少有什么行动比这个表面上十分简单的措施更加重要了。查理五世离开德意志时,让他的兄弟前去占领他自己将从那里撤出他自己的军队的要塞,但他的兄弟要自己为占领这些要塞支付费用并且在查理五世认为适于采取这一行动时这样做。费迪南这时却对匈牙利边境的情况忧心忡忡。那里的战争也在蔓延。而且他虽然在那里得到那时已经暂时转而赞助哈布斯堡家族的特兰西瓦尼亚的支持,但他觉得很难抵抗鲁梅利的省长穆罕默德·索科里[95]的对疆土造成巨大破坏的袭击。

查理五世这次让占领军换防这个举动,直接助长、促成、诱发了1552年德意志的叛乱。他过高地估计了土耳其的危险吗?如果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也并非他一人如此。8月15日,总督托马斯·德·维拉努埃瓦从巴伦西亚告知菲利普有敌军登陆的危

险。[96]8 月 24 日，维尔格尼翁从马耳他请求安纳·德·蒙莫朗西说："如果国王和您不愿在土耳其皇帝那里调停说项要他让我们过和平生活的话，我们就会处于被打败的危险中[97]……"

法国国王才不会关心拯救马耳他呢，他有很多其他要操心、关切的事。战争已经开始在帕尔马附近不宣而战，并且逐渐蔓延到欧洲，只差官方正式宣布了。法国国王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主动。他以帕尔马公爵的同盟者的身份在 9 月 1 日，即特兰托的主教会议恢复讨论的这一天，同教皇断交，以此作为第一步。12 日，他遣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驻法大使西蒙·勒纳尔[98]，并召回自己的大使。[99]直接战争已经开始。布里萨克已经轻易而举地占领基耶里和圣达米昂的小要塞。[100]更早些时候，在 8 月份，指挥法国帆桨战船的将领保兰·德·拉·加尔德在意大利沿海海域俘获了西班牙舰船 15 艘，[101]并于同月恢复对巴塞罗那的进攻。法国海军从这个港口掳走大船 4 艘、新近下水的帆桨战船 1 艘和多里亚亲王的三桅战船 1 艘。[102]从那时起，法国就接二连三采取作战措施，例如派遣舰队去意大利，在布列塔尼把船只装备齐全[103]以及没收在法国港口停泊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臣民的船只[104]等。最后，法国国王和德意志的新教诸侯之间的最后协定的基础在 10 月份奠定下来。[105]

这个结局会使神圣罗马帝国方面感到惊讶吗？根据匈牙利的玛丽的信函，至少在表面上，神圣罗马帝国方面并不感到惊讶（不管富埃特对此有什么其他的说法[106]）。玛丽在荷兰异常不安，但头脑清醒，并且和平时一样，考虑采取这一断然措施：大胆打消英国的敌意，把它争取过来，从而在该国取得一个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舰船来说不可或缺的港口。她提出[107]："有人甚至说上述王国易于征

服，特别在目前当它陷于四分五裂和极端贫困的境地的时刻更是如此。”不管怎样，假装对费迪南的儿子信任和爱戴，暂时不再谈神圣罗马帝国的问题，是颇为得策、合乎时宜的。德意志人从这件事中可以找到某些可感欣慰满意之处，并受到鼓动去援助皇帝陛下。如果战争打赢，就容易保证帝国由得力的人来领导。但是，首先必须打赢这场战争。匈牙利的玛丽似乎已经预见到这一切：法国会怎样得到信奉新教的英国的支持、怎样在德意志内部“挑拨离间”以及所谓的法国人与“莫里斯”·德·萨克斯公爵的协议的内容如何等。至于这位公爵，她提议说，既然在匈牙利又有同土耳其作战的前线，难道不可以给这个公爵一个在土耳其前线上的职位吗？[108]这是让他靠边的办法。如果他拒绝接受给他的这个职位，这就是迫使他暴露他要的花招的办法。

查理五世始终不了解法国要的这个花招。这是他唯一的策略错误。至于其他方面，他没有什么幻想。不管他的痛风病的病情多么严重，他仍然坚持去因斯布鲁克定居，以便能够就近对意大利进行监视。因此，他准备再次进行同法国国王的战争。[109]

1552年的战火

下一年，即1552年，在长时期内逐渐积累起来的炸药，引起一场巨大的火灾。欧洲各地燃起熊熊烈火。虽然这些滚滚烈焰，或则相继燃起，或则同时燃起，而且起火的地方如此之多，以致它们之间的根本联系被遮盖了，但都是一场唯一的大火的一部分。1552年这一年，几乎在整个欧洲大陆爆发了一系列战争。

最先爆发的是德意志的内战，即那场外莱茵的历史学家称之为诸侯革命的战争，虽然这不仅仅是一场"诸侯战争"，而且还是一场宗教的[110]甚至社会的战争。对查理五世来说，这场战争以灾难告终。他被驱赶出因斯布鲁克后，不得不在4月19日先于莫里斯的部队逃跑，丢失德意志，丢失之快就同1547年他很快得到这个国家一样。用布塞尔的话来说，他的"暴政"在1552年2月初和同年8月1日之间的短短几个月内崩溃了。帕绍条约于8月1日缔结，恢复了德意志的自由，并且暂时恢复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德意志之间的一项协定。

在西方，德意志进行一场对外战争。这场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法国国王履行他和德意志新教徒缔结的并被1552年1月15日签订的香波尔条约确认的协定，作了"莱茵之行"。他4月10日攻占图尔和梅斯，[111]5月抵达莱茵河河岸，然后在他的德意志同盟者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开始谈判时，谨慎地向西撤退。这时，凡尔登5月份被后撤部队在返国途中占领。[112]在第二阶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同德意志达成协议后，重新集结他的军队，从南到北穿越德意志，再度占领梅斯。梅斯之围始于10月19日，以1553年1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失败及撤退告终。[113]第三次德意志战争在东面匈牙利边境进行，敌方是土耳其。这场战争特别艰苦。对费迪南来说，这一仗打得很糟，战局逆转，他直到年底才得到莫里斯·德·萨克斯率领的德意志各个诸侯的救援。7月30日，特梅斯瓦尔被土耳其人攻占。[114]

在卢森堡和荷兰的边境进行了另外一系列战争。这些战争同上述各次战争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在意大利，战争零零星星地进行。这是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围城、皮埃蒙特的山地游击战以及时有时无的休战。4月29日的协定结束了法国国王和教皇于勒三世之间的战争。[115]但是，平衡立刻又要恢复。7月26日，在“法兰西！法兰西！”的呼喊声中，锡耶纳举行起义，驱逐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宣布独立。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事件，因为它切断了西班牙的交通线。直到1555年4月，锡耶纳陷落，被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和科西默·德·梅迪奇攻占，这起事件才告结束。[116]

我们必须把地中海的海上战斗加进上述各次欧洲大陆的战争中去。地中海的海上战斗，只不过是总的欧洲战争的细枝末节而已。这些战斗在军事上决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不把它们同欧洲的总的战争联系起来，它们就很难被人理解，毫无意义可言。1552年，这些战斗的规模缩减为土耳其大舰队的调动和转移以及法国的帆桨战船的航行等。土耳其大舰队经由平时的航路，一直开到墨西拿，8月5日在蓬查和特拉契纳之间打败安德烈·多里亚的舰队。[117]法国的帆桨战船则由保兰·德·拉·加尔德率领，奉命前去同土耳其大舰队会合。

但是，土耳其大舰队却不顾法国的一切强烈要求，不继续向西驶行、压逼。巴伦西亚的总督及时报告西班牙的菲利普，黎凡特的大舰队1552年8月13日进入马略卡。但是，这一年和上年的情况一样，这是一场虚惊。[118]可能锡南帕夏为了他个人的私事和对波斯的战争，感到急需赶回东方。他无论如何也不等待法国的帆桨战船。法国的帆桨战船正如土耳其舰队1543年在土伦的情况一样，必须远离本土前去东方的开俄斯岛停航过冬。[119]一份文献资料表

明，这些舰船开到那不勒斯沿海海域，在雷焦附近时让一些人登岸，并在当地以低价获得供应补给，杀猪宰牛，砍倒花园里的树作为木柴储备。两个当时在该地潜逃的见习水手——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尼斯人——说，这些帆桨战船正在航行途中，目的是前往追回土耳其大舰队以便占领那不勒斯或者萨莱诺。难道这一事件同萨莱诺亲王 D. 费朗特·桑塞维里诺的密谋有什么关联吗？这位亲王当时正在这支法国舰队的舰船上。威尼斯已经拒绝赞助这个密谋。这个密谋可能因舰队姗姗来迟而告失败。[120]这里可以再次看到当时法国的政策仍然是对那不勒斯梦寐以求。土耳其的帆桨战船如果不那样急于返回，也许会取得实质性的胜利成果。热那亚和那不勒斯都抵挡不住法土两个盟国的联合努力。安德烈·多里亚也不会有空离港出海去供应和加强受到威胁的城市。

但是，土耳其人的目光没有这样远大。对他们的舰队来说，要做的就是进行小规模的出征抢劫活动。船的底舱一旦装满掳获物就向黎凡特返航。甚至也可能像一个不久以后就不胫而走、到处流传、却又无法核实、很难消除的传闻所说的那样，这支舰队驶离时带有大量西班人或者热那亚人送交的贿赂。

因此，这个戏剧性的1552年的主要政治问题并不存在于地中海。这些问题与德拉库特、锡南帕夏或者这时已经年迈的安德烈·多里亚都毫无关联。人们企图看透识破的人，仍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或者令人捉摸不透的莫里斯·德·萨克斯。后者对宗教问题漠不关心，为人现实，很多人说他品德低下，行为不端。很少人像他那样神秘莫测。是他在导演反对查理五世的戏，迫使查理五世经过阿尔卑斯山一直逃到比不来梅更远的菲拉赫，用这个办法来

让查理五世为穆赫尔堡战役付出代价。然后，他在取得圆满成功的时刻突然停止行动。据说他这时是有力量向意大利方面施加压力的。然而他为什么突然停止行动呢？是因为士兵对他抗命不从吗？是因为他不愿意自己让法国人牵着鼻子走，唯法国人之命是听吗？他是个稀罕怪异的人物吗？是个目光如炬、深思熟虑的政治家吗？是个急于结束对德战争的人吗？或者他仅仅在这个风云变幻莫测之年同费迪南分子融洽相处，了解德意志在东方对抗穆斯林世界的斗争的困难吗？人们提出的上述问题之所以难于回答，归根结蒂是因为这个奇怪的人物突然带着这些问题的最佳答案——他自己的生命——从这个世界消失了。[121]

至于年迈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真的像爱德华·富埃特所说的那样，是他的外交机构的错误的牺牲品，或者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他自己的顽固不化性格的牺牲品吗？也许他认为既然在8年中他在法国前线避免了这类无保留地拼耗力气的事，他就能够不战而胜。所谓不战，即不解开腰包付出分文。他的财政困难很大。只是在逃离因斯布鲁克后，哈布斯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才决定作出巨大努力。或许正如理查德·埃伦贝格大胆提出的那样，查理五世1552年6月仅仅由于安通·富格向他提供了400万杜卡托才获救。[122]这笔贷款使他能够在帕绍谈判中口气坚定。来自佛罗伦萨（以一笔20万杜卡托的贷款的形式）、那不勒斯（以一笔80万杜卡托的贷款的形式），特别是来自西班牙的强有力的援助，使神圣罗马帝国的巨大躯体重新有了活力。[123]从1552年起，西班牙的白银用船装运，从半岛向热那亚输出，特别向安特卫普的输出，第一次达到巨大的数额。[124]查理五世被人指责缺乏先见之明。但是，他

怎么能够预见到费迪南分子的对他如此有害的、几乎无异于背叛的行径呢？他的大错在于他顽固地在奥格斯堡附近停留而不前往荷兰（他后来试图这样做但已经为时太晚）。荷兰是他进行最后防御的内堡，是他的强固要塞，现在甚至还是他的金库。[125]他本应在1544年就知道从那里，而且只能从那里打击法国。

亨利二世的政策也同样引起大量猜测，成了人们长期谈论的话题。亨利·霍瑟寻思德意志之行是否瓦卢瓦王朝的政策的颠倒。他自己立刻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答复。[126]亨利二世几乎马上回到对意大利的挂虑关切上来，回到这个幻影上来，回到这个必然会发生的问题上来。教廷大使圣克罗切1553年初写道："法国国王的思虑关注完全转向意大利的事物上了。"[127]因此，这次征伐德意志只不过是一起偶然事件而已。事实上，法国国王在这方面并不怎么需要进行选择。对他来说，问题在于同哈布斯堡家族这个庞然大物对抗并因此和别人一起，同时最有力地在最要害的地方打击它。发生的事件就这样把他从一个方向引到另外一个方向。1552年发生的事件又把他带向东方，并且让地中海的历史学家亦步亦趋，也跟着到了东方。这是因为西班牙的强大力量已经在德意志占领阵地，定位扎根，并且把荷兰作为它的财源，有时还作为它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基地之一。

科西嘉投向法国人；英国投向西班牙人

第二年，即1553年，地中海和附属于它的陆上地区仍然不处于国际政治的中心。在这个地区发生了什么事呢？阿尔及尔的海上

行劫者出动过一次,一直推进到直布罗陀;土耳其舰队出战过一次,这次战斗进行得稍迟,与法国的帆桨战船协同配合,一直打到科西嘉岛;最后,在夏季这个美好季节的末尾,法国军队和这个岛上的流放者、因政见移居外国者,占领了科西嘉岛。[128]这虽然是三次引人注目的行动,但并不像看起来那样重要。

萨拉赫海伊斯[129]是个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摩尔人"。他在巴巴罗萨的监护下被抚养成人。他从1552年起就是阿尔及尔的第七个"国王"。他4月份到达阿尔及尔这个城市时,首先就发起进攻,使拒绝缴付"贡税"的图古尔特和瓦尔格拉的首领就范。这些袭击非常奏效,他满载金银而归,并且还得到向他"纳贡"的允诺,即每年将向他交纳10个来自非洲的穷乡僻壤的黑种女人。在阿尔及尔,1552—1553年的冬天被用于精细地装备舰队。从6月初开始,萨拉赫海伊斯率领帆桨战船、荷兰圆头帆船、双桅横帆船等舰船共40艘。全都装备精良。然而,在这个季节进行的首次袭击却以在马略卡的惨败告终。接着,在西班牙海岸,海军及时得到警报,海上行劫者扑了个空。他们在海峡才得到机会,掳获了5艘葡萄牙的小吨位帆船。这些船只碰巧运送贝莱斯的总督。这位总督是谢里夫王位的觊觎者,这次从西班牙半岛归来。他在这个半岛同他的党徒试图推进他的事业。整个船队:小吨位帆船、葡萄牙人、摩洛哥人都遭到劫夺,被运到贝莱斯。哈埃多说,萨拉赫海伊斯在那里把掳获物作为友谊和睦邻关系的保证赠送给谢里夫。他这样做还为了使谢里夫不要经常入侵邻近的奥兰。尽管如此,3个月后,新的边境事件又在特莱姆森附近发生。阿尔及尔的主人不得不再次利用冬季来准备远征。这次是同摩洛哥对抗……不错,他已经采取了预防措

施，谨慎小心地把王位觊觎者巴·哈苏恩带回阿尔及尔。

当土耳其舰队由德拉库特率领(并由保兰·德·拉·加尔德和法国的帆桨战船伴随)驶抵意大利沿海海域时，萨拉赫海伊斯很可能已经返回他的基地。阴谋诡计，甚至可能已被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收卖的大臣鲁斯顿帕夏[130]的共谋串通，拖延了土耳其舰队的出发。这支舰队不如上一年的那支强大，首领已经易人，由德拉库特接替了锡南帕夏。此外，土耳其的舰船不立即径直驶往托斯卡纳的马雷马海岸，而把它们的时间浪费在劫掠上。8月，潘泰莱里亚岛遭到抢劫。然后，西西里海岸上的利卡塔小麦港也遭到劫掠。德拉库特和突尼斯人之间的谈判(突尼斯国王刚刚同拉古莱特的西班牙人绝交)，使舰队滞留在西西里和非洲之间。这些延误使安德烈·多里亚能够在把他的舰队的主力配置在热那亚的同时还来得及对基督教的要塞进行供应补给，并沿意大利海岸布署足够数量的快速舰船，以便及时通报敌方舰船的调遣运动情况。

敌人8月3日才抵达第勒尼安海。[131]几天以后，敌舰袭击了厄尔巴岛，抢劫了卡波利维里、里奥·马里亚纳、马尔西亚纳和农戈内港等地。但是，主要目标是科斯莫波利斯，即费拉约港。该地对敌人的进攻进行了抵抗。也仅仅在那时，在考虑对皮翁比诺发动进攻后，舰队才帮助把法国军队从锡耶纳的马雷马运送到科西嘉。

法军首脑在卡斯蒂利奥·德拉·帕斯卡亚举行了军事会议。[132]法国驻帕尔马的部队的司令特尔姆元帅的建议占了上风。在保兰·德·拉·加尔德和科西嘉的流放者(萨姆皮罗·科尔索是他们的首领)的支持下，这位元帅决定在没有国王明确的命令的情况下就侵入这个岛屿。这件事轻而易举就完成了。巴斯蒂亚8月

24日被攻占。德·拉·加尔德男爵26日抵达圣弗洛朗。然后轮到岛内的科尔泰被占。巴斯蒂亚的热那亚商人在位于岛的中心的这个城市避难。最后，9月初，博尼法乔在试图进行抵抗之后投降。[133]人们知道，这座城市和卡尔维是这个岛上热那亚人最多的城市。土耳其人掳获甚丰，而且已经得到德拉库特自己从保兰·德·拉·加尔德那里逼取来的付钱的承诺，因此拒绝延长对卡尔维这座热那亚人在岛上占有的最后一个要塞的包围，并返回本土。10月1日，[134]土耳其舰队穿过墨西拿海峡，12月抵达君士坦丁堡。

一个打击奥地利家族的大好时机丢失了吗？土耳其人没有竭尽全力打击，这是事实。[135]某些人说，他们被贿买腐蚀。但是，有另外一些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这次所作的努力审慎有节。土耳其的这次行动从一开始起就是审慎有节的，因为这一年只有60艘帆桨战船从君士坦丁堡开出。在东方，波斯战争仍在进行。在这个1553年，[136]一个在阿勒颇安家落户的伦敦商人安东尼·詹金森，目睹苏里曼大帝及其服饰豪华奢侈的一行在前往波斯途中进入这个城市的情况：有轻骑兵6.000名，土耳其近卫军士兵1.6万名，"全身穿金的"伴随素丹的侍卫仆役1,000名；素丹骑乘白马，身穿绣金袍子，头戴丝麻混织宽头巾。30万名军内人员和20万头骆驼殿后担任运输……难道不正是这个景象抵消、限制、减缩了地中海的战争吗？

这时，法国人依靠土耳其人在科西嘉站稳了脚跟。夏季终了时，这个岛屿已经属于他们所有。在这个岛屿登陆的消息使热那亚政府目瞪口呆，使科西梅·德·梅迪奇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大为震惊，引起教廷一连串责备。这个岛屿很快就被征服。萨姆皮罗·

科尔索和流放者在岛民的协助下已经单独完成几乎全部工作。不管对还是错，有理还是无理，科西嘉人憎恨热那亚人，憎恨这些外国主人和城市的高利贷者，憎恨这些原来身无分文的去殖民地发财致富的殖民者。整个科西嘉岛的居民都是这样吗？被热那亚人用武力降服的贵族家庭当然是这样。被荒年歉收和经济危机激怒、其正常生活被殖民者引进的新耕作方法打乱的平民大众也是这样。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热那亚的统治是“永久的凶手”。[137]

尽管如此，在这个就其资源而论人口过多的岛上，战争仍然加深了贫困。法国人、热那亚人、阿尔及尔人、德意志的身强力壮的士兵、热那亚的意大利籍的或者西班牙籍的雇佣兵，还必须加上萨姆皮罗的徒众，这一大群士兵都需要生存下去。他们抢劫居民，糟蹋庄稼，烧毁村庄。科西嘉的不幸在于它对外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它的内部价值，并且在这场瓦卢瓦家族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争中是个交通枢纽。法国占领科西嘉比它占领帕尔马和锡耶纳更加阻碍了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同它的同盟者之间的往来联系。“所有从卡塔赫纳、巴伦西亚、巴塞罗那（我们还应该加上马拉加和阿利坎特）开往热那亚、里窝那或者那不勒斯的船只，不可避免地要经过在科西嘉的海岸的视野之内的海域。在16世纪情况更是这样。

在这个时期，柏柏尔海盗麇集于在撒丁岛和非洲海岸之间的这部分地中海海域。正常的航海路线绕科西嘉海角或者直接穿过博尼法乔海峡。当时，船的吨位很小，航行时不能中途不停直接横渡。从西班牙开往意大利的船只自然而然中途要在科西嘉的各个港口停泊。”[138]那个时代的人对法国人征服该岛不管感到兴高采烈还是惶恐不安，都马上认识到征服这个被萨姆皮罗·科尔索称为

“意大利的制动器”[139]的地方的重要性。

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立即发起反攻。一俟恶劣的气候中断了法国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夏季合作，恢复了西欧各国的舰队之间平时的力量对比，局势就会颠倒过来。热那亚和托斯卡纳现在具有互相邻接的这种优势，而这时法国的帆桨战船已经驶返马赛。[140]科西嘉岛远离这些战船，得不到它们的支援。再者，这个岛屿现在直接受到仍在卡尔维坚持、毫不退让的热那亚人的威胁，只由叛乱者和5,000名老兵防守。亨利二世似乎已经在9月份开始同热那亚间接谈判。[141]但是，后者在佛罗伦萨公爵的唆使怂恿下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发出呼吁，[142]并且已经筹集了80万杜卡托，征募了1.5万人。多里亚派出的远征部队9月离城，在热那亚河畔滞留了一些时候，15日抵达科西嘉海角，16日进入圣弗洛朗海湾。海湾守备部队于下一年2月17日投降。[143]一场艰苦的战争开始了。

1553年是地中海风雷激荡、变幻莫测之年。但是，与席卷欧洲的大战相比，地中海的这些冲突就显得无足轻重了。这一年的一大插曲是戏剧性的英国王位继承事件。1553年7月3日[144]，爱德华六世去世。以新教为官方宗教的英国也随着这位英国国王之死而消失了。其后的英国几乎对法国友善，并且肯定敌视哈布斯堡家族，以致在荷兰，人们同时为莫里斯·德·萨克斯(死于7月11日)的消失和玛丽·都铎的登基[145]而感谢上帝。然而，这次登基在一个四分五裂、动乱不已的国家里特别困难，而且立刻产生了也并不简单的女王的婚姻问题。年轻的菲利普亲王在克服了重重障碍并于最后时刻排除了一个十分成熟的求婚者——葡萄牙王子东·鲁伊斯、玛丽自己的叔父[146]——的候选资格后，向女王求婚成功。

这一“非常令人嫉妒的成功”[147]应该归功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归功于格朗弗勒和西蒙·勒纳尔大使。它无可争议地是这位大使的杰作。女王的婚约于7月12日签订，两天后在王国全国公布。[148]

正当哈布斯堡帝国遭到沉重打击的时刻，命运通过这次出乎意料的成功重振了这个帝国的事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定居荷兰，放弃对已经四分五裂、而他自己又进一步任其四分五裂的德意志的依靠，转而依靠英国。他把军队集中在北海附近。北海是北欧的地中海。它和从大西洋通向北欧的海运干线一样，几乎全部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控制之下。这位皇帝把荷兰建成固若金汤、坚不可摧的要塞。[149]因此，对法国国王来说，1553年和1554年之间的冬季的前景是黯淡的。他能够像威尼斯大使所希望的那样阻止西班牙的君主前往他的新王国吗？(一个机会曾经出现在维尔格尼翁面前，但他没有抓住。)[150]这样做又会得到什么好处呢？在德意志，这项婚约的力量同样被人强烈地感受到。1553年12月30日，[151]威尼斯派驻查理五世处的大使写道：“德意志的各个诸侯仍然担心西班牙君主现在同德意志接近，担心他将来通过争取英国，接近英国，能够在这个新王国的帮助下，并且由于德意志人内部的分裂不和，再次用武力把他过去试图通过谈判取得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共同助理职位’据为己有”。

英国女王的婚姻甚至在正式缔结之前就已经在外交的秤盘上产生了重量。[152]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敌人来说，唯一的安慰就是这宗婚事没有办成，是英伦三岛受到严重动乱的震撼，是法国人想通过他们对伦敦民众发出号召使动乱的局势更加恶化。[153]后来甚至在1554年2月举行了关于把女王送往加来，送往安全可靠的地

方的谈判。[154]这样，查理五世得到的就并不是英国的支持，只不过是一个女王的好意和同情，而这个女王本身又只不过是一个别人对她的地位提出异议、并没有把握得到她自己的资财、甚至没有把握得到西班牙的援助的女统治者而已。这种援助法国人可以在英吉利海峡加以阻截。[155]最后，这个女王还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本身或者他的儿子手头更加拮据。

查理五世的弃权让位：1554—1556年

缺乏金钱的问题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十分严重。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方面，他同富格家族、谢兹家族以及其他奥格斯堡、安特卫普和热那亚等地的贷款者之间不断发生纠葛。在法国方面[156]，法国国王可以在里昂的交易所获得一笔贷款。1553年将是“盛大聚会”公债发行年。但是，借债必须偿还，而且为了偿还债款必须加征捐税。因此，在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由来相当久远的不安情绪。

早在1547年，[157]法国王军统领就不得不镇压在圭耶内镇征收人头税引起的骚乱。1552年4月，[158]一些传到西班牙的公文急报指出，法国既不缺乏小麦也不缺乏面包，但是，那里有一股对捐税极为不满的情绪，甚至圣安托万或者圣拉萨尔的修道院和医院都不能免缴捐税。在1552年这一年，重新开始的战争使平民百姓、商人和十分惧怕贵族敲诈勒索的农民破产。上述公文急报继续说：“每个贵族绅士难道不是到处拿自己需要的东西吗?这些人都像没有主子的摩尔人一样。”不错，这是一则西班牙人的公文急报，不一定可靠。但是，1554年4月，一则从法国发往托斯卡纳的公文急

报[159]也指出：人们对战争厌倦；军队状况不佳；国王缺乏钱款，无法征募瑞士人入伍；捐税再度加重；私人所有的银器被熔化；贵族证书公开出售；教士要求捐助……此外，在所有的基督教国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或者德意志，都存在同等程度的厌战情绪。8 月，教皇试图利用这种厌战情绪谋求和平。[160]

土耳其帝国因为自身的兵力投入波斯，情况也不妙。1555 年，法国国王的大使科迪尼亚克不得不径直前往正在对萨菲作战的部队的司令部，亲自请求素丹派遣舰队。[161]

也许过去曾经被历史学家视为阴谋和算计的结果，往往只不过是资财和钱款的短缺导致的情况而已。在 1554 年和 1555 年这两年内，战争到处都打得松松垮垮，疲疲塌塌。在荷兰边界和皮埃蒙特边界上进行的是一场要塞战。1555 年 6 月布里萨克[162]在皮埃蒙特发起一次突然袭击，攻占了卡萨尔要塞。小规模的海战在地中海进行。土耳其舰队在这个海域只是短期出现过。1554 年，这支舰队由德拉库特率领，在都拉斯停留过久，迟迟不驶离该地。至少法国人有这种看法。法国人和阿尔及尔的荷兰圆头帆船协同行动，企图这时在科西嘉岛上和在托斯卡纳的马雷马的海岸上进行干预。[163]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主要是因为若干艘西班牙帆桨战船已被派往大西洋护送菲利普前往英国。但是，德拉库特到达迟了，并且几乎还没有沿那不勒斯海岸航行就立即返回东方。法国代理人指控德拉库特叛变[164]，并从那时起就千方百计把这个人物排斥出指挥岗位。总而言之，德拉库特从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方面得到过钱财是可能的。但是，下一年，他在舰队里只担任第二把手，受新任舰队司令、年轻而缺乏经验的皮亚利帕夏的指挥。土耳其舰队不

顾法国国王进行一次“激烈的和坚决的”战争[165]的要求，冷眼旁观，不参加对卡尔维的包围。卡尔维得到热那亚人的充分供应，使法国人进攻受挫。土耳其舰队对11月份进攻巴斯蒂亚的尝试同样马马虎虎。这座城市一年以前就已经再度落入敌人手中。最后，在对托斯卡纳的海岸和岛屿进行过几次徒劳无益的进攻之后，土耳其舰队借口粮食缺乏[166]、气候恶劣，掉转船头返回本土。人们难道没有权利认为这支舰队像上一年一样已经接到审慎行事的命令吗？

大国缺乏资财，临战逃避，不负责任，这使小国得以表现得比平时更有效能。大家已经看到，热那亚是在用一股什么样的热劲在科西嘉作战。在从1554年到1555年这段时期，它把法国人驱逐出该岛的大部分地区。[167]托斯卡纳公爵科西梅·德·梅迪奇所作的努力同样大。尽管安德烈·多里亚在海上对他支援不力，他仍然迫使在锡耶纳的法国人于1555年4月21日投降。安德烈·多里亚一方面小心谨慎，另一方面他作为热那亚人眼见托斯卡纳扩张，大为不悦。几个月后，科西梅·德·梅迪奇夺回马雷马海岸上的奥尔贝特洛。当时只剩下亚平宁山中的蒙塔尔奇诺“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本来是锡耶纳的爱国者和一些法国人[168]的避难所。但是，1555年底，科西梅就进攻该地，并以扫荡基亚拉山谷作为这次进攻的开始。[169]

在这两年中，比奥斯曼舰队更值得详细叙述的只有阿尔及尔国家。1554年，[170]萨拉赫海伊斯率领他的军队从海上抵达梅利利亚的“新”港，然后又从陆上直抵塔扎和非斯。他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该城，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袭击摩洛哥。摩洛哥的骑兵抵挡不住土耳其人的火枪。但是，胜利的袭击是无果之花，不能产生稳定的局

面，因为胜利者在非斯把受他们保护的人扶植上台后(即那个上一年被他们俘虏的巴·哈苏恩。此人不久以前还是他们的奴隶)，后者不久以后就被前谢里夫杀掉。那些满载掳获物、被受他们保护并对他们感恩戴德的人馈赠重金和乘骑摩洛哥人的驴、马回去的胜利者一旦离去，谢里夫就回到城里。这次远征为阿尔及尔人留下的一切，就是佩农·德·贝莱斯这个我们以后还要再谈到的遍布岩石的小岛。[171]

下一年，即 1555 年，阿尔及尔人转向东方进行反布日伊的活动，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西班牙驻防地的活动。因为这种驻防地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城市，而是在土著居民点以前的界限之内的一小块设防地区，呈三角形。每个角上有堡垒一座。帝国城堡是一种类似拉古莱特的原始堡垒的三角形工事。海上大城堡和小城堡是摩尔人的古老建筑，面对海岸。[172]在这些堡垒内部有百来个人和几十匹马。提供人、畜的给养，既要依靠驶来的供应船，也同样要依靠守备部队的出击。要塞司令、年迈的卢伊斯·佩拉尔塔正是在一次外出搜寻粮秣时中埋伏身亡的，他的职务由他的儿子阿隆索接替。[173]1555 年 6 月，萨拉赫海伊斯率领几千名士兵离开阿尔及尔。这些士兵中有能使用喇叭口火枪的基督教背教者。与此同时，他又从海上派遣一支小舰队运输粮食和大炮。这支舰队包括帆桨战船 2 艘、小船 1 艘、在阿尔及尔征用的法国“箭船”1 艘。这是一支很小的舰队，大部分海上行劫船已经出航前去与利昂纳·斯特罗齐的舰队会合。但是，这支力量已经足够，因为堡垒无法抵抗大炮的轰击。堡垒的防守者逃到附近实际上无法防守的城市。不久以后，阿隆索·德·佩拉尔塔投降，从敌方换得的是保证他本人和他挑选

的40名同伴生命安全并让他们乘1艘法国"箭船"返回西班牙的诺言。这次失败在西班牙引起巨大反响。[174]在巴伦西亚、加泰罗尼亚、卡斯蒂利亚等地都有人谈到要组织一次报复性的远征。托莱多的大主教西利切奥率先发起这次报复运动。[175]然后，一切又都归于平静。路易斯·卡夫雷亚指出，这个情况如同在荣誉和名声之类的问题上需要大量金钱时发生的情况一样。远征延期进行，借口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在他自己的各个王国。但是，愤懑情绪始终非常强烈，以致阿隆索·德·佩拉尔塔回国时被逮捕，并受到审判，1556年5月4日在巴利亚多利德被斩首。[176]他的罪行难道真是那样严重吗？布日伊受到攻击，他就及时向西班牙提出请求，恳请派兵增援。命令从西班牙下达到当时那不勒斯的总督阿尔贝公爵那里。但是，这项命令下达得如此之慢，以致当多里亚亲王被公爵提醒，1556年3月在那不勒斯率领帆桨战船准备启碇时，投降的消息已经传来[177]……

当小国正在处理它们自己的争端时，大国之间的外交花招照常要弄。教皇于勒三世1555年3月22日之死[178]使查理五世失去无可争议的支持。在历时仅仅几个星期的马塞尔二世的统治之后[179]，当保罗五世于1555年5月23日当选时[180]，即正当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和平谈判[181]在马尔什进行之日，法国国王继承了他曾经失去的东西。开始时，没有任何事物使教皇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强烈的敌对情绪显露出来。但是，这种情绪本身就威胁着将在北欧建立起来的和平。1555年10月13日缔结的一项秘密条约（当时威尼斯和布鲁塞尔的人都知道有这项秘密条约）保证，如果实现和平的希望破灭，法国能够与教皇正式结成联盟。[182]

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出现同样重大的变化。菲利普已于1554年胜利到达英国。[183]各国外交信函纷纷对此大加猜测。女王爱他吗？他们会生儿育女吗？（早在1555年就有人说不会）。与此同时，人们获悉查理五世把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王国和米兰公爵领地让给他的儿子、当时的英国国王。[184]毫无疑问，此举的特殊目的，乃在于提高新郎的身价。这个举动类似1551年让人任命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为波希米亚国王的费迪南的举动。这些问题是威信和礼仪问题。但是，在1551年的这些退位声明书中——这一点我们读读查理五世在同一个1554年拟定的遗嘱便会信服——已经潜藏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一个国家的弃权让位的可能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已经潜藏着他在几个国家弃权让位的可能性。人们通常只想到根特的动人的催人泪下的景象，想到他放弃荷兰。1555年10月25日，查理在这个国家首次对三级会议声明他遁世隐居的意愿。[185]事实上，这时他已经放弃了西西里、那不勒斯、米兰内等地。1556年，他在远离西班牙的地方从西班牙的王位退下来，没有丝毫张扬。[186]他只在1558年死前不久才放弃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金冠。这个最大的弃权让位行动被推迟了，其原因是对前景难卜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感到不安的费迪南本人一再坚决要求推迟[187]，也可能是在荷兰和意大利感到需要他父亲的支持和保护的菲利普一再坚决要求推迟。

像自从米涅特和加夏尔以来历史学家们所做的那样，把这些弃权让位的事贬降为纯系宫闱失和以及个人冲突的结果，也许是错误的。也应该考虑到在1554年和1556年之间这段时期的战争气氛。查理五世也许想让他的儿子避免在紧接他的死产生的混乱

中继位的危险。他之所以放弃他最珍视的计划，他之所以把驾驶德意志国家这艘大船的任务交给费迪南的朋党，是因为自从 1552 年和 1553 年以来，他就估计到驾驶这艘大船是不可能的。当他 1555 年把缔结奥格斯堡和约的工作和责任交给费迪南时，他就离开了这艘大船的船舵。奥格斯堡和约将使德意志在这个世纪还剩下的时间内得以明显地安宁度日。但是，他内心却憎厌这项和约。此外，这个很不可靠的德意志，英国——菲利普的结婚礼物——能够在力量的天秤上取它而代之。抛弃这个德意志也许是结束战争和战争给他带来的巨额开支的唯一途径。

不管是什么原因，菲利普的帝国脱离德意志集团，对地中海世界来说，是件非同小可的事。1558 年 7 月，当菲利普二世要求得到 1551 年的协议书[188]曾经允诺给他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教区时，最后的联系也断绝了。他派驻费迪南处的大使 1558 年 7 月 22 日从费迪南那里得到一个相当婉转动听的答复："……在研究了你代表最尊贵的英国和西班牙国王、我们亲爱的和钟爱的侄子想要我注意的关于在意大利的帝国副长官的职务这个问题之后……你可以代表我们对殿下说，我们牢记曾经对他作过承诺；我们非常愿意履行这个承诺……"但是，事情非常微妙。"……殿下应该记得，当我的主人帝国皇帝、我自己以及殿下知道的那些人讨论让殿下和我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国王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副长官这个问题时，我们向他们指出过可能随着这个步骤在帝国国内产生的烦扰、动乱和骚动。我们还向他们指出，这条道路不会成功。尽管如此，出于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尊敬，并且根据他的旨意，我们不得不做已经做了的事。以后不久，人们承认我比我们大家期望

的更有预见，因为莫里斯公爵和其他王侯一旦被人告知我们的意图和计划，就拿起了武器……”[189]

那么现在人们是否在副本堂神甫的职位问题上要去冒同样的风险，进一步指控哈布斯堡家族想使神圣罗马帝国成为王位世袭的国家？同德意志的强大力量进行斗争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殿下我们要承受来自法国以及土耳其方面的种种任务和需要，而我要承受土耳其和匈牙利叛乱分子方面的种种任务和需要，宗教和其他麻烦问题我们也少不了，这还没算在内”，更不要说教皇这个奥地利家族的敌人还要百般刁难。费迪南继续说：“这一切还要加上另外一个碍难之处：殿下为了履行职责必须住在意大利。我们的承诺正是以这一点为条件作出的。十分明显，我们的意愿从来就不是殿下可以远从佛兰德、英国或者西班牙来履行这项职责……”让我们删节这封毫无疑问在我们眼里比在菲利普眼里更加讽刺挖苦的信，赶快读读它的结尾吧！“在这些条件下，我们从现在起就答应：不管什么时候殿下前去意大利，我们都将以适当的形式向殿下送去我们的证书……”这是可以一风吹光的诺言。不久以后，菲利普就只不过是西班牙一个地方的国王了。

这或许是他放弃德意志。这个放弃行动早就暗含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最先的那些弃权让位行动中了。这次放弃比任何事物都更加促进了欧洲的和平。在马尔什开始进行的、并且与广泛流行的看法相反并没有中断的谈判，[190]以导致缔结沃塞尔斯的停战协定告终。这项停战协定由于英国女王从中斡旋，理所当然地在战争季节即将来临时，于 1556 年 6 月 5 日草草签订。[191]

毫无疑问，这项停战协定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它只不过承认了

既成事实而已。但是，它使战争中止，换句话说，使巨额耗费中止，这正是人心所向的事。费迪南抱怨说："这个季节世界各地都钱款短缺。"他那方面希望通过法国人来同土耳其人达成停战协议。[192]这时，查理五世在这种缓和的气氛中打算离开，[193]前往西班牙，最终放弃世界和权力，并且在他离去后让菲利普留在荷兰。这样，神圣罗马帝国就将在不同的程度上，以同样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以布鲁塞尔为它的政治和军事首都，以安特卫普为它的经济首都。这当然是个美妙的计划。的确可以从布鲁塞尔密切注视并统治欧洲。但是，欧洲愿意听任别人统治吗？

3. 战争重起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仍然来自北方

沃塞尔停战协定遭到破坏

沃塞尔停战协定遭到破坏，是个难于理解的问题。鉴于敌对双方都已筋疲力竭，这项协定能在一个时期内相当好地满足了各方：法国保住它征服的地区，特别是萨瓦和皮埃蒙特两地；哈布斯堡家族正再度作为世界主人出现。这个家族拥有西西里、那不勒斯、锡耶纳、皮亚琴察和米兰等地。可以说意大利半岛属它所有，因为皮埃蒙特在16世纪还几乎不能说是意大利的一部分。最后，对罗马教廷来说，这显然是个尽力使这次停战转变为普遍和平的大好时机。这是它扮演的传统角色。[194]保罗四世感到至少不得不在嘴上讲讲漂亮话。于是

他正式下令庆祝，[195]派遣代表拜访停战协定的签字各方。他甚至还当着威尼斯大使纳瓦杰罗的面，[196]把缔结协定的功劳归于自己，但是，他骗不了任何人，尤其骗不了威尼斯人。

的确，这项停战协定的宣布在罗马犹如一声晴天霹雳。[197]立即就有消息传出说，这项协定的缔结违反了教皇的意愿，置教皇的所有努力于不顾。[198]不管怎样，这项协定是由于他后来才废除的。一个人竟然能够单独并且这样快地重新点燃没有彻底熄灭的战火，这正好使人注意到个人在历史上的戏剧性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在这个已达耄耋之年(生于 1477 年，登上圣彼得的王位时 79 岁)，但热情洋溢、精力充沛、宽厚虔诚得令人惊奇的人(他是德亚底安修会的创建者)的身上，教会找到一个坚韧不拔、毫不妥协的保护人。这位保护人使因 1549 年保罗三世之死而中断了的同查理五世的冲突再起。这是一场罗马同专制君主之间的、同 1527 年下令抢劫罗马的人之间的永恒的冲突。这个下令抢劫者使新教徒在德意志取得胜利，他还接受了奥格斯堡和约。

这是当时保罗四世对查理五世的反感之一。这种反感是他作为教皇对查理五世的反感。这种反感不应低估。但是，他对查理五世还有另外一种反感。这是他作为那不勒斯人对查理五世的反感。他是亲法的卡拉法家族的首领。他憎恨查理五世，憎恨他是那不勒斯的主人并且是他的亲属的敌人。这些亲属积恨很深，渴望复仇。保罗四世的高龄足以使他亲身经历过意大利从前的自由时代。他还憎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外国占领者、西班牙人的代表，“这些异教徒、这些分立派教徒、该死的家伙、犹太歪种、摩尔人歪种、世界的渣滓”的代表。[199]意大利的自由思想在他的身上十分强烈。这

一点从下面的话里可以得到证实(这些话是在教皇的政策失败之后对威尼斯大使说的)："亲爱的威尼斯爵爷们和其他所有不愿抓住机会摆脱灾祸的人们，你们会后悔的……法国人和西班牙人都是野蛮人，他们最好留在自己国内。"[200]

保罗四世是个根据自己的精神和内心的冲动行事的人。他作为讲道者和神学家，主要生活在他的思想和幻梦中，而不是生活在包围他的世界中。马里亚克指出："他像哲学家一样，是个只大致懂得如何领导国家事务的人。"[201]

通过对这些特点进行对照比较，我们可以比较好地了解教皇在1556年和1557年采取的政策和这项政策的爆炸性的力量。即使是这样，那也并不是全部历史，因为教皇并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他的政策不是一项，而是几项。他并不对这些政策全部负责。他的周围是他的亲戚和顾问，其中包括一个可怕的人物——卡尔洛·卡拉法红衣主教——一个奇怪的人。这个人像教皇一样狂热冲动，但缺乏教皇的优秀品质。这个红衣主教贪得无厌、脾气火爆，好把自己的旨意强加于人，行事无所顾忌。他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谈判像同法国人谈判一样，会在这种交往中走得很远。

1556年6月，他作为由红衣主教担任的教皇特使来到法国宫廷，然后带着从"爱好和平"的法国王军统领蒙莫朗西那里得到的正式干预的许诺[202]离去。科利尼制定了计划，其结果是自受其害。[203]几个月过去了。10月和11月，教皇和阿尔贝公爵进行谈判。这次谈判于11月18日达成停战40天的协议。[204]在谈判过程中，卡拉法红衣主教直接和进抵奥斯蒂亚的阿尔贝公爵接触。会谈的结果相当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卡拉法家族不但向西班牙人索要法

国人还在托斯卡纳拥有的要塞，而且还索要锡耶纳邦。德拉·卡萨收藏的官方文献资料中有一篇珍奇的对红衣主教卡拉法的讲话。这篇讲话旨在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陛下那里获得锡耶纳邦。[205]西班牙的档案资料中有一项1557年1月22日的备忘录。这项备忘录载有详细条件。根据这些条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陛下将宽厚地把锡耶纳邦给予蒙托里奥伯爵(他是红衣主教卡拉法的兄弟)，以履行正在和皇帝陛下谈判缔结的协定。[206]同一个卡拉法前往威尼斯，试图说服威尼斯市政议会加入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斗争，参加瓜分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的财产。这个瓜分是可能进行的。但是，威尼斯人拒绝了。他们说，他们不愿手上沾满苍蝇。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手上全是臊臭味……

卡拉法是被某些历史学家肯定为保罗四世的政策和思想的忠实解释者的人物，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则否定这种看法。对不同的意见进行评定殊非易事。

肯定无疑的是：保罗四世很早就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对哈布斯堡家族居心叵测。[207]甚至据说他准备召开主教会议来剥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显职高位。因此，对哈布斯堡家族来说，问题主要在于了解法国国王的意图何在。如果法国国王保持中立，它就完全能够使教皇就范。否则即使法国国王企图处于一种在以后的17世纪通常被称为“隐蔽”战争的状态中，战争也将重起。不可能再有什么疑问了。主意已经打定。鲁伊·戈梅兹和法国王军统领之间的和平谈判已突然中断，原因是这位王军统领对关于俘虏问题的谈判和关于他被人索要的、已经增加的将为他的儿子付出的赎金的谈判不大满意。在布鲁塞尔人们已不再抱任何幻想。“为了能够得到

一星半点使谈判破裂的借口，他们正等待阿尔贝公爵干出些反对教皇的事来。”[208]

我们应该重复一下这一点：卡拉法家族的政策这样快就产生了这样重大的后果，令人感到惊讶。但是，法国人可能担心不站在罗马这一边就会使他们的敌人的地位和威望提高。他们力图使用迂回曲折的办法，力图转弯抹角地支持教皇而又不使停战协定遭到破坏。事实上，可能正是由于教皇的干预进行得十分迅速，因此这种干预才得以奏效。过去的冲突点燃的狂热情绪并没有熄灭。法国人仍然对那不勒斯和米兰内念念不忘。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虽然被人认为已经置身世事之外，但仍然对保罗四世的所作所为大发雷霆。他让人把快信急件念给他听，并于6月决定推迟他的西班牙之行。毫无疑问，在对很久以前进行的对罗马的激烈斗争的回忆的推动下，他命令阿尔贝公爵对教皇的备战活动进行反击。这是与菲利普的意见背道而驰的。菲利普不惜任何代价避免破裂。迫在眉睫的冲突显现出是一场狂热的激情偏见的冲突。这是一场被旧思想和旧争吵经常产生的纷争驱使卷带的老人希望发生的冲突。这些旧争吵只要有新的怨恨产生就会扩大。

圣　康　坦

这一点千真万确，以致在意大利复活并因意大利而复活的战争，违反常理，目前并没有在意大利半岛和邻接这个半岛的地区，即在地中海地区进行。不错，这可能是由于土耳其的强大舰队按兵不动，远离战场；由于法国在没有强大的盟国的情况下就无法在地中海尝试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只有几艘土耳其帆桨战

船1556年由海上行劫者和哈桑·科索伴随曾经在短时间内前往包围奥兰。[209]在1557年这个战争胜负已决之年，土耳其人甚至连与这种小规模的钳形攻势相当的行动也没有组织。

1556年12月，弗朗索瓦·德·吉斯曾经率领一支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这支军队有步兵1.2万人，重骑兵400人，轻骑兵800人。[210]根据传闻，他当时拥有的部队比这更多。[211]这支军队和法国在阿尔卑斯山彼侧的唯一的同盟者弗拉拉公爵所征募的意大利军队[212]能作何用途呢？弗拉拉公爵被任命为法国驻意大利部队的司令。这项任命只是理论上的，因为实际上他已经让军队的指挥权旁落他的女婿弗朗索瓦·德·吉斯的手中。进攻米兰内可能是明智之举。但是，弗朗索瓦·德·吉斯野心勃勃，亟欲征战杀伐并夺取王位(可能就是梦想为他自己取得那不勒斯的王位)，因此难于对教皇保罗四世的呼吁充耳不闻。保罗四世刚刚谴责了1556年1月同西班牙签订的并于同年12月延长的停战协定。他大事封官许愿，十分慷慨。1月12日，西蒙·勒纳尔报告说，教皇决心运用他的全部“教义”和教会的收入来继续进行战争。[213]因此，教皇可能计划把博洛尼亚和佩鲁斯交还法国人。人们可以以这两个城市为基地更加为害佛罗伦萨公爵。弗朗索瓦·德·吉斯为什么进军罗马，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到达罗马后，把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花在玩弄阴谋诡计上，4月5日才对威尼斯发起进攻。进攻不很得手。5月，他不得不转攻为守。8月，他奉命返回法国。

教皇被人这样抛弃，不得不进行谈判，而且是为问题的彻底解决进行谈判。阿尔贝公爵用很大的克制缔结了和约。和约缔结后于9月14日公布。[214]这个消息一经传出，万众欢腾，普天同庆。我

们可以举出这些欢庆活动中的两次盛大游行：一次 9 月份在巴勒莫举行，“人们张灯结彩，庆祝保罗四世教皇陛下和我们的国王菲利普二世之间缔结和约”；[215]另一次 11 月 18 日[216]在巴利亚多利德举行，举行时该地鸣钟不止，有宗教列队仪式，人们高唱感恩赞美诗。

没有必要谈这项西班牙—教廷和约的重要性。它标志着西方世界的一个历史转折，标志着罗马沦落到服从哈布斯堡家族的地步，或者这样说也可以：它标志着罗马—西班牙联盟（因为在保罗四世的统治下，这种服从从来不是百分之百的，只消举出他 1555 年在承认新当选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个问题上制造的困难就可以知道。）这个联盟一直维持到从 1580 年到 1590 年这段时期，使天主教和教会受到保护[217]，使反宗教改革运动取得胜利。这个胜利只是因为有了这个世俗权与教权的联盟才得到保证。

弗朗索瓦·德·吉斯已经撤回米兰内，[218]但是，他在获悉圣康坦的灾难（1557 年 8 月 10 日）后，不得不再次越过阿尔卑斯山。人们知道科利尼在圣康坦被西班牙军队包围一天后，就设法钻进堡垒。8 月 10 日，王军统领指挥的解围部队在索姆河沿岸遭到敌军主力的突然袭击，并被驱散。接着发生了一场屠杀，大批法军官兵被俘，其中包括王军统领本人。菲利普在殿后部队中不时收到捷报。他写信给他的父亲说：“晚上 11 时，信使从战场到来，告诉我们敌军溃退，王军统领被俘。凌晨 1 时，另一名信使证实了失败的消息，没有证实王军统领被俘……我今天早上来到这里（**到博雷瓦**）以便明天前去现场。我的表兄弟（**埃马纽埃尔—菲利贝尔**）的一个亲随肯定他见到了王军统领和俘虏。俘虏的名单陛下即将见

到。”[219]

圣康坦攻下后，法国国王被解除武装。西班牙国王在法国国王的王国还有什么事不能干呢？菲利普二世指出：“然而，要在法国为所欲为必须以不缺乏金钱为条件。”关乎国运的话已经说出了口。西班牙的财政状况却是灾难性的。[220]1557年1月1日的法令已经宣布西班牙国家破产。所有的宏伟计划都难于实现，除非下定决心孤注一掷，不顾任何准则扑向巴黎。这正是埃马纽埃尔—菲利贝尔想做的，也正是已经告老退隐的查理五世得到胜利的消息后想做的。谁知道他们如果自主行事，为所欲为，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发生的情况是：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把时间浪费于包围诸如哈姆、卡特莱、圣康坦和努瓦荣之类的小城市上，因而失去了他们的胜利已经为他们带来的好处，未能扩大战果。

法国国王还来得及采取反措施，调集人马，等待吉斯返回。奇怪的是，在欧洲的各个金融中心，战败的法国国王的信誉仍然高于他的战胜者。英国人由于过分自信，也可能由于没有得到西班牙军队的及时援救，失去了他们在法国的古老要塞和据点。不管怎样，根据法国的观点，局势恢复了原状。毫无疑问，1558年7月13日，特尔姆元帅在格拉夫林战败，由于英国舰队参战，败局相当严重。但是，吉斯公爵[221]6月末攻拔可能威胁梅斯的蒂翁维尔。这次胜利弥补了上述败局。

同一个1558年，在地中海，一支强大的舰队应法国人的请求从东方开来。[222]6月份的头几天，这支舰队在那不勒斯沿海海域出现。6月7日，它被人发现在卡拉布里亚的小港口斯奎拉切。[223]13日，它在那波勒斯口。[224]它不在平时的停留港停留，继续高速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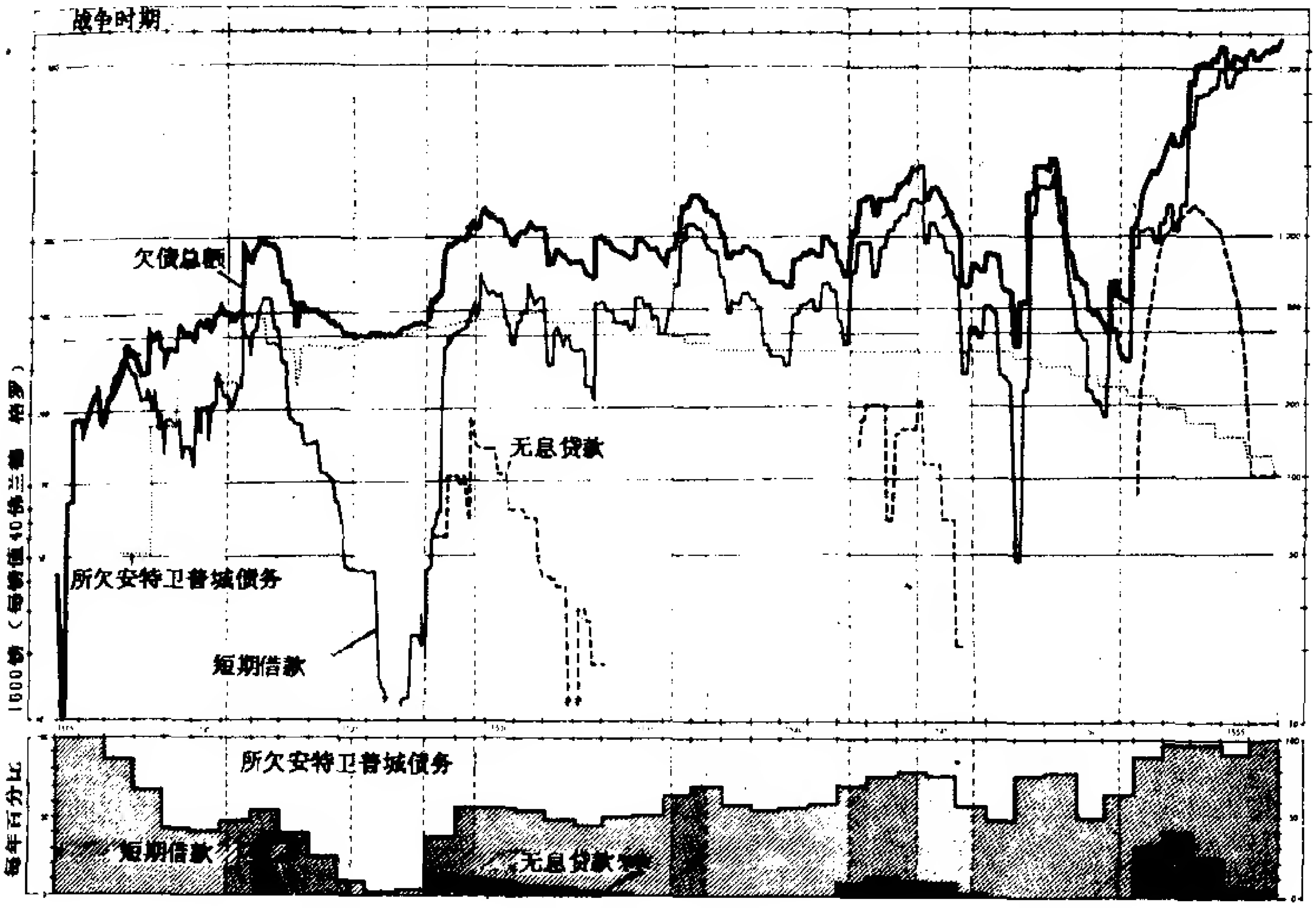


图66 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在安特卫普金融界的借款,1515—1556年

根据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查理五世在安特卫普金融界的借款"[载《查理五世和他的时代》(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1959年]绘制

有三种欠债:对安特卫普城市的欠债、对金融界商人的欠债(短期借款)、对显要人物的欠债(无息贷款)。以厘计算的利率在下图列出。短期借款最终占优势。这种巨额浮动欠债的起伏波动随着战争的变化产生。晕线构成的部分代表战争时期。对德意志新教徒的战争记录在两个连续的阶段中。这里采用的对数计数法隐蔽了最后的急剧上升(从50万镑上升到500万镑):菲利普二世的统治开始。要把这幅画补充完全,至少还需要关于坎波城的同样的记录资料。

行。[225]它突然袭击索伦托和马萨并获得成功,因为这些地方的居民虽然已经得到特别信使的通知,但没有想到危险迫在眉睫。6月26日,这支舰队一边航行,一边抢劫,抵达普罗西达沿海海域。它从普罗西达扬帆启航,驶往地中海西部。[226]在热那亚海湾,它没有发现法国的帆桨战船,于是向巴利阿里推进。皮亚利帕夏占领了巴利阿

里群岛中的米诺卡岛上的埃利亚[227]这座小城，使得巴伦西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时，巴伦西亚的人正担心摩里斯科人起来叛乱。[228]法国人说服这支舰队驶回土伦和尼斯。但是，皮亚利帕夏一到达那里，就拒绝采取任何对抗巴斯蒂亚的行动。这个拒绝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从格拉夫林传来了这一消息：瘟疫使被罚划船的奴隶和犯人大批死亡并且使皮亚利帕夏不得不拖带几艘帆桨战船。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皮亚利已被热那亚人高价贿买。

皮亚利帕夏不顾法国人徒劳无益的反对，率领舰队返回本土。返回时，还有为西班牙效劳的帆桨战船紧随其后，但这些舰船在航行中同土耳其舰队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次袭击对基督教世界来说，虽然代价高昂，但在战争的天平上却并没有什么大的份量。

因此，在罗马问题自从 1557 年 9 月以来已经得到解决的这个时刻，敌对双方能够恢复和平谈判。总之，1556 年的局面恢复了，但发生了两起新的事件：一是 1558 年 9 月 21 日，查理五世死于于斯特，菲利普二世在西班牙的出现因而比过去更为必要(我们以后再谈这件事)；二是玛丽·都铎接着也于 9 月 17 日去世，[229]这个对法国来说十分危险的英国同西班牙帝国的联盟于是分崩离析，宣告解体。王位继承问题在英国产生。这个问题构成的威胁和纠纷也随之而来。北欧再次成为所有外交人士瞩目关注之地。

卡托—康布雷锡和约

英国问题对最后导致在 1559 年 4 月 2 日和 3 日缔结卡托—康布雷锡和约的谈判，或许比历史

学家想象的更有影响。

毫无疑问,财源枯竭迫使敌对双方缔结和约。其次,事实证明,任何一方都无法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用武力解决问题。在法国方面,国内问题成堆,形成重压。如果按照词义去理解所有发自这个王国的外交报告,那么要找出一个比法国更加怨声载道的国家,找出一个比法国贵族阶级更加穷困悲惨的贵族阶级,找出一个比法国平民阶级更加呻吟悲叹的平民阶级,就是件难事了。虽然对情况的描述难免有夸大其词之处,但决非纯系子虚乌有。这个国家整个的巨大身躯,都受到新教的困扰折磨。亨利二世的政府决心用武力对付这个教派。在两个签字的政府中,这个政府肯定最"信奉天主教",打击异端更加坚决。它要这样做,和平对它来说就不可或缺。最后,还必须考虑到帮派的作用和影响。在亨利二世软弱无力的统治下,这种作用和影响十分强大。还必须考虑到吉斯和蒙莫朗西之间的将在不久以后为宗教战争添薪加炭的政治争端。这些争端往往只不过是普通的权力之争。威尼斯的通讯报导指出:"如果和平存在,这位王军统领就是法国最重要的人物;如果发生战争,他就是无足轻重的俘虏。"[230]这个事实太明显了。

这些事实、这些真实情况,在阿尔方斯·德·吕布勒的古老著作[231]和吕西安·罗米埃的光辉著作中[232]都已经经过详细的研审。但是,我们还可以对这些事实进行一些阐述。卡托—康布雷锡和约被法国历史学家,也被那个时代的某些人(我特别想到法国的皮埃蒙特的负责人布里萨克[233])视为法国的灾难。或许值得对另外一种观点进行研究。在法国从这项条约得到的好处中,最主要的是两宗婚姻:埃马纽埃尔—菲利贝尔和玛格丽特的婚姻以及菲利普二世

和法国的伊丽莎白的婚姻。伊丽莎白还是孩子，就必须成为西班牙的“和平的王后”。今天，我们倾向于低估这样一些好处。但是，这个事实不容否认：16世纪的整个政治首先是家族政治。婚姻是重大的交易。深远的谋算、无穷的狡计、窥测和陷阱，都是缔结婚姻的诱因。一宗与西班牙缔结的婚姻，只要由于它排除了与西班牙另一宗婚姻的可能性，这宗婚姻就是法国的辉煌胜利。英国的伊丽莎白只要愿意，就会成为菲利普二世的妻子。1558年10月，菲利普二世最真诚地向她求婚，被她拒绝。[234]与法国人缔结的婚姻，除了这宗婚姻本身带来好处之外，还是防止英国和西班牙帝国进行新的联合的保证。

对法国来说，条约的消极方面在于确定了法国放弃意大利，在于归还了萨瓦和皮埃蒙特这些和法兰西王国邻接、易于为法国同化的土地，从而对以后可能来自法国的对意大利半岛的事务的干预形成一道障碍，条约的消极方面最后还在于法国违反正式作出的承诺，放弃科西嘉，从而失去了地中海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阵地。但是，法国只归还了科西嘉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它并不拥有科西嘉的全部土地。条约规定把包括都灵在内的五个皮埃蒙特的要塞留给法国。这是对最近的将来加以保护。不错，这些要塞将于1562年11月2日归还。[235]但是，甚至在这个日期以后，在山的彼侧还会留下一个法国的桥头堡。因此，当内韦尔公爵1574年9月获悉亨利三世途经都灵期间把1562年以赔偿名义交给法国的皮涅罗尔和萨维朗两处要塞送给“萨瓦先生”时，大发雷霆。[236]从那时起，在山的彼侧对亨利三世就只剩下萨吕塞侯爵领地上的无法防守的城市和乡村了。内韦尔公爵又说：“这对我会是一件十分痛心

的事：陛下刚刚进入他的王国，就试图瓜分它，更有甚者，就试图在亲眼看见意大利的美丽之后永远关上通向这块土地的大门；我担心全世界看到陛下这样行事会大吃一惊，纷纷议论。"至于可怜的意大利，"它不幸眼见自己失去拯救自身的手段……眼见自己将永远屈从于西班牙的强大势力，会有正当理由来为自己的灾难悲叹。"之所以 1574 年，即卡托—康布雷锡和约签订后 15 年，还能向意大利"关上大门"，可能是因为 1559 年所作的牺牲和放弃并不像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大而明确。

不幸的是，法国牺牲的和放弃的，不仅仅有意大利，还有萨瓦，特别还有皮埃蒙特。后者是一个一半并入法国的、与瑞士各州邻接的、通过尼斯和维尔弗朗什狭窄的走廊在山的彼侧同意大利北部平原连接的邦国。当然，它并不是意大利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甚至在像班德洛[237]这样的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人怀疑有偏袒之嫌的意大利人的眼中，它也是一块单独的、特殊的土地。亨利二世统治下的法国急急忙忙寻求和平解决，却又显然不了解和平解决可能产生的后果，并且以不可原谅的残酷，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地放弃了皮埃蒙特。它还无情地让锡耶纳人受科西梅·德·梅迪奇支配，让科西嘉受热那亚支配。锡耶纳的流放者试图用高价从菲利普二世那里赎卖他们的自由，但白费力气。

然而，1559 年的条约隐藏着法国自身的谋算。亨利二世表现出来的反对异端的热情本身，在法国国内和国外，难道不都是为了对付英国而采取的策略的一部分吗？玛丽于 11 月死后，另外一个玛丽，即 1558 年 4 月 24 日与法国王太子结婚的玛丽·斯图亚特[238]，从王朝的观点看，显然享有取得英国王位的权利，特别由于

这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谨慎地，但却明显地倾向新教，情况更是这样。在罗马，人们对此感到忐忑不安。另一方面，菲利普二世尽力防止可能给年轻的英国女王的开除出教的惩罚。这个惩罚有为法国的入侵打开通路的危险。这次入侵当时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诗人们已在谈论这件事。例如 1559 年龙沙就在一首他向亨利二世致贺的颂歌中以及稍早些时候，在玛丽·都铎死后不久，迪·贝莱在一首写得极为清楚明白的十四行诗中，都谈到这件事。[239]

没有什么事物比 1559 年 6 月递交给菲利普二世的那份长备忘录[240]更能显示出北欧和英国事务的重要性了。这份文件使菲利普二世十分惊恐不安，以致他放弃了他的西班牙之行。这份没有签名的文件，毫无疑问出自君主的非西班牙籍顾问之手。菲利普二世把它送交给他不在西班牙各个王国期间担任摄政职务的姊妹胡安娜。这是一份包含 34 点内容的陈情表。它敦促西班牙国王继续留住北欧各国的中心——佛兰德。法国人当时正计划侵入英国。“如果丧失英国，佛兰德各地就将陷入迫在眉睫的危险中。否认这一点，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虽然某些人会对此提出异议。英国将在短时期内沦入敌手，这一点因各种理由已经被认为肯定无疑了。”这些理由包括：法国王太子享有权利；英吉利王国国势衰弱、四分五裂；英国国防状况不佳；英国天主教徒需要保护人；法国使用海军并以苏格兰为基地易于发动入侵等。至于教皇可以剥夺现在的英国女王的王位这一点，还不计算在上述理由之内。为了道义上的理由，西班牙国王显然不能支持天主教教会在英国的敌人。他如果这样做，就会发现自己遭到这个岛上大部分人的反对。（这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在荷兰，人们认为英国人大多数信奉天主教）。他会让

法国国王圆满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吗？从法律上讲，法国国王肯定将以他的名义宣布和平并维护和平，把远征英国的事交给法国王太子去进行。换句话说，就是追求他自己的目的而不顾他自己签订的条约。但是，如果菲利普二世留在荷兰，法国国王就不会进攻。

对参谋部的文件永远不能句句当真。但是，也有证据表明这项计划也不只是炊烟一缕。菲利普二世之所以不愿意经过法国返回西班牙，之所以避开人们对他的阿谀奉承，毫无疑问是因为他要避免自己卷入冒险的行动中。阿尔贝公爵在举行于巴黎圣母院的菲利普的婚礼上代表菲利普。他用密码写信给国王说："法国人尽量在他们所有的谈话中向陛下表示他们深厚的友谊……法国国王的全体亲随左右说的三句话中就会有两句谈到法国国王对陛下表示的敬爱和友谊，以及他将在陛下的一切事业中帮助陛下。这或许是真情，因为这是合乎理智的。也可能这些人表示愿意参与陛下的事业只是希望让陛下承担义务而不让他们自己的事业失败[241]……"就在法国国王开始热切地希望同菲利普二世真诚谅解，提出愿意派遣帆桨战船同菲利普二世的舰队合作，参加菲利普二世准备对阿尔及尔进行的远征时（至少法国方面这样认为），怀疑产生了。对这个怀疑，阿尔贝公爵的另一封信作了确切的说明。[242]在这封信里，他不无轻蔑地对法国宫廷里的每个人，甚至地位低如普通的马厩总管都了解国务会议的秘密讨论的内容感到惊讶。他对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说，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可以对基督教世界发号施令，还说"如果陛下在法国国王反英行动中援助他，他就会帮助陛下成为意大利的主人。"[243]然而，他又在 7 月份写的并由鲁伊·戈梅兹副署的信中大体说，不能让法国人在英国住定下来。"鉴于从前在那

不勒斯发生的事”，参加他们的事业是危险的、前途未卜的。“即使这样做并非陛下的意图，陛下现在就应该宣布，而且明明白白地宣布，一俟陛下离开荷兰，亲王大人（东·卡洛斯）就将前往该地，以使法英两国人知道，陛下并非在让这个战略要地毫无保护的情况下离开它。在我看来，这样做很好。”[244]

伊丽莎白在她那方面对法国在诺曼底各个港口厉兵秣马进行备战，深感不安，并且竭力针对苏格兰和法国采取行动。1560 年的安布瓦斯密谋，是一出社会戏和宗教戏，但并非与外国毫无关连。[245]不错，在这个时期，亨利二世的法国向比它弱小得多的国家作了让步。这位签署卡托—康布雷锡条约的国王 1559 年 7 月 1 日因意外事件亡故。[246]他的死孕育着动乱，至少在一个时期之内使法国失去了扮演重大角色的可能性。

这是一起多么不祥的偶然事件啊！对法国来说这是一次多么大的打击啊！如果我们愿意对 1559 年缔结的条约产生的结果进行研究和总结，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将英国争取过来这个希望包括进这个总结中，以补偿历史学家经常详细举出的损失。这些损失是：丧失了意大利和科西嘉。将英国争取过来这个希望，已经接近实现，但是，未来却使之化为泡影。

菲利普二世返回西班牙

菲利普二世从来没有喜爱过北欧国家。早在 1555 年，他就曾经打算让他的兄弟留住佛兰德，自己返回西班牙。[247]匈牙利的玛丽[248]为此暴跳如雷。难道北欧的“雾”适合老年，南欧的太阳适合青年吗？1558 年，菲利普二世没

有改变主意，想要他那个曾经在1556年秋季陪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去西班牙的姊姊在荷兰代替自己。但是，匈牙利的玛丽在终于接受之后[249]于1558年死去。直到1559年，即卡托—康布雷锡条约签订后4个月，他的岳父亨利二世死后1个月，菲利普二世才得以成行。

传记作者和历史学家谈到这件事时语焉不详。[250]马里亚纳史的第二部分的作者[251]甚至对这件事只字不提。这个作者的文章不作任何解释就一下子从荷兰的场景跳到西班牙的场景。由于这次旅行，菲利普二世个人的帝国，这个多年来稳定不变的单位，终于脱离了查理五世的继承系统。与此同时，欧洲的新秩序正在建立。1558年这位新君主未经战争就失去两个主要的战略要地：玛丽·都铎去世和他的父亲弃让神圣罗马帝国王位这两件事使菲利普二世丢失了英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在这些事件中，有一件属于历史的必然，易于为大家理解：菲利普二世不可能在对新教德意志、费迪南和马克西米利安的联合敌对行动进行的斗争中获胜。而几乎正当对菲利普二世来说德意志正在最终地形成一个关闭的、外国的、反对他的世界的时刻，一起非常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玛丽·都铎11月份出乎预料的死——打破了英国和西班牙的联盟，并且终止了建立一个以北海为中心的英国—佛兰德国家的梦想。

要估量这些事件的深远影响，只要想想菲利普二世本来可能是个什么人物——德意志世界和英国的主人——就足够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个称号，即使被剥夺了它的全部实质性的内容，本来也会使令人不快的关于在先权的争吵得以避免，本来也会增加

西班牙对意大利的权威，并且会使对土耳其的战争能够有一个单一的指挥权威，不管这场战争是在匈牙利平原或者是在地中海进行。另一方面，有了英国的支持或者中立，荷兰战争就会进行得迥然不同。将成为下半个世纪的主要事件的、为了统治大西洋而进行的搏斗，将不会在灾难中结束。但是，谁会看不到菲利普二世的帝国的重心由于实际情况和环境的力量从北欧转移到南欧呢？卡托—康布雷锡和约加强了西班牙对意大利的控制，靠更加紧急、更富成果的任务，促使欧洲南部成为西班牙国王外交政策的重点地区。

菲利普二世 1559 年 8 月至 9 月的返回西班牙之行，结束了这一事态的发展。从此以后，菲利普二世就像西班牙的俘虏一样，在这个半岛上留住下来。毫无疑问，同把他描述成被囚禁在埃斯科利亚尔的轶事所说的相反，他以后还经常周游各地，[252]但始终都在这个半岛之内。

古农·卢邦[253]在一部他很久以前写成但至今仍然有用的著作中责备菲利普二世没有在征服葡萄牙后把他的首都从马德里迁往里斯本，没有认识到大西洋的重要性。乍一看，他 1559 年春季离弃布鲁塞尔，也是同一性质的错误。菲利普二世在他整个统治期间谨慎小心地故意置身于欧洲的中心之外。他在制订政策时，不得不考虑一项在距离方面对他不利的计算。不难用统计数字来表明，消息无论从米兰、那不勒斯或者威尼斯，更不用说从德意志、英国或者法国，传到布鲁塞尔比传到马德里快得多。西班牙，而且只有西班牙，变成了菲利普二世下属的各个国家的心脏。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强有力的心脏，从这个心脏传出他的政策的强劲有力的推动。以后国王将从西班牙观察和评断各种事件；国王将在西班牙的道

德氛围中制订他的政策；他的左右亲信以后一直扩大的，是西班牙的利益；以后聚集在他的周围的将是西班牙人。

国王的归来对他的左右亲信的组成产生了影响。早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巡游出行，尽管为时短暂，仍然使他的这个或者那个大臣所受的恩宠和所居的地位发生变化。1546年，威尼斯大使贝尔纳多·纳瓦杰罗谈到佩雷诺特时，附带指出[254]："……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离开西班牙居留德意志或者佛兰德期间，他的威望大大提高了。"菲利普二世离开荷兰时同他的佛兰德顾问和弗朗什—孔泰顾问离别。正如佩雷诺特的儿子格朗弗勒的例子显示出的那样，这次离别产生了某种后果。流浪生活曾经使这位阿拉斯主教走遍查理五世的整个帝国。他后来在荷兰居留，地位令人羡慕。他是菲利普二世派驻帕尔马的玛格丽特处的代表。但是，他的地位不能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时期他在参议会中的地位相比，也不能和1559年菲利普二世离开之前他在菲利普二世的参议会中的地位相比。20年间，他就这样远离君主。这两个人最后一次会见的重要性大家都很了解。格朗弗勒1579年到达马德里。之后，帝国主义的扩张时期紧接着就开始了。[255]

菲利普二世返回西班牙后曾经长年累月完全信赖他的西班牙籍顾问。他在西班牙受到这个半岛上的各个王国的无限爱戴。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没完没了地巡游旅行之后，菲利普二世长期持续在西班牙出现，这被西班牙当成一种恩典，真是感动了"西班牙人的肺腑"。[256]费理亚公爵1595年写道："国王下属的邦国如此之多，如此之广，以致我怀疑他能否在别处像在西班牙的人心中那样全面地、完整地进行统治。"[257]

的确，这次不断计划、不断延期的旅行丝毫不像一出临时编成的戏。人们认为，菲利普二世的爱好在构成他的旅行的原因方面所起的作用被夸大了。他不喜爱荷兰正如荷兰不大喜爱他一样。他“对这个居留地感到厌腻”，因此，据说他匆匆离开荷兰并且一去不复返。[258]以上说法是一种大胆的设想。只有他匆忙离去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法国大使塞巴斯蒂安·德·奥贝斯皮内 7 月 27 日从根特城写信给他的主子说[259]：“这位君主如何匆忙出行，如何催办所有的事以便不出差错，不发生延迟或者阻碍他的出行等，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伊丽莎白的大使报告流传于西班牙各界的关于国王将永远不会返回荷兰和帕尔马的玛格丽特谈到“陛下到达西班牙的愿望”等两则传闻。但是，这个愿望是以严肃的动机为依据的。菲利普二世在布鲁塞尔的西班牙籍顾问从 1555 年起就支持这个愿望，反对“勃艮第派”、格朗弗勒派、库尔特维尔派、埃格蒙特派和奥朗日亲王派。毫无疑问，这些顾问有他们个人的原因：重返家园、恢复习俗、重得利益等。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可能利用在他们家乡进行的公有财产的大规模出售。但是，他们也想到西班牙的利益。

君主长期离位使政府机构逐渐变得松懈怠惰起来。西班牙的各个邦国有三个首都和三个政府：布鲁塞尔、于斯特修道院和巴利亚多利德。国王从布鲁塞尔指挥战争并操纵外交的主线。查理五世在于斯特修道院很快就不顾他原来的决定，再度掌握统治的权柄。胡安娜在巴利亚多利德听取参议会的意见，并且肩负起行政管理的主要职责。三个首都之间的权力划分并不相等。尽管有大批信使穿梭往来，这三个首都之间的联系仍然不完全。官方的来往信件经常抱怨这一点，而且这个协同配合方面的缺点很快就产生了

后果。一件事在巴利亚多利德商妥之后,必须呈交君主审查批准。这种难以置信的迂回所引起的耽搁延迟是可以想象的。西班牙几乎不再有人治理国政。1558年9月,查理五世在于斯特去世,更使困难加深。胡安娜公主显然不能胜任控制局势的任务。

菲利普二世在胜利的欢乐的气氛中离开布鲁塞尔。来自意大利各地的代表聚集在菲利普二世的周围,向他献出钱财,提出请求。科西梅·德·梅迪奇这样做,是为了得到锡耶纳;马耳他骑士团团长这样做,是为了得到远征的黎波里所必需的命令;热那亚共和国这样做,是为了处理关于科西嘉的收复的细节;法尔内斯家族这样做,是为了驱逐洛林公爵夫人,把荷兰的统治管理留给帕尔马的玛格丽特。菲利普二世在一次又一次接见中,一阵又一阵的感恩赞美声中,把他最大的恩宠赐给佛兰德的领主们,划定了新总督的权限。8月11日,他在弗莱辛格。为了等待顺风来临,他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星期。等待期间,他逐一参观游览了各个岛屿和城堡,借以消磨时间。最后,25日这天,王家舰队启碇。

让·德·旺德内斯的《日记》中有一篇很全面的关于这次返回之行的叙述。[260]这个日记又由年轻的亚历山大·法尔内兹的家庭教师阿尔丹盖利[261]写给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的几封信加以补充。亚历山大·法尔内兹是西班牙的政策的人质。他的母亲曾经同意让人在西班牙把他抚养大。他陪同国王作这次旅行。让我们顺便指出,传统的关于这次旅行的叙述(可以在沃森、普雷斯科特或布拉特利等人的著作中读到)和关于菲利普二世在拉雷多的富于浪漫色彩的登陆的叙述,通篇都是虚构。当这位君主的整个船队满载他的金银财宝、上千名跟随他的封建领主和他们的金银细软在他的

后面沉下海底时，他并没有冒生命危险驾一叶扁舟单独一人到达。一场猛烈的风暴的确把跟随的船队中的沉重的荷兰双桅帆船刮得颠簸不止。但是，菲利普二世在一封他自己于1559年9月26日写的信中说，只有一艘船集合清点时未到。[262]至于国王，他已经上岸，并且毫无疑问已经在岸上一天。上述他的整个船队沉下海底，他单独一人到达等，都纯属虚构，可能出自格雷哥里奥·莱蒂的想象。此人详尽地叙述了这次所谓的灾难。这个灾难是"所有以后降临到国王头上的耻辱和不幸的真正的预兆"[263]。

4. 世纪中叶的西班牙

国王是在怎样一个西班牙登陆呢？当然是一个急切盼望再见到他的西班牙。多年以来，那里人人都要求他归来。摄政女王和参议会从1555年起[264]就提出这一要求；卡斯蒂利亚的国会，1558年开会[265]提出这项要求；查理五世和西班牙半岛的全体公职人员也提出同样要求。查理五世认为菲利普二世的归来是必要的。在弗朗西斯科·奥索里奥的通讯中[266]，几乎每一页都影射国王的归来。他说，当消息不好时，这次归来会雪中送炭，解决所有的问题；当消息好时，这次归来可以使情况变得好上加好。1559年5月17日，他写道："和平的来临和陛下的到来，在这些王国所引起的喜悦和满意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致我无法用笔墨来形容。"[267]

当然，局势是严重的。西班牙虽然逃脱了战争的直接打击，但是，它不断提供兵员、船只，金钱，而且是大量金钱。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意义上，它已经被推翻了，陷入极度混乱和不安之中。一场

看来非常令人忧虑不安的宗教危机加深了这种混乱状态。

新教引起的惊恐不安

1558年[268]，在塞维利亚、巴利亚多利德和好些小中心都发现“新教”社会。这种叫法虽然并不确切，我们也应该使用。总而言之，它们被认为是“新教社会”。这个消息使查理五世和他的儿子惊恐不安起来，以致有时有人提出国王1559年的旅行和新教的爆炸有关。巴利亚多利德的中心广场上的第二次火刑的确是继国王在拉雷多登岸之后执行的。[269]这两起事件相隔一个月。丹麦历史学家布拉特利写道，菲利普二世收到来自塞维利亚和巴利亚多利德的坏消息后，“只渴望有一个他能返回西班牙的时刻。”[270]他这样写只不过是遵循某种传统而已。

宗教裁判所组织的引人注目的镇压，难道真正意味着一场规模巨大的新教运动正在西班牙蔓延并且威胁着这个国家吗？人们细读马塞尔·巴塔荣的文章并没有得到这个印象。《伊拉斯谟和西班牙》[271]一书的这位作者指出，所谓的1558年的“新教徒”基本上是其根源在西班牙已经古老并且与路德教义并无任何联系的精神运动的继承者。巴利亚多利德的精神火焰从近处看，正像各种不同的金属粉末同时燃烧时发出的那些五彩缤纷的火焰一样。这些金属中的某些十分贵重、稀有。谁能够精确地秤出譬如奥古斯丁·卡扎拉或者康斯坦丁诺这样的改宗者通过他们神秘的犹太传统能够为这个宗教裁判所的火堆带来的东西的重量呢？谁能够秤出在这堆火里燃烧的属于光明派的教义的东西的份量呢？这种教义是一种奇怪的金属，是纯西班牙产品。它炼净后是西班牙的主要的神秘

主义的材料。谁能说出这种合金中有多少是用一种精神上的宗教(这种宗教朝向内心生活)的伊拉斯谟思想制成的?在从1520年到1530年的这些年月,首先把伊拉斯谟教派的思想,然后把瓦尔德西教派的思想传到那时仍然向外部世界的精神货品敞开大门的意大利半岛……20年后,这些思想仍然存在,它们的位置虽然已经被调换,但仍然可以辨认出来。如果说在这些思想里搀和着路德教派的某些思想的话,这一点却是肯定无疑的:在西班牙没有有组织的新教的礼拜仪式,没有像法国的胡格诺教派那样的具有异端思想的教派。西班牙的异端如果说在某些方面反对天主教的传统的话,那就是它更加倾向于试图拯救,不仅拯救精神,而且也要拯救教会和它的组织,一句话,试图维护公认的教义。不管怎样,这就是它的希望。

如果没有什么或者几乎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添进了新的宗教精神的炉火中,那么为什么会发生1559年的镇压呢?根据马塞尔·巴塔荣的观点,[272]这是一种新的镇压方法。天主教徒懂得,他们的宗教应该毫不妥协,毫不容忍。他们渴望进攻,以此来证明他们充满自信;他们亟欲使用恐怖手段来惩一儆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有利于和平的政策以及弄乱所有的分界线和混淆各种立场的那种紧张局面的变化无常性,全都完结了。新教的不妥协性使事物变得明朗起来。在1555年后,在新教徒在德意志取得成功和查理五世退位后,对立的双方采取了严厉的、旗帜鲜明的立场。一场无情的镇压先在意大利进行,然后另一场在西班牙进行。两者互不相干。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独立自主的。菲利普二世和保罗四世虽然被卷入同一个运动中,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友好。事态迅速发

展。菲利普二世归返的西班牙已经转入反宗教改革运动，转入镇压。当然，这并不因此而是国王的所作所为产生的结果，这是他所处的时代产生的，结果这是整个基督教世界发生的事件产生的结果，这是日内瓦的兴起和罗马的反应产生的结果。这是一场卷带了菲利普二世的、菲利普二世自己并没有制造的巨大的精神冲突。然而，10月8日，国王出席在大广场上举行的火刑，通过他亲临刑场来突出对“路德派教徒”施加的惩一儆百的惩罚，此事并非偶然。

对菲利普二世的焦虑不安，我们不应该低估。他受到在德意志和在法国发生的事件的教育之后，1558年，忧心忡忡，疑惧重重。但是，正如1559年以后他和胡安娜公主的通信对宗教问题不关注，很少提及这一情况所显示的那样，他甚至在1559年返回以前，就已经了解到危险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大。6月26日，[273]他告知他已经收到关于5月份的第一次火刑的长篇报告，他补充说，他很希望“已经播下的邪恶会得到医治”。他的口气是平和的。已经播下的邪恶很大，但是，庄稼来不及成熟。

镇压意味着西班牙的异端的末日已经来临。也许胜利之所以能够轻易取得是由于这个事实：伊斯拉谟教派或者新教是从外国移植到西班牙的已经“接上”、发芽、开花的嫁接植物，但是它们成活的时间又有多长呢？在人类的文明史上，50年是一段很短的时间。土壤不利于嫁接，树不适宜嫁接。最后，这种“新教”所剩下的一切，就是它那能够被吸收入西班牙的神秘主义传统的那一部分，它那能够朝着西班牙的神秘主义——个人祈祷的避难处——的方向，朝着圣泰雷兹和十字兄弟会的圣让的方向延伸发展的那一部分。

其次，这个运动从来就不得民心，而且，情况正好相反。托莱多的大主教1558年10月宣称，看来民众并没有受到污染[274]。被拘捕者激起的公愤如此之大，以致不得不在夜间把他们转移到巴利亚多利德，[275]因为担心民众和儿童追赶、袭击他们，向他们扔石头。受控告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是人道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中的精英，也是西班牙领主的社会精英，大宗教裁判所法官1558年没有像他的历届前任那样对这些人加以宽恕。

可能这就是产生威尼斯散布的看来完全虚妄不实的传闻的原因。这个传闻说："在宗教的外衣下与大领主勾结串通，合谋组织几次叛乱。"[276]达克斯主教1559年3月[277]从威尼斯写来的信说得更加清楚。这封信报告说，"几个月来在圣马克产生一个传闻。此后这个传闻得到证实。它的内容是：在西班牙，王国最大的王侯中有四个起来赞成路德异端。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如此顽强……他们将用武力强迫他们所有的封臣拥护他们。如果菲利普不及早补救这个局面，他就将有成为最弱方的危险。"但是，威尼斯和罗马一样，都是谣言滋生的城市。有一天，朗布伊埃红衣主教致函查理五世说："从这里（罗马）传到威尼斯的消息和从威尼斯传到这里的消息在意大利并不被人当真，就像王宫里的闲言碎语在法国并不被人当真一样。"西班牙的"新教"似乎没有什么政治影响。但是，混乱可能产生，因为在宗教叛乱之外，西班牙还有政治不安情绪。这种不安情绪也令人忧心忡忡。

政治上的不安与不满

人们通常把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当作一个统一的西班牙来谈论。对于统一的西班牙这个名词，我们必须统一认识并加以限定。在这个长期的专制统治时期，中央集权制的实施当然加深了，民众个人享有的特权和自由将近 1559 年时继续遭到蚕食。法律没有改变。对过去的叛乱人们记忆犹新。王室的权威并非毫无限制，并非毫无与之对抗的力量。它必须同司法部门，同教士的神话般的财富，同富有的贵族的闹独立，同摩里斯科人有时公开的违反法纪，同政府官员的抗命不从等进行斗争。在 1556 年和 1559 年之间这段时期，甚至出现了国家威信严重下降和违抗命令的危机。

问题不在于公开的叛乱，而在于不满的情绪和不忠的思想形成的那股浪潮。这股浪潮在历史学家略伦特[278]所收集的并且只在并排列出时才具有意义的那类详情细节中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当查理五世“年迈力衰、誉满名高、病弱体残”，于 1556 年在拉雷多登岸时，他发现只有几个贵族在那里迎候。这时这位年迈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此感到痛苦和惊讶。[279]不久以后，查理五世的姊妹、法国王后伊丽莎白和匈牙利王后玛丽来半岛旅行。在从哈伦迪利亚前往巴达霍斯途中要召几个领主来陪同她们，但是，这些奉召的领主却抗命不从，并且认为因为这件事为自己辩解是多此一举。[280]不久以前，希望在瓜达拉哈拉定居的这两位王后曾经要求因凡塔多公爵把他的房屋让给她们。这些房屋是以后庆祝菲利普二世的第三次婚礼的地方。[281]公爵拒绝了这两位王后的要求，这激起这两个妇女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极大愤慨。但是，这位皇帝却不管别人

怎样议论，不愿强迫公爵。因为公爵是过去曾经为他效命的重要人物。1558 年 1 月，普拉森西亚的市长决定在位于于斯特附近的库阿科斯村执行某些命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这个村子的代表是个警官。市长和警官之间发生了争执。市长下令逮捕警官并且把他关押起来，从而结束了这场争执[282]。

人人都试图利用政府的缺陷、法官和大臣的无能来获得某些额外的特权。1559 年 10 月，[283]菲利普二世对财政赤字感到十分忧虑，于是下定决心，设法革除弊端，厉行节约。一位年老的顾问、巴利亚多利德的司法部门的治安法官帕洛马雷斯学士就大领主在司法事务方面的过分要求写了一封奇怪的信给国王。这位年老的顾问提醒国王，国王在 1548 年和 1550 年之间这段时期在德意志旅行时，七八个西班牙最高贵族曾经在巴利亚多利德的圣帕布洛修道院开会，为全体有爵位的骑士要求以后享有只受君主审判的特权。他们也曾经要求在领主的土地里发生的刑事案件当由王家法庭审理时，判决应付的罚款应归领主所有。他们引用一项所谓瓜达拉哈拉的法律来支持他们提出的上述要求。这项法律开始制订于胡安一世在位时期。根据帕洛马雷斯的说法，这项法律不足凭信或者含糊不清。1556 年（日期是有意义的，因为国王 1554 年前往英格兰，再次不在国内），在圣帕布洛修道院召开了一个同样的会议，会上提出了同样的遭到胡安娜公主拒绝的要求。领主们于是想出一个迂回的办法：在出售领地的契约中，特别在 1559 年订立的契约中，契约的订立者据说根据瓜达拉哈达法律采用了对国家的法律来说具有危险性的条款。是王室官员胡安·德·瓦尔加斯学士第一个把这些令人生畏的语句塞进有利于他自己的关于出售事宜

的文契中，其目的在于为自己保留下来在他购置的土地上进行刑事审判会带来的收益。他的例子自然群起效尤。帕洛马雷斯补充说："陛下的某些仆从和国务顾问已经签订这样的出售。陛下应该密切注意这件事。"甚至连最高的公职人员也受到引诱，这一点已经被人看到。

领主的所作所为和封臣土地的购买者的所作所为表明国家无能、贫困和懦弱。这些情况怂恿人们侵越国家的权力。那时王权经常遇到的障碍日益巨大，这是容易理解的。城市在受到失去司法裁判权的威胁时，顽强自卫，向国王派遣代表并且往往得手。同样，往往是管理贸易的官吏自己帮助塞维利亚的商人逃脱政府的措施。1557 年春季，政府没收了西印度船队带给个人的白银。查理五世气愤地说[284]："鉴于在过去运到的七八百万杜卡托中我们曾经要来了 500 万，于是这次商人是如此狡滑，办法想得如此巧妙，结果只剩下 50 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大发雷霆，亲自干预才使得司法机器运转起来对付罪犯。同年秋季，[285]派遣阿尔瓦罗·德·巴桑率领的小舰队去迎战西印度舰队的这一行动，被人认为更加审慎。这支小舰队 9 月 7 日抵达圣卢加尔，没收了硬币并把这些硬币运往桑坦德，然后再从该地运往荷兰。国王的权力机构沦落到采用权宜之计的地步。

国王的权力机构有时还丝毫不敢进行干预。例如，阿拉贡总督弗朗卡维拉公爵侵越司法部门的裁判权，下令绞死一个"示威者"，他的行动引发一场暴乱。国会未经国王召集就自行开会。这位总督被迫逃往阿尔哈费里亚。巴利亚多利德政府获悉此事后，否认授权给他，拒绝承担责任。[286]这个政府负担不起疏离阿拉贡这件事产

生的后果，特别在对法战争时期更是如此。同样，在巴伦西亚对“塔加里诺斯人”，即对当地的摩里斯科人进行预审(这是他们的生计)的宗教裁判所法官收到谨慎行事的训令。一封1557年6月4日致宗教裁判所委员会的信[287]写道：“去年9月4日……你们写信给我们说……由于局势如此危险，目前我们应当停止继续审理塔加林斯人的案件。”

可以想象，公职人员受到这些劝告后，真是畏首畏尾，犹豫不决，即使在奉命行事时也是如此。1559年2月28日，[288]宗教裁判所法官阿尔特亚加致函最高宗教裁判所，叙述巴塞罗那教廷圣职部的警官来要求他在巴伦西亚执行这个法庭作出的判决。“我之所以没有叫人逮捕检察官的公诉状中列出的人，是为了避免在当前的形势下，在被控告的人物大部分是这个城市杰出的官员……的情况下，可能在这个城市中由此产生的巨大公愤和动乱。”鉴于目前的形势……目前这个时期当然是严重的，并且在考验王朝的统治。

财 政 困 难

君主被捆住了手脚，无法自由行事。迫使他返回西班牙的各种忧虑中的最大的忧虑——关于钱的忧虑——支配他的全部所作所为。

他继承下来的帝国财政的赤字是如此巨大，以致他一支付由于战争重起而不得不支付的款项时，他的信誉就垮了。1557年1月国家正式宣布破产。[289]但是，这难道是真正的破产吗？菲利普二世的第一道著名法令只不过是流动债务的整理而已。王家国库依

靠借贷和预支度日。这些借贷和预支是商人以高利率和其他苛刻要求为条件同意提供的。这些商人(鉴于西班牙帝国的分散性质和君主在荷兰)自己单独就能代表王家国库动用远处的和很久以后的收入。王家国库付给他们高额利息并且在定期的集市日期偿还欠债。国家的债务就这样由大量彼此极不相同的证券表示出来。法令并没有废除债务，而是规定用“胡罗”(juros)偿付。这是一种永久性的或者终身性的年金，其利率原则上为5%。1557年1月1日被确定为清理债务的开始日期。

银行家们先是抗议，然后屈服。富格家族在进行了比其他家族更加激烈的抵抗之后也屈服就范。法令显然对商人造成严重损失：他们拥有的债券的利率降低；他们的资本冻结；他们还能够做的只不过是出售终身年金而已。他们之中好些人的确这样做了。但是，他们的行动引起市价猛跌，使出售者蒙受损失。因此，在富格家族投降时，[290]“胡罗”下降到它票面价值的40%到50%。短期高利(12%和13%)债券和利率为5%的永久性年金之间的强迫性交换，不管为债权人造成多大的损失，并不是完全的破产或者严格根据法律意义的破产。

应急措施使国家好好歹歹维持到卡托—康布雷锡和约缔结，但是，这种措施并没有消除全部困难。只有热那亚银行家还愿意贷款给西班牙国王。他们提出的贷款条件比过去更加苛刻。我现在举出1558年在巴利亚多利德缔结的两项“合同”为证。通过第一项合同，热那亚银行家尼古洛·格里马尔迪[291]借给国王100万金币。“这个尼古洛·格里马尔迪保证负责在佛兰德以每埃居值72格罗的比价付给80万埃居，并以如下的方式付给：西班牙船只第一次

自秘鲁到达时付30万;11月底付25万;1558年12月底付余下的25万。另外20万埃居他保证在这一年的11月、12月以每埃居值11里亚尔的比价在米兰支付,每月支付一半。"国王也作出一些保证作为回报:"陛下在西班牙以每埃居值400马拉维迪的比价并用下列方式偿还上述100万金币:30万立即用目前储存在拉雷多的钱款偿还;30万用将由首批来自秘鲁的船只运来的金、银偿还(如果这一年10月不偿还,上述格里马尔迪将无在11月底和12月底在佛兰德或者米兰付款的义务);30万埃居用1559年卡斯蒂利亚的税收偿付,无息期票将交付格里马尔迪。400万马拉维迪中余下的166,666埃居可以利率为10%的年金支付。将以下述方式偿还旧债54万埃居:11万用年金支付,利率为10%;13.5万用年金支付,利率为12%;17万用年金支付,利率为14%;2.5万用矿业股份支付。[①]这笔钱款的利息到1556年底按14%计算;1557年按8%计算。此外还准许格里马尔迪从西班牙输出100万金币。"

这些数字表明贷款条件异常苛刻。一篇法国的未署名的就此事进行的评论指出:"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个热那亚商人实际上并没有出借他自己的一分一厘钱。然而,由于他使菲利普国王在安特卫普和在米兰的金融市场以与国王在这里被付给钱款的条件相同的条件得到钱款从而帮助了国王,因此,他就为每埃居赚得50马拉维迪,因为当1埃居只值350马拉维迪时,却以1埃居值400马拉维迪的比价偿还他。这是15%的差价。实际上,他在佛兰德也赚得同样多,因为当1埃居值78格罗时,他却以1埃居值72格罗

① 原文如此,各项款额相加仅为44万,疑有误。——译者

的比价借钱给王室。”这个评论员对西班牙国王签定这样一项协定感到大惑不解。如果这位国王在拉雷多有钱，就让人把这些钱直接送来，事情不是更简单吗？这个评论员只看到这样做有两个好处：避免了海上运输的危险和旧债利率下降。高筑的债台对菲利普二世采取的对向他贷款者的政策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同样是热那亚商人的康斯坦丁诺·真蒂来[292]在同一个1558年同意借出的一笔60万埃居贷款的条件也同样苛刻。这笔贷款的偿还方式如下：12.5万埃居立即在塞维利亚偿还；一笔数额相同的钱款1558年7月在塞维利亚偿还。35万埃居分配给卡斯蒂利亚的税收负担。对此还要加上通过兑换得来的过高的利润和140万埃居旧债的清偿。同样一个匿名评论员很容易就让人看到谁从这项交易活动中得利最多。

在以上引用的两个例子中，整个负担都落在卡斯蒂利亚身上（这正如1557年1月1日和富格签订的奇怪的合同一样。这项合同有一份现存于那不勒斯的法尔内兹家族的档案中[293]）。这一点不应该令人感到惊奇。在这些艰难的年月中，商谈签订的贷款合同总是这个情况。这些贷款都用卡斯蒂利亚的普通税和特别税以及用来自西印度的船队带来的贵金属作为抵押发放。归根结蒂，菲利普二世的信用依靠西班牙的信用，而这种信用已经受到很大的损害。

国家的确受到肆无忌惮的剥削，在对保罗四世作战期间，政府的确不得不从高级教长那里勒索钱财。这些高级教长只是因为懒得对抗才拿出钱来。然后，由于需要面前无法律可言，政府就尽可能没收船队从西印度带回的钱财。这些钱应该是指预先决定给塞维利亚商人的钱或者从西印度归来的旅客身上找到的钱。这些没

收行动1556年、1557年和1558年一再发生，给人留下很坏的回忆。1559年菲利普二世才决定归还过去没收的资本，但是其中的三分之二用胡罗支付。随后，在商界出现的喜悦情绪充分说明，这一措施虽然本身并不公平合理，但在大多数人眼里，却是始料未及的[294]……

卡托—康布雷锡和约签订后不久，菲利普二世似乎感到某种程度的内疚。他说："……既不从（在西印度的船队上的）过路商人那里，也不从任何个人那里拿取任何东西。相反，让他们自由地收到寄送给他们的钱物，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合乎理智的。"[295]这是来得已晚的明智！10年以后，当传闻政府要恢复它早先的办法时，很多人却宁愿留在美洲而不愿冒他们的钱财被没收之险回到西班牙。[296]

至于正常的收入，除了卡斯蒂利亚的税收外，似乎都已经预支了。必须寻找其他税源。因此就产生了五花八门的财政应急办法。胡安娜公主1557年7月26日致国王的一封信[297]制订了一个表：西班牙出售末等贵族称号、承认教士的子女为婚生子女、设立市政官职，出售公有土地和司法裁判权……等。这种种出售比其他事物更使西班牙的各个王国陷于动乱之中。显然，这些出售有利于大领主，但是，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知道很少。这些出售同1570年以后教会土地的出售一样，值得仔细研究。城市是第一批牺牲者，因为公有土地实际上往往是市镇的土地。这些土地就这样从城市落入贵族手中。但是，很多乡村却趁此机会赎买了它们自己，从而摆脱了城市的司法裁判权。锡曼卡斯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从巴利亚多利德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

城市新官职的设置，是强使城市缴纳捐税的另外一种方式，因为国家收取官职出售费，随后则由城市支付薪津。[298]城市的抱怨不满是可以理解的。[299]城市保护它们自己的收入，毫不迟疑地把它们的代表一直派往佛兰德那样边远的地区。菲利普二世对城市的要求不能充耳不闻。他进行干预，取消了几笔几乎签订了的出售官职交易，最后还禁止出售某些低级官职。但是，这些明智的措施制订已晚。正如帕洛马雷斯学士和某些人的那封已经被人引用的信所说的那样，侵犯权利的事已经发生多起。关于这些侵犯权利事件中的某一些，例如发生在格拉纳达的对公有土地的侵占，已经没有或者很少有纪录留下。[300]1559年国库陷于极大的困境之中，菲利普二世和法国缔结了和平条约，但是，直到该约缔结为止，还必须维持一支步兵。然后让这支军队复员。要做成这件事必需支付这支军队薪饷的欠款。由于缺钱付不起这些欠款，无法让这支军队复员，于是薪饷欠款的数额不断增加，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菲利普二世3月份向西班牙索要17万埃居。[301]但女摄政只筹集成功两笔借款：一笔80万，另一笔30万。她作的后一次努力，使负责西班牙国库支付的代理人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尔·坎波的信用濒于破产。为了保全他的信用，已经把巴利亚多利德集市的闭市时间推迟到6月份。1559年7月13日，[302]胡安娜公主致函她的兄弟说："代理人准备去那里并且尽量履行关于支付马拉维迪的义务。其总额陛下将在呈交给陛下的备忘录中见到。他在这方面依靠的主要基础是期待中的由舰队从西印度运来的白银。这支船队刚刚到达。今天，我们刚刚获悉这支船队既没有为陛下也没有为其他任何人带来任何东西。"据塞维利亚的市政官员说，[303]是新西班牙的总督

决定不让船队装上任何锭性金属，原因是怕遭到海上行劫者抢劫。

在这种环境下，不可能对付6月份这个最后期限。公主继续写道："维利亚隆的集市贸易后来一直延长到圣詹姆斯节，[304]以便在这个期间找到一种可能的补救办法，因为财政委员会已经决定一定要偿付集市的定期票据，即使不得不以(卡斯蒂利亚的)1561年的税收或者其他项目作为抵押进行借贷也要这样做，虽然这些税款尚未获准征收。宁可承受任何高利贷款或者其他不利，而不愿让代理人的信用破产。多亏这个代理人才会时至今日仍然有人为陛下效劳，有人向陛下提供钱款，才会在今后我们能偿付集市的到期票据的情况下继续有人为陛下效劳，有人向陛下提供钱款。人们能够依靠的财源是几次出售船只所得。但是，陛下约束、限制这些出售，特别在塞维利亚进行的那次出售。当时正在为阿尔卡拉公爵洽谈一项价值15万杜卡托的出售事宜。这位公爵想得到1,500名封臣……"与此同时，女摄政派遣贝拉斯科博士等专家前往菲利普处，准确地把真实情况告诉他。[305]她生怕她兄弟还抱有幻想。

菲利普二世在荷兰没有找到任何补救办法。他在6月24日写道[306]："我留在这里除了自己一筹莫展，遭到失败，丢掉这些国家(荷兰)之外，毫无所获。……最好是我们大家都来寻找补救办法……如果办法不在这里，我就去西班牙寻找。"他的目的是表达得清清楚楚了。菲利普二世不大相信胡安娜公主办事的效力。公主忙于慷慨布施、祈祷，念念不忘野心勃勃的梦想。他的兄弟克扣这些布施。她的梦想集中在她想与之结婚的东·卡洛斯王子身上，以便使自己继续位居首列。或许国王还记得鲁伊·戈梅兹1557年的半岛之行？[307]在他的亲信获得成功的西班牙半岛这个地方君主

难道不能去碰碰运气吗？拯救之路应该在西班牙寻找，而且由君主自己去寻找。当逆风迫使国王在泽兰群岛作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次长达两周的停留时，他感到痛苦难受。这当然不是由于他个人舒适的起居生活设备方面的原因。正如他 8 月 24 日写给阿拉斯主教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我到西班牙来，延迟了我能够为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找到必需的补救办法的时刻。”[308]

这些确切的说明，有助于了解菲利普二世 1559 年 12 月 27 日[309]在西班牙的真实形势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的时刻写给格朗弗勒的那封引人注目的信。这位君主写道：“你要相信，我很想用所有我所知道的对荷兰必不可少的东西来供应这个地区。但是，我对你发誓，我发现这里的局势比那里更糟。我们无法援助你，甚至无法在这里满足那些如此微小，你看了会感到惊讶的需要。我向你承认，当我在佛兰德时，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里的情况会是如此之糟。正如你将从我写给我的姊妹（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的信中看到的那样，我除了嫁妆的钱以外，[310]实在找不出别的什么灵丹妙药来补救。”这封信显示出的醒悟清清楚楚、真诚坦率、不会被人误解。在西班牙再没有剩下什么了，因为人们从那里拿取的东西过多，也许人们愚蠢地在一个时期内已经把神圣罗马帝国财富的源泉汲尽了。因此，菲利普二世很晚才恢复我们前面谈到过的稳重。他决定在自己剩下的有生之年留在西班牙，是因为他承认有必要把这些源泉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上。

1570 年卡斯蒂利亚国会在科尔多瓦召开，第二年在马德里结束。埃拉索在首次会议上代表国王发言，并且简短地叙述了 1566 年上届会议召开以后的几年的情况。他说：“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这

些年来，国王在西班牙居留。正如在上次国会开会时已经对议员团说明过的那样，他虽然有紧急的和严重的理由离开西班牙亲自前往他的其他一些邦国，但是陛下明白，他在这里的这些王国暂时停留是多么必要……这不仅仅是为了这些王国自身的好处和特殊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供应……上述其他邦国的需求，因为这里的这些王国在所有疆土中是中心、头和主要部分。在上述情况下陛下也考虑到对你们的厚爱，于是颁布命令，使得在充分寻求补救紧迫的危难和匮乏的同时又能避免离开西班牙。"[311]

我们体会出的这篇官方演说的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是：除非发生特别的危险，菲利普二世不能远离他的各个邦国的心脏和珍宝——西班牙。大家同意布鲁塞尔是个很好的政治首都。但是，政治并不是最重要的。巴利亚多利德是西班牙帝国的金融首都。契约、合同等在那里签定。在它的门口，卡斯蒂利亚的集市贸易的节奏决定集市的闭市日期。情况必然是这样：神圣罗马帝国的主人把国家开支的主要负担集中在自己身上，就必须住在这个美洲白银到达的地方。然而，这一切国王只在他返回西班牙后才认识到。在这之前他从远方向西班牙的执政者下达的命令，毫无疑问表明他对情况很不了解，以致和他通信的人不止一次发现这些命令可笑之至。这种对事态的茫然无知，菲利普二世自己在他给格朗弗勒的信中也承认。这一点他自己提供了证据：他在批注一封胡安娜公主的来信[312]时在信旁写道（毫无疑问，某个恶语伤人者向他作了汇报）："他们无情地嘲笑我。"公主的这封信说，在巴利亚多利德的顾问会议召开后，她应该告诉他，大家的意见都与他的意见截然相反；她还认为给他送来钱款是不可能的，他必须来。他们是谁？顾

问和公主都了解半岛的实际情况并且都拥护他归来。

因此,菲利普二世返回西班牙后,得知那里的局势比他原来想象的更糟。剩下的就是要了解由于什么差错这个筋疲力竭的国家狂热地坚持不结束地中海战争,坚持让一场本可扑灭但相反日益激烈的斗争继续发展下去。但是,谨慎的国王真正对此负责吗?

本部分原注

1. R. Busch-Zantner, *op. cit.*.

一

1. Après le raid des Impériaux qui les amena jusqu' à Meaux Ernest Lavisse, *Hist. de France*, V, 2, p. 116. Le 18 septembre, Jean Dumont, *Corps universal diplomatique*, Amesterdam, 1726-1731, IV, 2, p. 280-287, et non 18 novembre, comme l'écrit à tort S. Romanin, *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Venise, 1853-1861, VI, p. 212.

2. A. E. Esp. 224, Philippe à Juan de Vega, Madrid, 5 décembre 1545, sur la trêve entre le roi des Romains et le Sultan, minute, f° 342. Sur le renouvellement de la trêve en 1547, B. N., Paris Ital. 227.

3. E. LAVISSE, *op. cit.*, V, 2, p. 117; Georg MENTZ, *Deutsche Geschichte*, 1493-1618, Tubingen, 1913, p. 227.

4. *Ibid.*, p. 117 (8 juin), Henri HAUSER et Augustin RENAUDET, *Les débuts de l'âge moderne*, 2[e] édit., 1946, p. 468.

5. Pour sa nomination à la tête des flottes ottomanes, 1533 et la date de sa mort, Charles-André JULIEN, *H. de l'Afrique du Nord*, Paris, 1931, p. 521. Sur sa vie, le livre romancé, haut en couleurs, parfois très juste, de Paul ACHARD, *La vie extraordinaire des frères Barberousse, corsaires et rois d'Alger*, Paris, 1939.

6. O. de SELVE, *op. cit.*, p. 95; S. ROMANIN, *op. cit.*, VI, p. 23.

7. E. LAVISSE, *op. cit.*, V, 2, p. 122; S. ROMANIN, VI, p. 222; O. de SELVE, *op. cit.*, pp. 124 et 126.

8. C. CAPASSO, "Barbarossa e Carlo V", *in*: *Rivista storica ital.*, 1932,

pp. 169-209.

9. *Ibid.*, p. 172 et note 1; C. MANFRONI, *Storia della marina italiana*, Rome, 1896 p. 325 et *sq.*; Hermann CARDAUNS, *Von Nizza bis Crépy*, 1923, p. 24 et 29; C. CAPASSO. *Paolo III*, Messine, 1924, p. 452; Alberto GUGLIELMOTTI, *La guerra dei pirati e la marina pontificia dal* 1500 *al* 1560, Florence, 1876, t. II, p. 5 et *sq.*

10. E. Lavisse, *op. cit.*, V, 2, p. 112.

11. N. IORGA, *G. des osm. Reiches*, Gotha, 1908-1913, III, p. 76 et *sq.* Sur l'ensemble de la politique turque à l'Ouest, sur les complications asiatiques, *ibid.*, p. 116 et *sq.*

12. *Ibid.*, p. 117.

13. Voir *supra*, I, p. 496, note 6.

14. Voir *supra*, II, p. 178

15. Voir *supra*, I, p. 554-555.

16. *Hispania victrix*, Medina del Campo, 1570.

17. Charles MONCHICOURT, "Épisodes de la carrière tunisienne de Dragut, 1550-1551", *in*: *Rev. tun.*, 1917, sur les exploits de Jean Moret, tir. à part, p. 7 et *sq.*

18. *Ibid.*, p. 11. Sur la vie de Dragut, l'ouvrage de l'historien turc Ali RIZA SEIFI, *Dorghut Re'is*, 2e éd., Constantinople, 1910 (édition en alphabet turco-latin, 1932).

19. *Ibid.*, p. 11.

20. *Archivio storico ital.*, t. IX, p. 124(24 mars 1550).

21. F. BRAUDEL, "Les Espagnols et l'Afrique du Nord de 1492 à 1577", *in*: *Revue Africaine*, 1928, p. 352 et *sq.*

22. Carl LANZ, *Correspondenz des Kaisers Karl V*, Leipzig 1846, III, p. 3-4(12 avr. 1550).

23. *Archivio storico ital.*, IX, p. 124(20 avr. 1550).

24. *Ibid.*, p. 126-127.

25. *Ibid.*, p. 125.

26. *Ibid.*, p. 126-127.

27. *Ibid.*, p. 127(11 mai 1550).

28. *Ibid.*.

29. *Ibid.*, p. 129-130(10 juin 1550).

30. *Ibid.*, p. 132(5 juin 1550).

31. *Ibid.* , p. 131(16 juin 1550).

32. Contrairement aux erreurs de E. MERCIER, *Hist.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Paris, 1891, III, p. 72.

33. *Archivio storico ital.* , t. IX, p. 132, C. MONCHICOURT, *art. cit.* , p. 12.

34. A. S. Florence, Mediceo 2077, f° 45.

35. Accord du gouverneur d'Africa avec le sheick Soliman ben Said; 19 mars 1551, Sim. E° 1193.

36. E. PÉLISSIER DE RAYNAUD, *Mém. historiques et géographiques*, Paris, 1844, p. 83.

37. Charles MONCHICOURT, "Études Kairouanaises", 1re Partie: "Kairouan sous le Chabbîa", *in*: *Revue Tunisienne*, 1932, pp. 1-91 et 307-343; 1933, pp. 285-319.

38. Évacuation des troupes en Espagne, Alphonse ROUSSEAU, *Annales tunisiennes*, Alger, 1964, p. 25, ce qui est erroné; E. PELISSIER DE RAYNAUD, *op. eit*, p. 83; Charles FÉRAUD, *Annales Tripolitaines*, Paris, 1927, p. 56.

39. C. Lanz, *op. cit.* , III, p. 9-11.

40. S. ROMANIN, *op. cit.* , VI, p. 214; le 13 déc. 1545, P. RICHARD, *H. des Conciles*, Paris, 1930, t. IX, 1, p. 222.

41. P. RICHARD, *op. cit.* , IX, 1, p. 214.

42. *Ibid.* , p. 209 et *sq.*

43. *Ibid.* , p. 214 et BUSCHBELL, "Die Sendung des Pedro Marquina...", *in*: *Span. Forsch. der Görresgesellschaft*, Münster, 1928, I, 10, p. 311 et suivantes, Les concessions en 1547, J. J. DÖLLINGER,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Karls V...* , Regensburg, 1862, p. 72 et *sq.*

44. Cité par BUSCHBELL, *art. cit.* , p. 316.

45. S. ROMANIN, *op. cit.* , VI, p. 221, d'après la relation de Lorenzo Contarini, en 1548.

46. Georg MENTZ, *op. cit.* , p. 209.

47. G. de LEVA, *Storia documentata di Carlo V...* , Venise, 1863-1881, III, p. 320 et *sq.*

48. Joseph LORTZ, *Die Reformation in Deutschland*, Fribourg-en-Brisgau, 1941, II, p. 264, note 1.

49. Domenico Morosino et Fco Badoer au Doge, Augsbourg, 15 sept.

1550, G. TURBA, *Venetianische Depeschen*, 1, 2, p. 451. et *sq*.

50. *Ibid.*, p. 478, Augsbourg, 30 nov. 1550.

51. *Ibid.*, p. 509, Augsbourg, 15 févr. 1551.

52. B.N., Paris, Ital. 227, S. ROMANIN, *op. cit.*, VI, p. 214.

53. Depuis le mois de mars 1548, cf. Germaine GANIER, *La politique du Connétable Anne de Montmorency*, diplôme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Le Havre (1957).

54. P. RICHARD, *op. cit.*, IX, 1, p. 439.

55. Le détail est souvent signalé, Fernand HAYWARD, *Histoire de la Maison de Savoie*, 1941, II, p. 12.

56. Juan Christoval CALVETE DE ESTRELLA, *El felicisimo viaje del … Principe don Felipe*, Anvers, 1552.

57. L. PFANDL, *Philippe II*, *op. cit.*, p. 170.

58. L. Pfandl, *op. cit.*, p. 161.

59. C. Lanz, *op. cit.*, III, p. 20.

60. F. Auguste Mignet, *Charles Quint*, *son abdication et sa mort*, Paris, 1968, p. 39 et note 1.

61. Convention du 6 octobre 1551, Simancas Capitulaciones con la casa de Austria, 4.

62. Dirons-nous avec Ranke que ce fut là un des chefs-d'œuvre de la diplomatie autrichienne?

63. L. PFANDL, *Philippe II*, *op. cit.*, p. 159.

64. Le Vénitien Mocenigo, en 1548, L. PFANDL, *op. cit.*, p. 199.

65. Charles Quint à Ferdinand, Munich, 15 août 1551, C. LANZ, *op. cit.*, III, 68-71.

66. A.N., 1489; W. ONCKEN, *op. cit.*, XII(édit. portug.), p. 1047; S. ROMANIN, *op. cit.*, VI, p. 224.

67. A. N., K 1489.

68. *Ibid*.

69. A. Simon Renard, 27 janv. 1550, *ibid*.

70. J'utilise le travail déjà cité de M[lle] Ganier.

71. A.N, K 1489, copie.

72. *Ibid.* Poissy, 25 avr. 1550. Déchiffrement et trad. espagnole.

73. Sur l'invasion du l'Oranie par ce dernier, avis du 17 août 1550, *Alxarife passa en Argel con un gruesso exercito por conquistar…*, *ibid*.

74. *Ibid.*, Simon Renard au roi et à la reine de Bohême, 31 août 1550.

75. *Ibid.*

76. *Ibid.*

77. Toujours sous la même cote, A. N., K 1489.

78. Fano à Jules III, 15 juill, 1551, *Nunt.-Berichte aus Deutschland*, Berlin, 1901, I, 12, p. 44 et *sq.*

79. Depuis 1530. La ville prise en 1510 par Pedro Navarro, F. BRAUDEL, *art. cit.*, *in*: *Revue Africaine*, 1928, p. 223.

80. C. MONCHICOURT, "Épisodes de la carrière tunisienne de Dragut", *in*: *Rev. Tunisienne*, 1917, p. 317-324.

81. Giacomo BOSIO, *I Cavalieri gerosolimitani a Tripoli negli anni 1530-31*, p. p. S. AURIGEMMA, 1937, p. 129.

82. J. W. ZINKEISEN, *op. cit.*, II, 869.

83. G. BOSIO, *op. cit.*, p. 164.

84. G. TURBA, *Venetianische Depeschen*, 12, p. 507, Augsbourg, 10 févr. 1551.

85. Le Nonce à Jules III, Augsbourg, 15 juill. 1551...

86. G. BOSIO, *op. cit.*, p. 164.

87. E. ROSSI, *Il dominio degli Spagnuoli e dei Cavalieri di Malta a Tripoli*, Airoldi, 1937, p. 70; 6 000, dit Charles FÉRAUD, *Ann, trip.*, p. 40; 5 000, C. MONCHICOURT, "Dragut amiral turc", *in*: *Revue tun.*, 1930, tiré à part, p. 5; 6 000, Giovanni Francesco BELA, *Melite illustrata*, cité par Julius BELOCH, *op. cit.*, I, p. 165.

88. Sur ces détails, C. Féraud, *op. cit.*, notamment, p. 40 au sujet de l'avarice d'Olmedes, E. Rossi et G. Bosio, *op. cit.*

89. Pour le récit du siège, outre les ouvrages déjà indiqués, Salomone MARINO, "I siciliani nelle guerre contro l'Infedeli nel secolo XVI", *in*: *A. Storico Siciliano*, XXXVII, p. 1-29; C. MANFRONI, *op. cit.*, p. 43-44; Jean CHESNEAU, *Voyage de Monsieur d'Aramon dans le Levant*, 1887, p. 52; Nicolas de NICOLAÏ, *Navig. et pérégrinations...*, 1576, p. 44.

90. Simon Renard à Charles Quint, 5 août 1551, A. N., K 1489.

91. *Ibid.*

92. Simon Renard à Phinippe, Orléans, 5 août 1551, A. N., K 1489.

93. Cf. note 2, ci-dessus.

94. Simon Renard à S. Alt., Blois, 11 avr. 1551, A. N., K 1489.

95. J. W. ZINKEISEN, *op. cit.*, II, p. 869.

96. Valence, 15 août 1551,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editos* (abréviation *CODOIN*), V, 117.

97. Malte, 24 août 1551, Guillaume RIBIER, *Lettres et mémoires d'État*, Paris, 1666, p. 387-389.

98. M. TRIDON, *Simon Renard, ses ambassades, ses négociations, sa lutte avec le cardinal Granvelle*, Besançon, 1882, p. 54.

99. *Ibid.*, p. 55 et 65, les ambassadeurs de Henri II sont l'évêque de Marillac et l'abbé de Bassefontaine.

100. S. ROMANIN, *op. cit.*, VI, p. 225.

101. Antoine de Bourbon à M. d'Humières, Coucy, 8 sept. 1551, *Lettres d'Antoine de Bourbon*, p.p. le marquis de ROCHAMBEAU, 1877, p. 26 et note 2.

102. Philippe à Simon Renard, Toro, 27 sept. 1551, A. N., K 1489, min.

103. *Ibid.*

104. Avisos del embassador de Francia, sept. 1551, A.N., K 1489.

105. W. ONCKEN, *op. cit.*, XII, p. 1064, 3 et 5 oct. 1551.

106. Eduard FUETER, *Geschichte des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s*, Munich, 1919, p. 321.

107. Marie de Hongrie à l'évêque d'Arras, 5 oct. 1551, C. LANZ, *op. cit.*, III, p. 81-82.

108. Les événements y tournent mal pour les Impériaux, F[co] Badoer au Doge, Vienne, 22 oct. 1551, G. Turba, *Venet Depeschen*, *op. cit.*, I, 2, , p. 518 et *sq.* Temesvar est menacé par les Turcs.

109. Camaiani à Jules III, Brixen, 28 oct. 1551, *Nunt-Ber. aus Deutschland*. Série I, 12, p. 91 et *sq*; Fano à Montepulciano, Innsbruck, 6 nov. 1551, *ibid.*, p. 97 et *sq*, 14 déc 1551, *ibid*, p. 111.

110. Charles Quint à Philippe, Villach, 9 juin 1552, J. J. Döllinger, *op. cit.*, p. 200 et *sq.*

111. E. Lavisse, V, 2, p. 149, G Zeller, *La réunion de Metz à la France*, 1552-1648, 2 vol., Paris-Strasbourg, 1927, I, p. 35-36, 285-9, 305-6.

112. E. Lavisse, V, 2, p. 150.

113. G. Zeller, *Le siège de Metz par Charles-Quint, oct.-déc.* 1552,

Nancy, 1943.

114. J. W. Zinkeisen, *op. cit.*, II, 873.

115. Accord accepté par Charles Quin, Innsbruck, 10 mai 1552, Simancas, *Patronato Real*, n°1527.

116. S. ROMANIN, *op. cit.*, VI, p. 226, Henri HAUSER, *Prépondérance espagnole*, 2e édit., 1940, p. 475.

117. Pour toutes ces dates, C. Monchicourt, *art. cit.*, tiré à part, p. 6, références à E. Charrièrs, *op. cit.*, II, p. 167, 169, 179-181, 182 note, 200, 201. Sur la défaite de Ponza, Édouard Petit, *André Doria, un amiral condottiere au XVIe s.*, 1887, p. 321, Dans la nuit qui suit la défaite de Terracine, les Turcs prennent sept galères chargées de troupes. C. Manfroni, *op. cit.*, III, p. 382.

118. *CODOIN*, V, p. 123.

119. C. MONCHICOURT, *art. cité*, p. 7.

120. Relacion del viaje de las galeras de Francia despues del ultimo aviso s. d. (le jeudi 25 août ou 25 sept. 1552). A. N., K 1489. Le refus de Venise, S. Romanin, *op. cit.*, VI, 226, à ce sujet documents dans V. Lamansky, *op. cit.*, Difficultés d'une résistance éventuelle de Gênes et de Naples, C. Manfroni, *op. cit.*, III, 382-383.

121. Le 11 juill. 1553, W. ONCKEN, éd. portugaise, *op. cit.*, XII, 1084.

122. Richard EHRENBERG, *Das Zeitalter der Fugger*, Iéna, 1896, I, p. 152-154.

123. G. TURBA, *Venet. Depeschen*, I, 2, p. 526, Innsbruck, 13 mai 1552.

124. Voir *supra*, I, p. 436 et *sq.*

125. G. ZELLER, *L'organisation défensive des frontières du Nord et de l'Est au XVIIe siècle*, Nancy-Paris-Strasbourg, 1928, p. 4.

126. *La prépondérance espagnole*, p. 475.

127. Cité par H. Hauser, note précédente.

128. Henry Joly, *La Corse française au XVIe siècle*, Lyon, 1942, p. 55.

129. D. de Haedo, *Epitome de los Reyes de Argel*, f°66 v° et sq.

130. C. LANZ, *op. cit.*, III, p. 576, G. de RIBIER, *op. cit.*, II, p. 436.

131. C. MANFRONI, *op. cit.*, III, p. 386.

132. Paul de Termes à Montmorency, Castiglione della Pescara, 23 août 1553, B. N., Paris, Fr. 20 642, f°165, copie, cité par H. JOLY, *op. cit.*, p. 55.

133. J. CHESNEAU, *Le voyage de Monsieur d'Aramon*, *op. cit.*, p. 161.

134. H. JOLY, *op. cit.*, 53. Le détour à l'aller pour éviter des pillages au royaume de Naples, considéré un peu comme terre française.

135. *Ibid.*, p. 385, C. MONCHICOURT, *art. cit.*

136. R. HAKLUYT,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II, p. 112.

137. Tommaseo, *Proemio alle lettere di Pasquale Paoli*, p. CLIII, cité par H. Joly, *op. cit.*, p. 28.

138. H. Joly, *op. cit.*, p. 8

139. *Ibid.*, p. 9.

140. *Ibid.*, p. 71 et 72.

141. *Ibid.*, p. 117.

142. *Ibid.*, p. 14, note 1.

143. Le 17, H. JOLY, *op. cit.*, p. 106, et non le 27, C. MANFRONI, *op. cit.*, III, p. 389.

144. W. ONCKEN, *op. cit.*, XII, p. 1086, le 6 juillet.

145. Da Mula au Doge, Bruxelles, 29 juillet 1553, G. TURBA, *Venetianische Depeschen*, I, 2, p. 617. Sur la reconnaissance de Marie Tudor, comme reine d'Angleterre, *Reconocimiento de Maria Tudor por Reina d'Inglaterra*, Simancas E°505-506, f°7.

146. Enrique PACHECO Y DE LEIVA, "Grave error politico de Carlos I", *in*: *Rev. de Archivos*, *Bibl. y Museos*, 1921, p. 60-84.

147. Granvelle à Renard, 14 janvier 1553, cité par M. TRIDON, *op. cit.*, p. 85.

148. M. TRIDON, *op. cit.*, p. 84. Dès novembre 1553, le résultat était acquis, Charles Quint à la reine de Portugal, Bruxelles, 21 novembre 1553, *in*: E. PACHECO, *art. cit.*, p. 279-280.

149. W. ONCKEN, *op. cit.*, XII, p. 1086.

150. Ch. de la RONCIÈRE, *H. de la marine française*, 1934, III, p. 491-492.

151. Da Mula au Doge, Bruxelles, 30 déc. 1553, G. TURBA, *op. cit.*, I, 2, p. 640.

152. Charles Quint à Philippe, 1er janv. 1554, A. E. Esp. 229, f°79.

153. Le connétable au cardinal de Paris (à Rome), Paris, 3 févr. 1554, A. N., K 1489(copie en italien). Simon Renard à Charles Quint, Londres, 29 janv. 1554, A. E. Esp. 229. f°79. du même au même, 8 févr. 1554, f° 80, 19 févr. 1554, mars 1554, *ibid.*; *CODOIN*, III, p. 458.

154. E. Lavisse, *op. cit.*, V, 2, p. 158.

155. Ils postent à cet effet des troupes près de Calais, le connétable au cardinal de Paris, Paris, 3 févr. 1554, Copie italienne, A. N., K 1489.

156. Charles Quint à Philippe, Bruxelles, 13 mars 1554, A. E. Esp. 229, f°81; 21 mars 1554, f°82; 1er avr. 1554, f°83; 3 avr. 1554, f°84. Da Mula au Doge, Bruxelles, 20 mai 1554, G. TURBA, *op. cit.*, I, 2, p. 648 et *sq.*

157. E. LAVISSE, *op. cit.*, V, 2, p. 137.

158. Avisos de Francia, Nantes, 26 juin 1552, A. N., K 1489.

159. Avisos de Francia, 3 avril 1554,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24, f°5, cité par H. JOLY, *op. cit.*, p. 119.

160. H. JOLY. *op. cit.*, p. 118.

161. C. MANFRONI, *op. cit.*, III, p. 392 et références à E. CHARRIÈRE, *op. cit.*

162. H. JOLY, *op. cit.*, p. 122.

163. C'est au cours de ces opérations que périt Leone Strozzi.

164. C. MANFRONI, *op. cit.*, III, p. 391.

165. *Ibid.*, p. 392; E. CHARRIÈRE, *Négociations...*, II, p. 351.

166. Marquis de Sarria à la princesse Jeanne, Rome, 22 nov. 1555, J. J. DÖLLINGER, *op. cit.*, pp. 214-216.

167. Durant l'hiver, la flotte génoise sort de sa tanière. Sur 12 galères qui lui sont confiées, Jean André Doria, dont ce sont les débuts, en perd neuf en janv. 1556, par suite d'un coup de *libeccio*, sur les côtes de Corse, C. MANFRONI, *op. cit.*, III, p. 394.

168. Lucien ROMIER, *Les origines politiques des guerres de religion*, Paris, 1914, II, pp. 393-440.

169. COGGIOLA, "Ascanio della Corna", p. 114, note 1, déc. 1555.

170. D. de HAEDO, *Epitome*, ... *op. cit.*, f°s 68 et 68 v°.

171. Voir *infra*, pp. 307-308.

172. Paule WINTZER, "Bougie, place forte espagnole", *in*: *B. Soc géogr. d'Alger*, 1932, p. 185-222, spécialement p. 204 et *sq.*, et 221.

173. Diego SUÁREZ, *Hist. del maestre ultimo que fue de Montesa...* Madrid, 1889, p. 106-107.

174. Luis de CABRERA, *Felipe II, Rey de España*, Madrid, 1877, I, p. 42.

175. Peticiones del Cardenal de Toledo para la jornada de Argel y Bugia y Conquista de Africa, Simancas E°511-513.

176. Paule WINTZER, *art. cit.*, p. 221. En sa faveur, Diego SUÁREZ, *op. cit.*, p. 107.

177. Le duc d'Albe à la princesse Jeanne, 29 mars 1556, Simancas E° 1049, f°11.

178. G. MECATTI, *Storia cronologica della Città di Firenze*, *op. cit.*, *II*, p. 697.

179. COGGIOLA, "Ascanio...," p. 97.

180. H. JOLY, *op. cit.*, p. 122; S. ROMANIN, *op. cit.*, VI, p. 230.

181. H. JOLY, *op. cit.*, p. 120.

182. Simancas P° Real, n°1538, 13 oct. 1555, COGGIOLA, *art. cit.*, p. 246.

183. Philippe à la princesse Jeanne, Windsor, 9 août 1554, A. E. Esp. 229, f°84. *Viaje de Felippe II*(sic) *à Inglaterra quando en* 1555 *fuè a casar con la Reina Dª Maria*, *CODOIN*, I, p. 564.

184. Ici les dates sont difficiles à fixer avec exactitude. Le 25 juil. 1554, la minute de la renonciation de Charles Quint au royaume de Naples était présentéeà Philippe par le régent Figueroa (Simancas E°3636, 25 juil. 1554, G. MECATTI, *op. cit.*, II, 693). Le 2 oct. de cette même année, Jules III concédait l'investiture des royaumes de Naples et de Sicile à Philippe (Simancas E°3638, 23 oct. 1554), puis, le 18 nov., le Pape lui concédait en fief les royaumes de Sicile et de Jérusalem (Simancas E° 1533, Rome, 18 nov., 1554). Pour Naples, Lodovico BIANCHINI, *Della Storia delle Finanze del Regno di Napoli*, 1839, p. 52-53. La renonciation de Charles Quint au royaume de Sicile serait, à l'en croire, du 16 janv. 1556, mais cette renonciation est faite au nom de "Carolus et'Joana reges Castelle" donc forcément avant la mort de Jeanne la Folle en 1555.

185. Pour le récit abrégé, voir Charles Bratli, Philippe II, roi d'Espagne, Paris, 1912, p. 87 et *sq.* ou L. Pfandl, *op. cit.*, p. 272 et *sq.*

186. *Renuncia de Carlos V en favor de Felipe II de los reinos de Castil-*

la, Simancas E°511-513.

187. Ainsi Ferdinand à Philippe II, Vienne, 24 mai 1556, *CODOIN*, II, p. 421 ou Charles Quint à Ferdinand, Bruxelles, 8 août 1556, *ibid.*, p. 707-709.

188. Cf. ci-dessus, I, pp. 235-236.

189. *CODOIN*, XCVIII, p. 24.

190. A ce sujet, la démonstration chez H. JOLY, *op. cit.*, p. 126, contrairement à l'opinion de Francis DECRUE de STOUTZ, *Anne de Montmorency*, Paris, 1899, II, p. 1.

191. A. d'AUBIGNÉ, *Histoire universelle*, Paris, 1886, 1, p. 125; E. LAVISSE, *op. cit.*, V, 2, p. 160, dit 15 févr., mais le roi de France publie la trêve dès le 13 (13 févr. 1556, A. N., K 1489), F. HAYWARD, *op. cit.*, II, 18.

192. Ferdinand à Charles Quint, Vienne, 22 mai 1556, C. LANZ, *op. cit.*, III, p. 69, 702.

193. Il débarquera à Laredo, le 6 oct. 1556, L. P. GACHARD, *Retraite et mort de Charles Quint*, Bruxelles, 1854, p. 137.

194. Philippe II à la princesse Jeanne, Londres, 13 avril 1557, A. E. Esp., 232, f°232.

195. Badoero au Sénat, Bruxelles, 7 mars 1556, COGGIOLA, *art. cit.*, p. 108, note.

196. Navagero au Sénat, Rome, 21 févr. 1556, COGGIOLA, *art. cit.*, p. 232-233.

197. Badoero au Sénat, Bruxelles, 1er mars 1556, COGGIOLA, *art. cit.*, p. 108, note.

198. *Ibid.*

199. Relation de Bernardo Navagero, 1558, E. ALBERI, *Relazioni...*, II, 3, p. 389.

200. Ernesto PONTIERI, "Il papato e la sua funzione morale e politica in Italia durante la preponderanza spagnuola", *in*: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1938, t. II, p. 72.

201. E. LAVISSE, *op. cit.*, V, 2, p. 163.

202. Henri II à Ottavio Farnese, Fontainebleau 29 juin 1556, COGGIOLA, *art. cit.*, p. 256-257; F. DECRUE, *Anne de Montmorency*, II, p. 186.

203. H. PATRY, "Coligny et la Papauté en 1556-1557", *in*: *Bul. de la*

Soc. de l'hist. du protestantisme français, t. 41, 1902, pp. 577-585.

204. Le duc d'Albe est rentré à Ostie le 14 nov. ; lo que refiere un hombre que fue a Francia estos dias a entenderlo que alla se hazia (déc. 1556), A. N., K 1490. La trêve signée le 18 nov. (Sim. Patronato Real, n°1580), prorogée le 27 déc. 1556, *ibid.*, n°1591.

205. *Opere*, Milan, 1806, p. 119-131, cité par COGGIOLA, p. 225 et *sq.*

206. Même date, Philippe II au cardinal Caraffa, Simancas *Patronato Real*, n°1614.

207. Ainsi dans l'affaire des Colonna qu'il dépouille de leurs terres, alors que les Colonna sont des partisan notoires de l'Espagne. Ainsi à propos des rapports toujours épineux avec Naples.

208. Lo que contienen dos cartas del embaxador en Francia de 9 y 13 de julio 1556, A. N., K 1489.

209. D. de Haedo, *op. cit.*, f°69 v° et 70; Jean Cazenave, "Un Corse, roi d'Alger (Hassan Corso)", *in*: *Rev. Afrique Latine*, p. 397-404; Socorro de Oran, Simancas E°511-513.

210. E. Lavisse, *op. cit.*, v, 2, p. 167.

211. Un hombre que se envio a Francia y bolvio a Perpiñan a los XXV de enero ha referido lo siguiente—28 janv. 1557—XA. N, K 1490. 30 000 fantassius, 10 000 cavaliers en Piémont. Une note en marge: "todo es mentina". Simon Renard mieux informe (Simon Renard à Philippe II, 12 janv. 1557) donne un total de 12 000 hommes, A. N., K 1490.

212. Simon Renard à Philippe II, 12 janv 1557, A. N., K 1490.

213. *Ibid.*

214. Cavi, 14 sept. 1557. Capitulación publica sobre la paz entre Felipe II y Paulo IV ortogada entre el duque de Alba y el Cardinal Caraffa. Simancas Patronato Real, n°1626. Clauses secrètes sur les fortions de Paliano, *ibid.*, n°1625.

215. Palmerino B. Com. Palerme Qq D 84. Sa date du 11 sept. n'estelle pas fautive?

216. Juan Vasquez à Charles Quint, Valladolid, 18 nov. 1557, L P. GACHARD, *La retraite...*, I, doc. n° C XXI。

217. Paul HERRE, *Papsttum und Papstwahl im Zeitalter Philipps II.*, Leipzig, 1907.

218. Philippe II à Charles Quint, Beaurevoir, 11 août 1557, aut. A.

N. , K 1490. Dans ce carton, nombreux documents sur la bataille de Saint-Quentin.

219. Philippe II à Charles Quint, cf. note précédente.

220. *Ibid.*

221. Philippe II au comte de Feria, 29 juin 1558, *CODOIN*, LXXXVII, p. 68.

222. Cesaréo FERNANDEZ DURO, *Armada española*, Madrid, 1895-1903, II, p. 9 et *sq.* Doge et gouverneurs de Gênes à Jacomo de Negro, ambassadeur en Espagne, Gênes. 23 mai 1558, A. d. S. Gênes, Inghilterra, I, 2273. Sur le rôle de notre ambassadeur de la Vigne, Piero au duc de Florence, Venise, 22 janv. 1558, Mediceo 2974, f°124. La flotte arrive plus tôt que d'ordinaire. Avis de Constantinople, 10 avril 1558, Simancas E°1049, f° 40.

223. Pedro du Urries, gouverneur de Calabre, au vice-roi de Naples, 7 juin 1558, Simancas E°1049, f°43. Le 13, elle sera prise, ensuite pillage de Reggio, C. Manfroni, *op. cit.*, III, p. 401.

224. Instruction date Mag^co^ Fran^co^ Coste misso ad classem Turchorum pro rebus publicis, Gênes, 20 juin 1558, minute A. d. S. Gênes, Costantinopoli 1558-1565, 1-2169. C. Manfroni, *op. cit.*, III, p. 401, note, me semble citer une autre copie de cette instruction.

225. Elle passe devant Torre del Greco, le cardinal de Sigüenza à S. A., Rome, 16 juin 1558. Simancas E°1889, f°142, A. E. Esp. 290, f°27.

226. Don Juan Manrique à S. A., Naples, 26 juin 1558, Simancas E° 1049, f°41.

227. C. FERNANDEZ DURO, *Armada Española*..., II, p. 11.

228. *Ibid.*, p. 12.

229. G. Turba, *op. cit.*, I, 3, p. 81, note 3.

230. Marin de Cavali au Doge, Péra, 16 déc. 1558, A. d. S. Venise, Senato Secreta, Cost., Filza 2 B, f°102.

231. *Le traité de Cateau-Cambresis*, 1889.

232. *Les origines politiques des guerres de religion*, Paris, 2 vol., 1913-1914.

233. Guy de BRÉMOND D'ARS, *Le père de M^me^ de Rambouillet, Jean de Vivonne, sa vie et ses ambassades*, Paris, 1884, p. 14; Lucien ROMIER, *Origines*, *op. cit.*, II, livre V, chap. II, p. 83-86; B. N., OC 1534, f°93,

etc.

234. Elisabeth à Philippe II, Westminster, 3 oct. 1558, A. N., K 1491, B 10, n°110 (en latin).

235. Baron A. Ruble, *op. cit.*, p. 55.

236. A Henri III, 25 sept. 1574, copie, Simancas E°1241.

237. *Op. cit.*, VII, p. 198, 205.

238. T. A. D'Aubigné, *op. cit.*, I, p. 41.

239. "Ils veulent que par vous la France et l'Angleterre changent en longue paix l'héréditaire guerre."

240. Apuntamientos para embiar a España (s. d, mai-juin 1559), Simancas E°137, f^{os}95-97. Une copie de cet importaut document, A. E., Esp., 290. Sur la réunion des principaux personnages "di qsti paesi" et leur désir, à cause du "garbuglio" d'Angleterre et d'Écosse, de voir le roi rester cet hiver dans les Flandres, Minerboti au duc, 2 juillet 1559,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029.

241. Le duc d'Albe à Philippe II, Paris, 26 juin 1559, A. N., K 1492, B10, f°43 *a*.

242. Le même au même, juin 1559, *ibid*, f°44.

243. *Ibid*.

244. Paris, 11 juil. 1559, *ibid.*, f°49.

245. J. DURENG, "La complicité de l'Angleterre dans le complot d'Amboise", *in*: *Rev. Hist. mod.*, t. VI, p. 248 et *sq.*; Lucien ROMIER, *La conjuration d'Amboise*, 3^e édit., p. 73; E. CHARRIERE, *op. cit.*, II, p. 595.

246. Ruy Gomez et duc d'Albe à Philippe II, Paris, 8 juil. 1559. A. N., K 1492, f°48, Henri II est perdu.

247. L. P. GACHARD, *op. cit.*, I, p. 122 et *sq.*, 27 mai 1555.

248. *Ibid.*, p. 124, la reine de Hongrie à l'évêque d'Arras, 29 mai 1556.

249. *Ibid.*, I, p. XLI et *sq*; p. 341-352; II, p. CXXXVII et *sq*, p. 390.

250. *Historiae de rebus Hispaniae...*, le tome I (le seul publié) de la continuation, par le P. Manuel José de MEDRANO, Madrid, 1741.

251. Ajoutons que les erreurs sont fréquentes et la chronologie généralement inexacte. Philippe II s'est embarqué le 25 août à Flessingue, il débarque le 8 sept. à Laredo. Pour Campana le Roi a mis à la voile le 27,

pour Gregorio Leti le 26... Les historiens modernes dont la lignée commence avec Robertson et Prescott ont reproduit ces données anciennes.

252. Voyez le résumé de ces voyages dans C. BRATLI, *op. cit.*, p. 188, note 280, et p. 101-102.

253. *Essai sur l'administration de la Castille au XVI^e^ siècle*, 1860, p. 43-44.

254. E. ALBÈRI, *Relazioni*, I, 1, p. 293 et *sq.*, juillet 1546.

255. M. PHILIPPSON, *Ein Ministerium unter Philipp II. Kardinal Granvella am spanischen Hofe*, 1579-1586, 1895.

256. Cf. article de C. PEREZ-BUSTAMANTE, "Las instrucciones de Felipe II à Juan Bautista de Tassis", *in*: *Rev. de la Biblioteca, Archivo y Museo*, t. V, 1928, pp. 241-258.

257. Simancas E°343.

258. Louis Paris, *op. cit.*, p. 42, note 1.

259. *Ibid.*, p. 42.

260. Voici le court récit de Jean de Vandenesse: "... le joeudy, jour de sainct Barthelemey, écrit-il, 23[e] en aougst, Sa Majesté soupa au dict Sonbourg; et après souppé vint à Flessinghe. Et environ les unze heures de nuict s'embarqua en sa nave, demeurant sur l'ancre jusques le vendredy sur le tard qu'il feit voille. Ledit jour environ les neuf heures du matin, les princes et seigneurs des Pays Bas prinrent congié du Roy et de tous; que ne fut sans regret, soupirs et larmes et pitié a veoir, voyant leur Roy naturel les habandonner... Et environ le midy arriva la duchesse de Parme, accompaignée du prince son fils et de plusieurs autres seigneurs, vint prendre congié de Sa Majesté. Et sur l'heure de vespres Sa Majesté feit voille, et passant avec assez bons vens les detroictz et dangiers des bancqz a veue de Dunckercke de Calaix et de Douvre navigea jusques au cannal près l'isle de Vicq(Wich). Entrant en la mer d'Espaigne, nous prindrent les calmes de sorte que fumes quinze jours en mer. Et le huictième de septembre jour de Nostre Dame, Sa Majesté et aulcunes navieres prindrent port à Laredo où Sa Majesté désembarqua et fut ouyr la messe en l'église et y coucha ce dit jour, questoit un vendredy, et fut l'on empesché tout le jour à desembarquer ce que l'on peust. Les ulques que sont vasseaulx pesantz et aulcunes aultres navieres ne peurent prendre port si tost. Et le samedy Sa Majesté partist du dit Laredo environ une heure après midy pour aller à Colibre qu'est demye lieue plus en

terre que Laredo. A la quelle heure s'en commença une si véhémente tormente en mer et en terre que les navieres qu'estoient au port sur l'ancre ne pouvoient résister qu'elles ne vinssent à périr et donner à travers; qu'est grande pitié à veoir perdre les naves gens et bagues. Et les aultres furent contrainctes courir la fortune par la mer. En terre les arbres desracinoient et les thuilles vouloient des thoiz des maisons et dura tout le jour et toute la nuict...", *in*: L. P. GACHARD et PIOT, *Collection des voyages des souverains des Pays-Bas*, 1876-1882, IV, p. 68 et *sq*.

261. Voici résumé le témoignage d'Ardinghelli: Ardinghelli suit en Zélande les déplacecements de Philippe II, assure la liaison avec lui. Le 23 août, il prévient Marguerite de Parme pour que celle-ci vienne faire ses adieux à Philippe II. Embarqué le 25, il profite en route des commodités qu'offrent les bateaux rencontrés pour donner des nouvelles de la santé du prince. Le 26 août, entre Calais et Douvres, il indique que tout marche à souhait et que des pilotes ont été pris à bord pour assurer la sécurité de la navigation à travers les bancs de sable. Philippe II ne voudra pas relâcher, écrit-il le 27, les précieux pilotes avant l'île de Wight. Le Roi est peut-être responsable de la lenteur de la marche, le vent s'est levé mais le souverain ne veut pas se séparer des hourques, sinon les navires auraient déjà fait trente lieues de plus. "Le voyage ne peut être que prospère, conclut-il, tous les lieux dangereux étant dépassés, d'aujourd'hui en huit nous espérons être en Espagne". Une barque espagnole rencontrée en route, emporte une lettre datée du 31. Le voyage se poursuit par très beau temps. "Nous serons cette nuit hors du canal...". La corespondance s'interrompt ensuite jusqu'au 8 septembre. Ce jour-là, Ardinghelli écrit: "Louanges à Dieu qui nous a finalement conduits tous sains et saufs dans ce port de Laredo. Après notre sortie du canal d'Angleterre, le temps a été si variable qu'il a trompé les marins plus d'une fois, nous avons éeé incommodés tantôt par la honace tantôt par le vent contraire, mais grâces à Dieu nous n'avons pas eu de tempête. Hier soir enfin, s'est levé un mistral qui nous a conduits cette nuit à plaisir jusques à terre...". De Laredo encore (il ne doit quitter le port que le 14) Ardinghelli écrit, le 10: "...samedi dernier (9 septembre) dans le milieu de la journée se déchaîna en mer une tempête si terrible que ce fut une grande grâce de se trouver à terre. Les navires qui étaient dans le port se sont sauvés avec la plus grande peine... trois d'entre eux ont donné par le travers

dans le port même sans qu'il y ait toutefois perte d'hommes ni de marehandises. Les hourques qui sont demcurées en arrière auront forcément courru de grands dangers, on est jusqu'à présent sans nouvelles d'où des craintes très vives...". Pourtant le 13, la "flotte des Flandres" arrivait "sans avoir aucunement souffert de la tempête passée...". Joie de chacun; les hourques transportaient les serviteurs et les biens des seigneurs qui accompagnaient Philippe II. Ces lettres d'Ardinghelli aux Archives farnésiennes de Naples, Spagna fascio 2, du f°186 au f°251.

262. Philippe II à Chantonnay, 26 sept. 1559 (et non 1560, indication du classement), A. N., K 1493, B 11, f°100(minute)"... des navires qui vinrent avec l'armada sur laquelle j'ai gagné ces royaumes, un seul manque qui n'ait pas paru jusqu'à présent. II appartient à un dénommé Francisco de Bolivar de Santander. II transportait la garde-robe des régents de mon conseil d'Italie et de quelques-uns de mes secrétaires et autres serviteurs, ainsi que vous le verrez d'après un mémoire joint à cette lettre...". Certains bruits affirmaient que le navire avait gagné La Rochelle. Sur ce navire perdu, L. P. GACHARD, *Retraite...*, *op. cit.*, II, p. LVII.

263. G. LETI. *La vie de Philippe II*, 1679, I, p. 135.

264. L. P. GACHARD, *Retraite...*, *op. cit.*, I, p. 122 et *sq.*

265. *Actas de las Cortès de Castilla*, 1558, I.

266. *CODOIN*, XXVII.

267. *Ibid.*, p. 202.

268. L. P. GACHARD, *Retraite...*, *op. cit.*, II, p. 401 et *sq.*, mais surtout les ouvrages classiques d'E. SCHÄFER et de Marcel BATAILLON; E. ALBÈRI, *op. cit.*, I,III, p. 401-402.

269. Juan ORTEGA Y RUBIO, *Historia de Valladolid*, 1881, II, p. 57 (premier autodafé); p. 58 (second autodafé); p. 64: on avait réservé la moitié des victimes pour l'arrivée du Roi.

270. C. BRATLI, *op. cit.*, p. 93.

271. P. 555 et *sq.* Voir le compte rendu de Lucien FEBVRE "Une conquête de l'histoire: l'Espagne d'Érasme", *in*: *Ann. d'hist. soc.*, t. XI, 1939, p. 28-42.

272. *Op. cit.*, p. 533 et *sq.* Faut-il tenir compte d'une économie en régression, manvaise conseillère? Voir *supra*, II, p. 218-219.

273. Simancas E°137, f°123 et 124.

274. Luis Quijada à Philippe II, 1er mai 1558, p. p. J. J. DOLLINGER, *op. cit.*, p. 243.

275. Mémoire de l'archevêque de Séville à Charles Quint, 2 juin 1558, p. p. L. P. GACHARD, *La retraite...*, *op. cit.*, II, p. 417-425: "Béni soit Dieu, écrit Vasquez à Charles Quint, le 5 juil. 1558, le mal est moindre qu'on ne le pensait", *ibid.*, p. 447-449.

276. Relation de Marcantonio da Mula, E. ALBÈRI, *Relazioni...*, I, 3, p. 402 et *sq.*

277. 6 et II mars 1559, E. CHARRIÈRE Négociations..., *op. cit.*, II, p. 563.

278. "La primera crisis de hacienda en tiempo de Felipe II", *in*: *Revista de España*, I, 1868, p. 317-361.

279. *Ibid.*

280. *Ibid.*

281. L. P. GACHARD, *La Retraite...*, *op. cit.*, I, p. 206-207, 7 nov. 1557, et II, p. 278-279, 15 nov. 1557.

282. *Ibid.*, I, p. 240-242, 5 janv. 1558.

283. Simancas, E°137.

284. L. P. GACHARD, *op. cit.*, I, p. 137-139, 1er avril 1557; p. 148-149, 12 mai 1557; sur ces questions et sur la punition des "oficiales", A. E. Esp. 296, 8 et 9 juin 1557; sur le détournement d'un navire chargé de métal précieux au Portugal, L. P. GACHARD, *op. cit.*, I, p. 142-144.

285. *Ibid.*, I, p. 172, Martin de Gaztelu à Juan Vasquez, 18 sept. 1557.

286. Juan A. LLORENTE, *La primera crisis...*, *art. cit.*

287. A. H. N. Inquisition de Valence, Libro I.

288. *Ibid.*, ceci à propos de demandes barcelonaises d'exécution de jugements.

289. A ce sujet, voir les livres classiques de K. HAEBLER et de R. EHRENBERG, et *supra* I, p. 455 et *sq.*

290. Le texte de l'asiento avec les Fugger, A. d. S. Naples, Carte Farnesiane, fasc. 1634.

291. B. N., Paris, Fr. 15 875, f°476 et 476 v°.

292. B. N., Paris, Fr. 15 875, f°478 à 479.

293. A. d. S Naples, Carte Farnesiane, fasc. 1634.

294. Joie relative bien sûr, au début même mécontentement. Il y a eu annulation d'un tiers de la dette, le reste payé en juros à 20 p. 100, Philippe à la princesse Jeanne, 26 juin 1559, Simancas E°137, f°121.

295. Philippe II à la princesse Jeanne, Bruxelles, 26 juin 1559, Simancas E°137, f^os 123 et 124.

296. Simancos E°137, 13 juli. 1559.

297. Manuel DANVILA, *El poder civil en España*, *Madrid*, 1885, V, p. 364 et *sq*.

298. M. DANVILA, *op. cit.*, V, p. 346 et *sq*.

299. Ainsi de Burgos (10 févr. 1559), de Séville (Simancas E°137), de Guadalajara (B. N., Paris, Esp. 278, f°13 à 14, 5 nov. 1557).

300. Sur l'enquête au sujet des terres usurpées de Grenade, je ne connais que le nom de l'enquêteur, le D^r Sanctiago, "oydor de Valladolid" que donne une lettre de Philippe II à la princesse Jeanne, 29 juillet 1559, Simancas E° 518, f^os 20 et 21. Simple mention dans une autre lettre de Philippe II, 27 avril 1559, Simancas E°137, f°139.

301. Voir à ce sujet la réponse de la princesse Jeanne, 27 avril 1559, Simancas E°137, f°139; M. DANVILA, *op. cit.*, V, p. 372.

302. Simancas E°137.

303. Voir note suivante.

304. 13 juil. 1559, Simancas E°137.

305. Nombreuses indications au sujet de la mission de ce personnage (Velasco et non de Lasco comme le disent les papiers du cardinal GRANVELLE, *Papiers d'État*, *op. cit.*, V, p. 454). Ainsi mention de la mission dans la lettre de Philippe II à la princesse, Bruxelles, 18 juin 1559, Simancas E°137 et du 20 mai, *ibid.*, f°116.

306. GRANVELLE, *op. cit.*, V, p. 606.

307. L. P. GACHARD, *La Retraite*..., *op. cit.*, II, p. LIII-LIV; M. DANVILA, *op. cit.*, V, p. 351(1557).

308. GRANVELLE, *Papiers d'État*, V, p. 641-644.

309. *Ibid.*, Tolède, 27 déc. 1559, p. 672.

310. De la nouvelle reine d'Espagne.

311. Il est fait ici allusion au voyage projeté de Philippe II aux Pays-Bas (1566-1568). *Actas de las Cortès de Castilla*, III, p. 15-24.

312. Notes de Philippe II en marge de la lettre que lui a adressée la

princesse le 14 juillet 1559, Simancas E°137, f°229. Ce texte a été vérifié a ma demande par D. Miguel Bordonau, alors archiviste en chef de Simancas.

二　土耳其霸权的最后六年：1559—1565年

从1559年4月卡托—康布雷锡条约缔结到1565年5月至9月马耳他被围这段时期，地中海的历史单独形成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在这6年内，它不再拖在西欧和北欧的重大事件之后。占领地中海的两个半部的巨人——土耳其人和西班牙人——摆脱了他们各自的其他任务之后，恢复了他们之间的决斗。这场决斗还不过分激烈。他们都想进行一场无情的战争吗？他们难道不都是短期的明确的图谋和行动的受害者吗？这些图谋和行动把他们卷带得比他们所希望的更远。人们可以从西班牙的模糊不清的政策想象到这一点。这项政策显然是因时因地权宜制定的，而不是本着坚定果敢的精神制定的。在苏里曼的伟大统治的最后几年内，土耳其采取了类似的对策。西欧的唯一重大行动是建立了一支为西班牙效劳的强大海军。但是，问题在于：西班牙能否有效地使用这支力量？这支力量是否足以控制海洋？

1. 对土耳其的战争：这是西班牙的疯狂和愚蠢的行动吗？

当西欧从战争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战争仍在地中海继续进行。

在西欧，在德意志内部签定了奥格斯堡内部和约；在西班牙帝国和教廷之间签定了1557年9月的协议；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缔结了卡托—康布雷锡和约。处处都在有效地恢复和平，只有地中海除外。战争仍然在那里继续进行，虽然在进行的过程中有时被突然的短暂停顿，有时被长期休战打断。战争的动机和活动都晦涩不明。从1559年到1575年的经济衰退，不能承担战争的全部责任。

西班牙—土耳其谈判的破裂

西班牙和土耳其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并非绝对不可避免。1558年，在菲利普二世的左右亲信中就有人持这种看法。同土耳其之间的持续多年的休战，对在西方更大胆放手、自由行动来说，似乎是必不可少的条件。1558年5月21日，菲利普二世派遣阿奎拉主教携带十分明确的指示前往他的叔父费迪南那里。[1]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曾于1月2日写信告知菲利普二世：同土耳其人的谈判已经在维也纳进行；已经决定付给土耳其素丹政府每年贡金的过期未付款(1547年的协议规定了这笔贡金，这笔贡金自1550年起就未交纳)；甚至还同意增加贡金。菲利普二世也表示赞同，他说："我现在了解到，在基督教世界使用必需的力量去对抗像土耳其人的力量那样强大的力量的可能性很小。我不能背离你的臣民——匈牙利人、波希米亚人和奥地利人——向你提出的并得到选帝侯们赞同和支持的审慎的意见……""一个经验丰富并在土耳其宫廷中有内应的"中间人，仅仅在几天以前保证，如果国王愿意的话，他能够争取素丹同西班牙缔结一项和约。国王继续写道："为了几个特殊理由，我不希

望以我的名义提出进行这样的缔约谈判的建议。我也不愿意把我们之间的桥梁全都焚毁。我心里记住这一点：土耳其人惧怕我在地中海的力量，如果他们知道我会被人说服把我自己包括进正在谈判的同陛下缔结的和约里去的话，可能会使他们提出的条件节制些、温和些。"这就是西班牙式傲慢的、坚持尊重荣誉攸关的原则的、但必要时并不拒绝迂回行事的外交手段。菲利普二世不愿主动向土耳其人有所表示。当他认为能够利用维也纳作为中间人时，行事便没有那样谨慎了。[2]

在1559年的头几个月，国王没有放弃这些谈判。我们找到一份可能是关于同土耳其为期10年或者20年的休战条件。[3]这份记录的日期是3月5日。国王在6日给他驻威尼斯的大使加尔西·埃尔南德斯的秘书的信中说，他"已经选定尼科罗·塞科，以便他由弗朗西斯科·德·弗朗基斯陪同前往土耳其皇帝处进行停战谈判。正如你所知道的，这次谈判弗朗西斯科·德·弗朗基斯已经使之开始进行了"。[4]上述的尼科罗·塞科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宫廷，之后他应该前往塞萨公爵处领受这位公爵的指示。同样也在6日这天，伦巴第军队的财务官尼古拉斯·奇德奉命付给尼科罗·塞科2,000埃居"以支付他将为我效劳而作的旅行的费用"，并且付给加尔西·埃尔南德斯5,000埃居，他知道应该把这笔钱转付给谁。给尼科罗·塞科的指示[5]向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情况。弗朗西斯科·德·弗朗基斯似乎是整个事件的策划者。他当时正第二次代表热那亚共和国途经威尼斯前往君士坦丁堡。他就对向鲁斯特姆帕夏（当时是首相）方面进行活动的可能性以及对这位帕夏馈赠什么礼品合适等问题同瓦尔加斯大使长谈。

尼科罗·塞科曾任驻土耳其大使。他这次将在威尼斯同弗朗基斯会合，然后由后者陪同前往拉古萨。以后，弗朗基斯将单独从该地继续上路。他将只在停战协定的批准差不多已经肯定无疑的时刻才召来塞科。就这样，正如1558年的情况一样，[6]菲利普二世丝毫不想在和谈这个问题上走得太远。塞科被授权同土耳其人签定一项为期10年、12年甚至15年的条约。在这项条约的延续期间，每年将向鲁斯特姆帕夏交付800到1,000埃居。菲利普二世补充说，如果可能通过鲁斯特姆的好意斡旋得到土耳其舰队今年夏季不出航的承诺，“那么，立即并且一次付给他1.2万到1.5万埃居是适当的，付款地点在威尼斯或者在君士坦丁堡由他挑选。”

我只是为了很好地证实在卡托—康布雷锡和约签定之前菲利普二世进行的谈判的真相和他的真正意图，才叙述这些细节。因为，和约一旦缔结，一切都会改变。1559年4月8日，菲利普二世在一封致塞萨公爵的长信中解释这些改变的原因。他写道：“你已经了解到我对你讲的关于……同土耳其休战的事……以及我向你发出的急件以便让尼科罗·塞科处理这件事。从那时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就通知我，一项他同土耳其皇帝之间的为期3年的休战协定已经由他的使节签订。土耳其皇帝无论如何也不接受把我包括在上述休战协定之内。我追求的主要目的……是看看某些对皇帝和对他的事务的好处是否能用这种办法得到。在我看来，这个目的似乎已经达到。此外，我们刚同法国国王签定了和约。因此，可以认为，土耳其皇帝（在西方）丧失了援助，没有任何港口接待他的舰队，因此不会派遣这支舰队来和基督教世界对抗。除上述各点之外，他年事已高，据说意欲退休。土耳其国内宫闱不和。他的几个儿子之间

兄弟阋墙,明争暗斗,使他苦恼不堪。"[7]因此,结论是:既然在这个形势下不可能进行任何尝试或者采取任何行动而不极大地丧失我们这方面的权力,就取消弗朗西斯科·德·弗朗基斯和尼科罗·塞科的旅行。西班牙原文表述得更加强烈,用了"而不极大地丧失我们的权力"这句话。以下是真正的动机:菲利普二世为了不丢失面子,在摆脱了他在西方所处的困境之后,不再继续他的和平的尝试。这种态度并非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的确,早在6月份,菲利普二世就同意了马耳他骑士团和西西里总督进攻的黎波里的计划。他在致函佛罗伦萨公爵向他索要帆桨战船时说:"既然最终同法国国王签订和约使上帝高兴,那么,在我看来,在意大利的我雇佣的帆桨战船不是在这个夏季剩下的时间内无所事事,而是尽力消灭海上行劫者并保证自由航行,这就是为上帝效劳并且于整个基督教世界有利……因此,我授权远征的黎波里……"[8]远征的黎波里,就是远征自1556年以来一直担任这个城市的省长的德拉库特。但是,人们难道不知道从1550年起任何反德拉库特的行动都会引起土耳其人的反击吗?

菲利普二世保全威信的政策,对战端重启负有直接责任,特别在局势有助于达成协议时更负有责任。塞萨公爵1559年12月4日指出:"土耳其皇帝由于他的几个儿子彼此不和,他的事进行得很糟"。[9]一个像那不勒斯总督阿尔卡拉公爵那样沉着冷静的人,1560年1月10日,正当对的黎波里的远征使他的王国被抽调走大部分军队时,写信给菲利普二世说:"我提醒陛下,这是同土耳其人谈判休战的大好时机,因为一则他的几个儿子之间争吵不和;二则陛下的各个邦国感到迫切需要和平。这里,在那不勒斯人人都认为这是十

分必要的。"[10]

然而，菲利普二世不但拒绝为了他自身的利益寻求休战，而且还介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事务，劝说这位皇帝不要缔结当时几乎缔结成功的协议。根据威尼斯大使季阿科莫·索朗佐的说法，[11]和约条款10月底还没有送回维也纳。在这个期间，有人向菲利普二世请教。这位君主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要接受这些条款。他甚至自己提出要让土耳其素丹在地中海感到惶恐不安，他答应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提供兵员和钱款，暗示他能够通过葡萄牙国王请求巴雅泽特和索非。总而言之，大大小小的理由他全都举出。对费迪南来说，占领特兰西瓦尼亚比同土耳其素丹达成协议难道不更有价值吗?这个劝告似乎不会掉进聋子的耳朵里。[12]

土耳其人的海上霸权

菲利普二世这样做有他的理由和借口。理由是：自从卡托—康布雷锡和约签订以来，亨利二世遣散了他的地中海舰队。直到这个世纪末，甚至在这个时期以后，在法国南部港口实际上已经不再有什么舰队停泊。这就为宣布实施于地中海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和平条约[13]增添了附加的保证。西班牙人在地中海重新获得行动自由。

借口呢?菲利普二世也可以借口他还从来没有掂量过土耳其军队的份量。如果说他在海上称过了土耳其的重量的话，这也几乎等于没有称过，因为普雷维扎战役在当时人的眼里并不是一次大规模的遭遇战。而且对他来说，这已经是过去古老的历史了。在陆上，西班牙人过去参加匈牙利边境战争时，只是以单个个人的身份

参加。只有过两次西班牙人(查理五世先于1534年让一批西班牙人在科龙登陆、定居，然后于1538年让另一批西班牙人在卡斯特尔努奥沃登陆、定居。这些西班牙人在这两个地方过着驻防地的普通生活，定期处于戒备状态，向外出击)不得不同巴巴罗萨作战。后来，他们先于1534年，后于1539年两次遭到驱赶。但是，从遥远的并不势均力敌的遭遇战中能得到一些什么教益呢？只不过是西班牙步兵1560年在杰尔巴，1565年在马耳他岛得以充分掂量敌人的力量而已。

让我们再加上这一点：在土耳其，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各省地方主义，甚至各种社会冲突都乘素丹的儿子之间兄弟阋墙之机大肆泛滥，猖獗为害。法国大使德·拉·维尼1559年7月致函达克斯主教称[14]，奴隶都赞助苏里曼的造反的儿子巴雅泽特。巴雅泽特被苏里曼最宠爱的儿子塞里姆打败。但是，既然巴雅泽特逃往波斯，内战尚未完全熄灭，而且又和一场可能发生的外战联系起来，因此，问题并没有因为巴雅泽特被打败而得到解决。正如德·拉·维尼9月所写的那样，[15]土耳其人“由于他们的内部事务而陷于他们从未经历过的最令人感到困扰的境地”。因此，菲利普二世可能认为当时并不是同土耳其人谈判而是消灭他们的时机。[16]

1559年夏季的形势似乎证实菲利普二世是正确的。这一年土耳其舰队没有驶越阿尔巴尼亚海岸进行冒险，而且队形散乱。秋季开始后，它没有进行任何进攻基督教世界的尝试就返航回国。菲利普二世无疑过分相信这一点：这支舰队只能在法国的协同配合下才能威胁基督教世界，没有这种协同配合，它就不得不限于在美好的季节快速窜犯、入侵。西班牙舰队尽管在数量上居于劣势，但能

在冬季或者春季，在晴好的气候终了时即在敌人出现之前行动。首要的问题在于能使自身免遭突然袭击。如果打算在地中海中部海域行动，尤其应该如此。

事实上西班牙必须对付双重危险：一方面要在从的黎波里到萨勒这一线对付柏柏尔人；另一方面要对付土耳其人。这两个集团是独立自主的。它们冬季分散，天气晴好的季节则联合作战，互相支援。柏柏尔海上行劫者舒舒服服地在西地中海定居下来。他们的事业兴旺发达。阿尔及尔在马格里布中央发展壮大，向周围扩张，建成一个直接威胁西班牙的帝国。这个"帝国"肯定不是政治上紧密团结、纪律严格的榜样。它被切割成一些分立的小块地区，正像卡比利亚的山被切割开了一样。但是，通衢大道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畅通无阻。我们已经谈到阿尔及尔的第七届国王萨拉赫海伊斯怎样一直推进到瓦尔格拉，1553年又怎样一直推进到非斯。非斯被再度攻占。1557年，谢里夫甚至曾经一度短期占领特莱姆森。他受土耳其人追击，被迫向首都撤退。但是，在离城不远的地方，他多亏他那支人数很多的骑兵和"埃尔切"——这些逃避到摩洛哥的巧于使用弓箭的摩里斯科人——遏阻了巴巴罗萨的儿子哈桑帕夏的军队的推进。在西方，阿尔及尔—摩洛哥边境最终显得越过比改变其位置容易。但是，在东方，阿尔及尔国家1555年在海岸前线成功地清除了布日伊的西班牙驻防地。最后，它于1558年在奥兰获得巨大胜利。

从本世纪开始起，自1509年以来，西班牙就在奥兰周围谨慎行事，多次兼并特莱姆森成功。然而，马丹·德·阿尔考德特有意识地推行的这种神经战政策却于1551年，自一支土耳其的卫戍部队在

特莱姆森长期驻扎之日起，停止执行。从那时起，这支部队对驻防地来说就形成一种长期的障碍和束缚。为了减轻这种束缚并重振他自己的卫戍部队的士气，这位年迈的东·马丹，这位“老人”(人们这样称呼他以便使之有别于他的儿子)使用他在他的位于安达卢西亚的领地征募的军队的一部分征伐位于奥兰以东12里的穆斯塔加奈姆。从土耳其人手中夺走穆斯塔加奈姆，就是切断他们和特莱姆森之间的联系。土耳其人经由这个港口运送他们在西部作战所必需的给养和大炮。这次作战指挥有方，攻克一处像穆斯塔加奈姆那样设防很差的要塞只会成功，不会失败。但是，时间却浪费于派遣新兵在奥兰附近出击，以此作为练兵。这些出击使整个北非警觉起来。然后，“老人”缓慢而谨慎地着手把他的计划付诸实施。8月26日，他遭到阿尔及尔人和土人的突然袭击，因寡不敌众而告失败。1.2万个西班牙人落入战胜者手中。阿尔及尔的房屋全都关满新俘虏。第二年，大批俘虏背弃宗教信仰，并加入哈桑帕夏的军队在卡比利亚作战。[17]

这些详情细节显示出新的土耳其国家在马格里布土地上为自己建立地盘时使用的力量和决心。在东到西西里的门户、北至撒丁、西抵直布罗陀以外的这个地区内，它那支日益壮大的海上力量就更加清楚地为人所知。法国国王派驻里斯本的大使尼科1559年9月4日写道[18]:“土耳其人最近驾乘14艘或者15艘帆桨战船前往阿尔加维并对该地居民大肆劫掠。我到达时，他们已经撤退……”他们在卡斯蒂利亚造成的损失更大。他们“在卡利兹”[19]升起“一面白旗，让人来把他们掳获的人全部赎走。后来，这些俘虏都被赎走了”。可以看到这些是什么样的“土耳其人”……

但是，阿尔及尔国家虽然是柏柏尔国家中最强盛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在马格里布东部，的黎波里"王国"以阿尔及尔为榜样发展起来。特别自1556年德拉库特领导这个国家以来，情况更是如此。但它们之间有这样的区别：的黎波里国家只能靠损害贫困得令人绝望的和难于降服的内地地区来维持下去。达里昂地区尤其是这样的内地地区。那里的居民能够随意切断从苏丹运出黄金和奴隶的道路。的黎波里在内陆方面受到限制，因而更加转向海洋。它所有的财富都在海洋方面，在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西西里方面。在西西里另一侧，德拉库特威胁着西地中海的物质生活。西西里总督和对的黎波里进行的远征的倡导者梅迪纳·切利公爵1555年6月写道[20]："一直威胁到包括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在内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都快饿死了。"

远征杰尔巴[21]

这次远征的方向与最初决定的不同，并且在我们将在本章简述的世事变迁之后转向杰尔巴。

如果说，作出这次远征的日期正如从布鲁塞尔发出的命令和指示所证实的那样，可以判定为1559年6月15日的话[22]，那么，远征计划在这之前就已经提出，责任也不由菲利普二世一个人单独来负。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了西西里总督梅迪纳·切利公爵和马耳他的长官让·德·拉·瓦莱特在这次远征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他们之间有密切的友好联系。[23]两人都要同可怕的的黎波里海上行劫者打交道。让·德·拉·瓦莱特过去为骑士们效劳，是的黎波里的杰出的总督。[24]在他的身上既有一个过去的"非洲人"的怀乡病，也有一邦之

长的野心。如果的黎波里收复，毫无疑问，它将只能再归他的骑士团所有。对梅迪纳·切利公爵胡安·德·拉·塞尔达来说，除了西西里的利益之外，他还受到再度取得，甚至更加辉煌地再度取得他的前任胡安·德·拉·维加1550年取得的胜利的这种愿望的驱使。形势显得有利。的黎波里只有一支刚好有500名土耳其人的卫戍部队，设防情况很差。德拉库特经常不得不干预内地的事，因而与这个凯鲁万的国王，这个查比亚的酋长公开作战。根据拉古莱特的一份公文急报，这个酋长的军队打垮了德拉库特的军队。他的道义上的权威很高。坎帕纳说，[25]这个酋长差不多像教皇在基督教徒中一样。这样说是言过其实。最后，从游牧的"摩尔人"那里得到援助总是有把握的。土耳其人对待这些游牧民过于凶残，以致他们不会喜欢土耳其人。梅迪纳·切利公爵和他们暗中串通一气（甚至通过一个名叫雅费尔·卡塔尼亚的人在德拉库特周围亲近的人中有内应）。然而他自己也承认，尽管这些阿拉伯人首领有信给他并且公开发表了观点，但是，依靠这些人毕竟非审慎之举。[26]

一个马耳他骑士、有封地的骑士圭梅朗，前往布鲁塞尔，向国王呈交远征的黎波里的计划。这件事很快通过初步审查阶段。1559年5月8日，菲利普二世要求总督呈交一份报告。但是，这份报告还没有从西西里发出，国王就已经作出决定[27]并把这项决定通知梅迪纳·切利公爵。与此同时，国王在6月15日的信中授权公爵率军远征。他在这封信中阐述催促他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同法国和平相处；可以从使意大利摆脱一个非常令人憎厌的邻国这件事中得到好处；德拉库特远征达里昂山归来几乎被仇视他的摩尔人包围时陷于困境；最后还有一点：在海上行劫者在他们的巢穴设防自卫之

前，在夏天发动远征是轻而易举的。这位君主在他同一天给有封地的骑士圭梅朗的指示中，还提到另外一个有利的论据：根据各地向他的汇报，这一年土耳其人不准备派出一支大型舰队。国王让意大利的帆桨战船归梅迪纳·切利调遣指挥。相反，西班牙的帆桨战船却奉命驶回本土保护海岸使之不受海上行劫者袭扰。因此，后来西班牙帆桨战船的首领胡安·德·门多萨拒绝参加远征，[28]他只不过是服从国王的命令而已。

因此，进行这次征伐使用的仅仅是菲利普二世的舰队中的意大利舰船，即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帆桨战船，从热那亚人、托斯卡纳人、西西里人和摩纳哥公爵那里租来的舰船以及教皇和圣约翰骑士团的联合舰队。让这些因为同法国签订了和约而得以抽调出来的舰船在通常十分方便的墨西拿港内集结并不困难。但是，集中军需给养以及进一步集中必需的人员却困难得多。菲利普二世预定8,000名西班牙士兵登陆（其中5,000名从米兰和那不勒斯的卫戍部队中抽调，2,000名从西西里王国中调来）。再加上圭梅朗以马耳他的名义提供的人力，难道这还不够吗？[29]然而，梅迪纳·切利在获悉国王的决定之前，在6月20日的陈情表中要求调派给他2,000来名士兵。虽然对他来说，两个炮兵中队似乎已经足够，但是，他却考虑到要塞设防很差，易于遭受攻击。这些数字说明，从一开始起，在国王的计划，即定于夏季立即出征的计划和总督渴望组织的大规模作战的计划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当从伦巴第撤出西班牙士兵这个行动显得困难时（皮埃蒙特的法国要塞尚未归还），国王便于7月14日立即下令[30]用阿尔卡拉公爵刚从那不勒斯派到墨西拿搭乘帆桨战船前往参加征伐的2,000名意大利士兵来代替西班牙

人。最重要的是，这些帆桨战船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一直上驶到热那亚去该地载运军队这个行动上。正如菲利普二世所写的[31]，“在天气晴好的季节还剩下的时间里完成事业。”迅速行动，这就是国王的指示。

但是，梅迪纳·切利要求增加兵员。这就迫使菲利普二世8月7日[32]最简略地重复从伦巴第调遣部队去西西里的命令。然而，塞萨公爵却及时从亨利三世去世这件事中找到不放走他的人员的新理由。[33]可以想象，由于信函缓慢地在根特、那不勒斯、米兰和墨西拿之间传递，因此每道命令都意味着进一步的拖延……8月10日，让·安德烈·多里亚上书国王说，[34]他把1艘帆桨战船托付给阿尔瓦罗·德·桑德。阿尔瓦罗·德·桑德将去热那亚，并从该地转赴米兰说服塞萨公爵不仅派出西班牙士兵，而且还派出在伦巴第征募的德意志士兵和意大利士兵各2,000名。于是对帆桨战船来说，产生了新的运输问题，姑且还不谈对负责并从事供应的船只来说必不可少的护航这个问题。鉴于法国要塞已经按照商定条款归还萨瓦公爵和曼图亚公爵，8月11日[35]，塞萨公爵终于在米兰决定同意。但是，先后答应派来的西班牙的、德意志的和意大利的步兵姗姗来迟，1个多月后才抵达热那亚。[36]9月14日，西班牙驻该城的大使菲格罗阿宣布这些部队登上几艘大帆船和11艘帆桨战船。“这全都是出色的、精锐的部队。如果它们不受阻于天气，会全部出发，一分一秒也不会延误。”但是，这时已经是9月14日了。

在那不勒斯同样产生了延迟和困难。9月14日[37]，让·安德烈·多里亚写道，马耳他骑士团的帆桨战船出发驶往那不勒斯，以便从该地运回骑士团刚刚在当地募集的意大利步兵。他本人则派遣帆

桨战船去塔朗托以便在该地接领那不勒斯总督同意向远征军提供的5个意大利连队，并继续往奥特朗托装运火药、炮弹。但是，前一天晚上，他收到总督来信。总督在信中宣布不再愿意提供上述5个步兵连，因为他得到“一支由80艘帆船组成的土耳其舰队抵达发罗拉的确切消息。这支舰队在发罗拉载上1,500名土耳其骑兵”。[38]让·安德烈·多里亚一下就为他的帆桨战船惊惶不安起来。“愿上帝把它们平安无事地带回……”这时，时间正不停地悄然流逝。菲利普二世感到胆战心惊。10月8日[39]，他写道：“我对征伐是否成功感到十分担忧，因为季节已经很迟了。”11月30日，指挥西西里的帆桨战船的东·桑乔·莱瓦从舰队刚刚集合的地点锡拉库萨写信说：“我从来没有忘记对梅迪纳·切利公爵说，并且曾经多次对他说，这次征伐成功的首要因素是行动迅速。拖延是成功的最大障碍……然而，人们正是在整个意大利寻找兵员和补给。”[40]

指出战备工作中的这种延误耽搁现象是重要的。[41]舰队终于在12月1日这个大好晴天[42]驶离锡拉库萨。这支舰队包括帆桨战船47艘、荷兰圆头帆船4艘、大帆船3艘(总共有作战船只54艘和运载船只36艘[43])。舰队载有1万到1.2万人。[44]这是一支比曾于1550年进攻非洲的兵力更强大的兵力，仅次于查理五世亲自出征突尼斯和阿尔及尔时所使用的兵力。这支军队的规模本身就足以说明它为什么集合缓慢，而土耳其舰队8月份抵达发罗拉又进一步延缓了它的行动。[45]埃雷拉说，土耳其的这支由100来艘帆船组成的大舰队之所以没有进一步向西驶行，是因为它受到集结在墨西拿的帆桨战船的威胁，不敢轻举妄动。[46]至少应该认为更加符合事实的说法是：这两支舰队在彼此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互相牵制。当

土耳其人10月份再度启航东驶时，那不勒斯总督才同意提供最后的、对征伐来说必不可少的他保存在塔朗托的兵员。[47]基督教舰队于是从墨西拿开到锡拉库萨。

但是，从此以后就再也谈不上什么进行突然袭击了。这次远征的消息传遍全欧。土耳其人和海上行劫者也已获悉。德拉库特设防自卫。9月25日，一艘法国大帆船驶离马赛，把关于一支在墨西拿停泊的舰队的消息[48]至少带到了米洛。秋季，德拉库特俘获了一艘从这支舰队派出进行侦察的船。[49]大量具有一定的准确性的传闻充斥于威尼斯的外交函件中[50]，以致土耳其人开始匆匆忙忙在君士坦丁堡装备一支舰队。据说，这支舰队由250艘帆船组成。马克西米利安在维也纳的看法是："这次远征公布过早，以致向土耳其人提供了准备一支如此庞大的舰队的理由和时间。"[51]

远征舰队是为了使自己这方面有进行突然袭击的这一招在12月份出航吗？每个海员都知道，选择这样一个时期出航简直就是精神错乱。但是，公爵是军人，不是水手。他坚持己见，力排众议。舰队驶离墨西拿。这支舰队一出海就几乎立即遭到狂风暴雨的袭击。唯一能脱险得救的办法是驶往马耳他。水手们的意见大概占了上风，因为恶劣的天气把他们阻留在马耳他达10个星期之久，直到1560年2月10日为止。在这次漫长的等待中，瘟疫使远征部队因士兵大量死亡严重减员。这支部队在作战之前就已经丧失士兵2,000来名。

帆桨战船和大帆船分开，各自出发。会师地点定在祖瓦赖附近海域。大帆船迟到。帆桨战船绕过克肯纳和杰尔巴后，于2月16日到达。这些舰船在这个时机掳获了两艘满载油脂、粗呢绒和香料的

船。[52]但是，有两艘荷兰圆头帆船却得以逃脱。这两艘逃脱的船载着厄尔杰·阿里，飞速驶向君士坦丁堡报警。这首先让当时正在杰尔巴的德拉库特来得及被告知这件事，警觉起来并前往的黎波里。可以毫不困难地想象到，的黎波里人心惶惶。让我们听听当时在地中海的另外一端，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总督的叙述吧（这时德拉库特的4艘帆桨战船已经开到土耳其首都）："据说，这些战船除了带来奴隶之外，还带来上述德拉库特的大量财物。这表明他认为战斗已经绝望。他要求迅速援救他，说他现在只有1,500名士兵，因为所有在的黎波里过冬的海上行劫者连同将近15艘船一听到宣布西班牙人到来的消息，都未经准许就逃之夭夭[53]……"

这支大舰队当时如果进攻的黎波里，就有可能攻占这个港口。没有在杰尔巴俘获德拉库特已经铸成大错，因为这个海上行劫者如果被围困在岛上无法逃脱，在的黎波里执行守备任务的400名土耳其士兵是无法阻止敌方轻易取胜的。梅迪纳·切利公爵后来承认了这一点。[54]但是，舰队在祖瓦赖附近的帕洛的退潮时露出的沙洲上，再次因为天气恶劣而在2月份的下半个月按兵不动。接着，事情又一再拖延，瘟疫再次猖獗为害，人员又有损失。3月12日，舰队启航。但是，这次是驶往杰尔巴。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获悉德拉库特已经返回的黎波里。即使杰尔巴没有城市，舰队也会占领这个盛产棕榈、橄榄和羊的岛屿，这个出产羊毛和油料的岛屿。登陆于3月7日进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4月初，热那亚领事洛梅利诺从墨西拿宣布（消息刚传到那里）："我们的大舰队"——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措词——"已经攻占杰尔巴"[55]……

梅迪纳·切利公爵俨然是一家之长，他已经在这个日期在新领

土上建立了西班牙国王的政府。他授权给一个他挑选的酋长。他注意使杰尔巴人不受骚扰、虐待。他迫使他的士兵在当地购物付钱。此外，哈弗西德家族的和查比亚家族的人分别从突尼斯和凯鲁万运来给养。这时，在岛屿北岸一座堡垒已经动工修建。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因为，木料、石料和石灰都极其短缺。当地土人除了骆驼队外，没有提供任何实际帮助。因此，军队在因寒热病流行而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仍然在这项艰苦的施工中耗损兵员。这时，船老板中最精明强干的，或者购买油料，或者购买马匹，或者购买骆驼，或者购买皮革，或者购买羊毛，或者购买粗呢绒。

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从柏柏尔得到消息的同时，也从黎凡特得到消息。这是一些坏消息。那不勒斯总督4月初被告知土耳其舰队将大大早于往常出动。他于是请求国王下令帆桨战船，特别是西班牙的帆桨战船，开到墨西拿集结待命。这些舰船不足以抵抗土耳其人，但可使土耳其人难于让兵员和大炮登岸。总督也致函梅迪纳·切利公爵，要他把他借给他的步兵连同帆桨战船一并送还，送还地点是塔朗托。[56]21日，他推心置腹地向国王谈他的恐惧和苦恼：如果不送还他这支步兵，他就不得不另外花钱募集意大利士兵。因此，他为部分或者全部送还这支远征军进行辩护。他又说："我告知（梅迪纳·切利公爵），我认为，当陛下的舰队受到杰尔巴的堡垒的修建工程牵制束缚时，坐待土耳其的舰队到来并非良策。"几天以后，他从一个自君士坦丁堡归来的旅客处获悉土耳其舰队已经出发前往援救的黎波里。[57]5月13日，[58]他被告知这支舰队已经离开莫东。他立刻通过陆路通知西西里并派遣三桅战船通知杰尔巴的占领部队。他报告国王说："我认为陛下的舰队并非处于一般

的危险中……"14日传来的公文急报表明，土耳其舰队已经在赞特海岸附近的水域被发现，正扬帆驶往柏柏尔。[59]但是，这时一切都已经在杰尔巴结束。

事实上皮亚利帕夏的舰队行驶得和消息同样迅速。5月18日，这支舰队抵达位于马耳他和戈佐之间的海域。它以最高的速度作直线航行，在20天内驶完君士坦丁堡和杰尔巴之间的这段距离，创造了航行记录。公爵一直预期这支舰队6月份开到，但却在5月11日就看见它抵达。在杰尔巴，谁也不打算战斗。正如后来奇里尼所说的那样，在大家看来，"英勇战斗不如迅速逃跑"。[60]要把这种态度归咎于某种"自卑心理"或者归咎于临危不镇定沉着、惊惶失措，或者归咎于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想把他们在岛上停留时堆放在船上的货物隐藏起来使之不受损害吗?这些货物后来被巡视官吉罗加指控为祸根。他说，没有这些财物，人们就不会操心在出发前装载这些财物，那不勒斯总督的指示就会被人遵从，土耳其舰队开到时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几天以前就已经坚壁清野，撤退一空了。[61]

然而，逃跑本身也并非易事。公爵不愿抛弃还留在岸上的意大利步兵和德意志步兵，因此浪费了10日和11日之间的一个夜晚。第二天土耳其舰队发起进攻时，顷刻之间人人惊惶失措，丧魂落魄。[62]为了赶快逃命而抛弃了一切，其中包括出名的货物：成包的羊毛、成罐的油、马和骆驼等。这些货物和所有可能增加船舶载重的物品全都扔进大海。哲加拉由于习惯地中海东岸地区的海盗生活，当时是少有的敢于同敌人对抗的人之一。他令敌人生畏，最后从敌人手中逃脱。但是，在进行遭遇战时，在组成基督教舰队的48艘帆桨战船和荷兰圆头帆船中，丧失了28艘。落入敌人手中的舰船

还不计算在内。这样的溃败十分罕见。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西西里、那不勒斯、热那亚和整个欧洲。5月18日凌晨2时,5艘幸免于难的帆桨战船开到那不勒斯。其中3艘隶属安东尼奥·多里亚,1艘隶属本迪内利·绍利,一艘隶属斯特凡诺·德·马里。这些舰船带来坏消息以及这些消息的种种详情细节。让我们注意,以下情况并非偶然:这些首批到达的是被租用的帆桨战船,或者如人们所说,是给养承包人的船只,即与西班牙国王订有合同的个人的船只,因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关心抢救他们的资本的人的船只……几乎与此同时,其他逃亡者乘坐更小的三桅战船和小船到达。在这些逃过了土耳其人的注意力的人中,有舰队司令让·安德烈·多里亚总督本人和他的几个亲随。"他们奇迹般地到达马耳他,并从马耳他到达墨西拿。"[63]

在这个期间,几千人留在堡垒里,备有充足的粮食,据说足够一年之需。对这些人应该怎样办呢?在拉古莱特人们迟至5月26日,[64]并且可能经由西西里,才被告知杰尔巴的败绩。10日,阿隆索·德·拉·库埃瓦从拉古莱特写信禀奏国王说,尽管那不勒斯的总督向他提出请求,他并不认为可能(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有关的那个人是土耳其人的走狗)利用陛下的封臣突尼斯国王来援救杰尔巴堡垒。如果这座堡垒不是修筑在老城堡那里而是修筑在舰队先前靠岸的罗切塔,被包围者本来会有个深水港和饮用水,本来有可能得到援助。但是,就这样……

在某个时期阿尔卡拉公爵继续想方设法,考虑采取种种措施。他以后获悉他的同事梅迪纳·切利公爵得救,就镇定下来。[65]后者还为他带来逃脱杰尔巴之难的意大利步兵的一部分以协助他保卫

那不勒斯，直到在杰尔巴损失的西班牙步兵被从西班牙新征募的兵员补替时为止。[66]

至于菲利普二世，将近6月2日，消息经由热那亚传到他那里。[67]他接到报告：损失了帆桨战船30艘、普通船只32艘；[68]只有17艘安全抵达。这些数字接近实际情况。国王同阿尔贝公爵、安东尼奥·德·托莱多、胡安·德·曼里克、古蒂尔·洛佩斯·德·帕迪拉等人商议后立即决定派遣一位权威人物前往墨西拿接替生死不明的总督，并且决定把将在卡拉布里亚招募的5,000名步兵以及将从那不勒斯后备队抽调的大炮和军火调往西西里。[69]根据传闻，菲利普二世要求法国国王用他的舰队进行支援[70]……6月3日，他任命当时加泰罗尼亚的总督东·加西亚·德·托莱多担任西西里政府首脑的职务。

菲利普二世就这样组织拯救这座堡垒。人们始终以为梅迪纳·切利公爵还被围困在堡垒内。6月8日，他接到关于西西里的令人放心的消息，兴奋地高声叫道，[71]这是另外一个应当关怀堡垒里的人的理由。拯救曾经为国王效劳的人是一项义务。他打算在墨西拿集中64艘帆桨战船，并且已经下令禁止装备精良的30艘巨型大帆船出港。在本地招募的意大利士兵以及后来被3,000名高地德意志士兵替换的来自伦巴第的西班牙步兵总共1.4万人应登上救援舰队，由东·加西亚·德·托莱多指挥。最后，将运往热那亚大量小麦作生产饼干之用……

现在已经万事俱备。但是，6月13日[72]，菲利普二世收到一封东·加西亚·德·托莱多的来信。这封信告诉他西西里的总督安然无恙[73]。15日，国王突然下令暂缓执行他已经下达的命令，理由是：根

据各种意见,围城中的人有8个月的粮食储备,而土耳其舰队的粮食却只够吃两个月,因而无法延长包围时间。[74]战备工作全都取消。然而,在新的命令下达受命者之前,又过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杰尔巴的败绩引起的骚乱仍在继续。多里亚老亲王呈奏他的谏劝。在他看来,使用数量不足的帆桨战船直接进攻并非审慎之举。他更愿尝试向地中海东岸地区进行牵制性的袭击。热那亚市政会议为解堡垒之围提供帆桨战船4艘。皮翁比诺的封建领主派出帆桨战船1艘为国王效劳。他说,如果这艘船不被国王接受,他就派它去冒险。[75]萨瓦公爵宣称他有帆桨战船3艘;其中1艘完好无损,可供使用;第二艘上只有被罚划船的犯人奴隶;第三艘空空如也,但是,他等待法国国王将调拨给他的4艘帆桨战船。[76]斯特凡诺·德·马里刚从维泰利红衣主教那里购置了帆桨战船两艘。他准备把这两艘船租给西班牙国王。一个定居威尼斯的曾经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效劳的名叫多梅尼科·皙加拉的人,毛遂自荐,表示愿意前往土耳其和波斯。[77]梅迪纳·切利公爵在西西里积极备战。在他的关怀下,6月份为巴勒莫、墨西拿和那不勒斯总督府[78]造好帆桨战船7艘。早在4月份,已有6艘下水,预先替换已在杰尔巴丧失的舰船。[79]

最后,下面这个事件再次表明了法西关系的现状如何:要法国提供帆桨战船的这项要求没有明明白白正式以菲利普二世的名义提出。正如米基耶尔1560年6月22日对威尼斯总督所说的那样,西班牙国王担心遭到拒绝甚于希望得到承诺。[80]怀疑和抱怨使这两个国家分离、疏远。菲利普二世不久以前教人辞退了年轻的王后的法国仆役。在有关英国的事务中,他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虽然在整个王国开始出现的、其规模多少有些被人夸大了的动乱,促使吉

斯家族的政府与西班牙合作，但是法国方面犹豫不决、模棱两可的态度也同样令人吃惊。6月25日[81]，法国驻西班牙大使向蒂耶波洛宣布他已经向西班牙人提供了马赛的帆桨战船和军队。蒂耶波洛转而向威尼斯总督再次宣布这件事。但是，这发生在6月25日，即菲利普二世作出取消军事行动的决定之后10天。阿尔贝公爵没有忘记在9月份强调指出："……最近，正当杰尔巴战役失败之际，我们从来不敢（向法国人）索要帆桨战船来进行陛下正在准备进行的援救，因为我在多次间接发出呼吁之后，从来没有得到足以促成我谏劝陛下向他们提出这一建议的答复。当时机已经过去之后……当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援助已经毫无用处可言之时，大使来对我说，如果我们需要帆桨战船，他们就准备提供。"[82]法国采取犹豫政策，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法西双方都继续忠于过去的政治路线，都觉得摆脱过去长期所抱的态度是困难的。法国国王难道不是仍然同他不想失去其友谊的土耳其素丹[83]，同向他派来使者以及马赛向他们运去武器的阿尔及尔人保持联系吗？[84]与此同时，虽然纳瓦尔国王亨利，或者西班牙人所说的那位旺多姆先生，当时并不在法国掌权，甚至还受到吉斯家族的迫害，但却同摩洛哥的谢里夫一起密谋策划。[85]

现在回到杰尔巴问题上来。我们看到，围绕着这个小小的事件产生的漩涡扩延到了什么地方。这起事件掀起的波浪几天之内就覆盖了整个欧洲。甚至在不久以前还渴望同土耳其人兵戎相见的维也纳，这次灾难性的事件也不断使费迪南和他的亲信左右深思熟虑起来。[86]虽然西班牙驻维也纳大使的信声称他的主人采取的反措施甚至比在的黎波里取得的胜利更提高了他的主人的声望，

但是，很难不相信菲利普二世的威信在这一事件中已经受到损害。

根据这个观点，西班牙国王突然作出的放弃杰尔巴岛上的被围困的人的决定是个好的解决办法吗？在杰尔巴，如果说水手们表现出明显的应该受到指摘的怯懦的话，那么陆军却在久经沙场的老兵阿尔瓦罗·德·桑德的指挥下光荣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他在被包围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7月11日，阿尔瓦罗·德·桑德还写信给西西里总督[87]。也许人们的确有某些理由认为土耳其舰队因在气候恶劣的季节来临时缺乏粮食而松手撤围。在这之前，已经有人告知那不勒斯总督，如果不进行援救性的远征的准备，土耳其舰队就会撤回。6月26日，总督把这一点通知拉古莱特的省长（因此是在他知道菲利普二世放弃远征之前），他设想：故意言行不慎泄露秘密让土耳其人以为援救的准备工作拖延很久，会是件好事。[88]那个时期，土耳其的各个首领对进攻杰尔巴岛并不积极，这是事实。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损失惨重。7月份，皮亚利帕夏的心腹纳苏夫·阿格哈到达君士坦丁堡，他并不隐瞒他不十分相信堡垒已被攻占。[89]这时，一些相当令人忐忑不安的消息从波斯传来。据说索非已经死去。他的继承人像爱自己的亲兄弟一样爱巴雅泽特。[90]7月15日，一个自称是巴雅泽特的大使的人甚至来到热那亚（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来自何处，何时到达，何时离开）。菲格罗阿在他自己在热那亚的家中接待了他，并且在让他乘坐一艘双桅横帆船前往尼斯之前对他阿谀奉承了一番。这个人到了西班牙才被人发现是个冒名顶替的家伙。

所有这些希望不久全都破灭。土耳其人虽然没有使用武力进攻堡垒，但占领了附近的水井，迫使被包围的人饮用蓄水池的水。

蓄水池因7月酷暑高温很快干涸。7月29日，阿尔瓦罗·德·桑德试图突围出击。他在突围时被俘。两天后，堡垒投降。8月6日，阿尔瓦罗·德·桑德写信给梅迪纳·切利公爵，[92]把这次失败诿过于他的士兵，以下至少是这个俘虏所作的解释："我如果在这些士兵中能够找到从前曾经在我的统率下的其他部队的士兵所具有的那种素质，我们会取得多年以来的最大胜利。"对一次失败的突围出击来说，这样说是言过其实。大家很愿意相信不久以后布斯拜克在土耳其对这个人的描绘："矮胖笨重，走路时气喘吁吁，特别是胆小如鼠。"过错在指挥。对杰尔巴的第二次灾难还可能作出上述解释之外的其他解释[93]，例如杜罗所作的解释：过错在于指挥。但是，最中肯的指控无疑是东·桑乔·德·莱瓦1561年[94]身系囹圄时在他那封从狱中写给国王的信里对远征的负责人进行的指责："这双重的灾难是上帝的判决。如果进行新的征伐，那么但愿人们严密监视亵渎神明的人。但愿人们把征伐的领导权交给真正优秀的天主教徒……"这是一个对自己锒铛入狱的原因进行过反复思考的囚犯感情流露、如实道来的话，这是一个16世纪的天主教徒感情流露、如实道来的话，因为这是一个头脑清醒、思虑周密、我们以后将在那不勒斯的帆桨战船上发现已经获释的人。

堡垒投降后，土耳其舰队得以再次抽出身来在地中海上自由活动。在马耳他和非洲之间巡航游弋并为拉古莱特运送援军的让·安德烈·多里亚获悉上述情况后立即放弃远征的黎波里的计划返回。[95]是这支胜利的土耳其舰队在驶往戈佐之前曾经在城市的港口停靠。[96]它8月13日抵达戈佐[97]，接着又从该地出发进行抢掠袭扰，沿西西里海岸航行，攻占海岸上的奥古斯塔[98]，对阿布鲁齐海

岸上的大、小村庄肆意烧杀掳掠[99]。但是，9月4日，一份公文急报报导说，这支舰队在普雷维扎休整，油漆船体的水下部分。”[100]皮亚利帕夏在该地接到返回君士坦丁堡的命令后，留下奥斯曼骑兵（他们后来经由陆路回国）并于9月1日启碇驶往纳瓦林。一系列公文急报证实了这些消息。那不勒斯总督准备遣返还在科特罗内和奥特朗托驻守的军队。[101]10月1日，皮亚利帕夏乘坐1艘漆成绿色的旗舰在礼炮轰鸣声、人群欢呼声、震耳欲聋的锣鼓和喇叭声中胜利进入君士坦丁堡。这艘旗舰由15艘鲜红色的帆桨战船以及舰队的其他船只跟随。布斯拜克对这次到达，对排成长列的俘虏，[102]对欢庆的城市都作了描绘。在这个欢庆的城市里的基督教徒在此后一段时期内受到虐待……

事件证明这种热情是正当的。伊斯兰国家在符合它的利益的情况下，完成了为统治中地中海而进行的斗争[103]。土耳其的统治过去曾经在的黎波里受到很大的威胁，现在则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好地得到维护。基督教世界陷入痛苦之中。土耳其舰队刚刚驶离意大利海岸，基督教国家就已经想到一年以后随着这支舰队返回会发生什么灾难。蒙特勒奥内和那不勒斯总督两人都谈论土耳其皇帝将在1561年指挥的对拉古莱特的征伐。[104]12月28日[105]，当人们在维也纳获悉土耳其正在武装120艘帆桨战船时，就已经想象到这些舰船将开往拉古莱特。这种无法摆脱的困扰由于海上行劫者在伊斯兰国家取得胜利后肆无忌惮、猖獗为害而增加。尽管时值严冬，这些海上行劫者仍然溯流而上，直抵托斯卡纳。[106]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海岸上处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107]根据君士坦丁堡方面的传闻，西班牙人被他们在杰尔巴得到的教训弄得惊惶失措，以致准备

马上放弃奥兰。[108]

局势还没有发展到放弃奥兰这个地步。但是，杰尔巴的双重灾难引导人们去进行某些有益的思考，这一点倒是真实的。从高级官员到最低层的执行者，人人都向马德里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的内容往往是：国王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就无法坚守他在地中海的各个邦国的海岸。阿尔贝公爵说，[109]必须加强意大利的卫戍部队（这支部队肯定是弱小的。我们已经看到从这支部队抽调出几个人来是何等困难）。这支部队人数很少，杰尔巴战役后大量减员。这肯定促使意大利的阴谋活动"沸腾"起来。这些阴谋活动从秋季起就在积极进行。[110]但是，使自身在海上强大起来，乃是根本大计。

并不是人人都看到这一点。有些人还只关切陆上的防御措施。例如阿尔卡拉公爵就是这样。他关心加强伊维扎和米诺卡两个岛上的防务。他知道这两个岛屿设防情况很差。[111]另外一些人头脑比较清醒。1560年7月9日，梅迪纳·切利公爵在一封措词十分激烈的信中写道："必须从我们的衰弱中汲取力量，让陛下把我们大家卖掉吧！首先把我卖掉吧！陛下只有使自己成为海的主人，才会得到安宁，陛下的臣民才会得到保护。否则一切都会对我们不利。"[112]"海的主人"这个称谓多次回到撒丁的总督阿尔瓦罗·德·马德里加尔的笔下，时而为了恳请国王成为海的主人，时而为了庆幸国王有这种愿望，"因为这是适合保持基督教世界的安宁的、适合保持这个世界的各个国家的事物的"。[113]胡安·德·塞普尔维达博士[114]和古怪的布斯希亚博士在这同一个1560年向国王表达了类似的愿望。布斯希亚是西班牙在拉古萨的鲜为人知的代理人，是那些以论行数写稿的方式谋生的、经常叙述茶楼酒肆中的闲谈杂闻的情报员

之一[115]……

外交家的种种梦想各自遵循对自身更加自然的途径，但却殊途同归。人人都转向威尼斯，因为人们将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基督教世界当前所处的困境中，只有威尼斯能够使海上霸权重归西方世界所有。但是，了解这个奉行利己主义的城市的人，只会对这种想法一笑置之，因为向威尼斯提出这样的要求，无异于通知它关店歇业。但是，并不受这些困难阻碍的笔继续在写。10月8日，卢纳伯爵在维也纳认为，"回到威尼斯人曾经一度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缔结的联盟，对陛下会最有助益。我的大人，愿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116]在罗马，似乎组成包括威尼斯在内的对抗土耳其的联盟的想法，的确在新教皇庇护四世和东·胡安·苏尼加的会谈中提到。后者和他的兄弟、卡斯蒂利亚的有封地的骑士，那时在罗马同时代表菲利普二世的利益。菲利普二世写信给这两兄弟说："我在另外一封信中对你——东·胡安·苏尼加——写信告诉我的情况作了答复。你们会在那封信里找到我的关于你们就与威尼斯结成联盟对抗土耳其人这一问题同教皇陛下举行的会谈的意见。这里，我想特别通知你们兰德里亚诺伯爵就这一问题（以乌尔比诺公爵的名义通过鲁伊·戈梅兹的渠道）提出的两项建议。这位伯爵保证，如果我愿意的话，他会使这个联盟缔结成功。对兰德里亚诺伯爵的这项建议，我回答说，鉴于这是一件大大有利于为上帝效劳，大大有利于基督教世界的利益的事，我感到很高兴。正在这时，共和国的总督去世的消息突然传到我这里。这个总督是现任总督的前任（因此这件事肯定在1559年8月17日以前进行过讨论）。我于是让这些会谈中断了几天。但是，兰德里亚诺伯爵告诉我，公爵将重新办

理这件事。"[117]

杰尔巴的灾难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它使菲利普二世的帝国转而面对在地中海方面的种种任务。它迫使它对此作出反应，采取行动。杰尔巴战役和1560年，标志着奥斯曼的力量在地中海的鼎盛时期。这就是说，1560年以后，奥斯曼的力量开始衰落。这并不是它本身的过错，而是在同年开始的、并从巴勒莫和墨西拿扩展到西意大利的全部海岸，扩展到西班牙的地中海海岸的大规模的海上船舶制造作业所产生的后果。

2. 西班牙的复兴

土耳其人如果不出人意料地、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地予敌人以喘息之机，西班牙的复兴是不可能的。无论1561年、1562年、1563年或者1564年，土耳其舰队都没有大举出战。连续4年以来基督教世界只受到过一场虚惊。重复上演这同样一出戏：在冬季几个月里公文急报大谈土耳其人在进行武装，从事战备，将派出一支强大的军队进攻拉古莱特、撒丁……；然后，夏季出现极大的惊恐不安，接着这一切又烟消云散；于是冬季防御计划不必彻底执行，收回贷款，遣散军队，中止运输，忽视征兵。西班牙在地中海的政策如同两拍子的呼吸。由于它留下不计其数的文件，因此没有比用图表来标示说明它的节奏、它的阶段更加容易的事了。

1561—1564年

土耳其舰队会在1561年来犯吗？人们对杰尔巴的败绩记忆犹新。在这个天气阴沉，有的地方粮食短

缺，[118]有的地方瘟疫流行[119]的1560年和1561年之间的冬天，人人都对土耳其舰队会来犯这一点深信不疑。一个法国人碰巧同一个拉古萨人一道从君士坦丁堡归来。这个拉古萨人根据他们在旅途中的谈话，在1591年1月到达他的故乡时说，他从他的旅伴那里得知：土耳其军队已经从波斯返回；那一年出动的舰队将非常强大。[120]那不勒斯总督研究了所有向他发来的公文急报后，于1月5日作出结论，让人确信土耳其舰队将比往常更早出航来犯。20天或者30天后，他采取措施使海军处于戒备状态。已经答应给他派来的西班牙增援部队会给他派来吗?拉古莱特会及时受到照顾、保护吗?[121]1个月后，西西里总督声称，奥兰和拉古莱特受到土耳其舰队的威胁(2月11日[122])。这里还姑且不谈阿尔及尔海上行劫者的出击袭扰。这些出击袭扰是千真万确的并且具有极大的威胁性，以致2月28日菲利普二世拒绝批准马略卡总督向他提出的离开岛屿的请求[123]。3月20日发自科孚的公文急报(5月2日在那不勒斯收到)还说，出现1支由100艘帆桨战船组成的土耳其舰队。[124]安东尼奥·多里亚4月份在拉古莱特旅行时担心会在海上遇到那些在等待同土耳其舰队会合期间可能决定包围驻防地的海上行劫者。[125]那份发自君士坦丁堡的声称只会有一支小型的、仅仅用于保卫地中海东岸地区海岸的土耳其舰队出航的第一号公文急报的发出日期是1561年4月9日[126]。这个后来得到广泛证实的消息[127]最早也不会在6月以前传到那不勒斯。到那时为止，基督教世界的防御丝毫没有放松。拉古莱特关于蓄水池和大炮的一系列要求[128]，从4月到6月一一得到满足。那不勒斯总督5月份还要求教皇准许马尔坎托里奥·科洛纳参加可能进行的那不勒斯的保卫战。[129]但是，难道必须对一部沉重的政治

和军事机器的所有的细小部分一一加以描述吗?这部机器在运转时比历史学家所谈的更有规律。

如果从那不勒斯的角度来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变化,那么在8月初只不过是紧张的局势缓和了,安宁恢复了,奉派负责守卫海岸的意大利军队复员了。[130]在西班牙,戒备状态也在9月初结束。9月5日,利摩日主教在他从马德里发出的信中写道[131]:"现在晴好的季节和对土耳其军队的恐惧都已经过去。"拥有50来艘帆桨战船的土耳其舰队,6月份驶离君士坦丁堡后只在这个城市和莫东之间迅速往返。这支舰队7月离开莫东,并于8月19日离开赞特返回君士坦丁堡。[132]为什么这是一次有限的努力呢?为什么犯下这个错误呢?

文献资料只让我们在那个时代的人的印象和假说之间进行选择。难道这正如博瓦斯塔耶1561年6月7日从威尼斯写给卡德琳·德·梅迪奇的信所提出的那样,是由于波斯事件吗?[133]他5月11日的信[134]已经谈到这一点:"菲利普国王……没有比这条缰绳更加可靠的在这些王国里箝制上述土耳其皇帝的办法。他可以相信,土耳其皇帝今年不会让他像去年那样平平安安度过。去年土耳其皇帝只从君士坦丁堡派出40艘帆桨战船。"让我们顺便注意这一点:5月9日,威尼斯先于那不勒斯得到消息;6月1日,西西里总督还不知道是否有来自土耳其方面的危险。[135]然而,博瓦斯塔耶并不认为波斯事件足以解释土耳其舰队为什么这样不正常地匆忙行动,出巡时间如此短暂,7月就返回基地。[136]7月11日,他寻思皮亚利帕夏是否像传闻所说的那样真的死去。皮亚利帕夏并没有死,而是鲁斯特姆死了。阿里帕夏登上首相的宝座。[137]土耳其皇帝的大臣之间的敌对活动可能同这支舰队的行动有关。[138]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传

闻,其中甚至还包括帆桨战船需要在黑海采取行动的传闻。[139]

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9月14日的报告[140]更加详尽。这份报告说,土耳其皇帝并没有在同索非和解方面取得成功。这位皇帝为这件事极为愤懑,下令对波斯人作战。还据说,他将前往阿勒颇过冬,以便在该地准备下一战役。但是,另外据说(卢纳伯爵在这里提供的证明值得注意),“他不敢离开君士坦丁堡既是因为他不相信他的儿子塞里姆忠贞不贰,也是因为由于巴雅泽特在他众多的臣民中间享有威信,他担心某个叛乱会在这些地区爆发并且发展到他无法返回这些地区的地步”。我们可以对这个文件所提出的关于对巴雅泽特进行的战争的背景进行猜测,但不能因此而忽视这场战争的社会方面。这场战争使土耳其的领土从边境一直到中心地区都遭到灾难,甚至陷于瘫痪……我们将在这些基督教世界的观察家作出的解释之外加上一个我们自己的假设吗?在土耳其帝国,1561年似乎是个农业歉收年、与威尼斯人争夺谷物年和瘟疫流行年。这些也同样是产生最后结果的重要因素。

1562年,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消息比较令人放心。只有一些稍微耸人听闻的公文急报,例如叙述突尼斯国王的大使在土耳其皇帝面前撕破自己的衣服[141]的公文急报,或者叙述(但是这些公文急报只使热那亚感到兴趣)萨姆皮罗·科尔索绕道阿尔及尔在君士坦丁堡旅行[142]的公文急报等。防御准备工作比上年开始得晚,中断得早。土耳其舰队没有试图进行任何袭击。[143]戒备状态5月底在那不勒斯宣布解除;6月上旬,[144]在马德里宣布解除。这真是一桩咄咄怪事。这桩怪事可以用上年过分的和毫无根据的恐惧来加以解释。这次土耳其没有发动进攻似乎十分自然。其原因人们不需要绞尽脑

汁就能找到。那不勒斯总督简略地写道，素丹决不会派遣他的舰队进攻拉古莱特，这“或许是因为他的几个儿子发生争吵，或许为了不让这支舰队离开土耳其的海岸，或许是因为他深知这个要塞固若金汤”。[145]

不管怎样，既然同一年土耳其皇帝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订了从1558年以来始终悬而未决的停战协定，上述情况就肯定有一些充足的、迫切的理由。[146]在这个时机，赎回了阿尔瓦罗·德·桑德、东·桑乔·德·莱瓦和东·贝伦格尔·德·雷克森斯等人。[147]既然素丹能够随心所欲地在海上强加给西方的事实上的和平对他来说并不足够，既然他也希望他的陆军从西方边境抽出身来，所以，可能是他想故意转向东方。

下个冬季，基督教世界逐渐习惯于这种平安无事的局面，同时也正式采取了预防措施。当然，又有了关于对拉古莱特和对撒丁的威胁的谈论。但是，早在1563年1月，威尼斯想同平时一样企图在希腊群岛上征收小麦并因此发生争端。这些争端表明土耳其的粮食远未库存充足。[148]人们也很早得知萨姆皮罗·科尔索的旅行突然中断。意味深长的是，菲利普二世本人从埃斯科利亚尔谨慎地敲响警钟，[149]并且下令向拉古莱特这个耗尽大量兵员和物资的要塞、这个永远无法填满的小无底洞供应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军用物资等。早在6月初，在那不勒斯，人们就肯定土耳其舰队不会到来。一个4月2日离开君士坦丁堡的情报员6月5日到达这座城市。他带来了谁也不会怀疑的好消息。[150]以后，所有的公文急报全都证实土耳其国王只让若干艘帆桨战船下水而不加以武装，并且限于让其中几艘出航。这几艘船对守卫希腊群岛是不可或缺的。

1564年，局势仍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11月份，有人谈到威尼斯人自已对之深感不安的土耳其进行武装这件事。[151]但是，土耳其舰队不会出航这一点，2月12日在君士坦丁堡方面得到肯定。[152]将近这同一个时期，阿尔卡拉公爵正式进行布署，派遣1,000人去拉古莱特。但是，他说，他是在不顾他得到的情报并且不把这些情报作为理由的情况下这样做的。[153]一切平静无事。萨姆皮罗·科尔索终于得以通过中间人士同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弗朗塞斯·德·阿拉瓦进行会谈。[154]他抱怨热那亚的统治，提醒大使注意这一点：科西嘉隶属于阿拉贡王国；科西嘉人是西班牙国王的臣民。弗朗塞斯·德·阿拉瓦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怎样，这两个这时来找他的科西嘉将领对黎凡特地区的事务了如指掌，能够使用他们来为国王效劳……

5月初可能还有过一次惊恐。鲁伊·戈梅兹对法国大使谈到这件事。[155]但是，这个月还没有过去，这些惊恐情绪就已消失。[156]5月27日和6月6日，一些来自君士坦丁堡的详细的公文急报说明了尽管渴望出航的海伊斯们提出抗议，[157]土耳其舰队仍然无法出海的原因：60艘正在捻缝的帆桨战船行将下水，但当时没有作出任何安排来保证获得划桨手和干粮的供应。接着，船的龙骨涂抹动物油脂和装载卫戍部队的普通土耳其骑兵等两项工作又一直进行到8月。因此，很可能这些舰船根本不会驶往西方。菲利普二世于是在6月中明智地决定让他的舰队转而对付柏柏尔人。[158]从那不勒斯出发的部队不再向墨西拿和拉古莱特进发，而是向热那亚和西班牙进发，更确切地说向马拉加进发。[159]不安的阴影8月份仍然笼罩。8月2日，绍利向热那亚市政会议报告说：[160]马德里方面宣布土耳其舰队

已经到达；但是，这个传闻被视为纯属子虚乌有之谈；“因此，在科西嘉的造反这个问题上，人们感到的焦虑较少(因为科西嘉刚刚在萨姆皮罗·科尔索的领导下造了反)。”这是在这个1564年最后一次提及土耳其舰队。在这一年，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国家对东方很少感到惊恐不安。它主要关切的是地中海西部发生的事件，即首先是科西嘉事件，另外是东·加西亚·德·托莱多胜利地在摩洛哥海岸进行的对弹丸之地的佩农·德·贝莱斯的征伐。

在冬季有几个星期，甚至有几个月，又传闻复活，猜测四起。1564年12月29日，马克西米利安在维也纳同威尼斯大使莱奥纳多·孔塔里尼闲谈。[161]据说一支庞大的土耳其舰队一俟天气好转就马上出航。马克西米利安问道：“你们威尼斯人怎么办?塞浦路斯岛离土耳其很近，而土耳其人一看见这个岛就觉得很中意。”大使回答说：“威尼斯会在这个岛上修筑防御工事。”大使反转过来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关于科西嘉的局势。这个岛上的局势使热那亚人有大量问题要处理，并会因土耳其舰队出航而恶化。这位皇帝答复大使说：“可能萨姆皮罗·科尔索并没有公开援助他的人、公开的同盟者，但是，他和某个王侯秘密串通，这种串通极其秘密，以致无人知晓。”这是一次典型的冬天在欧洲地图前进行的谈话!但是，未来的事件至少在一个方面将证实这些谈话，因为1565年这个战斗年不会像刚刚过去的几年那样。

同海上行劫者和严冬进行斗争:1561—1564年

土耳其人给了西班牙帝国4年和平。这4年得到了很好的利用。首先被用来同海上行劫者进行斗争。海上行劫者没有和土耳其舰队同时销声匿迹。这就自然而然地导致西班牙海军每年使用过去土耳其的威胁迫使它集中起来的,而现在这种威胁的消失又使之变得闲置不用、无所事事的兵力来对付海上行劫者。

菲利普二世的新舰队在同长于海上行劫的敌人的艰苦斗争中得到锻炼。这些敌人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上时,很难捕获;在他们的位于非洲的巢穴里时,很难袭扰。

海上行劫者的确给了西班牙人十分沉重的打击。1561年7月,西西里小舰队,共7艘船,全部在利帕里群岛附近海域中了德拉库特设下的埋伏。[162]这支舰队由马耳他的加泰罗尼亚骑士、有封地的骑士圭梅朗率领。利摩日主教写信给他的国王说:"这个圭梅朗在圣康坦备受尊敬。可是,人们称赞他在陆上比在海上更加精明强干、长于指挥。他在海上学习指挥舰队,但没有从德拉库特那里得到什么教益。他在海上受培养训练的生涯被德拉库特打断了。大人,正如你肯定已经毫无困难地通过来自意大利的信件得知的那样,不少人同这位将领都已经丧生。"[163]他又说,在这些损失中有人想"向我们隐瞒损失了另外1艘船。这艘船是在从那不勒斯开往西西里的途中丧失的,据称载有最近运到意大利的来自佛兰德的3个老连队。"德拉库特利用国王的帆桨战船调回西班牙海岸之机,"用34艘船使那不勒斯王国处境非常困难,以致半个月前上述那不勒斯的省长塔里法侯爵的使者步行到达,"恳请菲利普二世"把上述

帆桨战船退还他，因为马耳他的、西西里的和其他邻近的港口的帆桨战船受到上述德拉库特的骚扰和包围的情况极其严重，以致在这些船中没有一艘能够从一个地方驶往另外一个地方”。利摩日主教又说，幸好土耳其舰队没有开来，“说实话，这真是上帝的极大的恩典，因为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一小撮海盗和强盗在从直布罗陀到西西里这段海域里使这位君主受到他们的束缚控制，以致除了堡垒之外异教徒想在君主所属的土地哪里登陆就在哪里登陆。”

从直布罗陀到西西里这段海域的这种恐怖统治的真实历史，只能通过对安达卢西亚、巴利阿里和巴伦西亚等地的档案资料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发现。在这些档案资料里，摩里斯科人的骚动和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活动的突然发展有联系。哈埃多在谈到舍尔舍勒的海上行劫中心的活动时，多次提出这一点。舍尔舍勒差不多全居住着还和他们的在西班牙海岸的亲友有联系的摩里斯科逃亡者。[164]

1561年夏天，海上行劫者肯定有过多次掳获。随着这一年行将结束，基督教徒报复的时刻来到。报导和评论发生了变化：9月份，西班牙人被认为打算攻克摩纳斯提尔。[165]这个时期，海上行劫者纷纷返回老巢，躲避波涛汹涌的大海。西班牙政府则决不会打算让它的舰队留在安全处闲置不用。这是因为西班牙政府在军事上仍然处于不利地位。梅尔菲亲王在安德烈·多里亚死时被授与西班牙舰队的指挥权。他对没有出过海的人发出的命令违抗不从。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帆桨战船冬天在地中海的航路上航行被颠来簸去时是怎么一个模样。他们对风暴会使狭小的桨船蒙受什么海损和磨损全然无知。[166]

毫无疑问，他是正确的。但是，当弱小的一方想采取行动并维持必不可少的交通联系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在冬天恶劣气候条件下行动。这时，海上空空荡荡，敌人避进港内。西西里总督（这时仍然是梅迪纳·切利公爵）冷冷地提醒梅尔菲亲王，国王已经下令把帆桨战船调往墨西拿。命令就是命令。[167]规定的调动必须执行。拉古莱特10月份得到军火供应。[168]11月初，西班牙舰队还在特拉帕尼。尽管梅尔菲亲王没有表示过任何离开墨西拿的意愿，但是，西班牙舰队不再在该港这个事实表明这支舰队已经撤回自己的防线内。总而言之，天气是恶劣的。[169]毫无疑问，正是在这个时期（文件没有载明确切日期），一支由帆桨战船组成的船队不得不停止驶往拉古莱特。命令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又能起什么作用呢？西西里总督最后决定派遣一艘大帆船运载2，000萨尔马小麦去应付其人员和机构都反常膨胀的卫戍部队的需要。[170]1月份，有人想把在驻防地的由胡安·德·罗梅罗统率的多余的西班牙部队装上船运走。[171]但是，装载这些人和供应他们粮食，同样都大成问题。梅尔菲亲王如果敢于这样做的话，就会发现很容易证明让西班牙的帆桨战船在海上游弋的这种耗费极其巨大的政策，在这个冬天，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效果。

春季，柏柏尔人的海上行劫变本加厉。1562年3月1日，[172]一封来自拉古莱特的信表明，德拉库特已经出海寻找谷物供应。4月，阿尔及尔帆船企图突然袭击泰拜尔盖岛[173]。胡安·德·门多萨则在5月和6月成功地让一支大圆船船队由20来艘帆桨战船护航抵达拉古莱特[174]，途中没有遇到任何敌舰，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海上事故。在这同一个5月里，若干艘阿尔及尔海上行劫船在马赛附近海域出

现。[175]船上的海上行劫者声称在航行途中掳获一艘来自亚历山大的满载属于佛罗伦萨人的货物的船和一艘运送马尔瓦西葡萄酒的威尼斯大帆船。也有人说，这些海上行劫船攻下一座位于莫里泽奥港附近的城市并在该地俘虏了56人。“它们来马赛补充饼干储备和其他粮食并且恢复海上行劫活动。夜间，它们偷偷装上36桶火药和硝石。”后来，关于这些船上的海上行劫者的去向我们就一无所知了。6月，胡安·德·门多萨应罗马教皇的要求，[176]率领帆桨战船32艘在从那不勒斯到台伯河入海处这段海域维持治安。另一方面，7月，法国大使同萨姆皮罗·科尔索到达阿尔及尔。这位大使负有要求赔偿阿尔及尔海上行劫者造成的损失的使命。[177]既然存在着上述事实，阿尔及尔海上行劫者肯定坚持在地中海北岸继续活动。

西班牙人从9月份起进行反击。巴塞罗那方面宣布：3艘海上行劫者的荷兰圆头帆船在蓬察岛被掳获；几艘低舷长形船在托尔托萨被掳获。[178]但是，后面这件事并未得到证实。西班牙人在进行远航以供应其需求难以满足的拉古莱特的这个方面，取得新的成功。这次远航供应9月份由让·安德烈·多里亚负责进行。[179]胡安·德·门多萨这时已经率领增添了几艘私人帆桨战船的西西里和西班牙舰队返回西班牙海岸维持治安，并把给养和人员运到奥兰。[180]但是，这28艘帆桨战船在马拉加港内遭到一股狂暴的东风的突然袭击，被迫驶往埃拉杜拉海湾的背风处避难。根据《航海指导》，[181]在风从大海向岸上吹刮的情况下，在这种深20公尺和30公尺的淤泥中抛锚系泊是危险的。这些帆桨战船刚在那里避难就遭到一股狂猛的南风的突然袭击。[182]这场灾祸几乎彻底摧毁了这支舰队：在28艘帆桨战船中，有25艘沉没；在5,000人中，有2,500人丧生；只能在难船

的残骸中，回收一部分武器。

1562年11月8日，消息传到加埃塔，[183]再从那里传到那不勒斯。在杰尔巴那场灾祸发生后不久发生的这场灾祸，顿时激起轩然大波[184]。但是，菲利普二世的政府懂得怎样化衰弱为力量。1562年12月12日[185]，在特别召开的国会上，为非洲边界的防务和新帆桨战船的武装提出了给与特别补助的要求[186]。西班牙的海上振兴变得更加困难，只能加倍努力进行。刚刚在埃拉杜拉丧失的，是海军对半岛的海岸和对奥兰这个驻防城市的保护。根据利摩日主教的说法，奥兰是西班牙在非洲拥有的唯一配得上驻防城市这个名称的驻防城市。阿尔及尔人第二年对奥兰发起的强大攻势，当然同埃拉杜拉遭受的灾难有关。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攻势，与1556年哈桑·科尔索发动的攻势迥然不同。包围从1563年4月的头几天开始[187]直到6月8日为止，历时两月。西班牙卫戍部队事先在3月20日获悉4,000名狙击兵抵达马扎格朗时，就处于戒备状态。这些狙击兵布署在阿尔及尔国王的营房前面。间谍又报告说，如果天不下雨，阿尔及尔国王本会和这些狙击兵同时到达。根据预测估计，这位国王将于3月26日星期五这天与40艘舰船同时进入穆斯塔加奈姆。在这些舰船中，有两艘小吨位快速帆船和一艘商用“纳维塔”(naveta)。这3艘船曾经在阿尔及尔港内停泊并在该地装载火药、炮弹、木制怪兽以及饼干。大炮由4艘帆桨战船运到。最后，10艘大型帆桨战船(这是在杰尔巴战役中从基督教徒那里缴获来的并在哈桑帕夏的率领下从君士坦丁堡返回阿尔及尔的那10艘帆桨战船吗？)[188]分为两支分舰队被派往西班牙海岸，调查研究从半岛派遣援军的可能性。[189]

阿尔考德特公爵的两个负责指挥奥兰的两处驻防地的儿子——长子马丹和次子阿隆索——得到这些情报后，本来可以在阿尔及尔人的海、陆两军来临之前发出警报。他们必须保卫奥兰本身和位于米尔斯克比尔的港湾外的半岛上的小堡垒。这个堡垒控制着港内的船舶系泊处。阿尔及尔人先是犹豫不决，然后集中兵力进攻米尔斯克比尔，更主要是进攻新近修建在朝内陆方向俯瞰米尔斯克比尔高地的圣萨尔瓦多要塞。这个要塞在被围23天后于5月8日被攻占。阿尔及尔人接着集中兵力进攻米尔斯克比尔本身和驻守该城的那支只有几百名士兵的小守备部队。然而，这支部队尽管从5月8日到5月22日遭到敌军在步兵发起进攻之前进行的长时间的炮火轰击，却在5月22日击退进攻者的首次冲击并使之遭受重大损失。阿尔及尔人于是决定从5月22日到6月2日从另一个方向进攻堡垒。他们试图从老炮台和新炮台同时发起进攻。与此同时，架设在船头的大炮也从海上射击。但是，这些进攻均未奏效。结果是土耳其人向阿尔及尔撤走8艘满载伤兵的荷兰圆头帆船。[190]

米尔斯克比尔就这样坚守住了。不错，西班牙海岸近在咫尺，这为这两处要塞提供了有价值的援助。一些性能增强了的帆桨战船，特别是一些小船钻进了阿尔及尔人的舰队布设的封锁线。这些小船的舵手例如加斯帕尔·费南德兹、阿隆索·费南德兹等人是被围困者的真正救星。他们为被围困者运去粮食、军火和援军。从5月1日到6月4日，200多名贵族就这样从西班牙前往奥兰。在伊斯兰国家人们听见他的名字就心惊肉跳的洛斯·贝莱侯爵在卡塔赫纳盛宴招待这些贵族，慷慨大方，酒席丰盛得使卡塔赫纳的肉、鱼出售一光，卡塔赫纳居民在市场上再也找不到。[191]这时，米尔斯克比尔

的局势很糟。筋疲力竭的卫戍部队除了一点熏驴肉和其他的人们平常不吃的动物的熏肉之外,几乎什么也吃不到。援救的舰队6月8日及时抵达,赶走了这些土耳其"狗"。

当人们了解到完成这项任务的帆桨战船几乎全都来自意大利时,觉得这支舰队在包围开始后两个月就到达那里,真是个奇迹。对历史学家来说,不言而喻,这次在西班牙引起巨大轰动(塞万提斯和洛普·德·韦加都把这一引起轰动的事件作为戏剧题材)的包围战的令人感到兴趣的事物,倒主要不是东·马丹和他的部属在米尔斯克比尔的英雄行为,而是援军的快速运送。这是西班牙的公文急报传递迅速所产生的作用的极少例证之一。

4月3日,在包围开始前,菲利普二世收到密探的报告后,曾经派遣一名特别信使到他派驻热那亚的大使菲格罗阿那里,责成他让胡安·安德烈·多里亚、马尔科·琴图廖内、博罗梅红衣主教、萨瓦公爵和托斯卡纳公爵等人的帆桨战船出发,并且以罗萨斯港为第一个重新集合的地点。国王叮嘱说,大家应该尽力"争取时间,因为我在看见它们来到这里之前,必然会始终处于一种理由充足的焦急忧虑中。"[192]这些4月23日就在墨西拿收到的命令,[193]意味着除了西西里和马耳他骑士团的舰队外把意大利的几支舰队全部召回西班牙。菲利普二世4月25日写信给东·加西亚·德·托莱多说:"最重要的是意大利的帆桨战船的到来。"[194]

在意大利,人们的看法是一致的。那不勒斯总督在4月25日给菲格罗阿的信中[195]对他谈到以下几点:他通过3月28日(因此在国王4月3日发出命令之前)发出的那些信了解到奥兰被包围的情况;他知道土耳其舰队这一年不会出航;在他看来,让·安德烈·多里亚

用他能够率领的32艘帆桨战船和另外4艘来自王国的帆桨战船，共26艘来装载西班牙士兵2,000名，并且经由撒丁、米诺卡、伊维扎和卡塔赫纳(因此作直线航行不绕罗萨斯)在卡塔赫纳等待陛下的命令，“这样做对为陛下效劳来说，是适当的和有价值的。”同一天，[196]多里亚禀报国王，他即将到达卡塔赫纳。菲利普二世5月17日[197]在马德里收到他的信，当天就回信通知他：将在卡塔赫纳生产饼干以便为帆桨战船的到来作好准备；此外，饼干还将从巴塞罗那和马拉加两地运来。他又说由于以下原因：意大利舰队可能迟到；人们普遍感到这是西班牙的内政；救援舰队从奥兰返回时将分为两支小舰队，其中一支将由多里亚率领返回意大利以保卫海岸不受海上行劫者袭扰等，他已经选定西班牙帆桨战船的大统领东·弗朗西斯科·德·门多萨为这次远征的统帅。

6月初，在卡塔赫纳集合了42艘帆桨战船，其中4艘为西班牙船。在这些船中，8艘留在港内(萨瓦公爵的4艘和热那亚的4艘)，其余的34艘8日突然袭击并攻占奥兰。但是，这次出击只掳获了圆船3艘、小船12艘和法国萨埃特船1艘(这艘船被发现装载着铅、军火和锁子甲等)，大型划桨船都来得及逃离。[198]根据一则6月3日发自波内并由马赛转传的公文急报，这也许是因为阿尔及尔舰队一直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驶离[199]。但是，这次作战仍然被视为一次重大胜利。6月17日，[200]国王向那不勒斯总督通报这件事。迭戈·苏亚雷斯在他有价值的奥兰的编年史中称赞这位总督是这次胜利的卓越缔造者。对这一点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是，在赞扬的篇章里记载上菲利普二世的名字，把祝贺的范围扩大到整个西班牙的军事机器，岂不更加恰当吗?这部军事机器这次运转、配合良好，这或许是因

为有过去的痛苦的教训，或许是因为行动的范围有限，靠近西班牙本土。[201]

然而，马德里甚至还有更大的抱负。舰队刚刚返回卡塔赫纳就奉国王之命出发突然攻占佩农·德·贝莱斯。弗朗西斯科·德·门多萨患病，让桑乔·德·莱瓦指挥这次战斗。这次战斗的方案是梅利利亚的总督制订的。桨声使土耳其驻扎在这个小岛上的卫戍部队警觉起来。在贝莱斯前面登上陆地的部队不够大胆果断。部队的大部分长官不坚持、不炮击、不挺进，相反却决定部队撤回船上，把行动推迟到以后某个日期。舰队在8月份的最初几天返回马拉加。[202]海上行劫者被告知这次失败后，对西班牙海岸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和袭扰。他们甚至一直推进到加那利群岛。这是他们直到那时为止还没有采取过的行动。这时，西班牙的帆桨战船完成了对奥兰的供应补给，于8月底向该地运去支付卫戍部队薪饷所需的2万杜卡托。几天以后，这些舰船通过海峡，驶抵塞维利亚的外港圣玛丽亚。[203]

总而言之，这一年的活动的成果并不太差。但是，下一年，即1564年，西班牙做的事更多，因为它认为能够转入反攻。这可能是因为东方更加安全，总的政治局势稳定，也可能是因为1564年2月10日加西亚·德·托莱多被任命为大统领。但是，更主要的是，西班牙开始感到自己更加强盛。一个思想变化的迹象是(在任命东·加西亚之前)：那不勒斯的帆桨战船的司令桑乔·德·莱瓦1月份请求菲利普二世准许他率领他自己的帆桨战船中的5艘、斯特凡诺·德·马里的1艘和西西里的可供使用的空帆桨战船前往柏柏尔的海岸捕获海上行劫者的低舷长形船和荷兰圆头帆船以及抓捕对需要加以武装的船只的划船人员配备来说必不可少的俘虏。[204]在这一年

春季很早的时候，在惯常例行的任务，例如供应拉古莱特和奥兰之外，在政府上层还有人谈到要恢复过去没有成功的进攻佩农·德·贝莱斯的行动。4月，官方作出决定。[205]

整个作战行动是一项有条不紊、稳妥可靠的组织工作的杰作。历史档案留下的大量未公布的文献资料可以证实这一点[206]。一切都安排得极其井井有条，以致6月12日菲利普二世得以向法国大使宣布[207]海军将用来对付非洲。准备阶段结束，东·加西亚忙着在意大利调集军队和帆桨战船以便派遣这些人员和舰船先去西班牙，最后前往非洲。[208]14日，他曾经率领帆桨战船33艘[209]胜利进入那不勒斯。[210]菲利普二世这次再度深入细致地参与指挥舰队的全部活动。他下令后勤部门满足东·加西亚的一切要求，并且“加速这次作战行动，因为风像现在这样吹刮，我想他很快就会到达。让人调查一下是否需要更多的士兵，因为阿尔卡拉写信说，他只能够提供1，200名士兵。这1，200名士兵将在统领卡利洛·德·克萨达的率领下到达”。[211]

东·加西亚经由热那亚到达西班牙，途中沿北部海岸迂回航行而不是取道让·安德烈·多里亚上年走过的那条在各岛之间穿行的捷径。舰队第一次在加泰罗尼亚岸边的帕拉莫集中。6月6日，阿尔瓦罗·德·巴桑率领的西班牙帆桨战船在该地同它会合。阿尔瓦罗·德·巴桑辉煌显赫的生涯从此开始。26日，让·安德烈·多里亚率领22艘帆桨战船在该地下锚。[212]接着到达的是帕甘·多里亚的帆桨战船和其他船只。这些舰船在斯培西亚停留以便在该地载运德意志士兵。8月15日，舰队抵达马拉加。[213]东·加西亚暂时离开舰队，前往加的斯，迎接已经有人答应为征伐提供的葡萄牙帆桨战船。东·加

西亚的出现在从埃斯特波内和马尔贝拉到直布罗陀的沿海地区引起一片惊恐不安。这个地区的居民对海上行劫者的劫掠已经习以为常,以致他们认为敌人的帆船来临。在这之后,舰队十分缓慢地在附近的马尔贝拉和马拉加两个港口集中。8月底,舰队拥有舰船90艘到100艘,[214]再加上一些小吨位快速帆船、运载金银的大帆船和双桅横帆船,共150艘和士兵1.6万名。威尼斯有人不无恶意地说,[215]这是毫无用处的、虚张声势的炫耀武力。但是,不管怎样,它像扫帚那样,一下有力的横扫就把海上行劫者赶走了。敌方3艘帆桨战船和1艘武装运载金银的大帆船被掳获,6艘至7艘被驱赶,好容易才得以逃脱。

8月31日,舰队经过3天航行后抵达佩农沿海海域。该地居民像1563年那样弃城逃离。3艘加泰罗尼亚船在港内焚烧。这些船只是被贝莱斯的非常活跃的海上行劫者夺去的。这些海上行劫者已经同卡拉·穆斯塔法一道出发进行海上行劫。他们远未料到基督教舰队会来进攻他们的城市。东·加西亚并不因此而鲁莽行事,少用兵力。一座强固的大桥头堡垒朝着陆地这个方向掩护对小设防岛屿的进攻。这个岛屿的卫戍部队出乎所有意料之外,经过几天炮击之后于9月6日放弃了这个岛屿。西班牙人在那里构筑工事,留下大炮、粮食和人员,然后在夷平贝莱斯城的城墙后撤离桥头堡。在这个时机,9月11日,这里和当地土人有过几次交火。[216]

总而言之,可以说,这是为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大事声张,耗费巨资。可能这样做是适宜的:大张旗鼓表演一番以便向罗马教廷证明:教廷答应为同摩尔人进行的斗争提供的补助并没有白给。正如菲利普二世所说,[217]教皇正在注视呢!那个时代的观察家都强调

指出了这次征伐声势浩大、引人注目的一面。当然，进行这次征伐也有一些战略方面的原因，即：由一位新的首领来掌管西班牙舰队；企图粉碎贝莱斯的小而具有侵略性的海上行劫中心。这个中心离西班牙海岸和塞维利亚航道太近，对这个地方最终不会不构成阻碍。从那时起(正如从1508年到1525年一样)一支西班牙卫戍部队就在这个小岛上驻守。加西亚·德·托莱多把那里的一切安排布署妥当后才离去。他匆匆离去，因为别的地方需要他。在科西嘉、热那亚的市政会议面临萨姆皮罗·科尔索的叛乱的爆发，正在大声呼救。

科西嘉暴动

科西嘉的暴动酝酿已久。卡托—康布雷锡条约使这个岛屿的岛民感到绝望。从1559年到1564年，萨姆皮罗·科尔索殚精竭虑，四处奔走，积极谈判。但是，种种努力悉付东流。1564年6月12日，他率领一支小部队在瓦林科湾一登陆，这个岛屿就马上着火燃烧，因为这个岛屿一旦接触星星之火，就会熊熊燃烧起来。萨姆皮罗立刻扑向科尔泰并且攻占了该地。于是，这个岛屿曾经经历过的最令人悲痛的战争开始了：俘虏被杀，村庄焚毁，庄稼破坏。科西嘉历尽劫难。

对于热那亚来说，这倒并不是一件真正令人惊奇的事。不管官方的说法如何，市政会议很久以来就知道：这个岛屿很不安定；这个岛屿对统治当局十分敌视。热那亚的代理人已经密切地、周详地注视萨姆皮罗在法国和阿尔及尔，在托斯卡纳和在土耳其等地的旅行和密谋活动。热那亚的情报机构已经获悉他在马赛以及怎样

在该地拥有一艘武装起来的帆桨战船。因此，他的登陆已经被人预见到。但是，这个叛乱首领揭竿而起后产生后果之快，他的宣传之立竿见影以及蜂拥前来拥立他的人之多等，则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

他取得胜利时有人会问：萨姆皮罗的背后是谁？是向他提供登陆船只的法国国王吗？是土耳其海上行劫者吗？[218]很快就有人低声埋怨说是佛罗伦萨公爵[219]……可能在萨姆皮罗的背后同时有这些强大的后台。但是，支持的方式是间接的、有分寸的。叛乱者得到的最好的支持来自科西嘉岛山区的贫困状态，来自这个岛上深受热那亚的收税官吏和高利贷者之害的的庶民百姓。热那亚对这些因素当然决不会承认。它强调科西嘉的大邻邦在叛乱中所起的作用，以此来争取菲利普二世对这件事进行干预，这对它大有好处。它决不放过这样做的机会，特别当法国的作用过于突出明显时更是这样。7月7日，菲格罗阿写道：“科西嘉事件的基础比某些人最初所想的更多。萨姆皮罗煽起居民。这个岛屿的相当大一部分对他效忠。人们得到的消息说，卡尔塞斯先生在普罗旺斯征募7队步兵给他派去。虽然法国人声称征募这些步兵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海岸。”里昂的热那亚商人[220]也向市政会议报告法国人的活动和反应。

菲利普二世被告知这件事后，赞同东·加西亚的意见。东·加西亚主张率领30艘帆桨战船直抵科西嘉。与此同时，让·安德烈·多里亚和伊瓦拉将继续负责运载粮食和德意志军队。因此一封7月18日的信要求东·加西亚在接到国王的命令时，不管当时是什么时候，当时他在哪里，都立即前往科西嘉岛。国王写道，不能让已经控制伊斯特里亚并且威胁着阿雅克肖的萨姆皮罗占领整个科西嘉岛。

萨姆皮罗这个法国的爱好者将使科西嘉成为一个“土耳其人、摩尔人——我们的神圣的天主教教义的敌人——的中途停靠站。”[221]他致函他的驻法大使说，法国在这件事中扮演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角色[222]。“我无法相信上述科尔索的所作所为得到国王和王后的赞同，甚至无法相信他们知道这些事，既然这是一起与我们之间的友谊和兄弟情谊相悖的事件，是一起同遵守和约完全背道而驰的事件。但是，迹象是如此之多，如此之大，如此之明显，以致他们无法安于说他们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对菲利普二世来说，特别对热那亚人来说，不幸的是，当7月18日发出的要帆桨战船驶向科西嘉的命令下达给东·加西亚时，东·加西亚已经在西班牙海岸准备对贝莱斯进行征伐了。必须把他调遣回他原来驻守的地方吗?这意味着浪费时间和破坏对佩农的征伐行动。国王对菲格罗阿进行解释，还说：“已经有人警告他说，教皇正在密切注视他提供的用来武装帆桨战船的钱款是否真正对反抗非基督教徒的事业有用。”[223]由于所有这些情况，菲利普二世准许继续向直布罗陀和摩洛哥航行。在秋末而不是在这之前，西班牙才能考虑科西嘉的问题。

对佩农的征伐就这样使萨姆皮罗和他的拥护者得以长期歇息休整。热那亚散布的消息从那时起越来越令人惊恐不安。菲格罗阿在一封1564年8月5日的信中[224]谈到日益增多的法国的干预，谈到来往于这个岛屿和普罗旺斯之间的三桅战船，谈到被流放和被驱逐出境的热那亚人同一些科西嘉人在托马斯·科尔索(此人又以托马斯·朗什这个名字为人所知。他是阿尔及尔海岸的法国堡垒的修建者)的住宅中举行的秘密会谈。“托马斯·科尔索是经常向阿尔及

尔人供应船桨、火药、帆船和其他走私商品的人。”然而，卡特琳·梅迪奇却宣称她在这一事件中没有任何责任，甚至还提出由她来进行调停。她说，帆桨战船之所以在马赛布置得井井有条，这是为了准备国王即将进行访问。她甚至还通过朗布伊埃红衣主教对弗朗塞斯·德·阿拉瓦吐露真情说，东·加西亚·托莱多的舰队的帆桨战船驶经法国各个港口的外海，数量如此巨大却不要求“补充新鲜食物”，这件事使她疑窦丛生。[225]她的这些言行丝毫不能阻止热那亚指控法国，丝毫不能阻止热那亚对埃尔贝夫侯爵在马赛使之准备就绪的10艘帆桨战船感到惊恐不安[226]……

当时西班牙的战争机器在佩农没有受到丝毫损坏。它能够在科西嘉再度取得它刚刚在非洲取得的成功。1564年8月31日，阿尔贝公爵写信给菲格罗阿说，东·加西亚·德·托莱多在完成了他在贝莱斯执行的任务后，在西班牙将只留下帆桨战船20来艘，他本人将立即返回科西嘉。菲利普二世同时向菲格罗阿保证，法国决不会反对这次几乎正式公开准备的、众所周知的征伐。佛罗伦萨公爵的大使1564年9月22日把这件事通知他的主人。[227]菲利普二世自己第二天也这样做。[228]

然而，热那亚人并不满意。在他们看来，准备工作似乎进行得太慢。绍利大使24日声称，他对大概在卡塔赫纳的舰队的情况毫无所知。[229]1月9日他的恶劣情绪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如果舰队迟迟不到，就请最有声望的爵爷责备这个国家的领主们遇事无动于衷和生性懒散拖拉，而不要责备我疏忽大意，因为，说实话，我一直在陛下和他的大臣跟前坚持，从来没有停止过。”[230]他的这些指责可能有失公允。8月，西班牙驻热那亚大使的儿子洛伦索·苏亚雷

斯·德·菲格罗阿被派往米兰征募1,500名意大利士兵,用于在科西嘉作战。26日,这些征募来的意大利士兵被装上3艘圆船。这些船只当时只因等待晴好的天气未能到达这个岛屿。洛伦索是这些意大利人的统领。

热那亚人却有理由焦躁不安。萨姆皮罗击溃了埃斯特法诺·多里亚的军队。[231]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担心秋季会有什么谈判对他们不利。菲利普二世自己也说,为了避免支付一场可能因科西嘉地势崎岖而旷日持久的战争所需的费用,同萨姆皮罗达成一项协议是可取的。[232]当就这个问题向热那亚人进行试探摸底时,他们对菲利普二世的想法大发雷霆。最后,加西亚·德·托莱多10月25日抵达萨沃纳。[233]但是,这时天气晴好的夏季已经结束。他不打算让他的舰队去冒险。他提出派去20艘帆桨战船以及在西班牙和皮埃蒙特征募的步兵,而热那亚人却希望整个舰队在维基奥港[234]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演习。这一点他们没有成功。弗兰塞斯·德·阿拉瓦11月20日从阿尔勒寄发的信说,如果热那亚人在冬季到来之前还没有平息叛乱,最好是像法国方面已经向他建议的那样同叛乱者谈判和解。[235]但是,热那亚却不同意这样做。菲利普二世在他那方面拒绝了法国的调停。[236]

于是冬天来到,战争继续。外援不仅再度从法国(不一定得到国王和王后同意)而且也从里窝那源源不绝来到岛上[237]。满载军火和金钱的三桅战船从里窝那开出[238]。萨姆皮罗甚至和教皇暗中往来联系[239]。对热那亚人来说,战争的形势于是恶化[240]。20艘帆桨战船和西班牙士兵由胡安·安德烈·多里亚率领一直进抵巴斯蒂亚。[241]这些舰船和兵员足以使局势改观吗?恶劣的天气不仅妨碍海

上行动（12月14日东·加西亚只能离开热那里25里[242]），还妨碍了陆上行动。11月25日，人们获悉：远征军从巴斯蒂亚出发前往援救被包围的科尔泰，因天气恶劣以及瘟疫猖獗为害，部队大量减员，不得不折回……这次退却并没有因为安德烈·多里亚将近12月中兵不血刃，攻占维基奥港或者攻占巴拉涅的某个村子，而得到很好的补偿……热那亚人沦落到只能掌握控制海岸上和内陆的几个据点的地步。海岛的其余部分都逐渐叛离。热那亚的士兵聚集在驻防地里，受瘟疫和恶劣的供应之苦甚于受敌人之苦。

欧洲的平静

萨姆皮罗的叛乱历时长久，但局限在一个岛屿之内，总的说来，对欧洲的生活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这一点必须加以强调，因为西班牙世界之所以能够喘一口气，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重振颓局，乃是因为它在利用在土耳其前线出现的和平安宁的同时，也利用了它和欧洲之间的休战。总的说来，这种休战也许只不过是查理五世进行的各次令人筋疲力尽的战争产生的后果而已。从1552年到1559年，这些战争耗尽欧洲各国当时的全部资源，而且消耗量日益增大。因此，在西班牙、法国，并且影响所及，在整个欧洲，财政都陷于崩溃的境地。由此导致欧洲这个世界的大规模的战争暂时中止。多年以来，这个世界是这种大规模的战争选定的场地。

然后，查理五世帝国的分崩离析带来了相对的平静。费迪南分子统治下的德意志恢复了它的自治。欧洲因而忘记了它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全球王朝的恐惧。西班牙帝国主义当时还不构成一种威

胁。一直到将近1580年，这个帝国主义都不存在。因此，继各次大战而来的是从未经使用的精力中吸取养料的地方性争端。在法国，使这个王国饱受苦难的内部冲突和军队的复员，与比在本世纪初更加贫困的、王朝在意大利不再使用的小贵族阶级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状态有密切关系。

只有一场重大的冲突在卡托—康布雷锡条约期满后仍然持续。这场冲突就是瓦卢瓦家族的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这是一场至少可以溯源到1558年，溯源到法国王太子的婚事的旧争吵。法国政府对外的注意力大大远离地中海，转而朝向北欧。但是，这两个敌人都碍于自己国内的政治动乱和宗教动乱，不大能够真正大动干戈，而特别易于在罗马教廷或者是菲利普二世面前互相指责、辱骂。菲利普二世使事情长期拖延不决，不表态赞助任何一方，把维持北欧的这场来得正好的争吵视为自己取得和平安宁的手段。我们如果继续深入探究这种背信弃义的[243]和纯属国是的（虽然它归根结蒂在政治上是目光短浅的）政策，就会远离我们的本题。法国没有从这种政策中得到任何好处。但是，西班牙这样行事，却拯救了或者有助于拯救伊丽莎白的十分弱小的英国。菲利普二世能够预见到它成长壮大得如此之快吗？

在菲利普二世看来，遏止法国对西班牙的和平安宁来说乃是当务之急。当时，这是容易完成的任务。因为，1560年已经开始了卡特琳·德·梅迪奇的统治，而且动乱突然很快发生。对坚持保护他所属各个邦国使之不受新教传染的菲利普二世来说，这是一个提供军队的时机。提供军队这个行动，使他得以长期控制这个邻接西班牙的王国。他甚至还认为，根据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的优良传统和

这个世纪的整个外交界的习惯，他亲自在法国用钱收买一些法国人的合作、一些同盟者，是有用的、有价值的。

西班牙人就这样被引导同安托万·德·波旁进行长期谈判。在谈判中谁在欺骗对方呢？如果这份档案资料不再把我们引回地中海——首先是引向撒丁，然后又引向突尼斯——的话，我们就不设法再去打开、翻阅它了。

1561年，当安托万·德·波旁因拥有王国摄政官的头衔而可能更主要是在表面上而不是在实际上占有优越的地位后，谈判马上就开始了。[244]被西班牙称为"旺多姆先生"的这个人，事实上就是纳瓦尔国王。这个纳瓦尔在西班牙的那一部分正被菲利普非法占领。收复位于比利牛斯山彼侧的领土，至少在那里进行阴谋活动、煽起叛乱[245]、越过比利牛斯山的屏障插手西班牙的事务，进行这种种活动的诱惑自1551年以来，即自被西班牙征服以来，没有一个纳瓦尔国王能够抵抗得住，甚至以后的亨利四世也是这样。然而，也可能存在另外一种政策：如果不能收复西班牙所属的纳瓦尔，就争取得到另外一项补偿。旺多姆先生大胆进行这种活动。他要求得到撒丁王国，并且让他的这项要求远到罗马都为人所知。[246]他的一个以贝尔默若这个名字或者以韦尔默若这个名字在西班牙的文件上出现的代理人（因为保密的缘故这只是个假名），1562年1月在马德里受到鲁伊·戈梅兹和阿尔贝公爵的接见[247]。他们都对安托万·德·波旁的效劳和他明显地倾向异端分子十分不满。这两位大臣把希望寄托在上述"旺多姆"的野心上，向贝尔默若提出要他的主人接受突尼斯王国。他们还允诺以后帮助他的主人征服这个国家。但是，这个代理人却问道：这个王国究竟有些什么？阿尔贝公爵宣称："我对

他说，没有人能够比我更好地向他提供情况，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已经对这个王国有意了……并且特别对我详细地谈到这个王国。"接着是对突尼斯王国的田园牧歌似的描写：这个王国享有盛誉，以致"很少人不知道它"；它是从地中海东岸地区运往地中海西岸地区和从地中海西岸地区运往地中海东岸地区的货物的转运站；它土地肥沃，盛产小麦、油料、羊毛、牲畜；它有一系列良好的、易于防守的港口，没有任何与贫穷的撒丁王国类似之处；况且撒丁王国有它自己的法律，国王不能凭恃一己的权威把它让与别人。

我们不知道纳瓦尔国王怎样接受了这个诱人的建议。相反，我们知道卡特琳对波旁家族和西班牙之间的谈判，对1562年9月在热那亚广泛流传的撒丁王国将被割让的传闻感到关切和不安。[248]菲格罗阿9日写道："在这个城市传来了 D. J. 德·门多萨已经占领撒丁并将奉您的命令把它转交给旺多姆先生的消息。看来，这个消息在这里不值得相信。"谈判突然中断。旺多姆先生在鲁昂城下受伤，有可能因伤势太重丧命。菲利普二世很快就被告知"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都认为旺多姆先生毫无恢复健康的希望。"[249]他于是教人事先拟好唁函，在信上留下填写日期的空白。

这是一起无关紧要的小事件，但它表明法国受到外交界人士(这些人士高度警惕，花言巧语，行动稍慢；他们如果不需付出代价就会玩弄权谋、行事不择手段；他们骄傲自大、重视礼仪；他们即使并不像他们自己想象的那样办事有效，却始终十分活跃)的密切注视，因为如果说欧洲不再沉重地压在西班牙帝国身上，不再成为它的沉重的负担的话，难道全部功劳都归于鲁伊·戈梅兹的积极活动或者归于阿尔贝公爵的精明狡猾吗？这难道正如利摩日主教所写

的那样，是因为人们可以不时让法国人“把嘴放在水里”吗？这难道是因为菲利普二世是大部分王位都属于孩子或者落到毫无经验的女人手中的欧洲的唯一的成年君主吗？这难道不是因为这个欧洲感到疲惫不堪吗？这个事实是肯定无疑的：西班牙的处境和土耳其的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土耳其被一场远离地中海海岸的战争缠身，无暇他顾；西班牙则行动自由，既不受欧洲阻碍，也不受欧洲困扰，至少目前是如此。西班牙懂得利用这个大好时机。

几个关于西班牙的海上复兴的数字

用统计数字来示明16世纪海军军备的真实状况是极其困难的。首先，应该把什么船计算在内呢？除了帆桨战船、荷兰圆头帆船、低舷长形船之外，还应该把由圆船组成的辅助船队计算在内。这些圆船是供应船只，情况需要时还是作战船只，因为它们装备有大炮。1563年末，1564年初，西班牙政府征用了100来艘属于比斯开和坎塔布连地区的小渔船和双桅船。双桅船是一种重70吨、配备有志愿划桨手和大炮的小船。上述辅助舰队当时在加泰罗尼亚由阿尔瓦罗·德·巴桑组建。剩下还需要了解的是：这支舰队在什么条件下组建，组建目的何在。这些专门为航海设计的小吨位船只，似乎只是作为运输船只卷入地中海的斗争。西班牙的战略决策人物不了解这些大西洋的轻型帆船当时具有什么价值，后来又具有什么价值。

如果紧紧扣住作战舰船这个范围，那么除了帆桨战船这种强大的船只外，还必须算上小型帆桨战船、低舷长形船和荷兰圆头帆船。不错，主要是柏柏尔海上行劫者使用这些小船。归根结蒂，主要

的困难来自这个事实：菲利普二世的舰队实际上是各支不同的舰队的结合体，是4支分舰队的联合体。这4支分舰队是：西班牙分舰队、那不勒斯分舰队、西西里分舰队和西班牙雇佣的热那亚的帆桨战船队（主要是让·安德烈·多里亚的舰船），有时还加上摩纳哥、萨瓦、托斯卡纳和马耳他骑士团的帆桨战船。这就使我们的计算十分困难了。

为了估计西班牙的军备武装，我们已经试图对在从1560年到1564年这段时期的每一年，在墨西拿或者在别处集结，但主要在墨西拿集结的帆桨战船的数目作了估算。实际上这等于清点被动员的舰队的数目。

1560年，即进行杰尔巴战役的这一年，基督教世界的舰队拥有战舰154艘，其中包括帆桨战船47艘和荷兰圆头帆船4艘，[250]即帆桨战船的数目和其他各种战舰数目为1∶3。除了这47艘帆桨战船之外，还应该加上需要用来负责海岸防务，没有参加征伐的西班牙舰队以及十来艘马耳他骑士团的、托斯卡纳的、热那亚的和萨瓦的帆桨战船。国王在考虑援救杰尔巴要塞时所采取的措施，使我们能够计算出这些后备力量来。1560年6月8日，菲利普二世[251]计算他能够集中的帆桨战船，认为这些帆桨战船可能多达64艘。[252]这个数字可以认为是准确的。但是，它显然包括已经逃离杰尔巴的20艘帆桨战船。因此，如果我们把另外44艘加进进行远征的47艘里，就共有91艘，我们就知道在卡托—康布雷锡条约签订以后西班牙能够直接或者间接依靠的战船的总数。这是一个巨大数字，但是，杰尔巴战役的灾难使它减为64艘。这种大幅度的减少特别因为失去的舰船中的大部分增加了敌方舰船的数量而后果更为严重。1562年运载

阿尔及尔的哈桑帕夏的大型帆桨战船，就是杰尔巴战役的部分战利品。

意大利海军造船部门的反应是迅速敏捷的。西西里决定征收新税来制造舰船。[253]10月9日，[254]在那不勒斯和杰尔巴两次战役中丧失的6艘帆桨战船得到替补。唯一严重的困难是收罗划桨囚犯这个问题。在同一个时期，科西默·德·梅迪奇和萨伏依公爵一样，加强他的海上努力。菲格罗阿1560年7月的信指出，菲利普二世能在热那亚港租用一些帆桨战船。[255]让·安德烈·多里亚则重新组建了他的舰队，并于1561年1月向圣菲奥尔红衣主教购买了帆桨战船两艘。[256]

进行武装首先意味着筹集钱款。对菲利普二世来说，这是在已经给他的圣战税之外再向罗马方面要求“补助”的时机。[257]1561年1月，他得到这笔补助。补助期限为5年；补助款额为每年30万金杜卡托。[258]他觉得这笔钱款不够。1562年4月经过多次谈判，教皇庇护四世出于好心把补助额增加到42万杜卡托，补助期限由5年改为10年（这引起了西班牙教士的强烈抗议）并从1560年起有追溯效力。[259]根据保罗·蒂耶波洛的估计，菲利普二世因为有这笔补助和圣战税，1563年就获得75万杜卡托，教廷准许在西班牙国内和国外征收的其他捐税还不计算在内。根据1565年罗马的备忘录，这些捐税的数额每年为197万杜卡托。[260]

钱款问题解决后，还剩下技术问题。菲利普二世拥有除普罗旺斯的造船厂之外的西欧所有的造船厂和造船的劳动力。但是，至少在1561年，他并没有对这项任务予以应有的关怀重视。西班牙教会的钱不是无法马上自由使用，就是被用来填补西班牙预算的巨大

漏洞。国王和他的顾问特别不愿意承担意大利的“专制君主们”进行的重新武装所需的费用。进行武装，这自然是为了基督教世界的利益和保卫这个世界。从那时起，“专制君主们”作出和西班牙的努力相同的努力以及牺牲，并负担自己的费用。这是公平合理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561年3月，[261]西班牙政府要求葡萄牙的帆桨战船援助，以对抗柏柏尔的海上行劫者。当4月1日西班牙政府派遣拉·法瓦拉侯爵前往意大利负责就它的同盟者的所有帆桨战船的动员会合问题进行谈判时，这位侯爵特别注意明确指出，他的政府不愿意租用帆桨战船。西班牙要求皮翁比诺爵爷、热那亚共和国、萨瓦公爵、曼图亚公爵和公爵夫人以及佛罗伦萨公爵惠予援助，它提出的理由是：它现在只剩有很少几艘帆桨战船；正在它下属的各个王国建造的战船目前还不能使用。[262]热那亚驻西班牙大使的一封信指出，在所有表示愿意提供租用的帆桨战船的人中，只同马尔科·琴图廖内签订了合同。合同规定1562年这一年提供帆桨战船4艘或5艘。[263]但是，让·安德烈·多里亚这个帆桨战船的主要出租人收到了应于10月的集市上付给他的10万克朗。这笔钱是因他补足船上的装备而应该付给他的13万克朗中的一部分。[264]如果考虑到船舶下水十分缓慢，新造的帆桨战船要进行装备，继而再考虑到6月份7艘西西里帆桨战船因被德拉库特掳获而丧失[265]，那么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1561年，西班牙舰队没有弥补上年的损失。梅尔菲亲王进行他的秋季战役只调集了55艘帆桨战船。[266]

直到1561年末，西班牙才开始作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后来竟使巴塞罗那的海军造船厂得以恢复生产。邻国对西班牙的这种种活动都极为惶恐不安，以致卡特琳·德·梅迪奇派遣多藏斯先生

肩负特别使命前去他的女婿那里。此行的唯一目的是清除可能产生的误会[267]。这件事发生于12月份。同年冬季，若热斯公爵奉国王的特别命令，让他的部队向西班牙边境进发。他写道：虽然我丝毫不相信这些边境上有什么危险。真实的情况是，“两个月以来，上述西班牙国王下令巴塞罗那海军造船厂加紧生产以造好几艘帆桨战船和另外一些海船。正如他现在仍然在下令一样，他还下令生产大量饼干。普遍流传，这是为了在今年夏季远征阿尔及尔。大人，我知道，西班牙国王的确被他的全体百姓苦苦恳求在阿尔及尔作战，因为上述阿尔及尔人的国王现在仍然统治着西班牙人，因为西班牙人经由海洋从事贸易活动要冒很大的风险”。[268]1个月以后，1562年1月17日，利摩日主教提供了类似的关于这些帆桨战船的详情细节：“到处都在制造这些帆桨战船；到处都在为这些舰船进行准备，在加泰罗尼亚和邻近的王国砍伐了4,000多棵杉树以满足造船的需要，这里姑且还不谈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制造的帆桨战船；从日内瓦聘请来了造船师傅和工人。还有些来自我们的普罗旺斯。”[269]

然而，造船工程进展缓慢。砍伐的木材在干燥以前不能使用。因此，这项工程无法立竿见影。菲利普二世这一年和以前一样，不想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动员西地中海的所有能够立即使用的舰船。一份1562年6月14日的官方文件规定的供最高统帅部支配使用的舰船不到56艘：32艘在D.胡安·德·门多萨的指挥下作战；24艘在多里亚的指挥下作战。[270]然而，详细的统计表表明，西西里、教皇、托斯卡纳、热那亚以及最后诸如摩纳哥公爵、皮翁比诺爵爷等人的帆桨战船没有参加这支船队。提供这些未被使用的帆桨战船的准确数字是困难的。从前几年的统计材料看，可以设想，这个数字是

在20和30之间。因此，西班牙在地中海的总的武装力量可能为80艘到90艘帆桨战船。如果说杰尔巴战役的损失得到弥补的话，也只不过是刚好得到弥补而已。这个损失刚刚弥补，又突然降临了埃拉杜拉的新灾难，丧失了25艘帆桨战船。西班牙的武装又回降到它长期以来从未降到过的水平。整整一年的努力的成果突然化为乌有。

重病要用重药医。1562年12月12日，菲利普二世在马德里召开卡斯蒂利亚国会。在国会的开幕式上宣读的“提议”——切萨雷奥·F.杜罗指出，今天人们称这种“提议”为君主演说——陈述了在地中海和在大西洋两方面建立一支大型舰队的种种理由。[271]可以猜出这项建议的结论：要求征税。

这些措施涉及并影响到前途。1563年，新船的制造只能部分弥补西班牙舰队遭受的损失。当作战季节来临时，菲利普二世再次向他在意大利的所有同盟者：萨瓦公爵、热那亚共和国、佛罗伦萨公爵等发出呼吁。3月8日，他认为他已经拥有帆桨战船70艘。[272]和1560年一样，他把这些舰船的一半派往西班牙，把另外一半派往意大利。他的全部计划都被奥兰之围打乱。他大费周张才派出34艘帆桨战船前去拯救被围困的守备部队。这是因为在可以调动来进行国外远征的帆桨战船的数量和舰队船舰编制总数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差数，而之所以有这个差数又是因为一定数量的舰船要留作保卫海岸之用。

直到1564年，国王才见到他的这些努力的成果。9月份，东·加西亚·德·托莱多能够在西班牙海岸和非洲海岸之间调集90艘到102艘帆桨战船（这里只引用当时的人提供的最大数字）。即使是90艘，这也是个大跃进。不错，西班牙舰队的新首领对他收到的关于

土耳其人的情报深信不疑，大胆决定把全部可以使用的帆桨战船调集到海的西部的单独一点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预备队或者海岸卫队。萨姆皮罗·科尔索的登陆（这是巧合吗？）在这支向西进发的庞大的舰队驶离后留下的空空荡荡的后方进行。这一次国王毫不犹豫地向他的各个同盟者呼吁，请求他们给予各种有偿的或者无偿的援助。这也确有其事，因为贝莱斯的舰队不是西班牙国王的舰队，是除法国以外的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舰队。这支舰队除其他舰船之外，还包括萨伏依公爵的帆桨战船10艘、佛罗伦萨公爵的帆桨战船7艘、葡萄牙的帆桨战船8艘。[273]如果再加上雇佣的船只，就总共约有30艘“同盟者的”帆船伴随菲利普二世的帆船驶行。

然而，一些新造舰船已经离开船厂。那不勒斯的小舰队1月份由正在服役的帆桨战船4艘、下水后尚待装备的帆桨战船两艘、已在海军造船厂造好的帆桨战船两艘和正在制造中的4艘组成。[274]这支小舰队6月份包括正在服役的帆桨战船11艘[275]（第12艘仅缺划桨犯人）。[276]另外下水4艘；4艘正在制造中。加在一起总共有20艘，其中11艘服役。经过缓慢的准备后，工作似乎进展得相当快速。1564年末，西班牙海军造船厂开足马力生产。巴塞罗那的海军造船厂受到加泰罗尼亚前总督东·加西亚的特别关怀和照顾，其首批成果令人鼓舞。尽管遭到损失，但1559年的舰船、兵员总额不但达到，而且超过。

东·加西亚·德·托莱多

这种有益的反应是执行一项自觉的、连贯的、表明菲利普二世对他在地中海

的利益和责任高瞻远瞩的政策的结果吗?也许这仅仅是迫在眉睫的危险、杰尔巴战役和一系列不幸的偶然事件迫使菲利普二世作出他先前没有想到要作的努力。他似乎满足于,并且长期满足于进行从1561年到1564年这段时期中的小规模战争,而不去冒大风险,去大量耗费。他的身上没有能够酝酿制订一项真正的十字军东征政策的思想和狂热的激情。他朝向东方的视野,没有超过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海岸。甚至可能就在1564年,当那时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马克西米利安在君士坦丁堡就因费迪南之死而发生问题的1562年的停战协定的延长进行谈判时,菲利普二世就同1558年一样,试图参加这项谈判。在这方面,哈默提到保存在维也纳的文献资料中的“代理大使”,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驻君士坦丁堡的代理人阿尔伯特·维斯1564年12月22日的一份报告。[277]

因此,在东·加西亚·德·托莱多的背后,并没有任何既定政策,也没有任何能在几年后即使不能创造奥地利的唐·胡安的光荣,至少也能使这种光荣成为可能的条件。东·加西亚·德·托莱多可能缺乏唐·胡安的青春活力和气质大量赋予唐·胡安的那种东西——对冒险的爱好。1564年,东·加西亚年迈力衰,备受痛风和风湿病的折磨,然而,却是他整顿了西班牙舰队并使之成为有效而强大的工具。

以铁腕统治王国并且曾经大大促使王国首都美化的那不勒斯的杰出的总督 D. 佩德罗·德·托莱多的儿子东·加西亚·德·托莱多,似乎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威势的观念和大张旗鼓行事的思想。他的长兄死时,他是维拉弗朗卡侯爵。那时,即1539年,他已经开始率领自己的两艘帆桨战船在多里亚亲王麾下效劳。他21岁被任命

为那不勒斯分舰队司令。这个职位是给予他父亲的恩典。但是，这种恩典过早地给他带来沉重的负担。他在希腊、尼斯，当进行锡耶纳战役期间，他还在科西嘉，积极从事反对突尼斯、阿尔及尔、斯法克斯、克利比亚和梅赫迪亚等的活动。由于健康原因——至少他自己这样提出——1558年4月25日他放弃了他的职务，之后他被任命为加泰罗尼亚和鲁西永的总督和大统领。1560年那次警报之后，他在这里收到1564年2月10日发出的指派他为海军大统领的任命。[278]在这场警报中有关领导曾经打算把舰队和西西里王国交给他管理。同年10月7日，[279]根据他自己提出的要求，并且为了奖赏佩农之战的胜利，他被任命为西西里总督。他就这样让他想使之变为海军造船厂和仓库的岛屿附属于他的海军司令部。

人们根据他的这一行动认为他是个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人物。他知道他所效之劳的价值何在(他写道[280]:“我为了报效国王而战”)。他感觉自己在很好地效劳，因此敢于明确提出要求并且坦率陈述意见。1564年8月17日，他在担任司令职务之初积极效力，精忠报国，从马拉加写信给埃拉索说:“既无法描述，也无法想象我所发现的舰队的现状。”与此同时，他在致国王的信中写道:“如果希望我很好地履行我的职责并且保护陛下的财源的话，鉴于陛下的这支舰队当前的状况，我必须严格对待。我深知，我会因为不得人心而得不到任何好处。但是，我坦率地说，我不能对在属于我管辖范围之内的贪污盗窃、管理混乱等现象熟视无睹。”[281]

他在书信往来中显得忠诚正直、要求严格[282]、目光远大、有条不紊。而且他还是个思维清晰、观察敏锐、精于谋略的人。1564年12月14日[283]，他在从加埃塔写给菲利普二世的信中巧妙地提出西班

牙和教廷的关系问题。当加西亚和教皇会谈时，教皇庇护四世东拉西扯，把问题搅混，再次抱怨西班牙人，抱怨菲利普二世向他派去的人，抱怨这些人对他使用的言词，抱怨卢纳伯爵和瓦尔加斯伯爵，抱怨国王对主教会议的态度。在整整四小时内，东·加西亚只是侧耳倾听，对这些抱怨不作任何答复，也不提他所负的使命的目的。两天以后，雷雨过去，他开始陈述过去那一年海军取得的成果。教皇不无意图地回答说，他终于看到他长期以来给予的补助产生的效果，感到高兴。他的对话者于是把话题转向技术方面。这位对话者说，一支舰队非一朝一日所能建成，前几年的不间断的工作只有这一年大规模的集结才能使之显现出来。但是，教皇是个无法说服的人，他除了谈远征阿尔及尔的事外，对别的事全都只字不提。相比之下，在教皇眼里佩农·德·韦莱又有什么价值呢？当我们知道教皇的这些意愿、这些要求的时候，我们过去引证的菲利普二世的这句话："教皇正在注视着呢！"的含义，现在清楚起来了。我们自然而然会把这句话译为"教皇监视着我们"。教皇注视着西班牙，他的目光里没有任何善意的东西……

3. 马耳他：力量的考验（1564年5月18—9月8日）

马耳他——这里我们指的是1565年5月土耳其舰队突然抵达马耳他这个行动——像一场风暴那样袭击了欧洲。我这样说，毫无耸人听闻、虚假浮夸之意。但是，这场风暴——这个因其后果而成了这个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的事件——只是部分地使有关政府感

到吃惊。素丹怎样竟能武装、完善它这部庞大的战争机器而使消息不传到欧洲呢？从1564年末起，在关于土耳其的消息一贯灵通的维也纳，马克西米利安就对威尼斯大使说，一支庞大的舰队将在不久以后驶出君士坦丁堡港。菲利普二世进行武装、准备舰船。但是，难道塞浦路斯就没有危险吗？[284]预测的游戏已经开始了……

发生过突然袭击吗？

1月初，东·加西亚致函国王说[285]，在4月以前，即在土耳其人到达以前，把科西嘉问题处理完毕至关重要。必须在西方不受拘束、确保无虞，才能腾出手来在东方更好地抵抗一次人们很快就了解到的十分严重的进攻。1月20日，佩特雷摩尔从君士坦丁堡写信给卡特琳·德·梅迪奇说，很可能土耳其舰队将进攻马耳他。但是，这只不过是传闻而已。更多的关于这件事的情况他就不了解了。[286]每当人们考虑到土耳其的进攻时，马耳他这个名字就自然而然出现在脑海里。1月底，东·加西亚·德·托莱多考虑前去马耳他和拉古莱特。这两处要塞连同西西里(西西里过于广阔不会受到严重威胁)，是基督教世界面对东方的防御据点，是土耳其必然进攻的防御据点。

整个冬季，然后又在春季，令人惊恐不安的传闻接二连三传来。根据2月10日的公文急报：[287]土耳其的海军造船厂开足马力，积极生产；4月中，140艘帆桨战船、10艘大型帆船(或者大型威尼斯帆桨大木船)、20艘圆船和15艘土耳其大帆船，肯定将装备完毕供作战之用……同这些警报相比，阿尔瓦罗·德·巴桑率领西班牙帆桨战船在得土安河河口弄沉一些船只，成功地堵塞了这条河[288]，或者

海上行劫者抢走3艘从马拉加出发的船只并根据习惯提出以法尔孔海角为赎回这些船只的地点[289]等情况都无关紧要了。即使是轰动一时、耸人听闻的巴约讷会晤，也不能转移人们的注意力。[290]新完成的军备（在巴塞罗那下水的10艘帆桨战船和在马拉加下水的3艘荷兰圆头帆船）[291]也不足以使人心安定。因为使人感到焦虑不安的现实，是这样一个每天都得到证实的确实可靠的事实：这支即将开到的舰队是强大的；它还会得到地中海东岸地区和地中海西岸地区的海上行劫船的增援。可能正如哈埃多所说，早在1564年冬季，哈桑帕夏就已经在阿尔及尔被告知要对马耳他发动进攻。所有的收听哨——君士坦丁堡的收听哨以及离本土更近的，例如科孚的和拉古萨的收听哨——搜集到的情报的内容是一致的。一则4月8日发自拉古萨的公文急报说，皮亚利帕夏的首批20艘帆桨战船已于3月20日驶出海峡；[292]又说，公众谣传马耳他是土耳其远征的目标。但是，还不能肯定任何传闻确实可靠。[293]

西班牙政府担心拉古莱特遭到进攻。[294]3月22日，当局采取了措施在西班牙征募步兵4,000名，其中半数派往科西嘉，半数充作帆桨战船上的步兵。菲利普二世再三发出警告。4月7日，他写信给塞维利亚的隐修院院长和行政官说[295]：“土耳其舰队今后到来时，它拥有的帆桨战船将比往年多。”他告诉他们下达给阿尔瓦罗·德·巴桑的命令：前往卡塔赫纳装运开往科西嘉的西班牙军队，然后返回马略卡，在该地继续担任警卫以防海上行劫者进攻。4月8日，那不勒斯总督鉴于威胁十分严重，考虑征募1万名到1.2万名士兵，并亲自前往阿普利亚。[296]但是，关于土耳其正在佛罗伦萨公爵的帮助下计划进攻皮翁比诺的传闻，他并不相信。[297]

在有惯常的时差的情况下，西方开始获悉土耳其舰队推进的情况：4月17日，40艘帆桨战船抵达内格勒蓬特；19日，30艘帆桨战船在该地与上述40艘帆桨战船会合；舰队还剩下的舰船，即150艘帆船在希俄斯岛。[298]因此，这些舰船花了两周时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花得更多）才抵达希腊群岛。它们在途中补足了供应给养（特别是饼干）并且装载了一些部队。德拉库特坚持要舰队尽早出海，可能还要求这支舰队应该拥有帆桨战船50艘以阻止菲利普二世的舰队集中。在科孚，风闻土耳其舰队驶向马耳他。但是，情报员谨慎小心，不轻信这个传闻。他写道："鉴于这支舰队所进行的准备工作，人们认为，它肯定驶向拉古莱特。"[299]5月，这支舰队抵达纳瓦林[300]，18日开到马耳他。[301]

土耳其舰队再次全速航行，以便从突然袭击中得到最大的好处。17日，卡洛斯·德·阿拉贡通过特别信使匆忙从锡拉库萨写给东·加西亚·德·托莱多一封短信："今晨1时，卡西比尔的守备部队鸣炮30响。它打炮如此之多，我担心一定是土耳其舰队出现。"[302]这个消息不久就得到证实。17日，土耳其舰队在帕塞罗海岬附近海域被"发现"。22日，那不勒斯总督在一封附有东·加西亚提供的详细报导的信中向国王报告了这一情况。[303]6月6日，国王收到这首批准确的情报。[304]

防务负责人、西班牙人和骑士团团长，虽然早就被警告会有危险发生，但事件发展之快仍然使他们大吃一惊。骑士团团长尤其如此。他过去犹豫不决，迟迟不肯花钱，不愿在马耳他岛上进行必要的拆修工作。粮食和援军的运输发生延误。马耳他骑士团的5艘战备状态极佳的帆桨战船被封锁在港内，无法对基督教的舰队提供

任何援助。[305]

骑士团的抵抗

但是，骑士团团长让·德·拉·瓦莱特·帕里索特和他率领的骑士英勇自卫，令人钦佩。他们的勇敢拯救了一切。

土耳其舰队5月18日抵达这个岛屿前面的海域后，立即使用位于东南海岸边的宽大的马尔萨·西罗科港湾。这是马耳他的仅次于马尔萨·穆塞特海湾的最优良的抛锚停泊场地之一。它后来充当拉瓦莱特的海港。在18日和19日之间的夜晚，这支舰队让3,000人登陆，第二天又让2万人登陆。敌军铺天盖地而来，轻而易举就占领了这个岛屿。骑士们只剩下圣埃尔姆的小堡垒。这个堡垒居高临下，俯瞰马尔萨·穆塞特的入口、老城—布尔（这是一个宽阔的设防营地）以及圣米歇尔和圣昂热的强固堡垒。土耳其人考虑到海上的种种情况，5月24日首先包围这些堡垒中的最弱小的圣埃尔姆，企图通过攻占这个堡垒完全控制住港口。5月31日开始大炮轰击。但是，防御工事经过极端猛烈的炮轰后，6月23日才被攻拔。保卫者无一人逃脱。然而，他们顽强的抵抗拯救了马耳他。这次抵抗使这个岛屿得到准备击退敌军进攻和修完骑士团的建筑师M.埃万杰利斯塔所设计的布尔和圣米歇尔的防御工事必不可少的时间。这次抵抗也使西班牙人弥补了他们过去行动的迟缓。只是一些偶然发生的情况妨碍了西西里的帆桨战船的司令胡安·德·卡尔多纳在圣埃尔姆陷落之前把援助带到马耳他。他率领的1支由600人组成的小分遣队6月30日及时登陆并到达老城。这证明包围部队并没有完全

控制住陆地和海洋。

圣埃尔姆被攻占后,土耳其人把他们的陆、海两方面的兵力集中起来进攻宽大的但部分是临时构筑的圣米歇尔的防御工事。炮击、冲锋、埋设地雷、用舰船进攻,真是无计不施。但到最后,仍然什么办法都不能制服防守者。由于8月7日骑士团团长亲自参战,骑兵从老城出击,阵地最后几乎奇迹般地得救。这支骑兵向土耳其人的后方猛扑,引起一片惊惶。一个月后,9月7日,土耳其军队没有获得丝毫进展。反复不停的进攻使土耳其军队遭到大量伤亡。瘟疫甚至粮食短缺也使土耳其军队严重减员。援军和粮食都没有从君士坦丁堡运来。被包围者和包围者实际上都同样被弄得精疲力尽。这时,东·加西亚·德·托莱多进行干预。

援救马耳他

历史学家指责东·加西亚行动迟缓。但是,他们合情合理地考虑过他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环境吗?丧失马耳他对基督教世界来说无疑会是个灾难。[306]但是,丧失刚刚重新组建的西班牙舰队,就是把自己暴露于无法逃脱的危险之下。[307]另一方面,当西地中海和东地中海对抗时,我们不要忘记后者比前者更利于航行。我们不要忘记,对西班牙舰队的集中来说,利翁湾是一个比岛屿星罗棋布的爱琴海更加难于克服的障碍。在不利于舰队迅速集中的各种事物中,不仅仅有空间和距离,还有西地中海上的治安、运输、供应等方面的多种任务。这个西地中海处处都同时受到海上行劫者的威胁。必须在热那亚、里窝那和契维塔韦基亚等地装载粮食、钱款和军队。最后还有科西嘉。那里的叛乱之火一直

在熊熊燃烧并不断蔓延。

让我们根据西班牙舰队在阿尔瓦罗·德·巴桑的率领下所作的航行[308]来估计这种种困难吧！5月初，这支小舰队在马拉加。它在该地装载大炮和军火运往奥兰。之后，它从奥兰返回卡塔赫纳。它的19艘帆桨战船和两艘大帆船在卡塔赫纳载上运往米尔斯卡比尔的1,500名士兵。6月27日，它才到达巴塞罗那。它7月6日到达热那亚，[309]21日到达那不勒斯。上述港口每个都有些琐碎事务滞留它。让我们想象一下在西地中海的上千次类似的航运来往：运载征集的兵员、运载苦役囚犯、装货上运输船、发送钱款经费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上次调集远征佩农的舰队要等到1564年8、9月份。这一年也无法早些集中。6月25日，即圣埃尔姆堡垒陷落两天后，东·加西亚只拥有帆桨战船25艘。8月底，他有100来艘，好坏参半。在这些条件下，他按兵不动、坐待时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他不用分散使用兵力的方式让他的舰队去冒险，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几乎全部舰船都开到墨西拿后，8月初在该地[310]就应该如何使用这些舰船的问题举行了一次作战会议。胆大的人建议用60艘加强的帆桨战船运送救援部队。审慎的人和专家等人们所说的“实际的水手”，建议前往锡拉库萨，在该地等待事态发展。10天以后，由于让·安德烈·多里亚到来，东·加西亚的舰队最后得以补足。于是，东·加西亚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突然决定把一支登陆部队连同他的加强的帆桨战船投向海岛。8月26日，救援舰队驶离西西里。恶劣的天气使舰队偏航到岛的西海角，一直到法维尼亚纳。舰队从那里抵达特拉帕尼。1,000来名士兵在那里乘机潜逃。接着，一股顺风把舰队带回兰佩杜萨，最后把它带回位于马耳他北部的戈佐岛。舰队出发时，

突然袭击它的那场短暂的暴雨已经非常及时地使马耳他的“海峡”的船只全部驶离。但是,对基督教国家的帆桨战船来说,不可能及时在戈佐岛周围的海域会合。因此,东·加西亚不再坚持于9月5日返回西西里。这次失败的出航使他在历史学家对他作出不公正的评价之前就已经受到责备、轻蔑和嘲笑。但是,从第二天起,由于胡安·安德烈·多里亚的明确的干预,舰队再次出航。7日夜间,它驶过把戈佐岛和马耳他分开的那道海峡,并且在相当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驶抵弗留利海湾附近。东·加西亚想避免一次夜间登陆的危险,下令等待到天明。这次登陆进行得有条不紊,一个半小时内在梅利夏海滩上完成。然后,船队返回西西里。

登陆部队由阿尔瓦罗·德·桑德和阿斯卡尼奥·德·拉·科尔纳指挥,先缓缓推进。因为没有牲口驮重,士兵必须背着行李。行李成了部队的累赘。部队历尽艰辛抵达老城周围,然后在城墙外的大仓库里住下。应该继续推进吗?骑士团团长认为不应该,因为土耳其人已经放弃他们的阵地,撤离圣埃尔姆堡垒,再度登船。在这种情况下,上策是不让已受病员拖累的远征部队推进到垃圾成堆、尸横遍野的土耳其军队的阵地以避开瘟疫侵袭的危险。然而,这时土耳其首领从一个投敌的西班牙士兵、一个摩里斯科人那里得到报告,据称基督教登陆部队人数不多(5,000人),于是试图发起反攻。这些土耳其军队的首领让几千名士兵折返登陆,向岛屿内部推进,直抵老城。这些士兵在城内狭窄弯曲的街上被杀。脱险者急忙逃回皮亚利帕夏的归返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帆桨战船。舰队主力则驶往赞特。9月12日,土耳其的最后一艘帆船在马耳他的地平线上消失。在这之前已经率领60艘加强的帆桨战船在墨西拿装载一支新远征军

的加西亚·德·托莱多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让这支部队在锡拉库萨登陆是适当的。这些人在一个已遭破坏、粮食短缺的岛上能有什么作为呢？14日，他率领舰队进入马耳他港以便再装载那不勒斯的和西西里的西班牙步兵，并且迅速驶往地中海东岸地区，希望在敌人后方至少掳获几艘大帆船。23日，他抵达塞里戈，[311]在那里埋伏了将近8天，但因天气恶劣没有达到目的。10月7日，他返回墨西拿。[312]

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开，12日传到那不勒斯，[313]19日传到罗马。[314]10月6日，也可能还更早一些，[315]这个消息使君士坦丁堡一片沮丧，惊恐万状。基督教徒“由于土耳其人向他们扔石块，无法在城里的街道上行走。这些土耳其人全都痛哭失声，有的失去兄弟，有的失去儿子，有的失去丈夫，有的失去朋友。”[316]这时候，西方的基督教徒则因这年年初曾经胆战心惊因而现在更加欢欣鼓舞。迟至1565年9月22日，人们在马德里还不很乐观。[317]大家可以看看一个又名布朗托姆的布尔德勒先生怎样兴高采烈。这个先生同其他很多人到达墨西拿太晚，无法登船前往马耳他。“从现在起今后10万年，西班牙的伟大国王菲利普二世将无愧于他享有的隆名盛誉和对他的颂扬，也将无愧于整个基督教世界在同样长的年月里为他的灵魂得救祈祷，虽然上帝还没有因为他非常卓越地在即将继罗得岛之后陷入敌人手中的马耳他拯救了如此众多的人而给予他一个天堂里的席位。”[318]罗马人这年夏天曾经万分恐惧，现在听到这个关于土耳其帆桨战船败退的消息于是赞颂骑士作战英勇，感谢上帝插手干预，但是，相反，对西班牙没有表示任何谢意。教皇定了调子：既不原谅西班牙延误耽搁，也不原谅自从他登基以来西

班牙人为他制造的种种困难。帕凯科红衣主教得到胜利的消息后，请求教皇接见。这次接见非常令人不愉快。红衣主教提出这是授予国王五一税征收权的大好时机。他写道："我提出这一点好像是用火枪向他开了一枪。"教皇最后说："把五一税给他送去吗？他向我要求的时候，如果他得到，他就是幸运了……"不久以后，教皇在公开谈话中谈到胜利，但对西班牙国王的大统领和他的军队只字不提，把一切都归功于上帝和圣约翰骑士团。[319]他这样做是成功的。

西班牙和菲利普二世扮演的角色

然而，菲利普二世和东·加西亚的功绩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容置疑的。经常把马耳他比拟为塞瓦斯托波尔的朱里昂·德·拉·格拉维埃对这一事件的评价比其他历史学家的评价更加正确。曾经说过"我的包围已经完成"这句话的那个给人好感的修道院长韦尔托特指责东·加西亚为人拘谨，行事缓慢，他却不考虑这种缓慢在计算方面的原因。曼弗罗尼在其所著《意大利海军史》一书中把全部功劳归于意大利人。在他看来西班牙人似乎低于一切，不值一提。这是被历史学家一再重复的早期编年史作者的毫无意义的民族偏见和无稽之谈。

不管怎样，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马耳他的胜利标志着西班牙复兴的新阶段。这种复兴并非偶然取得。1565年，它一直被人积极追求。富克沃作为法国国王的代表这年年底到达马德里。他在11月21日写道[320]，40艘帆桨战船正在巴塞罗那制造，20艘正在那不勒斯制造，12艘正在西西里制造。可能（他又说，这里是纳博讷的总督在说）法国国王被请求准许从卡尔卡索内附近的基朗森林砍伐树木

制作大量“长而尖的木桨”，用以装备巴塞罗那的帆桨战船。菲利普二世所作的巨大努力带动别人也作出努力。因此，佛罗伦萨公爵也着手进行组建一支新舰队。

这是因为人们并没有感觉到土耳其的危险已经因从马耳他的撤退而消除。这年年终这种危险甚至显得更有威胁性。素丹加快了他的舰船制造工作。9月25日，在君士坦丁堡(不错，那里的人还不知道大舰队遭到的失败)已经有人谈到采取新的重大行动，特别是进攻阿普利亚的行动。[321]海军“溃败”的消息正如法国大使所写的那样，只不过更使这些计划充满复仇的愿望而已。尽管木材供应困难，仍然准备在海军造船厂制造舰船100艘。素丹自己甚至提出要制造帆船500艘。10月19日一份公文急报说：“他已经下令5万名划桨手和5万名由帆桨战船运载的士兵必须在明年3月中在安纳托利亚、埃及和希腊等地准备就绪。”马耳他、西西里或者阿普利亚将成为这些武装力量进攻的目标。11月3日，富克沃自马德里来信说，大家担心“如果土耳其素丹不死于他的军队在马耳他被击退这件事所引起的愤怒的话，那么他就会在下一年从海上和陆上作出巨大努力。”[322]11月21日[323]，人们在马德里从来自维也纳的消息得知，下一年素丹将使用他的全部兵力，其中包括土耳其近卫军和他的卫队，进攻菲利普二世。12月12日的公文急报宣称，苏里曼已经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宣战，并将率领20万人马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进攻。[324]此举被人理解为素丹用来反对他周围的顾问的劝谏的一种姿态。西方世界仍然深信土耳其舰队将由1565年的那些首领率领，被派出进攻马耳他，因为如果素丹听任这个岛屿设防，他以后就再也无法占领了。因此，有人认为素丹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将达成协

议……

这些传闻受到西班牙的认真对待。1565年11月5日，菲利普二世下令在拉古莱特设防，他致函菲格罗阿说，他决定为此事所需拨款5.6万杜卡托。[325]既然他要求阿达莫·琴图廖内用签汇票的方式借入这笔钱款，这似乎是个确定不移的决定。在执行这些命令的过程中，在老堡垒的四周开始修建起一个新古莱特(新古莱特面对老拉古莱特)。另一方面，除了阿尔瓦罗·德·巴桑的被召回西班牙的12艘帆桨战船之外，国王让他所有的舰队留在西西里。[326]骑士团团长难道没有威胁说如果他得不到援救就要放弃这个岛屿吗？12月底，西班牙国王援助他5万杜卡托(其中3万杜卡托现款和价值2万杜卡托的粮食和军火)，另外加上步兵6,000名。这至少是托斯卡纳的代理人所提供的情况。[327]1566年1月6日，富克沃报告说，土耳其人只能进攻马耳他或者拉古莱特。如果袭击马耳他，西班牙国王将向该岛派去德意志士兵3,000名、西班牙士兵和意大利士兵5,000名。他们将在圣埃尔姆山上筑垒设防，因为布尔已经无法整修。如果土耳其人进攻拉古莱特，国王将派往该地1.2万人。这些人将在堡垒附近安营扎寨。

然而，这种种措施和努力，其本身无论怎样值得称道，也无法构成一项真正的旨在引导和左右事态发展的进程的政策。马德里有一项反土耳其联盟的含糊不清、空洞无物的计划。据说菲利普二世寻求同威尼斯结成联盟。但这是认真严肃的吗？威尼斯人得知圣埃尔姆攻克时难道没有兴高采烈过吗？[328]他们作为善良的和诚实的商人，把马耳他骑士看成是东西贸易关系中令人扫兴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过把西方发生的事告知土耳其人。因此，当富克沃去

向他的同事威尼斯大使打听情况时，后者立刻让他放心：威尼斯市政会议丝毫无意同西班牙国王结盟……

法国和西班牙的共同政策也是同样的情况，除了空空洞洞的词句之外，别无其他。被大事宣扬的巴约讷会见，并不像当时的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所想的那样标志着历史的转折。在比利牛斯山的法国一侧，是一个动乱不安、备受折磨、已经发生明显叛国事件的王国。在这个国家里，为首的是一个焦急不安的女人和一个孩子国王。这个女人卡特琳·德·梅迪奇着手让他的儿子在整个王国抛头露面，就像人们进行巡回宣传一样。这是一次富有成果的但进行得缓慢的巡回宣传。当巡回旅行宣传者到达南部时，就法国的统治者同西班牙的统治者的会见这件事进行商谈、安排的时机似乎是良好的。谁第一个想这个问题倒也无关紧要(可能是蒙吕克这个西班牙的半代理人)。但是，不管怎样，菲利普二世却拒绝亲自露面。只是在他的妻子的再三恳求下，1565年1月他才同意让她同她的亲属作短暂的团聚。他认为让自己被别人恳求是正当合理的，这样做可能颇为得策。但是，这丝毫不意味他对这次会见漠然置之。[329]

在比利牛斯山的另一侧，辽阔的西班牙世界的确仍然十分安宁。但是，在它的身上越来越沉重地压着帝国的责任和负债累累的国库。菲利普二世本身一个人就是这个帝国、这个帝国的力量和它的衰弱的总和。在他的左右，他的第三个妻子、在西班牙以“和平王后”为人所知的伊丽莎白·德·瓦卢瓦能够起一定的作用。她还只是个孩子，说不上是个少妇。她并不是人们有时高兴描写的那种不幸的妻子。她似乎已经相当快地西班牙化了。不管怎样，她在巴约讷圆满地扮演了人们教她扮演的角色。西班牙驻法国国王宫廷大使

弗朗塞斯·德·阿拉瓦7月1日致函菲利普二世，在谈到这位年轻王后时他写道："我最真诚坦率地向陛下保证，王后陛下赢得了所有高贵善良的人的心，特别当她谈到有关宗教的事物和陛下现在对法国国王怀有的并将继续怀有的兄弟情谊和友好感情的时候更是如此。"[310]这可能是真实的。

年轻的西班牙王后伊丽莎白·德·瓦卢瓦4月8日出发[331]，6月10日[332]到达圣让-德-鲁斯。她的母亲在那里同她会合。14日，她们一同进入巴约讷。伊丽莎白在那里逗留了差不多两个月，直到7月2日，比预定的期限稍长[333]。对法、西两国政府来说，这种家庭团聚是进行这样一些活动的时机：互相作出保证，计划婚事（这一直是16世纪君主们聚会时的重要话题），最后双方空着两手分离，分离时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怀疑对方的诚意。这是历史上一件被人期望但结果使人扫兴的事。当然，在我们的眼里是这样，在参加者或者当时的人的眼里并不是这样。

甚至在让阿尔贝公爵和胡安·德·曼里克以观察员和顾问的身份陪同西班牙王后的菲利普二世的眼里，也不是这样。正如那个时代的人和历史学家所描绘的那样，阿尔贝公爵左右了整个会谈。西班牙方面企求的是：使法国动弹不得、无法行动并使它深深陷入内部和外部的争吵中。这既非友好政策，也非恶魔政策。对西班牙帝国来说，这几乎是一种必要，因为它位于法国周围，会自然而然地受到法国所有的运动和事变的影响，它所属的荷兰尤其是这样。这个地区自从1564年发生动乱以来，明显地处于危险之中。但是，有上述的企求，是以保卫宗教的名义过多地要求法国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再次成了方便的面具，但却没有提出任何东西作为交

换。法国的母后能够为了某个手法而放弃她的宗教宽容政策吗?这个手法很明显就是西班牙的手法,它将只能进一步分裂和削弱法兰西王国。

尽管谈判者满脸微笑,欢庆宴乐,觥筹交错,深刻的分歧仍然显露出来。甚至在会见前和会见中,就发生了一些令人警觉的事件。2月7日,当卡特琳·德·梅迪奇已经命令去巴约讷采购食品、为西班牙王后和她的女侍布置好西班牙式的房间时,弗朗塞斯·德·阿拉瓦从图卢兹送来报告:根据传闻,法国的统治者——摄政母后和国王——将带来“信仰异端的”旺多姆夫人、让娜·德·阿尔布雷。这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菲利普二世在这份报告的这几行字下面划了线。他还在这一页的旁边加上这句话:“如果情况属实,我不让王后前往该地。”[334]他立刻通知[335]法国大使[336],他不愿意纳瓦尔王后和孔代亲王出席会见。6月,恰好在西班牙王后到达之前不久,当弗朗塞斯·德·阿拉瓦获悉土耳其大使在马赛登岸时,发生了另外一起事件。这真是奇耻大辱。卡特琳·德·梅迪奇受到大使指责,尽力为自己辩护。她立刻把兰萨克先生派往她的女婿那里。兰萨克先生在西班牙王后同她的母亲在圣让-德-鲁斯会合的当天,即1565年6月10日,到达阿兰胡埃斯。他带来如下的辩护理由:法国国王和母后不知道这位大使来的目的何在。他们已经派拉·加尔德男爵前去迎接这个大使以便查明情况。如果他的使命含有任何反对西班牙国王的成分,当然他不会获准接见……菲利普二世致函弗朗塞斯·德·阿拉瓦说:“我复信说,我深信这一点。但是,与此同时,很多人不会不对这位特使正好在土耳其素丹派遣舰队前来进攻我的这一时刻来到感到惊讶。我仍然相信将以使大家了解我个人和法国

国王个人之间的友谊的方式对大使作出答复……"[337]

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它并没有消除西班牙人的疑虑。土耳其大使6月27日很快就向法国母后告辞。这时谈判正在紧张进行。母后赶紧向阿尔贝公爵解释说，她只同土耳其人谈在普罗旺斯进行的劫掠和造成的损失问题。[338]土耳其人答应赔偿和修复，条件是派一名法国特使前去素丹处。公爵认为，法国人的意图是在土耳其设法国使馆。他反驳母后说，既然土耳其舰队已经驶来西方，"事情就不会是派人去君士坦丁堡了。下一年西班牙国王的舰队将强大得使素丹舰队只能很小为害。"[339]

看来西班牙人在巴约讷认为法国将抛弃它和土耳其的传统友谊，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看来他们企图把法国拉入既反对异教徒又反对素丹的联盟中。几个月以后，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富克沃大使对母后说，这些谈判似乎企图把你塞进一个十分重要的同盟中。西班牙人利用了卡特琳·德·梅迪奇在巴约讷表示的愿望。母后谈到婚姻问题。这些婚姻可能导致缔结联盟。西班牙人主要谈联盟问题，正如富克沃所说，"从尾巴"开始。[340]富克沃大使警告说，当"土耳其人同母后陛下这样和平相处的时候，当法国人在土耳其港口和陆上受到的接待比在西班牙国王的各个王国的港口和陆上受到的接待更好，而法国的地理位置又使它不必十分惧怕土耳其人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同意缔结这样的同盟会有什么危险。假使我们要断绝和土耳其人的和平友好关系，牺牲你的臣民的全部商业贸易，那么西班牙国王陛下就应该同意母后陛下向他提出的任何要求。"然而，卡特琳所要求的，是有利于她的子女的婚姻。在富克沃看来，这些婚姻不大可能实现，特别是奥尔良公爵和菲利普二世的姊妹

胡安娜公主的婚姻更不大可能实现，因为公主似乎不同意。玛格丽特和东·卡洛斯的婚姻也是这样。西班牙的外交只玩这些牌。如果说这不是控制法国的一种方式，至少也是抑制法国政府的一种方式。

然而，西班牙的图谋毕竟是目光短浅的手法。马德里像使用挡箭牌那样使用全球天主教方针这个想法和论据。但是，被人执行的方针却是西班牙的方针（全球天主教方针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来自罗马，教皇庇护四世刚在该地死去）。西班牙甚至还没有制订出一项地中海方针的愿望。这项方针要以冲劲、激情、狂热、利益、金钱的力量、行动的自由等作为先决条件。而审慎国王菲利普二世却没有或者至今还没有这些禀性。他感到自己处处受到危险的包围。不错，是地中海的危险，这是毫无疑问的。此外还有大西洋上的新教徒海盗的危险、荷兰边境上的法国的危险。这场动乱正开始威胁集中在安特卫普这个调度站的西班牙的财富资源。1565年12月，关于菲利普二世在佛兰德巡行的传闻已经到处流传，后来继续流传，若干年内还会再度出现。[341]

事实上，而且至少不是在短时期内，客观环境全都使菲利普二世无法执行他在政治上的这一或者那一宏图大略。在他的统治的头十年，他只能对付属于当务之急的事和迫在眉睫的危险。他必须用最小的代价去对付，以免过分影响未来。我们在这里所谈的，还远非出现在菲利普二世的统治末期的帝国主义愚蠢行径。这位君主在他的统治末期离弃了谨慎国王的形象。

本部分原注

1. *Instrucciòn de lo que vos el Reverendo padre obispo del Aguila habéis de decir a la Majestad del Serenissimo Rey é Emperador, nuestro muy caro y muy amado tío donde de presente os enviamos.* Bruxelles, 21 mai 1558, *CODOIN*, XCVIII, p. 6-10.

2. Quant à la personne "qui a pratique et intelligence en la cour du Turc" et qui a été chargée, sans l'être de tâter le terrain à Constàntinople, ml doute que ce ne soit Francisco de Franchis Tortorino, un Gènois apparenté à la mahome de Chio. Chargé de mission par Gênes à la suite des tractations corruptrices avec Piali Pacha durant l'été 1558, il a sans doute proposé en même temps ses services à Philippe II. Aux Archives de Gênes, un registre calligraphié raconte en détail le voyage de Francisco de Franchis (Costantinopoli, 1. 2169) et des lettres consulaires nous le montrent à Naples et à Messine, en diffcultés d'ailleurs avec les autorités espagnoles, puis gagnant Venise, A. d. S. Gênes, Napoli, Lettere Consoli, 2, 2635; Gregorio LETI, *op. cit.* I, p. 302, parle de sa mission en compagnie d'un certain Nicolo Gritti.

3. *CODOIN*, XCVIII, p. 53-54.

4. Bruxelles, 6 mars 1559, Simancas E°485.

5. Instruction del Rey a Nicolo Secco para tratar con el Turco, Bruxelles, 6 mars 1559, Simancas E°485.

6. Bruxelles, 8 avril 1559, Simancas E°1210.

7. Sélim et Bajazet.

8. 15 juin 1559, Simancas E°1124, f°295.

9. Résumé des lettres du duc de Sessa, des 1er, 4, 7 déc. 1559(4 déc.), Simancas E°1210, f°142.

10. 10 janv. 1560, Simancas E°1050, f°9.

11. Au doge, Vienne, 25 oct. 1559, G. TURBA, *op. cit.*, I, 3, p. 108 et *sq*.

12. Le même au même, 22 nov. 1559, *ibid.*, p. 120 et *sq*.

13. Le roi au vice-roi de Sicile, Bruxelles, 4 avril 1559, Simancas E° 1124, f°304.

14. E. CHARRIÈRE, *op. cit.*, II, p. 596, note.

15. *Ibid.*, p. 603.

16. Marin de Cavalli au Doge, Péra, 18 mars 1559, A. d. S., Venise, Senato Secreta, Costant. Filza 2/B.

17. D. de HAEDO, *op. cit.*, p. 73, 74. Sur la politique espagnole en Afrique du Nord voir notre article *in*: *Revue Africaine*, 1928; Jean CAZENAVE, *Les sources de l'histoire d'Oran*, 1933.

18. Jean NICOT, *Correspondance...*, p. p. E. FALGAIROLLE, p. 7.

19. Cadix.

20. Au roi, 20 juin 1559, Simancas E°485.

21. Pour tout le détail de ce paragraphe, Charles MONCHICOURT, *L'expédition espagnole contrel'Île de Djerba*, Paris, 1913, modèle d'érudition minutieuse. En principe, nos références concerneront des sources non utilisées pour ce livre.

22. Au vice-roi de Sicile, même date, Simancas E°1124, f°300; instruction au commandeur Guimeran, même date, *ibid.*, f[os]278 et 279; au grand maître de Malte, même date, *ibid.*, f°302, etc.

23. Don Lorenzo van der HAMMENY LEON, *Don Felipe El Prudente...*, Madrid, 1625, f°146 v°.

24. Jean de La Valette, de la langue de Provence, grand maître de l'Ordre, 1557 à 1568. Il avait gouverné Tripoli de 1546 à 1549. Cf. les extraits de G. BOSIO, *I Cavalieri gerosolimitani a Tripoli*, p. p. S. AURIGEMMA, 1937, p. 271-272.

25. *Op. cit.*, p. 82-83.

26. Le duc de Medina Celi à Philippe II, 20 juil. 1559, Simancas E°1, f° 204.

27. Décision du 15 juin, rapport du 20.

28. C. MONCHICOURT, *op. cit.*, p. 93, laisse à penser que D. J. de Mendoza a agi de sa propre initiative. R. B. MERRIMAN (*op. cit.*, IV, p. 102) indique à titre d'hypothèse que D. Juan a pu recevoir un ordre. Le fait est établi par la lettre de Philippe II (voir notes précédentes, note 2, p. 285 et note 1, p. 282). Voir également sur ce point et sur le désarmement des côtes d'Espagne, l'Aubespine au roi, 20 juil. 1559, E. CHARRIÉRE, *op. cit.*, II, p. 600, note; L. PARIS, *Nég. sous François II*, p. 24; C. DURO, *op. cit.*, II, p. 46.

29. Curieuses remarques de A. de HERRERA, *op. cit.*, I, p. 14; partout se pose, après 1559, le problème de la démobilisation, l'expédition projetée, n'est-ce pas un moyen de débarrasser l'Italie espagnole des soldats qui "restaient de la guerre de Piémont et ne pouvaient mieux s'occuper que contre les Infidèles"?

30. Philippe II au com. Guimeran, Gand, 14 juil. 1559, Simancas E° 1124, f°331.

31. Au vice-roi de Sicile, Gand, 14 juil. 1559, Simancas E°1124, f°321.

32. Au com. Guimeran, Gand, 7 août 1559, Simancas E°1124, f°330.

33. Figueroa à la princesse Jeanne, Gênes, 7 août 1559, Simancas E° 1388, f°s162-163.

34. J. André Doria à Philippe II, Messine, 10 août 1559, Simancas E° 1124, f°335, en italien. Plus tard, J. A. Doria ne correspondra plus guère avec le roi qu'en espagnol.

35. Le due de Sessa au roi, Milan, 11 août 1559, Simancas E°1210, f°. 203.

36. Figueroa à Philippe II, Gênes, 14 sept. 1559, Simancas E°1388.

37. J. A. Doria à Philippe II, Messine, 14 sept. 1559, Simancas E°1124, f°336.

38. *Ibid.*

39. Philippe II au duc de Medina Celi, Valladolid, 8 oct. 1559, Simancas E°1124, f°325-326.

40. A Philippe II, Simancas E°1124, f°270.

41. Sur cette lenteur, innombrables documents et notamment, Simancas E°1049, f°s185, 188, 189, 225, 227, 251, 272.

42. Gio: Lomellino à la Seigneurie de Gênes, Messine, 10 déc. 1559, A. d. S., Gênes, Lettere Consoli, Napoli-Messina, 1-2634.

43. C. MONCHICOURT, *op. cit.*, p. 88.

44. *Ibid.*, p. 92.

45. Gio. Lomellino à la Seigneurie de Gênes, Messine, 24 août 1559, même référence qu' à la note 9, page précédente.

46. *Op. cit.*, I, p. 15.

47. Figueroa à Philippe II, Gênes, 27 oct. 1559, Simancas E°1388, f° 16.

48. Marin de Cavalli au doge, Péra, 29 janv. (1560), A. d. S., Venise,

Senato Secreta, Cost. 2/B, f°222 v°.

49. C. MONCHICOURT, *op. cit.*, p. 100.

50. Ainsi 31 janv. 1560, *C. S. P.* VII, p. 150.

51. Giacomo Soranzo au doge, Vienne, 3 févr. 1560, G. TURBA, *op. cit.*, I, p. 134.

52. Messine, 3 avr. 1560, A. d. S., Gênes, Lettere Consoli, Napoli-Messina, 1-2634.

53. Le baile au doge, Péra, 30 mars 1560, A. d. S., Venise, Senato Secreta, Cost. 2/B.

54. Dans ses notes au *Memorial de D. Alvaro*, C. MONCHICOURT, *op. cit.*, p. 100, note 2.

55. 3 avr. 1560, A. d. S. Gênes, Lettere Consoli..., 1-2634.

56. Le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4 avr. 1560, Simancas E°1050, f°28, au duc de Medina Celi, 20 avr., *ibid.*, f°32, au roi, 21 avr., f°32.

57. Au roi, 5 mai 1560, Simancas E°1050, f°36.

58. *Ibid.*, f°39.

59. Au roi, 16 mai 1560, *ibid.*, f°40.

60. P. 32 et 32 v°, cité par C. MONCHICOURT, *op. cit.*, p. 109.

61. Le visitador Quiroga au roi, Naples, 3 juin 1560, Simancas E°1050, f°63.

62. Bien vu par le fils de Machiavel, C. MONCHICOURT, *op. cit.*, p. 111.

63. La Sie de Gênes à Sauli, Gênes, 19 mai 1560, A. d. S., Gênes, L. M. Spagna 3. 2412.

64. Au roi, 30 mai 1560, Sim. E°485.

65. Le duc d'Alcala à Philippe II, Naples, 31 mai 1560, Simancas E° 1050, f°56.

66. Le même au même, 1er juin 1560, *ibid.*, f°60.

67. Par une lettre de Figueroa et des avis du cardinal Cigala et des ambassadeurs de Gênes, Philippe II au vice-roi de Naples., 2 juin 1560, Simancas E°1050, f°63. Sur le chiffre des pertes, Gresham, 16 juin 1560, parle de 65 bâtiments, Ms. Record Office, n°194.

68. Tiepolo au Doge, Tolède, 2 juin 1560, *C. S. P. Venetian*, VII, p. 212-213.

69. *Ibid.*

70. *Ibid*.

71. Philippe II au duc d'Alcala, Tolède, 8 juin 1560, E°1050, f°69.

72. Barcelone, 9 juin 1560, Sim. E°327.

73. D. Garcia de Toledo à Philippe II, Barcelone, 12 juin 1560, Simancas E°327.

74. Philippe II à D. Garcia de Toledo, Tolède, 15 juin 1560, Simancas E°327. Réponse de D. Garcia, de Barcelone, 23 juin, *ibid*.

75. Résumé des lettres de Figueroa, 3, 5, 10, 12 juill. 1560, Simancas E°1389.

76. *Ibid*.

77. *Ibid*.

78. Le duc de Medina Celi au roi, 9 juill. 1560, C. MONCHICOURT, *op. cit.*, p. 237.

79. Le duc d'Alcala à Philippe II, Naples, 9 oct. 1560, Simancas, E° 1050, f°137.

80. Michiel au doge, Chartres, 22 juin 1560, *C. S. P. Venetian*, VII, p. 228.

81. *C. S. P. Venetian*, VII, p. 229. Le duc d'Albe à Philippe II, Alva, 19 sept. 1560. orig. Sim. E°139, il en existe une copie.

82. B. N., Paris, Esp. 161, f^os 15 à 21. Voir E. CHARRIÈRE, *op. cit.*, II, pp. 621-623, sur les bruits d'une collaboration franco-espagnole.

83. Le roi à l'évêque de Limoges, 16 sept. 1560, L. PARIS, *op. cit.*, pp. 523-530.

84. Chantonnay à Philippe II, 2 févr. 1560, A. N., K 1493, f°39; L. ROMIER, *La conjuration d'Amboise*, 1923, p. 123. La reine d'Espagne à Catherine de Médicis, sept. 1560, L. PARIS, *Négoc. sous le règne de François II*, p. 510.

85. Chantonnay à Philippe II, Melun, 31 août 1560, A. N., K 1493, f° 83; 3 sept. 1560, L. PARIS, *op. cit.*, p. 506-509.

86. 3 juill. 1560, *CODOIN*, XCVIII, p. 155-158.

87. Simancas E°1389.

88. Simancas E°1050, f°84.

89. 13 juill. 1560, E. CHARRIÈRE, *op. cit.*, II, p. 616-618.

90. Constantinople, 17 et 27 juill. 1560, *ibid.*, 618-621.

91. Figueroa à S. M., Gênes, 26 juill., 1560, Simancas E°1389. Son

imposture, Sauli à la République de Gênes, Tolède, 14 déc. 1560, A. d. S., Gênes, Lettere Ministri, Spagna 2. 2411.

92. 6 août 1560, Simancas E°445, copie.

93. *Op. cit.*, II, p. 36.

94. B. N., Madrid, Ms 11085, 9 avr. 1561.

95. C. MONCHICOURT, *op. cit.*, p. 133; J. A. Doria arrivait à Malte, le 8 août 1560. J. A. Doria à Philippe II, 8 août 1560, Simancas E°1125. Il était sur le point de tomber sur Tripoli quand la nouvelle de la chute du fort lui parvint. Le mêmeau même, 9 sept. 1560, *ibid.*

96. 18 août 1560, Simancas E°1050, f°120.

97. C. MONCHICOURT, *op. cit.*, p. 134.

98. *Ibid.*

99. G. Hernandez à Philippe II, Venise, 21 août 1560, Simancas E° 1325.

100. Corfou, 4 sept. 1560, Simancas E°1050, f°129.

101. Le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Simancas E°1050, f°128.

102. *Op. cit.*, II, pp. 245 et *sq.*

103. R. B. MERRIMAN, *op. cit.*, IV, p. 107.

104. Monteleone au roi, 30 août 1560, Simancas E°1050, f°121. Le duc d'Alcala au roi, Naples 3 sept. 1560, *ibid.*, f°124.

105. Comte de Luna au roi, le 28 déc. 1560, *CODOIN*, XCVIII, p. 189-192.

106. Florence, 10 juill. 1560, Sim. E°1446.

107. G. Hernandez à Philippe II, Venise, 20 juill. 1560, Simancas E° 1324, f°47.

108. H° Herro au doge, Péra, 12 nov. 1560; A. d. S., Venise, Senato Secreta, Cost. 2/B, f^os^290-291.

109. 19 sept. 1560, B. N., Esp. 161, f^os^15 à 21.

110. 9 oct. 1560, Simancas E° 1850, f° 139. J. de Mendoza au roi, Palamos, le 1^er^ sept. 1560, Sim. E°327.

111. 26 août 1560, Simancas E°1058, f°118.

112. C. MONCHICOURT, p. 237.

113. Cagliari, 25 août 1560, Simancas E°327.

114. *CODOIN*, VIII, p. 560.

115. Sur le docteur Buschia, quelques-unes de ses lettres aux A. N.,

Paris, série K, 1493, B 11, f°111(20, 28, 30 sept., 4, 8, 13 oct. 1560). Sur les informateurs fantaisistes du Levant, Granvelle à Philippe II, Naples, 31 janv. 1572, Simancas E°1061.

116. *CODOIN*, XCVIII, p. 182.

117. Philippe II au grand commandeur et à D. J. de Zuñiga, Madrid, 23 oct. 1560, Simancas E°1324, f°48.

118. Dolu au cardinal de Lorraine, Constantinople, 5 mars 1561, E. CHARRIÈRE, *op. cit.*, II pp. 652-653, cherté, misère, peste.

119. *Ibid.*

120. Raguse, 2 janv. 1561, Simancas E°1051, f°11.

121.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6 janv. 1561, Simancas E°1051, f° 12.

122. Au roi, Trapani, Simancas E°1126.

123. Philippe II au vice-roi de Majorque, Aranjuez, 28 févr. 1561, Simancas E°328.

124. Corfou, 30 mars 1561, Simancas E°1051, f°51.

125. *Relacion que haze Antonio Doria...*, 18 avr. 1561, simancas E° 1051, f°62.

126. Constantinople, 9 avr. 1561, Simancas E°1051, f°54.

127. 12, 14 avr. 1561, Simancas E°1051, f°55; Liesma, 16 avr. 1561, *ibid.*, f°56.

128. Alonso de la Cueva au vice-roi de Naples, La Goulette, 17 avr. 1561, E°1051, f°57.

129. Vice-roi de Naples à Marcantonio Colonna, Naples, 9 mai 1561, Simancas E°1051, f°78.

130.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9 août 1561, Simancas E°1051, f° 119.

131. Madrid, 5 sept. 1561, B. N., Paris, Fr. 16103, f°44 et *sq.*

132. "Lo que se entiende de Levante... de Corfu", 10 août 1561, Simancas E°1051, f°120.

133. E. CHARRIÈRE, *op. cit.*, II, p. 657-658.

134. *Ibid.*, pp. 653-654.

135. Vice-roi de Sicile à Philippe II, Messine, 8 juin 1561, Simancas E° 1126. Vice-roi de Naples au roi, Naples, 7 juill. 1561.

136. E. CHARRIÈRE, *op. cit.*, II, p. 661.

137. H° Ferro au doge, Péra, 10 juill. 1561, A. d. S. Venise, Secreta Senato Cost. 3/C. Roustem Pacha est mort le 9 juillet.

138. L'évêque de Limoges au roi, Madrid, 5 sept. 1561, B. N., Paris, Fr. 16 103, f°44 et *sq*.

139. E. CHARRIÈRE, *op. cit.*, II, p. 657-658.

140. *CODOIN*, XCII, pp. 240-244.

141. 28 mai 1562, Simancas E°1052, f°27.

142. Sampiero n'arrivera d'ailleurs à Constantinople qu'en janvier 1563. Nombreux documents génois, A. d. S., Gênes, Spagna, 3 2412 et Costantinopoli, 1 2169.

143. Vice-roi de Naples à Marcantonio Colonna, 24 mai 1562, Simancas E°1051, f°87.

144. Philippe II au vice-roi de Naples, le 14 juin 1562, Simancas E°, 1051 f°96.

145. Voir avant-dernière note.

146. Daniel Barbarigo au Doge, Péra, 5 août 1562, A. d. S. Venise, Senato Secreta 3/C; Venise, 20 août 1562, trêve conclue pour 8 ans, *CODOIN*, XCVII, p. 369-372, C. MONCHICOURT, *op. cit.*, p. 142.

147. Constantinople, 30 août 1562, E. CHARRIÈRE, *op. cit.*, II, pp. 702-707.

148. 6-17 janv. 1563, *ibid.*, pp. 716-719.

149. Philippe II aux ducs de Savoie et de Florence, Escorial, 8 mars 1563, Simancas E°1393.

150. Simancas E°1052, f°169.

151. Narbonne, 2 janv. 1564, Edmond CABIÉ, *Ambassade en Espagne de Jean Ebrard, Seigneur de Saint-Sulpice*, Albi, 1903, p. 212.

152. Constantinople, 12 févr. 1564, Simancas E°1053, f°19.

153.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Naples, 17 févr. 1564, Simancas E°1053, f°22.

154. A Philippe II, Paris, 17 mars 1564, A. N., K 1501, n°48 G.

155. Saint-Sulpice au roi, 11 mars 1564, E. CABIÉ, *op. cit.*, pp. 262-263.

156. *Ibid.*, p. 269, 29 mai 1564.

157. Simancas E°1053, f°54.

158. Début de juillet 1564, E. CABIÉ, *op. cit.*, p. 270.

159. *Ibid.*, p. 279.

160. A. d. S. Gênes, L. M. Spagna, 3. 2412.

161. Au doge, G. TURBA, *op. cit.*, I, 3, p. 289-290.

162. Diego Sàrez, d'après le Général DIDIER, *Hist. d'Oran*, 1927, VI, p. 99, note 5.

163. 24 août 1561, B. N., Paris, Fr. 16 103.

164. C. DURO, *op. cit.*, II, p. 44. Voir *supra*, 2^e^ partie, chap. IV.

165. L'évêquè de Limoges au roi, 5 sept. 1561, B. N., Paris, Fr. 16 103, f°44 et *sq.*

166. Simancas E°1051, f°131.

167. *Ibid.*, f°139.

168. *Ibid.*, f°49.

169. Vice-roi de Sicile à Philippe II, Palerme, 8 nov. 1561, Simancas E° 1126.

170. Le même au même(s. d. dans mes fiches), *ibid.*

171. L'évêque de Limoges à la reine, Madrid, 3 janv. 1562, B. N., Paris Fr. 16 103, f°129 v°. En juin 1562, les Espagnols sont encore à La Goulette. Relation de voyage de J. de Mendoza... Simancas E°1052, f°33.

172. Alonso de la Cueva au vice-roi de Sieile, 1^er^ mars 1562, Simancas E° 1127.

173. Figueroa à Philippe II, Gênes, 9 mai 1562, Simancas E°1391.

174. Relation de voyage de J. de Mendoza..., Simancas E°1052, f°33; D. J. de Mendoza de retour à Palerme le 9 mai 1562, Simancas E°1127.

175. *Per lettere di Marsiglia*, 21 mai, A. d. S. Gênes, L. M. Spagna 3. 2412.

176.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4 juill. 1562, Simancas E°1052, f° 45.

177. Alger, 12 juill. 1562, A. d. S. Gênes, L. M. Spagna 3. 2412.

178. Sauli à la Sie de Gênes, Barcelone, 13 sept. 1562, *ibid.*

179. Au roi, La Goulette, 30 sept. 1562, Simancas E°486.

180. Saint-Sulpice au roi, 26 oct. 1562, E. CABIÉ, *op. cit.*, p. 90.

181. N°345, p. 83.

182. *Relacion de como se perdieron las galeras en la Herradura*, 1562, Simancas E°444, f°217; C. DURO (*op. cit.*, II, pp. 47 et *sq.*)ne semble pas être remonté aux sources.

183. J. de Figueroa au vice-roi de Naples, Gaète, 8 nov. 1562, Simancas E°1052, f°67.

184. C. DURO, *op. cit.*, II, p. 48.

185. Agostinho GAVY de MENDONÇA, *Historia do famoso cerco que o xarife pos a fortaleza de Mazagão no ano de* 1562, Lisbonne, 1607.

186. C. DURO, *op. cit.*, II, p. 49.

187. Le 3 ou le 4, d'après les récits traditionnels, peut-être pas avant le 8 avril. A cette date les Algérois sont encore à deux lieues de la ville, du côté de la terre. Philippe II à Figueroa, Ségovie, 18 avr. 1563, Simancas E° 1392. *Lo que ha passado en el campo de Oran y Almarçaquibir...*, Tolède, 1563; Pièce, B. N., Paris, Oi 69.

188. D. de HAEDO, *op. cit.*, p. 75 v°.

189. Résumé des lettres du comte d'Alcaudete, mars 1563, Simancas E° 486.

190. *Relacion de lo que se entiende de Oran por cartas del Conde de Alcaudete de dos de junio 1563 rescibidas a cinco del nismo*, Simancas E°486.

191. *Lo que ha passado...*, B. N., Paris, Oi 69.

192. Le roi rappelle ce détail dans sa lettre du 18 avril, Simancas E° 1392.

193. Le vice-roi de Sicile à Philippe II, Messine, 23 avr. 1563, Simancas E°1127.

194. Madrid, 25 avr. 1563, Simancas E°330.

195. Simancas E°1052, f°156.

196. Cette lettre citée d'après la réponse du roi, voir note suivante.

197. Madrid, Simancas E°1392.

198. *Ibid.*

199. Simancas E°1392.

200. Indication donnée d'après la lettre du vice-roi à Philippe II, lettre de réponse, 23 juill. 1563, Simancas E°1052, f°207.

201. A ce propos, R. B. MERRIMAN, *op. cit.*, IV, p. 110, parle d'efforts surhumains. N'est-ce pas trop dire?

202. Le 2 selon Salazar, le 6 selon Cabrera, d'après DURO, *op. cit.*, II, p. 55-59.

203. Gomez Verdugo à Francisco de Eraso, 29 août 1563, Simancas E° 143, f°117.

204. Sancho de Leyva au roi, Naples, 13 janv. 1564, Simancas E°1053, f°8. On sait cependant que S. de Leyva mettait à la voile pour La Goulette, vice-roi à S. M., Naples, le 17 févr. 1564, Simancas E°1053, f°22.

205. Philippe II à D. Garcia de Toledo, Valence, avr. 1564, *CODOIN*, XXVII, p. 398.

206. Jusqu'à la mise en construction de chaloupes ordonnée aux proveedores de Màlaga, *CODOIN*, XXVII, p. 410, 17 mai 1564.

207. 12 juin 1564, E. CABIÉ, *op. cit.*, p. 270.

208. D. Garcia de Toledo à Philippe II, Naples, 15 juin 1564, Simancas E°1053, f°64。

209. D. Juan de Çapata à Eraso, 15 juin 1564, *ibid.*, f°63.

210.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15 juin 1564, *ibid.*, f°60.

211. Note autographe du roi en marge d'une lettre que lui adresse D. Garcia de Toledo, Naples, 16 juin 1564, Simancas E°1053, f°65.

212. J. B. E. JURIEN de LA GRAVIÈRE, *Les Chevaliers de Malte*, Paris, 1887, I, p. 98.

213. *Ibid.*, p. 99.

214. Ce sont les chiffres de C. Duro. Le 29 août, Saint-Sulpice, pour Cadix seulement, parle de 62 galères (E. CABIÉ, *op. cit.*, pp. 291-292). 70 et quelques galères, dit-on en France, 13 août 1564, A. N., K 1502, no. 296.

215. J. B. E. JURIEN de LA GRAVIÈRE, *op. cit.*, I, p. 111, note 1.

216. Don Garcia de Toledo à S. M., Málaga, 16 sept. 1564, *CODOIN*, XXVII, p. 527.

217. Philippe II à Figueroa, 3 août 1564, Simancas E°1393 et non E°931 imprimé par erreur, Fernand BRAUDEL, *in*: *Rev. Afr.*, 1928, p. 395, note 1.

218. Figueroa au roi, Gênes, 27 juin 1564, Simancas E°1393.

219. A Venise, notamment, centre de nouvelles vraies ou fausses et de spéculations, G. Hernandez à Philippe II, Venise, 12 sept. 1564, Simancas E°1325.

220. Le même au même, *ibid.*

221. Philippe II à D. Garcia de Toledo, 18 juill. 1564, Simancas E° 1393.

222. 2 août 1564, A. N., K 1502.

223. Philippe II à Figueroa, 3 août 1564, Simancas E°1393.

224. Simancas E°1393.

225. D. Francés de Alava à Philippe II, 13 août 1564, A. N. , K 1502, n°96.

226. Nuevas de Francia... reçues le 3 sept. 1564, Simancas E°351.

227. Garces au duc de Florence, Madrid, 22 sept. 1564,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7. f°36 v°.

228. Philippe II au duc de Florence, Madrid, 23 sept. 1564, Simancas E°1446, f°112.

229. Sauli à la Seigneurie, Madrid, 24 sept. 1564, A. d. S. Gênes, L. M. Spagna 3. 2412.

230. 9 oct. , *ibid.*

231. Philippe II à Figueroa, Madrid, 25 oct. 1564, Simancas E°1393.

232. *Ibid.*

233. Figueroa à Philippe II, Gênes, 27 oct. 1564, Simancas E°1393.

234. Le même au même, 8 nov. , Simancas E°1054, f°21.

235. A. N. , K 1502, B 18, n°51 *a*.

236. Philippe II à Francés de Alava, 31 déc. 1564, A. N. , K 1502, B 18, n°77.

237. Figueroa à Francés de Alava, Gênes, 1er déc. 1564, A. N. , K 1502, B 18, n°60.

238. *Ibid.* A bord d'une de ces frégates, un Corse ami de Sampiero, Piovanelo que les corsaires barbaresques capturent au passage.

239. *Ibid.*

240. *Ibid.*

241. Figueroa à Philippe II, 3 déc. 1564, Simancas E°1393.

242. Le même au même, 21 déc. 1564, *ibid.*

243. Goûtons au passage cet argument, S. M. à Chantonnay, Madrid, 10 nov. 1562, A. N. , K 1496, B. 14, n°126: Philippe II a déclaré à Saint-Sulpice qu'il ne pouvait se déclarer contre la reine d'Angleterre *por causa de las antiguas alianças.*

244. La conversation est déjà commencée en sept. ; l'évêque de Limoges à Catherine de Médicis, Madrid, 24 sept. 1561, B. N. , Paris Fr. 15875, f° 194; Chantonnay à Philippe II, Saint-Cloud, 21 nov. 1561, A. N. , K 1494, B 12, n°111; le même au même, Poissy, 28 nov. 1561, *ibid.* , n°115.

245. G. Soranzo au doge, Vienne, 25 déc. 1561, une conjuration découverte à Pampelune, en faveur du roi de Navarre, G. TURBA, *op. cit.*, 1, pp. 195 et *sq*.

246. Morone au duc d'Albe, Rome, 2 oct. 1561, Joseph SUSTA, *Die Römische Curie und das Konzil von Trient unter Pius IV.*, Vienne, 1904, I, p. 259.

247. Le duc d'Albe à Chantonnay, Madrid, 18 janv. 1562, A. N., K 1496, B. 14, n°. 38.

248. Figueroa à Philippe II, 9 oct. 1562, Simancas E°1391.

249. Saint-Sulpice à Catherine de Médicis, Madrid, 25 nov. 1562, B. N., Paris, Fr. 15877, f°386.

250. C. MONCHICOURT, *op. cit.*, p. 88.

251. Philippe II au vice-roi de Naples, Tolède, 8 juin 1560, Sim. E° 1059, f°69.

252. Une estimation gênoise (*Conto che si fa delle galere che S. Mta Cattca potrà metere insieme*. A. d. S. Gênes, L. M. Spagna 2. 2411 (1560) fournit un intéressant décompte: galères d'Espagne (20); de Gênes (6), du Prince Doria, non compris celles qui sont à Djerba (6), du duc de Florence (3), du duc de Savoie(2), du comte de Nicolera(1), du roi de Portugal (4), de Paolo Santa Fiore(2), "delle salve"(23). Total 67, un document sicilien de 1560 (Simancas E°1125) donne le chiffre total de 74 avec le décompte suivant: galères du Pape(2), d'Espagne(20), du prince Doria(10), de Gênes (8); de la Religion(5), du duc de Florence(7); du duc de Savoie(6); d'Antonio Doria(4), de Cigala(2), du Cal Vitelli(3), de Paolo Sforza(2), de Naples(3), de Bendineli Sauli(1), de Stefano de Mari(1).

253. L. BIANCHINI, *op. cit.*, I, p. 54.

254. Le vice-roi de Naples au roi, Simancas E°1050, f°137.

255. Résumé des lettres de Figueroa au roi, 3, 5, 10, 12 juin 1560, Simancas E°1389.

256. Le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Naples, 12 janv. 1561, Simancas E°1051, f°17.

257. L. von PASTOR, *op. cit.*, XVI, p. 256 et note 1.

258. *Ibid.*

259. *Ibid.*, p. 257.

260. *Ibid.*

261. Tiepolo au doge, Tolède, 26 mars 1561, *C. S. P. Venetian*, VII, p. 305.

262. L'instruction de Fernando de Sylva, marquis de la Favara..., 1[er] avr. 1561, Simancas E°1126.

263. Sauli à la Seigneurie de Gênes, Tolède, 27 avr. 1561, A. d. S. Gênes, L. M. Spagna, 22411.

264. Tiepolo au doge, 26 avr. 1561, *C. S. P. Venetian*, VII, p. 310.

265. Le duc de Medina Celi au vice-roi de Naples, 30 juin 1561, Simancas E°1051, f°100, copie.

266. L'évêque de Limoges au roi, Madrid, 5 sept. 1561, B. N., Paris, Fr. 16103, f°44 et *sq.* copie, et, du même au même, la lettre déjà citée du 12 août 1561.

267. *Los puntos en que han hablado a S. M Mos. Dosance y el embax[or] Limoges*, Madrid, 10 déc. 1561, A. N., K 1495, B. 13, n°96.

268. Joyeuse au roi, Narbonne, 28 déc. 1561, B. N., Paris, Fr. 15875, f°460.

269. Mémoires de l'évêque de Limoges, 27 janv. 1562, B. N., Paris, Fr. 16103, f°144 v°, copie.

270. Philippe II au vice-roi de Naples, 14 juin 1562, Simancas E°1052, f°96. La composition des escadres est la suivante: *a*) escadre de D. J. de Mendoza, 12 galères d'Espagne (dont 4 détachées à la disposition des Prieur et Consuls de Séville); 6 de Naples; 6 d'Antonio Doria; 4 du comte Federico Borromeo; 2 d'Estefano Doria; 2 de Bendineli Sauli; *b*) escadre de J. André Doria, 12 galères du dit J. André, conformément à son nouvel *asiento*; 4 de la Religion; 4 de Marco Centurione; 2 du duc de Terranova; 2 de Cigala.

271. C. DURO, *op. cit.*, II, p. 49.

272. Philippe II aux ducs de Savoie et de Florence, S. Lorenzo, 8 mars 1563, Simancas E°1392.

273. C. DURO, *op. cit.*, III, p. 67.

274. Sancho de Leyva à Philippe II, Naples, 13 janv. 1564, Simancas E° 1053, f°8.

275. Vice-roi de Naples au roi, 15 juin 1564, Simancas E°1053, f°60.

276. 29 juin 1564, *ibid.*, f°73.

277. J. von HAMMER, *op. cit.*, VI, p. 118.

278. C. DURO, *op. cit.*, III, p. 61, note 2 et p. 62, note 1.

279. *Ibid.*, p. 64, note 3.

280. D. G. de Toledo á Eraso, Málaga, 17 août 1564, *CODOIN*, XXVII, p. 452, cité par C. DURO, *op. cit.*, III, pp. 65-66.

281. 22 août 1564, cité par C. DURO, *op. cit.*, III, p. 66.

282. Ainsi, pour les galères de Naples, G. de Toledo au vice-roi de Naples, 23 janv. 1565, Simancas E°1054, f°52.

283. D. G. de Toledo à Philippe II, Gaëte, 14 déc. 1564, *CODOIN*, CI, p. 93-105.

284. Leonardo Contarini au doge, Venise, 29 déc. 1564, G. TURBA, *op. cit.*, I, 3, p. 289.

285. D. G. de Toledo au roi, Naples, 7 janv. 1565, *CODOIN*, XXVII, p. 558.

286. E. CHARRIÈRE, *op. cit.*, II, pp. 774-776.

287. Constantinople, 10 févr. 1565, Simancas E°1054, f°64.

288. Alvaro de Bazan à Philippe II, Oran, 10 mars 1565, Simancas E° 486, voir E. CAT, *Mission bibliographique en Espagne*, 1891, pp. 122-126.

289. Rodrigo Portillo au roi, Mers-el -Kébir, 13 mars 1565, Simancas E°485。

290.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14 mars 1565, Simancas E°1054. f°70.

291. Francavila a S. M., Barcelone, 19 mars 1565, Simancas E° 332, Philippe II aux proveedores de Málaga, Madrid, 30 mars 1565, Simancas E° 145.

292. Constantinople, 20 mars, Corfou, 29 mars, Raguse, 8 avr. 1565, Simancas E°1054, f°71; le 22, dit JURIEN de LA GRAVIÈRE, *op. cit.*, I, p. 169.

293. A Madrid, le 6 avril, l'ambassadeur toscan Garces remettait à Philippe II les avis du Levant reçus par la voie de Florence; ils annoncent la puissance, non le but de l'armada. Garces au duc de Florence, Madrid, 6 avr. 1565, A. d. S. Florence, Mediceo, 1897, f°88. De même Pétrémol, dans sa lettre à Du Ferrier, 7 avr. 1565, E. CHARRIÈRE (*op. cit.*, II, pp. 783 à 785) indique le départ du gros de la flotte le 30 de Constantinople, mais ne sait si elle se dirige sur Malte ou La Goulette, Cette date du 30 mars donnée également par un avis de Constantinople, 8 avr. 1565, Simancas E° 1054, f°85.

294. Philippe II au Dean de Carthagène (Alberto Clavijo, proveedor de Málaga), Madrid, 22 mars 1565, Simancas E°145.

295. Aranjuez, 7 avr. 1565, Simancas E°145.

296.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Naples, 8 avr. 1565, Simancas E° 1054, f°80.

297. Le même au même, Naples, 8 avr. 1565, *ibid.*, f°81.

298. *Ibid.*, f°94, avis de Corfou, 30 avril 1565.

299. *Ibid.*

300. J. B. E. JURIEN de LA GRAVIÈRE, *op. cit.*, I, p. 172.

301. *Ibid.*

302. Simancas E°1125.

303. Simancas E°1054, f°106.

304. Recidiba a VI de junio, note sur le précédent document.

305. C. Duro, *op. cit.*, III, p. 76 et sq.

306. P. Herre, *op. cit.*, p. 53; H. Kretschmayr, *op. cit.*, III, p. 48.

307. J. B. E. Jurien de La Gravière, *op. cit.*, II, p. 140.

308. En mai, Alvaro de Bazan a dix-neuf galères sous ses ordres, Tello à Philippe II, Séville, 29 mai 1565, Simancas E°145, f°284. Par suite son escadre va grossir, il arrivera àNaples avec 42 galères.

309. J. B. E. Jurien de La Gravière, *op. cit.*, II, p. 167.

310. *Ibid.*, p. 172 et *sq.*

311. Por cartas del Duque de Seminara do Otranto a 29 de 7bre, 1565, Simancas E°1054, f°207. Le 22, Don Garcia était entre Zante et Modon, devant l'île déshabitée de Strafaria, étant parti de Cerigo, île vénitienne, avec l'intention d'y attendre l'armada turque "la qual forçosamante havia de pasar por alli".

312. J. B. E. JURIEN DE LA GRAVIERE, *op. cit.*, II, p. 224.

313. Le duc d'Alcala à Philippe II, Naples 12 sept. 1565, Simancas E° 1054, f°194.

314. Pedro d'Avila à G Perez, Rome, 22 sept. 1565, J. J. DOLLINGER, p. 629. A minuit le cardinal Pacheco a envoyé un courrier à S. M. avec la nouvelle de la victoire. Le card. Pacheco à Philippe II, 23 sept. 1565, *CODOIN*, CI, p. 106-107.

315. Constantinople, 6 oct. 1565, Simancas E°1054, f°210; Pétrémol à charles IX, Constantinople 7 oct. 1565, E. CHARRIÈRE, *op. cit.*, II, p.

804-805.

316. Voir note précédente.

317. Garces au duc de Florence, Madrid, 22 sept. 1565, orig. en esp.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7, f°148.

318. Cité par J. B. E. JURIEN de LA GRAVIÈRE, *op. cit.*, II, p. 201.

319. Le cardinal Pacheco à Philippe II, Rome, 23 sept. 1565, *CODOIN*, CI, p. 106-107.

320. FOURQUEVAUX, *op. cit.*, I, p. 10-14.

321. Constantinople, 25 sept. 1565, Simancas E°1054, f°205.

322. FOURQUEVAUX, *op. cit.*, I, p. 6.

323. *Ibid.*, p. 13.

324. Constantinople, 16 déc. 1525, Simancas E°1055, f°14.

325. Philippe II à Figueroa. 5 nov. 1565. Simancas E°1394.

326. Fourquevaux au roi, 21 nov. 1565. FOURQUEVAUX, *op. cit.*, I, p. 10-14.

327.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7 *bis*, 29 déc. 1565, FOURQUEVAUX, *op. cit.*, I, 36, 25 000 écus plus 3 000 Espagnols.

328. Garci Hernandez à Philippe II, Venise, 26 juill. 1565. Simancas E° 1325.

329. Saint-Sulpice, 22 janv. 1565, E. CABIÉ, *op. cit.*, p. 338; Philippe II à Figueroa, 3 févr. 1565; Garces au duc de Florence,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9, f°64.

330. Bayonne, 1er juill. 1565, A. N., K 1504, B 19, n°46.

331. Luis CABRERA de CÓRDOBA, *op. cit.*, I, p. 423, donne les dates des 8 et 14 juin.

332. Le duc d'Albe et D. J. Manrique au roi, Saint-Jean-de-Luz, 11 juin 1565, A. N., K1504, B 19.

333. Les mêmes au même, Bayonne, 28 et 29 juin 1565, *ibid.*, n° 37 (résumé).

334. F. de Alava à Philippe II, Toulouse, 7 févr. 1565, A. N., K 1503, B 19, n°33 *a*. Note autographe de Philippe II en marge.

335. Il faut tenir compte, en effet, des délais de route.

336. Saint-Sulpice à Catherine de Médicis, 16 mars 1565, E. CABIÉ, p. 357-358.

337. Aranjuez, 12 juin 1565, A. N., K 1504, B 19, n°11.

338. Il est bien possible, à la rigueur, que ces roberies soient fictives, H. FORNERON, *Hist. de Philippe II*, I, p. 322.

339. Voir *supra*, note 5, p. 327.

340. *Op. cit.*, I, p. 20, 25 déc. 1565.

341. D. Francés de Alava à Philippe II, 13 déc. 1565, aut. A. N., K 1504, B 19, n°95.

三　神圣同盟的起源：1566—1570年

从1566年到1570年，各种事件迅速发展，转趋直下。这或许是1565年秋季马耳他的戏剧性变化突然地、糟糕地结束了的相对安宁时期必然产生的后果。

但是，局势仍然变幻莫测……西班牙帝国新建的和增强了的力量将表现在它在地中海实施它的强劲有力的图谋和征战事业方面，还是被引向菲利普二世的强大威势的另一极——荷兰？这种种犹豫不决，是政治气候长期变化无常的原因之一。最终起作用的是谁？是人还是各种环境？后者有时被荒谬地加在一起。是西方还是土耳其统治下的东方？后者始终"吊在空中"，准备向基督教世界猛扑过来。

1. 是荷兰还是地中海？

庇护五世的当选

1566年1月7日，一次出乎意料的选举把以亚历山大红衣主教这个名字为当时的人所知的吉斯利里红衣主教推上教皇的御座。他出于对保证他当选为教皇的查

理·博罗梅和他那一派的感激，起名庇护五世。他这样做还为他的前任带来荣誉，尽管这位前任并没有特别喜爱过他。庇护四世和庇护五世两个人之间的对比是鲜明的。前者出生于米兰的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是政治家、法学家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庇护五世则在幼年做过羊倌，是无数穷人孩子之中的一个。在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时代，天主教会经常在这些孩子当中物色它最热心的仆人。此外，随着这个世纪的流逝，是他们——穷人——越来越成为为教会定基调的人。这些人是穷人，或者正如阿尔方斯·德·费拉尔于1566年力图使他的伯父伊波利特·德·埃斯特红衣主教当选但种种努力悉付东流之后轻蔑地称呼他们那样，是新贵。庇护五世正是这些新贵中的一个。他不是"王侯似的教皇"，不是通晓世故、准备妥协的人。（而没有妥协，世界就不会存在。）他有穷人的那种热诚以及激烈和不妥协的精神。他有时还有穷人的那种极端严厉、拒不饶恕人的性格。当然，他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因为文艺复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历史学家把这个教皇比作中世纪的教皇。另一个历史学家提出他有些像圣经里的人物。[1] 我倒倾向于赞同这种看法。

他1504年1月17日[2] 出生于亚历山大附近的博斯科，仅仅由于偶然的机会才得以上学读书。他14岁进沃格拉的多明我会的修道院，1521年在维杰瓦诺的修道院立誓，7年后在博洛尼亚和热那亚完成学业，被授予神父品级。从那时起，这个后来成为教皇庇护五世的亚历山大的弗拉·米歇尔就是多明我会修士中生活最简朴艰苦的人。他清贫度日，始终不渝。他旅行时只是步行，背着褡裢。荣誉来到他那里时，总是迫使他肩负重任，而且总是伴随艰苦的任

务而来。他先任隐修院院长，然后任监督官，将近 1550 年任科莫教区宗教裁判所法官。科莫位于天主教的防御边界的要害敏感处。他在那里为信仰进行顽强的斗争。毫不奇怪，他于 1550 年下令没收成包成捆的异端书籍。这一行动为他带来闻所未闻的纠纷和争执，但也使他得以去罗马旅行并和宗教裁判所的红衣主教，特别和从那时起就对他颇感兴趣的红衣主教卡拉法建立了联系。卡拉法红衣主教的支持使他得以被任命为于勒三世管辖下的宗教裁判所的总委员。1556 年 9 月 4 日，保罗四世登基，他被任命为苏特里和内皮的主教。但是，这个教皇为了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任命他为宗教裁判所所长。1557 年 3 月 15 日，教皇提升他为红衣主教。这个未来的庇护五世的确是保罗四世十分赏识的人。他有保罗四世那样的不妥协的精神、激情和铁的意志……自然他和保罗四世的继承者庇护四世的关系相当糟，因为庇护四世过于“凡俗”、过于“老于世故”、乐于妥协、过于想讨人欢心，以致不能同“亚历山大红衣主教”融洽相处。1566 年当上教皇的这个人本应起名为保罗五世。

在这个时期，这个脑袋光秃、胡须长白的老人，这个瘦骨嶙峋的苦行者[3]，生气勃勃，精力充沛，活跃积极。即使在罗马刮可怕的西罗科风的季节，他也从不休息。他也箪食瓢饮，过着清苦简朴的生活：“他中午吃面包和汤、两个鸡蛋、半杯酒；他晚上吃菜汤、生菜、几只贝壳类动物和一只煮水果；肉每星期只在餐桌上出现两次。”[4]1566 年 11 月，他像往常一样，不乘坐跟在他身旁的轿子[5]，在海边步行，视察防御工事。正是他的德行，而不是他的或者王侯们的密谋策划为他带来红衣主教团的选票。这些王侯这一次没有插手选举[6]。1565 年，雷克森斯致函菲利普二世说：“这是一个神学

家，一个好人，一个生活的典范，一个宗教热情很高的人。这是目前我们需要的任教皇的红衣主教。”[7]

庇护五世登上圣彼得的王位后仍然保持他过去的品质并且在他还在世时就已经成了传奇式的人物。从他任教皇的第一年起，雷克森斯就多次说过，3个世纪以来，教会没有过比庇护五世更好的首领，这是个圣人。在格朗弗勒的笔下也有同样的评论[8]。不可能谈及庇护五世而不考虑他的特殊性格和奇行异操。最微不足道的文章通过他的手写出也给人一种感情激烈和亲临谈论的奇怪印象。他生活在超自然的环境中，沉浸在虔敬热忱中。他不属于这个陷入卑鄙龌龊的政治谋算中的尘世这个事实，使他成了一股巨大的、无法预见的、危险的力量。一个王家顾问1567年写道：“我们宁愿现在这个圣父死去，不管他多么神圣、多么无法形容、多么无法衡量、多么超凡出众。”[9] 必须相信，对某些人来说，这种神圣性乃是一种约束……

庇护五世不妥协让步，他耽于幻想并充分意识到基督教徒同非基督教徒以及同异教徒之间的冲突。他的梦想是进行大战，尽快平息使基督教世界陷于分裂的、为害自身的冲突。他很快恢复执行庇护二世的让基督教君主们结成同盟以对付土耳其人的计划。他最先做出的姿态之一，就是要求菲利普二世停止同法国国王之间的关于在先权的争执。教皇庇护四世统治时期，这种争执曾经导致召回雷克森斯[10]。因为存在着这种争执，所以有人千方百计把法国国王推入与土耳其的联盟中。

他最先做出的另一个姿态，就是促成西班牙的海上武装。在教会收入方面对西班牙所作的让步、必须给予教皇亲属和宠信的赏

赐、附加的支出以及这些所需要的时间等问题所引起的讨价还价，都是尽人皆知的。庇护四世批准给予西班牙帆桨战船的为期5年的补助恰好在选举新教皇的时刻到期。新当选的教皇未经讨论就立刻批准延续这笔补助。1566年1月11日，庇护五世登基四天后，雷克森斯在写给贡扎洛·佩雷斯的信中毫无保留地对这笔未花费国王一个马拉维迪的五年补助金表示高兴。“上次这笔补助让我们付出了我们的来自那不勒斯王国的封臣的定期收入1.5万杜卡托，付出了在西班牙为教皇的侄子们提供的年金1.2万杜卡托，用于派遣负责谈判的大臣的巨额费用还不计算在内”[11]。教皇不同，习俗各异。教会显然在庇护五世身上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坚决进行一次新十字军东征的领袖，1566年的各种事件只能创造一种有利于十字军东征的气氛。

土耳其人在匈牙利和亚得里亚海

1565年11月和12月来自黎凡特的消息令人惶惶不可终日。1565年12月30日，威尼斯大使在红衣主教教皇选举会会场门口与其他人一道被正式接见。他鉴于消息很坏，恳请红衣主教们尽快选出一位教皇[12]。关于一支甚至比包围马耳他的那支舰队更强大的舰队来临的消息，正被人“众口一词地”广泛传播。

11月和12月的公文急报说明了参谋部进行重大部署的原因。1月16日菲利普二世提醒昌托奈，鉴于有消息传来说，这次土耳其舰队比1565年的那支土耳其舰队拥有舰船更多，作战能力更强，他决定加强两处最受威胁的要塞的防务。他把从老部队抽调出

来的西班牙士兵1,000名、德意志士兵2,000名和意大利士兵3,000名派往马耳他编入骑士团。他派遣训练有素的西班牙士兵5,000名、意大利士兵4,000名和德意志士兵3,000名，共1.2万名去新建堡垒尚未竣工的拉古莱特。因为堡垒内没有空地，所有这些增援部队都在堡垒周围水源丰沛的"山"里安营扎寨[13]。这些计划包括大量具体措施和行动指令。菲利普二世的精细的官僚机器十分长于此道。他的工作这次不是悄悄进行，而是故意大事张扬，被驻马德里的外国大使们察觉[14]。命令公开发布，人人皆知。官员接二连三任命：阿斯卡尼奥·德拉·科尔纳被任命为派往马耳他的德意志军队司令；阿尔贝公爵的儿子东·埃尔南多·德·托莱德被派往拉古莱特任职；阿尔瓦罗·德·桑德被派往奥兰任职[15]。1月26日，富克沃提到要运送从那不勒斯的守备部队中抽调出来的2,000名西班牙士兵去奥兰。他竟至写道，西班牙人目前希望土耳其人前来进攻阿普利亚和西西里，因为他们肯定，在这样的形势下，"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将奔赴援救"。一个月后，同一个富克沃报告说，据称，西班牙国王表示愿意给予威尼斯人四座意大利城市以便把他们吸引到反对土耳其人的同盟中来[16]。

围绕着西班牙的重新武装所进行的广泛的宣传，使富克沃产生了怀疑。他寻思阿尔贝公爵向他提供的数字是否可能夸大。然而，这些怀疑没有丝毫根据，因为在国王的命令和通告中也有相同的数字[17]。还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西班牙一反常态，围绕着他们的战备工作大事声张。是为了掩盖另外一些准备工作吗？他们对在巴塞罗那和那不勒斯造船这件事上保持高度沉默。这项造船工程至少在那不勒斯因缺乏苦役犯而受到阻碍[18]。

这时从君士坦丁堡传来如果属实就会使这些预防措施中的相当一部分变为毫无用处可言的消息。1月10日的一则消息说，土耳其舰队即将出航，但这支舰队比曾经进攻马耳他的那支小，因为土耳其人缺乏划桨手和军火。根据预测，100艘帆桨战船将在皮亚利帕夏的率领下出航，不会有什么大规模的行动，但可能是一次向西远达热那亚河的袭击，其目的在于阻碍西班牙舰队集中。此外，还传来这条引起轰动的消息：所有迹象都已证实年迈的苏里曼准备御驾亲征，前往匈牙利并从该地向维也纳进军[19]。的确，1565年战争已在巴尔干漫长的边界上重起。马克西米利安白费力气，急忙派遣代理人和发送信函去阻止这场战争，并促使回到1562年达成的停战协定的范围内。殊不知回到这个范围内已经远非此时正在进行大规模战备活动的素丹之所求了。据传，素丹拥有土耳其士兵20万名和鞑靼士兵4万名。土耳其首领正在为发动战役进行准备，为购买骆驼和马匹耗用钱财。这些骆驼和马匹价格奇昂。还发生了一件颇具征兆性的事：罗得岛年迈的县长、希腊群岛的守卫者阿里·波尔杜克率领他的帆桨战船出发前往多瑙河，其任务是在那里教人制造船舶、风帆和索具等物以备渡河之用[20]。

使用海军进攻西方的计划并未放弃。2月27日，划桨人员抵达君士坦丁堡[21]。这是帆桨战船已经准备就绪的迹象。据说这些战船将于4月1日左右出发。但是，所有的消息一致报导说，战船总数不到百艘[22]。如果匈牙利发生战争，地中海方面的危险预计较小[23]。可能因背教者为数很多而一直在黎凡特拥有最好的情报机构的热那亚，从一封2月9日的信中获悉土耳其舰队正计划驶入“威尼斯”湾，首先进攻阜姆，并计划在该地收集了数量肯定将极为

巨大的战利品后打开一条通路，前往援救在匈牙利的土耳其皇帝的军队[24]。这支舰队将只在获悉西班牙舰队尚未集中时才继续向前推进。

从此人人开始放心。4月18日，雷克森斯写信给国王说，马耳他人认为压在他们身上的巨大困难从此完全消除[25]。5月，菲利普二世似乎要马上下令取消在冬季采取的重大措施[26]。那不勒斯总督亟欲厉行节约，4月20日要求一俟他从那不勒斯收回已经借给东·加西亚·德·托莱多的、可能在西西里和拉古莱特驻守的西班牙士兵中的1,500人时[27]，就解雇德意志士兵。

然而，3月30日，土耳其舰队已经驶离君士坦丁堡。有消息说，这支舰队有帆桨战船106艘。另外一些消息则说，只有90艘，其中包括亚历山大的10艘[28]。但是，这支舰队并不急于穿过希腊群岛驶越爱琴海。它在那里没有进行战斗，首先是致力于结束热那亚人对希俄斯岛的统治。开始时，它限于把在希俄斯岛上领导贸易组织团体的热那亚人和他们的妻室儿女流放到黑海的加法[29]。5月10日，科孚的人仍然认为这支舰队将驶进海湾[30]，7月10日才看见它在岛的海峡内[31]。11日，这支舰队抵达发罗拉[32]，再从那里迅速开往都拉斯，然后前去科托尔海峡和卡斯特尔努奥沃。它可能于23日抵达卡斯特尔努奥沃[33]。

马耳他骑士团团长和东·加西亚·德·托莱多得到这些消息后，决定调离他们不需要的部队，因为季节已经太晚，土耳其舰队无法采取任何攻击这个岛屿的行动[34]。因此，18艘帆桨战船驶来撤运德意志士兵。几个月前被任命担任菲利普二世调往这个岛屿的部队的总司令的佩斯卡尔侯爵，因为那里不再有事可做，便离开他

的岗位。土耳其舰队驶入亚得里亚海，远没有引起任何惊扰。这个行动似乎倒使西班牙人宽慰地松了一口气……海湾问题毕竟是威尼斯人的事啊！现在该由他们去进行武装、谈判和采取预防措施了。对西班牙人来说，这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危险呢？那不勒斯海岸处于戒备状况，防守严密，内地居民内撤若干里。

根据威尼斯人的情报，大约在7月21日到达科托尔的土耳其舰队有帆船140艘，其中有帆桨战船、荷兰圆头船和低舷长形船共120艘。22日，皮亚利帕夏率领帆桨战船3艘直抵拉古萨，在该地接受了圣布莱士共和国的贡品[35]。几天以后，土耳其舰队开始进攻阿布鲁齐的贫瘠海岸[36]。7月29日，它在弗朗卡维拉附近让6,000到7,000人登陆，占领居民丢弃的城市并纵火焚毁。1艘帆桨战船由两艘小船伴随从弗朗卡维拉出发对佩斯卡拉水域进行侦查。但是，从这座设防城市只打了几炮，这3艘侦查船就掉头返航。土耳其舰队驶往奥尔托纳·阿·马尔，也发现该城已经撤退一空，于是把该城连同海岸上的几个村庄付之一炬。8月15日，土耳其军队的一支尖兵深入内地8里，直抵卡皮塔纳塔省的卡普里奥拉山。但是，这支部队运气不佳，遭到对方出人意料的、猛烈的抵抗，于是仓皇后撤，溃不成军。6日晚，土耳其舰队在瓦斯托的海域出现，有帆桨战船8艘，但在夜间消失。10日，人们在那不勒斯通过卡皮塔纳塔的省长的信函获悉，恶劣的天气使4艘土耳其帆桨战船在福尔托尔附近的海域搁浅[37]。船员自然得救，但得到命令从船上取回大炮和索具，然后把船付之一炬。土耳其人本来可以设法使这些船只再浮上水面。上述报导又说，如果敌舰队再驶来进攻那不勒斯王国的海岸，那么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战备情况良好。这时，有关当局对

土耳其人前几次进攻收效甚微感到高兴。总督获悉舰队离开希俄斯，下令在海岸上所有未设防的地点实行坚壁清野。于是，土耳其人来时发现海岸已经空无一人。他们一共俘虏3人。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嘲讽。过去，土耳其舰队每次驶来那不勒斯王国海域，它都会掳走五六千人，即使它背后有西班牙国王陛下的大批帆桨战船追赶时也是如此。至于物质损失，则比人们最初担心的少[38]。

土耳其舰队似乎已经在返航途中。8月13日，它在卡斯特尔努奥沃为舰船龙骨涂抹油脂，然后驶往勒班陀。这支舰队的划桨囚犯情况相当糟，并因瘟疫流行而数量锐减。不久以后，它返回普雷维扎。据说，它又从该地扬帆启航驶往君士坦丁堡[39]。9月，它返回当时称为“西马拉”的阿尔巴尼亚[40]。此举有些令人吃惊。它溯流而上，直抵发罗拉。这一行动仅仅是为了惩罚造反的阿尔巴尼亚人吗[41]？总督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但并不为此过分感到不安，因为那不勒斯的海军已经处于戒备状态。那不勒斯的德意志士兵已经被西班牙士兵替换。新的危险在冬季到来之前已经无声无息地自行消除。

1566年的海上战役的最后阶段的情况就是这样。两方面的情况相同：土耳其方面在亚得里亚海很少活动；西班牙方面则止于坐待一次规模不大的战役。西班牙人避免猛攻阿尔及尔或者突尼斯。在某个时期，他们曾经让人认为他们有这种意图[42]。他们满足于这一年平安无事，不受烦扰，而这一年其他人却受到袭击，遇到危险。威尼斯过去对别的国家太漠不关心，以致现在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怜悯。它现在似乎是敌人攻击的唯一目标。土耳其人一反常规，来到亚得里亚海海湾中的威尼斯。威尼斯惊恐万状，迅速采取对

策。7月份，它下水帆桨战船100来艘[43]。或许就是这种坚决的态度遏阻了土耳其人北进。然而，不管情况如何，威尼斯仍然异常惶恐不安。意大利和教皇也同样忧心忡忡。后者甚至同意支持威尼斯的要求。7月底8月初，他教亚历山德里诺红衣主教致函东·加西亚·德·托莱多，同时自己也写信给他，力劝他率领自己的舰队前往布林迪西，因为威尼斯人说过，他们正在武装100艘帆桨战船，如果把这些舰船加进东·加西亚的帆桨战船中，他们就能向土耳其舰队发起猛攻[44]。8月7日，东·加西亚回信[45]，向教皇发誓他要像保卫西班牙国王的各个邦国那样保卫天主教会的各个邦国，但他没有接受大胆的计划。土耳其舰队在西班牙军队和威尼斯军队的夹击之下，很可能无法逃脱。但是，当威尼斯自以为受到威胁时，可能只想短期作战。明智审慎、体弱多病的东·加西亚·德·托莱多奉命向南推进。教皇毫无疑问是唯一的认为这是摧毁苏里曼的舰队的大好时机的人。

这场亚得里亚海的战争，不管它最终的影响多么有限，由于当时在同一时刻震撼全欧，引起大乱，因此仍然惹人注目。在法国，譬如在布朗托姆，这是青年骚动、外出旅行、情绪不安的时刻…：某某和年轻的吉斯公爵一道前往匈牙利作战；某某去那不勒斯；某某像蒙吕克的儿子那样在大西洋上冒险并于攻占马德拉时丧生[46]。似乎谁也不愿蛰居家中，安分守己度日。甚至菲利普二世自己也谈到外出旅行。战争横越差不多在8月份进行叛乱的荷兰，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正在到处露面。战争把欧洲大陆上激烈的斗争的粗大的红线拉长到黑海上，并把亚得里亚海的海战延伸到黑海的辽阔海域。

匈牙利战争再起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之死(1564年7月25日)成了土耳其要求付清贡款尾欠并对1562年的停战提出异议的借口。贡款尾欠于1565年2月4日付清[47]。作为回报,休战时限再延长8年。但是,并不放弃其进攻特兰西瓦尼亚的计划的马克西米利安却调集大军攻占了托凯和塞伦克斯。而在特兰西瓦尼亚或者从这一方面接触或阻挠土耳其人的行动,就是使潜藏的分裂不和死灰复燃,进行一场"捂着的"战争。这场战争照例会导致一系列突然袭击和包围。1565年,匈牙利漫长的边界线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安宁。马克西米利安像卷入马蜂窝那样卷入特兰西瓦尼亚的争端,徒劳无益地作了和平的、只在某种程度上是真诚的努力,因为他希望和平却又不打算作丝毫让步。此外,他面对着势盛力强、满怀敌意的土耳其首相穆罕默德·索科里。素丹自己亟欲通过取得一次辉煌的胜利来抹除他在马耳他之战中蒙受的奇耻大辱。布达的帕夏阿尔兰从他的前卫岗位不断描述基督教匈牙利的军队武器粮秣短缺到了何种程度,以此来竭力促使战争爆发。他以身作则,于1566年6月6日向帕洛塔小要塞猛扑。但是,他的行动有些仓促草率,因为正当他即将攻克这个要塞之际,神圣罗马帝国军队解救了这个要塞,并且趁这股锐势,乘胜追进,攻占了韦斯普里姆和塔塔,在城里不分敌友,不分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见人就杀[48]。

匈牙利战争就这样烽烟再起。不能说这是一次突然袭击。在维也纳人人都知道土耳其必然会对此作出反应。德意志议会已经同意这一年给予25罗梅尔莫纳特的特别援助,以后3年每年增加

8 罗梅尔莫纳特的援助[49]。1566 年 4 月 29 日西班牙驻伦敦大使谈到这项援助时，提到 2 万名步兵、4,000 名骑兵和为期 3 年等数字[50]。与此同时，马克西米利安从罗马教廷和菲利普二世那里得到金钱和兵员等方面的援助，其总额我们现有的文献资料说法不一，但毫无疑问数额十分巨大。1566 年 3 月 23 日，托斯卡纳在马德里的代理人提到 6,000 名西班牙士兵和每月 1 万埃居等数字（菲利普二世从 1565 年起就提供了这些兵员和钱款[51]）。这笔钱通过富格家族和热那亚银行家支付[52]。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后（6 月），这个代理人谈到每月 1.2 万埃居，已经支付的 30 万埃居还不计算在内[53]。

因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既有时间又有能力进行备战。夏天，他把一支成分复杂的 4 万人的大军[54]调集到维也纳附近。这支军队只能使他进行防守。他除了防守之外别无其他意图。君士坦丁堡和布德遥隔千里。他设想土耳其的庞大的军队不会很快到达。走完这段距离估计需要 90 个白天工作日……这样一来，这支军队只剩下很少时间作战，因为，从 10 月起，这支军队将为严寒和供应困难所阻。对一支数量巨大、置身于几乎空空如也的地方的军队来说，军需供应方面的困难很大。以上至少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威尼斯大使莱奥纳多·孔塔里尼不无夸张地作出的解释[55]。同样，这位大使难道 6 月 20 日没有模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传达了些显然夸大的数字吗？根据这些数字，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有步兵 5 万名、骑兵 2 万名，再加上一支强大的多瑙河舰队[56]。

实际上，马克西米利安的军队的素质似乎与布斯拜克曾经在 1562 年见过并且曾经严加评论的那支军队的素质并没有什么两

样。富克沃认为战争不会转而对马克西米利安有利，他希望“土耳其皇帝能够坚持进行匈牙利战争，因为如果在那条战线上出现和平，德意志这条害人虫就太可怕了”。[57]他这样想并没有错。对自己内部发生宗教战争并经常遭受德意志雇佣骑兵蹂躏的法国来说，不幸的是，和平将于1568年在匈牙利恢复，而且一直持续到1593年。

一支分为好几个兵团的土耳其大军向匈牙利推进，同马克西米利安的军队对抗。根据查理九世收到的情报，这几个兵团共有30万人，按照它们惯常的方式，“装备着火炮和其他武器，弹药之多令人望而生畏”[58]。5月1日，素丹以比他在过去进行的12次战役中的任何一次都更加威严煊赫的排场离开君士坦丁堡[59]。从君士坦丁堡通向贝尔格莱德的军商两用大道上，他乘车途经安德里诺普尔、索非亚、尼切等地，因为他的健康状况不再允许他骑马。御驾行驶的崎岖不平的道路事先好好歹歹总算已经平整。与此同时，一路上有效地驱赶了前来袭扰土耳其军队、特别是前来抢劫军队补给的土匪。必须经常在宿营地附近架设处决这些匪徒的绞架。在比贝尔格莱德更远的地区，重大问题不在于同特兰西瓦尼亚的首领进行谈判，而在于渡涉江河。7月18日和19日，在查巴茨渡过萨韦河[60]；在武科瓦尔附近渡过多瑙河[61]；在埃塞格渡过德拉瓦河[62]。每次渡河，军队都必须在水位很高的河上架设桥梁。特别在多瑙河，这项工作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军队通过埃塞格后，一起事件——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将领指挥的一次成功的袭击——使土耳其军队转向驻防城市锡盖特(或锡盖特堡)。这个城市离佩奇相当远，正好由上述将领尼古拉·兹里尼公爵率军防守。8月5日，素

丹率军到达环绕这座城市的沼泽前面。9月8日,这个城市被攻占。

然而,土耳其的行动刚刚开始,就已经注定失败。因为取得这次胜利3天前,9月5日和9月6日之间的夜晚,苏里曼大帝去世。哈默说:"或者死于年老体弱,或者死于痢疾,或者死于中风。"[63]这些倒无关紧要。但是,就是这个日期被很多历史学家视为"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64]的日期。既然这个其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首脑的帝国在这个时刻从大帝手中,从"立法者"(土耳其人这样称呼他)的手中转入懦弱无能的"犹太女人的儿子"、喜爱塞浦路斯的酒甚于喜爱打仗的塞里姆二世的手中,这种看法倒是一个具有某种意义的对事物的明确解释。首相穆罕默德·索科里隐瞒了君主的死讯,让塞里姆来得及从库塔雅迅即前往君士坦丁堡,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就顺利地登上空缺的王位。战争持续到冬季,断断续续,交战双方互有胜负,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交战双方都宣布获得胜利。例如1566年9月1日,查理大公从位于主要战场边缘的戈里齐亚[65]宣布:克罗地亚的统领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突然袭击;这位统领带着俘虏和在波斯尼亚抢来的家畜、牲口等凯旋而归……这个消息立刻经由热那亚传到西班牙。难道就是这同一起事件使人在巴黎盛传在查理大公和土耳其人之间发生了一次重要的遭遇战,而且据说弗拉拉公爵在这场战斗中阵亡吗[66]?

事实上,战争差不多已经结束。冬季来临,土耳其军队撤退。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不需要人来"砸烂"就自行解散。9月在巴黎流传的消息说,同土耳其的停战协议将在国会闭会之前缔结[67]。至于菲利普二世,他早在9月份就深谋远虑地要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在土耳其军队撤走的情况下将遣散的"一切都保留起来供他自己使用[68]。他采取这项预防措施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这个1566年刚刚目睹地面上打开了一个深渊：荷兰的深渊。

1566年的荷兰[69]

对荷兰战争的由来已久的错综复杂的根源——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如果人们想到1565年的大饥馑的话）[70]、宗教的以及文化的——进行研究，或者跟在其他历史学家之后人云亦云，说什么冲突不可避免等，全都不在我们论题的范围之内。我们关心的只是这场冲突对菲利普二世的外交政策的影响。这场冲突在戏剧性的马耳他之围发生后不久，迫使菲利普二世的外交政策离开地中海转向北欧。在荷兰仅仅在名义上属于西班牙的这个时期（或者假定直到1544年，这一年荷兰变成对抗法国的坚强堡垒，在以后一个多世纪内一直是这样一个堡垒；或者假定直到1555年查理五世退位），一直到1555年，这个荷兰实际上自行其是，自由行动，起十字路口的作用。它的每扇大门都向德意志、法国、英国等大大敞开。它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有它自己的权利、政治保护措施和财政特权。它是第二个意大利。它高度城市化，高度"工业化"，依赖外部世界。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它难于管理。它仍然比人们有时想象的更加具有那种其土地被占有的社会的性质，并因而有诸如奥朗日家族、蒙莫朗西家族（这个家族的法国支系是小房）或者埃格蒙特伯爵家族等势力强大的贵族。这个贵族关心自身的特权和利益，亟欲进行统治，和遥远的西班牙宫廷内的党派争吵有密切关联，从1559年以来则特别和鲁伊·戈梅

兹领导的和平党有着联系。这就打开了认识的视野。如果人们想撰写一部完整的荷兰动乱的历史的话，就必须指出这个视野的重要性。

位于这个地带的荷兰，仅仅它居于北欧地区的心脏的这个地理位置，就足以说明它为什么必然逃脱不了宗教改革的各种潮流的影响。宗教改革的思想通过陆路和海路传播。宗教改革以路德教派的形式迅速传播到讲佛兰德语的各个地区。这个世纪中叶，宗教改革在这些地区提出它那宽容的解决办法：宗教和约，即尚未定型的南特敕令[71]。但是，不久以后，宗教改革通过南部这个提供小麦和酒类的地区，通过法国，更加广泛地获得成功，这次有利于加尔文教派，亦即有利于这种"罗曼语民族的"具有战斗性的和咄咄逼人的宗教改革[72]。这种改革创立了它的主教会议，即活跃的基层组织。这种基层组织是奥格斯堡和约所没有预见到的，也不会容忍的。宗教改革首先渗入法语国家，并且大大超出这个地区，在荷兰的整个十字路口取得胜利。它因此促使这个十字路口进一步向南开放。荷兰在政治上摆脱德意志后，精神上也摆脱了德意志，转而朝向动乱不止、四分五裂的法国。由于路德派教徒人数减少，对他们的迫害在那里变得困难起来。另一方面，英国近在咫尺，以致尽管荷兰与之竞争，但并不能逃脱它的影响和它的坚定不移的政策。此外，英国向遭受迫害的佛兰德人，甚至对地位最低下的人，例如居住在诺里奇的工人，提供避难所。这种援助形成联系北海的彼岸和此岸的纽带。

显然，必须区分震撼荷兰的种种潮流。它们不全都来自同一根源：有民众骚乱（特别是宗教性骚乱，这往往是社会性的骚乱）和贵

族骚乱。后者最初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它表现在1564年格朗弗勒红衣主教的被召回和1566年4月在卡伦堡市政大厦的和解结盟这两起事件上。贵族骚乱先于8月下半月的暴乱4个月发生。8月下半月的暴乱，是一次民众的、破坏文物艺术的暴乱，它导致抢劫教堂和撕毁圣像，从图尔内一直蔓延到安特卫普，扩及荷兰的整个领土，其速度之快令人惊骇。总之，有两种不同的运动。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的手腕灵巧就在于使这两种运动互相对抗。她使除了到达德意志的纪尧姆·德·奥朗日和布雷德罗德之外的贵族转而反对民众和城市。她这样做，即使没有重建自己的权威，也恢复了秩序。她没有花费钱财，没有使用武力，而是使用灵巧的手腕。

但是，这项政策有它的限度，并且在西班牙国内、国外都有反对者：在罗马的格朗弗勒和在西班牙的阿尔贝公爵。前者并不是袖手旁观；后者则有自己的党派作为后盾。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成功，的确损害了菲利普二世的权力和对天主教的保卫。她难道没有在事实上同意——尽管这种同意是非正式的——经过改革的宗教祭祀仪式在8月暴乱爆发之前这种祭祀仪式就已经盛行的地方继续实行吗？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让步，因为正如1565年布瓦·德·塞哥维亚的著名信件所证实的那样，在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是反对任何真正的让步的。他也许为了争取时间，同意某些细节方面的宽大，同意一项“总的宽免”（他说明这只在政治方面，而不是在宗教犯法行为方面）。总之，这是细小的让步。其唯一目的乃在于不使女总督、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的声誉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大量证据表明，他真正的意图是严厉对付叛乱事件。西班牙帝国在地中海这个场合的新生力量和舰队从美洲运回的大量白银等，菲利普二世

决定在北欧加以使用。是菲利普二世不妥协还是不了解情况？未来会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因为企图管理这个欧洲的十字路口的交通，是一种违反自然的、毫无希望的政策。正当荷兰在整个世界谋生，正当它对已经涌向它的大门并准备在必要时冲破它的大门的欧洲的其他地区变得必不可少的时候，试图把这个“在下面的国家”锁闭起来，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这里只列举几种使用过的万灵药：使它转变为有堡垒防护的营地（这是从1556年到1561年的情况），使它转变为特别的、自治的宗教行政体（正如人们用设立新主教区的办法所做的那样）和试图禁止大学生去巴黎旅行。这些万灵药全都是徒劳无益的措施。但是，使它转变为另外一个西班牙则将是更加严重的错误。然而，这仍然是受到西班牙束缚的菲利普二世1566年所梦想的……

菲利普二世在了解到8月下半个月民众暴乱的情况之前，致函他派往罗马的大使雷克森斯说：“你可以向教皇陛下保证：我宁愿丧失我的各个邦国，如果我有一百条生命的话，我宁愿丧失我的生命一百次，而不愿容忍会有损于宗教和为上帝的效劳的最细小的事物，因为我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异教徒的统治者。”[73]在罗马，人们对局势同样很不了解。庇护五世劝菲利普二世亲自进行强有力的干预。他于1566年2月24日写道[74]：“异端的瘟疫在法国和勃艮第蔓延得如此之快，以致我认为目前除了陛下亲自巡游视察之外，没有别的药可以对付。”关于这次著名的巡游视察，富克沃早在4月9日就已经谈到[75]。他无论在谈到把负责军事、粮食、军火事务的总专员、运输专家弗朗西斯科·德·伊巴拉召回西班牙这件事（这次召回可能产生重大的后果，“因为在西班牙除了这位总专

员以外，没有人负责这种事务"[76]），还是在谈到正在准备的、据说针对阿尔及尔但可能以荷兰为目标的远征的时候，他都经常提到这次巡行。的确，针对阿尔及尔的远征，不久就烟消云散。8 月份，又十分自然地再度盛传菲利普二世在佛兰德巡行的谣言。这个谣言不断具体明确起来[77]。

早在 8 月 18 日，富克沃就已经了解到有关方面正准备把西班牙在地中海的已经经过动员的大量兵力调往北欧[78]，即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撤出 5,000 到 6,000 名西班牙士兵和 7,000 到 8,000 名意大利士兵。这是在地中海前线和要塞的最精锐的部队。阿尔贝公爵所采取的大规模的行动的结果是：那不勒斯的西班牙步兵团在根特扎营；伦巴第的西班牙步兵团在列日扎营；西西里的西班牙步兵团在布鲁塞尔扎营[79]……这意味着直接或者间接解除地中海的武装。直接的方式是从作过战的精锐部队中抽调兵员；间接的方式是通过这些调动支用经费。在国务会议上难道没有人向菲利普二世谈起 300 万金币这个数字吗？

此外，执行这项政策时需要对北方采取一系列极其审慎的策略。例如对法国就是这样，这个国家的新教徒[80]正在准备援助他们的教友；又例如对德意志也是这样，奥朗日亲王和他的兄弟路易·德·纳索[81]在这个地方正不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禁令，成功地征募了军队；最后，对英国也是这样。这三处都是有危险的地方。西班牙对这些地方的个人、党派和君主都十分猜疑，必须提防[82]。菲利普二世和他的优秀的顾问和仆臣的注意力，必然从南方转向北方。

自然，这些措施在 8 月动乱后就显得更加必不可少。朋友和敌

人,甚至连阿尔贝公爵(在这一点上或多或少是真诚的)都对西班牙人进行反击之缓慢感到吃惊[83]。直到9月25日,圣絮尔皮斯才知道阿尔贝公爵将先于他的君主出发前往佛兰德[84],才知道制造动乱的人中的最受迫害的人——或者说至少那些最渴望逃脱西班牙的苛政酷刑的人——认为离弃这个危险的在下面的国家——他们的祖国——是审慎之举。他们之中的某些人逃往法国这个同样危险的国家。大批来自根特和安特卫普的弗拉米再浸礼教派教徒就这样蜂拥来到迪埃普安家落户[85]。

其次,这是有利于西班牙国王重振荷兰颓局(也许是由于玛格丽特的政策)或者似乎重振这一颓局的时期。1566年11月30日[86],西班牙国王指出"佛兰德事务的明显好转"。但是,他又说,局势还没有好转到可以稍微放松正在执行的措施的程度。

的确,这是11月30日,发生动乱几个月之后。但是,西班牙政府像平时一样,面临着两地遥隔这个问题和繁多的责任。它会更快行动吗?春季开始时,这个政府受到"乞丐"或者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受到"规劝者"的行动的突然打击;这年8月末又受到破坏圣像的群众性骚乱的突然打击。它能够立即准备进行反击吗?1566年12月初,阿尔贝公爵某天同富克沃进行会谈时可能道出了这次延误的真正理由。这些理由是:"土耳其人对基督教世界的进攻和其他一些妨碍西班牙去纠正它的荷兰臣属中的某些人的越轨过火行为的考虑。"[87]。土耳其在地中海上引起的惊恐情绪直到8月底才消失。在那个时期以前,怎样能使西班牙的这些久经沙场的、将在阿尔贝公爵的远征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军队转入预备状态听候使用呢?

相反，荷兰事件不再允许菲利普二世不采取预防措施就在地中海上贸然行动。这个双重的负担，这种双重的考虑，说明西班牙国王为什么采取这种犹豫不决的政策，说明他为什么遵从教皇的建议。教皇始终坚持劝他轮番在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采取坚定的、有效的政策，但并不了解菲利普二世在任何有问题的地区都负担不了全面地、深入地投入行动所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

庇护五世最初试图把菲利普二世拉入反土耳其联盟。这个联盟是皮亚利帕夏1566年夏季在亚得里亚海的属于意大利的水域内进行的战役，就已经使之复活、强化了的旧梦。12月23日，教廷驻西班牙大使向红衣主教亚历山德里诺汇报阿尔贝公爵向他发表的某些言论："（西班牙国王）陛下非常赞扬教皇陛下的神圣的热情和崇高的意愿……他也十分赞扬关于同盟和团结的想法"，但是，目前这种想法"没有用处，因为这样的举动只有当各个有关君主有完整的、可靠的力量的时候，只有当他们互相信任的时候，才能尝试，而目前这些力量分裂不和、已被削弱并且受到互相之间的猜忌怀疑的妨碍"。另一方面，西班牙国王目前应当"采取紧急的和必要的行动来对付他自己在佛兰德的臣民"[88]。阿尔贝公爵对国际局势作这样的悲观的描述，是为了突出它的乌云和威胁，并因而最终拒绝别人对他提出的要求。人们可以从公爵这种描述事物的方式中辨识出他惯用的说理辩论的方法。但是，这个观点似乎就是长期以来没有在荷兰和地中海之间进行选择的菲利普二世的观点[89]。

这是困难的选择，因为西班牙不能拒绝对土耳其人进行斗争。它必须抗击土耳其人，进行自卫。但是，进行自卫和进攻土耳其，这两者远非一回事。1566年末，西班牙政府不大愿意让地中海的那

种当然不是和平的，而是经常时隐时现的半战争状态恶化下去。它不想搅乱对它来说必不可少的或者至少是有利的欧洲的假和平。

因此，它怕通过一个新教世界也许不会毫无异议就接受的令人注目的联盟与罗马结合起来，因为这个联盟将会为沿着这个大市场开放的边境在荷兰制造动乱提供很好的借口。在德意志、英国、荷兰（在海军上将科利尼和孔代周围的那群人中），敌人已经作好进攻的准备，现在万事俱备只欠挑衅和借口了。因此，菲利普二世关心不要让荷兰的局势转变为宗教冲突。庇护五世劝他对异端进行公开的十字军讨伐，但白费力气。不管菲利普二世个人的想法如何，他在当时的环境下只愿意显得是个重新使臣民服从，使用他的不受时限约束的君主权利来对付臣民的君主。正如阿尔贝公爵12 月 9 日对富克沃解释的那样[90]，关于这件事，问题只在于“再使顽劣的臣民俯首听命、遵纪守法而已。争论的已经不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是对国王陛下公开的轻蔑，对国王的权威和命令提出的侮辱性的异议等问题。这对任何想进行统治，想使自己的各个邦国和平安定的君主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

这是明明白白的但又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言论。西班牙的大规模备战活动尽管被阿尔贝公爵说得完全“有理”，却在整个欧洲散布了极大的惊恐不安。这难道不是在征伐佛兰德的幌子下针对法国的行动吗？这就是富克沃的看法[91]。在法国，很多人都准备唯其马首是瞻。在这个国家有一股巨大的反对最近在佛罗里达屠杀了法国移民的西班牙人的狂热情绪。新教徒又蓄意激发这股情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焦虑不安的情绪虽然掩藏在极其彬彬有礼的风度举止中，但也未必小些。10 月，这位女王曾经公开对宣布的神圣

罗马帝国军队在对土耳其军队作战中取得的胜利表示高兴[92]。西班牙国王驻伦敦大使、多疑的 G. 德·西尔瓦惊呼:"但愿这是出自肺腑的由衷之言。"12 月 10 日,这位女王获悉菲利普二世将途经意大利前往佛兰德时,也公开表示她的失望。她说,如果他取道大西洋海路,她会十分愉快地尽主人之谊接待他的[93]。会有一支强大的军队随同国王吗?她希望这支军队还更加强大,强大得足以惩罚顽劣的忘恩负义的臣民[94]。这些过火的表态和申明没有骗过任何人,也没有阻止这位女王后来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教皇和西班牙国王可能结成的反对新教徒的联盟表示担心恐惧。甚至连威尼斯也找到对西班牙军队过境感到不安的理由,并且认为有必要让贝加莫处于警戒状态[95]。至于德意志的诸侯,他们有一千个政治方面的和宗教方面的理由忧心忡忡。1567 年 5 月,在阿尔贝公爵到达以前[96],他们就采取了预防措施。萨克森选侯、符腾堡公爵、勃兰登堡总督和赫斯总督等人的大使到达荷兰。他们的使命是请求保护路德派教徒(听从马丁·路德者),因为这些教徒并没有参加加尔文教派的叛乱。

但是,这里决不是研究 1566 年西班牙外交活动的突然扩展的场所。这项研究应该放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放在使这个世纪的教派冲突恶化的宗教的狂热激情的高涨的氛围中进行。同菲利普二世的不妥协或者笨拙相比,同他的所谓的不审慎的行动和他的真正的对事物缺乏了解相比,这种高涨在更大的程度上构成了荷兰的动乱的根源。

1567—1568年：在荷兰的局势的影响下

1567 年和 1568 年，地中海变成了西班牙发挥能动性和展示力量的次要场所，这是因为这种能动性固定在别处，也是因为这种能动性在地中海遇到一种几乎普遍的、共同的裁军的趋势。就西班牙而言，这是容易解释的。它的生动活泼的力量、它的金钱、它的注意力都使用在内海之外。至于在奥斯曼帝国方面，则无法作出确切的解释。可能这个帝国正受到它在波斯前线遇到的困难的困扰[97]，但这些困难比君士坦丁堡的公文急报所说的小。也可能它受到正在继续进行的匈牙利战争的阻碍，但这场在 1567 年的整个晴好季节里进行的、没有什么冲劲的战争（这场战争唯一引人注目的生动插曲是鞑靼人发动的而不是土耳其人发动的对奥地利边境的袭击。据说他们在这次行动中俘虏了 9 万名基督教徒，但这确有其事吗？）以 1568 年 2 月 17 日签订一项为期 8 年的新停战协定告终。这项协定的缔结从上一年起就已经开始谈判[98]。也可能土耳其人在阿尔巴尼亚遇到某些困难[99]，但这是长期的、次要的困难。至于他们在埃及和红海遇到的困难[100]，至少直到 1567 年，这些困难并没有触动帝国的最根本的生活。我们难道应该用土耳其在 1556 年的匈牙利战役中遭受的重大损失或者用并不穷兵黩武的塞里姆二世的登基来解释土耳其的按兵不动吗？这正是他那个时代的人发表的看法[101]，也是历史学家继他们的同代人之后，人云亦云发表的看法。这可能是真实的，虽然不要忘记，在苏里曼的“配不上他的继承人”（正如 G. 哈尔特劳布所说[102]）或者第一个“游手好闲的素丹（正如 L. 兰克所说[103]）的后面站着一个积极活跃的首相、令人惊讶

的穆罕默德·索科里，一个无愧于伟大的苏里曼时代的人。可能这平淡无奇的1567年和1568年两年，隐藏着打击和预先孤立威尼斯的秘密图谋。1567年8月，公文急报报导了面对塞浦路斯的卡拉马尼的要塞的修建工程。人们已经从这件事中得出即将进攻这个岛屿的结论。塞里姆和他的顾问是为了能够随心所欲地进攻威尼斯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订了1568年的停战协定吗？

土耳其遭到连续几年歉收的暗地的但却强有力的打击，这一点也是肯定无疑的。1566年，2月，威尼斯请求菲利普二世提供谷物。仅仅根据这个细节，我们就可以确定东方的困难[104]产生的最早日期。一份"值得相信"的公文急报指出，4月份，埃及和叙利亚发生饥荒，有人饿死[105]。难道不正是这种经济形势说明了阿拉伯世界为什么同时发生动乱吗？在地中海的东部水域，在整个希腊以及在从君士坦丁堡到阿尔巴尼亚这一带地区[106]，第二次收成，即1566年的夏收，特别糟糕。人们对1567年又是一个困难的年头并不感到惊奇。哈埃多指出阿尔及尔严重缺粮。这次粮荒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即1568年[107]，因为1567年的收成似乎于事无补。9月，那不勒斯总督的代表报告君士坦丁堡的面包贵得吓人[108]。瘟疫这个任何灾难的几乎不可分离的伴侣，也同时出现[109]。1568年3月的一份宣布同神圣罗马帝国缔结的停战协定的公文急报特别谈到，这项停战协定是由于摩尔人的骚动、粮食的昂贵，特别是由于大麦的昂贵[110]……才签定的。因此，可以认为1567年的收成最多也只不过是中等而已。一直到1568年的庄稼收割之后，才有一封信传来这份乐观的公报："君士坦丁堡卫生状况良好、粮食充足，尽管大麦短缺。"[111]在从1567年到1568年这个时期内，西地中海的粮食情

况同样不大光明[112]。

不管是为了什么缘故，土耳其人和西班牙人这几年内在互相监视、互相窥测中度过。双方都决心按兵不动，并到处散布谣言吓唬对方以求取得成功。一方认为对方的舰队将进攻拉古莱特、马耳他，甚至拉古萨、阿普利亚、塞浦路斯、科孚等地[113]；另一方则担心对方袭击的黎波里[114]、突尼斯或者阿尔及尔[115]。但是，恐惧毕竟是短暂的。交战双方的间谍工作都做得相当出色，以致这种与假想对手进行的拳击练习——这种神经战——无法长期欺骗对方。然而，这场战争足以迫使敌对双方采取预防措施。这种措施对地中海的整个生活有重大影响。

例如 1567 年就上演了这出经常演出的戏。那不勒斯总督 5 月份让他的海军处于戒备状态，命令它占领战略据点[116]。与此同时，墨西拿和西西里按照惯例进行夏季作战准备[117]。在土耳其人那一方面，1568 年出动了舰队。这是一项纯粹防御性的措施。因为这支舰队抵达发罗拉后就折返原地[118]。但是，将近 100 艘帆桨战船来临这件事就足以使意大利东海岸的安全机构开动运转起来。

当菲利普二世认为在他非常需要在别处拥有一支强大的和有效的武装力量的时刻，这些耗资巨大的预防措施难道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奢侈吗？不管怎样，同土耳其人停战的思想又在西班牙复活了。在重新武装的狂热和军人统治之后，又开始了外交游戏。至少在四个重大的时刻（1558－1559 年；1563－1564 年；1567 年；1575－1581 年）并且还可能在我们没有调查到的其他时机，西班牙的政策具有机会主义性质、实用主义性质和缺乏事先就有的见解。着重指出这一点并不是件坏事。这是一种与历史一贯坚持认为它所

采取的政策迥然不同的政策。

问题再一次并不在于大家都明显地看得见的官方正式的谈判(菲利普二世在同一时期继续接收罗马宝贵的援款以维持他对土耳其人的战争。因此，如果谈判失败，最重要的是不要因此受到连累和损害)。1567 年，提香介绍在威尼斯的西班牙的代理人加尔西·埃尔南德斯同一个路过该城的土耳其大使进行接触[119]。这个土耳其人声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毫无疑问将获得他正向素丹要求的停战；西班牙国王完全能够把自己包括进这项停战协议中去。这个土耳其人开始谈到关于尚未付清的用以赎回阿尔瓦罗·德·桑德的钱款的一些相当离奇的细节。他提出他愿意在君士坦丁堡进行活动，并说他已经就此事致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尚未得到答复。他甚至断言：1566 年如果没有米歇尔·塞尔诺维奇干的那些蠢事，他已经使谈判圆满结束；那时，西班牙国王是包括在停战方案里的。加尔西·埃尔南德斯写道："陛下应该了解这一点。"最后，这位土耳其大使(名叫阿尔班·贝伊，是个土耳其皇帝的翻译)志愿效劳，进一步活动并且为此目的，指定一个名叫多梅尼戈·德·卡雅诺的佩拉商人的家作为通讯地址……这些是一出戏里的配角和细枝末节，但是它们和另外一些加在一起。1567 年 5 月，这次弗朗塞斯·德·阿拉瓦在巴黎[120]和一个土耳其使者进行联系。这个使者来到法国主要是讨论犹太人米卡斯的要求。这个犹太人是塞里姆二世的亲信，是个被授予纳克索斯公爵称号的名声赫赫的重要人物，他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小范围内扮演富格那样的角色。纳克索斯这个人物我们已经在前面谈过。上述土耳其使者，以这个人物的名义而且是在继续处理他的利益时，提出志愿为西班

牙效劳,并特别建议使用这个人物的威望和影响来安排西班牙国王和素丹之间的停战。这个使者还说,鲁伊·戈梅兹一定了解大量关于这个问题的秘密。这倒是个并不枯燥乏味的情节。由于所有的消息最终都会泄露出来(在传播过程中被多次歪曲,变得面目全非),富克沃报导了一则这时正在马德里流传的奇闻:土耳其皇帝派遣他的首席翻译去法国国王那里,请求法国国王"安排他同西班牙国王之间的停战。"[121]

好些土耳其人之所以这样向西班牙国王提出为祂效劳——并非无偿的——这是因为他们毫无疑问比富克沃更加了解他的意图,因为菲利普二世已经在进行谈判。菲利普二世的大使昌托奈带着十分明确的指示前往维也纳:再次试图获得实际上并不要求得到的停战。1567 年 5 月 23 日,他写信给他的主人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把阿格利亚主教派往君士坦丁堡以便在土耳其进行谈判。这位主教在苏里曼统治时期,曾经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的大使。昌托奈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递交了菲利普二世交给他的文件的副本。这份文件载有他的君主"同意和土耳其人进行谈判达成协议"的条件。当然,这件事全都将被说成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提出来的,而不是菲利普二世提出的方案[122]。不久以后,菲利普二世祝贺他的大使圆满完成了使命[123]。

结果是:同年 12 月,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们提出要把西班牙国王包括在内。他们这样做是执行指示并为了推动他们本身的工作,即缔结停战协定。为了更好地保密[124],他们用克罗地亚文同穆罕默德·索科里商谈这个问题。但是,土耳其首相对此无动于衷。如果菲利普二世愿意停战,为什么不派一名大使来呢? 然而,谈判

并不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是步入歧途，转入约瑟夫·米卡斯这个做事过于卖力以取悦上司的人的手中[125]。晚至1568年6月，昌托奈还写信给菲利普二世说，他已经拒绝接见一位于停战协定刚刚签字后来到维也纳并打算在路过时拜访他的土耳其大使[126]。7月18日[127]，菲利普二世复信，同意他的大使的做法，要他把谈判保持在预定的范围内。谈判因而继续进行，虽然以后的进展情况我们不可能了解到。谈判何以最终失败的原因我们也不完全了解。

很可能菲利普二世渴望和谈还没有达到他愿意付出别人为此索要的高价的程度。地中海敌对行动的全面终止本来会使连绵不断、永无止境的耗费和烦扰的根源枯竭。但是，这些"敌对行动"目前的状况似乎不会使任何事物处于险境。即使这种行动使事物处于险境，西班牙的海军现在也能应付任何突然袭击。富克沃说，菲利普二世在西班牙拥有帆桨战船70艘，尚在巴塞罗那制造的共100艘还不计算在内[128]。此外还加上意大利舰队的巨大力量。这支力量用来直接进攻强大的土耳其舰队可能不够，但肯定足以阻止土耳其舰队为所欲为，足以困住海上行劫者的低舷长形船和荷兰圆头帆船。1567年和1568年，西班牙舰队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清除了海峡里的全部海上行劫者[129]，特别是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者。后者1566年曾经肆无忌惮地抢劫了安达卢西亚海岸，抢劫的范围远至塞维利亚。[130]

西班牙人是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沿海海域的无可争议的所有者，能够使用地中海的航路来集中派往佛兰德的兵力[131]。这些早在1567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的军队调动，从这一年的年初起招来一系列海上周游。那不勒斯步兵1月份上船[132]。西班牙的老部队不久后

在米兰集中[133]。对这些部队驻扎的城镇的居民来说，它们并非毫无滋扰、秋毫无犯。对西班牙的外交来说，让它们穿越欧洲这件事闹出的问题非同小可。西班牙的外交部门所关切的是不要引起丝毫惶恐不安并预先取得各地正式的安全通行证。拒绝发给通行证的自然不乏其人。首先是法国国王[134]。几乎大家对西班牙的军队都没有诚意[135]。

我们还应该加上供应[136]和海上运输等方面[137]的困难。必须设法弄到船只。不顾冬季的恶劣天气在海上航行，并非始终平安无事。2 月 9 日，29 艘满载军火、粮食和大炮的船在马拉加翻船沉没[138]……至于阿尔贝公爵，他则在等待观望之后，于 4 月 27 日同“新兵”连队在卡塔赫纳上船[139]。正如富克沃指出[140]，他可以等待时机，观察土耳其人的动向……8 月初[141]，这位公爵到达热那亚，在该地受到热烈接待，但警告和抱怨也铺天盖地而来。特别在科西嘉的问题上更是如此。1567 年 1 月 17 日，萨姆皮罗·科尔索被暗杀[142]。这起暗杀事件并没有使那里的和平得以恢复[143]。法国继续插手那里的事务[144]。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西班牙的军事准备工作进行得过分缓慢。这是没有正确估量这些部队人员调动的规模（正规部队之外还要加上仆役、军人的妻子、编组成真正的一营一营的营妓）和军需供应运输的规模。这项运输工作完成了。在完成的过程中动用了大批巨型圆船。这种船只适于用来运送新兵、成袋的蚕豆和大米以及不可缺少的饼干。这次运输是这个世纪到那时为止曾经有过的规模最大的运输军队的行动。在链条的一端，在安达卢西亚，当征兵人的鼓还咚咚咚咚地敲的时候，西班牙首批部队经过陆上长途行

军之后，正在荷兰的境内行进，离西班牙半岛有几百里路。但是，把西班牙王朝的注意力的中心置放得如此之远，在离开根据地如此之远的地方作战，这难道不是疯狂的举动吗？

1567 年 5 月，西班牙可能曾经有过最后一分钟的犹豫不决。阿尔贝公爵率领的船队当时正在向意大利海岸驶行。5 月 12 日，托斯卡纳代理人诺比利写道："公爵离去后，国务会议的这些先生鉴于佛兰德的事务对陛下来说处理得十分圆满，于是就公爵是否应该前往佛兰德的问题、进攻阿尔及尔或者的黎波里是否不再适当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145]讨论的结果是：8 票中有 4 票主张召回公爵，另外 4 票则认为他的旅行是必要的。诺比利又写道："后一种意见似乎占了上风。"不可能出现另外的情况。这部重型军事机器一旦开动，鲁伊·戈梅兹和他的朋友（这些朋友看见阿尔贝公爵远去，可能并没有感到不快）能够使它停止运转吗？但是，这是一个大好时机，可以看见外部事件能在西班牙政府内部引起的激动不安、犹豫不决。

就荷兰希望和平解决问题或者用金钱换取半信仰自由这一点而言[146]，似乎荷兰寄希望于鲁伊·戈梅兹。1567 年 1 月，马德里盛传是鲁伊·戈梅兹，而不是阿尔贝即将出行。他将不用一枪一弹平息一切，"因为上述国家所属各邦都对他发出邀请。"[147]这件事令人想到 1559 年有人指出的鲁伊·戈梅兹的朋党和荷兰大领主之间的那种旧联系在 6 年后的今天仍然发生作用。阿尔贝公爵赞成进行干涉。如果教廷大使言之有据的话[148]，鲁伊·戈梅兹则赞成建立反土耳其的联盟。但是，虽然这两个对手 3 月份甚至公开正式和解，虽然鲁伊·戈梅兹拒绝受富克沃的摆布操纵[149]，（富克沃去向

他抱怨阿尔贝时，受到彬彬有礼的、虚伪的热情接待，）鲁伊·戈梅兹的那个帮派和阿尔贝的那个帮派之间的对立在大、小事务上都仍在持续。

国王虽然容忍他们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却对他们加以控制。1567 年 3 月，他未同任何人商量就封赐一些人空缺的骑士团封地和空缺的有俸圣职。“各个党派的头目都对此感到十分羞辱。”仍然由谨慎国王就西班牙的政策作出决定[150]。

不管怎样，1567 年，西班牙帝国投入佛兰德事务时所使用的兵力是如此之多，以致它的邻国在好几个月内都为此感到焦虑不安[151]。在法国，9 月份莫城发生突然事变后，内战重起。11 月 10 日进行圣德尼战役时，这场内战达到顶点[152]，不久后逐渐平息。缔结隆朱莫和约时（1568 年 3 月 23 日），孔代亲王可能仅仅为了新教贵族的利益[153]而牺牲了他那一党的广大徒众的利益。但是，正如菲利普二世料想的那样，他就这样使自己得以在荷兰自由行事[154]。法国的动乱已经大大妨碍了西班牙的交通，以致西班牙的信使不得不取道大西洋和地中海。取道前者从圣塞瓦斯蒂安出发；取道后者则从巴塞罗那出发。走这两条路速度都慢得令人绝望[155]。在德意志，新教徒忐忑不安并且也在骚动。这一点可以从格罗宁根暴动看出[156]。在英国，伊丽莎白王后正在为争取时间而拖延，继续寄出彬彬有礼的信函，但也巧妙地在外国人面前抱怨自己国内的局势。1567 年 6 月，塞西尔就向古斯曼·德·西尔瓦描述说，风闻有个反新教徒的联盟和支持苏格兰女王的计划。这些阴谋的最好的证据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了能够自由加入这个联盟，刚刚同土耳其人签订了一项对他极为不利的、英国枢密院的成员对之感到

震惊和愤懑的停战协定[157]。最后，英国使用它手中日益锐利强大的武器。在大西洋，战争真正开始在英国海上行劫者和西班牙船只之间展开。

反对西班牙的势力正秘密地在遥远的北欧组织起来，谨慎地在菲利普二世派驻该地区的庞大的军队的周围打转。这支军队或许并不是西班牙外交家所想象的那样的良好的工具。它被从十分遥远的地方带来，耗费极大。当部队开始因士兵潜逃而空缺时，当为了填补空缺薄弱部分必须再次在安达卢西亚和其他地方敲鼓征募兵员时，又引起巨额的花费和可悲的迟缓。其次，这支骄傲、威武的驻佛兰德的军队，没有海洋上的掩护，听任别人袭击。这种袭击使它会丧失比斯开的扎布拉(zabre)行驶的主要海上供应线。

然而，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人们以为一支庞大的舰队即将建立。菲利普二世已经公布了他出发的消息并且放弃取道热那亚的打算。他认真进行准备。这种准备工作至少在桑坦德的坎塔布连海岸上是明显的。梅嫩德斯·达维勒斯似乎已经从佛罗里达及时返回指挥王家舰队。接着，所有措施突然全部取消。历史学家后来始终在思考这是否某种“卡斯蒂利亚式的”狡诈，某种旨在欺骗欧洲，旨在向卡斯蒂利亚国会敲榨勒索钱财，甚至还可能旨在尽可能长期隐瞒派遣阿尔贝公爵的理由[158]的掩人耳目的假动作。这种解释远非最能吸引人的解释。关于国王的意图和谋算，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泄露出来。菲利普二世当然不是一个向别人推心置腹的人。甚至在1567年这一年，在他的宫廷里，人人都感到大惑莫解。富克沃为自己对这件事知之极少进行辩解。他有一天写道，即使是国务会议中最狭小的核心集团的成员“也不知道事情的进展情况。这位

君主到了最后一分钟才宣布他的意图。"[159]或许我们永远也无法了解菲利普二世的旅行是否掩人耳目之举。不管怎样,这次旅行是 1567 年和 1568 年两年的政治推测和思考的重大题目之一。法国人对这次旅行深信不疑,以致卡特琳考虑要在博洛尼亚同西班牙国王晤谈一次[160]。但是,没有任何正式的证据表明菲利普二世真心诚意出行。显然,他在北欧的出现以及伴随他的舰队的出现,可能对事态发展的进程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在阿尔贝于 8 月到达布鲁塞尔后[161],在荷兰的秩序恢复后,既然王国的胜利显得如此巨大,菲利普二世还有必要登船前往在正开始的"寒冬的嘴里"的北欧吗?有人再三向他保证,至少直到 1568 年春季佛兰德局势非常平静[162]。此外还有这个理由阻止他出发:1568 年发生了东·卡洛斯惨死的悲剧。这出悲剧的真实情况比歪曲真相的传说所描述的更加动人心弦、更令人难受[163]。1 月份儿子因成了疯人被关进王宫的一间房子里(死于次年 7 月 24 日),当父亲的能够离开吗[164]?

这毕竟不是什么重大事件,因为西班牙对荷兰采取的政策所酿成的悲剧,并不是菲利普二世的一次或者几次不成功的巡行视察产生的结果(路德维希·普范德尔评论说,这样想就是不了解王家的吸引力[165]),而是阿尔贝计划的、设计的、预谋的和实现了的巡行视察产生的结果。

2. 格拉纳达战争的转折点

从 1568 年末起——这是在严冬发生的一件怪事——几场战火开始先后在地中海周围燃烧起来并且变成熊熊烈火。有的距离

海岸很远，但也有的距离海岸很近。1569年，战争日益频繁。它们历时或长或短，但全都说明了当时日益恶化的悲惨局势。

战争浪潮的高涨

在远离地中海的地方，荷兰战争已经开始。这不再仅仅是骚乱，而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西班牙以及整个地中海世界都深深卷入这场战争之中。1567年8月阿尔贝公爵的到来，是恐怖统治的开始。这种统治使人噤若寒蝉。但是，1568年4月，抵抗开始了。继维利埃和路易·德·纳索的头几次徒劳无益的进攻之后[166]，威廉·德·奥朗日7月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这次袭击同样徒劳无功，于11月份在庇卡底边境一片嘲笑声中结束[167]。

但是，如果说阿尔贝公爵陆战获胜，并且长期获胜（至少直到1572年4月布里埃尔暴动之前都是这样）的话，海上的情况就远非如此。1568年，西班牙人和新教徒之间的一场战争在大西洋上展开[168]。这场战争蜕变成一场英国和西班牙之间隐蔽的尔虞我诈的战争。双方都遭到打击。英伦三岛被剥夺了它们的毛纺业所必需的西班牙油脂的正常供应[169]。英国的回报是：西班牙帝国海上运输白银的大路，由于这件事产生的一切后果全被切断。比斯开的扎布拉连同它们运载的贵金属全被拦截掳获。阿尔贝公爵并没有立刻感觉到这场战争为英法海峡和地中海带来的后果。他像不止一个不能感知事物的先兆的政界人士一样，不了解对西班牙所属的荷兰来说，危险来自德意志或者来自法国少于来自英国。

这一点另外一些人比他感受得深切并且已经谈论过。准备一

旦信号发出就打击异端的庇护五世（他于 1569 年 2 月开除伊丽莎白出教）在 1568 年 7 月的信中[170]强烈地声称这是对英国采取行动的唯一时机。西班牙驻伦敦大使格劳·德·斯佩斯大使参加了玛丽·斯图亚特在岛上的阴谋活动和北方男爵的叛乱，并尽力把这些男爵组织起来。他过分乐观，对西班牙政治赌博的一个很小的方面过分重视，缺乏全局观点。但是，他认为 1569 年西班牙掌握着三张可以用来对付英国的牌，这一点或许并没有错。这三张牌是：苏格兰的局势、爱尔兰的局势[171]和即将爆发的英格兰北部天主教大领主的叛乱。菲利普二世受到这项大胆的策略的引诱。阿尔贝公爵则以缺乏经费和当时欧洲的局势为理由，反对这项策略并战胜了他的君主。阿尔贝公爵这个假伟人心地狭窄、目光短浅，奉行近视政策，只能在近距离内作战。他实行大赦为时太晚。他让苏格兰女王逃往英格兰，使苏格兰变为新教国家，让英格兰北方的男爵徒劳无益地暴动[172]。这些男爵的叛乱被伊丽莎白花很小的代价镇压下去。最后，当时间对他有利时，他不去打击动荡不安的英国，而去进行谈判，玩弄手腕，大耍花招。1569 年，谨慎者不是国王菲利普二世，而是同本国远离这一状况以及当时的局势使之成为当时的主人的阿尔贝公爵。

在法国，隆朱莫和约只在很短一个时期生效。1568 年 8 月，随着科利尼和孔代亲王逃往罗亚尔[173]，开始了第三次宗教战争。这与西班牙在佛兰德的行动有无可怀疑的联系。但是，胡格诺的首领向法国南方撤退几乎并没有使战争接近地中海一步。7 月份，地中海地区有人担心德意志“步兵”会降临那里。隆朱莫和约使这些德意志“步兵”无所事事。他们被人认为得新教徒之助南下意大利[174]。这

种假设在西班牙受到怀疑。法国内战再起使很多这类假设化为乌有。第三次异常激烈、残酷的内战只在1570年短短一段时间内波及地中海地区。当时正值雅尔纳克和蒙孔图尔战役年之后，科利尼海军上将在他的“向前的溃败中”，从加龙河谷到达濒临地中海的法国南方，然后到达罗讷河河谷[175]。1569年夏季，当这位海军上将进抵圭耶内时[176]，西班牙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使天主教徒要求得到来自比利牛斯山另侧的西班牙的支援，正如他们过去曾经在佛兰德得到支援一样[177]。要使力量的不均衡明显地有利于天主教徒，这种援助并不必要。但是，难道应该像弗朗塞斯·德·阿拉瓦那样认为只要宫廷愿意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新教徒，特别是把海军上将清除掉吗？西班牙大使责备法国国王的顾问如蒙莫朗西、莫尔维利耶、利摩日、兰萨克和维埃耶维尔等人[178]。他这样归咎这些人，似乎勇气并不重要，空间并不存在，法国受迫害的人并没有依靠外国新教徒的帮助……

欧洲的战争就谈到这里为止。东方的情况也是这样。战争在离地中海海岸相当远的地方进行，在土耳其辽阔的边境，从黑海周围的地区直到红海海岸猖獗为害。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外围战争。1569年，这场战争比其他因素都更使塞里姆和他的舰队在地中海无法活动。其次，这还是一场奇怪的战争，其矛头间接指向敌对的波斯的军队。波斯已经变成亚洲，特别是中亚、印度和印度洋之间的一个大转盘。

第一个作战区域是今天俄罗斯的南部地区。土耳其人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结成联盟，依靠他们和土耳其人自己征募来的准备使用于开山挖河的土方工程的罗马尼亚农民，力图从俄罗斯人手

中夺回喀山和阿斯特拉罕[179]。俄罗斯人1551年和1559年在这个地区定居下来。我们对欧洲情报人员提供的数字并不字字信以为真。但是,鉴于战区辽阔,我们可以承认这场战争需要大量兵员、大规模的运输和在作战基地阿佐夫储存粮食和军火。

仅仅打击莫斯科人、惩罚他们(正如再次急于为自己辩护的土耳其的极其拘泥形式的外交人士所解释的那样)以便支援一个受到俄罗斯人不公正的打击的封臣——克里米亚的可汗——,这就是这次远征的目的吗?事实上,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在16世纪同样遭受克里米亚的这些游牧民族的劫掠,不会不乐于互相谅解以对付这个缓冲国[180]。另一方面,这次远征并没有给人以土耳其人要为自己开辟通往中亚的道路的雄图大略的印象。剩下的理由更加简单:这是一次远距离的对抗波斯人的军事演习。土耳其人制订了开凿连接顿河和伏尔加河的运河并利用这条运河把黑海和里海连接起来的计划,一项为他们的帆桨战船打开一条直达波斯内海海岸的航路的计划。这是索非已经感觉到的明显的危险[181]。因此,他在我们不了解的情况下尽力煽起高加索的百姓和诸侯反对土耳其人。1570年,俄罗斯人掳获了土耳其侵略者的器材、装备和大炮,土耳其的这个大规模的行动因此受到挫折。但是,这些都并没有使这个行动的规模减缩[182]。

与此同时,另一场战争变得引人注目起来。这场战争两年前已经开始,从埃及蔓延到叙利亚,遍及阿拉伯各国。也门南部叛乱地区[183]是这场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地区。"阿拉伯国家"意指进行黎凡特贸易所必经的广阔地区。根据那个时代的人估计[184],这些国家的叛乱使土耳其人每年丧失近200万金币。此外还得加上进行一

场远离本土的战争所花费的巨额费用和遇到的大量困难。

使人相信这两场在土耳其国家后方进行的战争十分激烈的事实是：土耳其素丹在地中海前线按兵不动，几乎完全放弃了海洋[185]。基督教徒在这个海里，至少在这个海的西部和中部，为所欲为。8、9 月份，多里亚和胡安·德·卡尔多纳的帆桨战船可以在西西里附近的海域不受惊扰，追捕海上行劫者，战果甚丰[186]。但是，要准确地评断土耳其素丹的政策必须更好地了解奥斯曼的历史的底蕴。因为 1569 年末为征伐塞浦路斯而进行的大规模的战备活动，突然使君士坦丁堡的海军造船厂从它前此四年的昏沉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187]。这次远征计划的制订日期，可能要上溯到前几年，至少要上溯到 1567 年卡拉马尼的设防。可能正是由于这次设防，或者至少部分由于这次设防，土耳其素丹轻易就接受了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休战吗?也由于这次设防，他想在投入这一重大的行动之前处理好他的内部事务吗？因此，在我们刚刚谈到的于 1569 年进行的各次战争中他劲头十足。据说，这一年约瑟夫·米卡斯教人把王国的纹章画在他的纹章上。素丹已经答应把塞浦路斯赏赐给他。还据说，1569 年及时焚毁了威尼斯海军造船厂的那场大火的纵火者就是米卡斯，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他用钱收买的代理人。[188]

肯定无疑的是：土耳其进攻威尼斯这件事长期以来就在流传之中。毫无疑问，这就是谣传的西班牙和威尼斯市政议会结盟的原因[189]。散布这个谣言的是行事审慎的威尼斯；传播这个谣言的中心是罗马。威尼斯当然拥有一支令人生畏的舰队。但是，它纤细脆弱，根本无法和土耳其这个庞然大物相比。它如果受到这个妖怪的攻击（上帝知道它为了避免这个灾难一直在作各种让步），就只有依

靠基督教世界，依靠意大利，依靠西班牙，即依靠既拥有西班牙也几乎拥有意大利的菲利普二世才能进行抵抗。

格拉纳达战争的开始

在这个战备武装节奏加快、处处剑拔弩张的世界里，爆发了格拉纳达战争。这场战争开始时还不具有第二级，甚至第三级军事行动的规模，但很快就变得十分激烈起来。但是，无法说出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多大的程度上在外部引起了谋算和希望，在多大的程度上激发了激情狂热并且改变了西班牙的气氛。

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最先发生的是一起微不足道的事件：几个摩里斯科人在紧接 1568 年圣诞节的一个夜晚到达格拉纳达，走进城内，高声叫嚷，要求愿意保卫穆罕默德的宗教的人追随他们[190]。他们进城时是 60 来个人，出城时已达 1,000 人左右[191]。教廷驻马德里大使写道："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起像人们以后或许会说的那样的重大事件。"[192]阿尔巴伊辛这座最大的摩尔人的土著城市的确并没有发生什么骚动。然而，如果没有封锁山中要隘路口的大雪，格拉纳达很可能就会遭到大股力量侵犯[193]。摩里斯科人的这次行动本来会产生更大的效果，并且焚毁全城。这次行动的失败迫使叛乱分子逃往山中。另外一些摩里斯科人不久就同他们会合。这些摩里斯科人往往多是王国其他地方的人，而不是首都的居民。他们的人数估计在 4,000 左右[194]。绍利在致热那亚共和国当局的信中说："有的人说得多于这个数字；有的人说得少于这个数字。一直到现在，我还无法了解事实的真相。根据判断，这是一时的感情冲

动，因为暴动发生得不是时候，正在进行的对付他们的准备工作规模很大。从科尔多瓦、乌贝达、巴埃萨和其他地方开出了大批骑兵和步兵。”[195]根据某些传闻，摩里斯科人在奥尔希瓦构筑了工事(这是塞萨公爵的城市)，但他们没有大炮，怎么办?绍利继续写道:“据说他们中间有土耳其人300名，但人们从其他方面获悉，这些人只不过是一艘碰触了海岸的荷兰圆头帆船上的8个至10个生还者而已。”这主要还是一个乐观的报告。这个报告所谈的只是在上述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天的情况。不管怎样，这篇文章出自某个党派的一名成员之手，并非不偏不倚。绍利同所有的热那亚的代理人(或者谈到这件事的托斯卡纳代理人)一样，在谈到西班牙人时就称之为“我们的人”。正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富克沃既要客观又更不乐观。

因为这场宗教战争，这场相互敌对的文明之间的战争，自发而又迅速地蔓延到事先已经充满仇恨和灾难的土地上[196]。1月份阿尔梅里亚就被叛乱分子包围[197]。2月份，在格拉纳达拥有庄园、领地、城镇和封臣的塞萨公爵估计叛乱分子为数15万人，其中4.5万人有武器[198]。3月份，叛乱从山里扩展漫溢到平原上[199]。叛乱分子同阿尔及尔之间的联系对谁都不再是个什么疑问了[200]。

此外，对当局来说，暴动从一开始就显得极端严重。这可能是由于为了给阿尔贝公爵进行的征伐提供兵员，从西班牙南部轻率冒失地抽走了大批居民。该地比其他地方更大事征兵。其次，西班牙不习惯于在本土作战。它还没有完成作战的准备工作。第一项预防措施是为了立即征兵而发送钱款给格拉纳达的大统领蒙德哈尔和穆尔西亚的省长洛斯·贝莱斯侯爵。与此同时，西班牙的帆桨

战船处于戒备状态以阻止可能来自非洲的援军[201]。

西班牙政府竭力保密，使叛乱的消息不到处扩散流传。菲利普二世在一封给那不勒斯总督的信的旁边写道：“格拉纳达的事以保密为好”[202]。但是，2月19日[203]，那不勒斯方面回答他说，叛乱的消息已经经由热那亚和罗马两地传来。怎么办呢？当然，这个消息已经不胫而走，迅速传往君士坦丁堡。叛乱分子向那里求援[204]。从西班牙的心脏到土耳其，运转着一根不间断地轮流接替传递消息的链条，那些巡游的和逃亡的摩里斯科人还不计算在内。他们是不知疲倦的云游四海的步行者、旅行者和联络人。他们在北非和君士坦丁堡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和代言人。因此，土耳其政府没有插手摩里斯科人事件和过去威尼斯军火库的纵火事件的说法，是绝对不可靠的……1568年6月，唐·胡安在巴塞罗那和一个希腊首领举行重要会谈。这个希腊首领建议他煽动摩里亚起来叛乱。既然这样的会谈能够举行，为什么1565年、1566年或者1568年就不会有某个塔加林斯或者某个穆德哈尔和某个土耳其舰队司令举行类似的会谈呢？

不管怎样，这个消息一旦越过地中海辽阔的水域和欧洲的大片陆地，就至少爆发了两场不同的摩里斯科战争。正如相互矛盾至于极点、旨在在欧洲和东方煽起各种狂热偏见的报告、传说等在这方所勾画的那样，另外一场战争是格拉纳达战争。一张很密的阴谋和间谍活动网维持着东方的这种狂热偏见。我们很容易从东到西探查出这张网的来龙去脉，因为它牵涉西欧，因为西欧小心地保存下来这方面的全部资料。

不管这场战争的规模如何，西班牙的整个身躯肯定受到这场

内战的损伤。1569 年 11 月，暴动成了宫廷里每次谈话的题目[205]，而且还正如富克沃所说，现在是这里的“最令人吃惊的消息”[206]。这位大使继续写道：“整个王国惊恐万状。”[207]他趁此良机作了一番高谈阔论。他认为，臣民像过去起来反对法国的查理九世、苏格兰的玛丽·斯图亚特和佛兰德的西班牙国王一样，今天起来造他们自己的合法君主的反，这是时代的标志。“今天世界素性倾向于叛乱，在某些地区臣民素性倾向于造反。”查理九世后来以可疑的诚意撰文答复说，他希望叛乱分子连同“所有那些像他们一样曾经拿起武器扰乱他们的国王和君主的国家的人”会受到惩罚。[208]但是，对西班牙来说变得令人十分关切忧虑不安的局势，他感到忧伤吗？

反击的措施的确需要时间来进行安排。在这些行军困难、荒无人烟、整队整队士兵在那里有饿死之虞，而且有时的确发生这类事情的崇山峻岭中，怎样能够迅速行动呢？对有无数海湾的叛乱国家的漫长的海岸怎样能够进行封锁呢？这些海岸为运输兵员、军火、武器（基督教徒俘虏充作购买武器的支付手段：1 名俘虏交换 1 支喇叭口火枪[209]）、大炮[210]、给养、大米、麦子或面粉的阿尔及尔船只或者柏柏尔船只提供停泊地点。在这些海岸上，不是国王而是当地封建领主当家作主；在这些海岸上，走私活动和海上行劫有确定的道路和习惯做法[211]。对当局来说，海上和陆上的战争开始时进行得不顺利。蒙德哈尔是个可敬的统帅。但是，未来的红衣主教德萨在背后对他诬陷中伤，使他无法指挥。这位红衣主教还千方百计把洛斯·贝莱斯侯爵这个庸碌无能之辈推到台前。镇压毫不奏效，这就使残酷的战争旷日持久，不断扩大，日趋激烈。

所有这一切都丝毫不能阻止菲利普二世装得满不在乎、无忧

无虑。富克沃指出，菲利普二世对格拉纳达的骚乱“装得毫不在意。”[212]菲利普二世认为土耳其人有很多其他需要关切的事，还认为有帆桨战船守卫，来自阿尔及尔的叛乱分子不可能进行援助。只需“基督教社会”，即安达卢西亚的民兵行动起来，就足以使一切恢复正常。国外的西班牙人都没有官方的这种乐观情绪。在国外，西班牙的代理人殚精竭虑同恶意的夸大、谣传等进行斗争。在伦敦，西班牙大使格劳·德·斯佩斯特别为此哀叹。5月份，有人甚至“高声叫嚷”，公开宣布西班牙的其他王国造陛下的反的消息。“这里的人不了解西班牙人的忠诚……”[213]

不错，西班牙人并不需要用辉煌的胜利中的任何一次来粉碎这些日益增多的谣言。打这些胜仗的战场、死亡人数和俘虏人数都可以明确举出……在这场规模很小但极其残酷的战争中，战斗进行得断断续续，投入的兵力很少，双方军队都在毫无官方控制的情况下肆意屠杀[214]。这是一场不可能有什么胜利公报发表的斥候战。4月8日，卡斯蒂利亚的大封地骑士的帆桨战船在驶返西班牙海岸途中，在马赛的外海海面上，遭到一场风暴的袭击并被吹散。虽然这场风暴并不是西班牙的敌人乐于宣布的总灾难[215]，但似乎是一起相当重大的事件。

格拉纳达战役开始没有打好，又指挥失当，而且军队各级领导都有错误，因此旷日持久，耗费巨大。4月，奥地利的唐·胡安被任命为总司令。这项任命开始时并没有使局势丝毫改观。经验证明：仅仅使用民兵是不够的；需要从意大利调来军队（从那不勒斯[216]和伦巴第的[217]西班牙步兵团抽调来）；需要在加泰罗尼亚征募军队[218]。必须让这些增援部队有开到的时间。从1570年1月起，即在

叛乱开始一年以后，当唐·胡安终于能够自由行事，决定进行最初的几次打击时，局势才明显地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演变。

直到那时为止，已经进行了些什么活动呢？除了怀着希望，特别是希望饥饿能够单独降服叛乱分子之外[219]，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别的活动。格拉纳达得以保存下来，因为奥地利的唐·胡安特别下令年终以前不得撤离该地[220]。这件事被某些人看成是菲利普二世对唐·胡安的“刁难”。这样看问题，是把一项根据很多理由制订的、超越人际关系考虑的范围的政策加以“个人化”。这样看问题，也是缩减弗朗塞斯·德·阿拉瓦的下面这句惊叹所概括的当局的恐惧的程度：“上帝希望在这只狗（指已经被人获悉正在进行海战准备的素丹）能够进行武装之前，阿尔普哈拉的叛乱者会受到惩罚。”[221]人们也担心叛乱会蔓延到王国以外，担心阿拉贡的摩里斯科人“像他们在格拉纳达干过的那样发起疯来”[222]。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要对付的就不再是 3 万人（8 月初测算的叛乱分子数字）而至少是 10 万人[223]。

不，问题丝毫不在于“刁难”唐·胡安，而在于了解怎样做适宜。菲利普二世花了时间，而且是花了很多时间，才觉察到信使所报导的[224]似乎是决定性的胜利，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摩里斯科人能够从西班牙人的短枪面前“像鹿那样”逃跑[225]并且丝毫不会受伤。菲利普二世也花了很多时间才看出应该认真对待叛乱，才看出局势正如它在秋季所显现出来的那样，即：低地和城市属于基督教徒，山区属于叛乱分子[226]。鉴于土耳其人明显地在君士坦丁堡进行大规模备战，这种局势有长期持续下去的危险。

人们对上述种种情况的了解为时已晚。菲利普二世自身的恐

惧再次使他变得瘫痪无力。来自土耳其舰队的威胁显然要求他当机立断，迅速解决格拉纳达问题。但是，这种威胁使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样处于可能遇到危险的境地。10 月份，胡安·德·苏尼加请求国王加强驻意大利的西班牙军队[227]。由于佛兰德的局势，已经从这个意大利抽调走军队。重要的是，还将因格拉纳达的缘故这样做(这将在 12 月份进行)。也需要钱款，需要更多钱款。佛兰德的巨额开支已经耗尽大量钱财……当一方面外国干涉的危险显得更加清楚，另一方面战争真正恶化时，菲利普二世才甘于采取必要的措施。

10 月 26 日，教皇大使被正式告知，如果战争在冬季继续进行，如果它席卷其他摩里斯科人的地区，最后，如果土耳其人进行干预，西班牙就有再度落入穆斯林手中的危险。教廷大使认为，西班牙方面承认这一点，其目的乃在于从教皇那里获得让步，特别是关于圣战税的让步，但毫无疑问，这与真实的惶恐不安情绪是符合一致的[228]。在马德里，人们对摩里斯科人和穆斯林世界的联系了若指掌。秋天，人们接连得知，摩里斯科人的使节在从君士坦丁堡返回途中曾经在阿尔及尔受到接待，阿尔及尔有人答应供给他们几千支短枪[229]。之后，人们又得知，3 个犹太人(这是 3 个由于他们在约瑟夫·米卡斯的债权方面的利益问题来到法国宫廷的富商)讲述舰队将于 1570 年开到，给格拉纳达的摩尔人以鼓励和援助。摩里斯科人的使节已经代表摩洛哥的国王、非斯的国王和“柏柏尔的其他三四个国王……”向土耳其人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230]。这与几乎同时传到马德里的关于谢里夫正在准备对摩洛哥的驻防地进行军事讨伐的情报是吻合的。这些情报令人担心穆斯林会协同一致

入侵西班牙[231]。

现在，教皇大使[232]、托斯卡纳代理人诺比利[233]和菲利普二世本人在他们每个人和唐·胡安的通讯中[234]都承认格拉纳达的事态发展得非常之糟，何况迹象是明显的。12月份，摩里斯科人全部被驱赶出格拉纳达城。这是一项过火的、绝望的措施[235]。它使人认为这一年最后几天在荷兰收集到的下述情报是正确的：有时用短枪武装起来的摩尔人多次侵入王国，以致在格拉纳达或者在塞维利亚人们不敢再把"鼻子放在门外面。"[236]是行动的时候了。12月26日，菲利普为了更靠近战场，决定在科尔多瓦召开卡斯蒂利亚的国会[237]。

格拉纳达战役的后果：厄尔杰·阿里攻占突尼斯

菲利普二世在格拉纳达受到的困扰，不久以后就使柏柏尔的"国王"之一丧失王位。在突尼斯，受到查理五世保护并于1535年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当作傀儡重新扶上王位以对抗土耳其人的穆莱·哈桑已经遭到他自己的儿子穆莱·哈米达的排挤。新王在西班牙人、土耳其人和他自己的臣民，即突尼斯人和在南部既游牧又定居的阿拉伯人的左右夹攻之下，尽其所能进行统治。这种统治进行得与其说好不如说糟。或许正如哈埃多所指出的那样[238]，他的统治方式是依靠平民百姓来对抗突尼斯的大领主。但是，不管怎样，他似乎辜负了民众，使民众不满。他行使职权20年后，在国内树敌颇多。他的政权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个突尼斯君主的政权都更加脆弱。捕捉猎物的时机已经到来。格

拉纳达之战将使这个猎物落入阿尔及尔人手中。

因为,尽管1569年阿尔及尔人援助摩里斯科人叛乱是出于自身利益,出于获利的欲望,同时也出于宗教狂热(在一座阿尔及尔的清真寺中收存着向叛乱分子提供的大批武器),但是,阿尔及尔国王厄尔杰·阿里自从1568年3月以来似乎并不愿意为摩里斯科人承担巨大的风险。正如哈埃多所指出的那样,他关心自己的城市的防务远远超过关心格拉纳达。这可能是奉君士坦丁堡的命令行事,但这似乎更可能是由于西班牙代理人的央求。我们至少了解下达给一个名叫J.B.贡古萨·德勒·卡斯特勒的人的指示。此人1569年被派往阿尔及尔[239]。其次,大规模地援助摩里斯科人将意味着要强行突破西班牙设置的海上障碍。这是一个耗资巨大的行动。可能厄尔杰·阿里不愿意看见西班牙对他实行的经济封锁延续下去[240]。

尤其当格拉纳达战争为实施征服整个北非半岛的计划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时机的时候,为什么要为别人效命卖力呢?这项计划对阿尔及尔的每个统治者来说都是珍贵的。这是巴巴罗萨1534年进行的袭击和1554年萨拉赫海伊斯从另外一个方向对非斯进行的征伐的重演。能够证明西班牙情报部门的效能以及它同阿尔及尔的联系的,是下述事实:马德里了解厄尔杰·阿里的全部计划、摩里斯科人的使节从君士坦丁堡的返回[241]、"国王"和比斯克拉的统治者德利·哈桑之间的龃龉[242]以及对突尼斯的攻占。的确,10月8日,在阿尔及尔的一个西班牙俘虏、耶罗尼莫·德·门多萨船长说,他从十分可靠的来源获悉厄尔杰·阿里正为进攻穆莱·哈米达所作的准备。10月29日,一封新到的信证实了上述耶罗尼

莫·德·门多萨的第一封信的内容。菲利普二世下令立即通知拉古莱特的总督阿隆索·皮门特尔[243]。

在此期间，厄尔杰10月份就已带领土耳其近卫军士兵4,000到5,000名，没有让任何一支舰队伴随，就离开阿尔及尔(海路已经不能通行)[244]。这些近卫军士兵走陆路，经过君士坦丁和波内[245]。厄尔杰·阿里穿过大卡比利亚和小卡比利亚等地。所经之处大批志愿者加入他的军队，其中特别有几千名骑兵。他率领这些骑兵只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从突尼斯到达巴杰平原。穆莱·哈米达的军队未经战斗就自行溃散。战败的国王逃到城里，接着他因为感到在城内也并不安全，就带领几个忠实的亲随和他的那些他在逃跑途中还没有被人抢走的金银财宝逃到拉古莱特的西班牙堡垒。哈埃多说，12月末(但一份来自阿尔及尔的公文急报说是在1月19日。这一说法似乎更加确切[246])，厄尔杰·阿里兵不血刃就进入突尼斯。这个卡拉布里亚人受到突尼斯人很好的接待[247]。他占领了王宫，建立了他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统治，他发号施令，大肆恐吓，进行惩罚。3月份[248]，他上路返回阿尔及尔，在突尼斯留下一支很大的卫戍部队。这支部队由他下属的一个副长官、一个名叫卡伊托·拉马丹[249]的撒丁岛的叛徒统率，由突尼斯提供经费供养。

但是，如果格拉纳达不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如果有一支基督教舰队集中在墨西拿，采取这次军事行动本来是非常冒险的行为。何况西班牙会接受这种新局面吗[250]？

格拉纳达和塞浦路斯战争

1570年1月攻占突尼斯，是格拉纳达之战造成的不平衡状态产生的后果。这种

不平衡状态，也是塞浦路斯战争这一 1570 年的重大事件的发生和罗马—威尼斯—西班牙联盟缔结的因素之一。这个联盟的缔结是土耳其的进攻产生的直接后果。

摩里斯科战争的确在 1570 年这一年里整整持续了一年之久，至少延续到 11 月 30 日。这一天唐·胡安如果不是完全平定了，至少也是基本上平定了格拉纳达。这场战争历时很久，一直十分艰苦并且耗资巨大。然而，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它的面貌改观。毫无疑问，十分年轻的奥地利的唐·胡安（23 岁）由于他的干劲和勇敢，已经是个真正的领袖。国王让他支配使用大量资财。国王自 1 月份起就亲临科尔多瓦，这样就缩短了命令和报告的往返时间，迫使执行者更加积极工作，因而带来好处。这些好处或许朝臣和外交代表都不赞赏。外交代表被迫在军队的后方生活，每天都要设法解决他们食宿方面的细小困难[251]。

局势未能一下就彻底改观。第一次重大的战斗未获成功。这次战斗是包围加勒拉这座摩里斯科人的小城。该城高踞山顶，很难逼近，炮火不易"毁坏"[252]。城市守备部队以超人的毅力进行战斗。攻城部队自身经过一场可怕的屠杀之后不得不以罕见的勇敢来攻占要塞。这座城市的陷落打开了一条通往山里的道路。胜利之师在这条路上行进。但是，摩里斯科人从塞龙山的山头上向这些部队猛扑下来。一场难以抑制的混乱使刚刚获得胜利的一方向后退却[253]。就是在这次几乎是灾难的退却中，唐·胡安的导师路易斯·基赫达丧了命[254]。

这场以游击方式进行的伏击战必然会瓦解正规军士兵的斗志，并随着新近发生的事件使这些士兵变得凶残、懦弱或者绝望。3

月份，唐·胡安自己谈到他的部队士气瓦解[255]，军纪废弛[256]。部队刚刚集合起来就四处逃散……抢劫的诱惑掀起一场个人进行的和自发进行的战争。这种战争像麻疯病一样蔓延，甚至殃及和平地区。在西班牙各个城市，待出售的奴隶在大街小巷满坑满谷。其中一部分被用船运往意大利。然而，叛乱分子在山里仍然有将近2.5万人，其中有土耳其人或柏柏尔人4,000人。他们还剩下充足的粮食（一个情报员说，在叛乱分子那里，麦子每斯塔拉只值10里亚尔，其他谷物每斯塔拉只值4里亚尔[257]）。他们有无花果和葡萄干并且能够指望得到阿尔及尔的双桅横帆船和低舷长形船供应[258]。他们特别受到土耳其将进行干预的这种希望的支持[259]。毫无疑问，唯一使他们免遭敌方优势兵力消灭的是崇山峻岭。制服这些高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西班牙军队分成的两路纵队——一支由唐·胡安本人率领；另一支由塞萨公爵率领——进军非常缓慢。3月21日，绍利叙述了最近的推进情况的若干细节，用这些话来结束一封充满"佳音"的信："摩尔人全部被驱赶出平原[260]……"

像马德里的外交通讯员那样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的详情细节，是一项令人感到恼火的任务，因为好消息和坏消息相继出现，显然互不衔接。这种明显的不衔接的现象，终于使最卓越的观察家感到困惑，并且使诺比利写道（以下粗略地译为现代文字）："对摩尔人进行的战争，好像一种冷水和热水相间的淋浴。"[261]例如1570年5月在离塞维利亚很近的地方，1万来名摩里斯科人叛乱。这些叛乱分子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和阿尔科斯公爵的封臣。这是个坏消息。但是，人们很快就又惊又喜地获悉，叛乱分子没有参加山里的暴动，因为国王有了一个很好的主意：把他们的领主派到他们那里。

这些领主平息了他们的怒气并且把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带回家。他们仅仅因为西班牙人利用战场就在附近这个方便绑架他们，把他们当作俘虏出卖，抢劫他们的财产、妻子，才起来造反[262]。3 月份，在一个巴伦西亚的村子发生了类似事件。叛乱之火已经点燃，但又很快熄灭。正如这两个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战争远远没有被限制在一定地区的范围内。但是，对西班牙政府来说，巨大的危险仍然存在于阿尔普哈拉山。这是一个野蛮的、几乎无法征服的世界。异端分子在这里避居。甚至在 20 世纪，山地战也从来不是容易打的。富克沃写道，1570 年的战争"用微火耗损了并且最终烧毁了西班牙。"[263]

武器不能完成的事，外交终于完成了。叛乱分子的第一个首领已经被人暗杀。第二个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叛乱分子的大统领阿尔巴基 5 月 2 日来到唐·胡安的营帐，亲吻这位亲王的手，归顺投降。一项和约签订了。根据这项和约，摩里斯科人受到宽恕，并获准穿他们的民族服装，但他们须于 10 天之内投降并交出武器，放在预先指定的地点。柏柏尔人可以前往非洲而不受任何阻拦和惊扰[264]。可以看出和约的这些条款相当宽大温和。这些条款使人谈起"陛下的天生的宽大来"[265]。但是，它们主要说明国王有不惜任何代价摆脱某种危险的景遇的愿望。这难道是真正的和平吗？

5 月 15 日，已经有 3 万个摩尔人放下武器。圆船和划桨船都供土耳其人返回非洲之用[266]。投降的最后期限定在圣约翰日（6 月 24 日）[267]。然而从 6 月 17 日起，宗教裁判所法官开始抱怨不满起来。原因是自称已经忏悔了的摩里斯科人散步时随身携带武器，并且在大庭广众之中肆无忌惮地讲述他们的事迹，夸耀自己杀死了

多少基督教徒，夸耀自己为了“违反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268]干了些什么事。另外一封信说，他们当中很多人投降了，但在这些人当中还没有人去教廷圣职部忏悔自己过去的罪孽[269]。投降难道仅仅是个计谋吗？一些来自拉腊歇的小低舷长形船继续运来军火。这些低舷长形船相当多，以致桑乔·德·莱瓦的帆桨战船抓获了五六艘这种小船[270]。然而，正当上述的非洲人迟迟不登上船时[271]，基督教士兵却因为没有领到军饷而解散，并且产生了通常会有的后果[272]。凡此种种都丝毫不能促使叛乱分子对西班牙军队敬畏或理所当然地惧怕。

事实上，零零星星的战斗仍然在山里进行。叛乱分子对孤单的基督教徒进行危险的袭击[273]。绍利写道：[274]“格拉纳达的摩尔人正逐渐被征服，虽然他们当中不乏坚持叛乱者。400 个土耳其人已经前去柏柏尔，但是柏柏尔的摩尔人却留了下来。”两三千个摩里斯科人同他们的“国王”仍然留在山中，并且宣称他们只愿在获准留住阿尔普哈拉山的条件下投降，而这正是王家政府不愿作出的让步。绍利解释说：“我敢说要消灭他们至少要打一年仗，因为这些摩尔人收获了大量粮食，种植了小米和其他谷物。我们的军队无法阻止他们收割，因为没有足够的兵员担任这种警戒。”[275]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王国的“绥靖”会抱什么幻想呢？唐·胡安在他 8 月 14 日的信中再次谈到下面这一点：只有驱逐摩里斯科人才会得到和平[276]。情况的确是这样。但是，正如人们上一年在格拉纳达进行的那样，撤离一座城市是一回事，撤离一个王国是另外一回事，两者迥然不同。因此，在马德里，官方的说法是：战争已经结束。驻马德里的每个大使都决定向他的君主这样书面汇报[277]。仍

然在战场上的奥地利的唐·胡安就在这个时刻大谈特谈降服龙达的摩里斯科人以及进入阿尔普哈拉山的一种方式或多种方式[278]。对唐·胡安来说,9月份主要的还是破坏叛乱分子的葡萄园或者菜园[279]、追捕逃兵(这是另外一类令人讨厌的家伙),同时还有征募新兵等问题,因为战争还像一股没有熄灭的火焰那样在继续燃烧[280]。叛乱分子的头领不再与军队直接交锋,而是从这座小山溜到那座小山。所有在山上修筑的堡垒,所有被派遣驻守在这些堡垒里的卫戍部队,都无法阻止叛乱分子躲过监视网蓄意对基督教徒进行突然袭击[281]。

就在这时,西班牙政府决定进行大规模的放逐。毫无疑问,这项措施并不起决定性作用。10月13日,萨亚斯写信给弗朗塞斯·德·阿拉瓦说:"格拉纳达事件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人人可以把它看成已经结束。这样做对报效陛下和维护陛下的声誉都是适当的"。[282]这次这倒是真的。11月初,唐·胡安宣布马拉加、本托米斯山和龙达等地区已经平定[283]。

在这个期间,放逐已经完成。这一行动涉及50万人,可能还更多,特别使低地变得荒无人烟。这一行动令人看了产生怜悯之心。唐·胡安的关于这起事件的证明经常被人引用,虽然他本人拥护放逐这项措施。11月5日,他致函鲁伊·戈梅兹说:"这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事件,因为被放逐的人出发时,淫雨霏霏、风雪交加,以致这些可怜的人依偎在一起悲叹。不能否认,目睹一个王国的人被统统赶走,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令人觉得悲惨可怜的事。最后,这件事毕竟做了。"[284]梅迪奇驻马德里的代理人诺比利骑士的通讯我们经常引用。他清楚地看到这项惨无人道但很有成效的措施的

意义，写信给托斯卡纳大公说："格拉纳达事件现在完结了。我用一句话来总结：被降服了的摩尔人和低地的摩尔人让战争继续打下去，因为他们秘密地供给叛乱分子粮食。"[285]正是他们被驱逐了。

此后，在格拉纳达王国除了几千个像强盗那样生活[286]并且像强盗那样结帮成伙进行活动的摩尔人外，再没有剩下别的不屈服的人了。但是，在加泰罗尼亚的比利牛斯山中，摩尔人岂不是同样多，若非更多的话？这并不是一种完美的和平，但是一种接近标准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还有日常的法律不能充分贯彻实施和治安情况不佳的边缘地区。摩里斯科人被再度安置在卡斯蒂利亚。与此同时，在被平定了的王国，老基督教徒前来开拓、垦殖，使格拉纳达的肥美的土地变为殖民地。基督教世界毕竟在这场耗资巨大的战争中毫无所失[287]。

11 月 30 日，唐·胡安离开格拉纳达这个他最初学习打仗的战场，并且从此一去不复返。12 月 13 日，他到达马德里[288]。另外一项任务正在那里等待他去完成。这项任务可能是刚刚熄灭的战争产生的后果。因为土耳其人之所以在这个时刻进攻塞浦路斯（这是土耳其人的参谋部门所珍视的早已制订好的老计划），理由之一难道不是在地中海的另外一端西班牙似乎受到内战的羁绊吗？

塞浦路斯战争的开始阶段[289]

1569 年和 1570 年之间的冬天土耳其的政策怎样制订和安排，我们看得相当清楚。如果说清楚的程度还不完全、彻底的话，至少也属罕见。因为从历史的观点看，16 世纪的土耳其几乎是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我

们这些西方的历史学家只能够从外部通过西方官方的代理人的报告去观察它。但是,在从 1569 年到 1570 年这段时期,土耳其首相穆罕默德·索科里和威尼斯在东地中海殖民地的总督关系密切,他执行的政策并非他的政府的政策。这两条行动路线之间的区别使我们能够比平时更加深入土耳其帝国的内心世界。这是历史学家的说法。情况果真如此吗?

大家知道,新的土耳其皇帝塞里姆即位之初并不穷兵黩武。然而,传统的惯例和习尚却要求他以一次辉煌的胜利来作为他的统治开始的标志。这次胜利带来的好处会使他能够修建并装备新君主在传统上需要的清真寺。1567 年、1568 年和 1569 年的半休战状态我们已经看到,但是我们还没有最终有把握地加以解释。1569 年,当格拉纳达叛乱爆发时,俄罗斯战争的需求和红海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使全部可能在西方进行的活动都陷于停顿。但是,既然在秋季摩里斯科人还没有放下武器,对他们的支援问题就尖锐地提了出来。土耳其人会使他们的舰队一直推进到西班牙海岸吗?在西班牙半岛上人们相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土耳其舰队必须在柏柏尔海岸或者法国海岸上拥有一个据点。于是把土伦港作为避难处的要求公开提了出来,公开程度之大使得人们寻思:土耳其此举是否更主要旨在使西班牙惶恐不安,而非取得港口?西班牙获悉土耳其的这项请求,预先作出了反应。土耳其人曾经认真考虑过援救摩里斯科人吗?

首先,两地遥隔,显然帆桨战船冬季必须停航。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援助格拉纳达的叛乱分子在技术上可能吗? 保罗·赫尔[290]在他渊博的、内容丰富的关于塞浦路斯战争的著作中估计这是可能

的，但也只有在这样的范围内才是可能的：这项政策的确是甘心情愿采取的，并且得到首相穆罕默德·索科里的大力支持。这项政策是鹰派的政策，是在各个方面都无愧于苏里曼大帝的威势和声誉的政策，是成千上万份文献资料证实了的政策。但是，是什么样的文献资料呢？是威尼斯在东地中海殖民地的总督写的汇报他同奥斯曼帝国首相的会谈情况的信件。然而，不能排除这位首相可能欺骗愚弄他会谈的对方。他表面上对其会谈对方的信任、对他吐露的衷情、对他说的心里话、给予他的恩惠、甚至同威尼斯的彻底断交也未能中断的会谈，所有这些难道不是很具有巴尔干的和东方的特色吗？特别是很符合素丹的总的政策的利益吗？分散威尼斯对正在形成的危险的注意力，然后同威尼斯保持友好关系（因为外交决不是无用的），这并不一定就是这种虚情假意的目的，如果的确有什么虚情假意的话。但是，我当然不会相信索科里的所言所行像保罗·赫尔描述的那样真诚。保罗·赫尔像其他很多历史学家一样，他关切的是论证说明土耳其的衰落，是通过量度索科里的"老鹰政策"和塞里姆的平庸的、目光短浅的政策之间的差距来说明这一点。索科里的政策是：不触碰威尼斯，但要援助摩里斯科人。塞里姆的政策是：打击威尼斯帝国的外部边缘塞浦路斯。众所周知，塞浦路斯是这个帝国设防很差、易受攻击的地区。

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对土耳其政策的过分简单、缺乏证据的解释。土耳其制订政策的中心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倾向，难以理解（例如早在1563年拉古萨的情报人员就报告了苏里曼大帝攻占塞浦路斯的计划）。索科里出生时是波斯尼亚人。他还很年幼时就被人从他信奉基督教的父母那里抢走。他一步一步攀登奥斯曼行政

等级的阶梯，1555 年任土耳其帝国大臣，十年后成为首相和塞里姆的女婿。他在难以于其中幸存的宫廷里，在一个冷酷无情、令人畏惧的主人的左右成长起来。他修身养性，苦其心志，达到自我控制、不露声色、韬光养晦的境地。他被说成是威尼斯的朋友。他为威尼斯效劳，换取回相当大的报偿。这种行动从来没有让土耳其皇帝的宫廷的任何一个大臣承担什么义务。据称，他热爱和平，是个真正的和平主义者。这种说法夸大其词，因为他要的是土耳其式的和平。这种和平对弱者来说是难于负担的；对土耳其素丹的政府来说则是光荣体面的。此外，如果穆罕默德·索科里的政策的确是人们认为他所要采取的政策的话，那么当航船向另外一个方面行驶时，他仍然能够控制事态的发展，继续掌舵吗？据说他的政策很有分寸，只暗示出来，必要时变得温和，在适当时机又抛在一边。但是，这种灵活性的证明又在哪里呢？即使这种证明存在，当我们了解到素丹宫廷内部的激烈争吵和冲突的时候，就很难相信这种灵活性、这种两面派手法，即背叛或者至少破坏他的君主的图谋的行径，使他能够对抗他所有的敌人，对抗素丹过去的导师拉拉·穆斯塔法大臣，对抗海上将军皮亚利帕夏这个阴谋家和对抗有权有势的犹太人米卡斯。附带说一句，人们会寻思，对他的这些敌手中的最后一个，对这个十分可疑的人物，对这个欺诈行骗的债主（他向法国索还借款时至少是这样），对这个根据我们今天的看法即使不是戏剧里的阴险狡诈之徒至少也会被称为天生的间谍的完整典型的人物，应该有什么看法呢？关于米卡斯的情况，也是西方，唉，也只有西方，提供了一些函件和资料。米卡斯同托斯卡纳大公、热那亚以及西班牙，可能还同葡萄牙有联系……他是叛徒吗？或者准许

我们来假设推想一下，他是奉命行事吗？他在一项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协调一致的政策中扮演一个特意筹划的角色时并没有忘记从中谋取私利。根据保罗·赫尔的看法，他只不过是个“极不干净”[291]的人而已，是个根据个人的恩怨和利害得失行事者而已。他出于个人的恩怨反对威尼斯，因为后者夺走他的妻子的一部分财富；他出于个人的利害得失反对威尼斯，因为据说从1569年起[292]，他渴望成为塞浦路斯的国王，渴望在这个岛上设置一块和他属于同一教派者的殖民地。他可能有上述种种动机，这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当然不会像这个令人不安的人物[293]的传记的作者和忠实的崇拜者那样把他描绘得像雪那样白碧无瑕。我们必须承认，由于缺乏证据，我们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来对他进行评述。我们还必须承认，沿着由传记和野史轶事铺砌成的这条十分可疑的道路去探讨土耳其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篇章，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人们想不惜任何代价提出某些假设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否认存在着一项坚定不移地、过早地固定在一个目标——塞浦路斯——上的土耳其政策。这项政策发挥作用，支配某些行动，让每个人都扮演自己的角色。它让这个人对威尼斯亲切殷勤，让另外一个人处理同西班牙或者同法国的交易买卖。土耳其的政策是到处施放烟幕。它不让摩里斯科人灰心丧气，但又不促使柏柏尔人摆脱受他们半支持的状况。它在需要时指责柏柏尔人在突尼斯冒险[294]，但又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实行一项十分类似的政策，因为土耳其人虽然并不关心直接或者通过攻击西班牙的舰队来间接帮助在等待中的摩里斯科人，但寻求从摩里斯科人不自觉地给予他们的帮助中得到好处，以便不冒风险地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

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

土耳其人下定决心不放过任何机会,这一年也寻求恢复由于从 1567 年到 1568 年这段时期法国和西班牙的接近而已经变得相当冷淡的法土联盟。这就使 1569 年土耳其人提出的关于土伦的要求具有它的意义(这是一个摸底试探的时机),这还使同样怪诞的克洛德·迪·布尔所作的怪诞的君士坦丁堡之行具有它的意义。克洛德·迪·布尔在法国的东方政策处于复杂微妙和不正常的时刻到达,并且以他“疯狂的想象”[295]使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他很快同正式派驻的大使发生争吵,企图搞垮银行家米卡斯和得到首相穆罕默德·索科里的好感。在此期间,他为热那亚人效劳,代表他们进行谈判。当他在 1568 年和 1569 年之交的冬季由土耳其特别大使陪同取道威尼斯返回时,身上携有在穆斯林国家中规定基督徒或外侨权利的协定的“展期文件”。这是因为土耳其亟欲看见在西方再度出现一个遵循传统政策和支持土耳其利益的法国。人们(怀着不自觉的西方的骄傲)惯常看到法国把土耳其拉到自己一边并为了自身的目的利用土耳其。但是,土耳其也恳求法国并把法国拉到它那一边去。例如 1569 年和 1570 年就有过这种情况。在这两年内,安茹公爵和瓦卢瓦的玛格丽特的新婚丈夫、特兰西瓦尼亚亲王就波兰王位继承问题进行了会谈[296]……

但是,同这个被第三次内战弄得四分五裂的法国怎样恢复法土协定呢?法国国王被卷入天主教徒一边,走得太远,无法作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件事最好的证明是他同意在威尼斯逮捕迪·布尔和伴随他的土耳其人[297]。迪·布尔接连写信,许下很多大愿。他有多少话要讲啊!最后,他获准离开威尼斯,但结果又在米

兰多拉被捕……这丝毫不能阻止法国国王夸耀可怜的迪·布尔在威尼斯市政议会和土耳其人之间进行的斡旋[298]。

然而，在吉斯家族和不妥协的天主教党衰落后，法国的内战停止了一段时期。7月14日的停战协定签定后紧接着公布了8月8日的圣日尔曼抚慰赦令[299]。卡特琳那时转向新教徒。她转变的程度是如此之大，以致人们开始议论所谓"恶魔似的婚姻"("恶魔似的"这个形容词是弗朗塞斯·德·阿拉瓦使用的)[330]，即安茹公爵和伊丽莎白的婚姻以及纳瓦尔的亨利和瓦卢瓦的玛格丽特的婚姻。在外交方面，法国当时正着手推行一项大规模的反对西班牙的政策。这个意大利女人不但不再满足于在法国的两党之间迂回曲折地前进，而且也不满足于在这两党紧紧依靠的强国之间迂回曲折地前进。法国的局势突然明朗起来。这个现象似乎总是被人不正确地只用个人之间因琐事而进行的争吵来加以解释。

土耳其人当时在做什么呢？

可能海上从来没有过比1569年和1570年之间的那个冬天更加严酷、风暴更大、更不利于消息传播的冬天了[301]。这种恶劣的天气，使不同地区之间的距离比平时更大，使掩蔽土耳其的行动的那道无声的障碍更加强固。然而，人们知道，而且在几个月以前就已经知道，土耳其人狂热地进行武装[302]，而且这显然是为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袭击。袭击马耳他？袭击拉古莱特还是袭击塞浦路斯？当还在进行推测的时候，土耳其袭击了威尼斯，袭击了他们在这个国家能够打击到的任何地方。由于时值严冬，威尼斯城本身的人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才得知这件事，虽然这个城市的人始终保持警惕。

威尼斯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还不顾明显的事实,一直不相信灾难降临。这的确是一场灾难,因为这个由于谨小慎微而经常被人嘲笑、这个充当妓女同土耳其人睡觉的威尼斯,除了谨小慎微、审慎行事之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它是自己的个性和政策的牺牲品,但更主要的是它自己的躯体、它自己的疆土分散、四处延伸的帝国的牺牲品,是它自己的经济的牺牲品。它的帝国的疆土仅仅是一串海上的据点。它的经济迫使它像19世纪实行自由贸易的英国那样依靠外部世界生存,以它的进出口贸易为生。它的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庞大的西班牙帝国或者是土耳其帝国(从某种观点看它是土耳其帝国的边境)奉行的那种政策,不会是这些人力资源丰富、土地辽阔的帝国奉行的那种政策。因此,威尼斯的政策时时刻刻都在研讨、谋划之中。这只能用国是的理由来加以阐明。然而,在16世纪的下半个世纪,这种明智的审慎态度却变得毫无用处可言,因为处于发展演变中的世界是同威尼斯,同它的政治模式,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也可以)同它的生活方式相悖的。

1570年,威尼斯刚刚度过持续了30年的和平。这是富有成果的和平。然而,这个和平对威尼斯的政治结构影响的程度和对它的防务削弱的程度,都超过了人们和威尼斯自己的想象。特别是它那过去令人生畏现在则已陈旧过时的防御体系和它的军事机构的解体(它的军队的领导人,特别是它的舰队的领导人,每天都失望地指出这一点),使它的战备处于大大低于几十年前的水平[303]。它习惯于这种几年来一直受到威胁但又总是出乎意料地得到拯救它的和平。它习惯于巴尔干世界成千上万的阴谋诡计,因此也习惯于相信细小的权宜措施的有效性。它已经不再把土耳其的政策或者土

耳其的虚张声势的姿态看得过分严重。

土耳其最初试图恐吓它。土耳其抱着这样的希望：威尼斯将不战而降，只需进行袭击然后立即谈判就足够了。因此，在土耳其的威尼斯商人1月份遭到逮捕。他们的货品财物交给第三者保管[304]。2月中旬，似乎已经在摩里亚采用了同样的措施。船只遇到同样的命运。两艘停泊在君士坦丁堡的已经装载完毕的威尼斯大帆船的货物被搬空，船被征用来为舰队服务。但是，这远非被某些历史学家说成是大规模的一网打尽的行动的那种"对威尼斯船只的扣押"。冬天，在人们得知这项措施之前能够扣押、没收的船只不可能为数很多。其次，这项措施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令人不安之处。大帆船已经得到支付赔偿金的允诺。这些船只被扣押、没收，只不过是一则普通的社会新闻而已。这种事在19世纪司空见惯、相当普遍。威尼斯之所以感到不安（它自然会感到不安并因而进行武装），是因为它得到土耳其素丹将率军穿越安纳托利亚和卡拉马尼并已在卡斯特尔努奥沃[305]又布署了新土耳其近卫军士兵700名的消息。但这并不妨碍在科托尔的威尼斯的总督府以后赠送礼品给穆斯塔法帕夏的儿子。他当时正路过卡斯特尔努奥沃[306]。土耳其人将凭借土耳其历史上的权利要求把塞浦路斯无条件地转让给他们，这一点可能从2月1日起在君士坦丁堡就已经众所周知了。但是，这个消息虽然已于2月9日在格朗香的通讯中提到[307]，却迟至3月份才传到威尼斯。这时战争已在进行。

土耳其人无疑想用一种露骨的威胁来支持他们的外交行动。他们的确已经进攻过威尼斯的属地。2月27日，星期一这天，恶劣的天气把一个名叫博米诺·德·基奥季亚的人的威尼斯船抛到佩

斯卡拉附近的亚得里亚海的海岸上。26 日，星期日，这艘船离开扎拉后，一场可怕的风暴在安科纳山的南面，使它偏离了航向。这个在一些商人中名声很好的船主报告说，2.5 万到 3 万个土耳其人已经突然扑向扎拉，仅仅由于偶然的原因，两艘帆桨战船才凭恃它们的大炮击退了来犯者并发出警报[308]。上述数字无法查证。但是，根据 1576 年的一份报告，总共有 6 万人的达尔马提亚警备部队守卫的漫长而脆弱的防线已经遭到进攻，这一点却是严酷的事实。土耳其人猛攻这个地方并大肆破坏[309]。

最后，关于土耳其提出要求的消息，正式传到威尼斯[310]。2 月 1 日，从君士坦丁堡紧急派出的传达奥巴特[311]将近 3 月中[312]经过拉古萨，并于 3 月 27 日这天获准拜会威尼斯的元老院。但是，他没有获准正式陈述他的使命，并且听到一些非常尖锐和难听的话。土耳其的要求遭到元老院的 220 票中的 199 票的拒绝[313]。威尼斯确实决定进行斗争。3 月中，它向菲利普二世派去一名特使[314]。庇护五世由于威尼斯的告警已经向西班牙的君主派去路易斯·德·托雷斯。这位大使的使命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315]。

威尼斯公开显示它作战的意志。它武装它的后备舰队，让这支舰队下水。它为它的帆桨大木船配备船员，用精良的大炮装备福斯托的大帆船，征募士兵，接受大陆城市提供的兵员，向塞浦路斯派去一支土耳其人无法拦截的军队，把几千人投向达尔马提亚，向扎拉派去一名工程师[316]。这些战备武装工作在春季到来之前大事张扬地完成了，但不一定有坚决使用这些武器装备的意图。土耳其军队迟至 7 月份才首次在塞浦路斯岛的南端登陆。直到那时为止，威尼斯只满足于严格遵照成规惯例行事：首先是不要显出被吓倒的

样子；其次是以威胁对付威吓，以暴力对付暴力。它一旦得到它的国民的财富和个人被扣押的报告后，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采取报复措施[317]。但是，土耳其人一旦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它也仿效行事[318]。不错，5 月 5 日，被任命为威尼斯总督的皮埃尔・洛雷达诺代表主战派[319]。但是，主和派远没有沦落到软弱无力、哑口无言的地步。3 月 27 日这天显示出威尼斯举国上下同心协力。这个全国一致的行动，是关系到国家威望的大事。这在主和派看来，毫无疑问也是干得十分巧妙的。但是，在这种全国一致的表象的后面却是派系林立、四分五裂，政治上朝三暮四的情事屡见不鲜。如果土耳其人已经撤退，威尼斯本会马上忘掉它的战备武装，忘掉基督教世界的利益和它亲爱的姊妹西班牙的……

1570 年初，西班牙忧心忡忡，深感不安，并且身处困境。使它感到不安的是土耳其人进行的大规模的战备武装；使它身处困境的是占用了它的大部分海、陆军的战争。北方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使它处于困境之中。它目睹这些事件发生，但因阿尔贝公爵拒绝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而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后者在某种意义上袖手旁观，保持中立。但这是一种代价异常昂贵的中立。

西班牙人的大部分帆桨战船当时正忙于沿着格拉纳达的海岸警戒、巡逻，因此，他们无法随意使用这些舰船。他们还危险地使意大利陷于军队撤光、无人保卫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西班牙对来自黎凡特的消息所作出的反应，首先就是效法在进行马耳他战役之前所组织的警戒待命行动，使那不勒斯、西西里和北非的要塞、堡垒处于戒备状态。这种种戒备措施也耗资巨大，但无法避开，因为没有任何事物证明土耳其人会宽容西班牙的属地，不加侵犯。

公文急报一再坚称土耳其不会发起进攻,但是,难道可以始终对这些公文急报深信不疑吗?而且,发出公文急报的人也说法各异。可以把大量混浊不清的水随意引入传播消息的河渠中。人们声称,威尼斯常常像使用武器那样使用它的出色的情报机构。这个武器会使基督教世界惶惶不可终日,并在这个世界维持一种土耳其的危险所引起的精神变态。当然,不管怎样,在 16 世纪,人们对威尼斯散布的消息并非深信不疑,而是半信半疑。然而,对威尼斯人来说,在消息的出发点君士坦丁堡和在威尼斯,施展骗术、玩弄花招、必要时还唆使人撰写供西班牙国王陛下阅读的公文急报,也是轻而易举的事。不管怎样,3 月 12 日,那不勒斯总督还写道:"我收到我最相信的代理人之一 1 月 22 日自君士坦丁堡的来信。这封信证实了我的看法,即不管人们关于达尔马提亚的战争开始的情况刚刚了解到些什么,目前正在准备作战的这支大型舰队并不仅仅是用来进攻威尼斯的。"[320]

因此,西班牙人在意大利南部集中了他们所能集中的帆桨战船。由于西班牙缺乏常备部队,他们还为米兰和那不勒斯征募了德意志士兵;为西西里的帆桨战船征募了意大利士兵。他们供给拉古莱特兵员、粮食和军火。3 月 31 日,菲利普二世致函昌托奈说[321]:"我决定征募两团德意志士兵,其中一团为米兰征募,另外一团为那不勒斯征募",因为"我在意大利的各个国家目前兵员奇缺,"以致前往进攻这些国家的土耳其人会对这些国家造成严重损失。预定开往那不勒斯的团队由胡安·安德烈·多里亚的帆桨战船在热那亚装上船后,于 5 月 3 日到达目的地[322],并且立即派往各个海岸。但是,6 月底,当土耳其的危险在具体的地区已经成为明显的

事实时，这个团队在威尼斯拒绝发给它薪饷之后[323]解散了[324]。

至于帆桨战船，胡安·安德烈·多里亚于4月份到达那不勒斯之后，在意大利南部拥有60来艘。这个数字是热那亚、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舰队的舰船的总和。那不勒斯的舰队由圣克鲁斯侯爵率领。首领们抱怨说，这些帆桨战船武器装备窳劣，船上划桨苦役犯数量不足[325]，很少士兵或者根本没有士兵。7月份，胡安·安德烈·多里亚获准征募意大利士兵2,000来名以便为他的舰船配备兵员。在此期间，舰队不得不两次驶往拉古莱特[326]。

第二次航行的矛头是指向厄尔杰·阿里的。人们获悉，他已经率领24艘或者25艘帆桨战船在比塞大停泊。让·安德烈·多里亚打算派遣他的31艘加强了的帆桨战船前去掳获这24艘帆桨战船。但是，在这个期间，卡拉布里亚人已经在比塞大的河岸设防。猎获物受到严密保护。基督教徒的帆桨战船掉过头来航行，先开到拉古莱特，然后抵达撒丁岛。这些舰船开到那不勒斯之前要在撒丁岛换载一些部队[327]。不久以后，它们接到前往西西里然后向东方驶行的命令。菲利普二世不顾渴望进攻突尼斯的西西里的新任总督佩斯卡尔的一再请求[328]，答应了教皇和威尼斯的请求。人们试图拯救塞浦路斯。

援救塞浦路斯

土耳其人7月份在塞浦路斯岛登陆。9月9日，这个岛屿的首府尼科西亚落入土耳其人手中。只有法马古斯塔因为设防较好仍然在威尼斯人的控制之下，而且拥有能进行长期抵抗的大量兵力。由于消息传递延迟，已经到了相当晚的

时候，直到仲夏，塞浦路斯问题才明明白白提了出来。威尼斯会派兵前往援救这个岛屿吗？它能够单独对付土耳其人，拯救这个盛产糖、盐和棉花的宝岛吗？不管怎样，它的利益在于挑动西方反对土耳其人，使这场局部战争从属于一场总的大战。这场总的战争的威胁可能使它的敌手胆寒却步，迫使它的敌手把手松开接受妥协。它也希望不把自己和地中海的另外一个巨人结合在一起，避免缔结一个与 1538 年的联盟类似的联盟[329]。这个 1538 年的联盟对它来说记忆犹新、十分恶劣。威尼斯感到多里亚和巴巴罗萨当时勾结串通沆瀣一气。1590 年，帕鲁塔坚称发生了背叛情事。既然它当时遭到进攻，它怎能在两派之间不偏不倚、不依附任何一派，不受约束自行其事呢？

把西班牙卷入这场赌博中，并非轻而易举的小事。格朗弗勒得到最先传来的消息后，就宣布反对对威尼斯进行任何援救。谈判通过罗马当局进行，最初是三方商谈。但是，庇护五世这个令人惊奇、不可思议的人物很快就操纵了谈判。他不久就单独一人行事。由于他的天主教政策过去始终是一种战斗性的政策，因此，他行动起来，手段更加激烈、粗暴。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那样，教皇的那股热劲 1566 年曾经受挫落空，但在地中海后来发生的事件中却得到报偿。他干劲十足，全力以赴解决问题。他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干脆利落地解决困难。他迫使谈判双方作出决定。原则上，他自己只不过是双方的调解人而已。

可以料到，这个教皇很少关心威尼斯把它自身束缚在其中的那些卑微狭隘的谋划和算计。威尼斯唯一关切的是拯救自己的种植园和盐田。1570 年 3 月，威尼斯的元老院开会时，教皇已经通过

他的使节向威尼斯施加压力，并且马上准许威尼斯对该国教士征收所得税，以便帮助这个共和国进行战备武装。他很快同意建立一支教皇的舰队。1571 年，托斯卡纳的帆桨战船是这支舰队的主体部分。他很快准许把木材运往安科纳制造帆桨战船[330]。他很快向菲利普二世派去他的心腹、亲信、教皇左右的热诚积极的教士之一的路易斯·德·托雷斯[331]。这个人由于是西班牙人并在菲利普二世的国务会议里有亲朋好友，因此被特地挑选出来担任这项任务并被尽快派往西班牙。对他的指示 3 月 15 日发出。4 月份，他在科尔多瓦受到菲利普二世接见[332]。这个月格拉纳达鏖战正急，达到高潮，而科尔多瓦离战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因此，他在一种宗教狂热的气氛中，当基督教世界的命运正处于激奋的状态的时刻到达[333]。这个世界的北部边缘（被宗教改革）和南海海岸同时遭到进攻。南海海岸在两场战争之间处境悲惨困难。大西洋上的大规模的敌对行动，很快就使这两场战争合二为一。当时这种激奋情绪不但在庇护五世的信中迸发出来（如果情况相反倒会令人惊讶），而且也在他的特使的信中跃然纸上。只要浏览一下这些信件就可以发现构成格拉纳达之战背景的那种充满激情偏见的活生生的现实事物和十字军东征精神的狂热。

然而，谈判进展缓慢。庇护五世要求的是一个正式结成的联盟，而不是一种过渡性的、临时凑成的联合。托雷斯收到的指示用他奉命向国王重申的话语说得明明白白："很清楚，促成土耳其人同威尼斯人争吵、决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土耳其人相信会看到威尼斯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没有希望和陛下联合，陛下正忙于同格拉纳达的摩尔人打交道。"但是，最巧妙的算计有时会是最错误

的算计。菲利普二世之所以终于接受了反对伊斯兰教联盟，可能正是因为1570年，即进行格拉纳达战役这一年，把西班牙带回它往昔的激情狂热中。

显然，政治利益和财政利益都没有被人置诸脑后。威尼斯就是基督教世界的边境。这个世界会在威尼斯陷落之后或者在威尼斯同土耳其人缔结了法国政府毛遂自荐为它谈判的和约之后变得强大一些吗？教皇没有忽略这些论据中的任何一个。他写信给西班牙国王说："威尼斯的堡垒是西班牙国王的要塞的天然防御工事。"缔结这个联盟对菲利普二世来说等于"拥有威尼斯各邦、它们的人力、武器和舰队为他服务"。至于财政利益，这是清清楚楚的。自从1566年以来，西班牙国王就拥有大量特别税收入（即西班牙教士每年缴付的50万杜卡托）。但是，准许征收圣战税的教皇喻旨没有重新颁布，这意味着每年损失40万杜卡托[334]。1567年准许征收的什一税没有征收，因为担心遭到过分强烈的反对。路易斯·德·托雷斯以教皇的名义带来对征收圣战税的特许。但是，这项特许由于良心上的顾虑，到那时为止一直被扣住。这项对西班牙的财政预算的重大支持，毫无疑问对西班牙国王所作的决定有很大的影响。

菲利普二世通常被人认为行动迟缓、犹豫不决、优柔寡断，这次却在路易斯·德·托雷斯对他作了详尽的解释说明之后一个星期[335]原则上同意了对西班牙、威尼斯、土耳其以及对整个地中海来说都肯定是长期以来采取的最大一次冒险的行动。

甚至在缔结联盟以前就已经试图援救塞浦路斯[336]。援救工作在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因为一切都是临时匆匆安排的。尽管苏尼加在罗马多次进谏反对，教皇的舰队仍然临时仓促组成。教皇或许希

望让他自己的舰队出现，以此来防止西班牙人在这次征伐中像在从1538年到1540年那段时期那样随心所欲地指挥一切。另外一项也是临时仓促作出而且更加严肃认真的决定：任命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为联合舰队司令[337]。他是罗马领主、那不勒斯的王军统领，因而也是菲利普二世的封臣[338]。他一心一意想得到西班牙的恩宠(他已经两次试图去马德里旅行以便获得这种恩宠，但不很得手)。他是军人，不是水手。他年轻时只短期率领过他自己的帆桨战船。但是，庇护五世一旦选中了他，就坚持让他留在基督教舰队的领导岗位上。这一切都已经很严重了，因为作战时期，人不能临时充当舰队司令。

也不应当临时仓促组建一支作战舰队。然而，这正是威尼斯不得不做的，舍此别无他途可循。它迅速调集了一支庞大的舰队。但是，这项工作做得很差，因为它的战争机器因在漫长的和平时期闲置不用而锈蚀损坏。此外，它的海军的兵力分散为一支支单独的舰队。后备舰队在海军造船厂的干船坞里尚待重新配备人员。如果说威尼斯是富有的，甚至在物资、器材、船舶、帆桨战船、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和大炮等方面过分富有的话，它在人力方面却极端贫穷，在粮食供应方面却非常匮乏。一支海军需要划桨手、船员、帆桨战船上的士兵、木桶、储粮箱等。这些全都短缺。威尼斯市政议会既不懂得迅速行动，也不懂得采用新的战术来弥补人力的不足。它只开始模模糊糊地、粗略地看到用大炮装备起来的圆船、大帆船或者超级帆桨战船会有什么前途。尽管2月份时值严冬，圆船紧急运往塞浦路斯的援军仍然到达。途中，大帆船的炮火摧毁了土耳其的帆桨战船[339]。但是，教训并没有被人吸取。鉴于危险迫在眉睫，现在

来摆脱几百年的传统,来抛弃战斗的人既是战斗的动力又是战斗的机器的这种概念都已为时太晚……

在伊埃罗尼莫·扎内的统率下,3月13日从威尼斯出发的60艘帆桨战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于4月13日抵达扎拉[340]。这些舰船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月,直到6月13日为止。停留期间,如果不计算这些舰船为了对付乌斯科克人和为了对付海盗对拉古萨领土的袭扰而进行的几次巡逻[341],几乎按兵不动,无所事事,白白消耗了粮食。在没有可以提供物资的内地的扎拉港,补充这些粮食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些舰船甚至未能阻止土耳其的帆桨战船抢劫阿尔巴尼亚的海岸。这种按兵不动、无所事事的行动,也可能有充足的理由:它们既有保卫威尼斯的意愿,也惧怕亚得里亚海冬季的天气;在这种天气条件下,可以快速袭击、迅速横渡,但大型舰队不能编队驶行。它们也担心同土耳其舰队遭遇。土耳其舰队以希腊为基地保护希腊和塞浦路斯之间的交通往来。至少这是一种说法。

夏季到来,伊埃罗尼莫·扎内接到径直前往干地亚的命令,以便在该地调集全部威尼斯的帆桨战船。这些舰船也奉命在该岛集结。特别严令禁止这位海军司令在中途以任何事情为由停留。如果停留,将会使土耳其舰队打算开到并且来得及开到亚得里亚海。威尼斯舰队抵达科孚时,风闻教皇的舰队和西班牙舰队即将开到。它继续驶往干地亚。按照规定,它本来可以指望在该岛得到充足的兵员和粮食。但是,当它于8月份到达时,什么都没有准备就绪。这是由于粗心大意,缺乏远见?还是由于的确存在困难?一些威尼斯的报告对这些真正的困难作了解释。为威尼斯进行的从希腊群岛征募船员和收买被罚划船的奴隶的工作日趋困难。8月31日,西

班牙的和教皇的舰队驶入苏扎港。教皇的舰船并不比威尼斯的舰船装备精良。西班牙的帆桨战船则集中于墨西拿，在那里补充了划桨手和士兵[342]。

下一步如何行动？菲利普二世在他和路易斯·德·托雷斯的谈话中最初只答应了后者对他提出的要求，即让他的帆桨战船留在西西里。在举行了进一步的会谈，作出了派遣舰队去黎凡特的外海的承诺后[343]，对胡安·安德烈·多里亚发出了新的命令。8月9日，胡安·安德烈·多里亚接到这道命令，同时还收到让他充任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的下属的通知[344]。充任别人的副手不合他的心意，尤其在要让他的舰队，特别是让他自己的帆桨战船在黎凡特的外海冒险的时候，他更不愿意这样做。根据商定的供应合同的条件，他的帆桨战船如果损失，是不予补充替换的。这些舰船8月出航，奉命一直驶往塞浦路斯。这样，它们在返航时就必然会遭到冬季风暴的袭击。

因此，胡安·安德烈·多里亚执行上述命令很不乐意。他率领的51艘帆桨战船8月2日在奥特朗托与教皇的那支小舰队会合[345]。整个舰队直到9月1日才在克里特岛北岸附近的海域集结完毕[346]。

苏扎港被选作这次集结的地点。这个港口交通方便但供应很差。对全面的情况一观察，就可以明显看出威尼斯战备情况不佳。争执发生了。威尼斯人不在开阔的海上举行阅兵式，而是选择在港内举行。在海上，他们无法在兵员人数上弄虚作假。在港内，他们让船尾朝向陆地，这样就使船员在受检阅时可以从一艘帆桨战船转到另一艘帆桨战船[347]。与此同时，首领之间的龃龉不和也日益明

显。但是，既然威尼斯海军司令已经接到要不惜任何代价，必要时单独前往援救塞浦路斯的命令，联合舰队就决定驶向东方。然而，它并不直接开往塞浦路斯。抵达这个岛屿必然会同土耳其人遭遇。海军将领们考虑要采取进攻小亚细亚或者达达尼尔海峡的行动以便把敌舰队从塞浦路斯引开，然后迅速把自己的舰队布署于敌舰队与岛屿之间，以防它驶返该岛。

舰队因此启航驶向罗得岛[348]。这是一支巨大的兵力：帆桨战船180艘、帆桨大战船11艘（较大的船只和运输大帆船还不包括在内）、大炮1,300门、士兵1.6万名。尽管教皇的舰队和威尼斯舰队力量弱小，如果首领之间不是这样分裂不和，如果临时任职的海军司令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是个真正履行司令职责的首领，如果舰队谨慎小心的推进没有被多里亚进一步减慢，后来是能够采取一次有效的行动的。

因此，当舰队抵达小亚细亚海岸时传来了尼科西亚已于9月9日被攻占的消息[349]。除了法马古斯塔还在进行抵抗之外，几乎全岛都已落入土耳其人手中。首领们决定返航。恶劣的天气使他们在前往干地亚途中遇到可怕的阻碍，同样也使驶返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舰队这支胜利之师遇到阻碍。联合军因为岛上粮食供应很差，不准备在那里过冬。它们不得不突然向意大利撤退。这样做，航行的困难仍然很大。多里亚成功地把他的全部帆桨战船带回墨西拿[350]。但是，威尼斯人遭到巨大损失（13艘帆桨战船，甚至可能是27艘，在返回干地亚途中损失[351]）。马尔坎托尼奥11月只带回交给他的12艘帆桨战船中的3艘[352]。

可以想象这次失败的航行产生了多么令人不愉快的印象。可

以想象它引起了什么样的猜疑和争论[353]。在罗马和威尼斯,全部过错都推给多里亚。这是一个通过攻击国王的海军司令来攻击国王的大好时机。主和派在威尼斯再度占了上风。当然,西班牙人也少不了要进行反击。格朗弗勒写信给他的兄弟昌托奈说:“关于海洋,科洛纳并不比我懂得更多。”[354]在这个时期,威尼斯市政议会以它一贯的严厉惩罚了那些执行任务不力的人:从部队司令帕拉维奇诺、舰队司令伊埃罗尼莫·扎内(他被投入监狱后不久死去)一直到下级军官。这些惩罚和罢免,有力地促使威尼斯舰队1571年作战战果辉煌。

1570年冬季,联盟的前途似乎已经受到严重损害。这个联盟在原则上已经商定,但是还没有任何人签署。它似乎在存在以前就自行解体了。

本部分原注

1. Jean HÉRITIER, *Catherine de Médicis*, 1940, p. 439.

2. Pour tous ces détails biographiques, L. von PASTOR, *op. cit.*, XVII p. 37-59.

3. Rapport de Cusano, 26 janv. 1566, Arch. de Vienne, cité par L. von PASTOR, *op. cit.*, XVII, p. 42 et note 2.

4. *Ibid.*, p. 44.

5. *Ibid.*, p. 45.

6. Il n'y a eu, en sa faveur, que l'ombre d'une intervention de Philippe II, L. WAHRMUND, *Das Ausschliessungsrecht (jus exclusiva) der kath. Staaten Österreich, Frankreich und Spanien bei den Papstwahlen*, Vienne 1888, p. 26. Requesens à Philippe II, Rome, 7 janv. 1566: *Ha sido ayudato y favorecide pro parte de V. M.*; Luciano SERRANO, *Correspondencia diplomatica entre España y la Santa Sede*, Madrid, 1914, I, p. 77 et note 2.

7. Requesens à Philippe II, 5 janv. 1565, *in*: J. J. DÖLLINGER, *op. cit.*, I, p. 571-578, cité par L. von PASTOR, *op. cit.*, XVII, p. 11 et 59.

8. *Ibid.*, p. 48-49.

9. Zasius à l'archiduc Albert V de Bavière, F. HARTLAUB, *Don Juan d'Austria*, Berlin, 1940, p. 35; V. BIBL, *Maximilian II. der rätselhafte Kaiser*, 1929, p. 303.

10. Pie V à Philippe II, Rome, 24 janv. 1566, L. SERRANO, *op. cit.*, I, p. 111.

11. Rome, 11 janv. 1566, *ibid.*, I, p. 90.

12. Requesens au Roi, Rome, 30 déc. 1565, L, SERRANO, *op. cit.*, I, p. 67.

13. Philippe II à Chantonnay, Madrid, 16 janv. 1566, *CODOIN*, CI. p. 119-123; à F. de Alava, Madrid, 16 janv. 1566, A. N., K 1505, B 20, n° 65; Nobili au prince, Madrid, 18 janv. 1566,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7 *bis*; du même au même, 21 janv. 1566, *ibid.*

14. Ainsi par l'agent toscan, 15 janv. 1566, référence à la note précédente.

15. Lettres de Nobili des 18 janv. et 16 févr. 1566; 17 janv. 1566, FOURQUEVAUX, *op. cit.*, I, p. 47; 22 janv., p. 47-48; 11 févr., p. 52.

16. I, p. 61.

17.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23 janv. 1566, Simancas E° 1055, f° 11. Instruction au prieur D. Antonio de Tolède, 18 févr. 1566, Simancas E° 1131.

18. Lettre au vice-roi de Naples, 23 janv. 1566 (voir note précédente). Garcia de Toledo au vice-roi de Naples, Naples, 2 févr. 1566, Simancas E° 1055, f° 24; vice-roi de Naples à Plilippe II, Naples, 16 avr. 1566, Simancas E° 1055, f° 103, au sujet des quinze galères à fabriquer pour le compte du royaume de Sicile à Naples. Ne pourrait-on en faire construire huit à Gênes?

19. Simancas E° 1055, f° 7.

20. *Ibid.* "…*por el Danubio a hazer fabricar barcones y a hazer xarcias para pasar los exercitos*".

21. Avis de Constantionple 27 févr. 1566, Simancas E° 1055, f° 53.

22. *Ibid.*, avis de Corfou, 28 févr., par lettres de Cesare de Palma et Annibale Prototico, Simancas E° 1055, f° 49; cet avis parle de 80 à 90 galères seulement, lesquelles ne quitteraient pas les eaux turques. Avis de Chio, 1er

mars 1566, Simancas E° 1055, f° 59; avis de Corfou, 16 mars 1566, Simancas E° 1055, f° 67 et 68; seul un avis de Constantinople 15 mars 1566, et Lépante, 25 mars, Simancas E° 1055, f° 54, parle de 130 galères.

23. Or la guerre de Hongrie se prédisait plus que jamais, avec une marche sur Vienne, avis de Raguse, 26 févr. 1566, Simancas E° 1055, f° 61. Le 15 mars, on annonçait de Constantinople des mouvements de troupes vers Sofia (Simancas E° 1055, f° 64). Le 16, de Corfou, on signalait le rassemblement de spahis à Andrinople et la fonte de nombreux canons à Constantinople (Por carta de Corfu de 16 de março 1566, Simancas E°, 1055, f^{os} 67 et 68).

24. B. Ferrero à la République de Gênes, *Constantinople*, 9 févr. 1566, A. d. S. Gênes, Costantinopoli 22170. Confirmé par lettre de Corfou du 16 mars, Simancas E° 1055, f^{os} 67-68,

25. L. SERRANO, *op. cit.*, I, p. 184.

26. 29 mai 1566, FOURQUEVAUX, *op. cit.*, I, p. 64.

27. 20 avr. 1566, Simancas E° 1055, f° 104.

28. Avis de Raguse, 27 avr. 1566, Simancas E° 1055, f° 13. Avis de Corfou, 3 mai 1566, Simancas E° 1055, f° 124.

29. Par lettres de Constantinople, 16 juill. 1566, A. d. S. Gênes, Constantinople, 22170.

30. Avvisi venuti con la reggia fregata da Levante dall'ysola de Corfu de dove partete alli 10 di maggio 1566, Simancas E° 1055.

31. Corfou, 11 juill., avis arrivé à Otrante le 12, Simancas E° 1055, f° 155.

32. Rapport d'un patron de galion, Simancas E° 1055, f° 163.

33. G. Hernandez à S. M., Venise, 1er août 1566, Simancas E° 1365. Le marquis de Caparso au duc d'Alcala, Bari, 24 juill. 1566, Simancas 1055, f° 180.

34. Le grand maître à Philippe II, Malte, 25 juill. 1566, Simancas E° 1131. Philippe II à J. A. Doria, Bosque de Segovia, 11 août 1566, Simancas E° 1395.

35. Garci Hernandez au roi, Venise, 1er août 1566, Simancas E° 1325.

36. Lettre du gouvereur des Abruzzes, 1er août 1566, Simancas E° 1055, f° 165; Relacion de lo que la armada del Turco ha hecho en el Reyno de Napoles, desde que fue descubierta hasta los seys de agosto 1566, Simancas

E° 1325.

37. Por cartas de D. de Mendoza, 7 août 1566, de San Juan Redondo, Simancas E° 1055, f° 171.

38.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Naples 16 août 1566, Simancas E° 1055, f° 177; FOURQUEVAUX, *op. cit.*, I, p. 110-111, 123.

39. *Por cartas de J. Daça castellano de Veste* (Vasto?), 6 août 1566, Simancas E° 1055, f° 169. *Lo que se entiende de la armada por carta de Bari de los* 19 *de agotso 1566*, Simancas E° 1055, f° 178;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Naples, 5 sept. 1566, E° 1055, f° 190.

40.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Naples, 14 sept. 1566, E° 1055, f° 197.

41. Le même au même, Naples, 27 sept. 1566, *ibid.*, f° 200.

42. FOURQUEVAUX, *op. cit.*, I, p. 84-85, 6 mai 1566; Nobili au prince, Madrid, 6 mai 1566,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7 *bis* "*…et molti dicono che Sua Maesta vuol andar sopra…Argeri et dicono che in consiglio ha parlato* (*Philippe II*) *di voler andar in persona benché questo io no lo credo…*", le même au même, 7 mai 1566, *ibid.*

43. G. CAPPELLETTI, *op. cit.*, VIII, p. 373.

44.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Naples, 6 août 1566, Simancas E° 1055, f° 168.

45. 7 août 1566, Simancas E° 1055, f° 170.

46. Edmond FALGAIROLLE, *Une expédition française à l'île de Madère en 1556*, 1895; Nobili au prince, Madrid, 6 oct. 1566,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7 *bis*;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Venet.* VII, 12 nov. 1566, p. 386; Montluc désavoué par Charles IX: le roi à Fourquevaux, Saint-Maur-des-Fossés, 14 nov. 1566, p. 59-60; les Portugais sont les agresseurs, 29 nov. 1566, FOURQUEVAUX, *op. cit.*, I, P. 144.

47. Josef von HAMMER-PURGSTALL, *Hist.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835-1843, VI, p. 206.

48. *Ibid.*, p. 215.

49. Georg MENTZ, *Deutsche Geschichte*, Tübingen, 1913, p. 278.

50. G. de Silva au Roi, Londres, 29 avr. 1566, *CODOIN*, LXXXIX, p. 308.

51. Nobili au prince, Madrid, 23 mars 1566, A. d. S. Florence, Mediceo 1897 *bis*.

52. Leonardo Contarini au doge, Augsbourg, 30 mars 1566, *in*: G. TURBA, *op. cit*, I, 3, p. 313.

53. Nobili au prince, Madrid, 6 juin 1566,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7 *bis*.

54. Georg MENTZ *op. cit.*, p. 278.

55. Leonardo Contarini au doge, Augsbourg, 1er juin 1566, *in*: G. TURBA, *op. cit.*, I, 3, p. 320.

56. Le même au même, 20 juin 1566, *ibid.*, p. 324.

57. 18 août 1566, *op. cit.*, I, p. 109.

58. Charles IX à Fourquevaux, Orcamp, 20 août 1566, C. DOUAIS, *Lettres…à M. de Fourquevaux*, p. 49.

59. J. von HAMMER, *op. cit.*, VI, p. 216.

60. *Ibid.*, p. 219, dit le Danube à Chabatz.

61. *Ibid.*, p. 223.

62. *Ibid.*, p. 224.

63. *Ibid.*, p. 231; F. HARTLAUB, *op. cit.*, p. 23; à ce sujet nombreux avis inédits de Constantinople, 23 sept. 1566, Simancas E° 1055, f° 198;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5 nov. 1566, *ibid.*, f° 215.

64. Ainsi N. IORGA; ainsi Paul HERRE, *Europäische Politik im Cyprischen Krieg*, Leipzig, 1902, p. 8.

65. De Guricia, primero de setbre 1566, Simancas E° 1395.

66. F. de Alava au roi, Paris, 10 nov. 1566, A. N., K 1506, B 20, n° 76.

67. Le même au même, Paris, 8, déc. 1566, *ibid.* n° 88 "estar aqui algo sospechosos del Emperador paresçiendoles que hara treguas con el Turco antes que se acabe la dieta…".

68. Mémoire de Saint-Sulpice, 27 sept. 1566. FOURQUEVAUX, *op. cit.*, 1, p. 134.

69. Voir l'article, un peu confus car trop riche, de Pierre CHAUNU, "Séville et la "Belgique"", *in*: *Revue du Nord*, avril-juin 1960, qui essaie de replacer l'affaire des Pays-Bas dans l'histoire impériale de l'Espagne et la conjoncture internationale, à l'heure de Séville.

70. Léon VAN DER ESSEN, *Alexandre Farnèse*, Bruxelles, 1933, I. p. 125-126.

71. Georges PAGÈS, "Les paix de religion et l'Édit de Nantes", *in*: *Rev. d'hist. mod.*, 1936, pp. 393-413.

72. W. PLATZHOFF, *op. cit.*, p. 20

73. L. SERRANO, *op. cit.*, I, n° 122, p. 316, 12 août, cité par B. de MEESTER, *Le Saint-Siège et les troubles des Pays-Bas, 1566-1572*, Louvain, 1934, p. 20-21.

74. *Ibid.*, I, p. 131.

75. *Ibid.*, I, p. 67.

76. 30 avr., *ibid.*, I, p. 84.

77. *Ibid.*, I, p. 104; Nobili au prince, Madrid, 11 août 1566,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7 *bis*.

78. 18 août 1566, *op. cit.*, I, p. 109.

79. H. FORNERON, *op. cit.*, II, p. 230.

80. Philippe II à Francés de Alava, Bosque de Segovia, 3 oct. 1566, A. N., K 1506.

81. F. de Alava à Philippe II, Paris, 21 sept. 1566, A. N., K 1506, n° 57.

82. Méfiances de Philippe II à l'égard de l'Empereur, Fourquevaux à la reine, Madrid, 2 nov. 1566, FOURQUEVAUX, *op. cit.*, III, pp. 25-26. Inutile de dire les méfiances de Philippe II à l'égard de Catherine de Médicis.

83. Avis de Saint-Sulpice, 21 sept. 1566, FOURQUEVAUX, *op. cit.*, I, p. 133.

84. *Ibid.*, p. 134.

85. F. de Alava au roi, Paris, 4 oct. 1566, reçue le 20, A. N., K 1506, n° 62.

86. Philippe II à F. de Alava, Aranjuez, 30 nov. 1566, A. N., K 1506, n° 87.

87. Fourquevaux au roi, Madrid, 9 déc. 1566, FOURQUEVAUX, *op. cit.*, I, p. 147.

88. L. SERRANO, *op. cit.*, I, p. 425-426.

89. Paul HERRE, *op. cit.*, p. 41, Castagna à Alessandrino, Madrid, 13 janv. 1567; FOURQUEVAUX, *op. cit.*, I, p. 172 et *sq.*, 18 janv. 1567.

90. *Ibid.*, I, p. 147.

91. 4 janv. 1567, *ibid.*, I, p. 160.

92. G. de Silva au Roi, Londres, 5 oct. 1566, *CODOIN*, LXXXIX, p. 381.

93. Le même au même, Londres, 10 déc. 1566, *ibid.*, p. 416.

94. Le même au même, Londres, 18 janv. 1566, *ibid.*, p. 427.

95. Anvers, 24 mai 1567, Van HOUTTE, "Un journal manuscrit

intéressant 1557-1648: les Avvisi", *in*: *Bull. de la Comm. Royale d'hist.*, I, 1926, LXXXIX (4e bull.), p. 375.

96. FOURQUEVAUX, *op. cit.*, I, p. 166, 4 janv. 1567.

97. Avis de Constantinople, 10 mars 1567, Simancas E° 1056, f° 23; Chefalonia, 24, 26 mars, 5, 10 avr. 1567, *ibid.*, f° 34; Copia de capitulo de carta que scrive Baltasar Portotico de la Chefalonia a 10 de avril a D. Garcia de Toledo, *ibid.*, f° 38; le même au même, 12 avr. 1567, f° 36; Memoria de lo que yo Juan Dorta he entendido de los que goviernan en Gorfo (*sic*) es lo siguiente (24 avr. 1567), f° 45, Chefalonia, 21 avr., f° 47; Corfou, 28 avr., *ibid.*, avis de Constantinople, 17 mai 1567, f° 60; Fourquevaux au Roi, Madrid, 2 août 1567, FOURQUEVAUX, *op. cit.*, I, p. 248, "Le Sophy ne remue rien ains envoye un sien ambassadeur au d. Turc"; avis de Constantinople, 8 janv. 1568, Simancas E° 1056, f° 126, on croira à l'arrivée des ambassadeurs persans quand on les verra.

98. J. von HAMMER, *op. cit.*, VI, pp. 313-317; Chantonnay à Philippe II, Vienne, 4 juin 1567, *Codoin*, CI, p. 151-152; G. Hernandez à Philippe II, Venise, 26 janv. 1567, Simancas E° 1326. Trêve préparée de longue date conclue pour huit ans et non pour trois, comme Fourquevaux l'annonçait, il est vrai en avance, le 30 juin 1567, FOURQUEVAUX, *op. cit.*, I, p. 219. La guerre au ralenti n'a pas empêché l'empereur de solliciter des subsides espagnoles, 24 août 1567, *ibid.*, I, p. 255. Grosse escarmouche du côte de la Transylvanie, Chantonnay à Philippe II, Vienne, 30 août 1567, *CODOIN*, CI, p. 263. Inquiétudes impériales au sujet de l'issue des tractations engagées, 20 déc. 1567, FOURQUEVAUX, *op. cit.*, I, 311; Nobili au prince, 25 déc. 1567,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8, f° 153 Lo que se escrive de C. pro cartas de VII de marco 1568, Simancas E° 1056, f° 135, la trêve serait conclue pour dix ans, dit-on, avec inclusion du Très Chrétien, du roi de Pologne et de Venise.

99. Constantinople, 10 mars 1567, Simancas E° 1056, f° 23, révoltes albanaises dans la région de Valona et de Sopotico; Corfou, 28 avr. 1567, *ibid.*, f° 47;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11 mai 1567, Simancas E° 1056, f° 57, les Albanais révoltés sont ceux de Zulati, Procunati, Lopoze, Tribizoti…; de la Cimarra a XII de Junio 1567, *ibid.*, f° 6; Corfou, 26 déc. 1567, *ibid.*, f° 131.

100. Révolte du Yémen, Constantinople, 10 mars 1567, voir note précédente; Copia de un capitulo de carta que scrive de Venecia J. Lopez en XXI de hen° 1568, Simancas E° 1066, f° 130; Constantinople, 17 nov. 1568,

Simancas E° 1057, f° 2.

101. …*Que el Turco attiende solo a dar se plazer y buen tiempo y a comer y a bever dexando todo el govierno en manos del primer Baxa*, Constantinople, 10 mars 1567, Simancas E° 1056, "…*que el Turco continua sus plazeres y el presume mucho que por ventura sera la destrucion deste imperio que Dios lo permita*", Constantinople, 17 mai 1567, Simancas E° 1056, f° 60.

102. *Op. cit.*, p. 24.

103. *Op. cit.*, p. 54. Voir aussi Vic[te] A. de LA JONQUIÈRE, *Histoire de l'Empire ottoman*, t. I, 1914, p. 204.

104. Garces au prince, Madrid, 13 févr. 1566,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7, f° 116.

105. Constantinople, 30 avr. 1566, Simancas E° 1395.

106. Simancas E° 1055, f° 77.

107. *Ibid.*, 76 v°.

108. *Relacion de lo que refiere uno de los hombres que el Marques de Capurso embio a Constantinopla por orden del Duque de Alcala por octubre pasado* (1567), Simancas E° 1056, (f° non relevé par omission).

109. Corfou, 26 déc. 1567, avis arrivés à Lecce, le 12 janv. 1568, Simancas E° 1056, f° 131.

110. Constantinople, 5 mars 1567, Simancas E° 1058, f° 133.

111. Constantinople, 17 nov. 1568, Simancas E° 1057, f° 2.

112. Disette en Catalogne, 3 mai 1566, Simancas E° 336; disette à Gênes, Figueroa à Philippe II, Gênes, 26 mars 1566, Simancas E° 1395; en Aragon, 13 févr. 1567, FOURQUEVAUX, *op. cit.*, III, p. 36; en Sicile, grosse exportation de grains en 1567-1568, 209 518 salmes, mais de 93 337 seulement en 1568-1569, *Relationi delli fromenti estratti del regno de Sicilia*, 1570, Simancas E° 1124, La forte exportation de 1567-1568, n'est-elle pas en liaison avec les gros besoins du monde méditerranéen?

113. Constantinople, 10 août 1567 avis arrivés à Lecce le 20 oct., Simancas E° 1056, f° 80; Constantinople, 20 oct. 1567 (ital.), *ibid.*, f° 91; Constantinople, 16 mai (1568), *ibid.*, f° 151. Contre Raguse, avis de Corfou, 12 juin 1568, *ibid.*, f° 16.

114. Le duc de Terranova, président du royaume de Sicile, à Antonio Pérez, Palerme, 30 sept. 1568, Simancas E° 1132; Pescaire au roi, Palerme, 18 oct. 1568, *ibid.*

115. Pour Tunis, 21 mai 1567, contre Alger et Djerba, 15 févr. 1567, FOURQUEVAUX, *op. cit.*, I, p. 180, 15 mars, *ibid.*, p. 190. A noter qu'à partir de janvier 1567, l'Espagnol a eu la certitude, à peu près, qu'il n'y aurait pas d'armada turque, Lecce, 29 janv. 1567, Simancas E° 1056, f° 17.

116. Vice-roi de Naples, au roi, 11 mai 1567, Simancas E° 1056, f° 57.

117. Peu animé cependant avec les nombreuses galèresa lors détachées vers l'Ouest.

118. Chantonnay au roi, Vienne, 12 août 1568, *CODOIN*, p. 469-479.

119. Garci Herández au roi, Venise, 25 janv. 1567, Simancas E° 1326, le Titien?

120. Au roi, 6 mai 1567, A. N., K 1508 B 21, n° 6, passages déchiffrés entre les lignes.

121. Fourquevaux à la reine, Madrid, 3 mai 1563, FOURQUEVAUX, *op. cit.*, III, p. 42, 8 mai, I, p. 351. Philippe II n'aurait pas voulu être compris dans la trêve turco-impériale.

122. Chantonnay au roi, Vienne, 23 mai 1567, *CODOIN*, CI, p. 213-219.

123. Philippe II à Chantonnay, Madrid, 26 sept. 1567, *ibid.*, p. 280-281.

124. On sait que Méhémet Sokolli est né à Trébigni près de Raguse.

125. Chantonnay à Philippe II, Vienne, 28 févr. 1568, *CODOIN*, CI, p. 378-379.

126. Le même au même, Vienne, 12 juin 1568, *ibid.*, p. 432-436.

127. Philippe II à Chantonnay, Madrid, 18 juill. 1568, *ibid.*, p. 450.

128. Madrid, 24 août 1568, FOURQUEVAUX, *op. cit.*, I, P. 256.

129. Nobili au prince, Madrid, juin 1567,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8, f° 246; J. A. Doria au roi, Cadix, 26 juin 1567, Simancas E° 149. Arrivée de J. A. Doria à Málaga, le 11 juill., les provéditeurs à Philippe II, 12 juill. 1567, Simancas E° 149, f° 197.

130. Fourquevaux au roi, 2 mars 1567, FOURQUEVAUX, *op. cit.*, I, pp. 187-192.

131. Le même au même, 4 janv. 1567, *ibid.*, I, p. 160; vice-roi de Naples, au roi, 8 janv. 1567, Simancas E° 1056, f° 11.

132. Voir note précédente, 8 janv. 1567.

133. 13 févr. 1567, FOURQUEVAUX, *op. cit.*, I, p. 177.

134. 18 janv. 1567, *ibid.*, I, p. 169; Charles IX à Fourquevaux, 25 févr. 1567. *ibid.*, p. 83.

135. Difficultés avec les cantons suisses, 18 avr. 1567, A. N., K 150, n° 98. Craintes vénitiennes, Garci Herández au roi, Venise, 13 avr. 1567, Simancas E° 1326. Agira-t-on contre Genève au passage? Madrid, 15 avr. 1567, FOURQUEVAUX, *op. cit.*, I, pp. 202-203. Craintes du duc de Lorraine, F. de Alava à Philippe II, Paris, 17 avr. 1567, A. N., K 1507, n° 104.

136. Petit exemple: expédition de trois navires de Málaga, dont un chargé de riz et de fèves, Diego Lopez de Aguilera à Philippe II, Simancas E° 149, f° f205.

137. 30 juin 1567, FOURQUEVAUX, *op. cit.*, I, p. 220.

138. 15 févr. 1567, *ibid.*, p. 180; Nobili au prince, Madrid, 15 févr. 1567,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7 *bis*. "*Hieri venne avviso che nella spiaggia di Malaga combattute da grave tempesta sono affondate 27 tra navi et barche cariche di biscotti, d'armi, di munitioni et d'alchuni pochi soldati…*".

139. Fourquevaux au roi, Madrid, 15 avr. 1567, FOURQUEVAUX, *op. cit.*, I, p. 202. Le Turc ne viendra pas, "que no aura armada este año" annonçait le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Puçol, 4 avr. 1567, Simancas E° 1056, f° 31.

140. Il s'est embarqué le 26 au soir, le duc d'Albe à Philippe II, Carthagène, 26 avr. 1567, *CODOIN*, IV, p. 351. Le même au même Carthagène, 27 avr., *ibid.*, p. 354. Il ne part donc pas le 17, comme le dit l'édition des letters de FOURQUEVAUX, *op. cit.*, I, p. 209; Nobili au prince, Madrid, 3 mai 1567,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8, f°s 50 et 50 v°; le même au même, 4 mai 1567, *ibid.*, 4897 *bis*; le même au même, 12 mai 1567, *ibid.*, 4898, f°s 58 et 59 v°, "Parti il Ducca d'Alva di Cartagena alli 27 del passato et sperase che a questa hora sia arrivato in Italia".

141. Figueroa à Philippe II, Gênes, 8 août 1567, Simancas E° 1390.

142. A. de RUBLE, *Le traité du Cateau-Cambresis*, *op. cit.*, p. 82.

143. Adam Centurione va jusqu'à proposer de céder la Corse au Roi Catholique, Figueroa à Philippe II, Gênes, 8 août 1567, Sim. 1390. Figueroa à qui la proposition est faite la rejette aussitôt et rend compte.

144. Figueroa à Philippe II, Gênes, 15 mai 1568, Simancas E° 1390.

145. Nobili au prince, Madrid, 12 mai 1567,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8; sur le rétablissement de la situation aux Pays-Bas, F. de Alava à Philippe II, Paris, 9 avr. 1567. A. N., K 1507, n° 99; du même au même, Paris, 5 mai 1567, *ibid.*, K 1508, B 21, n° 16 *b*; il écrit de Marguerite de

Parme：*significale quan enteramente quedan ya en obediencia de V. M*[d] *todos aquellos estados sea dios loado*…

146. 4 janv. 1567，FOURQUEVAUX，*op. cit.* ，I，p. 156.

147. *Ibid.* ，I，p. 165. ；Nobili au duc，7 déc. 1566，A. d. S. Florence，Mediceo 4898，f° 8，donne la même nouvelle en avance. Mais Ruy Gomez a manœuvré.

148. Castagna à Alessandrino，Madrid，7 janv. 1567，cité par Paul HERRE，*op. cit.* ，p. 41. Ruy Gomez sondera même un jour l'ambassadeur du Très Chrétien au sujet d'une action éventuelle de la France contre le Turc puis laissera tomber l'entretien，Fourquevaux au Roi，Madrid，15 avril 1567，FOURQUEVAUX，*op. cit.* ，I，p. 204.

149. Fourquevaux，18 janvier 1567，*ibid.* ，I，p. 170.

150. Sigismondo de Cavalli à la S[ie] de Venise，Madrid，7 mai 1568，*C. S. P. Venetian*，VII，p. 423-424.

151. 23 janv. 1567，FOURQUEVAUX，*op. cit.* ，I，p. 183，Ce mot de F. de Alava à Philippe II (Paris，23 avr. 1567，A. N. ，K 1507，n° 106)，parlant du Roi de France et de ses conseillers：*Va les cada dia cresciendo el temor de la passada de V. M*[d].

152. Charles IX à Fourquevaux，Paris，14，nov，1567，C. DOUAIS，*Lettres de Charles IX à M. de Fourquevaux.* p. 129 et *sq.* ，nouvelle de la victoire de Saint-Denis. Départ des gentilshommes flamands qui se trouvent au camp des protestants，Francés de Alava au roi，Paris，23 oct . 1567，A. N. ，K 1508，B 21，n° 81.

153. E. LAVISSE，*Histoire de France*，VI，I，p. 100.

154. R. B. MERRIMAN，*op. cit.* ，IV，p. 289.

155. Nobili au duc，Madrid，30 oct. 1567，A. d. S. Florence，Mediceo 4898，f° 122.

156. Madrid，15 avr. 1567，FOURQUEVAUX，*op. cit.* ，I，p. 201；Requesens au Roi，Rome，19 avr. 1567，L. SERRANO，*op. cit.* ，II，p. 90.

157. G. de Silva au roi，21 juin 1567，A. E. Esp. 270，au f° 175，articles en italien de la ligue contre les Protestants.

158. L. van DER ESSEN，*op. cit.* ，I，p. 151，références à Campana et à Strada.

159. Fourquevaux à la reine，23，févr. 1567，FOURQUEVAUX，*op. cit.* ，III，p. 58；Granvelle au roi，Rome，14 mars 1567，*Correspondance*，I，p. 294. Au

reçu de mauvaises **nouvelles** des Pays-Bas"tout aussitost et du soir à lendemain"le roi s'est résolu au voyage d'Italie. 24 mai 1567, FOURQUEVAUX, I, p. 192; en Italie on pubie que le roi n'ira pas en Flandre, Granvelle au roi, Rome, 15 avril 1567, *Corresp.*, II, p. 382. Le voyage est-il un paravent pour une expédition contre Alger, Nobili au prince, Madrid, 4 mai 1567,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7 *bis*; certitude du départ, cependant les princes de Bohême ne font aucun préparatif, Nobili au prince, 18 juin 1567, *ibid.* 4898. f^{os} 62 et 62 v°, mais le même jour Nobili, *ibid*, f° 67 v°, annonce leur départ. Préparatifs pour le voyage, Nobili, *ibid.*, 4897 *bis*, 26 juin; Fourquevaux à la reine, Madrid, 30 juin 1567, FOURQUEVAUX, *op. cit.*, I, p. 228, ordre de départ donné par Philippe II: "Je ne scaurois dire si ce sont finesses castillanes, mais cela est ainsi". Philippe II à Granvelle, Madrid, 12 juill. 1567 *CODOIN*, IV, p. 373, sa ferme résolution de partir; Nobili au prince, Madrid, 17, juill. 1567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8, f° 77"…che l'andata di sua Mta in Flandra riscalda assai et tutti questi grandi lo dicono absolutamente…". Fourquevaux au roi, fin juill. 1567, FOURQUEVAUX, *op. cit.*, I, p. 241, on ne sait quelle mer choisira Philippe II Nobili au prince, Madrid, 24 juill. 1567, Mediceo, 4898, f^{os} 75 et 75 v° Pedro Melendez arrive àpoint de Floride pour prendre le commandement de la flotte royale; Francès de Alava à Catherine de Médicis, Paris, 8 août 1567, A. N.. K 1508, B 21, n° 42, la gouvernante des Pays-Bas envoie des navires au-devant de la flotte royale; Granvelle au roi, Rome, 17 août 1567, se réjouit du départ: "Bien qu'en Espagne et en Flandres et ici encore plus il y ait quantité de gens qui se refusent à croire au voyage de V. M. et qui discourent chacun à sa fantaisie…". Le temps passe: Fourquevaux à la reine, 21 août 1567"et de s'embarquer le dit roy en septembre serait naviguer en homme désespéré qui se veut perdre et faire perdre les siens"; G. Correr au doge, Compiègne, 4 sept. 1567, *C. S. P. Venetian*, VII, p. 403, d'après des lettres de marchands le Roi Catholique "is not likely to arrive". G. de Silva au roi, Londres, 6 sept. 1567, *CODOIN*, LXXXIX, p. 541, d'après l'ambassadeur français, Philippe II passerait par Santander non par la Corogne. Si le voygage n'avait pas lieu, expédition contre Alger. Lettre circulaire de Philippe II aux ducs de Florence, Ferrare, Urbin, Mantoue, Madrid, 22 sept. 1567, ne va **plus** en Flandre par la mer de Ponent "por sus enfermedades y por ser el camino tan trabajoso que no ha sido possible, para estar ya a la boca del invierno…". Fourquevaux au roi, Madrid, 23 sept. 1567, *op.*

cit., I, p. 367, voyage remis au printemps. Vice-roi de Naples au roi, Naples, 31 sept. 1567, Simancas E° 1056, f° 96, a reçu lettre lui indiquant que le voyage était remis au printemps prochain. Nobili au prince, 17 nov. 1567, Mediceo 4898, f° 128, tous les hommes de bon sens en faveur du voyage; le même au même, *ibid.*, f°137, 27 nov. 1567, Don Diedo de Còrdova lui dit dans l'antichambre du roi que Philippe II ira en Flandres avec des forces suffisantes pour combler les vides des compagnies espagnoles. Le cardinal de Lorraine à Philippe II, Reims, 16 janv. 1568, A. N., K 1509, B 22, n° 3 a, pour l'engager à passer dans les Pays-Bas et à continuer la répression des hérétiques; F. de Alava au roi, Paris, 27 mars 1568, A. N., K 1509, B 22, n° 35 a, *Todo lo de aquellos estados esta quietissimo desseando la venida de V. M*[d] *para el remedio dellos.*

160. E. HAURY, "Projet d'entrevue de Catherine de Médicis et de Philippe II devant Boulogne", *in: Bull. de la Soc. acad. de Boulogne-sur-Mer*, t. VI (extrait B. N., Paris, in-8°, Lb 33/543); Fourquevaux à la reine, Madrid, 24 août 1567, FOURQUEVAUX, *op. cit.*, I, p. 254.

161. Le 24 août, Van HOUTTE, *art. cit.*, p. 376.

162. Voir page précédente, note 2 *in fine*, F. de Alava au roi, 1[er] mars 1568, A. N., K 1509, B 22, f° 26 indique déjà, d'après le duc d'Albe, la quiétude des Pays-Bas.

163. Le livre de Viktor BIBL, *Der Tod des Don Carlos*, nous l'avons déjà dit, n'est pas à suivre.

164. Fourquevaux au roi, Madrid, 26 juill. 1568, FOURQUEVAUX, *op. cit.*, I, p. 371. La mort de Don Carlos a tiré le roi de plusieurs soucis "et pourra sortir de son royaume à sa volonté sans danger d'y survenir sédition en son absence".

165. *Philippe II*, p. 128.

166. L. PIRENNE. *H. de Belgique*, Bruxelles, 1911, IV, p. 13. A cette époque les agissements du prince d'Orange laissent Philippe II sans inquiétude, Philippe II à F. de Alava, Aranjuez, 13 mai 1568, A. N., K 1511, B 22, n° 31.

167. L. PIRENNE, *ibid.*, p. 14 et 15. Lettre de victoire du duc d'Albe à Philippe II, Cateau-Cambrésis, 23 nov. 1568 et dont on trouve partout des copies, B. N., Paris, Esp. 361; GACHARD, *Correspondance de Philippe II*, II, p. 49; *CODOIN*, IV, p. 506. Sur la campagne du prince d'Orange en France

en 1569, doc. inédits p. p. KERVYN DE LETTENHOVE, *Com. Royale d'Histoire*, 4ᵉ série, 1886, XIII, p. 66-74.

168. Van HOUTTE, *art. cit.*, p. 385, 386, 16 avr. 1569; bruits de guerre avec l'Angleterre, M. de Gomiécourt à Çaysa, Paris, 2 août 1569, bruits de guerre prochaine avec l'Angleterre, "dize por ciertos avisos q la Reyna d'Ingleterra arma para Normandia es de temer que no sera para lo de Flandes"; Van HOUTTE, *art. cit.*, p. 388. Sur cette grave crise de 1569, voir ci-dessus, 2ᵉ partie, chap. II.

169. G. de Spes au roi, Londres, 1ᵉʳ juin 1569, *CODOIN*, XC, p. 254; le même au même, *ibid.*, p. 276, Londres, 5 août 1589; "Es la falta de açeite aqui tan importante que de simiente de rabanos sacan aceite para adereszar la lana ...".

170. B. N. Madrid, Ms 1750, fᵒˢ 281-283. Sur toute la question d'Angleterre, voir le beau livre d'O. DE TÖRNE, *Don Juan d'Autriche*, I, Helsingsfors, 1915.

171. Des troubles en Irlande, dans les régions proches de l'Écosse, 8 janv. 1570, *CODOIN*, XC, p. 171.

172. Rome, 3 nov. 1569, L. SERRANO, *op. cit.*, III, p. 186. Proyecto del Papa sobre la sublevacion de Inglaterra contra Isabel: piensa Çuñiga que interviniendo el Rey en la empresa se lograria la concesion de la cruzada, Simancas E° 106, 5 nov. 1569; *C. S. P. Venetian*, VII, p. 479; Londres, 24 déc. 1569, *CODOIN*, XC, p. 316; 26 déc., p. 317. Conquista de Inglaterra y comission alli del consejero d'Assonleville, Simancas E° 541. Estado de los negocios de Inglaterra, *ibid.* Le point de vue du duc d'Albe exposé dans sa lettre à D. J. de Zuñiga, Sim. E° 913, copie aux A. E. Esp. 295, fᵒˢ 186 à 188: impossibilité de faire la conquête de l'Angleterre avec l'hostilité de l'Allemagne et de la France.

173. E. LAVISSE, *op. cit.*, VI, I, p. 106 et *sq.*

174. Le duc d'Alcala au pape, 24 juill. 1568, Simancas E° 1856, f° 17.

175. E. LAVISSE, *op. cit.*, VI, I, p. 111.

176. Francés de Alava au roi, Paris, 9 juin 1569, A. N., K 1514, B 26, n° 122.

177. Francés de Alava au duc d'Albe, Orléans, 19 juin 1569, A. N., K 1513, B 25, n° 54. J. Manrique inspecte la frontière de Navarre, J. de Samaniega au duc de Parme, Madrid, 12 juill. 1569, A. d. S. Naples, Farnesiane,

Spagna 5/1 f° 272;même indication,Castagna à Alessandrino,13 juill. 1569, L. SERRANO,*op. cit.* ,I,p. 112. On craint pour la Navarre,mais surtout au cas où cesseraient les guerres civiles en France,19 août 1569,FOURQUE-VAUX,II,p. 110;17 sept. 1569,*ibid.* ,p. 117.

178. Francés de Alava au roi,Tours,29 oct. 1569,A. N. ,K 1512,B 24, n° 139.

179. Constantinople,14 mars 1569,E. CHARRIÈRE,*op. cit.* ,III,p. 57-61. Const. , 26 mars 1569, Simancas E° 1057, f° 45, B[a] Ferraro à la S[ie] de Gênes,Const. 11 juin 1569,A. d. S. Gênes,Cost. 2/2170. C. 16 nov. 1569, Simancas E° 105,f° 3. Thomas de Cornoça au roi,Venise,9 déc. 1569,Simancas E° 1326:l'armada turque s'arme lentement,le sultan ayant besoin de ses forces du côté de la Moscovie,de l'Arabie et de la Perse. Const. ,10 déc. 1569,Simancas E° 1058,f° 6.

180. Moins cependant que ne l'indique W. PLATZHOFF,*op. cit.* ,p. 32.

181. Const. ,28 janv. 1569,Simancax E° 1057,f° 27:"…que no queria(le nouveau roi de Perse)que el fiume(*sic*)Volga se cortasse porque dello le vernia mucho daño por poder yr despues con varcas hasta sus estados a saqueallos…".

182. Avis de Const. ,reçus de Prague,par Venise,Prague,28 janv. 1570, A. N. ,K 1515,B 27,n° 21. Le problème du canal Don-Volga et récit de la campagne d'hiver,J. von HAMMER,*op. cit.* ,VI,p. 338 et *sq.*

183. F. de Alava au roi,Paris,4 févr. 1569,A. N. ,K 1514,B 26,n° 41"el Turco está muy embaraçado y empachado porque los Arabios prosperan y el Sofi los fomenta…". Alexandrie,14 avr. 1569,Simancas E° 1325,beaucoup de détails sur cette guerre du ,Yémen,comme si elle était le seul résultat des exactions des gouverneurs turcs,détails si nombreux quils sont à peu près inintelligibles comme le recit de J. von HAMMER,*op. cit.* ,VI,p. 342 et *sq.* qui reproduit curieusement toutes les indications de notre document. Const. 11 juin 1569,voir ci-dessus,note 1:les Turcs rétabliront probablement l'ordre dans le Yémen. Const. ,16 oct. 1569,E. CHARRIÈRE,*op. cit.* ,II,p. 82-99. Thomas. Cornoça au roi,Venise,29 sept. 1569,Simancas 1326,reprise d'Aden par les Turcs?Projet de percer l'isthme de Suez après soumission de l'Arabie, J. von HAMMER,*op. cit.* ,VI,p. 341.

184. Const. , 16 oct. 1569, E. CHARRIERE, *op. cit.* , III, p. 82-90, 800 000ducats pour le Yémen,un million pour la Syrie.

185. Vice-roi de Naples au roi, 14 janv. 1569, Simancas E° 1057, f° 18, pas d'armada turque cette année. F. de Alava à Çayas, Paris, 15 janv. 1569, A. N., K 1514, B 26, n° 23, bruits contradictoires, le Turc irait contre La Goulette ou contre Alexandrie; vice-roi de Naples au roi, Naples, 19 janv. 1569, Simancas E° 1057, f° 2, pas d'armada. Th. de Cornoça au roi, Venise, 24 janv. 1569, Simancas E° 1326, pas d'armada à cause de l'Arabie; Const., 28 janv. 1569, voir page précédente, note 3, pas d'armada; 14 mars 1569,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57-61. J. Lopez au roi, Venise, 2 juill. 1569, Simancas E° 1326: *Venecianos se han resuelto de embiar las galeaças en Alexandria y Suria ques señal que no saldra armada por este año*…

186. Pescaire au roi, Messine, 31 août 1569 et 2 sept. 1569, Simancas E° 1132.

187. B^a Ferrero à la S^ie de Gênes. Const., 23 juill. 1569, A. d. S. Gênes, Cost. 2/2170. Const. 24 et 29 mai (avis reçus à Naples, le 18 juill., Simancas E° 1057, f° 59). Const., 7 août 1569, Simancas E° 1057, f° 72: "que los aparatos maritimos continuan a gran furia y casi a la descubierta"; Const., 18 sept. 1569, Simancas E° 1057, f° 76; Const., 29 sept. et 2 oct. 1569, Simancas E° 1057, f° 9; Const., 16 nov. 1569, Simancas E° 1058, f° 3; Const. 26 déc. 1569, Simancas E° 1058, f° 8: *quest' appar (a) to di quest' armata sia per Spagna*… Sur ces armements, rapport du baile Barbaro aux Archives de Vienne, J. von HAMMER, *op. cit.*, VI, p. 336, notes 1 et 2.

188. P. HERRE, *op. cit.*, p. 15. Julian Lopez au roi, Venise, 15 sept. 1569, Simancas E° 1326. Voyez, dans l'autre sens, ce projet d'incendie de l'arsenal de Constantinople d'un certain Julio Cesar Carrachialo, vice-roi de Naples au roi, 23 mars 1569, Simancas E° 1057, f° 43.

189. Résumé des lettres du vice-roi de Naples, 22, 26, 29, 31 août 1569, Simancas E° 1056, f° 192.

190. Madrid, 5 janv. 1569, L. SERRANO, *op. cit.*, III, p. 23-24.

191. Sauli à la Seigneurie de Gênes, 5 janv. 1569, A. d. S. Gênes, Lettere Ministri Spagna 4, 2413.

192. Voir ci-dessus, note 1.

193. Pedro de MEDINA, *op. cit.*, p. 147 v°

194. Voir ci-dessus, note 2.

195. *Ibid.*

196. HURTADO DE MENDOZA, *op. cit.*, p. 71.

197. 13 janv. 1569, FOURQUEVAUX, *op. cit.*, II, p. 45.

198. 28 févr. 1569, *ibid.*, II, p. 56.

199. Avis d'Espagne, 20 mars 1569, *ibid.*, II, p. 62.

200. Sauli à la S[ie] de Gênes, Madrid, 14 avr. 1569, A. d. S. Gênes, Lettere Ministri, Spagna 1/2413.

201. Philippe II à Requesens, 15 janv. 1569, Simancas E° 910, ordre de venir sur les côtes d'Espagne avec 24 ou 28 galères.

202. Simancas E° 1057, f° 105, Madrid, 20 janvier 1569.

203. Vice-roi de Naples au roi, Naples, 19 février 1569, Simancas E° 1057, f° 36.

204. B[a] Ferrero à la S[ie] de Gênes, Constantinople, 23 juill. 1569, A. d. S. Gênes, Costantinopoli, 2/2170: *li mori di Granata etiam scriven qui al grand Sre et a tutti li principalli suplichando che se li manda socorso de arme solo che de gente sono assai*…, demandent l'envoi de l'armada en 1570; les régions du détroit de Gibraltar sont mal gardées et faciles à prendre. A. de HERRERA, *Libro de agricultura*…, *op. cit.*, 1598, rapporte dans son premier dialogue que la révolte de Grenade fut connue même à Constantinople où elle fut tout d'abord prise pour une fable, c'est là un on-dit (*segun se dize*) pour le moins curieux, 341 v°.

205. 13 janv. 1569, FOURQUEVAUX, *op. cit.*, II, p. 47-48.

206. *Ibid.*, p. 45.

207. *Ibid.*, p. 46.

208. Charles IX à Fourquevaux, Metz, 14 mars 1569, C. DOUAIS, *Lettres de Charles IX à M. de Fourquevaux*, p. 206.

209. H. FORNERON, *op. cit.*, II p. 161.

210. 23. janv. 1569, FOURQUEVAUX, *op. cit.*, II, p. 51.

211. *Avisos sobre cosas tocantes al Reyno de Granada*, 1569, Simancas E° 151, f° 83.

212. FOURQUEVAUX, *op. cit.*, II, p. 56.

213. Guerau de Spes au roi, Londres, 2 avr. 1569, *CODOIN*, XC, p. 219; du même au même, 9 mai 1569, *ibid.*, p. 228. Notre citation se rapporte à cette seconde lettre.

214. De vraies guerres américaines. G. FRIEDERICI, *Der Charakter*…, *op. cit.*, I, p. 463. Dans la si curieuse lettre du roi des révoltés Mohammed Aben Humeya à D. J. d'Autriche, Ferreyra, 23 juill. 1569, Arhc. Gouv. Gal de

l'Algérie, Registre n° 1686, f° 175-179, le roi des insurgés indique que tous les jours arrivent entre ses mains (comme sa propre part) de six à dix prisonniers chrétiens.

215. Michel Orvieto à Marguerite de Parme, Madrid, 1er avr. 1569, A. d. S. Naples, Farnesiane, Spagna, fasc. 5/1, f° 242, indique le mouvement des galères vers l'Espagne. Pescaire au duc d'Alcala, 17 avr. 1569, Simancas E° 1057, f° 53: à la nouvelle du désastre, il a l'intention d'envoyer en Espagne l'escadre de Juan de Cardona. *Récit du succez et journée que le Grand Commandeur de Castille a eu allant avec vingt-cinq galères contre les Mores*, Lyon, Benoist-Rigaud 8° Pièce, 14 p., B. N., Paris, Oi 69(1569), rapport pro-espagnol; FOURQUEVAUX, *op. cit.*, II, p. 75, 4 mai 1569: s'il n'y avait cette garde des galères, les Morisques se réfugieraient en Afrique du Nord.

216. H. FORNERON, *op. cit.*, II, p. 178, sans doute troupes amenées par Alvaro de Bazan, cf. la note suivante. Sauli à la Sie de Gênes, Madrid, 20 mai 1569, A. d. S. Gênes, Lettere Ministri, Spagna 4/2413; Philippe II à Don Juan d'Autriche, Aranjuez, 20 mai 1569, *CODOIN*, XXVIII, p. 10.

217. J. de Samaniega au duc de Parme, Madrid, 18 mai 1569, A. d. S. Naples, Farnesiane, Spagna, fasc. 5/1, fos 256-257.

218. *Ibid.*, f° 274, le même au même, Madrid, 25 juin 1569.

219. Sauli à la Sie de Gênes, voir note 3.

220. Philippe II à Don Juan d'Autriche, Aranjuez, 20 mai 1569, *CODOIN*, XXVIII, p. 10. Grenade est le seul point sauvegardé, Castagna à Alessandrino, Madrid, 13 juill. 1569, L. SERRANO, *op. cit.*, III, p. 111.

221. A Çayas, Paris, 2 août 1569, A. N., K 1511, B 24, n° 35.

222. Madrid, 6 août 1569, FOURQUEVAUX, *op. cit.*, II, pp. 101-102.

223. *Ibid.*, p. 109, 19 août 1569.

224. *Ibid.*, 107.

225. *Ibid.*, 19 août 1569, p. 111.

226. *Ibid*, 17 sept. 1569, p. 117-118.

227. Au roi, Rome, 14 oct. 1569, L. SERRANO, *op. cit.*, III, p. 163.

228. Madrid, 26 oct. 1569, *ibid.*, p. 180.

229. 31 oct. 1569, FOURQUEVAUX, *op. cit.*, II, pp. 128-129. C. PEREYRA indique (*Imperio español*, p. 168) que les Anglais auraient aidé les Morisques…

230. F. de Alava au roi, Tours, 9 déc. 1569, A. N., K 1513, B 25, n° 138.

Grandchamp de Grantrye à Catherine de Médicis, Const., 16 oct. 1569,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94, éventuelle mise de Toulon à la disposition des Turcs.

231. Avis d'Espagne, 19 déc. 1569,. FOURQUEVAUX, *op. cit.*, II, p. 165.

232. Madrid, 2 oct. 1569, L. SERRANO, *op. cit.*, III, p. 161.

233. Nobili au prince, Barcelone, 4 déc. 1569,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8, f° 550.

234. Madrid, 26 nov. 1569, *CODOIN*, XXVIII, p. 38.

235. FOURQUEVAUX, *op. cit.*, II, p. 165.

236. Ferrals à Charles IX, Bruxelles, 29 déc. 1569, B. N., Paris, Fr. 16123, f° 297 v°, …*de sorte que ceulx de Grenade et moins ceulx de Séville n'ausent mectre le nez dehors*…

237. Philippe à Guerau de Spes, Madrid, 26 déc. 1569, *CODOIN*, XC, p. 318.

238. *Op. cit.*, p. 78.

239. Simancas E° 487.

240. Le commerce est en effet interdit en direction d'Alger. Un marchand français arrêté à Valence, 1569, Simancas E° 487; pas de navires à Málaga à cause de la guerre. Inquisition de Grenade au C° S° de l'Inquisition, A. H. N., 2604, 17 mars 1570.

241. Madrid, 31 oct. 1569, FOURQUEVAUX, *op. cit.*, II, pp. 128-129.

242. Avis d'Espagne, 19 déc. 1569, *ibid.*, p. 165.

243. Jeronimo de Mendoza au comte de Benavente, Alger, 8 oct. 1569, Simancas E° 333; Sauli à la S^ie de Gênes, Cordoue, 26 février 1570, A. d. S. Gênes, L. M., Spagna 4/2513; le même au même, 29 oct., Simancas E° 487. Philippe II écrit, en marge de ce rapport: *sera bien embiar con este coreo a don A° Pimentel*…

244. *Memorias del Cautivo*, p. 2, septembre et non octobre.

245. D. de HAEDO, *op. cit.*, 78 v°.

246. Avis d'Alger, 22 févr. 1570, Simancas E° 487; Palmerini, B. Com. Palerme, Qq D. 84, place l'événement en 1569, mais est souvent fautif. A Rome, la nouvelle de la prise de Tunis n'arrive que dans la nuit du 8 au 9 févr. 1570. L'évêque du Mans au roi, Rome, 13 févr. 1570, B. N., Paris, Fr. 17 989, f^os 147 et 147 v°. La nouvelle arrivera à Constantinople le 2 avr. 1570,

Const. 7 avr. 1570, Simancas E° 1058, f°41. *Memorias del Cautivo*, p. 5, prise de Tunis en janvier 1570.

247. Avis d'Alger, voir note précédente, le Calabrais fut bien reçu par les Tunisois (*fue muy bien recebido de todos ellos*).

248. Haedo dit février; avis d'Alger, 1-6 avr. 1570, Simancas E° 487, il aurait quitté Tunis le 10 mars.

249. *Memorias del Cautivo*, p. 5.

250. Fourquevaux au roi, Cordoue, 22 avr. 1570, FOURQUEVAUX, *op. cit.*, II, p. 216.

251. Nobili au prince, Madrid, 18 janv. 1570,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49, f^os^ 10 et 11 v°: *quivi dicono ch'è gran penuria di tutte le cose onde non è molto approbata questa gita como non necessaria*, f° 9 v°; …*che noi andiamo in una provincia penuriosa di tutt'i viveri per cagione del mal recolto et della guerra de Mori: staremo a ridosso d'un esercito che già patisce infinitamente*…

252. Madrid, 3 févr. 1570, FOURQUEVAUX, *op. cit.*, II, p. 190.

253. Sauli à la S^is^ de Gênes, Cordoue, 26 février 1570, A. d. S. Gênes, L. M. Spagna 4/2413.

254. Don Juan à Philippe II, Caniles, 19 févr. 1570, *CODOIN*, XXVIII, p. 49; le même au même, Caniles, 25 févr. 1570, A. E. Esp. 236, f° 13.

255. A Philippe II, Tijola, 12 mars 1570, *CODOIN*, XXVIII, p. 79.

256. Le même au même, 30 mars 1570, 6 mai 1570, *ibid.*, pp. 83 et 89.

257. L'information de Nobili (voir note 1) est-elle juste? Du blé en tout cas est envoyé d'Alger aux révoltés, avis d'Alger, 1^er^ et 6 avril 1570, Simancas E° 487.

258. Dietrichstein à Maximilien II, Séville, 17 mai 1570, P. HERRE, *op. cit.*, p. 113, note 1. Le roi d'Alger aurait promis d'envoyer cinq navires de vivres et de munitions.

259. Nobili au prince, Cordoue 27 mars 1570,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9, f^os^ 59 et suivants.

260. Sauli à la S^ie^ de Gênes, Cordoue, 27 mars 1570, A. d. S. Gênes, L. M. Spagna 4/2413.

261. Nobili au prince, Séville, 16 mai 1570, Florence, Mediceo 4899, f° 94 v°.

262. Le même au même, *ibid.*, f° 95 v°; Juan de Samaniega au duc de Parme, Cordoue, 18 mars 1570, A. d. S. Naples, Carte Farnesiane, Spagna,

fasc. 3/2,f° 356.

263. Fourquevaux au roi, Séville, 22 mai 1570, FOURQUEVAUX, *op. cit.*, II, p. 222.

264. Nobili au prince, Cordoue, 25 mai 1570, A. d. S. Florence, 4899, f° 166 v° et rachat des captifs, P. HERRE, *op. cit.*, p. 118.

265. Cayas à F. de Alava, Ubeda, 4 juin 1570, A. N., K 1517, B 28, n° 70.

266. Avis de Grenade, 16 juin 1570, FOURQUEVAUX, *op. cit.*, II, p. 227.

267. *Ibid*, p. 226.

268. Les Inquisteurs de Grenade au Conseil Suprême de l'Inquisition, 17 juin 1570, A. H. N., 2604.

269. Les mêmes au même, 9 juil, 1570, *ibid.*

270. Madrid, 29 juin 1570. FOURQUEVAUX, *op. cit.*, II, p. 241, "chargé de riz, de bled et de farine", *ibid*, 11 juil.

271. Don J. d'Autriche à Philippe II, 2 juil. 1570, *CODOIN*, XXVIII, p. 110.

272. *Ibid.*, p. 111.

273. FOURQUEVAUX, *op. cit.*, II, p. 241-242.

274. Madrid, 13 juil. 1570, A. d. S. Gênes, L. M. Spagna 4. 2413.

275. *Ibid.*, 5 août 1570.

276. Don Juan d'Autriche à Philippe II. 14 août 1570, *CODOIN*, XXVIII, p. 126. Le même à Ruy Gomez, même, date *ibid.*, p. 128.

277. Juan de Samaniega au duc de Parme. Madrid, 20 août 1570, A. d. S. Naples, Carte Farnesiane, fasc. 5/1, f° 394.

278. A Ruy Gomez de Silva, Guadix, 29 août 1570, *CODOIN*, XXVIII, p. 133.

279. Madrid, 20 sept. 1570. FOURQUEVAUX, *op. cit.*, II, p. 268.

280. Avis d'Espagne, sept. 1570, *ibid.*, II, p. 262-263; Madrid, 11 oct. 1570, *ibid.*, II, p. 280.

281. *Ibid.*, p. 227.

282. A. N., K 1516, B 28, n° 7.

283. A Philippe II, 9 novembre 1570, *CODOIN*, XXVIII, p. 140.

284. Don Juan d'Autriche à Ruy Gomez, 5 novembre 1570, "*Alfin, Señor, esto es hecho*", cité par H. FORNERON, *op. cit.*, II, pp. 189-190; par O. de TÖRNE, *op. cit.*, I., p. 201.

285. Au gd duc, Madrid, 22 janvier 1571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903.

286. Sauli à la S[ie] de Gênes, Madrid, 11 janvier 1571, A. d. S. Gênes, L. M. Spagna 4/2413 parle de 2 500 Mores vivant comme *bandoleri*.

287. A. de HERRERA, *op. cit.*, p. 341 et *sq.*

288. A. de FOUHCÉ-DELBOSC, "Conseils d'un Milanais à Don Juan d'Autriche", *in*: *Revue Hispanique*, 1901, p. 60, n. a.

289. Surabondance des sources, cf. à leur sujet, J. von HAMMER, *op. cit.*, VI; Paolo PARUTA, *Hist. venetiana*, 2[e] partie, *Guerra di Cipro*; Uberto FOGLIETTA, *De sacro foedere in Selimum*, Libri IV, Gênes, 1587; Giampietro CONTARINI, *Historia, delle cose successe dal principio della guerra mossa da Selim Ottomano a'Venetiani*, Venise, 1576.

290. Paul HERRE, *Europäische Politik im cyprischen Krieg, 1570-1573*, Leipzig, 1902.

291. *Op. cit.*, p. 13.

292.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87-88, Iorga, *op. cit.*, III, p. 141.

293. J. Reznik, *Le duc Joseph de Naxos,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juive du XVI[e] siède*, Paris, 1936.

294. Constantinople, 7 avril 1570, Simancas E° 1058, f° 41.

295. Charles IX à du Ferrier, 6 oct. 1571, B. N., Paris, Fr. 16170, f° 32 v° et *sq.*

296. Paul HERRE, *op. cit.*, p. 25 et 146.

297. Madrid, 10 mars 1570, FOURQUEVAUX, *op. cit.*, II, p. 202, le "chaouch" demanderait au roi de France de faire préparer des vivres sur les côtes de Provence et de Languedoc pour l'armada turque. "Il n'y a faulte de discours sur cela." Salazar à S. M., Venise, 5 déc. 1570, A. N., K 1672, G 1, n° 159, Claude Du Bourg, toujours, détenu à la Mirandole, il serait question de le libérer; sur cet étonnant personnage de Claude Du Bourg, voir ci-dessus, I, pp. 343-344.

298. Instruction de Charles IX à Paul de Foix, 12 avril 1570, B. N., Paris, Fr., 16080, f° 166, cité par P. HERRE, *op. cit.*, p. 161.

299. E. LAVISSE, VI, 1, p. 113; Philippe II à F. de Alava, Madrid, 3 sept, 1570, A. N., K 1517, B 28, n° 89: *pernicioso concierto y pazes que esse pobre Rey ha hecho con sus rebeldes que me ha causado la pena y sentimiento que podeis considerar viendo la poca cuenta que se ha tenido con lo que tocava*

al servicio y honrra de Dios···

300. Au roi, Paris, 2 sept. 1570, A. N., K 1517, B 28, n° 87.

301. En février, puis en mars, les galères ne réussissaient pas à sortir du port de Naples, le temps étant "un des plus durs qu'il y ait eus en cette saison depuis beaucoup d'années". vice-roi de Naples au roi, Naples, 11 mars 1570, Simancas E° 1058, f° 34.

302. Avis de Corfou arrivés le 10 janv. 1570, Simancas E° 1058, f° 13, préparatifs grandioses contre Malte, construction de 20 mahonnes à Nicomédie, on fond 22 grosses couleuvrines à Constantinople, 10 000 rameurs raccolés en Anatolie, 250 voiles, dont 175 galères, "*et si murmura anchora per la Goleta*". Const., 21 janv. 1570, Sim. E° 1058, f° 19: voix commune désigne Chypre, danger de pilleries en Dalmatie des corsaires algérois. Alger, 26 janv. 1570 (par Valence), Simancas E° 334, armada ira sur Chypre ou sur La Goulette. L'évêque du Mans à Charles IX, Rome (2?) févr. 1570, B. N., Paris, Fr. 17989, f°s 145 v° et 146: l'armada turque irait sur Malte ou plutôt sur la Goulette. Chantonnay au roi Prague, 15 févr. 1570, *CODOIN*, CIII, p. 450-453; l'empereur a su par un espion que le Turc irait contre Chypre et non pas au secours des Morisques. A l'arrivee des nouvelles relatives a Chypre, Maximilien Parle d'une alliance possible entre lui, le roi d'Espagne, la Pologne, et le Reich. Thomas de Cornoça au roi, Venise, 25 févr. 1570, Simancas E° 1327: les Turcs ont l'intention d'attaquer Chypre. Castagna à Alessandrino. Cordoue, 11 et 22 mars 1570, cité par P. HERRE, *op. cit.*, p. 61-2, note 1: la flotte turque viendrait dans les eaux espagnoles. Avis de Corfou reçus à Naples, le 31 mars 1570, Simancas E° 1058, f° 30, armada turque contre Chypre. Pescaire au roi, Palerme, 12 juin 1570, mission de Barelli, chevalier de Malte, expédié en Orient, pour qu'il s'informe "*mayormente presuponiendo que algun intento avia para dar calor a las cosas de Granada*···", Simancas E° 1133. Ledit Barelli recommandé à Miques, vice-roi de Naples au duc d'Albuquerque, Naples, 24 juin 1570. Const., 18 mai, Simancas E° 1058, f° 66: contre Chypre. Vice-roi de Naples au roix, Naples, même date, *ibid.* f° 64.

303. Alberto TENENTI, *Cristoforo da Canal, la marine vénitienne avant Lépante*, 1962, notamment p. 175 et *sq.*

304. Paul HERRE, *op. cit.*, p. 16, dit le 13 janvier.

305. Thomas de Cornoça au roi, Venise, 26 févr. 1570, Simancas E° 1327.

306. J. Lopez au roi, Venise, 11 mars 1570 Simancas E° 1327. Pas de lettres nouvelles du baile. Son arrestation. Invasion turque en Dalmatie. Certitude de la guerre. Le même au même, le 16 mars 1570, *ibid.*, on viendrait de Constantinople demander Chypre à Venise.

307. Au roi,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101-104.

308. Docteur Morcat (del Consejo de Capuana) que al presente esta por governor en las provincias de Abruço, al duque de Alcala, Civita de Chieti, 28 févr. 1570, Simancas E° 1058, f° 37.

309. J. Lopez au roi, Venise, 1er avril 1570, Simancas E° 1327, correrias turques autour de Zara. Cavalli au Sénat, Cordoue, 1er avril 1570, bruits selon lesquels Zara aurait été prise (P. HERRE, *op. cit.*, p. 85, note 2); 9 (?) châteaux pris par les Turcs, Méhémet Sokolli à Charles IX, Constantinople 16 nov. 1570,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137.

310. Cf. page précédente, note 4.

311. P. HERRE, *op. cit.*, p. 16.

312. L. VOINOVITCH, *Depeschen des Francesco Gondola, 1570-1573*, Vienne 1907, p. 21.

313. *Ibid.*

314. D. F. de Alava au roi, Angers, 4 avril 1570, A. N., K 1517, B 28, n° 59.

315. R. B. MERRIMAN, *op. cit.*, IV, p. 126-127 et la publication d'A. DRAGONETTI de TORRES. *La lega di Lepanto nel carteggio diplomatico inedito di Don Luys de Torres*, Turin, 1931.

316. Juan Lopez au roi, 11 mars, 16 mars, 31 mars 1570 (sur le galion de Fausto), 9 juin 1570, Simancas E° 1327.

317. Paul HERRE, *op. cit.*, p. 27-28.

318. *Ibid.*

319. H. KRETSCHMAYR, *Geschichte von Venedig*, *op. cit.*, III, p. 54.

320. Simancas E° 1058, f° 35.

321. *CODOIN*, CIII, p. 480-481.

322. J. A. Doria au roi, Naples, 3 mai 1570, Simancas E° 1058, f° 31.

323. Vice-roi de Naples, 19 juil. 1570, Simancas E° 1058, f° 80, les Allemands ont été licenciés à la date du 26 juin.

324. Le même au même, Naples, 2 août 1570, Simancas E° 1058, f° 91.

325. Santa Cruz au roi, 26 avril 1570, Simancas E° 1058, f° 46.

326. Simancas E° 1060, f^os 1, 39, 49, 51, 206, E° 1133, 19 mars 1570, 6 mai 1570.

327. Pescaire au roi, Palerme, 17 juin, 18 juin, 26 juin 1570, 16 juil. 1570, Simancas E° 1133. J. A. Doria au roi, La Goulette, 2 juil. 1570, Simancas E°484.

328. Pescaire, 17 avril 1570, Simancas E° 1133 et autres lettres du 6 mai; de même, lettres du vice-roi de Naples, 14 août 1570 (Simancas E° 1058, f° 97), Philippe II au vice-roi de Sicile, 23 sept. 1570 (E° 1058, f° 217), 18 oct. (*ibid.*, f° 220).

329. Ceci bien vu par H. KRETSCHMAYR, *op. cit.*, III, p. 53.

330. Cardinal de Rambouillet à Charles IX, Rome, 8 et 12 mai 1570,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112-114.

331. L. SERRAÑO, *op. cit.*, I, p. 51.

332. Nobili au prince, Cordoue, 22 avril 1570, Florence, Mediceo 4899, f° 74°. Le nouveau venu a cependant assez peu plu aux milieux espagnols *tenendolo de razza non molto antica*; FOURQUEVAUX, *op. cit.*, II, p. 219-220, audience, de Torres, le 21 avril, promesse de 70 galères espagnoles, la réponse définitive du roi doit être donnée à Séville; cinquante galères, dit le cardinal de Rambouillet au roi, Rome, 22 mai 1570, B. N., Paris, Fr. 1789, f° 176.

333. Les Italiens (le Savoyard, le duc d'Urbino) poussent Philippe II à conclure l'alliance avec Venise, Paul HERRE, *op. cit.*, p. 88.

334. L. SERRANO, *op. cit.*, I, p, 53, note 3.

335. *Ibid.*, p. 54.

336. Sur l'ensemble du paragraphe, B. N.; Paris, Ital. 427, f^os 197 v° et 198.

337. Le cardinal de Rambouillet à Charles IX, Rome, 5-30 juin 1570,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115-116. Instrucition baillée à M. de l'Aubespine (juin 1570), B. N., Paris, Fr. 1789, f° 181 : "le sieur Marc Antonio Colonne que le Pape a faict général de toutes ses galères avec la grand merveille de beaucoup…".

338. L. SERRANO, *op. cit.*, I, p. 70.

339. J. Lopez au roi, Venise, 1^er août 1570, Simancas E° 1327.

340. L. SERRANO, *op. cit.*, I, p. 75

341. Innombrables lettres ragusaines au général de l'armada vénitienne, Hieronimo Zane, 7, 13, 17, 18 avril; 3, 16 mai 1570, A. de Raguse, L. P. I, f^os

168,168 v°,169,171,174,175 v° ,177,198,200 v°,201,202.

342. Levée de 2 000 hommes à Naples pour les galères de J. A. Doria et de Santa Cruz, le vice-roi de Naples au roi, Naples, 19 juil. 1570, Simancas E° 1058, f° 82; Nobili, 16 mai 1570,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899, f° 99 v° et 100.

343. Sauli à Gênes, Madrid, 13 juil. 1570, A. d. S. Gênes, L. M. Spagna 4/2413.

344. Ordre donné à la suite de l'intervention du nonce, L. SERRANO, *op. cit*, t. III, p. 448, cf. aussi *ibid*, III, p. 461-463; sur le mécontentement de J. A. Doria, cardinal de Rambouillet au roi, 28 août 1570,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118.

345. Simancas E° 1058, f^{os} 98 et 99.

346. J. A. Doria au roi, 17 sept. 1570, Simancas E° 1327. Les recteurs de Raguse aux ambassadeurs à Const., 11 sept. 1570, A. de Raguse, L. P., I, f° 242 v°, passage des galères hispano-pontificales le 18 alût à la hauteur de Corfou.

347. J. A. Doria, 17, sept. 1570, cf. note précédente.

348. *Memorias del Cautivo*, p. 7.

349. L. VOINOVITCH, *op. cit.*, p. 33; nouvelle connue à Madrid en novembre; Eligio VITALE *op. cit.*, p. 127 : sans doute le 16 de ce mois.

350. Pescaire au roi, Palerme, 22 oct. 1570, Simancas E° 1133.

351. Francisco Vaca au duc d'Alcala, Otrante, 1er nov. 1570, Simancas E° 1059, f° 6.

352. L. SERRANO, *Liga de Lepanto*, Madrid, 1918-1919, I, p. 81.

353.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p. 122-124; F. de Alava au roi, Paris, 12 nov. 1570, A. N., K 1518, B 28, n° 42.

354. *Correspondance de Granvelle*, IV, p. 51, 14, déc. 1570.

四　勒班陀战役

勒班陀战役是地中海地区16世纪最轰动一时的军事事件。但是，这个技术的和勇气的巨大胜利，很难根据历史上惯用的图式去理解。

不能认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战役是前此发生的各个事件产生的必然后果。那么，难道就应该像最近研究这个史实的历史学家之一的F.哈尔特劳布那样夸大奥地利的唐·胡安在这一战役中所扮演的莎士比亚笔下的英雄那样的角色吗？莎士比亚笔下的英雄单枪匹马制服了命运。但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一切却不合情理。

这次始料未及的胜利产生的后果如此之少，以致令人感到吃惊。伏尔泰觉得这一点很有趣。勒班陀战役于1571年10月7日进行。次年，同盟国在莫东战败。1573年，筋疲力竭的威尼斯放弃了斗争。1574年，土耳其人在拉古莱特和突尼斯取得胜利。所有十字军东征的梦想都被逆风吹得烟消云散、无影无踪。

然而，人们如果不让自己局限于研究事件本身而去观察事件的底蕴，观察在历史的闪闪发光的表层下面深藏的事物的话，就会发现大量新鲜的事实涌现出来。这些事实无声无息，毫不夸耀，扩散开来，超越了勒班陀战役的范围。

土耳其的强大威势的魔力被粉碎了。

基督教世界的帆桨战船刚刚完成了船上划桨苦役犯人的大规模的接替更换。这样，这些舰船在今后若干年内就有了新的动力。

基督教徒的活跃的海上行劫重新出现，到处展开。

最后，庞大的土耳其舰队在取得1574年的胜利后，特别在取得1580年那几年的胜利后终于衰朽解体。对这支舰队来说，一直延续到1591年的和平乃是一场最深重的灾难。这个和平使这支舰队在海港内腐朽衰亡。

声称勒班陀战役单独产生了这多种后果，未免言过其实。但是，这一战役的确促成了这些后果的产生。作为历史经验，它的重要意义或许在于以明显例证表明了单纯叙述事件史的种种局限性。

1. 1571年10月7日之战

联盟，亦即为了对土耳其人进行共同斗争而组成的同盟，大约在1571年5月20日缔结。未来的同盟者相互之间在夏季发生了争吵之后，虽然还不能说互相敌对，但互不信任，利益颇不一致，彼此颇不和睦。然而在争吵不和的情况下，竟能达成协议，团结起来，的确是件异乎寻常的事。

为时已晚的缔结

西班牙人指责威尼斯当它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和土耳其和好时，就企图同土耳其和好。教皇党人和西班牙人同样不相信朝三暮四、变化无常的威尼斯市政议会。威尼斯人这时正在同极其巨大的困难进行搏斗。他们回想起从1538年到1540年这段时期的先例，总觉不快。即使1571年夏季，当障碍全

都克服以后，在吹遍威尼斯的那股新闻旋风中，仍然流传一个似是而非的传闻：西班牙人准备先采取行动进攻热那亚，然后进攻托斯卡纳甚至威尼斯本身。显然，剩下的是要了解这些传闻来自何处，散布这些传闻的目的何在。也可能这些传闻只不过是民众猜疑的产物而已，是在自己制造，自己传播。

对负责圆满完成缔结联盟这项工作的委员们来说，任务是繁重的。帕凯科、格朗弗勒和胡安·德·苏尼加三位大主教代表西班牙。6月7日，[1]他们三人接到授予他们新职的圣旨（5月16日的命令）时都在罗马。威尼斯把这项任务交给它长驻罗马的大使米歇尔·索里亚诺。10月份，新任大使季奥瓦尼·索朗佐接替了他。教皇为了自己的利益，指定莫罗内、切西、格拉西斯、阿尔多布朗迪诺、亚历山德里诺、鲁斯蒂库奇等红衣主教参加谈判。最后两人参加会谈没有正式官衔。谈判困难重重。从1570年7月2日的第一次会议起，谈判曾经三次中断：第一次是从1570年8月到10月；第二次是从1571年1月到2月；最后一次是从1571年3月到5月。这一次似乎一切都已经得到解决。在最后两次中断期间，威尼斯试图同土耳其人和好，尽管它对此加以否认。11月份，秋季战役失败后不久，威尼斯派遣元老院秘书亚科波·拉加佐尼[2]前往君士坦丁堡。在这之前，穆罕默德·索科里和威尼斯在东地中海殖民地的总督之间的会谈从来没有中断过。这个企图推迟了联盟盟约的签订。威尼斯最后在它绝对肯定它在君士坦丁堡遭到失败时才决定同意缔结这个联盟。

因此，那些或多或少地定期在亚历山德里诺红衣主教的沙龙聚会商谈问题的外交官，不管他们怎样精明能干，并不能主宰事件的过程。他们扮演的角色在于：监视他们的邻居、撰写长篇报告，然

后根据收到的命令克服或者制造困难。他们受到上级指示的束缚。在作出任何重大决定时，他们都必须向各自的政府请示。这样，他就更受束缚。这样，在外交方面正常的办事过程之外，又加上地域之间固有的距离造成的长期耽搁。

他们如果能够自己作主，作出决定，本来可以相当快地达成协议，特别在当着教皇的面的情况下更是这样，因为教皇非常热中于缔结联盟。这一点在谈判的第一阶段就可以看出。一开始，教皇指派的谈判人员就建议把根据当时的需要修订了的1537年的协议的文本作为讨论的基础，以此来为谈判扫清道路。9月初，据传联盟已经缔结[3]。所有的重大问题的确都已经讨论。缔约各方同意联盟为期至少12年。这个组织将既是进攻性的，也是防御性的。它虽然首先是针对土耳其人缔结的，但同时也针对北非的封臣国家：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等。这一点是应希望借此在他们的活动范围内保护他们未来的自由的西班牙人的特别要求议定的[4]。达成协议的其他各点是：联合舰队将交给奥地利的唐·胡安指挥；共同行动的费用分为6份（同1537年一样），其中3份由西班牙负担，2份由威尼斯负担，1份由教皇负担。关于粮食供应问题，西班牙向威尼斯人打开它的意大利市场。它答应定出合理的售价并且保证不提高税额和其他出口税。威尼斯由于如果不依靠阿普利亚或西西里的谷物就不能不要土耳其的谷物，因此十分坚持这一点[5]。最后，将禁止联盟成员在未经其他联盟签字国许可的情况下和土耳其进行单独谈判。

协定草案送交各国政府审查修改。因此，从8月到10月为第一次休会时期。

10月21日，谈判恢复。但是，在此期间进行了毫无用处可言的黎凡特战役。菲利普二世对协定草案进行了长时间审查后，决定寄发出对最终缔结协定来说十分必要的授权他的谈判代表签署协定的授权书，但附有对协定草案的若干修改。相反，威尼斯却在差不多已经商定的事项上突然变卦。它更换了谈判代表，坚持一切都得重新商讨。新的讨论比过去的讨论更加激烈，在蓄意制造的唇枪舌剑和离题万里的胡聊乱扯造成的混乱中进行。凡是可能为不签定盟约提供借口的细节都被威尼斯再次提出作为争论的内容。例如：粮食的价格问题、联盟军总司令的权限问题、作战策略问题、联盟成员的财政分摊额问题……西班牙代表，特别是他们中间的格朗弗勒对威尼斯的态度越来越感到恼火。无论怎样说，没有比这种情况更加自然的了。因为前面还有个漫长的冬季。12月份，会谈终于在唐·胡安的副将由谁担任这个无关宏旨的问题上（是教皇的帆桨战船舰队的司令还是卡斯蒂利亚大封地骑士）中断，这使教皇极为不满。

这第二次中断延续了好几个星期。西班牙国王最后同意教皇在西班牙向他提出的三人中挑选唐·胡安的副将。与会委员们在2月份恢复了谈判。3月初，协定的新文本拟定。但是，等待拉加佐尼出使土耳其的结果的威尼斯又以种种借口推迟到5月份才签署协定。5月20日，最后互相交换签过字的协定文本，5天以后，即1571年5月25日，正式在圣彼得大教堂宣布联盟成立[6]。

协定的签署各方原则上同意建立一个永久性联盟。它们发表这个声明以后，满足于为缔结一项为期3年（1571—1573年）的军事协定进行准备。联盟成员承担每年派出一支由帆桨战船200艘和圆

船100艘组成并载有士兵5万名和轻骑兵4,500名的舰队的义务。这个联盟虽然矛头指向黎凡特，但并不排除可能对阿尔及尔、突尼斯或者的黎波里进行远征。相反，它考虑到这些远征。关于开支费用的处理问题，协定规定：教廷如不支付它负担的份额，威尼斯和西班牙将分别支付；后者支付总数的五分之三；前者支付总数的五分之二[7]。关于粮食问题，协定文本只规定出"合理的"价格并规定不得增加税额和其他出口税。联盟成员不得缔结任何单独和约。

以上是对1571年联盟的漫长而困难的缔结经过所作的十分简略的记述。远处有人忧心忡忡地密切注视着这个联盟的意向。法国人在观察评论这个联盟时，态度比别人更加尖酸刻薄、辛辣讽刺。单单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法国的一项对抗奥地利家族的威势的政策正在重新具体明确起来。1570年8月5日（因此时间是在7月14日休战和8月8日和约缔结这两件事之间），弗朗塞斯·德·阿拉瓦写道："法国人希望不要达成什么协议。他们说，威尼斯人如果签署这项协定，如果不保留同他们最大的敌人——土耳其人——谈判的自由，就是大笨蛋。在法国，人人都绞尽脑汁，千方百计阻止缔结这个联盟，并促使威尼斯和土耳其素丹和解。如果他们继续这样行事，那么，假使明年他们提出把土伦让给土耳其人，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8]8月5日，正当关于基督教联盟即将缔结的最乐观的传闻流传的时候，朗布伊埃红衣主教在罗马声称，他的意见始终不变。他写道，"这会是写在纸上的、看起来很漂亮的东西……能够在书面上建立起来……但是，我们永远也看不到它的效果。"[9]不错，在同一个时期，在威尼斯有很多与此相同的想法[1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对威尼斯市政议会如果真的签署的话，会在签署这项条约

后怎样行事表示十分怀疑。

接着，当舰队从黎凡特返回后，当严重的困难开始出现时，大家，或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在罗马进行的无休止的空空泛泛的议论不会产生什么结果。12月底，连平时十分乐观的教皇也不再向法国大使朗布伊埃红衣主教隐瞒他的气馁沮丧[12]。教廷驻马德里大使同样心灰意懒、十分倦息。托斯卡纳的代理人在这同一个城市坦率地声称他对联盟的缔结并不抱什么希望。在他看来，西班牙人只不过是为了让人付给他们圣战税和备用税才参加这些谈判游戏；一俟谈判变得明确具体起来，他们就会退出；一俟教廷大使显得过分“冷漠”，他们就恢复谈判，但他们用词非常空泛笼统，以致教廷大使“什么都弄不明白”[13]。当时是1月底。3月份带来了较好的消息。但是，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那样，现在轮到威尼斯人来制造拖延了。4月份和5月份，急躁的情绪笼罩整个罗马。这个城市的人很想知道这样耽搁和延迟到底意味着什么。直到6月，一个信使才带来一个重大的消息[14]。

法国：一个外交因素

联盟的长期酝酿，使法国的新政策来得及明确具体起来。之所以这是一项新政策，是因为至少自从1559年以来，法国在十年销声匿迹、信誉扫地期间，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没有出现于地中海。从成千上万个细枝末节中，从自1560年以来威尼斯人的态度中，从说服素丹1568年在亚历山大扣押、没收法国船只的约瑟夫·米卡斯的态度中，从已经显得对谈判游戏漠不关心的法国本身的态度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来。但是，

法国虽然在内战浩劫中已经惨遭破坏，却还远远没有陷入它在亨利三世统治末期似乎陷入的那种萎靡不振、停滞不前的状态中。起作用并即将复活的王室的政策的各个组成部分始终存在。

早在1570年4月，法国尽管在克洛德·迪·布尔事件中谨慎小心，但已经向威尼斯表示自己愿意进行斡旋。它行动之迅速真是令人惊讶不置。这时，塞浦路斯战争刚刚开始，法国内战尚未结束。不错，法国的全国和解政策当时已经出现。新教徒、"政治家"集团以及所有在国外代表法国国王的人士，无一例外，都是法国全国和解的拥护者。1570年，甚至1571年初，新的倾向可能还没有清晰地显露出来。这些倾向掩藏在关于和平和关于基督教世界的更高的利益的总的考虑的后面。但是，很早就可以从具有一种多年来已经被人遗忘的坚定口气的王室通讯中察觉出一种变化来[15]。查理九世在思想上已经被特利尼和海军上将争取过去。他狂热地想同西班牙决裂，并且在荷兰插手干预，施加影响。毫无疑问，他仍然让他的意图秘而不宣，但是，既然托斯卡纳已经注意到这个变化，因此，他这样做并不成功。这是一个影响整个国家的变化。在这个国家，正如彼得鲁奇5月19日写信给弗朗索瓦·德·梅迪奇所说："气氛是不利于西班牙国王的。"[16]

托斯卡纳人在这个事件中的确不是简单的旁观者或者知情人，而是同谋者和煽动者。托斯卡纳大公拥有1569年教皇庇护五世授予他的这个新的称号，但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的排挤，感到自己孤立无援。他特别对后者的意图感到忐忑不安，于是长期以来就在整个欧洲，其中包括新教国家，谋求支持和保证[17]。他的第一次谈判在拉罗舍尔举行，是同海军上将和特利尼进

行的。他甚至曾经谋求在土耳其人那里进行活动。一些专事诽谤诬蔑他人的人甚至指控他在犹太人米卡斯背后牵线操纵、出谋划策，因此是塞浦路斯战争的根源所在，是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西班牙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对他严密监视，对他们自己在托斯卡纳的驻防地的情况感到很不放心[18]。

在此期间，在1571年初，人人都在继续玩和平把戏。菲利普二世和查理九世互换了大使。1月末，奥利瓦雷斯公爵恩里克·德·古斯曼被派往马德里[19]。5个月后，6月份，贡迪来到菲利普二世处，谋求这位西班牙国王作出不同法国决裂的保证[20]。阿尔贝公爵至少在口头上是通融和解的[21]。或许这些话过分甜蜜动听，是用来否认事实本身所讲的那种迥然不同的话的。洛林红衣主教在罗马为了否认关于一场已经迫在眉睫的法国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的谣传而不得不经常对威尼斯人重复的那些话，就是这一类话[22]。这个谣传在意大利流传范围非常之广，以致法国国王也感到需要宣布这些谣传纯属虚构。

但是，1571年3月，维斯帕西亚诺·贡扎加以及拉古莱特和梅利利亚的工程师伊尔·弗拉蒂诺[23]视察了纳瓦尔边境。与此同时，米兰总督阿尔布克尔克公爵4月11日占领菲纳尔公爵领地。这是对比拉克家族在萨吕塞的牢骚、埋怨、报警、呼吁和对上述萨吕塞和皮埃蒙特的[24]法国卫戍部队的加强所进行的回击。这些事实难道仅仅是巧合吗？这个消息将近5月9日传达巴黎。弗朗塞斯·德·阿拉瓦写信给米兰总督说[25]："这里的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都对此事感受很深，十分震惊。但是，根据我听到的，他们不打算向陛下控诉，而是打算向萨瓦公爵和阁下控诉。"[26]说西班牙人采取这个行动，

就已经插上一根很坚固的门闩以防止法国人可能南下入侵意大利，这是过甚其词之谈。但是，这毕竟是个警告。它使法国公众舆论哗然，异常愤慨。

人们开始真正谈论战争。萨瓦公爵向菲利普二世抱怨有人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侧阴谋进行某些反皮埃蒙特的活动[27]。有人在西班牙获悉：法国的帆桨战船已经奉命自波尔多驶返马赛[28]；军队正向阿尔卑斯山推进[29]。最后，新教徒中的几个最卓越的人物积极说服国王在荷兰尝试某些行动[30]。此外，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向荷兰迁移的规模达到了令人惊恐的程度。

这就是战争吗？不是。因为进行一场战争需要有一个新教徒的联盟，需要有欧洲的大力支持。被欧洲嗤之以鼻的诸如英国女王和安茹公爵结婚之类的传闻，并不能代替这些[31]。进行战争还需要一个骚动不安的德意志[32]和一个决心斗争的托斯卡纳，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托斯卡纳的代理人老是满脸笑容，在马德里和别处同样谈判和策划，通过他们的“心腹”钻进西班牙政府的心脏获取大量机密[33]。但是，尽管这还不是战争，到处却都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基亚平·维泰利返回佛兰德途中，于1571年5月穿过法国。他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给他留下很坏的印象。他一到巴黎就认为有必要把这些事告诉弗朗塞斯·德·阿拉瓦[34]。后者也获悉法国国王派往土耳其一个像达克斯那样的才智超群出众的大使。这个半异教徒、新教徒的朋友，除了积极奔走活动，致力于反对西班牙，反对基督教世界，平息特兰西瓦尼亚的争吵（这每次都是神圣罗马帝国插手干预的时机）并处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土耳其人之间的以及威尼斯人和土耳其皇帝之间的冲突外，还会在那里干些什么

呢?法国的外交再一次使用漫长的通向土耳其的道路。

然而,新任大使并不急于赴任。7月26日,他在里昂[35]。9月9日[36],他向威尼斯总督呈交查理九世委托他呈交的信。国王在信里提出通过一份文献资料坚称为阿克斯主教的人"缔造一个良好的和平或者一个持久的休战。这个休战能够持续到前面谈到的和平来临"。国王继续写道,这难道不比"和一个如此强大的敌人,和一个与你的管辖区如此邻近的国家打交道"更有价值吗?威尼斯市政议会在正式缔结联盟之后不久,在勒班陀战役30天以前,就毫不拒绝听这些话[37]……因此威尼斯在它终于退出联盟之前两年就已经暗示过它不打算履行联盟规定的义务,或者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就已经流露出它要背叛联盟的思想了。

然而,联盟已经缔结。可以从法国对联盟的狂热仇视和憎恶的程度测知这个组织的重要性。关于这个联盟的主要缔造者教皇,当时还有什么样的坏话没有说啊!教廷对西班牙所作的让步,在法国散播了多大的嫉妒啊[38]!关于战争的传闻一直存在,以致南特和鲁昂的西班牙商人请求菲利普二世的大使及时通知他们,好让他们能够把他们的货物和人员转移到安全 的地方。弗朗塞斯·德·阿拉瓦写道:"他们再三来请求,缠住我不放,把我烦得要死。"[39]塞维利亚的法国商人同样惶惶不可终日[40]。阿尔贝公爵写道[41],在佛兰德的边境上,惊恐万状、焦虑不安的情绪强烈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住在法国一侧和我们这一侧的低地的人都携带他们的[金银细软]撤往安全的城市"。

要容忍这些法国人,得有何等的耐心啊!同一个阿尔贝公爵被法国人和努多维克·德·纳索之间以及法国人和奥朗日亲王之间的

协定激怒，嚷道[42]："他们为了让我失去两个眼睛，自己失去一个也是高兴的。"这时，格朗弗勒劝国王让唐·胡安经过普罗旺斯时狠狠打击这个地区。过去咒骂法国人的话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前的臣仆的嘴里又自然而然地大量出现。已经过去的查理五世的古老时代似乎又回来了。再者，战争已经在大西洋上进行。在这个大洋上，拉罗舍尔的海上行劫者和海上乞丐①，正勾结起来大事活动。1571年，西班牙人有成千上万个理由为西印度的舰队的安全担心。[43]

唐·胡安和他的舰队会及时到达吗？

在此期间，联盟的缔结正在地中海结出硕果。

西班牙人和教皇党在一项单独的协议中答应威尼斯人5月底以前[44]在奥特朗托把他们的全部兵力集中起来。这仅仅是个简单的善意表示而已，因为怎样才能够在10天之内（联盟缔结于5月20日）下达必要的命令呢？签订盟约的消息6月6日才传到西班牙。签订盟约之前的无法解释的耽搁延误，比平时更加减慢了沿西班牙海岸进行的战备工作。1570年的歉收妨碍了巴塞罗那和安达卢西亚各个港口的粮食供应[45]。

这次歉收产生了一个可喜的后果：扑灭了格拉纳达的游击战。2月18日，富克沃写道："他们饥饿难熬，以致离开高山，为了面包下

① 指荷兰各省的水手、渔民和码头工人组成的海上游击队，其袭击目标是西班牙的战船、沿海据点和运输船队。——译者。

山来当基督徒的奴隶。”3月份，发布了叛乱分子的首领丧生和大批为了活命被迫转而偷窃蔬果、家畜的摩里斯科人投降的消息。粮食短缺的迹象之一是：一些西班牙军队的士兵在卡塔赫纳获悉他们将被装上船开往奥兰时，马上就开了小差。荒年和饥馑时期驻防地的生活是什么滋味大家是熟悉的。幸好意大利的局势较好。威尼斯人到那不勒斯寻找粮食供应。西西里总督佩斯卡尔仍然主张进攻突尼斯和比塞大。5月份，他保证人们可以得到2万担饼干。这些饼干以每月7,000担的速度生产[46]。没有这些谷物，没有意大利的大麦和乳酪，没有那不勒斯的酒，谁知道勒班陀战役的胜利能否取得呢？因为必须在意大利的南端集中其数量相当于整整一座城市人口数量的士兵和水手，并且供应他们粮食，而这些人的牙齿和胃口都是头等的。

如果奥地利的唐·胡安能够独立自主行事，帆桨战船已经很快离开西班牙海岸了。他急于前去就任他的司令职务。从4月起就风闻他在巴利亚多利德拜访了他的养母、东·路易斯·基赫达的妻子之后，将前往意大利[47]。4月30日，圣克鲁斯侯爵率领那不勒斯帆桨战船抵达巴塞罗那，在该地得到唐·胡安即将在卡塔赫纳登船的消息，于是立即决定同他会合，希望在途中抓获几艘海上行劫船[48]。但是，在卡塔赫纳却毫无唐·胡安的踪迹[49]。这是因为他还在等待关于联盟的确切消息。5月17日，奥地利的唐·胡安还在阿兰胡埃斯，不知道他自己什么时候离开[50]。不少其他困难推迟了舰队的出发日期：首先是必须增加要装载上船的士兵的数目；其次是要作出决定让自从1564年以来就在西班牙滞留并即将返回维也纳的奥地利大公们[51]同唐·胡安一道径直前去热那亚。5月7日，菲利普二世

在给因阿尔卡拉公爵之死而暂时担任那不勒斯总督的格朗弗勒[52]的一封信中对这一点作了解释。简而言之，预料到的耽搁延迟是如此之长，以致人们认为宁可不要等待西班牙的帆桨战船和圣克鲁斯的帆桨战船以便载上正在热那亚河河岸上等待运往南欧的1,000名意大利士兵和8,000名德意志士兵。已经命令西西里的帆桨战船重新北上到热那亚去运载他们。

然而，人们盼望已久的关于联盟的缔结的消息加速了最后的准备工作。同一天，奥地利的唐·胡安离开马德里前去就任舰队司令。胡安·安德烈·多里亚只率领一艘帆桨战船从巴塞罗那前往热那亚，以便让他的城市作好接待奥地利的唐·胡安的准备[53]。16日，奥地利的唐·胡安到达巴塞罗那。圣克鲁斯侯爵阿尔瓦罗·德·巴桑的帆桨战船、吉尔·德·安德拉德率领的帆桨战船以及很多其他船舰，先后在巴塞罗那同奥地利的唐·胡安会合。这支由这些舰船组成的舰队运载有从安达卢西亚撤回的米盖尔·蒙卡达的和洛佩斯·德·菲格罗阿的两个西班牙步兵团[54]。

最后，6月26日，马德里向奥地利的唐·胡安发出指示。这些指示由于对他的权力作了种种限制，使他异常激怒、濒于绝望。他在一封于7月8日在第一次感情冲动下亲笔写的信中[55]“像问父亲那样”问鲁伊·戈梅兹他明显的失宠的原因是什么。笔调是激动的、感人的、令人不安的。在我看来，G. 哈尔特劳布[56]正确地认为这些日子标志着奥地利的唐·胡安一生中的一个分水岭。这些日子向他表明，他作为私生子而具有的附从地位是无法弥补的。国王对他不十分信任。不然，为什么当他到达十分重视礼仪的意大利的时候，拒绝给他殿下称号而只承认他的阁下称号呢？为什么他的王家军队

统帅职位被慎之又慎地围附上重重限制以致统帅这个职位变成一个虚有其名的头衔呢?7月12日,[57]他直接写信向国王诉苦……

另外一个忧虑是:舰队要拖得很晚才能集中[58]。他必须等待在马拉加和马略卡运载士兵、粮食和饼干的帆桨战船。罗多尔夫大公和埃纳斯特大公6月29日才到达[59]。舰队的主力18日[60]就已经启航。26日,尽管天气恶劣,这支舰队仍然驶抵热那亚。唐·胡安在该地只逗留到8月5日[61]。这段时间恰好用来装载人员、粮食、预定的物资器材以及参加为他举行的盛大庆宴。9日,他抵达那不勒斯[62]。接待活动和出发的准备工作把他阻留到20日[63]。24日,他终于到达墨西拿[64]。

劝唐·胡安约束自己持严格的防守态度的雷克森斯和胡安·安德烈·多里亚认为为时已经太晚。年迈的东·加西亚·德·托莱多也从比萨送来关于在他看来土耳其舰队拥有的优势的语调悲观的公文急报。[65]但是,唐·胡安只注意听取威尼斯的各个首领和他左右的西班牙舰长的意见。这些舰长主张采取行动。唐·胡安作出决定后,就以具有他那种气质的人所特有的热情全心全意投入等待完成的任务。

勒班陀战役之前的土耳其人

土耳其的帆桨战船集结和布署得更加迅速,从夏季一开始,就在海上行动。

同往常一样,这些舰船很早就有人报告被发现。2月份,有人在意大利获悉250艘帆桨战船和100艘其他舰船正在君士坦丁堡安装出航设备[66]。3月份有人获悉一直

被围困的法马古斯塔得到威尼斯的援助。[67]4月份有人获悉:这个城市仍在坚持抵抗;土耳其人在陆上进行准备,打算向阿尔巴尼亚或者达尔马提亚进发。舰队主力已经由海军司令率领驶出港口。[68]但是,据说只有50艘帆桨战船开往塞浦路斯,因为缺乏船员,帆桨战船不能超过100艘。[69]然而,从君士坦丁堡逃出的奴隶却说,有帆桨战船200艘。如果联盟没有缔结的话,这些舰船将开往科孚。如果情况相反,土耳其人将在完全征服塞浦路斯的同时,[70]只守护自己的海洋。仍然在流传关于经由陆路进攻阿尔巴尼亚或者达尔马提亚以及部队出发之前在索非亚集中等传闻[71]……

事实上,196艘土耳其帆桨战船已经从首都启航入海,并且在主要供应基地内格勒蓬岛和塞浦路斯岛之间兵分两路。远到莫东和普雷维扎等地都在生产饼干。[72]这是肯定无疑的在西部准备军事行动的迹象。事实也的确如此。6月份,因补充了厄尔杰·阿里的舰船(共有帆船300艘,其中帆桨战船200艘,低舷长形船100艘)而得到加强的土耳其舰队的主力离开已经不需要采取什么重大行动的塞浦路斯,[73]向干地亚岛驶来。15日,这支舰队抵达苏扎海湾,对海岸上的村庄和小城镇大肆抢劫。但它两次进攻卡纳[74]都白费气力。该地停泊有68艘用于护卫一支开赴法马古斯塔的援军的帆桨战船。这些舰船受到城堡的大炮的掩护。据传这些舰船被掳获。[75]但事实上,厄尔杰·阿里只不过攻占了雷蒂莫这个小港而已。土耳其舰队在进行了抢劫和多次小规模的战斗后,继续西进。

当土耳其舰队迫近时,韦尼埃罗不愿让自己同威尼斯剩下的海军一齐被关进亚得里亚海海湾内,于是离开摩里亚和阿尔巴尼亚海岸。他在阿尔巴尼亚对都拉斯和发罗拉进行了几次成功的袭

击。韦尼埃罗率领6艘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3艘普通船和50艘灵便的帆桨战船于7月23日前往墨西拿，把这个岛屿当作基地。这个撤退行动保证了他能够自由使用兵力，但也使土耳其人得以在亚得里亚海自由行动。[76]土耳其人为所欲为，劫掠海岸和达尔马提亚群岛，占领索波特、杜尔西格诺、安蒂瓦里、莱西纳并进攻库尔佐拉。库尔佐拉的居民斗志昂扬，竭尽全力保卫这座城市。与此同时，阿吉赫梅特帕夏的士兵经由陆路开到，把能抢到手的东西全都抢走。厄尔杰·阿里也袭击了扎拉。另一个海上行劫者卡拉·霍德亚抢劫了威尼斯的海湾[77]……

威尼斯市政议会得到格朗弗勒的准许，急急忙忙在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征募兵员[78]。但是，土耳其舰队无疑同韦尼埃罗一样，认为亚得里亚海可能是个陷阱，因此不把兵力全部投到该处，而让主力转向科孚。这个岛屿在它的居民撤离后，惨遭蹂躏，只有要塞中的大古堡这个岛中之岛受到保护，没有受到进攻者的袭击。土耳其舰队在科孚和莫东之间成扇形展开，坐观联盟国方面将采取什么行动。从6月中起，缔结联盟的消息事实上已经经由拉古萨传遍土耳其各地……

土耳其舰队一次过早出港，没有为土耳其人带来什么好处。土耳其人在这几个月的小规模的战斗中把军队弄得筋疲力竭，把粮食给养消耗一光。当他们进行最容易的活动，例如焚烧、抢劫亚得里亚海的村庄时，却忘掉了他们最主要的作战对象，即于地亚的威尼斯舰队。8月底，在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和马尔科·基里尼两位监督官的率领下，威尼斯舰队的60艘帆桨战船同联盟国的一支庞大的舰队顺利会合[79]。

10月7日之战[80]

唐·胡安到达墨西拿时，联盟军士气相当低落，集中起来的帆桨战船的航行状态不佳。但是，唐·胡安的那些情况良好的舰船的到来，产生了强烈的印象。此外，这位亲王和他的直接下属韦尼埃罗同科洛纳的首次接触情况很好。唐·胡安知道怎样在待人接物时有魅力。这个魔法师施展他的魔法，因为他始终热切地惦记在心的远征的命运，可能将取决于同敌人的这首次交锋。他知道怎样行动，怎样使一支杂七杂八拼凑而成的海军变成一个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的整体。他发现威尼斯的帆桨战船缺乏士兵，便调派去士兵4,000名。这些士兵中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各半。军饷全由西班牙国王付给。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大成就。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疑虑重重的威尼斯人在接受这项援助之前必须克服他们的疑惧心理。舰队的帆桨战船一下就变得完全相同，可以互换。正如舰队的航行命令表明的那样，各支舰队在需要时可以交换舰船而不真正混合为一。

舰队也觉察到它在联盟的理事会开会期间有了一个首领。并不是所有的阴云一下全都消散，但争执已经减少。正如威尼斯人所了解到的那样，唐·胡安既不想从威尼斯人那里把直接针对土耳其人的战役骗抢过来自己进行，也不想像菲利普二世、很多西班牙人和整个西西里所企望的那样，把一次对突尼斯的远征强加给威尼斯，用这次远征来代替这次战役。唐·胡安内心还想大胆推进到塞浦路斯，甚至更远，并且通过希腊群岛直抵达达尼尔。最后的决定、更审慎明智的决定是搜寻敌方的舰队并对之开战。

9月16日，舰队驶离墨西拿向第一个目标——科孚——进发。

它希望在该地得到最新的关于敌舰队的确切位置的情报，果然获悉，敌舰队在勒班陀狭长的海湾里。此外，这个消息还被派出的侦察船证实。情报低估了奥斯曼的兵力。但是，土耳其方面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这个错误导致土耳其的海军司令和他的顾问团决定向科孚沿海的基督教舰船猛扑。这时，联盟方面的军事会议在一次争论相当激烈的讨论中，不顾畏首畏尾的人和谨小慎微的人的反对，决定进行战斗。威胁要在必要时单独作战的威尼斯人的坚决要求、教皇党热切的愿望和唐·胡安的冲天干劲，对这次遭遇战都起了决定性作用。在这次战斗中，唐·胡安毫不犹豫地逾越了菲利普二世授予他的权力的狭窄的范围。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场合，唐·胡安是命运的缔造者。他非常真诚地认为，他不能使威尼斯和教廷失望而自己不丢掉面子和荣誉。避免作战就是出卖基督教世界。如果能够保存威尼斯的友谊，战斗和丧生并不一定意味着损害整个前途，因为有威尼斯的援助，可以重建基督教的舰队。唐·胡安这样做，使得后来有人为他辩护，[81]为他的主动精神进行解释。这无疑是他当时的想法。第二年当东·加西亚·德·托莱多想到唐·胡安曾经一下子就把意大利和基督教世界唯一的防务置于险境时，还不寒而栗。胜利后不久，明智的人把唐·胡安的这些行动视为疯狂鲁莽之举。他们想象基督教世界会遭到失败，想象土耳其的舰船追击联盟国的舰船一直追到那不勒斯或者契维塔韦基亚……

10月7日日出时，这两支互相搜寻的舰队突然在勒班陀海湾的入口相遇。基督教舰队很快就成功地把敌人关在海湾内（这是一个巨大的战术胜利）。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这时面对面看清了他们

共有多少舰船，都大吃一惊：土耳其方面有230艘；基督教徒方面有208艘。6艘装备精良、配备有大炮的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加强了唐·胡安的帆桨战船。总的说来，唐·胡安的这些帆桨战船在火炮和火枪装备方面优于土耳其的帆桨战船。土耳其的帆桨战船上的士兵还常常使用弓箭作战。

很多仍然存留的关于这次遭遇战的叙述，其中包括海军副司令朱里昂·德·拉·格拉维埃进行的研究，都缺乏理想的历史客观性。很难从中弄清取得辉煌胜利应该归功于谁。归于首领唐·胡安吗？这是毫无疑问的。归于安德烈·多里亚吗？他在这次遭遇战的前夕曾经考虑砍掉帆桨战船的船头冲角，让船头更加深入水中，这样前炮曲度不大的射击就能笔直打中土耳其舰船侧旁的正中木板。归于威尼斯的强大的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吗？这种战船配置在基督教舰队的队列的前沿，使像波涛一样涌来的敌舰土崩瓦解，并用它令人胆寒的强大火力击溃敌舰队。虽然这种战船几乎不动或者至少难于操纵，但在这种作战场合却起着主力舰的作用，是漂浮的堡垒。我们也不应该低估在这次非常类似陆战的战役中起了重大作用的卓越的西班牙步兵，也不应该低估西班牙帆桨战船的令人钦佩的军械部门。这些帆桨战船是所有地中海西部帆桨战船中土耳其人最惧怕的。[82]我们也不应该低估威尼斯的帆桨战船的特别密集的炮火。我们还应该像土耳其人后来强调指出的那样，像胜利者后来自己承认的那样，考虑到土耳其海军的筋疲力竭状态。土耳其海军没有以它的最佳作战状态出现在战场上[83]。

不管战功和荣誉属于谁，基督教的胜利是巨大的。只有30艘土耳其帆桨战船逃脱。这些舰船在厄尔杰·阿里的指挥下轻捷地，并

且以一种无与伦比的船舶操纵技巧在胡安·安德烈·多里亚的可怕的帆桨战船的周围变换队形。或许(正如诽谤所传的那样[84])这是因为热那亚人再次拒绝继续冒险,他们过分珍惜自己的资本。土耳其的其他帆桨战船全被掳获,掳获后或被胜利者瓜分,或被弄沉。在这次遭遇战中,土耳其死、伤3万多人,被俘3,000人。1.5万名苦役犯得到解放。在基督教徒方面,损失帆桨战船16艘,8,000人被杀死,2.1万人受伤。基督教徒在人员方面为胜利付出了昂贵代价。他们的兵员半数被歼。对战斗者来说,海上的战场似乎顿时被人的鲜血染红。

一个无足轻重的胜利吗?

这次胜利为最大的希望敞开了大门。但是,它当时却没有产生具有战略意义的后果。联盟的舰队部分由于它自身遭到损失,部分由于天气恶劣,没有穷追猛打溃逃之敌。这种恶劣的天气可能成了丧魂失魄的土耳其帝国的救星。甚至还在9月份,威尼斯人就认为继续向黎凡特进发,试图重新占领塞浦路斯,都已为时太晚。当法马古斯塔陷落的消息在勒班陀战役的前夕已经传到舰队首领那里的时候,在秋季继续向黎凡特进发是难以想象的。威尼斯自己在同月19日,[85]即韦尼埃罗为此目的派来的帆桨战船"安杰洛·加布里埃尔"号把胜利的消息带给它后的第二天,才得知法马古斯塔失守[86]。

至于唐·胡安,他很想立即远征达达尼尔。这次远征使他能够封锁海峡。但是,他缺乏粮秣和兵员。菲利普二世已经下令帆桨战船在意大利过冬。除非摩里亚的某个大港被让给这些舰船,在缺乏

进行包围所需的物资器材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冒险是不可能的。打算在亚得里亚海地区的几个次等小城的城下耽搁、滞留的教皇的舰队和威尼斯舰队，从它们的活动中既没有得到什么荣誉，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11月1日，唐·胡安回到墨西拿。几个星期后，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返回安科纳；韦尼埃罗返回威尼斯……

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致，作出这样的结论：勒班陀战役威武雄壮、轰动一时，甚至可以说十分光荣，但却没有产生任何后果，无足轻重。[87]达克斯主教代表他的主人巧妙地就这个题目大事发挥，并且在因遭受巨大损失（这些损失未得到"一寸土地"补偿[88]）而得到广泛真诚同情的威尼斯人中间这样做。达克斯主教看不见或者不愿意看见这次胜利，自有他自己的道理。

但是，如果注意到勒班陀战役进行之前发生的事而不只是注意在这之后发生的事，那么这次胜利就好像是一场灾难的结束、基督教世界的一种真正的自卑感的结束和一种同样真实的土耳其的霸权的结束。基督教的胜利堵塞了一条通向一个看来十分黯淡的未来的道路。如果唐·胡安的舰队被摧毁（谁知道呢？），那不勒斯、西西里就会遭到攻击，阿尔及尔人就会跃跃欲试，重新点燃格拉纳达的大火，或者把这场大火带到巴伦西亚[89]。在跟随伏尔泰对勒班陀战役进行评说嘲讽之前，衡量一下这次战役的胜利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是合理的。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紧接这次战役之后是一系列令人惊奇的欢庆宴乐——基督教世界几乎无法相信它的运道——，接着又有人提出了同样令人惊奇的五花八门的远征计划。这些计划针对地中海的各个地区，针对西班牙的惯常的势力范围——北非，针对埃及和叙利亚这些土耳

其人的遥远的属地(土耳其人从那里弄走大量金钱,头脑最冷静的格朗弗勒建议远征这些地区),针对罗得岛和塞浦路斯,最后还针对摩里亚。各地都有一些摩里亚的流亡者。只要稍微同情他们,稍微给他们一点武器,他们反过来就会什么都答应干。上述种种远征计划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容易使人产生幻想。在这两个地区,人们认为,一旦一支基督教军队南下侵袭巴尔干,这个地区的基督徒就会立即揭竿而起。耽于幻想的人——教皇和奥地利的唐·胡安——梦想解救圣地和攻占君士坦丁堡。难道没有人竟然建议在1572年春季侵犯突尼斯、夏季出征中东、次年冬季侵犯阿尔及尔吗?

应该为菲利普二世说句公道话,他并没有参与这种种狂热发疯的谋划。他不同于他的父亲、他的兄弟或者他的侄儿、葡萄牙的东·塞巴斯蒂安等人,他没有被十字军的梦想缠扰。[90]他一如既往,深思、谋算、衡量、估计、征求有地位的人的意见,要他们讨论,把格朗弗勒和雷克森斯的计划交给唐·胡安,责成他对这些计划中的各项建议逐一作出答复,并进行评价。会谈在罗马恢复以便确定下一战役的军事行动。胜利既没有丝毫减轻参加谈判的各方互不相让的激烈程度,也没有丝毫增加它们之间的互相信任。

人们倾向于嘲笑这些严肃的会谈和杂乱无章的远征计划。当人们了解到这件事的结局并有了事后的认识的时候,就会像新近研究勒班陀战役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研究这个战役的最优秀的历史学家P.塞拉诺那样,十分容易对这次胜利没有带来任何成果并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助益这一点作出解释。唯一能说的一点是:勒班陀战役的胜利只是一次海战的胜利。在这个被陆地包围和阻碍的液态世界里,这次胜利不足以拔除土耳其的根,这些深深扎在大陆

上的长根。联盟的命运决定于罗马，也同样决定于维也纳，决定于波兰的首都华沙以及莫斯科等地。如果土耳其帝国在这个陆地边境上遭到进攻……但是，它会遭到进攻吗[91]？

最后，西班牙不能像它应该做的那样，长期地、完全地投入地中海的事务。在这里，我们和往常一样找到了最根本的答案。如果西班牙顽强地把勒班陀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这个战役就可能产生后果。

人们并不总是了解这一点：只是由于西班牙在那一次完全地、彻底地投入了勒班陀战役，这个战役的胜利才可能取得。由于各种情况可喜地会集在一起，西班牙所有的困难在从1570年到1571年这段时期内都暂时地但全部地同时减轻了。荷兰似乎受到阿尔贝公爵的牢固控制。英国国内困难重重：首先是1569年这个国家北部的男爵的叛乱；然后是里多尔非的阴谋活动。这些活动即使不全部是，至少也有很多是西班牙的幕后牵线操纵。菲利普二世当时甚至打算进攻伊丽莎白，因为她看起来毫无抵抗之力，不堪一击。[92]法国的政策更加令人惶恐不安。但是，这项政策尚未制订完毕。1571年10月，达克斯主教出行的范围还没有超越威尼斯。托斯卡纳犹豫不决。科西默巧妙地组织制订的反西班牙的政策正处于间歇阶段，被遮掩起来。在这之前，这位大公甚至已经借给阿尔贝公爵在荷兰作战必不可少的钱款。[93]这是政治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吗？这是托斯卡纳在玩弄两面派手法吗？不管怎样，西班牙忽然从它的外部负担中解脱出来了。

西班牙利用这段休歇时期在地中海行动。于是在整个欧洲，各国士兵和冒险家成群结队，大批涌向雇佣兵员活动正在倍增的南

欧。一份报告说，威尼斯雇佣的法国士兵毫无疑问是胡格诺教徒。这些人在1571年保卫杜尔西格诺时，并不积极热情。[94]一些法国人也混杂在西班牙人中在阿里坎特登上菲利普二世的帆桨战船。[95]1572年春季，威尼斯有2,000个法国人。他们是受雇于威尼斯市政会议的雇佣兵。这些都是地中海战场突然具有的重要性的明显标志。

因此，西班牙就利用它的西方对手给它的暂时休战的机会在东方出击。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插曲而已。它更主要是根据环境、时机，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东打一棍，西敲一棒。它从来没有比这样更好地行动过。它永远也无法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用在一点上。这就是对"它的没有产生后果的胜利"作出的解释。

2. 1572年：惹人注目的一年

一场一直延续到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惨案的法国危机

自从塞浦路斯战争开始以来，法国对西班牙的敌意不断增长。1571年，这种敌意更加深了。在缔结联盟以后，这种敌意达到沸点。在勒班陀战役后，它爆发了，并且显露出一种赤裸裸的侵略性来。

对法、西这两个国家来说，1572年这一年一开始就出现了战争的征兆。战争事先就已经把它的阴影投射到一个武装起来的地中海上和一个动荡不安的北欧上。终于离开了威尼斯的达克斯主教

的使命(他1月份到达拉古萨[96]),同西班牙人所感到的正在北方日益增长的威胁相比,真是微不足道的事。西班牙人知道努多维克·德·纳索1571年春季在法国宫廷曾经受到怎样的接待。他们并非不了解法国国王和叛乱分子合谋勾结。西班牙的整整一个间谍情报网包围着法国并且渗入这个国家内部。[97]这张网很少致力于法、西两国的王室之间的友好和解。这两国的王室之间的会谈只不过是历史学家们陷入其中的长期一贯的说谎而已。像L. 塞拉诺那样[98]不自觉地抱着民族的偏见把什么都归因于卡特琳·德·梅迪奇的佛罗伦萨人的那种狡诈的两面派手法,是只抓住一个乱糟糟地纠结在一起的线团中的一根线。塞拉诺把卡特琳·德·梅迪奇描写成手法巧妙、态度多变,先是否认进行任何战备武装活动,然后又说这些活动是她那些叛乱的臣民进行的,最后又把这些活动说成是合法的自卫。

另一方面,英国的危险在这个时期复活了。1571年初,阿尔贝公爵劝告正准备经由海路前去荷兰的梅迪纳·切利公爵,如果他中途在海上停泊,就宁可在法国港口停泊而不要在英国港口停泊。[99]但是,1572年初,西班牙的这两个敌国彼此和解接近起来,忘掉了西班牙过去一直注意在它们之间培育和维持的长期争端。已经可以看到,一个联盟即将缔结。这一点从1月份起西班牙人就已经了解到。[100]法国国王对此作出的所有安抚镇定人心的解释,[101]是骗不了任何人的。

法英"联盟"条约于4月19日在布卢瓦签订。[102]3月份,这项条约的各项规定,特别是英国人有义务把他们出口的货物在欧洲大陆上的市场从荷兰转移到鲁昂和迪埃普的这项规定,已经广为人知。

与此同时，法国方面有义务供给这个岛国食盐、香料和丝绸。[103]这显然只会有利于法国的地峡的通路，并且促使安特卫普的衰落。[104]在威尼斯，人们甚至说，法国人是为了使鲁昂衰落的贸易复苏才缔结这项协定。[105]秘书阿吉龙当时正在一方面等待东·弗朗塞斯·德·阿拉瓦的继任者迭戈·德·苏尼加到来；[106]一方面在法国处理西班牙的日常事务。他丝毫不隐瞒他的痛苦。他在一封给秘书萨亚斯的信中毫无拘束，坦率陈词，公开对菲利普二世因声誉问题而不和英国协调一致表示遗憾。必须或者恢复谈判（同法国的协定在这个日期尚未签订），或者认为荷兰已经丧失。[107]

英国大使沃尔辛厄姆用更加复杂、更能辨别事物的眼光观察这些事物。他在条约签署后的第二天写信给伯利爵士说："穿长袍的人担心条约的签订会在这个王室和西班牙之间造成不和。他们对国王目前卷入战争非常生气，因为他们害怕事务的掌管权因此落入他人手中。"[108]这是对法国政策的变化不定性的客观、理智、不带激情偏见、健康的评断。马德里的宫廷消息灵通，甚至过分灵通，它倾向于把什么事都看得十分悲观。

不错，法国在大西洋海岸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时，故意闹闹嚷嚷大事张扬。[109]2月份，富克沃在马德里听人谈起这些准备工作。[110]阿吉龙在巴黎同葡萄牙大使交谈。这位大使和他同样感到不安。阿尔贝公爵在布鲁塞尔对这件事十分关切。[111]各地议论纷纷。[112]拉·加尔德男爵的西方的帆桨战船将带回地中海吗？这些正被装备成军舰的、已经被人得知将由菲利普·斯特罗齐指挥的高舷商船，会开到哪里？[113]圣古阿尔说，这些船只将用于巡逻以对付大西洋的海盗。菲利普二世认为士兵很可能变成窃贼。[114]迭戈·

德·苏尼加报告说，卡特琳·德·梅迪奇在谈到这件事时哈哈大笑，一面高声叫嚷说："波尔多的舰队不会碰触你们的任何东西。你们可以像你们自己的国王仿佛就在这支舰队的一艘船上那样放心。"[115]当苏尼加作这个报告时，人们实在很难相信法国正式许下的这支舰队将尊重西班牙的领土的诺言。[116]

令人忧虑不安的并不仅仅是波尔多舰队。荷兰南部的边境事件也是互相猜疑和指责的原因。这些局势动荡不安的地区的居民的疯狂错乱行为使这些猜疑和指责变得更加严重。[117]阿尔贝公爵是否加强了边境上的堡垒工事?他是否在堡垒架设了大炮?他是否布设了路障?[118]他是否像在战争时期那样强迫低地的居民服役、守卫?根据条约将自由地享有他们自己的财富的居住在荷兰的法国人，特别因为条约没有对宗教问题作任何规定而惴惴不安，时刻保持警惕。[119]这时，对西班牙来说，不可能不认为法国人每当他们能够煽起西班牙各省的叛乱时就会这样做。

4月1日，海上乞丐在纪尧姆·德·拉·马尔什的领导下已经占领默兹河口的岛上的布里埃尔。[120]叛乱已经扩展到弗莱辛格，在北部和东部蔓延，席卷整个瓦特兰德。荷兰真正的革命在一个穷人满谷满坑的狂热地区开始了。法国人必然会与这些穷人串通一气。[121]英国当然也如法炮制，照此行事。阿尔贝公爵向法国国王派驻布鲁塞尔代表抱怨叛乱分子的船只和新近武装起来的法国船只结伴驶行，叛乱分子从法国得到大炮、粮食和军火。[122]阿吉龙说，斯特罗齐的舰队几乎是一支法国胡格诺派的舰队。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舰船和这支舰队并排驶行。这支舰队能够在航行途中劫掠西班牙海岸。[123]

因为在北方进攻布里埃尔之外，又加上在南方的进攻，人们因此更有理由感到不安。5月23日，[124]胡格诺教徒随同拉·努进入瓦朗西安。5月24日拂晓，努多维克·德·纳索对蒙斯进行突然袭击。这是执行奥朗日和他的法国同盟者[125]商定的计划。这一行动丝毫没有使阿尔贝公爵感到惊奇。他总是过分低估海上前线和海上乞丐的危险，但却被来自法国方面的危险和西南的大陆边界吸引住[125]。

一场法西两国之间的战争看来的确已经迫在眉睫。5月份，纳瓦尔的总督韦斯帕西亚诺·贡扎加作了令人不安的关于法国在这个地区的阴谋活动的报告。[127]比利牛斯山地区的全部边界，从大西洋到地中海都处于警戒状态。圣古阿尔的报告对西班牙人猜疑的程度和西班牙大使的报告对法国人猜疑的程度不相上下。1572年5月21日，他写道："我看见他们进行各种储备。"[128]"他们在坎波城最后一次集市上征收了500多万税款"，并且还从意大利运来大量武器。这些武器在边境上分发了。最后，他们还供养着大批船长。这些船长受阻不能离开前往黎凡特。他结束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所谓的为联盟进行的战备工作不是针对朗格多克或者普罗旺斯的……在这个时期，法国国王在他那方面调集了80多艘舰船和"大量加斯科涅的步兵"。[129]这支舰队在等待什么？东·迭戈·德·苏尼加解释说，这支舰队是在等待了解西班牙的前线最先在哪里破裂。如果事情在荷兰得到顺利解决，这支舰队就不会开到那里去了[130]。

葡萄牙人也对一支法国后备舰队可能试图进行的活动惴惴不安。他们武装了一支庞大的舰队，配备有士兵2万名。传达这个消息的绍利说，这是因为葡萄牙人担心法国企图在摩洛哥占领盖拉海角。这个地方如果被占领，就会大大妨碍葡萄牙船只向东印度和向

“西印度”航行。除非法国人为了他们的利益企图对摩洛哥进行另外一次远征，他们才不这样做。[131]

西班牙并不是消极等待，无所作为，它采取了势必采取的海上措施来对付布列塔尼、拉罗歇尔和波尔多的出色的法国舰船。5月份，梅迪纳·切利公爵率领舰船50艘离开。[132]拉雷多已经下令在佛兰德武装30艘船只。在比斯开和加利西亚，当局给予任何愿意拿起武器、愿意加入梅迪纳的舰队以便观察法国人的活动的人以这样做的权利。[133]

至于意大利，那里的要害地区当然是皮埃蒙特、在皮埃蒙特周围的萨瓦各邦和米兰的军事中心。卡斯蒂利亚的大封地骑士刚刚被任命为米兰总督。来自德意志的士兵不断在这座城市聚集。如果圣古阿尔对这件事感到不安、抱怨起来，大胆问起这些士兵的情况，就会有人回答他说：“他们要被派到奥地利的唐·胡安那里……”[134]但是，在同一时期，[135]迭戈·德·苏尼加用同样惊惶不安的口吻写信给他的主人说，法国已经找到办法来让人把西班牙人在皮埃蒙特占领的要塞中的几个归还它。这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不安情绪。这种情绪传染了热那亚人。热那亚的市政会议写道，根据公众的传闻，4艘在马赛进行武装并准备运载6个步兵连离开的帆桨战船打算驶往科西嘉岛。[136]

谁也不会光明磊落地行事。真正的意图被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每个国家都自身感到不安但却又威吓别国，行事不择手段。当5月11日阿尔及尔人要求——这是一项出人意料的奇怪的要求——法国国王保护时，查理九世急忙接受。[137]他认为，他的兄弟安茹公爵当上阿尔及尔国王，向土耳其人纳贡，就会是个卓越的阿尔及尔

国王，不会被推翻。这个可怜的公爵曾经希望把多少顶王冠戴在自己头上啊！这可能是轻率行事，很可能破坏和素丹的同盟，或者正如达克斯主教回答这些奇怪的建议时所说，“把稻草当成谷料。”[138]但是，国王之所以这样轻易受到厄尔杰·阿里（与此同时，他提出要给菲利普二世一座城市！[139]）的毫无诚意的诺言诱惑，是因为他以为他接受这些诺言就能够巧妙地推动他在同西班牙的对弈的棋盘上的一个卒子。让我们不要像L. 塞拉诺和在他之后的F. 哈尔特劳布那样夸大这个事件。他们认为斯特罗齐的舰队的秘密要在阿尔及尔方面去寻找。[140]他们还认为查理九世想用把坎塔布连海岸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办法来使菲利普二世的舰队从阿尔及尔转移，来使他自己拥有这座城市。

法国的政策远不明确，非常缺乏一贯性。它没有把握在国外得到支持。8月份，新教德意志仍然没有决定采取行动。英国特别不愿意法国呆在荷兰。对它来说，这是开始同西班牙人进行会谈的大好时机。土耳其人自身的事已经够多。法国对自己的政策、措施没有把握。它的反西班牙的政策是查理九世这个感情易于冲动的人的政策，是大梦想家科利尼的政策。这项政策遭到沃尔辛厄姆所提到的“长袍”、佩剑的顾问和法国全体教士的反对。[141]他们之所以反对，理由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战争意味着巨额消费。在耗费大量资财的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占有教会的财产。一项世俗化的计划甚至已经拟定。这项计划将以和海军司令科利尼在加斯蒂内的十字架这个问题上所抱的“尚武好斗”的态度相同的程度煽动起巴黎的民众和教士。另一方面，进攻菲利普二世这件事非同小可。卡特琳·德·梅迪奇对一场会引起预料不到变化的战争开始感

到惶恐不安。6月26日，法国元帅塔瓦内斯在国务会议上明确地说，新教徒的力量可能在发生冲突时变得十分强大，乃至“那些现在好意领导他们的人不是丧命，就是得改变信仰……国王和他的王国就将完全受制于人。与其始终受制于人，唯他人之命是听，倒不如不要佛兰德和其他占领地。”[142]

法国的政策犹豫不决、动摇不定，准备退缩回来，当然还没有到准备同西班牙决裂的地步。6月的上半个月，当攻占瓦朗西安和蒙斯的消息传到马德里时，法国大使向菲利普二世表示遗憾。他几乎是在向这位国王转达他的国王的赔礼道歉。一切都是在他的国王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下发生的。他的国王真诚地为阿尔贝公爵的不友好的行动感到遗憾，希望菲利普二世重新相信他的国王的和平愿望。菲利普二世对此回答说，在佛兰德的叛乱分子中有很多法国国王的臣民和很多在法国居住过的人。在他看来，法西友谊只能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存在：言行必须一致。不管怎样，阿尔贝公爵奉命只在法国人主动绝交时才绝交[143]……一直到传来圣巴托罗缪惨案的消息以前，圣古阿尔代表他的政府一再提出和平的保证。在这些保证中，可能他加进了自己的看法。6月28日，圣古阿尔在和菲利普二世谈话时，谈到他的主人对给予他自己在佛兰德的封臣的惩罚感到满意。谈话提到科利尼的名字。这时这位大使毫不迟疑地声称这位海军上将是坏人，法国国王不相信他，虽然他在宫廷内为害比在宫廷外少。他结束谈话时乐观地说，国王派驻庇卡底边境上的军官是天主教徒，他们将竭尽全力避免发生冲突。菲利普二世也说，阿尔贝公爵也将这样做。根据西班牙掌玺大臣署的报告，[144]圣古阿尔离开菲利普二世时，非常满意。但是，当他在法国舰队的问

题上受到稍微有些过分的逼压时，他就终于答复说："海洋像个大森林，大家共有，法国人可到这里寻找财富。"[145]

法国的外交继续致力于谈判和平，这同样是千真万确的。不仅在马德里是这样，而且在维也纳和罗马等地也是这样。在夺取瓦朗西安的企图失败和让利斯战败后，事态全都发展得似乎法国的政策在开倒车一样。6月16日，查理九世把蒙斯的叛乱分子的失败通知他的驻维也纳大使，他说："这是上帝对那些起来反对他们的君主的人的公正判决。"他声称，他将竭尽全力使海上乞丐得不到任何援助，"我强烈谴责他们可憎的图谋……"[146]7月份，他写给在罗马的德·费拉尔斯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对纳索公爵怎样欺骗他进行了解释，并且再次表白他的和平意愿。[147]

法国的政策真是何等稀奇古怪而又变化无常。让我们不要像很多历史学家那样把这种政策说成是不道德的，因为在16世纪，人人都玩弄同样的手法，并且认为这样做是光明正大的。但是，它表露出大量犹豫不决和自相矛盾之处。法国一方面不决定同西班牙绝交；另一方面也不决定停止法、西边界线上的敌对行动。6月27日，有人从巴黎告知阿尔贝公爵：法国人在普罗旺斯征募3连轻骑兵；他们狂热地在马赛筑垒设防；一些部队正向皮埃蒙特的卫戍部队的驻防地开进。6月26日，法国的大国务会议开会讨论是否和西班牙断绝外交关系。会上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但是，这难道还没有明显地表明他们一见到良机到来就会抓住不放吗?因此，除非刀剑在手，是不能相信他们的。"[148]对从外部观察事态的人来说，因而也就是对西班牙人来说，法国的行动显露出它的清清楚楚的两面性，以致几乎什么都变得是可以置信的。例如在6月底，一个来自萨瓦

的信使把这样一个引起谣传的新材料带到马德里：教廷大使声称，法国国王要求自由通过萨瓦公爵的领地。[149]因此，所有的西班牙信使从意大利到西班牙几乎全都不走陆路而改走海路。[150]

其实，当菲利普二世手里有了关于让利斯进行袭击的报告时，或者当他在同一时期收到关于法国舰队的被人信以为真的调动和关于法国军队在庇卡底的调动的报告时，他对法国装腔作势，大谈友谊的保证会作何感想呢？让利斯率军6月12日出发援救蒙斯，17日被击溃，他本人落入阿尔贝公爵手中，这时他身上带着法国国王亲笔签署的文件。[151]菲利普二世被告知海军上将在梅斯设法筹集80万利佛以便在德意志干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事。蒙莫朗西和这位海军司令一致同意援助蒙斯。苏尼加又写道[152]："这里来了这个国王驻君士坦丁堡的代理人阿尔图卡里亚。街头巷尾流传他携有200万金币。但这并不可靠，人们看不出他这样做动机何在。我了解到有派他返回（土耳其）的说法。他们声称威尼斯人已经同土耳其人签定了一项停战协议。"这是威尼斯大使竭力加以否认的谣传。这些消息就这样在欧洲流传。这些消息并不总是经过仔细筛选，有真有假，有时准确地表明要发生叛变。东·迭戈·德·苏尼加被耶罗尼莫·贡迪告知法国国王的国务会议讨论的情况和内容：短袍和长袍顾问不愿打仗。卡特琳·德·梅迪奇的和平政策似乎占上风。[153]海军上将被国务会议排斥在外后，据说于13日和英国女王共同密谋策划。[154]

因此，圣巴托罗缪惨案并没有终止一项积极推行的、大力实施的和一致同意的干涉政策。罗马和马德里虽然后来对发生这次惨案幸灾乐祸，但都没有参与策划巴黎的这次屠杀。[155]此外，尽管发

生了这次屠杀，尽管巴黎圣巴托罗缪惨案的消息对法国的政治和国际政治产生了直接影响，尽管这次屠杀促成了在欧洲传播西班牙的国名的恐怖，尽管这次屠杀再次听任西班牙的主要是谨慎而非强力的政策自由施行，我并不认为这次屠杀因此就标志着法国的政策持久地朝着新的方向转变。与米什莱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相反，我不认为1572年8月24日这一天是这个世纪的重大转折点。圣巴托罗缪惨案的消息过去只产生过有限的后果。8月24日以后，法国的政策虽然暂时脱离了它先前的目的要求，不知所措，但是，正如人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以后仍然一如既往，始终不变。

1572年6月—7月给奥地利的唐·胡安的命令和逆命令

1572年8月圣巴托罗缪惨案仍然是一种遗弃。事件发生的经过就像赌徒之一的法国国王突然扔了他的牌一样。我们很想说，不管怎样，他一定会输。但是他的敌人是否相信他虚弱，是否指望这次遗弃呢？1572年6月和7月，菲利普二世推行的奇特的地中海政策反倒可能使人认为他高估了法国的力量。

一直到1572年6月，没有什么比菲利普二世在地中海方面对待联盟的政策更加简单的了。为了把产生于1571年的胜利的各种计划方案加以整理，教皇在罗马召开了一次会议。第一次会议12月11日举行。[156]这次会议只花了两个月就达到一项协议。这项协议于1572年2月10日由西班牙的委员：卡斯蒂利亚的大封地骑士和他的兄弟东·胡安·德·苏尼加（有时红衣主教帕凯科也参加进去）以及

威尼斯的委员：保罗·蒂耶波洛、季奥瓦尼·索朗佐签署。[157]这次讨论的结果有利于威尼斯市政会议。协议规定同盟成员将在黎凡特采取行动。[158]这件事一下就取消了对西班牙来说十分珍贵的远征北非的计划。协议规定储备7个月的粮食。大量物资器材将装载上船以便帮助被认为即将在摩里亚发动叛乱的希腊人。将在奥特朗托修建一个容纳11,000名士兵的兵营。这些士兵是后备军。可以根据局势的发展演变从这里抽调兵员。舰队的舰船数量略大于1571年：帆桨战船200艘、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9艘、普通船40艘、士兵4万名。安排行动日程的人总是十分乐观。日程规定：教皇的舰队和西班牙舰队3月底在墨西拿会师；然后，这两支舰队抓紧时间从该地驶往科孚同威尼斯舰队会合。

这样，西班牙就像它曾经在1570年和1571年为威尼斯作过牺牲，至少在表面上作过牺牲那样，将再次保卫威尼斯的利益。格朗弗勒写信给菲利普二世说，至于他，他并不觉得这件事非常不利。鉴于这个联盟肯定不会持久(由于法国的缘故，也由于威尼斯人性急的缘故，威尼斯人对丧失了黎凡特的贸易十分不满)，迅速利用这个组织粉碎土耳其的力量是适当的。只有通过远征黎凡特才能够同威尼斯人进行有效的合作。其次，这会使教皇十分满意，而且西班牙的这种态度在教皇、意大利和基督教世界看来，都是一种有好处的、毫不利己的团结的态度。[159]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真实的。但是，格朗弗勒说话的语气在一定程度上却是那种为了安慰别人或者安慰自己而采取的语气。

菲利普二世既然已经命令唐·胡安进行一次进攻比塞大甚至进攻突尼斯的尝试，就不应该乐意听这个"有好处的"决定。对比塞

大的远征将在春初进行，将采取突然袭击的形式。这次袭击将先于袭击黎凡特。唐·胡安为了准备这次远征，离开墨西拿前往巴勒莫。2月8日，他到达该地。[160]他必须从泰拉诺瓦公爵那里得到钱款。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161]他还必须向南方海岸进发。这个海岸是粮食基地和前往非洲的出发点。缺钱、缺粮，怎么能进行远征呢？至于帆桨战船和士兵，他写信到那不勒斯向格朗弗勒索要。[162]但是，格朗弗勒毫无菲利普二世的那种愿望和热情，并于2月21日向唐·胡安明确宣布："我不知道在缺乏钱款、在兵员不足的情况下这样一次重大的远征怎样进行。正如我记得我曾经致函阁下说过的那样，我不愿意阁下把脚踏上非洲，除非有一支适当的军队。"[163]最初，唐·胡安不接受这些理由。3月2日，他仍然希望看见那不勒斯的帆桨战船到来，希望沿柏柏尔海岸长途绕行到达科孚。[164]但是，3月中他作出决定。他在同参谋部、总督泰拉诺瓦、东·胡安·德·卡尔多纳、加布里奥·塞尔伯洛尼、总巡视官佩德罗·贝拉斯克斯等人商量以后，[165]写信给菲利普二世说："我不详谈迫使我返回墨西拿的理由，既然陛下在那些随同这封信寄出并且出自我以外的另一些人之手的信里会看到详细陈述的这些理由。这些理由在这里显得如此充足、如此令人信服，以致我绝对不能有别的做法。虽然我除了为使陛下高兴而进行这次对突尼斯的远征之外，丝毫没有想得到别的任何东西。陛下看见敌人被从这个城市赶走时，是会感到这种高兴的……"[166]

但是，5月1日，圣教皇庇护五世去世。[167]仅仅这个死本身就使联盟的整个前途成了问题。这起事件发生于政治局势极其紧张的时刻，构成了西班牙政策的根本转变的根源。这个大转变不久就被

后来发生的事件掩没消除。但它仍然不折不扣是一起事件。5月2日，菲利普二世断然命令他的兄弟推迟帆桨战船出发前往黎凡特的时间(该项命令于17日拟就)。如果他收到这道命令时已经离开墨西拿，必须尽快返回。先在6月2日，随后又在6月24日接着发出的信函里重复了这道命令。7月4日才撤回了这道命令。由此产生了一场延续6周之久、像旋风那样刮到意大利的危机。它产生的影响当唐·胡安已经在科孚和盟国会师时还没有缓解。

5月20日—7月4日：这些日期把这个问题置放在一个确切的时间范围内。P. 塞拉诺对这个时间范围没有予以充分注意。他是第一个阅读了西班牙档案的全部文献资料的历史学家，自然会重复这些文献资料所包含的辩护性的论据，因为菲利普二世必须在教廷、在威尼斯人那里，在对他的姿态感到惊奇的欧洲的各个宫廷那里以及在他自己派驻意大利的代表那里为自己辩白。但是，我们更可以不把这篇辩护辞当真，特别因为有时菲利普二世自己也直截了当把他真正的动机和官方的理由分开来。

菲利普二世举出官方的理由时，声称他之所以把唐·胡安留在墨西拿，是因为担心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168]不能否认菲利普二世是相信这个危险的，但是他没有理由在1572年5月为此特别担忧。

这个解释同日期不相符合。从马德里看，在西、法两国关系紧张的历史上，5月17日到5月20日、7月4日都不是事件发展到顶点的日期。在这些短暂的时期内没有发生与斯特罗齐的舰队有关或者与次要的战场有关的决定性事件。重大的消息当时只能来自荷兰。但是，将近5月20日，马德里的人还只了解在布里埃尔登陆的事件。进攻瓦朗西安和蒙斯是5月23日到5月24日才发生的事。[169]另一方

面，为什么7月4日，法国的危险在菲利普二世看来小一些？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这时这种危险加深了。菲利普二世在随附于这一天他给唐·胡安的逆命令中的各种理由里承认这一点。圣巴托罗缪惨案还远未发生，而且谁也没有预见到。[170]

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菲利普二世和唐·胡安的通讯，而去研究他寄往罗马的信函，特别是他6月2日和24日寄给东·胡安·德·苏尼加的那些信函，问题的答案就在别处，而且更加清楚。

菲利普二世还用另外一个理由来解释他的态度：教皇之死。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因为众所周知，新教皇的选举总是会对欧洲的政治产生影响，使之发生变化。尤其对教皇国家本身的政治来说，情况更是这样，何况这时西班牙的战争预算依靠罗马，因此它的舰队也依靠罗马。正如圣古阿尔所说，新教皇可能是个关心补救他自己的事务和他那个家族的事务甚于关心补救联盟的事务的人。[171] 毫无疑问，情况正是这样。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这一点菲利普二世后来也承认。教皇之死在它使这位国王得以解脱出来或者使这位国王能够像已经从他所承担的义务中解脱出来那样行事这个意义上，是这位国王作出这个决定的近因。但是，决定性的原因是远征黎凡特不大合他的心意。相反，他企图从事另外一次远征：远征阿尔及尔。

菲利普二世在他写给唐·胡安的第一封信中，就已经提到阿尔及尔。他在6月2日致胡安·德·苏尼加的信中写道："你知道我给我兄弟的命令和我向他建议让舰队留驻墨西拿的表面理由。让舰队留驻墨西拿可以用教皇之死作为借口，且不说我下的命令。"但是，"由于新的选举进行得很快，我们不能再依恃这些理由，"特别因为

已经作出的选择是“神圣的和良好的。”然而，我决心不改变看法。关于阿尔及尔，“如果我希望我所属的邦国从这个联盟中，从所有这些费用中取得某些成果和效益，而不是把这些费用用于像远征黎凡特这样的不可靠的事情上的话，我始终认为进行这次远征总的说来对整个基督教世界是合适的，特别对我的各个邦国是合适的。”必须把佛兰德的叛乱、人们对法国和英国插手干预的怀疑以及人们得到的关于法国进行武装的消息等作为理由提供给教皇。而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提到阿尔及尔[172]……

解释是清清楚楚的。菲利普二世想利用他积聚的力量来打击土耳其人，但要打到点子上，打击得对西班牙有利。要打击一直是西班牙觊觎的范围的一部分的北非，要打击阿尔及尔。这是伊斯兰的主要前哨，是它的西方基地，它的人员、船只和航海器材的供应中心。对西班牙所属的各个邦国来说，这是可怕的海上行劫船只的出发点。正是这项传统的政策引导菲利普二世作出决定。[173]

剩下要加以解释的就是7月4日的逆命令，即为什么要回到联盟成员原来的观点上和协议上去。菲利普似乎已经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人的、新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的和西班牙本身的“大臣”的激烈的和一致的反应面前作了让步。在这些西班牙“大臣”中，有米兰的东·卢伊·德·雷克森斯，他在罗马的兄弟、在那不勒斯的格朗弗勒，且不提因为已经把联盟的胜利挂在心上而激烈抗议的唐·胡安。这次总的攻势制服了审慎国王。他们提醒他：在这场赌博中他将丧失人望；他会迫使威尼斯立即同土耳其人谈判；对他来说，随之而来的就是丧失威信和力量。在西班牙代表敢于在意大利谈到远征阿尔及尔的计划之前，这个计划已经到处流传。此外，新教皇

把预备税和特别税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不断撰写热情洋溢的敕书，对联盟表示赞同。不管他多么灵巧、随和，并不是世界上的任何借口都能说服他。在罗马和别的地方，法国的危险并不被人看得十分严重。格朗弗勒自己认为只需要对法国国王讲话时疾言厉色、盛气凌人，就可以使法国国王为人行事重新审慎有节。唐·胡安认为对付法国国王最好的办法还是远征黎凡特，用进行一次新的勒班陀战役来回答他的诽谤。

6月12日，正从墨西拿前往巴勒莫的唐·胡安派出一艘帆桨战船。这艘船在岛屿之间驶行，只用了6天就抵达巴塞罗那。[174]人们得到这艘船到达和这次航行快得异乎寻常的消息时，认为一场灾难已经突然降临墨西拿。几天后这艘战船离开该地。7月12日，它把4日下达的珍贵的逆命令交给唐·胡安。[175]唐·胡安没有被授予自由决定问题的全权，因为国王要求从西班牙的帆桨战船中抽出胡安·安德烈·多里亚率领的舰队。如果法国国王胆大妄为，安德烈·多里亚的舰队就将有向比塞大或土伦推进的任务。[176]

对摩里亚的几次远征

夏末秋初，地中海大战在从科林斯海湾、中经摩里亚的西部海岸、直到马塔潘海岬的这一漫长的地域进行。摩里亚的西部海岸丘陵起伏，海礁密布，淡水补充点稀少，船只无法停泊。此外，在这个海岸面前延伸着爱奥尼亚海的空旷辽阔的海域。夏末以来，在这些地区，好几股大风在龙卷风的伴随下，使沿河平原被淹没，并且使海上不能行驶细低的帆桨战船。唯一的避风处在北面的科孚，或者确切地说，在沿达尔马提亚

海岸的地区或者在马塔潘海岬的另侧，在面对爱琴海的海岸上。这是像爱琴海或者像亚得里亚海这样的狭窄的海享有的一种优惠：与受到秋季风暴蹂躏的地中海的广阔海域相比，这种风暴在经过一定的延滞之后才侵袭这些海。

这确实是个奇怪的战场。联盟成员国在那里只有很少几个方便的基地。在与这些寸草不生的海岸邻接的威尼斯的岛屿中，没有一个能够提供可靠的避风处或者对舰队来说与避风处同样必不可少的粮食补给点。在它们之中塞里戈太狭窄，船只几乎无法靠近，除了葡萄树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资源；凯法利尼亚山峦起伏、荒无人烟。它们全都离开大陆的海岸太远，以致舰队在必须同对面的海岸对抗时，无法以这些岛屿为基地，在这里坚持。仅有的几个据点和方便的掩蔽处——科林斯湾北部的圣莫罗，这个海湾内的勒班陀以及南部的纽瓦林和莫东——都在土耳其人手中。

不错，联盟成员国根据几个被流放者的断言和许诺，指望摩里亚居民会发动叛乱，但是，在这方面却什么都没有组织起来。联盟内部的商讨只涉及为叛乱分子装运武器这个问题。唐·胡安只特别写信给罗得岛上的希腊人，当联盟成员国的军队到达时，那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叛乱，甚至连类似叛乱的事件也没有发生。17世纪末，威尼斯成功地占领了摩里亚。这件事它应该部分地归功于当地希腊居民的合作。[177]但是，在16世纪，这些居民都丝毫不动。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说明这是否由于土耳其人和由于他们的警惕性，或者由于希腊人过分了解拉丁民族（特别是他们过去的主人威尼斯）以致不愿意去为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此外，如果发生希腊人的暴乱，摩里亚会理所当然地被选作战场。这个地区丘陵起伏、合人心意。令

人闻风丧胆的土耳其骑兵在这里无法展开大规模的队形变换。这个地区远离土耳其人控制下的道路网。看来它的确准备宣布独立。但是，在这个时机，联盟成员国似乎并没有进行任何有意识的选择，偶然的时机和关于土著人叛乱的算计，把它们引向摩里亚海岸。

7月12日，唐·胡安接到在科孚与联盟成员国军队会师的命令。他立刻写信给刚刚同教皇舰队和同由吉尔·德·安德拉德指挥的西班牙帆桨战船一齐到达那里的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吉尔·德·安德拉德指挥的西班牙帆桨战船是唐·胡安托付给科洛纳的。威尼斯人已经到达。联盟成员国军队接到唐·胡安的信后本应等待联盟的首领到来。但是，科洛纳和威尼斯舰队司令福斯卡里尼担心会发生新的耽搁，又想单独打胜仗并且具有以后必要时为自己辩护的借口，于是7月29日让舰队启碇扬帆向南方驶行。这时正从南方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土耳其舰队再次同往常一样，很早出航；据说正在抢劫干地亚、赞特、凯法利尼亚的海岸。听任土耳其人劫掠这些岛屿和糟蹋岛上宝贵的庄稼是勒班陀战役的战胜者应该抱的态度吗？舰队已经列成作战队形离开科孚，途中得到监督官奎里尼指挥的干地亚的帆桨战船的增援。31日晚，这支舰队抵达赞特[178]，在该地停留3天。它那时获悉土耳其舰队在马尔瓦西，于是出发迎战。就这样，这支舰队被带到希腊的极南端。8月7日，两支舰队在塞里戈沿海海面上相遇。

厄尔杰·阿里的舰队并不是一支可以等闲视之、对之掉以轻心的舰队。土耳其帝国已经不是在通常被人认为是它具有的无数优越方便的条件下，而是在痛苦和疲劳中，当它的全部力量都因情况

危急而耗尽的时刻，重建了它的这支舰队。这个巨大的努力的结果是：造了舰船至少220艘，其中包括帆桨战船、荷兰圆头帆船和低舷长形船。关于这一巨大努力的确切的报告，基督教世界在整个冬天不时收到。可能这些舰船中的一大半新近造成，在1571年和1572年之间的冬季下水。这些舰船装载军队很少。但是，厄尔杰·阿里已经使它们的武装现代化了。它们装备着大炮和火枪；它们的火力大于阿里帕夏的那些还装备着大量弓箭和投石器的舰队。其次，厄尔杰·阿里成功地把阿尔及尔的海军作为样板，组建了一支极其机动灵活的舰队。这支舰队的帆桨战船更加轻便，但非常坚固。它们装备的大炮和辎重器材比受它们袭击的基督徒的帆桨战船少，但每次都机动灵活地战胜基督教舰队，这令人大惑不解。

最后，土耳其舰队具有两三个显著的优点。它付出代价，了解到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的可怕的威力，以后再也不会忘记。它有厄尔杰·阿里这样一位杰出的领袖。这个领袖的几个副手之间的矛盾一刻也不会使他忧虑烦恼。他是一个在战役开始时比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在战役终了时比唐·胡安更擅于掌握、使用自己的军队的首领。此外，这支舰队背靠一个友好的内地。这个地区的粮仓、后备部队和海岸炮兵近在咫尺，而基督徒却依靠在墨西拿、阿普利亚或者在科孚装上船的东西，依靠好赖贮藏在圆船上的饼干。这些圆船是帆桨战船和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必须同时牵引拖带的沉重、巨大的浮动仓库。轻型船只干这些超人的工作，会被弄得筋疲力竭。其次，厄尔杰·阿里只考虑采取一种付出代价最小而收效最大的政策，即：阻止基督教舰队抵达土耳其军队的练兵场——希腊群岛——同时保卫冬季奇迹般地重新组建的舰队。这也是他的优点

之一。虽然8月7日他接受了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的挑战，但这并非毫无心计，盲目行事。他十分清楚，联盟成员国军队并非全部出动投入战斗。他并不需要特别迎战、抵抗西班牙的难以对付的帆桨战船或者西班牙步兵团的步兵。它要迎战的只有威尼斯人或者几乎只有威尼斯人。威尼斯人和他同样缺少步兵，同样受到舰船笨重的船体的妨碍。他甚至还对威尼斯人拥有数量优势。

7日这天，时间已晚，在塞尔夫群岛和兹拉戈纳拉岛附近，在离切里戈不远的地方，战斗开始。联盟的舰队的队形展开得慢慢吞吞。这是不祥之兆。当这支舰队接近土耳其的帆桨战船时，是下午4时。风向对它不利。它几乎没有移动。各次进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各次佯攻，全都是土耳其的轻便帆桨战船发起的。联盟军方面小心翼翼，像在勒班陀战役中一样，把它的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和圆船（全都装备有火力强大的大炮并且超员装载军队）布署在舰船队列的前面。舰队的其他舰船在这支强大的屏护部队之后等待。厄尔杰·阿里想绕过这些庞大的浮动堡垒，进行帆桨战船对帆桨战船的战斗。他这一招没有得手，于是停止战斗。他的舰队部分驶回马尔瓦西。与此同时，他率领90艘最精良的帆桨战船留下来列成战斗队形。为了隐蔽自己的行动，他命令炮兵放空炮，并在一道巨大的烟幕之后消失。他同舰队的其余舰船会合，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这时他的几艘帆桨战船点燃舷灯，向切里戈驶去，让基督徒怀疑他开往西方，怀疑他试图把他们和唐·胡安率领的朝他们驶来的帆桨战船隔开。10日，第二次战斗把第一次战斗的过程重复了一遍。基督教徒藏在他们的"主力舰"后面。土耳其人无法破坏这种部署，溜出战场，正好像芭蕾舞中的配角一样……

因此，这次战役的第一阶段的技术方面的主要严重问题是联盟成员国的舰队的笨拙和迟钝。庞大的主力舰和帆桨战船—拖船连接在一起。它们使这些拖船同样行动缓慢。联盟成员国的军队在这里是地中海战争的陈规老套的牺牲品。革命的和创新的行动，应该是让大型的和强大的舰船利用风力。

第二次战斗的结局是厄尔杰·阿里退避到马塔潘海岬。这时，联盟成员国的军舰驶向赞特，同唐·胡安的舰队会合。8月10日，唐·胡安到达科孚，发现他的部属已经离开，没有给他留下任何表明舰队去向的踪迹。他怒火中烧，大发雷霆，满面通红，声称要返回西西里。但是，他对正在流传的坏消息深感不安，下了命令之后，又下令将其撤销。他终于设法使舰队9月1日在科孚集合起来。这时，大量时间已经浪费。但是，难道应该像塞拉诺那样，认为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进行的远征毫无用处可言吗？看来，几乎毫无疑问，联盟成员国军队这样做，即使没有起更大的作用，至少把干地亚或者赞特从土耳其舰队的劫掠中拯救了出来……

在舰队集合后进行的对军队员额的总核查统计出：帆桨战船211艘、荷兰圆头帆船4艘、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6艘、运输舰60艘、兵员3.5万到4万之间。这些统计数字无疑会有某些差误。怎么能够准确无误地记载私有的低舷长形船和帆桨战船呢？怎么能够记载志愿的冒险家——意大利贵族的精英——的这两种舰船呢？……另一方面，在这支庞大的舰队里，马却不到200匹，粮食缺乏，钱差不多同样少。不错，这支舰队需求很大，它对意大利的粮仓和菲利普二世的国库来说，都是一个无底洞。

唐·胡安没有马上离开科孚，而是举行了讨论。威尼斯的帆桨

战船需要补充兵员，但福斯卡里尼拒绝接受西班牙士兵，必须向他提供教皇的部队，而教皇的部队本身又已经被菲利普二世的雇佣兵代替了。最后，舰队扬帆启碇，出航目的与7月份相同，即与土耳其舰队交锋。于是，唐·胡安9月12日率领舰队抵达凯法利尼亚岛，然后前往赞特，最后到了摩里亚的海岸。当时的消息说，厄尔杰·阿里在纳瓦林。唐·胡安企图让他的舰船推进到港的南部，以便把敌人同莫东分割开来，并把敌人关闭在纳瓦林的设防很差的港内。虽然基督教舰队在夜间航行以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但使用兵力时犯下的错误却使这个企图归于失败。基督教舰队被海岸哨兵发现。因此无法阻止厄尔杰·阿里离开纳瓦林（他和70艘帆桨战船在该地）和向莫东撤退。基督教舰队尾随其后。于是，一场新的摩里亚之战开始。这场战争更加引人注目，但和上次同样令人失望。

9月15日这天，唐·胡安没有让他的舰队同在撤退中的敌人作战。16日，厄尔杰·阿里向他挑战，然后当夜幕下降时在莫东的大炮的掩护下躲藏起来。如果这天晚上唐·胡安不是向普埃尔托隆戈的锚地退去，不是让敌人进攻他的后卫（没有成功），而是转过身来朝向敌人，他本会有很多机会攻占莫东并在该地摧毁土耳其舰队，因为在被包围的港内，秩序极端混乱。塞万提斯后来说，土耳其人全都准备离开他们的帆桨战船，“他们已经收拾好了衣物和帕桑马格（这是他们的鞋子的名称），以便不待别人来袭就从陆地上逃之夭夭。”[179]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厄尔杰·阿里迅速采取行动。当基督教徒以为他已不能活动时，他却立即拆除他的舰队上的部分武装，以便把拆除的大炮架设在城周围的山上。要塞一经加强，就固若金汤，

无法攻克。不过，根据不久以后去那里的菲利普·德·卡纳伊的描述，这是一个很小的要塞，它的防波堤无法掩护20艘帆桨战船。[180] 但是，舰船在那里甚至在港湾都能确保安全无虞。相反，基督教徒的舰船不能无限期地在大海上停留。它们必须撤往附近的抛锚处。真正的被包围者难道是厄尔杰·阿里吗？联盟方面制订了大量攻占城市的计划。这些计划一个比一个冒险，不但遭到审慎的人的反对，而且与明显的事实抵触。这时，厄尔杰·阿里已经可以指望得到秋季恶劣天气的帮助。他可能有的这个同盟者，是他临时发动的这场战争的关键所在。他如果福星高照，可望圆满结束这一战役。联盟成员国方面逐渐才明白他的拖延战术的含义何在，及至最后恍然大悟，已经为时太晚。联盟成员国方面认为能够通过攻占纳瓦林这个行动来迫使土耳其人走出他们的巢穴，因为所有来自北方的向莫东提供的补给都经过纳瓦林。这个要塞设防很差，难于援救。但是，厄运向这个行动扑来。联盟成员国军队对地形不够熟悉。年轻的亚历山大·法尔内兹指挥的登陆行动困难重重。西班牙步兵行进的平原被倾盆大雨淹没。纳瓦林城得到警报。城里的大炮射击准确。当人们远远看见联盟成员国军队的长长的骆驼和骡马运输队向城市行进时，土耳其骑兵开到。最后，这支军队的粮食和军火供应不足。在光秃无树并受到陆上龙卷风横扫的平原上，没有避难场所。以上种种情况都使联盟成员国的这支军队前进时，寸步难行。这支军队有8,000人。显然，这时让它回到船上就刻不容缓了。

10月5日到6日之间的夜里，这支小部队重新出海。在随后的两天内，联盟成员国的舰队来到莫东前面再次挑战。但是，在这个勒班陀战役纪念日里，这一行动徒劳无益。联盟成员国的舰队甚至不

能利用20艘土耳其帆桨战船驶出港外追击一艘基督教徒的运输帆船的这个良好时机，因为唐·胡安的帆桨战船过于笨重，以致当这些被厄尔杰·阿里立即召回的舰船迅速返回它们的避难所时，唐·胡安的帆桨战船无法阻止它们返航。应该撤围还是进行最后一次夺取港口的尝试?唐·胡安命令随同多里亚和塞萨公爵留在后方的帆桨战船同他会合(这些帆桨战船10月16日才开到科孚。这时他自己正在返回途中)，以此表示他进攻的愿望。威尼斯人的确想继续包围几个星期，他们认为土耳其的防务最后必然土崩瓦解，还认为不管怎样，厄尔杰·阿里的舰队在向君士坦丁堡返航途中将经受恶劣天气的严峻考验。也许他们并没有错。有人坚持认为，土耳其卫戍部队筋疲力竭，可能屈服。[181]但是，另一方面，威尼斯舰队司令福斯卡里尼后来供认，他真正的原因是他在返回威尼斯时，自己特别害怕威尼斯的可怕的法庭。1570年当威尼斯舰队将领扎内远征塞浦路斯失败返回威尼斯时，这个法庭没有饶恕他。

10月8日，联盟成员国的舰队终于放弃对莫东的包围并向赞特撤退。9日，这支舰队到达赞特；13日开到凯法利尼亚，18日，抵达科孚沿海海域。两天后，这支舰队一分为二。接着两支舰队分离。已经决定放弃在黎凡特，在科孚或者在科托尔过冬的打算，放弃在亚得里亚海湾向土耳其的据点发动任何惩罚性的远征的打算。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站在唐·胡安一边，把解决问题的办法强加于威尼斯人。塞萨公爵写道[182]:“从表面上看，他们始终是满意的。”但是，10月24日，福斯卡里尼写信给威尼斯共和国当局说:“这次远征成果很小的唯一原因是西班牙人不是去帮助联盟，而是设法破坏联盟和削弱威尼斯。唐·胡安的拖延和耽搁，他在战斗中的犹豫不决

和优柔寡断，只适应了这项逐渐消灭威尼斯共和国的力量，确保西班牙国王在佛兰德的利益而忽视联盟的利益、甚至损害这些利益的计划。西班牙人的险恶用心在所有关系到威尼斯所属各邦的利益的方面都昭然若揭。”[183]还能够有什么比这更不公平的吗？但是，事实上，从这个秋末起，人们都已经感觉到联盟不复存在。西班牙舰队分为3支小舰队迅速驶返墨西拿。24日，唐·胡安率领第一支小舰队到达。26日，他隆重入城。[184]

任何那个时代的人如果被人征求关于1572年的“大”事的意见，可能根本不会举出上述的那次远征。1572年，几个大人物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上述被征求意见的那个时代的人想到的是这些大人物。我们已经在前面谈到5月1日庇护五世之死和6月的纳瓦尔王后之死。新教因这位王后之死而失去了灵魂。在8月24日惨案的受难者中有海军上将科利尼。格朗弗勒在那不勒斯认为达克斯主教，“这个依靠科利尼的胡格诺教徒”，不会再扮演和他的保护人在世时他扮演的角色相同的角色。[185]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权势强大的人物——红衣主教埃斯皮诺萨——9月16日死于中风。[186]他是国务会议主席、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他极端崇慕虚荣，身居多项显职高位，日理万机，工作繁重，死时他的桌子上还堆满尚未拆阅的信件。他还处于半失宠状态，好像被这种状态搞垮了一样。在欧洲大陆的另一端，特兰西瓦尼亚亲王于这年年初死去。7月7日，波兰国王辞世。[187]这样就开始了将于下一年以安茹公爵的当选告终的奇怪的危机。[188]

这个时期，一个名叫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人，由于在勒班陀受伤，再加上外科医生无能，以致伤势恶化，失去左手，变成伤残

……在里斯本，“在安东尼奥·戈萨·鲁埃斯的家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名叫加莫恩斯的人撰写、出版了《路西亚德斯》[189]。这是一本把这个辽阔广大的地中海包括进去的关于海洋险遇的书。这个海洋是葡萄牙在那里建立丰功伟绩的印度洋。

3. 威尼斯的“背叛”和突尼斯的两度被攻占：1573—1574年

秋天的局势使人非常清楚地预见到会发生的事——威尼斯的“背叛”——于1573年3月7日成为事实。这个“背叛”事件4月份在意大利被人获悉，下一个月被西班牙人得知。应该说，这更主要是一次放弃，而不是什么“背叛”。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共和国的局势：贸易、工业、财政遭到破坏；国力被所有战争中花费最大的海战耗尽；国民在日常生活中饱受粮食短缺和粮价高涨的折磨。可能那些受苦最重的人——穷人——并非最不勇敢的人。在威尼斯驾驶轻舟的船夫的歌谣中唐·胡安几乎成了传奇性的英雄，这并非毫无道理。但是，穷人不管理共和国的大事，富有的威尼斯人的商行不满足于同土耳其的间接贸易。

为威尼斯拟定的辩护词

另一方面，威尼斯眼见战争已经打到国门，在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的边界进行。它如果继续进行这场斗争，不就会变得没有能力保有这条达尔马提亚的会发生变化的边界线吗？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根据专家的说法，

塞贝尼科已经没有救了。这场已经历时达3年之久的战争没有给威尼斯带来任何大的好处。1571年，它丧失塞浦路斯，然后又失去一系列位于它的亚得里亚海领海上的据点。从在1571年和1572年之间进行的这次远征中，它除了得到一张等待付给的数额巨大的帐单和众所周知的怨恨不满之外毫无所获。没有任何事物反驳它的这个坚定的看法：西班牙竭力削弱它、损耗它。因为同受到包围和监视的托斯卡纳相比，同被半占领的萨瓦相比，威尼斯更是意大利的独立的、摆脱了西班牙的桎梏和势力的堡垒。威尼斯对米兰内那边的局势感到忧虑不安。1573年春季，当它"背叛"后，它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加强它在西部大陆上的要塞：既然了解邻居，就针对邻居的情况行事。

威尼斯的理由就是这些。威尼斯市政会议违反签定的条约的规定，没有预先通知它的联盟者，这个问题无关紧要。而且，根据那个时代的习俗和准则，这只不过是个轻微的过错而已。对它的责备也是不痛不痒的。1572年5月，菲利普二世对收回他的诺言难道曾经有过丝毫犹豫吗？

通过耐心的达克斯主教的居间调停，威尼斯同土耳其达成了协议。这位主教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这项调解工作。我们已经说过，他于1571年5月前往东方，9月份才迟迟到达威尼斯。他在泻湖城长期滞留。他到得不是时候。这时，勒班陀战役正在进行，巨大的胜利正在勾起幻想和梦想。他在1572年1月到达拉古萨之前坚持不懈，一再陈述其使命的目的。对头脑冷静的威尼斯人来说，谈判的诱惑在于有可能趁胜利之机争取到可以接受的有利的议和条件，甚至收回塞浦路斯。这个希望在威尼斯进行的所有直接谈判中和在它

以自己名义授权进行的谈判中居于次要地位。这里我们必须统一认识：威尼斯要收回塞浦路斯就必须承认它不再是殖民强国；它不再是作为该岛的拥有者；必须拆毁那里的工事，[190]并且成为土耳其在这个岛上的封臣。实际上这并不是收回塞浦路斯本身，而是收回塞浦路斯的贸易。至于其他，则还要在与土耳其的关系的危险的斜坡上接受可以称之为拉古萨式的解决办法的解决办法……

土耳其的苛严无比的要求，很快使这些希望归于破灭。[191]谈判在素丹个人反对同威尼斯议和的这个真真假假的借口下长期拖延不决。在这种情况下，达克斯主教的插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使土耳其提出的条件变得温和起来，并于3月7日使素丹同意一项和平协议。3月13日，土耳其提出的条件发往威尼斯，4月2日送到该城。[192]这些条件对威尼斯来说，即使并不像人们以后到处所谈的那样使人丢尽脸面，至少也严酷苛刻。威尼斯割让塞浦路斯，放弃土耳其在达尔马提亚从威尼斯手中夺走的哨所；它归还它在阿尔巴尼亚占领的土地，释放土耳其战俘不收赎金，付战争赔款30万西昆，并于1576年全部付清，否则条约将被视为无效。威尼斯将把自己的舰队的舰船数量限制为60艘帆桨战船，把为凯法利尼亚和赞特两地缴纳的年贡增为2,500西昆。莫切尼戈总督召开的普雷加迪的国务会议作为既成事实提出。不错，作为交换，威尼斯得到了和约，一项虽然在未来的一个长时期内并不可靠、岌岌可危[193]但却带来巨大好处和正常生活的可能性的和约……

不管怎样，1573年的谈判证明圣巴托罗缪惨案无论多么残酷并且产生了野蛮凶残的后果，都没有改变查理九世的外交政策。法国政府不同意与西班牙结成联盟，不愿意在一个所谓的天主教同

盟中，在西班牙的控制下断送自己。对卡特琳·德·梅迪奇和他的几个儿子来说，对过分强大的邻居进行的斗争正在继续。这一点不久就会从使安茹公爵登上波兰王位的选举中看到，从法国对各个德意志选帝侯，特别是对帕拉廷这个僧侣巷的第一个加尔文派教徒所进行的活动中和所施加的压力中看到，从法国对英国和对荷兰进行的活动中以及从自1573年起对热那亚进行的活动中看到。这一点在西班牙的情报人员的报告(这些报告对这一点添油加醋、大加发挥)里就显得非常清楚了。西班牙国王的情报员和西班牙的大臣不满足于如实报导事物，于是对未来进行预测。这的确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当1573年7月1日拉罗舍尔和约结束了圣巴托罗缪惨案引起的动乱之后，[194]他们就忧心忡忡起来。但愿法国国王能够禁止他的胡格诺教徒前去援救荷兰的叛乱分子！这种种传闻不管是真是假，被西班牙帝国的强大的但盲目的国家机器收集到之后，被任意夸大并通过成千上万条渠道到处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越来越明确具体，活灵活现……影子战争重新开始了。

奥地利的唐·胡安攻占突尼斯——另一个无足轻重的胜利

我们不想再次打开关于西班牙对威尼斯的正当不满的档案材料，这个已经被那个时代的人和历史学家毫无节制地塞得满满的档案材料。我们应该承认西班牙从来没有像在1571年和1572年之间的冬天那样忠诚而坚定地为联盟努力过。那时它在那不勒斯和墨西拿，[195]在热那亚和巴塞罗那制造新船以增加它拥有的帆桨战船的数量。唐·胡安的秘书

胡安·德·索托的一份报告甚至提出一个很高的指标：300艘或者350艘帆桨战船[195]……这纯粹是发疯吗？又是，又不是。因为胡安·德·索托同时又谈到一个相当合理的解决办法：用民兵来配备这些帆桨战船。特别是在墨西拿修建一个海军造船厂，或者更确切地说，扩大正在修建中的一个海军造船厂，而且在冬季来临时，把它掩蔽起来，让帆桨战船在里面藏身。总之，仿效威尼斯行事……

因此，西班牙从来没有作过比这次更大的努力。被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作为他的特使派往马德里的帕多瓦主教奥尔马内托受到最殷勤的、最周到的接待，虽然他的愿望遭到了反对。这个愿望是：3月份派遣100来艘帆桨战船到希腊群岛去完成抢劫那里的各个岛屿的海岸的任务。这次是土耳其的榜样在纠缠、搅扰他的想象，他想仿效土耳其行事吗？[197]菲利普二世和他的顾问们对海上的事物的重要性更加了解，不采纳对他们提出的种种想法和意见。这个国王再次选择了可行的而不是宏伟的计划。

国王的大臣们也同样既坚决而又有节制地对待威尼斯的背叛。教皇平时十分温和，对人非常和蔼可亲，这次得知威尼斯的背叛，对这个背誓变节的国家大发雷霆。他把威尼斯共和国的大使责备了一顿并且毫不犹豫地立即收回他在教会收入方面给予威尼斯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恩惠。他一旦息怒，就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相反，唐·胡安、格朗弗勒、东·胡安·苏尼加等人始终保持冷静。可能他们已经多次预见到这起事件了。易于激动的唐·胡安这时令人钦佩地控制住了自己。

正如已经预见到的那样，这时土耳其舰队正在出航，但出航得很晚。一个目击者看见这支舰队6月1日驶出君士坦丁堡。[198]然而，

弗雷斯纳的封建领主菲利普·德·卡纳伊却声称这支舰队6月15日才经过城堡，[199]7月15日才通过达达尼尔海峡。[200]这个谜的谜底可能是6月15日从科孚发出的那份公文急报。这份公文急报说，土耳其舰队分两批驶离，结果是：3日，卡拉加利率领第一批舰船抵达内格勒蓬（据说有帆桨战船200艘）；以后，皮亚利帕夏率领另外100艘帆桨战船与前一批会合。这一耽搁延误说明为什么在意大利存在某些乐观情绪。7月13日，东·胡安·德·苏尼加写道[201]："土耳其人今年将不采取任何行动。他们的舰队出航仅仅是为了阻止唐·胡安那方面进行任何尝试。"此外，他还说："他们的舰队乱七八糟。"这个细节所有随后发出的公文急报都加以重复。但是，土耳其舰队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向西驶行，并于7月28日在普雷维扎附近抛锚。8月3日，来自科孚的报告说，这支舰队在驶往拉古莱特之前，毫无疑问将入侵阿普利亚海岸，其双重目的是：阻止西班牙人远征柏柏尔和镇压再次叛乱的阿尔巴尼亚人。[202]根据卡纳伊的报告，8月14日，这支舰队驶向阿布鲁齐，或多或少企图与唐·胡安的舰船进行遭遇战，或者向巴勒莫进发。[203]事实上，它似乎迟疑不决。它在很短一段时期内驶向墨西拿。8月8日，它驶过那不勒斯海岸的科洛内海岬。[204]但是，8月14日这天，它好像返回普雷维扎，在萨皮安扎的海岸上用涂料涂抹船底。19日，它又离岸出发。[205]

这支舰队排列成庞大的队形出发后，西班牙方面开始惴惴不安起来。风闻它正在继续向西航行并将在某个法国港内过冬。唐·胡安下令不为夏季在撒丁岛值勤的步兵换防。[206]同样一则关于土耳其舰队将在法国港内过冬的传闻，8月25日传到罗马。[207]但是，苏尼加并不相信。历史无法说明他错还是对，因为土耳其舰队在航

途中遇到一场猛烈的风暴。一些帆桨战船丧失，另一些受到严重损坏，[208]以致不得不派人去普雷维扎购买桨和帆。[209]难道是这件事迫使土耳其舰队后撤吗?8月29日，发自科孚的一份公文急报指出，这支舰队在“古墨尼佐斯”。[210]9月初，这支舰队受到重创，队形混乱，情况很糟。它不在基督教世界的海岸附近的水域而在发罗拉。[211]9月5日，它驶往奥特朗托海岬的陆地，在该处攻占了卡斯特罗的小堡垒。[212]然后在22日，这支舰队连同它的230艘帆船驶向君士坦丁堡[213]，但是没有取得成果或者几乎没有取得成果。月底，它在勒班陀补充粮食。[214]

土耳其舰队的这次没有规律的航行没有对奥地利的唐·胡安的夏季活动产生丝毫影响。长期以来，在西班牙集团内，的确就有人谈到远征北非这个问题。冬天调集的兵力虽然不能和土耳其的全部舰队对抗，但仍然组成一支强大的队伍。佛罗伦萨的代理人德尔·卡恰自马德里写信说[215]:“此间有人认为:鉴于大规模的备战活动正在进行，钱款正在筹集，[216]新的征兵工作正在西班牙展开，造好的帆桨战船正在巴塞罗那下水，将对土耳其、阿尔及尔或者别的地方进行远征。的确不能认为作这样的努力只是为了抵抗土耳其人入侵而已。”[217]

但是，当土耳其舰队驶到那不勒斯海岸能受到打击的范围内时，就不应该耽于幻想了。不能冒一次新的杰尔巴之险。至于以什么地方作为远征的目标，就此在阿尔及尔、比塞大和突尼斯之间进行选择时，似乎就产生了犹豫不决。唐·胡安甚至菲利普二世[218]和西班牙的公众舆论偏向于选择阿尔及尔。西西里则要求以比塞大和突尼斯为目标。这两个地方与进攻基地相距很近。这一点也促使

人们作这样的选择。马德里的国务会议似乎也有过这样的愿望。不管怎样，选择终于作出。对阿尔及尔的远征推迟到或近或远的未来。[219]突尼斯将遭到进攻。

但是，在远征部队抵达非洲海岸之前，问题就已经发生。攻占突尼斯固然是件好事。下一步怎么办？像1535年查理五世不抱任何幻想所做的那样，重新扶立一个不配登上王位的傀儡吗？6月26日，唐·胡安写信给菲利普二世说："此间认为应该征服突尼斯，但不要把城市给予穆莱·哈米达国王。"[220]根据让·安德烈·多里亚的信，菲利普二世让唐·胡安作最后决定。[221]同一封信指出，由于季节太迟，远征阿尔及尔的方案已经放弃。这封信又说，如果不赶紧行动，对征服突尼斯的计划来说将出现同样的危险。"因为虽然航行距离很短，但正如人们所知道的，从特拉帕尼到拉古莱特的航程十分艰险，以致当帆桨战船偶然在柏柏尔遇雨就不得不在特拉巴尼滞留两个月以上，无法横渡。"唐·胡安谈到从费迪南大公所属各邦调来骑兵这个问题。多里亚说，这样做费时太多。让我们使用手中现有的兵力并把在伦巴第的德意志兵员调来，就已经足够了……

在土耳其舰队于7月2日开到之前赶紧行动，这个劝告很好。但是，不久以后就必须认真对付随着这支土耳其舰队的活动而产生的焦虑和惊恐情绪。这是行动延迟的新的原因。通常的困难，例如粮食供应、帆桨战船的整备、部队和钱款的运载等问题仍然存在。最后这个问题再次尖锐地提了出来。[222]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唐·胡安前往那不勒斯。这个地方是个比墨西拿更大的供应站。唐·胡安当时患病，"有三四种微恙缠身"，但仍然尽快到达西西里。然而，他并没有去墨西拿（他只是路过那里[223]），而是到了位于非洲的大门

口的巴勒莫和特拉帕尼。正当他忙于准备工作时，他的副手塞萨公爵却不无道理地对那些关于土耳其舰队将在发罗拉过冬的传闻感到不安。正如他已经向唐·胡安提出的那样，他问菲利普二世“用很好的大帆船运送包括西班牙士兵和德意志士兵在内的12,000名步兵去拉古莱特”[224]是否适当。至于菲利普二世，他既然8月12日就已经写信给泰拉诺瓦说，只有当土耳其提供时机时才远征突尼斯，因此他肯定土耳其的威胁相当严重。[225]

唐·胡安正需要这些审慎的劝告和意见，因为差不多在同一时期，8月15日，他禀告国王说，即使土耳其舰队不撤退，他也决定进行远征[226]。他这样做是听任自己受激情狂热的支配摆布，还是听从滥于封官许愿的教廷的命令？罗马教廷首先提供出它的帆桨战船。[227]教皇甚至谈到要把突尼斯的王冠戴在唐·胡安的头上。在这个被当时的人和历史学家大加讨论并弄得十分复杂的小问题上，尽管有O.德·托尔内的权威性的看法，[228]我却不认为要对所有安东尼奥·佩雷斯散布的流言蜚语、恶意诽谤全都一笑置之，加以否定。唐·胡安肯定受到登基的愿望，受到使他无法安宁片刻的不安情绪的困扰。托尔内声称罗马教廷等待攻克突尼斯后再来谈王位问题。这是可能的。然而唐·胡安在上面引证的他6月份写的那封信中，排除了重新扶立穆莱·哈米达的想法。他将在突尼斯任命的是一个当地的总督，而不是一个国王。这难道完全没有他自己私下的算计吗？在教皇那方面，将近10月20日，他在罗马宣称（唐·胡安的胜利还不为人所知）：“如果突尼斯攻下，最好把这个王国保存在基督徒手里而不要把它交给某个摩尔人国王。”[229]庇护五世早已经答应把从非基督教徒那里夺取来的第一个国家交给唐·胡安，不管这

个国家是怎样的国家。的确，比实权更引诱唐·胡安的是称号。在对按地位排列的先后次序和对等级高低入了迷的欧洲，年轻的王侯们对王冠真是朝思暮想，梦寐以求。安茹公爵在想得到阿尔及尔的王位之后，刚刚在波兰获得王冠。唐·胡安对他自己的私生子地位满腹牢骚，十分怨恨。他还被人保持在阁下这个低下的等级上。1574年，他梦想得到因查理九世之死而空缺的法国王位。他在荷兰的最后几年，获得英国王位的梦想老是在他的脑际萦回……

因此，可能格里高利十三世急欲同非基督教徒进行斗争，便试图用这类诺言来保征斗争的成功。这类许诺在取得征服突尼斯的胜利之前比取得这一胜利之后更容易理解，也更说得通。因为唐·胡安不得不干出一些近乎奇迹的事来以便集中所有对进行远征来说必不可少的物资器材，并且在几乎不名一文的情况下获得这些物资器材。[230]最必不可少的供餬口之用的经费是分期分批、一小点一小点向他提供的。[231]甚至说不定还没有做到这个程度。例如，他收到两张汇票：一张数额为10万埃居，另一张数额为8万埃居。其中第一张应于12月末支付，第二张应于1月1日以后的40天内支付。埃斯科维多这样写道，他必须使用这两张汇票，以便得到预付款。是他的军需官居心叵测、故意拖延误事吗？不完全如此。西班牙国库的总的情况非常糟。埃斯科维多还写信给他说，对坎波城的贷款的数字令人心惊肉跳。“佛兰德毁灭我们……”

9月初，唐·胡安离开墨西拿前往巴勒莫。他于7日到达该地。[232]他把塞萨公爵和圣克鲁斯侯爵留在身后。与此同时，他还派遣J.德·卡尔多纳去特拉帕尼。9月2日，土耳其舰队已经在圣莫罗海岬外的海域被人发现并撤向黎凡特的消息使他下定决心。[233]但是，西

班牙舰队并没有准备立即出发。西西里的主席(自从佩斯卡尔以来这个岛屿不再有总督)利用这段时间撰写关于计划在柏柏尔[234]采取的行动的陈情表。27日,唐·胡安从巴勒莫到达特拉帕尼。[235]这时,土耳其舰队再度驶近,似乎又变得具有威胁来犯之意,以致格朗弗勒采取了惯常的保卫那不勒斯王国的措施。[236]对非洲的远征因而再次成败未决。

唐·胡安虽然受到飓风的阻扰,但在10月7日勒班陀战役周年纪念日这天,[237]仍然向非洲进发。他从马尔萨拉出发抵达法维尼亚纳。他下午4时离开法维尼亚纳的避风处。8日日落时分,他到达拉古莱特。9日,他率军登陆。这个行动一直持续到黑夜降临,使1.3万名意大利士兵、9,000名 西班牙士兵和5,000名德意志士兵都登上了岸。他率领的舰队包括帆桨战船107艘、普通船31艘,再加上托斯卡纳大公的大帆船和大批载运粮食的小船、三桅战船以及其他个人私有的小船。[238]10日,他逼近城市。城内居民已经不战而逃。第二天他轻而易举就占领该城。[239]这时城堡宫殿里只剩下一些老人。

唐·胡安怎样处理被他征服的土地呢?从马德里发来拆毁这座被占领的城市的命令。但是,这道命令在唐·胡安返回时才到达他手里。他在没有接到指令的情况下,已经在突尼斯 的城堡里很快就地(可能在11日或者12日)召开了军事会议。除了惯常参加这种会议的顾问外,他还召集了西班牙、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步兵统领、几个舰长以及其他几个大家知道能够发表受到重视的意见的人到会。唐·胡安这样做是偶然为之还是想用数量优势来压倒他的正式顾问呢?不管怎样,这次临时召开的会议以多数票决定为西班牙国王保存住这座城市。[240]唐·胡安据此草拟了一道命令。他采取的主

要措施是：在被征服的突尼斯留下一支由4,000名意大利士兵、4,000名西班牙士兵，共8,000人组成的卫戍部队；这支部队由一个名叫加布里埃尔·塞尔布洛内的"炮手"担任指挥。[241]这项措施带动了其他措施，特别是任命一个本地总督(这位总督是前国王穆莱·哈米达的兄弟、哈弗西德王朝王位继承人穆莱·穆罕默德。可以说这是一个保护国)以及修建了一座俯瞰全城的巨大堡垒。[242]

尚待了解(格朗弗勒日复一日眼见暴风雨中的大海波涛汹涌，不稍停息，因此深感不安)唐·胡安是否会同样幸运，能成功地攻下比塞大。据说土耳其人已经躲藏在这里，躲在一个人所共知适于海上行劫的、部分设防的海港内。[243]但是，比塞大本身也不战而降。[244]唐·胡安在遭到他的军队洗劫的突尼斯只停留了一周时间。他在拉古莱特进行了4天准备后，于24日再度登船，并于当天下午攻占法里纳港。25日，他在比塞大。5天后，他又从该城出发到达法维尼亚纳岛。一路上天气晴朗。11月2日，他进入巴勒莫。13天前，这个城市的居民张灯结彩，庆祝攻占突尼斯。[245]12日，唐·胡安已经在那不勒斯。格朗弗勒在这个城市里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恺撒的名句："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胜利了。"以向唐·胡安表示敬意。[246]

毫无疑问，远征突尼斯在军事上是一次轻轻松松的散步。在天气晴好的季节之末，当果园里"无花果成熟时"，几天晴朗的天气促使事情易于成功。但是，这难道是一次胜利吗？

突尼斯的陷落：1574年9月13日

征服突尼斯并不仅仅是攻下它，而且还要占有它。然而，胜利之师却只占领了哈弗西德家族的王国的很小一部分。从来没有过征伐内

地并降服内部广大地区的想法。

在这种情况下，保存大城市就产生了一些困难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拉古莱特的驻防地的上千名人员外加奉派保卫这个城市的8,000名士兵的给养问题。对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后勤供应站来说，这个负担十分沉重。酒、咸肉、小麦等没有钱就无法弄到；船只没有钱就无法租到。而人们越来越把粮食和军火的运输任务交给租来的船。西西里和那不勒斯财源枯竭，这些简单的活动因而变成几乎无法解决的困难。格朗弗勒的抱怨并非令人厌烦的叫苦，而是正确的意见。突尼斯王国的真正问题正在这里，而不在教廷大使奥尔马内托为了从菲利普二世那里为唐·胡安取得突尼斯国王的称号所作的种种努力。这些努力是那些后来突然停止的、只不过构成稗官野史的内容的谈判。

人们大概会对唐·胡安的失败作种种不同的解释。菲利普二世和他的异父兄弟之间挖掘了一道鸿沟。荒谬无稽之谈、向他提供情报的人进行的间谍活动、安东尼奥·佩雷斯可能怀有的恶意（虽然我们没有调查研究这些年月的情况就不能接受这一点），最后还有国王天生的猜疑，凡此种种都酿成了这次失败。不仅如此，唐·胡安局限于他自己的活动领域内，没有注意到西班牙的全局。这一点也是导致失败的原因之一。自威尼斯退出联盟之日起，菲利普二世不管可能写了些什么或者发布了些什么，最终还是放弃了要积极主动地在地中海上采取重大行动的政策。这大大出乎他自己的料想之外。他同后来导致1575年的第二次破产的可怕的财政危机进行搏斗。他没有安特卫普的贷款人提供的物力、财力和各种方便，越来越依靠热那亚人和热那亚的金融市场。然而，1573年爆发了新、

老贵族之间的以及从事金融业的人和从事工商业的人之间的纠纷。这既是一场社会危机，也是一场政治危机。在新贵族的背后，难道没有法国国王站在那里吗？这也是西班牙帝国的危机，因为对运送军队和汇付钱款来说，热那亚都是一个中心点……

当北非问题尖锐地提出后，菲利普二世的谋略算计转向北方和热那亚，还转向更远的荷兰，也转向重新策划阴谋的法国。在这种情况下，留在非洲并非明智之举。这意味着增设新的支出项目，这意味着削弱拉古莱特（既然兵力要在突尼斯和新驻防地之间分开使用），这意味着为了获得并不可靠的好处而去冒失去已经到手的东西的危险。西班牙国王一再向教廷大使奥尔马内托指出这一点。然而，后者却丝毫不懂得这一点：马德里缺乏金钱势必引起态度、计划和意图的改变。除了宣称“宁愿自己死也不愿同意有损我的荣誉和名声的事”的国王之外，人人都希望有关双方就在北部妥协和解。[247]这就是说，在西班牙，风不是朝冒险的方向刮。然而，既然唐·胡安通过保存突尼斯这件事先斩后奏，把他的兄弟置于既成事实之前，后者就认为同意这件事更加可取，但这只是临时同意、一项临时协定，只在当年有效。

唐·胡安刚刚制造出来的是一部笨重的殖民机器。如果这部机器还能够自己运转，如果被征服的地区能够供养占领军，那就很好……这正是他的拥护者宣称这部机器具有的功能。这正是索托1574年5月以他的年轻主人的名义在马德里禀告国王的话。这正是格朗弗勒红衣主教同年11月所陈述的内容。红衣主教认为，如果像唐·胡安所要求的那样在比塞大和法里纳港修筑堡垒，菲利普二世就会肯定拥有北非东部。这会在海上阻碍土耳其人和阿尔及尔之

间的联系往来，在陆上会完全切断这些联系往来。堡垒一旦竣工，突尼斯的统治者拥有的收入就可以占用。这有利于西班牙国王。这些收入不但足以维持上述突尼斯的堡垒，而且还能够维持可能修建的堡垒。这些收入可以用提倡、扶持和鼓励这个地区的基督教徒经营的商业的办法来增加。为此，必须取得当地土著的友善的感情，必须精心选择他们的政府形式以便使他们喜爱西班牙国王的统治。[248]

但是，困难正在这里。10月末，突尼斯的居民返回城内（虽然并不是主要的居民。这些居民的房屋一直被士兵占用），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让人肯定那里的经济生活已经全部恢复正常。不过，既然占领当局和当地土著总督不久就在拉古莱特的海关问题上发生争执，经济生活肯定已经部分恢复了。上述那位总督要求恢复主要是关于皮革的13％的关税率。[249]向唐·胡安提供情报的西班牙人表示了他们对受他们保护的人的失望。另一方面，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使人肯定这个既有游牧人口也有定居人口的国家的大部分已经接受了基督教徒的征服。在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装作低估基督教徒在突尼斯取得的胜利，并且声称"阿拉伯人"（应该理解为游牧民）完全能够减低西班牙人的征服程度并且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些游牧民被冬季的严寒赶向南方。正当土耳其舰队再次出海时，他们又被夏季的炎热带回地中海的海岸。

马德里没有人准备把解决、处理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的工作承担起来。还摆着一大堆别的问题呢！当舰队的帐目差不多审核、结算完毕，唐·胡安正打算作西班牙之行时，4月16日，他收到前往热那亚和米兰的命令。与此同时，国王任命他为国王在意大利的摄

政官，有权指挥国王在该地的大臣。[250]在热那亚，人们预期他在该地的出现将有助于处理政治争端。从4月29日到5月6日，他留在这个城市，但是，他的使命的主要部分是针对伦巴第的。在马德里，人们认为他到达伦巴第将足以使法国感到不安，防止法国向西班牙寻衅闹事。在米兰，西班牙国王的兄弟的出现将加快派遣援军前去佛兰德，因为佛兰德的局势一直是西班牙主要关切的事。

对唐·胡安来说，菲利普二世的命令起了使之失宠受辱的作用。由于缺乏钱款而以令人不安的速度解体的舰队的可悲处境增添了他的悲伤。他在伦巴第的维杰瓦诺一座十分漂亮的古堡里焦急烦躁地等待受他委托向国王呈交详细报告的秘书胡安·德·索邦的归来。他感到心力交瘁，他同别人赌气，满腹怨恨。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十分不安。他拒绝从事任何工作，甚至拒绝处理有关突尼斯、舰队和供应的问题。他把什么事都付托给国王的大臣。国王的大臣并不是没有对这种正如格朗弗勒所说的把球踢给别人的推卸责任的做法提出过抗议。5月份，索邦到达马德里。他的陈情表在军事会议或者在国务会议上受到慢而仔细的审查研究。唐·胡安梦想的事物被埋在掌玺大臣公署的一扎按照书法规则工工整整抄写的文件的下面，变成了呈送给顾问们发表意见的调查表。军事会议的意见说："……关于突尼斯的局势问题，在所有的人看来，季节来到得如此之早，以致没有必要讨论我们应否留在那里。这个夏季，占领军留在那里是理所当然的。只宜责成唐·胡安大人和各位大臣完成供应要塞必需品的任务。"菲利普二世在这句话的旁侧批注说："同意，但应特别提醒我的兄弟所有关于拉古莱特的情况，以便他在该地继续获得供应补给。供应补给的方式就如同在突尼斯没有

堡垒的情况下一样。”

虽然大家一致同意让西班牙的士兵留驻突尼斯，否则就会丧失一切，[251]但是，关于唐·胡安的作用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梅迪纳·切利公爵认为，这位亲王是由于佛兰德和法国的缘故被派往伦巴第的，既然大封地骑士已经到达荷兰，而且法国的内部困难有增无已，他在伦巴第出现已经不再必要……因此，让唐·胡安再度负责处理海洋方面的问题，负责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柏柏尔的驻防城市的防务，同时担任舰队的领导。弗朗卡维拉的意见与此相同。相反，阿吉拉侯爵却认为“对很多事物必须从两方面加以考虑”。如果不能供给唐·胡安必需的经费和军队，把他再调到大舰队的指挥岗位上去又有什么用呢？昆卡主教发言同意上述看法。他着重详细谈了舰队的糟糕状况。据说有足足120艘帆桨战船。但是，面对土耳其人，这足够吗？在不势均力敌的遭遇战中，难道要让勒班陀战役的胜利者被迫去进攻敌人的后卫，逃之夭夭，或者更严重的是，由于他过于年轻、过于热情、血气方刚，一时冲动而去冒险吗？会议主席接受了所有这些看法所包含的明智之处。菲利普二世用这种审慎的语调作结论说：“告诉我的兄弟：的黎波里和布日伊的事务看来并非重要得为了处理这些事务必须让舰队冬天去冒险。”从这短短几行总结了一份冗长的文件的内容的话中可以看出，菲利普二世以大量多方面的情报、意见、主张以及十分细致的行政工作作为他的外交政策的基础。[252]当某一道命令需要1个多月到达执行者的手里时，事先权衡一切、预见一切，而不是在事件处于最关键的时刻去采取临时应急措施，这样做是有用的。

但是，就突尼斯而言，最后，什么也没有像预见的那样发生。

唐·胡安被迫主动采取行动。土耳其的这支舰队的规模、兵力、出发情况和因新造帆桨战船尚未发生作用而延迟了的出航等，公文急报已经指出。1574年7月11日，这支土耳其舰队抵达突尼斯。它拥有帆桨战船230艘、小船数十艘，载有兵员4万人。[253]由厄尔杰·阿里率领舰队；军队则由曾经于1573年降服叛乱多年的也门的锡南帕夏(不要把他同杰尔巴战役的胜利者混同)指挥……大家普遍感到惊奇的是：拉古莱特在被围困将近10个月后，于8月25日攻克。[254]普埃尔多·卡雷罗并没有防守这个地方，而是将其拱手交出。突尼斯的堡垒自卫的时间略微长点。9月13日，塞尔布洛内在该地投降。

怎样解释这双重灾难呢?突尼斯的防御工事尚未竣工。对保卫者来说，这是一个很不利的条件。分开的两个要塞不能互相支援，而且土耳其人得到土著辅助人员的帮助。游牧人帮助他们运输、挖战壕，为锡南帕夏提供一支工程部队。与此相反，基督教卫戍部队可能素质低劣。格朗弗勒提出西班牙人征募和更新部队过于频繁，结果使军队不再具有老部队的良好素质。但是，须知格朗弗勒当时既然是应对蒙受的灾难负责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当然需要寻找论据来为自己辩护。

军队的迅速投降并没有使唐·胡安以后的任务变得容易一些。他已经尽其所能了。7月20日，在土耳其人在突尼斯湾登陆的确切消息传来以前，他摆脱了闲散无事、麻木迟钝和呆滞死板的状态。但是，他远离非洲。怎样动员一支缺乏经费并因而处于可怕的废弃状态的舰队呢?8月3日，国王的一系列命令传到热那亚，下达给他。这样，他就可能在这些命令中进行对他的图谋有用的选择。8月17日，他率领帆桨战船27艘抵达那不勒斯。[255]31日，他到了巴勒莫，但

已经为时太晚。[256]除了派出两艘帆桨战船外，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满足普埃尔多·卡雷罗提出的援救的要求。这两艘舰船上的划桨苦役犯得到如果事情成功就会获释的许诺。8月14日，东·胡安·德·卡纳多纳写道："鉴于进入突尼斯海湾十分困难，我十分怀疑它们会到来。"[257]唐·胡安的顾问东·加西亚于27日写信给他说，解决的办法在于让士兵一小批、一小批从突尼斯前去拉古莱特。但是，在这个日期，该地已经投降了两天。[258]正在这个时刻，马德里决定把胡安·德·索托派回长期等待他的他的主人那里。这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巧合。胡安·德·索托于23日到达那不勒斯。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带来了准许唐·胡安重返他的舰队的命令。朱利奥·德尔·卡恰(我们从他那里获知这些细节)还说："他们(西班牙人)发现危险很大，储备了7,000埃居并且下了别的命令。愿上帝解救我们。"[259]

使唐·胡安不幸到极点的是，9月份他受到恶劣天气的阻碍。然而，他竭尽全力进行斗争。9月20日，他派让·安德烈·多里亚率领30艘加强的帆桨战船[260]径直前往柏柏尔。与此同时，他还派圣克鲁斯去那不勒斯装运德意志军队。[261]10月3日，他成功地在特拉帕尼把他的舰队的大部分，即60来艘帆桨战船，集合起来，此外还加上教皇的帆桨战船(即教皇舰队舰船的一半)。当他不顾东·加西亚的劝告即将推进到拉古莱特时，关于非洲的灾难和胡安·德·索托到达那不勒斯的消息同时传来。唐·胡安痛苦地叫道："他这次暂时离开5个月后，能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啊！他会告诉我已经成为历史事件的新闻，为我开出预防已经发生的灾难的药方。"[262]唐·胡安因为知道他要对已经发生的事负责而更加痛苦。在这一点上，他的幻想

并不比格朗弗勒更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这封激动、感人、承担他自己的错误，甚至还准备承担包括国王的错误在内[263]的别人的错误的信中觉察到。10月4日，他再次写信给他的兄弟。这次写信更多是告诉他的兄弟他自己的犹豫不决，而不是他的遗憾，而且还告诉他他已经草拟好的计划和他不再采取任何行动的最后决定。[264]的确，在冬天即将来临之际，正如他曾经考虑过的那样，试图对杰尔巴进行袭击，乃是最不明智审慎之举。假定在这段300里的航程中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这段航程中有200里不能停泊并且有季节变化带来的逆风），这也只不过是对土耳其获得的巨大胜利回报以一个小小的地区性的胜利而已。另一方面，返回突尼斯去把该地的4,000到5,000个土耳其人赶走，这样做难道是明智的吗？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只会是重复1573年的远征并再次招致同样的后果。他的结论是：只遵照国王的命令行事……唐·胡安现在已经变得何等谨慎小心啊！

由于天气恶劣，唐·胡安10月16日才再次抵达巴勒莫。他在西西里的这个首都找到胡安·德·索托，把他的国务会议的成员召集起来，征求他们对他可能采取的一次行动的意见。接着鉴于冬季即将来临，西西里的人力、物力已经枯竭，他认为在该岛等待国王的答复毫无意义。实际上，他只有一个愿望，即：返回西班牙再见到他的兄弟，向他解释。他经由最长的道路，即沿着海岸的道路，[265]继续前进，于10月29日到达那不勒斯。11月21日，他离开这个地方前往西班牙。[266]

地中海终于有了和平

在这个期间，土耳其舰队在没有受到惊扰拦阻的情况下，已经再次驶往君士坦丁堡。一个热那亚代理人说，这支舰队于11月15日抵达该港，共有帆桨战船247艘，其他舰船不计算在内。这次远征虽然表面看来十分成功，但造成了巨大损失。同一个代理人在报导一则即使并非毫不真实至少也肯定是夸大其词的传闻时写道[267]："1.5万名划桨手和士兵死于疾病，再加上5万名在拉古莱特和突尼斯丧生。"但是，不管怎样，损失几千个人的生命对庞大的土耳其帝国来说，只不过是在九牛身上拔去一毛而已，又有什么要紧呢？由于取得这次胜利，这个帝国又自豪起来。一份发自君士坦丁堡的公文急报说："他们对基督教徒的任何一座堡垒都毫不畏惧。"[268]当时，有哪一个预言家会预言这是土耳其舰队最后一次胜利返回君士坦丁堡港呢？

就在这个时刻，西班牙人在马德里和意大利面临土耳其的巨大威胁，感到异常绝望。身居战斗岗位的人如唐·胡安、泰拉诺瓦公爵、格朗弗勒是这样，手中有不计其数的政府公文经过的顾问们也是这样。因为胜利而骄傲自满的土耳其人现在还会有什么事不敢干呢？"军事副长官"佩德罗·德·伊巴拉写道："我以上帝的恩典的名义祈求，我以我主耶稣的血的名义祈求，愿土耳其人不在迦太基定居和筑垒设防。"[269]格朗弗勒亲笔写道："但愿人们发发慈悲，不要以那些总是声称能够办到不可能办到的事的人的意见作为行事的依据。但愿人们不要让帝国的臣民本身的负担重得使他们陷于极端绝望之中。我向陛下发誓，当我看见我们各地的情况时，如果我不用我自己的生命去寻求补救办法，我就不愿意看见我自己活

着。"但是，没有钱怎么办呢?海军军备竞赛无疑是十足的疯狂行为。"为了使自己占有优势，土耳其人以同等程度扩大了他们的力量。过去土耳最大的舰队有150艘帆桨战船。它无法使用这支舰队来运输足够的兵员(因为它的力量就在于数量)来实现宏伟的图谋。而现在它派出舰船300艘，载运大量军队，数量之多，任何堡垒都无法抵御……"[270]

在罗马，格里高利十三世情绪激动，试图再次把威尼斯拉进联盟。这样做当然徒劳无益。[271]在马德里传闻西班牙国王为了更好地对付土耳其人将前往巴塞罗那，并从该地转赴意大利。[272]这的确是罗马经常提出的建议。1574年9月16日，[273]国务会议讨论是否放弃奥兰。国王把这个问题交给军事委员会进行初审。1574年12月23日，奉派在奥兰完成使命的韦斯帕西亚诺·贡扎加写了一份很好的、在结论中建议撤出要塞、建议西班牙人撤到唯一的据点米尔斯克比尔[274]去的报告。关于梅利利亚的问题，似乎已经进行过同样的调查研究。热那亚大使对被派往马略卡的军事工程师伊尔·弗拉蒂诺谈到一项使命。[275]所有这些面对伊斯兰世界的堡垒全都又经过一次深入细致的检查，因为恐惧又使人提高了警惕，也使人谨慎小心起来。12月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订了一项为期8年的和约。在这期间，葡萄牙的年轻国王D. 塞巴斯蒂安在远西地区视察了海峡的驻防地之后，放弃对谢里夫的进攻。[276]西班牙面对东方的敌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继续谈论进攻比塞大、法里纳港和阿尔及尔等地的计划。但是，圣古阿尔在1574年11月26日报导这些传闻中的一则时声称："当我看见时，我就相信"……[277]

这就是勒班陀战役结束三年后西班牙的情况。如果说胜利"没

有用处”，那么，错误更应该归咎于西班牙的不稳定平衡，归咎于这个不适当地以内海为中心的兵力配置体系，而不应该归咎于人。在这个1574年的年末，西班牙的政治家们无暇顾及地中海，甚至无暇弥补突尼斯的灾难。在唐·胡安的伦巴第之行后，有人建议他作荷兰之行。圣古阿尔对马德里的闲谈琐闻总是注意倾听。10月23日，他写道[278]：“我听说，他们建议：如果拉古莱特得救，如果土耳其人不展开规模更大的进攻，就让唐·胡安率领1.8万名意大利士兵前往佛兰德。但是，如果土耳其人攻下拉古莱特，唐·胡安肯定会推翻他们的计划。”拉古莱特已被攻占，但是，唐·胡安仍然前往荷兰。

奇怪的是：对基督教徒来说，如果说勒班陀战役没有任何用处可言的话，那么，土耳其在突尼斯的胜利也没有什么决定性意义。O. 德·托尔内在他那本有文献资料作为依据的关于奥地利的唐·胡安的书中，以他惯有的精确性叙述了1754年的灾难，然后试图短暂地摆脱只叙述事件的历史的束缚限制。他指出：“土耳其人1574年在突尼斯取得的胜利，是奥斯曼政权在急剧衰落以前取得的最后一个辉煌的胜利。如果唐·胡安几年以后远征非洲，突尼斯可能留在西班牙人手中，他就可以振振有词地反对那些劝阻国王保存这块被征服的土地的人。”甚至土耳其的海上衰落（我指海上）猛然加快，如果说这不是出现于1574年之后，至少也是出现于1580年之后。这是事实。而且，这种衰落来得迅速突然。勒班陀战役肯定不是导致这次衰落的直接原因，虽然对于一个其资源只在历史学家的想象中，只在欧洲的忧虑不安或者只在土耳其的狂言自吹中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帝国来说，这次打击也是可怕的。摧毁了奥斯曼海军的是长期闲散无事的状态，是地中海的和平。当我们日复

一日只注意到发生的事件的连贯性而没有预见到和平的时候，我们却到了和平的门槛。突然地中海的这两头政治巨兽：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里暂时采用兰克的说法）放弃了斗争。这难道是因为地中海已不再是一笔数额够大的赌注吗？这难道是因为它变得太有抵抗战争的能力以致战争不像在巴巴罗萨时代，不像在这个因满载掳获物而变得沉重、累赘的土耳其大舰队的黄金时代那样有利可图吗？不管原因何在，这一点却是事实：这两个帝国单独一个对一个地留在地中海的封闭的比武场内，以后将不再极其盲目地、非常激烈地对抗。勒班陀战役没有完全做成功的事，被和平在几年之内做成功了。和平消灭了土耳其的舰队。这个脆弱的工具不再使用，不再更新，不再维修，就必然会自行消亡。不再有可供雇佣的水手，不再有坐在长凳上的划桨手。帆桨战船的躯体在海军造船厂厂房的拱穹下朽坏。

但是，像托尔内那样认为唐·胡安错过他一生中的大好时机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西班牙不丢弃地中海，土耳其就会在那里维持它的军事努力。是这两个敌手的互相离弃造成了这个世纪末的和平或者假和平。如果说西班牙在北非失掉一个机会的话，在我看来（在人们能够在重写历史时发表看法的这个范围内）这个机会是在16世纪开始时，而不是在紧接勒班陀战役之后的那几年里失掉的。这可能是因为西班牙那时到达了美洲，所以不在非洲的土地上进行一场新的格拉纳达战争，因而背叛了昨天被人称为它的“历史”使命而今天被人用更新的用语称为它的“地理”使命的事物。如果有什么罪人的话，罪人就是天主教徒费迪南而不是菲利普二世，更不是奥地利的唐·胡安。但是，所有这些相当空洞无物的官司都有

待人们为之辩护。明天的研究政治变化的历史学家，将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些讼案并可能使之具有某种意义。

本部分原注

1. L. SERRANO, *op. cit.*, I, p. 86 et note 2.

2. Silva au roi, Venise, 21 avril 1571, Simancas E° 1329; le même au même, 21 juin 1571, *ibid*, ; Relatione sull'Impero Ottomano di Jacopo Ragazzoni, 16 août 1571, ALBÈRI, *Relazioni*... III, 2. p. 372 et *sq*.

3. Les Commissaires au roi, Rome 8 sept. 1570, L. SERRANO, *op. cit.*, IV, p. 6.

4. Un projet contre Bizerte et Tunis, Pescaire au roi, Palerme, 20 mars 1571, Simancas E°487.

5. Démarches vénitiennes à ce sujet dès 1570, vice-coi de Naples au roi, 4 févr. 1571, Simancas E° 1059, f° 178. Ordre a été donné de fournir du blé à l'armada vénitienne qui hiverne à Candie. Sur la question complexe des subsistances, D. J. de Çuñiga au duc d'Albe, 17 juil. 1571, Simancas E°1058, f°81.

6. Texte original en latin, L. SERRANO. *op. cit.*, IV, p. 299 et sq. Traduction espagnole, B. N., Madrid, Ms. 10454, f°84; texte encore dans D. DUMONT, *Corps universel diplomatique*, V, p. 203 et *sq.*; Simancas Patronato Real n°1660, 25 mai 1571; H. KRETSCHMAYR, *Geschichte von Venedig*, *op. cit.*, III, p. 59; L. VOINOVITCH, *op. cit.*, p. 3; cardinal de Rambouillet à Charles IX, Rome, 21 mai 1571,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149-150.

7. *Relatione fatta alla maestà Cattolica, in Madrid, alli XV di Luglio 1571, di tutta la spesa ordinaria che correrà per la lega in 200 galere, 100 navi et 50 mila fanti ogn'anno*, Rome, s. d., in-4°, B. N., Paris, Oc. 1533.

8. D. F. de Alava à Philippe II, Poissy, 5 août 1570, A, N., K 1516, B 27, n°55.

9. 28 août 1570, B. N., Paris, Fr. 23 377, copie.

10. Julian Lopez au roi, Venise, 10 août 1570, Simancas E°1327.

11. Le comte de Monteagudo au roi, Spire, 30 oct. 1574, *CODOIN*, CX, p. 98-110.

12. Optimisme du pape, le cardinal de Rambouillet au roi, Rome, 4 déc.

1570, B. N., Paris, Fr. 17989; son découragement, le même au même, 19 déc., *ibid.*, copie.

13. Nobili au grand-duc, Madrid, 22 janv. 1571,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903.

14. Nobili et del Caccia au prince, Madrid, 12 avril-14 juin 1571 *ibid.*, F. HARTLAUB, *op. cit.*, p. 71.

15. Ainsi mémoire du 15 févr. 1571, adressé à Fourquevaux, Célestin DOUAIS, *Lettres à M. de Fourquevaux... 1565-1572*, 1897, p. 314-343.

16. Abel DESJARDINS, *Neg. diplomatiques avec la Toscane*, 1859-1886, III, p. 655 et *sq.*; 10 mai, *ibid.*, p. 669.

17. F. de Alava à D. J. de Çuñiga, 24 juin 1571, au sujet de Coligny et de Téligny, A. N., K 1520, B 29, n°24.

18.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 Naples, 3 mars 1571, Simancas E° 1059, f°60.

19. Son instruction, Madrid, 29 janv. 1571, A. N., K 1523, B 23, n°51.

20. Philippe II à Alava, Madrid, 30 juin 1571, *ibid.*; Nobili et del Caccia au prince, Madrid, 30 juin 1571,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903.

21. Response du duc d'Albe au Sr de Mondoucet, B. N., Paris, Fr. 16127, F^{os} 3 et 4 (non publiée par L. DIDIER, dont le recueil commence en 1571).

22. Paul HERRE, *op. cit.*, p. 163, note 1.

23. Nobili au prince, Madrid, 31 mars 1571,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903.

24. Note d'Antonio Perez, Madrid, 8 mai 1571, A. N., K 1521, 830, n°56.

25. A. N., K 1521, B 20, n°58.

26. Le coupable, c'est Alonso de la Cueva, duc d'Albuquerque, il a agi sans ordre du roi diront les ambassadeurs aux Français si ceux-ci se plaignent: Çayas à F. de Alava, Madrid, 16 mai 1571, A. N., K 1523, B 31, n°75. De même, 31 mai 1571, FOURQUEVAUX, *op. cit.*, II, p. 355, "On ne souffle mot de Final dans cette Cour... ", F, de Alava au roi, 1er juin 1571, A, N., K 1520, B. 29, n°2.

27. Nobili et del Caccia au prince, Madrid, 10 mai 1571, Mediceo 4903.

28. F. de Alava au duc d'Albuquerque, Paris, 27 avril 1571, A. N., K 1519, B 29, n°69.

29. *I, ibid.*

30. Philippe II à D. F. de Alava, 17 avril 1571, A. N., K 1523, B. 31, n° 67.

31. F. de Alava au duc d'Albuquerque, Paris, 17 mai 1671, A. N., K 1521, B 30, n°68.

32. Le même au même, 27 avril 1571, *ibid.*, n°69.

33. Nobili et del Caccia, Madrid, 16 avril-6 juin 1571,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903; Philippe II à Granvelle, S. Laurent, 13 Juin 1571, Simancas E° 1059, f°13; F. de Alava à Philippe II, Paris 26 juin 1571, A. N., K 1520, B 29, n°31. Un crédit de 150 000 écus du grand duc de Toscane à Ludovic de Nassau sur Francfort? F. de Alava au roi, 4-9 août 1571. A. N., K 1519, B 29, n° 69.

34. F. de Alava au roi, Paris 1er juin 1571, A. N., K 1520, B 29, n°2.

35. L'évêque de Dax à Charles IX, Lyon, 26 juill. 1571,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161-164. B. N., Pairs, Fr. 16170, fos 9-11, copie.

36.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178.

37. Le roi à la Sie de Venise, 23 mai 1571, B. N., Paris, Fr. 16170, fos 4-5, copie.

38. Francés de Alava à Çayas, "Lubier", 19 juin 1571, A. N., K 1520, B 29, n°12.

39. Le même au duc d'Albe, Louviers, 25 juin 1571, *ibid.*, n°20.

40. 17 août 1571, FOURQUEVAUX, *op. cit.*, II, p. 371.

41. Le duc d'Albe à Alava, Anvers, 11 juill. 1571, orig. en fransais, A. N., K 1522, B 30. n°16 a.

42. Le même au même, Bruxelles, 7 juin 1571, A. N., K 1520, B 29, n°6.

43. Nobili au prince, Madrid, 2 août 1571,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903.

44. L. SERRANO, *Correspondencia*, I, p. 102.

45. Fourquevaux à la reine, Madrid, 18 févr. 1571, *op. cit.*, II, p. 331.

46. Au roi, Palerme, 20 mars 1571, Simancas E° 187; la récolte a été bonne en Sicile, Raguse, 28 mai 1570, A. de Raguse, L. P., 2, fos 97 et 98.

47. Nobili et del Caccia, 16 avr. 1571,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903.

48. Santa Cruz au roi, 1er mai-2 mai 1571, Simancas E° 106, fos 81 et 82.

49. Le même au même, deux lettres du 17 mai 1571, *ibid.*, fos 83 et 84.

50. Don Juan à Ruy Gomez, *CODOIN*, XXVIII, p. 157.

51. Erwin MAYER-LÖWENSCHWERDT, *Der Aufenthalt der*

Erzherzöge Rudolf und Ernst in Spanien, 1564-1571, Vienne, 1927.

52. Simancas E°1059, f°129. Le duc d'Alcala, mort le 2 avr. 1571, Simancas E°1059, f°84. Sur la mission provisoire du cardinal Granvelle, nombre de papiers et notamment 10 mai 1571, Mediceo 4903; avis d'Espagne, 31 mai 1571, FOURQUEVAUX, *op. cit.*, II, p. 355; *CODOIN*, XXIII, p. 288. N. NICCOLINI, "La città di Napoli nell'anno della battaglia di Lepanto", *in*: *Archivio storico per le provincie napoletane, nouvelle, série*, t. XIV, 1928, p. 394.

53. Nobili et del Caccia au prince, Madird, 6 Juin 1571, Mediceo 4903.

54. L. van DER ESSEN, *Alexandre Farnèse, op. cit.*, I, p. 161.

55. Simancas E°1134.

56. *Op. cit.*, p. 79.

57. *Ibid.*, p. 78, note 2.

58. *CODOIN*, III, p. 187.

59. Erwin MAYER-LÖWENSCHWERDT, *op. cit.*, p. 39.

60. *Ibid.*, p. 40; *Res Gestae...*, I, p. 97.

61. Pour L. van DER ESSEN, *op. cit.*, I, p. 162, départ le 1er août.

62. Padilla à Antonio Pérez, Naples, 15 août 1571, reçue le 12 sept. Simancas E°1059, f°91.

63. L. van DER ESSEN, *op. cit.*, I, p. 163, dit nuit du 22; Juan de Soto à D. Garcia de Toledo, 21 août 1571, Don Juan est encore à Naples, *CODOIN*, XXVII, p. 162.

64. Don Juan à Don Garcia de Toledo, Messine, 25 août 1571, *CODOIN*, III, p. 15; L. van DER ESSEN, *op, cit.*, I, p. 163, dit le 23.

65. A D. Luis de Requesens, Pise, 1er août 1571, *CODOIN*, III, p. 8.

66. Corfou, 3 févr. 1571, Simancas E°1059, f°62.

67. Corfou, 29 mars 1571, avis reçu à Venise le 11 avr. 1571. Simancas E°1060, f°13.

68. Const., 10 avr. 1571, *ibid.*, f°125.

69. Messine, 23 avril 1571, *ibid.*, f°11.

70. Corfou, 27 avril 1571, Simancas E°1095, f°56.

71. Const., 5 mai 1571, retransmis par Corfou (encore des captifs évadés), Simancas E°1060, f°133.

72. Négrepont, 3 juin 1571, *ibid.*, f°137.

73. L. VOINOVITCH, *op, cit.*, p. 39.

74. G. de Silva à Philippe II, Venise, 6 juill. 1571, Simancas E°1329.

75. F. de Alava au roi, Melun, 1[er] août 1571, A. N., K 1520, B 29, n°37; 60 galères perdues: Nobili au prince, Madrid, 2 août 1571, Mediceo 4903.

76. L. VOINOVITCH, *op. cit.*, p. 40.

77. *Ibid.*, p. 41.

78. Granvelle à Philippe II, 20 sept. 1571, Simancas E°1060, f[os] 57 et 58. En Calabre et à Bari.

79. Don Juan d'Autriche à D. G. de Toledo, Messine, 30 août 1571, *CODOIN*, III, p. 17.

80. Sur le sujet, une immense littérature, d'innombrables témoignages, de non moins innombrables ouvrages d'histoire. Mais ces derniers sont peu précis, et pour ainsi dire jamais impartiaux. Lépante est-elle une victoire espagnole? vénitienne, voire italienne? Quelques témoignages: Ferrante CARACCIOLO, *I commentarii delle guerre fatte co'Turchi da D. G. d'Austria dopo che venne in Italia*, Florence, 1581. *Discurso sobre la vit[a] naral sacada de la armada truquesca traduzido del toscano en sp[ol]*, A. E. Esp. 236, f[os] 51-53, *Relatione della vittoria navale christiana contro li Turchi al 1571, scritta dal Sign[r] Marco Antonio Colonna alla Santità di N[ro] Sign[r] Pio V. con alcune mie* (de Francesco Gondola ambassadeur ragusain à Rome) *aggionte ad perpetuam memoriam*, p. p. L. VOINOVITCH, p. 107-112. *Relacion de lo succedido al armada desde los 30 del mes de setiembre hasta los 10 de octubre de 1571, f[os] 168-169*; *Relacion de lo succedido a la armada de la Santa Liga desde los 10 de octubre hasta los veynte cinco del mismo* f[os] 169-171, B. N., Madrid M[SS] 1750. La liste des ouvrages historiques dans L. SERRANO, Alonso SANCHEZ, ou dans G. HARTLAUB. Ne pas oublier: Guido Antonio QUARTI, *Lepanto*, Milan, 1930.

81. Las causas que movieron el S[or] Don Juan para dar la batalla de Lepanto (1571). B. N., Madrid M[ss] 11268/35.

82. *Ponentinas* ne veut pas dire, comme le pense F. HARTLAUB, *op. cit.*, p. 182, espagnoles, sans plus.

83. A ce sujet les considérations de Granvelle au roi, Naples 26 mai 1571, Simancas E°1060, f°30, ont l'avantage d'être antérieures à la rencontre.

84. Nobili et del Caccia au prince, Madrid, 24 déc. 1571,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903; L. VOINOVITCH, *op. cit.*, p. 42.

85. G. de Silva au roi, Venise, 19 oct. 1571, Simancas E°1329. Cf. B. N., Paris, Ital. 427, f[os] 325-333. F. de Alava au roi, 2 août 1571, A. N., K 1520, B

29,n°38;L. VOINOVITCH,*op. cit.* ,p. 102.

86. H. KRETSCHMAYR,*op. cit.* ,III,p. 69.

87. Ainsi H. WÄTJEN,*Die Niederländer im Mittelmeergebiet*,*op. cit.* , p. 9;H,KRETSCHMAYR,*op. cit.* ,III,pp. 75 et *sq.* ;L. SERRANO,*op. cit.* , I,p. 140-141.

88. Au duc d'Anjou,Venise,4 nov. 1571,B. N. ,Paris Fr. 16170,f[os]57 à 59,copie.

89. Henri DELMAS de GRAMMONT,*Relations entre la France et la Régence d'Alger au XVII[e] s.* ,I,p. 2 et note 2.

90. L. PFANDL,*Philippe II*. p. 366-367.

91. Je laisse de côté l'inutile campagne diplomatique dans ce sens,à Vienne,en Pologne,à Moscou,à Lisbonne,en place dès 1570,voir le livre de Paul HERRE,*op. cit.* ,pp. 139 et *sq.* ,même les curieuses tractations de Rome en Moscovie (PIERLING S. J. ,*Rome et Moscou*, *1547-1579*,Paris,1883:*Un nonce du Pape en Moscovie*,*Préliminaires de la trêve de 1582*,Pairs,1884). Sur le refus ferme du Portugal en 1573:*Le cause per le quali il Sermo Re di Portugallo nro Sig[re]*... A. Vaticanes,Spagna,7. f[os]161-162. En avril 1571,le tribut impérial a été payé au Turc,F. HARTLAUB,*op. cit.* ,p. 69;cardinal de Rambouillet,Rome,7 mai 1571,E. CHARRIÈRE,*op. cit.* ,III,pp. 148-149. L'empereur ne peut agir sans l'aide du roi de Pologne(Michiel et Soranzo au doge,Vienne,18 déc. 1571,P. HERRE,*op. cit.* ,p. 154). Du moins,il le dit à l'ambassadeur de Pologne: *Ohne Euch kann man nichts tun*,et l'autre de répondre:*Und wir wollen ohne Eur. Majestät nichts tun*. Nobili au prince, Madrid,18 nov. 1571,Mediceo 4903,a su de bonne source que l'empereur, pas prêt,ne peut intervenir cette année,En gros il y aura eu deux tentatives poussées ,insistantes pour le moins,sur le plan diplomatique,l'une en 1570 alors que les jeux ne sont pas faits,l'autre avec le début du pontificat de Grégoire XIII(mission,d'Ormaneto en Espagne,de l'archevêque de Lanciano au Portugal...).

92. Énorme documentation à ce sujet à Simancas,dont O. DE TÖNE donne une bonne esquisse,*op. cit.* ,I,pp. III et *sq.* Arrivée d'un ambassadeur en Espagne,Coban,*CODOIN*,XC,p. 464 et *sq*;Nobili et del Caccia Madrid, 10 mai 1571,Mediceo 4903.

93. Argent emprunté puis non utilisé,voir *supra*,I,p. 441.

94. G. de Silva à Philippe II. Venise,25 ou 26 nov. 1571,Simancas E°

1329.

95. Requesens à Philippe II (8 déc. 1571), A. E, Esp. 236, f° 132; FOURQUEVAUX, *op. cit.*, II, p. 243. passage de soldats à travers les Alpes; F. de Alava au duc d'Albuquerque, Paris, 27 avr. 1571, A. N., K 1519, B 29, n°69.

96.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245 en note; B. N., Paris, Fr. 16170, f°70 et *sq*.

97. H. FORNERON, *Histoire de Philippe II*, II, p. 304 et *sq*.

98. *Op. cit.*, I, p. 228 et *sq*, et surtout p. 228, note 2.

99. 31 janv. 1571, *CODOIN*, XXXV, p. 521 (101 *bis*), A. N., K 1535, B 35, n°10 *bis*; Catherine de Médicis à la reine d'Angleterre, 22 avr. 1572, comte Hector de LA FERRIÈRE, *Lettres de Catherine de Médicis*, 1885, IV, pp. 97 et 98.

100. G. de Spes, Cantorbery, 7 janv. 1572, *CODOIN*, XC, p. 551.

101. Cavalli à la S^ie de Venise, Blois, 24 févr. 1572, *C. S. P. Venetian*, VII, p. 484.

102. Articles de la ligue défensive conclue entre le roi de France et la reine d'Angleterre, 19 avril 1572, A. N., K 1531, B. 35, n°10 *bis*.

103. Aguilon au duc d'Albe, Blois, 8 mars 1572, A. N., K 1526, B 32, n° 6.

104. Saint-Gouard au roi de France, Madrid, 14 avr. 1572, B. N., Paris, Fr 1640, f^os 16 à 18.

105. G. de Silva au roi, Venise, 22 mai 1572, Simancas E°1331.

106. Son instruction, 31 mars 1572, A. N., K 1529, B 34, f^os 33 et 34.

107. Blois, 16 mars 1572, A. N., K 1526, B 32, n°19.

108. Walsingham à lord Burgley, 22 avr. 1572, H. de LA FERRIÈRE, *op. cit.*, IV, p. 98, note 1; Sir Francis de WALSINGHAM, *Mémoires et Instructions pour les ambassadeurs*, Amsterdam, 1700, p. 217.

109. Où allait la flotte? Ch. de LA RONCIÈRE, *H. de la Marine française*, 1934, p. 68, affirme: vers "les Antilles, la Guinée, la Floride, Nombre de Dios, l'Algérie (*sic*)". Cette flotte sera utilisée à bloquer La Rochelle pendant la quatrième guerre de religion.

110. II, p. 241.

111. Le duc d'Albe au Secrétaire Pedro d'Aguilón, Bruxelles, 19 mars 1572, A. N., K 1526, B 32, n°15. Indique aussi les entretiens d'Aguilón avec

l'ambassadeur de Portugal.

112. Saint-Gouard au roi, 14 avr. 1572, B. N. , Paris, Fr. 1610, f^{os} 22 et 23; Aguilón au duc d'Albe, Blois, 26 avr. 1572, A. N. , K 1526, B 37, n°57.

113. Francisco de Yvarra au roi, Marseille, 26 avr. 1572, Simancas E° 334.

114. Aranjuez, 10 mai 1572, A. N. , K 1528, B 35, n°48.

115. Çayas à Diego de Çuñiga, Madrid, 20 mai 1572, A. N. , K 1529, B 34, n°54.

116. FOURQUEVAUX, *op. cit.* , II, p. 309.

117. Aguilón au duc d'Albe, Blois, 3 mai 1572, A. N. , K 1526, B 32, n° 69.

118. Le duc d'Albe au roi, 27 avr. 1572, copie A. N. , K 1528, B 33, n°43.

119. Mémoire et propositions de l'ambassadeur Saint-Gouard à Philippe II, avr. 1572, A. N. , K 1529, B 34, n°44(tr. esp.). Autres menus incidents, Saint-Gouard à Catherine de Médicis, autogr. , Madrid, 14 avr. 1572, B. N. , Paris, Fr. 16104, f^{os}22-23; H. FORNERON, *op. cit.* , II, p. 302.

120. C. PEREYRA, *Imperio*... p. 170; G. de Spes au roi, Bruxelles, 15 avr. 1572, *Codoin*, XC, pp. 563-564. Mondoucet au roi, Bruxelles, 27 avr. 1572, orig. B. N. , Paris, Fr. 16127, désarroi du duc d'Albe. Le joli témoignage d'Antonio de Guaras au duc d'Albe, Londres, 18 mai 1572, *CODOIN*, XC, pp. 18-19, H. PIRENNE, *Histoire de la Belgique*, IV, pp. 29 et *sq.* ; Mondoucet au roi, Bruxelles, 29 avril 1572, B. N. , Paris, Fr. 16127, f° 43; Aguilón au duc d'Albe, Blois 2 mai 1572, A. N. , K 1526, B 32.

121. Voir note précédente, *CODOIN*, XC.

122. Mondoucet à Charles IX, Bruxelles, 29 avr. 1572, B. N. , Paris, Fr. 16127, f°43 et *sq.*

123. Aguilón au duc d'Albe, Blois, 2 mai 1572, A. N. , K 1526, B 32.

124. H. PIRENNE, *op. cit.* , IV, p. 31-32; *CODOIN*, LXXV, p. 41; H. FORNERON, *op. cit.* , II, p. 312.

125. H. PIRENNE, *op. cit.* , p. 31.

126. R. B. MERRIMAN, *op. cit.* , IV, p. 294.

127. Nobili et del Caccia, Madrid, 19 mai 1572,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903.

128. Au roi, Madrid, 21 mai 1572, B. N. , Pairs, Fr. 1604, f^{os}58 et *sq.*

129. Nobili et del Caccia au prince, Madrid, 19 mai 1572, A. d. S. Flo-

rence，Mediceo 4903.

130. D. Diego de Cuñiga au duc d'Albe，24 mai 1572，A. N.，K 1529，B 34，n°96 *a*，copie.

131. 18 mai 1572，A. d. S. Gênes，L. M. Spagna，5-2. 414.

132. Il arrivera à l'Écluse le 11 juin 1572，Medina Celi au roi，l'Écluse，11 juin 1572，*CODOIN*，XXXVI，p. 25.

133. Saint-Gouard au roi，Madrid，31 mai 1572，B. N.，Paris，Fr. 1604，f^{os} 75 et *sq*. Autres bruits：la flotte française irait sur les Indes "... et encore hier ce propos fust tenu chez le duc de Sesa..."，*ibid*. En France，les chemins encombrés de soldats. A. Bordeaux，une grosse flotte dont 14 navires de 600 tonnes，20 juin 1572，A. N.，K 1529，B 34，n°9.

134. Saint-Gouard au roi，Madrid，21 mai 1572，B. N.，Paris，Fr. 1604，f^{os} 58 et *sq*.

135. 24 mai 1572，voir note 2，ci-dessus.

136. A Sauli，6 juin 1572，A. d. S. Gênes，L. M. Spagna，6. 2415.

137. Le roi à l'évêque de Dax，11 mai 1572，B. N.，Paris，Fr. 16170，f°122 et *sq*. E. CHARRIÈRE，*op. cit.*，III，p. 291 en note.

138. Eugène PLANTET，*Les consuls de France à Alger*，1930，p. 9.

139. L. SERRANO，*op. cit.*，IV，p. 516-517.

140. *Ibid.*，I，p. 226；F. HARTLAUB，*op. cit.*，p. 56.

141. Pierre CHAMPION，*Paris au temps des guerres de religion*，1938，p. 198.

142. E. LAVISSE，*Hist. de France*，VI，1，p. 122.

143. *Lo que el embassador de Francia dixo a Su Mag^{d} en S. Lorenzo*，A. N.，K 1529，B 29，n°83. De même à ce sujet la lettre de Giulio del Caccia au prince，Madrid，19 juin 1572，A. d. S. Florence，Mediceo 4903，ou celle de Sauli à sa République，Madrid，4 juil. 1572，A. d. S. Gênes，L. M. Spagna，5. 2414.

144. 28 juin 1572，A. N.，K 1529，B 34，n°100.

145. *Relacion de lo que el S^{o} Çayas passo con el embassador de Francia，Viernes primero de agosto* 1572，A. N.，K 1530，B 34，n°2.

146. C^{te} H. de LA FERRIÈRE，*op. cit.*，IV，p. 104，note 1.

147. *Ibid.*，p. 106，note 2；B. N.，Paris，Fr. 16039，f°457 v°.

148. Diego de Çuñiga au duc d'Albe，Paris，27 juin 1572，A. N.，K 1529，B 34，n°78.

149. G. del Caccia au prince, Madrid, 30 juin 1572,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903.

150. *Ibid.*, "*cosi tutti* (les courriers) *sono venuti per acqua*".

151. *CODOIN*, CXXV, p. 56.

152. D. de Çuñiga au duc d'Albe, Paris, 17 juil. 1572, A. N., K 1529, B 34 n°128.

153. Le même à Philippe II, Paris, 10 août 1572, A. N., K 1530, B 34, n° 13.

154. Le même au duc d'Albe, 13 août, *ibid.*, n°15, copie.

155. Vérité pour l'Espagne, vérité pour l'Italie, celle-ci établie depuis longtemps. Edgar BOUTARIC, *La Saint-Barthélemy d'après les archives du Vatican*, *Bibl. de l'Ec. des Chartes*, 23e année, t. III, 5e série, 1862, p. 1-27; Lucien ROMIER "La Saint-Barthélemy, les événements de Rome et la préméditation du massacre", *in*: *Revue du XVIe siècle*, 1893; E. VACANDARD, "Les papes et la Saint-Barthélemy" *in*: *Études de critique et d'hist. religieuse*, 1905.

156. Les commissaires au roi, Rome, 12 déc. 1572, L. SERRANO, *op. cit.*, IV, p. 351.

157. *Ibid.*, IV, p. 656-659.

158. *Ibid.*, p. 657.

159. Granvelle à D. J. de Çuñiga, Naples, 20 mars 1572, Simancas E° 1061, f°16.

160. D. Juan au grand commandeur de Castille, Messine, 27 janv. 1572, Simancas E°1138; le même au même, 1572, *ibid.* Sur le séjour de D. Juan à Palerme, 8 févr., 17 avril, je suis les indications de Palmerini, B. Com. de Palerme, Qq D. 84.

161. Don Juan au grand com. de Castille, 14 févr. 1572, voir note précédente.

162. Le même à Granvelle, Palerme, 14 févr. 1572, Simancas E°1061, f° 11.

163. Granvelle à D. Juan, Naples, 21 févr. 1572, *ibid.*, f°s12, 13, 14, copie.

164. Don Juan au grand commandeur de Castille, Palerme, 2 mars 1572, Simancas E°1138.

165. L. SERRANO. *op. cit.*, I, p. 180, note 2.

166. Don Juan d'Autriche à Philippe II, Palerme, 17 mars 1572. Siman-

cas E°1138,aut. L. SERRANO,*op. cit.*,I,p. 180,dit le 18 mars.

167. Henry BIAUDET,*Le Saint-Siège et la Suède durant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1906,I,p. 181. Le duc de Florence à Philippe II,Pise,3 mai 1572:condoléances au sujet de la mort du pape. offre 11 galères, 2 galéasses *cono estava obligado à S. S.*,résumé espagnol,Simancas E°1458. Sauli à Gènes,Madrid,18 mai 1572,A. d. S. Gênes,L. M. Spagna 5. 2414:*La morte di S. Sta dispiace a tutti universalmte et a S. Mta forse più che a niun altro.* Nobili et del Caccia au prince,madrid,19 mai 1572,Mediceo 4903:"La Ligue aura bien perdu de sa vigueur avec la mort de ce saint homme".

168. R. RONETZKE,*Geschichte Spaniens...* p. 181. souligne la réalité du prétexte français. Pour L. PFANDL,*Philippe II.* p. 377-378,qui n'examine pas les faits de près,l'essentiel a été de rabaisser Don Juan.

169. Don Fadrique,le fils du duc d'Albe,le 15 avril,affectait encore de rire des événements de l'île Walcheren,H. PIRENNE,*op. cit.*,IV,p. 31.

170. Il faut rejeter la thèse de Gonzalo de ILLESCAS,*Historia pontifical y catolica*,Salamanque,1573,2^e partie,p. 358 et *sq.* Les alliés pour partir dans le Levant auraient attendu la nouvelle de la Saint-Barthélemy.

171. 21 avril 1572,B. N.,Paris,Fr. 3604,f^os 58 et *sq.*

172. Philippe II à Don Juan de Çuñiga, Saint-Laurent, 2 juin 1572, Simancas E°920,f^os 95-98.

173. Et non pas les menées françaises—tractations avec Alger dont jadis BERBRUGGER a tiré un article, "Les Algériens demandent un Roi français",*in*:*Rev. Afric.*,1861,p. 1-13—ou nos armements:le 12 févr.,seule une ligne de FOURQUEVAUX(*op. cit.*,II,p. 421.)mentionne 24 galères françaises à Marseille(mais que peut valoir ce chiffre?). Quant à la flotte que Paulin de la Guarde doit conduire de l'Océan en Méditerranée,elle se compose de deux grandes galées,quatre petites,deux brigantins et se trouve encore à Bordeaux le 28 juin,le baron de la Guarde à Saint-Gouard,Bordeaux, 28 juin 1572,cop. tr. espagn. A. N.,K 1529,B 34,n°103.

174. Voir *supra*,I,p. 329 et note 4.

175. L. SERRANO,*op. cit.*,I,p. 363.

176. Granvelle à Philippe II,29 août 1572,Simancas E°1061;L. SERRANO,*op. cit.*,II,p. 70,note. 2.

177. H. Kretschmayr,*op. cit.*,III,pp. 342 et *sq.*

178. L. Serrano. *op. cit.*,II,p. 32.

179. Don Quichotte, I, XXXIX.

180. *Op. cit.*, p. 170.

181. F. HARTLAUB, *op. cit.*, p. 156.

182. Sessa au roi, 24 oct. 1572, Simancas E°458, cité par L. SERRANO, *op. cit.*, II, p. 147.

183. L. SERRANO, *ibid.*

184. Pour tous les détails de ce paragraphe, je me suis appuyé sur le récit minutieux de L. Serrano.

185. Granvelle à Philippe II, Naples, 8 oct. 1572, Simancas E°1061, f°65.

186. Mondoucet au roi, 29 sept. 1572 et Saint-Gouard, 7 nov. 1572, L. DIDIER, *op. cit.*, I, p. 52 et note 2; G. del Caccia au prince, Madrid, 20 sept. 1572,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903. Le cardinal a eu des fièvres lentes. Très robuste, gros mangeur et grand buveur *in due hore l'aggravò il male per un catarro che lo suffocò* ...

187. Monteagudo à Philippe II, Vienne, 20 juil. 1572, *CODOIN*, CX, p. 483-489, H. BIAUDET, *op. cit.*, p. 178.

188. Charles IX à l'évêque de Dax, Paris, 17 sept. 1572,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303-309.

189. Jean Auzanet, *La vie de Camoëns*, Paris, 1942, p. 208.

190. L. SERRANO. *op. cit.*, II, p. 296, note 1.

191. Réclamation ainsi de Cattaro, *ibid.*, II, p. 303.

192. *Ibid.*, p. 311.

193. Elle ne sera paix définitive qu'en 1574, d'où ce libellé au Ms Ital 2117(B. N., Paris). *Relatione del Turco doppo la pace conclusa con la Signoria di Venetia l'anno 1574.* Sur cette paix lente à se conclure, G. de Silve à Philippe II, Venise 6 févr, 1574 (information ragusaine), Simancas E°1333; le même au même, 13 févr. 1574, *ibid.*; le même au même, 12 mars 1574, *ibid*; le même au même 16 mars 1574, *ibid.*; D. J. de Çuñiga à Philippe II, Rome, 18 mars 1574, *CODOIN*, XXVIII, p. 185. Les jurats de Messine à Philippe II, 30 mars 1574, Simancas E°1142; en avril 1574, Philippe II, sur les instances de la Papauté, offre l'appui de sa flotte au cas où les Turcs attaqueraient Zante ou Corfou Philippe II, à G. de Silva, S. Lorenzo, 5 avril 1574, Simancas E°1333, mais à condition, précisait le roi, que les Français ne rompent pas. On revenait en imagination à l'été de 1572. Paix provisoire que celle du 7 mars, à ce sujet, 12 mars 1574, E°1333; 16 mars 1574, *ibid*; *CODOIN*, XXVIII, p. 185; 30 mars

1574, Simancas E°1142.

194. Le mécontentement du duc d'Albe, à l'annonce de cette paix, Mondoucet au roi, 17 juil. 1573, L. DIDIER, *op. cit.*, I, p. 329.

195. D'après la lettre de Philippe II au duc de Terranova, S. Lorenzo, 20 juin 1573, Simancas E°1140.

196. Le roi résumé ce rapport dans la lettre indiquée à la note précédente.

197. La question indiquée par la lettre de l'archevêque de Lanciano au cardinal de Côme, Madrid, 24 janv. 1573, A. Vatic. Spagna, n°7, f° 10-11; et celle de l'évêque de Padoue au même, 25 janv. 1573, *ibid.*, f°22.

198. Rapport de Juan Curenzi, envoyé par Granvelle à Constantinople, dont il est de retour le 30 juin 1573, Simancas E°1063, f°35.

199. Philippe de CANAYE, *op. cit.*, p. 158.

200. Au témoignage d'un Génois venu de Chio, sur une barque française, Simancas E°1063, f°42.

201. A Philippe II, *CODOIN*, CII, p. 207-208.

202. Simancas E°1332.

203. *Op. cit.*, p. 180; Granvelle à D. Juan, Naples, 6 août 1573, Simancas E°1063, f°45.

204. Granvelle à Philippe II, 12 août 1573, Simancas E°1063, f°49. Autre renseignement, mais en retard, venant de Venise, la flotte songerait à prendre les îles Tremiti.

205. Philippe de CANAYE, *op. cit.*, p. 181.

206. D. Juan à Philippe II, Messine, 20 août 1573, reçue le 3 sept., Simancas E°1062, f°117.

207. Çuñiga à Philippe II, 25 août 1573, *CODOIN*, CII, p. 229.

208. Philippe de CANAYE, *op. cit.*, p. 181, 186, 8 galères perdues, 8 autres endommagées.

209. Çuñiga à Philippe II, 28 août 1573, *CODOIN*, CII, p. 231.

210. Simancas E°1063, f°87.

211. Philippe de CANAYE, *op. cit.*, p. 186.

212. Granvelle à Çuñiga, Naples, II, sept. 1573, *CODOIN*, CII, p. 258-259.

213. Philippe de CANAYE, *op. cit.*, p. 195.

214. Granvelle à Çuñiga, Naples, 8 oct. 1573, *CODOIN*, CII, p. 307-311.

215. Mediceo 4904, f°86.

216. L'argent va aussi vers les Flandres, Saint-Gouard au roi, Madrid, 14 juil. 1573, B. N., Paris, Fr. 16105.

217. Mais l'expédition annoncée par les correspondances diplomatiques est en général celle d'Alger; l'évêque de Padoue au C^{al} de Côme, Madrid, 15 juil. A. Vaticanes, Spagna 7, f°372; Sauli à Gênes, Madrid, 14 juillet 1573, L. N., Spagna 5. 2414.

218. Sauli, note précédente; Saint-Gouard, ci-dessus, note 7.

219. Alger passait au rang de projet, D. Juan à Philippe II, Naples, 25 juil. 1573, Simancas E°1062, f°112.

220. Simancas E°1062, f°96.

221. J. A. Doria à D. J. d'Autriche, Messine, 9 juil. 1573, orig. Alger, G. A. A. Registre n°1686, f°191.

222. D. Juan à Philippe II, Naples, 10 juil. 1573, Simancas E°1062, f°105 et encore, du même au même, Naples, 4 août 1573, *ibid.*, f°113.

223. Le même au même, Naples, 5 août 1573, *ibid.*, f°114, son départ pour Messine; le même au même, Messine, 10 août 1573, E°1140, il est arrivé à Messine, le 9 août.

224. 4 août 1573, Simancas E°1063, f°167.

225. De S. Lorenzo, Simancas E°1140, M.

226. Simancas E°1140.

227. Çuñiga à Philippe II, Rome, 13 août 1573, *CODOIN*, C, II, p. 209.

228. *Op. cit.*, I, p. 243 et *sq.*

229. Çuñiga au roi, 23 oct. 1573, *CODOIN*, C II, p. 330. Que le pape ne soit pas informé, la lettre le prouve: "... *Dijome el otro dia el Papa hablandome en la jornada del señor D. Juan, que si ganaba a Tunes*...". La nouvelle de la prise de Tunis, 11 oct. a été connue à Naples vers le 22 ou le 23 oct, Granvelle à Philippe II, Naples, 23 oct. 1573, Simancas E°1063, f°110.

230. Don Juan à Granvelle, Messine, 19 août 1573, copie, B. N., Madrid, Ms 10. 454, f^{os} 114 et 115; Çuñiga à Philippe II, Rome, 21 août 1573, *CODOIN*, CII, p. 219-220.

231. Escovdeo à D. Juan, Madrid, 5 sept. 1573, A. E. Esp. 236, f°122.

232. Le duc de Terranova au roi, Palerme, 7 sept. 1573, Simancas E° 1139.

233. Granvelle à D. Juan, 6 sept. 1573, Simancas E°1062, f°118.

234. Parere del Duca di Terranova, Presidente di Siclia, sopra le cose di Barberia, 17 sept. 1573, Simancas E°1139.

235. Le duc de Terranova à Philippe II, Palerme, 30 sept. 1573, Simancas E°1139.

236. Granvelle à Philippe II, Naples, 9 oct. 1573, Simancas E°1063, f°94.

237. Le duc de Terranova à Philippe II, Palerme, 9 oct. 1573, Simancas E°1139.

238. D'après la relation de la B. N. de Florence, CAPPONI, *Codice*, V, f° 349.

239. Indication formelle de cette date du 11. Jorge Manrique à Philippe II, Palerme, 7 nov. 1573, Simancas E°1140.

240. *Relacion que ha dado el secretario Juan de Soto sobre las cosas tocantes a la fortaleza y reyno de Tunez*, 20 juin 1574, Simancas E°1142, copie.

241. Instruccion a Gabrio Cerbellon, Simancas E°1140.

242. D. Juan à Granvelle, La Goulette, 18 oct. 1573, Simancas E°1063, f° 114.

243. Granvelle à Philippe II, Naples, 23 oct. 1573, *ibid.*, f°110 (reçue le 11 nov.).

244. Marquis de Tovalosos, B. N., Paris, Esp. 34, f°44.

245. Palmerini, 20 oct. 1573, B. Com. Palerme, Qq D 84, arrivée de D. Juan le 2 nov.

246. Granvelle à D. Juan, Naples, 24 oct. 1573, A. E., Esp. 236, f°s 88-90.

247. Saint-Gouard à Charles IX, Madrid, 3 févr. 1574, B. N., Paris, Fr. 16106, f°304.

248. Granvelle à Philippe II, Naples, 27 janv. 1574, Simancas E°1064, f°7, p. p. F. BRAUDEL, *in*: *Revue Africaine*, 1928, p. 427-428.

249. Simancas E°488.

250. O. de TÖRNE, *op. cit.*, I, p. 216 et mieux L. van DER ESSEN, *op. cit.*, I, l. 181 et *sq.*

251. *Lo que se ha platicado en consejo sobre los puntos de los memoriales que el sec° Juan de Soto ha dado de parte del S^or D. Juan*, s. d., Simancas E° 488 (mai ou juin 1574).

252. Voir note précédente.

253. Granvelle à Philippe II, 22 juil 1574, Simancas E°1064, f°46, parle de 320 voiles.

254. Puerto Carrero à Granvelle, La Goulette, 19 juil. 1574, la tranchée vient d'être ouverte du côté de Carthage, Simancas E°1064, f°46; Relacion del sargento G° Rodriguez de La Goulette, 26 juil. 1574, Simancas E°1141. Sur le siège et la prise de La Goulette, voir également E°1064, f°s 2, 4, 5, 5, 25, 54, 57, 58... ; opuscule anonyme, *Warhaftige eygentliche beschreibung wie der T ürck die herrliche Goleta belägert*, Nuremberg, Hans Koler, 1574; *Traduzione di una lettera di Sinan Bassà all'imperatore turco su la presa di Goleta e di Tunisi*, s. d., B. N., Paris, Ital. 149, f°s 368-380.

255. Ou 22 ou 23, O. de TÖRNE, *op. cit.*, I, p. 279, note 6.

256. Le duc de Terranova à Philippe II, Palerme, 31 août 1574, Simancas E°1141.

257. Simancas E°1142.

258. *CODOIN*, III, p. 159.

259. Madrid, 28 août 1574, Mediceo 4904, f°254.

260. Le duc de Terranova à Philippe II, Palerme, 20 sept. 1574, Simancas E°1141; Saint-Gouard au roi, Madrid, 23 oct. 1574, B. N., Paris, Fr. 16106.

261. Granvelle à Philippe II, Simancas E°1064, f°66.

262. O. de TÖRNE, *op. cit.*, I, p. 280, note 1.

263. Don Juan à Philippe II, Trapani, 3 oct. 1574 (*ibid.*, p. 283); la lettre de Granvelle du 27 sept. 1574, dramatique si l'on veut (Simancas E° 1064, f°. 61, cf. F. BRAUDEL, *in* : *Rer. Afr.*, 1928, p. 401, note 1) ne concerne que le premier désastre, la preise de La Goulette.

264. D. Juan d'Autriche à Philippe II, Trapani, 4 oct. 1574, Simancas E° 450.

265. Le même, au même, Naples 12 nov APLES, 12 NOV. 1574, *ibid.*

266. D'après van DER HAMMEN et PORRENO, cités par O. de TÖ RNE, *op. cit.*, I, p. 288, notes 4 et 6. Le paragraphe qui précède s'appuie sur le récit de TÖrne et sur mon article, "Les Espagnols et l'Afrique du Nord", *in* : *Revue Africaine*, 1928.

267. B^a Ferraro à la République de Gênes, 15 nov. 1574, A. d. S. Gênes, Gost. 2. 2170.

268. Constantinople, 15 et 19 nov. 1574, *ibid.*

269. Veedor general de S. M. en Piémont et Lombardie, Milan, 6 et 23 oct. 1574, Simancas E°1241.

270. Granvelle à Philippe II, Naples, 6 déc. 1574, Simancas E°1066, aut.

271. G. de Silva à Philippe II, Venise, 16 oct. 1574, Sim. E°1333 ; le même au même, 30 oct. *ibid*.

272. Giulio del Caccia au grand duc, Madrid, 25 oct. 1574, Mediceo 4904, f°273 et v°.

273. *Consulta del Consejo de Estado*, 16 sept. 1574, Simancas E°78.

274. A Philippe II, Oran, 23 déc. 1574, Sim. E°78. Sur la mission de V. Gonzaga, l'évêque de Padoue au cardinal de Côme, 9 nov. 1574, A. Vaticanes, Spagna n°8, f°336.

275. Sauli à la Rép. de Gênes, Madrid, 16 nov. 1574, A. d. S., L. M. Spagna 6. 2415.

276. Saint-Gouard au roi, Madrid, 23 oct. 1574, B. N., Paris, Fr. 16106.

277. Le même au même, 26 nov. 1574.

278. B. N., Paris, Fr. 16. 106.

五　西班牙—土耳其休战：1577—1584 年

文学作品总是把西班牙描绘成一个顽固不化的天主教国家。当西班牙正被法国国王指控在法国的新教徒中间进行阴谋活动，而西班牙的确也可能正在准备这样做时，一个那个时代的人、法国大使圣古阿尔在 1574 年就已经有这种看法了。[1] 这种"宗教第一"的观点，可能并不总是准确的。富于战斗性的宗教信仰在西班牙的政策制订时，并不总是起着启发、激励和推动的作用。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的论点在什么地方比在审慎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国务会议里还更有分量和影响呢？一切都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同罗马的搏斗和战争、阿尔贝公爵对荷兰的态度（这个态度在几个方面很明显地反对教会）、菲利普二世至少到 1572 年为止对伊丽莎白的英国所采取的政策等都证明了这一点。"菲利普二世难道没有被人称为英国的宗教改革的非志愿的同盟者吗？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自相矛盾，荒诞不经。"[2] 他在他于 1580 年后占有的葡萄牙在印度洋的领地里执行的宗教政策是宽容政策。

但是，没有任何事物比西班牙同伊斯兰国家和同各个强国的会谈以及同它们的和解能够更好地具体说明西班牙政府的态度了。寻求索非的援助（正如庇护五世自己准备这样做一样），或者像菲利普二世那样，仅仅在兵败葡萄牙的阿尔卡扎尔·克比尔后几

年就同摩洛哥的谢里夫结盟，无论如何，这毕竟同十字军东征精神大相径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方面不断同土耳其人会谈。菲利普二世的外交部门在同君士坦丁堡打交道时，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外交部门的办事方法甚至档案资料。神圣罗马帝国外交部门既为了家族的缘故也为了财政的缘故，一直在为菲利普二世的外交部门服务。匈牙利战争断断续续进行，进行这场战争的经费部分是西班牙志愿捐助的。西班牙于是利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东方进行的接触和会谈，让它的代理人跟随帝国大使之后，川流不息，沿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前进。有一个我们知道其姓名的代理人（哈默根据维也纳档案馆编写的古老著作指出这些代理人），就会有十个我们不知道其姓名的进行同样活动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活动时伸放出成千上万条线。这些线消失在事件的大网中，事件发生后，就几乎找不到了……

然而，我们想首先找到的正是这些线，以便通过这些最间接的、最隐蔽的途径来探索发生于 1577 年和 1581 年之间的地中海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倒转的秘密。

在这以后，而且也只是在这以后，我们将对这些转折的年代作为一个整体所产生的大量问题进行研究。如果土耳其没有被它从 1579 年起开始具有的征服者的狂热抛向东方去进攻波斯，如果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没有在 1580 年被抛向西方去征服葡萄牙和新世界，那么对历史来说（而且历史教科书对这件事几乎只字未提），我们即将试图尽可能详细阐明的马格利亚尼在君士坦丁堡进行的长期的、富有传奇性的谈判本来会意味着什么呢？

1. 马格利亚尼的使命:1578—1581 年

我们已经指出在从 1558 年到 1559 年这段时期尼科洛·塞科和弗朗基斯与维也纳和与热那亚协同配合实现和平的企图。我们也已经指出 1564 年和 1567 年的和平尝试。这两次尝试都由维也纳指挥。但是,在叙述事件时,我们没有认为应该提到在从 1569 年到 1570 年这段时期交给一个名叫胡安·巴雷利的马耳他骑士的使命。

回顾过去:菲利普二世最初的几次实现和平的尝试

1569 年 12 月,一个名叫胡安·巴雷利或者季奥瓦尼·巴雷利的人携带菲利普二世 10 月 27 日的指示到达卡塔尼亚。他在为骑士团团长效劳的过程中曾经参与罗得岛的希腊东正教神父胡安·阿基达(我按照西班牙文件的拼写)策划的一起错综复杂的阴谋事件。这个神父和一个卡尔诺塔贝伊有联系,住在摩里亚。他保证能够煽起这个地区反对土耳其。他也承允纵火焚烧君士坦丁堡的海军造船厂。如果考虑到信息传递方面的耽搁延误,这些日期(威尼斯的海军造船厂 1569 年 9 月 13 日爆炸)彼此相隔太近,因此不能认为这个想法是威尼斯造船厂爆炸事件诱发引起的。此外,经常有人就阿尔及尔问题和君士坦丁堡问题向西班牙的“第二局”提出这类建议。西西里总督佩斯卡尔侯爵负责审查胡安·巴雷利提出的建议,查清这个骑士得到已故骑士团团

长的信任并知道摩里亚事件,但不详细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不了解为焚毁土耳其舰队而想出的办法。这个骑士呈交国王的只不过是间接得来的情报,别无其他。他要求自己尽量谨言慎行。毫无疑问,他非常信赖预期的同希腊东正教神父的合作。

佩斯卡尔自己同罗得岛的这个希腊东正教神父接头联系,并且把他派往黎凡特。神父在那里就只等把他的一个教友派去以便根据他们商定的计划行事。但是,这个教友——一个威尼斯国民——必须来寻找载有焚烧土耳其舰队所必需的爆炸物的大帆船"库尼亚多"号。他犹豫不决,不大愿意作这次旅行,不大愿意和神父会合。他过去曾经和威尼斯当局有过纠纷。这次他想得到一张安全通行证。向在这些事情上疑虑重重的威尼斯市政议会要求这样的证件,真是连想都不应该想的根本办不到的事。因此,最后让胡安·巴雷利化装成一个老老实实、循规蹈矩的商人,把"库尼亚多"号交给他,还让他带上给那个希腊神父和那个在这件事中又出现的约瑟夫·米卡斯的指示……西西里总督慎之又慎,格外警惕,教人用他自己的名字为这艘船登记注册,以便使这艘船好像是去装运赎回的俘虏一样。

1 月 24 日,这艘船装载炸药和价值 5,000 埃居的货物驶离墨西拿。但是,一切都在黎凡特归于失败。事情全部完结后,东正教神父指责骑士把什么都搞糟了。焚毁海军造船厂的企图的确已经失败。在摩里亚,人们信赖的卡尔诺塔贝伊已经死去。应该派人去赞特取送给他的礼物的神父什么也没有干。不管怎样,佩斯卡尔侯爵在他 1570 年 6 月呈交的一份语焉不详的报告中拒绝就谁是这一"严重"事件的负责者这个问题表态。[3]

读者会说，所有这些记述都没有提到任何一次同伊斯兰国家的友好会谈。情况正好相反。根据另一份文献资料，巴雷利似乎负有谈判休战的使命。九年以后，在君士坦丁堡，年迈的穆罕默德·索科里被西班牙外交的狡诈和诡计激怒，或者是装作被这些行为激怒。他接见西班牙的代理人季奥瓦尼·马格利亚尼（关于这个西班牙代理人的情况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谈到）。“帕夏对我说：给我解释一下（西班牙人）把……洛萨塔[4]派到这里来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想法。他们派了马耳他骑士来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想法。我已经了解到这个人过去是巴雷利骑士。后来，他们把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派来这里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想法”。[5]

因此，巴雷利肯定曾经有过完成某项停战谈判的使命。肯定不是在1570年6月吗？我们应该这样设想：巴雷利在第一次来企图爆炸海军造船厂和煽动摩里亚叛乱之后，第二次来时手里却拿着橄榄枝，或者他同时圆满完成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圆满完成）这两项任务。如果说，这并不意味着西班牙为了它在东方进行的外交活动使用它的间谍和它雇佣的打手、流氓之类的话（这两种人都与背教者有接触联系），那又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一点上，巴雷利事件（它为某些更加具有探测性的工作提供了机会）可能是一起有意义的事件。

穆罕默德·索科里的名单上的下一个使者东·马丁·德·阿库尼亚1576年在君士坦丁堡。我们对这个人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这是一个出身微贱、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他与这个城市的背教者融洽相处、情同手足。

这个1576年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谈的倡导者回到意大利

时，难道不以曾经纵火焚毁土耳其的舰队为荣吗？穆罕默德·索科里很快被告知这位大使的特别要求。他对这位大使的奇谈怪论抱怨连天，十分不满。西班牙的外交部门对东·马丁·德·阿库尼亚的情况了如指掌，承认他的确可能焚烧过一艘大帆船。这起历史事件与巴雷利在1569年和1570年之间的这段时期的使命的某个细节奇怪地酷似。这起事件使人有理由认为，在十次这种性质的使命之中，我们只不过了解一次而已。希望重新获得恩典的背教者、以黎凡特问题专家自居的过去的战俘、必须经常监视的希腊人（正如一份西班牙的报告所说的[6]）、马耳他骑士、阿尔巴尼亚人、神圣罗马帝国的使者、他们的对话者、犹太人、像萨洛蒙博士那样的德意志人、像霍朗贝那样的译员等，组成一大群可疑的人。在两种文明之间的无人地带，正是这群并非一贯被他们的使用者正式承认的人在处理外交方面的事务。后来在17世纪，轮到耶稣会教士来充当中间调停人。[7]

1573年以后，这些人一如既往，忙忙碌碌。西班牙的需求使投机冒险的和情报的市场的价格上涨。对任何能提供有用的情报和在东方为西班牙效劳的人都经常悬以重赏。难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1576年，法国冒险家克洛德·迪·布尔提出要为审慎国王效劳，表示愿意处理西班牙国王在君士坦丁堡的全部事务吗？在君士坦丁堡，人人都知道1569年他干得多么出色。他只索要10万杜卡托，而这个数目的确大大多于需用来向土耳其首相行贿的钱的数额。[8]

唐·胡安时代

1571 年，奥地利的唐·胡安自己同土耳其人通信联系。16 世纪的战争要求他这样做。塞里姆写给他一封信并附有礼品。这可能是勒班陀战役之后的事。[9] 唐·胡安复信说，信和礼品他已经通过太监阿科马托·德·纳托利全部收到；还说，他向他遣回一个希腊间谍，“这个间谍奉你的命令来这里刺探基督教的组织机构、物资储存和武器装备情况。这个人没有杀死多少人。我虽然可以处决他，但我不仅饶了他的命，而且还让他随意了解我的全部措施计划。这些措施计划就是对你长期作战。”对这些来源不明确的文献资料的日期和严格的真实性我们都无法肯定。但是，上述那次通讯得到当时的人的证实，确有其事。这些文献资料就是证据。一方面是礼仪；另一方面是富于浪漫色彩的挑战。1571 年的接触不能称为谈判。但是，两年之后肯定进行了真正的会谈。

1573 年 6 月 30 日，格朗弗勒的代理人胡安·库伦齐从君士坦丁堡归来。他肯定是个情报员。但他也是谈判者吗？不一定。[10] 然而，6 月、7 月，一些西班牙代理人也在前往土耳其途中。如果他们是首批作这种旅行的人，我们可以认为派遣他们的决定是在紧接着威尼斯退出联盟之后作出的。1573 年 4 月 23 日，菲利普二世获悉威尼斯签定和约的消息。唐·胡安也于 4 月 7 日得知这一消息。实际上，这些人的这次出使毫无疑问只是这类旅行中的一次，但它却异常奇怪。因为，西班牙在这个 7 月只准备步威尼斯的后尘行事。

7 月 16 日，达克斯主教已经被他在拉古萨的代理人告知这些

人的旅行。[11]10 天以后[12]，他确切而详尽地了解到这是怎么回事。唐·胡安已经俘虏了阿里帕夏的儿子、塞里姆素丹自己的外孙，并且以最高的礼遇待他。唐·胡安拒绝收下素丹的女儿送给他的礼品，并且亲自叫人回赠素丹的女儿贵重豪华的礼物。素丹的女儿把送来的这些礼物交给塞里姆。这是法国驻威尼斯大使迪·费里埃提供的情况[13]。正式隆重的礼节和彬彬有礼的言词，掩盖着现实的谈判。的确，当阿里帕夏的儿子不交赎金就被释放并于 7 月 18 日抵达君士坦丁堡时，有 4 个西班牙人陪同，其中有唐·胡安的秘书安东尼奥·德·维劳(维格利亚诺)和塞萨公爵的亲信、一个名叫维尔季利奥·普利多里的佛罗伦萨人。穆罕默德·索科里在回答打听消息的主教时指出，这些是他的敌人，特别是约瑟夫·米卡斯的阴谋诡计。他又说，但是，如果西班牙国王希望和平，就必须纳贡，并且交出西西里的几个“堡垒”。主教对西班牙国王没有预先得到承诺和保证就进行这项活动感到惊讶。“这个行动使我认为，西班牙国王除了强烈希望并且极其需要在这条战线上得到安宁以便结束佛兰德的事务之外，他还预见到另外一个比这更加困难的紧急情况或者一个比所有这一切更大、正在开始执行的阴谋。”[14]

西班牙人获悉土耳其人提出的条件后，似乎并不拒绝纳贡这个想法：帝国大使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大使将同时缴纳贡品。西班牙人等待皮亚利帕夏和厄尔杰·阿里，并且依恃他们强大的势力来取得成功。首席穆罕默德帕夏厌恶谈判。至少他曾经这样说过。但是，什么事情都不能说得太绝。众所周知，素丹为人极其吝啬。他急欲结束耗资巨大的海战。自从勒班陀战役以来，每当他想到这场海战的后果，总是不寒而栗，因此他更有这个愿望。当时，他正在等

待东方的老索非死去。西班牙的计谋因而并没有事先注定失败。法国大使过去在查理五世在位期间和菲利普二世在位期间曾经阻止过几个这类计谋成功。但是,这次西班牙人提出一个庞大的贸易方案,特别提出把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商业领域向整个意大利开放,开放时把威尼斯人和法国人排斥在外。由此带来的贸易增加额难道就会使土耳其皇帝征收的税款增加吗?但这至少是人们用来引诱他的诱饵。[15]

在这个我们再次发现有约瑟夫·米卡斯参与的图谋中,还有托斯卡纳人(关于他们的卷入我们拥有充分的证据)和都灵的犹太人卷入。这些犹太人怂恿萨瓦大公。这位大公希望在犹太人的帮助下在尼斯做科西默·德·梅迪奇过去已经在里窝那做过[16]的和卢卡家族以后也将在那里做的事。这种普遍的进行贸易的愿望,是时代的标志吗?把威尼斯排斥在外的这个前景(它会遗留下来一个多么好的有待占领的市场啊!)刺激引发起大量贪欲。在从1570年到1573年这段威尼斯被排除在贸易竞争之外的时期内,这些贪欲变得具体明确起来,甚至开始付诸实现。所有这些进行贸易的欲望,伴随并加强西班牙的政策。大批大使、代理人、礼品和许诺络绎不绝于途,纷纷涌向君士坦丁堡。主教后来指出,这次密集的大规模的进攻最终有利于"引入西班牙人"。[17]当某人是法国的代表但只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代表时,他只会感到意懒心灰。"帕夏嘲笑我们想把他的手捆绑起来而又不想在他手里放一点什么东西。"[18]

但是,要看清这个图谋,必须注意到一直在举行谈判的1573年和1574年这两年之间的区别。还在1573年9月,达克斯主教[19]仍然相信西班牙会取得成功。西班牙的力量是巨大的。土耳其在

也门遇到困难。这些困难的细节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无法猜出的谜一样。同年，锡南帕夏解决了这些困难。[20]但是，唐·胡安在天气晴好的季节之末攻占突尼斯这件事，似乎已经危及达克斯主教不安地密切注视着其进展情况的会谈。这次会谈和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进行的类似会谈一样，如果成功，将使威尼斯人在批准自己的和约之前大吃一惊。威尼斯人的这项和约虽然原定 1573 年 3 月 7 日签署，但只是当土耳其人终于放弃要求更多的让步，特别是放弃得到科托尔和扎拉两地时，[21]才于 1574 年 2 月签署。凡此种种都向我们说明威尼斯为什么感到焦虑不安并且谨慎小心地进行战备，为什么它在外交方面紧紧跟随达克斯主教，小心翼翼与他保持步调一致。它自己所玩的和它的邻国乐于置于险境的是它的生命。干地亚是一个会被首先选中的猎捕对象，它设防不足。“这里的没有得到满足的居民长期以来就寻求摆脱他们所受的奴役。”[22]

西班牙同土耳其的条约的签订，对法国来说是一次罕有的打击。因此，主教对 1574 年 2 月设法避免了一次威尼斯和土耳其人在扎拉边界线和塞贝尼科要塞的问题上的破裂感到极为满意。在此关头，法国第二次拯救了众矢之的威尼斯。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中，西班牙人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是最后的失败者。法国大使写道，自从威尼斯和约缔结以来，“我开始不再十分惧怕西班牙人了。”[23]他很清楚，拯救威尼斯的是突尼斯的被占领。西班牙人通过占领突尼斯，阻止了土耳其人进入他们在柏柏尔的属地。1574 年 2 月，他写道：“如果事物停留在目前的状态中，这些属地就不会确保属于他们所有了。”[24]

我们了解的某些事实就是这样。在锡曼卡斯的某一捆档案材

料中肯定会有关于这次谈判的全部卷宗。根据法国的通讯,问题在于西班牙是真正希望和平或者仅仅是试图施展策略来挫败威尼斯(正当它慷慨大度地提出,如果土耳其进攻,就援助威尼斯的时刻)。这些目的没有一个达到。

但是,交易在继续进行。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不仅如此,交易还是由同样那些人进行。这些人由于没有得到确切的指示,由于以 1574 年 9 月土耳其人再度占领突尼斯为终结的事件的发展,在行动方面稍有拘束。这个月的 18 日,达克斯致函卡特琳·德·梅迪奇说,"已经在这里停留了 15 个月的西班牙人和佛罗伦萨人"即将出发。他们的护照完全合手续。但是,他们总是在最后的时刻既被当作人质也被当作大使扣留下来。马尔利亚尼后来写道:"(在这里)谈判总是危险的。"特别是这些谈判极端复杂。1574 年,正当谈判在君士坦丁堡进行时,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馆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威尼斯,在一个土耳其人的秘书和一个名叫利维奥·切利诺的人之间举行了关于西班牙和土耳其之间的和平的会谈。不幸的是,我们无法判定这次会谈的日期。毫无疑问,这个日期是在威尼斯和约签订之后,否则威尼斯就可能不会让谈判在它的领土上举行了。[25]1575 年 2 月,[26]格朗弗勒还就阿穆拉特三世登基一事与土耳其人商谈和平。但是,后来塞里姆之死并没有使事态发生什么巨大变化,因为在新素丹的统治下,穆罕默德·索科里的统治仍然继续,直到他于 1579 年被一个狂热分子暗杀才告结束。不错。阿穆拉特三世这个讲究排场、喜爱阔绰、生活奢侈、幼稚无知的君主比他的前辈更让他的国家对外开放。特别是和人相比,时代的变化更大,最终把新的生活条件强加给了土耳其了。

一个奇怪的胜利者：马丁·德·阿库尼亚

1573年，西班牙的外交部门在君士坦丁堡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以后，谈判有过暂时停顿吗？可能有过。无论如何，有过半停顿。这种半停顿状态一直持续到新任大使马丁·德·阿库尼亚到达土耳其首都就任为止。

关于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我没有找到能够使人准确地让他的奇怪形象再现的文献资料。但是，仍然有些文献资料对这方面的情况比夏里埃尔和他的跟随者（津克森或者约尔加）的报导谈得多得多。夏里埃尔等人就只提到东·马丁·德·阿库尼亚的名字和别人认为他有的“库尼亚勒塔”这个绰号。1577年，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在历史舞台上首次出现。根据威尼斯的一份公文急报[27]，他从那不勒斯出发，3月6日到达君士坦丁堡。他出发时，那不勒斯总督向他提供了3,000杜卡托。他在君士坦丁堡的逗留异常短暂，因为4月23日他就回到威尼斯。古斯曼·德·西尔瓦在一封信中解释说，东·“加西亚”·德·阿库尼亚离开时，带着一张为在君士坦丁堡赎回俘虏而开具的安全通行证。但是，“他去那里仅仅是为了商谈同土耳其人停战的问题。他的确也争取缔结了一项为期5年的停战协定”。在锡曼卡斯的确发现一份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成功地同土耳其大臣制订的一项协定的草案。这个草案载有3月18日这个日期。[28]它开头的几行字是“至高无上的和高深莫测的上帝照亮了、启发了两位皇帝的心……”这些话显然会令人想到土耳其文的原本。东·马丁·德·阿库尼亚还带回帕夏给菲利普二世的一封信，帕夏在信里答应土耳其舰队1577年

不出航。

工作做得快,但是做得好吗?西班牙人并不全都这样认为。当4月份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在前往西班牙途中路过那不勒斯停留时,蒙德哈尔侯爵以担任总督的格朗弗勒的继承人的身份接待了他。侯爵非常不乐意接待他,以致在关于这次会见的报告中为自己辩解。侯爵解释说:"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是到过意大利的声名狼藉的西班牙人之一。"[29]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极其轻率冒失。他在让蒙德哈尔发誓不泄露任何他对他密谈的关于他的使命的话之后,第二天就在那不勒斯把一切都公诸于众了。蒙德哈尔又说,这是他的言行失检过错或者是他的同伴的这种过错。蒙德哈尔当时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看来,很明显,既不应该指责东·马丁·德·阿库尼亚的同伴,也不应该指责总督的偏心,既然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在君士坦丁堡也玩弄过完全同样的花招。神圣罗马帝国大使惊奇地写道,东·马丁·德·阿库尼亚避免同体面的人物在一起,竭力与这个城市最声名狼藉的背教者为伍。"街上的顽童都认识他,了解他的秘密。"[30]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大肆挥霍的家伙,是个赌棍、酒鬼。他把他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时蒙德哈尔交给他的 3,000 埃居的一半换取丝绸、银器送回西班牙,剩下的则在莱切赌得精光。然后,他在回国途中到达那不勒斯时,蒙德哈尔不得不又预支给他一笔钱,使他能够继续前往西班牙。但是,蒙德哈尔坚持要他交来过去的和以后的帐目。[31]

6月,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在西班牙向安东尼奥·佩雷斯口头汇报他在君士坦丁堡圆满完成的一切,[32]因为他似乎在谈判中干得很好。也许他到得及时?不管怎样,尽管厄尔杰·阿里坚

决反对，[33]他仍然从帕夏那里争取到土耳其舰队不出航。特别是他成功地推动了休战谈判。总之，可能正是他的轻率冒失本身，他的乌七八糟的社会交往和他的肆无忌惮帮了他大忙。他肯定不是"干外交这一行的"。他不太关心注意爱惜、保护西班牙的敏感性。马德里的官僚们觉得这太难于忍受吗？不管怎样，官方的文件说，东·马丁·德·阿库尼亚由于健康原因没有回到东方。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在1578年写给国王的信表明，他怨恨国王……他身体很好。[34]在这封信里，他一方面解释说，他的继任者无法使帕夏回想起自己作出的承诺；另一方面，这位继承者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立下的功劳归于自己。可能他夸张了他的效劳的价值，因为，8月份另外一个使者从君士坦丁堡抵达奥特朗托，然后又到了那不勒斯。这个名叫奥雷略·德·圣克鲁斯的人也携带了土耳其皇帝的随和的建议。他解释说，土耳其皇帝"很愿意停战，因为他是个热爱和平的人，是和平的朋友，投身文学，是战争和一切可能扰乱安宁的事物的敌人"。至于穆罕默德帕夏，他是素丹之下的最大权威，已经年过六旬，憎恨战争。在所有其他大臣中，只有锡南帕夏表现得好战，但他是影响最小的人物之一。[35]

关于马丁·德·阿库尼亚的情况，最后谈一句相当令人悲伤的话。根据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文献资料，他奉国王之命于1586年11月6日，因而是在我们已经叙述的细节发生很久之后，在马德里附近的平托城堡中的一个大厅里被处决。这方面，我们对他在土耳其的胡作非为之一了解得若明若暗（一个西班牙代理人的揭发），但对他以基督教徒的方式死去时的动人心弦的场面却知道得很详尽。[36]

季奥瓦尼·马格利亚尼

1577年末,国王根据阿尔贝公爵的推荐,派遣加布里埃尔·塞尔布洛内的亲戚、米兰骑士季奥瓦尼·马格利亚尼去君士坦丁堡。这个骑士1574年曾经在突尼斯作战。他在战斗中受伤,一只眼睛失明,被敌俘虏,后于1576年通过一个名叫尼科洛·普罗达内利的拉古萨商人的调停,从土耳其人手中赎回。[37]国王给他的指示于1577年发出。这些指示的片断我们已经找到,但没有找到发出这些指示的确切日期。这些指示用很普通的言词拟就。他应该取道那不勒斯前往目的地,在那不勒斯时不得向蒙德雅尔透露他此行的使命。他将由一个名叫布鲁蒂的人陪同。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这个人或者是阿尔巴尼亚人,或者是西班牙帝国宫廷的"达官贵人",甚至或者是威尼斯的市政议会的年金领取者,[38]也可能上述种种身份他兼而有之。马格利亚尼被告知他将接替因健康原因羁身的马丁·德·阿库尼亚并进行停战谈判。他将注意把马耳他和意大利的各个王侯都包括在和约之内……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关于这次谈判的全部情况。对澄清这次重要谈判的根源来说,这当然嫌语焉不详、远远不够。

马格利亚尼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具有真正的才能(这个人能干、诚实、灵活、顽强,是个不知疲倦、勤于撰写的人),还因为西班牙政府仅仅希望把谈判工作从东·马丁·德·阿库尼亚之流的人的手中接管过来,把谈判提高到严肃认真、庄重的水平?没有读到西班牙派驻君士坦丁堡的新使节携带的正式的官方指示或者秘密指示(马格利亚尼在他的信中谈到这项秘密指示),这一点很难判断。

马格利亚尼和他的同伴离开那不勒斯海岸，11 月 8 日到达发罗拉。[39]他们 13 日离开发罗拉，25 日到达摩纳斯提尔，12 月 12 日到达罗多奇奥。马格利亚尼从该地通知他的译员霍朗贝他已经来到。这个译员在东·马丁·德·阿库尼亚负责谈判时期就已经参与谈判工作。14 日，译员的复信由一个特别信使送交给他。他当时在皮科洛港离君士坦丁堡不远。收到这封信的当天晚上，马格利亚尼一行进入君士坦丁堡。这个谈判使团的团长住在带领他入城的传达员的家里；他在这里立即同霍朗贝见了面。但是，这次会见时，大家只是互相寒暄了一番。正事推迟到第二天再谈。然而，从第二天起，情况全都恶化起来。马格利亚尼开始遇到麻烦。他刚刚阐述完他此行的使命，霍朗贝就用以下的话打断他："如果我是基督教徒，我会在东·马丁·德·阿库尼亚编造的谎言面前划十字。帕夏期待派来一位大使。这一点是在写给陛下的信中所谈的。这一点是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就在这里答应的。这一点是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最后吩咐一个径直来这里的人捎来的话。帕夏听说看法有了改变，非常气愤。但愿上帝让你的人不会受到由此而产生的无法补救的伤害。"

帕夏、译员和一个名叫萨洛蒙·阿斯卡纳西的博士强烈地重复了这个指责。据说，这位博士是德意志犹太人。但是，不管怎样，他在政府内是个有权有势的人物，在这个时机必须付以重金的人物（这并不意味在这个词的通俗意义上他被收买）。这种激烈情绪是由衷的吗？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撒了谎吗？马格利亚尼的话和我们所了解的关于这个人的情况会使人认为是的，他撒过谎。但是，在君士坦丁堡这个世界，由于那里进行极其复杂的谈判，它

现在对粗心大意的历史学家正如它过去对西方的大使或者等级低的外交代表一样，同样遍布陷阱。这出戏是怎样上演的至今还不为人所知。但是，很明显，西班牙人再次想要这种交易偷偷进行。如果东·马丁·德·阿库尼亚 1557 年的确曾经过分投身于这项活动，这一点就解释清楚了他为什么看见这项使命转交给另外一个人时那样焦虑不安。与西班牙人相反，土耳其人希望派来一个高级别的显赫庞大、引人注目的西班牙使团。而现在却向他们派去一个无名小卒、最近当过俘虏的瘸子。这件事很容易授厄尔杰·阿里（他反对停战）和法国人以笑柄。这个新派来的人物的伴随者都是些小民百姓：一个是身份未定的奥雷略·布鲁蒂；另一个是以普通商人、采购专家、西班牙的情报员、半间谍等身份为人所知的奥雷略·德·圣克鲁斯……

此外，这个小型的使团还尽量不事张扬。一则法国通讯说："他们不抛头露面，既不愿意别人看见他们，也不愿意别人知道他们。"[40]利尔的修道院院长 1 月 22 日指出："……这个名叫马里安的人代替那些人们期待会衣冠楚楚、携带重礼的大使，几乎秘密地出现了。他拥有处理停战事宜的权利。"[41]马格利亚尼在整整一年内，甚至还要他的随从人员穿奴隶的衣服。他经常化装，把脸遮住。一天，当他正在等待帕夏时，忽然看见威尼斯人的总督。他马上避离，走进在这之前帕夏一直接见他的那个房间。这件事使在那里的土耳其人十分恼怒。这是他自己叙述的。他之所以以此自豪夸耀，不是因为他个人对搞阴谋活动有什么癖好，而是因为他奉主人之命尽量谨慎小心、保守机密。格尔拉赫的工作日记是一个很好的关于马格利亚尼进行的谈判的整个情况的材料的来源。他在这本书的

开头指出，西班牙人当然渴望得到和平，但是，他们同时也想“让事物保持秘密，并且想使自己不在土耳其人面前奴颜婢膝、卑躬屈节。”[42]帕夏的激怒不难理解。这种激怒被他夸下的海口，被他针对教皇开的玩笑，被他对关于佛兰德发生的困难的影射，被他关于割让奥兰的要求表露了出来。

但是，土耳其方面和西班牙方面同样迫切需要和平。由于对方没有派来大使，土耳其人就同马格利亚尼谈判。又由于必须在春季到来之前达成协议，因此马格利亚尼接二连三受到接见。2 月 1 日以后，马格利亚尼报告局势有了明显缓和。7 日，签订了一项为期一年的停战协定。[43]这是一次停战、一项君子协定。协定文本载有译员霍朗贝和萨洛蒙·阿斯卡纳西博士正式出具的关于译文与原文相符无误的证明。这两个人在这些谈判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帕夏答应 1578 年在土西双方互相同等对待的条件下土耳其大舰队将不出航。停战范围扩大到整整一系列国家和君主。这些国家和君主中，一些由西班牙国王提名，其余的则由土耳其皇帝提名。土耳其方面提出的是法国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威尼斯和波兰国王，再加上非斯的“君主”。关于这一点停战协定的条款说(这样就顺便添加进了土耳其的过奢的要求)：“虽然由于非斯君主挂着尊贵的土耳其皇帝的旗帜并且对他归顺服从、称臣纳贡，这并非必要。”在菲利普二世方面，提出了教皇、“马耳他岛和这个岛上的圣约翰骑士团”、热那亚共和国、卢卡共和国、萨瓦公爵、佛罗伦萨公爵、曼图亚公爵、帕尔马公爵、乌尔比诺公爵，最后还有皮昂比诺的领主。关于葡萄牙国王，双方商定，土耳其舰队将不经由“白海”，即爱琴海，前往进攻他的位于直布罗陀以外的各个邦国。至于红海和

印度洋,作出的承诺则不同样明确清楚。只有上帝才知道以后这方面会发生什么。

总的说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正如西班牙的外交部门所希望的那样,这个成功从谈判一开始就分文不花地而且不声不响地取得。谈判进展迅速,从1月12日进行到2月7日,并且像马丁·德·阿库尼亚所进行的谈判那样,迅速完成。也许这是因为对土耳其人来说,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及时地避免动员舰队和这种动员所引起的巨额开支。只有在春季以前事事安排停当,采取行动才是值得的。因此,两次停战的日期是1577年3月18日和1578年2月7日[44]……

但是,土耳其人继续要求西班牙方面派出一个合乎正式规定的使团,因为他们想取得一个辉煌的、将在全欧洲引起反响的外交胜利。他们坚持这项要求。2月7日协定的结尾载明了双方交换大使的正式承诺。这个条款在其他的环境和条件的推促下,使马格利亚尼在维涅·德·佩拉的逗留以后又延长了三年,并且以后还成了他的不幸之源。

他完成了使命后难道不应该在1578年春季就返回欧洲吗?或许他对这一点想得并不太多,正如他4月30日写给安东尼奥·佩雷斯的快信所表明的那样,[45]他希望自己单枪匹马获得预期的结果,即取得一次为期两年或者三年的停战。他在一次这样容易进行的谈判所产生的狂热和幻想中可能怀着希望。他通过他的拉古萨朋友普罗达内利获悉唐·胡安在格姆布鲁克斯取得了通过其他途径证实了的胜利后,马上试图在4月底对这一胜利加以利用并再次使用“博士”(指萨洛蒙·阿斯克纳西)。他对这位博士说:“我一

直对霍朗贝和您说，我不倾向于认为我的主人国王陛下赞成派遣一名大使来。在这个问题上，霍朗贝乐于宁愿相信我的同事奥雷略（·德·圣克鲁斯）而不相信我。上帝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 。至于我，我仍然持同样的意见，特别因为唐·胡安大人在西方取得胜利，因为土耳其皇帝卷入一场对波斯的战争中，我更是如此。这场战争以险象丛生、困难重重而为人所知。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同佛兰德战争的重要性和影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请向穆罕默德帕夏指出这一点：在两年或者三年中查实我的主人、西班牙国王的力量并赞成通过我的斡旋缔结的停战，这对他是有好处的。”

他积极主动的举动大胆但不成熟。穆罕默德帕夏的答复很快来到，措词亲切友好，至少在博士用以传达这个答复的形式之下是亲切友好的。帕夏说，他对使者向他提出的理由没有异议。但是，土耳其皇帝年事尚轻，渴求军事方面的荣誉。2 月份，马格利亚尼曾经把这位皇帝描绘成易于接受建议，比塞里姆更加殷勤好客，坚信自己得到的第一个印象。穆罕默德帕夏说，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君主对厄尔杰·阿里每天的敦促规劝并非充耳不闻，毫不接受。这位“海上统帅”夸口说，他即便使用一支不精锐的舰队，也能够战胜当时处境困难的西班牙。帕夏推心置腹地对博士说：“我公开说了东·马丁·德·阿库尼亚的好话，而这个人又欺骗了我们，以致我自己的处境十分困难，不能再干下去了。”他说到这里，长叹一声，悲叹道：“这个帝国现在不再是有头有脚了。”博士及时地向马格利亚尼报告了这些漂亮动听的话，而且也没有忘记告诉他穆罕默德帕夏在听陈述西班牙的建议的时候所说的“博士，你很正确”这句话。

但是,最后这位帕夏又回到派遣大使这个问题上。如果菲利普二世派遣一个大使,他就准备使他的要求能够被人接受。穆罕默德帕夏又说,但是,假如不派遣大使,“我也将听从海上统帅的意见”。然后,他非常庄严地肯定说,他为使条约的全部条款得到遵守,阻止大舰船离港出航,真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帕夏的嘴里,优雅动听的恭维和露骨的恐吓就这样掺混在一起。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勾心斗角,比诈斗智。马格利亚尼的大量信件如实地汇报了他们的谈判情况。这些谈判给人以某种苦恼不安的印象。这些谈判还揭示出了一种复杂的,即使不算谨慎小心至少也是十分机智灵活的外交策略。谈判双方在运用这种策略时连最狡诈的手段都丝毫不鄙弃厌恶。

“马格利亚尼的手下人”受托把临时停战协定的文本带往西班牙。他于 1578 年 2 月 12 日从君士坦丁堡出发。马德里的国务会议对他带来的信息讨论了多次[46],“鉴于陛下事务的状况和财政状况,鉴于处理事务和致力于巩固加强各个王国的必要性……”在缔结和约的必要性的这个问题上,毫无困难地取得了一致意见。必须同土耳其人和睦相处,尽管没有人愿意寻根究底,深入讨论,但是,大家对上述这一点意见是一致的。相反,顾问们在“礼仪和威信的问题上”却犹豫不决,莫衷一是。是否派遣一名大使?如果这样做,是否满足于向马格利亚尼送去一份国书?讨论最后归结到了这一点上。9 月份,在原则上决定了向君士坦丁堡派遣大使。一个名叫东·胡安·德·罗卡富尔[47]的人接到为此目的发出的指示。这是一个极少抛头露面的人物。1579 年的一封信提到过他曾经率领那不勒斯舰队的几艘舰船。[48]他收到的正式指示没有载明确切日期。

这份文件详述了先前的谈判情况，还附有1578年9月12日发出的“第二号指示”[49]。这个指示规定了罗卡富尔在前往君士坦丁堡“受阻”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行事。他于是派遣随同他的埃凯瓦里船长，责成他去要求通过马格利亚尼缔结停战协定。因此，向素丹派去大使的决定并不十分肯定、坚决，因为仍然有可能在最后时刻阻留他前往。

又花了3到4个月时间才使马格利亚尼在他远方的寓所里了解到情况。根据格尔拉赫的工作日记，马格利亚尼的“手下的人”1月13日才回到君士坦丁堡[50]。旅行旷日持久可能是因为时值严冬，也可能由于西班牙的谋算。西班牙想在1579年再度运用曾经使它能够争取到土耳其舰队在前两年不出航作战的策略。法国人立刻作出这个结论。的确，这些好消息的传来和关于正派来大使的通知，都使马格利亚尼的任务易于完成。此外，由于土耳其人日益投入波斯方面的事务，因而逐渐变得更加随和。1579年1月16日，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秘书朱耶致函亨利三世说，土耳其人“由于波斯战争，和西班牙国王同样急需和平。他们将在波斯遇到的麻烦比他们愿意承认的多。”[51]当时担任菲利普二世驻威尼斯的代表的胡安·德·伊迪亚克斯1579年2月5日从法国大使那里获悉：马格利亚尼在君士坦丁堡不再受到监禁；他和他的下属都身穿新衣，还打算在佩拉租一幢房屋。“此间人士据此得出结论：土耳其人正在等候的陛下派出的负责前来缔结停战协定的特使，已经离这里不远。”[52]

然而，东·胡安·德·罗卡富尔却并不急于前往赴任。1月9日，他仍然在那不勒斯。3月4日，威尼斯有人传说，他正临近君士

坦丁堡。马格利亚尼已经从那里派出两个人前往迎接。[53]但是，这个消息发得过早。罗卡富尔“病了”。我们如果了解他收到的第二项指示和西班牙所抱的保留态度的话，就会像土耳其人那样对这种病，甚至对拖垮这个可怜的人的旧病复发产生怀疑。马格利亚尼仍然在一项与前几年签订的停战协定类似的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吗？我读过的文献资料都没有提到这件事。一则法国的通讯让人猜想有过这件事，但语焉不详。[54]总之，在 4 月份，土耳其舰队，或者至少是这支舰队的易于动员起来进行战斗的那部分舰船，在厄尔杰·阿里的率领下，向黑海进发。因此，在那不勒斯，人们很快就坚信土耳其舰队不会“出航”了。这个情况——简单的假设猜测——难道没有促使胡安·德·罗卡富尔中断他的旅行吗？

罗卡富尔不管是否生了病，都没有渡过亚得里亚海。8 月 25 日，埃凯瓦里船长在拉古萨登岸。他由一个名叫胡安·埃斯特万的人陪同，带着赠送给土耳其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的礼品，还为马格利亚尼带来缔结停战协定所必需的一切权力和保证。[55]这就使马格利亚尼所扮演的简单代理人的角色转变为真正的大使的角色。与此同时，一个新任法国大使到达君士坦丁堡。[56]9 月 16 日，这位大使从年迈的穆罕默德那里获悉土耳其同西班牙的停战协定很可能即将签字[57]，于是他很自然地立刻从中作梗。首先是发动一场新闻战，用旁敲侧击、含沙射影的办法来进行破坏。马格利亚尼解释说，西班牙国王所采用的已在君士坦丁堡为人所知的战略措施，是针对葡萄牙的。(这个国家的王位继承问题所产生的危机甚至早在红衣主教国王[58]死前就已经开始了。)正在这个时刻，这个法国人却利用流传于君士坦丁堡的传闻[59]，声称西班牙的这些战略措施是

针对阿尔及尔的。他还谈到意大利的战争,并暗示由于萨吕塞侯爵领地事件,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他的这些行动都徒劳无功。后来,热尔米尼——这位法国大使被指责未能把西班牙的外交道路阻塞住。但是,他除了打这场小笔墨仗之外,无法进行其他战争。圣巴托罗缪惨案发生后的最初几年,法国的威信在黎凡特真是一落千丈。这个国家明显软弱无力,在西方受到严重损耗。这些都削弱了它在君士坦丁堡的力量。谈判者不能空着两手来谈判。法国的政策刚刚导致逮捕了一个可能是唯一的能够把土耳其引向西方的人——克洛德·迪·布尔。他是安茹公爵的代理人,1579 年在威尼斯被捕,并被递解给米兰多拉。[60]他的计划是劝使土耳其参与安茹公爵对荷兰的征服。安茹公爵和沉默的威廉、整个欧洲的新教徒以及英国人都有联系。正如马格利亚尼指出的那样,这些人在君士坦丁堡都有代理人。这里面有引诱土耳其人之处。但是,土耳其人已经深深卷入使人精疲力竭的对波斯的战争中,几乎无法同时转过身来朝向西方。

总之,1580 年对马格利亚尼来说,是工作困难的一年,也是取得胜利的一年。马格利亚尼的使团现在正式附属那不勒斯,由东·胡安·德·苏尼加(此人在他的侄儿死后当上了卡斯蒂利亚的大封地骑士,在蒙德哈尔死后当上了那不勒斯的总督)领导。这个使团摆脱了与西班牙的迟缓的通信联系,现在办事比过去更有效能。大家知道,在蒙德哈尔时期,情况正相反,禁止马格利尼亚向那不勒斯通报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对马格利亚尼来说,任务显得容易。他渡过一些危急时刻,尽管剩下的时间是在闲扯、长聊和长聊之后同样长的情报汇报中,有时甚至是在因选择他们在佩拉的

主要教堂[61]里就坐的椅子而在关于在先权的问题上与热尔米尼发生的争吵中度过的。这些或者毫无意义可言,或者是想向土耳其人表示不可能在君士坦丁堡保持一个西班牙的常驻代表。而在君士坦丁堡保持西班牙的常驻代表这件事,正是菲利普二世不愿意作出的让步。

对马格利亚尼来说,另外一个困难在于:在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上,重大的角色不断更换。1579 年 10 月,穆罕默德帕夏遇刺身亡。接替他的阿吉赫梅特帕夏是个智力相当低下、碌碌无为的人。这可能对西班牙有利。[62]但是,他也于 1580 年 4 月 27 日亡故,由穆斯塔法帕夏继承。和这些高层的变化相对应的是小人物这个层次里的层出不穷的变化。索洛蒙博士虽然还在位,但译员霍朗贝已经销声匿迹。相反,我们发现了布拉蒂这个如果说不是三料,至少也是双料的间谍。当这个人的瞎吹胡说和背叛投敌行径很可能除了败坏马格利亚尼的名声之外还可能危及一批为马格利亚尼效劳的人物如锡南、阿伊达尔、因格莱斯、胡安·德·布里奥内斯[63]……等的时候,马格利亚尼只能揭露他,谴责他,而不能撵走他。两个新来的人出现:贝纳维德斯和佩德罗·布雷亚。他们是土耳其掌玺大臣公署的职员。前者是犹太人(他的宗教信仰阻禁他礼拜六上船),他对他在该机关拟定的文件了若指掌;后者是什么人较难确定。但是,这两个人都肯定是双重代理人。我们附带看见威尼斯在地中海殖民地的总督、拉古萨的商人尼科洛·普罗达内利和他的兄弟马里诺。马里诺的船 1580 年 10 月在那不勒斯。[64]

事实上,马格利亚尼在左右局势,但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因此,他难于维持自己的优势,难于不让自己被厄尔杰·阿里的夸

口和恐吓弄得惶惶不可终日。厄尔杰·阿里当着首相的面对他大发脾气，弄得他狼狈不堪，下不了台。或许这只不过是土耳其的大臣们在幕后导演的一出戏而已。但是，这出戏加进其他恐吓，却令人惴惴不安。厄尔杰·阿里在海军造船厂宣布和平谈判中断，他奉命武装帆桨战船200艘、大型帆船100艘。但是，马格利亚尼是个坚持自己的立场的人。他用具有权威的口气谈话，不避开危险。他宣称，“他下定决心在规定基督教徒的权利的协定缔结以前不以陛下的名义就任何问题进行谈判，不递交正式信函文书或礼品。”[65]他自告奋勇，要争取到土耳其舰队春季不离港出航。厄尔杰·阿里对他言词粗暴和行动过火[66]，只不过证明了土耳其舰队司令卡皮丹帕夏的恼怒。这并不是一场玩得称心如意的游戏。一份1580年2月26日发自君士坦丁堡的公文急报说，马格利亚尼发觉不可能同“这些土耳其狗”[67]达成一项能够满足他自己的荣誉要求或者满足为国王的效劳的协议，但是，事实上，在这个日期以前，一切都正在解决。18日早上，萨洛蒙博士携带一份和解性的文本来看他。由于问题不在于君主之间的一项协定，而在于帕夏和马格利亚尼之间的一项安排，因此，礼仪方面的困难一下就得到解决，[68]虽然马格利亚尼在这个过程中被弄得心绪异常不宁，受到粗暴的接待并且再次感到“危险”笼罩在他头上。3月7日，他写道：“最近50天来，我一直处于这种危险中。”[69]他甚至在这个日期还不完全放心。他在同一天嚷道：“我很担心所有我们达成的协议在破裂时引起巨大轰动，闹得满城风雨，以致我们希望根本从来没有开始进行过关于这项停战协定的谈判。”

然而，双方面临的局势、波斯战争的和葡萄牙战争的需要以及

使东方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的可怕的灾荒[70],都使停战协定的签订势在必行。签订日期已经临近。事态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每当可怜的马格利亚尼认为谈判已经完全绝望时却又恢复。博士或者另外一个调解人返回。帕夏同意重开谈判。马格利亚尼于是松了口气。[71]然后,在关于非斯王国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一场新的冲突。马格利亚尼拒绝承认这个王国属于土耳其皇帝。[72]接着又发生了一场关于葡萄牙的问题的争吵。[73]3 月,威尼斯盛传马格利亚尼有被处以木桩刑的危险,厄尔杰·阿里威胁要挖出他尸体上的眼睛[74]……但是,同月 21 日,他以惯常的形式同帕夏签订了一项有效期为 10 个月,到 1581 年 1 月期满的新停战协定。为了避免引起争议,这项协定的意大利文本存留在帕夏手里,而以金字书写的土耳其文本则交给马格利亚尼,然后再由马格利亚尼转交苏尼加。[75]

在这之后,由于和平在最近的将来得到保证,谈判休止了一段时期。谈判双方都让对方有闲暇休息。西班牙代理人胡安·斯特法诺前往西班牙,把消息带到那里,并从那里带回命令。这一次基督教世界都了解到事态的发展情况。5 月初,罗马获悉这项协定。那里有人觉察到事情与西班牙人先前的声明并不十分符合,即实际上使节是奉派前去中断谈判。[76]但是,罗马丝毫不打算就此声明、表态,因为在 1580 年这一年,它也放弃了地中海和对伊斯兰的战争,以便转而专心致志于处理爱尔兰事务和对新教徒的战争。

曾经密切注视米兰人马格利亚尼行事动向的热尔米尼声称,这个米兰人的成功是用极大的代价换取来的。的确,马格利亚尼更主要是借助诺言来办事[77],他的成功特别应该归功于环境和时机。在签署停战协定的时刻,最后对土耳其人产生作用的,是令人不安

的关于阿尔及尔暴动的消息。如果菲利普二世(他的舰队最近为进行葡萄牙战争作好了准备)能腾出手来在地中海自由行动的话，一切都有丢失的危险[78]。威尼斯了解这一点。它到那时为止一直保持沉默，心怀敌意，现在却改变了态度，力求把自己包括进正在准备缔结的和约之内。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1580年的停战毫无疑问由于夏里埃尔的老文献资料汇编和1855年在戈塔出版的津克森的那本始终十分有用的书对之作了清晰的阐述，因此，大多数严肃认真的历史著作都提到它。[79]然而，奇怪的是，它被人当作孤立的、特别的事件来加以描述，而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条长链条的一环。没有这条链条的其他环节，这一事件是很难理解的。

1581年的协定

在君士坦丁堡，没有任何人怀疑和约将在短期内缔结。然而，达到这一步却花了差不多整整一年时间。夏季在断断续续的谈判中度过。争吵的不再是关于称号和在先权方面的问题，而是关于信使报导方面的问题。4月5日，人们通过拉古萨的渠道获悉红衣主教亨利之死。马格利亚尼写道[80]："这个消息在这里的人的思想上引起某些变化。在这些人看来，由于没有经过大量流血和长期战争就完成了对这些王国的兼并，陛下的兵力变得如此强大，以致人们必然有理由对之心存恐惧。人们心存恐惧，特别是由于人们深信……(今后)陛下将更难同意根据他们希望的方式停战或者休战。"在另一方面，马格利亚尼却害怕厄尔杰·阿里的行动。据说，厄尔杰·阿里将率领60艘帆桨战船

前往阿尔及尔平息那里的动乱。“但是,另外一些人声称,厄尔杰·阿里虽然的确是为了这件事去阿尔及尔,但也是为了去进攻非斯国王……当他这次出行已经肯定无疑时,我准备去加以阻止……”[81]否则停战协定的全部条款都会受到威胁[82]。毫无疑问,这是通过别的渠道得到消息的卡斯蒂利亚大封地骑士的想法,是他写给马格利亚尼的信的内容。[83]对阿尔及尔的远征最终并没有进行,但同10月份传来的阿尔贝公爵对东·安东尼奥取得的胜利的消息一样,成了多次争论的题目。帕夏得知这位公爵这时发给他的士兵20万多布朗,立刻派人去马格利亚尼处询问为什么要发下这一笔钱,1多布朗价值多少。马格利亚尼赶紧答复说,一多布朗值两埃居。为了让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他交给同他谈话的人10来个多布朗。后者问他,胡安·德·埃斯特法诺在干什么,为什么耽搁这样久。[84]两个谈判者之间的既充满猜疑又毫无意义的谈判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时正值夏季。要在冬季才开始严肃认真的会谈。

12月份,风云突变,形势再度紧张起来,[85]因为胡安·德·埃斯特法诺仍然没有到达。马格利亚尼非常为难。帕夏催问他,西班牙国王是否已经下令缔结和约。不幸的是,马格利亚尼的一些信件已经散失,因此无法了解他的使命在最后几个月的执行情况。12月10日和20日之间,土耳其人的要求似乎更加明确起来。这些要求使马格利亚尼陷入十分尴尬为难的境地,因为正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他等待已久的命令(是否胡安·德·埃斯特法诺同来他没有明确说明)。这些命令他读后感到惶惑迷惘。国王要人告诉他:鉴于用“合乎愿望的平等方式”行事困难,因此,他已经放弃争取合乎正式手续的停战的想法。他这番话的意思是:他拒绝神圣罗马帝国

皇帝接受的并附有设置常驻外交代表的规定的那种协定。[86]

马格利亚尼对他应该做什么最后心中有了数，于是打定主意，尽快工作。他在12月28日的信中谈到他同土耳其近卫军的阿加会谈了整整3小时。12月27日出之前，后者给他派来一艘土耳其的狭长形轻舟，把他带到伊斯坦布尔。尼科洛·普罗达内利在会谈中担任翻译。马格利亚尼对此感到满意。他写道："他比别的任何人都更聪明能干。"可能他之所以选择这个翻译，是因为他正在为他的使命，为他应该让阿加转达些什么感到为难。阿加对这次会谈一点摸不着头脑。当他问马格利亚尼是否将去亲吻素丹的手时，这个意大利人回答说：如果有正式条约，他就去；如果只有暂时停战协定，他就不去。对我们来说，这倒是一个顺便了解这两个名词之间的区别的机会。了解这两者的区别是重要的。菲利普二世不接受正式条约；素丹则同意这种条约。但是，马格利亚尼问道，在这种情况下，"平等"会是什么样呢？他的对谈者又一次弄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然后，轮到这个对谈者来提出一些更加简单、更加明确的问题。马格利亚尼会留下来吗？"我对他说不留下来。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既然没有贸易往来，根据作出的决定，就没有必要继续留下了。我说这番话时微微一笑。我又说，我想对他讲老实话，有两个理由已经使我下定决心：第一个理由是：我发现这里的人待人接物缺乏礼貌；另一个理由是：法国大使馆的秘书返回时在他路过的基督教世界的各个地区散布关于他带回法国的有关在先权的声明的谣言……"

这位西班牙使节对他提出的理由不大有把握，于是叫人付给素丹的母后5,000埃居。这个女人乘机向他多索取。与此同时，他

注意设法不出示国王给予他的授权证书,借口他已经把这个证件送回那不勒斯。[87]他干事迂回曲折,手段十分灵巧,因为 12 月 10 日,已经有人要他提高警惕,谨防危险。在年底以前,他差不多已经说服了他的谈判对手。2 月 4 日,好几封信和公文急报从君士坦丁堡发往不少地方,宣布停战协定已经缔结,为期 3 年。[88]同一天,马格利亚尼致函东·胡安·德·苏尼加说[89]:"12 月 27 日圣约翰日这天,我去吉哈奥乌吉赫帕夏处。因为在我的眼前有陛下的尊严,于是我就用在我看来合适的言词向他陈述了我的使命。此后,我同这位帕夏多次会见。最后,1 月 25 日,他叫人来要我去他那里,他向我传达他的君主准许我离开的决定并告知陛下。他希望我尽最大努力使两国之间的融洽关系得以建立。在这种关系尚未建立期间,将签定一项为期三年的暂时停战协定。"根据热尔米尼的说法,这项协定几乎是前几个停战协定的再版,与前几个停战协定不同的是,这项协定为期三年。[90]那不勒斯总督 3 月 3 日接到这个消息,赶紧向菲利普二世报告。而且,在他看来,马格利亚尼谈判得非常之好。但是,他寻思教皇是否会不利用这件事来束紧一下他的钱袋的带子。[91]

不错,教廷会作出什么反应呢?那不勒斯总督东·胡安·德·苏尼加曾任驻罗马大使,对这一点比别人考虑得更多,更加关切。他认为抢先下手是最明智审慎之举。3 月 4 日[92],他为罗马方面给这个消息作了下面这种奇特的解释描述:他写道,他过去曾经告诉马格利亚尼菲利普二世不想停战。与此同时,他还援引尽可能正当的理由来为西班牙国王辩护。但是,当土耳其人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君士坦丁堡马上就有人谈到要用木桩刑来处决马格利亚尼。马

格利亚尼被指控在西班牙结束对葡萄牙的征服之前曾经用谎言假话来欺骗素丹。人们知道,类似的暴行土耳其人是完全干得出来的。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这个可怜的骑士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答应停战一年。土耳其人要求停战三年,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后才准许他返回基督教世界。但是,如果有哪个基督教国家想进行反对土耳其人的活动,破坏这个协定是轻而易举的,这一点毫无疑义。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协定是用武力强加于人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海上行劫者的一次破坏就会提供了一千次机会。胡安·德·苏尼加又顺便写道,不幸的是,目前我们被一大堆事情缠身,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来反对土耳其人,停战本身是无足轻重的……

在1581年这同一年里,一个威尼斯大使重复了那不勒斯总督描述这一事件的话。[93]这些话他自己相信吗?这些话在罗马有人相信吗?或许人们并不想把事情的真相过分弄清。首先,教廷最关切的是在爱尔兰采取的对抗英格兰的行动。在教皇看来,除了西班牙之外谁还能够起来和英格兰这个岛屿对抗呢?[94]

因此,在那个时代的人中间没有任何人像过去曾经有人谈到威尼斯的背叛那样谈到西班牙的"背叛"。只有例外才能证实规律:西班牙的教士大声疾呼,强烈抗议,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的一些人更加喜爱针对非基督教徒的十字军东征,而是因为既然战争已告结束,他们要求不再缴纳为了战争的目的而设置的和维持的捐税。他们提出这项要求是徒劳无益的。

后来对西班牙"背叛"它的盟国一事起诉的是历史学家。起诉这个词用来形容瓦特延和R.科内茨克用于叙述这起事件的几行文字稍嫌过分。R.科内茨克写道[95]:"反对土耳其的战争就这样最

终永远放弃了。随着这一战争的停顿，也中断了西班牙的百年传统。曾经激励和团结西班牙半岛的精神力量的对抗伊斯兰教的宗教战争不复存在。或许复地运动和继它之后对北非进行的远征袭击并不纯粹是宗教战争。然而，是宗教精神在不断鼓舞和推动这些行动，并且使这些行动在西班牙被人感觉是他们的一项共同的伟大事业。推动西班牙向前发展的功率最大的马达瘫痪了。"

如果考虑到西班牙的总的发展演变情况，这是一个准确的但在很多特别地点却是不正确的判断。从西班牙喷涌出来的那股宗教推动力量，在 1580 年那几年以后，转折到另外一个方向。反对异端的战争，也是一种宗教战争。这种战争包含一般战争包含的那些惯常的成分。此外，后来还有几个矛头指向北非和土耳其的图谋。后一个图谋即所谓 1593 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确无关紧要。

不管怎样，1580 年等年份在西班牙—伊斯兰世界外交关系史上形成一道鸿沟，这是事实。即使这段历史在过去比人们通常所说的更不连贯，更支离破碎，更游移不定，这个事实仍然存在。事实上的和平在马格利亚尼完成了他的使命后建立起来。1581 年的停战协定似乎在 1584 年甚至在 1587 年延续[96]。后来发生新的战争时，这些新的战争也无法与过去规模巨大的战争相提并论。停战和西班牙外交政策的机动灵活的权宜之计是迥然不同的两回事。[97]

难道我们因此就说西班牙于 1581 年叛离它的盟国吗？极而言之，往最坏里说，西班牙只不过叛离了它自己，叛离了西班牙的传统，叛离了西班牙的精神本体。但是，当事情涉及一个国家时，这种种叛离行为就并不常常只是精神方面的概念。不管怎样，西班牙既没有叛离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也没有出卖威尼斯让它可能遭到

报复，也没有抛弃它耗费巨资保卫的意大利。谁能指责它同土耳其进行过谈判呢？并不是西班牙把土耳其引进了欧洲的合唱。地中海的大规模战争甚至超过了大国本身的人力和物力所能负担的程度。这些政治巨兽感到要保住它们各自横在海上的那一半躯体十分困难。叛离和松开手来放弃斗争是判然有别的。在进行微妙棘手、晦涩难解的谈判的那些年代里，把战争带到地中海范围以外的钟摆的摆动起着双重的作用。它一方面在一场比在地中海这个封闭的场地内进行的海上冒险更大的海上冒险中，把西班牙推向葡萄牙和大西洋；另一方面，它又把土耳其抛向波斯，抛向亚洲的深处，抛向高加索、里海和亚美尼亚，后来还把土耳其抛向印度洋本身。

2. 战争离开地中海的中心

我们虽然了解土耳其战争的大幅度的起伏变化，但不能自始至终都对这些变化加以解释。对苏里曼大帝的统治所作的最简短的概括，明显地标示出了这些起伏变化。[98]这些起伏变化比这位君主的意志更支配、影响他长期的光辉的统治过程。土耳其的强大力量逐年依次向亚洲、非洲、地中海和欧洲的巴尔干摆动。每次摆动都有不可抗拒的推力与之相对应。如果说有一种什么有节奏的历史的话，这就是这种历史。但是，这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领域，主要的原因是：历史学家坚持对个人的力量作过高的估计。他们很少关注由来已久的、深刻长远的发展演变运动（例如土耳其帝国从既被它摧毁的又被它扩展的拜占庭帝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发展演变运

动），很少关注在主要的战线之间建立了必要的补偿的国际关系政治物理机制。土耳其的强大力量，通过这些主要的战线沉重地压在它外部世界上。

土耳其面对波斯

在1578年和1590年之间的这段时期，土耳其历史的内部运转情况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例如哈默的叙述所依据的编年史只不过是按照发生的事件提出重大问题而已。

其次，我们作为历史学家所不了解的，不仅仅是土耳其的——比较而言，这个国家几乎是紧密结合的、一致的、可以理解的——而且还有波斯的广阔的疆域。这是伊斯兰教世界的另外一种形式，这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另外一种文明。我们也不了解位于波斯、土耳其和东正教的俄罗斯之间的地区……最后，这另一个转盘——土耳其斯坦——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越过这些地区还有浩瀚的印度洋。这个海洋上的贸易掌握在葡萄牙手里，情况很糟，从1580年起由西班牙协助进行，但这主要是在理论上，而不是在事实上。

然而，正是这整个地区，在1577年和1580年之间的这段时期以后，土耳其的突然大转变把它卷进了争端之中。土耳其的这种转变是和当时把西班牙抛向大西洋的突然大转变同样强有力的转变。大西洋是欧洲的新财源。土耳其在向亚洲摆动的同时，也转身朝向类似的财源吗？没有任何文献资料为这种设想提供证明。我们的情报资料是如此不连贯完整，以致我们只能提出一些印象。

编年史告诉我们的是：波斯当时正在同可怕的政治困难进行

斗争。自从1522年以来就一直统治波斯的塔尔马斯克国王于1576年5月遇刺身亡。[99]继这起事件之后，新王哈伊德很快遭到杀害。接着是伊斯梅尔亲王登基。这位亲王为了继承王位被从阴森可怖的监狱中释放出来。他在位仅16个月，到1577年7月24日为止。最后是几乎双目失明的亲王、未来的阿巴斯大帝的父亲穆罕默德·霍巴本代登位掌权。这些事件加上若干其他事件(特别是格鲁吉亚、切尔卡西、土库曼和库尔德等部族所起的难于弄清的作用)使人了解到当时波斯的脆弱。这些事件说明为什么对土耳其边境上的首领，特别是对克霍斯雷弗帕夏，有一种诱惑力，为什么所有土耳其的“军人”会制订那样的政策。这些“军人”是锡南帕夏、穆斯塔法帕夏等几年来曾经献身海军的陆上司令官。当时波斯的核心似乎正在腐烂解体……这一点必须加以利用。

1578年从君士坦丁堡寄出一些信件。这些信件的收信人是波斯北部地区的奇尔万、达格斯坦、格鲁吉亚和切尔卡西等地的王侯，不管这些王侯是否在位掌权，是否被人服从，是否势盛力强。12封这类书信被收入历史学家阿里撰写的关于这场新波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役的故事《胜利之书》这本书中。[100]这些信分别寄给：“奇尔万的前君主的儿子夏布罗赫·米尔扎、库穆克和卡伊塔克的君主谢姆哈尔、里海海岸的达格斯坦的塔巴泽朗的总督、埃里温和奇尔万之间的地区的君主莱温德的儿子亚历山大、巴希·阿特奇乌克(伊姆克雷特)区的领主洛纳尔·萨布的儿子乔治、古里埃尔的君主和明格雷利亚(科尔奇斯)的君主达迪安。”这一连串名字把黑海和里海之间可以辨识出来的地区都卷入了纷争。在1533年和1536年之间这段时期以及在1548年和1552年之间这段时期，这

同一个地区就已经在苏里曼对波斯的各次战争的背景上出现。

关于这些中间地区的情况,关于凡城地区的土耳其边境的情况,或者关于在1576年和1578年之间这段时期被君主、王侯的血染红的波斯的本身情况,我们尽管知之甚少,但土耳其人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的矛头当时指向里海这一点看来却是可能的。目标并不一定就在于掌握、控制这个海,但进入这个海就足以直接威胁马赞达兰的波斯海岸。在这个帆桨战船还鲜为人知的海上,这种船只在作战时因而更加有效。在1568年那场战争进行期间和制订顿河—伏尔加河计划时,西方的外交通讯就已经提到这个战略目标了。但是,土耳其人那时难道还没有到达土耳其斯坦,到达俄罗斯人已于1566年因占领阿斯特拉罕而切断了的亚洲内部的道路的愿望吗?土耳其斯坦毕竟是丝绸之路所经之地。波斯应该把这个世纪末以及阿巴斯国王的伟大统治给它带来的经济复兴部分地归功于这些通往亚洲内部的道路。这些道路也是波斯的第一阶段的扩展的发源地。这次扩展可以从波斯的城市的发展中看出。这次扩展能够把英国商人从很远的地方吸引过来。它表现在亚美尼亚商人令人惊讶地散布在靠近印度洋的各个地区以及土耳其的位于亚洲和欧洲的各邦这一点上。这些商人之中的某些人1572年甚至到达了但泽。[101]大不里士这个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贸易中心是诱惑人的猎物。

良好的时机和波斯的日益衰弱由于土耳其人对他们的敌手拥有明显的技术优势而对土耳其人更加有吸引力。波斯人没有炮兵,很少火枪。土耳其人炮兵的数量也并不充足。但是,他们有这个兵种就足以使他们占上风。在土耳其人面前,没有堪称堡垒的堡垒。

在土耳其和波斯接壤的广阔地区，唯一的防御物是沙漠。在这些沙漠中，有些是天然的，其他的则是人为的。谨慎小心的伊朗帝王蓄意减少这些地区的人口。[102]

当然，在历次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中，宗教都起了作用。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接受和认可了对"什叶派狗"[103]——这些叛徒和戴"红帽子"的异教徒[104]——进行的斗争的虔诚的和近乎神圣的性质。特别由于什叶派教徒——"波斯教"的信徒——遍布土耳其帝国的亚洲部分，一直到安纳托利亚的中心地区，伊斯兰法典说明官就更加激烈地这样行事。1569 年，什叶派教徒举行过暴动。[105]但是，东方的情况和西方的情况一样，并没有什么纯粹的宗教战争。土耳其人在通往波斯的道路上前进时，被很多其他他们亟欲占有的东西弄得犹豫不决、动摇不定。除了那些我们已经举出的东西之外，还宜于加上格鲁吉亚的种种诱惑。这是一块可以使之成为提供大批男女奴隶、商旅往来频繁、道路四通八达、财政收入充裕的土地。

认为土耳其有一项宏伟的、长远的、强有力的政策的这种看法，并非一直被人接受。有人想指出的随着苏里曼大帝之死而开始的所谓的土耳其的衰落是一种估计判断的错误。土耳其仍然是一股强大的、远非粗野的而是有组织、有纪律和深思熟虑的力量。如果它突然抛弃它所熟悉的地中海的战场，转向东方，这并不足以成为宣称土耳其已经"趋于衰落"的理由。土耳其这样做，只不过是跟从自己的命运而已。

对波斯的战争

对土耳其人来说，这场战争仍然是一次使人筋疲力竭的严峻考验。塞浦路斯的征服者、总司令穆斯塔法 1578 年进行的第一次战役一开始就预示了即将来临的巨大困难。土耳其人在这个战役中取得某些重大胜利。这些胜利全都是用高昂的代价换来的（例如 1578 年 8 月 9 日在格鲁吉亚边境上的库拉河边的鬼怪古堡取得的胜利[106]）。如果说土耳其军队轻而易举就进入第比利斯的话，那么，从第比利斯到卡纳克、跨过这条河、穿越森林和沼泽的长途行军，就不如此了。粮草缺乏、精力耗尽、再加上不断受到波斯可汗袭扰的士兵大批死亡。但是，土耳其人 9 月份却在卡纳克河边再次获胜。格鲁吉亚的大部分土地仍然在他们手中。9 月份，土耳其军队总司令把这片土地划分为 4 个省，在这些省份留下省长、军队、炮兵，并且布置了在这些富饶的省份，特别在奇尔万，征收波斯人所征收的丝绸税的任务。与此同时，土耳其军队总司令设法取得已经在开始时以不同的程度愿意接受土耳其人的征服的当地诸侯的支持。秋季来临，他率领被“五次战斗和疾病”[107]造成大量伤亡的部队撤往埃尔祖鲁姆过冬。

这第一次战役显示出土耳其人遇到了什么困难呢？首先是敌人顽强；其次是土著反复无常（这些土著能够在山路要隘发起残酷的突然袭击）；特别是行军距离很长，行军宿营频繁艰苦，以及在这些高山、森林和沼泽纵横阻隔、冬季气候不适宜生活、肥瘠不均的地方几乎无法生活。同 1569 年“俄罗斯”战役的情况一样，巨大的空间起了抗击土耳其的作用。从君士坦丁堡（因为军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到埃尔祖鲁姆要宿营 65 次；从埃尔祖鲁姆到阿雷奇（远征

没有超越这个地方)要宿营69次。军队返回时,沿途宿营次数相同。对这样的远距离作战来说,最适合的兵种是携带辎重不多的骑兵,而不是根据西方的方式装备起来的配备有笨重累赘的后勤部门、步兵和炮兵的军队。[108]理想的工具是鞑靼骑兵这支部队。但这也并不是土耳其人可以自然而然地信赖的工具。必须设法取得它的支持,不是在它无能为力的山区使用它,而是在位于高加索以北和以南的辽阔的平原,特别是在北方使用它(这一点1580年奥斯曼帕夏进行的袭击可以证实)。但是,土耳其人以后在遭到破坏的地方又怎样生活,又怎样使他们的占领能够成功呢?

不管怎样,波斯人知道利用冬季的气候条件,他们于1578年和1579年之间的冬季转入反攻。和远离基地、住在临时建成的宿舍、习惯地中海气候的敌人相比,他们更能忍受亚洲的严寒。土耳其的据点对波斯人的首次进攻进行了抵抗。但是,一些据点在波斯人发起第二次进攻时陷落。土耳其人撤离奇尔万。他们在这个城市的卫戍部队撤到杰尔宾特。这是一个可怕的冬季。毫不奇怪,来自叙利亚的公文急报令人惊惶不安。[109]西班牙在君士坦丁堡的情报人员兴高采烈。他们当中有一个写道[110]:"据悉,陛下(西班牙国王)的一位大使即将到来。这使我感到大为不快。因为目前不是来到此地的时刻。如果他来,就必须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来。"观察家们的结论是:战争将持续下去。[111]波斯人要价过高。[112]1579年7月8日,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写道:"波斯人不满足于取得美索不达米亚,他们想要土耳其人放弃他们的教派的仪式。"[113]

这是因为土耳其人遭到挫折,兵败如山倒。被这场可怕的冬季战争中的种种机遇巧合带回君士坦丁堡的士兵,使这个城市里观

看他们的人在目睹他们返回时大为震惊。[114]这些士兵的形象的的确确是人类苦难的形象。然而，素丹并不因此而放弃他的计划。1579 年整整一年，或者至少这一年中可以干活的季节都被土耳其军队总司令用来修筑卡尔斯的强固堡垒。因此，必须重新在埃尔祖鲁姆集中部队，储备粮食，[115]向特拉布松派去 40 艘帆桨战船、军火、大炮、木柴等[116]，与此同时在远方同鞑靼人和几个印度王公进行谈判。在卡斯宾和奇尔万附近地区，波斯骑兵的威胁仍然十分严重，特别因为据说格鲁吉亚人同他们结成联盟，并且已经把人质交给他们。[117]

这时，花费大量劳动建成的卡尔斯的堡垒在南方巍然屹立起来。[118]君士坦丁堡的目击者报导说，这座堡垒固若金汤、无法攻克。马格利亚尼写道："这条消息极为重要，土耳其皇帝予以高度评价，而且这样评价很有道理，因为他完成了他的祖父苏里曼素丹的未竟之业。不能否认，苏里曼素丹是个伟大统帅。最后这两个晚上，在土耳其皇帝的宫殿施放烟火，举行欢庆。我很担心这个消息会使他过分骄傲自满起来。"然而，几天以后他又写道："我希望塞尔万发生过的事，卡尔斯也会发生，我以此自慰。塞尔万被土耳其人同样成功地攻占和设防，后来又被波斯人收复，这使土耳其人蒙受了巨大损失。"[119]在威尼斯，有人说这座堡垒有半个阿勒颇那样大，方圆 3 里。[120]但是，当时威尼斯的消息的价值如何是人所共知的。

此外，1579 年夏季，波斯人似乎故意采取守势。根据威尼斯人的说法，这是因为害怕正在土耳其军队中流行的瘟疫，[121]这是因为慑于土耳其的大炮和军队的威力(我们会这样想)，波斯人这时正等待他们的同盟者——冬季——来临。然而，波斯人的威胁始终存

在。在威尼斯，人们谈到边境线上有一支25万人的波斯军队，[122]虽然这也许是威尼斯人的又一夸大其词的说法。但是，在君士坦丁堡本地，人们获悉：尽管土耳其人已经在卡尔斯修建了坚固的障碍物，但是，处于1578年的那场征伐中的中心的第比利斯现在仍然在敌人的包围之中。[123]9月，在威尼斯有人谈到土耳其军队总司令在强迫他的部队从埃尔祖鲁姆向卡尔斯进军时遇到的种种困难。之所以有这样的传闻，是因为土耳其军队在行军途中有延迟和耽搁。甚至还有人谈到土耳其近卫军士兵和土耳其骑兵哗变。也有人寻思是不是土耳其军队总司令自己煽起了这些兵变，因为他想找到一个停止继续推进的借口。[124]10月份，君士坦丁堡的官方一片乐观气氛：想在什么时候同波斯议和，就能够在什么时候同波斯议和。尽管如此，总司令穆斯塔法仍然奉命住进冬季营房。据说，他还奉命不把部队撤往埃尔祖鲁姆，而是更向西撤，一直撤到阿马西亚。[125]第比利斯虽然陷于重围之中，遭到夹攻，但被穆罕默德·索科里的儿子解救，并且由于他的关怀得到充分的补给供应。[126]但是，冬季来临。鞑靼骑兵的主力很快就将放弃他们已经在夏天劫掠过的达格斯坦。[127]我们应该顺便注意这是一支小部队（根据哈默的说法，这支部队有骑兵2,000人）。这支部队在1个月内成功地进行了长距离行军。这段距离中的北高加索的一大片几乎是沙漠地区，在里海边上把克里米亚和杰尔宾特隔开。这件事或许表明那里有一条比穿过亚美尼亚的对人冷酷无情的崇山峻岭的道路容易行走的入侵道路。

穆罕默德·索科里死去。阿吉赫梅特短期任奥斯曼帝国大臣，[128]锡南帕夏被任命为埃尔祖鲁姆军队司令[129]，后来又在向格鲁

吉亚进军时升任奥斯曼帝国大臣。但这些都不能明显地改变战争的形势。夏天，锡南帕夏让他的军队分为几路纵队从埃尔祖鲁姆向第比利斯进军。他重新组织了奥斯曼帝国对格鲁吉亚的占领。然后，他为了给他的粮秣草料征搜队遭到的失败报仇雪耻，决定对设防强固的大不里士城进行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应当在采取行动后很快就善罢甘休，不再继续进攻，并且在冬季即将来临之际撤回埃尔祖鲁姆。和平谈判当时正在进行。锡南帕夏获准来君士坦丁堡商谈议和问题。谈判很快就达成某种类似停战协定的协定，1582年有效。波斯大使易卜拉欣1582年3月29日进入君士坦丁堡，"随带一支由数目与一年的天数相同的人员组成的队伍"。[130]

然而，在格鲁吉亚遇到的困难使土耳其军队不得不进行某些活动。必须在1582年夏季从埃尔祖鲁姆运来粮食供应第比利斯，[131]以备即将来临的冬季的需要。但是，供应运输车队却遭到格鲁吉亚人和波斯游击队的突然袭击。第比利斯的局势恶化起来。与此同时，波斯派驻土耳其的使团的活动突然停止。这一系列失败导致据说反对波斯战争的锡南帕夏被撤职和流放，导致1582年12月5日任命一个新大臣，即那个我们已经看到在1581年1月和马格利亚尼会谈的终结时同马格利亚尼较量的吉哈奥乌吉赫帕夏。

这个内部危机包含着战争的继续。作战指挥权准备留给鲁梅利的省长、这时已经升任大臣的费尔哈德。1583年和1584年的战役由他负责指挥。他关切操心、全力以赴的任务就是奉素丹之命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设防。因此，1583年在埃里温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堡垒，1584年修筑或者整修了一些古堡，并且在洛里和托马尼斯设防。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奥斯曼帝国的东部形成

了一条西方式的边界线，有要塞、守备部队和后勤供应运输队。这是一项审慎的政策，也是一项需要耐心的、不会带来光辉业绩但却使士兵艰苦劳作的政策。

这个期间，另外一场更加激烈的战争已经在达格斯坦总督奥斯曼帕夏的强烈要求下先在1582年，后又在1583年和1584年之间这段时期在北高加索(停战协定在这里没有被严格遵守)的横贯鞑靼草原的通衢大道上开始。这是一场没有使用过多的兵力就从黑海扩展到里海的战争。大量军队奉素丹之命在加法集中。[132]除了人员外，还向那里运去物资、粮食、86吨黄金。从人道的观点看，波斯战争不但耗尽国力、难于负担，而且不用说还吞噬巨额钱款。因此，很快就有了打算向清真寺借贷的说法。在此期间，1583年一份英国人的报告叙述说，波斯人准备了一车一车的银锭来支付军饷。[133]土耳其支付军饷用黄金；波斯支付军饷用白银。这个区别我们已经看到。

在加法组成的远征军由德雅费尔帕夏指挥，用了两周时间渡过顿河。为了开辟道路这支军队必须付补偿费给它在北高加索北部遇到的当地的部落，必须长时间地穿行野鹿成群的荒无人烟的地区。[134]经过80天的行军，这支军队于1582年11月14日抵达杰尔宾特。这时，它已经筋疲力竭，打算在该地过冬。春天来临，这支小部队在奥斯曼帕夏的率领下，再度出发，打败波斯军队，一直进抵巴库。奥斯曼让德雅费尔帕夏留在达格斯坦担任官职，然后把他其余的部队撤到黑海。这支军队在撤退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它在特雷克和库班河附近同俄罗斯人一再交锋后，抵达加法时被鞑靼人包围。鞑靼人作为同盟者很不忠实，至少信守盟约很不坚定。

他们拒绝像奥斯曼要求的那样废黜他们的可汗。要使他们就范，至少需要厄尔杰·阿里率领一支由帆桨战船组成的舰队进行干预。我们应当注意，如果我们使用的文献资料提供的数字是准确的，那么当时奥斯曼只率领了 4,000 人。这个事实显示出这个特别战役的规模大小。奥斯曼到达君士坦丁堡时受到素丹的异乎寻常的欢迎。素丹聆听他的长篇报告一连听了 4 个小时。他被任命为首相。素丹还委以指挥埃尔祖鲁姆的军队的重任并赋予攻占大不列士的使命。

土耳其军队的这位新任统帅在冬季聚精会神，全力以赴，进一步平定了克里米亚。晴好的季节一旦来临，他就率领一支有意缩编了的军队离开埃尔祖鲁姆。夏季末(1585 年 9 月)，他突然挥师转向大不列士并一举攻下这个城市。大不列士是个商业和手工业城市，位于盛产谷物和水果的平原的中心，对饥饿疲惫的土耳其军队来说，这不啻是个意外收获。但是，这个城市在遭到可怕的洗劫后，必须设防筑垒，加强防务，因为包围要塞的波斯人仍在继续战斗。奥斯曼帕夏取得这次辉煌胜利之后，在一次夜间遭遇战中阵亡(1585 年 10 月 29 日)。哲加拉把这支军队带回过冬营地。但是，波斯人仍然没有停止战斗。1585 年和 1586 年之间的冬天，从第比利斯到大不列士，沿土耳其长城的要塞全都处于索非的臣民和他们在当地的同谋者的包围之中。土耳其的长城再次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大不列士被第二次前来担任亚洲地区指挥职务的土耳其军队总司令费尔哈德帕夏及时解围。土耳其人缓慢地但有效地夺回了优势。在以后的两年，战争的确改变了性质，因为波斯人突然不得不对付新的敌手——霍拉桑的乌兹别克人。他们遭到来自背后的

进攻，同时他们征募骑兵的工作也困难起来。土耳其人于是超越大不列士向南挺进。一场以埃尔祖鲁姆为中心的战争很快就转变为一场以巴格达为中心的战争。在这个城市附近，费尔哈德帕夏的那支因补充了匆忙征募的库尔德士兵而壮大起来的军队1587年在格鲁斯平原打垮了波斯人。第二年土耳其人再次挥师北进，把兵力投向卡拉巴格地区的大不列士的周围。他们占领了那里的根德杰，并在这个城市尽力筑堡设防，为即将到来的战斗进行准备。

但是，在这个期间，年轻的阿巴斯在他的父王还在世时(1587年1月)，不管父王是否愿意，就参与治理国政。他明智审慎，知道面对困逼他的王国的两种危险——一方面是乌兹别克人；另一方面是奥斯曼帝国——宁愿在西方作出让步。于是，一个显赫庞大的波斯使团由哈伊德·米尔扎亲王率领再次到达君士坦丁堡。在新素丹穆拉德已经在那里开创了一个光辉伟大的时代的土耳其首都，波斯使团受到十分盛大的接待。谈判旷日持久，但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和约于1590年3月21日签订，从而结束了一场历时达12年之久的战争。土耳其在谈判中顽强坚持，寸步不让，并在缔结的条约中得到报偿。它征服的全部土地，即：格鲁吉亚、奇尔万、劳里斯坦、斯舍尔佐尔、大不列士和附属它的“阿塞拜疆部分”都留在素丹手中[135]：总而言之，整个外高加索、整个高加索的可以居住人的部分连同向里海敞开的窗户都留在素丹手中。

这并非一次微不足道的胜利。相反，这是奥斯曼帝国的生命力的奇特的标志，但决不是它唯一的奇特标志。然而，对研究地中海历史的历史学家来说，重要的是土耳其的力量的目标朝着远离内海的里海的方向固定下来了。这一股离心的推动力说明了为什么

土耳其至少到1590年为止离开了地中海这个场地。

土耳其人在印度洋

土耳其人不但在波斯作战，而且还深深卷入为控制印度洋而进行的战争中。这个海洋的情况我们也了解得很差。

印度洋，至少它的西部，在若干世纪内曾经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湖。葡萄牙人未能成功地把伊斯兰教徒从那里赶走。至少自1538年起，葡萄牙人遭到伊斯兰国家多次进攻。土耳其人在这些进攻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归根结蒂，或许是因为奥斯曼帝国没有在这个向南倾斜的斜坡取得成功，所以它无法同欧洲抗衡。它差一支精良的舰队。不错，土耳其拥有一支舰队，而且是一支令人胆寒的舰队。土耳其必须通过狭窄的红海和印度洋接触，而且它掌握的航海技术是用于地中海的那种航海技术。土耳其是用它使用于地中海的舰船，即在拆卸后用驮队一直运到苏伊士，然后再在那里安装、下水的帆桨战船，来同它在印度洋的竞争对手交锋。埃及总督老苏里曼帕夏1538年攻占亚丁并于同年一直推进到第乌，但他始终未能攻克该地。1554年皮利海伊斯[136]也率领帆桨战船去碰碰运气，同葡萄牙的帆船作战。这些帆船是远航大洋的船只，制服了土耳其的划桨船。由海军将领、诗人阿里指挥的、以位于另一个狭窄的海——波斯湾——的入口处的巴士拉为基地的帆桨战船舰队，1556年被驱赶到古德热拉特半岛。这支舰队的首领和水手在该地弃船登陆。印度洋上就这样发生了一场帆桨战船和帆船之间的奇怪的争斗。[137]

土耳其朝着这个方向的推进，一般说来是和土耳其—波斯战争相联系的。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推进总是继这类战争之后发生。1533 年到 1536 年，进行了对波斯的战争。然后是苏里曼帕夏的远征。攻占亚丁和对第乌的首次包围的时间是 1538 年。从 1548 年到 1552 年，进行了第二次对波斯的战争(但这场战争只在第一年具有重要性)。1549 年对第乌进行第二次包围。1554 年，皮利海伊斯远征。1556 年，阿里远征。同样，将近 1585 年，波斯战争进展速度放慢，争夺海洋的战争沿非洲东部海岸这个被葡萄牙人称为康特拉科斯塔的海岸再起。[138]

总之，土耳其和西班牙之间的停战仅仅实施于地中海。菲利普二世力劝葡萄牙官员宽容、忍耐，以避免心怀不满的当地土著王公向土耳其人求援[139]，但这徒劳无益并为时已晚之举。土耳其人甚至不待别人向他们呼吁。1580 年以后，他们继续对葡萄牙商人进行掳获甚丰的海盗式的劫掠，一支舰队由米拉利贝伊率领[140]甚至驶到盛产黄金的非洲海岸。它轻而易举就攻占了摩加迪沙、巴拉瓦、德任博和安帕扎。蒙巴萨王公宣布自己是土耳其宫廷的封臣。次年，米拉利贝伊攻下除仍然忠于葡萄牙的梅林德、帕塔和克利夫之外的海岸上的全部据点。这难道正像菲利普二世所想的那样是葡萄牙人强加给土著人的恶劣的待遇产生的结果吗？[141]

葡萄牙反击迟缓。1588 年，一支舰队在南阿拉伯海岸边失事遇难[142]。在西班牙，在无敌舰队进行活动的这一年里，伊比利亚的战争机器有不同于这些远方的斗争的其他需要关切处理的事。赌注是巨大的。在土耳其企图设防的蒙巴萨的后面，有苏法拉的金矿。更重要的是有到达波斯和印度的通路。1588 年，葡萄牙舰队曾

经试图在曼德海峡保卫这条通路,未获成功。对葡萄牙人来说,幸运的是,土耳其人竭尽全力活动,结果也被长途跋涉弄得筋疲力竭。1589 年,米拉利贝伊只有 5 艘船可以用于进攻。托梅·德·苏扎率领的葡萄牙舰队成功地在蒙巴萨河包围了米拉利贝伊。在这期间,沿海爆发了一场疯狂的黑人叛乱。这场叛乱最后把一切扫光荡尽,其中包括土著统治者和土耳其入侵者。只有在葡萄牙船上避难的人,其中包括米拉利贝伊本人,逃脱了这场屠杀。奥斯曼的最奇特的、最不为人所知的企图,就这样于 1589 年瓦解了。

葡萄牙战争:世纪的转折点

米什莱认为圣巴托罗缪惨案发生的那一年是这个世纪的转折点。如果的确曾经有过什么转折点的话,这个转折点倒更与在发生葡萄牙战争的同时还进行了大规模的争夺大西洋和世界统治地位的斗争的 1578 年和 1583 年之间的这段时期吻合。西班牙的思想和谋略转而针对大西洋和西欧。当菲利普二世的统治的第一阶段紧接 1575 年的破产宣告结束时,贵金属的大量流入使西班牙贮备战费的金库突然膨胀起来。于是,在这些“关键年”之后,开始了被一个历史学家称为 1579 年和 1592 年之间的这段时期的“王家白银循环”。[143]荷兰和别处的情况都是这样。菲利普二世的政策由于他的财源膨胀扩大而变得大胆起来,日益具有侵略性,并且更加鲁莽冒失。

这个惹人注目的变化没有逃脱历史学家的注意,特别没有逃脱比别人更了解这个变化但把这个变化看得过小的葡萄牙人的注

意。他们的民族的命运当然在大洋的历史上占着中心地位，但并不构成大洋的整个历史。在大西洋战争进行期间发生的多起事件加在一起，就立刻显示出了进行的斗争的规模。我们不能跟在另外几个人之后面亦步亦趋，说什么这些斗争为“现代”打开了大门。这样的断言是不成熟的。这些斗争在相当长的岁月中阻碍了大西洋的飞跃发展。

关于西班牙，方向的变化是明显的。1579 年，格朗弗勒红衣主教到达马德里。他在该地一直呆到去世(1586 年)，共长达 7 年之久。在这 7 年中，他首先非正式地，然后正式地担任首相职务。很多历史学家(甚至马丁・菲利普松)都非常倾向于认为，在这些政府的变化和从菲利普二世的统治的防御性的、审慎的阶段到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阶段的过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直到 1580 年为止，西班牙执行的政策更主要是“主和派”，即鲁伊・戈梅兹和他的朋友那一派所主张的政策，而不是阿尔贝公爵和他那一派，即“主战派”所主张的政策。当然也并非毫无例外。例如 1567 年阿尔贝公爵进行的远征和勒班陀战役便是例外。这两派都没有在任何现代的意义上组织起来，因此把它们称为两个小集团更加恰当。国王在使用它们的同时，始终超然于它们之上，并且对他的臣属之间的争执不和感到满意，因为这些争执不和保证他能够获得更加准确的情报，能够更容易进行监督，最后还更能够拥有完整的权威。菲利普二世让它们互相对立、争斗，互相怀疑、猜忌，从而使很多人因为他效劳而心力交瘁。他的统治时期的各项艰巨任务也助了他一臂之力。1579 年，除了他的统治的第一阶段的那些党派的幸存者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人了。1573 年，鲁伊・戈梅兹去世。他的

那个在他死后聚集在安东尼奥·佩雷斯周围的小集团，不再像过去那样团结一致。1573 年 12 月离开荷兰的阿尔贝公爵不再有昔日的显赫地位。1575 年，他突然失宠，从此受到排挤，被弃置于政治生活之外。

1579 年，菲利普二世召回格朗弗勒。他写信给他说："我在处理政府工作和为政务操心时，特别需要你这个人，需要你的帮助。你来这里愈早，我愈高兴。"[144]这位红衣主教当时住在罗马。尽管他这时年事已高——62 岁——他还是接受去冒险。但是，他在几经耽搁延迟之后才启程上路。他必须先在罗马，然后在热那亚等候。7 月 2 日，他才和陪同他的唐·胡安·德·伊迪亚克斯望见西班牙的海岸。8 日，他们在巴塞罗那上岸。上岸后，红衣主教立刻套马驾车上路，作夜间旅行，以避开骄阳酷暑。他奉当时已在埃斯科利亚尔的国王的特别命令，没有前往马德里，而是于 8 月初到达圣洛伦索，被国王当成救星迎接。[145]

救星这个词用在这里是恰当的。菲利普二世等到红衣主教已经在前来埃斯科利亚尔途中时，才扔去面具，露出真相，突然狠狠打击安东尼奥·佩雷斯和他的主要共谋者埃波丽公主。7 月 28 日和 29 日之间的夜晚，这两个人都被逮捕。这些日期很重要，值得注意。因为，长期以来，安东尼奥·佩雷斯对他的主人来说，就是一个可疑人物。但是，只在新的政府领导班子差不多就任时，国王才下定决心对付这个在宫廷中仍然势力强大的小集团。随着格朗弗勒的上台，主和派灭亡了。这固然是由于多种多样的、耸人听闻的、错综复杂的、对我们来说极端晦涩难懂的个人动机方面的原因，[146]但也是由于形势的推动。雷克森斯在荷兰所进行的调解尝试以失败

告终。这个失败比阿尔贝公爵的失败更引起轰动。对最初于1578年夏天着手进行处理的葡萄牙王位继承事件来说，和平的方式丝毫不能奏效。有人坚持认为，安东尼奥·佩雷斯在这起事件中背叛了他的主人。这种看法会引起多种解释，产生混乱，援引的证据不能令人信服。剩下的是这样一种假设：君主认为采取的政策令人不安，因而对之感到不悦。

因此，这是一个巨大变化。随着格朗弗勒红衣主教的上台，在菲利普二世的帝国的心脏里，安置下一个坚强刚毅、精力充沛、机智灵巧、高瞻远瞩和视野开阔的人物，安置下一个坚决、诚实、正直、忠于国王和西班牙的威势的人物。这也是一个属于另一辈的、习惯于缅怀查理五世的伟大时代、习惯于在这个时代寻找范例和比较、倾向于对自己所生活的悲惨时代进行批评的老人。这是一个能决断、有头脑、善思考的人。开始时他的影响很大。他是1580年胜利的缔造者。但是，这些胜利取得后，一俟菲利普二世从里斯本回国，他的影响就主要存在于表面而不存在于实际了。他也为国王效劳过度而心力交瘁。

因此，在这些重大事件的形成产生，即在把西班牙的力量从地中海带向大西洋的钟摆运动和格朗弗勒红衣主教的上台执政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协调一致的关联。写传记的方法很可能使我们迷失方向，正如它曾经使像马丁·菲利普松那样治学严谨的研究人员迷失方向一样。这个学者丝毫没有看到这股力量的转移。读红衣主教反对土耳其—西班牙停战协定的声明，就足以使这个学者对西班牙离弃地中海战争一事不予注意。但是，没有任何事物向我们保证红衣主教这时是口心一致、坦诚直率的。[147]在很多年内，就在

格朗格勒的"内阁"掌权时期,有过停战和继续停战的事,这是事实。地中海既不是因为红衣主教的缘故,也不是在不顾他的意志的情况下放弃的。

阿尔卡扎尔·克比尔

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进行的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并不是勒班陀战役,而是在这次战役之后7年进行的以阿尔卡扎尔·克比尔的灾难(1578年8月4日)告终的葡萄牙的远征。阿尔卡扎尔离丹吉尔不远,位于在拉腊歇入海的卢科河的岸边。[148]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虽然已经25岁,但还是一个头脑发热、耽于幻想、不完全承担责任的孩子,十字军东征这个强烈的念头仍然时刻萦回脑际。在进行非洲征战以前,他就已经会见过菲利普二世。菲利普二世劝过他不要把战争引到摩洛哥,但白费气力。这种远征准备得慢慢吞吞,发动以后所得到的好处甚至连进行突然袭击带来的好处也不如。阿布德·埃尔·马莱克谢里夫了解到葡萄牙的备战情况和葡萄牙舰队的出航情况,然后又了解到这支舰队在加的斯的停留情况,还来得及采取对策和宣布一场圣战。数量很小的葡萄牙军队在丹吉尔登陆,接着被运往阿尔齐拉(7月12日)去侵犯一个决心自卫并拥有一支精良的骑兵、大炮和火枪兵(这些士兵往往是安达卢西亚人)的国家。葡萄牙战车的长列纵队深入内陆。交战双方于1578年8月4日在阿尔卡扎尔·克比尔进行遭遇战。国王指挥无方使伙食很差、营养不良又被长途行军和烈日酷暑弄得筋疲力竭的基督教军队更加脆弱,不堪一击。面对这支侵略军,摩洛哥进行"集体征召",[149]基督教军队寡不敌

众，一败涂地。附近地区的山民把基督教军队的辎重给养抢劫一空。国王也在被杀之列。曾经随同基督教军队作战的那个已被废黜的谢里夫溺毙。与此同时，在位的谢里夫在这次有时被称为“三国王之战”的夜晚病故。一两万葡萄牙人落入非基督教徒手中。

不能说这是葡萄牙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但也不能低估这个孕育着重大后果的阿尔卡扎尔·克比尔战役的重要性。这个战役显示了摩洛哥的力量。用于赎回被俘基督教徒的赎金，使摩洛哥顿时变得十分富有，以致阿布德·埃尔·马莱克的兄弟、摩洛哥的新君主阿赫梅德既被人称为“胜利者”，也被人称为“镀金的人”。此外，进行阿尔卡扎尔·克比尔战役这一天，开始出现葡萄牙的王位继承问题。塞巴斯蒂安身后没有直接继位人，由他的叔父亨利红衣主教继承他的王位，但是，这个身体虚弱又患肺痨的老人的统治，只能是而且事实上也只不过一个短暂的插曲而已。

葡萄牙远远经不起这样严酷的考验。它的帝国以居中交换、转运货物和以用船装运金、银等两项活动为主要的立国之本。这些金、银横越大西洋，用来换取香料和胡椒。但是，非洲的贸易在这当中发挥作用。由于阿尔卡扎尔·克比尔战役，这部机器变了形，改了样。此外，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贵族仍然在非基督教徒手中。为了支付数额大得无法以现金支付的赎金，这个国家后来花光了铸币，并把首饰、宝石全都运往摩洛哥和阿尔及尔两地。更糟的是，大批人被俘使这个地域狭窄的王国失去了行政干部和军事干部。这种种原因加在一起，就使葡萄牙这时比在它的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无法克服它的衰弱状态。对历史学家来说，对大量就卢西塔尼亚的衰落这个题目进行论述发挥的著作进行筛选并且量度这个小

王国的真正苦难,并非易事。但是,如果说这个王国过去已经受到一种衰退、一种慢性的潜在疾病的感染的话,那么它在这个 1578 年的夏季就受到一种突然发作的昏厥症的侵袭。环境和事件使它的病情大大恶化。

对病人来说,落到一个庸医手里真是不幸到了极点。63 岁的老红衣主教、幸运者埃马纽埃尔的儿子中的最后一个幸存者,患足痛风。肺痨使他身体衰弱不堪。他的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助长了葡萄牙王国的日益扩大的动乱。他多年的积怨也起了同样的作用,因为在东·塞巴斯蒂安的随性之所至、行事毫无定规、反复无常的政府的统治下,他不得不千百次忍气吞声。他登上王位后,对这些记忆犹新,并且进行报复。第一批受他害的人中的一个是拉法藏达的很有权势的秘书佩德罗·德·阿尔科卡巴。他解除了这个秘书的一切职务并加以流放,但是,他却无法把此人和他的大批拥护者排除在这场政治赌博之外。

这个笨拙的举动,为西班牙的阴谋扫清了道路。菲利普二世由于他母亲的婚姻,对葡萄牙王位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利。在他和他觊觎的王位之间横阻着布拉冈斯公爵夫人拥有的和他竞争这个葡萄牙王位的权利。公爵夫人的这种权利同样无可争议。但是,这个"封建"家族没有能力同西班牙国王斗争。在参加争夺王位的人中,还有东·路易的私生子——克拉托的修道院长。东·路易也是幸运者埃马纽埃尔的儿子。但是,克拉托的修道院长作为私生子,他的出生对他要求继承王位颇为不利。事实上,在菲利普二世和葡萄牙的王位之间,只阻隔着里斯本的老君主。这个老君主的高龄和他那朝不保夕的健康状况,自 1578 年秋季起就已提出他的王位的继

承问题了。菲利普二世立即向葡萄牙派去一个机动灵活、能言善辩的外交官克里斯托瓦尔·德·穆拉。这个外交官来葡萄牙后大事馈赠金银，封官许愿。红衣主教国王自身的错误也以同样的程度使葡萄牙的亲西班牙党有了首批成员。克里斯托瓦尔·德·穆拉的确也和佩德罗·德·阿尔科卡巴挂上钩，有了联系。

此外，红衣主教国王的虔诚的信仰使他把他自己和整个葡萄牙交托给耶稣会，受耶稣会的精神统治。耶稣会会士和西班牙这个强大的外国结盟的程度如何？在这个问题上，马丁·菲利普松发表的文献资料被人遗忘。耶稣会会士虽然到那时为止一直被菲利普二世排斥在一边，但同意和他在葡萄牙进行合作，这是事实。最初敌视他的西班牙侄儿，相反却宠爱他的侄女卡德琳·德·布拉冈斯的亨利红衣主教国王，后来竟情不自禁地发表了半官方的有利于菲利普二世的声明。对于这种思想转变有多种解释。但是，这些解释都不排除耶稣会会士可能采取了干预行动。这个修会的会长E.梅尔库里亚诺发出的接受菲利普二世的要求的信的时间是1579年1月[150]。他手下的人（这些人起初更倾向于支持布拉冈斯夫人）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改变立场，转而为菲利普二世效劳。毫无疑问，他们希望从菲利普二世那里得到恩典，而在欧洲大陆内外，菲利普二世比任何人都更不吝惜施与这种恩典。

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的民族独立就不大可能得到维护。要维护民族独立，这个国家必须武装起来，它的统治者必须下定决心采取在民族内部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处理王位继承问题引起的危机。总而言之，要承认布拉冈斯家族，或者说如果需要的话，要承认克拉托的修道院长。然而这位红衣主教国王却把国家的全部防务弃

置一旁。这些防务意味着巨额费用。这位老国王同意支付的唯一费用是赎回仍然留在摩洛哥的俘虏所需的费用。他虽然对为赎回阿尔卡扎尔·克比尔战役的俘虏花费多少从不吝惜，但是对国家的防务却分文不花。如果国家在这样一条道路上行进的话，它的臣民，至少他们当中的富人，特别是商人，可能也不会下定决心作出必要的牺牲。

红衣主教国王也必须在他自己的继承问题上迅速作出决定。然而，他却把时间浪费于同法国前王后、查理九世的遗孀谈判他自己的只有得到教廷的特许才有可能成功的婚姻问题。是否把这个遗孀许配给他，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西班牙驻罗马大使轻而易举就阻挠了这次谈判。这位老君主违心地忍从了。我们不要把他想象成是个 18 世纪的修道院长，是个老风流。国是的理由支配他，使他萌生了缔结这门婚事的想法。正如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一样，这个想法证明这位红衣主教国王是唯一不相信他的死亡即将来临的人……

在遭到这次挫折后，他不再关心他自己的继承人问题。不错，他召开了国会，并试图成立一个仲裁委员会。所有的觊觎王位者都把他们的证件呈交给这个机构。但是，他剩下的很少的一点意志和毅力主要被用来反对克拉托的修道院长。他怀着深仇大恨折磨迫害他，企图利用他的非婚生性这个污点使他信誉扫地，甚至把他赶出王国。这就迫使克拉托的修道院长东·安东尼奥去西班牙避难了一个时期。后来，当他返回祖国时，便去他自己的领地躲藏起来。

不管怎样，菲利普二世决心捍卫他对葡萄牙王位拥有的继承权。从 1579 年起，他就开始进行战备武装，而且在进行时大事张

扬。他很想让欧洲，特别让葡萄牙知道这件事。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已经调集了重兵。他的兵力——2万来人——足够进行这一入侵活动。然而，调动、集结他的军队需要大量金钱，特别需要向托斯卡纳大公借一笔40万埃居的巨款，[151]还需要从驻意大利的卫戍部队中抽调一部分兵力。兵员、粮食和作战物资器材集中后，2万来人会合起来。这些集结活动使得从君士坦丁堡到英国到处都人心惶惶。君士坦丁堡的人认为这些努力是针对阿尔及尔的。伊丽莎白女王和英国认为菲利普二世有入侵他们的岛屿的图谋。没有一个地方像葡萄牙那样强烈地感受到这场神经战。

这个国家的平民大众强烈反对可怕的邻国——西班牙——的统治。城市里的平民百姓、低级教士仇恨西班牙人，仇恨之强烈使有钱有势的人心惊肉跳。平民大众的愤怒使这些人不敢公开背叛。因而产生了"背叛"的特殊形式，产生了虚伪的面孔、骗人的侈谈、爱国的词藻和审慎的行动。平民百姓就这样被生活富裕的人、有钱人和知识分子拱手交给敌人。有钱人既然往往是外国人——佛兰德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而且他们还很不愿意承受战争会带来的、他们又会身受其害的苛捐杂税和敲诈勒索，因此，他们怎么会不反对进行抵抗呢?高级教士的思想情况和贵族的思想情况，即往往军队的思想情况，与上述思想状况很相近。葡萄牙在东面无疑受到大自然的保护。从卡斯蒂利亚高原到葡萄牙低地，道路崎岖难行而且被强固的堡垒阻断。但是，这条边界线只有在得到决心自卫的国家的支撑时才具有它的价值。克里斯托瓦尔·德·穆拉散发的金钱不足以把作战的愿望全部彻底排除、驱散，正如边境地区的西班牙"封建主"的谈判不足以解除他们的葡萄牙邻居——城堡、

村庄和为王国提供安全保证的要塞的主人——的武装一样。但是，比个人——无论是出生为葡萄牙人的穆拉自己或者是曾经担任西班牙国王驻里斯本大使的奥苏纳公爵——的微弱的努力更加有效的，甚至比背叛出卖、背信弃义这种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的宝贵的手段，这种哈布斯堡家族喜爱的武器更加有效的，却是时机和形势的雷霆万钧、压倒一切的力量。葡萄牙需要美洲的白银。它的海军的大部分已经在大西洋上为西班牙效劳。[152]里斯本的有钱有势的人转而归附西班牙，这是同已经受到新教徒的海上行劫和硬币缺乏困扰的葡萄牙帝国感到的需要有关联的。这种需要就是决不同它那个太强大的邻国争斗，而是依靠这个邻国。比 1578 年和 1580 年之间的这段时期发生的事件更能证明上述情况的，或许是这件事件产生的后果，是葡萄牙的长期从属地位，是只有 1640 年的灾难才断绝了的或者使人能够更好地断绝的它和西班牙的相依为命的关系。我们也不要忘记西班牙现在已经统一起来，不再分裂为互相敌对的地区、省份（当时已经不再是阿尔朱巴罗塔的时代。我们在前后文里常常提到这个时代在这方面的图景）。因此，葡萄牙就只有通过同新教强国、拉罗舍尔、荷兰人、英国人结成联盟才能维护它的独立，使之不受西班牙损害。这是西班牙人已经注意巧妙地强调指出的、但葡萄牙已经感到无法逃避的现实。克拉托的修道院院长之所以后来试图返回自己的王国失败，是因为他搭乘英国船来，是因为他和罗马的敌人勾结，进行密谋策划，是因为他甚至将近 1590 年的时候还同土耳其人进行谈判……

1580年的军事政变

1580年2月，红衣主教国王亨利死去。在他的遗嘱指定的摄政王中，有两三个已经被争取到菲利普二世那一边。[153]菲利普二世将让他们自己处理王位继承问题，还是信赖想把自己的仲裁强加于人的教皇的判决？事实上，菲利普二世认为自己拥有不受时效限制的继承葡萄牙王位的权利。这是一种神授的权利，根本不存在要把这种权利提交各个摄政王或者国会讨论的问题。他不乐意承认教皇拥有的世俗的最高权力，不愿意接受教皇的裁决。此外，他现在确信可以在地中海得到和平。在同荷兰、法国、英国的关系方面，他也满怀自信，因此，他可以指望在欧洲的风雷激荡、变幻莫测、险象环生的局势中，得到暂时的歇息。葡萄牙在他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但条件是他必须迅速行动。这正是格朗弗勒自到达埃斯科利亚尔之日起就敦促他进行的事。是这位红衣主教和君主同样积极地，甚至比君主还更加积极地，加快了事件发展的进程。也是这位红衣主教确保已经失宠、但其声誉似乎是胜利的保证的阿尔贝老公爵被任命为军队的统帅。知道在时机到来之时捐弃前嫌宿怨，把自己个人的厌恶反感弃置一旁，是格朗弗勒的德行之一。对他这个外国人来说，照顾西班牙人，照顾他们可怕的帮派山头，照顾他们的敏感性格，可能是一种需要。他难道不就是授意对安东尼奥·佩雷斯和埃波丽公主采取半宽大的减刑措施的那个人吗？

入侵葡萄牙的战争这一简单的散步似的军事行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葡萄牙边境的障碍工事不攻自毁。6月12日，西班牙军队深入葡萄牙境内，直抵巴达霍斯。坚固的埃尔瓦斯要塞和奥利文

扎要塞,先后都不战而降。经由扎塔斯山谷通往里斯本的道路已经打通。在这个期间,一支由普通船只和帆桨战船组成的西班牙舰队7月8日驶离圣玛丽亚港,占领葡萄牙的阿尔加维的海岸上的拉古什并且很快在塔古斯河的河口出现。6月19日在圣塔伦被宣布为国王的克拉托的修道院院长东·安东尼奥由于平民百姓的支持,以主人的身份进入里斯本。但是,要在这座供应情况很糟、几个月来瘟疫猖獗为害造成大量死亡、现在又被驶来的西班牙舰队切断了它与外界的联系的大城市里坚持下去,就需要采取紧急的救亡措施。更需要的却是时间。紧急救亡措施,特别是财政方面的紧急救亡措施,并不缺乏,例如没收教会和修道院的钱财、使货币贬值、向商人强迫借款……等。但是,时间过于紧迫,形势异常严峻。是西班牙的行动迅速,而不是修道院院长东·安东尼奥的所谓的软弱(特别在他与阿尔贝公爵的间接的、蓄意争取一点时间的谈判中)使这个觊觎王位者垮台。叛变和投降活动在他周围进行。锡图巴尔遭到来自海上和陆上的进攻,于7月18日不战而降,但是这并没有使它免遭洗劫。入侵部队于是抵达塔古斯河小港湾。这个港湾像个小海那样广阔。毫无疑问,这是个巨大障碍。但是,对于一支把一系列西班牙军队毫无困难地一直运送到位于河的北岸的卡什凯什的舰队来说,这倒并不是个什么障碍。这次战斗以从西部和从塔古斯河右岸对首都的进攻告终。东·安东尼奥试图在阿尔坎塔拉桥上使用少量部队保卫通往里斯本的通道。但是,当天晚上,首都主动投降。征服者饶恕了这座城市,没有加以洗劫,或者至少是他们只洗劫了这座城市的郊区。

修道院院长东·安东尼奥作战受伤,穿城逃走,在附近的萨卡

文的小村子停留下来就医。他在那里聚集一批新的徒众，向科英布拉进发，然后强行进入波尔图并在该地停留了1个多月。他也试图在该地组织对西班牙的斗争，但同在里斯本一样，发生了多次小规模的叛变。格拉纳达海岸部队大统领桑乔·达维拉进行一次骑兵袭击，迫使他于10月23日逃离他最后的躲藏处，前往葡萄牙北部避难，直到一艘英国船驶来找到了他并把他运走为止。

这样，占领葡萄牙就只花了4个月时间。格朗弗勒在对菲利普二世的进谏里提请这位君主注意：恺撒为了不使他的进军速度减慢，不去占领已经攻下的城市，而是仅限于抓捕人质。1580年，西班牙入侵者似乎仅仅限于在所有有叛徒为他们打开了大门的地区推进。他们在葡萄牙人中间为已被征服的地区找到可靠的守护人。不需要运来大量援军，也不需要使用边境地区的领主的军队。在入侵行动开始之前，这些领主曾经被吁请派兵援助。让我们重复这一点：葡萄牙遗弃、出卖了自己，或者说被人遗弃、出卖了。

早在1580年以前，菲利普二世就巧妙地向葡萄牙人确认了他们过去享有的特权。他还承认他们享有新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葡萄牙后来没有并入卡斯蒂利亚王国，而是保存着它的行政机构、它的各个部门和国务会议等。总而言之，尽管在菲利普二世身上体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的王位的结合，但是，葡萄牙依然如故，保存着它的特性，保存的程度同阿拉贡一样，甚至超过。它仅仅是“西班牙的一个自治领”。[154]这当然丝毫不能为1580年的入侵辩护开脱。这一点并不是我们关切的，但说明了为什么这次征服得以维持下去，为什么它相当于一种持久的解决办法。

印度各邦得到这个消息，也不战而归附了西班牙。巴西也同样

行事。在巴西，由于它西部边界的情况，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王位的结合对它来说，远非不受欢迎。只是在关于亚速尔群岛的问题上存在一些严重困难。由于菲利普二世的疆土突然扩大（葡萄牙的海外地区同西班牙的海外地区加在一起，使菲利普二世得到这个世纪最大的两个殖民帝国），这种突然扩大产生了大西洋由谁来支配控制的问题。不管是否自觉，由于大势所趋，菲利普二世的这个由不同的成分混合组成的帝国，将依靠大西洋。这个大洋是对它的存在来说必不可少的、联系它的大量领地的纽带。这个大洋是甚至在菲利普二世生前就已经被人称为他的抱负——全球王朝[155]——的基地。

西班牙离开地中海

上述种种情况使我们在叙述史实时远远离开了地中海。

菲利普二世从在里斯本定居之日起，就真地把他那个由不同的成分混合组成的帝国的中心置放在浩瀚的大西洋的岸边。这个他从 1580 年到 1583 年留住过的里斯本，是个令人赞美的城市。从这个城市可以对整个西班牙世界进行统治。它肯定比处于卡斯蒂利亚的荒野的包围之中的马德里的地理位置和生活起居设备优越，特别在进行一场新的争夺海洋控制权的斗争的时期更是这样。舰船不断在海面上穿梭驶行。国王甚至从皇宫就可以看见的并在他写给他的女儿——几位公主——的迷人的信中描绘的这个景象，难道不就是每天都在更新的、关于支撑着西班牙帝国的经济的现实事物的直观教学的一课吗？如果说作为地中海、意大利和欧洲内陆地区的激荡的风云的监视

站，马德里的地理位置更加优越的话，那么里斯本就是大西洋岸边的一个极好的观察所。如果菲利普二世在筹建无敌舰队时完全了解这一点，如果当时他没有被系阻羁留在马德里因而远离战争的实际的话，那么多少延迟耽误，甚至多少灾难都可以避免啊！

西班牙的政策向西方摇摆和被卷入大西洋的强大的潮流的方式、在1582年和1583年之间发生的亚速尔事件（在这起事件中希腊群岛得救。与此同时，由于斯特罗齐的灾难，建立法属巴西的梦想破灭）、从1579年起到这个世纪末被人坚持不懈地使之复活的爱尔兰战争、对英战争的备战活动、1588年无敌舰队的出航、在1591年和1597年之间菲利普二世进行的对英国人的远征、包括对布列塔尼的部分占领这个重大问题在内的西班牙对法国内部事务的干预、英国和荷兰采取的对策、新教徒在整个大西洋上进行的疯狂的海上行劫等事物，虽然发生在地中海之外，但对地中海来说并非风马牛不相及。和平之所以能够在地中海重新建立，是因为战争转移，进入与它邻接的广阔地区，即西边的大西洋、东边的波斯的边缘以及印度洋等地区。西班牙的向西摇摆的运动同土耳其向东摇摆的运动对称。这些摇摆是纯粹叙述事实的历史由于它本身的性质而无法解释的巨大摆动。对这种现象或许可能有本书作出的解释之外的其他解释。但是，问题和现象本身非常清楚明确，不容争辩：长期在地中海进行对抗的西班牙集团和土耳其集团最后一下子就互相摆脱了。内海排光了在1550年和1580年之间构成它的主要特征的大国之间的战争。

本部分原注

1. L'accusation portée par une lettre de Charles IX. Saint-Gouard y répond longuement (au roi, Madrid, 24 févr. 1574, B. N., Paris, Fr. 16106). Si des agents espagnols ontétédans les assemblées des rebelles, qu'on en saisisse un ou qu'on lui donne son nom. Ayant les noms il leur mettrait l'inquisition "si bien a doz qu'il faudroit qu'elle perdist tout crédit ou qu'elle s'atachast au mesme Roy s'il se voulloit servir contre Votre Majestéde telles praticques lesquelles je ne puis penser ni croire... ". Sans doute leur désir est-il de brouiller tout en France "... je crois qu'ilz seroient trais ayses que Votre Majesté feust toujours troublé en sa maison pour le pensement qu'ilz ont que cela leur sertàé remédier et à ordonner la leur... ". Sans doute encore, ajoute Saint-Gouard "...choses d'estat permettent ou pour le moins souffrent quelquefois de l'honneste". Philippe II pourrait-il intriguer avec les Huguenots alors qu'il déclare pour ses Pays-Bas "qu'il les ayme mieux perder de consentir chose quelle qu'elle soit contre la relligion et foy cath. "et s'il s'entendait"contre le service de Votre Majesté au dedans son royaume je croy que ce seroit plus tost avecques quelques brigans qui ont pris ung tiers estat et lesquels ne sont fondez ne pour le service de Dieu ne celuy de Votre Majesté en ce qu'ilz se sont trouvez aux armées ou par les provinces sous coulleur de se dire catholique les armes à la main avecqz toute insolence se rassasier de leur enragée avarice". —Et l'affaire Henri de Navarre, Claude Du Bourg? voir ci-dessus, I, pp. 343-344.

2. A. O. MEYER, *England und die katolische Kirche*, I, p. 28, cité par PLATZHOFF, *Geschichte des europ. Staatensystems*, p. 42.

3. Pescaire au roi, 12 juin 1570, Simancas E° 1133.

4. Je laisse un prénom illisible sur ma copie.

5. Relation de Margliani, 11 févr. 1578, Simancas E° 489.

6. Rapport sur Estefano Papadopoulo, Madrid, 21 juin 1574 "... *y es menester mirar les mucho a las manos...* ", Simancas E° 488.

7. Cf. entre autres H. WÄTJEN, *op. cit.*, p. 67-69

8. Mémoire de Du BOURG, trad. esp., 1576, A. N., K 1542.

9. Lettre de Selim second empereur des Turcs, à Don Juan d'Autriche

"luy envoyant des présents los qu'il était général de l'armée chrestienne", B. N., Paris, Fr. 16141, f° 440 à 446.

10. Lo que refiere Juan Curenzi..., 30 juin 1573, Simancas E° 1063, f° 35.

11. L'évêque de Dax au roi, Const., 16 juil. 1573,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405.

12. Le même au même, Const., 26 juil., 1573, *ibid.*, p. 413-416.

13. Au roi, Venise, 26 févr. 1574, *ibid.*, p. 470, note.

14. Voir note 11.

15. L'évêque de Dax à Catherine de Médicis, Constantinople, 17 févr. 1574,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470 et *sq.*

16. Pietro EGIDI, *Emanuele Filiberto*, *op.*, *cit.*, II, pp. 128 et *sq.*

17. L'évêque de Dax au roi, 18 sept. 1574,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572.

18. *Ibid.*, p. 572.

19. Au roi, *ibid.*, pp. 424-427, Constantinople, 4 sept. 1573.

20. Le même au même, *ibid.*, pp. 470-475, 24 mars 1574.

21. Le gros incident du "fort" de Sebenico, *ibid.*, 17 févr. 1574, pp. 462-470.

22. Voir note 5, ci-dessus.

23.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467.

24. 17 févr. 1574, *ibid.*, III, p. 462-470.

25. Relacion que hizo Livio Celino..., 1574, Simancas E° 1333.

26. Granvelle au roi, Naples, 6 févr. 1575, Simancas E° 1066. Lettre assez pessimiste du cardinal. Avec le changement de règne, il va falloir acheter de nouvelles intelligences, d'où de nouvelles dépenses, tout comme l'empereur à propos de sa trêve dont il faut obtenir à nouveau confirmation. Le nouveau souverain, Amurat, a 28 ans, "belliqueux, aimé de ses sujets...".

27. Constantinople, 8 mars 1577, A. d. S. Venise, Secreta Relazioni Collegio, 78; Guzmán de Silva au roi, Venise, 28 avril 1577, Simancas, E° 1336, signale le passage de D. Martín qu'il appelle D. Garcia de Acuña, parti à Const. avec un sauf-conduit pour le rachat de captifs, en fait pour traiter de la trêve *y a salido con la resolution dello por cincos años*... Pour l'arrivée de D. Martin à Constantinople, les avis français donnent la date fausse du 15

mars.

28. Simancas E° 159, f° 283.

29. Mondejar à Antonio Pérez, Naples, 30 avril 1577, Simancas E° 1074; f°31.

30. Cost., 2 mai 1577, transmis sans doute par G. de Silva, Simancas E° 1336.

31. Voir note 2.

32. Martín de Acuña au roi, Madrid, 6 juin 1577, Simancas E° 159, f° 35.

33. Silva à Philippe II, Venise, 19 juin 1577, Simancas 1336.

34. Don Martín de Acuna à S. M., Madrid, 1578, sans autre précision. Simancas E°159, f°283.

35. Mondejar à Philippe II, Naples, 13 août 1577, Simancas E° 1073, f° 136.

36. Fernand BRAUDEL, "La mort de Martín de Acuña", *in*: *Mélanges en l'honneur de Marcel Bataillon*, 1962. Cf. F. RUANO PRIETO, "D. Martín de Acuña", *in*: *Revista contemporánea*, 1899.

37. G. Margliani à Antonio Pérez, Constantinople 30 avril 1578, Simancas E° 489.

38. Cf. GERLACH, *Tagebuch*, p. 539;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705.

39. Pour tout ce qui suit, le long mémoire de G. MARGLIANI, février 1578, Simancas E° 488.

40.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705.

41. A Henri III, Const., 22 janv. 1578,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710.

42. *Op. cit.*, p. 160;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499.

43. *Lo que se tratto y concerto entre el Baxa y Juan Margliano*, 7 févr. 1578, Simancas E° 489. Copie du même document faite en 1579 peut-être, *Capitoli che si sono trattati fra l'illmo S^{re} Meemet pascià (di) buona memoria...*, Simancas E° 490.

44. *Lo que ha de ser resuelto sobre lo de la tregua* (1578), Simancas E° 489; sur la non conclusion d'accords économiques, Margliani (à Antonio Pérez?), 11 févr. 1578, Simancas E° 489.

45. Simancas E° 489. La victoire de Gembloux est du 31 janv. 1578.

46. *Relacion de lo que ha passado en el neg° de la tregua y suspension de armas con el Turco y lo que para la conclusion della llevo en com^on don Juan de Rocafull y el estado en que al presente esta*(1578), Sim. E° 459, f° 28(ou f° 281). Ces textes non datés doivent être resitués entre le début de juin et le 12 sept. 1578, question de délais postaux: à titre d'indicatión une lettre de Margliani adressée à Antonio Pérez de Const, le 9 déc. 1578 lui arrivait, le 31 mars 1579, après un voyage de 3 mois et 22 jours.

47. Date de son instruction seconde, 12 sept. 1578, voir ci-dessous note 3. Don J. Rocafull est le Don Juan de Rogua, de Valenza, dont parle GERLACH, cité par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500.

48. Don Juan de Cardona à Philippe II, Barcelone, 1^er nov. 1576, Simancas E° 335, f° 58"... *y con correo por tierra ordenando a Don Juan de Rocafull hizieze despalmar las nueve galeras*".

49. Instruccion segunda a Don Juan de Rocafull, Madrid, 12 sept. 1578, Simancas E° 489.

50.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500.

51.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777.

52. Juan de Idiáquez à Phillippe II, Venise, 5 févr. 1579, A. N., K 1672, G 1, n° 22.

53. J. de Idiáquez à Philippe II, Venise, 4 mars 1579, A. N., K 1672.

54.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852 note, mais l'avis du 9 janv. 1580 vise autant l'avenir que le passé. Qu'a pu signifier aussi le texte de 1579 dont nous avons donné mention *supra*, II, p. 441, note 2.

55. Echevarri à Margliani, Gazagua, 2 sept. 1579, A. N., K 1672, G 1, n° 117. Le même au même, Caravancara(sic), 2 sept. 1579, *ibid.*, n° 118, se plaint de Brutti "bellaco".

56. Margliani à Antonio Perez, Péra, 2 sept. 1579, Simancas E° 490.

57. Germigny au roi, Vignes de Péra, 16 sept. 1579, *Recueil*, p. 8 et *sq.*

58. Laquelle ne sera d'ailleurs connue à Constantinople qu'au début d'avril 1580, G. Margliani au vice-roi de Naples, Vignes de Péra, 9 et 14 avr. 1580, A. N., K 1672, G 1 n° 166.

59. Const., 4 juill. 1579, copie it., A. N., K 1672, G 1, n° 81 a.

60.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p. 782 et *sq.*, note. Sur les exploits du "général" Du Bourg, voir ci-dessus, I, pp. 343-344.

61. *Ibid.*, p. 885 et *sq.*

62. Grand com. de Castille à Philippe II, 9 juin 1580, Simancas E^c 491.

63. Margliani à D. J. de Çuñiga, 3 févr. 1580, Simancas E° 491.

64. Margliani au vice-roi de Naples, 15 oct. 1580, Simancas E° 1338.

65. Le même au même, 2 févr. 1580, résumé de chancellerie, Simancas E° 491.

66.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p. 872 et 876, note.

67. Const. 26 févr, 1580 Simancas E° 1337.

68. Margliani au grand commandeur, Vignes de Péra, 27 févr. 1580, Simancas E° 491, copie.

69. Le même au même, 7 mars 1580, Simancas E° 491.

70. Le même au même, 29 oct. 1580, Simancas E° 1338; Germigny au roi, 24 mars 1580,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885.

71. Le même au même, 12 mars 1580, copie, Simancas E° 491.

72. Voir note précédente.

73. Le même au même, 18 mars 1580, Simancas E° 491.

74. Ch. de Salazar à Philippe II, Venise, 18 mars 1580, Simancas E° 1337.

75. Les lettres de Margliani au grand commandeur, 23 et 25 mars 1580 (Simancas E° 491) ne donnent pas la date exacte de cette signature. Mais Germigny est formel, 24 mars 1580.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884-889.

76. 2 mai 1580, A. Vaticanes Spagna n° 27, f^e 88.

77. Au roi, 17 mai 1580,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910-911.

78. M. PHILIPPSON, *Ein Ministerium unter Philipp II.*, p. 404; L. von PASTOR, *Geschichte der Päpste*, t. IX, 1923, p. 273; H. KRETSCHMAYR, *op. cit.*, III, p. 74.

79.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107.

80. 9 et 14 avr. 1580, A. N., K 1672, G 1, n° 166.

81. *Ibid.*

82. *Ibid.*

83. (Avr. 1580), Simancas E° 491.

84. Margliani au vice-roi de Naples, Péra, 29 oct. 1580, Simancas E° 1338.

85. Le même au même, Péra, 10 déc. 1580, Simancas E° 1338.

86. Le même au même, Péra, 20, 21, 26 (29 ou 30) déc. 1580, résumé

de chancellerie, Simancas E° 491.

87. Tous ces détails d'après la lettre de Margliani au grand commandeur (fin déc. 1580), A.N., K 1672, G 1, n° 169.

88. Bartolomè Pusterla à D. Juan de Çuñiga, avis du Levant, 4 févr. 1581 *in* : *Cartas y avisos*..., p. 53-54. Germigny au roi, 4 févr. 1581, *Recueil*..., p. 31; E. CHARRIÈRE, *op. cit.*, IV, p. 26-28 note, parle des "escuz neufs marquez au coing d'Aragon" avec quoi Margliani a payé les Pachas. Avis du Levant, 4 févr. 1581, Simancas E° 1339.

89. Margliani à D. J. de Çuñiga, 4 et 5 févr. 1581, *Cartas y avisos*..., *op. cit.*, p. 55; 5 févr. 1581, Sim. E° 1339. Je lis sur mon texte Sciaous Pacha et non comme l'éditeur anonyme des *Cartas*, Scianus...

90. Voir note 88.

91. Don Juan de Çuñiga à Philippe II, Naples, 3 mars 1581, reçue à Tovar le 23 mars. Simancas E° 1084.

92. Don Juan de Çuñiga au marquis de Alcaniças, 4 mars 1581, Simancas E° 1084.

93. E. ALBÈRI, *op. cit.*, I. V. p. 328.

94. Au nonce d'Espagne, Rome, 11 juill. 1580, A. Vat., Spagna 27, f° 123... *il passar con silentio nel fatto de la treguaè stata buona risolutione poiché il farne querella in questo tempo non potria sinon aggiungere traraglio a S. Mtà senza speranza di frutto.*

95. *Op. cit.*, p. 181.

96. A l'extrême rigueur en 1584 par Margliani lui-même, si l'on interprète librement une indication de J. von HAMMER, *op. cit.*, VI, p. 194-195. Trêve prolongée pour deux ans en 1587, mais il ne fournit pas ses sources.

97. Comme M. de Brèves, en 1624, le pensait, E. CHARRIÈRE, *op. cit.*, IV, p. 28, note.

98. Je pense notamment à celui de Franz BABINGER, "Suleiman der Mächtige", *in*: *Meister der Politik*, 2 vol., Stuttgart et Berlin, 1923.

99. J. von HAMMER, *op. cit.*, VII, p. 70. Sur tous ces problèmes voir le livre bref, mais décisif de W. E. D. ALLEN, déjà cité, I, p. 105, n, 2.

100. J. von Hammer, *op. cit.*, p. 77.

101. B.N., Paris, Ital., 1220.

102. *Ibid.*, f° 317 v° (vers 1572).

103. J. von HAMMER, *op. cit.*, VII, p. 75.

104. *Ibid.*, p. 80; *Voyage dans le Levant de M. d'Aramon*, *op. cit.*, I, 108.

105. De Grantrie de Grandchamp à M. de Foix, Const., 30 août 1569,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62-66.

106. J. von HAMMER, *op. cit.*, VII, p. 81. Sur la guerre de Perse, le vieil ouvrage de Hammer utilise les sources précieuses de Minadoi et de Vicenzo degli Alessandri et les sources orientales, celles des historiens Ali et Pertchewi. Une fois de plus l'occasion est bonne de dire la supériorité de ce vieux livre sur ceux de ses successeurs, J. W. ZINKEISEN et N. IORGA.

107. Péra, 9 déc. 1578 (Margliani à Pérez, reçue le 31 mars 1579), Simancas E° 489.

108. Que n'eût dit Émile-Félix Gautier à son sujet?

109. Venise, 7 janv. 1579, A. N., K 1672, G 1.

110. Const., 4 févr. 1579, A. N., K 1672, G 1.

111. Const., 24 mars 1579, *ibid.*

112. Juan de Idiaquez à Philippe II, Venise, 21 mars 1579, *ibid.*, n° 35.

113. X. de Salazar à Phillippe II, Venise, 8 juill. 1579, *ibid.*, n° 84.

114. Margliani (référence exacteégarée).

115. J. de Idiáquez à Phillippe II, Venise, 29 avr. 1579, A. N., K 1672, n° 56, copie.

116. Germigny au roi, Péra, 16 sept. 1579, *Recueil.* p. 10; *Relacion de lo que ha succedido al capitan de la mar Aluchali desde los 17 de Mayo que partio de aqui de Constantinopla asta los 6 de agosto sacada de las cartas que se han recibido de Juan de Briones y Aydar Ingles*, A. N., K 1672, G 1, n° 115. (Même relation, Simancas E° 490). *Relacion de lo que ha sucedido de los 9 de agosto hasta los 28*, A. N., K 1672, G. 1, n° 116. Euldj Ali est rentré à Constantinople le 10 sept. (cf. Germigny, cité au début de cette note) avec 13 galères.

117. Const. 29 avr. 1579, A. N. K 1672, n° 56, copie.

118. Margliani à Antonio Perez, Pera, 2 mars 1579, Simancas E° 490.

119. Le même au même, 5 sept. 1579; *ibid.*

120. J. de Cornoça à S. M., Venise, 17 oct. 1579, A. N., K 1672, G 1, n° 142 a.

121. Salazar à Philippe II, Venise, 7 sept. 1579, *ibid.*

122. *Ibid.*

123. Germigny au roi, Péra, 16 sept. 1579, *Recueil*. . . , p. 10.

124. Voir note 5.

125. Germigny au grand-maître de Malte, Péra, 8 oct. 1579, *Recueil*. . . , p. 17-18. Jusqu'à Erzeroum seulement, J. von HAMMER, *op. cit.*, VII, p. 96.

126. J. von HAMMER, *op. cit.*, VII, p. 97.

127. *Ibid.*, p. 98.

128. Il meurt le 27 avr. 1580, E. CHARRIÈRE, *op. cit.*, III, p. 901.

129. Trois lettres de Margliani à Don Juan de Çuñga, 27 et 30 avr. 1580, Simancas E°491. Résumé de la chancellerie.

130. J. von HAMMER, *op. cit.*, VII, p. 104.

131. *Ibid.*

132. *Ibid.*, p. 112.

133. R. Hakluyt, *op. cit.*, II, p. 171.

134. J. von Hammer, *op. cit.*, VII, p. 113, note 1.

135. *Ibid.*, p. 223. Donc victoire turque, G. BOTERO, *op. cit.*, p. 188 v°, la voit de la façon suivante: "car bien que le Turc ait été désfoit et mis en route plus d'une fois, il ha ce néanmoins, en se fortifiant peu à peu es lieux propres, occupé très grands pays; et finalement ayant pris la grande ville de Tauris, il s'en est asseuré par une grosse et forte citadelle. Ainsi ceux de Perse pour n'avoir des citadelles et forteresses ont perdu la campagne et les villes aussi".

136. Karl BROCKELMANN, *Geschichte der islamisch. Völker und Staaten*, 1939, p. 282; sur le personnage et ses curiosités, Erich BRÄUNLICH, *Zwei türkische Weltkarten*. . . , Leipzig, 1937.

137. La formule est malheureusement un peu trop simple. Mais comment, ici, entrer dans tous les détails? 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 qui prépare un travail d'ensemble sur l'océan Indien au XVI[e] siécle me fait remarquer que les flottes portugaises sont composées de voiliers, disons atlantiques, de navires de types indigénes et aussi de galéres. . . une flotte composite, pour des tâches diverses.

138. M. A. Hedwig FITZLER, "Der Anteil der Deutschen an der Kolonialpolitik Phillips II in Asien", *in*: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36, p. 254-256.

139. Lisbonne, 22 févr. 1588, *Arch. port. or.*, III, n° 11, cité par M. A. H. FITZLER, *art. cit.*, p. 254.

140. Cf. W. E. D. ALLEN, *op. cit.*, p. 32-33 et notes, qui rectifie l'erreur de ma 1re édition.

141. 14 mars 1588, *ibid.*, n° 43, cité par M. A. H. FITZLER, *art. cit.*, p. 256.

142. M. A. H. FITZLER, *art. cit.*, p. 256.

143. Pierre Chaunu, *art. cit.*, *in*: *Revue du Nord*, 1960, p. 288 et *Conjoncture*, p. 629 et *sq.*

144. M. PHILIPPSON, *op. cit.*, p. 62; *Correspondance de Granvelle*, VII, p. 353.

145. Granvelle à Marguerite de Parme, 12 août 1579, PHILIPPSON, *op. cit.*, p. 71.

146. Nullement éclaircies par le livre hâtif et partial de Louis BERTRAND, *Philippe II. Une ténébreuse affaire*, Paris, 1929. Le gros problème reste celui de l'authenticité ou non du manuscrit de La Haye. Le beau livre du Dr G. MARAÑON, *Antonio Pérez*, 2 vol., Madrid, 2e édit., 1948, renouvelle ces problèmes sans les éclaircir entièrement.

147. M. PHILIPPSON, *op. cit.*, p. 104 et p. 224.

148. Général DASTAGNE, "La bataille d'Al Kasar-El-Kebir", *in*: *Revue Africaine*, t. 62, p. 130 et *sq.*, et surtout le récit de QUEIROZ VELLOSO, *D. Sebastião*, 2e éd., Lisbonne, 1935, chap. IX, p. 337 et *sq.* repris par ce même auteur au tome V de l'*Historia de Portugal*, de Damião PERES.

149. Ch. A. JULIEN, *H. de l'Afrique du Nord*, p. 146.

150. Mercuriano à Philippe II, 11 janv. 1579, Simancas E° 934; le même au même, Rome, 28 avr. 1579, *ibid.*; M. PHILIPPSON, *op. cit.*, p. 92, note 2 et p. 93, note 1.

151. Le grand-duc de Toscane à Philippe II, Florence, 17 juin 1579, Simancas E° 1451. Voir également R. GALLUZZI, *Istoria del Gran Ducato di Toscana*, III, p. 345 et 356.

152. Le Portugal au service de l'Espagne depuis la crise de 1550, depuis la victoire du métal blanc d'Amérique. Large immigration portugaise vers les villes d'Espagne et notamment Séville.

153. R. B. MERRIMAN, *op. cit.*, IV, p. 348, d'après la correspondance des Fugger, remarques éclairantes, *The Fugger News-Letters*, p. p. V. von

KLARWILL, 1926, t. II, p. 38.

154. Voyez, à ce sujet, les remarques de Juan Beneyto PÉREZ, *Los medios de cultura y la centralización bajo Felipe II*, Madrid, 1927, p. 121 et *sq*.

155. Grand problème et bien aperçu par Jacques PIRENNE, *Les grands courants de l'hist. universelle*, II, 1944-45, p. 449 et *sq*.

六　在重大历史事件范围之外的地中海

我们可以浏览一下罗歇·B. 梅里曼所著的《西班牙帝国的兴起》[1]这本书。从传统的角度看，这是一部优秀的著作。这本书写到1598年菲利普二世的统治终结时为止。地中海1580年以后的历史，这本书只字未提。这种沉默，这种几乎所有西班牙历史都保持的沉默，是耐人寻味的。对罗歇·B. 梅里曼和遵循历史一故事这个模式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在马格利亚尼出使土耳其之后，地中海就被大规模的战争和外交活动抛弃，顿时陷入沉沉黑夜之中。照射地中海这个舞台的聚光灯全都熄灭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些聚光灯用它们交叉的灯光照射的，是另外一些舞台。

然而，地中海远远没有死亡，没有停滞。但它现在是怎样一个世界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决不应该过分在我们惯常使用的西班牙的甚至意大利的档案的原始资料中去寻求。正如今天被人称为报纸的这种东西一样，各个掌玺大臣公署，其中包括意大利的这类机构所收集的情报资料，只收录引起轰动的、产生巨大反响的事件。通过这些资料，地中海的历史变得不再能够被人感知和理解了。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或者巴塞罗那这些地方，人们谈的、写的，都是发生在远离地中海的地方的事件。人们寻思土耳其一波斯和约是否会缔结，法国国王是否和他的臣民意见一致，葡萄牙是否被

降服，菲利普二世在他的无敌舰队出航之前的那几年里进行的战备活动是否针对大西洋或者非洲。不时传来很多关于地中海的消息和密谋会谈。这些消息和密谋会谈在外交函件和通讯中都有记载。但是，似乎由于偶然的原因，这些都始终只不过是中途消亡的、没有实现的梦想而已。例如在威尼斯、罗马、托斯卡纳和西班牙之间多次缔结的反土耳其同盟的计划就是这样。这些计划并不比1587年缔结的拉·努反土耳其计划更有价值。人们对大帕鲁塔1592年对这些计划如此重视感到十分惊讶。[2]

罗马的情况也是这样。它的思想和行动仍然引向，而且以后长期引向大西洋。罗马教廷在同北方的异端进行的斗争中和西班牙团结一致。正如庇护五世为了同伊斯兰教进行斗争曾经在勒班陀战役前夕所做的那样，格里哥利十三世和西克斯特·坎特先后把教会的巨额收入让与菲利普二世以便同伊丽莎白及其同盟者进行斗争。整个意大利都参与了这场维护罗马教会的战斗。总而言之，地中海地区的各个国家的全部注意力和它们的政治努力的最佳部分都集中在地中海之外的地方。似乎人人都从地中海转过身来朝向别处：土耳其人离开地中海，转而向里海压逼；摩洛哥雇佣军于1591年占领廷巴克图；[3]菲利普二世自己试图变为，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试图仍然是大西洋的主人。

这种事态一直延续到1590年左右。但是，亨利三世之死（1589年8月1日[4]）引起一场严重的危机，其影响在整个地中海地区都可以感受到，特别在威尼斯更可以感受到。威尼斯对法国，对这个作为欧洲的力量平衡的不可或缺的部件的国家，对这个因此甚至成为处于众多强敌包围之中的威尼斯共和国的自由的保证人的国家

的可能撤离深感不安。一个威尼斯商人写道[5]:“我们不知道现在该相信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这些关于法国的谣言为商业造成巨大损失。”威尼斯市政会议感觉受到严重威胁,以致它毫不犹豫就与信奉新教的格里宾登人结成同盟,又毫不犹豫于8月份同意在1590年1月接待亨利四世向它派去的大使德·梅斯先生。[6]西克斯特·坎特寻思: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行事?“这是因为威尼斯共和国害怕纳瓦尔方面的某一事物吗?它错了。它不应该害怕。必要时我们准备竭尽全力保卫它。”[7]但是,西克斯特·坎特弄错了。这个共和国预先表态反对这个只能保障和加强西班牙令人无法容忍的霸权的天主教集团……

亨利三世的王位继承问题引发的危机从1590年起逐渐充分显露出来。同年,土耳其素丹摆脱了在远离本土的地方进行的对波斯的战争。现在他将转而回到地中海或者巴尔干半岛(读者应该了解为匈牙利)吗?或者他不这样做,而是试着(这正是1593年以后他所做的)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攻基督教世界吗?这项政策所下的赌注逐渐又突出了在地中海发生的事件。但是,这些事件并没有因此而具有在1550年和1580年之间的这段时期的那种富有戏剧性的格调。从1593年起重新出现的,是徒有大规模战争和宏大谋略之名而无其实的战争和谋略。伴随这些战争和谋略而来的是大吹大擂。言行之间何啻霄壤。战争失去了严肃性。不断缔结的密约和做成的交易使战争经常中断。1598年,海上统帅、土耳其的卡皮坦帕夏哲加拉拜访[8]亚得里亚海海湾的威尼斯将军,向他提出一些商谈的事项,其中包括可能把塞浦路斯归还威尼斯这个问题。另外一年,[9]他经西西里总督准许(哲加拉是西西里的

背教者。他在他父亲的船上被俘。那时他还是孩子。他的父亲是有名的基督教徒海上行劫者），接待母亲和一大群家人登上他的船。官方的这些温良宽厚的举动在20年前是根本行不通的。

1. 土耳其的困难和动乱

在1580年和1589年之间这段时期，当一场残酷的战争正在蹂躏大西洋的时候，编写内海编年史的人却没有什么可写。土耳其对开罗、的黎波里和阿尔及尔等地进行的惩罚性的征伐，只不过是警察行动而已。这类行动甚至很难核实。在基督教控制的地中海这方面，需要指出的只有西班牙的（或者为西班牙服务的）帆桨战船连续不断的航行。这些舰船不断把兵员从意大利运往西班牙。这些兵员是：在当地征募的意大利士兵、在阿尔卑斯山另侧征募的下山来到米兰和热那亚的德意志步兵[10]以及从西西里或者从那不勒斯撤回以便代之以征募来的西班牙新兵的西班牙老兵。几年后，当这些西班牙新兵的“训练”完成时，他们又将被替换……在这些年月里，米兰是西班牙的主要军事基地。它向四面八方重新分派菲利普二世的兵员，其中包括经由漫长的陆路把兵员分派到佛兰德。只要对军队穿过大伦巴第城市的运动进行研究，就可以发现在菲利普二世统治的每个时期西班牙在军事方面关切的是什么，就可以测定西班牙帝国生命的节奏。

当帆桨战船运载新兵从西班牙归来时，大量白银随同带到热那亚。整个意大利都因这种白色金属流入而发财致富。我们已经说过，整个地中海地区也通过意大利富裕起来。大量白银的流入，是

地中海生活这个阶段的重大特征之一。如果没有海上行劫这种不被"正大的"历史登录但并不因此而较不残酷的二等战争的话，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幸福时期。此外，这种海上行劫也经历了一些变化。这方面有两件小事需要研究考虑。一件是具有象征性的：1587年7月，厄尔杰·阿里死去，时年67岁。[11]从此没有人再开始类似他那样的生涯。他是巴巴罗萨和德拉库特的最后一个继承人。随着他的去世，一个时代消逝了。另外一件小事预示未来：1586年，5艘英国商船撵走了西西里的帆桨战船舰队。[12]这是战列舰的尚未被人觉察到的伟大前程的先兆。[13]

1589年以后：北非和伊斯兰世界的叛乱

1589年打破了地中海的宁静。它重新发出警报：在欧洲发生了法国的危机；在伊斯兰世界情况也相同。

关于北非的细小事件和轻微动乱的资料虽不完全，但人们可以察觉在这些事件和动乱的后面，在北非的整个东部和中部，在自从1574年突尼斯被攻占以来，土耳其人就已经控制的这个地区内，展露出一场普遍的危机。这一危机甚至还进一步扩展，可能把地中海的整个伊斯兰地区都包括了进去。这些叛乱和动乱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在前几年，曾经在身兼统帅帕夏和省长两职的厄尔杰·阿里和他留在阿尔及尔代替他的副将之间发生过多次争执纠纷。1587年厄尔杰·阿里之死可能使事态恶化了吗？不管怎样，土耳其政府认为用每届任期三年的帕夏制度来代替省长——真正的地方性的"国王"——制度是适宜的。[14]

因为问题的实质是土耳其的权力危机，是对土耳其的权力的挑战。面对这种权力，海上行劫者坚持或者力求坚持他们的行动自由。此外，正如哈埃多所说，土耳其人和“摩尔人”即使在阿尔及尔城内，彼此也几乎一直是陌生的，因为摩尔人的征服者让摩尔人始终居于低下的地位。某些文章使人联想起伊斯兰教隐士和土著人的运动。这是一种在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偶然性的运动，但也是一种始终具有宗教性质的反对土耳其入侵者的反抗运动。一个的黎波里的叛乱者说：“土耳其人踏上哪里，哪里的草就停止生长，接着就会腐烂。”[15]不管怎样，这些难以辨明的、我们对之若明若暗的运动，当然与马格里布同土耳其之间的联系开始松弛有关联。后者不再拥有制海权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1587年厄尔杰·阿里之死，而是1582年他试图夺取阿尔及尔[16]并试图越过阿尔及尔夺取非斯失败这件事。历史学家把这件事归因于奥斯曼的衰落。说得更确切些，在所有与土耳其的制度、货币、财政和权力等有联系的国家，这难道不是一场虽然还是暂时的但却是普遍化了的不安和动乱吗？

尽管这并不是土耳其强盛时代的终结，至少也是土耳其宏大的、耗资巨大的地中海政策的停止执行。1589年初，威尼斯的情报人员还认为阿尔及尔的前省长哈桑·韦内齐亚诺打算进行大规模的远征。他冬季已经成功地率领5艘荷兰圆头帆船从阿尔及尔驶往君士坦丁堡，“这使无法在中途截获这些船只的基督教的舰船只有感到耻辱。”[17]1月10日，哈桑到达土耳其首都。不久以后，风闻新的“卡普丹帕夏”打算武装50到60艘帆桨战船并且进抵非斯，试图再度执行厄尔杰·阿里的图谋。传到那不勒斯的公文急报谈到有人在

摩里亚储备小麦和饼干以及100艘帆桨战船准备驶往的黎波里等情况。[18]100这个数字人们已经多年不习惯听说。同一时期，来自威尼斯的情报转引了这个数字[19]。消息十分令人忧虑，以致西班牙人打算春季派遣加强了的帆桨战船去黎凡特侦察敌人的活动[20]。但是，4月份，人们获悉君士坦丁堡的海军造船厂并没有紧张积极、热火朝天地生产。如果真的要远征柏柏尔的话[21]，最多只有50艘帆桨战船可用于这次行动。1个月后，威尼斯有人断言不会有1支能够产生重大后果和影响的土耳其大舰队出航。[22]但是，5月底和6月底，再次发布了30艘到60艘土耳其帆桨战船向西驶来的消息，以致有关部门决定像过去一样把王家帆桨战船调来墨西拿。[23]

哈桑的确已于6月18日率舰离港出航。22日，他抵达内格勒蓬岛。第二天，罗得岛、亚历山大和塞浦路斯的"守备部队"在那里和他再度会师。一份宣称这支土耳其舰队共拥有帆桨战船和荷兰圆头帆船80艘[24]的公文急报（根据以后的公文急报这个数字似乎被人夸大）说，哈桑的舰船上没有足够的划船奴隶。7月28日，哈桑在继续航行之前仍然在莫东等待10艘来自科龙的帆桨战船。[25]启航的日期可能是8月1日。根据威尼斯提供的数字，[26]这支舰队启航时有帆桨战船30到44艘。来自巴勒莫的消息则说，[27]这支舰队有帆桨战船46艘和荷兰圆头帆船4艘，这些舰船"除了旗舰以外，情况都相当糟糕。"[28]舰队载有8,000人，径直驶往的黎波里。它在西西里沿海海域被人发现，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袭击西西里海岸。[29]

如果不了解土耳其舰队尽管面临重重阻碍，首先是面临春末以来就破坏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的动乱[30]，仍然出航作战这一事实，那么对土耳其的这一努力的规模就会作出不正确的估计。这

些产生于深重苦难和军纪废弛的动乱，在5月份异常令人不安，以致帕夏们在他们的住宅里也不再感到安全。“他们就好像置身于敌营之中一样，前后左右都有卫士。”[31]这个危机就发生在土耳其帝国的中心，这使人联想到当时正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蔓延发展的动乱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彼此互不相关。米兰达伯爵9月8日写道：“关于已经驶往的黎波里的土耳其舰队，除了它已于上月12日抵达这个城市以及哈桑·阿加迅速行动，力图征服已经叛乱的摩尔人这两点之外，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了解到任何其他情况。在这个期间，叛乱分子的首领——伊斯兰教隐士——正在拚死抵抗。他有大批士兵，但希望一支基督教大舰队驶来援助他。以上是从一艘开去援助摩尔人的马耳他骑士团的帆桨战船那里[32]“了解到的情况”。这一事实被这个骑士团的一项报告证实。[33]

因此，尽管哈桑的远征散布了恐惧不安，但是它的矛头并不指向基督教世界。土耳其人没有任何前去与西班牙作战的意图。他们在出航和返航途中都没有侵犯那不勒斯或者西西里的海岸。此外，在此期间，在君士坦丁堡还有一个菲利普二世的半官方的代理人。连续停战的状态没有中断。从8月到9月，菲利普二世命令让·安德烈·多里亚率领帆桨战船40来艘去西班牙寻找和运集军队。这证明，尽管重新补充、装备那不勒斯的和西西里的西班牙步兵团以预防将来产生的纠葛的行动仍然被视为必不可少，但人们现在并不过分恐惧[34]……

几个月后，一份发自君士坦丁堡的公文急报说，哈桑率领的35艘帆桨战船返航时“溃不成军、队形散乱，以致住在这里的基督教徒都为这些战船的作战对手竟让这些战船返回从而失去全歼它们

的良机而深为惋惜。的确，此间认为这支舰队在它的大部分划桨手和大量士兵死后，已经完蛋了”。[35]这份好战的公文急报的口气是耐人寻味的。海军造船厂之所以还在继续生产，“这是为了使大家害怕。”

至于写这封信的人自己，他却不愿意受骗上当。难道他不了解，难道他没有就近目睹困扰土耳其帝国的重重困难吗？如果哈桑·韦内齐加诺的这次远征（除了它标志出地中海和以前相比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之外）不是发生危机的年月里土耳其事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毫无疑问，我就不会强调指出了。人们可以猜测出这个局势，但不确切了解这个局势。

君士坦丁堡发生叛乱。的黎波里也发生叛乱。这两个城市遥隔千里。现在叛乱也席卷突尼斯。那里一个名叫穆罕默德·卡普西的人[36]的报告早在1589年9月就已经指出，当地土著对土耳其人日益激怒、愤恨。这是一个卷入个人争端，并且寻找几桶火药，或者说得简单些，寻找几枚杜卡托的孤立者、冒险家或者幻想者发出的警报和呼号吗？显然不是。因为突尼斯的愤怒情绪1590年爆发，其激烈程度很能把问题揭示出来。所有的年鉴都载明伊斯兰教教历纪元999年的哈德贾月发生的，即1590年发生的突尼斯暴乱以及几乎全部布卢克·巴希斯遭到杀害的事件。这些布卢克·巴希斯是受到军队和百姓憎恨而又受托管理所有行政事务的官吏。[37]这时，随着新的一年到来，在的黎波里叛乱再起。3月，一份发自君士坦丁堡的公文急报报告的黎波里的帕夏死去和在港内避难的土耳其人处于绝境。仍然需要从开罗派出骑兵或者同上年一样需要派遣50至60艘帆桨战船去解救这些人。[38]但是，现在已经不再是武装50艘帆桨战

船对土耳其素丹来说只不过是玩玩游戏的时代了。根据1590年3月16日一份发自君士坦丁堡的公文急报，土耳其人为了削减开支，提出愿意把的黎波里总督的职位提供给任何愿意自己出资武装5艘帆桨战船并且使用这些舰船进行远征解救的黎波里的人。然而，没有任何人挺身而出。于是，有关方面打算武装30艘帆桨战船并加上希腊群岛的警卫部队的帆桨战船以及将在希腊征用的几艘低舷长形船[39]……

显然，在君士坦丁堡，人们对非洲绵延不绝的动乱深感不安。但是，采取行动并非易事。海军造船厂不能在朝夕之间重建一支舰队。士兵薪饷微薄，骚动不满。但这丝毫不能阻止土耳其人吹嘘他们拥有帆桨战船300艘，不能阻止首席帕夏骄焰日增，威胁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波兰、威尼斯、马耳他……由于同波斯的和约看来即将缔结，这些威胁终于弄得人心惶惶。威尼斯让干地亚处于戒备状态，并且扩大它的海军造船厂的生产。[40]

在这期间，北非的危机继续迅速发展。两个成功地逃离的黎波里的基督教徒俘虏4月初向阿尔贝伯爵报告。他们用肯定的口气说："伊斯兰教隐士仍然在继续战斗。虽然意大利认为这一年土耳其舰队不会出航，但在的黎波里，人们鉴于出航对于土耳其来说是必要的，因此执相反的看法。因为如果敌人从土耳其人手中夺走的黎波里，就会使土耳其人冒丧失他们远至阿尔及尔的柏柏尔的属地的危险。如果失去的黎波里这个要塞，他们的非洲帝国会整个土崩瓦解。这是肯定无疑的。"[41]在威尼斯，当土耳其人和波兰人唇枪舌战、进行争论激烈的谈判的时刻，人们密切注视着叛乱的发展情况。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写道："刚刚传来的消息说，叛乱的摩尔人

已经攻占的黎波里，并且杀掉来自突尼斯的士兵的首领和该城卫戍部队的首领，其中包括帕夏。要塞仍然在被围困在该城的土耳其人的手中。”人们认为，将有军队从开罗经由陆路开来解救土耳其人。[42]米兰达伯爵在将近同一时期指出，很可能派出另外一支现在在附近海域活动的土耳其舰队来援救。[43]

不管怎样，对西班牙来说，没有理由对此惊恐不安。特别因为那时传到马德里的消息说，西班牙—土耳其停战协定已经延长3年。[44]一个法国代理人指出，这在马德里是“梦寐以求的”。阿尔贝伯爵坚持让西西里海岸处于戒备状态。但是，单单北非的事本身已经足够占用刚刚休整康复的土耳其舰队的全部力量和可能派去的埃及骑兵的力量了。[45]叛乱确有蔓延全境之势。阿尔贝伯爵派遣一个名叫胡安·萨尔米恩托的人去泰拜尔盖这个热那亚的珊瑚采集人的岛屿、这个良好的侦听站。泰拜尔盖总督斯皮罗诺和他的代理人德·马吉斯对伯爵说(当然用隐语说，因为如果土耳其人知道老老实实的热那亚人提供情报的话，热那亚人可能丧命)：“整个柏柏尔都被煽动起来拚死反对土耳其，特别在突尼斯更是如此。该地的帕夏处于极大的财政困难中。他欠他的士兵6个月薪饷。他无法付这笔钱。因此，他的副将和行政机构人员都被士兵关押起来，成了俘虏。在柏柏尔全境，土耳其人纷纷逃离、登船前往阿尔及尔……”萨尔米恩托又写道：“他们要我向阁下和王子(西班牙储养的哈弗西德家族的王子)建议派遣70艘帆桨战船。只要这些帆桨战船一在拉古莱特海湾出现，摩尔人就会把土耳其人打得落花流水。条件是阁下同王子意见必须一致，让摩尔人的财产免遭劫掠。”[46]“当哈桑·阿加来到的黎波里，让一支3,000人的土耳其军队登了陆，让他

的帆桨战船解除武装，在海面上无人防卫的时候，却并没有从西西里派来"20艘帆桨战船。这些战船本来是能够掳获并焚毁这些土耳其帆桨战船的。"热那亚人对这个情况感到惊讶。"[47]

似乎很可能当时西班牙人是在对事态了如指掌的情况下故意不采取行动。他们不打算就的黎波里问题或者就柏柏尔的任何其他部分的问题重新点燃土耳其一西班牙战争的战火。阿尔贝伯爵1590年4月的信不加任何掩饰地谈到这一点。[48]几艘佛罗伦萨的帆桨战船刚刚开到巴勒莫，"这些舰船武装配备精良，由划桨手、步兵予以加强……据说这些舰船将驶往马耳他同马耳他骑士团团长的帆桨战船会合，以参加将在的黎波里采取的行动，这样就将给土耳其人以派遣舰队去地中海西部水域并使陛下为难的借口"。"为了使陛下为难，"这是再明白不过了。阿尔贝后来满意地得知，佛罗伦萨的帆桨战船除了会同骑士团进行海上行劫、再次在罗得岛和亚历山大之间[49]袭击由大帆船组成的"商队"之外，没有别的意图。如果说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对恢复过去的争斗西班牙人比土耳其人更不热衷。

这种态度有助于限制北非的叛乱。这些叛乱往往只不过是装备很差的，最好的也只不过是装备几支火枪的土人对抗设防的城市，对抗整队整队的、而且装备着大炮的火枪手而已。虽然土耳其的驻防地保卫自身的任务并不容易，但是，只要叛乱分子这方面得不到外援，只能依靠自己，它们并不是绝对无法胜任这一任务。1590年夏天，过去曾经挫败过土耳其人的的黎波里伊斯兰隐士被人出卖给土耳其人。据报导，同年5月初，他曾经撤退到卡乌尔斯，把整个海岸都留给土耳其人。在土耳其新舰队可能开到的时刻，这

是正常的预防措施。[50]不久以后，一份5月21日发出的公文急报宣布他在那不勒斯被人暗杀。[51]6月8日，从君士坦丁堡传来的消息明确说，"煽起的黎波里和柏柏尔的其他一些地方的暴乱的伊斯兰隐士被陈尸示众。这具尸体成十字形，置放在广场上。这既表示胜利，也表示基督教徒的耻辱，后来，尸体被钉在普通绞架上"。[52]不错，6月2日，消息传来，这位伊斯兰隐士有了接替者，而且是个更加好斗的接替者。[53]但是，似乎土耳其人在的黎波里受到的惊扰有所减少。除了在君士坦丁堡和北非之间作例行往返的由帆桨战船组成的小舰队，例如陪同被任命为突尼斯总督的雅费帕夏[54]的10艘帆桨战船外，土耳其人这一年没有进行较大规模的海上征伐活动。如果我们的资料核实工作准确可靠的话，1591年和1592年，土耳其人也没有进行这类活动。这是因为这类活动并非绝对必要，或者是因为进行这类活动是土耳其的真正力量所不能及的吗？然而，北非的危机最终对当地土著带来的好处少于它对非洲的土耳其人，对卫戍部队和对危机使之几乎自治的各个奥斯曼小殖民地等带来的好处。这是事实。这些殖民地难道不是越来越被迫自给自足、独立自主吗？在可以觉察到事态的这种发展演变情况的阿尔及尔，最后的胜利者是海伊斯的共和国——塔伊法；直接的结果是海上行劫活动日益增多。突尼斯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本世纪末以前，那里的海上行劫活动已经飞速发展。由于柏柏尔的摄政团已经摆脱了外界的控制，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主宰自己的命运，[55]这类摄政团的未来面貌当时正在开始显现。另一方面，北非由于它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在本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日益疏远，它变成了一个比过去更加向基督教世界的贸易和阴谋活动开放的世界，一个吸引隔海相望

的邻国的贪欲和冒险活动的世界。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一个法国商人表示要安排布日伊整个城市的转让。[56]如果有人愿意帮助库多国王对抗阿尔及尔，这个国王将把几个港口让给他[57]。1607年，托斯卡纳的帆桨战船轻而易举地抢劫了波内……对北非来说，一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不按照东方的节奏生活，不再是东方的前哨了。

土耳其的财政危机

在1590—1593年的危机同土耳其的整个历史之间有什么关联，这一点尚待了解。这个危机除了有地方性的原因(例如在北非)之外，肯定还有普遍性的原因，因为它虽然在这里或者那里受到抑制，但几乎又在土耳其世界所有的省份出现、消失、再现，例如在小亚细亚这块叛乱和动乱的沃壤出现，也在君士坦丁堡出现。继1589年事件之后，1593年1月，土耳其骑兵在君士坦丁堡再次叛乱。[58]

所有这一切可能与1584年土耳其的财政危机有关。这一年，[59]土耳其政府开始在货币方面大要花招。在这方面，它效法曾经一下子就把它的货币贬值50％的波斯。土耳其以1素丹宁值43迈丹的比价从开罗获得金币(用非洲金子铸成)。而这些金币作为军饷发给士兵时，却按1素丹宁值85迈丹的比价计算，这是相当于波斯的50％的贬值率的贬值。在这个期间，价值与素丹宁相同的威尼斯西昆现在不是1西昆值60阿斯普尔，而是值120阿斯普尔。此外，还重新熔铸了作为土耳其各地的和士兵军饷的标准货币的阿斯普尔。掺进这种新铸的小银币的铜的成分越来越多，这种小银币变得越

来越薄。那个时代的一位历史学家说，这些阿斯普尔“像杏树树叶那样轻，又像露珠那样没有价值”。[60]1590年，土耳其骑兵中的骚乱难道不就是对发行这些伪劣货币作出的反应吗?这一年，一则发自威尼斯的情报[61]表明，在土耳其塔勒(应该理解为皮阿斯特或格鲁希)方面手法在继续玩弄。该世纪初，1塔勒值40阿斯普尔。在穆罕默德三世(1595—1603年)的统治下，货币价值继续暴跌。西昆同阿斯普尔的比价从1:120上升到1:130，后来又上升到1:220。与此同时，财税机关却坚持继续按过去的1:110的比价计算。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写道[62]:“(土耳其)帝国贫困、枯竭得只有纯铁的阿斯普尔作为唯一的货币流通使用了。”这显然是夸大之词，但这种夸张仍然显示出土耳其内部的崩溃情况。这种情况，只叙述大事的普通历史极不重视。

从1584年到1603年，至少连续发生过两次货币危机，而且除了货币的波动外，还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地中海东端在间隔一段时间之后，遇到地中海西端已经遇到过的困难。但是，它没有伊比利亚半岛在朝向大西洋为美洲的白银打开大门后找到的那种新财源来暂时减轻这些困难。因此，我们可以大致这样认为：由于无法支付军饷和中央政权的作用削弱，土耳其的破产和经济方面的衰弱在1590年左右产生了一种迅速蔓延扩散的危机。障碍已经遭到破坏或者即将遭到破坏，这就让这里和那里的多种多样的不满的表现——政治的、宗教的、伦理的，甚至社会的——显露出来。在这个疆域辽阔的帝国，紧随货币价值的暴跌之后，发生了一系列骚乱和纷争。[63]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解释而已。这种解释需要补

充，需要细致地区别，当然也需要修改。所有这些工作都只有对关于土耳其的档案资料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到。

1593—1606年：匈牙利前线大规模战斗再起

自1568年停战以来，战争就从来没有真正在土耳其的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的这条大陆边界上停止过。说得更确切些，这场战争是陆上的海上劫掠。有进行这种战争并整批整批靠它为生的专家。他们是：达尔马提亚和威尼斯的边界上的乌斯科克人和马尔托洛斯人、匈牙利辽阔的边境地区的阿金德伊斯人（巴奇·布汝克人的祖先）和哈伊杜克人、居住在波兰和俄罗斯公国之间的有争议的地区以及居住在多瑙河和黑海之间的有争议的辽阔地区的鞑靼人和哥萨克人。这种连绵不绝、永无休止的游击战争，在于1568年缔结（为期8年）、又于1579年和1583年两次展延期限的停战之后的漫长的间隔时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从1578年起，土耳其的力量就已经转向亚洲。在边界线的土耳其一侧，军队一下子全部撤离，边境被弃置不顾。骚乱开始出现。这些骚乱的性质固然不能与北非的骚乱的性质相提并论，但是，情况同后者一样，缺乏对有关地区牢固的控制助长了这些骚乱。1590年，锡南帕夏就波兰的边境问题对英国王后解释了这一点。他写道："土耳其皇帝在波斯战争中不愿到其他前线作战。波兰的哥萨克和其他一些人结成的匪帮，趁进行这场战争之机不断袭扰土耳其臣民。"波斯战争结束后，素丹打算惩治这些袭扰者。然而，关于波兰这方面的问题，素丹接受用友好的方式处理冲突（1591年的确

签定了一项协定[64]),但这仅仅是由于英国王后的干预。这位王后已经宣称她对波兰感到兴趣,因为波兰向英国臣民提供谷物和火药。锡南没有谈到几届波兰大使带去的礼品和他们的国王作出的他自己惩罚哥萨克人的允诺。

对牲畜和村庄无休止的抢劫,使土耳其和波兰之间的边界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变得一片荒芜。整个漫长的边境的情况也是这样。土耳其和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的边界地区遭受破坏的情况甚至更加严重。哈布斯堡帝国在中部和西面是远比波兰人或者俄罗斯人更加危险的邻居。俄罗斯人在南方常常进入荒无人烟的地区或者土耳其没有直接完全控制的那些罗马尼亚的地区。当然,我们不能设想土耳其人始终是受害者。游击战争并不是朝着唯一的方向进行的。根据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说法,只有土耳其人才是罪人。没有一个土耳其边境地区的贝伊——最小的城堡的主人——没有在他自己的领地内使用过自己的军队、同盟者和个人的据点来参加这种地区性的战争。1584年和两年后的1586年12月,当基督教徒——边界上的领主和城堡主、斯拉沃尼亚的和克罗地亚的"军区总管"——在镇压结帮成伙在卡林西亚活动的土耳其人时,[65]他们就不管别人怎样议论,就不像约瑟夫·德·蒂尔恩伯爵和军区总管托马斯·埃罗迪那样仅仅满足于击退敌人的袭击,仅仅满足于钳制敌人或者用先发制人的办法"防止"他们。事实上,双方都全力以赴,地区性的战斗经常导致有成百成千人被俘的对阵战。在这些灾难的重压之下,整个匈牙利,不管是基督教地区还是伊斯兰教地区,例如卡林西亚、施蒂里亚的边境地区、斯拉沃尼亚和克罗地亚边境省以及卡尔尼奥尔等地,都惨遭蹂躏。在这些地方,成排成行的城

堡和要塞、起伏不平的地形或者河流造成的沼泽等都不能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66]有利于作战的季节持续多长，战火就燃烧多长而不熄灭。甚至冬季的休战也并非绝对有保证。对我们来说，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这些边境地区变得一片荒凉，令人感到恐惧。使用大部队在这些地方作战产生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例如，为了供应格朗的前哨堡垒，必须从布德派出大批用牛组成的运输队。但是，如果基督教徒偶然前来堵截这些运输队，把牛出借给运输队的人——匈牙利平原的农民——就不再有牲口拉犁，于是就把自己的妻子拴在犁上拉犁。这是一场无法平息、野蛮残酷、惨无人道的战争。当这场战争在16世纪最后10年再度爆发时，对土耳其人来说，这不啻是第二次波斯战争，和第一次波斯战争同样野蛮残酷、同样耗费国力、同样旷日持久(1593—1606)。

一直到那个时期，虽然基督教徒总是在游击战中获胜，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政策却是坚决执行1568年停战协定的条款。159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进行谈判，使这项停战条约得以展延期限8年，交换条件是：他按照惯例付一笔为数3万的贡款，另外加上金、银器皿作为特殊礼品。这种明显的懦弱政策是一种继承物，是一种自卑感，不需要特别解释。

更难理解的是土耳其人的态度。人们设想土耳其人在同波斯人缔结和约之后将转而重新登上西方的舞台。吹嘘和夸口表明了这一点。土耳其的全部力量难道不会凶猛地压向例如威尼斯这样的国家吗?威尼斯市政会议让它的舰队处于戒备状态。1590年春季，它赶紧在干地亚筑垒设防，1591年一下子就把2,000名步兵派往该地。[67]法、英两国大使敦促土耳其皇帝把他的舰队调到地中

海。早在1589年，[68]以后又在1591年初，君士坦丁堡有人谈到正准备出航的300艘帆桨战船。这些舰船将开去援救被人称为叛乱分子的西班牙的摩里斯科人。[69]然而，这场暴风雨却改向北方袭击。

也许这是由于1593年波斯尼亚总督哈桑在克罗地亚的西塞克城下遭到失败的缘故。在这之前的几年内，这个哈桑已经对乌斯科克人采取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70]1591年，他在位于克罗伊茨和苏昂尼奇之间的地区进行了杀、烧、掳、掠，并在1592年春季，再度犯下同样的令人发指的罪行。[71]这可能是蓄意挑衅。然而，1593年6月，人们得知，在同样这些地区进行的惯常的春季扫荡行动已经以在库尔帕河河岸的彻底失败告终。哈桑本人和几千个土耳其人在这次扫荡中丧生。一件巨大的战利品落到胜利者手中。

这个消息使到那时为止一端为和平拥护者，另一端为好战分子，两端重量相等的天秤向一端倾斜。在好战分子中，为首的是基督教徒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坚定不移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参加过匈牙利战争的老兵、军队的人物和军队强加给这个国家的首相锡南帕夏。不能低估这个无情的阿尔巴尼亚人，这个顽固、狡诈、不倦地积聚财富的老人。也许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犯了错误，没有在1591年开始的谈判中对他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没有认真对待他。但是，锡南的东山再起和重新掌权，并没有导致关系立即断绝。同神圣罗马帝国大使冯·克雷克维茨的谈判继续进行。甚至锡南帕夏的儿子、鲁梅利的省长还在充任中间调解人。

来自西塞克的消息，除了引起一场预先长期酝酿，或许需要使之在君士坦丁堡爆发的风暴爆发之外，还产生了什么其他作用呢？波斯战争的结束，使土耳其素丹政府面临惯常的部队复员和 复员

部队的再使用等问题。它必须处理被欠发军饷的士兵的骚乱。1590年，骚乱有演变为革命之势。这个局势和阿穆拉特三世的反复无常的性格同样沉重地压在帝国的命运上，并且导致好几个首相的相继上台和下台。使首都摆脱大批闲散无事的军队的这种必要性，把土耳其推向另外一场欧洲大陆的战争。哈默的那本就近从原始资料中收集材料、充满轶事、流传已久的关于奥斯曼帝国的书，描述了首相费赫拉特(1594年曾短期任大臣)在首都大街上遭到因领不到军饷而不满的骑兵袭击的情况。他回答这些骑兵说："上前线去，那里会发军饷给你们。"[72]1598年，土耳其近卫军士兵又因发给他们的军饷是劣币而造反。4月18日的一份公文急报宣称，在这个城市，无法在这些人中间生活。[73]3年以后，轮到土耳其骑兵闹事了。3月20日到3月25日，发生了同样的事件。[74]这次骚乱爆发后1个月，一些君士坦丁堡的来信说，"军人的肆无忌惮和横蛮无礼"，迫使大多数商人关门停业。[75]

因此，1593年，匈牙利战争至少产生了这个结果：它使君士坦丁堡的闲散无事的士兵有事可干。

关于这场历时达14年(1593—1606年)之久的战争，我们只了解它的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零零星星的杂闻。[76]哈默在叙述这场战争时，只限于模仿原始资料的说法，不加分析、取舍，因而不能对这场战争进行清晰完整的叙述。津克森和伊奥尔卡后来重新叙述这段历史事实。但是，他们的叙述仍然令人失望。本书在这里不重复和改进他们的叙述，因为与本书有关的只是主要的情节。

即使找出这些主要情节，也并非易事，因为这场战争单调，它受到战场的地形的制约，它在从亚得里亚海到喀尔巴阡山这一遍

布城堡和要塞的广阔的地区内进行。作战双方每年都把一支兵员或多或少的军队投入战场。这两支军队中先出动的一支轻而易举就攻占一系列城堡和要塞。驻守这些城堡和要塞的军队忠于职守的程度各不相同。它们经常一遇敌军进逼，感到困难，就撤离阵地，或者不发一枪，不经战斗，就把一系列设防的据点拱手交给敌人。胜利者是否会坚守这些被占领的据点，这是兵力大小和军费多少的问题。但是，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在筑有堡垒的地区，打开缺口从来没有一次导致深入敌方领土。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首先是：人在这些惨遭破坏、荒无人烟的地区要冒饿死的危险。不可能运去粮秣给养。对深入敌方领土的入侵者来说，还存在这样的危险：在打开的缺口的两侧留下的一方或者另一方的堡垒仍然完好无损。驻守这些堡垒的军队能会同外面的军队使入侵者陷于孤立无援之境，切断其退路。神圣罗马帝国军队虽然在这个方面已经在匈牙利骑兵的帮助下取得巨大进展，但没有配备一支作为单独使用的武器构想和组建起来的骑兵。甚至在土耳其人方面，他们的骑兵也比人们猜测的少。他们不得不向同盟者要求增援。1601年，[77]土耳其帆桨战船出航招募鞑靼骑兵并把他们运往匈牙利。毫无疑问，土耳其人从前使用他们的骑兵进行强有力的袭击，征服了巴尔干。后来，洛林的查理和欧仁亲王也先后使用骑兵进行袭击，使基督教世界的边界向南推移。1593年的军队缺乏对进行大规模军事活动来说必不可少的手段和资财。

对从1593年到1609年这段时期的史实的叙述，陷入一些细枝末节，例如一系列包围，一些城市遭到突然袭击，它们的投降、得救、被围、解围……等之中。这些细枝末节没有产生什么重大后果。

只发生过两三起重大事件:基督教徒攻占格朗和佩斯特、土耳其人攻占埃尔劳和收复格朗。两军极少遭遇。因此,只进行过一次历时3天的重大战役。这次战役最初胜负未决,最后则以素丹获得胜利告终。这个素丹从1595年10月23日到27日,亲自在克雷斯特斯平原指挥作战。但是,这次战役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冬季迫使作战双方休战停火,素丹不得不把他的军队一直撤到布德和贝尔格莱德。

但是,在这些单调的战斗进行的过程中,一块相当清晰的战争区域显现出来。神圣罗马帝国的边界西边依托阿尔卑斯山的天然屏障,东边依托喀尔巴阡山,从一列森林密布、遍地岩石的山脉延伸到另一列林木葱郁、同样遍地岩石的山脉。战争在两列山脉之间,在匈牙利的广袤开阔的平原上进行。那里的主要通路是多瑙河和蒂萨河。小船在河里运送军队和粮秣给养。战争不时通过经常架设在河上的桥梁打到对岸。在流向北方的两条河经过的通道中,多瑙河经过的通道比较冷落、比较暴露。蒂萨河谷作为通道,情况并不稍好,但提供比较舒适的住所和比较方便的供应。它的优点是流经平定了的地区。

战争的特点大体说来,就是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不可否认的发展壮大。这支军队取得的首批胜利,在欧洲引起很多,甚至太多反响,[78]并在1595年受到普遍庆祝。不错,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没有遭到突然袭击。它眼见危险来临,及时请求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各邦援助。它及时得到意大利、罗马教廷、托斯卡纳的帮助。这些帮助是大量的,因为意大利在本世纪末富有起来,并深知自己是土耳其觊觎的对象。教皇给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财政援助,并准许他征收国王向教士征收的所得税。托斯卡纳大公提供了一支军队。[79]

对威尼斯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使它站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边。但是，这个行动徒劳无功。威尼斯市政议会拒绝放弃它的武装中立政策，继续让土耳其人就在它的大门前面寻找粮秣给养。这就大大激怒了西班牙。[80]为了使波兰和莫斯科公国援助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也进行过一些徒劳无功的尝试。必须进一步强调指出的是：德意志自从1555年以来，它内部各邦几乎和平共处；自从1568年以来，它正式同土耳其和平共处；自从1558年以来，它不再受北方可能发生的动乱的干扰，正处于一个长治久安和蓬勃发展时期。它的力量在边界上显示出来。意大利军队和法国军队也在这条边界上驻守。于是这条边界线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屏障。

但是，另外一些边界线却出现活跃的景象。在主要战场之外，还有次要战场：一方面是克罗地亚战区和斯拉沃尼亚战区；另一方面是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东部地区的战区。后两个地区对战争的命运具有重大影响，是储藏得满满当当的粮仓，是土耳其的牲畜储存区。君士坦丁堡从这里收取牲畜供自己用。还有特兰西瓦尼亚这个复杂的世界。这既是一个匈牙利世界，也是一个罗马尼亚世界，还是一个德意志世界。就它具有一系列设防强固的、有灵巧的技艺的城市这一点而言，它是一个德意志世界。这些城市是来自西方的奇妙的接芽。这些接芽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正是这些次要战区，即大致说来今天的罗马尼亚所包括的这些地区，似乎决定了匈牙利战争的命运。开始时，这些地区的突然的有利于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介入，引发了从1594年到1596年的极为严重的危机。土耳其帝国仅仅由于幸运地获得的克雷斯特斯的胜利，才从这场危机中得救。另一方面，1605年特兰西瓦尼亚单方面的介入（这次是

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使土耳其人一下就收复失地，并且轻而易举地取得锡特瓦托罗克的不利于任何人的和平(1606年11月11日)。

1594年，正当匈牙利局势仍然极不明朗之际，三个纳贡国：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造反，起来反对土耳其素丹并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罗多尔夫缔结协定。[81]勇士米歇尔在瓦拉几亚对这个国家以前的统治者进行屠杀。这次三国叛乱强有力地牵制了土耳其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战争。但是，关于这个位于波兰、俄罗斯和多瑙河地区之间的巴尔干集团的作用，传统历史再次只向我们提供对这出戏的主要演员的评论，而不是对这出戏本身的评论。这些主要演员是：特兰西瓦尼亚各个地区的严酷的统治者，得到教皇的金钱援助并且梦想领导正在多瑙河边开始筹组的十字军东征[82]的西吉斯孟德·巴索里、摩尔达维亚的督军阿隆，最后是难于捉摸的和更难于评价的大人物、瓦拉几亚及其邻近广大地区的统治者、勇士米歇尔。

这次暴动和穆罕默德三世登基等两件事的同时发生，加深了对时局的影响。因此，1595年夏季，锡南帕夏指挥军队向勇士米歇尔发起猛攻。8月，他渡过多瑙河，攻下布加勒斯特，然后占领瓦拉几亚的故都特尔戈维斯特。但是，他却成了好斗的沙俄特权贵族和他们的骑兵袭击的目标，无法在他征服的土地上坚持下去。他不得不在冬天即将来临之际焚毁匆促建成的木头堡垒。他的撤退变成了一场灾难。随同他再次渡过多瑙河的只有残余部队。这时，胜利的敌人沿着白雪覆盖的道路向南推进，攻占了布勒伊拉和伊斯马伊拉两座城市。后一座城市系土耳其人新建，是下多瑙河最强固的

要塞。[83]在特兰西瓦尼亚，土耳其人的命运也强不了多少。土耳其远征部队的兵员、给养以及包括大炮在内的物资器材[84]丧失殆尽。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歼灭了试图解格朗之围的那支小部队（8月4日）。1595年9月2日，这座城市投降。

素丹亲自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了这个败局，并且以他1596年10月23日和24日在克雷斯特斯平原上取得的胜利使颓局得以重振。因此，我们不要过分夸大这个战役开始时期的“德意志的”复兴。当然，这次复兴也不可否认。我们尤其不应该再奢谈什么奥斯曼的无法挽救的衰落，虽然这个话题已经在那个时代的西方人中间出现。一个西班牙大使指出[85]，土耳其帝国开始“一个链环一个链环地解体了”。但是，在他提供的证据中，并没有我们渴望这个证据包含的那种意义和内容。此外，土耳其人是审慎的。他们面对特兰西瓦尼亚和多瑙河各省，知道怎样等待时机和进行谈判。经验教训了他们，他们不再去捅瓦拉几亚的马蜂窝。他们把波兰人驱赶到这些暂时不受他们控制的肥沃平原[86]，以便尽量把他们中立起来。他们无法完全避免遭受勇士米歇尔[87]的军队不时对他们发起的猛烈袭击，但是能够在好得多的条件下转过身来对付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战争的最后几年，交战双方的力量更加势均力敌，都在这场单调而耗资巨大的斗争中筋疲力竭。财力和兵力都消耗殆尽。[88]在土耳其方面，士兵逃避作战任务。[89]但是，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士兵也同样行事。[90]专家认为，双方兵源都不充足。[91]此外，双方军队在战争开始时的那种昂扬斗志大大下降[92]。1593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下令每天中午敲撞土耳其人的钟，以便每天提醒人们同基督教世界的大敌的战争还在进行。1599年，素丹阿穆拉特已经教人大事

炫耀地把穆罕默德的绿旗从它的保存地点大马士革一直运到匈牙利。但是，谁也不再对诸如此类的举动感到兴趣了。首相易卜拉欣认真进行和平谈判。[93]这些谈判同单调的战争同时继续进行。双方的“后方”都把守得不如“前线”好。因此，1600年左右，一个名叫雅西季的人[94]（被西方的公文急报称为“司书”的那个人）领导的一场鲜为人知的叛乱震撼了小亚细亚，导致商业贸易的中断，引起一场对安卡拉的真正的包围。[95]这次叛乱非常成功，以致布尔萨本身受到威胁。[96]1601年，这个“司书”被哈桑帕夏挫败。君士坦丁堡举行盛大集会和庆宴欢庆这次胜利。[97]更加严重的是，在亚细亚再次爆发了对波斯的战争。这场战争耗资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使小亚细亚的地方性的叛乱压在土耳其帝国身上的威胁更加严重。

然而，就在这个普遍衰竭疲弱的时刻，土耳其人成功地在北方重振颓局。1605年，他们答应把匈牙利的王位，即除了面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威胁修建的边境要塞之外的土耳其属匈牙利的王位给它当时的统治者博克斯开。仅此一举就足以使特兰西瓦尼亚的态度发生具有决定性的彻底改变。[98]这位山区的贫穷君主受平原沃土这份礼品的诱惑过深。其实，这只不过是个骗局而已。但是，这个骗局却足以引起土耳其人所需要的对敌方的牵制。另一方面，土耳其人在他们投向西面的克罗地亚和施蒂里亚边境地区的鞑靼人的帮助下，能够胜利地在多瑙河河谷里前进。威斯格拉德攻下后不久，格朗也于1605年9月29日夺回。接着维斯普里姆和帕洛塔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以上谈到的只是首相拉拉·穆斯塔法取得的重大胜利。

由于同波斯进行的战争耗资巨大，土耳其人赶紧尽量利用他

们1605年取得的胜利进行和谈。谈判一下子就取得进展。和约终于在1606年11月签订。现状得到恢复。作战双方互相归还要塞，遣返战俘。特兰西瓦尼亚的君主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订了一项单独条约，和他亲近起来，放弃了匈牙利王位。土耳其素丹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里得到一笔20万杜卡托的赠款。但是，作为交换，这位素丹同意今后放弃贡金、贡物。1606年的和约是缔约双方平等地缔结的第一个土耳其—神圣罗马帝国条约。

2. 从法国内战到对西班牙的公开战争：1589—1598年

在西方，另外一场战争也正在地中海边缘进行，但不时影响地中海。这就是与西方世界的和与大西洋的整个总危机有关联的法国战争。对我们来说，在这里也和在本书的其他篇章一样，问题不是面面俱到，什么都谈，而是仅仅指出这些事件和当时风平浪静的地中海的历史之间有什么关联。但是，这项有限的任务同样十分繁重。在法国进行的宗教战争是欧洲的宗教和政治戏剧的一部分。至于这些战争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姑且不去谈它。怎样在这样一个问题复杂的领域内标划一个准确的和有限的调查研究的范围呢？

从1589年至1598年，法国经历了两次危机：从1589年到1595年这段时期的危机主要是法国内部的，是自从这个国家开始发生动乱以来它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危机；接着从1595年到1598年，随着对西班牙的公开战争的进行，发生了一次外部危机。这两次危机都极大地搅扰了这个国家，但是，它们都只是作为地中海边缘地区的事

件才与我们研讨的题目有关。

法国的地中海地区的宗教战争

不管怎样说，法国的地中海地区在宗教战争中归根结蒂只扮演了次要的角色。既是这场动乱的原因又是这场动乱的借口的新教异端，对把势力扩展到多菲内，并进而从那里进入意大利或者扩展到朗格多克，又进而从那里进入西班牙，比对通过普罗旺斯扩展到空空荡荡的大海更加关切。在朗格多克和多菲内这两个动乱的省份的中间，相对说来，普罗旺斯是安宁的。但这并没有使这个省份免遭一再发生的动乱的旋涡侵扰，并没有防止1562年、1568年、1579年那里多次产生严重的惊恐不安……特别在这最后一年，真正的农民起义使这个地方田园荒芜、满目凄凉。[99]在这个时期，战争变得具有地方性，屠杀和抢劫司空见惯。正如在法国的其他地区一样，一切都在普罗旺斯酝酿，解体……这还是个同法兰西王国结合得很差的地区。[100]它贫瘠、穷困、热爱自由、有当地残酷的敌对冲突、有很怕丧失自己的特权的城市和不安分守己的贵族。但是，难道有可能对这些零星细小的动乱进行分类吗?难道有可能准确地标明卡尔西分子和拉扎分子之间的以及以后神圣联盟成员和比加拉分子之间的肮脏的地方性战争的责任吗?难道有可能准确地标明这些随着亨利三世统治的最后几年的到来，然后又由于1589年8月1日他遭到暗杀而急遽发展的多次惨剧的责任吗?[101]

毫无疑问，1589年以后，至少直到1593年，法国的惨剧的主要部分始终发生在北部，发生在从荷兰到巴黎、从巴黎到诺曼底和到

布列塔尼的那片地区。但是，南方的事态正在恶化。那里和别处一样，在亨利四世的统治刚刚开始时，王国瓜剖豆分，碎裂为具有党派性的城市、领地、庄园、贵族集团和独立自主的军队集团。在这之后是发展相当迅速的重新建设时期。所有的沙粒再度粘结起来，又构成了古老大厦的坚固的石块。这段历史在节奏方面是简单的，在细节上却复杂到了荒诞不经的程度。每颗沙粒都有它的编年史作者。每个重要人物都有他的传记作者。

在广义的濒临地中海的法国南部地区，有六项或者七项冒险性的事业在交错进行：蒙莫朗西和若热斯公爵进行的相互对抗的冒险、埃佩尔农公爵在普罗旺斯的冒险、王军统帅勒斯迪吉埃尔[102]在多菲内和在多菲内周围的冒险、内穆尔公爵在里昂内[103]的冒险、萨瓦人在从普罗旺斯直到日内瓦湖周围的地区的冒险。最后，更糟的是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玩弄的复杂的花招。在这些人中，只有三个为亨利四世效劳，即蒙莫朗西、勒斯迪吉埃尔和埃佩尔农。用效劳这个词来描述这些人的活动是过于简单化了，至少在一种情况下（在埃佩尔农的那种情况下）很不确切。埃佩尔农和当时很多人一样特别为他效过劳。

1594年11月，他支持、归附外国人的事业。[104]

彻底弄清这些冒险事件中的每一起，是个困难的任务，因为它们互相冲突，互相覆盖。但是，大体说来，从地理的角度看，它们相当清楚地组成两场几乎分开的、命运不同的战争：一场是实际上从1592年末起就已经结束了的朗格多克战争；另一场是1596年才结束的普罗旺斯战争。看来，后者推翻了人们可能先验地提出的种种估计和设想。1592年后，西班牙无法在朗格多克，即在它的家门口，

维持一场战争，而后来它却在相当遥远的普罗旺斯把战争一直进行到1596年。地方的环境是产生这种明显的反常现象的原因……

在朗格多克，亨利四世的敌人处于有利的地位。西班牙这时已经在塞尔达尼和鲁西永站稳脚跟，大步前进到比利牛斯山北部，拥有被人称为地中海的海上霸权的东西。此外，亨利四世的敌人还有其他这几张王牌：西边是神圣联盟成员在那里势力强大的圭耶内；东边是整个地区上上下下形成整体反对信奉异端的国王的普罗旺斯。

然而，忠于新国王的蒙莫朗西公爵在蒙彼利埃拥有强大的力量。此外，他能够通过圣灵桥同多菲内地区的勒斯迪吉埃尔的时刻准备进行干预的力量会合。“保皇党人”控制着沿罗讷河的道路，或者至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切断这条道路，因而拥有对地中海地区的所有国家施加压力的手段。此外，朗格多克与地中海一个奇特的部分邻接。这个部分叫做利翁湾。那里波涛汹涌，帆桨战船驶行十分危险。这个海湾冬季长期遭受恶劣天气的袭扰。水手们对赋予他们困难的、[105]往往无法执行的任务的菲利普二世经常谈到上述情况。菲利普二世交给他们的这些困难任务是：运输军队和粮秣给养、追捕法国海上行劫者和摧毁布里斯贡这个堡垒。最后这项无法完成的任务经常提出。我们还要加上这一点[106]：1588年以来，蒙莫朗西拥有一支由双桅横帆船和三桅战船组成的舰队。这些轻捷快速的小船抢劫加泰罗尼亚的船只，1589年后在包围纳博讷港的战斗中得到有效的使用。西班牙笨重的帆桨战船对付这些小船并不比威尼斯的帆桨战船对付乌斯科克人的舰船更加有效。这样，并不拥有海上霸权的蒙莫朗西就能够从海上得到来自科西嘉的援军[107]

以及来自里窝那的桨手和船队。[108]

事实上，神圣联盟成员有一盘比看起来还更难的棋要下。而且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这盘棋已经交给一个不大高明的棋手去下了，即交给元帅的儿子、若热斯公爵去下了。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这个棋手立即转身朝向附近的西班牙，一开始就占领了重要驻防城市卡尔卡索内。然而，1590年5月8日的一份西班牙的公文急报[109]却说“保皇派”仍然保存着这个重要驻防城市的“要塞”。在同一时期，蒙莫朗西把部队集中在圣灵桥，以便向纳博讷发起进攻。若热斯惊恐不安，致函菲利普二世说：“朗格多克的天主教徒处于这样的状态：如果不立即（最迟在6月中旬）对这种状态加以补救，就有信仰异端的国王主宰一切之虞，因为他的首席顾问和为他在上述地区统率指挥军队的蒙莫朗西先生正在筹建一支大军……”[110]

或许若热斯把事物的图景描绘得过分阴暗，因为他的目标是取得那些总是从极其富有的西班牙迟迟到来的贷款和援助。尽管如此，局势仍然十分严重。6月12日，若热斯仍然什么也没有收到，并且一想到敌人准备“在这个收获季节袭扰他们并使他们丧失维护他们神圣的决心的手段……”[111]就惶恐不安起来。6月22日，他再次诉苦和呼吁，并派主教代理维莱马丁去西班牙国王处。[112]7月10日，他又对允诺给予他援助但援助却又迟迟不来这件事埋怨诉苦。[113]这一天，这位公爵致函菲利普二世说：“我极其谦卑地恳请陛下原谅我对陛下陈述我的需求因而经常缠扰陛下。如果我不了解陛下有维护天主教的热情，如果我没有得到陛下所作的将在这个省份支持天主教的保证并通过此举宽厚地给我的荣誉，我是不会

向陛下陈述我的需求的。”[114]菲利普二世的援助8月份到达了吗？没有到达，至少是没有全部到达。有一封信清楚地表明西班牙的帆桨战船在近期内对纳博讷[115]附近的德意志士兵提供了补给。另一封信也证明，允诺提供的武器弹药已经部分交货。[116]但是，我们知道，在同一时期内，法国雇佣的德意志士兵却因为没有领到军饷而拒绝进入“敌国领土”，换句话说，拒绝作战……[117]一场小小的赌博正继续进行：一方一再提出要求；另一方却慢慢吞吞作出答复。许下动听的诺言之后，接着就是失败。偶尔也有几次成功。

这场赌博好好歹歹继续了两年。但是，1592年，比利牛斯山以南发生了重大的阿拉贡事件。为了保卫安东尼奥·佩雷斯，这个地区的一部分起来造反。逃亡者安东尼奥·佩雷斯和他的朋友到贝亚恩避难。亨利四世的姐妹卡德琳在该地利用这个时机，从比利牛斯山她所在的一侧派出几支军队穿越阿拉贡地区[118]进行袭击。因此，菲利普二世把他的军队留在山南，并且抛弃了若热斯和朗格多克的天主教徒。这些天主教徒处于绝望境地，于是破釜沉舟，孤注一掷，9月份试图攻占塔尔纳河上的维尔米尔，希望能够随后夺取凯尔西和圭耶内，放弃重要驻防城市卡尔卡索内，[119]在别处继续斗争。这个行动以一场灾难告终。1512年11月4日的一项报告证明天主教徒丧失了他们的全部步兵和炮兵。[120]对战败者来说，现在别无他途可循，只剩下向西班牙国王陛下求援这条路了。向“这个基督教徒中最笃信基督教的人和天主教徒中最笃信天主教的人，向人们的全部希望除了应该首先建立在上帝身上之外，其次就应该建立在他身上的这个人”求援[121]。但是，援助毫无效果可言。

下一年初，缔结了一项停战协定。关于缔结这项协定的消息

1593年2月中传到巴黎。[122]沿地中海地区的内战以保皇党人从来没有指望过会有的速度和胜利告终。[123]在朗格多克的内部，在图卢兹周围，斗争后来一直延续到1596年。但是，1593年东部的胜利有它的重要意义。这次胜利把这个叛乱地区切割为二。亨利四世的统治开始时，这场叛乱从意大利附近一直蔓延扩展到大西洋。和贝亚恩的情况一样，"保皇派"就在切割处同西班牙的边界线接触。

甚至早在亨利三世去世之前就已经开始的斗争，后来在普罗旺斯比在邻近的朗格多克延续得更久。它还通过它最后引起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纠纷一直延续到1598年(驻守贝雷的小股萨瓦卫戍部队撤离贝雷的日期)西班牙—法国战争结束。

1589年4月，即在亨利三世去世之前，普罗旺斯脱离法兰西王国，说得更确切些，埃克斯的高等法院已经加入天主教联盟，承认马延内公爵为"摄政官"。[124]这个高等法院的弱小的"保皇"少数派，同年7月撤往佩尔图伊斯。[125]至于埃克斯、阿尔勒和马赛(严格说来这个城市位于普罗旺斯之外，但在普罗旺斯地区)等大城市则全部支持神圣联盟。可以说普罗旺斯地区在它的那些受到特权保护的城市的支配控制下，在法国的新国王登基之前，就已经表态。至于1587年任命的总督埃佩尔农公爵，他已经把他的职位弃让给他的兄弟贝纳尔·德·诺加雷·德·拉瓦莱特。这位新任总督刚强、活跃，面临新的危险而不气馁、不退缩。他忠于王家政府，依靠勒斯迪吉埃尔的军队和农民群众。他面对危局，挺身迎敌，屹立不动，并且成功地重新占领中普罗旺斯和南普罗旺斯。1590年的一份西班牙的公文急报指出，他在土伦设防，[126]既对抗萨瓦人也对抗所有可能在海边出现的危险。但是，拉瓦莱特在这场斗争的最后的恐怖的10年

中，和所有力图使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左右普罗旺斯的人一样，并未取得压迫之势。至少一直到1596年为止，始终存在着两个普罗旺斯：一个依附埃克斯；另一个依附国王的临时首都佩尔图伊斯。它们互相敌视，在它们之间有一些变化不定的、经常模糊不清的边界。

在这个地区扮演最重大的角色的马赛，自从第二个王家行政官朗什遇刺以来（1588年4月），[127]就已经以一种经久不衰的热情赞同、拥护同盟的事业。而表态支持同盟，同它进行合作，就意味着在将来的某一天和西班牙采取共同行动。

但是，1590年夏季，普罗旺斯只发生过一起外国阴谋事件。这一阴谋系萨瓦公爵策划。这位公爵虽然有条件采取行动干预普罗旺斯的事务，比远处的势盛力强的西班牙国王更能把普罗旺斯弄得鸡犬不宁，却只是个小小的对手。这年7月，查理·埃马纽埃尔响应神圣联盟盟员、女阴谋家索尔特伯爵夫人克里斯蒂娜·达古雷的号召，侵入普罗旺斯。1590年11月17日，他到达埃克斯。高等法院在该地接待他，并授以普罗旺斯的军事指挥权，但没有把他野心勃勃追求的目标——伯爵的冠冕——授给他。[128]

1590年冬季，构成普罗旺斯的悲剧的全部因素都出现了。事态之所以没有迅速发展，是因为西班牙没有把它的力量投入这个萨瓦公爵本身在那里也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单独强加他的意志的势力范围内，而是把力量用于朗格多克的舞台，直到1592年发生阿拉贡危机和同年9月发生维尔米尔的崩溃为止。但是，1592年，由于普罗旺斯的次要舞台仍然是法国沿地中海的地区唯一的人们有可能对之采取行动、进行干预的区域，西班牙人便去那里插手干预。到那

时为止，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们采取这一行动时，并不十分迅速、急迫，并没有把当地的演员萨瓦公爵、勒斯迪吉埃尔、拉瓦莱特……等排挤出舞台。

证明萨瓦公爵力量弱小的是：1592年冬季，勒斯迪吉埃尔能够先在拉瓦莱特的帮助下，然后又能够单独（拉瓦莱特在包围罗克布吕纳期间，于1592年1月11日受伤身亡[129]）把萨瓦人的军队驱赶回瓦尔河的彼岸；他还能够在春季在尼斯公爵自己的领地上对这位公爵进行突然袭击。萨瓦人的卫戍部队分散在普罗旺斯各地，虽然受到堵截，却未被包围，但也并非高枕无忧。[130]然而，夏季来临，勒斯迪吉埃尔返回阿尔卑斯山。这使萨瓦人得以再发动一次进攻普罗旺斯全境的战役，并且在穿越普罗旺斯过程中，于1592年8月攻占戛纳和昂蒂布。[131]可是，这些胜利并不比以前的几次更具有决定性意义。战争在一个贫穷的国家化为一系列突然袭击。胜利者取得了胜利，但没有取得战果。埃佩尔农公爵在他兄弟死后立即上台执政。他率领他那批加斯科涅冒险家像在被占领的领土上定居那样，在那里安定下来。秋季来临，一系列以残酷著称的直接进攻和激烈战斗，使他得以从萨瓦人手中收复戛纳和昂蒂布。局势又颠倒过来了吗？一切又都成了问题吗？“反皇党的”普罗旺斯的代表9月转向西班牙国王，向他求援。[132]自从1592年被他的岳父马延任命为总督以来就以神圣联盟成员的名义担任普罗旺斯总督的卡尔塞斯伯爵在1593年开始时再次提出这个要求。这是他受到的一场虚惊，因为萨瓦公爵两次都没有取得的全面胜利，现在埃佩尔农公爵也没有取得。1593年6月、7月间，埃佩尔农试图攻占埃克斯城，但未成功。[133]

那时，正好1593年7月，法国发生了使一切又都成了问题、使局势顿时改观的事件，国王亨利四世发誓弃绝新教。一个广泛的衷心归顺国王、拥护国内和平的运动随之而起。1594年1月5日，埃克斯的高等法院向国王宣誓。在所有由神圣联盟成员组成的高等法院中，这个高等法院率先承认亨利四世。[134]它采取一个似乎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的行动。在普罗旺斯，这一年毫无疑问是归顺和背弃两种行动兼而有之的一年，出现了最后的阴谋、叛乱、错误的算计、激烈的行动和成千上万宗交易的一年……

一起事件、一起几乎可以说是这个季节的重大政治事件，突出了出来：组成过去的神圣联盟的各个党派转而归附亨利四世，彼此变得亲密起来，让它们的恼怒转向埃佩尔农发泄。埃佩尔农的活动已经昭然若揭。他自知不为亨利四世喜爱（这位公爵是采取强迫亨利四世的办法于1592年接管了普罗旺斯的），而且当地贵族对他恨之入骨。他事先很早就知道，地平线上显露出和平之日，就将是他的权力和他无疑梦寐以求的大公国的末日到来之时。因此，这位公爵不愿同埃克斯人和同普罗旺斯的贵族和解妥协，或者对这个当阴谋活动在普罗旺斯处于高潮时亨利四世派来的奇怪的代理人雅克·德·博韦·拉·凡进行的交易感到不安并非毫无道理。但是，面临勒斯吉迪埃尔和蒙莫朗西的双重干预和压力，他不得不奉国王之命同埃克斯人和解。然而，勒斯迪吉埃尔的背信弃义和巴拉弗雷的儿子、吉斯公爵被任命为普罗旺斯政府首脑的消息，却使埃佩尔农下定决心叛变。正如他后来所说，这是为了挽救他的荣誉和生命。[135]叛变这就意味着同萨瓦人和同西班牙人和解妥协。根据他自己的信件和西班牙的档案资料，[136]他早在1594年11月[137]就已经下

定最大的决心。但是，1595年，即一年以后，叛变才白纸黑字写在一项协定里。公爵带领他的加斯科涅人和他在普罗旺斯，甚至在普罗旺斯之外仍然掌握的几座城市叛变投敌。不管怎样，在西班牙的关于这一事件的文献资料中，有一张奇怪的列有埃佩尔农公爵在整个法国拥有的财富和城市（至少他声称这些城市属于他所有）的表。[138]

但是，公爵这次叛变得太迟了。当他同西班牙之间的协定于1595年11月正式缔结时，法国南方的命运已经决定。然而，1594年，西班牙决定作一次巨大努力。卡斯蒂利亚的王军统领、米兰总督贝拉斯科已经调集一支大军并且准备超越萨瓦，翻越汝拉山，进行一次征伐，一直向第戎挺进。罗斯内元帅[139]甚至建议他在“埃利”[140]河岸的波旁内的穆兰建立营地以便养护他的骑兵。1595年夏季，进攻的目标是法国的心脏。6月5日，在法兰西山泉获得的胜利促使入侵者决定后撤。这次胜利从军事角度看尽管意义不大，但产生了重大后果。虽然亨利四世过去南迁时拆除了南方的军事设施，[141]但加固了一直延伸到海上的可能被敌人从侧翼包抄的阵地。

1596年，埃佩尔农公爵和马赛城都已经就范。一切恢复正常。吉斯公爵没有花太多力气就清除了这两个障碍。2月，“保皇党人”在维多班[142]打垮了埃佩尔农的那支小军队。战斗甚至还在阿尔让斯的河面上进行，多人溺毙。下个月（3月26日），公爵和国王签订和约。[143]两个月后，他离开普罗旺斯。[144]至于马赛，2月16日和17日之间的那个夜晚，该城发生一次叛乱。叛乱分子向吉斯公爵打开城门。[145]

这个大城市的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就这样结束。该城的情况这

里必须稍微谈谈。正如法国的其他城市一样，在这些兵荒马乱的年代，马赛已经重新获得事实上的自治。它独立自主，信仰天主教，加入了神圣联盟，自1588年4月起就陷于狂热偏见之中。但是，怎样在王国的狭窄的边缘继续生存下去呢？怎样在事实上在王国之外继续生存下去呢？因为动乱已经使王国分崩离析、四分五裂。向西班牙提出的供给要求揭示出部分问题。[146]另一方面，从近处和远处，从四面八方包围这个城市的战争，并不是很现代的战争。这主要是一次耗费人力的战役而不是耗费物力的战役，但它的代价仍然十分昂贵。对马赛来说，警卫部队和军事开支都必不可少。为了承受这些牺牲，必需有一项狂热的带偏见的政策。查理·德·卡佐尔克斯在五年中是这项政策的代表者。最近为他撰写传记的的拉乌尔·比斯凯，一方面固然并没有不惜一切代价为他恢复名誉，但另一方面对这个人物进行了新的评述。[147]这个刚强的领导者1591年2月用革命手段攻占了市政厅。事实上，他居于这个城市之首，是个专心致志、认真负责、精明能干、办事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人。他的政策和活动只致力于为他的城市谋求利益，丝毫不受萨瓦公爵的具有威胁性的阴谋的束缚。萨瓦公爵亟欲通过马赛与西班牙直接联系。1591年，这位公爵在这个城市停留以便进行活动，但白费气力。他试图用背信弃义的手段夺取圣维克多（1591年11月16日—17日），但也同样白费气力[148]……卡佐尔克斯坚持置身于普罗旺斯的贵族的争吵和阴谋活动之外，虽然马赛曾经让索尔特伯爵夫人在该地短期避难，这个独裁者后来仍然巧妙地摆脱了她。

如果人们想到卡佐尔克斯就在马赛本地执行的各项政策，想到可以称为他兴办的公共救济事业的事物，想到他努力引进的印

刷技术，想到他修建的公共建筑物，特别是如果想到他的人望，那么他的"暴政"就会具有一种新的面貌。毫无疑问，这种暴政同所有的暴政一样，对人猜忌多疑、严密监视、报复心强，至少对比加拉派是这样。他们被肆无忌惮地投入监狱、充军流放、剥夺财富。但是，说来奇怪，这是一种深得民心的，有利于城市民众——穷人——的独裁。1594年，一份西班牙的公文急报报导了正在马赛进行的一场对富商和贵族的战争。这份公文急报说："为什么进行这场战争，原因还不清楚。可能是为了从这些人那里弄些钱财。"[149]这个城市虽然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但它难道不是在这个沉重的财政负担之下不堪重压吗?1594年，教皇和托斯卡纳大公虽然被恳求援助这个城市，但却不愿给它一个布朗卡。[150]卡佐尔克斯的思想意识和需要同样迫使他转向强大的西班牙，以便得到恩惠、优待和继续生存的手段。[151]

在时局环境的帮助下，马赛这座城市投入了西班牙的赌博，接着又整个牵连进去。1595年11月16日，马赛的法官和行政官写了一封特别的、仍然审慎但口气十分坚定明确的信给菲利普二世。这封信颇值得一谈。[152]他们在信中写道："上帝在我们的灵魂中点燃了支持他的事业的热诚的圣火。他看见天主教信仰在法国严重地、危险地遭难遇险。他岿然屹立，顶住我们所遭受的来自这种信仰的和这个城市的敌人的攻击。这种宗教和这个城邦的领土，由于上天特别的庇佑，没有蒙受损失并且一直保存到今天。我们毫不动摇地希望以我们的生命作为代价，以我们所有的在这个神圣的决心之下永远团结一致的公民的生命作为代价，继续坚持下去。但是，我们预见到由于波旁家族的亨利的事业的兴旺发达，暴风雨正日趋猛

烈。我们眼见国家资财已经耗尽枯竭，而私有资财用于执行这项伟大而有利的事业也不再足够，因此，才敢抬眼仰望陛下，并求助于陛下……正如求助于全体天主教徒的庇护者一样，最谦卑地吁请陛下为了这个城市过去的信仰和忠诚，把他的天生的仁慈善良的光辉投射到这个充满功德的城市……”

至少根据这个文献，马赛并没有投靠西班牙国王。“叛变”有不同的等级。这个城市（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卡佐尔克斯）只宣称它不愿停止有益的战斗。一本于1595年和1596年之间出版的相当长的未署名的回忆录也有这种说法。这本《马赛城的法国天主教徒对某些信奉异端的邻居、反基督教的和信奉无神论的政界人物的劝告的答复》[153]是一本文字冗长、杂乱无章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没有为宗教战争时期的报纸发表过的、已经为人所知的争论增添什么新的内容。它对事物的客观性极不关注，把保皇党人和无神论者，把胡格诺和酒色之徒相提并论、混为一谈。这本小册子是在进行一场浅薄的论战。隔一段时间再听听，所有那些使这场论战变得激烈、恶毒的成分，都显得枯燥无味，虚假空洞、言之无物。唯一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这个城市和西班牙之间的关系，这本小册子只字未提。

然而，和解却势在必行、不可避免。这个城市或者必须躲在强大的西班牙的背后，或者必须同已经达到马赛并对卡佐尔克斯和他的战友路易·德·埃克斯作出种种美妙动听的许诺[154]的王家代理人艾蒂安·贝纳尔主席达成协议。但是，这些过分美妙动听的许诺难道没有布设什么陷阱吗？马赛的主人们宁愿同菲利普二世达成协议。城市的三名“代表”，其中包括卡佐尔克斯的儿子，出发前往

西班牙。他们在那里详细列举在1591年和1595年之间马赛发生的事件[155]，着重指出卡佐尔克斯和路易·德·埃克斯这两个“独裁者”所扮演的角色。卡佐尔克斯和路易·德·埃克斯都是这个城市的古老的名门望族子弟。他们在亲友和马赛民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在马赛这个城市建立了天主教的秩序与和平。但是，这些成果并非不劳而获：他们必须进行武装，征募雇佣军，攻占圣母院和圣维克多等两个要塞和圣让楼塔，守卫“里亚尔门”大站台和埃克斯门（这些地方是最能够防守的），在港口的出口修建克雷斯蒂安堡垒（尚未竣工），饲养马匹以保障这个地区安全并且使马赛人能够“采摘他们的果实而不受敌人骚扰”。[156]既然波旁的亨利已经得到教皇宽恕，既然他已经取得胜利，既然他是阿尔勒的主人（因而是马赛的谷物供应的主人），既然马赛难民充斥，难民中间有“埃克斯的主教、被波旁的亨利剥夺了财产的让布拉尔大人这个大人物”，既然这个城市不顾贝亚恩人亨利四世的建议处于这种绝境，因此，只能在西班牙国王的“卵翼”下坚持。后者被恳求帮助这个城市，而且迅速用金钱、军火、人员和帆桨战船帮助这个城市。由于王家军队推进到马赛城门，由于有人在城内策划阴谋，局势更加紧张。

援助于1595年12月到来。[157]这些援助包括多里亚亲王的儿子的帆桨战船和两个西班牙连队。它们及时阻止了王家军队进入马赛。但是，这个城市的局势混乱起来。城内的居民甚至对朋友也产生怀疑。1596年1月21日，[158]马赛的代表心满意足地离开西班牙宫廷。这个城市投靠了西班牙国王但又不是完全投靠，它允许西班牙国王的帆桨战船自由进入马赛港，允许西班牙国王在马赛驻军。马赛公民向西班牙国王作出他们不同亨利四世谈判并且只承认同西

班牙友好的人为法国国王的承诺。马赛人的声明宣称他们“不承认波旁的亨利，不向他效忠，也不向西班牙国王陛下的敌人效忠，将保持他们对天主教的信仰和他们的现状，直到上帝乐于把一个虔信基督教的、真正是天主教徒的、同陛下团结友爱、亲如手足、融洽相处的国王给予法国时为止。”1596年2月12日，马赛的代表还在巴塞罗那，他们从该地写信给东·胡安·德·伊迪亚克斯，请求他运来加泰罗尼亚的谷物。[159]但是，5天以前，即7日，一起阴谋在这个城市得逞。卡佐尔克斯遭到暗杀，这个城市交给亨利四世。[160]据说，后者听到这个好消息时说：“现在我就是法国国王了。”[161]

当然，人们可以对法国历史的这个片断进行详尽的论述，并且继一些优秀的历史学家之后在普罗旺斯这个省份找出法国的宗教战争的最后几年的全部特征：物价飞涨，城乡异常贫困，盗匪猖獗，匪患蔓延，贵族残忍凶狠。在埃佩尔农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各省的“国王”的范例。这些“国王”中有：多菲内的勒斯迪吉埃尔（尽管人的性格迥然不同）、布列塔尼的梅克尔、勃艮第的马延……等人。通过马赛的例子了解城市在这个解体的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然后了解法国的这次重建，这样做会更加吸引人。

神圣联盟不仅仅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的同盟，不仅仅是为吉斯家族效劳的工具……它也标志着一种大规模的向过去的回归。君主政体曾经同这个过去进行斗争，并且部分地加以消灭。它特别是一种向独立的城市生活，向城邦的回归。勒·布雷东律师1586年11月被判处绞刑并被悬尸示众。[162]他无疑是个有些癫狂古怪的人物。他的计划包括恢复城市享有的豁免权。他的梦想是把国家分为若干主宰自己命运的小天主教共和国。这是意味深长的。城市的叛

变，这些其居民从有产阶级领袖人物到最低下的手工业者都十分狂热的城市的叛变，和吉斯家族的叛变同样严重。巴黎是这些城市的扩大了的形象。1595年，费理亚公爵建议阿尔贝特大公尽量根据与亨利三世在位时期存在的同盟的原则相同的原则在法国重建一个同盟。“这个同盟不是洛林家族的王侯们创建的，而是巴黎的几个有产者和其他一些城市创建的。这些城市开始时只有三四个……但是，创建这个同盟的条件环境十分合乎基督教教义、十分高尚体面，以致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和法国的精英都加入了。”[163]这些人物中的某一些还在布鲁塞尔。同盟的首领的错误和叛变当然并没有断送全部事业……

这是对城市的作用有说服力的、甚至达到了夸大程度的证明。但是，这些城市叛变后能够长期生存下去吗？道路被切断就意味着贸易中断，因此也意味着自杀。这些城市之所以在1593年以后由反对亨利四世转而归顺亨利四世，除了人们惯常提出的正确的理由之外，难道不是因为它们需要法国的空间来生存吗？如果需要的话，马赛这个假使没有大陆的援助就不能只靠海洋生存的城市，会再度提醒我们注意，在地中海的范围内，陆路和海路必然相依为命。

不管怎样，如果不把卡佐尔克斯事件放在市镇生活的狭窄的范围和背景中去观察，就永远无法理解这起事件。对卡佐尔克斯来说，全部问题就在于不背叛他的城市。如果要评论他的态度的话，那就只能根据这种观点来进行。要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就再读读西班牙的代理人的陈情表吧！这份陈情表写道：“马赛的先生们牢记他们的城市从建立之日起到1257年该城同普罗旺斯的查理·德·茹

伯爵达成协议并承认伯爵为它的君主止，差不多一直由它自己的法律治理，并且以共和国的形式治理。它承认伯爵为它的君主是以大量保留、条约和协定为条件的。这些条约之中最主要的就是任何沃多瓦派异教徒（当时十分流行的一个教派）或者任何宗教信仰可疑分子不得避居马赛……"[164]

西班牙—法国战争：1595—1598年

几句话就足以勾勒出1595—1598年西法战争的大概轮廓：这是一场公开的战争；事实上它始于1589年，甚至更早，因为在我们刚刚逐年浏览了其历史事件的半个世纪内，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经常的斗争中，难道有过很多暂时的休止吗？

不管怎样，这次战争于1595年1月17日由亨利四世正式宣布。声明的文本在巴黎由弗雷德里克·摩勒尔印制，甚至还传到西班牙政府当局那里。法国国王在声明中扼要地叙述了他对菲利普二世的不满，他谈到"菲利普二世竟敢在对人怜恤的借口下，公开破坏法国人对他们的天然君主和最高君主的忠诚。这种忠诚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钦佩。菲利普二世公开地、不正当地为他自己或者为他的亲属追求这顶高贵的王冠"。[165]把这场冲突置于君主权利的这个高度，这样做并非毫无价值，并非不精明灵巧，并非毫无道理。但是，这种做法与事情发展的真实情况却几乎毫无关联。费理亚公爵很久以前就已经预见到西法战争这一次还会像在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二世时期的情况一样，是"外围的"并将在交战双方都打得筋疲力竭感到厌倦时以签订和约告终。[166]

这场战争的确只波及王国的边缘，在索姆河防线、勃艮第、普罗旺斯、土伦和波尔多等地区进行，最后又在布列塔尼进行。人们谈到法国被西班牙包围这个问题。而事实上，这既是包围，也不是包围，因为西班牙尽管邻接法国，拥有舰队，但未能成功地据守住它在法国周围的要塞和堡垒。1596年土伦陷落。同年马赛失守。抵抗到最后时刻的梅克尔公爵于1598年投降。[167]实际上，两年以来，他已经不大能够战斗了。不管怎样，重要的是，战争没有伤害王国的心脏。法国受到自己庞大身躯的保护。西班牙国王虽然找到一些他能够撬开其城门的城市，找到一些他能够收买其良心的人，甚至找到一些愿意向他卖身投靠的新教徒（例如弗瓦地区一个名叫蒙韦朗的人[168]），但这还是，并且始终是在敌对的王国的边缘地区发生的事。

不错，驻阿尔卑斯山另侧的意大利的西班牙军队进行过征伐。但这也只不过是一次往返于意大利和弗朗什—孔泰之间的旅行而已。正如我们已经指出，法兰西山泉战役导致西班牙的撤退和马延最终的屈服归顺。只有瑞士各州的坚决的抵抗当时防止了弗朗什—孔泰被占领。

比较重大的战争再次在北方荷兰边界地区展开。西班牙人在荷兰取得重大胜利，攻下康布雷、杜朗、加来等几个设防城市。随后，亚眠被突然占领（1597年3月11日）。正如一份致弗恩特斯伯爵的公文急报所解释的那样[169]，对西班牙人来说，问题在于要在他们已经攻占的城市中坚持下去，在于警备部队和城内的居民在那里共同生活，和睦相处，不发生纠纷和骚乱。

不管怎样，亚眠的攻占在法国引起巨大反响。位于索姆河的宽

阔的河谷的另一侧的通往巴黎的道路打开了。必须进行反击。亨利四世决心收复这座城市。于是法国狂热地寻求钱款资财，向盟国——英国和荷兰联合省——发出呼吁。英国已于1596年向西班牙正式宣战。[170]因此，根据西班牙的情报，[171]在即将出发收复亚眠的法国军队中有英国兵2,000名和荷兰兵2,000名。这个城市在已被围困半年、西班牙于该城投降前9天试图解围失败后，才于1597年9月25日被攻下。[172]这是一次巨大的、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引起轰动的胜利。但是，胜利者刚刚入城，就不再剩一兵一卒了。他的整个军队已经溃散。幸好和法国的贫困和衰竭相对抗的，只有西班牙帝国在1596年的破产发生后不久所经历的无法补救的疲惫和财政的困境。

破产使西班牙陷于瘫痪，无法活动。在西班牙的军事行动中心——主要驿站米兰，从1597年春季起，[173]部队的运输工作完成得很差。要在那不勒斯抽调意大利兵员把他们一直运到热那亚，然后又运往佛兰德。驻米兰内的部队也同样规定北运。但是有足够的钱款吗?另外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是：怎样援救萨瓦公爵查理一埃马纽埃尔这个冒失鬼?为了这个目的能够使用搭乘帆桨战船离开西班牙前往热那亚的西班牙军队吗?把法国军队牵制固定在这个地区以便阿尔贝特大公在荷兰前线所受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减轻，这显然是有好处的。[174]最后，当一切都已准备就绪，部分军队正准备开赴佛兰德时，又出现了新的困难：通过萨瓦的道路安全吗?由于勒斯迪吉埃尔参战，尚贝里和蒙梅利昂有丢失之虞。更糟的是，如果钱款不及时来到，整个萨瓦、皮埃蒙特和米兰都有同样的危险。卡斯蒂利亚的王军统领亲自写下这个情况并且让人向国王作

书面报告。

因此，在北方，在瑞士各个邦州(在这些邦州和阿彭策尔之间的交易代价十分昂贵)，同时有成千上万个问题向西班牙军事当局提出。此外，紧接着收复亚眠之后，意大利的亲法党不甘屈服，重新抬头。萨瓦面临的危险逐渐明显起来。正好这时弗拉拉公爵突然死去。教皇克莱门特八世立刻为教廷要求继承公爵的权位。1597年11月16日，卡斯蒂利亚王军统领致函菲利普二世说："我看见军队在意大利调动如此频繁，从内心深处感到难过。我除了派兵驻守我们的边境外，将留守这里，不采取任何行动，直到接到陛下的命令为止。的确，我即使接到相反的命令，也将因事出必要而被迫采取同样的方针。因此，当教皇正在调集一支强大的军队时，我恳请陛下考虑这个邦国的贫困和苦难。教皇自然会被引向法国，因为他像爱他的儿子和受他保护的人一样，爱贝亚恩这个人。他在多次谈话和许多场合表明他对陛下的事缺乏善意，他对陛下的各个邦国的威势表示不满。他是佛罗伦萨人……由于威尼斯人和其他不爱我们的诸侯正在进行武装，所有这些人都可能转而进攻米兰……，因此，在意大利，人们普遍想赶走西班牙人。对于这一切，除了派来大批军队，提供大量金钱和极其迅速地采取行动之外，别无其他补救办法。关于这件事，我相信陛下的明智审慎。"[175]

韦尔万和约

这场持续不断的战争到底对谁有利呢?毫无疑问只对新教强国有利，对它们在海洋上为所欲为、肆意行动的海军有利……甚至正是由于仍然信仰天主教的南方各省的贫

困，荷兰联合省壮大起来。它们因为安特卫普的衰落而受到养育，变得富裕起来。尽管亚历山大·法尔内兹收复了安特卫普，这个城市还是由于三级会议攻占了埃斯科河河口而完全衰落了。对阿姆斯特丹的成长壮大来说，这一切灾难都是不可或缺的。与此同时，伦敦和布里斯托尔也在突飞猛进，因为环境和形势全都对各个年轻的北方强国有利。西班牙尽管企图封锁大陆，但对这些国家仍然开放。地中海的大门被它们冲开；大西洋被它们攻占、征服。在这个世纪终结之前，它们于1595年抵达印度洋。这些就是本世纪末的真正重大事件。和这些重大事件相比，在西法战争中发生的层出不穷的事件，只不过是细枝末节而已。正当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争夺城市、要塞、山丘之际，荷兰人和英国人却在占领世界……

这是教廷1595年制订的政策似乎已经考虑进去的情况。教皇克莱门特八世向菲利普二世表示愿意进行调解并竭力促成法西和约的缔结。特别由于罗马、教会和天主教世界对忠于罗马的基督教徒之间的这场战争感到忧虑不安，克莱门特八世更积极推动这件事。自从西克斯特·坎特登基以来，教廷就已经致力于拯救天主教法国。教廷最后玩了法国独立这张牌，并且在玩这张牌的同时，由反对转而赞成于1593年宣布弃绝新教两年后受到罗马宽免的贝亚恩的事业。

除了因狂热、偏见和对法国领土的贪欲而失去理智、陷入迷误的萨瓦公爵之外，自由（或者半自由[176]）的意大利都支持罗马的行动，朝着同一个方向施加压力。这个意大利对松开西班牙的束缚感到非常高兴，它既富有又活跃。早在1590年，威尼斯就第一个接待那个贝亚恩派来的大使，以此来非难西班牙的政策。托斯卡纳大公

资助亨利四世的政策。亨利四世的债务很快就达到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177]精明的债权人取得抵押品，占领马赛附近的岛屿和波梅格群岛。几年以后，缔结了玛丽·德·梅迪奇的婚姻。缔结这门婚事固然有其他一些原因，但也部分是由于支付过期未付的欠款。

不管怎样，在1597年9月亨利四世夺回亚眠之后，开始显得是个胜利者。他严重地威胁着荷兰吗？他甚至梦想深入荷兰境内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他如果想推行这项大胆的政策，或者对布雷斯，或者对萨瓦公爵进行另外一次远征，要圆满完成这些计划，他的同盟者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然而，他的同盟者却不愿意他在荷兰和通往意大利的路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们希望的是：继续进行一场把西班牙牵制在大陆上的大规模的战斗中，从而使他们得到远征遥远的海洋的好处的战争。很可能正如埃米尔·布尔热瓦所设想的那样，[178]亨利四世感到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被他的同盟者抛弃或者至少没有得到它们充分支持，因此他更加倾向于寻求和平。鉴于他的王国当时的状况，这种和平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难道和平对西班牙说来不同样必不可少吗？1596年西班牙的进一步破产刚刚使这个国家的庞大的战争机器停止了转动。菲利普二世感到他的末日来临，更加想让他最喜爱的女儿克莱尔·伊莎贝尔·欧仁在荷兰安家立业。在他的生命的极其悲惨的最后几年里，克莱尔·伊莎贝尔·欧仁是他最喜爱的伴侣，是朗读作品给他听的人和秘书，是他的心腹，是他秘密的慰藉……他打算把她许配给新近（1595年）被任命为荷兰的岌岌可危的政府的首脑的阿尔贝特大公。关于让他女儿在荷兰安家立业这件事，由于在他的儿子、未来的菲利普三世的周围开始出现了一股新的势力，出现了一股

敌视他牢记在心的解决办法的势力，因此他感到作出决定的紧迫性。历史学家马蒂厄·帕里斯写道，大公“心急如焚，亟欲结婚”。这件事难道算得上是大大小小的导致缔结韦尔万和约的原因之一吗？疲乏和需要暂时歇息等都是原因。也许西班牙的算计，西班牙的那种经常既出于需要也出于好玩而去迎合迁就的算计，也是原因。菲利普二世的外交难道没有甚至以昂贵的代价来寻求很快从法国方面获得和平以便腾出手更加迅速地对付其他两个敌手——英国和荷兰联合省——吗？我们知道，塞西尔爵士曾经去过亨利四世那里，试图在最后的时刻阻止他和西班牙缔结和约。我们不要忘记，当时一支西班牙舰队正驶向英伦三岛。我们也不要忘记，阿尔贝特大公首先关切的是在取得同法国的和平后立即挥师北向。不能排除这类算计在西班牙作出决定时起了作用。

但是，为了充分了解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更应该把目光转向罗马，转向这个反宗教改革运动的蓬勃发展、意大利的金融繁荣和其西方敌人的衰落在这个世纪末使其威势大大增长的罗马。当时克莱门特八世使用的有利于己的解决小而棘手的弗拉拉问题的方式就是这种威势的突然增长的明证。弗拉拉这个城市是意大利最大的港口之一，是个热闹的城市，在意大利棋盘上占有关键位置，位于一个大国的内部。当法国或者西班牙甚至威尼斯还来不及进行干预或者没有胆量进行干预时，教皇就已经把它据为己有了。[179]

罗马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也源出于它有自己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政策。这些办法和政策主要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天主教会的一致的愿望制订的，而不是根据少数几个精明的策略家的谋略算计制订的。使自己通过罗马被人接受，被人敬服，是天主教世界的

一种意志，一种意义深远的运动。这个天主教世界时而受到北方的新教的阻碍，时而转过身去又受到东方的土耳其的阻碍。1580年，罗马紧紧跟上普遍的运动的发展，积极热心，用反对新教异端的战争来代替反穆斯林的战争。随着世纪末的到来，反对新教的运动结束。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就是罗马当时试图重新组织朝向东方的反对土耳其人的圣战。

因此，对天主教徒来说，16世纪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氛围中结束的；17世纪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的。自1593年起，反土耳其人的战争在欧洲东部，在匈牙利，在地中海等地又成为现实。这场战争虽然从来没有发展演变为普遍的冲突，但在13年内，直到1606年缔结和约以前，它却使一种长期的威胁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头上。1598年，梅克尔公爵离开位于法国西部尖端的布列塔尼，前往参加匈牙利战争。他的这次冒险具有象征的价值。成千上万个信徒当时正梦想粉碎被很多人认为濒临崩溃解体的土耳其帝国。荷兰驻教廷大使弗兰吉帕尼1597年9月致函阿尔多布朗迪诺说[180]："如果驻佛兰德的兵员的四分之一前去同土耳其人作战的话，那就好了……"这是不止一个天主教徒的愿望，也是不止一个非天主教徒当时开始怀有的愿望。可以回溯到1587年的拉·努的反土耳其的计划，就是这一点的明证。

韦尔万和约于5月2日签订，并于1598年6月5日经法国国王批准[181]。这项和约把像1559年签订的卡托—康布雷锡和约那样划定的法兰西王国归还亨利四世。因此，它使西班牙人立即放弃一系列他们占领的地区。西班牙人必须撤离他们在布列塔尼攻占的阵地，放弃他们在北方边境地区获得的胜利果实，其中包括加来。加来的

归还具有重要意义。总的看来，和约的条款似乎对法国有利。亨利四世的未来的掌玺大臣贝利耶弗尔夸张地说："这项和约是500年来法国所缔结的最有利于它的和约。"这固然是官方的谈话，但也并非毫不正确。尽管韦尔万和约并不意味着任何对国外的领土的征服，但它决定性地挽救了王国的完整性。它的好处在于为法国带来了这个国家所绝对需要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医治一个几年来被出卖给外国，过分狂热地、过分盲目愚昧地自我毁损的国家所受的创伤的手段。毫无疑问，1595年以后全面的经济形势的下滑趋势，促成了这个突然的形势大转变，[182]促成了战争的终止。

3．战争将不会在海上发生

在本章刚列举的各次地方性战争中，一些发生于地中海西部，其他的则在地中海东部进行。它们彼此之间并无联系。它们可能远远地互相影响，但并不互相连接。原因在哪里？因为把它们隔开的海洋严守中立，拒绝帮助只有它才能组织和传送的全面战争。

从1589年到这个世纪末，甚至到这个世纪结束以后，人们在海上作战。但是，这些只不过是"和平"时期地中海的惯常的战争，即海上行劫这种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的、小规模的、活动范围往往很狭窄的、只牵连少量武装力量、只牵连几艘舰船的战争。上述情况之所以需要指出，是因为从1591年起，特别在1593年、1595年和1601年，曾经有人几次试图发动大规模的海战。弄清楚这几次尝试的情况是重要的。指明这些尝试的微不足道的意义、影响和它们的失败，归根结蒂就是量度一个新的时代。它们的微不足道和失败表

示时代已经变了。

1591年的虚惊

早在1589年，正当土耳其和波斯之间的谈判进行之际，特别在1590年当土耳其—波斯和约已经签订后，土耳其的注意力再次大大转向西方。我们已经谈到哈桑·韦内齐亚诺在1590年夏季和秋季对的黎波里进行的规模不大的海上远征。这次目标有限的远征标志着土耳其人在地中海地区的一项新的海上活动的开始。

但是，长期的歇息和持久的闲散已经使土耳其海军的基层组织结构解体。这些组织和基础只能缓慢地、不完全地重建。舰船缺乏合格水平。海军造船厂缺乏熟练工人。甚至连必需的海军步兵队也不再足够。[183]自从厄尔杰·阿里对阿尔及尔进行第一次远征以来，即自从1581年以来，10年的时间足够使整整一部战争机器锈坏。重建海军的努力因经费缺乏，因长期以来向土耳其海军提供粮食给养的爱琴海沿岸地区惨遭基督教海上行劫者的劫掠和蹂躏而更加困难。

1590年对的黎波里的征伐严格地局限于它的惩罚性目的，没有使西班牙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死灰复燃。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奇。西班牙人和土耳其人都不愿意寻求断绝关系的借口。当哈桑的帆桨战船离开莫东后驶向非洲时，这些舰船一反过去的传统，途中既没有碰触那不勒斯的海岸，也没有碰触西西里的海岸。此外，这几年有一个名叫胡安·德·塞格尼的西班牙代理人常驻君士坦丁堡。这件事使人认为停战能够在不同的程度上正式维持到1593年。

档案里保存着大量胡安·德·塞格尼的信件。可惜充满这些信件的，更多是他个人的牢骚怨言，而不是他对他的使命的对象所作的叙述和解释。不管英国代理人和法国代理人作过什么努力，不管他们多次进行过什么呼吁和请求，[184]反对西班牙的欧洲各国试图在海上复活穆斯林反对强大的西班牙的战争仍然是枉费心机。1591年英国代理人在“海上将军”哈桑帕夏的支持下，对土耳其皇帝陈述说，菲利普二世已经从意大利的海岸阵地撤出他平时的卫戍部队的大部分以便扩大他投入法国的部队。他向土耳其皇帝肯定，在这样的形势下，对土耳其来说，占领广大的领土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是毫无用处的尝试，但引起反响。之所以引起反响，主要是因为那整整一系列大事张扬地公布的土耳其计划和那整整一系列显然针对外国的演说，似乎使英国的或者法国的代理人能够指望取得胜利而不会遭到失败。大量传闻又开始在地中海地区流传。这些传闻矛盾百出。其中一部分是过去的威风凛凛、令人胆寒的土耳其舰队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可怕的记忆培育起来的。有人私下传说300艘土耳其帆桨战船将在春季进攻阿普利亚和罗马海岸，然后将在土伦过冬并一直推进到格拉纳达。这个岛上的摩里斯科人在这些帆桨战船到达之前已经起来造反（这同样是谣言）。如果这些帆桨战船小些，也许会满足于只进攻威尼斯或者马耳他。马耳他骑士团刚刚捕获一艘运载前往麦加的朝圣者的大帆船。[185]一些威尼斯人为干地亚担忧。他们说，前往黎凡特的基督教徒海上行劫者在那里得到大量援助并且找到人同他们合谋行动。[186]我们还应该补充这一点：尽管威尼斯当局作出努力，用不着说……

毫无疑问，胡安·德·塞格尼消息比较灵通。他在从君士坦丁堡

发出的信中写道，那里的确有人谈到一项庞大的计划，但并不是为这一年制订的。[187]土耳其人向法国国王和英国女王作了书面承诺，但是这些承诺只能使他们在1592年春季承担义务。[188]全部准备工作的目标似乎都是长远的。例如土耳其素丹就正在准备——但仅仅是准备而已——采取一系列财政措施，例如：让帕夏和县“志愿”捐款；从犹太人那里征收特别税以及其他各种捐税。有关这些税款的详情细节，被西方改动、歪曲后，很难辨清真伪。[189]

的确，从6月中起，就开始不再有人谈论将于春季出航的大型舰队了。[190]人们预料之中的那支小型舰队会出现吗？[191]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不错，它会出航，但只驶往埃及和柏柏尔，可能还会驶往普罗旺斯。[192]这支舰队还能勉勉强强集中40到60艘破破烂烂的帆桨战船。威尼斯一个名叫佩罗特的人向弗朗西斯科·德·韦拉十分肯定地谈了上述情况。[193]5月初，人们更加乐观起来。据悉，虽然季节早早来临，土耳其人却毫不急于武装他们的帆桨战船，甚至没有表现出有为下一年作准备的愿望。[194]最多会出航30来艘帆船保卫希腊群岛，即保障土耳其海上贸易往来联系的安全。[195]

但是，同一份公文急报说，关于上述300艘将由200艘英国舰船增援的土耳其帆桨战船的传闻继续流传。[196]这个传闻同其他几则传闻是互相吻合的：君士坦丁堡的海军造船厂复工并且从希腊群岛调来能工巧匠，这一点早从1591年3月初起就已经是事实。[197]4月份，土耳其人在特兰西瓦尼亚订购大量亚麻和苎麻。这除了为制作未来的舰队用的风帆和缆绳之外，还为什么呢？[198]6月份，海军造船厂再度繁忙起来。已经开始在黑海岸边制造帆桨战船。也对旧船进行检修。运载风帆的船只驶到君士坦丁堡。[199]目前还没有什么可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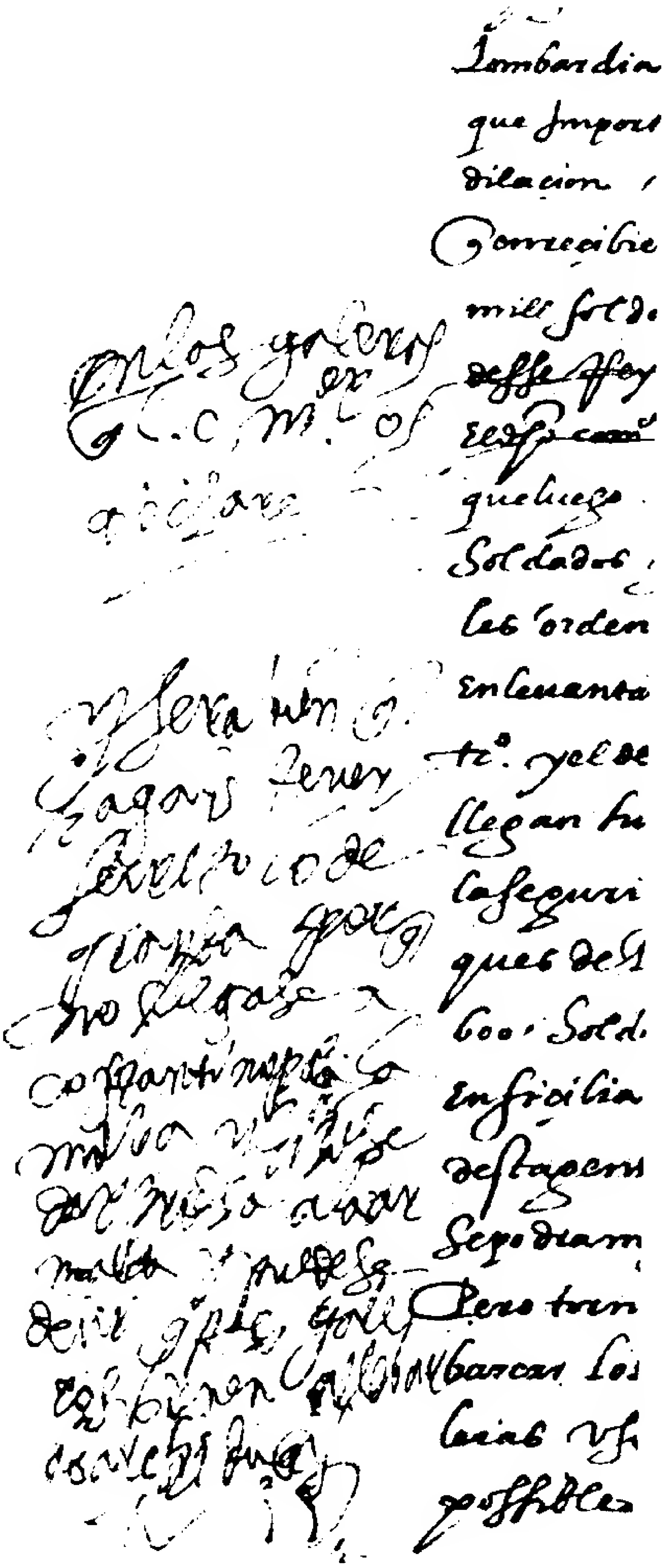


图67　菲利普二世在工作，1569年1月20日

国王在他于1569年1月20日从马德里致那不勒斯总督阿尔卡拉公爵的信(锡曼卡斯，E° 1057，f° 105)的页边写下两个批注。我现在译出第二个批注："你如果能够使格拉纳达事件保密，不向外泄露，以免这个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以免(土耳其)大舰队提前出航，这将是很好的。"格拉纳达于1568年圣诞夜造反。但当国王的信到达时，上述消息已在那不勒斯的大街小巷传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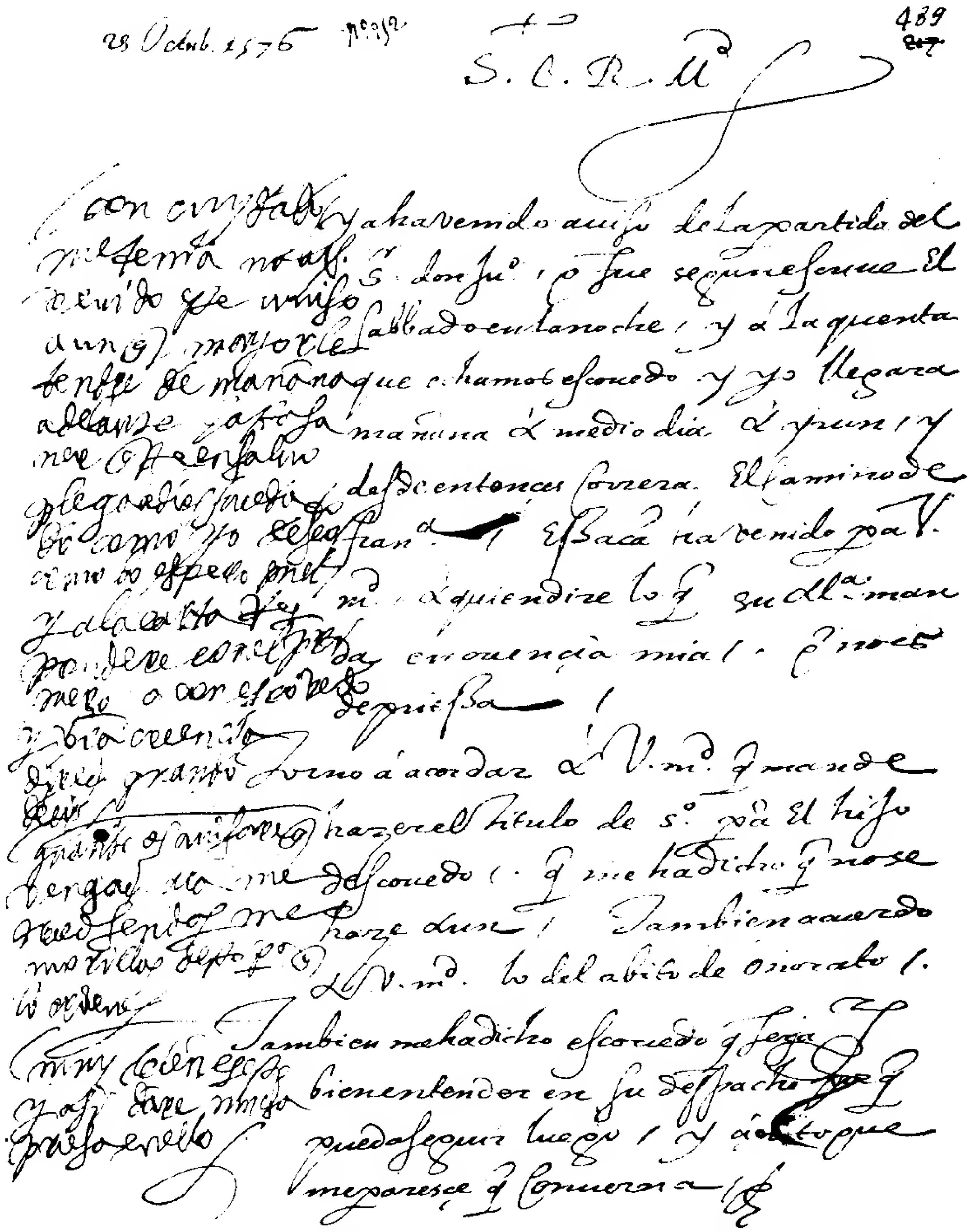


图68　菲利普二世在工作，1576年10月23日

安东尼奥·佩雷斯1576年10月29日写给国王的一张短笺告知国王奥地利的唐·胡安已经动身前往荷兰，还告知国王埃斯科维多提出的两项要求。菲利普二世在页边对每段都作了答复。他针对最后一段（埃斯科维多请求准许他也前往荷兰）写道："此事甚好，我将催办。"（锡曼卡斯，E° 487）。这一页的尺寸在我们的印版上大大减缩。这里提到的埃斯科维多于1577年3月31日遇刺。本文载安东尼奥·佩雷斯著《统治的艺术》，1867年由 J. M. 瓜迪亚在巴黎重新出版。

惧的，但以后呢?土耳其人虽然并没有在1591年进行任何大规模的征伐(只有几艘护卫帆桨战船出航执行警备任务。6月15日，6艘船员饥肠辘辘、筋疲力尽的帆桨战船被人发现在远航柏柏尔后返回君士坦丁堡)[200]。惊恐不安的情绪在基督教世界大大增长。梅卡蒂叙述说，[201]1591年这一年，威尼斯人生活在对土耳其人的恐惧中。威尼斯武装、装备了帆桨战船并派兵前往干地亚等，至少都是事实。[202]

这些惊恐不安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土耳其既然已经从对波斯的战争中脱身出来，人们就必须考虑到它进行干预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土耳其似乎在执行一项恐吓和讹诈政策，使基督教世界提心吊胆、惴惴不安，使它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策。土耳其之所以执行这样一项政策，可能是为了促使西班牙的代理人早日到来。这个代理人受委托进行新的停战谈判，还受委托至少为帕夏带来大笔钱款。这些钱款通常总是伴随谈判而来的。1591年是同西班牙签订的停战协定的到期年和续订展期年。我们已经在前面指出身兼情报员、间谍和代表的米诺卡的胡安·德·塞格在君士坦丁堡。[203]弗朗西斯科·德·韦拉的一封信[204]指出另外一个西班牙的代理人加勒亚索·贝尔农(至少一篇西班牙的文章这样叫他)也在这个城市。此人向君士坦丁堡提供情报并为其效劳。此人向西班牙大使指出，如果对波斯的战争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再起的话，派遣胡安和埃斯特法诺·德·费拉里去君士坦丁堡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他们到这里来的意图在土耳其已经被人知晓”。难道不可以一口咬定此人就是来负责谈判停战协定的续订和展期的代理人吗?在另外一个西班牙的代理人季奥瓦尼·卡斯特利内(这是个意大利人)的信中[205]也可

以找到几句关于这个晦涩不明的问题的话。这个代理人说[206]:“锡南(帕夏)问到这个还没有到来的西班牙人的情况。现在该是他和钱款一齐到来的时候了。”[207]因此,土耳其和西班牙停战的问题是会谈的内容并且继续使外交人员奉派往返旅行。但是,这项协定1591年签订是否按照惯例为期3年?我们无法断言。

不管怎样,1592年的春季平静无事。菲利普二世在1591年11月28日的一封信中命令那不勒斯的总督米兰达伯爵在必要时准备援救那不勒斯。总督回信说,这种必要性不会出现。[208]这一年,土耳其舰队只有两次由哲加拉率领出航。[209]10月份,新任海上将军在发罗拉。[210]但是,鉴于当时这一年行将结束,他去那里只是为了收缴每年的贡金。米兰达出于谨慎,立刻下令在墨西拿集中16艘帆桨战船。我们缺乏更加准确的有关资料。但仅仅这个数字就足以证明哲加拉拥有的兵力微不足道。再者,由于恶劣的天气使基督教徒的帆桨战船无法立即驶离那不勒斯前往西西里,因此这些舰船还来得及获悉哲加拉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消息,还来得及收到取消已经下达给它们的命令的命令。[211]从这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中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1591年有过正式协定,菲利普二世就不需要断然下达关于马耳他的命令;米兰达伯爵就不需要决定派遣帆桨战船前往墨西拿。事实上,他们之中谁也没有谈到关于这方面的协定以及人们对这项协定或多或少的信任。肯定无疑的事实是:谈判这场游戏在君士坦丁堡没有破裂。弗朗西斯科·德·韦拉在神秘的利波马诺案件中[212]似乎身居幕后,把几条线牵在自己手里。这个利波马诺可能是西班牙的代理人,他于1591年在君士坦丁堡被威尼斯人逮捕后,宁愿在归途中自杀。围绕这起

案件的晦涩难解、不明不白之处，无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在土耳其首都进行的谈判的真实情况和氛围环境。

有人会认为，这类谈判可能遭到的失败，是引起一次突然的警告性的打击的原因。这次打击就是1593年土耳其舰队对卡拉布里亚海岸的劫掠。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及时得到通知，并及时采取了传统的安全措施。但是，百来艘土耳其帆船在佯攻西西里之后，突然出现在墨西拿对面的海面上的圣焦瓦尼海沟，对雷焦和附近的14个村庄[213]大肆劫掠，然后驶返发罗拉，没有对遍布防御工事的海岸造成任何损失。于是，就这样开始了一场不再停止的或者几乎不再停止的隐蔽战争。这是土耳其舰队和西班牙舰队之间真正的战争的一种蜕化形式。在一个我们无法准确地确定的日期(可能是1595年[214])，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帆桨战船大张旗鼓，进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报复，抢劫了帕特雷。此外，还大规模地参加了东方的海上行劫活动。在这些掳获甚丰的海上抢劫中，在马格达公爵的帆桨战船上效劳的阿隆索·德·孔特雷拉斯某天参加这种抢劫归来得到“一帽子钱，这些钱一直满到帽沿”。[215]而他作为普通一兵的正式薪饷只不过为3埃居而已。这是一种小规模的战争。这种战争包含大量纷繁庞杂的内容，有时(在土耳其方面)有摩里斯科流亡者参加，此外还涉及不安于现状的卡拉布里亚。公文急报表明，卡拉布里亚得到可疑的船只的援助。这些船只夜间点着舷灯，[216]沿着海岸航行。但是，这种战争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战争。

1594年，哲加拉舰队出航一次。[217]这支舰队至迟7月份驶离君士坦丁堡，8月22日抵达菲格雷多港。[218]土耳其人来临的消息传来，当时没有设防的西西里王国顿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219]。的确，迟

至9月9日，那不勒斯人还在焦急等待多里亚亲王的帆桨战船到来[220]。如果土耳其人继续推进，西班牙的防务的混乱状态就会被敌方利用。但是，尽管如此，9月中旬，有关方面仍然高枕无忧，让担任警备任务的民兵撤离西西里海岸，并且只让普通平民百姓[221]来保护这些地区。土耳其舰队很早就已经返回君士坦丁堡。[222]据说这支舰队由90艘到100艘甚至120艘帆桨战船组成。10月8日，原先征募来补充进驻伦巴第的军队但到那时为止一直被留下的2,500名那不勒斯士兵启程向北开拔。

1595年发生了一场同样的虚惊。7月31日，土耳其舰队在它的监视待命站莫东。[223]意大利顿时惊恐不安起来。西班牙人打算把帆桨战船调集到墨西拿。[224]但是，一些秘密情报说，土耳其人不会离开他们的海。[225]这些情报后来得到证实。西班牙舰队仍然按既定计划我行我素，像平时一样从事向西方的运输活动。土耳其的威胁原来只不过是一次狗的吠而不咬的行动而已。[226]

让·安德烈·多里亚不愿同土耳其大舰队作战：1596年8—9月

我们知道，1596年是土耳其在匈牙利战场经历了巨大危机的一年，是进行艰苦的克雷斯特斯战役的一年。这一年，土耳其人仍然在希腊海岸上占有他们平时惯有的防御阵地，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提防基督教西方，而且还需要提防阿尔巴尼亚地区可能发生的事变。这个地区正风雷激荡，像过去或许曾经有过的一个世纪那样，从无宁日可言。[227]阿尔巴尼亚似乎准备叛乱。在罗马和佛罗伦萨，流行打

算登陆尝试的议论。但是，这场可能在威尼斯边境附近发生的冲突与威尼斯过分利害攸关，因此，威尼斯严守中立，不介入这场冒险，也不让它扩展蔓延。西班牙这时正受到教廷的纠缠。教廷希望看见西班牙人和土耳其的舰队较量。[228]以前，1572年，罗马曾经企图把对土耳其人的陆上战争和海上战争合为一体，使之互相配合，但未成功。现在，1596年，它也不可能发动一场海上战争来配合在匈牙利进行的陆上战争。1596年夏季，让·安德烈·多里亚被请求进行干预，但他却用他收到的正式命令作为挡箭牌。他被人催促时，就向菲利普二世请示。但是，他请示用的词句充分说明他对他的君主的意图已经心中有数。“上月最后一天，我曾经禀呈陛下。今天我再次禀呈陛下，大公和教皇陛下的帆桨战船于本月2日到达。大公的战船到来的意图可以从这些帆桨战船给我带来的大公的信件的副本中得知。我已立即通知西西里王国的主席，但不知道他将作出什么决定。教皇要我搜寻敌人并与之战斗，但是，既然敌舰队在帆桨战船的数量方面对我方占有极大优势，既然这支舰队除了它目前运载的部队外还能载上它所需要的全部全副武装的骑兵，因此，我不认为在这一点上服从教皇陛下是明智之举。此外，教皇陛下说，根据他在阿尔巴尼亚有内应这一情况，我应该让部队在该地登陆。我回答他说，这方面除了陛下要我率领他的帆桨战船留守基督教世界的海岸的命令以外，我没有接到陛下的其他命令[229]……

让·安德烈·多里亚的确只满足于向地中海东岸地区派出几队帆桨战船牵制敌人。然后，他在墨西拿静待事态发展。8月13日，他报告菲利普二世，[230]“如果没有必要对付敌人”，他将率领整个舰队前往西班牙。他稍微耽搁了一些时候，于9月份这样做了。[231]土耳其

的帆桨战船同月到达纳瓦林。正如教皇所断言的那样，这些舰船开到时，它们的状况很糟。它们没有驶离中途停靠站远去，[232]天气一旦转为恶劣就返航了。[233]

1597—1600年

1597年开始时，基督教世界接到有35艘到40艘土耳其帆桨战船即将出航的报告，又惶恐不安起来。[234]这项报告有一次几乎得到证实。但是，这或许纯粹出于偶然，因为其他一些乐观的情报已经报告根本不会有舰队开来。[235]8月初，威尼斯方面获悉一支土耳其舰队已经离开君士坦丁堡。这是一支数量减缩了的用于对付马耳他的帆桨战船舰队。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写道，这支舰队在东方进行的袭击“惊醒了熟睡的人”。[236]显然，这个时期，西班牙人十分愿意土耳其人休眠。这支舰队完全可以缩减它的规模而不致蒙受什么不利的影响。它能够像海上行劫者的小舰队那样机动灵活，有战斗力。它的破坏力、杀伤力和正规舰队相同，甚至比正规舰队更大。人们不久就了解到这支舰队由30艘帆桨战船和44艘大帆船组成，由马米帕夏率领，已于7月2日驶离君士坦丁堡。它的目标是同地中海西部的海上行劫者进行斗争，但有机会时自己也进行海上抢劫。大国的战争就这样变为单纯的海上行劫。伊尼戈·德·门多萨开始思忖促使土耳其进行武装的是否并非西班牙舰队的惰性和它的厌战情绪。[237]

然而，毫无疑问，马米帕夏的这支舰队的战斗力比不上阿尔及尔人的真正的海上行劫船队，而且出发时也没有为进行这次出征适当地武装起来。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它不顾原先拟定的行动计

划，迅速驶回港口，返航途中也偶然遭到猛烈袭击。[238]

1598年仍然一切正常。既然土耳其舰队再次出航，一切正常这个情况毕竟还是令人感到惊奇的。[239]7月26日，土耳其舰队由哲加拉率领离开君士坦丁堡。[240]这支舰队驶过塞图尔以后，曾经因缺乏粮食和钱款而耽搁，但后来它仍然继续前进，尽管据说船上已经发生瘟疫。[241]这支舰队共有帆桨战船45艘。这些帆桨战船的武装比上年那些帆桨战船的武装精良。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9月份，哲加拉到达赞特，但并没有对基督教世界进行任何征伐。他的帆桨战船无疑过分疲累，[243]不能冒险进行长距离的征伐。这样，1598年也有过一次土耳其舰队漫无目的的出航。战争仍然没有爆发。在君士坦丁堡仍然有人作出努力进行停战谈判。这次是由居住在土耳其首都的犹太人为西班牙进行谈判。[244]

1599年同样宁静。1600年，哲加拉率领19艘帆桨战船出航。这些舰船抵达塞图尔后不久就只剩下10艘了。其他9艘的武器装备已被拆除，其人员帆索等物则用于补充加强剩下的船。[245]西方的宁静丝毫没有遭到破坏。在西班牙，甚至有人考虑派帆桨战船去佛兰德以满足阿尔贝特大公提出的要求。[246]

是1601年的一场虚惊还是一个错过的机会？

因此，人们看到下一年西班牙开始进行海战准备感到十分震惊。把西班牙的注意力重新引向地中海的，是亨利四世在萨吕塞这个问题上[247]对萨瓦进行的战争，还是威胁托斯卡纳的企图？是使巴塞罗那通向热那亚的道路畅通无阻的必要性，还是西班牙半岛

摆脱了对法战争之后有更多的力量用于地中海这个事实?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1601年西班牙以多年没有过的规模在地中海上部署了兵力。西班牙所属的整个意大利都处于临战状态。[248]威尼斯因德意志军队未经它的许可就穿越它的领土开赴大军云集的米兰而更加惶恐不安。它自己也在进行武装。这是很自然的。[249]弗恩特斯伯爵让这个国家放心。这也是很自然的。但这也肯定不能丝毫奏效。[250]。这些重新武装的行动以及这些部队和舰船的调动,立刻在也许过分紧张的、过分对可能威胁它的和平生活的事物注意和敏感的意大利的全境,引起一次普遍的危机。易卜拉欣帕夏[251]的使者、马赛的背教者巴尔托洛梅·克罗海伊西[252]难道不是携带着总计划前往法国和英国吗?这个人4月份前往佛罗伦萨和里窝那,途经威尼斯。

至于亨利四世,他并不认为战争会由此爆发。他写信给德·维利埃先生[253]说,弗恩特斯伯爵如果把意大利搞乱,就会遭到教皇反对。“如果没有教皇,上面所谈到的国王就会发现办成什么事情都很困难。”再者,菲利普二世不再需要这样的骚动。1601年5月16日,亨利四世又致函维利埃说,[254]“我从来不认为西班牙人想在意大利或者别处作战,既然他们已经在荷兰打仗,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个沉重的负担,而他们几乎并不比别的任何人更有钱。”其次,这时,意大利的恐惧情绪已经缓和。威尼斯让它的军队复了员。[255]5月27日,当菲利普二世终于“宣誓保证执行”韦尔万和约时[256],危机可以说已经结束了。

但是,这次危机首先集中在意大利,夏季又突然转移到海洋。6月中,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公文急报不再提供关于东方的情况,而是

提供关于西方的情况。它提到一支强大的西班牙舰队进行的战备活动，这使面临危险即使得到海上行劫者的帮助[257]也只能调集30艘或者50艘帆桨战船的哲加拉极为惊恐。法国对西班牙舰队的这次集中是了解的。亨利四世6月25日写道[258]："正在热那亚进行作战准备的海军威胁着土耳其帝国，并且使西班牙的邻国疑惧起来，但是，我希望它像这位弗恩特斯伯爵采取的其他行动一样，造成的声势多于实际的危害。"土耳其人采取了若干预防措施，让30来艘帆桨战船向特内多斯岛[259]进发，直抵达达尼尔的出口。法国国王对西班牙舰队的出航不予重视。他于7月15日写道："在我看来，关于这件事的报导言过其实。"[260]

至于基督教舰队，它显得更加具有威胁性。虽然威尼斯声称它知道这支舰队将驶往阿尔巴尼亚以占领该地的卡斯特尔努奥沃，[261]但人人都在寻思它究竟要进攻什么地方。8月5日，东·安德烈·多里亚亲王率领他的舰船离开特拉帕尼。[262]在君士坦丁堡，危险被人夸大。该地的局势一下就奇怪地颠倒过来。风闻一支由90艘帆桨战船和40艘大帆船组成的基督教舰队正在活动。[263]哲加拉抵达纳瓦林后，谨慎地让自己连同他的40艘帆桨战船关闭、留守在港内。[264]

然而，决不会发生第二次勒班陀战役。单单多里亚把特拉帕尼选为出发港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西班牙所关心的并不是黎凡特而是北非。实际上，西班牙舰队已经出航前往进攻阿尔及尔。它希望突然袭击[265]这个柏柏尔的大港。但是，恶劣的天气将再次使所有的希望统统化为泡影。除此之外，再加上舰队指挥不大胆果断，因此它不得不返航。早在9月14日，法国驻西班牙大使[266]就报告说，这

支舰队执行任务失败。据宣布，"这次失败是由于舰队在离它打算停泊的地点4里远的地方遭到风暴袭击。这场风暴把帆桨战船吹得东零西散、桅樯折裂，以致被迫放弃原定计划。"这是要添加到列有1830年以前基督教徒错过的攻占阿尔及尔的时机的长表上的另外一次吗？至少在罗马有这样的想法。塞萨公爵在罗马报告说，教皇陛下"对上述舰队蒙受的耻辱感到非常难过"。[257]教皇尤其认为，非洲方面的牵制使得富有成果的对黎凡特的征伐无法进行……因此，在17世纪开始时，人们惊奇地又见到关切非洲的西班牙人和注意东方的意大利人之间发生这些永无休止的争吵。

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点：这次征伐——在这方面，这次征伐显示出地中海的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如果成功，也只不过导致一场简单的地方性的战争而已。西班牙舰队本来不会同土耳其舰队遭遇。舰队的、加强的帆桨战船的和大帆船的大规模战争不可能再成为主宰地中海的事物。历史的普遍的、强大的、敌对的潮流比环境、人、谋算和计划等更为重要、更有影响。它反对这些耗资巨大的战争的复活。大规模的战争的衰落以它自己的方式预示着地中海本身的衰落。

1598年9月13日 菲利普二世去世[268]

我们在叙述这些发生在地中海舞台上的事件的时候，没有在适当的地方提到一起轰动一时的、传遍五洲四海的事件：菲利普二世之死。1598年9月13日，他死于埃斯科利亚尔。这时正值他的漫长的统治的晚期。对他的敌手来说，他的统治似乎没有止境。

这是叙述时的遗漏疏忽吗?谨慎国王从国际舞台消失,这意味着西班牙在政策方面大事改弦易辙吗?面对东方,西班牙的政策(老多里亚1601年进攻阿尔及尔的企图没有使这项政策发生任何变化)仍然过于谨慎小心,不想引起同土耳其的公开冲突。[269]西班牙的代理人继续他们在君士坦丁堡进行的密谋活动,试图谈判一项实际上并不可能缔结的和约以及有效地致力于避免冲突……任何关于战争的谈论,都只涉及针对柏柏尔人的有限战争。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西班牙本身甚至没有发生什么决定性的变化。只有长期以来一直在起作用的力量在继续活动。我们在谈到被人称为新统治时期的贵族领主的反抗这一事物时,已经特别谈到这一点。所有的事物都具有连续性。和平的恢复尽管实现起来十分缓慢,也同样具有连续性。在菲利普二世的统治的最后几年,人们进行了不协调的但却是极大的努力之后,和平的恢复势在必行。1598年的韦尔万和约是已故国王缔造的事业。同英国的和约在6年之后(1604年)缔结;同荷兰联省的和约又等了11年多之后(1609年)缔结。但是,这两者都是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趋势的产物。没有任何事物比菲利普二世的令人崇敬赞佩的死更能显露他那令人捉摸不透的形象。他的死经常有人描述,而且描述得非常哀婉动人,以致人们对重复关于这个死的动人心弦的细节犹豫不决起来。这个死肯定是一个国王的死、一个基督教徒的死。这个国王和基督教徒异常相信教会的代人祈祷的力量的效能。

6月份,他刚刚受到疾病的侵袭,感到痛苦,就不顾医嘱叫人把自己送往埃斯科利亚尔以便死在那里。然而,他仍然同败血症进行了斗争。这种病在他生病痛苦了53天之后,夺走了他的生命。他并

没有在一种自豪的氛围中死去。而这种自豪的精神正是基督教改革运动的世纪的象征。[270]他不是为了孤独地死于埃斯科利亚尔而去那里的。他回到他自己的亲属那里。他的那些葬在那里的亲属在等待他。他由他的儿子——未来的菲利普三世，由他的女儿——即将前往佛兰德的公主，由高级神长和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在他的长期痛苦的挣扎时期追随他的达官贵人陪同前往。他死时陪侍在侧的人之多，他的死的社会影响之大，为他举行的追悼仪式之隆重，都可说达到尽可能高的程度。在他临终的时刻，围绕着他的，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自豪、孤独和想象”，而是王室成员、众多圣徒和举国上下的众声祈祷。他们组成整整齐齐的宗教仪式队伍。这个队伍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只能从最纯净的宗教生活中，或许还要从天主教加尔默罗会修士的革命气氛中去了解这个一生常常被人说成是致力于使政教分离的人，这个被敌人恬不知耻地用最荒谬的诽谤污蔑的人，这个被他的崇拜者很快就用光环装饰起来的人。

但是，君主难道就是他自己是其纽带、保证和象征的历史的力量吗?这种情况多么使这个孤僻和神秘的人物无法应付啊！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对这个人了解研究得很差。他像接待大使那样接待我们，彬彬有礼，聆听我们谈话，用十分低沉的、甚至用往往听不见的声音答复我们，从来不对我们谈到他自己。在他死前3天中，他忏悔了他一生的过错。但是，这些在他的那个或多或少能够正确评断事物的、或多或少在漫长的生命中曾经误入迷津的良心的法庭上被列举出来的错误，谁又能够肯定真正想象得出来呢?这里有他一生中很难理解的重大问题之一、很难猜出的谜之一。如果我们公正诚

实的话，我们就必须把这个谜的阴影留在他的肖像上，或者留在他的多幅肖像上。什么人能够在一生中毫不改变呢?从提香为他画的那幅他是个20岁的亲王的肖像所标志的时代起，到潘托亚·德·拉·克鲁兹为他画的那幅他是处于统治终结时期的国王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动人的肖像所标志的时代止，菲利普的这一生是漫长的一生，是动荡的一生。

我们所能理解的菲利普二世是这样一位君王：他致力于国王的工作；他置身于永无休止的报告的中心和交叉点；这些报告结合起来，用纵横交错的线在他面前编织世界和西班牙帝国的网。他是一个坐在办公桌旁边阅读、提笔快速批阅报告的人。他远离别人；冷漠、深思。情报的线把他同从世界每个角落向他匆匆而来的活生生的历史连接起来。说实话，他是他的帝国的全部弱点和全部力量的总和。他是对帝国进行总结的人。他在荷兰的副手起先是阿尔贝公爵，后来是法尔内兹。他在地中海的副手是唐·胡安。这些人只能看到帝国事业的一部分，即在大规模的冒险事业中他们所负责的那一部分。国王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乐队指挥和乐队演奏者之间的区别。

他并不是一个具有卓识远见的人。他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连续不断的、没完没了的琐事。他对文件的批注没有一个不是针对具体而微的事作出的。其中有他的命令、他的意见，甚至有他对某个拼写错误或者某个地理错误所作的改正。在他的笔下从来没有过总体思想和宏图大略。我不认为地中海这个词曾经以我们赋予它的内容在他的思想中浮现过或者以我们脑海里惯有的那种充满阳光和蓝色海水的地中海的形象在他的思想里出现过。我也不认为

地中海表示重大问题的一个具体部分或者表示清楚地构想出来的政策的执行范围。真正意义上的地理不是君主们所受的教育的一部分。这些都充分说明为什么结束于1598年9月的长时间的临终前的痛苦并不是地中海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些也都充分说明为什么我们应该再次对传记史学和结构史学之间的差距，以及更进一步，对传记史学和地理区域史之间的差距进行思考……

本部分原注

1.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and in the new world*, 4 vol.

2. Paruta au Doge, Rome, 7 nov. 1592, *La legazione di Roma*...,p.p. Giuseppe de LEVA, 1887, I, p. 6-9.

3. Emilio GARCIA GÓMEZ, "Españoles en el Sudán", *in*: *Revista de Occidente*, oct.-déc. 1935, p. 111.

4. Muerte del Rey de Francia por un frayle dominico, Simancas E° 596; E. LAVISSE, *op. cit.*, VI, 1, p. 298 et *sq.*

5. A. Cucino à A° Paruta, Venise (sept.-oct.) 1589, A. d. S. Venise, Let. Com.-XII *ter*.

6. H. KRETSCHMAYR, *op. cit.*, III, p. 42-43, parle d'août et de nov. La réception semble bien avoir eu lieu en janvier 1590, F^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 Venise, 20 janv. 1590, A. N., K 1674.

7. L. von PASTOR, *op. cit.*, X (édit. al.). p. 248.

8. I. de Mendoza à Philippe III, Venise, 19 déc. 1598, A. N., K 1676.

9. G. MECATTI, *op. cit.*, II, p. 814.

10. Et qui causent leurs habituels dommages au passage "... *come è il lor solito*". La Rép. de Gênes à H. Picamiglio, Gênes, 17 juill. 1590, A. d. S. Gênes, L. M. Spagna 10. 249.

11. Simancas E° 487.

12. R. HAKLUYT, *op. cit.*, II, p. 285-289, rencontre au large de Pantelleria.

13. Mais d'ordinaire les faits signalés ont beaucoup moins d'importance encore. Voyez dans J. von HAMMER, *op. cit.*, VII, p. 192-194 et 194, note 1, dans L. C. FÉRAUD, *op. cit.*, p. 86, pour l'un la femme, pour l'autre la sœur de Ramadan, quitte Tripoli en 1584, après Passassinat de son mari ou frére, pacha de Tripoli. Elle emporte sur sa galére 800 000 ducats, 400 esclaves chrétiens et 40 jeunes filles. Elle est bien reçue sur le chemin de Constantinople à Zante, mais elle est attaquèe peu après à la hauteur de Çéphalonie par Emo, commandant de la flotte de Venise. La galére est prise, les Musulmans massacrés. L'incident se règle à l'amiable, grâce à l'intervention de la sultane; Emo sera d'ailleurs décapité et sa prise restituée ou compensée. Dans l'affaire, 150 captifs libérés d'aprè R. HAKLUYT, *op. cit.* (II, p. 190) qui situe l'événement vers oct. 1585. A bord de la galère se trouvaient deux Anglais que le fils de Ramadan a fait circoncire de force à Djerba.

14. Charles-André JULIEN,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op. cit.*, p. 538.

15. L. C. FÉRAUD, *op. cit.*, p. 83.

16. Ch. -André JULIEN, *op. cit.*, p. 537.

17. Juan de Cornoca à Philippe II, Venise, 4 févr. 1589, A. N., K 1674.

18. Miranda à Philippe II, Naples, 18 févr. 1589, Simancas E° 1090, f° 21.

19. Juan de Cornoga à Philippe II, Venise, 9 mai 1589, A. N., K 1674.

20. Miranda à Philippe II, Naples, 12 avr. 1589, Simancas E° 1090, f° 35.

21. Le même au même, *ibid.*, f° 53. L'Adelantado de Castille à Philippe II, Gibraltar, 13 mai 1589, Simancas E° 166, f° 72.

22. J. de Cornoga à Philippe II, 9 mai 1589, A. N., K 1674. Départ de 30 galères. Const., 22 juin 1589, A. N., K 1674; Miranda à Philippe II, 8 juill. 1589, Simancas E° 1090, f° 83; F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 Venise, 8 juill. 1589, A. N., K 1674.

23. Miranda, note précédente.

24. Miranda à Philippe II, Naples, 14 juill. 1589, Simancas E° 1090, f° 89.

25. Avis du Levant, 27 juill. et 1er août 1589, A. N., K 1674.

26. F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 5 août 1589, A. N., K 1674, mêmes ren-

seignements; Miranda à Philippe II, Naples, 12 août 1589, Simancas E° 1090, f° 105.

27. V.-roi de Sicile (à Philippe II?), Palerme, 17 août 1589, Simancas E° 1156.

28. Voir avant-dernière note.

29. D'où l'inutilité des mesures de défense prises par le comte d'Albe, v.-roi de Sicile: Albe à Philippe II, Palerme, 22 mai 1589, Simancas E°1156.

30. J. de Cornoça à Philippe II, Venise, 13 mai 1589, A.N., K 1674.

31. Le même au même, Venise, 10 juin 1589, *ibid.*

32. Miranda à Philippe II, Naples, 8 sept. 1589, Simancas E° 1090, f° 124.

33. Relacion del viaje que hizieron las galeras de la religion de Sant Juan que estan al cargo del comendador Segreville en ausencia del General de la Religion, 1589, Simancas E° 1156.

34. Miranda à Philippe II, Naples, 18 sept. 1589, Simancas E° 1090.

35. Const., 8 déc. 1589, A.N., K 1674, F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 Venise, 2 déc. 1589, A.N., K 1674; le même au même, 22 déc. 1589, *ibid.*

36. Palerme, 25 nov. 1589, E° 1156.

37. Alphonse ROUSSEAU, *Annales Tunisiennes*, *op. cit.*, p. 33.

38. Const, 2 mars 1590, Simancas E° 1092, f° 18.

39. Const. 16 mars 1590, A.N., K 1674.

40. F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 Venise, 31 mars 1590, A.N., K 1674.

41. Le comte d'Albe à Philippe II, Palerme, 7 avr. 1590, Simancas E° 1157.

42. F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 Venise, 14 avr. 1590, A.N., K 1674.

43. Miranda à Philippe II, Naples, 14 août 1590, Simancas E° 1090, f° 15.

44. Longlée au roi, Madrid, 15 août 1590, p.p. A. MOUSSET, *op. cit.*, p. 401.

45. Const., 27 avr. 1590, A.N., K 1674.

46. 25 avr. 1590, *Relacion q. yo Juan Sarmiento hago para informacion de V. Ex^a del viaje que hize para la isla de Tabarca en Berveria de orden de V. Ex^a*, Simancas E° 1157.

47. *Ibid.*

48. Au roi, Simancas E° 1157.

49. Const. ,25 mai 1590, A. N. ,K 1674;Albe à Philippe II, Palerme, 2 juin 1590, Simancas E° 1157.

50. Albe à Philippe II, Palerme, 5 mai 1590, Simancas E° 1157.

51. Simancas E° 1092, f° 32.

52. A. N. ,K 1674.

53. Albe à Philippe II, Palerme, 2 juin 1590, Simancas E° 1157.

54. Const. ,8 juin 1590, A. N. ,K 1674.

55. F. BRAUDEL, *in*:*Rev. Afric.* ,1928.

56. J. A. Doria à Philippe II, 6 juin 1594, Simancas E° 492.

57. Sur ce roi de Kouko, se reporter à la note précédente et à son analyse, F. BRAUDEL, "Les Espagnols en Algérie",*in*:*Histoire et Historiens de l'Agérie*, 1930, p. 246. Sur un incident analogue, des fortifications à Africa qu'il faudrait jeter à bas, le duc de Maqueda à Philippe II, Messine, 12 août 1598, Simancas E° 1158.

58. J. von HAMMER *op. cit.* ,VII, p. 264.

59.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802.

60. *Ibid.* ,p. 803.

61. F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 Venise, 14 avr. 1590, A. N. ,K 1674"... *con que havian baxado los talleres diez asperos cada uno*".

62. D. Iñigo de Mendoza à Philippe II, Venise, 9 sept. 1590, aut. ,A. N. ,K 1677.

63. Le dernier état de la question, Vuk VINAVER "Der venezianische Goldzechin in der Republik Ragusa", *in*: *Bollettino dell' Istituto di Storia della Società e dello Stato veneziano*, 1962.

64. 12 juin 1590, R. HAKLUYT, *op. cit.* ,II, p. 294-295. L'accord sera conclu en 1591.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657.

65.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582.

66. *Ibid.*

67. F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 Venise, 3 mars 1590, A. N. ,K 1674;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623.

68. Le même au même, Venise, 3 sept. 1589, A. N. ,K 1674.

69. Const. 5 janv. 1591, A. N. ,K 1674.

70.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581.

71. *Ibid.* ,p. 585.

72. J. von HAMMER, *op. cit.* ,VII, p. 297.

73. A. N. ,K 1677.

74. Const. ,18 avr. 1601, A. N. ,K 1677.

75. Const. ,4 mai 1601, *ibid.* Sur ces incidents de 1601, leurs causes et leurs antécédents, voir également, Const. ,27 mars 1601, A. N. ,K 1630; Iñigo de Mendoza à Philippe III, Venise, 13 mai 1600, aut. K 1677; Lemos à Philippe III, Naples, 8 mai 1601, K 1630; F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I, Venise, 5 mai 1601, K 1677 et Const. ,29 nov. 1598, K 1676.

76. J. von HAMMER, *op. cit.* ,t. VII, et J. W. ZINKEISEN, *op. cit.* ,t. III. Quelques dates: 1594, prise de Novigrad par les Impériaux; 1595, prise de Giavarino par les Turcs, grosse émotion en Chrétienté, G. MECATTI, *op. cit.* , II, p. 799; 1598, reprise de Giavarino, Simancas E° 615; 16 mai 1598, I° de Mendoza à S. M. ,Venise, A. N. ,K 1676, colére du sultan à la nouvelle de la prise de Giavarino; 11 avr. 1598, I° de Mendoza à S. M. , nouvelle de la prise de Giavarino arrivée à Venise le 6 avr. , A. N. ,K 1676; 5 déc. 1598, Inigo de M. au roi, Venise: satisfaction des Vénitiens quand ils apprennent que les Impériaux ont levé le siège de Bude; 28 nov. ,I° de Mendoza à S. M. ,les Turcs ont levé le siège de Vadarino, les Impériaux celui de Bude, A. N. ,K 1676; 20 oct. ,fausse nouvelle mais pas donnée comme telle de la prise de Bude, I° de Mendoza, A. N. ,K 1676; 4 nov. 1600: Fco de Vera à S. M. ,Venise, A. N. ,K 1677, prise de Canisia par les Turcs le 22 octobre; 11 août 1601: di Viena A. N. ,K 1677, défaite des Transylvains par les Impériaux près de Goroslo; 21 oct. 1601: défaite de l'Écrivain, célèbrée par de grandes fêtes, Constantinople, 21 oct. 1601, A. N. ,K 1677; 10 nov. 1601: la défaite de l'Ecrivain n'est pas tenue pour certaine. F^{co} de Vera à S. M. , Venise, A. N. ,K 1677; 1er déc. 1601: échec de l'assaut impérial contre Canisia, F^{co} de Vera à S. M. ,Venise A. N. ,K 1677.

77. Const. ,4 mai 1601, A. N. ,K 1677. Il ne s'agit, il est vrai que de quatre galères.

78. G. Mecatti, *op. cit.* ,II, p. 789, p. 809.

79. *Ibid.* ,p. 790. Sur la mission du cardinal Borghese en Espagne, voir l'instruction de Clément VIII, 6 oct. 1593, p. p. A. Morei Fatio, *L'Espagne au XVI^{e} et au XVII^{e} siècle*, p. 194 et *sq*.

80. *Consejo sobre cartas de Fco de Vera*, mai 1594, Simancas E° 1345. L'Espagne reproche aussi à Venise sa politique en faveur de Henri IV.

81. J. W. Zinkeisen, *op. cit.* , III, p. 587.

82. G. Mecatti, *op. cit.*, II, p. 800(1595), N. Iorga, *op. cit.*, III, p. 211.

83. N. IORGA, *Storia dei Romeni*, p. 213.

84. G. MECATTI, *op. cit.*, p. 801.

85. F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I, Venise, 5 mai 1601, A. N., K 1677.

86. Const., 17 mars 1601, A. N., K 1677.

87. Ainsi au début de 1600, près de Témesvar, D. Iñigo de Mendoza à Philippe III, Venise, 26 févr. 1600, A. N., K 1677, et comme en 1598 avec l'appui des Transylvains et durant l'hiver(3 janv. 1598), A. N., K 1676.

88. Vienne, 28 mars 1598, A. N., K 1676.

89. P. PARUTA, *op. cit.*, p. 15 et 16.

90. Iñigo de Mendoza à Philippe III, Venise, 19 déc. 1598, A. N., K 1676.

91. Le même au même, 11 juill. 1598, *ibid*(11 et non 18 juill., comme l'indique le classement des archives).

92. Juan de Segni de Menorca à Philippe II, Const. 3 nov. 1597, A. N., K 1676. Des soldats turcs désertent et se réfugient dans les villages chrétiens.

93.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609. Bruits de paix: le duc de Sessa à Philippe III, Rome, 14 juill. 1601, A. N., K 1630; D. Iñigo de Mendoza à Philippe III, Venise, 1er août 1600, K 1677; le même au même, Venise, 27 mai 1600(si l'Empereur n'est pas secouru d'argent, il fera la paix), *ibid*.

94. Const., 17 juill. 1601, A. N., K 1677; Golali dit une lettre d'Ankara, 10 déc. 1600, *ibid*. Et plus tôt, Iñigo de Mendoza au roi, Venise, 8 août 1598, K 1676, mais est-ce l'Écrivain qui alors se fait appeler(ou passer pour) le sultan Mustapha?

95. Ankara, 10 déc. 1600, copie, A. N., K 1677.

96. Const., 8 et 9 sept. 1601, A. N., K 1677.

97. Const., 21 oct. 1601, A. N., K 1677, sa défaite par Hassan Pacha. Le duc de Sessa à Philippe III, Rome, 9 déc. 1601, A. N., K 1630, Hassan Pacha, un des fils de Méhemet Sokolli.

98.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613-614.

99. Paul MORET, *Histoire de Toulon*, 1943, p. 81-82.

100. Maurice WILKINSON, *The last phase of the League in Provence*, Londres, 1909, p. 1.

101. *Muerte del rey de Francia*, Simancas E° 597.

102. Charles DUFAYARD, *Le Connétable de Lesdiguières*, Paris, 1892.

103. Il disparaît le 15 août 1595, E. LAVISSE, *op. cit.*, VI, 1, p. 399.

104. Sur d'Épernon, Léo MOUTON, *Le Duc et le Roi*, Paris, 1924.

105. D. Pedro de Acuña à Philippe II, Rosas, 19 sept. 1590, Simancas E° 167, f° 218. Le mauvais temps a empêché de démanteler le fort de Briscon. Avis de D. Martin de Guzmán d'après les pilotes de la côte; les galères ne doivent pas retourner à cet effet à cause du mauvais temps qui dure de deux à trois mois *y entrar en el golfo de Narbona y costearle es mucho peor*. Le marquis de Torrilla (Andrea Doria) à S. M., Palamos, 28 sept. 1590, Simancas E° 167, f° 223, indique les difficultés de bloquer les côtes du Languedoc avec le mauvais temps. Du même au même, *ibid.*, f° 221 sur la difficulté d'atteindre le fort de Briscon.

106. Les conseillers de Barcelone à Philippe II, 17 juill. 1588, Simancas E° 336, f °157. Lista del dinero y mercadurias que han tomado los de Mos. de Envila a cathalanes cuyo valor passa de 30 U escudos (1588). Simancas E° 336 (s. f°), Manrique? à Montmorency, 26 avr. 1588, Simancas E° 336, f° 152.

107. Avis espagnol, 8 mai 1590, A. N., K 1708.

108. Les Espagnols s'emparent d'une barque chargée d'armes au château de Livourne, Andrea Doria à Philippe II, Rosas, 13 août 1590, Simancas E° 167, f° 219.

109. A. N., K 1708.

110. Mai 1590, A. N., K 1708.

111. Joyeuse à Martin de Guzmân, Narbonne, 12 juin 1590, A. N., K 1708.

112. Joyeuse à S. M., 22 juin 1590, Simancas E° 167, f° 154.

113. Joyeuse à D. Martin de Idiáquez, Narbonne, 10 juill. 1590, A. N., K 1449, note identique à D. J. de Idiáquez.

114. Joyeuse à Philippe II, Narbonne, 10 juill. 1590, A. N., K 1449.

115. D. Pedro de Acuña à Philippe II, Rosas, 13 août 1590, Simancas E° 167, f° 220.

116. Pedro de Ysunca au roi, Perpignan, 13 août 1590, A. N., K 1708.

117. D. J. de Cardona à Philippe II, Madrid, 30 août 1590, Simancas E° 167, f° 189.

118. E. LAVISSE, *op. cit.*, VI, 1, p. 353, Cf. SAMAZEUILH, *Catherine de Bourbon, régente de Béarn*, 1868. Antonio Pérez et ses amis levèrent des troupes en Béarn... *Antonio Pérez y otros caballeros que benieron a bearne hazen hazer esta gente en favor de los Aragoneses*... Avis, 1592, Simancas E° 169.

119. E. LAVISSE, *op. cit.*, VI, 1, p. 352.

120. Dendaldeguy, envoyé de Villars, au Roi Catholique, Brionnez, 4 nov. 1592, copie, A. N., K 1588.

121. *Ibid.*

122. Diego de Ibarra à Philippe II, Paris, 15 févr. 1593, A. N., K 1588. Toute la Ligue chancelle alors, voyez la lettre du marquis de Villars à Philippe II, Auch(?), 5 févr. 1593, A. N., K 1588.

123. Le duc de Joyeuse est mort en janvier 1592. Le nouveau duc(son fils ou son frère?)Ange, qui pour prendre sa succession quitte le froc des Capucins, a eu une entrevue avec Montmorency au Mas d'Azille et d'Olonzac. La trêve alors signée pour un an ne devait pas finir. Le duc de Joyeuse retiré à Toulouse y reprenait la lutte contre Henri IV (Joyeuse à Philippe II, Toulouse, 10 mars 1593, A. N., K 1588). Il resta à la solde de l'Espagne.

124. Victor L. BOURRILLY et Raoul BUSQUET, *Histoire de Provence*, Paris, 1944, p. 92.

125. *Ibid.*

126. 8 mai 1590, A. N., K 1708.

127. V. L. BOURRILLY et R. BUSQUET, *op. cit.*, p. 91, R. BUSQUET, *Histoire de Marseille*, Paris, 1945, p. 224 et *sq.*

128. V. L. BOURRILLY et R. BUSQUET, *op. cit.*, p. 92-93.

129. *Ibid.*, p. 93.

130. Don César d'Avalos à Philippe II, Aix, 4 mars 1592, Simancas E° 169, f° 103.

131. Le même à D. J. de Idiáquez, Antibes, 7 août 1592, Simancas E° 169, f° 45.

132. Don Jusepe de Acuña à D. D° de Ibarra, 13 sept. 1592, copie, A. N., K 1588.

133. V. J. BOURRILLY et R. BUSQUET, *op. cit.*, p. 93.

134. E. LAVISSE, *op. cit.*, VI, 1, p. 384.

135. Léo MOUTON, *op. cit.*, p. 40.

136. A. N. ,K 1596, nos 21 et 22, cité par Léo MOUTON, *op. cit.* ,p. 42 et note, p. 43. Les demandes des"catholiques"de Provence, 8 déc. 1594, A. N. ,K 1596. Délibération du Conseil d'État, 1er févr. 1595. A. N. ,K 1596.

137. Accordi di Mone de Pernone con S. Mtà, copie en français, Saint-Maximin, 10 nov. 1595, A. N. ,K 1597, voir Léo MOUTON, *op. cit.* ,p. 44, note 2. L'accord avec la Savoie au plus tard en août 1595(Disciffrati del Duca de Pernone, Saint-Tropez, 11 déc. 1595, A. N. ,K 1597). Cf. le document sans date des A. E. ,Esp. 237, f° 152.

138. Estat des villes qui recongnoissent l'authorité de Monseigneur le duc d' Épernon, A. N. ,K 1596(indication aussi des"villes"qu'il possède en Dauphiné, Touraine, Angoumois, Saintonge). Le même document en espagnol *Lista de las villas de Provenza*. . . A. E. ,Esp. 237, f° 152. Mémoire sur ce qui est sous le commandement de Mr d' Épernon, s. d. A. N. ,K 1598.

139. Charles de Savigny, s. de Rosne;son rôle à Fontaine-Française, T. A. d'AUBIGNÉ, *op. cit.* ,IX, p. 55 et *sq.*

140. 12 sept. 1594, copie, A. N. , K 1596. Nécessité pour Henri IV d'aller à Lyon. Nuevas generales que han venido de Paris en 26 de noviembre (1594, A. N. ,K 1599).

141. E. LAVISSE, *op. cit.* ,VI, 1, p. 401.

142. *Ibid.* ,p. 405;Léo MOUTON, *op. cit.* ,p. 47.

143. Léo MOUTON, *op. cit.* ,p. 47.

144. *Ibid.* ,p. 47-48.

145. Étienne BERNARD, *Discours véritable de la prise et réduction de Marseille*, Paris et Marseille, 1596.

146. Un document s. d. (A. N. ,K 1708)fait mention de demandes marseillaises d'extraction de blé ou à Oran ou en Sicile. La ville sollicite aussi qu'on la délivre des deux galères d' Épernon qui croisent au large de la ville.

147. R. BUSQUET, *op. cit.* ,p. 226 et *sq.*

148. *Ibid.* ,p. 231.

149. Nuevas de Provenza, 1594, Simancas E° 341.

150. *Ibid.*

151. 10 000 salmes de blé obtenues en Sicile en 1593. A. N. ,K 1589.

152. Louis d'Aix, Charles de Casaulx, Jehan Tassy à Philippe II, Marseille, 16 nov. 1595, A. N. ,K 1597. Cette lettre avait été précédée d'une lettre de recommandation d' Andrea Doria à Philippe II, Gênes, 13 nov. 1595,

A. N. ,K 1597 B 83.

153. A. N. ,K 1597 B 83.

154. R. BUSQUET, *op. cit.* ,p. 240. Et surtout entente préparée avec l'Espagne longtemps à l'avance, voir note 5, page, précédente et cardinal Albert à Phillippe II, Marseille, 7 sept. 1595, A. N. ,K 1597.

155. S. d. ,A. N. ,K 1597 B 83.

156. *Ibid.*

157. Antonio de Quinones à Philippe II, Marseille, 1[er] janv. 1596, A. N. ,K 1597;Carlos Doria à Philippe II, Marseille, 1[er] janv. 1596, *ibid.*

158. *Puntos de lo de Marsella*, A. N. ,K 1597.

159. *Los diputados de Marsella a Don Juan de Idiâquez*, Barcelone, 12 févr. 1595, Simancas E° 343, f° 92(résumé de chancellerie).

160. R. BUSQUET, *op. cit.* ,p. 245.

161. *Ibid.*

162. E. LAVISSE, *op. cit.* ,VI, 1, p. 264;*ibid.* ,p. 342 et *sq.* ,sur le réveil commercial.

163. S. d. ,vers 1595, Simancas E° 343.

164. S. d. ,A. N. ,K 1597, B 83.

165. A. N. ,K 1596.

166. Référence, note 6, page précédente.

167. Dans le texte de la prorogation de la trêve, 3 juill. 1596, A. N. ,K 1599, on indiquait que chaque parti lèverait les deniers dans les régions qu'il tenait. Argent doit être envoyé, sinon Mercœur négociera, M° de Ledesma à Philippe II, 20 janv. 1598, A. N. ,K 1601. Mercœur à Philippe II, Nantes, 24 mars 1598(A. N. ,K 1602)lui annonce sa paix avec Henri IV et lui demande à être employé en Hongrie.

168. Philippe II au duc d'Albuquerque, Madrid, 10 juill. 1595, Simancas E° 175, f° 290.

169. Advis à Monsieur le Comte de Fuentes, 12 mars 1595, A. N. ,K 1599.

170. *Déclaration des causes qui ont meu la royne d'Angleterre à déclarer la guerre au roy d'Espagne*, Claude de Monstr'oeil, 1596, A. N. ,K 1599.

171. Mendo de Ledesma à Philippe II, Nantes, 25 juin 1597,A. N. , K 1600.

172. E. LAVISSE, *op. cit.* ,VI, 1, p. 410.

173. Dès février, le manque d'argent (Relattione summaria del danaro che si presuppone manca nello stato di Milano, 12 févr. 1597, Simancas E° 1283). Sur les mouvements de troupes, Philippe II au connétable de Castille, Madrid, 7 avr. 1597, Simancas E° 1284, f° 126. Le même au même, 2 mai 1597, *ibid.*, f° 125. Le connétable à Philippe II, Milan, 12 mai 1597, *ibid.*, f° 86.

174. Sur le secours au Savoyard: Philippe II au connétable de Castille, Saint-Laurent, 28 avr. 1597, Simancas E° 1284, f° 116; le connétable au roi, Milan, 12 mai 1597, f° 83; le même au même, 23 juill., f° 55; le roi au connétable, 8 août 1597, f° 122.

175. Velasco à Philippe II, Milan, 16 nov. 1597, Simancas E° 1283, f° 2. Sur l'affaire de Ferrare, sa lettre du 4 nov. (f° 5) et (E° 1283 sans f°) 5 nov. 1597, Relacion de las prevenciones que S. S^{d}... Sur les Suisses, lettres de Philippe II du 31 juill. (E° 1284, f° 123) et du connétable du 23 juill. (E° 1283, f° 55), du 7 oct. (*ibid.*, f° 4). Sur Amiens, sa lettre du 25 oct. 1597 (E° 1283). Je mets en cause des transferts de troupes en 1597 d'Italie en Espagne, notamment un tercio de Napolitains de D. Cesar de Eboli qui à bord de naves ragusaines, arrive le 7 août à Alicante, D. Jorge Piscina? à Philippe II, Alicante, 8 août 1597, *ibid* (6 naves ragusaines). Ensuite ces naves "q. llevan el tercio de Cesar de Eboli" sont envoyées au Ferrol (le prince Doria à Philippe II, Cadix, 21 août 1597, Simancas E° 179). Sur l'arrivée d'un convoi (2 navires venus d'Espagne à Calais, 40 navires annocés avec 4,000 Espagnols de D. Sancho de Leyva et peut-être argent): Frangipani à Aldobrandino, Bruxelles, 27 févr. 1598, *Corresp.*, II, p. 298-299.

176. Voyez dès 1593, les curieuses remarques de William Roger à "Burley" et à Essex (près de Louviers, 1er mai 1593, A. N., K 1589) ou mieux encore sur les aides d'argent d'Italie à la Hollande et à Henri IV, J. B. de Tassis à Philippe II, Landrecies, 26 janv. 1593, A. N., K 1587, Annotation de Philippe II.

177. R. GALLUZZI, *op. cit.*, V, p. 302, Berthold ZELLER, *Henri IV et Marie de Médicis*, Paris, 1877, p. 17.

178. A propos de mon travail manuscrit (1922), sur *La Paix de Vervins*, rédigé sous sa direction.

179. Sur l'affaire de Ferrare: I° de Mendoza à Philippe II, Venise, 3 janv. 1598, A. N., K 1676 (l'excommunication de D. Cesare). Lo platicado y

resuelto en materia de Ferrara en consejo de Estado..., 7 janv. 1598, que Cesare d'Este se soumette, Simancas E° 1283. I° de Mendoza à Philippe II, Venise, 10 janv. 1598, A. N., K 1676. Accordi fatti tra la Santa Seda Apostolica et D. Cesare d'Este, 13 janv. 1598, *ibid.* I° de Mendoza à Philippe II. Venise, 24 janv. 1598, A. N., K 1676: le même au même, 31 janv. 1598. *ibid.*

180. 25 sept. 1597, *Corresp.*, II, p. 229.

181. Ratification par le roi de France de la paix de Vervins, Paris, 5 juin 1597, A. N., K 1602.

182. Le problème esquissé à larges traits par Pierre CHAUNU, "Sur le front de l'histoire des prix au XVI^e siècle: de la mercuriale de Paris au port d'Anvers", *in: Annales E. S. C.* 1961.

183.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124.

184. Avis espagnol du 5 janv. 1591, A. N., K 1675. De multiples détails sur ces interventions qui, je le pense, peuvent être laissées dans l'ombre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629 et *sq*).

185. Voir note précédente.

186. J. de Segni de Menorca à Philippe II, Constantinople, 7 janv. 1591, A. N., K 1675.

187. 7 janv., 19 janv. 1591, *ibid.* De Constantinople, 19 janv. 1591, *ibid.* Le sultan au roi de France, lettre interceptée, copie ital., janv. 1591, *ibid.*; de même le sultan à la reine d'Angleterre, *ibid.*

188. Note précédente.

189. Avis du Levant transmis par l'ambassadeur de Venise, A. N., K 1675.

190. Avis de Const., 16 févr. 1591, A. N., K 1675.

191. F^co de Vera à S. M., Venise, 2 mars 1591, A. N., K 1675.

192. Le même au même, Venise, 16 mars 1591, *ibid.*; avis de Const., 16 mars 1591, transmis par l'ambassadeur impérial, *ibid.*

193. F^co de Vera à S. M., Venise, 30 mars 1591, A. N., K 1675.

194. Le même au même, Venise, 4 mai 1591, A. N., K 1675.

195. 11 mai, *ibid.*

196. *Ibid.*

197. Constantinople, 2 mars 1591, A. N., K 1675.

198. F^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 Venise, 17 avr. 1591, A. N., K 1675.

199. Const. ,12 juin 1591, *ibid*.

200. Const. ,15 juin 1591, *ibid*.

201. *Op. cit.* ,II, p. 785.

202. J. W. ZINKEISEN, *op. cit.* ,III, p. 623.

203. Voir notes 2 et 3, p. 503.

204. Venise, 8 juin 1591, A. N. ,K 1675.

205. Sa lettre citée déjà note 1, ci-dessus. Son nom Castelie avec ligature sur l'i d'après ma lecture qui n'a pu être vérifiée.

206. Je suis ici, non le texte de Const. ,mais le résumé de la chancellerie au dos de la lettre.

207. ... *Que venga con dineros*.

208. Naples, 15 févr. 1592, Simancas E° 1093, f° 8.

209. Miranda à Philippe II, Naples, 8 sept. 1592, *ibid*. ,f° 79.

210. Le même au même, Naples, 25 oct. 1592, *ibid*. ,f° 91.

211. Le même au même, Naples, 16 nov. 1592, *ibid*. ,f° 93.

212. F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 Venise, 29 juin 1591, A. N. ,K 1675.

213. Pietro GIANNONE, *Istoria civile del Regno di Napoli*, La Haye, 1753, t. IV, p. 283, 1593 et non 1595 comme l'indique A. BALLESTEROS Y BARETTA, *op. cit.* ,cf. page suivante, note 7.

214. Voir note 7, page suivante.

215. *Les aventures du capitan A. de Contreras*, trad. et édition par Jacques BOULENGER, *op. cit.* ,p. 14.

216. 21 sept. 1599,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t. IX, p. 406.

217. F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 Venise, 6 août 1594, Simancas E° 1345 et 20 août ,*ibid*.

218. Carlo d'Avalos à Philippe II, Otrante, 25 août 1594, Simancas E° 1094, f° 89.

219. Olivarès à Philippe II, Palerme, 8 sept. 1594, Simancas E° 1138. C'est alors qu'il faut placer l'incendie de Reggio et le pillage de quelques navires au large de Messine, Carlo Cigala au comte d'Olivarès, Chio, 3 nov. 1594, Simancas E° 1158 et des indications rétrospectives, 15 janvier 1597, Simancas E° 1223, G. MECATTI, *op. cit.* ,II, p. 789-790.

220. Miranda à Philippe II, Naples, 9 sept. 1594, Simancas E° 1094, f° 99.

221. Olivarès à Philippe II, Palerme, 15 sept. 1594, Simancas E° 1158.

222. Miranda à Philippe II, Naples, 11 oct. 1594, Simancas E° 1094, f° 110.

223. F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 Venise, 19 août 1595, Simancas E° 1346.

224. Miranda à Philippe II, Naples, 19 août 1595, Simancas E° 1094, f° 181.

225. Le même au même, Naples, 24 août 1595, Simancas E° 1094, f° 170.

226. Je signale les affirmations de A. BALLESTEROS y BARETTA, *op. cit.*, IV, 1, p. 169 sur le pillage et le sac de Reggio par Cigala en 1595 et celui de Patras, en représailles, par les Espagnols, dont je n'ai pas trouvé mention dans les papiers que j'ai consultés. Cette affirmation étant donnée sans preuves, je ne puis me prononcer à son sujet. Voir note 9, page précédente.

227. V. LAMANSKY, *op. cit.*, pp. 493-500.

228. Qui vient d'arriver à Navarin. Olivarès à Philippe II, Naples, 24 sept. 1596, Simancas E° 1094, f° 258.

229. J. A. Doria à Philippe II, Messine, 8 août 1596, Simancas E° 1346.

230. Le même au même, Messine, 13 août 1596, *ibid.*

231. Olivarès à S. M., Naples, 24 sept. 1596, Simancas E° 1094, f° 258.

232. *Ibid.*

233. Iñigo de Mendoza à S. M., Venise, 7 déc. 1596, A. N., K 1676.

234. Le même au même, Venise, 5 avril 1597, A. N., K 1676.

235. Le même au même, Venise, 14 juin et 5 juil. 1597, *ibid.*

236. Le même au même, Venise, 2 août 1597, *ibid.*

237. 9 août 1597, *ibid.*

238. 18 oct. 1597, *ibid.*

239. Lettres des 14 févr. 1598, 14 avril, 4 juil., 18 juil., 8 août, sur les évolutions de Cigala, *ibid.*

240. Venise 29 août 1598, *ibid.*

241. Lettres du 12 sept. 1598, *ibid.*

242. 30 sept. 1598, *ibid.*

243. Maqueda à Philippe II, Messine, 28 sept. 1598, Simancas E° 1158.

244. J. von HAMMER, *op. cit.*, VII, p. 362 et note 2.

245. I. de Mendoza à Philippe III, Venise 19 août 1600, A. N., K 1677.

246. Archiduc Albert à Juan Carillo, Bruxelles, 14 sept. 1600, *Aff. des Pays-Bas*, t. VI, p. 33. Henri IV à Rochepot, Grenoble, 26 sept. 1600, *Lettres inédites du roi Henri IV à M. de Villiers*, p. p. Eugène HALPHEN, Paris, 1857, P. 46.

247. Henri IV à Villiers, 27 févr. 1601, *ibid.*, p. 12-13.

248. J. B[e] de Tassis à Philippe III, Paris, 5 mars 1601, A. N., K 1677.

249. Fco de Vera à S. M., Venise, 31 mars 1601, *ibid.*

250. Le même au comte de Fuentès, Venise, 14 avril 1601, *ibid.*

251. Ou Coresi, F[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I, Venise, 21 avril 1601, *ibid.*; partira de Venise le 2 mai (le même au même, 5 mai, *ibid.*).

252. Le même au même, 14 avril 1601, *ibid.*

253. 24 avril 1601, *Lettres inédites du roi Henri IV à M. de Villiers*, *op. cit.*, p. 19.

254. *Ibid.*, p. 29.

255. F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I, Venise, 5 mai 1601, A. N., K 1677.

256. Henri IV à Villiers, 16 mai 1601, *Lettres... du roi Henri IV...*, *op. cit.*, p. 26.

257. Const., 17 et 18 juin 1601, A. N., K 1677.

258. A Villiers, *Lettres... du roi Henri IV...*, *op. cit.*, p. 36.

259. Const., 2 et 3 juillet 1601, A. N., K 1677.

260. A Rochepot, *Lettres... du roi Henri IV...*, *op. cit.*, p. 98.

261. Fco de Vera à Philippe III, Venise 28 mai 1601, A. N., K 1677, Henri IV à Villiers, 3 sept. 1601, *Lettres...*, *op. cit.*, p. 44-45.

262. Sessa à Philippe III, Rome, 17 août 1601, A. N., K 1630.

263. Const. 26 et 27 août 1601, A. N., K 1677.

264. Const. 8 et 9 sept. 1601, *ibid.*

265. A. d'AUBIGNÉ, *op. cit.*, IX, p. 401 et *sq.*

266. Henri IV à Villiers, Fontainebleau, 27 sept. 1601, *Lettres... op. cit.*, p. 48.

267. Sessa à Philippe III, Rome, 6 oct. 1601, A. N., K 1630.

268. La source narrative la plus détaillée est celle du P. de SEPULVEDA, *Sucesos del Reinado de Felipe II*, p. p. J. ZARCO, *Ciudad de Dios*, CXI à CXIX. *Historia de varios sucesos y de las cosas* (éd. Madrid, 1924). Parmi les récits, d'historiens contemporains, Jean CASSOU, *La vie de Philippe II*, Paris, 1929, p. 219 et *sq.* et Louis BERTRAND, *Philippe II à*

l'Escorial, Paris, 1929, chap. VII, "Comment meurt un roi", p. 228 et *sq*.

269. La présence de Joan de Segni de Menorca à Const. nous est encore signalée par une de ses lettres à Philippe II, 3 nov. 1597, A. N. ,K 1676. A la veille de la Guerre de Trente Ans, tentative des Impériaux pour libérer l'Espagne définitivement de cette charge ou mieux de ces menaces, action à propos du baron Mollart. En 1623, la négociation entre les mains de Giovanni Battista Montalbano, le projet d'une paix perpétuelle avec les Turcs et d'un détournement des épices par le Proche Orient, avec l'aide même des Polonais. Cf. H. WÄTJEN, *Die Niederländer*... *op. cit.* ,p. 67-69.

270. Jean CASSOU, *op. cit.* ,p. 228.

结　论

本书流传于世，遭到非难，被人引用，受到批评（极少），得到赞扬（太多），已经快20年了。20年来，我经常有机会补充它的解释，维护它的观点，思考它已经确定下来的构思，改正它的错误。最近，我认真重读了这本书，为它的再版进行准备。我对它进行了大量改动。但是，书是不依存于它的作者的，它有自己的生命。改进它，用注释、细节、地图、图片去补充它，修饰它，这是可能的；彻底改变它，则是不可能的。威尼斯常常发生这样的事：一艘在城外购买的船，无论它是达尔马提亚的船厂制造的，还是荷兰的船厂制造的，在城内由心灵手巧的木匠精心检修、补全后，人们还是一眼就可以认出它仍然是原来那艘船。

尽管本书的校阅者付出了长期的、艰苦的劳动对它进行修订，它的读者仍然可以不费力气在它的旧版中认出它来。它的结论、它的信息、它的意义，仍然同过去一样。它是对大量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结果。这些文献资料来自处于近代的开始时期的那些情况不明的年代里的广阔的地中海舞台的每个角落。其次，本书是一个编写总体历史的尝试。它的写法是：把历史事实按照三种具有连续性的记载来写，或者说按照三种不同的“楼梯平台”来写。我更愿意说是按照三种不同的时间计量单位来写。这样写的目的在于抓住过去所有不同的、彼此之间有最大差别的节奏；在于提出它们的共存、互扰、矛盾以及多种深广丰富的内容。在我

的意愿中，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但是，它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缺点：它的各个声部常常互相遮掩覆盖。在所有这些声部中，没有一种能够永远使自己作为独唱被人承认、接受并把伴奏拒之千里之外。那么，怎样才能在同一个时间内像通过一个透明层那样，看见被现实重叠起来的各种不同的历史呢？我把某些语句和某些解释当作一再出现在本书的三个部分里的主旋律和这三个部分的共同的、熟悉的曲调来使用。我试着用这种方法来给人一个关于上述情况的印象。但是，困难在于：不是只有两种或者三种对时间的计量，而是有几十种对时间的计量。它们之中的每一种又牵连、包含某种特殊的历史。只有被人类的科学汇集在一起的这些对时间的计量的总和，才能构成人们很难恢复其整个丰富纷繁的图像的总体历史。

1.

没有人责备我把作为本书的开场白的十分广泛的关于地理的论述并入这部历史著作内。这种论述好像是超于时间之外构思出来的。它的图景和真实事物不断从这部巨著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显露出来。地中海作为一个单位，有具有创造力的空间，有惊人的经由海路的来往自由（正如欧内斯特·拉布鲁斯所说的自动进行的自由贸易），有各个彼此既不同又相似的地区，有产生于社会的发展演变运动的城市，有互相取长补短的各种居民，有与生俱来的敌意，它是一个被人不断修改的，但也是根据一项必须遵行的计划进行修改的作品。它并不慷慨大度，而且还往往野蛮残忍，把长期持

续的敌意、限制和障碍强加于人。一切文明都意味着建设、困难和斗争。地中海的各种文明同成千上万个经常看得见的障碍进行过斗争。这些文明利用了有时粗糙的和很不充足的人的资源。这些文明不断盲目地同紧紧夹住这个内海的几个大陆的巨大地块进行斗争，甚至还必须同浩瀚无边的印度洋和大西洋进行斗争。

因此，我根据地理观察的框架和脉络仔细寻找了地中海历史上的局部的、持久的、不变的、重复的事物，即"具有规律性的事物"。这些并不是人类古代的生活的所有的结构或者单调不变、千篇一律的具有规律性的事物，而是它们之中最重要的、涉及每天的生活的事物。这些具有规律性的事物，是我这部著作的参考图、它优先采用的成分、它最生动的图像。可以很容易用这些事物来补充史料图册。它们作为无时间性的事物存在于现代生活中，人们可以在旅行中，在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让·季奥诺、卡洛·莱维、劳伦斯·杜雷尔、安德烈·尚松等人的著作中遇到。对所有曾经在某一天遇见过"内海"的西方作家来说，"内海"是作为一个历史问题，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作为一个"长期的"问题出现的。我同奥迪西奥和杜雷尔一样，认为古代本身就存在于今天的地中海的沿岸地区。在罗得岛和塞浦路斯，"你如果注意观看在被烟熏黑的店名'龙'的酒店里打牌的渔民，你就可以想象出真正的尤利西斯是什么模样了。"我同卡洛·莱维一样，认为作为他那部精采的小说《基督在埃博利停下》的真正的主题的偏僻的荒野，把人带回了蒙昧时代。埃博利（鲁伊·戈梅兹的亲王称号由此得来）位于萨莱诺附近的海岸上，道路从那里离开海岸径直通向深山。基督（即文明、公平和生活的甜美）从来没有到达过卢卡尼亚的崇山峻岭和加格利亚诺

村。这个村子蹲伏在“高岭土的悬崖绝壁之上”，蹲伏在寸草不生、光秃无树的斜坡上的凹地里。在那里，可怜的乡下人像往常一样，受到现代新的享有特权者管辖和支配。这些享有特权者是：药剂师、医生、小学教师。他们全都是农民避开、惧怕和用转弯抹角的办法对付的人……族间仇杀、抢劫、原始的经济和工具，仍然在他们那里流行。一个移民可以带着大量国外时新的玩意儿、奇妙灵巧的工具从美洲回到他那几乎荒无人烟的村庄。但是，他却永远无法改变这个古老的、与世隔绝的世界的任何事物。我不相信人们能够在不具有地理学家（旅行家或者小说家）的眼睛的情况下，看清地中海的深奥莫测的面貌的真正轮廓和它那令人难以忍受的现实事物。

2.

我们从事的第二项工作——发现和指明16世纪的地中海的集体命运和它的在完整的意义上的“社会”历史——从一开始起直到结束为止，都始终使我们面临地中海的物质生活的恶化这个狡诈的、复杂的、无法解决的问题。用过去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遇到土耳其、伊斯兰国家、意大利和伊比利亚等的主导地位的多重的和连锁的衰落；或者用今天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遇到地中海的产生动力的部类（公共财政、投资、工业、航运）的运转中断和发生故障。一些受过或者没有受过德意志思想培育的历史学家，往往坚持认为有一种自在的衰落的过程。罗马世界的命运已经为这个过

程提供了一个完全的例证。最近的坚持这种看法的人或许就是奥特马尔·斯潘和他那个普遍主义学派的弟子埃里克·韦伯。[1]对埃里克·韦伯来说，在所有的规律中，有这样一条规律：一切下降（Verfall）都会由同一时期出现的上升（Aufstieg）加以补偿，仿佛人类的共同生活毫无所失一样。汤因比和施本格勒提出同样僵硬死板的论点。我反对这些过分简单的看法和这些论点所包含的范围广泛的解释。真的可以很容易把地中海的命运的例子列入这些图解分类中的哪一类呢？毫无疑问，并不存在某种衰落的典型。对每种特殊情况来说，典型必须从基础的结构出发来重新建立。

不管人们赋予衰落这个意义模糊不清的词以什么内容，地中海并不是一个广泛的、不可逆转的和过早发生的倒退的过程的容易忍受的、逆来顺受的受害者。我在1949年说过，在我看来，衰落在1620年以前并不明显。今天我乐意说，衰落在1650年以前并不明显。当然，我对这一点并不完全有把握。不管怎样，最近十年出版的三本最精彩的关于地中海地区的命运的著作：勒内·巴厄雷尔的关于普罗旺斯的著作、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的关于朗格多克的著作和皮埃尔·维拉尔的关于加泰罗尼亚的著作，都没有反驳我原来的观点。我认为，要重新构筑在标志地中海的主导地位的终结的广泛中断之后的整个地中海的新全景，就必须选择一个迟晚的日期：1650年甚至1680年。

随着地方性的研究将使人能够获得更高度的精确性和严密性，我也必须进行这些计算方面的尝试、这些估算和这些我投入其中的重大的调查研究。这些工作使我比我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很不完全的尝试所显示的更加接近主要关切发展问题和国民会计问

题的经济学家(在我国是弗朗索瓦·佩鲁、让·富拉斯蒂埃和让·马尔切夫斯基等人)的思想。我们顺着这条道路前进,这个情况就会变得惊人地明显:16世纪的地中海首先是农民、佃农、地主的世界;收获庄稼的劳动和收获的庄稼是这个世界的极其重要的事物;其他东西都是上层建筑,是积累的结果,是过度向城市转移的结果。首先是农民和谷物,换句话说,首先是人的粮食和人的数量。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命运的无声的规律。目前也好,长远也好,农业生活都起着主导的、支配的作用。它经受得住人口增加的重压和城市的那种令人眼花缭乱得再也看不见别的任何事物的豪华奢侈吗?这是每天、每个世纪的关键问题。相比之下,其他问题都不值一提了。

例如在16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在意大利发生了一项大规模的有利于农村的投资活动。我对把这件事看成是过早的衰落的迹象犹豫不决。说得确切些,这是一种健康的反应。一种宝贵的平衡就这样在意大利保存下来了。不言而喻,这是物质的平衡,因为在社会方面,大规模的私有田产的发展把它的灾害和长期的束缚强加于各个地方。卡斯蒂利亚的情况也是这样。[2]历史学家今天告诉我们物质平衡在那里延续到17世纪中叶。这就改变了我们以前的看法。过去我曾经认为,1580年前后那些年月的短期尖锐的危机来源于西班牙帝国重新转向葡萄牙和大西洋这个事实。看来这是个"庄重的"解释。菲利普·鲁伊斯·马丁[3]最近指出,这首先只不过是在这个世纪的80年代伊比利亚国家发生的巨大谷物危机引起的一个过程而已。因此,根据欧内斯特·拉布鲁斯的描述,这大体上是"旧制度的危机"。

简而言之,即使在对危机的短期形势性的历史进行的调查研

究中，也必须经常说，首先是结构，是缓慢的历史；也必须指望结构史学来提供答案。一切事物，例如城市（1949年城市曾经使我眼花缭乱，那时首先是文明）的成果业绩，还有短期形势的历史现象，都应该同这个基本的水平面进行比较，用它来进行量度。有时候我们倾向于过快地对这种短期形势历史进行解释，似乎它在它有时很短暂的发展演变运动中搅动了一切，似乎轮到它自己时，它本身并没有受到别的事物支配。其实，一部新经济史正有待以生命所面临的永不停息的发展演变运动和静止的事物作为出发点逐步创立。众所周知，最引起轰动的事物，并不是最重要的事物。

不管怎样，地中海的生命的光辉灿烂的事物并不是随着1590年前后几年发生的百年趋势的逆转，并不是随着1619—1621年的短期危机的剧烈震荡宣告结束的。在掌握更多的情况以前，我也不相信北欧和南欧之间“传统的”形势的灾难性的差距。这种差距如果存在的话，就会既是地中海繁荣的掘墓人，也是北欧人的霸权的缔造者。上述关于差距的说法，是一种一箭双雕的解释和加倍简便的解释。但是，我要求仔细观察。

把历史分为快速发展的和慢速发展的两类，分为形势的和结构的两类。这种分法仍然是一场远未结束的争论的核心问题。我们将这些发展演变运动分类，就必须对这些发展演变运动进行互相比较。在这之前，我们并不确知是这一些发展演变运动支配了那一些发展演变运动或者相反。辨识这些发展演变运动、加以分类、进行比较，这是我们首要关心的问题和首要的任务。可惜还不可能跟踪16世纪和17世纪的“国民收入”的总的变化。但是，正如吉尔斯·卡斯特[4]、卡洛·奇波拉和朱塞佩·阿莱阿蒂等人[5]曾经做过的那样，

我们现在能够对城市的形势重新进行研究。前者对图卢兹，后两人对帕维亚做了这种工作。城市在它的纷繁复杂的生活中记录了一种更加真实的形势。这种形势至少同物价和工资惯常的曲线同样真实。

最后，问题是要使互相矛盾的年表协调一致起来。例如由于经济气候时好时坏，具有自己的意志和愿望的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各个国家和各种文明在怎样游移不定呢？关于国家，我提出这一点：困难的时代有利于它们相对的发展。对文明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吗？文明的灿烂光辉往往出现得不适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最后一批花朵是在城市国家的秋天，甚至冬天（在威尼斯和博洛尼亚）开放的。强大的帝国文明是在海洋的各个庞大帝国即伊斯坦布尔帝国、罗马帝国、马德里帝国的秋天展现出来的。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这些光辉的影子在巨大的政治躯体50年前曾经生存过的地方浮动。

3.

在这些问题的范围内，事件和个人的作用缩小了。这只是一个观点问题。但是，我们的观点正确吗？就事件而论，“我们给予历史事件的正式上演以首要地位。这种演出很少改变景物，几乎根本没有改变结构”。这是一个当代小说家、非常喜爱地中海的人劳伦斯·杜雷尔的想法。不错，是这样。但是，正如一些历史学家和一些哲学家问过我的那样，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距离观察历史，人会变成什么呢？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他的行动的自由会变成什么呢？此外，

还正如一位哲学家——弗朗索瓦·巴斯蒂德——曾经反对我的那样，既然整个历史是一种展开、实施和渐进，人们难道不能够说百年趋势也是一种“事件”吗？毫无疑问，可以这样说。但是，我步保尔·拉孔布和弗朗索瓦·西米昂的后尘，在历史生活的这个海洋里，在“事件”的名称下，我单独放在一边的事物是短暂的、感人的事件，特别是传统历史的“值得注意的事实”。

我不能因此而坚持说，这粒发光的尘埃，这个光亮的表面毫无价值可言；或者坚持说，总体历史的重建，不能以这个微观历史作为出发点。这种微观历史使我联想到（我相信它错误地使我联想到）微观社会学在学术界并非名声狼藉。不错，微观社会学由经常不断重复的事物构成，而叙述事件的微观历史却由异常的、突出的、非典型的事物构成，的确是一系列“社会戏剧”。但是，贝内德托·克罗齐不无道理地坚持说过，任何一起单一的事件——让我举亨利四世1610年被暗杀事件或者以完全越出本书所谈的历史时期的费里政府1883年掌权事件为例——都包含着在胚胎中的人类的整个历史。人类的历史是一张乐谱。这些单个的音符在它上面显现出来。

谈完这一点，我承认，由于我不是哲学家，我并不很想详尽地论述这样多已经向我提出的并且还将继续向我提出的关于事件的意义或者关于人类的自由的问题。必须统一对自由这个有多重意义、在各个世纪其含义从来没有相同过的词的看法，必须至少分清团体自由和个人自由。1966年，法国这个团体的自由是什么？1571年，西班牙作为一个整体它的自由确切地说是什么？菲利普二世的自由是什么？同他率领的舰船、同盟者和士兵一道在茫茫大海上迷

失航向的奥地利的唐·胡安的自由又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是一个狭窄的岛屿,几乎是一座监狱……

指出行动范围的狭窄有限性,就是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吗?我认为不是这样。不会因为让你在只打两下或者三下之间进行选择,问题就不继续提出:你能够还是不能够打这几下?你能够还是不能够有效地打这几下?你能够还是不能够明白这几下(而且仅仅这几下)是你力所能及的?我将作出这样不合情理的结论:伟大的实干家是有自知之明的、能够准确地量度自己的能力的狭窄有限性的人,是选择把自己保持在这个狭窄有限的范围之内,甚至利用不可避免的事物的重量以便把它加到自己的推力中去的人。任何反对历史的主流——这种主流并不总是明显的——的努力都是预先注定要失败的。

因此,当我想到个人的时候,我总是很想看见他被囚禁在他自己勉强制造出来的命运里,被囚禁在一幅在他的前后构成了"长期"的无限的远景的风景画中。在我看来,在历史的分析解释中,最后终于取得胜利的总是长节拍。这样说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统统由我来承担。这种长节拍否定大量事件,否定所有那些它不能卷进它自己的水流中的并且被它无情地排开的事件。它当然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偶然性的作用。论气质,我是"结构主义者",我很少受到事件的激励和推促,只是一半受到形势——这种具有同一标志的多起事件的组群——的激励和推动。但是,历史学家的"结构主义"与在同一名称之下烦扰人类的其他科学[6]的提问法风马牛不相及。它不是把人引向表现为函数的关系的数学抽象,而是引向生命的根源,引向生命所具有的最具体的、最日常的、最坚不可摧的、最不具

名的和最人道的事物。

1965年6月26日

本部分原注

1. *Beiträge zum Problem des Wirtschaftverfalles*, 1934.

2. Travail en cours.

3. Felipe RUIZ MARTIN, in: *Anales de Economia*, *segunda época*, juillet-septembre 1964, p. 685-6.

4. *Op. cit.*, p. 382 et *sq*.

5. 《Il trend economico nello stato di Milano durante i secoli XVI et XVII. Il caso di Pavia》*in*: *Bollettino della Società Pavese di Storia Patria*, 1950.

6. Cf. Jean VIET, *Les méthodes structuralistes dans les sciences sociales*, 1965.

附　　录

一、本书脚注缩写汉译

1. A.C.　Archives Communales.　市镇档案馆
2. A.Dép.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省档案馆
3. A.d.S.　Archivio di Stato.　国家档案馆
4. A.E.　Affaires Étrangères, Paris.　外交部，巴黎
5. A.H.N.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Madrid.　国立历史档案馆，马德里
6. A.N.K.　Archives Nationales, Paris, Série K.　国立档案馆，巴黎，系列 K
7. B.M.　British Museum, Londres.　不列颠博物馆，伦敦
8. B.N,F.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lorence)　国立图书馆（佛罗伦萨）
   B.N, M.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adrid)　国立图书馆（马德里）
   B.N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国立图书馆（巴黎）
9. G.G.A　Ex-Gouvernement Générale de l'Algérie　前阿尔及利亚总督府
10. P.R.O.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res　档案局，伦敦
11. Sim.　Simancas　锡曼卡斯
12. Sim. E°　Simancas, Série Estato　锡曼卡斯，国家系列

二、参考书目

Accarias de Sérionne (Jacques), *La richesse de la Hollande*, Londres, 1778, 2 vol.

Achard (Paul), *La vie extraordinaire des frères Barberousse, corsaires et rois d'Alger*, Paris, 1939.

***Acta Tomiciana epistolarum Sigismundi regis Poloniæ*, Poznan (vol. 15 : Wroclaw), 1852-1957, 15 vol.**

***Actas de las Córtes de Castilla, 1563-1623*, Madrid, 1861-1915, 39 vol.**

Albani (Dina), *Indagine preventiva sulle recenti variazioni della linea di spiaggia delle coste italiane*, Rome, 1933.

Albèri (Eugenio), *Relazioni degli ambasciatori veneti durante il secolo XVI*, Florence, 1839-1863, 15 vol.

Alberti (T.), *Viaggio a Costantinopoli*, p.p. A. Bacchi della Lega, Bologne, 1889.

Albitreccia (L.), *La Corse dans l'Histoire*, Lyon-Paris, 1939.

Alcocer y Martínez (Mariano), *Consultas del Consejo de Estado*, Collection « Archivo Histórico Español », Valladolid, 1930.

***Castillos y Fortalezas del antiguo Reino de Granada*, Tanger, 1941.**

Aleati (Giuseppe), *La popolazione di Pavia durante il dominio spagnolo*, Milan, 1957.

Alemán (Mateo), *De la vida del picaro Guzmán de Alfarache*, Milan, 1615, 2 vol.

Allen (W. E. D.), *Problems of Turkish Powe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res, 1963.

Almanacco di economia di Toscana dell'anno 1791, Florence, 1791.

Almeida (Fortunato de), *Historia de Portugal*, Coïmbre, 1926-1929, 3 vol.

Almeida d'Eça (Vincente), *Normas economicas na colonizacão portuguesa*, Lisbonne, 1921.

Amadei (Federigo), *Il Fioretto delle croniche di Mantova*, Mantoue, 1741.

Amari (Michele), *Storia dei Musulmani di Sicilia*, Florence, 1864-1868, 3 vol.

Ammann (Hektor), *Schaffhauser Wirtschaft im Mittelalter*, Thayngen, 1949.

Ancel (J.), *Peuples et Nations des Balkans*, Paris, 1926.

Andrada (F. de), *O primeiro cerco que os Turcos puzerão na fortaleza de Dio, nas partes de India*, Coïmbre, 1589.

Angelescu (I. N.), *Histoire économique des Roumains*, Genève, I, 1919.

Anquez (Léonce), *Henri IV et l'Allemagne*, Paris, 1887.

Aramon (G. d'), voir Chesneau (Jean).

Arantegui y Sanz (José), *Apuntes históricos sobre la artilleria española en los siglos XIV y XV*, Madrid, 1887.

Arbos (Philippe), *L'Auvergne*, Paris, 1932.

Arco y Fortuño (Ricardo del), *La idea del imperio en la politica y la literatura españolas*, Madrid, 1944.

Argenti (Philip P.), *Chius vincta*; *or, The occupation of Chios by the Turks (1566) and their administration of the island (1566-1912) described in contemporary reports and official despatches*, Cambridge, 1941.

Armstrong (H. C.), *Grey Wolf, Mustafa Kemal : an intimate study of a dictator*, Londres, 1933 ; trad. franç. : *Mustapha Kémal*, Paris, 1933.

Arqué (Paul), *Géographie des Pyrénées françaises*, Paris, 1943.

Arrigo (A.), *Ricerche sul regime dei littorali nel Mediterraneo*, Rome, 1936.

Arsandaux (H.), voir Rivet (P.) et Arsandaux (H.).

Arvieux (Chevalier d'), *Mémoires du Chevalier d'Arvieux*, Paris, 1735, 6 vol.

Ashauer (H.) et Hollister (J. S.), *Ostpyrenäen und Balearen*, Berlin, 1934, coll. « Beiträge zur Geologie der westlichen Mediterrangebiete », n° 11.

Aspetti e cause della decadenza economica veneziana nel secolo XVII, Venise-Rome, 1961.

Assézat (J.), voir Du Fail (Noël).

Asso (Ignacio de), *Historia de la economia politica de Aragón*, Saragosse, 1798 (rééd. de 1947).

Atkinson (G.), *Les nouveaux horizons de la Renaissance française*, Paris, 1935.

Atti del convegno per la conservazione e difesa delle laguna e della città di Venezia (Istituto Veneto), Venise, 1960.

Aubenas (Roger), *Chartes de franchise et actes d'habitation*, Cannes, 1943.

Aubespine (Sébastien de l'), *Négociations... relatives au règne de François II*, p.p. L. Paris, Paris, 1841.

Aubigné (Théodore Agrippa d'), *Histoire Universelle*, éd. pour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par le baron Alphonse de Ruble, Paris, 1886-1897, 9 vol.

Aubin (G.) et Kunze (A.), *Leinenerzeugung und Leinenabsatz im östlichen Mitteldeutschland zur Zeit der Zunftkäufe. Ein Beitrag zur industriellen Kolonisation des deutschen Ostens*, Stuttgart, 1940.

Audisio (Gabriel), I : *Jeunesse de la Méditerranée* ; II : *Le sel de la mer*, Paris, 1935-1936, 2 vol.

Aurigemma (S.), voir Bosio (Giacomo).

Auton (Jean d'), *Chroniques*, Paris, 1834-1835, 4 t. en 2 vol.

Auzanet (Jean), *La vie de Camõens*, Paris, 1942.

Avenel (Georges d'),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propriété, des salaires, des denrées et de tous les prix en général depuis l'an 1200 jusqu'à l'an 1800*, Paris, 1894-1898, 4 vol.

Avity (Pierre d'), voir Davity (Pierre).

Azevedo (Lucio de), voir Lucio de Azevedo (J.).

Babeau (Albert), *Les voyageurs en France depuis la Renaissance jusqu'à la Révolution*, Paris, 1885.

Babelon (Ernest), *Les origines de la monnaie considérées au point de vue économique et historique*, Paris, 1897.

Bacchi della Lega (A.), voir Alberti (T.).

Badaloni (Nicola), *La filosofia di Giordano Bruno*, Florence, 1955.

Baehrel (René), *Une croissance : la Basse-Provence rurale (fin du XVIe siècle-1789)*, Paris, 1961, 2 vol.

Balandier (Georges), *Afrique ambiguë*, Paris, 1957.

Balducci Pegolotti (Francesco), *Pratica della mercatura*, Lisbonne, 1765-1766, 4 vol.

Ballesteros y Beretta (A.), *Historia de España, y su influencia en la Historia Universal*, Barcelone, 1918-1940, 9 tomes en 10 vol.

Bandello (M.), *Novelle*, Londres, 1791-1793, 9 vol.

Baratier (Édouard), *La démographie provençale du XIIIe au XVIe siècle*, Paris, 1961.

Barbagallo (Corrado), *Storia universale*, Turin, 1930, 5 vol.

Bardon (Achille), *L'exploitation du bassin houiller d'Alais sous l'ancien régime*, Nîmes, 1898.

Barrau-Dihigo (L.), voir Joly (Barthélemy).

Barros (J. de), *Da Asia*, Venise, 1551.

Bartoli (Daniele), *Degli uomini e de' fatti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Turin, 1847.

Baruzi (Jean), *Problèmes d'histoire des religions*, Paris, 1935 (25 février 1936).

Baschiera (Luigi), voir Paruta (Andrea).

Bataillon (Marcel), *Érasme et l'Espagne*, Paris, 1937.

Batiffol (Louis), *La vie intime d'une reine de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Paris, 1931, 2 vol.

Baudrillart (Mgr Alfred), *Philippe V et la cour de France*, Paris, 1890-1901, 4 vol.

Bauer (Clemens), *Unternehmung und Unternehmungsformen im Spätmittelalter und in der beginnenden Neuzeit*, Iéna, 1936.

Baulant (Micheline), *Lettres de négociants marseillais ; les frères Hermite (1570-1612)*, Paris, 1953.

Baumann (Émile), *L'anneau d'or des grands Mystiques*, Paris, 1924.

Beatis (A. de), *Die Reise des Kardinals Luigi d'Aragona durch Deutschland, die Niederlande, Frankreich und Oberitalien, 1517-1518*, p. p. L. Pastor, Fribourg-en-Brisgau, 1905 ; traduit en français par Madeleine Havard de La Montagne sous le titre : *Voyage du Cardinal d'Aragon (1517-1518)*, Paris, 1913.

Beaujour (Baron Louis Auguste Frédéric de), *Tableau du Commerce de la Grèce, formé d'après une année moyenne depuis 1787 jusqu'en 1797*, Paris, 1800, 2 vol.

Bechtel (Heinrich),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 : Von der Vorzeit bis zum Ende des Mittelalters* ; II : *Vom Beginn des 16. bis zum Ende des 18. Jahrhunderts*, Munich, 1951-1952, 2 vol.

Beiträge zur Geologie der westlichen Mediterrangebiete, hrsg. im Auftrag der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 von Hans Stille, Berlin, 1927-1939, 19 vol.

Belda y Perez de Nueros (Fr.), *Felipe secundo*, Madrid, s.d. (1927).

Bellay (Martin et Guillaume du), voir Bourrilly (V. L.) et Vindry (F.).

Bellettini (Athos), *La popolazione di Bologna dal secolo XV all'unificazione italiana*, Bologne, 1961.

Beloch (Karl Julius),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Italiens*, Berlin, 1937-1961, 3 vol.

Belon (Pierre), *Les observations de plusieurs singularitez et choses mémorables trouvées en Grèce, Asie, Judée, Égypte, Arabie et autres pays estranges*, Paris, 1553.

Below (G. von), *Über historische Periodisierungen mit besonderem Blick auf die Grenze zwischen Mittelalter und Neuzeit*, Berlin, 1925.

Beltrami (Daniele), *Storia della popolazione di Venezia dalla fine del secolo XVI alla caduta della Repubblica*, Padoue, 1954.

Forze di lavoro e proprietà fondiaria nelle campagne venete dei secoli XVII e XVIII, Venise, Rome, 1961.

Benedetti (B.), *Intorno alle relazioni commerciali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e di Norimberga*, Venise, 1864.

Beneyto Pérez (Juan), *Los medios de cultura y la centralización bajo Felipe II*, Madrid, 1927.

Benichou (Paul), *Romances judeo-españoles de Marruecos*, Buenos Aires, 1946.

Benjamin de Tudela, *Voyage du célèbre Benjamin, autour du monde, commencé l'an MCLXXIII*, trad. par Pierre Bergeron, La Haye, 1735.

Bennassar (B.), *Valladolid au XVI^e siècle*, thèse en cours de publication.

Benndorf (Werner), *Das Mittelmeerbuch*, Leipzig, 1940.

Benoit (Fernand), *La Provence et le Comtat-Venaissin*, Paris, 1949.

Bérard (Victor), *La Turquie et l'hellénisme contemporain*, Paris, 1893.

Les navigations d'Ulysse ; II : *Pénélope et les Barons des Iles*, Paris, 1928.

Béraud-Villars (Jean), *L'Empire du Gaô. Un État soudanai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Paris, 1942.

Berchet (G.), *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e la Persia*, Turin, 1865.

Bercken (Erich von der), *Die Gemälde des Jacopo Tintoretto*, Munich, 1942.

Bergier (Jean-François), *Les foires de Genève et l'économie internationale de la Renaissance*, Paris, 1963.

Bermúdez de Pedraza (Francisco), *Historia eclesiástica de Granada*, Grenade, 1637.

Bernaldo de Quirós (C.), *Los reyes y la colonización interior de España desde el siglo XVI al XIX*, Madrid, 1929.

Bernard (Étienne), *Discours véritable de la réduction de la ville de Marseille*, Paris et Marseille, 1596.

Bernardo (L.), *Viaggio a Costantinopoli*, Venise, 1887.

Bertoquy (P.), voir Deffontaine (Pierre), Jean-Brunhes-Delamarre (Mariel), Bertoquy (P.).

Bertrand (Louis), *Sainte Thérèse*, Paris, 1927.

Philippe II à l'Escorial, Paris, 1929.

Beutin (Ludwig), *Der deutsche Seehandel im Mittelmeergebiet bis zu den Napoleonischen Kriegen*, Neumünster, 1933.

Bianchini (Lodovico), *Della storia economico-civile di Sicilia*, Naples, 1841.

Della storia delle finanze del Regno di Napoli, Naples, 1839.

Biaudet (Henry), *Le Saint-Siège et la Suède durant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Paris, 1906.

Bibl (Viktor), *Der Tod des Don Carlos*, Vienne et Leipzig, 1918.

Die Korrespondenz Maximilians II. Familienkorrespondenz, Vienne, 1916-1921, 2 vol.

Maximilian II., der rätselhafte Kaiser, Hellerau près Dresde, 1929.

Bihlmeyer (Karl) [vol. III : et Tüchle (Hermann)], *Kirchengeschichte*, 11^e à 13 éd., Paderborn, 1951-1956, 3 vol. ; trad. fr. : *Histoire de l'Église*, Mulhouse, 1962-1964, 3 vol.

Bilanci generali, seria seconda, Venise, 1912.

Billioud (Joseph) et Collier (Jacques-Raymond),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 t. III, Paris, 1951.

Binet (R. P. Etienne), *Essay des merveilles de nature et des plus nobles artifices*, 13^e éd., Paris, 1657.

Birot (Pierre) et Dresch (Jean),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yen-Orient*, Paris, 1953-1956, 2 vol.

Bisschop (Éric de), *Au delà des horizons lointains* ; I : *Kaimiloa. D'Honolulu à Cannes par l'Australie et le Cap à bord d'une double pirogue polynésienne*, Paris, 1939.

Blache (Jules), *L'Homme et la Montagne*, Paris, 1934.

Blanchard (Raoul), *Géographie de l'Europe*, Paris, 1936.

Blanchet (Léon), *Campanella*, Paris, 1920.

Bloch (Marc), *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Paris, 1931.

La Société féodale, Paris, 1940.

Blok (P. J.), *Relazioni veneziane*, La Haye, 1909.

Bodin (Jean), *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Paris, 1583.

La Response de Jean Bodin à M. de Malestroict, 1568, p.p. Henri Hauser, Paris, 1932.

Bog (I.), *Die bäuerliche Wirtschaft im Zeitalter des Dreissigjährigen Krieges. Die Bewegungsvorgänge in der Kriegswirtschaft nach den Quellen des Klosterverwalteramtes Heilsbronn*, Cobourg, 1952.

Bonnaffé (Edmond), *Les Arts et les mœurs d'autrefois. Voyages et voyageurs de la Renaissance*, Paris, 1895.

Bono (Salvatore), *I corsari barbareschi*, Turin, 1964.

Boppe (Léon), *Journal et Correspondance de Gédoyn « le Turc », consul de France à Alep*, Paris, 1909.

Borderie (Bertrand de La), voir La Borderie (Bertrand de).

Borel (Jean), *Gênes sous Napoléon Ier (1805-1814)*, 2e éd., Paris-Neuchâtel, 1929.

Borlandi (Franco), *Per la storia della popolazione della Corsica*, Milan, 1942.

Bory de Saint-Vincent (J. B.), *Guide du voyageur en Espagne*, Paris, 1823, 2 vol.

Bosio (Giacomo), *I cavalieri gerosolimitani a Tripoli negli anni 1530-1551*, p.p. S. Aurigemma, Intra, 1937.

Botero (Giovanni), *Relationi universali*, Brescia, 1599.

Bouché (Honoré), *La Chorographie ou description de Provence*, Aix-en-Provence, 1664, 2 vol.

Boué (Ami), *La Turquie d'Europe*, Paris, 1840, 4 vol.

Boulenger (Jacques), voir Contreras (Alonso de).

Bourcart (Jacques), *Nouvelles observations sur la structure des Dinarides adriatiques*, Madrid, 1929.

Bourgeois (Émile), *Manuel historique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 Paris, 1892-1926, 4 vol.

Bourget (Paul), *Sensations d'Italie*, Paris, 1891.

Bourgoing (Baron Jean-François), *Nouveau voyage en Espagne*, Paris, 1788, 3 vol.

Bourrilly (V.-L.) et Busquet (R.). *Histoire de la Provence*, Paris, 1944.

Bourrilly (V. L.) et Vindry (E.), *Mémoires de Martin et Guillaume du Bellay*, publ. pour la «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 Paris, 1908-1909, 4 vol.

Bowles (William),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naturelle et à la géographie physique de l'Espagne*, trad. de l'espagnol par le vicomte de Flavigny, Paris, 1776.

Boxer (C. 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nne, 1959.

Bozzo (S. V.), *Corrispondenza particolare di Carlo di Aragona... con S.M. il re Filippo II* (Documenti per servire alla storia di Sicilia, 1re série, vol. II), Palerme, 1879.

Bradi (Comte Joseph M. de), *Mémoire sur la Corse*, Orléans, 1819.

Bradi (Lorenzi de), *La Corse inconnue*, Paris, 1927.

Bragadino (A.), voir Stefani (Fr.).

Braganza Pereira (A. B. de), *Os Portugueses em Diu*, Bassora, 1938.

Brantôme (Pierre de Bourdeilles, abbé et seigneur de), *Œuvres complètes*, éd. Mérimée, Paris, 1858-1895, 13 vol.

Bratianu (G.), *Études byzantin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Paris, 1938.

Bratli (Charles), *Philippe II, roi d'Espagne. Étude sur sa vie et son caractère*, Paris, 1912.

Braudel (Fernand),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1re éd., Paris, 1949.

Capitalisme et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XVe-XVIIIe siècles, en cours de publication.

Braudel (F.) et Romano (R.), *Navires et marchandises à l'entrée du port de Livourne, 1547-1611*, Paris, 1951.

Bräunlich (Erich), *Zwei türkische Weltkarten aus dem Zeitalter der grossen Entdeckungen*, Leipzig, 1937.

Brémond (Gal Éd.), *Yémen et Saoudia*, Paris, 1937.

Berbères et Arabes, Paris, 1942.

Brémond d'Ars (Guy de), *Le père de Mme de Rambouillet, Jean de Vivonne, sa vie et ses ambassades près de Philippe II et à la cour de Rome*, Paris, 1884.

Brésard (M.), *Les foires de Lyon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Paris, 1914.

Bretholz (Berthold), *Lateinische Paläographie*, 2e éd., Munich, 1912.

Brèves (François Savary, seigneur de), *Relation des voyages de... tant en Grèce, Terre Saincte et Aegypte, qu'aux royaumes de Tunis et Arger*, Paris, 1628.

Brion (Marcel), *Laurent le Magnifique*, Paris, 1937.
Michel-Ange, Paris, 1939.

Brockelmann (C.), *Geschichte der islamischen Vôlker und Staaten*, Munich, 1939.

Brosses (Président Charles de), *Lettres familières écrites d'Italie en 1739 et 1740*, Paris, 1858, 2 vol.

Brückner (A.), *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Literatur*, Leipzig, 1905, 2e éd., 1909.

Brulez (W.), *De Firma della Faille en de internationale handel van Vlaamse firma's in de 16e eeuw*, Bruxelles, 1959.

Brun (A.), *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introduction du français dans les provinces du Midi*, Paris, 1923.

Brunetti (Mario), voir Vitale (Eligio) et Brunetti (Mario).

Brunhes (J.-B.), *Étude de géographie humaine. L'irrigation, ses conditions géographiques ses modes et son organisation dans la péninsule Ibérique et l'Afrique du Nord*, Paris, 1902
Voir aussi Deffontaines (Pierre), Jean-Brunhes-Delamarre (Mariel), Bertoquy (P.).

Brunner (O.), *Neue Wege der Sozialgeschichte.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Göttingen, 1955.

Brunschvig (Robert), *La Berbérie orientale sous les Hafsides, des origines à la fin du XVe siècle*, Paris, 1940, 2 vol.

Bubnoff (Serge von), *Geologie von Europa*, Berlin, 1926-1930, 2 vol.

Buchan (John), *Oliver Cromwell*, Londres, 1934.

Bugnon (Didier), *Relation exacte concernant les caravanes ou cortège des marchands d'Asie*, Nancy, 1707.

Bullón (Eloy), *Un colaborador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 el doctor Palacios Rubios y sus obras*, Madrid, 1927.

Burckhardt (J.), *Geschichte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Stuttgart, 1867 ; 6e éd., Esslingen, 1920.

Busbec (Baron Augier Ghislain de), *Lettres du Baron de Busbec*, p.p. l'abbé de Foy, Paris, 1748, 3 vol.

Busch-Zantner (R.), *Agrarverfassung, Gesellschaft und Siedlung in Südosteuropa. Unter bes. Berücksichtigung der Türkenzeit*, Leipzig, 1938.
Albanien. Neues Land im Imperium, Leipzig, 1939.

Busquet (Raoul), *Histoire de Marseille*, Paris, 1945.
Voir aussi Bourrilly (V.) et Busquet (R.).

Cabié (Edmond), *Ambassade en Espagne de Jean Ébrard, seigneur de Saint-Sulpice, de 1562 à 1565*, Albi, 1903.

Cabrera de Côrdova (L.), *Relaciones de las cosas sucedidas en la Corte de España desde 1599 hasta 1614*, Madrid, 1857.
Felipe segundo, Rey de Espa˜a, Madrid, 1876, 4 vol.

Cagnetta (Franco), *Bandits d'Orgosolo*, trad. de l'italien : *Inchiesta su Orgosolo*, par Michel Turlotte, Paris, 1963.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Series, East Indies, China and Japan, Londres, 1862-1892, 5 vol.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and Manuscripts relating to English Affairs existing in the archives and collections of Venice and in other libraries of Northern Italy, Londres, 1864-1947, 38 vol.

Calvete de Estrella (Juan Christôval), *El felicissimo viaje del... Principe don Felipe*, Anvers, 1552.

Campana (C.), *La vita del catholico... Filippo II*, Vicence, 1605-1609, 3 vol.

Canaye (Philippe), sieur de Fresne, *Le voyage du Levant, 1573*, p.p. Henri Hauser, Paris, 1897.

Cano (Thomé), *Arte para fabricar... naos de guerra y merchante...*, Séville, 1611.

Capasso (B.), *Catalogo ragionato dell'Archivio municipale di Napoli*, Naples, 1876.

Capasso (C.), *Paolo III*, Messine, 1924, 2 vol.

Capmany y de Montpalau (A. de), *Memorias históricas sobre la Marina, Comercio y Artes de la antigua ciudad de Barcelona*, Madrid, 1779-1792, 4 vol.

Cappelletti (Giuseppe),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dal suo principio al suo fine*, Venise, 1850-1855, 13 vol.

Caracciolo (Ferrante), *I commentarii delle guerre fatte co'Turchi da D. Giovanni d'Austria dopo che venne in Italia*, Florence, 1581.

Carande (Ramón), *Carlos V y sus banqueros*, Madrid, 1949.

Carcopino (Jérôme), *Le Maroc antique*, Paris, 1943.

Cardauns (Ludwig), *Von Nizza bis Crépy. Europäische Politik in den Jahren 1534-1544*, Rome, 1923.

Carmoly (Éliacin), *La France israélite, galerie des hommes et des faits dignes de mémoire*, Paris-Leipzig, 1855.

Caro Baroja (Julio), *Los Moriscos del Reino de Granada*, Madrid, 1957.
Los Judíos en la España moderna y contemporánea, Madrid, 1961.
La sociedad criptojudía en la Corte de Felipe IV (discours de réception à l'Academia de Historia), Madrid, 1963.

Carré (J. M.), voir Fromentin (Eugène).

Carrera Pujal (Jaime), *Historia política y económica de Cataluña*, Barcelone, 1946, 4 vol.

Carreras y Candi (Franceschi), *Geografia general de Catalunya*, Barcelone, s. d. 1913-1918, 6 vol.

Cartas y avisos dirijidos a D. J. de Zúñiga, virrey de Nápoles en 1581, Madrid, 1887, vol. XVIII de la Colección de libros españoles raros o curiosos.

Carus-Wilson (Eleanora), *Medieval Merchant Venturers*, Londres, 1954.

Casa (Giovanni della), voir Della Casa (Giovanni).

Casanova (Abbé S. B.), *Histoire de l'Église corse*, Ajaccio, 1931, 2 vol.

Cassou (Jean), *La vie de Philippe II*, Paris, 1929.
Les conquistadors, Paris, 1941.

Castaneda-Alcover (Vicente), voir Porcar (Moisé Juan).

Caster (Gilles), *Le commerce du pastel et de l'épicerie à Toulouse de 1450 environ à 1561*, Toulouse, 1962.

Castro (M. de), *Vida del soldado español Miguel de Castro*, Madrid-Buenos Aires, 1949.

Casti (Enrico), *L'Aquila degli Abruzzi ed il pontificato di Celestino V*, L'Aquila, 1894.

Cat (Édouard), *Mission bibliographique en Espagne*, Paris, 1891.

Catalina García (Juan) et Perez Villamil (Manuel), *Relaciones topográficas de Espana. Relaciones de pueblos que pertenecen hoy a la provincia de Guadalajara*, Madrid, 1905-1915, 7 vol. (t. XLI à XLVII du « Memorial Histórico Español »).

Catherine de Médicis, voir La Ferrière (Comte Hector de).

Cavaillès (Henri), *La vie pastorale et agricole dans les Pyrénées des Gaves, de l'Adour et des Nestes*, Bordeaux, 1931.

Caxa de Leruela (Miguel), *Restauración de la antigua abundancia de España*, Naples-Madrid, 1713.

Cecchetti (B.), *Informazione di Giovanni dall'Olmo console veneto in Lisbona sul commercio dei Veneziani in Portogallo e sui mezzi per ristorarlo, 1584, 18 maggio*, per nozze Thienesa, Schio, Venise, 1869.

Celli (Angelo), *The History of Malaria in the Roman Campagna from ancient times*, Londres, 1933.

Cellini (Benvenuto), *Vita di Benvenuto Cellini scritta da lui medesimo*, trad. française, Paris, 1922, 2 vol.

Cervantes (Miguel), *Novelas Ejemplares*, p.p. Francisco Rodríguez Marín, trad. franç., Paris, 1949.

Chabod (Federico), *Per la storia religiosa dello stato di Milano*, Bologne, 1938.

Champion (Maurice), *Les inondations en France depuis le VI*e *siècle jusqu'à nos jours*, Paris, 1858-1864, 6 vol.

Champion (Pierre), *Paris sous les derniers Valois, au temps des guerres de religion. Fin du règne de Henri II. Régence de Catherine de Médicis. Charles IX*, Paris, 1938.

Chardin (Jean), *Journal du Voyage en Perse et autres lieux de l'Orient*, Amsterdam, 1735, 4 vol.

Charles IX, voir Douais (Célestin).

Charles Quint, voir Lanz (Carl).

Charles-Quint et son temps, Paris, 1959.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N.R.S., Sciences humaines, Paris, 30 septembre-3 octobre 1958.)

Charliat (P. J.), *Trois siècles d'économie maritime française*, Paris, 1931.

Charrière (Ernest), *Négociations de la France dans le Levant*, « Collection de documents inédit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 1re série, Paris, 1840-1860, 4 vol.

Chastenet (Jacques), *Godoï, prince de la paix*, Paris, 1943.

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de), *Itinéraire de Paris à Jérusalem*, Paris, 1831.

Chatenay (Léopold), *Vie de Jacques Esprinchard, rochelais, et Journal de ses voyages au XVIe siècle*, Paris, 1957.

Chaunu (Pierre),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iques (XVIe, XVIIe, XVIIIe siècles). Introduction méthodologique et indices d'activité*, Paris, 1960.
L'Amérique et les Amériques, Paris, 1964.

Chaunu (Pierre et Huguette),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de 1601 à 1650*, Paris, 1955-1960, 12 vol.

Chavier (Antonio), *Fueros del reyno de Navarra*, Pampelune, 1686.

Chesneau (Jean), *Le voyage de Monsieur d'Aramon ambassadeur pour le roy en Levant*, Paris, 1887.

Chevalier (François), *La formation des grands domaines au Mexique. Terre et Société aux XVIe-XVIIe siècles*, Paris, 1952.

Cicogna, voir Tiepolo (Lorenzo).

Cirillo (Bernardino), *Annali della città dell'Aquila*, Rome, 1570.

Cochenhausen (Friedrich von), *Die Verteidigung Mitteleuropas*, Iéna, 1940.

Cock (Henrique), *Relación del viaje hecho por Felipe II en 1585 a Zaragoza*, Madrid, 1876.

Codogno (O.), *Nuovo itinerario delle Poste per tutto il mondo...*, Milan, 1608.

Coindreau (Roger), *Les corsaires de Salé*, Paris, 1948.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para la historia de Espana (*C.O.D.O.I.N.*), Madrid, 1842-1896, 112 vol.

Colette, *La naissance du jour*, Paris, 1942.

Collier (Jacques-Raymond), voir Billioud (Joseph) et Collier (Jacques-Raymond).

Colmenares (Diego de), *Historia de la insigne ciudad de Segovia*, 2e éd., Madrid, 1640.

Colonna (Marco Antonio), voir Voinovitch (L.).

Comines (Philippe de), *Mémoires de Messire Philippe de Comines... où l'on trouve l'histoire des rois de France Louis XI et Charles VIII*. Nouvelle éd. revue avec un recueil de traités, lettres, contrats et instructions... par messieurs Godefroy, augmentée par M. l'abbé Lenglet du Fresnay, Londres et Paris, 1747.

Conestaggio (Jeronimo), *Dell'unione del regno di Portogallo alla corona di Castiglia*, Gênes, 1585.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XIe*), Rapports, Stockholm, 21-28 août 1960, Goteborg, Stockholm, Uppsala, Almqvist et Wiksell, 1960, 5 vol.

Coniglio (G.), *Il Viceregno di Napoli nel secolo XVII*, Rome, 1955.

Contarini (Giampietro), *Historia delle cose successe dal principio della guerra mossa da Selim ottomano a' Venetiani*, Venise, 1572.

Contreras (Alonso de), *Aventures du capitaine Alonso de Contreras (1582-1633)*, trad. et p.p. Jacques Boulenger, Paris, 1933.

Coornaert (Émile), *Un centre industriel d'autrefois. La draperie-sayetterie d'Hondschoote (XIVe-XVIIIe siècles)*, Paris, 1930.
Les Français et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à Anvers, fin du XVe-XVIe siècle, Paris, 1961, 2 vol.

Corazzini (G. O.), voir Lapini (Agostino).

Córdova (L.), voir Cabrera de Córdova (L.).
Cornaro (L.), *Trattato di acque*, Padoue, 1560.
Corridore (F.), *Storia documentata della popolazione di Sardegna*, Turin, 1902.
Corsano (A.), *Il pensiero di Giordano Bruno nel suo svolgimento storico*, Florence, 1954.
Corsini (O.), *Ragionamento istorico sopra la Val di Chiana*, Florence, 1742.
Corte Real (J.), *Successo do segũdo cerco de Diu*, Lisbonne, 1574.
Córtes de los antiguos reinos de León y de Castilla, Madrid, 1861-1903, 8 vol.
Cortese (Nino), *Feudi e feudatari napoletani della prima metà del Cinquecento*, Naples, 1931.
Cossé-Brissac (Philippe de), voir *Sources inédites...*
Costa (Joaquín), *Colectivismo agrario en España*, Madrid, 1898.
Crescentio (Bartolomeo), *Nautica mediterranea*, Rome, 1607.
Croce (Benedetto), *Storia del Regno di Napoli*, 3e éd., Bari, 1944.
Cunnac (J.), *Histoire de Pépieux des origines à la Révolution*, Toulouse, 1946.
Cunningham (W.), *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5e éd., Cambridge, 1910-1912, 3 vol.
Cupis (C. de), *Le vicende dell'agricoltura e della pastorizia nell'agro romano e l'Annona di Roma*, Rome, 1911.
Cuvelier (J.) et Jadin (J.). *L'ancien Congo d'après les archives romaines, 1518-1640*, Bruxelles, 1954.
Cvijić (Jovan), *La Péninsule balkanique*, Paris, 1918.
Dall'Olmo, voir Cecchetti (B.).
Da Mosto (Andrea), *L'archivio di Stato di Venezia*, Rome, 1937-1940, 2 vol.
Dan (P.), *Histoire de Barbarie et de ses corsaires*, Paris, 2e éd., 1649.
Danvila (Manuel), *El poder civil en España*, Madrid, 1885.
Dauzat (Albert), *Le village et le paysan de France*, Paris, 1941.
Davis (James C.), *The Decline of the Venetian Nobility as a Ruling Class*, Baltimore, 1962.
Davity (Pierre), *Les Estats, empires et principautés du monde*, Paris, 1617.
Debien (Gabriel), *En Haut-Poitou, défricheurs au travail, XVe-XVIIe siècles*, « Cahiers des Annales », Paris, 1952.
Decker (H.), *Barockplastik in den Alpenländern*, Vienne, 1943.
Decrue de Stoutz (Francis), *Anne, duc de Montmorency, connétable et pair de France sous les rois Henri II, François II et Charles IX*, Paris, 1889.
Deffontaines (Pierre), Jean-Brunhes-Delamarre (Mariel), Bertoquy (P.), *Problèmes de Géographie humaine*, Paris, 1939.
Delbrück (Hans),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 im Rahmen der politischen Geschichte*, Berlin, 1900-1920, 4 vol.
Weltgeschichte. Vorlesungen gehalten an der Universität Berlin 1896/1920, Berlin, 1923-1928, 5 vol.
Deledda (Grazia), *La via del male*, Rome, 1896.
Il Dio dei viventi, Rome, 1922.
De Leva (Giuseppe), *Storia documentata di Carlo V*, Venise, 1863-1894, 5 vol.
Voir aussi Paruta (P.).
Della Casa (Giovanni), *Galateo*, Florence, 1561.
Della Rovere (Antonio), *La crisi monetaria siciliana (1531-1802)*, p.p. Carmelo Trasselli, Palerme, 1964.
Della Torre (Raffaele), *Tractatus de cambiis*, Gênes, 1641.
Delmas de Grammont (Henri), voir Grammont (Henri Delmas de).
De Luigi (Giuseppe), *Il Mediterraneo nella politica europea*, Naples, 1925.
Delumeau (Jean), *Vi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Rom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Paris, 1957-1959, 2 vol.
L'alun de Rome, XVe-XIXe siècle, Paris, 1963.

Denucé (J.), *L'Afrique au XVIe siècle et le commerce anversois*, Anvers, 1937.

Dermigny (L.),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Paris, 1964, 4 vol.

Descamps (Paul), *Le Portugal. La vie sociale actuelle*, Paris, 1935.

Desdevises du Dezert (Georges), *Don Carlos d'Aragon, prince de Viane, étude sur l'Espagne du Nord au XVe siècle*, Paris, 1889.

Desjardins (Abel), *Négociations diplomatiques de la France avec la Toscane*, « Collection de documents inédit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 Paris, 1859-1886, 6 vol.

Despaux (Albert), *Les dévaluations monétaires dans l'histoire*, Paris, 1936.

Despois (Jean), *La Tunisie orientale. Sahel et Basse Steppe*, Paris, 1940.

Didier (Général L.), *Histoire d'Oran. Période de 1501 à 1550*, Oran, 1927.

Didier (L.), voir Mondoucet (C. de).

Diehl (Charles) et Marçais (Georges), *Histoire du Moyen Age* ; III : *Le Monde oriental*, Paris, 1936, in : *Histoire Générale*, publ. sous la direction de Gustave Glotz.

Dietz (A.), *Frankfurter Handelsgeschichte*, Francfort, 1910-1925, 4 vol.

Di Giovanni (Giovanni), *L'ebraismo della Sicilia*, Palerme, 1748.

Dieulafoy (Jane), *Isabelle la grande reine de Castille (1451-1504)*, Paris, 1920.

Dion (Roger), *Histoire de la vigne et du vin en France des origines au XIXe siècle*, Paris, 1959.

Di Tocco (Vittorio), *Ideali d'indipendenza in Italia durante la preponderanza spagnuola*, Messine, 1926.

Doehaerd (Renée), *Études anversoises. Documents sur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à Anvers (1488-1514)*, Paris, 1962-1963, 3 vol.

Doehaerd (Renée) et Kerremans (Charles),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ntre Gênes, la Belgique et l'Outremont d'après les archives notariales génoises des XIIIe et XIVe siècles*, Bruxelles-Rome, 1941-1953, 3 vol.

Döllinger (I. J. J. von),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Karls V., Philipps II. und ihrer Zeit. Aus spanischen Archiven*, Ratisbonne, 1862.

Domínguez Ortíz (Antonio), *La sociedad española en el siglo XVII*, t. I, Madrid, 1963.

Donà (Leonardo), voir Vitale (Eligio) et Brunetti (Mario).

Doren (Alfred), *Italienische Wirtschaftsgechichte*, t. I (seul paru), Iéna, 1934 ; trad. en italien par Gino Luzzatto sous le titre : *Storia economica dell' Italia nel medioevo*, Padoue, 1936.

Dorez (Léon), voir Maurand (Jérôme).

Dorini (Umb.), *L'isola di Scio offerta a Cosimo de Medici*, Florence, 1912.

Dornic (François), *L'industrie textile dans le Maine et ses débouchés internationaux, 1650-1815*, Paris, 1955.

Douais (Célestin), *Dépêches de M. de Fourquevaux, ambassadeur du roi Charles IX en Espagne, 1565-1572*, coll. « Société d'Histoire diplomatique », Paris, 1896-1904, 3 vol.
Lettres de Charles IX à M. de Fourquevaux, 1566-1572, même coll., Paris, 1897.

Dozy (Reinhart Pieter Anne), *Histoire des Musulmans d'Espagne jusqu'à la conquête de l'Andalousie par les Almoravides (711-1110)*, Leyde, 1861, 4 vol.

Dragonetti de Torres (A.), *La lega di Lepanto nel carteggio diplomatico inedito di Don Luis de Torres*, Turin, 1931.

Dresch (J.), voir Birot (P.) et Dresch (J.).

Drouot (Henri), *Mayenne et la Bourgogne (1587-1596),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s provinces françaises pendant la Ligue*, Paris, 1937, 2 vol.

Du Fail (Noël), *Œuvres facétieuses*, p.p. J. Assézat, Paris, 1875, 2 vol.

Dufayard (Charles), *Le connétable de Lesdiguières*, Paris, 1892.

Du Gabre (Dominique), voir Vitalis (A.).

Dumont (Jean), *Corps universel diplomatique du droit des gens, contenant un recueil des traitez d'alliance, de paix, de trêves... depuis le règne de Charlemagne jusqu'à présent*, Amsterdam, 1726-1731, 8 vol.

Duro (C.), voir Fernández Duro (Cesáreo).

Du Vair (Guillaume), *Recueil des harangues et traictez*, Paris, 1606.

Eberhardt (Isabelle), *Notes de Routes : Maroc, Algérie, Tunisie*, Paris, 1908.

Ébrard (Jean), voir Cabié (Edmond).

Eck (Otto), *Seeräuberei im Mittelmeer. Dunkle Blätter europäischer Geschichte*, Munich, 1940 ; 2e éd., 1943.

Egidi (Pietro), *Emmanuele Filiberto, 1559-1580*, Turin, 1928.

Ehrenberg (Richard), *Das Zeitalter der Fugger. Geldkapital und Creditverkehr im 16. Jahrhundert*, Francfort, 1896 ; 3e éd., 1922, 2 vol.

Einaudi (Luigi), voir Malestroict (sieur de).

Eisenmann (Louis, voir Milioukov (P.), Seignobos (Charles) et Eisenmann (Louis).

Élie de la Primaudaie (F.), *Documents inédits sur l'histoire de l'occupation espagnole en Afrique (1506-1574)*, Alger, 1875.

Emmanuel (I. S.), *Histoire de l'industrie des tissus des Israélites de Salonique*, Lausanne, 1935.

Encyclopédie de l'Islam, Paris-Leyde, 1913-1934, 4 vol., suppl., 1934.

Epstein (F.), voir Staden (H. von).

Eškenasi (Eli), voir Habanel (Aser) et E kenasi (Eli).

Espejo de Hinojosa (Cristóbal) et Paz y Espeso (Julián), *Las antiguas ferias de Medina del Campo*, Valladolid, 1912.

Essad Bey (Mohammed), *Allah est grand !*, Paris, 1937.

Essen (Léon van der), *Alexandre Farnèse, prince de Parme, Gouverneur général des Pays-Bas, 1545-1592*, Bruxelles, 1933-1934, 5 vol.

Essen (Léon van der) et Louant (Armand), voir Frangipani (Ottavio Mirto).

Estienne (C.), *La guide des chemins de France, revue et augmentée*, Paris, 1552.

Estrangin (Jean-Julien), *Études archéologiques, historiques et statistiques sur Arles*, Aix-en-Provence, 1838.

Eydoux (Henri-Paul), *L'homme et le Sahara*, Paris, 1943.

Fagniez (Gustave), *L'économie sociale de la France sous Henri IV, 1589-1610*, Paris, 1897.

Fail (Noël du), voir Du Fail (Noël).

Falgairolle (Edmond), *Une expédition française à l'île de Madère en 1566*, Paris, 1895.

Falke (Johannes), *Di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Handels*, Leipzig, 1859-1860, 2 vol.

Fanfani (Amintore), *Storia economica. Dalla crisi dell' Impero romano al principio del secolo XVIII*, 3e éd., Milan, 1948.

Fanfani (Pietro), *Saggi di un commento alla Cronica del Compagni* ; I : *La descrizione di Firenze*, II : *I Priori*, Florence, 1877.

Febvre (Lucien), *Philippe II et la Franche-Comté, la crise de 1567, ses origines et ses conséquences*, Paris, 1911.
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 La religion de Rabelais, Paris, 2e éd., 1947.
Pour une Histoire à part entière, Paris, 1963.

Febvre (Lucien) et Martin (Henri), *L'apparition du livre*, Paris, 1957.

Féraud (Laurent-Charles), *Annales tripolitaines*, Paris, 1927.

Fernández (Jesús), voir García Fernández (Jesús).

Fernández Duro (Cesáreo), *Armada española desde la unión de Castilla y de Aragón*, Madrid, 1895-1903, 9 vol.

Filippini (A. P.), *Istoria di Corsica*, 2e éd., Pise, 1827-1831, 5 vol.

Fisher (Godfrey), *Barbary Legend.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North Africa, 1415-1830*, Oxford, 1957.

Flachat (Jean-Claude), *Observations sur le commerce et sur les arts d'une partie de l'Europe, de l'Asie, de l'Afrique et des Indes Orientales*, Lyon, 1766, 2 vol.

Flores (Xavier A.), *Le « Peso político de todo el mundo » d'Anthony Sherley ou un aventurier anglais au service de l'Espagne*, Paris, 1963.

Floristán Samanes (Alfredo), *La Ribera tudelana de Navarra*, Saragosse, 1951.

Foglietta (Uberto), *De sacro fœdere in Selimum*, Gênes, 1587.

Fordham (Herbert), *Les guides routiers. Itinéraires et cartes routières de l'Europe*, Lille, 1926.
Les routes de France, Paris, 1929.

Formentini (Marco), *La Dominazione spagnuola in Lombardia*, Milan, 1881.

Forneron (Henri), *Histoire de Philippe II*, Paris, 1881-1882, 4 vol.

Forster (William), voir Sanderson (John).

Forti (U.), *Storia della tecnica italiana*, Florence, 1940.

Foscarini (J.), voir Stefani (Fr.).

Fossombroni (V.), *Memorie idraulico-storiche sopra la Val di Chiana*, Florence, 1789.

Foucault (Michel), *L'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Paris, 1961.

Fouqueray (P. H.), *Histoir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France des origines à la suppression (1528-1752)*, Paris, 1910-1925, 5 vol.

Fourastié (Jean), *Prix de vente et prix de revient*, 13ᵉ série, Paris, s. d. (1964).

Foy (Abbé de), voir Busbec (Baron Augier Ghislain de).

Franc (Julien), *La colonisation de la Mitidja*, Paris, 1928.

François (Michel), *Albisse del Bene, surintendant des finances françaises en Italie, 1551 à 1556*, «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 Paris, 1933.
Correspondance du cardinal François de Tournon, 1521-1562, Paris, 1946.
Le cardinal François de Tournon, homme d'État, diplomate, mécène et humaniste, 1489-1562, « Bibliothèque des Écoles françaises d'Athènes et de Rome », Paris, 1951, fasc. 173.

Frangipani (Ottavio Mirto), *Correspondance d'Ottavio Mirto Frangipani, premier nonce de Flandre (1596-1606)*, I, Rome, 1924, p.p. L. van der Essen ; II-III (1-2), p.p. Armand Louant, 1932 et 1942.

Franklin (Alfred),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s arts, métiers et professions exercés dans Paris depuis le XIIIᵉ siècle*, Paris, 1906.
La vie privée d'autrefois : arts et métiers, modes, mœurs, usages des Parisiens, du XIIᵉ au XVIIIᵉ siècle, Paris, 1887-1902, 27 vol. ; XIII : *Le café, le thé, le chocolat*, 1893 ; XV et XVI : *Les magasins de nouveautés*, 1894-1895.

Franz (G.), *Der Dreissigjährige Krieg und das deutsche Volk. Untersuchungen zur Bevölkerungs- und Agrargeschichte*, Iéna, 1940.

Fremerey (Gustav), *Guicciardinis finanzpolitische Anschauungen*, Stuttgart, 1931.

Freyre (Gilberto), *Introdução à história da sociedade patriarcal no Brasil* ; I : *Casa grande y senzala*, Rio de Janeiro, 5ᵉ éd., 1946, 2 vol. : II : *Sobrados e mucambos*, 2ᵉ éd., Rio de Janeiro, 1951, 3 vol.

Frianoro (Rafaele), voir Nobili (Giacinto).

Fried (Ferdinand), *Wandlungen der Weltwirtschaft*, Munich, 1950 ; trad. fr. de la 1ʳᵉ éd., parue sous le titre *Wende der Weltwirtschaft*, Leipzig, 1939 : *Le tournant de l'économie mondiale*, Paris, 1942.

Friederici (Georg), *Der Charakter der Entdeckung und Eroberung Amerikas durch die Europäer*, Stuttgart, 1925-1936, 3 vol.

Frobenius (Leo),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africaine*, trad. de l'allemand par Dʳ H. Back et D. Ermont, Paris, 1936.

Frôdin (J.), *Zentraleuropas Alpwirtschaft*, Oslo, 1940-1941, 2 vol.

Fromentin (Eugène), *Voyage en Égypte (1869)*, p.p. J. M. Carré, Paris, 1935.

Fuchs (R.), *Der Bancho Publico zu Nürnberg*, Berlin, 1955.

Fuentes Martiáñez (M.), *Despoblación y repoblación de España (1482-1920)*, Madrid, 1929.

Fueter (Eduard), *Geschichte des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s von 1492-1559*, Munich, 1919.

Fugger, voir Klarwill (V. von).

Gabre (Dominique du), voit Vitalis (A.).

Gachard (L. P.), *Correspondance de Philippe II sur les affaires des Pays-Bas (jusqu'en 1577)*, Bruxelles, 1848-1879, 5 vol.
Retraite et mort de Charles Quint au monastère de Yuste, Bruxelles, 1854-1855, 3 vol.
Don Carlos et Philippe II, Bruxelles, 1863, 2 vol.

Correspondance de Marguerite d'Autriche avec Philippe II (1559-1565), Bruxelles, 1867-1881, 3 vol.
Lettres de Philippe II à ses filles, les infantes Isabelle et Catherine, écrites pendant son voyage au Portugal, 1581-1583, Paris, 1884.

Gachard (L. P.) et Piot (Ch.), *Collection des voyages des souverains des Pays-Bas*, Bruxelles, 1876-1882, 4 vol.

Gaffarel (P.), *Histoire du Brésil français au XVI^e^ siècle*, Paris, 1878.

Galanti (G. M.), *Descrizione geografica e politica delle Due Sicilie*, Naples, 1788, 4 tomes en 2 vol.

Gallardo y Victor (Manuel), *Memoria escrita sobre el rescate de Cervantès*, Cadix, 1896.

Galluzzi (R.), *Istoria del granducato di Toscana sotto il governo della casa Medici*, Florence, 1781, 5 vol.

Gamir Sandoval (A.), *Organización de la defensa de la costa del Reino de Granada desde su reconquista hasta finales del siglo XVI*, Grenade, 1947.

Gandilhon (René), *Politique économique de Louis XI*, Paris, 1941.

Ganier (Germaine), *La politique du connétable Anne de Montmorency*, Le Havre, s. d. (1957).

Ganivet Garcia (Angel), *Obras completas* ; I : *Granada la Bella, Idearium español*, Madrid, 1943.

García (Juan), voir Catalina García (Juan) et Pérez Villamil (Manuel).

García de Quevedo y Concellón (Eloy), *Ordenanzas del Consulado de Burgos de 1538*, Burgos, 1905.

García Fernández (Jesús), *Aspectos del paisaje agrario de Castilla la vieja*, Valladolid, 1963.

García Mercadal (G.), *Viajes de extrangeros por España y Portugal* ; I : *Viaje del noble bohemio León de Rosmithal de Blatina por España y Portugal hecho del año 1465 a 1467*, Madrid, 1952.

García y García (Luis), *Una embajad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a Egipto*, Valladolid, 1947.

Gassot (Jacques), *Le discours du voyage de Venise à Constantinople*, Paris, 1606.

Gautier (D^r^ Armand), *L'alimentation et les régimes chez l'homme sain et chez le malade*, Paris, 1904.

Gautier (Émile-Félix), *L'islamisation de l'Afrique du Nord. Les siècles obscurs du Maghreb*, Paris, 1927.
Un siècle de colonisation, Paris, 1930.
Mœurs et coutumes des Musulmans, Paris, 1931.
Genséric, roi des Vandales, Paris, 1932.
Le passé de l'Afrique du Nord, Paris, 1937.

Gautier (Théophile), *Voyage en Espagne*, Paris, éd. de 1845 et 1879.
Constantinople, Paris, 1853.

Gavy de Mendonça (Agostinho), *Historia do famoso cerco que o xarife pos a fortaleza de Mazagão no año de 1562*, Lisbonne, 1607.

Gédoyn « le Turc », voir Boppe (Léon).

Gelzer (H.), *Geistliches und Weltlisches aus dem türkisch-griechischen Orient*, Leipzig, 1900.

Gentil da Silva (J.), *Stratégie des affaires à Lisbonne entre 1595 et 1607*, Paris, 1956.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pub. sous la direction de P. Vidal de La Blache et L. Gallois, Paris, 1927, XV tomes en 23 vol.

George (P.), *La région du Bas-Rhône, étude de géographie régionale*, Paris, 1935.

Gerlach (R.), *Dalmatinisches Tagebuch*, Darmstadt, 1940.

Gerometta (B.), *I forestieri a Venezia*, Venise, 1858.

Gévay (Anton von), *Urkunden und Aktenstücke zur Geschichte der Verhältnisse zwischen Österreich, Ungarn und der Pforte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Vienne, 1840-1842, 9 vol.

Giannone (Pietro), *Istoria civile del Regno di Napoli*, La Haye, 1753, 4 vol.

Gillet (Louis), *Dante*, Paris, 1941.

Gioffrè (Domenico), *Genova e Madera nel 1° decennio del secolo XVI*, in « Studi Colombiani », t. III, Gênes, 1951.
Gênes et les foires de change : de Lyon à Besançon, Paris, 1960.

Girard (Albert), *La rivalité commerciale et maritime entre Séville et Cadix jusqu'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32.

Giraud (Paul), *Les origines de l'Empire français nord-africain*, Marseille, 1937.

Giustiniani (Girolamo), *La description et l'histoire de l'île de Scios* (s. l.), 1506 (pour 1606?).

Glamann (K.), *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La Haye, 1958.

Goldschmidt (L.), *Universalgeschichte des Handelsrechts*, Stuttgart, 1891.

Goleta. Warhafftige eygentliche Beschreibung wie der Türck die... Vestung Goleta... belägert..., Nuremberg, 1574.

Gollut (L.),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la république séquanoise*, Dole, 1592.

Gomes de Brito (Bernardo), *Historia tragico-maritima*, Lisbonne, 2e éd., 1904-1909, 2 t. en 3 vol.

Gomez Moreno (Manuel), voir Hurtado de Mendoza (Diego).

Gondola (Francesco), voir Voinovitch (L.).

González (Tomás), *Censo de la población de las provincias y partidos de la Corona de Castilla en el siglo XVI*, Madrid, 1829.

González Palencia (Angel), *Gonzalo Pérez secretario de Felipe II*, Madrid, 1946, 2 vol.

Gooss (Roderich), *Die Siebenbürger Sachsen in der Planung deutscher Sudostpolitik. Von der Einwanderung bis zum Ende des Thronstreites zwischen König Ferdinand I. und König Johann Zápolya (1538)*, Vienne, 1940.

Gosselin (E.-H.), *Documents authentiques et inédi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marine normande et du commerce rouennais pendant l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Rouen, 1876.

Götz (Wilhelm), *Historische Geographie. Beispiele und Grundlinien*, Leipzig, 1904.

Goubert (Pierre), *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de 1600 à 1730*, Paris, 1960, 2 vol.

Gounon-Loubens (J.), *Essais sur l'administration de la Castille au XVI^e^ siècle*, Paris, 1860.

Gourou (Pierre), *La Terre et l'homme en Extrême-Orient*, Paris, 1940.

Gothein (A.), *Geniza*, en cours de publication.

Grammont (Henri Delmas de), *Relations entre la France et la Régence d'Alger au XVII^e^ siècle*, Alger, 1879-1885, 4 vol.

Grandchamp (Pierre), *La France en Tunisie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1582-1600)*, Tunis, 1920.

Granvelle (Cardinal de), *Papiers d'État du cardinal Granvelle*, publiés sous la direction de Ch. Weiss, « Collection de documents inédit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 Paris, 1841-1852, 9 vol.
Correspondance du cardinal Granvelle, 1566-1586, p.p. Edmond Poullet et Charles Piot, Bruxelles, 1877-1896, 12 vol.

Grataroli (G.), *De regimine iter agentium, vel equitum, vel peditum, vel mari vel curru seu rheda*, Bâle, 1561.

Graziani (A.), *Economisti del Cinque e Seicento*, Bari, 1913.

Grekov (B.) et Iakoubovski (A.), *La Horde d'Or*, trad. du russe par François Thuret, Paris, 1939.

Grenard (Fernand), *Grandeur et décadence de l'Asie*, Paris, 1939.

Grevin (Emmanuel), *Djerba, l'île heureuse, et le Sud Tunisien*, Paris, 1937.

Griziotti Kretschmann (Jenny), *Il problema del trend secolare nelle fluttuazioni dei prezzi*, Turin, 1935.

Gröber (G.), *Grundriss der romanischen Philologie*, Strasbourg, 1888-1902, 3 vol. ; 2e éd., vol. I : 1904-1906.

Grottanelli (Lorenzo), *La Maremma toscana : studi storici ed economici*, Sienne, 1873-1876, 2 vol.

Grousset (René), *L'empire des steppes*, Paris, 1939.

Gsell (S.), Marçais (G.), Yver (G.), *Histoire d'Algérie*, Paris, 1927.

Guardia (G. M.), voir Perez (Antonio).

Guarnieri (Giuseppe Gino), *Un'audace impresa marittima di Ferdinando dei Medici, con documenti e glossario indo-caraibico*, Pise, 1928.

Cavalieri di Santo Stefan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lla marina militare italiana, 1562-1859, Pise, 1928.

Guéneau (Louis), *L'organisation du travail à Nevers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1660-1790)*, Paris, 1919.

Guevara (A. de), *Épistres dorées, moralles et familières*, traduites d'espagnol en français par le seigneur de Guterry, Lyon, 1558-1560.

Guglielmotti (Alberto), *La guerra dei pirati e la marina pontificia dal 1500 al 1560*, Florence, 1876, 2 vol.

Guicciardini (Francesco), *La historia d'Italia*, Venise, 1568.
Diario del viaggio in Spagna, Florence, 1932.

Guijo (G. M. de), *Diario de Gregorio Martín de Guijo, 1648-1664*, p.p. M. R. de Terreros, Mexico, 1953.

Guillaume de Vaudoncourt (Frédéric François), *Memoirs of the Ionian Islands*, Londres, 1816.

Guillon (Pierre), *Les trépieds du Ptoion*, Paris, 1943.

Günther (A.), *Die Alp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 als sozialer und politischer, wirtschaftlicher und kultureller Lebenskreis*, Iéna, 1930.

Ha Cohen (Joseph), *Emek Habakha, la Vallée des Pleurs, Chronique des souffrances d'Israël dans sa dispersion jusqu'à 1575* et *Continuation de la Vallée des Pleurs*, p.p. Julien Sée, Paris, 1881.

Haebler (Konrad), *Die wirtschaftliche Blüte Spaniens im 16. Jahrhundert und ihr Verfall*, Berlin, 1888.

Geschichte Spaniens unter den Habsburgern, t. I (seul paru) : *Geschichte Spaniens unter der Regierung Karls I. (V.)*, Gotha, 1907.

Haëdo (P. Diego de), *Topographia e historia general de Argel* et *Epitome de los Reyes de Argel*, Valladolid, 1612, 1 vol.

Hagedorn (B.), *Die Entwicklung der wichtigsten Schiffstypen bis ins 19. Jahrhundert*, Berlin, 1914.

Hahn (W.), *Die Verpflegung Konstantinopels durch staatliche Zwangswirtschaft, nach türkischen Urkunden aus dem 16. Jahrhundert*, Stuttgart, 1926.

Hakluyt (R.),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Londres, 1599-1600, 3 vol.

Halperin Donghi (Tulio), *Un conflicto nacional : Moriscos y Cristianos viejos en Valencia*, Buenos Aires, 1955.

Halphen (E.), voir Henri IV.

Hamilton (Earl J.), *El florecimiento del capitalismo y otros ensayos de historia económica*, Madrid, 1948.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 Cambridge, Mass., 1934.

Hammen y León (Lorenzo Vander), voir Vander Hammen y León (Lorenzo).

Hammer-Purgstall (J. von), *Histoire de l'Empire ottoman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à nos jours*, trad. de l'allemand par J. J. Hellert, Paris, 1835-1848, 18 vol.

Häpke (Rudolf), *Niederländische Akten und Urkunden zur Geschichte der Hanse und zur deutschen Seegeschichte*, t. I (seul paru) : *1531-1557*, Munich et Leipzig, 1913.

Harris (John), *Navigantium atque itinerantium bibliotheca, or a complet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Londres, 1705, 2 vol.

Hartlaub (F.), *Don Juan d'Austria und die Schlacht bei Lepanto*, Berlin, 1940.

Hassel (U. von), *Das Drama des Mittelmeers*, Berlin, 1940.

Hauser (Henri), *La prépondérance espagnole (1559-1560)*, 2^e éd., Paris, 1940.
Voir aussi Bodin (Jean).

Hauser (Henri) et Renaudet (Augustin), *Les débuts de l'âge moderne, la Renaissance et la Réforme*, 3^e éd., 1946, t. VIII de l'*Histoire générale* publiée sous la direction de Louis Halphen et Philippe Sagnac.

Hayward (F.), *Histoire de la Maison de Savoie*, Paris, 1941-1943, 2 vol.

Heckscher (E. F.), *Der Merkantilismus*, Iéna, 1932, 2 vol. ; trad. esp. : *La época mercantilista*, Mexico, 1943.

Heeringa (K.), *Bronnen tot de geschiedenis van den Levantschen handel*, La Haye, 1910-1917, 2 vol.

Heers (Jacques), *Gênes au XV^e^ siècle. Activité économique et problèmes sociaux*, Paris, 1961.

Hefele (Charles-Joseph), *Le cardinal Ximénès et l'église d'Espagne à la fin du XVI^e^ et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trad. de l'allemand par M. l'abbé A. Sisson et M. l'abbé A. Crampon, Paris, Lyon, 1856.

Hefele (Charles-Joseph) et Hergen Roether (cardinal J.), *Histoire des Conciles d'après des documents originaux*, traduite en français par Dom H. Leclercq et continuée jusqu'à nos jours ; t. IX : Première Partie, *Concile de Trente* par P. Richard, Paris, 1930.

Hefele (Hermann), *Geschichte und Gestalt. Sechs Essays*, Leipzig, 1940.

Helwig (Werner), *Braconniers de la mer en Grèce*, trad. de l'allemand : *Raubfischer in Hellas*, par Maurice Rémon, Leipzig, 1942.

Hennig (Richard), *Terrae incognitae. Eine Zusammenstellung und kritische Bewertung der wichtigsten vorcolumbischen Entdeckungsreisen an Hand der darüber vorliegenden Originalberichte*, Leyde, 1936-1939, 4 vol. ; 2e éd. : 1944-1956, 4 vol.

Henri IV, *Lettres inédites à M. de Sillery, ambassadeur à Rome, du 1er avril au 27 juin 1601*, p.p. Eugène Halphen, Paris, 1866.
Lettres inédites à M. de Villiers, ambassadeur à Venise, p.p. Eugène Halphen, Paris, 1885-1887, 3 vol.
Lettres au comte de La Rochepot, ambassadeur en Espagne (1600-1601), p.p. P. Laffleur de Kermaingant, Paris, 1889.

Hentzner (Paul), *Itinerarium Germaniæ, Galliæ, Italiæ*, Nuremberg, 1612.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von), *Ideen zu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Riga et Leipzig 1784-1791, 4 vol. ; trad. fr. :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de l'humanité*, par Émile Tandel Paris, 1874, 3 vol.

Hering (Ernst), *Die Fugger*, Leipzig, 1940.

Héritier (Jean), *Catherine de Médicis*, Paris, 1940.

Herre (Paul), *Europäische Politik im cyprischen Krieg (1570-1573), mit Vorgeschichte und Vorverhandlungen*, Leipzig, 1902.
Papsttum und Papstwahl im Zeitalter Philipps II., Leipzig, 1907.
Weltgeschichte am Mittelmeer, Leipzig, 1930.

Herrera (Gabriel Alonso de), *Libro de Agricultura*, Alcalá, 1539, éd. de 1598.

Herrera Oria (Enrique), *La Armada Invencible*, collection « Archivo Histórico Español », Madrid, 1929.

Herrera y Tordesillas (Antonio de), *Primera (tercera) parte de la Historia general del mundo*, Madrid, 1601-1612, 3 vol.

Heyd (W.), *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au Moyen Age*, trad. et p.p. Furcy-Raynaud, Leipzig, 1885-1886, 2 vol.

Hiltebrandt (Philipp), *Der Kampf ums Mittelmeer*, Stuttgart, 1940.

Hinojosa (Ricardo de), *Los despachos de la diplomacia pontificia en España*, Madrid, 1896.

Hirth (Friedrich C. A. J.), *Chinesische Studien*, t. I (seul paru), Munich, 1890.

Hispanic studies in honour of J. Gonzáles Llubera, p.p. Frank Pierce, Oxford, 1959.

Histoire et Historiens de l'Algérie, Paris, 1931.

Historiadores de Indias, collection dirigée par Manuel Serrano y Sanz, Madrid, 1909, 2 vol. ; II : « Guerra de Quito » de Pedro de Cieza de León, « Jornada de Managua y Dorado » de Toribio de Ortiguera, « Descripción del Perú Tucuman, Rio de la Plata et Chile » de Fr. Reginaldo de Lizárraga, in Nueva Biblioteca de autores españoles dirigida por Marcelino Menéndez y Pelayo, vol. XIV et XV.

Höffner (Joseph), *Wirtschaftsethik und Monopole im 15. und 16. Jahrhundert*, Iéna, 1941.

Holland (Henry), *Travels in the Ionian Isles, Albania, Thessaly, Macedonia, etc., during the years 1812 and 1813*, Londres, 1815.

Holleaux (Maurice), *Rome, la Grèce et les monarchies hellénistiques au III^e^ siècle av. J.-C. (273-205)*, Paris, 1921.

Hollister (J. S.), voir Ashauer (H.) et Hollister (J. S.).

Hommage à Lucien Febvre. Éventail de l'histoire vivante, Paris, 1953, 2 vol.

Hopf (Carl), voir Musachi (Giovanni).

Hoszowski (St.), *Les prix à Lwow (XVI^e^-XVII^e^ siècles)*, trad. du polonais, Paris, 1954.

Howe (Sonia E.), *Les grands navigateurs à la recherche des épices*, trad. de l'anglais par le général Fillonneau, Paris, 1939.

Howe (W.), *The Mining guild of New Spain and its Tribunal General, 1770-1821*, Cambridge, 1949.

Hugo (Victor), *William Shakespeare*, Paris, 1882.

Hürlimann (Martin), *Griechenland mit Rhodos und Zypern*, Zurich, 1938.

Hurtado de Mendoza (Diego), *De la guerra de Granada, comentarios*, p.p. Manuel Gómez Moreno, Madrid, 1948.

Huvelin (P.), *Essai historique sur le droit des marchés et des foires*, Paris, 1897.

Huxley (Aldous), *Tour du monde d'un sceptique*, trad. de l'anglais par Fernande Dauriac, Paris, 1932.

Iakoubowski (A.), voir Grekov (B.) et Iakoubowski (A.).

Ibn Iyâs,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Histoire des Mamlouks*, trad. et annoté par Gaston Wiet, Paris, 1955-1960, 2 vol.

Ibn Verga (Salomon), *Liber Schevet Jehuda*, p.p. par M. Wiener, Hanovre, 1855-1856, 2 vol.

Illescas (Gonzalo de), *Historia pontifical y católica*, Salamanque, 1573.

Imbart de la Tour (Pierre), *Les origines de la Réforme*, 2^e^ éd., Melun, 1944-1945, 2 vol.

Imbert (Gaston-Paul), *Des mouvements de longue durée Kondratieff*, Aix-en-Provence, 1959.

Indice de la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de Fernández de Navarrete que posee el Museo Naval, Madrid, 1946.

Instructions Nautiques du service hydrographique de la Marine française, principalement les n^os^ 357, 360 et 368, Paris, 1932 et 1934.

Iorga (N.),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Gotha, 1908-1913, 5 vol.
Points de vue sur l'histoire du commerce de l'Orient au moyen âge, Paris, 1924.
Ospiti romeni in Venezia, Bucarest, 1932.

Jacobeit (Wolfgang), *Schafhaltung und Schäfer in Zentraleuropa bis zum Beginn des 20. Jahrhunderts*, Berlin, 1961.

Jadin (J.), voir Cuvelier (J.) et Jadin (J.).

Jäger (Fritz), *Afrika*, 3^e^ éd., Leipzig, 1928.

Jal (A.), *Glossaire nautique*, Paris, 1848.

Janaček (J.),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Prague avant la bataille de la Montagne Blanche* (en tchèque), Prague, 1955.

Janssen (Johannes),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 seit de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Fribourg-en-Brisgau, 1878-1894, 8 vol.

Jardé (Auguste), *Les céréales dans l'Antiquité ; I : La production*, « Bibliothèque des Écoles françaises d'Athènes et de Rome », Paris, 1925.

Jean-Brunhes-Delamarre (Mariel), voir Deffontaines (Pierre), Jean-Brunhes-Delamarre (Mariel), Bertoquy (P.).

Jelavich (C. et B.), *The Balkans in Transition ; essays on the development of Balkan life and politics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p. C. et B. Jelavich, Berkeley, 1963.

Jireček (Constantin), *Die Romanen in den Städten Dalmatiens während des Mittelalters*, Vienne, 1901-1904, 3 vol.

Joly (Barthélemy), *Voyage en Espagne, 1603-1604*, p.p. L. Barrau-Dihigo, Paris, 1909.

Joly (Henry), *La Corse française au XVI^e^ siècle*, Lyon, 1942.

Jones (W. H. S.), *Malaria, a Neglected Factor in the History of Greece and Rome*, Cambridge, 1907.

Jonge (Johannes Cornelis de), *Nederland en Venetie*, La Haye, 1852.

Juchereau de Saint-Denys (Antoine), *Histoire de l'empire ottoman depuis 1792 jusqu'en 1844*, Paris, 1844, 4 vol.

Julien (Charles-André),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Paris, 1931.

Jurien de la Gravière (Vice-amiral J. B. E.), *Les chevaliers de Malte et la marine de Philippe II*, Paris, 1887, 2 vol.

Justinian (Jérosme), voir Giustiniani (Girolamo).

Kellenbenz (Hermann), *Sephardim an der unteren Elbe. Ihre wirt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Bedeutung vom Ende des 16. bis zum Beginn des 18. Jahrhunderts*, Wiesbaden, 1958.

Kerhuel (Marie), *Les mouvements de longue durée des prix*, Rennes, 1935.

Kermaingant (P. Laffleur de), voir Henri IV; voir aussi Laffleur de Kermaingant (Pierre-Paul).

Kernkamp (J. H.), *De handel op den vijand, 1572-1609*, Utrecht, 1931-1934, 2 vol.

Kerremans (Charles), voir Doehaerd (Renée) et Kerremans (Charles).

Kirchner (Walther), *The Rise of the Baltic Question*, Newark, 1954.

Klarwill (Victor von), *The Fugger News-Letters*, Londres, 1924-1926, 2 vol.

Klaveren (Jacob van), *Europä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Spaniens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Stuttgart, 1960.

Klein (Julius), *The Mesta ; A Study in Spanish Economic History, 1273-1836*, Cambridge, 1920.

Koch (Matthias),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Kaisers Maximilian II.*, Leipzig, 1857-1861, 2 vol.

Konetzke (R.), *Geschichte des spanischen und portugiesischen Volkes*, Leipzig, 1939.

Kretschmann (Jenny), voir Griziotti Kretschmann (Jenny).

Kretschmayr (H.), *Geschichte von Venedig*, Gotha et Stuttgart, 1905-1934, 3 vol.

Kroker (E.), *Handelsgeschichte der Stadt Leipzig*, Leipzig, 1925.

Kronn und Aussbunde aller Wegweiser, Cologne, 1597 (anonyme).

Kulischer (Josef), *Allg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zeit*, Munich, 1928-1929, 2 vol. ; second tirage, 1958.

Kunze (A.), voir Aubin (G.) et Kunze (A.).

Laborde (C^te^ Alexandre-Louis de), *Itinéraire descriptif de l'Espagne*, Paris, 1827-1830, 6 vol.

La Borderie (Bertrand de), *Le Discours du voyage de Constantinople*, Lyon, 1542.

La Boullaye Le Gouz (François), *Les voyages et observations du sieur de La Boullaye le Gouz où sont décrites les religions, gouvernements et situations des Estats et royaumes d'Italie, Grèce, Natolie, Syrie, Palestine, Karaménie, Kaldée, Assyrie, Grand Mogol, Bijapour, Indes orientales des Portugais, Arabie, Égypte, Hollande, Grande-Bretagne, Irlande, Dannemark, Pologne, isles et autres lieux d'Europe, Asie et Afrique...*, Paris, 1653.

La Bruyère (René), *Le drame du Pacifique*, Paris, 1943.

La Civiltà veneziana del Rinascimento, Fondazione Giorgio Cini, Venise, 1958.

Lacoste (L.), *Mise en valeur de l'Algérie. La colonisation maritime en Algérie*, Paris, 1931.

La Ferrière-Percy (Comte Hector de), *Lettres de Catherine de Médicis (1533-1587)*, « Collection de Documents inédit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 Paris, 1880-1909, 10 vol., Index, Paris, 1943, 1 vol.

Laffleur de Kermaingant (Pierre-Paul), *Mission de Jean de Thumery, sieur de Boissise (1598-1602)*, Paris, 1886.
Voir aussi Henri IV.

La Jonquière (V^te^ A. de), *Histoire de l'empire ottoman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nos jours*, Paris, 1914, 2 vol., in : *Histoire Universelle* de Victor Duruy.

La Lauzière (J. F. Noble de), voir Noble de la Lauzière.

Lamansky (Vladimir), *Secrets d'État de Venise, documents, extraits, notices et études*, Saint-Pétersbourg, 1884.

La Marmora (Alberto Ferrero de), *Voyage en Sardaigne ou description statistique, physique et politique de cette île*, 2^e^ éd., Paris et Turin, 1839-1857, 4 vol.

Landry (Adolphe), *Traité de démographie*, Paris, 1945.

Lane (Frederic C.), *Venetian Ships and Shipbuilders of the Renaissance*, Baltimore, 1934.
Andrea Barbarigo, Merchant of Venice, 1418-1449, Baltimore, 1944.

Lanz (Karl), *Correspondenz des Kaisers Karl V. Aus dem kgl. Archiv und der « Bibliothèque de Bourgogne » zu Brüssel*, Leipzig, 1844-1846, 3 vol.

Lanza del Vasto, *La baronne de Carins*, Paris, 1946.

Lapeyre (Henri), *Une famille de marchands, les Ruiz ;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u commerce entre la France et l'Espagne au temps de Philippe II*, Paris, 1955.
Géographie de l'Espagne morisque, Paris, 1960.

Lapini (Agostino), *Diario fiorentino di Agostino Lapini dal 252 al 1596*, p.p. G. O. Corazzini, Florence, 1900.

La Primaudaie, voir Élie de la Primaudaie (F.).

La Roncière (Charles de), *Histoire de la marine française*, Paris, 1899-1932, 6 vol.

Larruga (Eugenio), *Memorias politicas y económicas sobre los frutos, comercio, fábricas y minas de España*, Madrid, 1745-1792, 45 vol.

La Torre y Badillo (M.), *Representación de los autos sacramentales en el periodo de su mayor florecimiento*, Madrid, 1912.

Lattes (E.), *La libertà delle banche a Venezia*, Milan, 1869.

Laval (François Pyrard de), voir Pyrard de Laval (François).

Lavedan (Pierre), *Histoire de l'Art*, Paris, 1949-1950, 2 vol.

Lavisse (Ernest),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la révolution*, Paris, 1903-1911, 9 tomes en 18 vol.

Lebel (Roland), *Le Maroc et les écrivains anglais aux XVI^e^,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Paris, 1927.

Leca (Philippe), *Guide bleu de la Corse*, Paris, 1935.

Leclercq (Dom H.), voir Hefele (Charles-Joseph) et Hergen Rœther (cardinal J.).

Leclercq (Jules), *De Mogador à Biskra ; Maroc et Algérie*, Paris, 1881.

Le Danois (Édouard), *L'Atlantique, histoire et vie d'un océan*, Paris, 1938.

Lefaivre (Albert), *Les Magyars pendant la domination ottomane en Hongrie, 1526-1722*, Paris, 1902.

Lefebvre (Georges), *La grande Peur de 1789*, Paris, s. d. (1957).

Lefebvre (Th.), *Les modes de vie dans les Pyrénées atlantiques*, Paris, 1933.

Lefebvre des Noëttes (Cdt), *L'attelage. Le Cheval de selle à travers les âges.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esclavage*, Paris, 1931.

Lefevre-Pontalis (Germain), voir Selve (Odet de).

Le Glay (Dr André), *Négociations diplomatiques entre la France et l'Autriche durant les trente premières années du XVI^e^ siècle*, « Collection de documents inédit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 Paris, 1845, 2 vol.

Le Lannou (Maurice), *Pâtres et paysans de la Sardaigne*, Paris, 1941.

Lenglet du Fresnay (M. l'abbé), voir Comines (Ph. de).

Léon l'Africain, *De l'Afrique, contenant la description de ce pays et la navigation des anciens capitaines portugais aux Indes Orientales et Occidentales*, trad. de Jean Temporal, Paris, 1830, 4 vol.

Le Roy (Loys), *De l'excellence du gouvernement royal avec exhortation aux François de persévérer en iceluy*, Paris, 1575.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Les paysans de Languedoc*, 2 vol., Paris, 1966.

Leti (Gregorio), *Vita del Catolico re Filippo II monarca delle Spagne*, Coligny, 1679, 2 vol., trad. en franç. par J.-G. de Chevrières sous le titre : *La vie de Philippe II, roi d'Espagne*, Amsterdam, 1734.

Lescarbot (Marc), *Histoire de la Nouvelle France*, Paris, 1611.

Levi (Carlo), *Le Christ s'est arrêté à Éboli*, trad. de l'italien par Jeanne Modigliani, Paris, 1948.

L'Herba (G. da), *Itinerario delle poste per diverse parti del mondo*, Venise, 1564.

L'Hermite de Soliers (Jean-Baptiste, dit Tristan), *La Toscane françoise*, Paris, 1661.

Lilley (S.), *Men, Machines and History ; a short history of tools and machines in relation to social progress*, Londres, 1948.

Lisičar (V.), *Lopud. Historički i savremeni prikaz*, Dubrovnik, 1931.

Livet (Roger), *Habitat rural et structures agraires en Basse Provence*, Gap, 1962.

Livi (Giovanni), *La Corsica e Cosimo de' Medici*, Florence-Rome, 1885.

Livi (R.), *La schiavitù domestica nei tempi di mezzo e nei moderni*, Padoue, 1928.

Lizárraga (Fr. Reginaldo de), voir *Historiadores de Indias*.

Lonchay (Henri) et Cuvelier (Joseph), *Correspondance de la cour d'Espagne sur les affaires des Pays-Bas, 1598-1621*, Bruxelles, 1923.

Longlée (Pierre de Ségusson de), *Dépêches diplomatiques de M. de Longlée, résident de France en Espagne, 1581-1590*, p.p. A. Mousset, Paris, 1912.

Lopez (Roberto S.), *Studi sull'economia genovese nel medio evo*, Turin, 1936.

Lortz (Joseph), *Die Reformation in Deutschland*, 2e éd., Fribourg-en-Brisgau, 1941, 2 vol.

Los Espanoles pintados por si mismos (ouvrage collectif), Madrid, 1843.

Lot (Ferdinand), *Les invasions barbares et le peuplement de l'Europe, introduction à l'intelligence des derniers traités de paix*, Paris, 1937.

Louant (Armand), voir Frangipani (Ottavio Mirto).

Loyal Serviteur, *La très joyeuse et très plaisante Histoire composée par le Loyal Serviteur des faits, gestes, triomphes du bon chevalier Bayart*, p.p. J. C. Buchon, coll. « Le Panthéon littéraire », Paris, 1836.

Lozach (J.), *Le delta du Nil, étude de géographie humaine*, Le Caire, 1935.

Lubimenko (Inna),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t politiques de l'Angleterre avec la Russie avant Pierre le Grand*, Paris, 1933.

Luccari (G.), *Annali di Rausa*, Venise, 1605.

Lucchesi (E.), *I monaci benedettini vallombrosani in Lombardia*, Florence, 1938.

Lucio de Azevedo (J.), *Historia dos Christãos novos portugueses*, Lisbonne, 1921.

Luetić (J.), *O pomorstvu Dubrovačke Republike u XVIII. stoljeću*, Dubrovnik, 1959.

Lusignano (Stefano), *Chorografia et breve historia universale dell'isola de Cipro*, Bologne, 1573 ; trad. française, Paris, 1580.

Luzac (Élie de), voir Accarias de Sérionne (Jacques).

Luzzatto (G.), *Storia economica del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 Padoue, 1932.
Storia economica di Venezia dall'XI al XVI secolo, Venise, 1961.

Macaulay Trevelyan (G.), voir Trevelyan (G. Macaulay).

Madariaga (S. de), *Spain and the Jews*, Londres, 1946.

Maffée (Père Jean-Pierre), *Histoire des Indes*, Lyon, 1603.

Magalhães Godinho (Vitorino), *Historia economica e social da expansão portuguesa*, t. I, Lisbonne, 1947.
Os descobrimientos e a economia mondial, Lisbonne, 1963.
Les finances de l'État portugais des Indes orientales au XVIe et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thèse dactylographiée, Paris, 1958.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L'or et le poivre. Route de Guinée et route du poivre, en cours de publication.

Maisons et villages de France, ouvrage coll., Paris, 1945.

Mal (J.), *Uskočke seobe i slovenske pokrajine*, Llubljana, 1924.

Mâle (Émile), *L'art religieux après le Concile de Trente. Étude sur l'iconographie de la fin du XVIe siècle, du XVIIe siècle, du XVIIIe siècle. Italie, France, Espagne, Flandres*, Paris, 1932.

Malestroict (sieur de), *Paradoxes inédits du Sieur de Malestroict touchant les monnoyes*, p.p. Luigi Einaudi, Turin, 1937.

Malraux (André), *La lutte avec l'Ange*, Genève, 1945.

Malynes (Gerard), *A Treatise of the Canker of England's Commonwealth*, Londres, 1601.

Mandich (Giulio), *Le pacte de ricorsa et le marché italien des changes au XVIIe siècle*, Paris, 1953.

Manfroni (C.), *Storia della marina italiana*, Rome, 1897.

Mankov (A. G.), *Le mouvement des prix dans l'État russe du XVIe siècle*, trad. française, Paris, 1957.

Mans (Raphaël du), voir Raphaël du Mans.
Mantran (Robert), *Istanbul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 Paris, 1962.
Marañón (Gregorio), *Antonio Pérez*, 2^{e} éd., Madrid, 1948, 2 vol.
Marca (P. de), *Histoire de Béarn*, Paris, 1640.
Marçais (Georges), voir Diehl (Charles) et Marçais (Georges), ainsi que Gsell (S.), Marçais (Georges), Yver (G.).
Marciani (Corrado), *Lettres de change aux foires de Lanciano au XVI^{e} siècle*, Paris, 1962.
Marcucci (Ettore), voir Sassetti (F.).
Marguerite d'Autriche, voir Gachard (L.-P.).
Mariana (Juan), *Storiæ de rebus Hispaniæ*, libri 25 ; t. I de la continuation p. Manuel José de Medrano, Madrid, 1741.
Marliani (Giovanni Bartolomeo), *Topographia antiquæ Romæ*, Lyon, 1534.
Martiáñez (M.), voir Fuentes Martiáñez (M.).
Martin (Alfred von), *Sociologia del Renacimiento*, Mexico, 1946.
Martin (Henri-Jean), voir Febvre (Lucien) et Martin (Henri-Jean).
Martínez (Mariano), voir Alcocer Martínez (Mariano).
Martínez de Azcoitia (Herrero), *La Población Palentina en los siglos XVI y XVII*, Palencia, 1961.
Martínez Ferrando (J. E.), *Privilegios otorgados por el emperador Carlos V...*, Barcelone, 1943.
Marx (Karl), *Contribution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trad. sur la 2^{e} éd. allemande par J. Molitor, Paris, 1954.
Mas-Latrie (Jacques-M.-J.-L.), *Traités de paix et de commerce...*, Paris, 1866, 2 vol.
Massieu (abbé Guillaume), *Histoire de la Poësie française avec une défense de la Poësie*, Paris, 1739.
Massignon (Louis), *Annuaire du monde musulman*, Paris, 1955.
Masson (Paul), *Histoire du commerce francais dans le Levant au XVII^{e} siècle*, Paris, 1896.
Histoire du commerce français dans le Levant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11.
Les Compagnies du Corail, Paris, 1928.
Maull (Otto), *Geographie der Kulturlandschaft*, Berlin et Leipzig, 1932.
Maunier (René) et Giffard (A.), *Faculté de droit de Paris. Salle de travail d'ethnologie juridique. Conférences 1929-1930. Sociologie et Droit romain*, Paris, 1930.
Maurand (Jérôme), *Itinéraire de Jérôme Maurand d'Antibes à Constantinople (1544)*, p.p. Léon Dorez, Paris, 1901.
Maurel (Paul), *Histoire de Toulon*, Toulon, 1943.
Mauro (F.), *Le Portugal et l'Atlantique au XVII^{e} siècle, 1570-1670*, Paris, 1960.
Mayer-Löwenschwerdt (Erwin), *Der Aufenthalt der Erzherzöge Rudolf und Ernst in Spanien, 1564-1571*, Vienne, 1927.
Mayerne (Théodore Turquet de), *Sommaire description de la France, Allemagne, Italie, Espagne, avec la guide des chemins et postes*, Rouen, 1615.
Mazzei (J.), *Politica doganale differenziale e clausola della nazione più favorita*, Florence, 1930.
Mecatti (G. M.), *Storia cronologica della città di Firenze*, Naples, 1755, 2 vol.
Médicis (Catherine de), voir La Ferrière (comte Hector de).
Medina (Pedro de), *Libro de grandezas y cosas memorables de España*, Alcalá de Henares, 1595.
Medrano (José de), voir Mariana.
Meester (B. de), *Le Saint-Siège et les troubles des Pays-Bas, 1566-1579*, Louvain, 1934.
Meilink-Roelofsz (M. A. P.), *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La Haye, 1962.
Meinecke (F.), *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i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Munich, 1924.
Meister der Politik, éd. par Erich Marcks et Karl Alexander v. Müller, 2^{e} éd., Stuttgart, 1923-1924, 3 vol.
Mélanges en l'honneur de Marcel Bataillon, Paris, 1962.

Mélanges Luzzatto, Studi in onore di Gino Luzzatto, Milan, 1950, 4 vol.
Melis (Federigo), *Aspetti della vita economica medievale*, Sienne-Florence, 1962.
Mellerio (Joseph), *Les Mellerio, leur origine et leur histoire*, Paris, 1895.
Mendez de Vasconcelos (Luis), « Diálogos do sítio de Lisboa », 1608, *in* : Antonio Sérgio, *Antologia dos Economistas Portugueses*, Lisbonne, 1924.
Mendonça, voir Gavy de Mendonça.
Mendoza (Diego de), voir Hurtado de Mendoza.
Mendoza y Bovadilla (cardinal Francisco), *Tizón de la nobleza española*, Barcelone, 1880.
Menéndez Pidal (Gonzalo), *Los caminos en la historia de España*, Madrid, 1951.
Menéndez Pidal (Ramón), *Idea imperial de Carlos V*, Madrid, 1940.
Mentz (Georg), *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der Gegenreformation und des Dreissigjährigen Krieges, 1493-1648*, Tübingen, 1913.
Mercadal (G. Garcia), voir García Mercadal (G.).
Mercier (Ernest), *Histoire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Berbérie),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reculés jusqu'à la conquête française (1830)*, Paris, 1888-1891, 3 vol.
Mérimée (Henri), *L'art dramatique à Valencia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au commencement du XVII^e^ siècle*, Toulouse, 1913.
Merle (L.), *La métairie et l'évolution agraire de la Gâtine poitevine de la fin du Moyen Age à la Révolution*, Paris, 1958.
Merner (Paul-Gerhardt), *Das Nomadentum im nordwestlichen Afrika*, Stuttgart, 1937.
Meroni (Ubaldo), *I « Libri delle uscite delle monete » della Zecca di Genova dal 1589 al 1640*, Mantoue, 1957.
Merriman (R. B.),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in the New*, New York, 1918-1934, 4 vol.
Mesnard (Pierre), *L'essor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au XVI^e^ siècle*, Paris, 1936.
Meyer (Arnold O.), *England und die katholische Kirche unter Elisabeth und den Stuarts*, t. I (seul paru) : *England und die katholische Kirche unter Elisabeth*, Rome, 1911.
Michel (Francisque), *Histoire des races maudites de la France et de l'Espagne*, Paris, 1847, 2 vol.
Michel (Paul-Henri), *Giordano Bruno, philosophe et poète*, Paris, 1952 (extrait du « Collège philosophique » : *Ordre, désordre, lumière*).
La cosmologie de Giordano Bruno, Paris, 1962.
Michelet (Jules), *Histoire de France*, t. VII : *La Renaissance*, Paris, 1855.
Mignet (F.-Auguste-A.), *Charles Quint, son abdication, son séjour et sa mort au monastère de Yuste*, Paris, 1868.
Milano (Attilio), *Storia degli ebrei in Italia*, Turin, 1963.
Milioukov (P.), Seignobos (Charles) et Eisenmann (Louis), *Histoire de Russie*, Paris, 1932-1939, 2 vol.
Milojević (Borivoje), *Littoral et îles dinariques dans le royaume de Yougoslavie*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vol. 2), Belgrade, 1933.
Minguijón (S.), *Historia del derecho español*, Barcelone, 1933.
Mira (Giuseppe), *Aspetti dell'economia comasca all'inizio dell'età moderna*, Côme, 1939.
Moheau, *Recherches et considérations sur la population de la France*, Paris, 1778.
Monchicourt (Charles), *L'expédition espagnole de 1560 contre l'île de Djerba*, Paris, 1913.
Mondoucet (C. de), *Lettres et négociations de Claude de Mondoucet résident de France aux Pays-Bas (1571-1574)*, p.p. L. Didier, Paris, 1891-1892, 2 vol.
Monod (Th.), *L'hippopotame et le philosophe*, Paris, 1943.
Montagne (R.), *Les Berbères et le Makhzen dans le Sud du Maroc*, Paris, 1930.
Montaigne (Michel Eyquem de), *Journal de voyage en Italie*, éd. Ed. Pilon, Paris, 1932.
Montanari (Geminiano), *La zecca in Consulta di Stato*, éd. A. Graziani, Bari, 1913.
Montchrestien (Antoin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patronale, traicté d'œconomie politique*, p.p. Th. Funck-Brentano, Paris, 1889.
Monteil (Amans-Alexis), *Histoire des Français*, Paris, 1828-1844, 10 vol.

Morales (A. de), *Las antigüedades de las ciudades de España*, Madrid, 1792.

Morand (Paul), *Lewis et Irène*, Paris, 1931.

Morazé (Charles),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économique*, Paris, 1943.

Morel-Fatio (Alfred), *L'Espagne au XVIe et au XVIIe siècle*, Heilbronn, 1878.
Études sur l'Espagne, 1re série, 2e éd. : *L'Espagne en France*, Paris, 1895.
Études sur l'Espagne, 4e série, Paris, 1925.
Ambrosio de Salazar et l'étude de l'espagnol en France sous Louis XIII, Paris, 1900.

Moscardo (L.), *Historia di Verona*, Vérone, 1668.

Mousset (A.), voir Longlée (P. de Ségusson de).

Mouton (Léo), *Le Duc et le roi : d'Epernon, Henri IV, Louis XIII*, Paris, 1924.

Müller (Georg), *Die Türkenherrschaft in Siebenbürgen. Verfassungsrechtliches Verhältnis Siebenbürgens zur Pforte, 1541-1688*, Hermannstadt-Sibiu, 1923.

Müller (Johannes), *Zacharias Geizkofler, 1560-1617, des Heiligen Romischen Reiches Pfennigmeister und oberster Proviantmeister im Königreich Ungarn*, Baden, 1938.

Müller (K. O.), *Welthandelsbräuche (1480-1540)*, Stuttgart, 1934 ; 2e tirage, Wiesbaden, 1962.

Musachi (Giovanni), *Historia genealogica della Casa Musachi*, p.p. Carl Hopf, in *Chroniques gréco-romaines inédites ou peu connues*, Berlin, 1873.

Nadal (G.) et Giralt (E.), *La population catalane de 1553 à 1717*, Paris, 1960.

Nalivkin (K.), *Histoire du Khanat de Khokand*, Paris, 1889.

Naudé (W.), *Die Getreidehandelspolitik der europaischen Staaten vom 13. bis zum 18. Jahrhundert*, Berlin, 1896.

Navagero (Andrea), *Il viaggio fatto in Spagna*, Venise, 1563.

Nef (John. U),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Londres, 1932, 2 vol.

Nelson (John Charles), *Renaissance Theory of Love, the Context of Giordano Bruno's « Eroici furori »*, New York, 1958.

Niccolini (Fausto), *Aspetti della vita italo-spagnuola nel Cinque e Seicento*, Naples, 1934.

Nicot (Jean), *Jean Nicot, ambassadeur de France au Portugal au XVIe siècle. Sa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p.p. E. Falgairolle, Paris, 1897.

Nicolay (Nicolas de), *Navigations, pérégrinations et voyages faicts en la Turquie*, éd. d'Anvers, 1576.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ville de Lyon et des anciennes provinces du Lyonnais et du Beaujolais, Lyon, éd. de 1889, 2 vol.

Nielsen (A.), *Dän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Iéna, 1933.

Niemeier (G.), *Siedlungsgeographische Untersuchungen in Niederandalusien*, Hambourg, 1935.

Nistor (J.), *Handel und Wandel in der Moldau bis zum Ende des 16. Jahrhunderts*, Czernowitz, 1912.

Noailles (MM. de), voir Vertot (abbé Aubert de).

Noberasco (F.), voir Scovazzi (Italo) et Noberasco (F.).

Nobili (Giacinto, dit Rafaele Frianoro), *Il vagabondo*, Venise, 1627.

Noble de Lalauzière (J.-F.), *Abrégé chronologique de l'histoire d'Arles*, Arles, 1808.

Nueva Recopilación de las leyes de España, Madrid, 1772-1775, 3 vol.

Nuntiaturberichte aus Deutschland nebst erganzenden Aktenstücken, 1. Abt., 1533-1559, Gotha, 1892-1912, 12 vol. ; *2. Abt., 1560-1572*, Vienne, 1897-1939, 6 vol. ; *3. Abt, 1572-1585*, Berlin, 1892-1909, 5 vol. ; *(4. Abt.) 1585 (1584)-1590 (1592)*, Paderborn, 1895-1919, 3 t. en 5 vol.

Obermann (Karl), voir *Probleme der Ökonomie und Politik in den Beziehungen zwischen Ost und West.*

Oexmelin (Alexandre O.), *Histoire des aventuriers flibustiers...*, Trévoux, 1775, 2 vol.

Olagüe (L.), *La decadencia española*, Madrid, 1950-1951, 4 vol.

Oncken (Wilhelm), *Allgemeine Geschichte in Einzelerstellungen*, Berlin, 1878-1892 (1893), 43 vol.

Ortega y Gasset (José), *España invertebrada*, Madrid, 1934.
Papeles sobre Velázquez y Goya, Madrid, 1950.

Ortega y Rubio (Juan), *Historia de Valladolid*, Valladolid, 1881, 2 vol.
Relaciones topográficas de los Pueblos de España, Madrid, 1918.

Palatini (Leop.), *L'Abruzzo nelle Storia documentata di Carlo V di Giuseppe de Leva*, Aquila, 1896.

Palencia, voir González Palencia (Angel).

Paléologue (M.), *Un grand réaliste, Cavour*, Paris, 1926.

Parain (Charles), *La Méditerranée : les hommes et leurs travaux*, Paris, 1936.

Pardessus (J.-M.), *Collection des lois maritimes antérieure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828-1845, 6 vol.

Paré (Ambroise), *Œuvres*, 5^e^ éd., Paris, 1598.

Parenti (G.), *Prime ricerche sulla rivoluzione dei prezzi in Firenze*, Florence, 1939.

Paris (L.), voir Aubespine (Sébastien de l').

Pariset (G.), *L'État et les églises en Prusse sous Frédéric-Guillaume I^er^*, Paris, 1897.

Parpal y Marqués (C.), *La isla de Menorca en tiempo de Felipe II*, Barcelone, 1913.

Paruta (Andrea), *Relazione di A.P. console per la Repubblica Veneta in Alessandria presentata nell'ecc. mo Collegio ai 16 dicembre 1609...*, a cura di Luigi Baschiera, per nozze Arbib-Levi, Venise, 1883.

Paruta (Paolo), *Historia vinetiana*, Venise, 1605.
La legazione di Roma (1592-1595), p.p. Giuseppe de Leva, Venise, 1887, 3 vol.

Pastor (Ludwig von), *Geschichte der Päpste seit de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3^e^ et 4^e^ éd., Fribourg-en-Brisgau, 1901-1933, 16 vol. ; trad. française : *Histoire des Papes*, par Furcy-Raynaud, 1888-1934, 16 vol.

Paz Espeso (Julián), *Catálogo de la 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éditos (C.O.D.O.I.N.)*, Madrid, 1930, 2 vol. Voir aussi Espejo de Hinojosa (Cristóbal) y Paz Espeso (Julián).

Pédelaborde (P.), *Le climat du bassin parisien, essai d'une méthode rationnelle de climatologie physique*, Paris, 1957.

Pegolotti, voir Balducci Pegolotti.

Pellegrini (Amedeo), *Relazioni inedite di ambasciatori lucchesi alla corte di Roma*, sec. *XVI-XVII*, Rome, 1901.

Pellissier de Raynaud (E.), *Mémoires historiques et géographiques sur l'Algérie*, Paris, 1844.

Pereyra (Carlos), *Historia de la América española*, Madrid, 1924-1926, 8 vol.

Perez (Antonio), *L'art de gouverner*, p.p. J. M. Guardia, Paris, 1867.

Pérez (Damião), *Historia de Portugal*, Barcelone, 1926-1933, 8 vol.

Pérez (Juan Beneyto), voir Beneyto Pérez (Juan).

Pérez de Messa (D.), voir Medina (Pedro de).

Pérez Villamil (Manuel), voir Catalina García (Juan) et Pérez Villamil (Manuel).

Peri (Domenico), *Il negociante*, Gênes, 1638.

Perret (Jacques), *Siris*, Paris, 1941.

Petit (Édouard), *André Doria, un amiral condottiere au XVI^e^ siècle, 1466-1560*, Paris, 1887.

Petrocchi (Massimo), *La rivoluzione cittadina messinese del 1674*, Florence, 1954.

Peyeff (Christo), *Agrarverfassung und Agrarpolitik in Bulgarien*, Charlottenburg, 1926.

Pfandl (L.), *Introducción al siglo de oro*, Barcelone, 1927.
Geschichte der spanischen Nationalliteratur in ihrer Blütezeit, Fribourg-en-Brisgau, 1928.
Johanna die Wahnsinnige. Ihr Leben, ihre Zeit, ihre Schuld, Fribourg-en-Brisgau, 1930 ; traduit en français par R. de Liedekerke sous le titre : *Jeanne la Folle*, Bruxelles, 1938.
Philipp II. Gemälde eines Lebens und einer Zeit, Munich, 1938 ; trad. fr. : *Philippe II*, Paris, 1942.

Philipp (Werner), *Ivan Peresvetov und seine Schriften zur Erneuerung des Moskauer Reiches*, Königsberg, 1935.

Philippson (Alfred), *Das Mittelmeergebiet, seine geographische und kulturelle Eigenart*, Leipzig, 1904 ; 4^e^ éd., 1922.

Philippson (Martin), *Ein Ministerium unter Philipp II. Kardinal Granvella am spanischen Hofe (1579-1586)*, Berlin, 1895.

Pieri (Piero), *La crisi militare italiana nel Rinascimento*, Naples, 1934.

Pierling (Paul), *Rome et Moscou, 1547-1579*, Paris, 1883.
Un nonce du Pape en Moscovie, préliminaires de la trêve de 1582, Paris, 1884.

Piffer Canabrava (Alice), *O commercio português no Rio da Plata, 1580-1640*, São Paulo, 1944.

Piganiol (A.), *Histoire de Rome*, Paris, 1939.

Pino-Branca (A.), *La vita economica degli Stati italiani nei secoli XVI, XVII, XVIII secondo le relazioni degli ambasciatori veneti*, Catane, 1928.

Piot (Charles), voir Granvelle, ainsi que Gachard (L.-P.) et Piot (Charles).

Pirenne (Henri), *Les villes du Moyen Age*, Bruxelles, 1927.
Histoire de Belgique, Bruxelles, 1900-1932, 7 vol.

Pirenne (Jacques), *Les grands courants de l'histoire universelle*, Neuchâtel, 1948-1953, 3 vol.

Planhol (Xavier de), *De la plaine pamphylienne aux lacs pisidans. Nomadisme et vie paysanne*, Paris, 1958.

Plantet (Eugène), *Les Consuls de France à Alger avant la conquête*, Paris, 1930.

Platter (Félix), *Mémoires de Félix Platter*, traduits et annotés par Édouard Fick, Genève, 1866.

Platter (Félix), *Félix et Thomas Platter à Montpellier*, Montpellier, 1892.

Platzhoff (W.), *Geschichte des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s, 1559-1660*, Munich, 1928.

Plesner (J.), *L'émigration de la campagne à la ville libre de Florence au XIII^e siècle*, Copenhague, 1934.

Pohlhausen (H.), *Das Wanderhirtentum und seine Vorstufen*, Braunschweig, 1954.

Poirson (A.-S.-J.-C.), *Histoire du règne de Henri IV*, Paris, 1865-1866, 4 vol.

Poliakov (Léon), *Histoire de l'antisémitisme* ; I : *Du Christ aux Juifs de Cour*, Paris, 1955 ; II : *De Mahomet aux Marranes*, Paris, 1961.
Les " banchieri " juifs et le Saint-Siège, du XIII^e au XVII^e siècle, Paris, 1965.

Poni (Carlo), *Gli aratri e l'economia agraria nel Bolognese dal XVII al XIX secolo*, Bologne, 1963.

Porcar (Moisés Juan), *Cosas evengudes en la ciutat y regne de Valencia. Dietario de Moisés Juan Porcar, 1589-1629*, p.p. Vicente Castaneda Alcover, Madrid, 1934.

Porchnev (Boris),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de 1623 à 1648*, Paris, 1963, trad. française.

Porreño (Baltasar), *Dichos y hechos del señor rey don Philipe segundo el prudente...*, Cuenca, 1621.

Pose (Alfred), *La monnaie et ses institutions*, Paris, 1942, 2 vol.

Poullet (Edmond) et Piot (Charles), voir Granvelle (cardinal).

Pouqueville (F.-C.-H.-L.), *Voyage de la Grèce*, Paris, 1820-1821, 5 vol.

Presotto (Danilo), « *Venuta Terra* » e « *Venuta Mare* » *nel biennio 1605-1606*, thèse dactylographiée de la Faculté d'Économie et Commerce de Gênes, 1963.

Prestage (E.), *The Portuguese Pioneers*, Londres, 1933.

Prévost (abbé A.-F.),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voyages*, Paris, 1746, 20 vol.

Primeira Visitação do Santo Officio as partes do Brasil pelo Licenciado Heitor Furtado de Mendoça..., deputado de Santo Officio ; I : *Confissões de Bahia, 1591-1592*, São Paulo, 1922 ; II : *Denunciacoes de Bahia, 1592-1593*, São Paulo, 1925 ; III : *Denunciacões de Pernambuco, 1593-1595*, São Paulo, 1929.

Probleme der Ökonomie und Politik in den Beziehungen zwischen Ost- und Westeuropa vom 17.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p.p. par Karl Obermann, Berlin, 1960.

Ptasnik (S.), *Gli Italiani a Cracovia dal XVI° secolo al XVIII°*, Rome, 1909.

Puig y Cadafalch (J.), *L'architectura romanica a Catalunya* (en collaboration), Barcelone, 1909-1918, 3 vol.
Le premier art roman, Paris, 1928.

Pugliese (S.), *Condizioni economiche e finanziarie della Lombardia nella prima metà del secolo XVIII*, Turin, 1924.

Putzger (F. W.), *Historischer Schulatlas*, 73e éd. d'A. Hansel, Bielefeld, Berlin et Hanovre, 1958.

Pyrard de Laval (François), *Voyage... contenant sa navigation aux Indes orientales...*, 3e éd., Paris, 1619.

Quadt (M.), *Deliciœ Galliœ sive itinerarium per universam Galliam*, Francfort, 1603.

Quarti (Guido Antonio), *La battaglia di Lepanto nei canti popolari dell'epoca*, Milan, 1930.

Queiros Vegoso (José Maria de), *Dom Sebastião, 1554-1578*, 2e éd., Lisbonne, 1935.

Quétin, *Guide en Orient, itinéraire scientifique, artistique et pittoresque*, Paris, 1846.

Quevedo y Vellegas (Francisco Gomez), « Isla des los Monopantos », *in : Obras satiricas y festivas*, Madrid, 1958, t. II, Madrid, 1639.

Quinet (Edgar), *Mes vacances en Espagne*, Paris, 4e éd., 1881.
Les Révolutions d'Italie, Paris, 1848-1851, 2 vol.

Quiqueran de Beaujeu (P.), *La Provence louée*, Lyon, 1614.

Rabelais (François), *Gargantua*, éd. « Les Belles Lettres », Paris, 1955.
Le Quart Livre du noble Pantagruel, in *Œuvres de Rabelais*, éd. Garnier, Paris, 1962, 2 vol.

Rachfahl (F.), *Le registre de Franciscus Liscaldius, trésorier général de l'armée espagnole aux Pays-Bas de 1567 à 1576*, Bruxelles, 1902.

Raffy (Adam), *Wenn Giordano Bruno ein Tagebuch geführt hätte*, Budapest, 1956.

Rahola (Federico), *Economistas españoles de los siglos XVI y XVII*, Barcelone, 1885.

Ramel (François de), *Les Vallées des Papes d'Avignon*, Dijon, 1954.

Ranke (Leopold von), *Die Osmanen und die spanische Monarchie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4. Aufl. des Werkes « Fürsten und Völker von Südeuropa »*, Leipzig, 1877, 2 vol. ; trad. fr. : *Histoire des Osmanlis et de la monarchie espagnole pendant l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Paris, 1839.

Raphaël du Mans, *Estat de la Perse en 1660...*, p.p. Ch. Schefer, Paris, 1890.

Rau (Virginia), *Subsidios para o estudo das feiras medievais portuguesas*, Lisbonne, 1943.

Raveau (Paul), *L'agriculture et les classes paysannes. La transformation de la propriété dans le Haut-Poitou au XVIe siècle*, Paris, 1926.

Raynaud (E. Pellissier de), voir Pellissier de Raynaud (E.).

Razzi (Serafino), *La storia di Raugia*, Lucca, 1595.

Rebora (Giovanni), *Prime ricerche sulla « Gabella Caratorum sexaginta Maris »*, thèse dactylographiée de la Faculté d'Économie et Commerce de Gênes, 1963.

Recherches et Matériaux pour servir à une Histoire de la domination française aux XIIIe, XIVe et XVe siècles dans les provinces démembrées de l'empire grec à la suite de la quatrième croisade, p.p. J. A. C. Buchon, « Panthéon littéraire », Paris, 1840, vol. III, 2 t. en 1 vol.

Recopilación de las leyes destos reynos hecha por mandado del Rey, Alcala de Hénares, 1581, 3 vol.

Recouly (Raymond), *Ombre et soleil d'Espagne*, Paris, 1934.

Recueils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 ; V : *La foire*, Bruxelles, 1953 ; VII : *La ville*, Bruxelles, 1955, 3 vol.

Renaudet (Augustin), *Machiavel*, Paris, 1942.
L'Italie et la Renaissance italienne (cours professé à la Sorbonne), Paris, 1937. Voir aussi Hauser (Henri) et Renaudet (Augustin).

Reparaz (Gonzalo de), *Geografia y politica*, Barcelone, 1929.

Reparaz (Gonzalo de), fils du précédent, *La época de los grandes descubrimientos españoles y portugueses*, Buenos Aires, 1931.

Retaña (Luis de Fernández), *Cisneros y su siglo*, Madrid, 1929-1930.

Reumont (Alfred von), *Geschichte Toscana's seit dem Ende des florentinischen Freistaats*, Gotha, 1876-1877, 2 vol.

Reznik (J.), *Le duc Joseph de Naxos,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juive du XVIe siècle*, Paris, 1936.

Riba y Garcia (Carlos), *El consejo supremo de Aragón en el reinado de Felipe II*, Valence, 1914.

Ribbe (Charles de), *La Provence au point de vue des bois, des torrents et des inondations avant et après 1789*, Paris, 1857.

Ribier (Guillaume), *Lettres et mémoires d'estat*, Paris, 1666, 2 vol.

Ricard (Samuel), *Traité général du commerce*, 2e éd., Amsterdam, 1706.

Richard (P.), voir Hefele (Charles-Joseph) et Hergen Rœther (cardinal J.).

Rilke (R. M.), *Lettres à un jeune poète*, trad. française, Paris, 1937.

Rivet (P.) et Arsandaux (H.), *La métallurgie en Amérique précolombienne*, Paris, 1946.

Riza Seifi (Ali), *Dorghut Re'is*, 2e éd., Constantinople, 1910 (édition en alphabet turco-latin, 1932).

Rochechouart (L.-V.-L. de), *Souvenirs sur la Révolution, l'Empire et la Restauration*, Paris, 1889.

Rodocanachi (Emmanuel-P.), *La réforme en Italie*, Paris, 1920.

Rodriguez (Domingos), *Arte de Cozinha*, Lisbonne, 1652.

Rodríguez Marín (Francisco), *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Madrid, 1916.

Roger (Noëlle), *En Asie Mineure : la Turquie du Ghazi*, Paris, 1930.

Röhricht (R.), *Deutsche Pilgerreisen nach dem Heiligen Lande*, nouv. éd., Innsbruck, 1900.

Romanin (Samuele), *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 Venise, 1853-1861, 10 vol.

Romano (Bartolomeo), voir Crescentio (Bartolomeo).

Romano (Ruggiero), *Commerce et prix du blé à Marseill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56.

Romano (Ruggiero), Spooner (Frank C.), Tucci (Ugo), *Les prix à Udine*, à paraître.

Romier (Lucien), *Les origines politiques des guerres de religion*, Paris, 1913-1914, 2 vol.
La conjuration d'Amboise, Paris, 1923.
Catholiques et huguenots à la cour de Charles IX, Paris, 1924.
Le royaume de Catherine de Médicis, 3e éd., Paris, 1925, 2 vol.

Rossi (E.), *Il dominio degli Spagnuoli e dei Cavalieri di Malta a Tripoli (1530-1551)*, Intra, 1937.

Roth (Cecil), *The House of Nasi : I. Doña Gracia*, Philadelphie, 1948 ; II. *The Duke of Naxos*, Philadelphie, 1948.

Roth (Johann Ferdinand), *Geschichte des nürnbergischen Handels*, Leipzig, 1800-1802, 4 vol.

Roupnel (Gaston), *Le vieux Garain*, 7e éd., Paris, 1939.
Histoire et destin, Paris, 1943.
La ville et la campagne au XVIIe siècle. Étude sur les populations du pays dijonnais, 2e éd., Paris, 1955.

Rousseau (baron Alphonse), *Annales Tunisiennes*, Alger, 1864.

Rovelli (Giuseppe), *Storia di Como*, Milan, 1789-1803, 3 vol.

Rowlands (R.), *The Post of the World*, Londres, 1576.

Rubio Ortega, voir Ortega y Rubio (Juan).

Ruble (Alphonse de), *Le traité du Cateau-Cambrésis (2 et 3 avril 1559)*, Paris, 1889. Voir aussi Aubigné (Théodore Agrippa d').

Rubys (Claude), *Histoire véritable de la ville de Lyon*, Lyon, 1604.

Ruiz Martín (F.), *Lettres marchandes échangées entre Florence et Medina del Campo*, Paris, 1965.
Les aluns espagnols, indice de la conjoncture économique de l'Europe au XVIe siècle, à paraître.
El siglo de los Genoveses en Castilla (1528-1627) ; capitalismo cosmopolita y capitalismos nacionales, à paraître.

Rumeu de Armas (Antonio), *Piraterías y ataques navales contra las islas Canarias*, Madrid, 1947, 6 vol.

Rybarski (R.), *Handel i polityka handlowa Polski w XVI stuleciu*, Poznań, 1928-1929, 2 vol. en 1.

Sachau (Eduard), *Am Euphrat und Tigris, Reisenotizen aus dem Winter 1897-1898*, Leipzig, 1900.

Saco de Gibraltar, in : *Tres relaciones históricas*, « Colección de libros raros ô curiosos », Madrid, 1889.

Sagarminaga (Fidel de), *El gobierno y régimen foral del señorío de Viscaya*, rééd. par Dario de Areitio, Bilbao, 1934, 3 vol.

Saint-Denys (Antoine Juchereau de), voir Juchereau de Saint-Denys (Antoine).

Saint-Sulpice, voir Cabié (E.).

Sakâzov (Ivan), *Bulgar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Berlin et Leipzig, 1928.

Salazar (J. de), *Politica Española*, Logroño, 1617.

Salazar (Pedro de), *Hispania victrix*, Medina del Campo, 1570.

Salomon (Noël), *La campagne en Nouvelle-Castille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d'après les « Relaciones Topográficas »*, Paris, 1964.

Salva (Jaime), *La Orden de Malta y las acciones españolas contra Turcos y Berberiscos en los siglos XVI y XVII*, Madrid, 1944.

Salvestrini (Virgilio), *Bibliografia di Giordano Bruno, 1581-1950*, 2e éd. posthume, p.p. Luigi Firpo, Florence, 1958.

Salzman (L. F.), *English Trade in the Middle Ages*, Oxford, 1931.

Samanes (Floristan), voir Floristan Samanes (Alfredo).

Samazeuilh (Jean-François), *Catherine de Bourbon, régente du Béarn...*, Paris, 1863.

Sânchez Alonso (Benito), *Fuentes de la historia española e hispano-americana*, 3e éd., Madrid, 1946.

Sanderson (John), *The Travels of John Sanderson in the Levant (1584-1602)*, p.p. William Forster, Londres, 1931.

Sandoval (A.), voir Gamir Sandoval (A.).

Sansovino (Francesco), *Dell'historia universale dell'origine et imperio de' Turchi*, Venise, 1564.

Sanudo (Marin), *Diarii*, Venise, 1879-1903, 58 vol.

Sapori (Armando), *Studi di Storia economica medievale*, Florence, 1946, 2 vol.

Saraiva (Antonio José), *L'inquisition et la légende des Marranes*, à paraître.

Sardella (P.), *Nouvelles et spéculations à Venise*, Paris, 1948.

Sassetti (F.), *Lettere edite e inedite di Filippo Sassetti*, p.p. Ettore Marcucci, Florence, 1855.

Sauermann (Georg), *Hispaniæ Consolatio*, Louvain, 1520.

Sauvaget (J.),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 l'Orient musulman*, Paris, 1943.
Alep. Essai sur le développement d'une grande ville syrienne des origines au milieu du XIX^e^ siècle, Paris, 1941.

Savary (François), voir Brèves (François Savary, sieur de).

Savary des Bruslons (Jacques),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commerce, d'histoire naturelle et des arts et métiers*, Copenhague, 1759-1765, 5 vol.

Sayous (A.-E.), *Le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à Tunis depuis le XII^e^ siècle jusqu'à la fin du XVI^e^*, Paris, 1929.

Scarron (P.), *Le Roman comique*, Paris, 1651, éd. Garnier, Paris, 1939.

Schäfer (Ernst),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spanischen Protestantismus und der Inquisition im 16. Jahrhundert*, Gütersloh, 1902, 3 t. en 2 vol.

Schalk (Carlo), *Rapporti commerciali tra Venezia e Vienna*, Venise, 1912.

Scharten (Théodora), *Les voyages et séjours de Michelet en Italie, amitiés italiennes*, Paris, 1934.

Schefer (Ch.), voir Raphaël du Mans.

Schiedlausky (G.), *Tee, Kaffee, Schokolade, ihr Eintritt in die europäische Gesellschaft*, Munich, 1961.

Schmidhauser (Julius), *Der Kampf um das geistige Reich. Bau und Schicksal der Universität*, Hambourg, 1933.

Schnapper (Bernard), *Les rentes au XVI^e^ siècle. Histoire d'un instrument de crédit*, Paris, 1957.

Schnürer (Gustav), *Katholische Kirche und Kultur in der Barockzeit*, Paderborn, 1937.

Schöffler (Herbert), *Abendland und Altes Testament. Untersuchung zur Kulturmorphologie Europas, insbesondere Englands*, 2e éd., Francfort-sur-le-Main, 1941.

Schulte (Aloys),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lichen Handels und Verkehrs zwischen Westdeutschland und Italien mit Ausschluss von Venedig*, Leipzig, 1900, 2 vol.

Die Fugger in Rom (1495-1523), mit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Kirchlichen Finanzwesens jener Zeit, Leipzig, 1904, 2 t. en 1 vol.

Geschichte der grossen Ravensburger Handelsgesellschaft, 1380-1530, Stuttgart et Berlin, 1923, 3 vol.

Schumacher (Rupert von), *Des Reiches Hofzaun.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Militärgrenze im Südosten*, Darmstadt, 1940.

Schumpeter (Joseph),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Londres, 1954. Trad. italienne : *Storia dell'analisi economica*, Turin, 1959, 3 vol.

Schweigger (Salomon), *Ein neue Reissbeschreibung auss Teutschland nach Konstantinopel und Jerusalem*, 4e éd., Nuremberg, 1639.

Schweinfurth (G.), *Im Herzen von Afrika, Reisen und Entdeckungen im centralen Aquatorial-Afrika während der Jahre 1868 bis 1871*, Leipzig, 1874, 2 vol.

Sclafert (Th.), *Cultures en Haute-Provence : déboisements et pâturages au Moyen Age*, Paris, 1959.

Scovazzi (Italo) et Noberasco (F.), *Storia di Savona*, Savone, 1926-1928, 3 vol.

Sée (Henri), *Esquisse d'une histoire du régime agraire en Europe aux XVIIIe et XIXe siècles*, Paris, 1921.

Sée (Julien), voir Ha Cohen (Joseph).

Segarizzi (A.), *Relazioni degli Ambasciatori Veneti al Senato*, t. III (1-2) : *Firenze*, Bari, 1916.

Segni (B.), *Storie fiorentine... dall'anno 1527 al 1555*, Augsbourg, 1723.

Ségusson de Longlée (P. de), voir Longlée (P. de Ségusson de).

Seidlitz (W. von), *Diskordanz und Orogenese der Gebirge am Mittelmeer*, Berlin, 1931.

Seignobos (Charles), voir Milioukov (P.), Seignobos (Charles) et Eisenmann (Louis).

Sella (Domenico). *Commerci e industrie a Venezia nel secolo XVII*, Venise-Rome, 1961.

Selve (Odet de),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p.p. Germain Lefèvre-Pontalis, Paris, 1888.

Sens et usage du terme structure dans les 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ouvrage collectif, Paris-La Haye, 1962.

Sepúlveda (P. de), *Sucesos del reinado de Felipe II*, p.p. J. Zarco Cueva in *Historia de varios sucesos...*, Madrid, 1922.

Sercey (comte Félix-E. de), *Une ambassade extraordinaire. La Perse en 1839-1840*, Paris, 1928.

Sereni (Emilio), *Storia del paesaggio agrario italiano*, Bari, 1961.

Serra (Antonio), *Breve trattato delle cause che possono far abondare li regni d'oro argento..., con applicatione al Regno di Napoli*, Naples, 1613.

Serrano (Luciano), *Correspondencia diplomática entre España y la Santa Sede durante el Pontificado de Pio V*, Madrid, 1914, 4 vol.
La Liga de Lepanto, Madrid, 1918-1919, 2 vol.

Serres (Olivier de), *Le Théâtre d'agriculture*, Lyon, 1675.

Le Théâtre d'agriculture et mesnage des champs (pages choisies), Paris, 1941.

Servier (Jean), *Les portes de l'année, rites et symboles : l'Algérie dans la tradition méditerranéenne*, Paris, 1962.

Sestini (dom), *Confronto della ricchezza dei paesi...*, Florence, 1793.

Sicroff (Albert-A.), *Les controverses des statuts de « pureté de sang » en Espagne du XVe au XVIIe siècle*, Paris, 1960.

Siegfried (André), *Vue générale de la Méditerranée*, Paris, 1943.

Signot (Jacques), *La division du monde*, Paris, 1539.

Simiand (François-J.-Ch.),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1930 et 1932, 3 vol.
Le salaire, l'évolution sociale et la monnaie, Paris, 1932, 3 vol.
Recherches anciennes et nouvelles sur le mouvement général des prix du XVI^e^ au XIX^e^ siècle, Paris, 1932.
Les fluctuations économiques à longue période et la crise mondiale, Paris, 1932.

Simon (Wilhelm), *Die Sierra Morena der Provinz Sevilla*, Francfort, 1942, trad. espagn. : *La Sierra Morena de la provincia de Sevilla en los tiempos postvariscios*, Madrid, 1944.

Simonsen (Roberto), *Historia economica do Brasil, 1500-1820*, São Paulo, 1937.

Simonsfeld (H.), *Der Fondaco dei Tedeschi und die deutsch-venetianischen Handelsbeziehungen*, Stuttgart, 1887, 2 vol.

Singer (Charles) *et al.*,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Oxford, 1954-1958, 5 vol.

Sion (Jules), *La France méditerranéenne*, Paris, 1934.

Siri (Mario), *La svalutazione della moneta e il bilancio del Regno di Sicilia nella seconda metà del XVI° secolo*, Melfi, 1921.

Soetbeer (Adolf), *Litteraturnachweis über Geld- und Münzwesen*, Berlin, 1892.

Sombart (Werner), *Krieg und Kapitalismus*, Munich, 1913.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Munich, 1921-1928, 3 t. en 6 vol.
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 Munich, 1922.
Vom Menschen. Versuch einer geistwissenschaftlichen Anthropologie, Berlin, 1938.

Sorre (Maximilien-J.), *Les Pyrénées méditerranéennes*, Paris, 1913.
Méditerranée. Péninsules méditerranéennes, Paris, 1934, 2 vol. (t. VII de la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Les fondements biologiques de la géographie humaine, Paris, 1943.

Sottas (J.), *Les messageries maritimes à Venise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Paris, 1938.

Sources inédites de l'histoire du Maroc, p.p. Philippe de Cossé-Brissac, 2^e^ série : Dynastie filalienne, Archives et Bibliothèques de France, t. V, Paris, 1953.

Souza (A. S. de), *Historia de Portugal*, Barcelone, 1929.

Soveral (Visconde de), *Apontamentos sobre relacões politicas e commerciaes do Portugal com a Republica di Veneza*, Lisbonne, 1893.

Spenlé (Jean-Édouard), *La pensée allemande de Luther à Nietzsche*, Paris, 1934.

Speziale (G. C.), *Storia militare di Taranto*, Bari, 1930.

Spooner (Frank C.), *L'économie mondiale et les frappes monétaires en France, 1493-1680*, Paris, 1956.
Voir aussi Romano (Ruggiero), Spooner (Frank C.), Tucci (Ugo).

Sprenger (Aloys), *Die Post- und Reiserouten des Orients*, Leipzig, 1864.

Staden (H. von), *Aufzeichnungen über den Moskauer Staat*, p.p. F. Epstein, Hambourg, 1930.

Stählin (Karl), *Geschichte Russlands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Stuttgart, Berlin et Leipzig, 1923-1939, 4 t. en 5 vol.

Stasiak (Stefan), *Les Indes portugaises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d'après la Relation du voyage fait à Goa en 1546 par Christophe Pawlowski, gentilhomme polonais*, Lwow, 1926-1928, 3 fasc.

Stefani (Fr.), *Parere intorno al trattato fra Venezia e Spagna sul traffico del pepe e delle spezierie dell'Indie Orientali, di A. Bragadino e J. Foscarini*, ed. per nozze Correr-Fornasari, Venise, 1870.

Stella (C. de), *Poste per diverse parti del mondo*, Lyon, 1572.

Stendhal, *Promenades dans Rome*, Paris, 1858, 2 vol.
L'abbesse de Castro, Paris, 1931.

Sternbeck (Alfred), *Histoire des flibustiers et des boucaniers*, Paris, 1931.

Stochove (Chevalier Vincent), *Voyage du Levant*, Bruxelles, 1650.

Stone (Lawrence), *An Elizabethan : Sir Horatio Palavicino*, Oxford, 1956.

Storia di Milano, p.p. la Fondazione Treccani degli Alfieri : *L'età della Riforma cattolica, 1554-1630*, Milan, 1957.

Strachey (Lytton), *Elizabeth and Essex*, 2^e^ éd., Londres, 1940.

Stubenrauch (Wolfgang), *Kulturgeographie des Deli-Orman*, Stuttgart, 1933.

Suárez (Diego), *Historia del maestre último que fue de Montesa...*, Madrid, 1889.

Sully (Maximilien de Béthune, duc de), *Mémoires*, nouv. éd., Paris, 1822, 6 vol.

Šusta (Josef), *Die römische Curie und das Konzil von Trient unter Pius IV.*, Vienne, 1904-1914, 4 vol.

Szekfü (J.), *État et Nation*, Paris, 1945.

Taine (Hyppolite-A.), *Voyage aux Pyrénées*, 2e éd., Paris, 1858.
La philosophie de l'art, 20e éd., Paris, 1926.

Tamaro (Attilio), *L'Adriatico, golfo d'Italia*, Milan, 1915.

Tassini (Giuseppe), *Curiosità veneziane*, Venise, 1887.

Tavernier (Jean-Baptiste), *Les six voyages qu'il a faits en Turquie, en Perse et aux Indes*, Paris, 1681.

Tawney (R. H.) et Power (E.), *Tudor Economic Documents*, Londres, 1924, 3 vol.

Telbis (Hans), *Zur Geographie des Getreidebaues in Nordtirol*, Innsbruck, 1948.

Tenenti (A.), *Naufrages, corsaires et assurances maritimes à Venise, 1592-1609*, Paris, 1959.
Cristoforo Da Canal. La Marine vénitienne avant Lépante, Paris, 1962.

Termier (P.), *A la gloire de la Terre*, Paris, 1922.

Terreros (M. R. de), voir Guiso (G. M. de).

Teulet (J.-B.-T.-Alexandre), éd. des *Relations politiques de la France et de l'Espagne avec l'Écosse au XVIe siècle (1551-1588)*, nouv. éd., Paris, 1862, 5 vol.

Tevins (J.), *Commentarius de rebus in India apud Dium gestis anno MDXLVI*, Coïmbre, 1548.

Tharaud (Jérôme et Jean), *La bataille à Scutari*, 24e éd., Paris, 1927.
Marrakech ou les seigneurs de l'Atlas, Paris, 1929.

Theissen (J. S.), voir Gachard (L.-P.).

Thénaud (J.), *Le voyage d'Outremer*, Paris, 1884.

Thomazi (Cdt A.-A.), *Histoire de la navigation*, Paris, 1941.

Thumery (Jean de), voir Laffleur de Kermaingant (P.).

Tiepolo (Lorenzo), *Relazione del console Lorenzo Tiepolo (1560)*, p.p. Cicogna, Venise, 1857.

Tocco (Vittorio di), voir Di Tocco (Vittorio).

Tollenare (L.-F.), *Essai sur les entraves que le commerce éprouve en Europe*, Paris, 1820.

Tomić (S. N.), *Naselje u Mletackoj Dolmaciji*, Nich, 1915.

Tommaseo (Nicolò), *Relations des ambassadeurs vénitiens sur les affaires de France au XVIe siècle*, Paris, 1838, 2 vol.

Tongas (G.), *L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avec l'Empire ottoman durant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 et l'ambassade à Constantinople de Philippe de Harlay, comte de Césy, 1619-1640*, Toulouse, 1942.

Törne (P. O. von), *Don Juan d'Autriche et les projets de conquête de l'Angleterre, étude historique sur dix années du XVIe siècle (1568-1578)*, Helsingfors, 1915-1928, 2 vol.

Torres (A.), voir Dragonetti de Torres.

Tott (Baron François de), *Mémoires sur les Turcs et les Tartares*, Amsterdam, 1784, 4 vol.

Tournon (cardinal François de), *Correspondance...*, p.p. Michel François, Paris, 1946.

Toynbee (A.), *L'Histoire, un essai d'interprétation ;* abrégé par D. C. Somervell des volumes I à VI de *A Study of History*, trad. de l'anglais, Paris, 1951.

Trasselli (Carmelo), voir Della Rovere (Antonio).

Trevelyan (George Macaulay), *History of England*, nouv. éd., Londres, 1946.

Tridon (M.), *Simon Renard, ses ambassades, ses négociations, sa lutte avec le cardinal Granvelle*, Besançon, 1882.

Truc (Gonzague), *Léon X et son siècle*, Paris, 1941.

Tucci (Ugo), voir Romano (Ruggiero), Spooner (Frank) et Tucci (Ugo).

Tudela (Benjamin), voir Benjamin de Tudela.

Turba (Gustav), *Venetianische Depeschen vom Kaiserhof*, Vienne, 1889-1896, 3 vol.
Geschichte des Thronfolgerechtes in allen habsburgischen Länden, Vienne, 1903.

Turquet de Mayerne (Théodore), voir Mayerne (Théodore Turquet de).

Tyler (Royall), *Spain, a Study of Her Life and Arts*, Londres, 1909.

Uccelli (Arturo), *Storia della tecnica del Mediaevo ai nostri giorni*, Milan, 1944.

Ugolini (L. M.), *Malta, origini della civiltà mediterranea*, Rome, 1934.

Uhagon (Francisco K. de), *Relaciones históricas de los siglos XVI y XVII*, Madrid, 1896.

Ukers (William H.), *All about Coffee*, New York, 1922.

Ulloa (Modesto), *La hacienda real de Castilla en el reinado de Felipe II*, Rome, 1963.

Usher (A. P.), *The Early History of Deposit Banking in Mediterranean Europe*, vol. I (seul paru), Cambridge, Mass., 1943.

Ustariz (Jerónimo de), *Theorica y practica de comercio y de marina...*, 2e éd., Madrid, 1742.

Vair (Guillaume du), voir Du Vair (Guillaume).

Valle de la Cerda (Luis), *Desempeño del patrimonio de su Magestad y de los reynos, sin daño del Rey y vassallos y con descanso y alivio de todos*, Madrid, 1618.

Van der Essen (Léon), voir Essen (Léon van der) ; voir aussi Frangipani (Ottavio Mirto).

Vander Hammen y León (Lorenzo), *Don Filipe el Prudente, segundo deste nombre, rey de las Españas*, Madrid, 1625.

Varenius (Bernardus), *Geographia generalis*, Amsterdam, 1664.

Varennes (Claude de), voir *Voyage en France...*

Vasconcellos (L. Mendes de), voir Mendez de Vasconcelos (L.).

Vaudoncourt (Guill.), voir Guillaume de Vaudoncourt (Frédéric).

Vaudoyer (J. L.), *Beautés de la Provence*, 15e édition, Paris, 1926.

Vaumas (G. de), *L'éveil missionnaire de la France d'Henri IV à la fondation du Séminaire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Lyon, 1941.

Vayrac (Jean de), *État présent de l'Espagne*, Amsterdam, 1719.

Vázquez de Prada (V.), *Lettres marchandes d'Anvers*, Paris, 1960, 4 vol.

Verlinden (Charles), *L'esclavage dans l'Europe médiévale. I : Péninsule ibérique, France*, Bruges, 1955.

Vertot (René Aubert de), *Ambassades de MM. de Noailles en Angleterre*, p.p. C. Villaret, Leyde et Paris, 1763.

Vicens Vives (J.), *Historia Social y Económica de España*, Barcelone, 1957, 3 vol.
***Manual de Historia Económica de España*, Barcelone, s.d. (1959).**

Vidal de La Blache (Paul), *États et nations de l'Europe*, Paris, 1889.
***Tableau de la géographie de la France*, 3e éd., Paris, 1908.**
***Principes de géographie humaine*, Paris, 1922.**

Viet (Jean), *Les méthodes structuralistes dans les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1965.

Vilar (Pierre), *La Catalogne dans l'Espagne moderne*, Paris, 1962, 3 vol.

Villalón (Christóval de), *Viaje de Turquia...*, 1555, Madrid-Barcelone, 1919, 2 vol.

Villamil (M.), voir Catalina García (Juan) et Pérez Villamil (Manuel).

Villaret (C.), voir Vertot (René Aubert de).

Vital (L.), *Premier voyage de Charles-Quint en Espagne de 1517 à 1518*, Bruxelles, 1881.

Vitale (Eligio) et Brunetti (Mario), *Corrispondenza da Madrid di Leonardo Donà, 1570-1573*, Venise-Rome, 1963, 2 vol.

Vitale (Vito), *Breviario della storia di Genova*, Gênes, 1955, 2 vol.

Vitalis (A.),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de Dominique du Gabre (évêque de Lodève), trésorier des armées à Ferrare (1551-1554), ambassadeur de France à Venise (1555-1557)*, Paris, 1903.

Vivoli (G.), *Annali di Livorno*, Livourne, 1842-1846, 4 vol.

Voinovitch (L.), *Depeschen des Francesco Gondola, Gesandten der Republik Ragusa bei Pius V. und Gregor XIII. 1570-1573*, Vienne, 1909.
***Histoire de Dalmatie*, Paris, 1935, 2 vol.**

***Voyage de France, dressé pour l'instruction et commodité tant des François que des étrangers*, 4e éd. trad. par Cl. de Varennes, Rouen, 1647.**

Wahrmund (L.), *Das Ausschliessungsrecht (jus exclusiva) der katholischen Staaten Osterreich, Frankreich und Spanien bei den Papstwahlen*, Vienne, 1883.

Walcher (Joseph), *Nachrichten von den Eisbergen in Tyrol*, Vienne, 1773.

Walsingham (Francis), *Mémoires et instructions pour les ambassadeurs*, Amsterdam, 1700.

Waltz (Pierre), *La Question d'Orient dans l'antiquité*, Paris, 1943.

Wätjen (Hermann), *Die Niederländer im Mittelmeergebiet zur Zeit ihrer höchsten Machtstellung*, Berlin, 1909.

Weber (Erich), *Beiträge zum Problem des Wirtschaftsverfalls*, Vienne, 1934.

Wee (Herman van der),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fourteenth-sixteenth centuries*, Louvain, 1963, 3 vol.

Weiller (Jean), *Problèmes d'économie internationale*, Paris, 1946-1950, 2 vol.
L'économie internationale depuis 1950, du plan Marshall aux grandes négociations commerciales entre pays inégalement développés, Paris, 1965.

Weiss (Charles), *L'Espagne depuis le règne de Philippe II jusqu'à l'avènement des Bourbons*, Paris, 1844, 2 vol.
Voir aussi Granvelle (cardinal de).

Werth (Emil), *Grabstock, Hacke und Pflug*, Ludwigsburg, 1954.

Weulersse (Jacques), *Paysans de Syrie et du Proche-Orient*, Paris, 1946.

Wiet (G.), voir Ibn Iyâs.

Wilczek (Eduard Graf), *Das Mittelmeer, seine Stellung in der Weltgeschichte und seine historische Rolle im Seewesen*, Vienne, 1895.

Wilhelmy (Herbert), *Hochbulgarien*, Kiel, 1935-1936, 2 vol.

Wilkinson (Maurice), *The Last Phase of the League in Provence, 1588-1598*, Londres, 1909.

Williamson (James A.), *Maritime Enterprise, 1485-1588*, Oxford, 1913.

Wood (Alfred C.), *A History of the Levant Company*, Londres, 1935.

Wright (I. A.), *Documents concerning English Voyages to the Spanish Main, 1569-1580*, Londres, 1932.

Wyrobisz (Andrzej), *Budownictwo Murowane w Malopolsce w XIV^{e} et XV^{e} wieku* (résumé en français), Cracovie, 1963.

Yver (G.), *Le commerce et les marchands dans l'Italie méridionale au XIII^{e} et au XIV^{e} siècle*, Paris, 1903.
Voir aussi Gsell (S.), Marçais (G.), Yver (G.).

Zanelli (A.), *Delle condizioni interne di Brescia dal 1642 al 1644 e del moto della borghesia contro la nobiltà nel 1644*, Brescia, 1898.

Zanetti (Armando), *L'ennemi*, Genève, 1939.

Zanetti (Dante), *Problemi alimentari di una economia preindustriale*, Pavie, 1964.

Zarco Cuevas (père J.), *Historia de varios sucesos y de las cosas*, éd. de Madrid, 1922.
Relaciones de pueblos de la diócesis de Cuenca, hechas por orden de Felipe II, Cuenca, 1925, 2 vol.

Zeller (Berthold), *Henri IV et Marie de Médicis*, Paris, 2^{e} éd., 1877.

Zeller (Gaston), *La réunion de Metz à la France, 1552-1648*, Paris-Strasbourg, 1927, 2 vol.
Le siège de Metz par Charles-Quint, oct.-déc. 1552, Nancy, 1943.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au XVI^{e} siècle, Paris, 1948.
La vie économique de l'Europe au XVI^{e} siècle (cours de Sorbonne), Paris, 1953.

Zierer (Otto), *Bilder aus der Geschichte des Bauerntums und der Landwirtschaft*, Munich, 1954-1956, 4 vol.

Zinkeisen (J. W.). *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in Europa*, Gotha, 1840-1863, 7 vol.

Zweig (Stefan), *Les heures étoilées de l'humanité*, trad. franç. d'A. Hella, Paris, 1939.

Parmi les livres récents que je n'ai pas eu le temps d'utiliser à plein, à signaler :

Aymard (Maurice), *Venise, Raguse et le commerce du blé pendant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Paris, 1966.